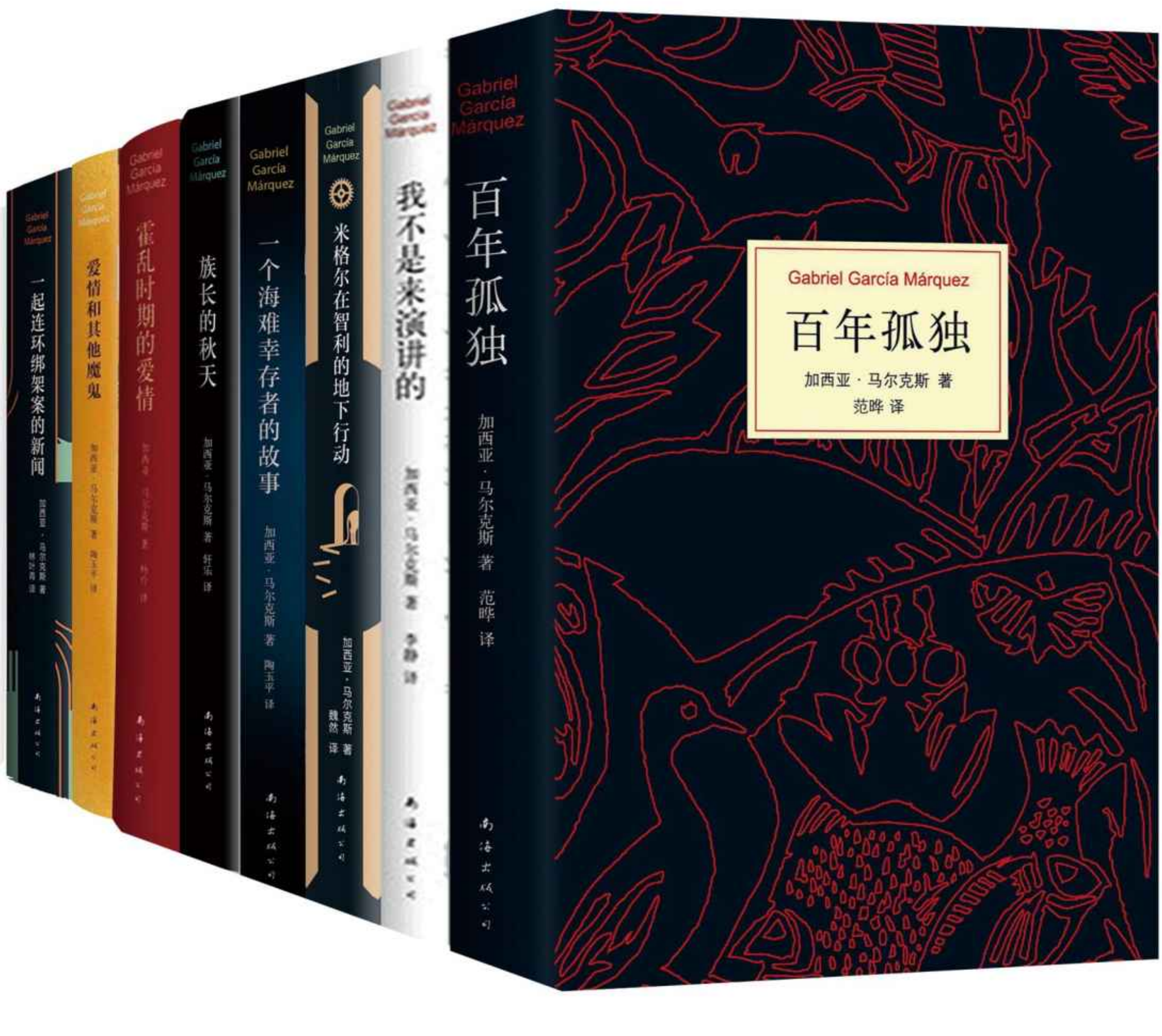
马尔克斯 优选套装

读完《百年孤独》

距离马尔克斯 还有1328公里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　目　录

百年孤独

霍乱时期的爱情

族长的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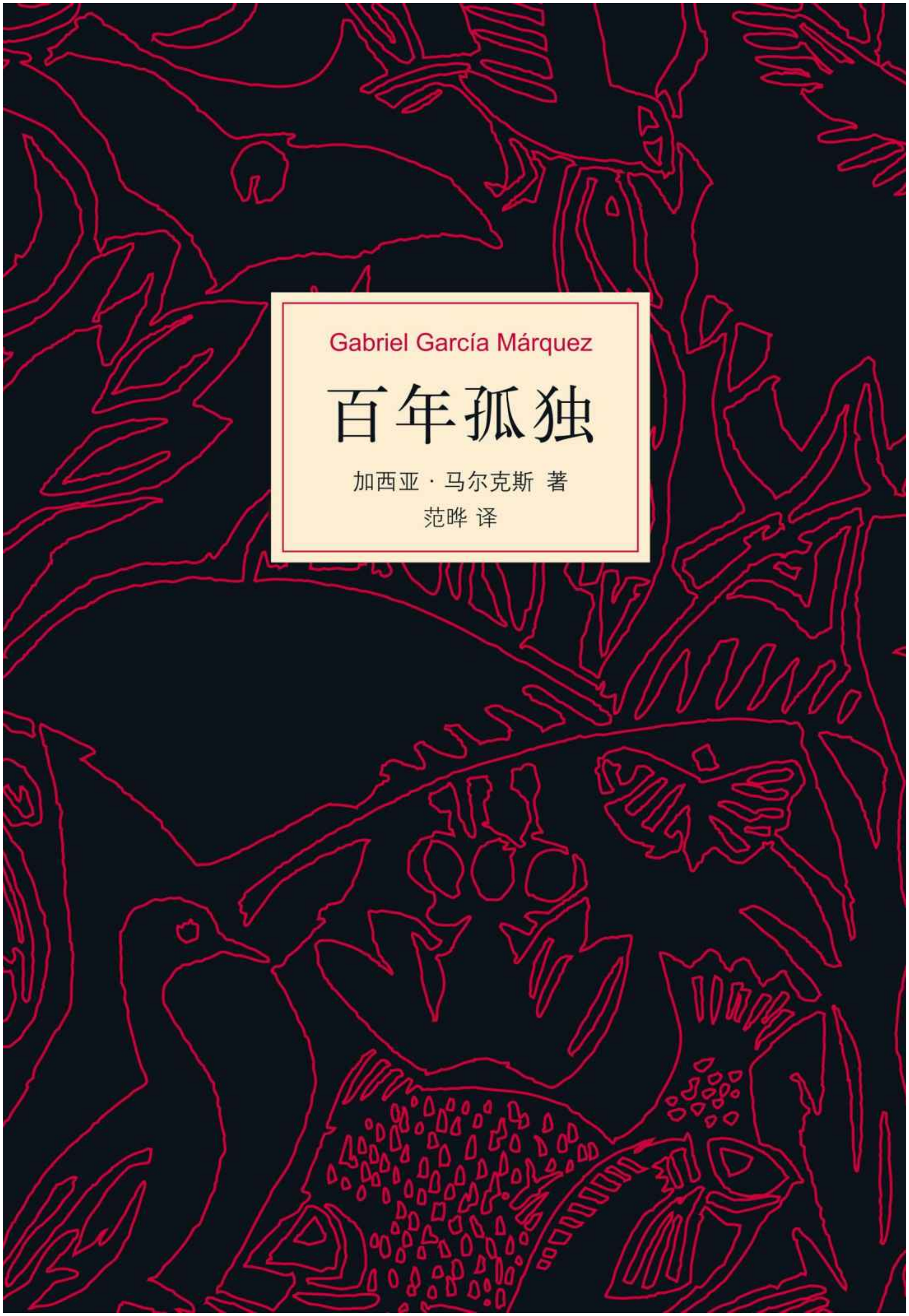
爱情和其他魔鬼

我不是来演讲的

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

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

米格尔在智利的地下行动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范晔 译

目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Obra de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67

Cien años de soledad

献给

赫米·加西亚·阿斯科特

玛利亚·路易莎·艾里奥

一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马孔多是一个二十户人家的村落，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每年三月前后，一家衣衫褴褛的吉卜赛人都会来到村边扎下帐篷，击鼓鸣笛，在喧闹欢腾中介绍新近的发明。最初他们带来了磁石。一个身形肥大的吉卜赛人，胡须蓬乱，手如雀爪，自称梅尔基亚德斯，当众进行了一场可惊可怖的展示，号称是出自马其顿诸位炼金大师之手的第八大奇迹。他拖着两块金属锭走家串户，引发的景象使所有人目瞪口呆：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跌落，木板因钉子绝望挣扎、螺丝奋力挣脱而吱嘎作响，甚至连那些丢失多日的物件也在久寻不见的地方出现，一窝蜂似的追随在梅尔基亚德斯的魔铁后面。“万物皆有灵，”吉卜赛人用嘶哑的嗓音宣告，“只需唤起它们的灵性。”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天马行空的想象一向超出大自然的创造，甚至超越了奇迹和魔法，他想到可以利用这个无用的发明来挖掘地下黄金。梅尔基亚德斯是个诚实的人，当时就提醒他：“干不了这个。”然而那时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对吉卜赛人的诚实尚缺乏信任，仍然拿一头骡子和一对山羊换了那两块磁铁。他的妻子乌尔苏拉·伊瓜兰本指望着靠这些牲口扩展微薄的家业，却没能拦住他。“很快我们的金子就会多到能铺地了。”她丈夫回答。此后的几个月他费尽心力想要证实自己的猜想。他拖着两块铁锭，口中念着梅尔基亚德斯的咒语，勘测那片地区的每一寸土地，连河床底也不曾放过。唯一的挖掘成果是一副十五世纪锈迹斑斑的盔甲，敲击之下发出空洞的回声，好像塞满石块的大葫芦。何

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和一起探险的四个男人将盔甲成功拆卸之后，发现里面有一具已经钙化的骷髅，骷髅的颈子上挂着铜质的圣物盒，盒里有一缕女人的头发。

三月里，吉卜赛人又来了。这次带来一架望远镜和一台足有鼓面大小的放大镜，展出时声称是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的最新发明。他们让一个吉卜赛女人坐在村子一头，将望远镜安在帐篷入口。花上五个里亚尔，人们就可以凑到望远镜后，看到那个吉卜赛女人在眼前出现，仿佛触手可及。“科学消除了距离，”梅尔基亚德斯说，“用不了多久，人们不出家门就能看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他们用那台巨型放大镜作了一次惊人的演示：把一堆干草铺在街道中央，然后通过聚焦阳光点燃。尚未从磁铁实验的失利中平复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又萌生了将这一发明应用于战争的想法。梅尔基亚德斯再次试图让他打消念头，但最后还是接受了两块磁铁加三枚殖民地金币，将放大镜换给了他。乌尔苏拉难过地哭了。那些钱是从她父亲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一匣金币中拿出来的，她本来一直埋在床下，想等待合适的机会做本钱。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无暇安慰她，以科学家的忘我精神全心投入战术实验，甚至不惜以身犯险。为了验证放大镜对敌军产生的效果，他亲自待到阳光的焦点下，结果身体被灼伤后溃烂，挨了很长时间才痊愈。妻子对如此危险的发明心生恐惧而提出抗议，但他全然不顾，险些把家里的房子点燃。他久久待在房间里，计算新武器的战略威力，写出了一本解说无比清晰、说服力无可抗拒的手册。他把该手册连同多种实验记录和多幅示意图一起寄给当局，承担这一使命的信使翻越山脉，迷失于无边的沼泽，蹚过湍急的河水，遭受猛兽的袭击、绝望情绪和瘟疫的打击险些丧命，最后终于找到了邮政骡队途经的驿道。虽然当时远赴首都不太可能，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仍然表示，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他立刻出发，为军方实地演示他的发明，并亲自传授阳光战的精密战术。他等待回复多年，最终厌倦了等待，到梅尔基亚德斯面前哀叹

自己的挫折。于是那个吉卜赛人做出了足以显明其诚实的举动：收回放大镜，把那三枚多卜隆[①]还给他，还留下一些葡萄牙人的地图和多种航海仪器。梅尔基亚德斯亲笔写了一份赫尔曼修士[②]的研究成果提要给他，教他如何使用星盘、罗盘和六分仪。为了确保不受打扰地进行实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宅院深处盖了一间小屋，整个漫长的雨季都把自己关在屋中。他把家庭职责完全抛在脑后，整夜待在院子里观测星体的运行，为了寻找精确测定正午的方法险些患上日晒病。掌握了那些仪器的用法并操作自如后，对空间的认知使他无须离开小屋就能遨游未知的海洋，寻访荒凉的地域，并与神奇的生灵交流。正是在那个时期他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旁若无人地在家中踱步，与此同时乌尔苏拉和孩子们却在菜园里累得直不起腰来，照料香蕉、海芋、木薯、山药、南瓜和茄子。然而，没有任何征兆，他疯狂的活动猝然中断，整个人陷入一种心醉神迷的状态。他连续好几天像是着了魔，喃喃自语，说出一连串自己都无法相信的惊人设想。最终，在十二月一个星期二的午饭时分，他从所有的折磨中一下解脱了。孩子们终其一生都将记得父亲如何在桌首庄严入座，被长期熬夜和苦思冥想折磨得形销骨立，因激动而颤抖着，向他们透露自己的发现：

“地球是圆的，就像个橙子。”

乌尔苏拉再也无法忍耐。“如果你非发疯不可，就一个人疯好了，”她喊道，“别想用你那套吉卜赛人的胡话教坏孩子！”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无动于衷，妻子在狂怒之下把星盘扔到地上摔得粉碎，他也没有被吓着。他又造了一台，还召集村里的男人到自己的小屋，用无人能懂的理论向他们证明，一直向东航行就有可能回到出发点。全村人都确信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已经失去理智，这时梅尔基亚德斯来到，澄清了真相。他当众赞许这个男人的聪明才智，说他仅凭天文观测就建立起的理论尽管在马孔多尚不为人所知，但已

经被实践所证明。为了表示敬佩，他特别馈赠了一样将对村子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礼物：一间炼金实验室。

那一时期，梅尔基亚德斯正以惊人的速度衰老。他头几回来访时看上去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岁数相仿，但当后者仍然力气过人，揪住马耳朵就能将马掀翻的时候，吉卜赛人却好像已被某种顽疾击垮。实际上，那是他无数次周游世界时染上多种罕见疾病的结果。他在帮助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搭建实验室时亲口说过，死神一直追随他的脚步，嗅闻他的行踪，但尚未下定决心给他最后一击。他经历了危害人类的各种疾病和灾难幸存下来。他在波斯得过蜀黍红斑病，在马来群岛患上坏血病，在亚历山大生过麻风病，在日本染上脚气病，在马达加斯加患过腺鼠疫，在西西里碰上地震，在麦哲伦海峡遭遇重大海难，却都大难不死。这个天赋异禀，自称掌握了诺查丹玛斯[3]之钥的人是个阴沉的男子，裹在一团愁云惨雾里，谜一般的目光仿佛能看透一切。他总戴着一顶黑色大礼帽，活像乌鸦展开的翅膀，身穿一件天鹅绒坎肩，染着沧桑岁月的苔印。他智慧无边又神秘莫测，但还是有着凡人的一面，未能摆脱日常生活中琐碎问题的烦扰。他抱怨着衰老和病痛，为经济上微不足道的困窘而难过；他很久以前就不再展露笑容，因为坏血病夺去了他所有的牙齿。在一个闷热的正午，他吐露了心声，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确信那是一段伟大友情的开始。孩子们听着他的神奇故事，目瞪口呆。奥雷里亚诺那时只有五岁，他一生都将记得，那个下午吉卜赛人如何坐在窗前金属的反光中，用管风琴般深沉的声音揭示最幽暗的想象地域，热得沿太阳穴流下油腻的汗水。他的哥哥 何塞·阿尔卡蒂奥，将会把这奇妙的形象作为记忆遗产，传给所有后世子孙。乌尔苏拉却对这次来访印象恶劣，因为她走进房间的时候，正赶上梅尔基亚德斯一分神，打破了一个装有二氯化汞的小瓶。

“这是魔鬼的气味。”她说。

“绝不是。”梅尔基亚德斯纠正道，“魔鬼已被证明具有硫化物的属性，而这不过是一点儿氯化汞。”

一向诲人不倦的梅尔基亚德斯详细讲解了朱砂与魔鬼相关的效用，但乌尔苏拉却未加理睬，径自带孩子们出去祈祷。那种刺鼻的味道将与对梅尔基亚德斯的记忆一起，永远铭刻在她心里。

那间简陋的实验室，除了大量的小锅、漏斗、蒸馏瓶、滤器和滤网，还备有一座简陋的炼金炉，一个仿照“哲学之卵”制成的长颈烧瓶，以及一套由吉卜赛人按照犹太人玛利亚对三臂蒸馏器的现代描述制作的蒸馏过滤设备。梅尔基亚德斯还留下了对应七大行星的七种金属的若干样品，摩西和索希莫④的倍金配方，以及“超绝之精”⑤系列笔记和草图，如果参悟成功就能炼出点金石。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见倍金配方很简单便着了迷，接连几个星期都央求乌尔苏拉挖出她的殖民地金币，说水银能分割多少次，金子就能翻上多少倍。乌尔苏拉像往常一样，在丈夫无可动摇的决心前让了步。于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将三十枚多卜隆金币投入一口坩埚，与铜屑、雌黄、硫黄和铅一起熔化，然后倒入盛满麻油的锅里用旺火煮沸，直到熬出一摊发出恶臭的浓浆，看起来更像是劣质的糖浆而非美妙的黄金。在令人忐忑和绝望的蒸馏过程中，经过与七种行星金属冶合，再放入玄妙的水银和塞浦路斯的硫酸盐中炮制，又用猪油替代萝卜油回锅熬炼，乌尔苏拉宝贵的遗产最后变成一坨碳化的油渣，死死粘在锅底。

当吉卜赛人再来的时候，乌尔苏拉已经发动全村的人加以抵制。但好奇心胜过了恐惧，因为这一次吉卜赛人走遍全村，利用各式乐器制造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叫卖人还声称将要展出纳西安索人最神奇的发明。因此全村人都去了帐篷，付上一个生太伏就看到了青春焕发的梅尔基亚德斯：身体痊愈，皱纹平复，全新的牙齿闪闪发亮。凡是还记得他的牙龈如何毁于坏血病、脸颊如何松弛、嘴唇如何干瘪的人，面对这一无可置疑的明证，都不禁为吉卜赛人的魔力而惊栗。梅尔基

亚德斯将镶在牙床上的牙齿完好无损地摘下并向观众展示—那一瞬间他变回了往昔的老朽模样—随后又戴上牙齿展露出重获青春的微笑，这时惊慌变成了恐惧。即便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都觉得梅尔基亚德斯的知识已经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不过当后者私下里给他讲解了假牙的原理后，他随即感到一阵畅然。他觉得这一切如此简单而神奇，一夜之间又对炼金研究完全失去了兴趣，陷入新的情绪危机，无心饮食，整天在家中踱步。“世上正发生着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对乌尔苏拉说，“就在那边，在河的另一边，各种魔法机器应有尽有，而我们却还像驴子一样生活。”从马孔多创建之初就认识他的人，都惊讶于他在梅尔基亚德斯影响下发生的变化。

当初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是那种年轻的族长式人物，他指导人们怎样播种，建议怎样教育孩子、饲养牲畜，为村社的繁荣与所有人通力合作，在体力劳动上也不例外。从一开始他家的房子就是村里最好的，成为他人仿效的对象。他家有一间敞亮的小厅，一间鲜花盛开、颜色喜人的露台餐厅，两间卧室，一座栽着一棵大栗树的庭院，一片精心打理的菜园，还有一个畜栏，山羊、母鸡和猪在其间和谐相处。在家里乃至整个村子，斗鸡是唯一禁养的动物。

乌尔苏拉的勤劳比起丈夫毫不逊色。她身材娇小，活力充沛，严肃不苟，是个意志坚定的女人，从未有人听她唱过歌。她似乎无处不在，每天从清晨到深夜，伴随着细棉布裙柔和的窸窣声一直四处忙碌。全亏了她，那泥土夯平的地面、未经粉刷的泥墙和自制的粗木家具才永远一尘不染，旧箱子里存放的衣服才永远散发着罗勒的淡淡香气。

像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这样富于进取心的男人，村里再没有第二个。他排定了各家房屋的位置，确保每一户都临近河边，取水同样便捷；还规划了街道，确保炎热时任何一户都不会比别家多晒到太阳。短短几年里，三百名居民的马孔多成为当时已知村镇中最勤勉有序的典范。它的确是一处乐土，没人超过三十岁，也没人死去。

从村庄初建时起，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就制作了捕鸟机关和鸟笼。很快，不光在家里，整个村庄到处都是拟黄鹂、金丝雀、蓝鸲和知更鸟。种类纷繁、数目众多的鸟儿一起鸣唱，令人心烦意乱，乌尔苏拉不得不用蜂蜡堵住耳朵才能保持神志清醒。梅尔基亚德斯的部落第一次来贩卖治头痛的玻璃珠的时候，大家都惊讶于他们竟能找到这个迷失在沼泽雾瘴中的村庄，而吉卜赛人承认他们正是循着鸟鸣而来。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当初建功立业的雄心，迅速在磁铁迷狂、天文演算、炼金幻梦以及见识世上奇观的热望中消磨殆尽，曾经勇于开拓、仪表整洁的他，变成一个外表懒散、不修边幅的男人。他那野蛮人一样的胡须，乌尔苏拉费尽力气才能勉强用菜刀收拾干净。甚至有人将他视为某种诡异巫术的牺牲品。然而当他将开荒的工具扛上肩头，倡议全体村民共同开辟一条将马孔多与新兴发明相连的捷径时，即使是那些深信他已发疯的人也丢下活计与家人而去跟随他。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对这一地区的地理情况一无所知。他只知道向东是无法逾越的山脉，山脉的另一侧是古老的城市里奥阿查，据他的祖父即第一位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所述，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⑥]曾在那里以大炮猎杀鳄鱼为乐，修补后填上稻草送给伊丽莎白女王。年轻的时候，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领着一群同伴，携带妻儿、牲口及所有生活用品，翻越山脉去寻找入海口。他们经过二十六个月的跋涉后决定放弃，为了避免原路返回便建立了马孔多。他对那条路不感兴趣，因为它只能将他带回到过去。向南是永远覆着绿色植被的泥塘和广阔的大沼泽,吉卜赛人都说没见过它的边界。大沼泽西边毗邻的是广袤无垠的水面，那里有皮肤娇嫩的鲸类，它们长着女人的头颅和身体，凭借巨大乳房的魔力让航行者迷失心智。吉卜赛人沿着这条水路航行了六个月，才找到邮政骡队经过的陆地。根据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估计，与文明世界唯一可能的连接

是北方的道路。于是他将当年和自己一起创建马孔多的同一群人用开荒装备和狩猎器械武装起来，把导向工具和地图塞进背包，开始了这场可怕的冒险。

最初几日，没有遇到什么值得一提的阻碍。他们沿着乱石遍布的河岸下到数年前找到盔甲的地方，从那里经野生橘林中的一条小径进入森林。走了快一个星期的时候，他们打了一头鹿来烤熟，决定只吃一半，把另一半腌好留待后日，希望借此尽量推迟拿金刚鹦鹉充饥的日子，因为那蓝色的鸟肉有股浓烈的麝香味。此后的十多天，他们从未见到太阳。地面变得柔软潮湿如火山灰，林莽日益险恶，鸟儿的啼叫和猿猴的喧闹渐行渐远，天地间一片永恒的幽暗。在这潮湿静寂、远在原罪之先就已存在的天堂里，远征队的人们被最古老的回忆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的靴子陷进雾气腾腾的油窟，砍刀斩碎猩红的百合与金黄的蝾螈。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几乎没有说话，只借着某些昆虫发出的微弱光亮，像梦游人一般穿过阴惨的世界，肺叶间满溢令人窒息的鲜血味道。他们无法返回，因为辟出的道路转瞬就被新生的植物再次封闭，其生长速度几乎肉眼可见。“不要紧，”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说，“重要的是别迷失方向。”他始终拿着罗盘，带着队伍走向看不见的北方，直到走出这片着了魔的土地。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没有星光，但黑暗中充盈着清新的空气。人们被漫长的跋涉折磨得精疲力竭，纷纷挂起吊床，两个星期以来第一回安心入眠。醒来时已是日头高照，人们无不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慑：在蕨类和棕榈科植物中间，静静的晨光下，赫然停着一艘覆满尘埃的白色西班牙大帆船。船向右侧微倾，完好无损的桅杆上还残留着肮脏零落的船帆，缆索上有兰花开放点缀其间。船身覆盖着一层由石化的鱼和柔软的苔藓构成的光润护甲，牢牢地嵌在乱石地里。整艘船仿佛占据着一个独特的空间，属于孤独和遗忘的空间，远离时光的侵蚀，避开飞鸟的骚扰。远征者们在船内仔细探查，却发现里面空无一物，只见一座鲜花丛林密密层层地盛开。

大帆船的发现意味着大海就在近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热情受到沉重打击。他将此视为顽皮的命运对自己的嘲弄：曾经作出巨大牺牲、历经无数苦难寻找大海而不得，如今无心寻找它却送上门来，横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成为无法逾越的障碍。多年以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也曾穿越这片土地，那时这里已经成为常规驿道，而他见到的唯有烧焦的龙骨矗立在一片罂粟花地上。直到那时他才相信这段历史不是父亲的想象，不禁为大帆船如何深入陆地至此而困惑不解。然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不曾为这个问题困扰，他又走了四天，来到距大帆船十二公里的海边。面对大海，他的梦想破灭，这灰白肮脏、泡沫翻腾的大海，不值得为之冒险和牺牲。

“见鬼！”他喊了起来，“马孔多周围全是水！”

很长时间内，马孔多处在一个半岛上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这源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远征归来后武断绘出的地图。他绘图时满怀怒气，故意夸大交通的艰难，以此来惩罚自己竟如此荒唐地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我们一辈子哪儿也去不了，”他向乌尔苏拉抱怨道，“我们注定要在这里活活烂掉，享受不到科学的好处。”他在实验室小屋里思来想去，脑海中全是这个念头，几个月后终于酝酿出一个方案，要将马孔多迁移到更合宜的地点。但这一次，乌尔苏拉抢在了他那狂热计划的前头。凭借一番百折不挠的努力，她暗中与村里所有女人联合起来，反对男人们的突发奇想—他们已经在准备搬家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不知道从何时起，又是怎样的力量从中作梗，他的计划陷入由种种借口、托辞和阻力形成的罗网，最终彻底沦为幻想。这天早上他在庭院尽头的小屋里一边念叨着搬家梦想，一边把实验器具装回原来的箱子，乌尔苏拉带着无辜的神情关注着这一切，甚至对他感到些许怜悯。她任凭他装完，任凭他钉好箱笼、用刷子漆上自己名字的缩写，没有责怪他一句，心里却知道他已经明白—因为听见他这么低声自言自语—村里的人不会随他上路。只是当他开始拆卸小屋的房门时，乌尔苏拉才鼓起勇气询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他

不无苦涩地回答："既然没人肯走，那我们自己走。"乌尔苏拉没有动摇。

"我们不走，"她说，"就留在这儿，因为我们已经在这儿生了一个孩子。"

"我们还没有死人，"他说，"只要没有死人埋在地下，你就不属于这个地方。"

乌尔苏拉反驳了他，温和而坚定：

"如果非要我死了才能留下，那我就去死。"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无法相信妻子竟会如此意志坚决。他试图用自己的幻梦诱惑她，许诺带她去一个神奇的世界，在那里只需往地里洒一点儿魔水就能让作物按照自己的愿望结实，在那里花一点点钱就能买到各式各样的止痛器械。但乌尔苏拉对他预言的景象毫不动心。

"忘了你那些疯狂的新鲜玩意儿，还是管管你的孩子吧。"她回答，"瞧瞧他们，自生自灭没人管，和驴子一样。"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照妻子的话做了。他往窗外望去，只见两个孩子赤脚待在阳光暴晒的菜园里，他感觉从那一刻起他们才开始存在，从乌尔苏拉的咒语中诞生出来。随即他内心发生了某种变化，某种神秘而明晰的力量将他从当下拉扯出来，带往记忆中从未涉足的所在。乌尔苏拉继续打扫，此刻她已经确信有生之年再也不会离开这个家园，而他一直凝视着孩子们，直到双眼湿润。他用手背擦干眼睛，深深地叹息一声，接受了现实。

"好吧，"他说，"让他们帮我把东西从箱子里拿出来。"

大儿子何塞·阿尔卡蒂奥已经十四岁，脑袋四方，头发粗硬，和父亲一样固执任性。他发育迅速，体格健壮也像父亲，不过从那时就可以明显看出他缺乏想象力。他在马孔多建立前翻越山脉的路上孕育和诞生，当时父母在证实他身上没有任何动物器官之后曾一起感谢上天。奥雷里亚诺是在马孔多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到三月就满六岁了。

他沉默寡言，性格孤僻，在母亲腹中就会哭泣，来到人世时大睁着双眼。剪脐带的时候，他四下打量房间里的东西，好奇却毫无惊惧地观察人们的脸庞。随后，他任凭人们凑过来看，自己却无动于衷，专注地望着棕榈叶铺成的屋顶，那屋顶在雨水的巨大压力下似乎即将坍塌。乌尔苏拉没再想起他那全神贯注的目光，直到有一天，三岁的小奥雷里亚诺走进厨房，正赶上她从灶台端下一口滚烫的汤锅放到桌上。孩子在门口一脸困惑，说："要掉下来了。"汤锅本来好好地摆在桌子中央，但孩子话音刚落，它便像受到某种内在力量的驱使，开始不可逆转地向桌边移动，掉到地上摔得粉碎。警觉的乌尔苏拉将此事告诉丈夫，但丈夫却将其解释为自然现象。他一向如此，对孩子们不闻不问，一方面因为他认为童年是智力尚未发育健全的时期，另一方面因为他总是沉浸于自己虚无缥缈的玄想中。

然而自从那个下午叫孩子们帮忙取出实验器具，他便将自己最宝贵的时间留给了他们。在僻静的小屋里，墙壁上渐渐挂满荒唐的地图和奇异的图画。他教他们读写和算术，向他们讲起世界上的诸多奇迹，不光涉及自己已知的事物，还充分发挥想象力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极致。就这样，孩子们得知在非洲的最南端有平和而智慧的人民，他们唯一的消遣是坐下来沉思；得知爱琴海可以徒步穿越，只需从一个岛屿跳上另一个直到萨洛尼卡港。那些光怪陆离的课程深深铭刻在孩子们的记忆中，以至于多年以后，在政府军军官向行刑队下令开枪的前一刻，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又回想起三月里那个温暖的下午：父亲在物理课上倏然顿住，一脸着迷的神情，手停在半空中，眼神凝固，倾听着远远传来的高音笛、串铃和鼓的声音。吉卜赛人又来到了村里，推销孟菲斯城的智者们最新最惊人的发明。

那是一批新的吉卜赛人，男男女女都很年轻，只会说他们自己的语言，个个容貌俊美，皮肤油亮，双手灵巧。他们在街上载歌载舞引来喧声笑语，激起惊诧不断：染成各种颜色的鹦鹉吟唱着意大利浪漫曲，母鸡伴着手鼓的节奏下出一百个金蛋，训练有素的猴子能猜出人

的所思所想，多功能机器既能缝扣子又能退烧，还有用来忘却不快回忆的仪器、用来浪费时间的药膏以及其他上千种异想天开、闻所未闻的发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都恨不得发明一台记忆机器来记录下这一切。村子瞬间变了样。马孔多的居民在自己村子的街道间迷失了方向，置身于喧嚷的集市中不知所措。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一手拉住一个孩子，免得他们在混乱中走失。他从镀金牙的卖药人和六条胳膊的杂耍艺人身旁跌跌撞撞地走过，在人群散发出的粪便和檀香气味中艰难地呼吸，发疯似的四处寻找梅尔基亚德斯，想请他解开这场神奇梦魇中的无尽奥秘。他问了好几个吉卜赛人，但他们都听不懂他的语言。最后他来到梅尔基亚德斯惯常扎帐篷的地方，遇见一个神情郁郁的亚美尼亚人在用卡斯蒂利亚语[7]介绍一种用来隐形的糖浆。那人喝下一整杯琥珀色的液体，正好此时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挤进入神观看的人群向他询问。吉卜赛人惊讶地回望了他一眼，随即变成一摊热气腾腾散发恶臭的柏油，而他的回答犹自在空中回荡：“梅尔基亚德斯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惊呆了，他竭力抑制悲恸，而人群渐渐被别处的机巧吸引过去，那一摊亚美尼亚人的遗存物也彻底消失。后来，别的吉卜赛人向他证实梅尔基亚德斯的确在新加坡的沙洲上死于热病，被丢到了爪哇海的最深处。孩子们对这个消息不感兴趣，坚持要父亲带他们去见识孟菲斯智者们创造的最新奇观，据帐篷入口处招揽生意的吉卜赛人说，那曾经是所罗门王的宝藏。孩子们非去不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只好付了三十里亚尔，领他们走到帐篷中央，那里有一个遍体生毛的光头巨人，鼻上穿着铜环，脚踝间绕着沉重的铁链，正看守着一个海盗藏宝箱。巨人刚打开箱子，立刻冒出一股寒气。箱中只有一块巨大的透明物体，里面含有无数针芒，薄暮的光线在其间破碎，化作彩色的星辰。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茫然无措，但他知道孩子们在期待他马上给出解释，只好鼓起勇气咕哝了一句：

“这是世上最大的钻石。”

“不是。”吉卜赛人纠正道，“是冰块。”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没能领会，伸出手去触摸，却被巨人拦在一旁。“再付五个里亚尔才能摸。”巨人说。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付了钱，把手放在冰块上，就这样停了好几分钟，心中充满了体验神秘的恐惧和喜悦。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又另付了十个里亚尔，让儿子们也体验一下这神奇的感觉。小何塞·阿尔卡蒂奥不肯摸，奥雷里亚诺却上前一步，把手放上去又立刻缩了回来。“它在烧。”他吓得叫了起来。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没有理睬，他正为这无可置疑的奇迹而迷醉，那一刻忘却了自己荒唐事业的挫败，忘却了梅尔基亚德斯的尸体已成为乌贼的美餐。他又付了五个里亚尔，把手放在冰块上，仿佛凭圣书作证般庄严宣告：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

---

①多卜隆（doblón），西班牙古金币名。

②赫尔曼修士（monje Hermann，1013—1054），即 Hermann von Reichenau，德国本笃会修士，著有多种星相学著作。

③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1503 — 1566），法国预言家，所著《诸世纪》中载预言诗千首，据说在后世多有应验。

④索希莫（Zósimo），公元 3 世纪的希腊炼金术士。

⑤“超绝之精”（Gran Magisterio），炼制点金石的程序指南，象征着灵魂臻于至善的进程。

⑥弗朗西斯 • 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1540 —1596），英国航海家、海盗，多次劫掠西班牙殖民地。

⑦卡斯蒂利亚语（castellano），即西班牙语，今日的西班牙语起源于卡斯蒂利亚地区。

二

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在十六世纪袭击里奥阿查的时候，乌尔苏拉·伊瓜兰的曾祖母被警钟长鸣和隆隆炮声吓得惊慌失措，一下坐到了炉火上。烫伤使她终其一生再不能履行妻子的义务。她只能侧着坐，还得借助靠垫，此外走路应该也出了问题，因为她从此再没有当众行走过。她坚持认为自己的身体散发出焦味，因而拒绝一切社交活动。她不敢入睡，在院子里直待到天亮，因为她总是梦见英国人带着凶猛的劫掠犬从卧室的窗户进来，用烧红的烙铁对她施加令人羞耻的折磨。她丈夫是一位阿拉贡商人，和她育有两个子女。为了缓解妻子的恐惧，他在医药和娱乐上耗光了半个商铺。最后他清点了生意，带着家人远离海边，在山中一处平和的印第安人村落定居，并在那里为妻子盖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卧室，确保她梦魇中的海盗无隙可入。

在这个隐蔽的小村落里，很早就住着一个种植烟草的克里奥约人[①]堂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乌尔苏拉的曾祖父和他合作经营，短短几年就积累下大笔资产。几个世纪后，克里奥约人的玄孙和阿拉贡人的玄孙女结成夫妇。为此，每当乌尔苏拉因丈夫的荒唐而光火时，总要越过三百年的因缘巧合，诅咒弗朗西斯·德雷克袭击里奥阿查的那个时刻。这不过是一种发泄，因为事实上他们俩至死都没有分开，联结他们的是比爱情更坚固的东西：共同的良心谴责。他们是表兄妹。两人一同在那古老的村落长大，各自的先辈凭着辛劳和良好的习惯把那村落变成了全省最好的村庄之一。尽管从一降生他们的婚姻就在意料之中，但当他们表示出要结合的愿望，家长们还是试图阻止。他们害怕这两个数百年交好的家族这一代健康的后裔会遭受生出鬣蜥的耻辱。之前已经有过一个可怕的先例。乌尔苏拉的一位姑妈嫁给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一位叔父，生出的儿子终其一生

都穿着肥大宽松的裤子，在保持了四十二年最纯洁的童贞后失血而死。那都是因为他自出生到长大一直拖着一条拔塞器形状的软骨尾巴，末端还带有一撮毛发。最终，一位屠夫朋友用肉斧帮他砍掉了这条从未让任何女人见过的猪尾巴，也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凭着十九岁的轻狂，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我不在乎生下猪崽儿来，只要会说话就行。"就这样他们在吹吹打打、爆竹齐鸣中成婚，庆祝活动持续了三天。如果不是乌尔苏拉的母亲用各种关于后代的险恶预言吓住了女儿，让她甚至拒绝发生夫妻关系，他们本可以就此过上幸福的生活。由于担心魁梧而任性的丈夫趁熟睡时强暴自己，乌尔苏拉睡前会穿上母亲为她缝制的帆布衬裤，衬裤上还有缠绕的皮条加固，前面用粗大的铁扣锁住。如是度过了几个月的时光：白天，他放养斗鸡，她和母亲一起在绷子上绣花；晚上，两人展开几个小时的激烈对抗，似乎以此替代了夫妻生活。人们嗅出事情有几分奇怪，于是村里开始谣传乌尔苏拉婚后一年仍然是处子之身，因为她丈夫没有本事。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是最后一个听到流言的人。

"乌尔苏拉，人家在说什么你可都听见了。"他非常平静地对妻子说。

"让他们说去吧。"她回答，"咱们都知道那不是真的。"

就这样又过了六个月，直到那个悲惨的星期天，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斗鸡比赛中赢了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失利者看着自家斗鸡的鲜血勃然大怒，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身边走开几步，好让整个斗鸡场都听见自己要说的话。

"祝贺你，"他喊道，"看看这只鸡能不能帮上你女人的忙。"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不为所动，抱起他的斗鸡。"我马上回来。"他对大家说。然后，又对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说：

"你呢，赶紧回家拿上家伙，因为我要杀了你。"

十分钟后他回来了，手持祖父嗜血的长矛。村里一半的人都聚集在斗鸡场门口，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正在那里等着。他还没来得及反抗，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就以公牛般的力气投出了长矛，以第一代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当年猎杀本地老虎的准头，刺穿了他的咽喉。那天晚上，人们在斗鸡场守灵的时候，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走进卧室，他妻子正在穿贞节裤。他用长矛指着她，命令道：“脱了它。”乌尔苏拉并未质疑丈夫的决定。“你得为以后的事负责。”她嘟囔了一句。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将长矛插到地上。

“如果你非生鬣蜥不可，那咱们就养鬣蜥。”他说，“起码这个村里不会再有人为你的过错丧命了。”

那是六月里一个美好的夜晚，天气清凉，月光明亮。两人一夜不眠，在床上嬉闹直到破晓，任凭夜风吹过卧室，吹来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亲属的哭号。

这一事件被视作公平决斗，却给两人留下良心上的烦扰。一个失眠的夜晚，乌尔苏拉到院子里喝水，就看见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待在大瓮边。他浑身青紫，神情忧伤，正努力用芦草团堵住咽喉上的空洞。她不觉害怕，只有同情。回到房间后她把所见告诉丈夫，但丈夫没有在意。“死人是不会出现的，”他说，“只不过我们自己受不了良心上的负担。”两晚之后，乌尔苏拉再一次在浴室里看见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他正用芦草擦洗脖子上凝结的血痂。另一天晚上，她又看见他在雨中徘徊。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终于无法忍受妻子的幻觉，抄起长矛冲进院子。死人就在那里，神情忧伤。

“见鬼去吧。”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冲他喊道，“你来一次我就再杀你一次。”

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没走，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长矛也没敢出手。从那以后他再也无法安睡。死人在雨中望着他时流露出的无尽伤痛，对活人的深沉眷恋，在家中遍寻清水来润湿芦草的焦灼神情，总在他脑海里浮现，令他饱受折磨。“他一定很痛苦，”他

对乌尔苏拉说，“看得出他非常孤独。”她很受感动，再看到死人一一掀开灶台上的锅盖时，明白了他要找什么，从此便在家中各处摆上盛着清水的大碗。一天晚上，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自己房间里遇见死人在洗伤口，终于再也无法忍受。

“好吧，普鲁邓希奥，”他说，“我们会离开这个村子，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永远不回来。现在你安心走吧。”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翻越山脉之旅。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有许多像他一样年轻的朋友，他们因要探险而欢欣鼓舞，都拆掉自家房子，带上女人孩子上路，朝着没有人向他们应许过的土地进发。出发之前，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将长矛埋在院子里，又把自己那些出色的斗鸡一只只砍下脑袋，深信这样能够给予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些许安慰。乌尔苏拉只带了一箱嫁衣、少许家用物品以及那个小匣子，匣里装着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金币。他们没有预定的路线，只想朝着与里奥阿查相反的方向进发，为的是不留下任何踪迹，不碰见任何熟人。那是一场荒唐的旅行。走了十四个月后，吃猴肉喝蟒蛇汤坏了胃口的乌尔苏拉生下一个健全的男婴。她的腿肿得变了形，静脉曲张得像水泡鼓起，因此一半的路程都躺在吊床上，由两个男人用一根棍子抬着走。孩子们虽然肚皮干瘪、眼神倦怠，看起来很可怜，实际上倒比父母更能适应旅行，大部分时间都过得很愉快。经过将近两年的跋涉，一天早上，他们成为第一批见到山脉西坡的人。从云雾弥漫的山顶望去，大沼泽无边无际的水面一直延伸到世界的另一边。然而，他们从未找到大海。在沼泽间盲目行进了几个月之后，一天晚上，他们远离了路上遇见的最后一拨土著，在一条乱石累累的河流岸边扎了营，那河水仿佛冰冷的玻璃在流动。若干年后，在第二次内战期间，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曾试图走同一条路奇袭里奥阿查，行进了六天后他意识到这完全是疯狂之举。在沿河驻营的那天晚上，他父亲的追随者们看起来像是身处绝境的遇难者，但人丁倒比旅行前更为兴旺，并且所有人都期望能老死善终，而后来也都如愿以偿。那

天晚上，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梦见那个地方耸立起一座喧嚣的城市，家家户户以镜子为墙。他询问这是什么城市，得到的回答是一个他从未听说、也没有任何含义的名字，但那名字却在梦中神秘地回响：马孔多。第二天，他说服众人相信永远也找不到大海了。他又下令在河边最凉爽的地方砍伐树木辟出空地，就在那里建起了村庄。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没能解开镜屋之梦，直到见识冰块的那一刻。于是他相信自己理解了梦境的深意。他想到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利用水这种寻常材料大规模生产冰块，并用它们建造村庄的新居。马孔多将不再是一个连合页和插销都因高温而变形的酷热之地，而会变成一个寒冬之城。他没有坚持建立制冰厂的尝试，只因那时他正热衷教育儿子们，特别是奥雷里亚诺，这孩子起初就显露出炼金方面的罕见天赋。实验室已经收拾干净。他们重新查阅梅尔基亚德斯的笔记，如今已心情平静，不再有因新奇而生的兴奋。他们长时间耐心实验，试图将乌尔苏拉的金子从粘在锅底的废料中分离出来。年轻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几乎从不参与。当他父亲全身心摆弄炼金炉的时候，这位冲动任性、发育一向超出实际年龄的长子，已经长成一个体格魁伟的小伙子。他变了声，上唇布满初生的茸毛。一天晚上乌尔苏拉走进房间，正赶上他脱衣服准备睡觉。一种混杂了羞耻和怜悯的感觉涌上她的心头：这是除丈夫外她见到的第一个男人的裸体，发育得如此完好，在她看来甚至有些异常。已经第三次怀孕的乌尔苏拉，又经历了新婚时的恐惧。

那段时期有个女人常来家里帮忙做家务，她神情欢快，言语无忌，举止诱人，还会用纸牌算命。乌尔苏拉对她说起自己的儿子，认为他惊人的尺寸和表兄的猪尾巴一样不正常。那女人爆出一阵直率的笑声，仿佛一条玻璃溪流在整个家中荡漾。“正相反，”她说，“他会幸福。”为了证实这一预言，没过几天她就把纸牌带了来，与何塞·阿尔卡蒂奥一起反锁在厨房旁边的谷仓里。她镇静自若地把纸牌摊开在一张旧木工桌上，随意闲扯着，而那年轻人等在她身旁，厌烦多过好

奇。突然，她伸手摸了他一下。“好家伙。”她实实被吓到，说不出别的话来。何塞·阿尔卡蒂奥感到骨头里充满了泡沫，并伴随着一种无力的恐惧，以及哭泣的强烈欲望。女人没有给他任何暗示，但何塞·阿尔卡蒂奥整夜都在烟味中寻找她，那气味本是从她腋下逸出，也渗入到他的皮肤里面。他想一直和她在一起，想让她做自己的母亲，想永远待在谷仓里，想听她说“好家伙”，想让她再一次摸自己并对自己说“好家伙”。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去她家找她。那是一次莫名其妙的礼节性拜访，他坐在客厅里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那个时候他失去了欲望。他觉得她变了，与她的气味在自己心中幻化出的那个形象完全不同，仿佛成了另一个人。喝过咖啡，他沮丧地离开。当天晚上，在失眠的惊恐中，他恢复了强烈的欲望，只是此刻渴望的不是谷仓里的她，而是下午见到的她。

几天后，那女人不合时宜地把他叫到自己家里。只有她母亲在家，她借口教一套牌戏，把他带进自己的卧室。然后她尽情地摸他，而他在最初的震颤后却感到失落，心头的恐惧压过了愉悦。她让他晚上去找她。他为脱身答应了，心里知道自己做不到。但到了晚上，在火热的床上，他意识到不能不去，即使自己不可能做到。他摸索着穿上衣服，听见黑暗里弟弟安稳的呼吸声，父亲在隔壁房间里的干咳声，院子里母鸡的咕咕声，蚊子的嗡嗡声，自己心脏的怦怦跳动，以及天地间他此前从未察觉的喧嚣，走向沉睡的街巷。他满心希望门是闩着的，而不是像她许诺的那样仅仅虚掩着。结果门开着。他用指尖一推，合页发出清晰的悲鸣，引发一阵直达他心底的寒意。从进门的那一刻起，他就闻到了那气味。他侧着身子，尽量不发出声响。小客厅里，女人三个兄弟的吊床支在那里，而他不知道吊床的位置，在黑暗中又无法确定。他需要摸索着穿过小客厅，推开卧室的门，找准方向以免上错床。他做到了，只是被吊床挂绳绊了一下—吊床挂得比他预想的要低。一直在打鼾的男人在梦中翻了个身，带着些许失望嘀咕了一句:“那是星期三。”他推门的时候，门无可避免地在高低不平的

地上发出了声音。置身于一团漆黑中，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彻底迷失了方向，但已后悔莫及。这狭小的房间里睡着她的母亲、她的姐妹及其丈夫和两个儿女，而她自己或许并没在等他。他本可以借助气味来寻找，只是整个家中都充斥着那味道，令人迷惑但同时又像一直在他皮肤里面那样清晰。他一动不动地待了许久，惊奇中自问怎么会陷入这种孤立无援的绝境，这时一只五指伸开在黑暗中摸索的手碰到了他的脸。他不觉吃惊，因为下意识里一直在等待这一刻。他疲惫到了极点，把自己交付给这只手，跟随它到了一个形状莫辨的地方。他被脱去衣裳，像一袋土豆似的被摆布、被翻来翻去。在这神秘的黑暗中，他不再需要手臂，不再闻到女人的气味，而只有氨水的气味。他试图回想起她的脸庞，然而脑中却浮现出乌尔苏拉的面容，便隐约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一件很久以来就想做的事，只是此前从未想过真的可以做到；他也不知道现在是如何在做，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脚在哪里头在哪里，甚至不知道是谁的脚谁的头；他觉得再也无法忍受腰间冰冷的声响和腹内的气流，无法忍受恐惧和迷乱的渴望，渴望逃走，又渴望永远留在这恼人的静寂和可怖的孤独中。

她叫庇拉尔·特尔内拉。她参加过以建立马孔多告终的远征，是被她的家人所强迫，为了离开那个在她十四岁时强暴她的男人。那人一直爱着她，直到她二十二岁，但从未下决心公开关系，因为他是个外来户。他许诺追随她到天涯海角，但要等他处理完自己的事情，而她已经厌倦了等待，在或高或矮，或金发或黑肤的男人中辨认他，纸牌许诺说他三天、三个月或三年后会从陆上或海上来。在等待中，她的大腿不再有力，乳房不再坚挺，性情不再温和，但心灵的狂野依然如故。何塞·阿尔卡蒂奥被这个神奇的玩物迷得神魂颠倒，天天晚上穿过房间的迷宫去寻找她的踪迹。有一回门闩着，他就反复叩敲，心想既然有勇气敲第一下，就要坚持到最后一下。最终，经过漫长的等待，他等来了她开门。白天，他昏昏欲睡，暗自享受前夜的回忆。当她走进家门，还是那样欢快、言语无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他也

无须费力掩饰紧张，因为这个轰然大笑惊飞鸽群的女人和那无形的力量毫不相干—那力量教会他朝内呼吸和控制心跳，使他明白人们为什么会惧怕死亡。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以至于当他父亲和弟弟的好消息使全家沸腾时，他还不知道是他们终于熔开了那个金属块，分离出了乌尔苏拉的金子。

经过多日繁难而艰巨的工作，他们的确做到了。乌尔苏拉欣喜万分，甚至为炼金术的发明赞美上帝。实验室里挤满了村民，主人端出番石榴甜点加小饼干款待他们，来庆祝这一奇迹。与此同时，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隆重展示了坩埚中失而复得的黄金，仿佛那是他刚刚创造出来的。他让所有人一一看过，最后来到近来极少在实验室露面的长子跟前。他把发黄的干硬块摆到儿子眼前，问道:“你觉得怎么样? ”何塞·阿尔卡蒂奥直率地回答:

“像狗屎。”

父亲反手给了他一巴掌，打得他直流出血和泪来。那天晚上庇拉尔·特尔内拉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药瓶和棉布，用山金车酊给他敷肿，还让他尽情享受而不用费神，爱怜他而不弄疼他。他们如此心心相印，片刻之后不知不觉开始窃窃私语。

“我想和你单独在一起。”他说，“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一切告诉所有人，用不着再躲躲藏藏。”

她不想扫他的兴。

“那太好了。”她说，“要是单独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点亮灯，互相能看见，而且我想怎么叫就怎么叫，不用管别人，你在我耳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一场谈话，伴以对父亲的切齿怨恨，对纵情相爱的迫切憧憬，在他身上激发出一种沉着的勇气。他事先未作任何铺垫，直接把一切都告诉了弟弟。

一开始小奥雷里亚诺只意识到风险，觉得哥哥的冒险极有可能引来祸端，却没能理解其中的魅力所在。后来哥哥的渴望渐渐感染了

他。他听他讲述种种波折的细节，分享他的痛苦和喜悦，与他一起担惊受怕，一起体验幸福。他整夜不睡，一个人躺在床上好像睡在炭火席上，直等到天亮哥哥回来，然后两人毫无睡意地交谈到起床的时候。很快两人都变得委靡不振，都对父亲的炼金术和智慧失去了敬意，都躲藏到孤独之中。“这两个孩子呆呆的，”乌尔苏拉说，“一定是肚子里有虫子。”她用土荆芥研末熬制了一剂难喝的汤药，不料两人都以意想不到的坚忍喝了下去，并且一天之内同时坐到便盆上达十一次之多，排出了几条粉红色的寄生虫。他们兴高采烈地向所有人展示，为的是避免乌尔苏拉追究他们神不守舍和倦怠消沉的真实原因。那时奥雷里亚诺不仅能理解，还能对哥哥的经历感同身受，因为有一次当哥哥详尽无遗地向他描述情爱的奥妙，他插话问道：“那是什么感觉？”何塞·阿尔卡蒂奥当即回答：

“好像地震。”

一月里一个星期四的凌晨两点，阿玛兰妲出生了。在其他人进入房间之前，乌尔苏拉先把她浑身上下细细检查了一遍。她又轻又湿像条蜥蜴，不过身体所有部位都属于人类无疑。奥雷里亚诺发现家里挤满了人，才知道这一新闻。他趁着混乱溜出去找哥哥，因为哥哥从十一点就不在床上了。这一决定如此仓促，他甚至没时间考虑要如何把哥哥从庇拉尔·特尔内拉的卧室里拉出来。他围着房子转了几个小时，吹口哨打暗号，快天亮时才不得不回去。在母亲的房间里，他看到何塞·阿尔卡蒂奥正在逗弄初生的小妹妹，脸上挂着天真无辜的笑容。

乌尔苏拉安稳休息了四十天不到，吉卜赛人又来了，是带来过冰块的同一拨江湖艺人和杂耍演员。与梅尔基亚德斯的部落不同，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证明了自己并非传播进步的使者，而是贩卖娱乐的商人。包括他们带来的冰块，也不是为了推广应用到生活中，而是纯粹当作马戏团的奇物。这次的奇巧物件中有一块飞毯，他们同样没有将其视为交通发展上的重大贡献，而仅仅当作用于消遣的玩物来介

绍。毫不奇怪，人们挖出了自家埋藏的最后几枚金币，想换取一次从村里房顶飞过的短暂经历。借着纷乱人潮的掩护，何塞·阿尔卡蒂奥和庇拉尔享受了一段惬意的独处时光。他们成为人群中一对幸福的情侣，甚至开始怀疑，爱情或许可以是一种比夜晚幽会中疯狂而短暂的快乐更平和深沉的感觉。然而，庇拉尔打破了美梦。她受身边何塞·阿尔卡蒂奥的激情感染，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和时机，一句话就使他的世界地覆天翻。“现在你是真正的男人了。”见他没听懂自己的意思，她又明明白白地解释了一遍：

“你就要有儿子了。”

连续几天何塞·阿尔卡蒂奥都不敢走出家门一步。一听到厨房里传来庇拉尔声震屋瓦的笑声，他就立刻逃到实验室。那里的炼金器械在乌尔苏拉的祝福下都已重获新生，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兴高采烈地接纳了迷途知返的儿子，并且带他入门，参与自己终于启动的点金石探寻工作。一天下午，飞毯载着吉卜赛驭手和几个村里的孩子从实验室窗前迅捷掠过，他们在飞毯上兴奋地挥手致意，两个儿子都被吸引过去，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看都不看一眼。“让他们做梦去吧，”他说，“将来我们要用更科学的方式比他们靠一条可怜的床罩飞得更高。”尽管装出感兴趣的样子，何塞·阿尔卡蒂奥其实从未理解“哲学之卵”的魔力，在他看来那不过是一个做坏了的瓶子。他无法抛开自己的心事。他吃不下睡不着，脾气变坏，就像父亲工作受挫时一个样。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见他举止失常，以为他对炼金术太过投入，便免去他在实验室的工作。奥雷里亚诺当然知道哥哥所受的折磨与寻找点金石毫无关系，但也无法令他吐露真情。往日的推心置腹已经一去不返，同谋和交流变成敌意与缄默。他渴望孤独，对整个世界的怨恨咬噬着他的心。一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下了床，不过不是去庇拉尔·特尔内拉家，而是混迹于集市的喧嚷人潮中。他走过各样花巧的玩意儿，没有一样能引起他的兴趣。最后他的注意力落在一样非展品上：一个非常年轻的吉卜赛女郎，几乎还是个

孩子，被身上的玻璃珠链压弯了腰。这是何塞·阿尔卡蒂奥一生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她正在人群中观看一个人因为忤逆父母而变成蟒蛇的惨剧。

何塞·阿尔卡蒂奥无心观看眼前的场景。针对蛇人的悲惨审问还在进行，他已经挤进人群，来到吉卜赛女郎所在的第一排，在她身后停下。他紧贴着她的后背。女郎想躲开，但何塞·阿尔卡蒂奥更用力地挤上去。于是她感觉到了。她靠着他一动不动，又惊又惧地战栗着，无法相信这一事实。最终她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脸上露出一个颤抖的微笑。这一刻两个吉卜赛人将蛇人装回笼子，送到帐篷里面。主持节目的吉卜赛人宣布：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要上演可怕的场景：一个女人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作为惩罚，一百五十年里每天晚上的这一时刻她都要被砍头。”

何塞·阿尔卡蒂奥和女郎没有观看砍头表演。他们去了她的帐篷，一边脱衣服一边急不可耐地亲吻。女郎卸下玻璃珠链，脱去浆过花边的层层衬裙和重重背心，以及无用的紧身胸甲，最后露出的身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是个瘦弱的小家伙，乳房刚刚发育，双腿还没有何塞·阿尔卡蒂奥的手臂粗，但她的坚定和热情弥补了身体的单薄。然而何塞·阿尔卡蒂奥无法回应她，因为他们身处公用帐篷，吉卜赛人拿着马戏道具走来走去忙着各自的事情，甚至会在床边停下掷上一把骰子。挂在帐篷中央木杆上的油灯照得四下通明。在爱抚的间歇，何塞·阿尔卡蒂奥赤着身子躺在床上伸了个懒腰，不知如何是好，而女郎还在努力诱导他。没过多久进来一个体态丰腴的吉卜赛女人，陪伴她的男人不属于马戏团，也不是村里的人。两人开始在床前脱衣服。那女人无意中看了何塞·阿尔卡蒂奥一眼，以狂热的目光打量着他那休憩中的壮观野兽。

“小伙子，”她嚷道，“愿上帝替你保守它。”

何塞·阿尔卡蒂奥的女伴请他们别来打扰，于是那一对就地躺下，紧靠他们的床边。他人的激情唤醒了何塞·阿尔卡蒂奥的欲望。刚一触碰，女郎的骨头像是散了架，仿佛一盒多米诺骨牌哗啦啦一阵混响，她的肌肤在苍白的汗水中融化，她的眼睛盈满泪水，她的整个身体发出悲惨的哀叹，散逸淡淡的淤泥气味。但她以坚强的性格和可敬的勇气承受住了冲击。何塞·阿尔卡蒂奥感觉身体悬空，飞向极乐之境，心灵融化在柔情色欲的泉源里，那情欲涌入女郎的耳朵，又从她的口中变成语言涌出。那天是星期四。到星期六晚上，何塞·阿尔卡蒂奥往头上缠了块红布，跟着吉卜赛人走了。

乌尔苏拉发现他失踪后找遍了整个村子。吉卜赛人搭帐篷的地方篝火已经熄灭，只剩灰烬仍在冒烟，一堆堆垃圾散落其间。一个在垃圾中寻找玻璃珠的人告诉她，前一晚曾见到她儿子混在马戏团的人群里，用独轮车推着装蛇人的笼子。“他跟吉卜赛人跑了！”她向丈夫喊道，而丈夫对儿子的失踪没有表现出丝毫惊慌。

“是真的就好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说，一边在研钵里捣碎那无数次被捣碎又熔合再捣碎的材料，“那样他就能长大成人了。”

乌尔苏拉出去打听吉卜赛人是从哪里走的，按照别人的指引边走边问，相信还来得及追上。她离村子越来越远，等发觉时已经走出太远，便索性不再回头。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直到晚上八点听到小阿玛兰妲哭得声音沙哑，把材料留在粪床上加热，过去一看才发现妻子失踪了。几小时后他聚集起一支整装待发的队伍，把阿玛兰妲托付给一位自愿喂奶的妇女，随后上路四处追寻乌尔苏拉的踪迹。奥雷里亚诺也跟了去。黎明时分，几个操着陌生语言的土著渔夫打着手势告诉他们，不曾见到有人经过。徒劳寻索三天之后，他们回了村。

此后几个星期，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陷入沮丧当中。他担负起母亲的职责照料小阿玛兰妲，给她洗澡换衣服，一天四次送去哺乳，晚上甚至为她唱起乌尔苏拉从来不会唱的摇篮曲。有一次，庇

拉尔·特尔内拉自告奋勇要在乌尔苏拉回来之前帮忙料理家务。奥雷里亚诺凭着对厄运格外敏感的神秘直觉，在看见她进门的瞬间灵光一闪。他意识到哥哥的逃走以及随后母亲的失踪都与她有关，尽管这无法解释，于是以一种沉默而强烈的敌意相待。她没有再来。

时间使一切恢复了原样。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和儿子不知从何时起又回到了实验室，他们抖落尘埃，点起炉灶，拾起已经在粪床上沉睡了数月的材料，又一次耐心地操作起来。连躺在柳条小筐里的阿玛兰妲，也好奇地观看父兄在水银蒸气弥漫的小屋里入神地工作。架子上被遗忘多日的一个空瓶忽然重得挪不动。工作台上的一锅水未经加热便沸腾了半个小时，直到完全蒸发。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和儿子看着这一切又恐惧又欢喜，他们无法解释，只是将其视作新材料要诞生的预兆。一天阿玛兰妲的小筐自行移动起来，在房间里兜了个圈。奥雷里亚诺大吃一惊，连忙去拦下它。做父亲的却没有惊慌，他把小筐放回去，固定在桌腿上，坚信期待已久的事情即将发生。就在那时，奥雷里亚诺听见他说：

“就算你不敬畏上帝，也该敬畏金属。”

失踪近五个月后，乌尔苏拉突然归来。她异常兴奋,青春再现，衣着打扮都是村里人从未见过的款式。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几乎无法承受这一惊喜。“没错！”他喊道，“我就知道会这样。”他的确相信，因为在漫长的幽闭时光里，在操作实验的同时，他内心深处祈求的奇迹不是发现点金石，不是赋予金属生命的气息，也不是将家中的合页和门锁变成黄金，而是此时此刻的情景：乌尔苏拉归来。但她没有被丈夫的欢喜打动，只是例行公事般吻了他一下，仿佛自己不过离开了一个小时。她对他说：

“你出去看看。”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出门看见一片喧嚷景象，好半天才从困惑中恢复过来。那不是吉卜赛人，而是和他们一样的男男女女，直发棕肤，说的是同样的语言，抱怨的是同样的痛苦。他们的骡子驮

着食品，牛车满载着家具、家居用品，都纯粹是些普通的人间物事，毫无噱头地出售；他们贩卖的乃是日常现实。这些人来自大沼泽的另一边，距此只有两天路程。那些村镇里的人们每月都能收到邮件，见惯了各样改善生活的机器。乌尔苏拉没有追上吉卜赛人，却找到了丈夫在失败的远征中没能发现的通向伟大发明的道路。

---

①克里奥约人（criollo），在殖民地出生的欧洲人后裔。

三

庇拉尔·特尔内拉的儿子出生两星期后就被送到祖父母家。乌尔苏拉拗不过丈夫的顽固—他无法容忍家中新生的一星血脉流落在外—只好不情不愿地接受，但前提条件是不能向孩子透露真实身份。孩子继承了何塞·阿尔卡蒂奥的名字，后来大家为了避免混淆只叫他阿尔卡蒂奥。那一时期村里活动频繁，家中活计不断，孩子的照料退居其次，被托付给一个叫比西塔西翁的瓜希拉印第安女人。她和兄弟为逃避部落中肆虐多年的失眠症来到这里，两人温顺又勤快，乌尔苏拉便收留了他们帮忙做家务。就这样，阿尔卡蒂奥和阿玛兰妲在学会卡斯蒂利亚语之前先学会了瓜希拉语，还学会了喝蜥蜴汤吃蜘蛛卵，乌尔苏拉则忙于大有前途的糖果小动物生意，对此一无所知。马孔多变了样。跟着乌尔苏拉一起来的人四处宣扬它土地肥美、位置又比大泽区优越，于是昔日僻静的小村落很快变成繁华的城镇，有了手工作坊和店铺，还开通了一条永久商道。第一批穿尖头靴戴耳环的阿拉伯人就沿商道而来，用玻璃珠链交换金刚鹦鹉。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一刻也不能平静。他着迷于眼前的现实，认为这比自己广袤的幻想世界更为神奇，因而对炼金实验完全丧失了兴趣。他将漫长时日中饱受锤炼的材料搁置一旁，又变回了创业之初那个富于进取心的男子，那时他忙于设计街道规划新居，以保证人人享有平等权益。他在新落户的居民中赢得极大尊重，任何人铺设地基或修造围栏都要先咨询他的意见，大家还一致决定由他掌管土地的分配。走江湖的吉卜赛人又来了，这次把流动游艺会变成了大型赌场。人们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相信何塞·阿尔卡蒂奥会一道归来。但他并没有出现，吉卜赛人也没有带蛇人来，在乌尔苏拉看来有关儿子的唯一线索也没了着落。镇上因此拒绝吉卜赛人扎营，并将他们视为贪欲与堕落的传播者，不

许他们以后再踏上这片土地。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也明确表示，梅尔基亚德斯以他悠远的智慧和神奇的发明对村子的发展壮大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马孔多的大门将永远对他古老的部落敞开。然而据那些周游各地的旅人说，梅尔基亚德斯的部落由于逾越了人类知识的界限，已从大地上被抹去。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至少暂时从幻想的种种煎熬中解脱出来，很快便营造出一种井然有序的实干氛围，其中只批准一项自由：释放从建村伊始就以歌声欢快报时的群鸟，代之以家家户户各备一台音乐钟。这些雕刻精美的木钟是用金刚鹦鹉从阿拉伯人那里换来的，由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统一校准。每隔半小时镇上便响起同一乐曲的欢快和弦，一到正午更是蔚为壮观，所有时钟分秒不差地同时奏响整曲华尔兹。那些年间，也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决定在街上种植巴旦杏代替金合欢，并且发现了能使树木经久不衰的方法，但一直秘不示人。多年以后，马孔多已经遍布锌顶木屋，那些最古老的街道上却依然可见巴旦杏树蒙尘的断枝残干，然而已无人知晓出自谁人手植。当父亲忙于整治市镇，母亲一心扩展家业，每天两次用树枝穿着糖制的小鸡小鱼出门销售，奥雷里亚诺则从早到晚待在被遗弃的实验室里，完全凭自己的探索掌握了金银器工艺。他身量大长，哥哥留下的衣服很快都不合身了，便开始穿父亲的衣服，只是得让比西塔西翁收紧衬衣修剪裤子，因为奥雷里亚诺没有他们那样魁伟的身材。青春期的他失去了甜美的童音，变得沉默寡言孤独入骨，但却恢复了呱呱坠地时流露出的执著眼神。他全神贯注于金银艺实验，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担心他过于专注，认为他或许需要一个女人，便给了他家里的钥匙和一些零钱。奥雷里亚诺却用钱买来盐酸配制王水，还把钥匙镀了层金。不过他的古怪之处与阿尔卡蒂奥和阿玛兰妲相比又算不得什么，那两个孩子早就开始换牙，却依然整天跟在印第安女人后面，顽固地不肯说卡斯蒂利亚语而只说瓜希拉土语。“你有什么可抱怨的，”乌尔苏拉对丈

夫说，“有发疯的父母就有发疯的儿女。”正当她哀叹自己命不好，认定儿女们的怪癖与猪尾巴同样可怕时，奥雷里亚诺眼神定定地望着她，令她感到一阵茫然。

“有人要来了。”他说。

和往常一样，乌尔苏拉听到他发表预言又试图用家庭主妇的常识来解释。有人来再正常不过。每天都有数十个外乡人经过马孔多，从未引发混乱，更无须事先神秘预告。然而，奥雷里亚诺对一切逻辑解说浑不在意，对自己的预感确信不疑。

“我不知道是谁，”他坚持道，“但不管是谁，人已经在路上了。”

果然，到了星期天，丽贝卡来了。此时她只有十一岁。几位皮草商人带着她从马纳乌雷辛苦跋涉而来，受人之托将她连同一封信送到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家，却又说不清楚托付他们的人究竟是谁。她的所有行李包括一个小衣箱、一把绘有彩色小花的小摇椅和一个帆布口袋，袋里装着她父母的骨殖，一刻不停地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那封带给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信中充满温情的话语，可见纵然岁月蹉跎天各一方，写信人依然对他深情不改，并且出于基本的人道精神将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送来这里。孩子算乌尔苏拉的远房表妹，因而也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亲人，尽管关系上要更远些。她是难忘的挚友尼卡诺尔·乌略亚和他可敬的妻子丽贝卡·蒙铁尔的女儿，愿他们在天国安息，一并送来他们的骨殖，盼以基督徒的礼仪安葬云云。信中提到的名字和末尾的签名都清晰可辨，然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和乌尔苏拉都不记得有这些亲戚，也从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写信人，更不用提还是在遥远的马纳乌雷。从女孩那里也无法获得更多信息。从来到的那一刻起，她就一直坐在摇椅上吮手指，一双受惊的大眼睛打量着所有人，不曾流露出能听懂别人提问的迹象。她穿着已显破旧的黑色斜纹布衣裳，脚上是漆皮脱落的短靴。头发拢到耳后，用黑带子束住两个发髻。披肩上的图案沁染汗渍已无法辨认，一颗食肉动物的犬牙配上铜托系在右手腕上当作抵

抗“邪眼”的护身符。青绿色的皮肤，圆滚紧绷如一面鼓的肚子，都显示出她体弱多病、忍饥挨饿的历史甚至要比自身的年龄更久远，然而食物端上来的时候，她却任凭盘子搁在腿上尝也不尝。大家几乎要相信她是个聋哑儿，直到印第安人用他们的语言问她要不要喝点儿水的时候，她才眼神一动仿佛认出了他们，点了点头。

家人没有办法，只得把她收留下来。奥雷里亚诺耐心地在她面前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圣徒节期表，但她对所有名字都没有反应，家人只好根据信中她母亲的名字叫她丽贝卡。那时马孔多还没死过人，自然没有墓地，他们只得暂时将骨殖袋收藏起来，等将来有合宜的地方再下葬。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遗骨在家中到处碍事，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像母鸡抱窝似的咯咯作响。丽贝卡过了很久才融入家庭生活。她总是缩到家中最偏僻的角落，坐在摇椅上吮吸手指。什么都无法引起她的注意，除了那些钟表奏出的音乐，她每过半小时就会瞪着受惊的眼睛四下寻找，仿佛想在空中某个位置找到那乐声。数天过去，她什么也不肯吃。谁都无法理解她居然没有饿死，后来印第安人——他们一刻不停、悄无声息地在家里走来走去，一切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发现她只喜欢吃院子里的湿土和用指甲刮下的石灰墙皮。显然她父母或是其他抚养人曾斥责过这一恶习，因为她总是心有愧疚暗中行事，藏起口粮来等没人时再享用。从那以后，家里开始对她严加监视。他们在院子里洒牛胆汁，往墙壁上涂辣椒油，相信用这些方法可以遏制她的恶习。然而她找寻泥土时显得异常狡黠机智，乌尔苏拉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手段。乌尔苏拉在小锅里放入橘汁，兑上大黄晾了一整夜，次日让她空腹喝下。没人说过这就是治疗食土怪癖的特效药，但乌尔苏拉却相信任何苦味的食物进入空腹都会令肝脏产生反应。丽贝卡拼命反抗，力气之大与瘦小身量根本不符，他们不得不像扳倒一头小牛犊似的逼她服药，却难以制止她的乱踢乱踹，无法忍受她在撕咬和吐口水之余古怪难解的呼号。印第安人听得目瞪口呆，说那是他们语言中最污秽的辱骂。乌尔苏拉知道后，在药物治疗之外又

加上了皮带抽打。永远无从确知，究竟是大黄或毒打，还是二者一起最终发挥了效用，总之几个星期后丽贝卡显出康复的迹象。她加入到阿尔卡蒂奥和阿玛兰妲的游戏中，他们把她当姐姐看待。她胃口颇佳，刀叉也用得不错。不久家人又发现她的卡斯蒂利亚语说得和印第安土语一样流利，手头活计也干得出色，还会哼唱音乐钟奏出的华尔兹舞曲，配上滑稽的自编歌词。大家很快就接纳她为家庭新成员。她和乌尔苏拉最亲，连乌尔苏拉的亲生儿女都比不上。她管阿玛兰妲和阿尔卡蒂奥叫小妹妹小弟弟，称奥雷里亚诺为叔叔，呼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为爷爷。于是，她和其他家人一样名正言顺地用上了丽贝卡·布恩迪亚的姓名，那也是她一生用过的唯一姓名，直到去世从未玷污。

丽贝卡改掉食土的恶习后，被安排到其他孩子的房间睡觉。一天夜里，和他们睡在一起的印第安女人突然醒来，听见一种奇怪的响声在角落里时断时续。她以为有动物溜进房间，警觉起来，却发现丽贝卡坐在摇椅上吮着手指，双眼像猫眼一般在黑暗中放光。比西塔西翁心中充满恐惧和难逃宿命的凄苦，她在那双眼睛里认出了威胁他们的疫病，正是这种疫病逼得她和兄弟背井离乡，永远抛下了他们古老的王国，抛下了公主与王子的尊贵身份。这就是失眠症。

天亮的时候，印第安人卡塔乌雷失去了踪影。他姐姐比西塔西翁留了下来，认定了自己的宿命：就算逃到天边，这致命的疫病也会穷追不舍尾随而至。没有人理会她的惊恐。“要是不用睡觉，那再好不过。”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说，“那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可用。”但印第安女人向他们解释，失眠症最可怕之处不在于让人毫无倦意不能入睡，而是会不可逆转地恶化到更严重的境地：遗忘。也就是说，患者慢慢习惯了无眠的状态，就开始淡忘童年的记忆，继之以事物的名称和概念，最后是各人的身份，以至失去自我，沦为没有过往的白痴。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笑得喘不过气来，认为这不过

是又一种印第安人杜撰的疾病。乌尔苏拉为防万一，还是将丽贝卡和其他孩子隔离开来。

几个星期后，比西塔西翁的恐惧似乎平息了下去。有天晚上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乌尔苏拉也醒着，问他怎么了，他回答：“我又想起了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他们一刻也没睡着，但到了第二天感觉疲劳尽去，便把不眠之夜抛在了脑后。午饭时候，奥雷里亚诺惊异地讲起他如何一整夜都在实验室忙着给一枚别针镀金，准备在乌尔苏拉的生日送给她，但此刻却仍然感觉良好。到了第三天，大家在该入睡的时刻还是毫无睡意，这才意识到已连续五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终于警觉起来。

“孩子们也都醒着。”印第安女人的话里带着宿命意味，“这病一旦进了家门，谁也逃不了。”

他们果然染上了失眠症。乌尔苏拉从母亲那里学过各种草药的效用，熬制了乌头汤让所有人服下去，可他们仍然睡不着，整天醒着做梦。在这种清醒的梦幻中，他们不仅能看到自己梦中的形象，还能看到别人梦见的景象，一时间家里仿佛满是访客。丽贝卡坐在厨房角落里的摇椅上，梦见一个和自己相貌极其相似的男人，他身着白色亚麻衣裳，衬衫领口别着一粒金扣，给她带来一束玫瑰。陪伴他的还有一位女士，用纤细的手指拣出一枝玫瑰簪在她发间。乌尔苏拉知道那男人和女人是丽贝卡的父母，但一番努力辨认之后，还是确信从未与他们谋面。与此同时，由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一个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疏忽，家中出品的糖果小动物仍源源不断地在镇上出售。大人小孩都津津有味地吮咂着可口的绿色失眠小公鸡、美味的粉红失眠小鱼和柔软的黄色失眠小马，于是到了星期一凌晨整个镇子都醒着。一开始没人在意。恰恰相反，人们都因不用睡觉而兴高采烈，因为那时候马孔多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时间总不够用。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就把活儿都干完了，凌晨三点便无所事事，听着音乐钟数华尔兹的音符。那些想睡觉的人，不是因为疲倦而是出于对睡眠的怀

念，试遍了各种消磨精力的方法。他们聚在一起不停地聊天，一连几个小时重复同样的笑话，甚至把阉鸡的故事演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那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讲故事的人问大家要不要听阉鸡的故事，如果大家说“要”，他就说没让大家说“要”，而是问大家要不要听阉鸡的故事；如果大家说“不要”，他就说没让大家说“不要”，而是问大家要不要听阉鸡的故事；如果大家都不说话，他就说没让大家不说话，而是问大家要不要听阉鸡的故事；而且谁也不许走，因为他没让人走，而是问大家要不要听阉鸡的故事。就这样继续下去，整夜整夜重复这一恶性循环。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意识到失眠症已经侵入镇子，便召集起各家家长，把自己所知的失眠症情形讲给他们听。众人决定采取措施防止灾难扩展到大泽区的其他村镇。他们把用金刚鹦鹉跟阿拉伯人换来的小铃铛从山羊脖子上摘下，放在镇子入口，供那些不顾岗哨的劝告和恳求坚持进镇的来客使用。那时节走在马孔多街道上的所有外乡人都要摇动小铃铛，好让病人知道自己是健康人。他们在镇上逗留期间禁止一切饮食，因为疫病无疑只经入口之物传播，而所有食品饮料都已沾染失眠症。这项举措成功地将疫病控制在村镇之内。隔离卓有成效，后来人们就将紧急情况视为常态。生活恢复秩序，工作照常进行，没人再为睡眠这一无用的习惯担忧。

还是奥雷里亚诺想出了办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帮助人们抵御失忆。这发现本出于偶然。他属于第一批病人，已是老练的失眠者，并借此掌握了高超的金银器工艺。一天他在寻找用来捶打金属箔片的小铁砧时，却想不起它的名称。父亲告诉他：“砧子。”奥雷里亚诺把名称写在纸上，用树胶贴在小铁砧底部：砧子。这样，他相信今后就不会再忘记。当时他还没想到这便是失忆开始的症状，因为那东西的名称本不好记。没过几天，他发现自己对实验室里几乎所有器物都叫不出名来。于是他依次注明，这样只需看一下标签就可以辨认。当父亲不安地告诉他自己童年最深刻的记忆都已消失时，奥雷里亚诺向他

传授了这一方法。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先在家中实行，而后推广到全镇。他用小刷子蘸上墨水给每样东西注明名称：桌子，椅子，钟，门，墙，床，平锅。他又到畜栏为动物和植物标上名称：奶牛，山羊，猪，母鸡，木薯，海芋，香蕉。随着对失忆各种可能症状的研究不断深入，他意识到终会有那么一天，人们即使能通过标签认出每样事物，仍会记不起它的功用。于是他又逐一详加解释。奶牛颈后所挂的名牌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体现出马孔多居民与失忆作斗争的决心：这是奶牛，每天早晨都应挤奶，可得牛奶。牛奶应煮沸后和咖啡混合，可得牛奶咖啡。就这样，人们继续在捉摸不定的现实中生活，只是一旦标签文字的意义也被遗忘，这般靠词语暂时维系的现实终将一去不返。

通往大泽区的路口立起一块牌子，上写马孔多；中心大道立有一块更大的牌子，上书上帝存在。各家各户都已写好用来记住物品和情感的简要说明。这套做法需要高度的警醒和坚强的毅力，因而很多人选择了向虚拟现实的魅力屈服，寄情于自我幻想，这纵然不切实际却更能与人安慰。庇拉尔·特尔内拉在这场造梦运动中出力最多，她成功地将纸牌算命从推演未来应用到追溯过往。借助这一方法，失眠者开始生活在由纸牌萌生的模棱两可的世界中。在模糊的追忆中，父亲是四月初到来的肤色黝黑的男人，母亲是左手戴金戒指肌肤呈麦色的女人，出生日期则简化为最近一个有云雀在月桂树上啼叫的星期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对这些寻求慰藉的方式深感无奈，决定制造当初曾想用来记录吉卜赛人神奇发明的记忆机器。该装置的设计基于以下原理：每天清晨将一生获得的知识从头至尾复习一遍。他把它想象为一种旋转辞典，人坐在中轴位置用摇把操纵，在几小时内令生活中最必要的知识都从眼前经过。当他做好大约一万四千张卡片的时候，通往大泽区的路上出现了一位衣衫不整的老人，他用小铃铛摇出悲凉的声响以表示未染上失眠症，拖着一件绳索紧系的鼓囊囊的行

李，拉着一辆黑布蒙住的小车。他径直来到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家门前。

比西塔西翁开了门，但并不认识他，以为他想要兜售什么，还不知道在这个已经深陷失忆泥沼的村镇任何物品都没有市场。这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尽管声音也因犹疑时断时续，双手颤抖仿佛质疑着事物的真实存在，但仍可以明显看出，他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人们可以安睡并拥有记忆的世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看见他坐在客厅里，一边用几经补缀的黑色礼帽扇风，一边带着同情的神色认真阅读贴在墙上的一个个标签。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分外殷勤地向他打了个招呼，担心他是曾经相识而现在已不记得的故人。但来访者看出了他的做作，感觉到自己已被遗忘，那并不是心中暂时的尚可补救的遗忘，而是另一种更残酷且不可逆转的遗忘，他对此绝不陌生，因为那正是死亡的遗忘。于是他都明白了。他打开塞满稀奇物件的行李，掏出一个小手提包，里面满是瓶瓶罐罐。他给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喝下一种淡色液体，重新燃起了他的记忆之光。泪水濡湿了他的双眼，随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置身于一间各种物品都贴着标签的荒唐屋子里，为墙上煞有介事的蠢话而惭愧。他随即又认出了来人，脸上顿时焕发出欢喜的光彩。那人是梅尔基亚德斯。

马孔多欢庆重获记忆的同时，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和梅尔基亚德斯正在重温往昔的友情。老吉卜赛人准备就此留在镇上。他的确一度死去，但难以忍受孤独又重返人世。他因执著于生命受到惩罚，被剥夺了一切超自然能力，又被逐出了部落，便决定到这个死神尚未光顾的偏远角落栖身，专心创立一家银版照相术工作室。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还从未听说过这一发明，他看到自己和全家人的形象在一块闪光的金属版上凝固成永恒，顿时惊诧得说不出话来。在当时拍下的一张老照片上，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灰色的头发乱蓬蓬，硬挺的衬衫领子用一粒铜扣扣上，神情庄严中藏着惊诧，乌尔苏拉乐不可支地说他像“一位受惊的将军”。何塞·阿尔卡蒂奥·

布恩迪亚在那个晴朗的十二月上午的确受惊不小，他以为人的形象一旦被摄到金属版上，生命就会随之日渐销蚀。有趣的是，乌尔苏拉一反常态，消除了丈夫的疑虑，并且抛下往日的怨气，决定让梅尔基亚德斯留下一起生活，只是她一直拒绝拍照，因为——按她自己的原话——不愿意将来让儿孙笑话。那天上午她给孩子们穿上最好的衣裳，在他们脸上都搽了粉，还让每人喝下一勺骨髓糖浆，好让他们面对梅尔基亚德斯壮观的机器保持近两分钟的安分。在这张唯一的全家福照片上，奥雷里亚诺身穿黑色天鹅绒正装，夹在阿玛兰妲和丽贝卡中间，那倦怠的模样和深邃的眼神与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时一般无二。但那时他尚未感觉到命运的预示。他已是熟练的金银匠，凭着精湛的手艺在整个大泽区享有盛名。他的作坊与梅尔基亚德斯杂乱的实验室合在一起，屋里几乎听不到他的呼吸声。他父亲和老吉卜赛人为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大声争论，瓶子和托盘撞击作响，酸液不时在磕磕碰碰中打翻，溴化银白白浪费，而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时空。他全神投入工作，加上经营有道，不久赚取的收入就超过了乌尔苏拉的美味糖果小动物生意。但所有人都觉得奇怪，他明明已是个十足的男子汉，竟然还没有结识女人。事实上他的确没有。

数月后，好汉弗朗西斯科回来了，他是个将近两百岁的江湖艺人，常来马孔多吟唱自编的歌谣。他通过这些歌谣不厌其详地讲述旅行途中的各地见闻，从马孔多直讲到大泽区的边界。如果有人要捎带口信或发布消息，就付两个生太伏请他加到曲目中。乌尔苏拉便是这样偶然得知母亲过世的消息，那天晚上她听着歌谣，本来还期望听到儿子何塞·阿尔卡蒂奥的下落。人们称他为好汉弗朗西斯科，是因为他曾在一次即兴赛歌会上击败魔鬼，至于其真名实姓则无人知晓。他在失眠症肆虐期间一度从马孔多消失，一天晚上又突然出现在卡塔利诺的店里。全镇人都去听他唱歌，想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这次和他同来的有个肥胖无比的女人，需要四个印第安人用摇椅抬着；还有一个黑白混血姑娘，一副孤单无助的神情，打着伞遮挡阳光。这天晚

上奥雷里亚诺去了卡塔利诺的店里。他看见好汉弗朗西斯科像一条巨石雕成的变色龙端坐在好奇的听众中间。他用苍老走调的声音唱出世事变迁，以当年罗利爵士[①]在圭亚那相赠的那架古老手风琴伴奏，那双四方走遍、踩踏硝石而皴裂的大脚还打着拍子。院子深处的一扇门内不时有男人进出，门前鸨母坐在摇椅上静静地扇着扇子。卡塔利诺耳上别了一朵毡绒玫瑰，向听众兜售碗盛的甘蔗酒，并不失时机地靠近那些男人，将手放到不该放的地方。将近夜半时分，酷热难当，奥雷里亚诺已从头听到尾，没有听出什么与自家有关的消息。他正准备起身回家，鸨母挥手跟他打了个招呼。

“你也进去吧，”她说，“只要二十生太伏。”

奥雷里亚诺向鸨母腿上的钱罐里投了一枚硬币，走进房间却不知道要做什么。混血姑娘露着母狗那样的乳头，赤着身子躺在床上。在奥雷里亚诺之前，这天晚上已有六十三个男人光顾过这里。经过这么多人进进出出，房间里的空气中混合了汗水和喘息的气味，变得污浊不堪。姑娘掀起湿透的床单，请奥雷里亚诺抓着另一侧。床单沉得像粗麻布一样。他们俩抓住两头拧水，直到恢复正常重量。他们又翻过席子，汗水从另一面往下淌。奥雷里亚诺盼着这活儿永不停息。他在理论上了解情爱是怎么回事，但还是双膝发软站立不稳，皮肤滚烫毛发悚然，仍忍不住要立刻排出腹中的重负。那姑娘收拾好床铺，要他脱掉衣服时，他慌忙解释：“是他们让我进来的。要我往钱罐里投二十生太伏，还得动作快点儿。”姑娘明白了他的困惑。“如果你出去的时候再放二十生太伏，就可以多待一会儿。”她温柔地说。奥雷里亚诺脱了衣服，羞惭至极，总想着自己的裸体没法和哥哥相比。不管那姑娘怎样努力，他都愈加没有反应，愈觉孤独异常。“我会再放二十生太伏。”他绝望地说。姑娘默默地向他谢过。她的背上都已磨破。她瘦得皮包骨，呼吸间流露出无尽的疲惫。两年前，在离这里很远的地方，她睡前没有熄灭蜡烛，醒来已经身处火海。她和抚养她长大的祖母一起居住的房子化作灰烬。从此，祖母带着她走遍各个村镇，让她以二

十生太伏的价钱卖身，以挣回烧毁的房屋。根据姑娘自己估算，按每夜接待七十个男人计还需要干十几年，因为她还需另付二人的旅费、饮食费以及抬摇椅的印第安人的工钱。鸨母第二次敲房门的时候，奥雷里亚诺离开了房间，什么也没做，惶惶然只想哭泣。当天夜里他想着那姑娘无法入睡，有欲望也有怜悯。他感到无可抑制的冲动，要去爱她和保护她。到天亮的时候，他已被失眠和狂热折磨得疲惫不堪，终于作出庄严的决定，要与她成婚并把她从所欠祖母的债务中解救出来，夜夜享受她给予七十个男人的满足。但上午十点他赶到卡塔利诺店里的时候，姑娘已经离开镇子。

时间平复了他一时的冲动，却加深了挫败感。他一心在工作中逃避。他决定认命，终生远离女人来遮掩自己无能带来的羞耻。与此同时，梅尔基亚德斯已经把马孔多所有可照的都照在金属版上，然后把银版照相术工作室让给了臆想联翩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后者要用它来获取上帝存在的科学依据。他运用一套复杂的程序在家中各处采集影像叠加曝光，确信只要上帝存在，迟早会被他拍下银版照片，不然就可以一举推翻其存在的假设。梅尔基亚德斯在破解诺查丹玛斯预言方面取得了深入进展。他每每研究到深夜，缩在退色的天鹅绒坎肩里艰难喘息，用雀爪般的小手在纸上胡乱涂写，手上的戒指都已失去曾经的光彩。一天夜里，他相信已破译出一则有关马孔多未来的预言。它会变成一座光明的城市，矗立着玻璃建造的高楼大厦，却再没有布恩迪亚家的丝毫血脉存留。“一定弄错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大发雷霆，“不是玻璃房子，是冰房子，像我梦见的那样。而且不管到什么时候，总会有布恩迪亚家的人，直到永永远远。”在这个古怪的家里，乌尔苏拉尽力保持正常，她扩大了糖果小动物生意，整夜不歇地开着烤炉，产出一篮篮面包以及品种丰富的布丁、蛋白酥和小饼干，几个小时内就在通往大泽区的小路上全部售出。明明已到可以安享生活的岁数，她反倒越来越活跃。她一直忙于自己兴隆的事业，一天下午，当印第安女人帮她往面团里加糖，她无

意中向院子望去，竟看见两位陌生的美丽少女在暮色中绣花。那是丽贝卡和阿玛兰妲。她们为外祖母严格守孝三年，那时刚刚脱去孝服，鲜艳的衣裳仿佛使她们在世上获得了新的地位。谁也不曾想到，丽贝卡会是两人中更漂亮的那个。她面容白皙明净，眼睛大而沉静，一双有魔力的手仿佛在将无形的丝线绣成花样。年龄小些的阿玛兰妲虽然魅力稍逊，但遗传了过世外祖母自然的气质和内心的高傲。待在她们身边的阿尔卡蒂奥已显露出父亲当年迅猛的成长势头，但看起来还像个孩子。他开始跟奥雷里亚诺学习金银器工艺，同时也学习读写。乌尔苏拉忽然意识到家里已人满为患，儿女们即将成婚并生儿育女，到时势必会因为屋子拥挤而离开家门。于是她取出长年辛劳攒下的积蓄，又从顾客那里预支货款，着手扩建家宅。她准备修建一间正式的客厅，一间更舒适通风的起居室，一间能摆下十二个座位的餐桌、容纳全家人和所有宾客进餐的饭厅，九间窗户都朝向院子的卧室，以及一条带扶栏的长廊，扶栏上有盆栽的欧洲蕨和秋海棠，能借着玫瑰花园遮挡正午的阳光。她准备扩建厨房，砌起两座炉灶；拆掉庇拉尔·特尔内拉曾在里面为何塞·阿尔卡蒂奥算命的那座旧谷仓，盖一座比原来大上两倍的新仓，保证家里永远不会缺粮。她准备在院子里的栗树荫下分建男女浴室，在院子深处建一座大马厩、一间铁丝网鸡舍、一个奶牛棚和一处四面开放供迷途鸟儿自由栖息的鸟舍。乌尔苏拉仿佛染上了丈夫的狂热，在十几个木匠和泥瓦匠的簇拥下发号施令，决定采光与通风事宜，随意分配空间而不受任何限制。村庄初建时的简陋房舍里堆满了工具和建筑材料，挤满了挥汗如雨的工人。工人们不时请求大家不要妨碍干活，殊不知碍事的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被骨殖袋发出的沉闷咯啦声所烦扰，走到哪儿都难得安宁。在这种恼人的环境中呼吸着生石灰和焦油的气味，谁也说不清镇上这幢有史以来最大的房子，大泽区这处最友善好客最舒适清凉的寓所，究竟是如何从地下冒了出来。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这场大变革期间一直忙于捕捉上帝的踪迹，对此更加难以理解。新家即将落成的时候，乌

尔苏拉把他从狂想世界里拉了出来，告诉他已经接到命令，必须把房子立面涂成蓝色而不是他们想要的白色。她把那份官方法令拿给他看。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没有明白妻子的话，却辨认出了法令上的签名。

“这家伙是什么人？”他问。

“里正。”乌尔苏拉难过地回答，“人家说是政府派来管事的。”

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那位里正，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马孔多。他下榻在雅各酒店—店主是最早来这儿用小玩意儿换金刚鹦鹉的阿拉伯人中的一个—次日便租了一间临街的小屋，距布恩迪亚家两个街区。他摆上从雅各酒店买来的一桌一椅，把随身带来的共和国国徽钉在墙上，又在门上标明“里正”字样。他发布的第一条法令便是所有房屋都要漆成蓝色，以庆祝国家独立纪念日。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手拿这一纸命令的副本找到他时，他正在那间狭小办公室内搭起的吊床上午睡。“这是您写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问道。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这位老成持重、性情腼腆、脸色红润的男子，回答说是。“凭什么？”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再次问道。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从桌子抽屉里找出一份文件给他看。“我已被任命为本镇的里正。”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看都没看那任命书一眼。

“在这个镇上我们不用纸片发布命令。”他镇定自若地说，“另外希望您弄清楚，我们不需要里正，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可纠正的。②”

面对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的漠然，他仍未提高声音，详细追述了当年如何草建村庄，如何划分土地和开辟道路，又如何根据需要予以改进，却从未麻烦过任何政府，也不见有人来找过麻烦。“我们和平相处，连自然死亡的人都没有。”他说，“您也看见了，我们至今还没有墓地。”人们并未因政府没来帮助而难过。正相反，他们都为一直以来政府的放任自流而高兴。他希望保持现状，因为他们建起村镇并

不是为了让随便哪个外来人到此发号施令。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已经穿上和裤子一样雪白的卡其布上装，时时刻刻保持举止庄重。

“所以，如果您想留在这里，和其他普通居民一样，我们非常欢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总结道，“但如果您是来制造混乱，强迫大家把房子漆成蓝色，那么您可以收拾起家什，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因为我的家一定要像鸽子一样雪白。”

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脸色苍白。他后退了一步，咬紧牙关不无痛苦地挤出一句：

“我得警告您，我带了武器。”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自己也不知道双手何时又恢复了年轻时掀翻一匹马的力气。他抓住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的衣领，把他拎起来举到与自己双眼平齐。

“我这样做，”他说，“是因为我宁愿掂起一个活人，也不愿后半辈子都惦着一个死人。”

他就这样抓住衣领拎着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走过半条街，直到通往大泽区的路上才放他双脚着地。一星期后，里正带着六名赤着双脚、衣衫褴褛、手持猎枪的士兵回来了，另有一辆牛车上坐着他妻子和七个女儿。晚些时候又来了两辆车，载着家具、衣箱和日常用具。他在雅各酒店安顿下家人，同时开始找房子，并在士兵的保护下重开办公室。马孔多的创建者决定驱逐入侵者，带着他们的长子来听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调遣。但他并不同意，说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这次回来带上了妻子和女儿，而当着家眷的面羞辱一个人不是男子汉所为。因此，他决定用和平方式解决。

奥雷里亚诺陪父亲同去。此时他已经蓄起翘尖角的黑髭须，声音日渐洪亮，日后的战争中这将成为他的特征。他们没带武器，对卫兵视而不见，径直走进里正的办公室。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并不慌张，向他们介绍正巧在那里的两个女儿。安帕萝，十六岁，和母亲一样肤色黝黑；蕾梅黛丝，只有九岁，是个肤色如百合、眼睛碧绿的漂

亮女孩。她们姿态优美，教养有素，一见父子俩进门，不等介绍就已搬过椅子请他们就坐。但两人都站着不动。

“很好，朋友，”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说，“您可以留下，不过不是因为您门前那几个拿猎枪的土匪，而是看在您夫人和女儿的面子上。”

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一阵茫然，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没给他反驳的机会。“只有两个条件，”他补充道，“第一，各家的房子想漆什么颜色就漆什么颜色；第二，士兵得立刻离开。我们负责维持秩序。”里正举起右手，五指伸直。

“以荣誉担保？”

“以敌人担保。”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回答，随即带着几分苦涩补充道，“因为有件事我要跟您说明白：您和我还是敌人。”

当天下午士兵就离开了。没过几天，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为里正找到一处房子。一切都恢复平静，只有奥雷里亚诺例外。里正最小的女儿蕾梅黛丝，论年龄足可当他的女儿，但她的影子正折磨着他身体的某个部位。那是一种肉体上的感觉，几乎在他行走时构成障碍，就像鞋里进了一粒小石子。

---

①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2 — 1618），英国探险家，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

②在西班牙语中，“里正”（corregidor）源于“纠正”（corregir）一词。

四

雪白如鸽子的新家落成时，举办了一场庆祝舞会。乌尔苏拉是在那天下午发现丽贝卡和阿玛兰妲已出落成婷婷少女的一刻萌生这个想法的，甚至可以说，扩建计划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让姑娘们有一处体面的地方接待访客。为了完美无缺地实现这一愿望，她在扩建进程中像苦役犯一般劳作，在竣工前就已订购了昂贵的装饰品和生活用具，还添置了一样必将震惊全镇、引发年轻人欢呼的神奇发明—自动钢琴。钢琴分部件装箱运来，一同到货的还有维也纳的家具，波希米亚的玻璃器皿，西印度公司的餐具，荷兰的桌布，以及各式各样的灯具、烛台、花瓶、帷幔和壁毯。进口公司自费派来一名意大利技师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负责安装和调试自动钢琴，指导顾客使用，并教授如何伴着印满六卷纸带[①]的时兴乐曲跳舞。

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是个金发的年轻人，马孔多的居民还从未见过这样英俊又有教养的男子。他非常注重仪表，酷暑天气仍身着花缎紧身马甲和厚厚的深色呢料上装。他出于礼貌与主人保持适当距离，好几个星期关在客厅里汗流浃背地工作，心无旁骛的状态足可与金银器作坊里的奥雷里亚诺媲美。一天上午，他没有开门，也没有招呼任何人来见证奇迹，就在自动钢琴上装好第一卷纸带，于是烦人的捶打声和板条持续的轰鸣戛然而止，只有明净谐和的乐声开始荡漾。所有人都赶到了客厅。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大吃一惊，倒不是因为优美的旋律，而是因为自动钢琴琴键的自行弹奏。他立刻把梅尔基亚德斯的照相机架设在客厅里，期望能够拍到那看不见的演奏者。那天意大利人和他们共进午餐。这个天使般的男子未戴戒指的苍白手指使用起刀叉来如行云流水，令负责斟酒上菜的丽贝卡和阿玛兰妲惊诧不已。在客厅旁的起居室里，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教她们跳舞。他用

节拍器打着拍子指导舞步，但不触及她们的身体。这一切都受到乌尔苏拉礼貌的监视，她在女儿们上课的过程中一刻不曾离开房间。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这些日子脚踏舞鞋，身穿富于弹性又极其贴身的舞蹈长裤。“你用不着这么担心，”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对妻子说，“这人是个娘娘腔。”但她不肯放松警惕，直到课程结束，意大利人离开马孔多才罢休。接着他们开始筹备舞会。乌尔苏拉开列出一张经过严格筛选的宾客名单，入选的都是村庄创建者的后代—除去庇拉尔·特尔内拉一家不算，那女人又生了两个父亲不明的孩子。实际上这是门第之选，只不过以友情作为选择标准。那些入选者早在背井离乡创建马孔多之前就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家的常客，而且他们的儿孙也是跟奥雷里亚诺和阿尔卡蒂奥一起长大的伙伴，他们的女儿则是唯一可以来家里与丽贝卡和阿玛兰妲一同绣花的姐妹。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这位仁慈的地方官不过是个摆设，其职责仅限于用微薄的经费供养两名木棒武装起来的警察。为了贴补家用，他的女儿们开了一家缝纫店，业务从制作毡绒花到出售番石榴甜食再到代写情书，不一而足。她们端庄而勤劳，是镇上最美的姑娘，新式舞也跳得最好，却根本没被考虑纳入受邀之列。

乌尔苏拉和姑娘们拆包取出家具，擦亮餐具，挂起玫瑰花舟少女图，泥瓦匠刚砌成的房子空空荡荡，到这时才有了一缕新生的气息。与此同时，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不再追寻上帝的形象，确信其并不存在，转而将自动钢琴开膛破肚，探寻其中蕴藏的秘密魔法。在舞会开始两天前，他面对一堆多出来的弦轴和木槌一筹莫展，刚把一团乱麻似的琴弦从一端捋顺，另一端又卷了起来，最后总算胡乱拼凑复原。那些日子家中空前忙乱，但崭新的煤油灯终究在预定的日期和时刻点燃。家门洞开，空气中树脂和灰浆的气味还未散去，建村元老的儿孙们依次参观了摆放有欧洲蕨和秋海棠的长廊，各个安静的房间，弥漫着玫瑰芬芳的花园，最后来到客厅，簇拥在覆盖着雪白床单的新奇发明周围。自动钢琴在大泽区一些镇子已经流行开来，在别处

见识过的人不免有些扫兴，然而最失望的人还是乌尔苏拉。她放好第一卷纸带让阿玛兰妲和丽贝卡领先起舞，但机器却毫无动静。老态龙钟的梅尔基亚德斯几乎已经失明，但仍试图乞灵于自己古老的智慧来修复钢琴。最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误打误撞，移动了一处卡住的部件，音符开始断断续续地冒出，随即又以颠倒的顺序涌泻。琴槌敲击在散乱无序又过分绷紧的琴弦上，纷纷脱臼错位。然而，那二十一位当年深入山林西行寻找大海的无畏勇士的后人，执著地绕过错乱乐声的暗礁，翩翩起舞直到天明。

皮埃特罗·克雷斯皮重新把自动钢琴组装起来。丽贝卡和阿玛兰妲帮他理顺琴弦，听到那颠倒的华尔兹乐曲时跟他一起连连大笑。见他那样可亲又可靠，乌尔苏拉便取消了监视。在他告别的前夜，家里用修复的自动钢琴临时举行了一场舞会，他和丽贝卡联袂表演了一场美妙的现代舞。阿尔卡蒂奥和阿玛兰妲的舞姿舞技也并不逊色。但表演被迫中断，挤在门口围观人群中的庇拉尔·特尔内拉和另外一个女人又撕又咬打了起来，只因后者胆敢妄言年轻的阿尔卡蒂奥长着女人的屁股。将近午夜时分，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满怀感情地发表了简短致辞，并许诺会很快回来。丽贝卡一直送他到门口，随即关闭家门，熄灭灯火，她回到自己房间里恸哭起来。那是一种难以安慰的哭泣，持续了好几天，连阿玛兰妲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她的守口如瓶并不奇怪。她虽然表面热情坦诚，实际秉性孤僻，从不敞开心扉。她已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身材修长结实，但仍旧喜欢坐在那把和她一起到来的小木头摇椅上，那椅子加固过多次，扶手已经不见了。没人留意她到了这个年龄还是喜欢吸吮手指，她一有机会便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并养成了面朝墙壁睡觉的习惯。雨天的下午，她和女友们待在秋海棠长廊里刺绣，每当看到潮湿的土层和蚯蚓在花园里堆起的小丘，她常常会从交谈中走神，怀念的泪水带着咸味涌上舌尖。她一开始哭泣，当年那些被橘汁和大黄压服的秘密嗜好顿时化为无法抑制的渴望爆发。她又开始吃土。第一次几乎是出于好奇，她确信那糟糕的

味道将是摆脱诱惑的最佳药方。她果然无法忍受泥土在嘴里的感觉，但她没有放弃，而是受制于不断增强的渴望，渐渐恢复了旧日的胃口，恢复了对原生矿物的喜爱以及原始食物带来的满足。她将一把把泥土藏进口袋，一边传授女友们最繁难的针法，谈论其他不值得自己为之吃下石灰墙皮的男人，一边趁人不注意一点点吃掉，心中涌起既幸福又愤怒的迷乱感觉。这一把把泥土使那唯一值得她自卑自贱的男人不再遥远也更加真切，仿佛从他脚上精巧的漆皮靴在世界另一处所踏的土地传来矿物的味道，她从中品出了他鲜血的重量和温度，这感觉在她口中猛烈烧灼，在她心里留下安慰。一天下午，安帕萝·摩斯科特无缘无故请求参观新家。阿玛兰妲和丽贝卡对这突如其来的到访不明所以，礼貌而生硬地接待了她。她们向她展示扩建后的家宅，请她听自动钢琴的演奏，为她端上橘子水和小饼干。安帕萝给她们上了一课，诸如什么是端庄大方，什么是仪态可亲，什么是举止得体，给在场不过短短一会儿的乌尔苏拉留下了深刻印象。两小时后，谈话渐渐无味，安帕萝趁阿玛兰妲分神的瞬间将一封信塞给丽贝卡。她只来得及看见“可敬的丽贝卡·布恩迪亚小姐”字样，与自动钢琴说明书上的字体同样工整，以同样的绿色墨水写就，使用同样的绮丽措辞。她立刻用指尖将信折起藏进胸衣，望着安帕萝·摩斯科特的眼神中充满无尽感激，还有结下生死之盟的无声承诺。

安帕萝·摩斯科特与丽贝卡·布恩迪亚之间突然萌生的友情燃起了奥雷里亚诺心中的希望。他一直想着蕾梅黛丝，深受折磨，却总找不到机会见面。当他跟最亲密的朋友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勒和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建村元老们的儿子，名字与父亲相同—在镇上散步时，曾无数次用渴望的目光在缝纫店中寻找，但看见的只是她的姐姐们。安帕萝·摩斯科特在家中的出现对他而言不啻一个预兆。“她一定会一起来，”奥雷里亚诺低声对自己说，“她一定会来。”他重复了无数次，如此坚信不疑，终于一天下午，他在作坊里组装一条黄金小鱼的时候，感到她回应了自己的呼唤。不一会儿，他果然听到一个童稚的

声音，于是抬起头来一看，心脏因惊恐而停止了跳动：小女孩穿着粉红薄纱裙和白色小靴子站在门前。

“这里不能进，蕾梅黛丝。”走廊里传来安帕萝·摩斯科特的声音，“人家在干活。”

但奥雷里亚诺没等她听从姐姐的话，就举起口中穿着细链的小金鱼，对她说：

“进来。”

蕾梅黛丝走近问了几个关于小金鱼的问题，奥雷里亚诺无法回答，因为他猝然间喘不过气来。他想永远这样待下去，守着她百合般的肌肤，伴着她翡翠色的眼睛，听她以对待父亲的尊敬，每问一个问题都叫一声“先生”。梅尔基亚德斯坐在角落里的书桌前，画着难以索解的符号。奥雷里亚诺恨他。他做不了别的，只能对蕾梅黛丝说要把小金鱼送给她，结果吓得她飞快地逃出了作坊。那天下午奥雷里亚诺失去了隐藏于心底的耐性，此前他正是靠这种耐性等待见面的机会。他无心干活。他竭力集中精神无数次呼唤，但蕾梅黛丝没有回应。他到她姐姐们的缝纫店寻找她，在她家窗前寻找她，去她父亲的办公室寻找她，但她的身影只出现在他心中，填满了他可怕的孤独。他和丽贝卡在客厅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听着自动钢琴弹奏华尔兹。丽贝卡这样做是因为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曾教她如何伴着那音乐跳舞，奥雷里亚诺这样做则是因为一切，包括音乐在内，都能让他想起蕾梅黛丝。

家里充满爱情的气息。奥雷里亚诺寄情于无头无尾的诗行。他把诗句写在梅尔基亚德斯送他的粗糙羊皮纸上，写在浴室的墙壁上，写在自己的手臂上，而所有诗句中都有蕾梅黛丝幻化的身影：蕾梅黛丝在下午两点令人昏昏欲睡的空气中，蕾梅黛丝在玫瑰无声的呼吸中，蕾梅黛丝在蠹虫如沙漏般的暗地蛀蚀中，蕾梅黛丝在清晨面包的热气中，蕾梅黛丝无所不在，蕾梅黛丝无时或缺。丽贝卡每天下午四点待在窗边绣花，等待情书的到来。明明知道运送邮件的骡子每十五天才

来一次，她依然天天等候，相信他们会算错时间，任何一天都有可能到来。然而事与愿违，有一次到了预定的日期，骡子却没有出现。丽贝卡绝望得发疯，半夜爬起来，自戕般饥渴地吞下一把把花园里的泥土。她又痛苦又愤怒地哭泣，咀嚼着柔软的蚯蚓，咬碎蜗牛的硬壳崩裂牙齿，又呕吐直到天亮。她陷入一种迷狂的衰弱状态，失去意识，在毫不知耻的呓语中吐露心声。乌尔苏拉惊诧之下撬开她的衣箱，在箱底发现了用玫瑰色丝带系好的十六封香气四溢的信件，夹在旧书里的枯叶和花瓣，以及一碰就化为粉末的蝴蝶标本。

只有奥雷里亚诺能理解这样的创痛。那天下午，当乌尔苏拉试图将丽贝卡从迷狂中拯救出来时，他跟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勒和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去了卡塔利诺的店里。那里扩建了一排木板房，里面所住的单身女人散发出萎谢花朵的气味。一支由手风琴和鼓组成的乐队演奏着好汉弗朗西斯科的歌谣，他已有好几年没在马孔多出现。三位好友喝着甘蔗酒。马格尼菲科和赫里内勒多同奥雷里亚诺年纪相仿，但比他更通晓世事，轮流和坐在大腿上的女人喝酒。其中一个镶着金牙、神色憔悴的女人的爱抚令他浑身震颤，但他拒绝了她。他发现喝得越多就越发想念蕾梅黛丝，不过也更能忍耐思念带来的折磨。他不知自己从何时开始飘了起来。他看见朋友们和那些女人在耀眼的闪光中浮游，没有体积没有重量，他们所说的言语未经双唇，他们神秘的手势与表情彼此疏离。卡塔利诺一只手搭在他背上，对他说："快十一点啦。"奥雷里亚诺回过头去，就看到了那张畸形的大脸，耳边还插着一朵毡绒花。他随即失去了记忆，好像当初得了失忆症那样，直到另一个早晨才恢复，他身处完全陌生的房间，一旁站着穿着衬裙、赤着双脚、蓬头散发的庇拉尔·特尔内拉，她拿着一盏灯照着他，一脸难以置信的神情。

"奥雷里亚诺！"

奥雷里亚诺站稳脚，抬起头。他不知自己是怎样来到这里的，但知道目的为何，因为那正是他从童年起一直深藏心底的隐秘。

“我是来跟您睡觉的。”他说。

他的衣服上满是污泥和呕吐的痕迹。庇拉尔·特尔内拉那时候和两个孩子生活在一起，她没有问他什么，把他引到床前。她用打湿的丝瓜瓤给他擦脸，为他脱了衣服，自己也赤裸身体，然后放下蚊帐，免得孩子们万一醒来看到。她已经厌倦了等待留下的男人，离开的男人，无数因纸牌的模糊指引迷了路没能赶到她家的男人。在等待中她的皮肤起了皱褶，乳房被掏空，心里的余烬熄灭。她在黑暗中摸索着奥雷里亚诺，把手放在他的肚子上，带着母性的温柔亲吻他的脖子。“我可怜的小宝宝。”她喃喃道。奥雷里亚诺颤抖起来。他平稳老练、毫无滞碍地越过痛苦的峭壁，发现蕾梅黛丝变成了无边的沼泽，闻起来好像幼兽和新熨好的衣服。渡过难关之后，他哭了起来。一开始是几声不由自主、断断续续的抽泣，随后泪如泉涌，他感觉心中苦痛的块垒迸裂了。她等待着，用指肚摩挲他的头发，直到他的身体倾空那令他无法活下去的黑暗。然后庇拉尔·特尔内拉问他：“她是谁？”奥雷里亚诺告诉了她。她笑了，只是昔日足以惊飞鸽群的笑声如今甚至不会把孩子们吵醒。“你得先把她养大。”她开玩笑说。但在玩笑背后，奥雷里亚诺感受到了理解。他离开房间的时候，不仅抛下了不解人事时的惶惑，也卸下了几个月来折磨内心的重负。庇拉尔·特尔内拉当下给了他一个承诺。

“我去跟那女孩说。”她说，“等着我把她端在盘子里送给你。”

她做到了。只是时机不对，因为家里已经失去往日的平静。丽贝卡那般喊叫已经无法保守秘密，阿玛兰妲发现了她的痴恋后开始发烧。她也在为没有回应的爱情而饱受折磨。她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写下一封封狂热的信，以摆脱没有希望的激情带来的折磨，然后把信深藏在衣箱内。乌尔苏拉同时照顾两个病人，几乎忙不过来。她费尽心机长时间询问，也没能问出阿玛兰妲委靡的缘由。最终，她又灵机一动，撬开衣箱，便发现了用玫瑰色丝带系好的信，信内塞满新鲜的百合花瓣，信上泪痕未干，封封都写给皮埃特罗·克雷斯皮，但从未寄

出。乌尔苏拉眼含愤怒的泪水，诅咒自己动念购买自动钢琴的那个时刻，并取消了刺绣课程，下令进入没有死人的丧期，直到女儿们死心断念为止。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已经改变对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最初的看法，十分欣赏他对音乐器械的灵活掌握，于是试图干预，却无济于事。庇拉尔·特尔内拉告诉奥雷里亚诺，蕾梅黛丝已经作好结婚的准备，他意识到这个消息会给父母带来新的痛苦。但他还是选择面对现实。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和乌尔苏拉被郑重其事地请到客厅，漠然听着儿子的宣告。但听到那未婚妻的名字时，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气红了脸。“爱情是瘟疫！”他咆哮着，“有那么多漂亮又正派的女孩，你偏偏要娶敌人的女儿。”乌尔苏拉却赞成儿子的选择。她坦承自己对摩斯科特家七姐妹的好感，说她们漂亮、能干、端庄又有教养，称赞儿子有眼光。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面对妻子的热情让了步，但提出一个条件：作为交换，丽贝卡要嫁给皮埃特罗·克雷斯皮。乌尔苏拉等到能腾出时间时，会带阿玛兰妲去省城观光，让她多和外人接触以淡忘自己的失落。丽贝卡听到这个结果，立时恢复了健康，给未婚夫写了一封欢喜万分的信，经父母过目后亲自送到邮局投递。阿玛兰妲假意接受了这一决定，渐渐退了烧，但在心中暗暗发誓，丽贝卡想要结婚除非从她的尸体上跨过去。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身着舞会那晚才穿过一次的深色呢料正装，系上赛璐珞硬领，套上岩羚皮靴，去蕾梅黛丝·摩斯科特家提亲。里正和他妻子半是欣喜半是困惑地接待了他，不知道他这次突然来访的目的，稍后又都认为他记错了提亲的对象。为了澄清误会，做母亲的叫醒蕾梅黛丝，把她抱进客厅，那孩子还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父母问她是否已作出嫁人的决定，她哭哭啼啼地回答只想继续睡觉。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理解了摩斯科特夫妇的困惑，便去找奥雷里亚诺确认。等他回来的时候，摩斯科特夫妇已经换上正装，重新布置了家具，在花瓶里插上鲜花，六个大女儿也陪在一旁等待。尽管场面尴尬，硬领也让他很不舒服，何塞·

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还是肯定，蕾梅黛丝就是儿子选中的人。“这没有道理，”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有些不快，“我们还有六个女儿，都是单身，年龄也合适，非常愿意成为您儿子这样正派又勤劳的男士的伴侣，可奥雷里亚诺偏偏相中了还在尿床的那一个。”他妻子是个保养得很好的女人，从眼神到姿态都带着悲伤，她责备了丈夫的无礼。喝过果汁后，他们欣然接受了奥雷里亚诺的决定。不过摩斯科特太太请求单独与乌尔苏拉谈一次。乌尔苏拉很吃惊，抱怨让自己搅进了男人们的事情，但实际上又兴奋又害怕，次日便登门拜访。半小时后，她带回了蕾梅黛丝还没到青春期的消息。奥雷里亚诺并不认为这是什么无法逾越的障碍。他已经等了那么久，如果有必要还可以等下去，直到未婚妻达到生育的年龄。

恢复不久的平静又被打破，这一次是梅尔基亚德斯的死。尽管这结果已在意料之中，但他死亡的情形却是人们事先所想象不到的。他归来后没几个月，便经历了一个急剧衰老的过程，很快就被归为那类无用的老翁，他们像幽灵般在卧室间步履蹒跚地游荡，高声追怀美好岁月却无人理睬，直到某天清晨死在床上才被人想起。起初，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出于对新奇的银版照相术和诺查丹玛斯预言的热情，还常常帮他的忙。但随着时间流逝，两人之间的交流日益困难，他最终被丢下孤独一人。他的视力和听力都在衰退，似乎把对话者混同于他在人类历史早期所结识的人物，回答他人问题时混乱使用多种语言。一天他忘了戴上夜里放在床边水杯里的假牙，从此索性不戴。乌尔苏拉着手扩建家宅的时候，特意为他盖了一个房间，紧挨着奥雷里亚诺的作坊，远离家中的忙乱喧闹，有一扇阳光充沛的窗子和一个书架。她亲自把尘侵蛾蛀几近损毁的书籍、写满难解符号的脆薄纸张和装假牙的杯子一一摆上书架，那杯子里已经长出水生植物，开着纤小的黄花。梅尔基亚德斯似乎很喜欢这个新居，因为从此再没见他出屋，甚至在饭厅也不见他的踪影。他只去奥雷里亚诺的作坊，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在随身携带的羊皮纸上涂写谜一般的文字，那纸好

像由某种干燥的材料所制，像千层饼似的裂开。他就在那里吃下比西塔西翁每天两次送去的食物，但最后那段日子他没了胃口，只吃蔬菜过活。很快他就显出素食者特有的孤清模样。他的皮肤上覆着一层柔软的苔藓，与那件不分季节永不离身的坎肩上滋生的相仿，他的呼吸间散发出熟睡动物的臭气。奥雷里亚诺最终忘了他的存在，沉浸在自己的诗行里，但有一次感觉听懂了他低沉独白中的只言片语，便留了心。实际上，他滔滔不绝说出的艰深话语中唯一能够辨别出来的，只是像锤击般不断重复的一个词“二分点二分点二分点”[②]，还有一个名字“亚历山大·冯·洪堡”[③]。阿尔卡蒂奥开始帮奥雷里亚诺做金银器活计的时候，曾尝试稍稍接近他。梅尔基亚德斯回应了这一沟通努力，不时吐出几个和现实毫不相干的卡斯蒂利亚语句子。然而一天下午，他好像突然间激情骤至，神采焕发。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阿尔卡蒂奥将回想起梅尔基亚德斯为他朗读那一页页不可理解的文字时的颤抖，他自然是听不懂，但那铿锵的音调听起来仿佛教皇通谕的吟唱。随后，他很久以来第一次露出笑容，用西班牙语说道：“等我死的时候，请在我房间里烧上三天水银。”阿尔卡蒂奥告诉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后者试图获取更具体的信息，却只得到一句回答：“我已经达到永生。”每当梅尔基亚德斯的呼气发臭，阿尔卡蒂奥便在星期四的上午带他去河里洗澡。他看来好了些。他脱下衣服，和年轻人一起没到水里，凭着神秘的方向感绕过深凹和危险地带。“我们是水做的。”他有一次这么说道。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没人在家里见过他，除了那天晚上他令人感动地努力修理自动钢琴，以及他腋下夹着用毛巾包好的加拉巴木果壳瓢和油椰肥皂跟阿尔卡蒂奥去河里洗澡的时候。一个星期四，在叫他去河边之前，奥雷里亚诺听见他说：“我已经发热病死在新加坡的沙洲上。”那天他下水时弄错了路线，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在下游几公里的地方被找到，尸身搁浅在一处明晃晃的河湾里，一只孤零零的秃鹫落在他肚子上。乌尔苏拉哭得比自己父亲去世时还伤心。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不顾她的惊诧和反对，拒

绝为他下葬。“他永生不死，”他说，“他自己给出了复活的配方。”他重新燃起遗忘多时的炼金炉，放上一锅水银煮沸，一旁的尸体渐渐充满蓝色的泡沫。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鼓起勇气提醒他，溺死者不安葬的话会危害公共卫生。“哪儿的话，他根本没死。”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如此回答。熏香一般的水银烧煮已经持续七十二小时，尸体上开始迸裂出青紫色的花朵，伴随着轻微的爆响，家里充满恶臭。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同意下葬，但拒绝草率行事，而要用隆重的礼仪对待这位马孔多最大的恩人。这是镇上第一次也是参与人数最多的葬礼，一个世纪后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或可与之媲美。他们将他葬在为公墓预留的空地中央，筑起一座坟墓，墓碑上铭刻着他们对他的唯一所知：**梅尔基亚德斯**。他们为他守灵九个夜晚。大家聚在庭院里喝咖啡、讲笑话、玩纸牌，阿玛兰妲趁着这混乱找到一个机会向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表白自己的爱情，后者几个星期前刚与丽贝卡正式订下婚约，并且开办了一家乐器和发条玩具店，就在当年阿拉伯人常常流连并用廉价的小玩意儿交换金刚鹦鹉的地方，也就是人们口中的土耳其人大街。意大利人那一头闪亮的鬈发常引得女人们情不自禁地赞叹，他觉得阿玛兰妲不过是个任性的小姑娘，没有把她的话当真。

“我有个弟弟，”他对她说，“他很快会来店里给我帮忙。”

阿玛兰妲感到受了侮辱，带着刻骨的怨恨告诉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她下定决心要阻止姐姐的婚礼，就算横尸门前也在所不惜。意大利人对如此骇人的威胁大感震惊，忍不住告诉了丽贝卡。于是，因乌尔苏拉的繁忙一再推迟的旅行，在不到一个星期内就安排妥当。阿玛兰妲没有反对，但在与丽贝卡吻别的一刻，在她耳边轻轻说道：

“你别做梦了。就算把我赶到天边，我也能想办法让你结不成婚，哪怕要杀了你也不在乎。”

乌尔苏拉的离开，以及梅尔基亚德斯无形的存在——他继续悄无声息地在房间里游荡——使家里显得分外空旷。丽贝卡接管了日常家务，印第安女人负责照管面包房。每到傍晚，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就

在一阵薰衣草的香风中到来，总带上一件玩具做礼物，他的未婚妻则在客厅里接待他，并敞开所有门窗以免引起风言风语。这种谨慎不免显得多余，因为意大利人已充分表明他的正派可靠，他甚至连姑娘的手都没有碰过，尽管她年内就将成为他的妻子。这样的来访很快使家里摆满了神奇的玩具。上了弦就能翩翩起舞的跳舞女郎，八音盒，奔跑的马儿，耍杂技的猴子，敲鼓的小丑，各种令人惊异的机械动物，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带来的这些玩具驱散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心头悼念梅尔基亚德斯去世的悲痛，他又回到了过去那个钻研炼金术的时期。他生活在满是开膛破肚的动物、大卸八块的机件的天堂里，试图利用钟摆原理设计一套永动系统，使这些玩具趋于完善。奥雷里亚诺已经无心干活，专门教导小蕾梅黛丝读写。起初小女孩宁愿和自己的娃娃一起玩，全怪那个天天下午都来的男人，家里人总要她放下游戏，给她洗澡更衣，然后让她坐在客厅里接待他。但奥雷里亚诺的耐心和诚意最终赢得了她的好感，她甘愿好几个小时和他待在一起学习词语的含义，用彩色铅笔在本子上画小房子、畜栏里的奶牛、散发黄色光芒落到山背后的圆太阳。

只有丽贝卡受了阿玛兰妲的威胁一直闷闷不乐。她了解妹妹的性格，了解她的高傲，因她刻毒的怨恨而担惊受怕。她连续几个小时躲在浴室里吸吮手指，竭尽全力抗拒吃土的诱惑。为了摆脱心头的忧虑，她请庇拉尔·特尔内拉为自己推算未来。说了些模棱两可的套话之后，庇拉尔·特尔内拉给出了预言：

“只有等你父母入土为安，你才会幸福。”

丽贝卡一阵颤抖。她记起好像在梦里，看见还是小女孩的自己走进家门，带着衣箱、小木头摇椅和一个口袋，而她一直不知道口袋里面装的什么。她记起一位秃顶的先生，他身着亚麻衣裳，领口别着一粒金扣，但与金杯国王[④]毫无相似之处。她记起一位非常年轻美貌的女士，双手温和芬芳，与金元仆侍那双似乎患了风湿病的手相去甚

远，那女士曾在她发间簪上鲜花，下午带她在一个绿色街巷的城镇中散步。

“我不明白。”她说。

庇拉尔·特尔内拉同样困惑。

“我也不明白，但牌上就是这么说的。”

丽贝卡被这解不开的谜团搅得忧心忡忡，便告诉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他责怪她竟然相信纸牌的预言，自己却在暗中翻遍衣柜和衣箱，挪开家具，掀起床板和地板，四处寻找那个骨殖袋。他想起自从房子扩建以后就再没见过，便偷偷找来那些泥瓦匠，其中一个承认，当时嫌那袋子碍事就把它砌在了夹壁里。他们耳朵贴在墙上四处侦听，听了好几天终于听到了低沉的咯啦咯啦声，于是凿开墙壁，发现骨殖仍完好无损地保存在袋中。当天他们便把骨殖安葬在一个没有墓碑的坟茔里，就在梅尔基亚德斯的坟墓旁。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回到家，心里卸下了如同对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的回忆一样的良心重负。经过厨房的时候，他吻了一下丽贝卡的额头。

“别胡思乱想了，”他说，“你会幸福的。”

与丽贝卡结下的友谊为庇拉尔·特尔内拉重新敞开了家门，而那扇门自从阿尔卡蒂奥出生后乌尔苏拉就不曾为她打开过。她随时随刻都会登门，闹出的动静活像一群山羊，并以狂热的干劲做着最繁重的家务。有时她会走进作坊帮阿尔卡蒂奥敏化照相版，手脚利落，温情脉脉，却给他造成困惑。这女人令他不知所措。她肌肤的热度，她身上的烟味，她在暗室里无拘无束的笑声，都令他心神不定脚下磕绊。

有一次，奥雷里亚诺正在打造金银器，庇拉尔·特尔内拉就倚在桌上观赏他耐心地干活。事情发生在突然之间。奥雷里亚诺确认阿尔卡蒂奥在暗室里，才抬起头迎上庇拉尔·特尔内拉的视线，她的想法毫无掩饰，仿佛暴露在正午的阳光下。

“好吧，”奥雷里亚诺说，“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庇拉尔·特尔内拉咬着嘴唇，露出一丝悲伤的笑容。

“你适合打仗，”她说，“百发百中呢。”

预感得到了证实，奥雷里亚诺心下一阵轻松。他继续埋头干活，仿佛什么也没发生，声音里多了几分安稳和镇定。

“我认了，”他说，“就叫我的名字。”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终于如愿以偿：他把钟表的机件安在上弦的跳舞女郎身上，于是那个玩具在自己的音乐伴奏中一刻不歇地跳了三天。这一发明带给他的兴奋超过了以前所有的疯狂举动。他不再吃饭，不再睡觉。少了乌尔苏拉的照料和监督，他任凭想象将自己带到一种永恒的谵妄状态，从此再也没有恢复。他整夜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高声自语，寻找方法将钟摆原理应用到牛车上，应用到犁铧上，推广到一切有用的运动物体上。失眠引起的狂热令他筋疲力尽，以至于一天凌晨，当那个头发花白、行动迟缓的老人走进他的卧室，他一时竟没认出来。那是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最终，他还是想了起来，惊讶于死人也会变老。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不禁怀念起往昔，一阵心潮澎湃。“普鲁邓希奥，”他高声喊道，“你怎么跑这么远来这儿了！”死去多年以后，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对活人的怀念如此强烈，对友伴的需求如此迫切，对存在于死亡之中的另一种死亡的迫近又是如此惧怕，最终对他最大的冤家对头萌生出眷恋。他找了很久。他向里奥阿查的死人们问起他，向从巴耶杜帕尔、从大泽区来的死人们问起他，但没人知道。马孔多对亡灵来说是一处未知之地，直到梅尔基亚德斯死后，在五颜六色的死亡地图上用一个黑点标出。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与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一直聊到天亮。没过几小时，他在熬夜后的疲惫不堪中走进奥雷里亚诺的作坊，问道：“今天星期几？”奥雷里亚诺告诉他是星期二。“我想也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说，“可我忽然又觉得还是星期一，跟昨天一样。你看那天，看那墙，看那秋海棠。今天还是星期一。”奥雷里亚诺已经习惯他的种种古怪，没有理会。第二天，星期三，他又来到作坊。“真糟糕，”他说，“你看那风，听那太阳嗡嗡响，跟昨天前天都一

样。今天还是星期一。”那天晚上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在长廊里碰见他，见他正以老人那种毫不雅观的方式哭号，为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为梅尔基亚德斯，为丽贝卡的父母，为他自己的父母，为所有他能想起在死亡中孤独无依的人哭号。皮埃特罗·克雷斯皮送给他一只上了弦就能用两脚走钢丝的小熊，但没能转移他的注意力。又问他前些日子提出的利用钟摆原理建造机器载人飞行的计划进展如何，他回答说那不可能，因为钟摆能让任何东西飞起来，却无法使自己腾空。星期四他又出现在作坊里，一副大祸临头的痛苦神情。“时间这个机器散架了，”他几乎哭了出来，“而乌尔苏拉和阿玛兰妲还在那么远的地方！”奥雷里亚诺像对待小孩一样训斥了他，他显出顺从的样子。他花了六个小时观察各种事物，试图找出一分一毫与前一天的不同之处，期待发现某种变化能证明时间的流逝。他整夜睁着眼躺在床上，呼唤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梅尔基亚德斯以及所有的死人来分担他的忧虑。但没人出现。星期五，他在谁都还没起床时又去观察外界的状况，最后彻底确认了仍是星期一。于是他抽出一根门闩，以超常的力量和野蛮的劲头将所有炼金设备、银版照相装置、金银器作坊都砸个稀烂，像中了邪似的高喊着一种流利高亢却无人能懂的语言。他准备将家里其他地方也如此捣毁，这时奥雷里亚诺向邻居求助。将他按倒在地用了十个人，捆绑起来用了十四个人，拖到院中的栗树那里用了二十个人。他被绑在树上，用奇怪的语言喊叫着，嘴里吐出绿色的泡沫。乌尔苏拉和阿玛兰妲返家的时候，他的手脚仍被捆在栗树树干上，全身被雨水淋透，一副天真无辜的样子。她们和他说话，他看着却认不出对面是谁，说了些没人能懂的话。乌尔苏拉为他松开被绳索勒伤已经溃烂的手腕脚踝，只在腰上留下捆绳。后来又用棕榈叶搭了顶棚，为他遮阳蔽雨。

---

①自动钢琴上用于控制琴键的穿孔纸带。

②二分点（equinoccio），昼夜平分点，黄道与天赤道的交点。

③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 —1859），德国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

④“金杯”（copa）与后文中的“金元”（oro）、“宝剑”（espada）都是西班牙纸牌中的花色；“国王”、“骑士”、“仆侍”分别为每种花色中的第十二、第十一、第十张牌。

五

三月的一个星期天，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和蕾梅黛丝·摩斯科特在尼卡诺尔·雷伊纳神甫于客厅里搭起的祭坛前结为夫妇。摩斯科特家四个星期以来的担惊受怕至此达到顶点，因为小蕾梅黛丝虽已进入青春期，却尚未摆脱童年的习惯。母亲已经给她讲授过青春期的变化，但二月的一个下午她仍然惊叫着冲进房间，打断了姐姐们和奥雷里亚诺的谈话，向他们展示内裤上一块巧克力色的污迹。于是婚礼定在一个月后举行。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教会她自己洗澡穿衣，让她懂得最基本的家庭事务。他们让她在烧热的砖上小便，好摆脱尿床的习惯。他们还费了不少工夫才说服她相信夫妻间的秘密绝不可外传，因为她听说以后既惊惶又兴奋，恨不得和遇见的每一个人讨论新婚之夜的种种细节。这项工作颇费心神，但当预定的佳期到来，小女孩熟谙人情世故已经不逊于任何一位姐姐。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挽着她的手臂，在鞭炮声和数家乐队的乐声中走过鲜花与花环装点一新的街道。新娘挥手致意，并向在窗口为她祝福的人们表示感谢。奥雷里亚诺身着黑呢正装，脚穿带金属搭扣的漆皮靴，数年后面对行刑队时他穿的也是这一双。他在家门前迎接新娘，随后带她走向祭坛，整个过程中脸色极其苍白，喉咙里像有个硬球堵着。新娘却表现得自然得体，即使在奥雷里亚诺为她戴戒指却失手落地时也没有丝毫失态。四周一片耳语，宾客开始骚动，而她仍抬起戴着花边手套的手，无名指兀自不动，直到新郎赶在戒指滚到门口之前伸脚挡住，又面红耳赤地回到祭坛前。她母亲和姐姐们提心吊胆，生怕小女孩在仪式上有不得体的举动，结果倒是她们自己失态，冲上去吻她。从那天起，她就展示出责任感、大方的仪态，以及面对逆境仍波澜不惊的控制力。她还想到留下结婚蛋糕最好的部分，盛在盘里配上叉子端到何塞·阿尔卡

蒂奥·布恩迪亚面前。身形魁梧的老人被绑在栗树树干上，蜷缩于棕榈叶顶棚下的一张小木凳上，饱经日晒雨淋已失去血色。他冲她感激地笑了笑，一边用手指抓蛋糕吃，一边哼着一首难以理解的圣诗。喧闹的庆典一直持续到星期一早上，其间唯一不幸的人是丽贝卡·布恩迪亚。这本该也是她的喜事。乌尔苏拉已同意在同一天为她举行婚礼，不料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星期五接到的一封信带来了他母亲病危的消息。婚礼推迟了。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接到信后一个小时即起程前往省城，在路上错过了与母亲的相遇，他母亲星期六晚上准时抵达马孔多，并在奥雷里亚诺的婚礼上献唱了本是为自己儿子婚礼准备的悲伤咏叹调。皮埃特罗·克雷斯皮为了及时赶回自己的婚礼，一路跑瘫了五匹马，但当他星期天午夜时分赶到的时候，能做的只剩下打扫喜事的残烛余烬。从未查出究竟是谁写了那封信。在乌尔苏拉的拷问下，阿玛兰妲气得哭了起来，对着木匠们尚未拆除的祭坛赌咒发誓以证明自己的无辜。

尼卡诺尔·雷伊纳神甫是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从大泽区请来主持婚礼的，这位老人因清苦的职业而变得刻板。他肤色阴沉，瘦得皮包骨，肚子却浑圆凸出，一副老好人的表情与其说是善良不如说是天真。他本打算婚礼结束后就回自己的教区，但马孔多居民的灵性贫瘠状态令他大吃一惊，他们按本性行事，肆无忌惮地繁衍生息，不给儿女施洗，不为节庆祝圣。考虑到世上没有别的地方更需要上帝的种子，他决定再待一个星期来教化犹太人和外邦人，使同居的合法化，让濒死的领圣礼。然而没有人理睬他。他们回答说这里很多年来没有神甫，大家一向都是直接和上帝解决灵魂问题，已经摆脱了致死之罪的污染。尼卡诺尔神甫厌倦了在旷野讲道，决心建造一座教堂，世界上最大的教堂，要有真人大小的圣徒群像和彩绘玻璃窗，要让人们从罗马来到这个不敬神的中心敬拜上帝。他托着一个小铜盘四处募捐。人们给了他不少捐资，但他想要更多，因为教堂得有一口声音能震得溺水者浮出水面的大钟。他苦苦恳求，直到声音嘶哑，浑身骨头开始

咯咯作响。到一个星期六，他连造门的钱都没募齐，不由陷入绝望。他临时在广场搭起一个祭坛，星期天就像失眠症时期一样摇着铃铛，召唤居民参加露天弥撒。一些人出于好奇，另一些人出于怀旧，还有些人唯恐上帝将他们对其代理人的轻慢视为对其本身的冒犯，都应邀而来。就这样，早上八点的时候半个镇子的人都聚集在广场上，听尼卡诺尔神甫用因乞讨变得嘶哑的嗓音咏唱福音书。最后，当人群开始散去，他举手提请大家注意。

“稍等，”他说，“现在我们要亲眼观看上帝神力无穷的明证。”

方才助祭的男孩递过一杯热气腾腾的浓巧克力，他一口喝了下去。然后他从袖子里掏出手帕擦嘴，闭上眼睛大张双臂。随即，尼卡诺尔神甫从地面凭空升起足足十二厘米。这一举动很有说服力。一连几天他走街串巷，凭借巧克力的助力一再重现升空的明证，施舍源源不断地被祭童收到口袋里。不到一个月，教堂便得以开工建造。没有人怀疑这一演示的神圣源起，除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一天上午人们聚集在栗树周围想再次见证神迹，他只是无动于衷地看着。当尼卡诺尔神甫连同身下的凳子一起离地腾空，他只在小木凳上挺了挺身，耸耸肩膀。

“Hoc est simplicisimum,”①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说，“homo iste statum quartum materiae invenit.”②

尼卡诺尔神甫一抬手，凳子的四条腿同时落了地。

“Nego,”他说，“Factum hoc existentiam Dei probat sine dubio.”③

就这样，人们知道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口中的鬼话其实是拉丁语。尼卡诺尔神甫利用自己是唯一能与他交流的人这一优势，试图将信仰灌输到他错乱的头脑中。他天天下午坐到栗树下用拉丁语传教，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拒不相信繁复的证明和巧克力的效验，单单要求拿上帝的照片作为凭证。尼卡诺尔神甫给他带去各式圣牌圣像，甚至包括一件维罗妮卡手帕④的复制品，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将这些通通视作缺乏科学依据的人工制品概不

承认。面对他的冥顽不灵，尼卡诺尔神甫放弃了向他传福音的念头，但出于慈悲心怀仍旧每天来探望他。这时就轮到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转守为攻，试图用他理性主义者的种种策略动摇神甫的信仰。有一回，尼卡诺尔神甫带上棋盘和棋子来到树下邀他下西洋跳棋，他没有答应，理由是既然都同意遵守规则，他无法理解两个对手如何还能争斗。尼卡诺尔神甫从未自这个角度思考，但此后再也没有摸过跳棋。他越来越惊叹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睿智，便问他怎么会被绑在树上。

“Hoc est simplicisimum,”他回答，“因为我疯了。”

从那以后，神甫担心自己的信念会动摇，就不再去探望他，全心投入教堂的建造以加快进程。丽贝卡重新燃起了希望。她的未来全系于教堂的竣工，因为有个星期天尼卡诺尔神甫来家里吃午饭时，全家人都在席间谈论教堂建成后举行的宗教仪式将是何等庄重堂皇。“最幸运的人是丽贝卡。”阿玛兰妲说。丽贝卡没有听懂她的意思，于是她带着天真的笑容解释：

“因为你的婚礼将是教堂落成后举行的第一个仪式。”

丽贝卡试图抢先作出评论。以现在的施工速度来看，教堂竣工起码要等十年。但尼卡诺尔神甫看法不同：鉴于信徒们捐赠日益慷慨，完全可以作出更乐观的估计。尽管丽贝卡暗暗生气，连饭都没有吃完，乌尔苏拉还是赞同阿玛兰妲的主意，并捐出一笔可观的款项以加速施工。尼卡诺尔神甫认为再有一笔相同数额的捐赠，教堂就能在三年内竣工。从此，丽贝卡不再和阿玛兰妲说话，确信她的用心并不像表面那样单纯无辜。“我已经手下留情了，”在当晚的激烈争吵中阿玛兰妲回答道，“这三年我都用不着杀你了。”丽贝卡接受了挑战。

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得知婚礼再次推迟，失望之极，但丽贝卡向他证明了自己的忠贞不渝。“等你准备好，咱们就私奔。”她对他说。然而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并不是敢于冒险的人，他不像未婚妻那样性情冲动，视对承诺的尊重为不容挥霍的资本。于是丽贝卡采取了更大

胆的举措。一阵神秘的风吹灭了客厅里的灯，乌尔苏拉随即发现这对情侣在黑暗中接吻。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窘迫地向她解释说这要归咎于新式煤油灯的质量问题，甚至帮她在客厅里安上了更可靠的照明设施。但又一次不知是灯油出了问题还是灯芯被阻断，乌尔苏拉发现丽贝卡坐在未婚夫的腿上。她不再接受任何借口。她把面包房托付给印第安女人比西塔西翁打理，亲自坐到摇椅上监视情侣的相会，免得那些在自己的青春年代就已过时的花招得逞。“可怜的妈妈，”丽贝卡看着乌尔苏拉在一旁打着哈欠昏昏欲睡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到死也要在这把摇椅上受罪。”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天天去察看施工，在过了三个月受监视的爱情生活后终于厌烦了缓慢的工程进度，决定自己出钱给尼卡诺尔神甫补足完工所需的资金。阿玛兰妲并没有慌张。她每天和女友们在长廊里绣花或做编织活计，一边聊天一边酝酿新的计策。她自以为最有效的一招，即取走丽贝卡将嫁衣收入卧室衣柜之前就放好的樟脑丸，却因为估算失误落了空。她是在离教堂完工不到两个月时采取的行动，但随着婚期临近丽贝卡迫不及待地要试穿嫁衣，比阿玛兰妲预计的时间提前了许多。丽贝卡打开衣柜，依次取下包装纸和护衬布，发现从锦缎礼服、织绣纱巾直到橘花头冠都被蛾子蛀成了粉末。她确信当初在包装里放过两把樟脑丸，但这一悲剧似乎纯粹出于偶然，她不敢责怪到阿玛兰妲身上。离婚礼已不到一个月，安帕萝·摩斯科特竟慨然答允在一个星期内为她做出一身新嫁衣。那个阴雨绵绵的中午，当安帕萝抱着一堆泡沫般的织物走进家门让丽贝卡最后一次试衣时，阿玛兰妲几乎要昏厥过去。她瞬间失声，一道冷汗沿脊背下流。漫长的数月里，她一直在恐惧的战栗中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她深信，如果最终找不到阻挠丽贝卡婚礼的办法，到了一切手段用尽的最后时刻，她不会缺乏下毒的胆量。那天下午，安帕萝以无穷无尽的耐心在丽贝卡周身上下别了千万枚别针，丽贝卡则裹在那甲胄般的缎料里热得透不过气来，与此同时，阿玛兰妲多次乱了针脚，扎

了手指，但仍以可怕的冷静作出决定：日期定在婚礼前最后一个星期五，方式是在咖啡中加一剂鸦片酊。

不料一个更大的障碍突然出现，并且无法挽救，迫使婚礼再次无限期延迟。婚期前一个星期，小蕾梅黛丝半夜醒来，内脏打嗝般撕裂，火热的汁液爆涌浸透全身。三天后她被自己的血毒死，一对双胞胎也横死腹中。阿玛兰妲受到良心的谴责。她曾切切祈求上帝，希望发生某种可怕的事情免得自己向丽贝卡下毒，因此对蕾梅黛丝的死怀有负罪感。那并不是她日夜祈祷所期盼的障碍。蕾梅黛丝为这个家带来了欢快气息。她和丈夫在作坊旁收拾出一间小屋，用刚刚告别的童年时代的娃娃和玩具装饰一新。她欢快的活力溢出房间四壁，像生机盎然的和风吹过秋海棠长廊。她从清晨便开始唱歌。她是唯一敢在丽贝卡与阿玛兰妲争吵时从中斡旋的人。她担负起照顾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繁重任务。她为他送去食物，每日伺候他大小便，用肥皂和丝瓜瓤给他擦洗，为他除去头发胡须里的跳蚤和虱子，还让棕榈叶顶棚保持完好并在暴风雨天气用防水帆布加固。最后几个月，她已经能够用简单的拉丁语与他沟通。当奥雷里亚诺和庇拉尔·特尔内拉的儿子出生后被送到家里，并在家中举行仪式命名为奥雷里亚诺·何塞，蕾梅黛丝决定把他认作自己的长子。她这种母性本能令乌尔苏拉惊讶不已。就奥雷里亚诺而言，他在她这里找到了生存的意义。他整日在作坊干活，蕾梅黛丝会在上午送去一杯不加糖的咖啡。夫妇俩每天晚上都去摩斯科特家。奥雷里亚诺和岳父一局接一局地玩多米诺骨牌，蕾梅黛丝则与姐姐们聊天，或和母亲商量大人的事情。与布恩迪亚家的联姻稳固了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在镇上的权威。他频繁前往省城，结果成功让政府在镇上建立一所学校，便交由继承了祖父教学热忱的阿尔卡蒂奥掌管。他说服了大多数人家将房子漆成蓝色以纪念国家独立日。应尼卡诺尔神甫之请，他将卡塔利诺的店铺迁往一条偏僻的街道，还关闭了镇中心多处生意兴隆却有伤风化的场所。他带回六名荷枪警察来维持秩序，这时却没人想起当初镇上不准有武装

人员的协议。奥雷里亚诺对岳父的工作效率颇为欣赏。“你也会变得像他一样胖。”他的朋友们对他说。但长久端坐着干活，令他颧骨线条更明显，使他眼神更锐利，却没有增加他的体重，也不曾影响他的冷静性格，相反还加深了他唇间的笔直线条，那代表着孤独的沉思和无情的决断。他和妻子在双方家里都成功唤醒了深厚的亲情，因而当蕾梅黛丝宣告怀孕的时候，甚至连丽贝卡和阿玛兰妲都暂时休战，忙着编织蓝毛衣—如果生的是男孩；还有红毛衣—如果生的是女孩。几年以后面对行刑队，阿尔卡蒂奥最后想到的人也是她。

乌尔苏拉吩咐关闭门窗守丧，如非绝对必要不许任何人出入。她还要求一年之内不得高声说话，并将一张蕾梅黛丝的银版照片摆在停放遗体守灵的地方，照片上斜系着一根黑色饰带，前面点起一盏长明灯。此后子孙们一直保持灯火不熄，他们面对着照片上这个身着百褶裙、脚踏白色小靴子、头系蝉翼纱蝴蝶结的小女孩却不免困惑，难以将其与曾祖母的标准像联系起来。阿玛兰妲担负起照顾奥雷里亚诺·何塞的职责。她当作儿子抚养的这个孩子，将会分担她的孤独，缓解她的内疚—由于她向上帝疯狂祈求，鸦片酊误落在蕾梅黛丝的咖啡里。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戴着系了黑纱的帽子轻手轻脚走进家门，与一袭黑衣长袖及手、心中仿佛暗暗淌血的丽贝卡默默相会。此时此刻连重议婚期的念头也会被视为大不敬，恋人关系就此永远停滞不前，沦为无人再去理会的倦怠爱情，仿佛昔日为了亲吻而熄灭灯火的情侣已被抛弃，屈从于死神的淫威。方向迷失，希望破灭，丽贝卡又开始吃土。

居丧多日后十字绣活动已经恢复，一天下午两点，酷热的死寂中突然有人推开大门。房柱震颤不已，长廊里刺绣的阿玛兰妲及其女友，卧室里吸吮手指的丽贝卡，厨房里的乌尔苏拉，作坊里的奥雷里亚诺，甚至栗树下孤零零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都感到房子在大地的震动中摇摇欲坠。来人是一个身材过人的大汉。他粗壮的胸背几乎挤不进门。他野牛似的脖子上挂着救难圣母像，双臂和胸前

覆满神秘的刺青，右手腕上紧紧缠着“十字架婴孩”[5]护符铜手链。他的身体经风吹日晒变成棕褐色，短发竖起好像骡子的鬃毛，下颌坚毅，眼神悲伤。他的腰带比马肚带宽两倍，靴子带护腿和马刺，靴跟钉了铁掌，走到哪里都给人以地震般的战栗感。他拎着几个破旧的褡裢穿过客厅和起居室，像一阵风暴般出现在秋海棠长廊，惊得阿玛兰妲和女友们一动不动，绣花针停在空中。“嗨。”他用疲倦的声音说道，随手将褡裢往缝纫桌上一丢，径直走向家中深处。“嗨。”他向丽贝卡打了个招呼，她看着他从自己卧室门前经过，吓得呆了。“嗨。”他对奥雷里亚诺说道，后者正在作坊工作台前全神贯注地干活。他没在任何人身边停留，直接走向厨房，在那里才第一次停住脚步，结束了从世界另一端起程的旅行。“嗨。”他说。乌尔苏拉瞬间愣住，看着他的眼睛，随即发出一声惊呼，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高兴得又哭又叫。他是何塞·阿尔卡蒂奥。他像离开时一样赤贫，乌尔苏拉还得给他两个比索付雇马的钱。他说的西班牙语掺杂着水手的黑话。家人问他都去了哪里，他回答：“那边。”他把吊床支在为他安排的房间里，睡了三天三夜。醒来后吃了十六个生鸡蛋，便直接去了卡塔利诺的店里，他那超常的身材在女人当中引发了好奇和恐慌。他要求奏乐并请所有人喝甘蔗酒。他打赌说能同时和五个男人掰腕子。“这不可能。”那些人确信无法撼动他的手臂后，不禁发出感慨，“他有‘十字架婴孩’。”卡塔利诺不相信这类角力花样，押上十二比索赌他挪不动柜台。何塞·阿尔卡蒂奥将柜台从原地搬起，举过头顶，又放到大街上。结果出动了十一个男人才把它搬回去。在节庆般的狂热气氛中，他在柜台上展示了自己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阳物，上面红蓝两色纵横交错，覆满多种语言的刺青。那些女人饥渴地围在他身边，他问谁肯出最高价。最有钱的一个愿出二十比索。他又提议所有女人一起抽签，十比索一个签号。这是个夸张的价格，最红的姑娘一夜也不过挣八比索，然而所有女人都表示同意。她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十四张纸

条上，放在一顶帽子里，然后每人抽出一张。最后抽到只剩两张了，中奖者将在其中产生。

“每人再出五比索，”何塞·阿尔卡蒂奥建议，“我就让你们两个分享。”

他以此为生。他曾与一群无国籍的水手一起周游世界六十五次。当晚与他在卡塔利诺店里同床的女人将他赤身裸体带到舞厅，让大家观赏他从前额到后背、从脖颈到脚趾，通身上下没有一丝一毫皮肤没文刺青。他没能融入家庭。他白天睡觉，晚上就去烟花巷赌赛力气。难得几次乌尔苏拉把他拉到餐桌前，他表现得迷人又可亲，特别是当他讲述异国冒险的时候。他曾经遭遇海难，在日本海漂流了两个星期，以死于日晒病的同伴尸体为食，那一次次用海水腌制，又经阳光烤熟的肉质有种甜美的味道。在孟加拉湾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他们的船杀死了一条海龙，他们还在龙腹中发现了一名十字军战士的头盔、搭扣和武器。他在加勒比海见过维克多·休斯[6]的海盗幽灵船，船帆被死亡的阴风扯得七零八落，桅杆被海蠊蛀蚀，它再也找不到瓜德罗普岛的方向。乌尔苏拉坐在桌边哭个不停，仿佛在阅读一封封从未抵达的家书，阅读何塞·阿尔卡蒂奥讲述的英雄业绩和不幸际遇。“家里有这么多房间，我的儿子啊，”她抽泣道，“有那么多吃的都喂了猪！”但在内心深处，她无法把那个被吉卜赛人带走的男孩和这个吃午饭能吃掉半扇乳猪、放屁能令花儿枯萎的巨汉联系起来。其他家人的感觉也是如此。阿玛兰妲听到他在席间如野兽般打嗝，无法掩饰自己的厌恶。阿尔卡蒂奥从未得悉自己的身世秘密，对他刻意博取好感的问长问短，几乎不加理睬。奥雷里亚诺试图重温两人共宿一室的旧日时光，重拾少年时代的默契，但何塞·阿尔卡蒂奥都已忘却，因为海上生涯里有太多事情塞满了记忆。只有丽贝卡一见面就被他征服。那天下午看见他从自己卧室门前经过，她就觉得比起这个呼气好像火山爆发、全家都为之震颤的阳刚化身，皮埃特罗·克雷斯皮不过是个好赶时髦的文弱小子。她寻找一切借口接近他。有一次，何塞·

阿尔卡蒂奥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着她，对她说：“你很有女人味，小妹妹。”丽贝卡失去了自制力，又开始以往日的狂热吃泥土和墙皮，饥渴地吸吮手指，拇指上甚至都结出了茧子。她呕出混杂有死水蛭的绿色液体。她夜夜不眠，烧热得颤抖，在谵妄中挣扎，直等到凌晨时分整栋房子因何塞·阿尔卡蒂奥的归来而震颤。一天下午全家人都在午睡，她再也无法忍受，去了他的房间。她发现他穿着短裤，醒着躺在用缆绳绑在柱子上的吊床里。她盯着那花饰繁复的巨大身躯大感震惊，不禁想要退回去。“对不起，”她辩解道，“我不知道您在这儿。”她压低了声音，以免惊醒旁人。“到这儿来。”他说。丽贝卡照做了。她站在吊床前，流出冷汗，感到五脏六腑都纠结在一起，而阿尔卡蒂奥用指肚抚摸她的脚踝，然后是小腿肚，然后是大腿，嘴里喃喃地说：“小妹妹，啊，小妹妹。”一股强似龙卷风却又惊人精准的力量将她拦腰举起，三两下扯去内衣，像撕裂一只小鸟一般，她得努力支撑着才不至于死在当场。她感谢上帝让自己拥有生命，随即失去神志，沉浸在由无法承受的痛苦生出的不可思议的快感中，扑腾挣扎于吊床这热气腾腾的泥沼间，喷出的血液被泥沼像吸墨纸一般吸收了。

三天后，他们在五点钟的弥撒上结为夫妇。何塞·阿尔卡蒂奥前一天去了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的商店，看见他正在给学生上古弦琴课，但并没有把他叫到一边回避学生。“我要和丽贝卡结婚了。”他说。皮埃特罗·克雷斯皮顿时脸色煞白，把琴交给学生，宣布课程结束。等到堆满乐器和上弦玩具的厅里只剩下他们两人，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说：

“她是您的妹妹。”

“我无所谓。”何塞·阿尔卡蒂奥回答。

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用散发出薰衣草气味的手帕擦了擦额头。

“这违背天理，”他解释道，“另外，法律也不允许。”

何塞·阿尔卡蒂奥失去了耐性，倒不是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所讲的道理，而是他那副苍白的脸色更让人恼火。

“去他的天理，”他说，“我来是为了告诉你，不要再费心去问丽贝卡什么。”

但当看到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眼眶湿润，他粗暴的态度软了下来。

“好吧，”他换了一副腔调，“如果您真喜欢我们家，那还有阿玛兰妲呢。”

尼卡诺尔神甫在星期天的讲道中申明何塞·阿尔卡蒂奥和丽贝卡不是兄妹。乌尔苏拉视此事为不可想象的失礼，永远不肯原谅。当他们从教堂回来的时候，她禁止这对新人再迈进家门。对她来说，他们就等于死了一样。因此他们到公墓对面租了一间小屋，屋里唯一的家具是何塞·阿尔卡蒂奥的吊床。新婚之夜一只蝎子钻进拖鞋蜇了丽贝卡的脚，她的舌头为此都麻痹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度过一个惊世骇俗的蜜月。邻居们因惊醒整个街区的叫声而恐慌—每夜八次，连午睡时段也有三次—祈祷那种肆无忌惮的激情不要侵扰死人的安眠。

奥雷里亚诺是唯一关心他们的人。他给他们买了一些家具，并送钱过去，直到何塞·阿尔卡蒂奥恢复常态，开始耕种与家中院子相邻的无主土地。阿玛兰妲却永远无法摆脱对丽贝卡的怨恨，尽管生活为她带来了超出梦想的满足：乌尔苏拉不知如何洗刷耻辱，她主动提出让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每个星期二仍来家中共进午餐，后者平和而不失尊严地战胜了挫折。出于对这一家人的尊敬，他在帽子上仍然系着黑纱，并很乐意亲近乌尔苏拉，为她带来异国礼物：葡萄牙沙丁鱼，土耳其玫瑰果酱，还有一次是一条精美的马尼拉大披巾。阿玛兰妲总是亲切殷勤地款待他。她揣测他的喜好，为他扯掉衬衫袖口的脱线，在他过生日时送上一打绣着他姓名缩写的手帕。每个星期二吃过午饭，她在长廊里绣花，他陪伴一旁，其乐融融。对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而言，这个他一向当小女孩对待的姑娘不啻全新的发现。她虽然外表缺乏魅力，却拥有罕见的感受力，能体会世间万物的美好，还蕴含一种不为人知的柔情。一个星期二，发生了众人意料中早晚会发生的

事：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向她求婚。她没有停下手里的活计，等耳边火热的红潮退去才开口，镇静的声音显出老成持重。

“当然可以，克雷斯皮，”她回答，“但要等了解更深的时候。太着急总是不好。”

乌尔苏拉困惑不已。尽管对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抱有好感，她仍然无法确定他经历了与丽贝卡风波重重的漫长恋爱后作出这一决定，从道德角度来看究竟是好是坏。其他人没有这样的顾虑，最后她只好将此事当作无从判断的事实接受下来。奥雷里亚诺是家中的主心骨，他的意见神秘难解却又不容置疑，更为乌尔苏拉平添一重困惑。

“现在不是谈婚论嫁的时候。”

这句话的含义乌尔苏拉几个月后才明白，但那已是奥雷里亚诺当时所能给出的最坦诚的意见，不光涉及婚嫁，也适用于战争以外的所有事项。他自己面对行刑队的时候，仍将无法理解一系列微妙又无可抗拒的偶然事件是如何将他引向那个结论的。蕾梅黛丝的死并未引起他所担心的震惊，而更像是一种沉郁的愤怒，渐渐转化为寂寞消极的挫败感，与当初他认命选择独身时的感受相仿。他重新沉浸到工作中，但保留了与岳父玩多米诺骨牌的习惯。在那个因守丧而陷于沉寂的家里，晚间的交谈加深了两个男人的友谊。“再结婚吧，奥雷里托⑦，”岳父对他说，“我还有六个女儿可选。”选举前夕，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频繁出行，有一次归来后为国家的政局忧心忡忡。自由派已决意开战。奥雷里亚诺那时还完全不明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区别，岳父为他作了简要介绍。自由派，他说道，都是些共济会分子，心术不正，主张绞死教士，实行世俗婚姻并允许离婚，承认私生子和婚生子享有同等权利，试图分裂国家建立联邦制以剥夺最高当局的权力。而保守派不同，他们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天赋权柄，以维护公共秩序和家庭道德为己任；他们是基督信仰和当局权威的捍卫者，决不允许国家分裂搞自治。出于人道方面的情感，奥雷里亚诺对自由派关于私生子的主张颇有好感，但他难以理解为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竟会闹到

发动战争的地步。在他看来，岳父为了选举请求调来六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由一名士官率领进驻这个没有丝毫政治热情的小镇，实在有些小题大做。士兵不仅进驻了镇子，还挨家挨户收缴猎枪、砍刀甚至菜刀，然后才给二十一岁以上的男子分发写有保守派候选人名字的蓝色选票和写有自由派候选人名字的红色选票。选举前夜，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亲自宣读了一份公告：从星期六午夜开始四十八小时内禁止贩卖酒精饮料，禁止非同一家庭的三人以上聚会。选举顺利进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星期天早上八点广场上安放了一个木箱，由六个士兵看守。投票完全自由，这一点奥雷里亚诺可以作证，他几乎一整天都和岳父一起监督，确保每人只投一次。下午四点，广场上响起一阵军鼓声宣告投票结束，堂阿波利纳尔用带有自己签名的标签封住票箱。当晚，他和奥雷里亚诺玩多米诺骨牌时，命令士官打开票箱计票。红色选票与蓝色选票的数目不相上下，但士官只留下十张红色选票，其余用蓝色选票补足。然后他们用新标签重新封好票箱，第二天一早便送去省城。“自由派一定会开战。”奥雷里亚诺说。堂阿波利纳尔没将视线从自己的多米诺骨牌上移开。“如果你是指换票的事，那他们不会。”他说，“已经留下一些红的，免得他们有意见。”奥雷里亚诺明白了反对派的不利地位。“如果我是自由派，我就要为选票的事开战。”岳父从眼镜上方瞟了他一眼。

“哈，奥雷里托，”他说，“如果你是自由派，就算你是我女婿也看不着换票的事。”

真正在镇上激起民愤的不是选举的结果，而是士兵们没有归还查收的武器。一群妇女找到奥雷里亚诺，请求他向岳父要回那些菜刀。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非常含蓄地向他解释，士兵们已经把查没的武器运走，作为自由派准备开战的证据。奥雷里亚诺对此没作任何评论，但有天晚上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和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勒跟其他朋友谈论菜刀事件，他们问他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时，他没有犹豫。

“如果一定要当什么，我当自由派，”他答道，“因为保守派净是些骗子。”

第二天，应朋友之请，他去拜访阿利黎奥·诺格拉医生，求治并不存在的肝痛。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阿利黎奥·诺格拉医生几年前来到马孔多，带着一药箱无味的药丸和一块无法令人信服的行医招牌：“一钉入，一钉出。”⑧其实那只是伪装。那副平庸医生的无辜外表下隐藏着一个恐怖分子，借着及膝的高筒靴遮住相伴五年的脚镣在踝部留下的疤痕。他是在参加联邦派的第一次起事时被捕的，后乔装改扮逃往库拉索，被迫披上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憎恶的衣服—教士袍。漫长的逃亡岁月过去，从加勒比海各地来到库拉索的流亡者带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大受鼓舞登上走私贩的帆船，随身带着一瓶瓶纯由白糖制成的药丸和一张他自己伪造的莱比锡大学文凭，出现在里奥阿查。但他随即失望得痛哭起来。联邦派的激情在流亡者口中被描述成一触即发的火药桶，其实早已沦为对选举的渺茫幻想。怀着受挫的苦涩，以及寻找一处安稳地方养老的渴望，这位冒牌的顺势疗法医生逃到了马孔多。他在广场一侧租下间小屋，在这摆满空药瓶的斗室里过了几年，生计全仰仗那些已经试遍所有医药，最后只靠糖丸聊作安慰的病人。在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有名无实的统治期间，他那煽动者的天性一直无用武之地。追忆往昔，与哮喘作斗争，他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大选的临近使他重新找到了起事的机会。他与镇上缺乏政治素养的年轻人建立联系，暗暗展开教唆工作。票箱中出现大量红色选票，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归因于年轻人的追新猎奇，但其实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强迫自己的门徒投票，好让他们认清选举不过是一场骗人的闹剧。“唯一有效的，”他说，“就是暴力。”奥雷里亚诺的大多数朋友都为铲除保守秩序的念头所鼓舞，但没人敢拉他下水，这不仅因为他与里正的关系，也和他孤僻遁世的性格有关。另外众所周知，他在岳父的授意下投了蓝色选票。因此他表露自己的政治态度纯属偶然，为不存在的病痛去求诊更是完全出于一时的好奇心。

猪圈般的陋室里蛛网横斜，樟脑味扑鼻，他见到的是一个浑身灰尘颇似蜥蜴的人，喘息间肺里呼啸作响。医生一言不发，先把他领到窗前，检查下眼睑。“不是这里。”奥雷里亚诺按照人家事先所教的说道。他用指尖按住肝部，加了一句：“是这里疼得让我睡不着觉。”于是阿利黎奥·诺格拉医生推说阳光太强，关上了窗，随即向他简洁地解说为什么刺杀保守派是一种爱国行为。连续几天奥雷里亚诺都在衬衣兜里揣着小药瓶，每两个小时取出一次，倒出三粒药丸在手上，然后放进嘴里慢慢含服。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嘲笑他竟信任顺势疗法，但那些知情人都把他当成又一个加入的同伴。几乎所有建村元老的儿子都参与其中，但没人知晓他们所酝酿的行动的具体内容。然而有一天医生向奥雷里亚诺吐露了秘密，他终于弄清了密谋的详情。虽然当时他确信铲除保守党政权刻不容缓，但这一计划仍令他不寒而栗。阿利黎奥·诺格拉医生是个信奉个人暗杀的狂热分子，他的方案可归纳如下：将一系列个人行动汇成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总攻，铲除当局官员及其亲属，特别是孩子，以达到将保守主义斩草除根的目的。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他的妻子和六个女儿，自然全在目标之列。

“您不是什么自由派，您什么派也不是，”奥雷里亚诺波澜不惊地对他说道，“您就是一个屠夫。”

“这样的话，”医生同样平静地回答，“把药瓶还给我。你不再需要了。”

六个月后，奥雷里亚诺才得知医生当时曾宣布他已无可救药，说他性格被动、生性孤僻，是个感情用事、没有前途的家伙。他们担心他会泄密，试图困住他。奥雷里亚诺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他不会说出一个字，但在刺杀摩斯科特一家的晚上，他们将会看见他守在门口。他表现出不容置疑的决心，那计划只得无限期推延。就在这段日子里，乌尔苏拉询问他对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和阿玛兰妲成亲的意见，他于是回答说现在不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从一个星期前开始，他就在

衬衣下藏着一把老式手枪，并监视着自己的朋友们。每天下午他与何塞·阿尔卡蒂奥和丽贝卡喝咖啡—他们的家开始有些样子了—从七点起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午饭时他会与阿尔卡蒂奥聊天，后者已经长成一个身材魁伟的少年，因战争的迫近越来越兴奋。在学校里，比阿尔卡蒂奥还要年长的学生跟刚学会说话的孩子混在一起，自由派的激情在那里传播开来。他们谈论着枪毙尼卡诺尔神甫，将教堂改成学校，实现自由恋爱。奥雷里亚诺试图抑制他的狂热，劝他要小心谨慎。阿尔卡蒂奥听不进他冷静的说理和对现实的客观估计，当众斥责他性格软弱。奥雷里亚诺等待着。终于，在十二月初，乌尔苏拉惊慌失措地冲进作坊。

“开战了！”

实际上，战争三个月前就开始了。整个国家都进入戒严状态。唯一及时获悉情况的人是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但他连自己妻子都没告诉，直到一支小部队突然赶到控制了镇子。他们用骡子拖着两门轻型炮，在拂晓前悄无声息地入驻，把军营扎在学校。下午六点开始实施戒严。这次搜查比前次更加严格，挨家挨户连农具也没收了。他们把阿利黎奥·诺格拉医生拖出来，绑在广场上的一棵树上，未经审判就地枪毙。尼卡诺尔神甫试图凭借腾空的神迹令军方折服，结果一个士兵用枪托给了他一下，打破了他的脑袋。自由派的群情汹涌在无声的恐惧中沉寂。奥雷里亚诺面色苍白，沉默寡言，继续和岳父玩牌戏。他明白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尽管还拥有镇上军政首领的头衔，实际上又一次沦为傀儡。所有决策都由一位上尉作出，他的部队每天都要征收一笔特殊的治安税。在他的命令下，四个士兵把一个被疯狗咬过的女人从家中强拖出来，当街用枪托活活打死。军事占领两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奥雷里亚诺走进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家，像往常一样从容地要了杯不加糖的咖啡。只剩下他们两人在厨房里时，奥雷里亚诺的声音里平添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权威。“叫小伙子们准备好，”他说，“我们要开战了。”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无法相信。

“用什么武器呢？”他问。

“用他们的。”奥雷里亚诺回答。

星期二午夜，在一次近乎疯狂的行动中，二十一个不到三十岁、用餐刀和尖铁棍武装起来的男子由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率领，奇袭军营，缴获武器，并在院中将上尉和四个杀害那女人的凶手枪毙。

当夜，在行刑枪声响起的同时，阿尔卡蒂奥被任命为镇上的军政首领。那些已成家的起义者甚至没有时间与妻子告别，只能任由她们从此自生自灭。黎明时，在摆脱了恐惧的镇民的欢呼声中，他们出发去投奔革命军将领维多利奥·梅迪纳，据最新消息说他的队伍正在马纳乌雷一带活动。出发前，奥雷里亚诺把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从衣柜里请了出来。“您不用紧张，岳父，”他说，“新政府会保证您本人和您家人的安全。”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很难将眼前脚踏高筒靴、肩挎步枪的阴谋家与晚上和他玩多米诺骨牌到九点的那个人联系起来。

“这真荒唐，奥雷里托！”他喊道。

“一点儿也不荒唐，”奥雷里亚诺回答，“这是战争。另外请不要再叫我奥雷里托，我现在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

---

①拉丁语：“简单之极”。

②拉丁语：“此人洞悉物质之第四态耳”。

③拉丁语：“非也，此乃上帝存在之明证无疑”。

④维罗妮卡（Verónica）为公元 1 世纪的一名犹太妇女，据传她在耶稣受难路上曾为其擦去脸上的血污，后手帕上即留下耶稣圣容。

⑤“十字架婴孩”（niños-en-cruz），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护身符，未必与圣婴（el Niño）有关，据说贴身携带并以自身鲜血饲喂后能令主人力大无穷，刀枪不入。

⑥维克多·休斯（Víctor Hugues），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小说《光明世纪》中的人物。

⑦“奥雷里托”（Aurelito），“奥雷里亚诺”（Aureliano）的昵称。

⑧顺势疗法中“以毒攻毒”的原则。

六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发动过三十二场武装起义，无一成功。他与十七个女人生下十七个儿子，一夜之间都被逐个除掉，其中最年长的不到三十五岁。他逃过十四次暗杀、七十三次伏击和一次枪决。他有一次被人在咖啡里投毒，投入的马钱子碱足够毒死一匹马，但他仍大难不死。他拒绝了共和国总统颁发的勋章。他官至革命军总司令，从南到北、自西至东都在他的统辖之下，他也成为最令政府恐惧的人物，但从不允许别人为他拍照。他放弃了战后的退休金，到晚年一直靠在马孔多的作坊中制作小金鱼维持生计。他一向身先士卒，却只受过一次伤，那是他在签署尼兰迪亚协定为长达近二十年的内战画上句号后自戕的结果。他用手枪朝胸部开了一枪，子弹从背部穿出却没有损及任何要害部位。经过这一切，留下来的只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孔多街道。然而据他寿终正寝前几年的自述，那天清晨他带着二十一个人投奔维多利奥·梅迪纳将军的时候，甚至连这事也没期望过。

“我们就把马孔多交给你了。”这便是他临行前对阿尔卡蒂奥的全部嘱托，“我们好好地交给你，你争取让它变得更好吧。”

阿尔卡蒂奥对这一托付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他从梅尔基亚德斯一本书的插图获得灵感，发明了一套带饰带和元帅肩章的制服穿上，腰间还挎着那位被处决的上尉的金穗马刀。他将两门火炮设在镇子入口，让他昔日的学生统一着装，他们听了他的演讲群情激奋，全副武装四处巡逻，给外人以坚不可摧的印象。这一策略有利有弊，政府的确在十个月内都没敢进攻，可一旦行动就派出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半个小时内消灭了抵抗。从掌权的第一天起，阿尔卡蒂奥便显露出发号施令的嗜好。他有时一天颁布四份公告，想到什么立即宣布实施。他

推行针对十八岁以上男子的义务兵役制，将下午六点以后还在街上行走的牲畜都征作公用，还强迫成年男子佩戴红袖章。他将尼卡诺尔神甫幽禁在神甫寓所，并以枪决相威胁，禁止他主持弥撒或敲钟，除非是庆祝自由派的胜利。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不容置疑，他下令让一支行刑队在广场上练习射击稻草人。起初没人当真。归根结底，那不过是些还上学的孩子在扮大人。然而一天晚上，阿尔卡蒂奥走进卡塔利诺的店里，乐队的小号手吹出夸张的调子跟他打招呼，引得客人笑声连连，他当即以藐视当局的罪名下令将小号手枪决。凡是抗议的人，一律关进他在学校设立的一间牢房，戴上脚镣，只给面包和水。“你是个杀人犯！”乌尔苏拉每次听到他任意妄为的消息都会向他大吼，“等奥雷里亚诺知道了，会把你给毙了，我第一个去放鞭炮。”但这些都无济于事。阿尔卡蒂奥继续强化他那毫无必要的铁腕手段，成为马孔多有史以来最残酷的统治者。“现在尝到不同滋味了吧，”一次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这么评论道，“这就是自由派的天堂。”话传到了阿尔卡蒂奥那里。他领着巡逻队闯进屋门，砸烂家具，殴打女眷，把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拖走了。乌尔苏拉一边满心羞耻地哀号，一边挥舞着涂过柏油的马鞭，穿过镇子冲进军营的院中，这时阿尔卡蒂奥已准备就绪，正要下令执行枪决。

“我看你敢，杂种！”乌尔苏拉喊道。

阿尔卡蒂奥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第一记鞭子就抽了过去。“我看你敢，杀人犯！”她喊道，“婊子养的，你把我也杀了算了，省得我丢人，养了你这么一个怪物。”她毫不留情地鞭打，一直把他逼到院子深处，像蜗牛似的缩成一团。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被绑在柱子上，昏迷不醒，原先立在同一位置的稻草人经受演习的弹雨早已支离破碎。行刑队的小伙子们四散奔逃，害怕乌尔苏拉拿他们出气，但她看都没看他们一眼。她任凭身上制服破烂的阿尔卡蒂奥在一旁又疼又怒地吼叫，解开绳索把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带回了家。离开军营前，她还释放了那些囚犯。

从那时起镇上的事便由她做主。她恢复星期天的弥撒，停用红袖章，废除那些轻率无理的条令。她固然性格坚强，仍不禁为自己的不幸命运哀恸。她感觉如此孤单，只好到被人遗忘在栗树下的丈夫那里徒劳地寻求陪伴。“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样子，”她向他倾诉着，头上的棕榈叶顶棚在六月的雨水中摇摇欲坠，“你看看家里都空了，孩子们四散在外，又只剩下咱们两个，跟当初一样。”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深陷于无意识的深渊，对她的哀怨无动于衷。刚发疯那会儿，他还能用半吊子的拉丁语急切地表达日常需要。在偶尔恢复理智的短暂时刻，阿玛兰妲送来食物时，他还会诉说最令他烦扰的痛苦，顺从地让她拔火罐和敷芥子泥。但当乌尔苏拉来他身边诉苦时，他已经完全脱离现实。她给坐在小木凳上的他一点一点擦身，同时把家里的近况讲给他听。“奥雷里亚诺去打仗了，四个多月了，到现在也没有他的消息，”她一面说，一面用蘸了肥皂的丝瓜瓤给他擦背，“何塞·阿尔卡蒂奥回来了，变成比你还高的大个儿，浑身都是刺青，但他回来就给这个家丢脸。”她随即发觉，听了这些坏消息丈夫似乎很难过，于是决定说谎。“别信我跟你说的话，”她说着往丈夫的便溺上撒灰土以便铲走，“何塞·阿尔卡蒂奥和丽贝卡结婚是上帝的安排，他们现在挺幸福。”谎言说得越来越真诚，最后连她自己也从中得到了安慰。“阿尔卡蒂奥已经是个稳稳当当的大人了，”她说，“而且非常勇敢，穿上制服挎上马刀可精神了。”这好像在跟一个死人说话，因为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不会再为任何事操心。但她仍旧说个没停。在她眼里，他是那么温顺那么超然，就决定给他松开绳索。可他甚至都没离开小木凳一步，任凭日晒雨淋一如往昔，仿佛那些绳索毫无必要，实际上是某种比任何有形捆绑更加强大的束缚将他禁锢在栗树树干上。将近八月，漫长的冬天初始，乌尔苏拉终于可以告诉他一个近乎事实的消息。

“你瞧，好运还没离开我们，”她说，“阿玛兰妲和摆弄自动钢琴的意大利人要结婚了。”

阿玛兰妲和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得到了乌尔苏拉的信任，友情日深，这一回她认为没有必要再监视他们的见面。这是一段暮色恋情。意大利人每天傍晚登门，扣眼里别着一枝栀子花，把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译给阿玛兰妲听。他们待在弥漫着牛至和玫瑰香气的长廊里，他朗读，而她编织袖口花边，对战争中的种种动乱和噩耗都毫不关心，直到不堪蚊子的烦扰才躲进客厅。阿玛兰妲的善解人意，以及不失分寸又包容一切的温柔，织起一幅无形的网罗把男友围在其中，他不得不用自己未戴戒指的苍白手指生生拨开，才能在八点时告辞离去。他们用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收到的意大利明信片做成一本精美的图册，里面的图画都是幽静园林中的恋人，配以中箭的红心和鸽子衔起的金色缎带。“我知道佛罗伦萨的这个公园，”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边浏览明信片边说，“你一伸手，鸽子就落下来吃食。”有时看着一幅威尼斯的水彩画，思乡之情使运河中污泥和腐败水产的气味升华成了花朵的幽香。阿玛兰妲一时叹息，一时欢笑，幻想着第二故乡，在那里容貌俊美的男男女女说着孩童的语言，古老的城市昔日荣光不再，只剩下出没于瓦砾间的猫儿。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曾经穿过大洋上下寻索，曾经在丽贝卡冲动的纠缠中错生激情，最终找到了真爱。爱情的幸福带来了生意的兴隆。他的商店那时几乎占据了整个街区，堪称幻想的温床，里面有能以钟琴报时的佛罗伦萨钟楼仿制品，有索伦托的八音盒，有一开盖便奏起五音曲的中国香粉盒，以及一切所能想象的乐器和一切所能构想的上弦装置。他的弟弟布鲁诺·克雷斯皮负责商店的业务，因为他自己单单照管音乐学校就忙不过来。多亏了他那五光十色的玩物博览，土耳其人大街变成了一方和谐的绿洲，令人淡忘了阿尔卡蒂奥的种种专横和遥远的战争梦魇。乌尔苏拉恢复星期天弥撒的时候，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捐赠给教堂一架德国簧风琴，组织了一个儿童唱诗班，教他们唱格列高利圣诗，为尼卡诺尔神甫沉郁的仪式平添了几许亮丽色彩。没有人怀疑阿玛兰妲会是一位幸福的妻子。他们不刻意推进恋情，任凭心中的感情自然发展，最后只差定下婚期。他

们没遇到什么阻碍。乌尔苏拉为当初反复推迟丽贝卡的婚期这一失误暗中自责不已，不愿重蹈覆辙增添懊悔。战争的戕害，奥雷里亚诺的远走，阿尔卡蒂奥的暴行，以及何塞·阿尔卡蒂奥和丽贝卡的被逐，都令为蕾梅黛丝的服丧退居其次，不再那么严格。婚期在望，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暗示将收养奥雷里亚诺·何塞为长子，他一直待他以父亲般的亲切。一切都预示着阿玛兰妲将一帆风顺地走向幸福。然而与丽贝卡相反，她丝毫不显急切。一如染桌布、织绦带、绣孔雀那样，她耐心等待着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向内心的煎熬屈服。她盼望的时刻与十月不祥的阴雨一同到来。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拿过她膝上的绣筐，双手紧握她的手。"我不能再等了，"他对她说，"我们下个月就结婚。"阿玛兰妲触碰到他冰冷的双手时没有颤抖。她像只抓不住的小动物似的缩回手去，继续自己的活计。

"别天真了，克雷斯皮，"她微笑着，"我死也不会和你结婚的。"

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瞬时崩溃，他不顾羞耻地哭泣，绝望得几乎扭断手指，但无法令她改变主意。"别浪费时间了，"这便是阿玛兰妲的全部回应，"如果你真那么爱我，就请不要再进这个家。"乌尔苏拉觉得自己羞愧得要发疯。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百般哀求，卑躬屈膝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在乌尔苏拉的怀里哭了一个下午，而她恨不得出卖自己的灵魂换取对他的安慰。雨夜里常可见到他的身影，擎着一把绸伞在屋子附近游荡，期望看到阿玛兰妲卧室里的一点儿灯光。他的衣着打扮从未像那段时间那样考究。他那受难君王一般的庄严头颅，显出一种奇异的伟大风姿。他去哀求阿玛兰妲的女友，就是那些和她一同在长廊里刺绣的女郎，请她们从中说项。他抛下生意，整日待在店后写下狂热的短笺，连同花朵薄瓣与蝴蝶标本寄给阿玛兰妲，又都被她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他关在屋里无休无止地弹古弦琴。一天晚上，他唱了起来。马孔多在睡梦中惊醒，心神俱醉，那琴声不似这个世界所有，那饱含爱意的歌声也不会再现人间。一时间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看见镇上所有的灯火都亮了，唯独阿玛兰妲的窗前

依旧黑暗。十一月二日，亡灵节，他弟弟打开店门，发现所有的灯都亮着，所有的八音盒都在奏乐，所有的钟表都停在一个永恒的时刻。在这纷乱的合奏中，皮埃特罗·克雷斯皮伏在店后的写字台上，双腕用剃刀割破，双手浸没在一盆安息香水里。

乌尔苏拉决定在家中为他守灵。尼卡诺尔神甫反对举行宗教仪式，也不同意将他葬在公墓里。乌尔苏拉顶撞了他。“尽管您和我都理解不了，但这个男人是一位圣徒，”她说，“所以我要违背您的意思，把他安葬，就葬在梅尔基亚德斯的墓旁边。”她得到了整个镇子的支持，葬礼极其隆重。阿玛兰妲没有离开卧室，她在床上听见乌尔苏拉的哭声，涌进家中的人群的脚步声和低语声，然后是一片深沉的寂静，带有被践踏花朵的气味。很长一段时间，每到傍晚她依然会闻到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身上的薰衣草余香，但她还能克制住不至于陷入谵妄。乌尔苏拉抛弃了她。那天下午当阿玛兰妲走进厨房，把手伸到炉子的炭火中，她甚至没有抬头表示同情。阿玛兰妲在剧痛中失去了痛感，只闻到自己皮肉烧灼的焦味。这是治疗悔恨的一剂猛药。很多天来，她在家里的时候都把手浸在一个盛着蛋清的碗里。当烧伤痊愈时，那些蛋清似乎也使她心中的创伤愈合。这场悲剧为她留下的唯一外在痕迹便是裹在伤手上的黑纱，她到死也没摘下。

阿尔卡蒂奥显出少见的慷慨，下令全镇为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守丧。乌尔苏拉将此视为羔羊迷途知返。但她错了。她已经失去阿尔卡蒂奥，不是从他穿上制服的时候，而是从一开始。她自认为把他当儿子养育成人，就像抚育丽贝卡那样，既无优待也无歧视。然而，当阿尔卡蒂奥还是个孤独的孩子时，时常担惊受怕，他经历了失眠症的肆虐，见证了乌尔苏拉的实干热情，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疯癫，奥雷里亚诺的高深莫测，以及阿玛兰妲和丽贝卡之间的殊死对抗。奥雷里亚诺教他读写，但同时总想着别的事，仿佛一个陌生人。奥雷里亚诺的衣服小了，就送给他，让比西塔西翁裁改。阿尔卡蒂奥为着过大的鞋子、改小的裤子，以及自己女人般的臀部而深深苦恼。

他从来没有像与比西塔西翁和卡塔乌雷用他们的语言交谈那样，与其他人自由地交流过。实际上梅尔基亚德斯是唯一关心他的人，给他念那些难以理解的手稿，教他银版照相技术。没有人想到他暗地里如何为梅尔基亚德斯的死哀哭，又以怎样的疯狂徒劳地钻研他留下的手稿，试图使他重返人间。学校里获得的关注和尊敬，掌权后的发号施令和荣耀四射的制服，使他从苦涩过往的压抑中解脱出来。一天晚上在卡塔利诺的店里，有人放胆说了他一句："你不配姓这个姓。"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并没有下令将那人枪决。

"我很荣幸，"他说，"我不是布恩迪亚家的人。"

了解他身世秘密的人从这句反驳推想他自己也已知情，其实他一直蒙在鼓里。庇拉尔·特尔内拉，他的母亲，曾经在照相暗室里令他热血沸腾，对他而言，她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就像对当初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和随后的奥雷里亚诺一样。尽管她已失去迷人的风采和笑声的魅力，他仍然循着她的烟味四处寻找她，找到她。开战前不久的一天中午，她比平时晚了些来学校接她的小儿子，阿尔卡蒂奥就在他用来午休、后来增设了锁镣的房间里等她。孩子在院中玩耍，他则躺在吊床上等待，焦渴得浑身颤抖，他知道庇拉尔·特尔内拉一定会从这里经过。她来了。阿尔卡蒂奥抓住她的手腕，想把她拉到吊床上。"我不能，不能，"庇拉尔·特尔内拉惊恐地说，"你不知道我多想让你高兴，但是老天在上，我不能这样。"阿尔卡蒂奥以家传的超凡力气揽住她的腰，肌肤相触让他感觉世界在融化。"别装圣女了，"他说，"说到底，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个婊子。"可悲的命运令庇拉尔一阵恶心，她只得强行忍住。

"孩子们会知道的，"她低声说，"最好是你今晚别闩门。"

当天夜晚，阿尔卡蒂奥躺在吊床上等待，狂热得发抖。他没有睡觉，凌晨听着蟋蟀无休无止的纷乱鸣叫和石鸻准确无误的报时，越来越觉得自己受了骗。正当焦虑变为怒气的时候，门突然开了。几个月后，面对行刑队，阿尔卡蒂奥将会回想起此时发生的一切：教室里迷

离的脚步声，板凳的磕绊声，最后是黑暗中的躯体以及另一颗心脏的搏动引起的空气悸动。他伸出手，碰到了另一只即将在黑暗中沉溺的手，摸到有两枚戒指戴在同一根手指上。他感觉到她手上的筋脉、她厄运的搏动，感觉到她湿润的手掌上生命线在拇指根部被死亡的魔爪掐断。他知道这不是他等待的女人，因为她散发出的不是烟味，而是发蜡的芳香气味，而且她双乳鼓胀，乳头如男人的一样，阴部坚实浑圆像榛子，并且她的兴奋显出生涩，她的温存不无慌乱。她是处女之身，名字居然叫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①]。庇拉尔·特尔内拉付了她五十比索，毕生积蓄的一半，让她来做如今她正在做的事。阿尔卡蒂奥多次看见她在父母开的日用品小店里看店，但从未留意过，因为她拥有一种罕见的美德，只在适当的时机现身，平时都无人察觉。但从那天起，她便缠上了他，就像到他腋下寻找温暖的猫。她每到午休时间就来学校—她父母收了庇拉尔·特尔内拉的另一半积蓄，也不加阻拦。晚些时候，政府军将他们赶出了学校，两人便在店后的黄油罐头与玉米袋中间恩爱。到阿尔卡蒂奥被任命为军政首领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

亲戚中只有何塞·阿尔卡蒂奥和丽贝卡知情，那时候他们与阿尔卡蒂奥的亲密关系与其说是出于亲情，倒不如说是源于同谋间的戚戚。何塞·阿尔卡蒂奥已然低头负起婚姻的重轭。丽贝卡凭着不屈的性格、贪婪的情欲和执著的野心，吸纳了丈夫超常的精力，使他从一个游手好闲、寻花问柳的男人变成一头干活的巨大牲口。他们的家清洁整齐。每天清晨丽贝卡都打开门窗，墓地的风从窗子进自院门出，裹挟着尸骨析出的硝石，在家中的墙壁和家具上都覆了一层泛白的粉末。想吃泥土的饥渴，父母骨殖的咯啦咯啦响声，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的优柔寡断激起的厌烦心绪，这些都被抛在了记忆的角落。她不受战乱的影响，从早到晚都在窗边刺绣，等到陶瓷的锅碗瓢盆开始在碗橱里颤抖就起身热饭。过了很久才会出现那几只邋遢的猎犬，然后是脚踏带马刺的高筒靴，肩挎双铳猎枪的巨人，他有时会带回一头鹿，

更多的时候是一串兔子或野鸭。一天下午，上任不久的阿尔卡蒂奥突然登门。自从离家后，他们再没见过他，但他表现得那样亲热，他们便邀他共享野味。

直到喝咖啡的时候，阿尔卡蒂奥才说明来意：他收到一份针对何塞·阿尔卡蒂奥的起诉。起诉人说他开始时在自家院子里耕地，后来扩展到四周相邻的土地，赶着牛推倒篱笆掀翻棚屋，甚至强行占据了周边最好的田地。有些农民的土地他不感兴趣没有霸占，但却向他们强行征租，每个星期六扛着猎枪带着猎犬前去收取。他对此并不否认。他的理由是抢占的这些土地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当年建村时分掉的，而他认为可以证明自己的父亲从那时起就失去了理智，因为他处理的实际上是自家的财产。这一申辩其实毫无必要，阿尔卡蒂奥并非来此主持公道。他仅仅是来建议设立一个财产登记处，使何塞·阿尔卡蒂奥能合法拥有抢占的土地，条件是后者委托当地政府来行使征租的权利。他们达成了协议。数年以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审核地契时，发现从院落所在的小丘直到视野尽头所有的土地，包括公墓在内，都在他哥哥名下，而阿尔卡蒂奥在任职的十一个月内不仅收取地租，还向丧家索要在何塞·阿尔卡蒂奥的土地上下葬亲人的费用。

乌尔苏拉几个月后才知道这个已经众所周知的消息，因为人们不愿增添她的痛苦，有意隐瞒。她一开始就有些怀疑。“阿尔卡蒂奥在盖房子。”她装出自豪的样子告诉丈夫，同时试着往他嘴里灌进一勺加拉巴木糖浆。但她随即下意识地叹了口气：“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劲。”晚些时候她得知阿尔卡蒂奥不仅盖好了房子，还订购了一套维也纳家具，由此怀疑得到证实：他果然在滥用公款。一个星期天，弥撒结束后她看见他正在新家和手下玩牌，就朝他喊道：“你是我们家的败类！”阿尔卡蒂奥没有理睬她。直到那时，乌尔苏拉才知道他有一个六个月大的女儿，而和他未婚同居的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又怀孕了。她决定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写信，不管他在哪

里，告诉他这里的情形。然而那段日子里接连发生的事件使她没能实现想法，甚至让她后悔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战争，从那时起不再是遥远模糊的字眼，而是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严峻的现实。二月末的时候，马孔多来了一位风尘仆仆的老妇人，骑着一头驮着扫帚的驴子。她一副人畜无伤的样子，巡逻队未加盘问就放了进来，把她当成了从大泽区那些村庄常来的小贩中的一个。她径直来到军营，阿尔卡蒂奥在曾经的教室、如今的后方基地接待了她。四围的吊床或卷起或系在铁环上，角落里堆着棕席，步枪、卡宾枪和猎枪散置一地。老妇人先立正行了个军礼，然后才自报身份：

“我是格雷戈里奥·史蒂文森上校。”

他带来了坏消息。据他说，自由派的最后几个抵抗据点都危在旦夕。奥雷里亚诺上校正边战斗边向里奥阿查一侧撤退，他是受上校委派来向阿尔卡蒂奥报信的。阿尔卡蒂奥应当放弃抵抗投降，以换取敌人保证自由派生命财产安全的允诺。阿尔卡蒂奥用怜悯的目光打量着这位奇怪的信使，他看起来与一个逃难的老妇人没什么两样。

“您自然是带来什么书面证明了。”他说。

“自然是没带，”信使回答，“这不难理解，当前形势下不能带任何会连累别人的东西。”

他说着从内衣里掏出一条小金鱼放在桌上。“我想有这个就足够了。”他说。阿尔卡蒂奥确信那小金鱼出自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之手，但也可能是别人在战前购买抑或偷抢得来，因而不足为凭。信使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甚至不惜泄露一项军事秘密。他透露自己即将赶赴库拉索，招募整个加勒比海地区的流亡者，筹集武器装备，计划在年底登陆杀回国。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支持这一计划，不同意当下再作无谓的牺牲。但阿尔卡蒂奥没有动摇，他下令将信使关押起来直到弄清他的身份，并决心誓死守卫辖地。

他无须等上很久，因为自由派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而且越发确切。三月末，提前到来的雨季的一个清晨，几星期以来紧张的平静被

尖厉的军号声猝然打破。随后一声炮响，教堂的尖塔轰然倒塌。阿尔卡蒂奥的抵抗决心与疯狂无异。他手下不过五十来人，装备低劣，每人至多能分到二十发子弹。但这些人，他旧日的学生，受他那慷慨激昂的宣言所鼓动变得热血沸腾，时刻准备着为一项无望的事业献出生命。纷乱的军靴声，互相矛盾的号令声，令大地震颤的炮火声，慌乱的射击声，无谓的军号声—在这片混乱中，自称格雷戈里奥·史蒂文森上校的男人设法与阿尔卡蒂奥对上了话。“请不要让我蒙受羞耻，戴着镣铐穿着女人的破烂死掉，”他说，“如果我非死不可，请让我战斗而死。”他说服了他。阿尔卡蒂奥下令给他一支枪和二十发子弹，让他带着五个人保卫军营，他自己则领着参谋部冲向抵抗前线。他没能到达通往大泽区的路。街垒都已被清除，守军在无遮无挡的街道上作战，他们先用步枪直到子弹耗尽，然后用手枪对步枪，最后展开肉搏战。在镇子失守前，一些用棍棒和菜刀武装起来的妇女冲到街上。阿尔卡蒂奥在混乱中发现阿玛兰妲正像个疯子一样四处找他，身上还穿着睡衣，手持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两把老式手枪。他把步枪交给一位在战斗中弄丢了武器的军官，拉上阿玛兰妲逃向邻近的街巷带她回家。乌尔苏拉等在门口，纷飞的流弹已在邻居家墙上打出一个窟窿，她却全不在乎。雨停了，街面变得像泡化的肥皂又软又滑，而且黑暗中辨不出远近距离。阿尔卡蒂奥把阿玛兰妲交给乌尔苏拉，想去对付两个从街角胡乱开枪的士兵，但老手枪在衣柜里收藏多年之后失去了效用。乌尔苏拉用身体护住阿尔卡蒂奥，想把他拉进家门。

“快进来，看在上帝的分上，”她喊着，“别再发疯了！”

士兵们瞄准了他们。

“放开那个男人，女士，”其中一个士兵喊道，“不然后果自负！”

阿尔卡蒂奥把乌尔苏拉推向家门，随即投降了。很快枪声停息，钟声敲响。不到半个小时，抵抗被彻底粉碎。阿尔卡蒂奥的人一个也没活下来，但在战死前拉上了三百个士兵陪葬。最后被攻占的堡垒是军营。那个自称格雷戈里奥·史蒂文森上校的人释放了囚犯，命令他

的人上街战斗。他身形灵活，弹无虚发，将二十发子弹从不同窗口射出，给人以此地有重兵把守的印象。于是进攻者开炮将军营轰为平地。指挥进攻的上尉惊奇地发现，瓦砾堆里只有一个穿着衬裤的男人死在那里，没有子弹的步枪仍被炸离身体的手臂紧紧抓着。他那头像女人一样的浓密头发用发梳绾在颈后，脖子上的披巾上挂着一条小金鱼。上尉用靴尖翻过尸体，照亮这男人的脸，顿时愣住。“见鬼！”他喊了一声。其他军官围了上来。

“瞧瞧这家伙都跑到哪儿来了，”上尉对他们说，“是格雷戈里奥·史蒂文森。”

天亮的时候，经过军事法庭的即时审判，阿尔卡蒂奥被判处枪决，在公墓的墙前执行。在生命的最后两个小时里，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自童年时代起一直折磨他的恐惧感消失了。他无动于衷地听着冗长的指控，甚至没想去展现自己刚刚获得的勇气。他想着乌尔苏拉，她这会儿应该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栗树下喝咖啡。他想着八个月大的女儿还没有名字，想着即将在八月出生的孩子。他想着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昨天晚上他还给她留了一头鹿腌起来准备星期六中午吃；他想念她披散在肩头的发丝和她仿佛出自人工的睫毛。他想着他的亲人，并无感伤，只是在严格盘点过往时发现，实际上自己是多么热爱那些曾经恨得最深的人。军事法庭的庭长开始宣读最后的判决，阿尔卡蒂奥这才意识到已经过去两个小时。“尽管业已证实的指控不足以构成宣判依据，”庭长说，“然而被告人犯下了可怕的渎职罪行，导致其下属作出无谓的牺牲，仅此已足够被处以极刑。”置身于满目疮痍的学校，他曾在这里第一次感受到权力带来的安全感，他曾在一旁几米开外的房间里初尝情爱的滋味，阿尔卡蒂奥感到这样煞有介事的死亡不免可笑。其实他在意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因此听到死刑判决时他心中没有恐惧只有留恋。直到被问及最后的愿望，他才开口。

“告诉我女人，”他声音非常平静，“给女儿起名乌尔苏拉。”他顿了一下，重复道，“乌尔苏拉，跟她祖母一样。再告诉她如果生了男孩，就叫他何塞·阿尔卡蒂奥，但不是随他伯父的名字，而是随他祖父。”

行刑前，尼卡诺尔神甫想要引他作忏悔。“我没什么可忏悔的。”阿尔卡蒂奥喝过一杯黑咖啡，便听候行刑队处置。行刑队的首领是个擅长紧急枪决的老手，他拥有罗格·卡尔尼塞罗[②]这样的姓名绝非偶然。走向墓地的路上，细雨绵绵不绝，阿尔卡蒂奥望见星期三的曙光闪现在地平线上。留恋之情随着晨雾散去，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好奇感。当行刑队命令他靠墙站好的时候，他才看见丽贝卡。她头发濡湿，身穿带玫瑰色花朵图案的外衣，正打开屋门。他努力想让她认出自己。实际上丽贝卡只是偶然向墙边瞟了一眼，立时惊呆，而后才勉强反应过来向他挥挥手以示告别。阿尔卡蒂奥也同样挥挥手。在被一排黑洞洞的枪口瞄准的瞬间，他听见梅尔基亚德斯仿佛教皇通谕的吟唱，听见还是处女的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在教室里迷离的足音，同时鼻中感受到曾在蕾梅黛丝尸体鼻腔内发觉的冰块般的坚冷。“啊，糟糕！”他想起来了，“我忘了说，如果生女儿，就叫她蕾梅黛丝。”一时间，随着撕心裂肺的剧痛，折磨他一生的全部恐惧重又涌上心头。上尉下令开枪。阿尔卡蒂奥几乎来不及挺胸抬头，就感到不知从哪里流出的滚烫液体在大腿间烧灼。

“浑蛋！”他喊道，“自由党万岁！”

---

①在西班牙语中，“桑塔索菲亚 · 德拉 · 彼达”（Santa Sofía de la Piedad）有“慈悲圣女索菲亚”之义，“索菲亚”一名本身亦有“智慧”之义。

②“卡尔尼塞罗”（Carnicero），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屠夫”。

七

战争在五月结束。政府发布正式通告，言辞夸张地宣称将毫不留情地严惩发动叛乱的首恶分子。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通告发布两个星期前被捕，那时他化装成土著巫医，与西部边境相距咫尺。追随他上战场的二十一人中，十四人阵亡，六人受伤，只有一人陪伴他直到最后的失败时刻—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被捕的消息经一份特别通告传到马孔多。“他还活着，”乌尔苏拉告诉丈夫，“我们祈求上帝让他的敌人发发慈悲吧。”哀恸了三日，那天下午她正在厨房搅拌奶味甜食，耳边忽然清晰无比地响起儿子的声音。“是奥雷里亚诺，”她喊了起来，飞跑到栗树下告诉丈夫，“我不知道这神迹是怎么回事，不过他还活着，我们马上就能见着他了。”她对此深信不疑。她把家里的地板擦洗一新，又重新摆放了家具。一个星期后，虽然政府通告里没有提及，却有来源不明的传言戏剧性地证实了她的预感。奥雷里亚诺上校已被判处死刑，行刑地点定在马孔多，以儆效尤。星期一上午十点二十分，正在为奥雷里亚诺·何塞穿衣服的阿玛兰妲听到远处人声喧哗、军号嘹亮，一秒钟后乌尔苏拉就冲进房间，大喊道：“他被押来了。”押解队伍挥动枪托竭力抵御蜂拥而至的人群。乌尔苏拉和阿玛兰妲一路挤到街角，看见了他。他俨然一副乞丐模样，衣衫褴褛，须发乱成一团，还赤着脚。他走在滚烫的地面上却浑不在意，双手捆在背后，绳索的另一头系在一位军官骑着的战马颈上。在他身旁，是同样蓬头垢面的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他们俩并未显出悲伤，面对那些百般谩骂士兵的人群反倒有些困惑。

“我的孩子！”乌尔苏拉在喧嚷中喊道，一巴掌打向试图拦堵自己的士兵。军官的坐骑前蹄腾空，直立起来，于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

亚上校停住脚步。他颤抖着，避开母亲的双臂，目光坚定地望着她的眼睛。

“回家吧，妈妈，”他说，“您去找当局批准，来监狱里看我。”

他看了阿玛兰妲一眼，她离乌尔苏拉两步远，正不知所措。他微笑着问道：“你的手怎么了？”阿玛兰妲举起缠着黑纱的手。“烧伤。”她回答，同时一把拉开乌尔苏拉免得被马践踏。军队朝天开枪示警。一支特别小队将囚犯围在中间，一路小跑赶到监狱。

黄昏时分，乌尔苏拉来到监狱探望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她曾试着通过堂阿波利纳尔·摩斯科特获得批准，但这位里正在专权横蛮的军人面前毫无权威可言。尼卡诺尔神甫得了肝病，发烧卧床不起。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没被判处死刑，但他的父母去探监时仍被枪托轰了出来。眼看不可能找到任何传话的人，又确信儿子明天一早会被枪毙，乌尔苏拉便把要带给他的东西包成一包，独自去了军营。

“我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母亲。”她自报家门。

卫兵挡住她的去路。“无论如何我要进去，”乌尔苏拉表示决心已定，“如果你们得到了命令，那就开枪吧。”她推开一个卫兵，闯进当年的教室，里面一群赤身露体的士兵正在给武器上油。一位身穿野战服、戴着厚眼镜、脸色红润、举止庄重的军官，做了个手势要卫兵们退下。

“我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母亲。”乌尔苏拉重复了一遍。

“您的意思是，”军官脸露和蔼的微笑纠正她，“您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先生的母亲。”

乌尔苏拉从他咬文嚼字的说话方式中听出了内地人特有的慵懒腔调。

“随您怎么说，先生，”她承认道，“只要能让我见他就行。”

上级下令不允许探视死刑犯，但那位军官自行做主允了她十五分钟的会面时间。乌尔苏拉让他检查了自己的包袱：一套干净的换洗衣服，儿子结婚时穿过的靴子，她从预感儿子要归来的那天存留至今的奶味甜食。她在牢房里见到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他躺在行军床上，大张双臂，因为腋下长满了疖子。他们允许他刮了胡子，浓密的短髭尖角上翘，衬得颧骨线条分外突出。在乌尔苏拉眼中，他比离开时更苍白，但略高了些，也愈显孤单。他对家中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自杀，阿尔卡蒂奥任意妄为后被枪决，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栗树下昏沉度日。他也知道阿玛兰妲把近似孀居的独身时光全部花在了奥雷里亚诺·何塞的抚养上，这孩子已显露出聪慧的头脑，学说话的同时也学会了读写。从进入房间的那一刻起，乌尔苏拉就被儿子老成持重的神情、生杀予夺的气概和通身放射出的威严光彩所震慑。她奇怪他消息如此灵通。“您别忘了，我能未卜先知。”他开玩笑道，随即又严肃地补充一句，“今天早上他们押我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都已发生过。”实际上，当喧嚣的人群拦住去路，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惊讶于短短一年间镇子就衰老如斯。巴旦杏树枝叶凋零；漆成蓝色的房子时而改漆红色，时而又改回蓝色，最后那颜色都变得难以辨别了。

“你还能指望什么？”乌尔苏拉叹了口气，“时间过得很快。”

“话是没错，”奥雷里亚诺附和道，“可也没那么快。”

这本是期望已久的探视，双方也都准备好了问题甚至预先想好了答案，可就这样又变成了家常聊天。卫兵通知时间已到，奥雷里亚诺从床席下取出一卷汗湿的纸张。那是他写的诗，有他离开时随身携带的为蕾梅黛丝而作的，还有后来在危机四伏的战时间歇写的。“答应我别给任何人看，”他说，“今天晚上就用这些生炉子。”乌尔苏拉答应了，站起身来与他吻别。

“我给你带了把左轮手枪。”她低声说道。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确认了他们不在卫兵的视线之内。“我用不着，”他压低声音答道，“不过还是给我，免得您出去的时候被搜出来。”乌尔苏拉从胸衣里掏出左轮手枪，他接过去藏在床席下面。“现在不要告别。”他镇静地结束了谈话，“不要乞求任何人，也不要向任何人低头。您就当我早被枪毙了。”乌尔苏拉咬着嘴唇没哭出来。

“找热石头贴到疖子上。”她说。

她转身，离开牢房。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站在那里，若有所思，直到牢门关闭。他回到床上，仍旧大张双臂。自从少年时代开始对自己的预感有所意识，他就想死亡的来临会由一种不容置疑、不可改变的明确征兆来预告，但如今还剩几个小时就要上刑场，那征兆仍未出现。有一次，一个极其美貌的姑娘走进他在图库林卡的营地，请求卫兵放她进去见他。卫兵同意了，因为他们知道有些狂热的母亲会把女儿送进最出名的勇士的卧室，据她们自己说是为了改良血统。姑娘走进房间的时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正要写完那首关于雨中迷路人的诗。他背对着她，把诗页收进存放诗作的带锁小箱子。他感觉到了。他抓起箱子里的手枪，却没有回头。

“请不要开枪。”他说。

他握着子弹上膛的手枪转过身，看见那姑娘已放下自己的枪，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就这样，他躲过了十一次伏击中的四次。相反，一个至今未被抓获的凶手一天晚上潜入革命军在马纳乌雷的军营，刺死了他的好友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勒上校，而他是为了让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勒上校发热退烧才把自己的行军床让出来的。他就睡在同一房间内几米外的吊床上，却毫无察觉。他试图摸清预感的规律，却是徒然。预感总是倏然来临，灵光一现，好像一种确凿无疑的信念在瞬间萌生却无从捕捉。有些时候来得如此自然，直到应验之后才有所察觉。也有些时候非常明确却没有应验。还有许多时候不过是普通的迷

信而已。然而在被判处死刑并被问及有何愿望的那一刻，他毫无困难地认清了预感，据此作出回答：

“我要求在马孔多执行。”他说。

庭长有些不快。

“别耍滑头，布恩迪亚，”他说，“你这是在拖延时间。”

“同意与否，悉听尊便，”上校说，“但这就是我的最后愿望。”

从那时起预感不再光临。乌尔苏拉来探监的这一天，他反复思考，终于得出结论：或许这次死亡不会给出预告，因为它并非由运气决定，而是取决于刽子手的意愿。他被疖子折磨得整夜不眠。黎明将近，走道上传来脚步声。“来了。”他对自己说，不知为什么还想到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而那老人这时也正在栗树下晦暗的晨曦中想着他。他心里没有恐惧，没有留恋，只有深深的怒气，愤怒于这人为的死亡害得他看不到那么多未竟的事情如何收场。门开了，卫兵端着一杯咖啡走了进来。第二天同一时间他还是一样，为腋下的疼痛而恼火，发生的事情也一般无二。星期四，他和卫兵们分享了奶味甜点，换上了穿着略紧的干净衣服和漆皮靴。到了星期五，仍未行刑。

实际上，他们不敢执行判决。镇上人的桀骜不驯使军人们想到，处决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马孔多甚至整个大泽区都将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他们向省政府请求指示。星期六晚上等待命令的同时，罗格·卡尔尼塞罗上尉和其他几个军官去了卡塔利诺的店里。只有一个女人，几乎出于胁迫，才勉强答应和他同房。“没人愿意和一个要死的人上床，”她向他承认，“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大家都在说处决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军官，包括行刑队的所有士兵，一个挨一个早晚都会被干掉，就算躲到天边也没用。”罗格·卡尔尼塞罗上尉告诉了其他军官，那些军官又告诉了自己的上司。星期天，尽管没人明确透露，尽管没发生任何军事行动打破这些日子透着紧张的平静，整个镇子却都已知道军官们在寻找各种托辞逃避行刑的任务。星期一，邮差带来正式命令：“枪决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执

行。”当晚军官们把七张写着各自名字的小纸条放进一顶帽子，残酷的命运令罗格·卡尔尼塞罗上尉中了彩。“霉运逃也逃不掉，”他满心苦涩地说，“我生下来就不走运，到死也是倒霉鬼。”早上五点，他抽签选出行刑队，在院中排好，随后一句话叫醒了死刑犯，也预告了他的命运。

“上路吧，布恩迪亚，”他告诉他，“时候到了。”

“原来是指这个，”上校回答，“我正梦见疖子都破了。”

丽贝卡·布恩迪亚听说了奥雷里亚诺将被枪决的消息，凌晨三点就起床。她待在卧室里，摸黑透过半开的窗户盯着墓地的墙，身下坐着的床铺在何塞·阿尔卡蒂奥的鼾声中颤抖着。整整一个星期，她都执著地在暗中等待，就像当年等待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的来信。“不会在这儿枪毙他。”何塞·阿尔卡蒂奥对她说，“他们会半夜在军营里枪毙他，然后就在原地埋掉，免得让人知道谁参加了行刑。”丽贝卡继续等待。“他们那么蠢，一定会在这儿枪毙他。”她说。她对此确信不疑，甚至连开门挥手告别的方式都预先想好了。“就凭那六个吓破胆的士兵，他们才不会从街上押他过来，”何塞·阿尔卡蒂奥坚持道，“他们知道镇上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尽管丈夫说得头头是道，丽贝卡仍然守在窗前。

“你看着吧，他们就是那么蠢。”她说。

星期二早上五点，何塞·阿尔卡蒂奥已喝过咖啡，放出狗去。这时丽贝卡关上窗户，猛地抓住床头，险些摔倒。“他们押他过来了，”她叹了口气，“他真精神。”何塞·阿尔卡蒂奥往窗外望去，看见了他，穿着年轻时穿的裤子，在晨曦中颤抖。他已背朝墙站好，两手叉在腰间，因为腋下烧灼的疖块令他无法垂下手臂。“忍来忍去，”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嘀咕着，“忍来忍去就为了让六个软蛋干掉你，你还什么都做不了。”他气恼地反复念叨，看起来几近狂热，罗格·卡尔尼塞罗上尉还以为他在祈祷，不禁为之感动。当行刑队瞄准他的时候，怒气凝成黏稠苦涩的东西，麻痹了他的舌头又迫使他闭上眼

睛。那一瞬间晨曦的银白色光芒隐没，他又看见了小时候穿着短裤系着领结的自己，看见了父亲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带他走进帐篷见到了冰块。他听见喊叫声，以为那是最后的行刑命令。他出于好奇颤抖着睁开眼，准备迎接子弹白热的轨迹，却只看见罗格·卡尔尼塞罗上尉高举双手，何塞·阿尔卡蒂奥穿过街道，手中端着可怖的猎枪随时准备开火。

“请别开枪，”上尉对何塞·阿尔卡蒂奥说，“您一定是上帝派来的。”

由此，又一场战争爆发。罗格·卡尔尼塞罗上尉带着手下的六个士兵和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一起去里奥阿查，解救在那里被判处死刑的革命军将军维多利奥·梅迪纳。他们为了争取时间，本想沿着当年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创建马孔多时走过的道路穿越山区，但不到一个星期就确信那是不可能实现的行动。因此他们被迫取道危险的盘山路，随身装备除了行刑队配备的弹药再无其他。他们常常在村镇附近扎营，派出一个人乔装改扮一番，带着一条小金鱼在光天化日之下走进村子和潜伏的自由党人接头，次日清早那些人便出门打猎一去不回。当他们从一处山脊遥遥望见里奥阿查的时候，维多利奥·梅迪纳将军却已被处决。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手下人推举他为加勒比海沿岸革命军统帅，挂将军衔。他接受了职务，但拒绝升衔，并发誓一天不推翻保守党政权就一天不变军衔。三个月后，他们成功武装起一千多人，但随即被打垮，幸存者逃到了东部边境。下一次消息传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安的列斯群岛，在贝拉角登陆。一份政府公告通过电文传遍全国，欢天喜地地宣布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死讯。但是两天后，另一封通电几乎紧随前一封的余波，带来南方平原爆发起义的消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无所不在的神话由此而生。相互矛盾的消息同时传来，说他在比亚努埃瓦获胜，说他在瓜卡马亚勒被击败，说他被莫蒂隆印第安人生吃，说他死在大泽区的一个小镇，说他又在乌鲁米达起义。自由党的领导人那时

正忙于谈判争取国会席位，称他为冒险主义者，完全不代表本党立场。国民政府将他归于土匪一类，悬赏五千比索买他的人头。经过十六次失利，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率领两千名武装精良的土著从瓜希拉出发，里奥阿查的守军在梦中惊醒，弃城而去。他在那里建立总部，对政府全面宣战。他从政府方面收到的第一份通告，以枪毙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相威胁，要他在四十八小时内带人撤到东部边境。罗格·卡尔尼塞罗上校当时是驻地负责人，沮丧地将电文呈送到他面前，但他看过之后却出人意料的高兴。

“太好了！”他喊道，“我们马孔多已经有电报了。”

他的答复很干脆。他会在三个月内将总部设到马孔多，如果到时看不到活着的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他将不经审判，先从将军们开始直接枪决俘虏的所有军官，并将下达命令让所有部属照办直到战争结束。三个月后，他胜利进入马孔多，在通向大泽区的路上接受的第一个拥抱便来自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

家里到处都是孩子。乌尔苏拉收留了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和她的长女，以及阿尔卡蒂奥被处决五个月后出生的一对双胞胎。她没有遵照死者的遗愿，而是用蕾梅黛丝的名字给女孩命了名。“我相信这才是阿尔卡蒂奥的意思。”她解释道，“我们别叫她乌尔苏拉，取这名字的人吃了太多的苦。”她给双胞胎取名为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和奥雷里亚诺第二。阿玛兰妲负责照顾所有的孩子。她在屋里摆上小木椅，还接纳了邻居的孩子，开设了一个幼儿园。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归来时，爆竹与时钟齐鸣，一个儿童合唱团唱起歌来欢迎他。长得像祖父一样高大的奥雷里亚诺·何塞身着革命军军服，向他行军礼致敬。

并非所有的消息都是好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逃走一年后，何塞·阿尔卡蒂奥和丽贝卡搬进了阿尔卡蒂奥建起的房子。没人知道他阻止行刑的事。新家坐落在广场最好的一角，掩映在一棵巴旦杏树的浓荫里，树上足有三个知更鸟的鸟巢。一扇大门迎送访客，四

扇明窗承接阳光，他们就在这房子里安下热情好客的新家。丽贝卡旧日的女伴，包括摩斯科特家四个尚未出嫁的女儿，重新聚在一起刺绣，就像数年前在秋海棠长廊里一样。何塞·阿尔卡蒂奥继续享受掠夺来的土地收益，他的所有权已得到保守党政府的承认。每天下午都可以看见他骑马归来，扛着双铳猎枪，带着猎狗，一串兔子挂在马鞍上。九月的一天下午，眼看暴风雨迫近，他比平时提前回了家。他到饭厅和丽贝卡打过招呼，把狗拴在院中，又将兔子挂在厨房准备晚些时候腌起来，随后去卧室换衣服。丽贝卡事后声称丈夫进卧室时自己正在浴室，丝毫没有察觉。这一说法难以令人信服，但又没有更可信的其他说法，另外谁也想不出丽贝卡会有什么动机谋杀令她幸福的男人。这也许是马孔多唯一从未解开的谜团。何塞·阿尔卡蒂奥刚关上卧室的门，一声枪响震彻全屋。一道血线从门下涌出，穿过客厅，流到街上，沿着起伏不平的便道径直向前，经台阶下行，爬上路栏，绕过土耳其人大街，右拐又左拐，九十度转向直奔布恩迪亚家，从紧闭的大门下面潜入，紧贴墙边穿过客厅以免弄脏地毯，经过另一个房间，划出一道大弧线绕开餐桌，沿秋海棠长廊继续前行，无声无息地从正给奥雷里亚诺·何塞上算术课的阿玛兰妲的椅子下经过而没被察觉，钻进谷仓，最后出现在厨房，乌尔苏拉在那里正准备打上三十六个鸡蛋做面包。

“圣母在上！”乌尔苏拉喊了起来。

她沿着血流溯源而上，穿过谷仓，经过秋海棠长廊—奥雷里亚诺·何塞正在那里念诵三加三等于六、六加三等于九—又穿过饭厅和一个个房间，径直走到街上，先右拐再左拐到了土耳其人大街，忘了自己还穿着烤面包的围裙和家居拖鞋，来到广场，走进一户从未登过门的人家，推开卧室的门，险些被火药燃烧的气味呛死，发现何塞·阿尔卡蒂奥趴在地上，身下压着刚脱下来的靴子，这就看到了血流的源头，而血已不再从他右耳流出。没发现他身上有任何伤口，也没找到凶器何在。另外也无法除去尸体上呛人的火药味。最初用丝瓜瓤蘸肥

皂洗过三遍，然后先用盐和醋、后用草木灰和柠檬汁擦拭，最后浸到一桶碱水里泡了六个小时。经过反复揉搓擦洗，他身上的刺青花纹开始退色。他们不得已想出一个极端的方案，加入胡椒、莳萝和月桂叶用小火煮上一整天，但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不得不即刻下葬。他们用一口长两米三、宽一米一，内部以铁板与钢栓加固的特制棺材将他密封下葬，但仍然在一路经过的街道上留下了气味。尼卡诺尔神甫的肝部肿胀紧绷如鼓，他只能在床上为死者祈福。此后数月，虽然为坟墓砌起层层护板，在其间撒上压实的灰土、锯末和生石灰，墓园依然飘荡着火药味，直到多年以后香蕉公司的工程师在坟上浇了一层水泥，那气味才消失。从尸体被抬出的那一刻起，丽贝卡就紧闭家门，过上了活死人的生活。她将自己包覆在高傲的厚壳里，尘世间的一切诱惑都无法将其打破。她出过一次家门，那时她已进入晚年，脚下一双古银色鞋子，头上一顶缀有小花的女帽。那时正值传言中“流浪的犹太人”经过村庄带来酷暑，飞鸟都热得撞破纱窗死在卧室里。最后一次有人看到她的时候，她一枪命中，当场击毙一个企图撬门入室的小偷。除了阿尔赫尼妲，她的女仆和心腹，再也没人与她有过联系。人们一度听说她给被她视作表兄的主教写过信，但从未听说她收到过回音。她已被镇上的人遗忘。

奥雷里亚诺 · 布恩迪亚上校凯旋归来，但他并没有为事情的这种表象而兴奋。政府军未作抵抗便放弃许多村镇，这在自由派民众当中激发的胜利憧憬不宜打破，然而革命者了解真相，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更是如此。此时他手下士兵超过五千，控制着沿海两个州，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背海受困，并陷入了混乱的政治环境之中，无怪乎当他下令重建毁于政府军炮火的教堂尖塔时，尼卡诺尔神甫在病榻上不禁感慨：“这实在荒唐，基督信仰的卫士摧毁教堂，共济会的人却下令重建。”为了寻找一条出路，他在电报室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与其他城镇的首领商谈，他日益确信战争已陷入僵局。每当自由派的捷报传来，就会有通报大肆庆贺，但他会在地图上标出实际进展，进

而发现他们的队伍正在深入雨林，与疟疾和蚊虫作战，与现实背道而驰。“我们在浪费时间，”他向他的军官们抱怨，“只要党内那些混账东西还在乞讨国会的位子，我们就得接着浪费。”失眠的夜里，就在当死囚犯时待过的同一个房间，他仰面躺在吊床上，眼前浮现出那些身着黑衣的律师的形象，他们在黎明的寒意中离开总统府邸，竖起大衣领子遮住耳朵，搓手御寒，窃窃私语，庇身于凌晨时分昏暗的小咖啡馆，细细揣摩总统说“是”的时候真正想说什么，说“不”的时候又想说什么，甚至还推测总统心口不一的时候究竟想的是什么—而他此时在三十五度的高温中驱赶着蚊子，感到可怕的黎明正在迫近，到时他就只能下令让自己的人跳进海里。

一个疑虑重重的夜晚，庇拉尔·特尔内拉正在院中和士兵一起唱歌，上校请她用纸牌为自己推算将来。“当心嘴巴，”这是庇拉尔·特尔内拉推算三次后得出的全部结论，“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预示非常清楚：当心嘴巴。”两天后，有人递给勤务兵一大杯没加糖的浓咖啡，勤务兵给了别人，这人又给了另一人，传来传去最后送到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办公室里。上校并没有要过咖啡，但既然端到面前，他便喝了下去。咖啡里下了足够毒死一匹马的马钱子碱。他被送回家的时候，身体已经僵成弓形，舌头伸在齿间。乌尔苏拉与死神搏斗抢夺他的生命，她用催吐剂给他洗胃后，拿一床床热毯子将他裹紧，又喂了他两天蛋清，直到受损的身体恢复正常温度。到第四天，他脱离了危险。在乌尔苏拉和军官们的坚持下，他无奈地又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那时他才知道他的诗稿并没有烧掉。“我想不用那么急。”乌尔苏拉向他解释，“那天晚上，我准备生火，就跟自己说最好还是等尸体送来了再说。”在身体初愈的恍惚中，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身边摆满了蕾梅黛丝落满尘灰的娃娃，他读起自己的诗来，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一一浮现。他又开始写诗。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他远离这场徒劳战争中的惊涛骇浪，将自己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化作

押上韵脚的诗行。他的想法由此变得分外清晰，经得起反复思索。一天晚上他问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

“告诉我，老兄：你打仗是为了什么？”

“还能为了什么，老兄，”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回答，“为了伟大的自由党呗。”

“你知道为了什么，算是有福，”他答道，“我呢，现在刚发现我打仗是为了自尊。”

“这可不好。”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说。

他的警觉令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感到好笑。“当然，”他说，“不过不管怎么说，这总比不知道为了什么打仗强。”他看着他的眼睛，笑着加上一句：

“也比你强，你是为了一样对谁都没用的东西打仗。”

他的自尊曾令他放弃与内陆武装组织的联系，除非党的领导人公开更正称他为强盗的说法。然而，他知道只要放下这些顾忌，就能立刻打破战争的恶性循环。休养身体给了他反思的契机。他说服乌尔苏拉挖出剩余的遗产，连同她可观的积蓄都交给自己，又任命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为马孔多的军政首领，随后便起程去与内陆的反抗武装建立联系。

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不仅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最信任的人，还被乌尔苏拉当作家中的一员。他体质虚弱，性格腼腆，生来文质彬彬，却更适合打仗，不适合从政，他的政治顾问们毫不费力就将他绕进了理论迷宫。不过他还是在马孔多实现了奥雷里亚诺上校梦寐以求的乡土平安，后者希望可以在此安心打造小金鱼以终老。他住在父母家里，但每星期总有两三次到乌尔苏拉这里吃午饭。他开始教奥雷里亚诺·何塞使用火器，对他提前进行军事训练，还在征得乌尔苏拉的同意后带他去军营生活了几个月，使他成长为男子汉。多年以前，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几乎还是个孩子，就表白过对阿玛兰妲的爱意。她那时正沉浸在对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的单相思中，因而

还嘲笑过他。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在等待。有一回他从狱中给阿玛兰妲捎来一张小纸条，请她在一打细棉布手帕上绣上自己父亲的名字缩写，还捎去了工钱。一个星期后，阿玛兰妲去监狱给他送那一打绣好的手帕，钱也还了他，两人谈了几个小时的往事。“等我出去就和你结婚。”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在告别时说道。阿玛兰妲笑了，但教孩子们读写的时候仍然想着他，希望为他寻回年轻时对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燃起的激情。每个星期六是探监的日子，她都去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父母家，陪他们一同去监狱。其中一个星期六，乌尔苏拉看见她在厨房里等蛋糕出炉，要挑出最好的裹在专为此绣出的餐巾里。

“嫁给他吧，”乌尔苏拉对她说，“你很难再找到像他这样的男人。”

阿玛兰妲装出生气的样子。

“我不需要追着男人嫁，”她回答，“我给赫里内勒多带蛋糕，是觉得他可怜，迟早会被枪毙。”

她本是随口一说，却赶上政府公开威胁，如果叛军不交出里奥阿查就要枪毙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探监被取消。阿玛兰妲关起门来痛哭，与当初蕾梅黛丝死时相仿的罪疚感折磨着她，仿佛是她出于无心的话语又一次引来死亡。母亲安慰她，让她相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有所举动制止枪决，并许诺一等战争结束就亲自把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给她带来。结果她提前兑现了承诺。当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以军政首领的显赫身份再次登门时，她像对待儿子一般接待他，百般恭维以取悦他，全心祈求以唤起他迎娶阿玛兰妲的初衷。她的祈求看来灵验了。每次吃过午饭，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都会留下，在秋海棠长廊里和阿玛兰妲下跳棋。乌尔苏拉给他们送上牛奶咖啡和蛋糕，并照顾好孩子，免得他们被打扰。阿玛兰妲在奋力重燃心中已被遗忘的青春激情的余烬。她无法忍受心头的焦虑，期盼着共进午餐的日子，期盼着下跳棋的午后。有这位勇士的陪伴时间流逝得飞快，他的名字带有怀旧色彩，他的手指移动棋子时的轻微

颤抖不易觉察。但那天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再次提出结婚的请求时，她拒绝了。

“我谁也不嫁，”她告诉他，“尤其不嫁给你。你太爱奥雷里亚诺才想跟我结婚，因为你没法跟他结婚。”

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是个有耐性的人。“我会再提出来，”他说，“我迟早要说服你。”他继续登门造访。阿玛兰妲关在卧室里强忍悲声，捂住耳朵，免得听见那位追求者向乌尔苏拉谈论最新战况的声音。尽管心里无比渴望，她仍能克制着不出去见面。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时还能抽出时间，每两个星期发一份详细的通报到马孔多。只有一回，就在离开近八个月后，他直接写信给乌尔苏拉。一位特使把一封火漆封口的信送到家里，里面的一张纸上是上校工整的字迹：好好照顾爸爸，他就要死了。乌尔苏拉吃了一惊。“既然奥雷里亚诺这么说，奥雷里亚诺就有把握。”她说。她去请人帮忙把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带回卧室。他一如往昔身子沉重，而且栗树下的漫长岁月助长了他随意增重的本事，结果七个人协力都搬不动他，只能勉强把他拖到床上。身量巨硕的老人饱受淫雨骄阳的折磨，他一呼气，屋里的空气中便充溢着幼蘑、鸡蛋花以及经年凝聚的风雨的味道。次日清晨，床上不见了他的踪影。各个房间找过一遍之后，乌尔苏拉发现他又回到了栗树下。于是把他绑在床上。尽管气力仍在，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却无意反抗。他对一切都无所谓。他回到栗树下也不是出于本人意志，只不过源于身体的习惯。乌尔苏拉照顾他，喂他进食，给他讲奥雷里亚诺的消息。然而实际上，他很久以来还保持交流的对象只有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死后衰老已极，几近归于尘土，但仍每天两次找他聊天。他们谈起斗鸡。他们约好建立一个饲养优异品种的养殖场，倒不是为了享受他们已不再需要的胜利，而是为了在阴间沉闷的星期天聊作消遣。正是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为他擦洗，给他喂食，向他讲述一个陌生人的光辉业绩，那人名叫奥雷里亚诺，是战时的一名上

校。一个人的时候，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一个有无穷房间的梦中得到慰藉。他梦见自己从床上起来，打开房门，走进另一间一模一样的房间，里面有同样铸铁床头的床、同样的藤椅和后墙上同样的救难圣母像。从这一间又进入另一间一模一样的，如此循环，无穷无尽。他喜欢从一间走到另一间，仿佛漫步在镜廊中，直到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轻拍他的肩头。于是，他一间间回溯，渐渐苏醒，他原路折返，在现实的房间里与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相会。然而一天晚上，就在他被拖回床上两个星期之后，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在居中的房间里拍了他的肩膀，他便永远留在了那里，认为那才是现实的房间。第二天早上乌尔苏拉给他送饭的时候，看见一个男人从长廊走近。他个子矮小敦实，身穿黑呢大衣，一顶同样漆黑的巨大帽子直压至忧郁的眼际。“上帝啊，”乌尔苏拉想，“简直就是梅尔基亚德斯。”那是卡塔乌雷，比西塔西翁的兄弟，当年为了逃避失眠症而出走，一去再没有消息。当比西塔西翁问他为什么回来，他用他们庄重的语言答道：

“我来是为了王的下葬。”

于是他们走进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房间，用尽全身力气摇晃他，冲他耳边叫喊，又把一面镜子放在他的鼻孔前，但都无法将他唤醒。不多时，木匠开始为他量身打造棺材，他们透过窗户看见无数小黄花如细雨缤纷飘落。花雨在镇上落了一整夜，这静寂的风暴覆盖了屋顶，堵住了房门，令露宿的动物窒息而死。如此多的花朵自天而降，天亮时大街小巷都覆上了一层绵密的花毯，人们得用铲子耙子清理出通道才能出殡。

八

阿玛兰妲坐在藤摇椅上，将手中活计搁在膝头，看着奥雷里亚诺·何塞往下巴上涂满泡沫，在皮条上刮着剃刀，准备平生第一次刮胡子。他试着把上唇棕黄的茸毛理成髭须时不慎割破皮肤，粉刺流出血来，而到最后他也没理成个样子，但这番艰苦的努力却让阿玛兰妲觉得自己从这时起便开始老了。

“你和你这个年龄时的奥雷里亚诺一模一样，”她说，“你已经是大人了。”

其实他早就是了，这可以追溯到已然遥远的一天，阿玛兰妲仍把他当作孩子，在浴室里当着他的面脱下衣服。自从庇拉尔·特尔内拉把孩子托付给她抚养，她一向这样做，已经习惯了。他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唯一注意到的是乳房间的深沟。他天真地问这是怎么了，阿玛兰妲装作用指尖在胸前掏挖的样子回答：“挖呀挖呀挖呀就成这样了。”后来，当她从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的自杀事件中恢复，又和奥雷里亚诺·何塞一起洗澡，他已经不再注意那深沟，而注目于那紫色乳头和丰硕双峰，感到一阵奇怪的战栗。他继续观察，一点一点发现她隐秘处的神奇，窥看时感到皮肤上汗毛倒竖，就像她的皮肤碰到水时一样。很小的时候他就习惯天亮前离开自己的吊床睡到阿玛兰妲的床上，觉得和她在一起就不会惧怕黑暗。然而从意识到她的裸体那天起，驱使他钻进她蚊帐的不再是对黑暗的恐惧，而是对天明时感受她温暖呼吸的渴望。一天凌晨，就在阿玛兰妲拒绝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的那段日子，奥雷里亚诺·何塞在几近窒息中惊醒，感觉她的手指像滚烫的虫子在焦灼地向他的腹部蠕动。他装作熟睡未醒，调整姿势为她除去一切障碍，随即感到那只未缠黑纱的手宛如失明的软体动物在他饥渴的水藻间潜游。两人都装作不知道双方心知肚明的事

实，都装作不知道对方已知情，自那天晚上起被一种不容侵犯的默契紧紧联结在一处。奥雷里亚诺·何塞不听到客厅里时钟午夜报时的华尔兹就无法安眠，而那位容颜开始枯萎的盛年处女没等到梦游人钻进蚊帐也一刻不得安宁。她亲手将他抚养大，未曾想到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宽慰自己孤独的良药。他们不仅赤身露体睡在一起，彼此爱抚到精疲力竭，还在家中各个角落互相追逐，随时随刻关在卧室里，沉浸于持久的兴奋中。他们差点儿被乌尔苏拉发现，那天下午她走进谷仓，正撞见他们准备接吻。“你很爱你姑妈？”她毫不知情地问奥雷里亚诺·何塞。他回答说是。“你做得对。”乌尔苏拉评判道，称好做面包的面粉就回了厨房。这一幕让阿玛兰妲从狂热中惊醒。她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得太远，不是在和孩子玩亲嘴游戏，而是在挑动人过中年危险无望的情火，便决然断绝了关系。奥雷里亚诺·何塞那时快要完成军训，最终接受了现实，搬到军营去睡。每个星期六他都和士兵们去卡塔利诺的店里。他突如其来的孤独，早熟的青春，都在散发着残花味道的女人们身上得到了慰藉。他在黑暗中展开幻想，竭力将她们想象成阿玛兰妲。

没过多久，开始传来互相矛盾的战局消息。政府承认叛乱在扩大，但马孔多的军官们却得到内部消息称和议即将达成。四月初，一位特使出现在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面前。特使向他证实，党的领导人确实已经与内陆的起义军取得联系，即将议定停战协定，以此为自由党换取三个部长职位、国会里的少数席位以及对所有放下武器的起义者的大赦。特使同时带来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绝密命令，他在命令中表明不赞同停战协定，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应当选出五名最好的手下，作好准备带他们离开国境。命令执行得极其隐秘。协定公布一个星期前，正当彼此矛盾的传言四起的时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带领包括罗格·卡尔尼塞罗上校在内的十名亲信军官，夜半时分暗中潜入马孔多，遣散驻军，埋掉武器，毁去文件。天亮时，他们已经和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及其手下五名军

官一起离开镇子。这次行动迅速又隐秘，连乌尔苏拉都直到最后一刻才知情，那时有人轻轻敲响她卧室的窗户，低声道：“如果您想看一眼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现在就去门口。”乌尔苏拉跳下床，穿着睡衣出了门，只隐隐望见一小队骑手在无声的尘烟中离开镇子。到了第二天，她才知道奥雷里亚诺·何塞也随他父亲去了。

政府与反对党发布联合声明宣告停战，十天后传来消息说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西部边境发动了第一场武装起义。他那支人员不足、装备低劣的部队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击溃。但在这一年，当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试图使国人相信和解已经达成，他又组织了另外七次起义。一晚，他从一条纵帆船上炮轰里奥阿查，守军将当地最知名的十四个自由党人从床上拖出来枪决以示报复。他曾占领一处边界关卡半个多月，从那里通电全国宣告发动全面战争。他曾在一次远征中迷失于雨林三个月，异想天开地试图穿越一千五百多公里的原始森林直捣首都近郊。还有一次，他距马孔多不到二十公里，却在政府军巡逻队的威逼下退到山区，趋近他父亲多年前发现西班牙大帆船残骸的着魔之地。

比西塔西翁在那段时间去世。她因为对失眠症的恐惧放弃王位，最后得偿所愿，安详离世。她的遗愿是起出埋藏在她床下二十多年的积蓄，寄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继续战斗。乌尔苏拉并未取出这笔钱，因为那时四处传言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已经死于一次在省城附近的登陆行动中。人们相信了官方通告—那已是不到两年内的第四份—因为六个月里再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当乌尔苏拉和阿玛兰妲旧丧未除又添新丧，意料之外的消息突然传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还活着，但似乎已放弃对本国政府的侵扰，加入了加勒比海其他共和国胜利在望的联邦派军队。他以不同的名字活动，离祖国日益遥远。日后人们将会知道，当时的他一心想要联合中美洲各地的联邦派力量，横扫从阿拉斯加到巴塔哥尼亚的一切保守党政权。他

离去几年后，乌尔苏拉第一次收到他的亲笔信，那封信寄自古巴的圣地亚哥，经过多人辗转传递已经皱皱巴巴、字迹模糊。

“我们永远失去他了，”乌尔苏拉感叹道，“这样下去他就得在世界尽头过圣诞了。”

听她说这话的人，也是她对其出示信件的第一个人，是保守党将军何塞·拉克尔·蒙卡达，战后马孔多的市长。“这个奥雷里亚诺，”蒙卡达将军说，“真可惜他不是保守党。”他的敬佩出自真心。像许多保守党人一样，何塞·拉克尔·蒙卡达为了捍卫自己的党派才参战，并在战场上获得了将军的头衔，但他无意成为职业军人。恰恰相反，他和党内许多同道一样，是反军事主义者。在他看来，军人都是些没有原则的懒虫、野心勃勃的阴谋家，惯于欺压平民乱中牟利。他聪明和善，性格开朗，胃口好，爱斗鸡，一度成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最可怕的对手。他在沿海广阔区域内的职业军人中建立了自己的权威。曾有一次，他出于战略考虑被迫放弃一座据点让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军队占领，同时留下了两封信。其中一封很长，他在信中邀请对手共同努力促使战争更人道。另一封写给他身陷自由派占领区的妻子，他请求将信送给她。从那以后，即使在战事最激烈的时期，两位指挥官仍会达成暂时休战的协定来互换战俘。那些战事间歇期洋溢着节庆气息，蒙卡达将军有了机会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下象棋。他们成了好友。他们甚至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团结两党的民众力量，肃清军人和职业政客的流毒，建立一个汲取了两党理论思想精华的人道主义政府。战争结束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铤而走险，不断起事，而蒙卡达将军被任命为马孔多的里正。他脱下军装，以不带武器的警察取代士兵，实行大赦法令，并救助一些阵亡自由党人的家属。他成功让马孔多提升为市，也因此当了第一任市长。他营造出安定的氛围，令战争成为昔日荒诞的噩梦。尼卡诺尔神甫被肝病高热折磨得奄奄一息，已由科罗奈尔神甫取代，后者被人称作“新手”，是第一次联邦战争中的老兵。布鲁诺·克雷斯皮与安帕萝

·摩斯科特结了婚，他的玩具乐器店生意蒸蒸日上。他盖了一座剧院，成为许多西班牙剧团的巡演站点。那是一座宏伟的露天大厅，配有木制靠背椅，饰以古希腊面具的天鹅绒大幕。三个售票窗造成狮头形状，从大张的狮口出售戏票。学校也在那一时期重建，由堂梅尔乔·埃斯卡洛纳负责。他是一位从大泽区派来的老教师，让不用功的学生在院中石灰地面上跪着行走，让言语放肆的学生吃辣椒，家长们对此十分满意。奥雷里亚诺第二和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这对任性的双胞胎儿子，是第一批带着小黑板、粉笔和标有名字的小铝壶坐到教室里的学生。蕾梅黛丝遗传了母亲的美貌，开始被称为美人儿蕾梅黛丝。尽管时光流逝，丧事接二连三，苦痛不断增添，乌尔苏拉却并不显衰老。在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的帮助下，她将自己的甜食生意推上新的高峰，不仅在短短几年内挣回了儿子消耗于战争中的资财，还用纯金塞满了一个个葫芦埋在卧室里。“只要上帝还让我活着，”她时常这样说，“这个净出疯子的家里就缺不了钱。”就在这时候，奥雷里亚诺·何塞从尼加拉瓜联邦派军队里开了小差，跑到一艘德国船上当水手，最后出现在家中的厨房里。他壮实如马，肤色黝黑，头发浓密，像个印第安人。他怀着秘密的目的回来，一心要和阿玛兰妲结婚。

阿玛兰妲见他进来，没等他开口，便明白了他回来的原因。在饭桌上，他们不敢对视。但两个星期后，他当着乌尔苏拉的面盯着她的双眼说：“我一直在想你。”阿玛兰妲躲着他，竭力避免碰面的机会，尽量不与美人儿蕾梅黛丝分开。那天当侄子问她手上的黑纱要戴到什么时候，她脸红了，并因自己脸红而气恼，因为她觉得那问题在影射她的童贞。自从他回来后，她就闩上了卧室的门，但许多个夜晚过去，听着隔壁房间他那平稳的鼾声，她放松了警惕。在他归来两个月后的一天凌晨，她察觉到他进了卧室。那一刻，她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逃走或叫喊，心头反而涌上一阵如释重负的轻松。她感觉到他钻进蚊帐，就像他孩提时代常做的那样，就像他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她

意识到他寸丝不挂，不禁冷汗直流，牙齿咯咯打战。“你走，”她低声道，惊得喘不过气来，“不走我就喊了。”但奥雷里亚诺·何塞知道此刻该做些什么，他已经不再是怕黑的孩子，而是出自军营的猛兽。自那天晚上起，没有结果的无声战斗又开始了，每每持续到黎明。“我是你姑妈，”精疲力竭的阿玛兰妲低声道，“差不多就等于你母亲，这不光因为年纪，我还把你养大，就差没给你喂过奶。”奥雷里亚诺·何塞黎明时离开，第二天凌晨又回来，每次发现房门并未闩上就愈加兴奋。他没有一刻不想她。在那些被攻陷村镇的阴暗卧室里，特别是在那些最下贱的地方，找到她的影子；在伤员绷带上干涸血迹的味道中，觅见她的身形；在致命危险所激发的恐惧中，随时随地与她相遇。他曾经从她身边逃开，试图在记忆中将她抹去，为此不仅远走他方，还表现出被战友们归为莽撞的凶悍冒进。他越是在战争的粪坑里摔打她的形象，战争本身就越像阿玛兰妲。他就这样在流亡中忍受煎熬，寻求以自己的死亡来消灭她，直到听见有人讲起那个古老的故事。故事主人公和既是自己姑妈又是自己表姐的女人结婚，结果生出的儿子成了自己的祖父。

“一个人能娶自己的姑妈吗？”他惊异地问。

“不光可以娶姑妈，”一个士兵回答，“我们现在跟教士打这场仗，就是为了让人连亲娘都能娶。”

十五天后他开了小差。他发现阿玛兰妲比记忆中更憔悴，也更忧伤、更端庄；她岁月的航船正在绕过盛年的最后一个岬角，但在卧室的幽暗中她却显出从未有过的狂热，激烈的反抗也从未显得这样富于挑战。“你是头野兽。”受他追逼的阿玛兰妲说，“不能对一个可怜的姑妈干这种事，除非有教皇的特许。”奥雷里亚诺·何塞答应去罗马，答应膝行整个欧洲去亲吻教皇的鞋子，只要她肯放下悬着的吊桥。

“不光是这个，”阿玛兰妲反驳道，“会生出猪尾巴孩子的。”

奥雷里亚诺·何塞对一切道理都充耳不闻。

“就算生出犰狳也不要紧。”他恳求道。

一天凌晨，他再也无法压抑欲望和忍受痛苦，便去了卡塔利诺的店里。他找到一个乳房干瘪、亲切又廉价的女人，暂时平息了欲火。他试图对阿玛兰妲采取蔑视的态度，见到她在长廊里做缝纫活计，已经能将手摇式缝纫机应用自如时，一句话都不对她说。阿玛兰妲感觉卸去了重担，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又想起了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为什么怀念下跳棋的午后，甚至渴望他成为卧室中的情人。奥雷里亚诺·何塞还不知道自己已丧失多少领地，一天晚上他无法再忍受伪装的漠然，又回到阿玛兰妲的房间。她以无可动摇的决心拒绝了他，从此永远闩上了卧室的房门。

奥雷里亚诺·何塞回来后没几个月，家里来了个体态丰满的女人，浑身散发出茉莉香，带着一个五岁多的男孩。她声称那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儿子，她带来请乌尔苏拉起名。没有人怀疑那个无名男孩的血脉：他和被领去看冰块时的上校长得分毫不差。女人说孩子一出生就大睁双眼，用大人的方式打量众人，他那种眼睫不眨看东西的样子令人害怕。“一模一样，”乌尔苏拉说，“就差用眼神翻倒椅子了。”他们给他起名为奥雷里亚诺，用了母亲的姓氏，因为法律不允许在生父尚未承认前使用父姓。蒙卡达将军做了教父。阿玛兰妲坚持要把孩子留下来抚养，但他母亲拒不同意。

乌尔苏拉那时还不知道将少女送进军人卧室的习俗，那就像把母鸡赶到良种公鸡那里去。但在这一年她有了充分的了解：又有九个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孩子被送到家里起名。其中最大的已过十岁，长相奇特，肤色黝黑，眼睛碧绿，与父家没有丝毫相似。送来的孩子有各种年龄各种肤色的，但都是男孩，都带着落落寡合的神情，显示出毋庸置疑的血缘归属。其中有两个格外突出。一个身材魁伟与年龄不符，打碎了许多花瓶和餐具，双手仿佛拥有损坏一切所碰东西的特性。另一个一头金发，长着母亲那样的蓝眼睛，留着女人一样的长鬈发。他走进家里，一副熟门熟路的样子，仿佛就在这里长大。他径直来到乌尔苏拉卧室里的一个箱子前，说：“我要上弦的跳舞女

郎。”乌尔苏拉吓了一跳。她打开箱子，在梅尔基亚德斯时期落满尘灰的旧物中翻寻，找到了包裹在一双长袜中的上弦跳舞女郎，这东西是当初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带到家里的，此后被人遗忘了。不到两年内，他们为上校在战场上一路播撒的儿子命了名，都叫奥雷里亚诺，姓氏则随母亲：共计十七个。起初，乌尔苏拉还往孩子的口袋里塞满钱，阿玛兰妲则努力争取把他们留下来抚养，但后来她们只是送一份礼物，并担当教母。“我们起了名就行了。”乌尔苏拉一边说，一边在小本子上记下母亲的姓名地址及孩子出生的时间地点，“奥雷里亚诺一定算得清楚，等他回来自己拿主意吧。”吃午饭时，她对蒙卡达将军谈起这意外的人丁兴旺，希望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能回来一次，和所有儿子在家中团聚。

“不用担心，大姐，”蒙卡达将军不无神秘地说，“他会比您预料中回来得早。”

蒙卡达将军知晓这事却不愿在午饭时明说，其实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正要发动一场迄今为止他所领导的最漫长、最激烈也最残酷的起义。

时局又变得像第一次战争爆发前的数月里那般紧张，一度获得市长本人支持的斗鸡比赛都被取消了。市政大权实际落在驻军首领阿基莱斯·里卡多上尉手中，自由党人将他视作挑衅分子。“要出大事，”乌尔苏拉对奥雷里亚诺·何塞说，“下午六点以后不要上街。”这些劝告都归于徒然。奥雷里亚诺·何塞和当年的阿尔卡蒂奥一样，已经脱离她的怀抱。他回到家里，仿佛就可以不再为日常需要操心，这在他身上唤醒了伯父何塞·阿尔卡蒂奥那种放浪懒散的习性。他对阿玛兰妲的激情消逝得无影无踪。他四处游荡，打打台球，拈花惹草排解孤独，翻出各个角落里乌尔苏拉藏起又忘记的钱财。到后来他只为换衣服回家。“都一个样。”乌尔苏拉哀叹道，“一开始好好的，又听话又体面连只苍蝇都舍不得打，结果刚长出胡子就都变坏了。”与阿尔卡蒂奥不同，他知道自己是庇拉尔·特尔内拉的儿子，她在家里支起一

张吊床供他午睡。两人是母子，却更像是孤独中的同伙。庇拉尔·特尔内拉已经无所期盼。她的微笑带上风琴那般的低音，她的乳房经过无数爱抚耷垂下来，她的小腹和大腿成为无可挽回的尤物生涯的牺牲品，但她的心在衰老中不觉苦涩。她肥胖，饶舌，散发出落难主妇的傲气，摒弃了纸牌营造的乏味幻梦，却在旁人的爱情中找到了慰藉。就在奥雷里亚诺·何塞午睡的屋子里，邻家的姑娘们带着露水情郎来幽会。“把房间借给我，庇拉尔。”他们就这么简单说一句，人已经在屋里。“没问题。”庇拉尔回答。如果还有旁人在场，她会这样解释：

“人家在床上快活，我也快活。”

她从未为此收钱。她从未拒绝帮忙，就像她从未拒绝不计其数的男人，而直到她盛年的尾声还有人找上门来。他们既没有付出钱财也没有献上爱情，连愉悦也不过奉上寥寥几次。她的五个女儿遗传了她火热的天性，少女时代就迷失在人生的歧路上。两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一个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部队里战死，另一个十四岁时在大泽区某村偷一篓母鸡受伤被抓。在某种意义上，奥雷里亚诺·何塞就是半个世纪以来金杯国王向她允诺的那个高大黝黑的男人，他也像所有纸牌召唤来的男人一样，走进她内心时已经死星照命。她在牌上看到了。

“今晚你别出门，”她对他说，“你在这儿睡，卡梅莉塔·蒙铁尔求了我不知多少次，让我把她带进你屋里。”

奥雷里亚诺·何塞没能理解这一恳求的深意。

“告诉她半夜等我。”他回答。

他去了剧院。一家西班牙剧团将上演《狐狸的匕首》，那实际上是索里利亚的戏，但阿基莱斯·里卡多上尉下令改了名字，因为自由派把保守派称作哥特人。[①]到入口验票的时候，奥雷里亚诺·何塞才发现阿基莱斯·里卡多带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搜查过往人流。“留神，上尉，”奥雷里亚诺·何塞提醒道，“敢对我动手动脚的人还没生出来呢。”上尉试图强行搜查，奥雷里亚诺·何塞因为没带武器，撒腿

便跑。士兵们没有听从开枪的命令。“他是布恩迪亚家的人。”一个士兵解释道。上尉气急败坏，一把抢过步枪，跨到街心，瞄准了目标。

“胆小鬼！”他喊了起来，“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本人才好呢。”

二十岁的处女卡梅莉塔·蒙铁尔，刚用橘花水沐浴完毕，正在庇拉尔·特尔内拉的床上撒迷迭香叶子，枪声就在这时响起。奥雷里亚诺·何塞本来注定要在她身上享受阿玛兰妲拒绝给予的幸福，生下七个儿女，最后老死在她怀里，然而一发步枪子弹被纸牌算命的失误导引，从他背后穿入在胸前开花。而阿基莱斯·里卡多上尉，本是这天夜晚注定要死的人，确实比奥雷里亚诺·何塞早死了四个小时。枪声刚响，他就被两发至今未明来源的子弹同时击中，人群的呐喊随即响彻夜空。

“自由党万岁！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万岁！”

十二点时，奥雷里亚诺·何塞血已流尽，卡梅莉塔·蒙铁尔发现纸牌指引的前途落了空。四百多人列队从剧院门口经过，用左轮手枪向阿基莱斯·里卡多上尉被遗弃的尸体开火。填满铅弹的尸体像泡了水的面包支离破碎，动用了一个小队推着独轮车才运走。

何塞·拉克尔·蒙卡达将军对政府军的过分举动深感恼火，他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重又穿上军装，掌握了马孔多的军政大权。但他并不指望凭自己息事宁人的态度改变已经无法挽回的事态。九月间传来各种消息，彼此矛盾。政府一再宣称仍掌握着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而自由党人接连收到内陆武装起义的秘密消息。在军事法庭缺席审判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并判处其死刑之后，政府才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任何部队一旦抓到他必须立即执行枪决。“这就是说，他回来了。”乌尔苏拉在蒙卡达将军面前喜形于色，但将军自己并没有得到这一消息。

实际上，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回国。人还未到，互相矛盾的传言就已传来，说他同一时间在相隔千里的不

同地方出现，因此蒙卡达将军起初并不相信他已归来，直到官方正式宣布他占领了沿海两州。“祝贺您，大姐，”蒙卡达将军对乌尔苏拉说，同时把电报拿给她看，“您很快就能见着他了。”乌尔苏拉从那时起担心起来。“那您怎么办，老弟？”她问道。这个问题，蒙卡达将军已经问过自己很多次。

“和他一样，大姐，”他回答，“尽我的职责。”

十月一日黎明时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率领装备精良的一千人进攻马孔多，守军接到命令要抵抗到底。到中午蒙卡达将军与乌尔苏拉一起吃饭的时候，起义军的一声炮击响彻全市，将市政府金库的大门炸为齑粉。“他们的装备不比我们差，”蒙卡达将军感叹道，“而且他们士气更高。”下午两点，大地在双方的炮声中颤抖。他向乌尔苏拉道别，确信自己在打一场无望的仗。

“我祈求上帝让您今晚不会在家里看到奥雷里亚诺，”他说，“如果真是那样，请代我拥抱他，因为我不会再见到他了。”

当晚，他试图逃离马孔多时被捕，临行前他还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写了一封长信，追缅当年想让战争更人道的共同理想，并祝愿他在对抗两党军人腐败和政客野心的战斗中获得最终胜利。次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和他在乌尔苏拉那儿共进午餐，他就被囚禁在那里等待革命军事法庭决定他的命运。这是一次家庭聚会。然而就在敌对双方忘却战事一起缅怀往昔的同时，乌尔苏拉心头却蒙上一层阴影，感觉自己的儿子才是外来的侵入者。她从看到他进门起就有这种感觉，那时一群喧嚣的军人护卫着他进来，搜遍各个房间确信没有危险才罢休。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仅允许他们这样做，还颁下严令不准任何人走进他周围三米以内，甚至连乌尔苏拉也不例外，与此同时他的卫队在房子附近忙着设置岗哨。他身穿寻常粗布军装，没佩任何军衔标志，带马刺的长靴上沾满泥土和干血迹。他腰间佩戴手枪，枪套未扣，手永远按在枪柄上，与眼神一样显出高度的警觉与果断。他的前额如今分外开阔，像是被文火烤过。他的脸庞

因加勒比海的盐分而皴裂，带着几分金属般的坚厉。他凭着某种活力胜过了迫近的衰老，只是这活力与内心的冷漠不无关联。他比离家时更高，更苍白嶙峋，开始表露不念旧情的迹象。“上帝啊，”乌尔苏拉心想，“他现在看起来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他的确成了这样的人。他带给阿玛兰妲的阿兹台克头巾，他在午饭时的怀旧，他口中的趣闻逸事，都不过是昔日性情的残余。将死尸掩埋到公墓里的命令刚被执行，他就指派罗格·卡尔尼塞罗上校去敦促建立军事法庭展开审判，他自己则担负起推行激进改革的艰巨任务，决心将江河日下的保守党政权摧毁殆尽。“我们要赶在党内政客前面。”他对自己的顾问说，“等他们睁眼面对现实的时候，看到的就是既成事实。”就在此时，他决定审查百年来的地契，便发现了他哥哥何塞·阿尔卡蒂奥强占土地又将其合法化的行径。他将那些文书一笔勾销。最后出于礼貌，他搁下手头的事务，抽出一个小时去见丽贝卡通知他的决定。

在屋内的阴影中，那位曾经见证他被压抑的爱情，并以自己的执拗救过他性命的孤零孀妇已变成往昔的幽灵。她遍体着黑直到指节，心如死灰，对战事几乎一无所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感觉她骨头的磷光从皮肤透出，感觉她在重重鬼火间行走，而凝滞的空气中还能隐隐闻到火药的味道。他开始劝说她节哀除丧，改善屋内通风，不要再为何塞·阿尔卡蒂奥的死迁怒整个世间。然而丽贝卡已经看破一切浮华。她曾经在泥土的味道中，在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芬芳的书信里，在丈夫如狂风暴雨的床榻上徒劳地寻寻觅觅，最终却在这个家中找到了安宁。在这里，记忆因思绪无情的力量化为实体，如同活人一般在幽闭的房间里游荡。她躺在藤摇椅里，望着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仿佛他才是一个往昔的幽灵。甚至听到何塞·阿尔卡蒂奥强夺的土地都将归还原主，她也不显丝毫激动。

“你想怎样就怎样吧，奥雷里亚诺。”她叹息道，“我一直认为，你是个无情的人，现在更确定了。”

审查地契的同时即决审判也在进行，由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负责，以枪决所有被革命军俘虏的政府军军官告终。最后受审的是何塞·拉克尔·蒙卡达将军。乌尔苏拉出面干预。“他是我们马孔多有史以来最好的长官。”她对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说，“他心肠有多好，待我们多亲切，就更不用我跟你说了，因为你比谁都清楚。”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满地盯着她。

“我不能越权执法，”他回答，“如果您有话要说，请到军事法庭上去说。”

乌尔苏拉不仅这样做了，而且叫上了所有生活在马孔多的革命军军官的母亲。这些建村元老都已年迈，其中不少人参加过当年翻越山脉的可怕远征，她们一个接一个颂扬何塞·拉克尔·蒙卡达将军的种种恩德。乌尔苏拉最后登场。她庄严的哀伤、她显赫的姓氏，以及她令人信服的慷慨陈词一度打破法庭的平静。“诸位把这场可怕的游戏玩得很认真，你们做得不错，因为你们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她对法庭成员说，“但是请别忘了，只要上帝还让我们活着，我们就还是母亲；不管你们有多么革命，只要没规矩，我们就有权脱了你们的裤子打一顿。”法官们退庭讨论，她那铿锵的话语仍在已变为军营的学校里回响。午夜时分，何塞·拉克尔·蒙卡达将军被判处死刑。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顾乌尔苏拉激烈的责骂，拒绝改判。快天亮的时候，他去牢房探望死囚。

“你记住，老兄，”他说，“不是我要枪毙你。是革命要枪毙你。”

看见他走进来，蒙卡达将军甚至没从床上起来。

“见鬼去吧，老兄。”他回答。

直到此刻，归来以后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才有机会与他真诚相对。上校惊讶于他的猝然衰老、他双手的颤抖、他等候死亡时多少出于惯性的逆来顺受，于是感到一阵对自己的深深蔑视，却将其误认为同情心萌发的表现。

“你比我更清楚，”他说，“所有的军事法庭都是闹剧。实际上你是在为别人的罪行受过，因为这次我们不惜代价要赢得胜利。换了是你，难道不会这样做？”

蒙卡达将军站起身来，用衬衫衣角擦拭玳瑁框眼镜的厚镜片。“也许吧，”他说，“不过我担心的不是你要枪毙我，因为说到底，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这就算是自然死亡了。”他把眼镜放在床上，又摘下怀表。“我担心的是，”他补充道，“你那么憎恨军人，跟他们斗了那么久，琢磨了他们那么久，最终却变得和他们一样。人世间没有任何理想值得以这样的沉沦作为代价。”他摘下结婚戒指和救难圣母徽章，与眼镜和怀表放在一处。

“这样一来，”他总结道，“你不仅会变成我们历史上最专制最残忍的独裁者，而且还得枪毙我的乌尔苏拉大姐来抚慰你的良心。”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为所动。蒙卡达将军将眼镜、徽章、怀表和戒指递给他，换了副口气。

“不过我让你来不是为了指责你，”他说，“我想拜托你把这些东西交给我妻子。”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东西收进兜里。

“她还在马纳乌雷吗？”

“还在马纳乌雷，”蒙卡达将军确认道，“还在教堂后面你送过信的同一幢房子里。”

“很乐意效劳，何塞·拉克尔。”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说。

当他走入蓝色的晨雾，脸庞像当年另一个清晨那般湿润，他才明白为什么要下令在院中行刑，而不是在墓地的墙前。行刑队在门前列开，向他致以对国家元首的敬礼。

“可以把他带来了。”他下了命令。

---

①此处剧目为西班牙剧作家何塞 · 索里利亚的《哥特人的匕首》。西班牙语中“索里利亚”（Zorrilla）字面上有“狐狸”的意思。

九

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第一个感觉到战争的虚无。身为马孔多的军政首领，他每星期两次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互通电报。起初，这种通话决定着一场血肉战争的进程，那清晰的局势让他们任何时刻都能确认所处位置并预见未来走向。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虽然从未与人推心置腹，即使对最亲近的朋友也不例外，但那时尚保持着亲切的口吻，能让线路另一端的人辨认出来。很多次他都延长谈话超出预计，扯开话题拉起家常来。然而随着战事吃紧战火绵延，他的形象渐渐黯淡，消逝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代表他声音的点横越来越遥远模糊，汇聚组合而成的词语逐渐失去意义。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只是倾听，心中却感惶惑，觉得仿佛在和另一个世界的陌生人通电。

“明白，奥雷里亚诺，”他总是按下发报键这样作结，“自由党万岁！”

他最终失去了与战争的一切关联。曾几何时一段真实的经历，一股青春年代不可抗拒的激情，如今对他而言已成为遥远的注脚：虚无而已。他在阿玛兰妲的缝纫间里找到了唯一的慰藉。他每天下午都去看她。他喜欢看着她的双手为细麻布上褶，美人儿蕾梅黛丝则在一旁摇着缝纫机的摇柄。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度过几个小时，享受彼此的陪伴。但当阿玛兰妲因他衷情不改而暗自欣喜的时候，他却猜不透她那无法捉摸的秘密思绪。刚听到他归来的消息，阿玛兰妲心中就无比焦灼。但当看见他混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卫队中进门，看见他被严酷的流亡生活折磨得脱了形，因岁月流逝和遭人遗忘而愈显衰老，因汗水和尘土而污秽不堪，左臂悬着绷带模样丑陋，甚至还闻到他散发出牲畜的气味，她险些因幻灭而晕倒。“上帝啊，”她想，“这可

不是我盼的那个人。”但第二天他再次登门时，已经剃须沐浴，髭髯散发出薰衣草的香气，臂上染血的绷带也不见了。他给她带来一本散发着珍珠光泽的精装祈祷书。

“男人真是奇怪，”她这样说，因为想不出别的话来，“反对教士打了一辈子仗，到头来还送人祈祷书。”

从那以后，即使是战事最激烈的时日，他仍然每天下午来看她。有很多次美人儿蕾梅黛丝不在，他就负责转动缝纫机的摇柄。阿玛兰妲面对这个男人表现出的恒心、忠诚和温顺不知所措—他虽然大权在握，但总是将所有武器留在客厅，寸铁不带地走进缝纫间。四年间他多次求爱，她总能找到办法拒绝却不伤害他，因为她虽然不再爱他，却也离不开他。美人儿蕾梅黛丝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且被认为智力发育迟缓，却为这痴情感动，自愿帮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说项。阿玛兰妲突然间发现，自己一手抚养成人的小女孩刚刚步入花季，就已出落成马孔多有史以来最美丽的女子。她感到当年对丽贝卡的那种仇怨在心中苏醒，于是祈求上帝不要让自己走上极端盼望她死去，同时将她赶出了缝纫间。就在这个时期，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开始厌倦战争。他对阿玛兰妲百般劝说，表露出深沉蕴藉的无限柔情，甚至不惜为她牺牲自己用锦绣年华换来的荣光，但却没能说服她。八月的一个下午，阿玛兰妲在彻底拒绝了这位坚毅的追求者后，再也无法忍受执拗性情的重压，锁在房间里为自己孤独到死的命运痛哭起来。

“你我都忘掉对方吧，”她对他说，“我们已经老得不适合谈这种事了。”

那天下午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收到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电报。那是一次例行公事的谈话，没有为胶着的战局带来任何突破。谈话即将结束时，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望着荒凉的街道、巴旦杏树上凝结的水珠，感觉自己在孤独中迷失了。

“奥雷里亚诺，”他悲伤地敲下发报键，“马孔多在下雨。”

线路上一阵长久的沉默。忽然，机器上跳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冷漠的电码。

“别犯傻了，赫里内勒多，”电码如是说道，“八月下雨很正常。”

两人时隔太久没有见面，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猝然间收到这样粗暴的回答，不由一阵茫然。两个月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回到马孔多，这茫然变作了惊愕。连乌尔苏拉都惊讶于他的改变。他回来时没有声张没带卫队，不顾天热裹着斗篷，和三个情人住在同一间屋里，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吊床上。他几乎不怎么看通报一般战况的电文。有一次，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向他请示如何从边境上的一处地方撤离，以免引发国际纠纷。

“别拿这种小事来烦我，”他下令道，“去问上帝吧。”

那或许是战局最紧张的时候。最初支持革命的自由派地主已经与保守派地主签订秘密协定，以阻挠地产审查。在流亡中借战争渔利的政客已经公开指责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激进行为，但即使是这样的群起反对也没能令他萦怀。他写下的五卷多诗歌再也没有读过，被遗忘在箱底。到晚上或午睡的时候，他会从自己的女人中叫一个上吊床，从她身上获得欢愉，随即沉沉睡去，不曾流露丝毫忧虑。这时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惶惑的心灵永远失去了平静。起初他陶醉于凯旋的荣光、不可思议的频频得胜，濒临显赫声名的深渊。他将马尔伯勒公爵置于座右，此人是教授他战争艺术的导师，以一身虎皮虎爪的华服让大人起敬、令小儿惊悚。正是那时他作出决定，任何人，包括乌尔苏拉在内，都不得靠近他身旁三米以内。他走到哪里都待在副官们用粉笔画出且只有他一人能进入的圆圈中心，从那里发出简短却不容置疑的命令，决定着世界的命运。他处决蒙卡达将军后第一次到马纳乌雷时，一刻也没延误，就去完成死于己手的受害者的遗愿。将军遗孀接过眼镜、徽章、怀表和戒指，却不允许他进门一步。

“请别进来，上校。”她对他说，“在您的战争里您说了算，但在我家里我说了算。”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没有显出丝毫不快，但在私人卫队将那位寡妇的家舍夷为平地化为灰烬之后，他的心才恢复平静。“留神你的心，奥雷里亚诺，”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对他说，“你正在活活腐烂。”那一时期，他召集起义军的主要将领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上各色人等群集，有理想主义者、野心家、冒险者、愤世嫉俗者，还有普通的罪犯。甚至一位前保守党官员也在其中，他贪污公款后托身于起义军以逃避法律制裁。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他们彼此间存在着巨大分歧，几乎要酿成一场内讧，就在这鱼龙混杂中一位居心叵测的强权人物脱颖而出—特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他是纯印第安人，出身山野，大字不识，却暗藏祸心，同时拥有救世主般的感召力，引得手下狂热地追随。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召集会议是为了统一起义军的指挥，以抵制政客的操纵。但特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抢在了他前面：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让最优秀的将领组成的联盟土崩瓦解，攫取了总指挥权。“这是一头狡诈的野兽，需要小心提防，”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对手下的军官们说，“对我们来说，这人比国防部长更危险。”这时，一位一向极其腼腆的年轻上尉小心翼翼地竖起食指。

“这很简单，上校，”他提议道，“得杀了他。”

令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吃惊的并不是这一建议的冷酷，而是竟有人一瞬间抢先一步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别指望我下这个命令。”他说。

他没下命令，的确没有。但十五天后特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遇伏，在乱刀下被剁成肉酱，大权落到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手中。就在他的权威被所有起义军将领承认的当天夜里，他猝然惊醒，叫喊着要毯子。一种内在的寒冷直入骨髓，即使烈日当空也让他不堪其苦，好几个月都难以安眠，到最后成了习惯。权力带来的陶醉消失于阵阵烦恼之中。他试图找到抵御寒意的方法，就下令枪毙了提议暗杀特奥菲洛·巴尔加斯将军的年轻上尉。他的命令总是在发布之前，

甚至早在他动念之前，就已被执行，而且总会执行得超出他事先所敢想望的范围。他大权独揽却在孤独中陷入迷途，开始失去方向。被占领市镇中人们的欢呼令他厌烦，因为他们也曾向他的敌人发出同样的欢呼。每到一处，他总能见到那些少年用和他一模一样的眼睛望着他，用和他一模一样的声音同他说话，向他致意时的警惕神色和他回应时的神色一般无二，并且都自称是他的儿子。他感觉自己被分裂，被重复，从未这般孤独。他确信手下的军官对自己撒谎。他对马尔伯勒公爵也产生了敌视。“最好的朋友，”那时他常这样说，“是刚死去的朋友。”他厌倦了战事无常，身陷这场永无休止的战争的恶性循环中总在原地打转，只不过一次比一次越发老迈，越发衰朽，越发不知道为何而战、如何而战、要战到何时。总有人待在粉笔圈外，手头拮据的人，儿子得了百日咳的人，因为受不了嘴里粪便一样的战争味道而想一睡不醒、但仍鼓足最后的气力报告的人：“一切正常，我的上校。”正常恰恰是这场无尽的战争最可怕的地方：什么都不曾发生。他深陷孤独，不再感知到预兆，他为了逃避必将陪伴他终生的寒意回到了马孔多，在最久远的回忆中寻求最后的慰藉。他如此懒怠，当听说党组织派来一个代表团商议如何打破战争的僵局时，也只是在吊床上翻了个身，甚至没有完全醒转。

“带他们去逛窑子。”他说。

来的是六位身着礼服头戴礼帽的律师，在十一月的烈日下以极大的坚忍耐着酷暑。乌尔苏拉把他们安顿在家里。白天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关在卧室里密谋，到了晚上就请来卫兵和手风琴乐队，自费去卡塔利诺的店里消遣。“别打扰他们，”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下令，“总之，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十二月初，期待已久的会谈开始，很多人事先预计将会极其漫长，实际上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在闷热的客厅里，覆着如裹尸布般白床单的自动钢琴透出几分鬼气，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就坐在钢琴旁，这回他周围没有副官用粉笔画的圆圈。他由自己的政治顾问们簇拥着坐在椅子上，裹在羊

毛毯里，安静地倾听使者们简要的建议。他们首先请求放弃审核地产以重新换取自由派地主的支持，其次请求放弃对抗教会势力来获取信众的拥护，最后请求放弃争取私生子与婚生子的同等权利以维护家庭完整。

“你们的意思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听罢微笑道，“我们只是为了权力而战。”

“这只是暂时的调整。”一位代表回答，“当下，最重要的是扩大战争的群众基础，然后再视情况而定。”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一位政治顾问迫不及待地插入谈话。

“这是自相矛盾的。”他说，“如果这些调整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保守党政府是正确的。如果靠这些调整就能扩大战争的群众基础，像你们说的那样，那就等于是说政府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总而言之，也就是说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和全国人民作对。”

他还想继续，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用一个手势打断了他。“不用浪费时间，博士。”他说，“重要的是，从今以后我们只为权力而战。”他仍微笑着，接过代表们递上的文件准备签字。

“既然是这样，”他总结道，“我们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他的手下面面相觑，迷惑不解。

“抱歉，上校，”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轻声说道，“这是背叛。”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半空停下蘸了墨水的笔，将全部威权都压到他身上。

“交出你的武器。”他命令道。

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站起来，把武器放在桌上。

“去军营报到，”奥雷里亚诺· 布恩迪亚上校下令道，“听候革命军事法庭发落。”

随即他签署了声明，交给使者，说道：

“先生们，拿好你们的文件。好好利用吧。”

两天后，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吊床高卧，对一切求情置若罔闻。行刑前夜，乌尔苏拉不顾禁止打扰的命令，到卧室去见他。她一身黑衣，带着罕见的肃穆神情，在会面的三分钟内一直保持站姿。“我知道你要枪毙赫里内勒多，”她庄严宣告，“我怎么做也拦不住。但是我告诉你：我以我父亲和我母亲的骨头发誓，以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名义在上帝面前发誓，我只要一看见他的尸体，不管你在哪儿都会立刻把你揪出来，亲手杀了你。”没等他回答，她转头就走了，最后又丢下一句话：

“就跟你出生时如果长着猪尾巴一样处理。”

那个漫无尽头的夜里，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追忆着在阿玛兰妲缝纫间里度过的那些一去不返的午后时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则苦苦挣扎了数小时，试图抓裂自己孤独的硬壳。自从那个遥远的午后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他唯一的快乐时光就是在金银器作坊里打造小金鱼的时刻。他被迫发动三十二场战争，打破与死亡之间的所有协定，并像猪一样在荣誉的猪圈里打滚，最后耽搁了将近四十年才发现纯真的可贵。

天亮的时候，离行刑还有一个小时，他来到牢房里，因整夜未眠备受煎熬而显得精疲力竭。“闹剧结束了，老兄，”他对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说，“我们离开这儿，不然蚊子就先把你枪毙了。”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无法掩饰对这一态度的蔑视。

“不，奥雷里亚诺，”他回答，“我宁可死也不愿意看到你变成一个屠夫。”

“不会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说，“穿上鞋，帮我结束这场狗屁战争。”

说这话的时候，他没有想到结束一场战争要比发动它艰难得多。他花了将近一年时间以血腥手段强迫政府同意对起义军有利的和平条

件，又用了一年时间说服自己党派的人接受这些条件。他甚至不惜运用超出想象的铁腕手段来镇压手下那些不肯出售胜利果实的军官的反叛，最终还是借助敌人的力量才令他们屈服。

他从未像那时一样骁勇善战。他终于能为自己的自由而战，而不再为抽象的概念，不再为政客见风使舵、翻云覆雨的口号而战，这样的信念令他激情满怀、斗志昂扬。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一如以往坚定忠诚，当初怎样为胜利而战，如今便怎样为失败而战。他曾责备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无谓的鲁莽。“别担心，”上校微笑着回答，“死亡远比想象的要难。”就他而言，的确如此。他坚信自己的大限早已注定，这信念赋予他一种神奇的免疫力和一定期限的永生，使他在枪林弹雨中毫发无伤，最终赢得一场比胜利更艰难、更血腥、代价更高昂的失败。

在将近二十年的沙场生涯中，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多次回家，但由于总是身处紧急状态，总有军队随员簇拥身旁，总有传奇光环笼罩四周—那光芒连乌尔苏拉也无法视而不见—最终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他最近一次回马孔多，是和三位情妇单住一处，只在家里出现过两三次，还是有空回来吃午饭的时候。美人儿蕾梅黛丝和战时出生的那对孪生子，几乎都不认识他。阿玛兰妲也无法将少年时代制作小金鱼的兄长，与这个用三米隔离线把自己和其他人隔开的传奇军人联系起来。然而当停战的日子临近，家人想到他会变成正常人回归家庭，长久沉睡的亲情便以前所未有的劲头复苏了。

“终于，”乌尔苏拉说，“我们家又有男人了。”

阿玛兰妲第一个怀疑家里人已经永远失去了他。停战前一星期，他没带卫队而只让两个赤脚的勤务兵走在前面，进家后把骡子上的鞍和收藏诗稿的箱子卸在长廊里，那是他当年帝王般行装仅存的部分。她看见他从缝纫间门口经过，便叫了一声。奥雷里亚诺· 布恩迪亚上校似乎一时想不起她是谁。

“我是阿玛兰姐呀。”她为他的归来感到欣喜，高兴地说，又向他举起缠着黑纱的手，“你看。”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微微一笑，一如那个遥远的清晨他被判死刑回到马孔多，第一次看见她缠着黑纱的时候。

“真可怕，”他说，“时间过得真快！”

政府军必须将房子保护起来。他在回来的一路上遭人唾骂，被指责加剧战事只为了卖上更好的价钱。他发烧畏寒，浑身颤抖，腋下又一次生满疖子。六个月前，乌尔苏拉听说了停战的消息，便打开他的婚房清扫一新，又在各个角落点起没药熏香，想着他这次回来应该会在蕾梅黛丝发霉的娃娃间安心养老。然而，最近两年他已耗尽对生命的全部眷恋，连安度晚年也已与他无缘。他从乌尔苏拉格外用心拾掇过的金银器作坊门口走过，甚至没发觉门上的锁眼里已插好钥匙。他对时光在家中侵蚀出的种种令人心碎的细微创痕毫无察觉，而任何一个还保有鲜活记忆的人，像他这样长久离家后归来都本该有触目惊心之感。壁上石灰墙皮剥落，角落里肮脏蛛网絮结，秋海棠落灰蒙尘，房梁上白蚁蛀痕纵横，门后青苔累累，然而乡愁的精巧陷阱徒然虚设，这一切都没能勾起他的忆旧伤怀。他在长廊里坐下，裹着毯子，连靴子也没换，仿佛只想等待雨停。整个下午，他都在观看落在秋海棠上的雨水。乌尔苏拉这才意识到，他不可能在家里待得长久。“如果不是战争，”她想，“那就是死亡把他带走。”这推测如此清晰可信，她当作是一种预兆。

当天晚饭席间，那个应该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第二的孩子用右手掰面包，左手喝汤，而他的孪生兄弟，应该是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用左手掰面包，右手喝汤。他们动作整齐划一，不像是面对面坐着的两兄弟，更像是照镜子的游戏。孪生兄弟自从意识到彼此的相像便发明出这一游戏，这次为了给他接风又特意上演。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毫无察觉。他完全心不在焉，甚至都没注意到美人儿蕾梅黛丝赤着身子走向卧室。只有乌尔苏拉敢于打断他的出神。

“如果你注定还要走，”她在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说，“至少要记住我们今晚的样子。”

这时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才意识到—却毫不意外—乌尔苏拉是唯一能够看透自己不幸的人。多年来，他第一次鼓起勇气正视她的脸庞。她皮肤皴裂，满口蛀牙，头发枯白，眼神惊慌。他唤起心中尚存的最久远的记忆，那个他曾预感滚烫的汤锅将从桌上掉落的下午，相比那时如今的她已是面目全非。一瞬间，他意识到半个多世纪的操持给她留下了种种创伤与疤痕，也证实了这些磨难并不能在自己心里激起分毫怜悯。于是他作出最后的努力，在心中寻找情感腐蚀殆尽的所在，却没能找到。曾几何时，他在自己的皮肤上嗅到乌尔苏拉的体味，至少还隐约感到羞赧，他也不止一次感到自己的思想受她干扰。然而这一切都已被战争抹去。就连蕾梅黛丝，他的妻子，此刻也不过是某个足可做他女儿的人的模糊形象。他在爱的荒漠中结识的无数女人，把他的血脉播撒在整个沿海地区，却不曾在他的情感中留下任何痕迹。她们大多摸黑进房，黎明前离去，次日给他留下的只是肉体的些许厌倦感。唯一经受了时间和战争考验的，只有孩提时代他对哥哥何塞·阿尔卡蒂奥的感情，但那却不是基于友爱，而是源于同谋。

“对不起，”他找借口推脱乌尔苏拉的请求，“这场战争把一切都毁了。”

此后的日子，他忙于毁去在世上留下的一切痕迹。他清理金银器作坊，只留下不带任何个人标记的用具；把自己的衣服送给勤务兵；怀着父亲当年埋葬刺死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的长矛时的忏悔心情，把武器埋在院子里。他只留下一把手枪，一发子弹。乌尔苏拉没有干涉他。她只是在他想要毁掉蕾梅黛丝的银版照片时，才上前劝阻。那照片保存在客厅里，由一盏长明灯照亮。“这张照片早就不属于你了，”她说，“这是留给全家的遗物。”到停战前夜，家里一件与他有关

联的物事都没剩下。他带上装诗稿的箱子来到面包房，遇上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正准备点炉子。

“用这个点火，”他对她说，递过第一卷发黄的纸张，“更好烧，都是很旧的东西。”

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一向寡言温顺，连对自己的儿子都从未拂逆，这时却觉得不能遵命行事。

“这是很重要的文件。”她说。

“哪儿的话，”上校说，“是自己写给自己的玩意儿。”

“那么，”她说，“您自己烧吧，上校。”

他不仅这样做了，还用小斧子把箱子劈了，将木片丢入火中。几个小时前，庇拉尔·特尔内拉来看他。多年未见，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惊讶于她已如此衰老，如此肥硕，同时纸牌算命术又如此精进。“当心嘴巴。”她告诉他。他不禁暗自思忖，她在他声誉如日中天的时候也这样说过，莫非那是对他命运的预见，只是惊人地提前了而已？不久，私人医生为他除去疖子的时候，他不经意地问起心脏的确切位置。医生用听诊器听罢，拿蘸了碘酒的棉团在他胸前画了个圈。

星期二停战日的清晨天气温和，细雨绵绵。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到五点就走进厨房，喝他惯常喝的不加糖的咖啡。“你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出生的，”乌尔苏拉对他说，“所有人都被你睁开的眼睛吓坏了。”他没有理会，因为他正专心倾听部队的集合声、军号声和打破黎明寂静的颁令声。尽管经过多年的军旅生涯，他对这些已是司空见惯，但这回却仍像年轻时面对一个女人的胴体一样感到双膝发软浑身震颤。他最终还是陷入了怀旧的罗网，隐约想着自己如果娶了她，或许会远离战争和荣耀，做一个无名的匠人、一头幸福的动物。这迟来的震颤并不在他的预料当中，给早饭添了几许苦涩。早上七点，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带着一群起义军军官来找他，发现他变得更加沉默、孤独、阴郁。乌尔苏拉想在他肩上披一条新毯子。“政府会怎么想呢，”她对他说，“人家还以为你是因为连买毯子的钱都没有才投

降的。”但他没有接下毯子。直走到门口，看见雨还在下，他才答应戴上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一顶旧毡帽。

“奥雷里亚诺，”这时乌尔苏拉对他说，“答应我，你如果在那边碰上难缠的事，就想想你母亲。”

他冲她淡淡一笑，伸直五指举起手来，一言不发走出门去，迎上一路的叫喊、谩骂和诅咒直到市镇出口。乌尔苏拉挂上门闩，决定有生之年不再摘下。“我们就在家里烂掉吧，”她想，“就在这没有男人的家里化成灰。绝不能让这个可耻的市镇看见我们流泪。”她整个上午找遍最隐秘的角落，却没能找到任何能拿来怀想儿子的物事。

仪式在距马孔多二十公里的一棵巨大木棉树的浓荫下举行，日后将围绕这棵树建起尼兰迪亚镇。负责接待政府与两党代表，以及起义军缴械代表团的是一群身着白衣、唧唧喳喳的见习修女，她们活像风雨中盘旋飞舞的受惊鸽子。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骑着一头泥迹斑斑的骡子到来。他没有刮胡子。既然已抵达一切希望的终点，丧失了全部荣光以及对荣光的怀念，比起梦想的破灭来倒是疖子的烦扰更令他痛苦。按照他的要求，现场没有音乐，没有爆竹，没有庆典钟声，没有欢呼喝彩，没有任何可能破坏停战悲凉气氛的程序。一位旅行摄影师为他拍了唯一一张本可能流传后世的照片，却被迫在显影前毁掉了底版。

仪式仅仅持续了签署文件所需的一段时间。各方代表在补丁重重的马戏团帐篷正中一张简陋的桌前就坐，忠心追随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到底的军官围在四周。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特使准备高声朗读降书，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表示反对。“我们不要在形式上浪费时间了。”他说，看也不看就要在文件上签字。这时他手下的一位军官打破了帐篷里令人昏昏欲睡的沉默。

“上校，”他说，“拜托您不要第一个签字。”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同意了。现场一片寂静，仿佛能从清晰可辨的笔尖落纸声中听出签的是谁的名字。文件在桌上整整转了一

圈，最前面的位置依然空着。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准备填上这一空白。

“上校，”他手下的另一位军官说，“现在挽回还来得及。”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为所动，在第一份文件上签了名。最后一份还没签完，一位起义军上校牵着骡子出现在帐篷门口，骡背上驮着两个箱子。来人非常年轻，却显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模样。他是马孔多地区革命军金库的保管人。他拽着饥肠辘辘的骡子艰难跋涉了六天，终于在停战协定签字的日子及时赶到。他万分谨慎地卸下箱子，打开，一块接一块共取出七十二块金砖摆在桌上。没人记得有这笔财富存在。最近一年的混乱中，中央指挥部四分五裂，革命沦为各部首领之间的血腥混战，再无任何职责可言。革命军的黄金被熔铸成砖锭，后来又裹上一层陶土，却落得无人监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这七十二块金砖列入上缴清单，不容多说当下就结束了仪式。瘦削的年轻人仍站在他面前，一双糖浆色的眸子肃然望着他的双眼。

“还有事吗？”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问道。年轻的上校从牙缝间挤出两个字。

“收据。”他回答。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亲笔写了张收据给他。随后他喝了杯见习修女分发的柠檬水，吃了块饼干，就退到事先备好供他休息的野战帐篷里。他脱下衬衣，坐在行军床边，于下午三点一刻拿起手枪朝胸前私人医生画圈的地方开了一枪。同一时刻在马孔多，乌尔苏拉见灶上的奶锅久烧不开，便掀开锅盖，发现里面满是蛆虫。

“他们杀了奥雷里亚诺！”她喊道。

她出于孤独时养成的习惯往院中望去，看见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雨中淋得浑身湿透，神情哀伤，比死的时候衰老许多。“他们背信弃义杀了他，”乌尔苏拉对此确信无疑，“没有人会好心为他合上眼睛。”到傍晚的时候，她透过泪水看见发光的橙色圆盘如闪电般急

速飞过天空，便相信这就是死亡的兆头。当她还在栗树下伏在丈夫膝上啜泣的时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已被人送回家来，他裹在结着血迹变得硬挺的毯子里，愤怒地圆睁双眼。

他没有生命危险。子弹的轨迹完美无缺，医生能够将一根浸过碘酒的丝带从他胸前塞进又从后背拉出。“这是我平生的杰作。”医生得意地对他说，“这个点是唯一一处子弹可以穿过而不伤及重要器官的地方。”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发现身边围满了慈悲的见习修女，正绝望地念诵圣诗祈求他的灵魂安息。于是他深深悔恨仅仅为了嘲弄庇拉尔·特尔内拉的预言，没有按当初的计划在腭部开枪。

“如果我现在还掌权，”他对医生说，“我就会不经审判直接枪毙你。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而是因为你让我成为笑柄。”

短短几个小时里，自杀未遂使他恢复了失去的荣誉。那些编造谣言说他出卖革命换来一间金砖砌墙的卧室的人，现在都将他的自杀举动誉为悲壮之举，视他为烈士大肆颂扬。后来当他拒绝了共和国总统颁发的勋章，连与他不共戴天的敌人也陆续来到家中，请求他推翻停战协定，发动新的战争。屋里堆满了赔情道歉的礼品。晚些时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才被旧日同袍的广泛支持所触动，并没有排除顺应众意的可能。不仅如此，有时他还显得很热衷想再发动一场战争，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觉得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理由。理由出现了：共和国总统表示，在特别委员会一一审查以及国会批准抚恤金申请之前，不会给自由派或保守派的老兵发放抚恤金。“这是在践踏协定。”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怒吼道，“他们会等邮件等到死。”他第一次从乌尔苏拉买来给他养伤的摇椅上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口述了一份措辞激烈的电文给共和国总统。在这份从未公开的电文中，他严词谴责这第一次罔顾尼兰迪亚协定的行径，威胁说养老抚恤金的问题如果不能在十五天内解决，他将再次发起战争，不死不休。他自觉态度磊落无私，还期望保守派的老兵支持。然而政府的唯一答复便是以保护为名加强了部署在他家门口的武装力量，并禁

止一切探访。相似的措施也应用到了其他需要监视的军事首领身上。这场行动雷厉风行，及时有效，到停战两个月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伤势痊愈时，当初极为坚决鼓动他起事的手下不是被杀便是被驱逐出境，或是死心塌地融入到政府机关中。

十二月，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出了房间，往长廊里只看了一眼便彻底打消了开战的念头。乌尔苏拉迸发出与年龄全然不符的活力，令家中焕然一新。“现在让他们瞧瞧我是什么人，”她看到自己的儿子没什么大碍便说，“这世上再也找不到比我们这个疯人院更漂亮更好客的人家。”她请人清扫和油漆房屋，更换家具，重整花园，播下新花种，大开门窗让夏日的明净阳光照进卧室。她宣布一次次累加的丧期结束，自己也脱下死气沉沉的旧衣，换上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新衫。自动钢琴再次奏响，为家里带来欢乐。听到钢琴声，阿玛兰妲想起了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想起了黄昏时分他佩戴的栀子花、他身上的薰衣草香气，她枯萎的内心深处萌生出经岁月淘洗后的纯净幽怨。一天下午整理客厅的时候，乌尔苏拉向看守住宅的士兵请求帮忙。年轻的警卫队队长批准了这一请求。渐渐地，乌尔苏拉不断委派他们新的任务。她请他们吃饭，送他们衣服和鞋子，教他们读写。当政府撤除监视时，有一个士兵还留下来，为家里服务了许多年。新年那天，年轻的警卫队队长受不了美人儿蕾梅黛丝的冷落而失去理智，天亮前在她窗前殉情而死。

十

多年以后，在临终的床榻上，奥雷里亚诺第二将会回想起那个阴雨绵绵的六月午后，他走进卧室去看自己的头生子。那孩子孱弱又爱哭，没有丝毫布恩迪亚家人的样子，但他未作多想便给他取好了名字。

“叫他何塞·阿尔卡蒂奥。”他说。

费尔南达·德尔·卡皮奥，他一年前娶来的美丽妻子，表示同意。但乌尔苏拉无法掩饰那隐隐的不祥预感。她从家族漫长历史上重复命名的传统中得出了在她看来无可争辩的结论：所有叫奥雷里亚诺的都性格孤僻，但头脑敏锐，富于洞察力；所有叫何塞·阿尔卡蒂奥的都性格冲动，富于事业心，但命中注定带有悲剧色彩。唯一无法归类的特例是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和奥雷里亚诺第二。他们在童年时如此相似又顽皮，连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也分不清。洗礼那天，阿玛兰妲给他们戴上写有各自名字的手环，穿上颜色不同并标有名字缩写的衣服。可开始上学的时候，他们决定互换衣服和手环，管自己叫对方的名字。梅尔乔·埃斯卡洛纳老师已经习惯管穿绿色衬衣的叫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因此当发现后者戴着奥雷里亚诺第二的手环，而另一个虽然穿着白色衬衣戴着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的手环，也自称奥雷里亚诺第二的时候，不禁大为光火。从那以后，再没有人能确定无误地分辨两人。他们渐渐长大，不再彼此酷似，但乌尔苏拉仍暗自寻思，他们会不会在玩复杂换名游戏的某一时刻混淆，从此永远对换了身份。直到青春期初始，他们仍是按同一节奏生活。他们同时醒来，同时想去浴室，同样感到身体不适，甚至做同样的梦。家人一向以为他们动作划一只是为了让人混淆，直到有一天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发现了真相：她给兄弟俩中的一个一杯柠檬水，他刚尝了

一口，另一个就抢先说里面没放糖。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想起来的确忘了放糖，随后把事情讲给乌尔苏拉听。“全都一个样，”她毫不惊奇，“天生的疯子。”随着时间流逝，事情都乱了套。在换名游戏中保留下奥雷里亚诺第二这名字的男孩变成和祖父一样的彪形大汉，而那个叫作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的却长得像上校一样瘦骨嶙峋，两人之间仅存的共同点就是家传的孤独气质。或许正是这种体魄、姓名与性格的交错，才使得乌尔苏拉怀疑他们从童年时起就互换了身份。

两人之间的差异在战争最酣时显露无遗，那时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请求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带他去看枪决犯人。尽管有乌尔苏拉反对，他的愿望还是得到了满足。但对奥雷里亚诺第二来说，光是去看行刑这念头就足以让他胆战心惊。他宁愿待在家里。十二岁那年，他问乌尔苏拉那个锁着的房间里有什么。“纸，”她回答，“是梅尔基亚德斯的书和他最后几年写的古怪东西。”这回答不但没令他满意，反而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反复恳求，并保证不破坏任何东西，最后乌尔苏拉给了他钥匙。自从梅尔基亚德斯的尸体被搬出之后，再没有人进过这个房间，门上的锁都已锈住。但当奥雷里亚诺第二打开窗子，一道光线施施然射入，仿佛是这房间的常客，天天造访从未间断，而且屋内没有丝毫灰尘或蛛网，一切整洁如经清扫，甚至比梅尔基亚德斯下葬那天还要干净几分。墨水瓶里没有干涸，金属材料上不见锈迹，连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烧煮水银的炉火也不曾熄灭。隔板上摆放着用一种色泽苍白、硬如纸板，仿佛鞣制人皮的材料做衬面的书籍，还有保存完好的手稿。虽然幽闭多年，房间里的空气却似乎比家中别处还要纯净。一切都如此整洁，几个星期后乌尔苏拉提着水桶拿着扫帚走进房间想要打扫的时候，竟发现无事可做。奥雷里亚诺第二沉浸在一本书里。这书缺了封面，哪儿都找不到书名，那孩子仍读得津津有味，诸如一个女人坐在桌旁用大头针专挑饭粒吃，一位渔夫向邻居借压渔网用的铅坠，后来作为报偿送的鱼腹中含有一颗钻石，此外还有能满足一切愿望的神灯的故事和飞毯的传奇。他惊

奇地询问乌尔苏拉这些可都是真的，她回答说是，多年前吉卜赛人就曾给马孔多带来神灯和飞毯。

“只不过，”她叹了口气，“世界一天不如一天，那些东西也不见了。”

看完这本很多故事因为缺页没有结束的书，奥雷里亚诺第二开始破译手稿，只是这项艰巨的任务不可能完成。手稿上的字迹仿佛晾在铁丝上的衣服，比起文字来更像是音符。一个炎热的中午，他正在钻研手稿，忽然感觉自己并非单独待在房间里。背对窗口的光线，梅尔基亚德斯坐在那里，手放在膝盖上。他还不到四十岁，穿着同一件不合时宜的坎肩，戴着同一顶鸦翼状礼帽，发间的油脂因炎热而融化，沿着苍白的鬓角流淌，与奥雷里亚诺和何塞·阿尔卡蒂奥孩童时所见一模一样。奥雷里亚诺第二立时认出了他，因为这份记忆代代相传，从祖父遗传到了他这里。

“你好。”奥雷里亚诺第二说。

“你好，年轻人。”梅尔基亚德斯说。

从那以后的好几年里，他们几乎每天下午都见面。梅尔基亚德斯为他讲起世上万事，想把古老的智慧传授给他，却不肯译出手稿。“不到一百年，就不该有人知道其中的含义。”他解释道。对于这些交谈，奥雷里亚诺第二终生持守秘密。有一次，他感觉自己的世界瞬时崩塌了，因为乌尔苏拉在梅尔基亚德斯出现时进了房间。但她看不见他。

“你在和谁说话？”她问。

“没和谁。”奥雷里亚诺第二回答。

“你曾祖父也是这样，”乌尔苏拉说，“他也老自言自语。”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实现了观看枪决的愿望。他毕生都将记得六个枪口同时冒出的青色焰光、回响于山间直至消失的枪声，以及死刑犯凄惨的微笑和迷茫的眼神。那人保持直立，鲜血浸透衬衫，从柱子上被解下到被塞进装满石灰的棺材一直微笑着。“他还活着，”他想，“他们要把他活埋。”这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此他便厌

恶军事演练和战争，这倒并不是因为行刑这件事本身，而是因为活埋死刑犯的做法。没人知道他从何时起开始到钟楼上敲钟，帮助“新手”的继任者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做弥撒，还负责喂养神甫住处院里的斗鸡。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得知后，严厉批评他竟去学习这些被自由派唾弃的行径。“问题是，”他回答，“我觉得我天生是保守派。”在他看来，这是命中注定。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大为光火，忙去告诉乌尔苏拉。

“这更好。”她表示赞成，“但愿他当个神甫，这样上帝就终于能进这个家门了。”

很快便听说，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在为他准备第一次领圣体仪式。他一边为斗鸡修剪颈羽，一边跟神甫学习教理问答。在他安置母鸡抱窝的时候，神甫用简明的例子为他解释上帝如何在创世第二日想到让鸡在蛋中孕育。从那时起神甫表现出老年谵语的最初症状，数年后甚至妄言或许魔鬼已在对上帝的反叛中获胜，如今是它坐在天国的宝座上，隐藏自己的身份来引人受骗上当。经过导师的大胆锤炼，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掌握了足以迷惑魔鬼的神学诀窍，不亚于他在斗鸡方面的百般花招。阿玛兰妲给他做了身亚麻正装，配上硬领和领带，又给他买了一双雪白的鞋子，还用金字把他的姓名印在大蜡烛的丝带上。领圣体前两天，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把两人关在圣器室里听他告解，手捧一本罪孽大全作为参照。那份罪孽清单那么长，神甫上了年纪，平时又习惯六点就寝，终于没等结束就在扶手椅上睡了过去。这场问讯令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眼界大开。神甫问他有没有和女人做坏事，他并不吃惊，当下如实回答没有，但被问到有没有和动物做过的时候，他不禁一阵惶然。五月第一个星期五，他在好奇心的煎熬中领了圣体。后来他去向佩特洛尼奥请教，这个疾病缠身的圣器保管人住在钟楼上，据说以蝙蝠为食，他这样回答：“是有些堕落的基督徒和母驴干那种事。”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仍很好奇，缠着问个不停，佩特洛尼奥终于失去了耐心。

“我每星期二晚上去，”他透露了秘密，“如果你保证谁也不告诉，下星期二我就带你去。”

到了星期二，佩特洛尼奥果然拎着一张此前无人知晓其用途的小木凳，下了钟楼，带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走进附近的一处菜园。男孩迷上了这样的夜间出游，很长一段时间后卡塔利诺的店里也出现了他的身影。他一心扑在斗鸡上。“把你的这些畜生拿到别处去，”乌尔苏拉第一次看见他带着漂亮的斗鸡回来，便下了命令，“斗鸡让这个家受的苦已经够多了，你现在还给我们往回带。”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没有争辩就照办了，带到他祖母庇拉尔·特尔内拉那里继续养，后者只要他肯来，愿意提供他所需的一切。很快他在斗鸡上显露出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传授的智慧，挣的钱不仅够他扩大养殖，也可以满足他作为男人的需要。那时候乌尔苏拉拿他与他兄弟相比，难以理解童年时相似如一个人的兄弟俩最后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迥异。她无须困惑太久，因为奥雷里亚诺第二也开始表现出懒散放荡的倾向。关在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里时，他是个孤僻内向的人，就像年轻时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一样。但就在尼兰迪亚协定签订前不久，一桩偶然事件令他走出自己的天地，回到现实世界。他遇上一个让人买彩票赢手风琴的年轻女人，她非常亲热地和他打招呼。奥雷里亚诺第二没有感到惊讶，因为常有人将他错认作他的兄弟。那女人哭闹着想让他心软，最终把他领进了自己的房间，他却一直没有纠正这个错误。这次邂逅之后，她对他爱恋有加，甚至在彩票上做手脚让他赢得了手风琴。两个星期后，奥雷里亚诺第二意识到女人在轮换着与他们兄弟俩睡觉且满心以为是同一个人，他却没有挑明事实，反而想方设法继续下去。他再没有回到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下午他待在院子里，凭着听来的印象自学手风琴。乌尔苏拉对此提出反对，因为当时正值丧期，何况她也鄙视手风琴，把它看作是好汉弗朗西斯科的徒子徒孙那路流浪汉才用的乐器。但奥雷里亚诺第二未加理会，终于成为一名手

风琴高手，他直到结婚生子，跻身马孔多最受尊敬的人物之列，依然保持着这一爱好。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和他兄弟共享一个女人。他监视他的行踪，打乱他的安排，一经确认他当晚不会去找他们共同的情人，就去和她睡觉。一天早晨，他发现自己得病了。两天后，他撞见他兄弟抱着浴室的柱子，浑身大汗，痛哭流涕，便立刻明白了缘故。他兄弟向他坦承，自己使那女人染上了被她称作花柳病的恶疾，被赶了出来。他还说庇拉尔·特尔内拉曾设法给他医治。奥雷里亚诺第二暗中用滚热的高锰酸洗液擦洗，服用利尿剂。暗暗忍耐三个月的折磨后，两人分别痊愈。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再没找过这个女人。奥雷里亚诺第二获得了她的原谅，和她一起生活到死。

她叫佩特拉·科特斯。她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和一个卖彩票的露水情人一起来到马孔多，那男人死后她便接过这桩生意。她是个年轻整洁的黑白混血女人，一双黄色的杏眼使她的脸庞带上几分美洲豹般的凶悍，但她却有着慷慨的心灵和绝妙的情爱天赋。当乌尔苏拉终于知道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成了斗鸡人，而奥雷里亚诺第二则忙于为自己情人喧闹的聚会拉手风琴时，她觉得自己混乱得要发疯。这两人身上好像都集中了家族的缺点，却没有继承任何美德。于是她决定谁也不能再叫奥雷里亚诺和何塞·阿尔卡蒂奥这两个名字。但当奥雷里亚诺第二的头生子出生时，她却没敢违抗他的意愿。

“好吧，”乌尔苏拉说，“但有个条件，孩子由我来养。”

尽管她已年逾百岁，患白内障几近失明，却仍然活力不减，性格不变，头脑清醒。没有人比她更适合培养一位品德高尚的人才来重振家声，他将远离战争、斗鸡、放荡女人和疯狂举动，这四样灾难在乌尔苏拉看来正是造成家族衰落的罪魁祸首。“他将成为神甫。”她神情庄重地许诺，“如果上帝让我活得够长，我一定能看见他当上教皇。”所有人，不仅卧室里的，还有整幢房子里聚集的奥雷里亚诺第二的狐朋狗友，听了都忍俊不禁。战争成为糟糕的记忆已被人遗忘，但

此时一瓶瓶香槟的瓶塞轰然迸脱，倒像是瞬间回到了枪炮隆隆的日子。

“为教皇的健康干杯。”奥雷里亚诺第二打趣道。

客人们齐声响应。随后，主人拉起手风琴，爆竹噼啪燃响，市镇上敲起欢快的鼓声。清晨，淋透香槟的客人宰掉六头牛拿到街上任人随取。没人对此大惊小怪。自从奥雷里亚诺第二主持家务以来，这类聚会成了家常便饭，尽管通常并没有庆祝一位教皇的诞生这样名正言顺的借口。短短几年间，他不靠努力，全凭运气，因所饲养牲畜的神奇繁殖力挣下了在大泽区数一数二的巨大财富。他的母马一胎生三驹，他的母鸡一天下两次蛋，他的猪飞速长膘。没人能解释这种荒唐的繁殖力，只能归结为魔法。“你现在得省着点儿，”乌尔苏拉对她那毫无长远打算的曾孙说道，“这种运气不可能一辈子跟着你。”但奥雷里亚诺第二未加理会。他越是大开香槟供朋友畅饮，他的牲畜就越发疯狂地繁衍，而他也就越发确信好运与自己的行为无关，而是来自于佩特拉·科特斯，他的情妇，她的爱具有催化自然的能力。他认定这就是财富的源头，坚信不疑，因此从未让佩特拉·科特斯远离自己的牲畜，即使结婚生子后仍征得费尔南达的同意和她生活在一起。奥雷里亚诺第二和祖辈一样身材壮硕，但却有着享乐的活力和令人无法抗拒的亲切感，这是前人身上所没有的。他几乎没时间去照管畜群。他只需带上佩特拉·科特斯去养殖场，和她一起骑马在自己的土地上绕一圈，就足以令所有带着自己标记的牲畜无可救药地染上多产症。

就像他漫长一生中所有的好事一样，这笔巨大的财富也是出于偶然。直到战争末期，佩特拉·科特斯还在靠卖彩票糊口，奥雷里亚诺第二则不时洗劫乌尔苏拉的储钱罐来过活。他们成了轻浮的一对，只知道夜夜睡在一起，即使在禁止寻欢的日子也不例外，在床上嬉闹直到天明。“这女人非毁了你不可，”乌尔苏拉看着曾孙梦游般走进家门，朝他大喊起来，“她把你变傻了，过不了两天你肚子里就会生只癞蛤蟆，疼得直不起腰。”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过了很久才发现他冒名

顶替自己，很难理解兄弟的痴狂。在他的印象中，佩特拉·科特斯是个很平常的女人，在床上甚至有些慵懒，完全不具备勾人情愫的魅力。对乌尔苏拉的呼号和兄弟的嘲弄，奥雷里亚诺第二一概充耳不闻，他那时只想着找个营生养活佩特拉·科特斯，在某个狂欢之夜与她死在一起，死在她身上，死在她身下。当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终于抵不住安享晚年的诱惑，重开作坊，奥雷里亚诺第二觉得制作小金鱼是桩不错的生意。他在那间酷热的小屋里待了很久，看着上校在大彻大悟后生发出难以想象的耐心，让坚硬的金属片在手中渐渐变成金色的鱼鳞。他觉得这活计太过费力，而他又无时无刻不思念着佩特拉·科特斯，因此三个星期后便彻底从作坊消失了。正是在那段时间，佩特拉·科特斯忽然想到卖彩票抽兔子的主意。她的兔子不断繁殖生长，速度之快甚至没等彩票卖完就已发育成熟。开始的时候，这种惊人的繁衍并没有引起奥雷里亚诺第二的注意，直到后来市镇上的人都厌烦了兔子彩票，一天晚上他听到隔着院墙传来阵阵喧闹声。“别担心，”佩特拉·科特斯说，“是兔子。”两人再没睡着，被兔子的忙碌声吵了一夜。天亮时，奥雷里亚诺第二打开房门，看见院里满是兔子，在晨光中一片青蓝。佩特拉·科特斯笑弯了腰，忍不住跟他开个玩笑。

“这些都是昨晚生的。”她说。

“太可怕了！”他说，“你干吗不试试养牛？”

几天后，为了在院子里腾出地方，佩特拉·科特斯用兔子换了一头奶牛。两个月后这奶牛就生了三胞胎。事情便是这样开始的。一夜之间，奥雷里亚诺第二拥有了土地和畜群，几乎来不及扩建拥挤的畜栏和猪圈。这种匪夷所思的兴旺令他自己都觉得好笑，他只好选择荒唐的方式来抒发大好心情。“让一让，母牛们，生命短暂啊。”他喊叫道。乌尔苏拉纳闷他究竟在搞什么鬼，想着牲畜会不会是偷来的，他是不是变成了偷牛贼。每次看到他打开香槟仅仅是为了往头上喷泡沫寻找乐趣，她都要大声斥责他挥霍浪费。他对此十分厌烦，一天清早

心血来潮，拿起一箱钞票、一罐糨糊和一把刷子，哼着好汉弗朗西斯科的老歌把家中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贴满了一比索的纸币。从自动钢琴运抵时就漆成白色的老宅，现在变得像清真寺一样。家人乱作一团，乌尔苏拉大惊失色，市镇上的人都挤在街上观看这挥霍豪举，这时奥雷里亚诺第二已经从立面到厨房全部裱糊完毕，连浴室和卧室都没放过，最后把剩下的钞票抛到了院子里。

“好了，”他最后宣告，“我希望在这个家里再没有人跟我提钱的事。”

的确如此。乌尔苏拉命人把钞票揭下来，连带着还揭下大片大片的石灰墙皮，又重新把房子刷白。“上帝啊，”她恳求道，“让我们和当初建村时一样穷吧，免得下辈子你为这样的浪费惩罚我们。”她的祈求得蒙垂听，但结果却与她期待的相反。一个揭钞票的工人不小心碰倒了一尊战争末期别人寄存在家里的圣约瑟石膏雕像，那空心雕像跌在地上摔碎了。里面满是金币。没人记得是谁送来这尊真人大小的雕像。“是三个人带来的，”阿玛兰妲解释道，“请我们保存到雨季过去，我对他们说就放在这儿，谁也不会碰到。他们就非常小心地把它放在这儿，一直搁到现在，再也没人回来要过。”最近一段时间，乌尔苏拉在雕像前点上蜡烛，跪地膜拜，从未想过她所敬拜的不是一尊圣徒像，而是将近两百公斤的黄金。想到自己无意中犯下异教行径却迟迟不自知，她更加痛苦。她朝着壮观的金币小山啐了一口，把它们装进三个帆布袋，埋在一处秘密的地方，等待那三个陌生人早晚来讨要。很久以后，她已进入行动不便的暮年，还常常加入许多流连于家中的旅人的谈话，询问他们有没有在战争期间寄存过一尊圣约瑟石膏雕像，等雨季过后来取。

这种事情给乌尔苏拉带来巨大烦扰，在那段时间却时常发生。马孔多沉浸在一派奇迹般的繁荣景象中。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已经被配有木制百叶窗和水泥地面的砖石建筑所替代，后者更有利于散去午后两点令人窒息的酷热。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时代的旧村庄

唯一的残留，就是那些覆满灰尘的巴旦杏树，它们忍耐得了最恶劣的环境，而清澈见底的河里那些史前巨石都被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疯狂的长柄锤砸成了粉末，为的是清理河道开发航路。这是一个疯狂的梦想，不比当初他曾祖父的诸多狂想逊色，因为布满石块的河床和险阻重重的湍流使马孔多无法通航到海。但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出人预料地心血来潮，顽固地要实施这一计划。到那时为止，他还从未表现出什么想象力。除了与佩特拉·科特斯的露水情缘，他并没有别的女人。乌尔苏拉认为他是整个家族史上最没出息的子孙，觉得他一无可取，甚至在斗鸡场上也没出多少风头。就在这时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给他讲起离大海十二公里处搁浅的西班牙大帆船，上校战时曾亲眼见过它烧焦的龙骨。这一说法在很长时间里被很多人视为荒诞不经的神话，可在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听来却不啻一个启示。他拍卖了所有的斗鸡，然后招募人手，购买工具，展开一系列砸碎石块、挖掘河道、铲除暗礁甚至填平瀑布的宏伟工程。“这些我太熟悉了。”乌尔苏拉喊道，“时间好像倒转了，我们又回到了从前。”预计河道可以通航的时候，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向兄弟详细讲述了自己的计划，奥雷里亚诺第二为他提供了所缺的资金。此后，他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当人们已经在议论他买船的计划不过是卷走兄弟钱财的骗局时，却有消息传来说一艘奇怪的船正向市镇驶来。已经淡忘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当年丰功伟业的马孔多居民，争先恐后地奔向河滨，难以置信地看着第一艘也是最后一艘造访该市的船。那不过是一条树干扎成的木筏，靠着岸上的二十个男人用粗索牵引前行。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站立船头，眼里闪着志得意满的神色，正在指挥这项艰巨的作业。和他一起到来的是一群风情万种的女郎，她们撑起鲜艳的阳伞抵御灼热的日光，肩上是精美的丝绸披巾，脸上是彩色的脂粉，发间插着鲜花，臂上佩着金蛇，齿间镶着钻石。这条用树干扎成的木筏是唯一能让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航行到马孔多的船只，也仅此一次，然而他却从未承认失败，反而将自己的成就当成一次意志

的胜利。他将记录得一丝不苟的账目交给兄弟，很快又回到与斗鸡相伴的生活中。这场不走运的冒险的唯一遗泽，就是来自法国的女郎们带来的新潮流。她们的精湛技艺令传统的风月套路彻底改观，她们在社会福利方面的贡献将过气的卡塔利诺店远远抛在后面，使整条街变成一座市场，其间日式灯笼灯影摇曳，手摇风琴琴声忧伤。正是她们发起了那场血腥狂欢节，使马孔多陷入三日的疯狂，唯一长久的成果就是奥雷里亚诺第二获得了认识费尔南达·德尔·卡皮奥的机会。

美人儿蕾梅黛丝被选为狂欢节女王。乌尔苏拉为曾孙女惊心动魄的美貌感到恐惧，却无法阻止她当选。此前，乌尔苏拉禁止她出门，除非是和阿玛兰妲一起去望弥撒，但是也要她用一块黑色头巾蒙住脸庞。那些并不虔敬的男人，那些在卡塔利诺店里化装成神甫主持渎神弥撒的男人，都涌向教堂，只为一窥美人儿蕾梅黛丝的脸庞，哪怕看上一眼也好。她的美貌传说伴着人们惊人的狂热在整个大泽区流传。他们等了很久才如愿以偿，事实上等不到那机会才是真正的幸运，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终生再也无法安眠。让她露出面容的男人，那个外来者，尊严尽失，陷入自轻自贱的泥潭，数年后睡在枕木上被一辆夜行列车轧死。从他身着绿色丝绒上装和绣花马甲出现在教堂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人怀疑他必定是受美人儿蕾梅黛丝的魔力所吸引，从远方而来，或许是从域外某个遥远的城市而来。他如此英俊，如此优雅沉静，如此风度翩翩，和他比起来皮埃特罗·克雷斯皮不过是个充大人的毛头小子。不少女人笑容中含着不满，嘟囔说他才配得上黑纱蒙面。他在马孔多不曾与任何人交谈。星期天清晨他如同神话中的王子一般现身，骑着配有银马镫和天鹅绒鞍褥的骏马，弥撒结束后便离开市镇。

他的风采如此摄人心魄，以至于第一次在教堂里看见他，所有人都认定美人儿蕾梅黛丝与他之间已然存在一桩秘密约定，一场紧张的无声对决，一次势不可免的争霸，不仅会以爱情告终，还要加上死亡方能了结。到了第六个星期天，这位绅士现身时手中拿着一枝黄玫

瑰。他和往常一样站着望弥撒，弥撒结束时拦住了美人儿蕾梅黛丝的去路，献上那枝孤独的玫瑰。她再自然不过地接过去，仿佛对这一馈赠早有准备，并在一瞬间掀开头巾，嫣然一笑表示感谢。仅此而已。然而对于那位绅士，对于所有不幸一睹风采的男人来说，那一刻便是永恒。

从那时起，那位绅士夜夜带着乐队在美人儿蕾梅黛丝窗前流连，有时候直待到黎明时分。奥雷里亚诺第二是唯一对他产生真切同情的人，曾试图打破他执著的幻想。“别浪费时间了，”一天晚上他劝道，“这家里的女人比骡子还糟糕。”他伸出友谊之手，邀请他畅饮香槟，试图使他明白自己家里的女人个个铁石心肠，但却没能稍减他的决心。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受够了夜夜无休无止的乐声，威胁要用手枪子弹来治疗他的相思病。但真正令他放弃努力的是他自己可悲的绝望。曾经衣着考究、毫无瑕疵的人物沦为衣衫褴褛、龌龊卑下的渣滓。有传言说他抛下了在远方国度的权势与财富，但实际上没人知道他从何处来。他整日惹是生非，在酒馆寻衅滋事，在卡塔利诺的店里待到天亮，滚在自己的排泄物里。他的最大悲剧在于，美人儿蕾梅黛丝从未注意过他，即使在他如王子般盛装出现于教堂时也不例外。她接受那枝黄玫瑰并没有任何恶意，只不过觉得他的夸张表现有趣；她掀开头巾也是为了看清他的脸，而非有意展示自己的容颜。

事实上，美人儿蕾梅黛丝不属于这个世界。进入青春期后很久，她还要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为她洗澡穿衣；等到她生活能够自理的时候，仍得有人留神她，防止她用自己的一撅儿粪便在墙上画小动物。她到了二十岁还没有学会读写，不会使用餐具，赤着身子在家里走来走去，因为她天生拒斥一切常规。当年轻的警卫队队长向她表白爱意时，她被这冒失的举动吓了一跳，当下拒绝了。“你看他好傻，”她对阿玛兰妲说，“他说他因为我难受得要死，好像我是绞肠痧似的。”当那年轻人果真死在她的窗下，美人儿蕾梅黛丝便证实了自己最初的印象。

“你们看，”她评论道，“他就是太傻了。”

她仿佛拥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能够透过一切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至少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美人儿蕾梅黛丝根本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弱智，恰恰相反。“她就好像是打了二十年仗回来的人。”他常这样说。至于乌尔苏拉，她常常感谢上帝赐予这家里一个纯洁无瑕的灵魂，但同时也为其美貌而惶惶不安。她觉得那是与美德相冲突的优点，是隐藏在纯真之中的邪恶圈套。为此乌尔苏拉决定让她远离尘世，避开凡间一切引诱，殊不知她早在母亲腹中就注定永不受玷染。她从未想过在一场群魔乱舞的狂欢节上成为选美女王。然而一心想化装成老虎的奥雷里亚诺第二把神甫安东尼奥·伊莎贝尔请到家中，说服乌尔苏拉相信狂欢节并非像她认为的那样是异教节日，其实出自天主教传统。最终她被说服，勉强同意了举行女王加冕礼。

蕾梅黛丝·布恩迪亚将成为狂欢节女王的消息在短短几个小时内飞越大泽区的边界，传至遥远到从未听说过她超凡美貌的地方，引发了一些人的担忧。在他们眼中，这一姓氏仍与反叛作乱联系在一起。这种担忧是毫无根据的。如果那个时期还有谁能做到与世无争，那便是日渐衰老、归于平凡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他渐渐失去了与家国现世的一切联系。他待在作坊里足不出户，小金鱼生意是联结他与外界的唯一纽带。停战初期被派来监视他家的士兵中有一个负责将成品拿到大泽区的村镇去贩卖，又带着金币和最近的消息回来。他说保守党政府获得了自由党人的支持，正在修改历书使每任总统可以在任一百年。他说政府终于与教廷达成协定，还有一位红衣主教从罗马被派来，头戴钻石冠冕，端坐在实心的黄金宝座上，而自由党的部长们都跪下来亲吻他的戒指并摄影存照。他说一家西班牙剧团经过首都时，女主唱在化妆室里被一群戴面具的人绑架，到了星期天却出现在共和国总统的消夏别墅里跳裸体舞。“别跟我谈政治，”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对他说，“咱们只管卖小金鱼。”坊间有流言说他对国

家现状不闻不问是因为靠着作坊发了财，但传到乌尔苏拉耳中时只引发了她的讥笑。从她纯粹的实用主义观念出发，她实在难以理解上校的生意意义何在：用小金鱼换来金币，随即把金币变成小金鱼，如此反复，卖得越多活计越辛苦，却只是为了维持一种不断加剧的恶性循环。实际上上校在乎的不是生意，而是干活本身。他必须全神贯注地投入，嵌上片片鱼鳞，用红宝石微粒镶鱼眼，锤出鱼鳃，添上尾鳍，再没有余暇为战后的失落而烦恼。这门精密的手艺极其耗费心神，令他在短短时间内比在整个战争年代衰老得更甚。不变的坐姿令他脊柱变形，精确到毫米的工艺使他视力受损，但不容丝毫分心的专注让他获得了心灵的平静。一群来自两个党派的老兵寻求他的支持，希望解决养老抚恤金的问题，因为政府一直许诺却从未落实，那是他最后一次涉入与战争相关的事务。“忘了这回事吧，”他劝道，“你们看我早就放弃了养老金，免得傻等到死受罪。”开始的时候，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每到傍晚都来拜访，两人坐在大门口追忆过往。但阿玛兰妲无法忍受这个疲累的男人勾起自己的回忆，他的秃顶正将他引向未老先衰的深渊。于是她无理地令他处处难堪，终于他只在特殊情况下才登门，最后因瘫痪而彻底消失。沉默寡言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对家中重新焕发的活力视若无睹，约略懂得幸福晚年的秘诀不过是与孤独签下不失尊严的协定罢了。每天浅睡一觉后五点起床，照例到厨房喝上一杯不加糖的咖啡，然后一整天关在作坊里，到下午四点才拖着一张矮凳走过长廊，如火如荼的玫瑰、明媚耀眼的暮色、阿玛兰妲的漠然—每到黄昏时分她的忧郁就发出开锅般清晰可闻的声响—都无法吸引他的注意。他在临街的门口坐下，直到蚊虫开始肆虐才回到家中。一次，有人鼓起勇气打扰了他的独处。

“您近来可好，上校？”那人走过时问道。

“就在这儿待着，”他回答，“等着给我下葬。”

由此可见，因美人儿蕾梅黛丝被封为女王，他的姓氏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而引发的担忧实际上缺乏事实根据。然而很多人并不这样

想。市镇上的人们对迫近的悲剧一无所知，广场上人声鼎沸，一派欢天喜地的热闹景象。狂欢节达到疯狂的最高潮，奥雷里亚诺第二实现了扮成老虎的愿望，快乐地在狂热的人群中奔跑，因长久吼叫而嗓音嘶哑。就在此时，通往大泽区的路上出现了一队庞大的化装人群，他们抬着一座金光耀眼的花台，上面是一位人们所能想象出的最迷人的女子。一时间，马孔多本来心境平和的居民都摘下面具好看清这位神奇的美人，她头戴翡翠王冠，身披白鼬皮斗篷，俨然拥有货真价实的权柄，而不仅是闪光的缀片和皱纹纸打扮起来的女王。不乏目光敏锐的人觉察到这是一种挑衅行为。但奥雷里亚诺第二马上摆脱了困惑，宣布将新来者视作贵宾，并很聪明地让美人儿蕾梅黛丝和外来的女王在同一高台上就座。直到午夜时分，那些化装成贝都因人的外来者仍在热闹狂欢，并用绚丽的烟火和精彩的杂耍助兴，让人想起当年吉卜赛人的本领。突然间，就在节日的最高潮，有人打破了这微妙的平衡。

“自由党万岁！”他喊道，“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万岁！”

步枪倾泻的弹雨压倒了烟火的光彩，惊恐的喊叫盖过了乐声，欢乐被恐慌所取代。多年以后，人们仍确信外来女王的亲卫队实际上是一个中队的政府军，每人的外袍下都暗藏着军用枪械。政府在一份特别通告中否认了这一指控，并许诺将彻底清查这场血案。然而真相从未澄清，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女王卫队在未受到任何挑衅的情况下，根据指挥官的暗示进入战斗状态，毫无怜悯地向人群开火。当一切恢复平静，那些假贝都因人都不见了。广场上有死有伤，倒下了九个小丑、四个科隆比纳[①]、十七个纸牌大王、一个魔鬼、三个音乐家、两个法国贵族和三个日本皇后。在惊惶困惑中，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救出了美人儿蕾梅黛丝，而奥雷里亚诺第二把外来女王抱在怀里带回了家，她的衣服被撕扯成碎片，白鼬皮斗篷上满是血迹。她名叫费尔南达·德尔·卡皮奥。她在全国最美丽的五千名女性中力拔头筹，他们领她到马孔多来，答应封她为马达加斯加女王。乌尔苏拉把她当作

女儿对待。人们不但没有质疑她的无辜，反而都同情她的天真。屠杀发生六个月后，当伤者都已痊愈，公墓上最后的花朵全部凋落的时候，奥雷里亚诺第二远赴她和父亲生活的城市找她。后来在马孔多与她成婚，喧闹的欢庆活动持续了二十天。

---

①科隆比纳（Colombina，亦作 Columbine），起源于意大利喜剧的固定角色，多以活泼伶俐的年轻女仆形象出现。

十一

婚姻险些在第二个月破裂，原因在于奥雷里亚诺第二为了向佩特拉·科特斯赔礼，给她拍了一张身着马达加斯加女王盛装的照片。费尔南达知道后收拾起嫁妆箱笼，不辞而别离开了马孔多。奥雷里亚诺第二在去往大泽区的路上追上了她。他苦苦劝说并一再表示要痛改前非，终于将她接回家去。从此，他与情人断绝了来往。

佩特拉·科特斯了解自己的能耐，并没流露出忧愁的迹象。是她令他成为男人。当初她把他从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里引出来时，他还是个孩子，一脑袋荒唐的念头，对现实一无所知，是她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位置。他天生内向，落落寡合，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是她赋予他截然相反的性格：充满活力，豪爽开朗，无拘无束；是她教会他享受生命和狂欢挥霍的乐趣，最终将他由内到外塑造成自己从少女时代起就梦寐以求的男人。他结婚了，就像儿女们或早或晚都会成家一样。他不敢事先告诉她这个消息。在这种情形下，他采取了非常幼稚的做法，不是无端发火便是凭空抱怨，总之想让佩特拉·科特斯主动提出分手。一天，奥雷里亚诺第二又无理取闹，她避开了圈套，并将事情挑明。

“说白了，”她说，“你就是想和女王结婚。”

奥雷里亚诺第二羞愧不已，装出勃然大怒的样子，声称这是对自己的曲解和侮辱，于是一去再没回来。佩特拉·科特斯听着婚礼的音乐和爆竹声、宾客狂欢的喧闹声，一刻也不曾失去休憩中猛兽的那种镇定自若，仿佛这一切不过是奥雷里亚诺第二的又一场淘气。有人向她表示同情，她却报之以微笑。“不用担心，”她说，“连女王都得听我的。”一位女邻居给她带来烛台好在失去的情人像前点亮，她的言语中带着神秘的自信：

“唯一一根能让他回来的蜡烛一直亮着。”

不出所料，蜜月一结束奥雷里亚诺第二就回到了她这里。他带来了那群狐朋狗友，以及一位旅行摄影师，还拿来了费尔南达·德尔·卡皮奥在狂欢节上穿过并沾染了血迹的外装和白鼬皮斗篷。当天下午趁着欢闹的气氛，他让佩特拉·科特斯穿上女王的盛装，封她为马达加斯加至高无上的终身统治者，并在朋友当中大肆分发记录盛况的照片。她积极配合这场游戏，内心满怀对他的怜悯，认为他想出这样荒唐的举动来跟自己和好一定没少担惊受怕。到晚上七点，她仍穿着女王的盛装，在床上款待他。他结婚已近两个月，她却立刻觉察出他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心中因实现报复而涌出甜美的快意。然而两天后他没敢再来，而是请别人居间解决分手的善后事宜，她便明白自己得比预期更具耐心，因为他看起来已决心牺牲自我来维持表面的婚姻。但她也并不慌张。她仍然逆来顺受，这更证实了人们的印象：她是个可怜的女人。她留下的唯一纪念品是奥雷里亚诺第二的一双漆皮靴，他自己曾说过要穿着这双靴子睡到棺材里去。她用布把靴子包好收在衣箱深处，准备开始一场耐心的等待。

“他早晚会回来的，”她想，“哪怕只是为了穿这双靴子。”

她等待的时间并没有预期的那样久。实际上，奥雷里亚诺第二在新婚之夜就知道，自己根本不必等到穿漆皮靴的时候就会回到佩特拉·科特斯家里：费尔南达是一个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女人。她出生和成长在距大海一千公里的一座阴风惨惨的城市，阴森的夜里城中的石板小巷仍然有总督时代的马车辚辚驶过。每到下午六点，全城三十二座钟楼齐声敲响丧钟。那座以墓园长砖铺地的领主深宅，终年不见阳光。庭院中柏树枝叶不惊，卧室里苍白的帷幔暗淡无光，晚香玉花园的拱廊上水渍蔓延，到处一派死气沉沉。直到进入青春期，费尔南达对外界的认识都只是邻家传来的忧伤钢琴练习曲，那弹奏者甘愿放弃午休，经年累月练习不止。在母亲的房中—母亲生着病，她的脸在蒙尘的彩色玻璃窗下显出青黄色—她听着那刻板、重复、消沉的音

阶，心想这乐声在世上自由飘荡，自己却在编织棕榈花圈中年华老去。母亲患五点钟热病汗流不止，对她讲起往日的辉煌。费尔南达还很小的时候，一个月夜，她看见一位身着白衣的美貌女子穿过花园向祈祷室走去。在这惊鸿一瞥中，最令她不安的是那女子长得与自己一模一样，仿佛就是二十年后的自己。“那是你曾祖母，她当过女王。”母亲在咳嗽的间歇对她说，“她折下一枝晚香玉时染了风寒，后来因此而死。”多年以后，费尔南达发觉自己与曾祖母模样酷似的时候，不禁对童年时所见的情景产生怀疑，但母亲责备了她的这种疑惑。

“我们家权势无比，财富无边，”她说道，“你也会成为女王的。”

她信以为真，尽管家里将亚麻布铺上长桌又摆上银餐具，只是为了喝一杯掺水的巧克力、吃一块甜面包而已。直到婚礼那天，她还梦想着成为一个传奇国度的女王，尽管她父亲堂费尔南多为置办嫁妆不得不将房产抵押。这并非幼稚无知或是野心谵妄。她就是这样被培养成人的。从记事时起，她记得自己都是在刻有家族纹章的黄金溺盆里大小便。十二岁时第一次出家门，她去的不过是两个街区外的修道院，仍需乘坐马车前往。她的同学惊奇地发现她被单独隔开，坐在一把高背椅上，即使在休息时间也不和旁人混在一处。“她可不一般，”修女们解释道，“将来是要做女王的。”她的同学深信不疑，因为那时的她就已出落成她们从未见过的美貌、高贵又端庄的姑娘。八年之后，她学会了用拉丁语作诗，学会了弹奏古钢琴，学会了与绅士谈鹰猎术、和主教论护教学，学会了向外邦君主阐述人间政务、为教皇诠释天国事宜，却还是回到父母家中又编起花圈来。她发现屋里已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必需的家具、烛台和银餐具，其他家居物品都已一件件卖掉以负担她的学费。母亲因五点钟热病去世了。父亲堂费尔南多一身黑衣，戴着硬领，怀表的金链绕过胸前，他每星期一给她一枚银币作为家用，同时取走前一个星期编好的花圈。他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关在书房里，少有的几回出门上街也都会在六点前回家，陪她一

起念玫瑰经。她从未和任何人结下亲密的友情。她从未听说过令整个国家流血败落的频繁战事。她从未间断过每天下午三点倾听钢琴练习曲。她那做女王的梦想开始破灭时，大门上传来了两下急迫的门环敲击声。她打开门，面前是一位衣着得体的军人，举止庄重有礼，脸颊上有一道伤疤，胸前佩戴着一枚金质勋章。他和她父亲走进书房密谈。两个小时后，父亲来缝纫间找她。“请准备好行李，”他对她说，“你要长途旅行了。”她就这样被带到了马孔多。仅仅一天之内，生活粗暴地打碎了幻梦，将父母多年来极力向她隐藏的现实赤裸裸地全盘呈现。回家后，她把自己关在房里痛哭，毫不理睬堂费尔南多的哀求和解释，试图借此消抹这场耸人听闻的嘲弄造成的创伤。就在她下定决心终生不再走出卧室一步的时候，奥雷里亚诺第二赶来找她了。这一转机完全出乎意料，因为她当初又惊又怒、又羞又恼，便撒谎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奥雷里亚诺第二出门来找她的时候，所掌握的真实线索只有两条：内地人的独特口音和编棕榈花圈的职业。他豁出一切寻找她。他凭着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翻越山脉创立马孔多那样的蛮勇，凭着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一次次徒劳发动战争那样的盲目骄傲，凭着乌尔苏拉一心延续家族血脉那样的疯狂执拗，寻找费尔南达时不曾有片刻气馁。当他问起何处出售棕榈花圈时，人们带他一家一家挑选。当他问起哪里有世上最美的女人时，所有的母亲都把自己的女儿带到他面前。在雾气弥漫的隘道间，在注定被遗忘的时光中，在幻灭的迷宫里，他一度迷失方向。他穿过一片黄色荒原，在那里回声重复着人的所思所想，焦虑引出预示未来的蜃景。徒劳寻找数星期后，他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城里所有的钟楼同时敲响丧钟。尽管从未见过，也从没听人描述过，他还是立即认出了被尸骨析出的石灰质侵蚀的外墙，被菌类蛀空木头的衰败凉台，以及钉在大门上，被雨水冲刷得模糊难辨，堪称世上最悲凉的纸板：出售棕榈花圈。从那一刻起到费尔南达将家里托付给女修道院院长照看后出发的那个寒冷早晨，修女们几乎来不及缝好嫁衣，并将烛台、银餐

具、金溺盆，以及两百年间家业衰败后余下的无数无用的家什装进六个箱子。堂费尔南多婉拒了同去的邀请。他答应晚些时候等处理完手头的事务再去。他为女儿送上祝福后，又关在书房里，用印有惨淡花饰和家族纹章的信笺给她写信，那是父女俩有生以来第一次充满人情味的交流。对费尔南达而言，这才是生活的真正开始。对奥雷里亚诺第二而言，这几乎同时是幸福的开端和结束。

费尔南达有一册配有金色小钥匙的精美历书，她的灵修导师在上面用紫色墨水标出了需要禁欲的日期。除去圣周、主日、守节日、每月第一个星期五、静修日、弥撒日以及月事周期，她一年中可行房的日子只剩四十二天，分散在密密麻麻的紫色小叉之间。奥雷里亚诺第二确信时间会摧毁这面凶恶的铁网，同时大大延长了预定的喜宴天数。乌尔苏拉忙于将白兰地和香槟的空瓶丢进垃圾桶，以免家中无处落脚，她在精疲力竭之余惊奇地发现，爆竹声和音乐声在继续，一头头牛被屠宰，但新婚夫妇却在不同时间就寝且睡在不同的房间。她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经历，暗中疑惑费尔南达是否也贴身穿着一条贞节裤，迟早会引发人们的嘲笑，酿成又一场悲剧。然而费尔南达向她坦承，自己仅仅是需要两个星期的预备期才能和丈夫有肌肤之亲。期限过去，她果然打开卧室房门，表现出赎罪祭品一般的自我牺牲气概。世上最美的女人出现在奥雷里亚诺第二眼前，她光彩诱人的眸子好像受惊的动物，长长的黄铜色发丝散满枕上。目醉神驰之下，他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费尔南达穿了一件宽大的白睡衣，衣角直垂至脚踝，袖口遮住双手，小腹位置一个圆洞掩映于精美花边中。奥雷里亚诺第二不禁放声大笑。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淫秽的，”他大叫道，笑声在整个家中回荡，“我娶了个慈悲的修女回家。”

一个月后，他仍然没能让妻子脱下睡衣，便去为佩特拉·科特斯照女王相。晚些时候当他把费尔南达劝回家，趁着和好的热度百般纠缠，她终于让步了，却无法给予他当初远赴三十二座钟楼之城寻找她

时所梦想的满足。奥雷里亚诺第二在她身上找到的只有深深的痛苦。在他们第一个孩子降生前不久的一天夜里，费尔南达发觉丈夫又偷偷回到了佩特拉·科特斯的床上。

“是这样。”他承认了，以无可奈何的语气解释道，“为了让牲口继续繁殖，我不得不这么做。”

他花了些时间使费尔南达相信这离奇的理由，但当他用无可辩驳的证据将她说服，她却只要他保证一件事：最后不要让人撞见他死在情妇的床上。于是三个人就这样相安无事地生活下去。奥雷里亚诺第二对两人一般亲热。佩特拉·科特斯为情人的回归而扬扬自得，费尔南达则装作毫不知情。

这种默契并未令费尔南达融入这个家庭。乌尔苏拉多次要求她丢掉行房后起床时必戴的羊毛皱衬领，那已经引起邻居的窃窃私语，但她没有理会。乌尔苏拉也没能说服她改上厕所或是改用夜壶，而将金溺盆卖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做成小金鱼。阿玛兰妲对她矫揉造作的用词、谈起任何事情都要拐弯抹角的说话习惯十分不满，在她面前说起自创的黑话。

“这非是非，”她说，“非那发种发连非自非己非拉非的非屎非都夫恶发心夫的发女非人非。”

终于有一天，费尔南达再也无法忍受嘲弄，想知道阿玛兰妲究竟说了些什么。她直截了当地作出回答，毫不拐弯抹角。

“我是说，”她答道，“你就是那种把屁股说成斋戒日的女人。”

从那天开始两人不再说话。实在迫不得已，她们会互留便条，或者对着空气传话。费尔南达感觉得到自己在家中不受欢迎，但并未因此稍减推行祖上规矩的决心。她取缔了家中谁饿了就自行去厨房吃饭的习惯，强制家人准时准点在饭厅的大桌上就餐，并铺好亚麻桌布，配上枝状烛台和银餐具。乌尔苏拉一向视为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变成庄严的仪式，由此形成了一种紧张气氛，沉默寡言的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首先对此表示反对。但这一仪式仍被固定下来，再加上晚

饭前念诵玫瑰经的程序，都引起了左邻右舍的注意，很快就有风言风语传出，说布恩迪亚家的人不像一般人家那样坐在桌旁，而是把就餐变成了一场大弥撒。甚至乌尔苏拉的迷信也和费尔南达的迷信之间产生了冲突，前者更多源于个人的灵光一现，与传统关系不大，而后者则继承自父母，清晰明确，分门别类适用于不同场合。在乌尔苏拉耳聪目明的时候，她的意愿在家中还有一定影响，往日的一些习惯尚能勉强保留，但当她视力大减，被岁月的重负逼入角落，从费尔南达到来的那一刻启动的严酷变革便彻底完成，家庭的发展走向完全取决于她一人的决定。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按照乌尔苏拉的吩咐接手经营甜食和糖果小动物生意，这在费尔南达眼中有失体面，立刻被取消了。往日从清晨到入睡一直敞开的屋门，在午睡时段以阳光晒热了卧室为理由关闭，到后来也就不再打开。从村庄创建时起就挂在房梁上的芦荟枝和面包，被一座耶稣圣心神龛代替。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察觉到这些变化并对后果作出预言。“我们正在变成贵族老爷，”他抗议道，“这样下去，我们又得跟保守党政府开战了，不过这一次是要把国王推上台。”费尔南达极有分寸，避免与他发生冲突。但他的特立独行、他对一切社会成规的排斥，都令她在内心深处十分反感。他清晨五点必喝的咖啡，作坊里的杂乱无序，身上脱线的毛毯以及傍晚坐在门口的习惯都让她恼火。但她不得不忍受家里的这一不和谐音，因为她确信年老的上校是一头猛兽，只是因岁月消磨和理想幻灭而暂时平静下来，而一旦老人脾气失控就足以令家里天翻地覆。当丈夫决定用曾祖父的名字为他们的长子命名时，她没敢提出异议，因为她来到这个家不过一年。到第一个女儿出生时，她便直接表明了自己的决定，要用她母亲的名字取名—雷纳塔。那时乌尔苏拉已经想好要叫她蕾梅黛丝。经过一番紧张的争执，并由奥雷里亚诺第二笑吟吟地居中调停，新生儿以雷纳塔·蕾梅黛丝的名字受洗。但费尔南达仍叫她雷纳塔，而她丈夫一家及市镇上的人都叫她梅梅，即蕾梅黛丝的昵称。

最初，费尔南达没有提及自己的家世，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开始营造父亲的神话。她在饭桌上谈起他，经她描述他俨然是摒弃世间虚荣的超凡者，甚至渐渐荣升为圣徒。奥雷里亚诺第二为妻子这样出格地美化岳父而惊奇，忍不住在她背后小小嘲弄一番。家里其他人也仿效他。就连乌尔苏拉，一向极力维护家庭和睦、暗自为家中冲突而痛苦的人，有一次也不禁说了一句，她的小玄孙必定能当上教皇，因为他是“圣徒的外孙，女王的儿子，还有个偷牲口的父亲”。尽管有这样的暗中戏谑，但孩子们已经习惯将外祖父当作传奇人物。他在给他们的信中抄录虔敬的诗行，每个圣诞节寄来一大箱礼物，箱子送到的时候险些把家里的大门撑坏。其实那些礼物都是昔日显赫家业的最后遗存。他们用礼物在孩子们的卧室里建起一座祭坛，上面的圣徒像有真人大小，玻璃珠眼睛闪烁着令人不安的神采和生机，精美的绣花呢绒外衣用的是马孔多任何居民都不曾穿过的好衣料。那栋古老冰冷的深宅中如殡葬品般的堂皇陈设，一件件转移到了布恩迪亚家敞亮的房子里。“已经把整个家族墓地都给咱们搬来了，”有一次奥雷里亚诺第二评论道，“就差那些柳树和墓地砖了。”虽然箱子里从来没有出现过适合孩子们玩耍的东西，但他们每年仍然期待十二月的到来，因为那些永远无从预知的古董礼物终归是家里的新鲜事物。到第十个圣诞，小何塞·阿尔卡蒂奥已经准备上神学院，外祖父的大箱子比往年来得格外早，钉合严密且涂了沥青防水，并用一贯的哥特体上书“无比尊敬的堂娜费尔南达·德尔·卡皮奥·德·布恩迪亚女士收”。她在卧室读信时，孩子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打开箱子。和往年一样，他们在奥雷里亚诺第二的帮助下，先刮去沥青封印，起出钉子开盖，再清除保护用的锯末，这才看到一个带铜螺栓的密封铅匣。奥雷里亚诺第二起出八枚螺栓，孩子们已等得不耐烦，但当他掀开铅板，立刻发出一声惊呼，随即将孩子们赶到一边。他看见堂费尔南多躺在匣子里，身着黑衣，胸前挂着耶稣受难像，皮肤寸寸迸裂溢出臭气，浑身浸泡在文火熬煮的汤里，翻滚的泡沫宛如珍珠。

就在梅梅出生后不久传来意外的消息，政府将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举行纪念特典以庆祝当年尼兰迪亚协定的签订。这一举动与当局的施政方针大相径庭，上校毫不掩饰地表示了反对，并拒绝参加纪念活动。“我平生第一次听说特典这个词，”他说，“但不管是什么意思，这只能是个笑话。”局促的作坊里挤满了使者。当年像乌鸦一般围着上校转的那几位黑衣律师再次登门，一个个更加衰老却也更加庄严。看着这些人像当年斡旋停战时一样出现在眼前，为自己唱起赞歌，上校实在无法容忍他们的厚颜无耻。他下令不许他们打扰，坚称自己不是他们所说的什么开国元勋，而只是个没有回忆的手工匠，剩下的唯一梦想就是被人遗忘，清贫度日，制作小金鱼劳累而死。共和国总统要来马孔多参加仪式并亲自为他授勋的消息，最令他恼火。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派人一字不差地传话给总统，说自己非常期待这个迟到的机会好给他应得的一枪，倒不是为了惩罚他治下政府的任意妄为和倒行逆施，而是因为他没有尊重一个已经对任何人都不构成危险的老人。这一有力威胁促使总统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行程，派一名代表送来勋章。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迫于各界压力，离开病床抱着瘫痪之躯来劝说他的老战友。上校看见从青年时代起与自己同甘共苦的伙伴倚着厚厚的靠垫坐在四人抬着的摇椅上进来，一刻也没有犹疑，认定他辛苦赶来是为了支持自己。当他发现了来访者的真实意图，便立刻叫人把他从作坊里抬了出去。

“我明白得太晚了，”上校对他说，“当初让他们枪毙你才是帮了你的大忙。”

于是纪念特典在没有任何布恩迪亚家成员出席的情况下举行了。庆祝活动碰巧赶上狂欢节，但没有人能让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打消因此而产生的顽固念头，他认定这一巧合也是政府有意为之，为的就是加剧其中残酷的讽刺意味。他在孤寂的作坊里听见军乐声声，礼炮齐鸣，钟声敲响感恩赞，以及家门口飘来演说的只言片语，他们正宣布用他的名字为街道命名。他愤怒得眼眶湿润，恨自己的软弱，

自战败后头一回因为再没有年轻时的勇气发动一场血腥的战争，将保守党政府消灭干净而深感痛苦。活动的余响尚未沉寂，乌尔苏拉敲响了作坊的房门。

“别打扰我，”他说，“我没空。”

“开门，”乌尔苏拉用平常的语调坚持道，“这事和庆典没什么关系。”

于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拉开门闩，看见门口聚集着十七个形貌迥异的男子，他们体型肤色各不相同，但都带着落落寡合的气质，在任何地方都能被分辨出来。他们是他的儿子。他们事先未经协商，甚至彼此互不相识，都是风闻纪念特典的消息从沿海地区的各个角落赶来。他们都自豪地取了奥雷里亚诺这个名字，用的母亲的姓氏。他们在家中逗留了三日，弄得像战场一样混乱，乌尔苏拉心满意足，费尔南达又惊又怒。阿玛兰妲从故纸堆里找出乌尔苏拉当年记录姓名、出生日期和受洗日期的小本子，在对应每个名字的空白中添上现在的住址。这份表格可以看作是二十年战争的缩影，凭着它足以重绘上校夜间的行军路线，从那天凌晨他带着二十一个人离开马孔多加入一场荒唐的起义，直到最后一次他裹在沾了血迹而硬结的毯子里归来。奥雷里亚诺第二没有放过款待堂兄弟们的机会，他打开香槟，拉起手风琴，大肆庆祝，算是补回了因纪念特典而未能尽兴的狂欢节。他们打碎了家里一半的餐具，为了追赶一头公牛并将它兜在毯子里抛耍而将花园里的玫瑰践踏殆尽；他们开枪射杀母鸡，强迫阿玛兰妲跳起皮埃特罗·克雷斯皮所教的悲伤华尔兹，怂恿美人儿蕾梅黛丝穿上男人的裤子参加爬竿游戏；他们在饭厅里放出一头涂满油脂的猪，结果将费尔南达撞翻在地，但没有人抱怨这些意外，欢快的气氛席卷全家。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开始时还有所顾虑，甚至对其中几人的血脉心存怀疑，但他渐渐被他们的疯狂感染，临行前还送了每人一条小金鱼。连冷漠的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也为他们准备了一场斗鸡，但险些以悲剧结束，因为好几个奥雷里亚诺都是此中老手，一眼

就看穿了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传授的花招。奥雷里亚诺第二从这些为数众多的亲戚身上看到了大肆欢宴的无限可能，决定让所有人都留下来跟他一起干活。唯一接受邀请的人是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一个身形高大的黑白混血儿，有着祖父的冲劲儿和开拓精神，他已经周游半个世界寻找机会，留在哪里都一样。其他人尽管尚未成家，但都已认准自己的前途，个个都是灵巧的工匠，家中的支柱，性情平和的男人。到了圣灰星期三，在众人四散回到沿海各地之前，阿玛兰妲让他们穿上主日正装，陪他们去了教堂。他们更多是感到有趣而非出于虔诚，被领到祭坛围栏前，由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用圣灰在前额上画上十字。回到家后，最小的奥雷里亚诺想要清洗前额，却发现那痕迹无法消除，他的兄弟们也是如此。他们试过清水与肥皂，试过泥土和瓜瓤，最后用上了浮石和碱液，仍然无法除去那痕迹。但阿玛兰妲和其他去望弥撒的人都轻而易举地洗掉了。“这样更好，”乌尔苏拉在与他们告别时说，“从今往后谁都不会把你们认错。”他们在乐队演奏声和爆竹声中胡乱散去，给市镇上的人留下的印象是布恩迪亚家的血脉将绵延不绝。额上印着十字的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在市郊建起一座制冰厂，那正是昔日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痴迷于发明变得癫狂时所梦想的事。

数月过去，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已为人们所熟识和喜爱，开始四处寻找房屋准备把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不是上校的女儿—接来。他看上了广场一角那座似已废弃的破败宅子，便打听主人是谁。有人告诉他那房子没有主人，过去曾经住过一位以泥土和墙皮为食的孤单寡妇，她晚年时别人在街上只见过她两次。她头戴缀有细小假花的女帽，脚穿古银色的鞋子，穿过广场到邮局寄信给主教。他们说陪伴她的只有一个残忍的女仆，那女人杀死猫狗及其他一切闯入家中的动物，并把尸体抛到街上，让市镇上的人都闻得到腐烂的恶臭味。自从最后一只动物的尸体在阳光下晒干后，又过了很久，所有人都确信那女主人和她的女仆早在战争结束前就已去世，房子迄今未倒不过是因

为近年来没赶上严酷的冬季，也没遇上能使房倒屋塌的暴风。铰链因锈蚀而断裂，门板靠成团的蛛网勉强支撑，窗框受潮卡死，地面长满杂草野花，其间裂缝成为蜥蜴和各种爬虫的巢穴，一切似乎都证明这里至少有半个世纪没人居住过。对冲动的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而言，并不需要见到这些迹象才会采取行动。他用肩膀撞了下大门，蛀蚀的木板便寂然倒塌，灰尘四溢，白蚁巢碎屑飞扬。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伫立在门口不动，等到尘雾落定，立时看见了客厅中央那位瘦骨嶙峋的女人。她穿着上个世纪的衣服，光秃的头顶上稀疏几根黄发，一双大眼睛仍残存着昔日的美丽，只是最后的希望之光已在其间熄灭，脸上的皮肤因孤寂而干裂。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被眼前非人间所有的景象震慑，险些没有察觉到那女人正用一把老旧的军用手枪指着他。

“抱歉。”他含糊地低声道。

她在堆满破烂的客厅中央一动不动，一点点仔细打量这肩宽背厚、额头有灰烬刺青的大汉。她透过尘雾看到他站在往昔的薄雾中，背上斜挎着双铳猎枪，手里拎着一串兔子。

“慈悲的上帝啊，”她低声惊叹道，“这不公平，现在又让我想起这些！”

“我想租房。”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说。

那女人举起手枪，稳稳瞄准他额间的灰烬十字，毅然决然地扣紧扳机。

“请出去。”她下令道。

当天晚上吃饭时，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向家人讲起自己的遭遇，乌尔苏拉难过地哭了起来。“神圣的上帝啊，”她双手抱头喊道，“她还活着！”时光流逝，战事频仍，加上平日里无数的不幸，她都把丽贝卡给忘了。自始至终清楚地知道她还活着并在蛆虫窝里腐烂的人，只有日渐衰老却毫不心软的阿玛兰妲。当天亮时心中的寒意将她从孤枕上唤醒，她会想起她；当她用肥皂擦洗自己凋零的乳房和枯

萎的腹部，当她穿上老年人雪白的细棉布裙和胸衣，当她更换手上缠裹赎罪伤痕的黑纱，都会想起她。无论何时，或睡或醒，从最庄重到最卑下的时刻，她都会想起丽贝卡，因为孤独已经为她筛选记忆，将生活在她心中累积的无数垃圾尽行焚毁，并净化、升华了其他记忆，即那些最苦涩的记忆，使其永远存留。从她那里美人儿蕾梅黛丝知道了丽贝卡的存在。每当她们路过那幢破败的房子，她都会讲起丽贝卡一桩负心的事件，一个出丑的故事，想借此让侄女分享自己日渐衰竭的怨尤，并使积怨在她死后延续。但她没能成功，因为蕾梅黛丝对一切激烈的情感都具有免疫力，遑论他人恩怨。乌尔苏拉经历了与阿玛兰妲截然相反的过程，她记忆中的丽贝卡已经被净化，那个和父母的骨殖袋一起被送来的小女孩令人怜惜的形象已经掩盖了大逆不道脱离家庭的那段过往。奥雷里亚诺第二决定接她回家好生照料，但他的好意遭到丽贝卡的断然拒绝。她辛苦多年忍受折磨好不容易赢得的孤独特权，绝不肯用来换取一个被虚假迷人的怜悯打扰的晚年。

二月里，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十六个儿子归来时额上仍带着灰烬十字的印记。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在欢闹中提起丽贝卡，于是他们在半天内就修复了房子外观：更换门窗，给立面漆上欢快的颜色，加固墙壁，重铺水泥地面。但他们没能得到许可进行室内装修。丽贝卡甚至没在门口露面。她任凭他们七手八脚完成了工程，随后估算了花销，让一直陪伴自己的老女仆阿尔赫尼妲送去一把在最后一场战事结束后就不再流通，而她以为还通用的硬币。这时人们才明白她与世隔绝到了何种程度，也知道只要她一息尚存，便不可能将她从顽固的自闭中解救出来。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儿子们第二次造访马孔多时，其中的另一个，奥雷里亚诺·森特诺，也留下来和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一起干活。他属于最早一批来到家里受洗的人，乌尔苏拉和阿玛兰妲都清楚地记得他，因为短短几个小时内所有经过他手的易碎物品全被打个粉碎。时间的流逝遏制住当初的成长势头，他长成一个中等身材

的汉子，天花疤痕十分醒目，但手上惊人的毁灭力量却丝毫未减。他甚至碰都没碰就已打碎无数盘子，费尔南达只得赶在自己仅存的昂贵餐具损失殆尽之前为他买来一套白餐具，但这些耐用的金属盘碟也很快釉彩剥落、扭曲变形。这种不可救药的能力令他本人也很恼火，不过他同时还拥有热忱可亲的气质，一见面就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干活也十分出色。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大幅提高了冰块的产量，超出了本地市场的需求，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不得不考虑将生意扩展到大泽区的其他市镇。就在这时他突发奇想，这一设想不仅对工厂的现代化，甚至对市镇与外界的沟通都具有决定意义。

“应当把铁路修过来。”他说。

这是马孔多人第一次听说铁路这个词。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在桌上画出的图样，分明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当年为太阳战方案所绘制的草图一脉相承，乌尔苏拉见此情形便确认了自己的感觉：时光倒流了。然而与祖父不同，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既不失眠也没影响胃口，更没乱发脾气迁怒旁人。再荒唐的设想他都视为近在眼前的可能，他合理地计算成本和工期，有条不紊地实施计划。而奥雷里亚诺第二—如果说他从曾祖父身上继承了某种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所不具备的气质，那就是从不汲取过往的教训—掏出大把的钱来资助修建铁路，就像过去资助他兄弟荒唐的航运事业一样。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查过日历后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三出发了，预计雨季过后返程。但从此就没有了他的音讯。鉴于生产过剩，奥雷里亚诺·森特诺已经开始用果汁代替水制冰，无意中为冰激凌的发明奠定了基础。他相信这样做可以使厂子的产品多样化。由于雨季已过而他兄弟整整一个夏天都没有消息，也没有任何返回的迹象，他已将这厂子视为己有。然而到了下一年初冬，有个女人在最炎热的时候去河边洗衣，忽然她喊叫着跑过市镇中心的大街，神情紧张而兴奋。

“朝这边来了，”她竭力解释道，“一个吓人的东西，好像一间厨房拖着一个镇子。”

那一刻，市镇上的人都在一阵可怖的汽笛声和急促的喷气轰响中惊愕不已。之前几个星期，他们曾看见一队工人铺设枕木和铁轨，但没有人在意，都认为是吉卜赛人带着新花样归来，还是吹笛子打铃鼓那老一套，吹嘘耶路撒冷的天才们发明的鬼知道什么药水。人们从汽笛和喷气引发的骚乱中回过神来之后，都涌上街头，看见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正在火车头上向他们招手。他们目瞪口呆地望着用鲜花装扮的火车在晚点八个月后首次开到。这列无辜的黄色火车注定要为马孔多带来无数疑窦与明证，无数甜蜜与不幸，无数变化、灾难与怀念。

十二

马孔多人被诸多神奇发明弄得眼花缭乱，不知该从哪里开始惊叹。他们彻夜观看发出惨白光芒的电灯泡，电力是由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第二次坐火车带来的发电机所提供，机器发出的无休无止的嗡嗡声他们过了很长时间才渐渐习惯。生意兴隆的堂布鲁诺·克雷斯皮在他那狮头状售票窗的剧院里放映的活动人影戏，引发了市民的愤慨，因为他们刚刚为一个人物不幸死亡并被下葬而抛洒伤心之泪，转眼间那人又变成阿拉伯人，生龙活虎地出现在下一部影片里。付过两个生太伏来与剧中人共悲欢的观众无法忍受这种闻所未闻的嘲弄，遂将坐椅砸个稀烂。市长应堂布鲁诺·克雷斯皮之请，特意发布公告解释，称电影不过是一种造梦机器，不值得观众如此激情投入。听到这一令人沮丧的解释，不少人认为自己成了吉卜赛人又一新奇发明的牺牲品，决定再也不来剧院，因为自家已经有够多烦恼，不必再为那些虚幻人物装出来的不幸落泪。手摇唱机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那些法国卖笑女郎带来唱机取代了过时的手摇风琴，令乐队的收入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开始的时候，好奇心使光顾花街柳巷的寻欢作乐者人数激增，据说连一些可敬的女士也化装成乡民男子，特意跑去就近观看新奇的唱机，但经过反复的近距离观察，她们很快得出结论：那并不是所有人想象的，或是那些女郎宣传的什么魔法音乐轮，而不过是个机器把戏，远不如乐队那样富于感染力、人性化又充满日常真实感。人们深感失望，因此到后来唱机变得普遍，家家户户都有一台的时候，也没有用来供成人消遣，而是当作给儿童拆卸的玩具。然而，当市镇上有人在火车站亲身体验了电话这一惊人事物—因为也有手柄，一度被视为简易唱机—连最不肯轻信的人也陷入了困惑。上帝仿佛决心要试验人类惊奇的极限，令马孔多人时时摇摆于欢乐与失望、疑惑与明

了之间，结果再没有人能确切分清何处是现实的界限。真实与幻景错综纠结，引得栗树下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鬼魂也按捺不住，大白天在家中四处游荡。铁路正式开通之后，火车于每个星期三上午十一点定时抵达，于是一座简易的木屋小站盖起来了，配有一张写字台、一部电话和一个售票窗口。从那以后，马孔多的街巷间出现了许多男男女女，他们装作平常人模样，其实却像马戏团的演员。这些走街串巷、巧舌如簧的商贩以同等泛滥的热情推销高压锅和宣扬第七日使灵魂得救的修行法则，按说他们在这个受过吉卜赛人愚弄的市镇上前景并不乐观，但仍从那些耐不住反复游说以及容易上当的人身上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在这些夸夸其谈的演员中，有一位身穿马裤加护腿，头戴软木帽，鼻上架着一副钢框眼镜，眼睛呈黄玉色，皮肤如斗鸡的人物，在一个星期三来到马孔多并在布恩迪亚家用了午饭。他就是身材矮胖、一脸笑容的赫伯特先生。

他吃完第一把香蕉之前，并没有引起桌上任何人的注意。奥雷里亚诺第二只是偶然遇见了他，当时雅各酒店已客满，他正费劲地用西班牙语抗议。奥雷里亚诺第二就像平常对待陌生人那样，将他带回家里。他经营系留气球生意，已经游遍半个世界，一向收入可观，但在马孔多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乘坐气球升空，因为人们曾经见识并坐过吉卜赛人的飞毯，不免把这项发明视为一种倒退。他正打算赶下一趟火车离开。午饭时，平日挂在饭厅里的虎纹香蕉端上了桌，他心不在焉地掰下一根。他边说边吃，慢慢品尝，细细咀嚼，不像是食客在享受美味，倒像是学者在借此消遣。他吃完一把又要了一把。这时他从一直带在身边的工具箱里取出一套精密仪器，以丝毫不逊于钻石买家的谨慎专注态度仔细检查了一根香蕉，又用专门的探针切割，再用药剂师的天平称重，用军械师的卡尺测长。随后他又从箱子里拿出一系列仪器，依次测量温度、湿度和光照强度。面对这一令人困惑的仪式，没有人还能安心吃饭，都在等待赫伯特先生最后发布重大结论，但他却守口如瓶，丝毫没有透露自己的意图。

此后的日子里，人们看见他带着网罩和小筐在市镇周边捕捉蝴蝶。星期三的时候来了一群人，有工程师、农艺师、水文专家、地形测绘员和土地测量员，他们在几星期内将赫伯特先生捕捉蝴蝶的地方都考察了一遍。晚些时候，杰克·布朗先生乘坐挂在黄色火车后面的专用车厢来到，那车厢整体包银，配有紫色天鹅绒安乐椅和蓝色玻璃车顶。乘坐专用车厢一道赶来的还有神情肃穆的黑衣律师，当年他们曾四处追随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脚步，如今又簇拥在布朗先生左右。人们不禁由此猜想，那些农艺师、水文专家、地形测绘员和土地测量员，包括赫伯特先生和他的系留气球、彩色蝴蝶，以及布朗先生和他带轮子的陵墓、凶猛的德国犬，都与战争不无关联。然而疑心重重的马孔多人根本来不及思忖，他们刚开始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市镇已经变成一片锌顶木屋的营地，住满了从世界各地乘火车—不光有坐在座位和平台上的，还有坐在车顶上的—赶来的外乡人。美国佬带来了他们身披麦斯林纱、头戴薄纱大礼帽、神情慵懒的女人，在铁路另一侧建起一座城镇。街道上棕榈树荫掩映，家家户户装有金属纱窗，阳台上摆着白色小桌，天花板上挂着吊扇，宽广的绿草地上有孔雀和鹌鹑漫步。整个城区被一圈金属网环绕，仿佛电网保护下的巨大鸡笼。在夏天凉爽的清晨，网上缀满烧焦的燕子，远远望去黝黑一片。仍然没有人知道他们目的何在，或者真的只是些慈善家，然而这些人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令当初吉卜赛人造成的混乱相形见绌，而且更持久也更难以索解。他们掌握了往昔唯有造物主才拥有的力量，能调节降水量，加速收获周期，令河流从亘古不变的路线改道，将河中巨大的白石连同冰冷的激流都移到了市镇另一端的墓地后面。就是这一次，他们在何塞·阿尔卡蒂奥退色的墓上加筑了一层混凝土，以免尸体散发的火药味污染水源。为那些缺乏爱情滋润的外乡人考虑，他们将柔情万种的法国女郎们所在的街道扩建成大得多的集镇，并在一个值得铭记的星期三运来一火车不可思议的妓女大军。这些淫靡放荡的风月高手，古老技艺无一不精，药膏器具无所不备，能够使无能

者受振奋，腼腆者获激励，贪婪者得餍足，节制者生欲望，纵欲者遭惩戒，孤僻者变性情。灯火辉煌的舶来品商号取代了五色杂陈的破旧店铺，令土耳其人大街愈加繁华。每到星期六夜晚街上人声鼎沸，众多冒险者在赌桌上、打靶摊前、专营算命解梦的小巷里、摆着油炸食品和饮料的餐桌间互相推搡拥挤。到星期天清早一片狼藉，四下横躺的常有快乐的酒鬼，但总少不了斗殴时被子弹、拳头、刀子、酒瓶殃及的围观者。外来人潮不合时宜地涌入，最初街上几乎无法行走，堆满了家具和箱笼。有人未经批准就随便在空地上自行盖房，大张旗鼓地干起木工活。也有人在巴旦杏树林间拉起吊床，支起遮阳篷，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寻欢做爱。唯一保持安宁的角落是来自安的列斯群岛生性平和的黑人的居住区，他们把木屋搭在桩子上，在市郊建成一条街道。每到傍晚，他们便坐在家门口，用含混的帕皮亚门托语唱起忧伤的赞美诗。短短时间内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在赫伯特先生来访后八个月，马孔多的老居民每天都要早早起来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

“瞧瞧我们自找的麻烦，”那阵子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常常说，“就因为请个美国佬吃香蕉。”

奥雷里亚诺第二却对外乡人的潮涌而至兴奋不已。家里突然间挤满了陌生的来宾、世界各地的酒肉豪客，不得不在院中加盖卧室，扩建饭厅，换上一张可供十六人就餐的新餐桌，并配上成套的新餐具，即使如此仍需排出班次轮流进餐。费尔南达压下疑虑，像款待国王一样招待最卑劣的客人，但他们却穿靴踩脏长廊地板，在花园里随地小便，到处铺席子午睡，言语间全然不顾女士的感受，毫无绅士风度可言。阿玛兰妲对入侵家中的人潮愤慨不已，恢复了旧时习惯回到厨房吃饭。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认定大多数人来作坊探访他并非出自善意或敬意，而是抱着瞻仰历史遗迹、观赏博物馆化石的猎奇心态，因此决定紧闭房门，此后便很少再见他坐在大门口。乌尔苏拉却不同，即使在步履蹒跚扶墙行走的日子里，每当火车驶来仍像孩童般兴奋。“鱼和肉都得做。”她下令给四个厨娘，她们在桑塔索菲亚·德

拉·彼达的沉着指挥下忙碌着将一切准备到位。“什么都得做一些，”她说，“你永远不知道外乡人爱吃什么。”火车在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刻到达。午饭时，整个家在集市般的喧闹中震颤。那些汗流浃背的客人甚至不知道主人是谁，你推我搡地抢占餐桌上的有利位置，与此同时厨娘们忙不迭端上大锅大锅的汤、一罐罐炖肉、一瓢瓢蔬菜、一盘盘米饭，并用长柄勺不停地将整桶整桶的柠檬水舀进杯里。家里乱成一片，费尔南达一想到不少人吃了两回便气恼不已，而且不止一次恨不得用市井小贩才说的粗话来发泄怒火，因为竟有昏了头的客人要找她结账。赫伯特先生来到马孔多已经一年多，人们只知道美国佬想在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当年带人寻找伟大发明时穿越的着魔之地上种植香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另外两个儿子，额头上仍带着灰烬十字的印记，也被这热潮吸引而来。他们说明来意的一句话或许能代表所有人的心声。

“大家都来，”他们说，“我们也来了。”

美人儿蕾梅黛丝是唯一不为香蕉热潮所动的人。岁月流逝，她却永远停留在天真烂漫的童年，对各样人情世故越发排斥，对一切恶意与猜疑越发无动于衷，幸福地生活在自己单纯的现实世界里。她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费事穿胸衣和衬裙，便为自己缝制了一件麻布长袍，往头上一套就简单解决了穿衣服的麻烦，并且感觉上仍像没穿一样。按照她的想法，在家里赤身露体才是唯一体面的方式。她本有一头瀑布般垂至腿肚的长发，但她厌烦了家人总要她修剪，还要用发卡束成发髻，或用彩色绳圈编出辫子，便索性剃了个光头，拿头发去给圣徒像做假发。她简化事物的本性有个惊人之处：她越是抛开时髦只求舒适，越是罔顾成规仅凭感觉行事，她那不可思议的美貌就越发动人心魄，对男人也越有诱惑力。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儿子们第一次来到马孔多时，乌尔苏拉一想到他们和曾孙女的血管里流淌着同样的血液，立刻因久远的恐惧而战栗。“你得睁大眼睛，”她提醒蕾梅黛丝，“跟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搞上，都会生出长猪尾巴的孩子。”她毫

不理会这提醒，穿上男人的衣服，在沙地上打了个滚就去爬竿。十七个堂兄弟见此景象都难以自持，险些酿成一场悲剧。正因如此，他们逗留期间都没住在家里，其中四人留下后也都按乌尔苏拉的安排租房另住。如果美人儿蕾梅黛丝得知这样小心防范的理由，一定会觉得十分好笑。直到羁留尘世的最后一刻，她都丝毫不曾察觉自己红颜祸水的宿命意味着日常生活中的灾难。每一次她不顾乌尔苏拉的命令出现在饭厅，总会在外乡人中激起惊恐和骚乱。显而易见，她在肥大的外袍下全然赤裸，而且所有人都会把她线条完美的光头当作挑逗，把她天热时肆无忌惮露出的大腿、用手吃饭后吸吮手指的习惯视为罪恶的诱惑。家里从没人注意，外乡人却很快发觉，美人儿蕾梅黛丝能散发撩人心魄的气息、扬起令人断肠的微风，所过之处几小时后仍然余香袅袅。在世界各地历经沧桑的情场老手一致认定，像美人儿蕾梅黛丝天生香气所催发出的这般强烈的渴望，他们平生从未体验过。凭着这种气息，他们在秋海棠长廊、在客厅、在家中任何一处，都能判断出她驻足的确切位置以及她离开了多长时间。这是一种特征明显、不易混淆的踪迹，很久以前就已融入家中其他气味因而家里人无从察觉，但外乡人却能立刻辨认出来。因此，只有他们能理解那位年轻的警卫队队长为何殉情，另一位来自远方的绅士为何陷入绝望。美人儿蕾梅黛丝对身边的紧张氛围毫无察觉，对自己在所到之处引发的可怕的情感灾难一无所知。她对男人没有丝毫恶意，可最终她那无辜的和善态度却使他们陷入狂乱。乌尔苏拉为了让她不被外乡人看到，强迫她和阿玛兰妲在厨房里吃饭，她反倒觉得更轻松自在，终于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实际上，她对在哪儿吃饭无所谓，也没有固定时间，而是视自己的胃口而定。有时她凌晨三点起床吃午饭，然后睡上一整天，如此日夜颠倒过上几月，直到某个偶然事件让她恢复正常。情形好的时候，她上午十一点起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赤身露体关在浴室里杀蝎子，慢慢从漫长而昏沉的梦境里清醒过来。然后她用加拉巴木果壳瓢从池里舀水沐浴。沐浴过程漫长且细致，充满仪式感，不了解她的

人会以为她在专注地欣赏自己的胴体，而那胴体也的确值得这样欣赏。其实对她而言，这一独自进行的仪式毫无肉欲的意味，仅仅是打发时间的方式，直到自己有了吃饭的胃口。一天，她刚开始沐浴，有个外乡人掀开屋瓦偷窥，看到她惊人的裸体顿时透不过气来。她从屋瓦的缝隙间发现了那双凄楚的眼睛，但并没有害羞，只是惊慌。

“当心，”她喊道，“会掉下来的。”

“我只想看看你。”外乡人嗫嚅道。

“好吧，”她说，“不过要当心，瓦片都烂了。”

外乡人的脸上浮现出惊愕又痛苦的表情，似乎正在与自己的本能冲动展开无声斗争，不愿打破眼前的幻梦。美人儿蕾梅黛丝以为他害怕压碎屋瓦，于是比平时洗得更快，想让他尽早脱离险境。她一边从水池里舀水冲洗身子，一边告诉他屋顶的状况是个问题，想必是铺的落叶淋雨腐烂才招来满浴室的蝎子。外乡人把这样的闲谈当作了纵容，终于在她开始打肥皂的时候没能抵制住诱惑，迈进一步。

“让我给你打肥皂吧。”他嗫嚅道。

“谢谢你的好意，”她回答，“我用自己的手就够了。”

“哪怕只是背上也行。”外乡人恳求道。

“没那个必要，”她说，“从没见过谁往背上打肥皂。”

后来，她擦干身子的时候，外乡人双眼含泪地恳求她嫁给自己。她直截了当地答道，自己绝不会嫁给就为了看女人洗澡而浪费将近一小时，甚至错过了午饭的傻男人。最后，当她穿上外袍，他证实了她里面的确什么也没穿，就像所有人猜测的那样。他再也无法忍受，感觉这秘密像灼热的铁已经在自己身上留下永远的烙印。于是他又揭去两片屋瓦，准备跳进浴室。

“这很高，”她吓坏了，赶忙提醒他，“你会摔死的！”

腐坏的屋顶在巨响中四分五裂，那男人来不及发出一声惊恐的叫喊，就已摔得头破血流，当即死在水泥地面上。从饭厅闻声赶来的外乡人匆忙抬走尸体，他们在死者的皮肤上闻到了美人儿蕾梅黛丝那令

人窒息的气息。那气息深深渗入尸体，连头颅裂缝里涌出的都不是鲜血，而是一种饱含那神秘香气的琥珀色液体。于是他们明白美人儿蕾梅黛丝的气息仍在折磨死者，直到尸骨成灰也不放过。然而，他们并没有将这桩恐怖的事件与其他两个为美人儿蕾梅黛丝而死的男人联系起来。要等到另一个牺牲者出现，外乡人以及马孔多的许多老住户才会相信关于美人儿蕾梅黛丝的传说，即她发出的不是爱情的气息，而是死亡的召唤。证实这一点的机会出现在几个月后，那天下午美人儿蕾梅黛丝和一群女友一起去见识那些新奇的种植园。对马孔多的居民来说，这是一种新兴的消遣：在香蕉林中弥漫着湿润气息又杳无尽头的小径间漫步，那里的寂静仿佛刚刚从别处迁来，崭新未用，因此还不能正常传递声音。有时候在半米的距离内听不清别人说话，但在种植园另一头却能听得清清楚楚。这个新游戏为马孔多的少女带来欢笑和惊奇，引发惊恐与戏嘲，直到晚上她们还会谈起恍如梦境的散步经历。那里的寂静如此出名，乌尔苏拉也不忍剥夺美人儿蕾梅黛丝的乐趣，便同意她那天下午出门，但要衣着得体并戴上帽子。从少女们走进种植园的那一刻起，空气中便有致命的芳香满溢。在沟垄间劳作的男人感到自己被奇异的魔力所控制，面临着无形的危险，很多人甚至忍不住想要痛哭一场。美人儿蕾梅黛丝和她受惊的女友们险些落入一群凶暴的男人手中，好不容易才躲进附近的一户人家。没过多久四个奥雷里亚诺将她们救出，他们额上的灰烬十字引发某种对神明的敬意，仿佛那是门第等级的标志、免受伤害的印记。美人儿蕾梅黛丝没跟任何人说起有个男人趁着混乱在她腹部摸了一把，那只手更像是攫在悬崖边缘的鹰爪。那一瞬她惊愕地望着袭击者，那双绝望的眼睛像灼人的炭火印在她的心里。当晚，那男人在土耳其人大街吹嘘自己的勇气，炫耀自己的幸运，可几分钟后一匹马就从他胸前踏过，众多外乡人看着他在街上垂死挣扎，直到在自己吐出的鲜血里窒息。

四桩无可置疑的事例证实了美人儿蕾梅黛丝拥有致命力量这一猜测。尽管不乏言语轻薄的男人乐于宣称与这样令人心动的女人过上一

夜死了也值，可实际上没人敢去尝试。或许想要征服她乃至祛除她带来的危险，只需一种最自然最简单、被称为“爱”的情感，但从没有人想到过这一点。乌尔苏拉不再为她费心。曾几何时，她尚未放弃挽救她令她融入现实的努力，试图让她对家务产生兴趣。“男人比你想的要求更多。”她故作神秘地说道，“有很多饭要做、很多地要扫，还有很多小事要忍耐，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乌尔苏拉试图训练她为家庭幸福作准备的想法不过是自我欺骗，因为她早已确信一旦欲望得到满足，没有任何男人能忍受哪怕一天她这种不可思议的懒散。最后一个何塞·阿尔卡蒂奥降生后，她一心要将他培养成教皇，也就不再为曾孙女操心。她任由她自生自灭，相信早晚会有奇迹发生，在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上总会有一个耐性足够的男人能接受她。很早以前，阿玛兰妲就放弃了将她改造成贤妻良母的一切努力。在缝纫间里那些被遗忘的午后，她这个侄女连对帮忙摇缝纫机摇柄都不大感兴趣，那时她便得出明确的结论：她脑子有问题。阿玛兰妲奇怪她竟会对男人的甜言蜜语完全无动于衷，便对她说：“看来我们得卖彩票才能把你推销出去。”后来，乌尔苏拉坚持要美人儿蕾梅黛丝用头巾蒙脸去望弥撒，阿玛兰妲认为这样平添了神秘感，很快就能吸引某个好奇的男人耐下性子来寻索她内心的弱点。然而当阿玛兰妲看到对那个在各方面都胜过一位王子的追求者她竟愚蠢地不屑一顾，便不再抱任何希望。费尔南达从未试图去理解她。她在血腥狂欢节上见到美人儿蕾梅黛丝一身女王打扮，觉得她真是个出众的美人。可看到她用手抓饭吃，说出的话没有一句不显天真，费尔南达只有在心里哀叹，家里这些傻子都活得太久了。尽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依然相信并再三宣扬，美人儿蕾梅黛丝实际上是他平生见过最有智慧的人，这一点从她不时嘲弄众人的惊人能力上就可以看出，但他们还是对她不闻不问，任其自然。美人儿蕾梅黛丝独自留在孤独的荒漠中，一无牵绊。她在没有恶魔的梦境中，在费时良久的沐浴中，在毫无规律的进餐中，在没有回忆的漫长而深沉的寂静中，渐渐成熟，直到三月的一个下午，费尔南

达想在花园里叠起她的亚麻床单，请来家里其他女人帮忙。她们刚刚动手，阿玛兰妲就发现美人儿蕾梅黛丝变得极其苍白，几近透明。

“你不舒服吗？”她问道。

美人儿蕾梅黛丝正攥着床单的另一侧，露出一个怜悯的笑容。

“正相反，”她说，“我从来没这么好过。”

她话音刚落，费尔南达就感到一阵明亮的微风吹过，床单从手里挣脱并在风中完全展开。阿玛兰妲感到从裙裾花边传来一阵神秘的震颤，不得不抓紧床单免得跌倒。就在这时美人儿蕾梅黛丝开始离开地面。乌尔苏拉那时几近失明，却只有她能镇定自若地看出那阵不可阻挡的微风因何而来，便任凭床单随光芒而去，看着美人儿蕾梅黛丝挥手告别，身边鼓荡放光的床单和她一起冉冉上升，和她一起离开金龟子和大丽花的空间，和她一起穿过下午四点结束时的空间，和她一起永远消失在连飞得最高的回忆之鸟也无法企及的高邈空间。

外乡人想当然地认为美人儿蕾梅黛丝终于屈从于成为蜂后的宿命，而她的家人不过是编出升天的鬼话来挽救名誉。费尔南达尽管妒火中烧，最终还是承认了这一奇迹，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在恳求上帝归还那些床单。大多数人相信这一奇迹，甚至点起蜡烛念诵经文，举行九日祭。如果不是奥雷里亚诺兄弟惨遭屠杀使恐怖代替了惊诧，或许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其他的话题。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从未认为自己事先感知过预兆，但他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早料到了儿子们的悲惨结局。当随着人潮赶来的奥雷里亚诺·塞拉多和奥雷里亚诺·阿卡亚表示愿意留在马孔多，父亲曾试图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他看不出他们留在这个一夜之间就变为危险地带的市镇上有什么可做。但奥雷里亚诺·森特诺和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得到奥雷里亚诺第二的支持，在自己的厂子里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当时出于尚说不清楚的理由反对这一决定。自从见到布朗先生坐着马孔多的第一辆汽车登场—那是辆橙色的翻篷轿车，喇叭声把市镇上的狗吓得不轻—这位老军人就对众人大惊小怪的样子气恼不已，他

意识到人性发生了变化，现在已不再是那个抛下妻儿肩扛猎枪上战场的时代。自从尼兰迪亚停战协定签订以来，先后上任的都是些从马孔多温和乏味的保守派中选出的庸庸碌碌的市长、沦为摆设的法官。“这是一帮可怜虫的政府。”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看着配有警棍的赤足警察走过时评论道，“我们打了那么多仗，就争取到没让人把房子漆成蓝色。”但自从香蕉公司到来，当地官员被外来势力取代，布朗先生还把他们接进电网鸡笼里生活，据他说是去那里享受与他们地位相称的待遇，不用再忍受酷热、蚊虫以及市镇上各种不便和匮乏。昔日的警察换成了手持砍刀的雇佣兵。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关在作坊里，思考着这些变化，在沉寂的孤独岁月中第一次痛苦地确信没将战争进行到底是个错误。就在那些天里，已被遗忘的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勒上校的兄弟带着他七岁的孙子去广场买饮料，孩子不小心撞上一个警察小头目，把饮料洒到了他的制服上，那个暴徒就挥起砍刀将他剁成肉酱。孩子的爷爷试图上前阻止，也被一刀砍下脑袋。市镇上所有人都看见一群人如何将无头的尸体送回家里，看见那脑袋被一个女人揪住头发拎着，还看见鲜血模糊的袋子里装着孩子的碎尸。

这一事件结束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赎罪心境。蓦然间他内心又充满了年轻时的愤怒，当年他面对那个因被疯狗咬伤就惨遭乱棍打死的女人的尸体时也曾这般怒火中烧。他望着家门口好奇围观的人群，因着对自己的深深蔑视又恢复了当年的洪亮嗓音，向他们发泄胸中再也无法忍受的愤恨。

“等着瞧，”他喊道，“我要领着我的人拿起武器，干掉这些该死的美国佬！”

那个星期里，在沿海各地，他的十七个儿子像兔子般被暗藏的凶手瞄准额间的灰烬十字一一猎杀。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晚上七点从母亲家出来，被黑暗中射出的一发子弹打穿了脑门。奥雷里亚诺·森特诺被发现死在工厂中他时常挂起的吊床上，眉间插着一把冰锥没至手柄。奥雷里亚诺·塞拉多看完电影把女友送回她父母家，归来时走

在灯火通明的土耳其人大街上，被人群中一个永远无法确知身份的凶手用左轮手枪一枪放倒，跌进一锅沸腾的黄油里。几分钟后，正和一个女人待在房间里的奥雷里亚诺·阿卡亚听见有人敲响紧闭的房门并喊道：“快，有人在杀你的兄弟。”据那女人事后讲述，他从床上跳起来，打开门，迎面一发毛瑟枪子弹爆开了他的脑袋。在那个死亡之夜，家里准备为四具尸体守灵的同时，费尔南达发疯似的跑遍整个市镇寻找奥雷里亚诺第二。而他已被佩特拉·科特斯藏在衣柜里，她以为屠杀的目标包括所有与上校同名的人。直到第四天他才被放出来，那时来自沿海各地的电报已经证实，暗藏的敌人只针对带有灰烬十字的兄弟下手。阿玛兰妲找出记录侄子们信息的小本，收到一封电报就划去一个姓名，到最后只剩下最年长的那个。他们都清楚地记得他，因为他黝黑的皮肤和碧色的大眼睛形成了强烈反差。他叫奥雷里亚诺·阿玛多，是个木匠，生活在深山脚下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等了两个星期仍没收到告知他死讯的电报，奥雷里亚诺第二想到他或许还不知道死亡的威胁，便派出一名信差去提醒他。信差带回消息，说奥雷里亚诺·阿玛多还活着。在暗杀之夜，有两个男人去了他家，用手枪向他射击，但没打中额间的灰烬十字。奥雷里亚诺·阿玛多翻出院墙，消失在雨林的迷宫里。他曾与当地的印第安人做过木材生意并结下友谊，因而对那里了如指掌。他从此没有了消息。

对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而言，那是一段黑暗的日子。共和国总统向他发来唁电，承诺会彻底调查，并为死者表示哀悼。在总统的授意下，市长为葬礼送来四个花圈，想摆在棺材上，却被上校拦在街头。葬礼之后，他起草了一份措辞激烈的电文给共和国总统并亲自去发送，但电报员拒绝办理。于是他添上更多火药味十足的字句，装进信封寄了出去。就像妻子去世或战争中好友接连战死时一样，他心里没有悲痛，只有无处发泄的盲目愤怒，以及徒耗精力的无奈。他甚至指控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参与了暗杀，因为神甫曾给他的儿子们留下无法消除的印记便于敌人辨认。衰朽不堪的神甫那时已头脑糊

涂，在布道坛上的荒唐布道开始吓走教区的信众。一天下午他拿着圣灰星期三的灰罐来到家里，要为全家画十字来证明那灰烬完全可以用水洗掉。然而惨剧已造成深深的恐惧，连费尔南达也不愿参与实验，并且从此再没有布恩迪亚家的人在圣灰星期三跪在祭坛围栏前。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很久都未能恢复平静。他不再制作小金鱼，吃不下东西，拖着毯子像梦游者一般在家中游荡，口中咀嚼着默然的怒火。三个月过去，他的头发变得灰白，往日里修剪齐整的髭须耷垂在苍白的唇边，但他的双眼重又变成两团火炭，这双眼睛曾吓住看到他出生的人，曾仅仅一瞥就让椅子打转。忍受着怒火的折磨，他试图唤起青年时代曾引导自己走上危险道路直至荣耀的荒原的预兆，却都归于徒然。他迷失在一个陌生的家中，这里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事物能引发他丝毫的感怀。一次他打开梅尔基亚德斯房间的门，想寻找战前岁月的痕迹，却只看见废料、垃圾和多年积累下来的污物。在没人再翻动的残破书页间，在被潮气侵蚀的羊皮卷上，生出繁密的紫苔；曾经是家中空气最洁净的房间，却充斥着腐朽记忆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一天早上，他看见乌尔苏拉趴在栗树下已故丈夫的膝上哭泣。家里只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看不见那位经历半个世纪风吹雨打的健硕老人。“跟你父亲打个招呼吧。”乌尔苏拉对他说。他在栗树前停了片刻，又一次确认了那片空旷的空间同样无法触动他的情感。

“他说什么？”他问。

“他很难过，”乌尔苏拉回答，“因为他认为你快死了。”

“请告诉他，”上校笑了，“一个人不是在该死的时候死，而是在能死的时候死。”

亡父的预感拨动了他心中残存的最后一分高傲的余烬，但他却错以为陡然间重获了力量。因此他纠缠着乌尔苏拉要她说出院中何处埋藏着圣约瑟石膏雕像里的金币。“你永远不会知道。”她回答道，那坚定的态度源于往日的教训。“早晚有一天，”她补充道，“这笔财富的主

人会出现，只有他能挖出来。”没人知道一向慷慨大方的人怎么会如此迫不及待地开始聚敛金钱。那并非足够救急的小钱，而是提一下就能让奥雷里亚诺第二咋舌的惊人巨款。他登门求助时，那些旧日的党内同僚都躲起来不见他。就在这个时期他听到人们说：“如今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唯一区别就是，自由派去做五点的弥撒，而保守派去做八点的。”然而他如此坚持，四处奔走恳求，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东拼西凑，暗中不懈努力，结果在八个月里筹到的款项超过了乌尔苏拉埋藏的金币数目。于是他去拜访病中的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要他协助自己掀起一场全面战争。

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尽管瘫痪在摇椅上，但在一段时期内的确是唯一能够联络到起义军旧部的人物。自从尼兰迪亚停战协定签订以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寄身于打造小金鱼的作坊，他却与直到战败仍忠心耿耿的部下保持着联系。他和他们一起打着一场屈辱的日常战争，其中充满恳求与申请：“请您明天再来”，“就快了”，“我们正在认真研究您的问题”；打着一场彻底失败的战争，败给了那些“您忠实恭顺的仆人”，他们应该签发但从未签发养老抚恤金。另一场血腥的战争延续了二十年，却不曾像这场无限拖延、日日消磨的战争带给他们如此多伤害。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曾躲过三次暗杀，五次受伤大难不死，身经百战安然无恙，却败给了无尽的等待，屈服于凄凉的晚景，在一间借来的光线昏暗的屋子里想着阿玛兰妲。最后一批他知晓下落的老兵出现在报纸上的照片里，卑顺地仰着面孔，身旁站着不知名的共和国总统。他赏赐他们铸有自己头像的金扣子别在衣领上，又归还给他们一面染着鲜血和硝烟污痕的战旗，以备日后覆在棺材上。另一些人更有骨气，在社会救济的荫庇下仍苦苦等待回音，他们或因饥饿而死，或怀着一腔怒火苟活，或在精致的荣誉粪堆中衰老腐烂。因此，当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邀请他发动一场殊死决战，彻底铲除外国入侵者扶植的腐败可耻的政府，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不禁因同情而颤抖起来。

“噢，奥雷里亚诺，”他叹气道，“我知道你老了，可现在才明白你比看起来的样子还要老得多。”

十三

在最后惶惑的几年，乌尔苏拉几乎无暇顾及对何塞·阿尔卡蒂奥的教皇培养，一转眼就到了他该收拾行装去上神学院的时候。他的妹妹梅梅，夹在费尔南达的严厉和阿玛兰妲的幽怨之间，几乎同时到了预定的年龄，该送到修女开办的学校，她将在那里被培养成古钢琴大师。乌尔苏拉十分苦恼，她怀疑自己的方法是否有效，竟调教出这样一位倦怠的见习教皇，但她没有归咎于自己老年蹒跚的步履、视物模糊的翳障，而是怪罪于某种她说不清的东西，只能模糊地想象为时代的逐渐衰败。“如今的日子不比从前了。”她常这么说，感到失去了对日常现实的把握。以前，她觉得孩子们很久也长不大。只要想想，过了多长时间长子何塞·阿尔卡蒂奥才跟着吉卜赛人离开，又过了多久之后他才刺了一身蟒蛇似的花纹，带着满口占星术士的腔调回家，而在阿玛兰妲和阿尔卡蒂奥忘掉印第安人的语言学会卡斯蒂利亚语之前家里又发生了多少事。再想想可怜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栗树下经历了多少天烈日与寒露，她为他的去世又哭过多少回，然后是经历无数战事、为家人带来无数忧愁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奄奄一息中被抬回家来，当时他还不满五十岁。过去，她做了整整一天的糖果小动物仍有时间照顾孩子，检查他们的眼白看是否需要一剂麻油。而现在，她无事可做，驮着何塞·阿尔卡蒂奥从早到晚游逛，这分外匆忙的时光流逝却使得她做起事来全都半途而废。事实上乌尔苏拉虽然连自己的年岁都已忘记却仍不服老。她四处碍事却又想事事插手，连外乡人也厌烦了她不停的询问，问他们在战争时期可曾寄存一尊圣约瑟石膏雕像，等过了雨季再取走。没人确切知道她从何时开始丧失视力。最后几年她已经卧床不起，但仍表现得仿佛只是衰老所致，没有人察觉到她的失明。她在何塞·阿尔卡蒂奥出生之前便

意识到了这一异常。一开始她以为只是暂时的视力衰退，偷偷服用骨髓糖浆并往眼睛里滴蜂蜜，但不久便渐渐确认自己已经无可挽回地陷入黑暗，以至于对电灯这一新发明一直没有明确的概念，因为第一批电灯泡装上时她只能隐约感受到那光亮。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那等于公开承认自己的无用。她暗中用心记下东西的位置、人们的声音，继续凭记忆“观看”患白内障后看不到的事物。到后来她意外地发现了气味的助益，在黑暗中据此分辨东西远比凭借体积和颜色更为有效，她由此终于免去了认输的羞耻。在黑暗的房间里，她能穿针缝扣，还知道牛奶何时会煮沸。她对所有东西的位置了如指掌，有时连她自己都忘记她已失明。有一次，费尔南达因丢失了结婚戒指把家里搅得地覆天翻，最后还是乌尔苏拉在孩子们房间的壁架上找到。其实很简单，当其他人漫不经心地四下走动时，乌尔苏拉用剩余的四种感官关注着他们，免得被他们不小心撞到；一段时间后她发现家里的每个人每天都在无意中重复同样的路线，做同样的事，甚至在同一时刻说同样的话。只有当他们偏离这些刻板的常规时，才会有丢东西的危险。因此乌尔苏拉听见费尔南达为丢了戒指而沮丧，立刻想起她当天所做唯一与往日不同的事就是晾晒孩子们的床席，因为前一天夜里梅梅发现了一只跳蚤。那时孩子们也帮忙干活，由此乌尔苏拉想到费尔南达一定是将戒指放在了他们唯一够不着的地方—壁架上。而费尔南达只在她平常经过的路线上寻找，殊不知寻找失物会受到日常习惯的妨碍，因此总是难以找到。

乌尔苏拉竭力跟上家里的一切细微变化，而抚养何塞·阿尔卡蒂奥正帮了她的忙。她注意到阿玛兰妲在为卧室里的圣徒像换衣服，便装作要教孩子辨别颜色。

“来，”她对他说，“告诉我天使长圣拉斐尔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

就这样，孩子提供了她双眼无法获得的信息，而早在他离家去神学院学习之前，她就已经能够凭着圣徒像衣服的质地来分辨不同的颜

色。但有时也会发生意外。一天下午，阿玛兰妲在秋海棠长廊里绣花，乌尔苏拉一下撞在她身上。

“上帝啊，”阿玛兰妲抱怨道，“请您走路看着点儿。”

“这得怪你，”乌尔苏拉说，“你坐在不该坐的地方。”

她觉得自己是对的。但从那天起，她意识到从没有人发现过的一件事，即一年中太阳的位置不断发生细微的变化，坐在长廊里的人也会不知不觉随之挪动。从那以后，乌尔苏拉只需记得日期，就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阿玛兰妲所坐的位置。尽管双手颤抖得越来越明显，双脚越来越沉重，她瘦小的身影却从未那样活跃，同时在无数地方出现。她几乎像当年操持整个家时一样忙碌。然而，在晚年无法穿透的孤独中，她获得了非凡的洞察力，能察觉到家中任何不起眼的小事，也第一次看清了过去因忙碌而忽略的真相。在培养何塞·阿尔卡蒂奥为上神学院作准备的那段时期，她细细回顾了马孔多创建以来家中的大事小情，彻底改变了对子孙的一贯看法。她意识到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并非像她想的那样，由于战争的摧残而丧失对家人的情感，实际上他从未爱过任何人，包括妻子蕾梅黛丝和一夜风流后随即从他生命中消失的无数女人，更不必提他的儿子们。她猜到他并非像所有人想的那样为着某种理想发动那些战争，也并非像所有人想的那样因为疲倦而放弃了近在眼前的胜利，实际上他成功和失败都因为同一个原因，即纯粹、罪恶的自大。她最终得出结论，自己不惜为他付出生命的这个儿子，不过是个无力去爱的人。他还在她腹中的时候，一天晚上她听见他哭泣。那清晰可辨的哭声惊醒了身边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他高兴地认定儿子拥有腹语能力。其他人则预测他会成为一个预言家。而她却浑身颤抖，确信这深沉的哭号正是那可怕的猪尾巴的最初征兆，恳求上帝让他死在腹中。然而晚年的洞察力使她明白—这一点她也多次向人提起—胎儿在母腹中的哭泣不是腹语或预言能力的先兆，而是缺乏爱的能力的明显信号。儿子身上的光环剥落，反而在她心里激起所有他应得的同情。至于阿玛兰妲，那孩子

的铁石心肠曾令她恐惧，她刻骨的痛苦曾令她痛苦，但现在她终于发现阿玛兰妲才是世上从未有过的最温柔的女人。她怀着惋惜的心情弄明白了，阿玛兰妲令皮埃特罗·克雷斯皮遭受那些不公平的折磨，并非像所有人想的那样是出于报复心理；令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日夜煎熬徒劳等待，也并非像所有人想的那样是出于痛苦的怨毒。实际上，这两样行为都属于无穷的爱意与无法战胜的胆怯之间的殊死较量，最终胜出的是阿玛兰妲毫无理由的恐惧，恐惧的对象是她自己饱受折磨的心灵。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乌尔苏拉开始呼唤丽贝卡的名字。迟来的悔恨和突如其来的敬意激发了旧日的亲情，她明白只有丽贝卡，从未喝过自己的奶水只以地上的泥土和墙上的石灰为食的丽贝卡，血管中流淌的不是自己的血液而是陌生人的陌生血液—他们的骨殖仍在坟墓里咯咯作响—拥有冲动心性和炽热情欲的丽贝卡，才拥有无畏的勇气，而那正是乌尔苏拉希望自己的后代具备的品质。

“丽贝卡，”她说着，手在墙壁上摸索，“我们对你太不公平！”

家里人以为她失去了理智，自从她走路时像天使长加百列一样高举右手，人们便认定了这一判断。但费尔南达却发现她失常的阴影中隐藏着明察秋毫的光亮，因为她能毫不犹豫地说出家中上一年的开销。阿玛兰妲也持相似的看法。一天，她母亲在厨房搅拌着一锅汤，并不知道有人在一旁，却突然说起当初从第一拨吉卜赛人那里买来的玉米磨早在何塞·阿尔卡蒂奥六十五次周游世界之前就已丢失，可它其实还在庇拉尔·特尔内拉家里。庇拉尔·特尔内拉也将近百岁，依然身体健康，充满活力，只是出奇肥胖，到了能吓跑小孩的地步，就像当年她的笑声能惊飞鸽群一样。她对乌尔苏拉的本领毫不奇怪，因为她凭自己的经验开始明白，老年人的清醒判断会比纸牌算命更精准。

然而，当乌尔苏拉意识到她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何塞·阿尔卡蒂奥来坚定志向，立时因沮丧而陷入迷惘。她试图用眼睛去看那些本可以靠直觉看得更清楚的东西，于是开始频频出错。一天早上，她把

一瓶墨水误当作花露水倒在孩子头上。她执意四处插手却造成无数麻烦，弄得自己也情绪恶劣，烦躁不安，一心想要挣脱如蛛网般缠着自己的黑暗。这时她并未将自己的笨拙视作衰老与黑暗的最初胜利，而是归咎于时光的错误。她想起以前，上帝还没让岁月缩水如同土耳其商人丈量花布时偷减尺寸，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如今不仅孩子们长得更快，连人的情感也变了样。美人儿蕾梅黛丝连身体带灵魂才升天，凉薄的费尔南达就在角落里踱来踱去，为那些被卷走的床单愤愤不平。奥雷里亚诺们在坟墓里尸骨未寒，奥雷里亚诺第二就又点亮家中的灯火，聚上一群醉汉拉起手风琴，浑身浇透香槟酒，仿佛被害的不是基督徒而只是几条狗，仿佛用无数的操劳和无数的糖果小动物换来的这个疯人之家注定要沦为堕落的垃圾场。她想到这些的时候，家人正为何塞·阿尔卡蒂奥准备行李。乌尔苏拉又不禁自问是否应当索性躺进坟墓让人埋土，并毫无顾忌地质询上帝是否真的认为人心如铁足以经受这许多痛苦的折磨。她问了又问，愈加惶惑，并感到无可抑制的强烈欲望涌上心头，想要像外乡人一样破口大骂，想要让自己最终能放任片刻，那是她渴求已久却反复拖延的时刻，在这一时刻她不再逆来顺受，而要痛骂一场，把整整一个世纪忍气吞声压在心底的无数污言秽语一吐为快。

“妈的！”她叫了一声。

阿玛兰妲正要把衣服收进箱子，以为她被蝎子蜇了。

“在哪儿？”她警觉地问道。

“什么？”

“虫子！”阿玛兰妲解释道。

乌尔苏拉伸出一根手指指向心脏部位。

“这儿。”她回答。

星期四下午两点，何塞·阿尔卡蒂奥离家去了神学院。乌尔苏拉将会永远记得想象中他告别时的样子：无精打采而又神情严肃，像她教导过的那样没流一滴泪；身穿配铜扣的绿呢正装，颈系浆过的领

结，热得透不过气来。饭厅里满是她为了掌握他的行踪而洒在他头上的花露水气味。在饯行午宴上，家人用欢快的表情掩饰内心的不安，以夸张的热情回应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的妙语。当天鹅绒包面、四角镶银的箱子被搬出时，活像是从家里抬出一口棺材。唯一拒绝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就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

“这下麻烦事全齐了，”他愤愤道，“一个教皇！”

三个月后，奥雷里亚诺第二和费尔南达把梅梅送到学校，带回一架击弦古钢琴代替了原先的自动钢琴。正是在这个时候阿玛兰妲开始织起自己的寿衣。香蕉引发的狂热已经平息下去。马孔多的老住户被外乡人挤到边缘，勉强守住旧日的营生，但仍深感庆幸仿佛遭遇了一场海难劫后余生。家里依旧招待客人吃午饭，一直要等到多年以后香蕉公司离开时，昔日的生活才得以恢复。然而好客的传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现在是费尔南达发号施令。乌尔苏拉被遗忘在黑暗中，阿玛兰妲只顾织寿衣，旧日的见习女王终于掌控了选择宾客的权力，并将承袭自父母的森严规矩强加给他们。在这样一个外乡人胡乱挥霍轻易得来的财富，闹得四处乌烟瘴气的市镇上，她的严厉举措却将家里变成旧习俗的堡垒。对她而言，只有和香蕉公司无涉的人才是体面人，就此毫无通融余地。连小叔子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也成为她歧视之下的牺牲品，因为他早在第一波狂潮中就将自己优异的斗鸡全部出手，当上了香蕉公司的庄园监工。

“只要他还长着外乡人的疖子，”费尔南达说，“就别想进这个家门。”

家中限制如此之严，相形之下奥雷里亚诺第二更体会到在佩特拉·科特斯那里的舒适。起初，他借口减轻妻子的负担，将宴会转移过去。后来，又借口牲畜的繁殖力下降，将牛棚和马厩移走。最后，借口情妇家更凉快，将打理生意的小办公室也移了去。等费尔南达发觉丈夫还在世自己就成了寡妇，已经错过了挽救的时机。奥雷里亚诺第二几乎不在家里吃饭，虽然还陪妻子过夜，但这些表面维持的假象已

经无法瞒过任何人。一天晚上，他由于疏忽在佩特拉·科特斯的床上过了一夜。出乎他的意料，费尔南达既无一句斥责也无一声幽怨，只是在次日把他的两箱衣物送到他情妇家里。她有意挑选大白天，又命人抬着箱子走在街道中央，好让所有人看到，以为这样做能使迷途的丈夫羞愧难当，低头回归正道。然而这一英勇壮举只是再次证明费尔南达不仅根本不了解自己的丈夫，而且也不了解这个与她父母所处完全不同的社区，因为所有看到衣箱经过的人都认为这是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的必然结局，奥雷里亚诺第二则连续三天大摆筵席庆祝获得自由。对他妻子尤为不利的是，当她因颜色阴郁垂至脚踵的长袍、散发陈腐气息的诸多圣牌和不合时宜的高傲显得未老先衰，那位情妇却身裹华丽的真丝衣裙，眼中因旧情重燃漾出虎纹一样的光彩，像是再度焕发青春。奥雷里亚诺第二对她重又萌发了年轻时的激情，那时佩特拉·科特斯将他错认为他的孪生兄弟而爱他，同时与两人睡觉，并相信是上帝赐予好运让自己拥有这样的男人，做起爱来好像两个不同的人。这重拾的激情如此炽烈，两人不止一次正要吃饭，只因眼波交错，无需只言片语就立刻盖上饭菜，忍着饥饿去卧室里极尽欢爱。奥雷里亚诺第二从偷偷拜访法国女郎的几次经历中受到启发，为佩特拉·科特斯买了一张带主教式华盖的床，在窗前挂起天鹅绒窗帘，在天花板和墙壁上镶满水晶镜面。他从未像那时一般喜爱欢宴，大肆挥霍。每天十一点抵达的火车为他运来一箱又一箱的香槟和白兰地。从车站回家的路上，他像跳昆比安巴舞时即兴邀请舞伴一样将所有碰见的人拉去赴宴，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乡人，认识的还是即将认识的，一概都在邀请之列。连只会说外语的布朗先生那样难以捉摸的人物，也被奥雷里亚诺第二诱人的表情和手势招引来，一次次在佩特拉·科特斯家烂醉如泥，甚至在手风琴的乐声中胡乱哼唱得克萨斯民歌，让一直跟在身边的德国猛犬伴着歌声跳舞。

“让一让，母牛们，”奥雷里亚诺第二在狂欢的高潮时分喊道，“让一让，生命短暂啊。”

他气色从未那样好过，他本人从未像那样广受爱戴，他的畜群也从未像那样疯狂地繁殖。那么多的猪、牛、鸡在无休无止的宴席中被屠宰，院中泥土在无数鲜血的浇灌下变得淤软乌黑。那里成了永久垃圾场，骨骸内脏遍地，残羹剩饭成堆，人们不得不一直燃放炸药吓走秃鹫，以免它们啄出宾客的眼珠来。奥雷里亚诺第二变得肥硕臃肿，面色红中透紫，走路像乌龟般迟缓。这都要归因于他奇佳的胃口，只有周游世界归来时的何塞·阿尔卡蒂奥才能比得上。耸人听闻的贪食，一掷千金的豪气，无人可比的好客，他的名声越出大泽区的边界，吸引了沿海一带最知名的老饕。神奇的饭桌精英从四面八方赶到，参加在佩特拉·科特斯家举行的疯狂的饕餮大赛。奥雷里亚诺第二保持常胜不败，直到那个不祥的星期六卡米拉·萨迦丝杜梅出现，这个图腾般的女人以“母象”的美名享誉全国。比赛一直持续到星期二清晨。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里，奥雷里亚诺第二就着木薯、山药和烤香蕉吃掉一头牛，喝下一箱半香槟，对胜利充满信心。比起波澜不惊的对手，他看起来兴奋活跃得多。对手明显更具专业风范，但也正因如此在挤满屋子的各路观众眼中显得缺乏激情。奥雷里亚诺第二在求胜欲望驱使下张口大嚼的同时，“母象”施展外科医生般的技艺将肉细细分解，慢慢享用，甚至带有几分愉悦。她体形巨大敦实，但壮硕的身架掩不住女性的温情。她脸庞秀美，纤细的双手保养得当，浑身散发出不可抗拒的个人魅力，奥雷里亚诺第二在她进门时低声说，自己宁愿和她在床上而不是在桌上比赛。后来看到她吃下整整一扇牛肉仍保持着淑女的最佳仪态，他严肃地评价道，这头娇柔迷人而又胃口奇佳的长鼻动物从某种角度来看正是理想的女人类型。他说得不错。得名“母象”之前，她一度被称为“兀鹫”，这实在没有道理可言。她不像流言所说是杀牛碎骨的屠夫，也不是希腊马戏团里长胡子的悍妇，而是一所声乐学校的校长。她开始学习进食技巧时已是一位可敬的母亲，她这么做是为了找到合适的方式让自己的儿女吃得更好，即不靠人为刺激，而是凭借精神的绝对平静。她那已被实践证明的理论基于

以下原则：一个人只要能完全拥有良心上的安宁，就可以不断进食直到疲惫无力为止。因此，她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而非竞技方面的兴趣才离开学校和家庭，来与这个以无所顾忌的大胃王之名享誉全国的男人比试。她第一眼看到奥雷里亚诺第二，就意识到他不会输在胃上，却会输在性格上。第一个夜晚过去，“母象”依然不动声色，奥雷里亚诺第二却因为说笑太多而渐渐困乏。他们睡了四个小时。醒来的时候，每人喝下五十个橙子榨出的果汁、八升咖啡，吃了三十个生鸡蛋。到第二个早上，两人都许久未眠，又吃下两头猪、一把香蕉和四箱香槟。“母象”怀疑奥雷里亚诺第二也在无意中发现了同样的进食诀窍，但区别在于他是从彻底放纵的荒唐之道中领悟的。这样他就比她预想的更为危险。然而在佩特拉·科特斯端上两只烤火鸡时，奥雷里亚诺第二的肚子已快撑到极限。

“如果吃不了，就别再吃了，”“母象”说，“我们算打成平手。”

她说这话是出于真心，知道自己眼看要将对手逼死，在懊悔中再无法咽下任何食物。但奥雷里亚诺第二将这话错当成新的挑战而猛吞火鸡，结果连他惊人的巨胃也无法承受。他失去了知觉，一头扎在盛残骨的盘子里，像狗一样口吐白沫，发出窒息垂死时的嘶嘶声。他感觉在黑暗中被人从一座塔的顶端扔下，坠向无底的深渊，并在最后一线清醒的光亮中意识到在这没完没了的下落尽头等待他的是死亡。

“带我去费尔南达那里。”他挤出了这句话。

朋友们把他送回家，认为他算是履行了对妻子的承诺，没有死在情妇的床上。佩特拉·科特斯把他想要穿到棺材里去的那双漆皮靴打好鞋油，正四处找人要给他送去，这时却有人来告诉她说奥雷里亚诺第二已脱离危险。实际上他不到一个星期就康复了，十五天后举办了规模空前的筵席庆祝大难不死。他仍然住在佩特拉·科特斯家里，但每天都去看望费尔南达，有时还会留下来和家人吃饭，仿佛命运颠倒了事物，使他变成了情人的丈夫、妻子的情人。

这对费尔南达而言是一种宽慰。遭冷落时，她排解烦闷的方法只剩下在午休时间弹奏古钢琴和阅读儿女的来信。在半月一封寄给他们的信中，她没写一句真话。她对儿女避而不言自己的痛苦，刻意隐去家中的悲哀。尽管阳光仍照耀在秋海棠上，午后两点依然炎热难耐，欢闹声还不时从街上传来，这个家却越来越像她父母那座殖民时代的深宅。费尔南达游荡于三个活着的鬼魂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死去的鬼魂之间，后者在她弹奏古钢琴时，偶尔会坐在客厅的阴影里，露出探询的目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恍如一个影子。自从上次出门去找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要发动一场无望的战争之后，他除了到栗树下小便几乎从未离开作坊。他只允许理发师每三个星期登门一次，旁人一概不见。乌尔苏拉每天给他送一次饭，送什么他便吃什么。他制作小金鱼的热情未减，但自从听说人们买去不是当作首饰而是当作历史遗物，就不再出售。他把蕾梅黛丝那些从成婚时起就装饰在卧室里的娃娃拿到院里付之一炬。警觉的乌尔苏拉发现了儿子的举动，却没能制止。

“你心肠硬得像石头。”她对他说。

“这不是心肠的问题。”他回答，“房间里全是蛀虫。”

阿玛兰妲在织她的寿衣。费尔南达不理解她为什么不时给梅梅写信，还寄去礼物，但对何塞·阿尔卡蒂奥却提都不愿提起。“你们到死也不会明白。”当她通过乌尔苏拉询问原因时，阿玛兰妲这样回答，而这一回答在她心中种下的疑问，永远也没有得到解答。身材高挑瘦削，神情高傲，总穿着宽松的泡泡纱裙，顽强地抗拒岁月流逝以及苦痛记忆的侵蚀，阿玛兰妲仿佛在前额上刻着代表贞洁的灰烬十字。其实真正的记号在她手上，在她睡觉时也不摘下并且总是亲手清洗熨平的黑纱上。时间在她织绣寿衣的指缝间流逝。在人们的印象中，她似乎白天织晚上拆，却不是为了借此击败孤独，恰恰相反，为的是持守孤独。

在被遗弃的岁月里，费尔南达最担心的是梅梅放假回家却见不到奥雷里亚诺第二。那次暴食晕厥事件结束了她的担忧。梅梅回来的时候，她父母已经商定，不仅要让女儿相信奥雷里亚诺第二仍是个顾家的丈夫，还要避免让她察觉到家里的悲凉气息。每年的那两个月，奥雷里亚诺第二扮演起模范丈夫的角色，举办有冰激凌和小饼干的聚会，其间由这个活泼开朗的女学生弹奏古钢琴助兴。从那时就可明显看出，她没有继承母亲的性格。她更像是阿玛兰妲的缩影，仿如十二三岁时的她，还浑然不知伤心的滋味，走起路来仿佛踩着舞步，为家里平添生机，直到对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的秘密激情永远扭曲了她的心灵。但与阿玛兰妲不同，与所有家人都不同，梅梅尚未表现出继承自家族的孤独宿命，看上去完全与外界融成一片，只是到了下午两点会雷打不动地关在客厅里练习古钢琴。很明显她喜欢这个家，一整年都期盼着回家后在年轻人中引发的那种欢腾。她喜爱聚会和殷勤好客的性情与父亲相去不远。这一灾难性遗传的最初征兆显露于第三个假期，梅梅事先没打招呼，自作主张邀请了四位修女和六十八个同学来家里度假一周。

“太不幸了！”费尔南达哀叹道，“这孩子和她父亲一样荒唐！”

家里不得不向邻居借床及吊床，让她们分成九组就餐，排定沐浴时刻，并借来四十张凳子好让这些穿着蓝色校服和男式靴子的姑娘安稳片刻。这是一次失败的邀请，因为这些唧唧喳喳的女学生刚刚吃完早饭，不一会儿又得开始排队吃午饭，然后是晚饭，整整一个星期只来得及去种植园散了一次步。到了晚上，修女们个个精疲力竭，无法动弹也无力再下达命令，而不知疲惫的女学生们仍在院中高唱乏味的校歌。一天，她们险些踩到乌尔苏拉身上，因为她总是坚持要帮忙，结果越帮越忙。另一天，修女们一阵大乱，因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栗树下小便，毫不顾及院中有女学生在场。阿玛兰妲也险些制造出恐慌，当时一位修女走进厨房看见她正往汤里放盐，一时觉得没话可说，便问她那白色粉末是什么。

“砒霜。”阿玛兰妲答道。

到达的当天晚上，女学生们为了在睡前如厕乱成一团，直到凌晨一点还有人没轮到。于是费尔南达买来七十二个便盆，但结果只是把夜里的难题推迟到早上，因为一清早女学生们就在厕所门前排起长队，每人手持自己的便盆等着刷洗。尽管有人发烧，不少人身上因蚊虫叮咬而发炎，但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不屈的耐力，能战胜最艰巨的困难，甚至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刻还在花园里跑来跑去。等她们终于离开时，家里鲜花萎地，家具破损，墙壁上满是涂鸦，但费尔南达因她们的离开而备感轻松，也就原谅了她们造成的破坏。她将借来的床和凳子归还，把七十二个便盆收进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那个紧锁的房间，一度指引过家中精神生活的方向，从此以后遂被称为“便盆室”。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看来，这才是最合适的名字，因为在家里其他人惊讶于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历经岁月侵蚀仍一尘不染的时候，他就已看出里面垃圾成堆。说到底他本不在乎究竟谁看到的才是真相，他得知那房间的归宿也只是因为整整一下午费尔南达都在摆放便盆，进进出出打扰了他的工作。

那些天里，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又在家中出现。他穿过长廊，没和任何人打招呼，一头钻进作坊与上校交谈起来。尽管眼不能见，乌尔苏拉却听出了他那代表监工身份的皮靴声，惊讶于他与家人之间，包括与他的孪生兄弟之间无法消弭的隔阂，他们童年时曾一起上演奇妙的换名游戏，现在却已不剩任何相似之处。他瘦削，严肃，总带着一副沉思的神态和几分撒拉逊人的忧郁，暮色沉沉的脸上闪烁着凄凉的光亮。他最像他们的母亲，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乌尔苏拉在说起家人的时候常忘掉他，并因此而自责。但当她感觉到他又在家中出现，而且注意到上校是在干活的时候允许他进了作坊，不由再次检视往日的记忆，从而确认了在童年的某个时刻他一定与孪生兄弟换了身份，应该是他而不是他的兄弟叫奥雷里亚诺这个名字。没人了解他的生活细节。据说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固定住所，在庇拉尔·特尔

内拉家里养斗鸡，有时也睡在那里，但一般都会在法国女郎的房间里过夜。他胡乱度日，不动感情，毫无志气，仿佛乌尔苏拉星系中的一颗流星。

事实上，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不属于这个家，也从未属于任何一个，这都要追溯到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带他去军营观看枪决的那个遥远的清晨。他终其一生也无法忘记那个死刑犯悲伤而略带嘲弄的笑容。那是他最早也是唯一的童年记忆。另一段记忆，关于一个身穿不合时宜的坎肩、头戴鸦翼状礼帽，在明亮的窗前谈玄说异的老人的记忆，他却不知道该归于哪一时期。那是一段模糊的记忆，毫无教益也不令人怀念，而对死刑犯的记忆则截然不同，不仅实际确定了他一生的走向，而且随着年纪渐长反而愈加清晰，仿佛流逝的时光使他与往事日益接近。乌尔苏拉想托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帮忙让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走出幽闭。“劝他去看看电影，”她对他说，“就算他不喜欢看电影，起码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她很快发现他与上校一样对自己的恳求充耳不闻，两人都是铁石心肠，不为情所动。尽管她无从得知，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两人关在作坊里长谈时究竟说了些什么，但她却明白家里只有这两人是因相似而走到一起。

事实上，即使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也无法将上校从幽闭中拉出来。女学生的侵扰已经耗尽他的耐心。尽管烧毁了蕾梅黛丝可爱的娃娃，他仍以卧室里蛀虫太多为借口，在作坊里支起吊床，除了去院中大小便以外再不离开。乌尔苏拉连跟他随便聊天都做不到。她知道他只顾着打制小金鱼，对盘里的食物看也不看就推到桌角，不在乎汤里油渐凝肉已冷。自从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拒绝帮助他在晚年发动一场战争，他一天天变得愈加冷酷。他紧紧封闭起自己的内心，家人最后就权当他已不在人世。他再没有表现出任何人性的反应，直到有一年的十月十一日他出门去看马戏团游行。对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来说，那一天与他最后几年中的任何一天都没什么两样。清晨五点，他被墙外蟾蜍和蟋蟀的齐鸣惊醒。绵绵细雨从星期六开始就没

有停歇，他即使不曾听到花园枝叶上的淅沥声，也能从自己骨头中的寒意里察觉到。他与往常一样裹着羊毛毯，穿着粗棉布衬裤。他还沿用旧年间的过时名谓称这裤子为“哥特佬衬裤”，但图舒适一直穿着。他套上紧身裤，但没有系上带子，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在衬衣领口别上金纽扣，因为他准备马上洗澡。随后他把毯子披到头上好像兜帽，用手指捋捋脏污的髭须，就去院中小便。离太阳出来还有好些时候，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还在泡了雨水而腐烂的棕榈棚下打盹。上校像往常一样没看见他，也没听见他的鬼魂因热尿溅在靴子上被惊醒时所说的难解的言语。他决定晚些时候洗澡，不是因为寒冷和潮湿，而是因为十月里沉闷的雾气。回作坊的路上，他闻到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用来点燃炉灶的火捻的气味，便到厨房里等待咖啡煮开，好取走自己不加糖的那一杯。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像每天清晨那样问他那天是星期几，他回答说是星期二、十月十一日。他望着眼前这个被火光映成金色的沉稳女人，这个无论此时还是其他时刻都仿佛从未真实存在过的女人，忽然想起战事激烈时的另一个十月十一日，他因确信与他过夜的女人已死而突然惊醒。她的确死了，而他没有忘记那个日期，因为那女人在死前一小时曾问过他那天是星期几。在回忆中，这一次他仍未意识到往日的预感早已弃他而去。咖啡在沸腾，他纯粹出于好奇，不带丝毫怀旧的风险，想着那个他从未知晓姓名，从未见过她生前模样的女人，因为她是在黑暗中跌跌撞撞摸上他的吊床。然而，有太多女人以同样的方式进入他的生活，在他脑海中成为茫然一片，他记不起是否就是她在初会的狂热中几乎淹没在自己的眼泪里，并且在死前不到一小时还信誓旦旦要爱他到死。他不再想她，也不再想其他女人，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走进作坊，打开灯来数点存在铁皮罐里的小金鱼。有十七条。自从决定不再出售，他仍然每天做两条，等凑够二十五条就放到坩埚里熔化重做。他干了一上午活计，全神贯注，心无旁骛，没有察觉到十点的时候雨下大了，有人在作坊

前叫喊着关门别让水淹到家里；他甚至忘掉了自我，直到乌尔苏拉端着午饭进来并关了灯。

“这雨下的！”乌尔苏拉说。

“十月嘛。”他回答。

说话的时候，他并未从当天做的第一条小金鱼上移开视线，他正往鱼眼里镶嵌红宝石。直到做完小金鱼丢进罐子，他才开始喝汤。然后他不急不慌，慢慢吃下盛在同一个盘子里的洋葱炖肉、白米饭和炸香蕉片。他的胃口不受环境好坏的影响。午饭后，他感到一阵闲下来的空虚。出于一种科学的迷信，他在饭后消化的两小时内不干活、不阅读、不洗澡也不做爱。这种信念如此根深蒂固，早在战时他就曾为了避免士兵们消化不良而多次推迟行动。他躺在吊床上，用折叠小刀掏着耳朵，不到几分钟便睡着了。他梦见自己走进一幢空空的房子，墙壁雪白，还因为自己是第一个走进这房子的人而深感不安。在梦中，他记起前一夜以及近年来无数个夜晚自己都做过同样的梦，知道醒来时就会遗忘，因为这个不断重复的梦只能在梦中想起。果然，片刻后当理发师敲响作坊的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醒来，只觉得自己无意中睡了短短几秒钟，还来不及做梦。

“今天不用理了，”他对理发师说，“星期五见。”

他的胡须三天没刮，夹杂着白茸毛，但他觉得没必要刮，反正星期五可以在理发时一并解决。糟糕的小睡后，黏糊的汗水令他腋下疖子的旧疾又隐隐发作了。雨停了，但还没出太阳。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打了个响亮的嗝，嘴里泛起汤的酸味，仿佛是身体在下达命令，要他披上毯子去上厕所。他蹲在那里超出了必要的时间，脚下木箱中发酵的臭气直往上腾，最后还是习惯提醒他该回去干活了。在刚才等待的时间里，他又想到今天是星期二，香蕉公司的庄园里发工资的日子，所以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没来作坊。这一记忆和近年来所有的记忆一样，总会让他不知不觉想起战争。他记得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曾答应为他找一匹额间带白斑的马，此后却再没谈起这个

话题。随后他又想起其他纷杂的事情，却无意评判，因为既然无法引开思绪，他便学会了冷静地回想过往，不让那些无法删除的记忆勾起自己的情感。在回作坊的路上，他见空气开始变得干爽，觉得是洗澡的好时候，却被阿玛兰妲抢了先，于是便去制作当天的第二条小金鱼。在他嵌鱼尾的时候太阳出来了，射出炽烈的光芒如帆船破浪般吱嘎作响。空气经过三天细雨的洗涤，漫天都是飞蚁。这时他觉得想要小便，但一直拖到把小金鱼做完才去。四点十分，他向院子走去，忽然听见远处铜管奏乐、大鼓轰鸣、孩童欢呼。从年轻时代起，他第一次有意落入怀旧的陷阱，仿佛回到了吉卜赛人到来时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神奇下午。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丢下厨房里的活计，向门口跑去。

“是马戏团。”她喊道。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没有去栗树下，也走出门外，混在好奇的人群里观看游行。他看见一个女人穿得金光闪闪骑在大象的脖子上。他看见哀伤的单峰驼。他看见打扮成荷兰姑娘的熊用炒勺和菜锅敲出音乐节奏。他看见小丑在游行队尾表演杂耍。最后当队伍全部走过，街上只剩下空荡荡一片，空中满是飞蚁，几个好奇的人还在茫然观望时，他又一次看见了自己那可悲的孤独的脸。于是他向栗树走去，心里想着马戏团。小便的同时，他仍努力想着马戏团，却已经失去记忆。他像只小鸡一样把头缩在双肩里，额头抵上树干便一动不动了。家里人毫无察觉，直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去后院倒垃圾，忽然发现秃鹫正纷纷从天而降。

十四

梅梅的最后一个假期正赶上家人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守丧。家里大门紧闭，一切聚会取消。他们低声说话，安静进餐，每天三次念诵玫瑰经，连炎热的午休时分古钢琴练习都流露出举哀的悲音。费尔南达曾暗中对上校不满，但正是她严格规定以上守丧礼仪，同时惊讶于政府对死去的敌手大肆追缅。奥雷里亚诺第二照例在女儿休假期间睡在家里。费尔南达想必作出了某些努力来恢复合法妻子的权利，转过年来梅梅就多了一个新生的小妹妹，家人不顾做母亲的意愿，给她起名为阿玛兰妲·乌尔苏拉。

梅梅结束了学业。在专为庆祝她结业而举行，同时也代表服丧期结束的聚会上，她以精湛的技艺演奏十七世纪的流行曲目，证明她获得古钢琴琴师的证书是实至名归。比起她的技艺，她的双重性格更令宾客们惊叹。她举止浮泛，甚至有些幼稚，本不适合从事任何严肃的活动，但只要她在古钢琴前就座，立刻变成另一个迥然不同的少女，那份出人意表的沉稳给人以老成的印象。她一向如此。实际上她没有任何明显的天赋，但她为了不令母亲失望，通过严格的训练获得了最优异的成绩。如果当初强迫她学习的是其他技能，结果也会一样。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厌恶费尔南达的严苛以及为别人作决定的习惯，但仅仅为了不拂逆母亲的苛求，她完全能作出比上古钢琴课程更大的牺牲。在结业仪式上，她以为有了那张印着华丽的哥特体大写字母的羊皮纸，自己就能从责任中解脱出来，而当初她担起这份责任与其说是出于顺从，倒不如说是为了求个清静。她相信即使固执如费尔南达，也不会再为这样一种古旧的乐器费心，毕竟连修女们都将其视作博物馆里的化石。最初几年她以为自己的打算有误，因为在她走遍半个城市的各家客厅，并在马孔多举行的所有慈善晚会、学校会演、爱

国主义纪念活动上展露身手令人昏昏欲睡之后，她母亲仍在向所有看上去能欣赏女儿才华的新来者发出邀请。只有到阿玛兰妲死后，家中再次闭门服丧，梅梅才能锁起古钢琴，把钥匙落在某个衣柜里，连费尔南达也懒得查问遗失于何时又是出于谁的过错。梅梅四处表演时的坚韧不比刻苦学琴时逊色，这是她获得自由的代价。费尔南达对她的顺服极其满意，对她的琴艺引发的赞赏无比自豪，因而从不反对她往家里带来众多女友，在种植园度过午后时光，和奥雷里亚诺第二或可信任的女士去看电影，只要所看的片子是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在布道坛上允准的。在那些娱乐时间里梅梅才显露出自己的真正爱好。她的快乐正与自律相悖，她爱的是聚会的喧闹、情爱的八卦，以及和女友长时间关在房里学习抽烟和谈论男人。有一次，她们分喝了三瓶朗姆酒，最后脱光衣服相互测量和比较身体的各个部位。梅梅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她嚼着甘草根走进家门，坐到桌前，费尔南达和阿玛兰妲正吃着晚饭，互不理睬，都没有觉察到她的反常。她在一位女友的卧室里度过了疯狂的两个小时，又笑又怕哭个不停。在这场危机过去后，她获得了不寻常的勇气，想要逃离学校还要坦然告诉母亲不如拿古钢琴当作灌肠器。梅梅坐在桌首，喝着鸡汤，那汤在胃里仿佛令人重生的灵药。她看见费尔南达和阿玛兰妲周身笼罩在无视现实的可笑光晕中，极力克制才压下冲动，没去揭穿她们的做作、心灵的空虚以及自大的幻觉。从第二个假期起，她就知道父亲只是为了面子才住在家里。她对母亲一向了解，后来又设法认识了佩特拉·科特斯，就觉得父亲的选择不无道理。她也更愿意让父亲那个情妇做自己的母亲。梅梅仍带着酒意头脑昏沉，快乐地想象着如果这时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会引发怎样的热闹。她正为这促狭的念头暗暗得意，费尔南达已有所察觉。

“你怎么了？”她问。

“没什么，”梅梅回答，“我到现在才发现我多爱你们俩。”

阿玛兰妲听出了这宣告中明显的怨恨，吓了一跳。费尔南达却感动不已，但后来当梅梅在半夜醒来，头痛欲裂，胆汁吐了一身的时候，她险些疯了。她给梅梅服下一小瓶河狸油，往腹部敷上药泥，在额头放上冰袋，还强迫她遵照新来的古怪法国医生的要求，五天内节制饮食并足不出户。那位医生给梅梅检查两个多小时后得出一个含糊的结论，说她患上了某种妇科失调症。梅梅丧失了勇气，彻底陷入消沉，对这一切只有忍受。乌尔苏拉尽管已完全失明，依然活跃而清醒，只有她猜到了真正的病因。“照我看，”她心想，“这和醉鬼的表现没什么两样。”但她不仅摒弃了这念头，还为自己轻率的想法而自责。奥雷里亚诺第二看着梅梅委靡不振不由心中一阵绞痛，下定决心以后要多关心她。父女间愉快的伙伴关系就这样诞生，使他在一段时间里摆脱了盛宴中的孤独，也使她摆脱了费尔南达的监护，又不至于激发看起来势不可免的家庭冲突。奥雷里亚诺第二推开一切活动和梅梅在一起，带她去看电影或马戏，把大部分空闲时间都花在她身上。近年来，他已过度肥胖，甚至无法弯腰系鞋带，再加上过于放纵各种欲望，性格也变得恶劣。女儿使他恢复了往日的开朗，和女儿在一起的快乐令他渐渐远离放浪的生活。梅梅正当花季，她算不上美貌，就像阿玛兰妲一样，却单纯可亲，初次见面就能赢得别人的好感。她那现代派的性格与费尔南达陈腐的矜持做派以及遮掩不住的狭隘心胸格格不入，却得到了奥雷里亚诺第二的喜爱与维护。正是他让女儿搬出从小居住的那间卧室，摆脱了屋里从童年时代起就令她一直恐惧的圣徒像的惊悚眼神。他为她的新房间配备了豪华的卧床、大梳妆台和天鹅绒窗帘，丝毫没有意识到布置成了佩特拉·科特斯卧室的翻版。他对女儿慷慨大方，自己都不知道给了她多少钱，因为他总让她从兜里随意取用。他还给女儿买来香蕉公司商店里的所有美容新品，她的房间里摆满了磨甲的浮石垫、烫发的发夹、洁齿的牙膏、令眼神迷离的眼液，以及其他五光十色的新奇化妆品和美容用具。费尔南达每次走进女儿的房间都大为震惊，感觉她的梳妆台和那些法国女郎的简直没什

么两样。然而那个时期有两件事令费尔南达无暇分心，她在照料多病又任性的小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之外，还要忙于与隐身的医生们进行激动人心的通信。因此当她察觉到丈夫与女儿之间的亲密后，只能让奥雷里亚诺第二承诺永远不带梅梅去佩特拉·科特斯家。这一警告其实毫无必要，因为那个女人正为情人和他女儿的亲密无间吃醋，根本不愿与梅梅产生任何瓜葛。一种莫名的恐惧折磨着佩特拉·科特斯，仿佛直觉在告诉自己只要梅梅愿意就可以做到费尔南达做不到的事：夺走那份她自以为至死不渝的爱情。奥雷里亚诺第二第一次遭到情妇的冷落和讥嘲，不禁担心自己搬来运去的衣箱又要回到妻子身边。这种担心并未变成现实。没有谁像佩特拉·科特斯了解自己的情人那样了解一个男人，她明白衣箱会一直留下，因为说起来奥雷里亚诺第二如果有什么厌烦之事，那就是一切变动对生活造成的麻烦。衣箱仍待在原来的地方，佩特拉·科特斯则奋力运用做女儿的无法与之相争的唯一手段来夺回爱人。这同样是毫无必要的努力，因为梅梅根本不愿介入父亲的私事，而即使她愿意，也很可能会站在父亲的情妇这一边。她也没有时间为别人找麻烦。她每天自己整理床铺，打扫房间，就像修女们教导的那样。上午她忙着打理自己的衣服，或者在长廊里刺绣，或者用阿玛兰妲那台古老的手摇式缝纫机做活计。到别人午休的时候，她练上两个小时古钢琴，知道每日作出这样一点儿牺牲能使费尔南达心情平静。出于同样的原因，她继续在教会慈善义卖会和学校晚会上演奏，尽管邀请已日渐减少。到了傍晚，她化妆完毕就穿上简便的衣服和硬挺的高筒靴，不是和父亲出门就是去女友家，直待到晚饭时分。这时候，奥雷里亚诺第二多半会带她去看电影。

梅梅的女友中有三个美国姑娘，她们钻出电网鸡笼和马孔多的少女们建立了友谊。其中一个叫帕特里夏·布朗。出于对奥雷里亚诺第二慷慨招待的感谢，布朗先生也为梅梅敞开了自家的大门，邀请她参加星期六的舞会，那是美国佬和本地人共同参与的唯一活动。费尔南达知道后，暂时撇下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和隐身的医生，掀起一场轩

然大波。“你想想，”她对梅梅说，“上校在坟墓里会怎么看呢？”显然，她是在寻求乌尔苏拉的支持。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位失明的老妇人认为梅梅参加舞会并和同龄美国姑娘交友没什么不妥，只要她立场坚定不改信新教就好。梅梅很好地领会了高祖母的意思，舞会后第二天都会提早起床去望弥撒。费尔南达依然反对，直到有一天梅梅告诉她美国人想听自己弹奏古钢琴。古钢琴再次从家中运出，送到布朗先生家中，在那里年轻的演奏家赢得了最真诚的掌声和最热烈的祝贺。从此以后，他们邀请她参加舞会、星期天去泳池游泳，还每星期请她吃一次午饭。梅梅学会了游泳且游得相当专业，还学会了打网球和吃弗吉尼亚火腿配菠萝片。从舞会、泳池到网球场，她很快发现英语对她不再是难题。奥雷里亚诺第二因女儿的进步兴奋不已，于是从一个游商手中买下配有许多彩图的六卷本英语百科全书送给她，她就在空闲时阅读。读书取代了以前的情爱八卦、和女友一起进行的密室探险，这倒不是因为有人强迫，而是因为她不再有兴趣讨论已经众所周知的所谓秘密。回想起醉酒的经历，她只当作幼稚的冒险，并兴致盎然地讲给父亲听，结果奥雷里亚诺第二比当事人更觉有趣。他笑得喘不过气来，“要是让你母亲知道了”，每当她透露一个秘密他都会这样评论。他曾经让女儿答应以同样的信任告诉他初恋的进展，而梅梅也向他倾诉过自己对一个随父母来度假的美国红发男孩的好感。“好家伙，”奥雷里亚诺第二笑道，“要是让你母亲知道了……”但梅梅又告诉他那男孩已经回国，再也没有消息。她周全的考虑确保了家中的和睦。奥雷里亚诺第二有了更多时间花在佩特拉·科特斯那里，尽管身心都不允许他再像当年那般大宴宾客，但他仍不放过宴饮作乐的机会，再次拿出自己的手风琴，那琴上已经有些按键松动要用鞋带系住。在家里，阿玛兰妲织着那永远织不完的寿衣，乌尔苏拉则任凭自己被衰老引向幽暗深处，那里唯一可见的就是栗树下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的鬼魂。费尔南达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在每月寄给儿子何塞·阿尔卡蒂奥的信里没再写一句谎言，只是略去了自己和隐身的

医生通信一节。他们诊断出她的大肠里有个良性肿瘤，正准备运用通灵术实施治疗。

如果不是阿玛兰妲不合时宜的死亡引发新的动荡，布恩迪亚家衰颓宅院中安静恬和的日子或许能持续很久。这一事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虽然衰老又孤僻离群，但看起来依然结实挺拔，一如往常健康得好像磐石。自从那个下午她彻底拒绝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并关在房中痛哭，再没有人能窥见她的内心。她在走出房门的那一刻，已经耗尽所有的眼泪。从此再没见她哭过，不管是在美人儿蕾梅黛丝升天的时候、奥雷里亚诺们遇害的时候，还是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去世的时候。上校是她在这世上最爱的人，尽管直到他的尸体在栗树下被发现时她才表现出这一点。她去帮忙抬运尸体。她为他穿上军装，刮胡子，梳头发，给髭须上蜡，比他自己在光荣岁月中做得还好。没有人觉察到其中的爱意，因为他们都已见惯阿玛兰妲熟练地处理丧葬事宜。费尔南达惊诧于她对天主教与生活的关系一无所知，只懂得天主教与死亡的关联，仿佛那不是一种宗教，而只是一套丧葬习俗的手册。阿玛兰妲太过沉浸于自己的回忆，无法理解那些精微的教理。她人老了，心中的往事却依然鲜活。她听到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的华尔兹舞曲时，想哭的欲望一如年轻时涌上心来，仿佛流逝的时间和往日的教训都没留下痕迹。那些她借口受潮发霉而亲手扔进垃圾桶的乐谱纸带，依然在记忆中转动令琴槌敲击不停。她曾经试图在与侄子奥雷里亚诺·何塞窘迫的激情中将记忆淹没，试图在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稳重阳刚的庇护下藏身，但都是枉然，连她老年时最绝望的举措也归于徒劳。还在小何塞·阿尔卡蒂奥被送去神学院之前三年，她为他洗澡时用的爱抚方式就不像是老祖母对待孙儿，更像是女人对待男人，如同传言中法国女郎们所做的那样，也如同十二岁和十四岁的她看见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穿着紧身舞蹈长裤随着节拍器的拍子舞动魔杖时想要对他做的那样。她有时为自己没能阻止这一悲惨的暗流而痛苦，有时愤怒得甚至用针扎手指，然而最令她痛苦最令她

愤怒最令她心酸的却是爱情这棵芳香四溢却暗遭虫蛀的番石榴树正渐渐走向死亡。就像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总想起战争一样，她不可避免地想起丽贝卡。她兄长可以看淡记忆，她却只能让它越发灼烫。多年间她对上帝的唯一祈求，就是不要让自己遭受惩罚死在丽贝卡之前。每次路过丽贝卡的家，看着房子日渐破败，她便心满意足地以为上帝垂听了她的祈求。一天下午，她在长廊里缝纫，突然冒出一个念头，确信自己会坐在这里，以同样的姿势并在同一束阳光下听见丽贝卡的死讯传来。她坐下等待，仿佛在等一封信。一段时间里，她拆下扣子又缝上，让等待变得不那么漫长难耐。家里没人注意到阿玛兰妲在为丽贝卡缝制一件精美的寿衣。后来，当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说看见丽贝卡形如鬼魂，皮肤遍布裂纹，头顶黄发稀疏，阿玛兰妲丝毫不觉惊奇，因为他描述的鬼魂和她很久以来想象的一模一样。她已作好决定要为丽贝卡的尸身装殓整容，用石蜡掩盖脸上的裂纹，再用圣徒像的头发为她做一顶假发。她将装扮出一具美丽的尸体，让它身着亚麻寿衣，并为棺材套上带紫色花边的丝绒衬面，还要举行最体面的仪式下葬到蛆虫的所在。她满怀怨恨地制定了计划，但心中一个念头令她战惊：纵然出于爱意，她也无法做得比这更好。但她没受困惑搅扰，继续完善各种细节，最后超越了丧葬专家的水准，不啻精通死亡仪轨的大师。在这可怖的计划中唯一没有考虑到的就是，她尽管曾向上帝祈求，仍有可能死在丽贝卡之前。事实上，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然而在最后的时刻，阿玛兰妲毫无受挫感，相反感到摆脱一切苦痛获得了自由，因为死神格外开恩，提前几年预先给出了通知。那是在梅梅上学后不久，一个炎热的中午，她正在长廊里缝纫时看见了死神。她当下认了出来，没有丝毫恐惧，因为她面前是一位穿蓝衫的长发女人，外表有些老气，与昔日帮忙下厨的庇拉尔·特尔内拉有几分相似。费尔南达很多次也在场，却没有看见她，尽管她是那样真实，那样有血有肉，好几回还请阿玛兰妲帮忙穿针。死神并未说到她何时会死，也没告知她是否会死在丽贝卡之前，只是让她从四月六日起开

始为自己缝制寿衣。死神应许她尽可以做得精美复杂，但要像为丽贝卡缝制时一样认真，还说她会死在完工的当天傍晚，死时没有痛苦、没有恐惧也没有烦恼。为了尽可能拖延时间，阿玛兰妲订购了优等麻纱，亲手织布。她织得极其仔细，光做这项活计就耗费了四年时间。然后她开始绣花。随着完工日期不可避免地临近，她意识到除非发生奇迹，才能将活计拖到丽贝卡死后，但干活时的专注令她得以保持必要的镇静来接受失败。也就在那时，她理解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制成小金鱼随即又销毁的举动。世界不过是身外之物，她的内心不再为任何苦痛而波动。她深深遗憾没能在多年前获得这样的领悟，那时还来得及净化记忆，在崭新的光芒下重建世界，平静地唤回傍晚时皮埃特罗·克雷斯皮身上的薰衣草味道，并且将丽贝卡救出悲惨的境地，而这不是出于爱也不是出于恨，而是出于对孤独的深切理解。那天晚上梅梅言语中的怨恨令她惊讶，并非因为她在情感上受到触动，而是因为她感觉到自己的经历在另一个少女身上重演，她表面看来纯洁无瑕，实际上却已遭到怨恨的玷污。但那时她已完全接受命运，明知纠正的一切可能都不复存在，也并不觉得失落。做完寿衣成了她的唯一目标。她非但没像当初那样借助不必要的精工细作来拖延时间，反而加快了进度。一个星期前，她估计将在二月四日晚间缝上最后一针，便向梅梅提议将预定在次日举行的古钢琴音乐会提前。她没有说明原因，结果建议没被采纳。于是，阿玛兰妲开始设法拖延四十八个小时，后来她甚至觉得死神也在助她一臂之力，因为二月四日晚上风雨大作破坏了发电厂。但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她还是在任何女人都不曾完成过的精美作品上添上了最后一针，并以最平常的口气宣告自己将死于当晚。她不仅告诉了家人，还通知了整个市镇，因为她相信可以通过最后一次造福世人的举动来补救自己卑微的一生，而在她看来没有什么事比给逝者带信更好。

正午之前，阿玛兰妲·布恩迪亚将在傍晚起程捎带冥信的消息就在马孔多传开，到下午三点客厅里已经放了整整一箱信件。不愿写信

的人托阿玛兰妲带个口信，她就在小本子上一一记下收信人的姓名和去世日期。“放心，”她安慰委托人，“我一到那边就去打听他的下落，把口信带给他。”一切仿佛一场闹剧。阿玛兰妲没显出丝毫慌乱，也没露出任何痛苦的迹象，甚至因为履行了义务而显得更加年轻。她身形挺拔修长一如平常。如果不是颧骨凸出和牙齿略有缺残，她看上去会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她亲自吩咐将信件放进涂了柏油的箱子，并指定安放在坟墓中的位置，以尽量做到防潮。上午她请来一位木匠，站在客厅里让他量尺寸做棺材，就像是要做一件礼服。她在最后几小时迸发出无穷活力，费尔南达认为她是在拿所有人寻开心。乌尔苏拉知道布恩迪亚家的人都是无疾而终，并不怀疑阿玛兰妲的死亡预感，但仍害怕昏了头的寄信人希望信件早些送达而将她活着下葬。于是她拼命在家中清场，喊叫着与侵入者争吵，到下午四点时终于达到目的。这时，阿玛兰妲刚刚将自己的物品分发给穷人，只留下死后要穿的一套换洗内衣和一双普通的灯芯绒便鞋放在简陋的粗木棺材板上。她没有忽略这个细节，因为她还记得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死的时候只剩下在作坊里穿的拖鞋，自己不得不给他买一双新鞋。快五点的时候，奥雷里亚诺第二来接梅梅去参加音乐会，惊讶地发现家里正在筹备丧事。那时看上去生机勃勃的活人就只有阿玛兰妲，她甚至还好整以暇地修了鸡眼。奥雷里亚诺第二和梅梅开玩笑似的与她告别，还约好下个星期六举办复活宴席。听说阿玛兰妲·布恩迪亚将给死人带信，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在五点钟赶来准备施行临终仪式，但等了一刻多钟才看到濒死的女士从浴室出来。一见她穿着马达普兰白细布睡衣、披散着头发出现，老迈的神甫便认定这是一个玩笑，随即遣走了祭童。但他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阿玛兰妲作出一次延宕了二十年的忏悔。阿玛兰妲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她不需要任何宗教仪式的帮助，因为她的良心是清白的。费尔南达大惊失色，她不顾别人会听见，高声自问阿玛兰妲究竟犯下了怎样可怕的罪行，以至于宁可亵

渎神明而死也不愿丢脸地忏悔。于是阿玛兰妲躺下，逼迫乌尔苏拉当众检查自己的贞洁。

“谁也不用乱猜，”她喊道，好让费尔南达听见，“阿玛兰妲·布恩迪亚怎样来到这世上就怎样离开。”

她没再站起来。她靠在厚垫子上仿佛真的病了，编起长辫子在耳边盘好，根据死神的教导她应该这样躺进棺材。然后，她向乌尔苏拉要来一面镜子，四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自己饱经岁月摧残与苦痛煎熬的面容，惊讶于所见竟然与想象中的形象分毫不差。乌尔苏拉从房间里的寂静知道天色已暗了下来。

“跟费尔南达告别吧，”她恳求道，“一分钟的和好抵得过一辈子的友谊。”

“已经没这个必要了。”阿玛兰妲回答。

当临时搭起的舞台上灯光亮起，演出的第二部分开始时，梅梅不禁想到了她。曲子弹奏到一半时，有人到她耳边告知了消息，演出当即中止。奥雷里亚诺第二赶到家中的时候，不得不推开人群挤进去，看到了那位老处女的尸体。她面容丑陋惨淡，手缠黑纱，身穿精美的寿衣。棺材安置在客厅里，旁边是一箱信件。

为阿玛兰妲守灵九天后，乌尔苏拉再没有起床。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负责照顾她。她每天往卧室里送饭和用来洗漱的胭脂果水，将马孔多发生的一切讲给她听。奥雷里亚诺第二时常来探望，给她送来衣服。她把衣服和日常必需品一起放在床边，很快就建起一个触手可及的小天地。她还赢得了小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的亲近，教这个与她酷似的孩子认字。她神志清醒，生活能够自理，给人的印象只是历经百年沧桑而自然衰老。虽然她明显视物困难，却没有人怀疑她已彻底失明。她有足够充裕的时间和平和的心境来关注家人的一举一动，也是她首先发觉了梅梅的隐忧。

“过来，”她对梅梅说，“现在只有我们俩，告诉我这个可怜的老太太到底出了什么事。”

梅梅挤出几声笑，避开了谈话。乌尔苏拉没有勉强，此后见梅梅不再来看她便确认了心里的猜测。她知道梅梅比平日里更早开始打扮，等待出门时一刻不能安宁，整夜在隔壁卧室辗转反侧，看见一只蝴蝶蹁跹就痛苦难耐。有一次梅梅说要去找奥雷里亚诺第二，但奥雷里亚诺第二不久就来家里找女儿，乌尔苏拉惊诧于此时的费尔南达竟如此缺乏联想毫不生疑。梅梅那诡异的举动、迫切的约会、压抑的渴望都再明显不过，而费尔南达却要到很久以后的一个夜晚才发现她在剧院里和一个男人接吻，回到家里掀起轩然大波。

那时梅梅太过沉浸于自己的世界，还责怪乌尔苏拉出卖了她。实际上是她出卖了自己。一段时间以来，她处处留下蛛丝马迹，连最迟钝的人也会察觉，而费尔南达那么晚才发现是因为她自己正沉迷于与隐身医生的秘密交往中。尽管如此，她最后还是注意到了女儿的缄默寡言、莫名惊恐、情绪无常和行为乖张。她开始不动声色地严密监视。她任凭女儿和平日的女友出门，帮她为星期六的聚会打扮，从未提出任何可能引起她戒心的问题。她已掌握证据能充分证明梅梅言行不一，但从不流露自己的怀疑，以等待决定性的机会。一天晚上，梅梅对她说要和父亲去看电影。没过多久，费尔南达就听见宴会的鞭炮声和奥雷里亚诺第二的手风琴声从佩特拉·科特斯家的方向传来。于是，她穿好衣服，赶到剧院，在坐椅上的背影中认出了自己的女儿。由于猜测得到证实，她一时激动没能看清与梅梅接吻的男人，但她还是在观众震耳欲聋的嘘声与大笑声中听出了他颤抖的声音。“对不起，亲爱的。”她听见他这么说，一言不发就将梅梅拉出剧院，为了羞辱她还特意经过人声鼎沸的土耳其人大街回家，随后将她锁在卧室里。

第二天下午六点，费尔南达听出了那个登门拜访者的声音。他年轻，脸色青黄，若是她以前见过吉卜赛人便不会为他那双悲伤的深色眼睛而吃惊，若是其他任何心肠不这样冷酷的女人见了他那梦幻般的神情都会理解女儿的心思。他身穿旧亚麻衣裳，鞋上奋力涂过层层锌白，手里拿着上星期六新买的窄边草帽。在一生中，他此前没有过而

此后也不会有现在这般恐惧，但他的自尊和稳重使他不显卑屈，只是因干活而变得粗糙的双手和开裂的指甲有损他不凡的风度。然而费尔南达不用看第二眼就知道他是个工匠。她还知道他身上穿的是唯一一套周末正装，衬衫下面的皮肤上生着从香蕉公司染上的疖子。她没给他说话的机会。她甚至没让他进屋，片刻后就不得不将门关闭，因为家里已经到处飞舞着黄蝴蝶。

“请走开，”她对他说，“我们正派人家里没有您要找的人。”

他叫马乌里肖·巴比伦。他在马孔多出生成长，是香蕉公司汽修厂里的学徒。梅梅是偶然与他结识的。一天下午，她和帕特里夏·布朗想找一辆汽车到种植园里兜风，当时司机病了，他便被派来开车。梅梅终于如愿以偿坐到了副驾驶位置，可以近距离观察驾驶操作。和那位正式司机不同，马乌里肖·巴比伦为她作了操作示范。那还是梅梅刚开始来布朗先生家串门的时候，女士开车在马孔多仍被视为有失体统，因此她得到些理论知识便心满意足，此后几个月都没再见到马乌里肖·巴比伦。后来她想起兜风时，除了那双粗糙的手，他的男性美也曾引起自己的注意，但事后她又曾向帕特里夏抱怨过他那不无高傲的自信令人厌烦。她第一次和父亲星期六去看电影的时候，又见到了马乌里肖·巴比伦，他穿着亚麻正装，坐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她发觉他不看电影却总是回头看她，其实那也不是为了看她而是为了引起她的注意。梅梅很厌恶这种粗俗的把戏。最后，马乌里肖·巴比伦过来和奥雷里亚诺第二打招呼，这时梅梅才知道他曾在奥雷里亚诺·特里斯特简陋的发电厂工作过，因而在她父亲面前也像对待上级一样恭敬。这一幕减轻了她对他高傲的反感。他们没有单独见过面，除了打招呼没有谈过一句话，但那天夜里她却梦见他在一场海难中救了自己，而她没有任何感激之情还大为光火。这看起来像是自己给了他一个他所渴求的机会，而那却是她不希望发生的，不仅对马乌里肖·巴比伦，对所有属意于她的男人都是如此。故此她在梦醒后很生自己的气，因为不但没有对他产生厌恶，反而感到一种无法压抑的冲动想要

见他。一个星期以来，这冲动日益强烈，到星期六更达到顶点，她得极力控制才能在打招呼时不让他看出自己的一颗心快要跳出来。她在愉悦与愤怒交杂的感觉中昏了头，第一次伸出手去，而直到此刻马乌里肖·巴比伦才握上她的手。梅梅在刹那间又为自己的冲动而悔恨，可发现他的手也同样冰凉汗湿，心中的悔恨旋即化作残酷的满足感。当天晚上，她明白如果不让马乌里肖·巴比伦意识到他只是痴心妄想，自己就不会有片刻安宁，于是整个星期都在为此奔忙。她耍尽一切花招想让帕特里夏·布朗陪自己去要车，却没能成功。最后，她利用了那个正在马孔多度假的美国红发男孩，借口想见识新型号汽车让他带自己来到厂里。在看见马乌里肖·巴比伦的那一刻，梅梅便无法再欺骗自己，明白事实上是自己无法抵抗与他单独见面的欲望。她也确信对方一见自己来到便明白了这一点，不由又是一阵气恼。

“我来看看新型号汽车。”她说。

“这是很好的借口。”他回答。

梅梅意识到自己正被他傲慢的光芒灼伤，拼命想打压他的气焰。但他没给她留时间。“不用怕，”他低声对她说，“女人爱上男人，这不是头一回。”她感觉如此无助，连新型号汽车也没看就离开了。她整夜在床上翻来覆去，愤怒得哭泣。她最初的确对那个美国红发男孩有兴趣，但他现在看起来不过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就在那时，她发觉在马乌里肖·巴比伦出现之前总会见到那些黄蝴蝶。她以前见过，特别是在汽修厂里，当时还以为它们是迷上了油漆的气味。有一次在昏暗的剧院里，她也感觉到蝴蝶在头顶盘旋。直到马乌里肖·巴比伦开始追求她，混在人群里像个只有她才能认出的幽灵，她才明白黄蝴蝶与他有关。在音乐会的听众中，在剧院的观众中，在大弥撒的人群中，都时时有马乌里肖·巴比伦的身影，她无须见到就能发现，因为蝴蝶已经指明他在场。有一次，奥雷里亚诺第二被蝴蝶令人窒息的扑腾搅得不胜其烦，她险些忍不住像当初答应的那样向他透露秘密，但直觉告诉她这一次他不会像往常那般笑起来：“要是让你母亲知道了……”一

天早上，费尔南达正在给玫瑰修枝，突然发出一声惊叫，一把拽过梅梅，因为她刚才正站在美人儿蕾梅黛丝升天的地方。那一瞬间，她感到神迹将再次发生在女儿身上，因为一阵突如其来的振翅声让她慌了神。那是蝴蝶在盘旋。梅梅看见它们仿佛从光芒中凭空出现，心里顿时一惊。这时马乌里肖·巴比伦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包裹，说是帕特里夏·布朗送的礼物。梅梅按捺下羞赧，掩饰起不安，甚至努力装出自然的微笑，请他把东西放在扶栏上，因为自己的手上满是泥污。几个月后费尔南达把这个男人赶出门去时完全不记得这次见面，而此时她也仅仅注意到他那患了胆病般的黄暗肤色。

“这男人很奇怪，”费尔南达说，“一副快要死的样子。”

梅梅以为是蝴蝶令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修剪完玫瑰，她洗了手把包裹拿进卧室打开。那是一套中国玩具，由五个盒子层层相套，最里面的那个装有一张卡片，上面的字迹写得很吃力，仿佛出自不大会写字的人之手：我们星期六剧院见。盒子那么长时间一直放在扶栏上，费尔南达完全有可能出于好奇打开，梅梅此时一阵后怕，同时也为马乌里肖·巴比伦的大胆机智而欢喜，并惊讶于他认定自己必然赴约的天真信念。梅梅已经知道奥雷里亚诺第二星期六晚上有约会，但渴望的烈焰炙烤了她一个星期，到星期六她终于说服父亲把她一个人留在剧院，等电影散场再来接她。灯光还亮着的时候，就有一只夜间活动的蝴蝶在她头顶盘旋。时候到了。灯光熄灭，马乌里肖·巴比伦坐到了她身边。梅梅感觉自己在惶然不安的沼泽中挣扎，而且就像她梦到的那样，只有那个身上带着机油味、黑暗中几乎看不见的男人才能拯救她。

“你要是不来，”他说，“以后就再也见不着我了。”

梅梅感到他的手重重压在自己的膝盖上，明白那一刻两人都已抵达孤独的彼岸。

“我就不喜欢你这一点，”她微笑着说，“你总是说最不该说的话。”

她疯狂地爱上了他。她辗转难眠，茶饭不思，深深沉浸在孤独里，连自己的父亲都成了障碍。她利用约会的借口编织出错综复杂的迷网令费尔南达无从捉摸，她不再去看女友，打破常规在任意时间和地点与马乌里肖·巴比伦见面。开始的时候她不喜欢他的粗鲁。他们在汽修厂后面荒凉的草地上第一次单独相处时，他毫不怜惜地带着她进入野兽般的状态，令她精疲力竭。后来她意识到这种方式也是柔情的表现，便失去了平静，再也离不开他，一心渴望沉醉在他那混杂着去污剂和机油气味的迷人气息中。阿玛兰妲死前不久，梅梅在疯狂中突然显出一线清醒，开始为未卜的前途恐慌。这时她听说有个女人会用纸牌算命，便暗中登门拜访。那是庇拉尔·特尔内拉。一见梅梅进门，她就猜出了她的心思。“坐吧，”她说，“不用纸牌我也能猜出布恩迪亚家人的未来。”梅梅那时并不知道，而且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年过百岁的算命老妪是自己的曾祖母。即使她知道也不会相信，尤其老人还毫不掩饰地告诉她热恋中的焦灼只能在床上平息。马乌里肖·巴比伦也持同样的观点，但梅梅不肯相信，她在内心深处怀疑那只不过是匠人的错误想法。她当时认为爱情的一种方式能够击败另一种方式，这与胃口得到满足就不觉饥饿是同样的道理。庇拉尔·特尔内拉不仅纠正了她的错误，还将那张铺着麻布的旧床慷慨出借，她在那上面孕育了梅梅的祖父阿尔卡蒂奥，后来又怀上了奥雷里亚诺·何塞。她还教她如何用芥末泥蒸气来避孕，并传授她药水配方，好在意外发生时消除麻烦，甚至摆脱“良心的挣扎”。这次会面令梅梅获得了与那天下午醉酒后同样的勇气。然而，阿玛兰妲的死迫使她推迟了行动。在守灵的九天里，她片刻不曾离开混在家中吊唁人群里的马乌里肖·巴比伦。后来是漫长的服丧和必不可免的闭门幽居，他们分开了一段时间。那段日子她内心受尽煎熬，焦急不安，难忍冲动，因此在能够脱身出门的第一个下午便径直来到庇拉尔·特尔内拉家里。她献身给马乌里肖·巴比伦，不抗拒、不扭捏也不羞赧，显出优异的天赋和过人的敏锐，若换一个比她的情人更多疑的男人或许要怀疑她熟稔此道。

三个多月中他们每星期幽会两次，蒙在鼓里的奥雷里亚诺第二还一直提供庇护，天真地为女儿的借口作保，只为帮她摆脱她母亲的严厉管束。

费尔南达在剧院抓到两人的当天晚上，奥雷里亚诺第二无法忍受良心的重负，便去费尔南达把梅梅关禁闭的卧室找她，相信她会对自己倾诉一切隐情。但梅梅断然拒绝。她那样自信，那样紧守着自己的孤独，奥雷里亚诺第二觉得两人之间的一切关联都不复存在，父女情谊和默契已成往昔的幻梦。他想和马乌里肖·巴比伦谈谈，认为凭着旧主人的权威能够让他打消念头，但又被佩特拉·科特斯说服那是女人的事，一时犹豫不定，并对禁闭结束女儿的苦难几乎不抱希望。

梅梅没有显出丝毫痛苦的迹象。恰恰相反，乌尔苏拉察觉到她在隔壁卧室入睡安稳，起居正常，饮食按时，消化良好。唯一令乌尔苏拉不解的是，近两个月的惩罚期间梅梅不像其他家人一样在早上洗澡，而是改在晚上七点。有一次她曾想提醒梅梅小心蝎子，但考虑到梅梅坚信是自己告密而避之不及，她也就不愿去打扰，免得被当成唆烦人的高祖母。每到傍晚，黄蝴蝶便飞进家来。每天晚上从浴室出来，梅梅都能见到费尔南达用杀虫剂拼命扑杀蝴蝶。“这太糟糕了，”她说，“别人一直告诉我夜里的蝴蝶会带来厄运。”一天晚上，梅梅还在洗澡，费尔南达偶然走进她的卧室，屋内群集盘旋的蝴蝶几乎让她无法呼吸。她随手抓起一块布来驱赶，而当她将女儿晚间洗澡的习惯与洒满一地的芥末泥联系起来，一颗心立时恐惧得冻结了。她没像第一次那样再去等候合适的机会，第二天便邀请同她一样来自内地的新任市长共进午餐，请求他在后院安排一个守夜人，因为她感觉有人不时潜入家中偷鸡。那天晚上，守夜人将马乌里肖·巴比伦一枪放倒，当时他正揭开屋瓦准备钻进浴室，而梅梅则赤身裸体正为爱情而浑身颤抖，在蝎子与蝴蝶的环绕中等他，就像近几个月来几乎夜夜所做的那样。一颗嵌在脊柱里的子弹令马乌里肖·巴比伦从此卧床不起。他在孤独中老死，没有一句抱怨、一声抗议，也没有一丝吐露真

相的企图；他忍受着往事的折磨，忍受着不容他安生片刻的黄蝴蝶，一直被当成偷鸡贼遭人唾弃。

十五

梅梅·布恩迪亚的儿子被送到家中时，行将给马孔多带来致命打击的各种事件已经渐露端倪。当时局势很不明朗，人们无心关注私人丑闻，费尔南达借着这有利的环境将孩子藏匿起来，只当他从未存在。她不得不收留他，因为他被送来时的情形不容她拒绝。她不得不在余生中违心地忍受他，因为真要下手时她又缺乏勇气将他溺死在浴室的水池里。她把孩子关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旧日的作坊里，并让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相信这孩子是她在一个漂来的篮子里捡到的。乌尔苏拉到死也不会知道孩子的真实来历。小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一次去作坊时撞见费尔南达给孩子喂食，也相信了篮中漂来这一说法。奥雷里亚诺第二因妻子以荒唐的方式处理梅梅的悲剧而彻底与她疏远，直到孩子被送来三年后他才知道外孙的存在，这还是因为费尔南达一时不慎让孩子从禁闭中跑了出来，在长廊里停留了片刻。他浑身赤裸，头发蓬松，惊人的生殖器好像火鸡垂肉，不似人类的后代倒像地道的野人。

费尔南达不曾料到自己无可更改的宿命中会出现这样的变数。她本以为已经彻底消除的耻辱，随着那孩子又回到了家中。当初被子弹击断脊柱的马乌里肖·巴比伦刚被抬走，费尔南达就已制定出全盘计划来洗濯耻辱。她没和丈夫商量，第二天收拾好行装，往小行李箱里放进女儿的三套换洗衣服，在火车抵达半小时前来卧室找她。

“我们走，雷纳塔。”她说。

她没作任何解释。梅梅没指望也无心听她解释。她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哪怕是被送到屠宰场也不在乎。自从听见后院的枪声和马乌里肖·巴比伦同时发出的痛号，她再没说过一句话，至死不曾开口。母亲命她离开房间时，她没梳头也没洗脸。她像个梦游者般登上火车，

甚至没有注意到那些黄蝴蝶仍然陪伴着她。费尔南达从未知道，也不曾费心去探究，女儿岩石般的沉默究竟是出于意志还是因为惨遭打击后丧失了言语能力。梅梅对穿越昔日着魔之地的旅行几乎毫无意识。她不曾看见铁路两侧遮天蔽日的香蕉种植园。她不曾看见美国佬的白房子，因尘土和酷热变得荒芜的花园，身穿短裤和蓝条衬衫在门厅里玩牌的女人。她不曾看见尘雾飞扬的路上满载着香蕉的牛车。她不曾看见如同鲱鱼般跃入清澈河水的少女，她们高耸的酥胸令火车上的乘客饱受折磨。她不曾看见工人居住的杂乱破烂的棚屋，马乌里肖·巴比伦的黄蝴蝶在那里盘旋，脸色青绿、瘦骨嶙峋的孩子坐在门口的便盆上，怀孕的女人们朝开过的火车高喊着污言秽语。这些飞速闪过的情景，当初在离校回家的路上曾令她兴奋不已，如今却无法在她心里激起一丝涟漪。种植园热烘烘的湿气消失了，火车穿过开满罂粟花，还矗立着西班牙大帆船烧焦的龙骨的原野，迎上与将近一个世纪前同样清凉的空气，驶向泡沫泛涌的肮脏大海边，驶向当年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梦想破灭的地方，而梅梅却不曾往窗外看过一眼。

下午五点，当她们到达大泽区的终点站，费尔南达要她下车她便下了车。她们坐上一辆好像大蝙蝠似的小车，由一匹喘着粗气的马拉着，穿过凄凉的城市。在遭硝石侵蚀开裂的无尽长街上空回响着钢琴练习曲的旋律，与费尔南达少女时代在午休时段听到的一模一样。她们登上一艘内河航船，船上的木头螺旋桨发出可怕的响声，锈迹斑斑的铁板活像火炉口一般映出红光。梅梅把自己关在舱室里。费尔南达每天两次在床边给她留下一份食物，又每天两次原封不动地拿走。梅梅倒不是决意要绝食而死，她只是一闻到食物的味道就会恶心，甚至连喝清水都会反胃。那时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芥末泥蒸气没能生效，费尔南达更是要到近一年后孩子被送来时才知晓。在令人窒息的舱室里，在铁皮舱壁的摇晃和桨轮搅起的淤泥臭气中，梅梅昏昏沉沉，不辨日期。很长时间后，她看见最后一只黄蝴蝶在风扇扇叶间撞得粉碎，便认定是马乌里肖·巴比伦已死的明证。然而她没有放弃。她继

续想念他，这期间她们骑在骡背上艰辛地跨越了幻象丛生的荒原，奥雷里亚诺第二在寻找世上最美的女人时曾经在此迷路，又沿着印第安人的道路翻过山脉进入那个阴风惨惨的城市，那里的石板路上回响着三十二座教堂的丧钟齐鸣。那天晚上，她们在被遗弃的殖民风格的深宅中过夜。在一间杂草丛生的房间里，费尔南达把木板铺在地上当床，又拽下残存的窗帘裹在身上御寒，那窗帘在她们稍一翻身时便化为了碎片。梅梅知道了身在何处，因为她在失眠的惊恐中看见了一位黑衣绅士，正是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圣诞前夕被装进铅棺送到家里的那位。第二天望过弥撒，费尔南达带她走进一座阴暗的建筑，她立刻认出了是母亲常常提及接受女王培训的修道院，便明白旅程已到终点。费尔南达去一旁的房间里与人交谈，留下她在星罗棋布地挂满殖民地时期历代主教油画肖像的大厅里。她冷得直抖，因为仍穿着印有黑色细花的单纱衣和经过荒原时冻得变了形的高帮皮鞋。她站在大厅中央想念着马乌里肖·巴比伦，透过彩色玻璃窗射进来的黄色光线洒在她身上。这时，从房间里走出一位十分美丽的见习修女，手里提着装有她那三套换洗衣服的小行李箱。她走到梅梅身边伸出手，并没有停下脚步。

“我们走，雷纳塔。”她说。

梅梅握住她的手，跟了上去。那是费尔南达最后一次看见她，她正努力跟上修女的脚步，最后消失在修道院的铁栅后面。她仍在想念马乌里肖·巴比伦，想念他身上的机油味和身边的蝴蝶。她每一天都在想念他，直到多年以后一个秋天的早晨在克拉科夫一家阴森的医院里衰老而死，那时的她已改名换姓，终生一言未发。

费尔南达乘坐一列由武装警察保护的火车回到马孔多。一路上她注意到了旅客们的紧张，沿线村镇驻军的戒备状态，意味着将有重大事件发生的不祥气氛，但她无从得知究竟是什么事，直到抵达马孔多，听说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正在鼓动香蕉公司的工人罢工。“这下全齐了，”费尔南达心想，“家里又出了个无政府主义者。”罢工在两个

星期后爆发，但并未造成事先所担心的严重后果。工人希望星期天可以不用去采收和运送香蕉，这一要求听起来合情合理，连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都认为正符合上帝的准则，因此出面支持。这次行动以及此后几个月中其他行动的成功，使默默无闻的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名声大噪，而以前人们还常说他唯一干成的事情就是让法国妓女挤满了整个市镇。他以当年拍卖斗鸡去发展荒唐的航运事业的那种冲动，辞去香蕉公司的监工职务，加入到工人一边。没过多久，他就被指控为企图扰乱公共秩序的国际阴谋集团的特务。在流言四起的那个星期，一天夜里他参加秘密会议后遭到陌生人袭击，却在四发手枪子弹下奇迹般逃脱。接下来的几个月，连隅居在自己黑暗角落里的乌尔苏拉都觉察到了外界的紧张气氛，感觉回到了儿子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怀揣顺势疗法药丸暗中策划起义的那个危险年代。她曾试图以前车之鉴劝告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但奥雷里亚诺第二告诉她在那个暗杀之夜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兄弟的消息。

“和奥雷里亚诺一个样，”乌尔苏拉感叹道，“世界好像在原地转圈。”

费尔南达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安之若素。丈夫因她未经自己同意就决定了梅梅的命运而与她大吵一通，从那以后她便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奥雷里亚诺第二曾想去搭救女儿，必要的话甚至会报警，但费尔南达给他出示了文件，上面写明女儿进修道院是出于自愿。实际上，梅梅签字时已经置身于铁栅的另一边，仍像被人领入时一样浑不在意。在内心里，奥雷里亚诺第二不相信那些证据的合法性，就像他不相信马乌里肖·巴比伦进院子是为了偷鸡，但这两个说法安抚了他的良心，使他没有歉疚地回到了佩特拉·科特斯的护庇下，继续摆宴欢闹、大吃大喝。费尔南达对市镇上的动荡漠不关心，对乌尔苏拉的预言充耳不闻，实施了自己的最后一步计划。她给将要成为初阶神职人员的儿子何塞·阿尔卡蒂奥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说他姐姐雷纳塔因患黄热病已安息在天主的怀抱里。后来，她将阿玛兰妲·乌尔苏拉

交给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照顾，专心与隐身的医生通信。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几经推迟的通灵手术定下最终日期。然而隐身的医生答复说鉴于马孔多的局势不稳定，暂时不宜做手术。她急不可耐同时又缺乏对外界的了解，居然在另一封信里向他们解释不存在什么时局不稳，一切都是自己小叔子胡闹的结果，说他最近心血来潮搞什么工会，就像以前开河通航时一样疯狂。到了炎热的星期三，他们还没达成共识，这时有人敲响家门，是一位老修女挎着一个篮子。为她开门的时候，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以为是一件礼物，想接过那个用绣花台巾盖着的篮子。但修女没让她拿过去，声称自己受命要严守秘密，亲手交与堂娜费尔南达·德尔·卡皮奥·德·布恩迪亚本人。那是梅梅的儿子。费尔南达以前的灵修导师在信中告诉她孩子出生于两个月前，由于他母亲不愿开口表达自己的意愿，只好用他外祖父的名字奥雷里亚诺为他命名施洗。费尔南达对命运的这一嘲弄愤怒不已，但在修女面前仍不动声色。

“我们就说是从漂来的篮子里发现的。”她微笑道。

“没人会相信。”修女说。

“既然大家都相信《圣经》，”费尔南达反驳道，“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的话。”

修女留下吃午饭，等待返程的火车。她谨守严训没有再提婴儿一个字，但费尔南达仍然将她视为自家耻辱的一个知情者，暗自惋惜中世纪绞死通报噩耗的使者的习俗没能流传至今。就在那时，她决定等修女一走就在水池里溺死婴儿，但良心阻止了她，她只好选择耐心地等待，等着上帝以无限慈悲来帮自己摆脱这个累赘。

新来的奥雷里亚诺满一岁时，市镇上的紧张局势毫无预兆地被激化了。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和其他一直隐藏于地下的工会领导人在一个周末不合时宜地出现，在香蕉种植区的各村镇发动游行。警察只是出来维持秩序。但到星期一晚上，领导人被逐个拖出家来，戴上五公斤重的脚镣，关进省监狱。这其中有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和洛伦

索·加比兰，后者是墨西哥革命中的一位上校，流亡到了马孔多，他常说自己曾亲眼见证战友阿尔特米奥·克鲁斯[①]的英雄事迹。不到三个月他们就获释了，因为政府与香蕉公司没能就哪一方应当负担囚犯在狱中的伙食达成协议。这一次工人的不满在于居住区缺乏卫生设施，医疗服务纯属欺骗，工作条件太过恶劣。另外他们还提出，公司从未支付现钞，总以代用券顶替，而那只能用来在公司的货栈购买弗吉尼亚火腿。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入狱，是因为他揭露了公司利用代用券制度来降低果品的海运成本。假如不为公司货栈供货，那些从新奥尔良回到装载香蕉的港口的船只能白白空驶。其他的指责尽人皆知。公司的医生从不为患者作检查，仅仅让他们在医疗站前排成一队，由一位护士依序在舌头上放置一颗胆矾色小药丸，不管他们患的是疟疾、淋病还是便秘。这种千篇一律的疗法引得许多孩子一次又一次排队，领来药丸却并不吞下，都带回家去在玩彩票游戏时作筹码。公司的工人挤在简陋的宿舍里。工程师们没有设计厕所，只是在圣诞节时去营地给每五十人提供一间移动厕所，并当众示范如何延长使用寿命。一度簇拥在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身边的那些黑衣律师如今已经老迈，改为香蕉公司效力，他们以魔法般的手段将那些控诉变为无效。工人们拟出一份联合请愿书，但过了很久也未能正式通报到香蕉公司那里。一听说请愿的消息，布朗先生就把自己玻璃车顶的车厢挂上火车，与公司里最知名的代表们一起从马孔多消失。然而，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一些工人在妓院里捉到了他们当中的一个，让他在请愿书副本上签了名。当时他正赤身露体，和自愿引他入彀的女人待在一起。阴郁的律师们在法庭上证明那人与公司没有任何瓜葛，为防止他人质疑，他们还把那人当作骗子关进监狱。晚些时候，布朗先生微服出行时在三等车厢里被捉获，他们让他签了另一份请愿书副本。次日出庭时，来到法官们面前的是一个皮肤染成黑色、满口流利西班牙语的人。律师们证明这人不是杰克·布朗，生于阿拉巴马州普拉特维尔的香蕉公司总管，而只是一个人畜无害的药草贩子，生于马

孔多并在本地以达格贝尔多·丰塞卡的名字受洗。不久，面对工人们新的努力，律师们在多处公开展示布朗先生的死亡证明书，该文件经领事和外长们认证，证明当事人已于六月九日在芝加哥被救火车轧死。工人们厌倦了这些荒诞的诡辩，越过马孔多当局，直接上诉于最高法院。在那里操纵法律的魔术师们证明所有的指控都毫无效力，因为香蕉公司没有，从未有过，也永远不会有任何正式工人，一直以来都是招募临时工。由此，关于弗吉尼亚火腿、神奇药丸和移动厕所的谎言彻底破灭，法庭作出最终判决，颁布公告严正宣布根本不存在什么工人。

大罢工爆发了。耕作在田间停滞，香蕉在枝头腐烂，一百二十节车厢的火车纷纷瘫痪在支线上。悠闲的工人挤满各村镇。土耳其人大街迎来漫长的喧嚣周末，雅各酒店的台球厅不得不二十四小时分场开放。军队宣布受命重建公共秩序的那天，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正待在台球厅里。尽管没有未卜先知的才能，他仍觉得这一消息不啻一个死亡宣告，自从那个遥远的清晨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带他观看行刑以来他等待已久。不祥之兆并未扰乱他的镇静。他照旧打球，连击也没有失误。不一会儿，鼓声大作，号角长鸣，人潮喧嚷，他便知道不论这一局台球，还是从那个观看行刑的清晨起他与自己玩的孤单沉默的一局游戏都已告终。于是他向街上张望，就看见了军队。三个团的士兵踏着苦役犯划桨的鼓点行进，大地在他们脚下震颤。他们仿佛多头巨龙一般，在正午的阳光中呼出臭气。他们矮小，结实，粗鲁。他们像马一样流汗，发出太阳暴晒下的兽皮气味，带着内地人寡言的漠然和难以捉摸的神情。队伍走了一个多小时，但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几个小队来回转圈，因为所有人都很相似，仿佛一个母亲生出的儿子，并且都同样呆滞地承受着背囊和水壶的重负、上了刺刀的步枪带来的耻辱、盲目服从与荣誉感之间的矛盾。乌尔苏拉在自己床榻上的黑暗中也听到军队经过，交叠两指[2]举起手来。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一瞬间显出形迹，趴在刚熨好的绣花桌布上，想着儿子何塞

·阿尔卡蒂奥第二，而他正不动声色地看着最后一队士兵从雅各酒店门前走过。

根据军事管制法，军队负有处理争端的职责，但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努力争取和解。刚在马孔多露面，士兵们就放下步枪，采摘香蕉，装上火车起运。迄今为止一直安于等待的工人们没有其他武器，便带上干活用的砍刀钻进山林，开始进行破坏活动。他们烧毁种植园和货栈，破坏铁轨阻止用机枪开路的火车通过，剪断电报电话线。水渠被鲜血染红。依然健在的布朗先生，连同家人及其他同胞被送出电网鸡笼，抵达军队保护下的安全区。眼看一场血腥恶战一触即发，当局发出通告，呼吁工人们到马孔多集合。通告中宣布，省军政主席将于下星期五前来调解争端。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混在从星期五一早就向车站集中的人群里。他参加了一次工会领导层的会议，与加比兰上校一起被指派混进人群，见机行事引导群众。当发觉军队在小广场周围布下多处机枪掩体，电网内的香蕉公司所在地也被炮兵保护起来，他便感觉不妙，口中涌上一阵苦涩。快十二点的时候，等待的火车仍未到达，包括工人、妇女和孩子在内的三千多人挤满了站前的空地，又挤进一旁已被军队用一排排机枪封锁的街道。那场面不像是欢迎会，更像是欢闹的集市。土耳其人大街的油炸食品摊子和饮料小店都移了过来，人们在烈日下等待却仍心情愉快。将近三点时有传言说专列要等明天才到，疲倦的人群发出沮丧的叹息。这时，一位中尉登上车站屋顶，站在四个瞄准人群的机枪掩体之间，要求人群肃静。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身旁是一个十分肥胖的赤足女人，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四岁。她并不认识他，自己抱起小的那个孩子，请他抱起另一个好让他听清下面要说些什么。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让孩子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多年以后，尽管无人相信，这个孩子还会传讲，他曾亲眼看到中尉拿着喊话筒宣读省军政主席四号令。政令由卡洛斯·科尔特斯·巴

尔加斯将军及其书记官恩里克·加西亚·伊萨查少校签发，全文共三条八十字，宣布罢工者实为“一伙不法分子”，授命军队予以枪决。

政令念完后，一位上尉在震耳欲聋的嘘声和抗议声中接替了站在屋顶上的中尉，拿起喊话筒示意有话要说。人群恢复了平静。

“女士们，先生们，”上尉的声音低沉、缓慢，带着些许疲倦，“各位有五分钟的时间撤离。”

嘘声和高声喊叫淹没了计时开始的军号声。没有人挪动。

“五分钟过去了，”上尉声调不变，“再有一分钟就开枪了。”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流着冷汗，把孩子放下来交给他母亲。“这些浑蛋真会开枪的。”她喃喃道。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来不及说话，因为他随即听到加比兰上校用沙哑的嗓音叫喊着重复那女人的话。现场紧张的形势、奇异的沉寂令他心醉神迷，并且确信任何事都无法赶走这些沉浸在死亡诱惑中的人。他踮起脚尖，越过前方人群的头顶，平生第一次抬高了音量。

“浑蛋！”他高喊道，“这一分钟你们自己留着吧。”

他喊叫后发生的事情并未令他产生恐惧，而是恍如幻觉。上尉下令开火，十四处机枪掩体立时响应。但一切宛似一场闹剧，仿佛机枪正在喷射的只是骗人的烟火，因为能听见急迫的枪声嗒嗒，能看见白炽的烈焰喷吐，却感受不到任何轻微的反应，听不到任何声音，甚至一声叹息。密集的人群仿佛瞬间石化，刀枪不入。突然，在车站一侧，一声垂死的呼号打破了着魔般的状态：“啊啊，妈妈呀。”一股翻天覆地的力量，一种火山爆发的气流，一阵大难临头的咆哮，在人群中以无比凶猛的势头猝然爆发。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几乎来不及抱起孩子，而他母亲和另一个孩子已经被四下奔逃的惊惶人群所吞没。

多年以后，尽管仍被邻居们当作胡言乱语， 那孩子还会传讲，自己被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举过头顶随他奔走，几乎腾空，飘荡在人潮的恐惧之上，冲向附近的街道。他处在居高临下的位置，看到失控的人群冲到街角，一排机枪开始扫射。许多个声音同时叫喊：

“趴到地上！趴到地上！”

第一拨人已经这样做了，被弹雨横扫在地。幸存者们没有趴到地上，反而试图冲回广场，却在恐慌中仿佛被巨龙摆尾一击而退，密集的人潮撞上反向而来的另一波密集人潮，后者已被对面街上的龙尾击溃，那里的机枪也在一刻不停地开火。人们走投无路，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渐渐向中心缩拢，因为机枪子弹仿佛不知餍足又条理分明的剪刀，正像剥洋葱似的将周边有条不紊地逐一剪除。孩子看见一个女人双臂呈十字平伸，跪在一片神奇地未遭践踏的空地上。满脸鲜血的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在倒地的一刻将他推到那里，随后蜂拥而至的人潮淹没了空地，淹没了跪着的女人，淹没了旱季高远天空中的光线，淹没了乌尔苏拉·伊瓜兰曾售出无数糖果小动物的这个该死的世界。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仰面躺在黑暗中。他意识到自己是在一列长得望不见头的沉寂火车上，头发因凝固的鲜血而硬结，全身骨头都在疼痛。他感到困意难忍。他准备抛开恐惧大睡一场，便换成侧身姿势以减轻痛楚，这时才发现自己正躺在死人身上。车厢里除了中间的过道，没有一处空地方。大屠杀应该过去好几个小时了，因为尸体与秋天的石膏一样冰冷，也与石化的泡沫一样坚硬，装车的人甚至有时间像运送一串串香蕉似的把尸体排好码齐。为了逃出梦魇，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朝着火车前进的方向，匍匐着从一节车厢爬到另一节车厢。当火车驶过一座座沉睡的村庄，借着板条间映进的光线，他看见了男人的尸体，女人的尸体，儿童的尸体，他们都将像变质的香蕉一样被丢入大海。他只认出一个在广场上卖饮料的女人和加比兰上校，上校手里还握着卷成一团、带莫雷利亚银搭扣的皮带，曾试图用来在恐慌中开路。到达第一节车厢后，他跃入黑暗之中，卧在水沟里直到火车过去。那是他平生见过的最长的火车，有将近两百节运货车厢，首尾各有一个火车头，中间还夹着一个。火车

悄无声息地在夜间滑行，车上没有任何光亮，连定位的红绿灯光也没有。车厢顶上依稀可见一挺挺机枪旁士兵的黑影。

午夜过后突降暴雨。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却知道只要与火车反向而行就能回到马孔多。三个多小时后，他已浑身湿透，头痛欲裂，在拂晓的晨光里远远看见了第一排房舍。他循着咖啡的香气走进一户人家的厨房，一个女人抱着孩子正向火炉弯下腰去。

“您好，”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是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布恩迪亚。”

他逐字说出全名，向她证明自己还活着。他这样做很明智，因为那女人乍见他那副憔悴、阴郁、头上衣间都沾满血迹的模样出现在门口，还以为是鬼魂显现。她认得他。她给他拿来一条毯子御寒，好等着脱下来的衣服在火上烘干，为他烧水清洗伤口—好在只是皮肤上的一道划伤—又给他一片干净的尿布把头包住。然后，她按照传言中布恩迪亚家人的习惯煮了杯不加糖的咖啡给他，把衣服在火边摊开。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喝完咖啡才开口说话。

“应该有三千人的样子。”他喃喃道。

“什么？”

“死人。”他解释道，“所有在车站的人都死了。”

那女人用同情的眼神打量着他。“这儿没有死人。”她说，“从你伯父，也就是上校那时候起，马孔多没发生过任何事。”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在到家前一路逗留过的三家厨房里都听到同样的回答：“没有死人。”他走过车站广场，看见油炸食品摊子的桌子已被码起，那里也没留下任何屠杀的痕迹。雨下个不停，街上空无一人，家家大门紧闭，看不出里面有丝毫生命的迹象。直到第一声弥撒钟声响起，才有了一丝人间气象。他敲开了加比兰上校家的门。一个他以前见过多次的孕妇，当面把门紧紧关闭。“他走了，”她惊恐地说道，“回他的老家了。”电网鸡笼的正门和往常一样，由两名地方警察守卫，他们身着雨

衣，头戴橡胶头盔，在雨中仿佛石像。在偏僻的小巷里，安的列斯群岛的黑人齐声唱着安息日的赞美诗。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翻过院墙，从厨房进了家。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几乎没有提高声音。“别让费尔南达看见你，”她说，“她刚起床。”仿佛在完成一项早已领会的使命，她把他引到“便盆室”，收拾出梅尔基亚德斯快要散架的行军床，还在下午两点趁费尔南达午睡的时候从窗子递进一盘食物。

奥雷里亚诺第二被暴雨拦住只好睡在家里，下午三点还在等待天晴。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暗中告诉了他，他便在这时去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看望自己的兄弟。他同样无法相信大屠杀的发生，更不相信满载尸体的火车驶向大海的梦魇。前一天晚上，他已读过政府特别通告，通告称工人们已经听从命令撤离车站，平静地各自回家了。通告还称工会领导人本着高度的爱国精神，已将要求减为两条：改善医疗服务和在居住区设置厕所。晚些时候传来消息，称军队首脑与工人达成协议后，立即与布朗先生沟通，布朗先生不仅接受了新条件，而且主动提议出资举行三天的公众娱乐活动来庆祝争端的解决。只是当军方问及何时可以宣布签署协议，他望了望窗外闪电纵横的天空，摆出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

“估计要等到天晴。”他说，“只要雨还在下，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取消。”

此前三个月没有下过雨，正值旱季。但在布朗先生宣布他的决定后，整个香蕉种植区暴雨大作，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在回马孔多的路上正赶上这场暴雨。一个星期后雨仍未停。政府利用所掌控的一切传播渠道在全国千百遍反复宣传，官方说法最终成为定论：没有死人，心满意足的工人们已回到家中，香蕉公司在降雨期间取消一切活动。军事管制法继续施行，以备在必要时采取紧急措施处理持续降雨造成的社会危害，但军队已撤回军营。白天，士兵们高高挽起裤腿，在街上的激流中和孩子们玩溺水者游戏。晚上宵禁之后，他们用枪托砸开房门，把嫌疑人从床上拖出来，送他们踏上没有归途的旅程。根

据四号令对不法分子、杀人犯、纵火犯和反叛分子实施的搜捕及剿灭仍在继续，但军方面对挤满司令部办公室的受害者亲属的询问，却一概矢口否认。“您一定是在做梦，”军官们坚持道，“马孔多没发生过任何事，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是一座幸福的小城。”就这样，工会领导人被消灭殆尽。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是唯一的幸存者。二月的一天晚上，响起枪托砸门特有的声音。仍在等待雨停的奥雷里亚诺第二打开门，看见一位军官带着六名士兵。他们浑身淋得湿透，一言不发，从厅堂到谷仓逐一搜查，不放过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衣柜。乌尔苏拉被屋里亮起的灯光惊醒，但在搜查的过程中没吭一声，只是将手指交叠，指向士兵们活动的位置。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急忙去通知睡在梅尔基亚德斯房间里的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但他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走。于是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又把门锁上。他在屋里穿上衬衣和鞋子，坐在行军床上等待他们到来。那时他们正在搜查金银器作坊。军官命人打开门锁，借着提灯的光亮扫视一周，看到了工作台和玻璃柜，柜中的酸液瓶罐和各式器具都按当初主人留下的原样放着。他看出来没有人住在这房间里，却仍狡诈地向奥雷里亚诺第二询问他是不是金银匠。奥雷里亚诺第二向他解释这作坊属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啊哈。”军官恍然大悟，打开灯下令仔细搜查，连收在瓶子后面铁皮罐里的十八条未被熔化的小金鱼也被找了出来。军官将小金鱼摆在工作台上一条一条检查了一遍，神色和缓下来，忽然间变得有人情味了。“我想要一条，如果您允许的话。”他说，“过去是叛乱的信物，现在可成了文物。”他很年轻，几乎还未成年，但丝毫不显腼腆，并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只是直到此时才流露出来。奥雷里亚诺第二送了他一条小金鱼，军官收在衬衣口袋里，眼中闪烁着孩子般的光彩，又把余下的倒进罐里放回原处。

“这是无价的纪念品，”他说，“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可是一位最伟大的人物。”

然而，他的人情味并不妨碍他严格履行职责。在重新锁好的梅尔基亚德斯房间的门口，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没有放弃最后一线希望。“这间屋子一百年没有住人了。”她说。军官仍下令开门，拎起提灯扫视一圈。光线照在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脸上的瞬间，奥雷里亚诺第二和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看见了他那双阿拉伯人似的眼睛，心下便明白这是一段焦虑的结束，又是另一段焦虑的开始，而只有彻底放弃才能安心。军官仍拎着提灯四下检视，直到发现堆放在衣柜里的那七十二个便盆才表现出兴趣。他打开了灯。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坐在行军床边，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从未显得如此庄严深沉。房间深处的隔板上放着书页散落的书籍和羊皮卷，整洁的工作台一尘不染，墨水瓶中的墨水仍未干涸。空气纯净明澈，一切不染尘埃，清新如故，与奥雷里亚诺第二童年记忆中的景象丝毫不差，只有当初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感觉不到。但军官只对便盆感兴趣。

“这家住了几口人？”他问道。

“五口。”

军官显然无法理解。他的视线停留在奥雷里亚诺第二和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看见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的地方，但连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也意识到他对自己视而不见。随后他熄了灯，关上门。听着他对士兵们说的话，奥雷里亚诺第二明白这位年轻的军官和当年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看到的是同样的景象。

“这间屋子确实至少有一百年没住人了，”军官对士兵们说，“说不定都有蛇。”

门一关上，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就确信自己的战争已经结束。数年前，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曾对他讲起战争的魅力，并试图用个人经历中的无数实例来证明。他信以为真。但就在军人们对他视而不见的这个晚上，他回想起过去几个月的紧张局势，狱中的苦难，车站里的恐慌，以及满载死尸的火车，得出一个结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不过是个伪君子或懦夫。他不理解上校何必用那么多言

辞来解释自己在战争中的感受，其实用一个词便足够：恐惧。相反，在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里，被神奇的光线、落雨的声音、隐身的感觉所保护，他找到了此前生命中一刻不曾有过的安宁，余下的唯一恐惧就是自己有可能会被活埋。他告诉了每天前来送饭的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她答应只要自己一息尚存，就一定让他先死后葬。摆脱了所有恐惧，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得以专心钻研梅尔基亚德斯的羊皮卷，愈难索解兴致愈高。他习惯了雨声，两个月之后那已经无异于另一种静谧，唯一打扰他独处的就是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的进进出出。因此他恳求她把饭留在窗台上，再次关门上锁。家人已将他遗忘，包括费尔南达，她得悉军人们对他视而不见，便不觉得留他在那里有什么不妥。六个月的幽闭过去，军队已撤离马孔多，奥雷里亚诺第二想找人聊天打发等待雨停的时间，便打开门锁。门一开，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这气味散发自屋里满地的便盆，每一个都已用过多次。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须发蓬乱形容难辨，对令人作呕的气味恍若不知，仍在反复研读天书般的羊皮卷。他身上闪耀着天使般的光芒。门开的时候，他只是微微抬了下头，但就在那一瞥中，他的兄弟分明看到了曾祖父那种无可挽回的宿命在重演。

“有三千多人，”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只说了一句话，“现在我能确定车站里所有的人都死了。”

---

①洛伦索·加比兰（Lorenzo Gavilán）与阿尔特米奥·克鲁斯（Artemio Cruz）皆为墨西哥作家卡洛斯 · 富恩特斯的长篇小说《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中的人物。

②此处指将中指半搭在食指上，借以消灾避祸，类似“触木祛灾”的迷信。

十六

雨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两天。间或有细雨绵绵的日子，一开始人人都还身着盛装，带着久病初愈的神情预备庆祝天晴，但很快便习惯了将这些间歇当作滂沱重现的前奏。暴雨倾盆破空而降，飓风自北方而来，掀瓴破瓦，推墙倒垣，将种植园里的残株连根拔起。就像乌尔苏拉在这些日子里常会想起的失眠症蔓延时一样，灾难本身能激发人们找出对抗烦闷的方法。奥雷里亚诺第二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不甘心向无所事事的日子屈服。布朗先生引发暴雨的当晚，他碰巧为一件小事回到家里，费尔南达从柜中找出一把快要散架的雨伞给他。“用不着，”他说，“我等雨停了再走。”这当然算不上什么无法更改的承诺，但他却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衣服都放在佩特拉·科特斯家里，因此他每三天脱下身上的脏衣服，只穿着衬裤等候衣服洗净。为了不觉无聊，他投入到家里各处的修缮活计中。他把合页调好，给锁孔上油，拧紧门环，校正插销。一连几个月，只见他带着工具箱四处奔忙，那箱子恐怕还是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时代吉卜赛人落下的。没人知道是无意的锻炼、越冬的烦闷，抑或是被迫的节欲，令他的肚子像皮袋泄气似的渐渐瘪了下去，快活的乌龟脸不再那么赤红，颏下的垂肉也不再那么鼓突，最后整个人都不再那么臃肿，又能够自己系鞋带了。看着他装门锁，修钟表，费尔南达不禁暗自担心他会不会也染上了且造且毁、且毁且造的恶习，就如同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做小金鱼、阿玛兰妲缝扣子做寿衣、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读羊皮卷、乌尔苏拉追忆往事那样。然而实情并非如此。问题就出在搅乱一切的连绵大雨上，如果三天不上一次油连最干燥的机械也会从齿轮间绽放出花朵，而锦缎中的金银线长了锈，潮湿的衣服上则生出橙红色的水藻。环境如此湿润，仿佛鱼儿可以从门窗游进游出，在各个房间

的空气中畅泳。一天早上乌尔苏拉醒来，觉得自己陷入一种恬静的恍惚中，叫人哪怕用担架也要将自己送到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那里。就在此时，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发现她后背上密密麻麻全是水蛭。赶在乌尔苏拉的鲜血被吸干之前，她用未熄的木炭烫灼把水蛭一条条揭下来。家里不得不开沟排水，清除蟾蜍和蜗牛，这样才能晾干地面，撤去垫在床脚的砖块，重新穿鞋走路。奥雷里亚诺第二忙着应付各样需要处理的琐事，直到一天下午坐在摇椅上望着早至的暮色，想起佩特拉·科特斯却毫不动情，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衰老。他大可顺势重拾费尔南达乏味的爱情，步入盛年的她仍美貌不减，但雨水已经令他远离一切情欲的冲动，代之以清心寡欲的平和。他兴致盎然地想象，换了以前在这样将近一年的雨天里自己能做出什么事来。他第一个将锌板引进马孔多，远在香蕉公司将其引为时尚之先，不过他单单是为了给佩特拉·科特斯的卧室盖屋顶，享受雨声淅沥带来的私密感。但即使是这些年轻时的荒唐回忆也没能触发他的激情，仿佛最后一场欢宴已经耗尽他所有的欲望，只为他留下一项奇妙的奖励，即可以纵情回忆过往而不带半点儿苦涩与悔恨。或许有人会想，是暴雨给了他安静沉思的机会，是钳子加油壶的忙碌活计唤醒了他迟来的感怀，让他想到一生有许多有益的事情可做却从未实行。但这两者都不正确，因为他安于家室的渴望既不是反复思考的结果，也不是痛改前非的产物，而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往昔，那时他还在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里读着飞毯和巨鲸吞食水手与航船的神奇故事，到如今这愿望又因暴雨连绵而重新浮现。在这段日子里，由于费尔南达偶一疏忽，小奥雷里亚诺跑到了走廊上，被外祖父发现了身世的秘密。他给孩子理发，穿好衣服，让他不再怕人。这孩子凸出的颧骨、惊奇的眼神和孤僻的神态，很快显出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这对费尔南达而言算是了却一桩心事。一段时间以来，她已经在克制自己的傲慢，却不知该如何补救，因为她越是思索解决的办法，越发觉得不可行。若早知道奥雷里亚诺第二会这样处理问题，这样乐于做外

祖父，她本不必绕那么多圈子拖那么长时间，在一年前就能摆脱煎熬。对已经开始换牙的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来说，小外甥就像是一件难以掌控的玩具，成为无聊雨天里的消遣。奥雷里亚诺第二想起了那套丢在梅梅以前的卧室里再也没人动过的英语百科全书，他开始把书上的插图，特别是动物插图翻给孩子们看，然后是地图、异国风景和知名人物的照片。由于不懂英语，只能勉强认出那些最出名的城市和最常见的人物，他就编造出人名和传说来满足孩子们无穷的好奇心。

费尔南达真的相信丈夫在等待天晴回到情妇那里。下雨的最初几个月，她担心丈夫会溜进自己的卧室，那样她只得不顾羞赧地坦诚，自从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出生以后她就失去了过夫妻生活的能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急切地与隐身的医生通信，但总因频频发生的邮政事故而中断。最初几个月，常有消息说火车在暴风雨中出轨，隐身的医生也来信告知没有收到她的信件。晚些时候，她与从未谋面的医生失去联系后，已然在认真考虑戴上丈夫参加血腥狂欢节时用过的老虎面具，化名去找香蕉公司的医生作检查。但那时常有人带来有关暴雨的不幸消息，其中一个告诉她公司已经撤走医疗站，搬到了没下雨的地区。因此她的指望化为泡影。她只能一边期待雨天过去邮路恢复，一边自行设法缓解身上的暗疾，因为她宁死也不愿落在马孔多所剩唯一的医生，那个以驴草为食的古怪的法国人手里。她去找乌尔苏拉，相信她会知道某种可以缓解自己不适的方子。但她出于拐弯抹角的说话习惯，从不直接叫出事物的名称，不惜前后颠倒以减轻羞耻感，将分娩说成排出，将血漏唤作胃热，结果乌尔苏拉合乎情理地得出结论，认为她的病与子宫无关而属于肠胃问题，建议空腹服用甘汞。对于其他不这样过分正经的人来说，这病症其实并非难言之隐。如果不是身染暗疾，不是遗失信件，费尔南达才不会在乎下雨，因为她的一生中本就阴雨不停。她不曾改变作息时间，也不曾稍减繁文缛节。当桌子四脚还立在砖块上，椅子下还垫着木板以免吃饭时弄湿双脚，她依然不忘铺上亚麻桌布，摆设中国瓷器，吃晚饭时点亮烛台，

因为她认为灾难不能成为不守规矩的借口。家里没有人再向街上张望。要是依着费尔南达，她一定会永远禁止这种行为，而且远在雨天开始前她就有此想法，因为在她看来门发明出来就是为了关闭，对街上动静的好奇则只属于青楼女子。然而，当听说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的送葬队伍正经过时，她自己首先向外张望，结果透过半掩的窗户所见的景象令她痛苦不已，很长时间都为自己的软弱而悔恨。

她想不到会有这样凄惨的送葬队伍。棺材由一辆牛车拉着，车上用香蕉叶搭了个遮篷，但在雨水暴烈击打下，地面一片泥泞中，车轮每走一步都不住下陷，遮篷也摇摇欲坠。一道道凄凉的水柱倾泻在棺材上，浸透了覆在上面的旗帜。那是一面染着鲜血和硝烟污痕的战旗，被最有骨气的老兵们所唾弃。棺材上还摆着一把饰有丝穗铜缨的军刀，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当年寸铁不带地进入阿玛兰妲的缝纫间之前，总是把它挂在客厅的衣架上。牛车后面是尼兰迪亚协定签订后硕果仅存的老兵，全把裤腿挽起半截，有几人还赤着脚，他们都在泥泞中扑腾着，一只手拄着白坚木手杖，另一只手拿着被雨淋得退色的纸花圈。他们仿佛幻象出现在仍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上，所有人在经过时都不忘向那幢房子望上一望。到广场的街角拐弯时，他们不得不请人帮忙拉出深陷的车轮。乌尔苏拉让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把自己搀到门口。她关注着送葬的每一个细节，没人怀疑她都能看到，尤其当她像报讯天使般高举手臂随着牛车的摇摆而晃动的时候。

“永别了，赫里内勒多，我的孩子，”她喊道，“替我向我的家人问好，告诉他们雨停了我们就能见面。”

奥雷里亚诺第二扶她回到床上，像往常一样漫不经心地问她那句告别是什么意思。

“是真的，”她说，“我等雨停了就死。”

街上的情形令奥雷里亚诺第二警醒起来。他终于开始为牲畜的命运担忧，便披上一块油布，赶去佩特拉·科特斯家里。他看见她站在

院中齐腰深的水里，正设法使一匹死马漂起来。奥雷里亚诺第二捡起一根木棒上前帮忙，肿胀的庞大尸骸翻了个身遂被奔涌的泥流卷走。自下雨以来，佩特拉·科特斯所做的就是将牲畜尸体清出院子。最初几个星期，她托人带信给奥雷里亚诺第二，请他赶紧应对，而他回复说不用着急，情况没那么糟，等雨停再作计较。她托人告诉他牧场正被水淹，畜群在逃往没有食物的高地，那里等待它们的只有美洲虎和瘟疫。“没什么办法，”奥雷里亚诺第二回答，“反正雨停了还会再下崽。”佩特拉·科特斯看着牲口接二连三地死掉，甚至顾不上将陷在泥潭里的牲口宰杀。她眼睁睁看着暴雨无情地毁掉这份当初在马孔多人眼中最稳固、最雄厚的家业，剩下的只有冲天臭气。当奥雷里亚诺第二决心来探看情况时，他眼前就只剩那匹死马，以及马厩的瓦砾间一头瘦骨嶙峋的母骡。佩特拉·科特斯见他来了，没有惊奇、没有喜悦也没有怨恨，仅仅露出一丝嘲弄的笑容。

“来得真是时候！”她说。

她老了，瘦得皮包骨，那双活像食肉动物的尖锐眸子由于整日看雨已变得悲凉而温顺。奥雷里亚诺第二在她那里待了三个多月，倒不是因为他感觉比家里更好，而是因为他需要这么长时间才能下决心再次披上油布出门。“不着急，”他说，就像在另一个家里所说的一样，“再待几个小时等天晴吧。”第一个星期，他逐步适应了时光和雨天在情妇身上留下的痕迹，眼中的她又渐渐恢复了往日的模样，他便回想起两人的纵情享乐，回想起两人的欢好激发牲畜疯狂繁殖的景象。到第二个星期的一天夜里，半是出于爱意半是出于兴致，他用急迫的爱抚将佩特拉·科特斯唤醒，但她没有回应。“老实睡吧，”她嘟囔道，“现在已经不是干那些事的时候。”奥雷里亚诺第二在天花板上的镜子里看见了自己，也看见了佩特拉·科特斯的脊柱仿佛枯萎的神经穿起的一串线轴，于是明白她说得不错，不过那与什么时候无关，而是他们自己已不再适合干那些事。

奥雷里亚诺第二带着自己的衣箱回到家里，心中确信不仅是乌尔苏拉，马孔多所有的居民都在等待雨停后死去。一路上，他看见他们坐在厅堂里，眼神迷茫，抱手胸前，感受着浑然一体、未经分割的时光在流逝。既然除了看雨再无事可做，那么将时光分为年月、将日子分为钟点都终归是徒劳。孩子们嬉闹着迎接奥雷里亚诺第二，他又为他们拉起呼呼作喘的手风琴。但比起手风琴演奏，还是百科全书更受欢迎，因此他们又回到梅梅的房间，奥雷里亚诺第二又发挥想象，将飞艇说成在云朵中寻找卧床的飞象。有一回，他发现了一名骑手的插图，那人身上的异国服饰也掩不住熟悉的气息。仔细观察之后，他得出结论：那是一幅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肖像。他拿去给费尔南达看，她也看出了相似之处，认为那骑手不仅与上校一个人，甚至与家中所有成员都很相像，尽管那其实是一名鞑靼武士。时间就这样在罗德岛巨像和弄蛇人之间流逝，直到妻子提醒他，谷仓里只剩下六公斤咸肉和一袋米。

“那你现在想让我怎么样？”他问。

“我不知道，”费尔南达回答，“这是男人的事。”

“好吧，”奥雷里亚诺第二说，“等雨停了总会有办法。”

他对百科全书的兴趣多过家庭用度，尽管午饭时只有一小块肉和少许米饭将就。“现在什么也干不了，”他常说，“雨总不会下一辈子。”随着谷仓存粮日渐匮乏，费尔南达的怨气也日益增长，偶尔的牢骚、少见的怨言终于爆发为势不可当的洪涛，在一个早上以仿佛吉他叠句的单调起始，一天里音调渐渐升高，音色越发丰富，韵律益显激越。奥雷里亚诺第二起初并未留心这反复的唠叨，直到次日早饭后才察觉那比雨声更流畅高昂的嗡鸣声，吵得他头昏脑涨。费尔南达在整个家中游走，痛诉满腹的哀怨，说自己原是照着女王的模子受的培养，结果却沦落成一个疯人院的女佣，有个游手好闲、崇拜偶像、放荡不羁、整天仰面躺着等天上掉面包的丈夫，而她却要累折了腰靠几个小钱维持这个用大头针撑起的家，从上帝开启新的一天到她晚上眼

睛疼得像进了玻璃碴才上床睡觉，总有那么多事要做，总有那么多事要忍耐要纠正，却从没有人说一句“早上好，费尔南达”或“晚上睡得怎么样，费尔南达”，也从没有人哪怕是出于礼貌问一声她脸色为什么这样苍白或为什么早上起来眼圈发紫，当然她也从未期待这些话能够从这家人的口中说出来，归根结底他们都一直把她当作障碍，当作端锅用的抹布，当作画在墙上的丑八怪，总在背后说她的坏话，叫她假圣女，叫她法利赛人，叫她刁女人，而阿玛兰妲，愿她安息，甚至公然说她是那种分不清直肠和斋戒日的女人，上帝啊，这叫什么话，而她还顺从圣父的旨意忍受了这一切，可她实在忍受不了那可恶的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说什么家道衰落就是因为娶进了一个内地女人，听听，一个好发号施令的内地女人，上帝啊，一个恶毒的内地女人，跟政府派来屠杀工人的内地佬是一路货色，你说说，他指的不是别人就是她嘛，阿尔瓦公爵的教女，出身于连总统夫人都艳羡不已的名门望族、有着高贵血统的她有权在签名中列出十一个源自半岛的古老姓氏，是这个私生子横行的市镇里唯一能自如运用十六件套餐具的人，而她那通奸的丈夫却狂笑着嘲讽，说那么多刀叉、那么多汤匙，比起基督徒来百足虫用着更适合，只有她闭着眼睛都知道什么时候、从哪一侧、用哪种酒杯上白葡萄酒，以及什么时候、从哪一侧、用哪种酒杯上红葡萄酒，不像粗俗的阿玛兰妲，愿她安息，竟然以为白天就喝白葡萄酒，晚上就喝红葡萄酒，整个沿海地区只有她有资格夸口自己是只在金溺盆里方便的人，而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愿他安息，竟然以他共济会会员的恶毒，放肆地质问她从哪儿来的这种特权，莫非她拉的不是粪便而是香草，你想想，这是什么话，而雷纳塔，她的亲生女儿，也趁她不备到卧室去看她的大便，出去说溺盆的确是金的也的确刻着家族纹章，但里面盛的是纯粹的粪便，实实在在的粪便，甚至比别人的更糟，因为那是内地女人的粪便，你想想，那还是她的亲生女儿，因此她从未对家里其他人抱有幻想，但无论如何她有权期盼从丈夫那里得到些许尊重，不管怎样他是她经过婚姻圣礼

结下的伴侣，她的主宰，她的合法郎君，他出于自由而崇高的意愿担起重任将她领出父家，她在那里本来一无所缺，无忧无虑，编织花圈只为消遣，因为她的教父曾专门寄来一封用戒指盖印火漆封缄的信件，特意叮嘱教女的双手除弹奏古钢琴以外不可从事任何尘世俗务，然而她疯狂的丈夫领她出门时对一切劝诫和嘱托都满口应承，却将她带到这个热得令人窒息的低洼地狱，没等她结束圣灵降临节斋戒就径自拿着他的流动衣箱和浪荡子的手风琴去跟那个灾星女人姘居，只要看看她的胯，哦，是的，只要看看她小母马似的扭胯模样，就能猜出那是一个……一个和她截然不同的女人，无论在宫殿还是猪圈，在桌上还是床上，她都是堂堂的名媛，天生的贵妇，她敬畏上帝，遵从上帝的律法，顺服上帝的旨意，他和她在一起当然不能像和那个女人一样玩那些放荡的花样，那女人当然来者不拒，就像那些法国女郎，甚至更糟，想想看，那些女郎起码还会诚实地在门前亮起红灯，这些下流行径，难以想象竟然要扯上堂娜雷纳塔·阿尔戈特与堂费尔南多·德尔·卡皮奥的独生爱女，特别是她父亲，毫无疑问，一位圣洁的男子，伟大的基督徒，圣墓骑士团的骑士，直接从上帝那里领受了死后肉身不朽的恩典，皮肤柔滑似新娘的锦缎，眼眸生动清亮如翡翠。

“这可不是真的，”奥雷里亚诺第二打断了她的话，“他被送来的时候都臭了。”

耐着性子听了一整天，终于让他抓到一处错误。费尔南达未加理睬，但声音却低了下去。当天晚饭时分，气急败坏的唠叨声压过了窗外的雨声。奥雷里亚诺第二低着头，吃得很少，早早回了卧室。第二天早饭时，费尔南达浑身颤抖，一副没有睡好的样子，似乎完全被自己的怨气击垮了。然而，当丈夫问起能不能吃一个水煮溏心蛋，她没有直接回答上星期鸡蛋就已经吃完，而是炮制出一通恶毒的言语，抨击男人整日只知道观赏自己的肚脐，还觍颜要求饭桌上有云雀肝。奥雷里亚诺第二像往常一样带孩子们去读百科全书，费尔南达则装作要收拾梅梅的卧室，其实只为了让他听见自己的嘟囔。当然了，一个人

脸皮要足够厚，才能欺骗天真的孩子们说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肖像收在百科全书里。午后，孩子们正在午睡的时候，奥雷里亚诺第二坐在长廊里，费尔南达也追到那里，刺激他，折磨他，没完没了地围着他嗡嗡叫，说家里能吃的只剩下石头，而她的丈夫还理所当然地在那里稳坐，俨然一位波斯苏丹在看雨，因为他就是一个懒汉，一个吃闲饭的，一个废物，比粉扑棉还要松垮几分，习惯了靠女人养活，自以为娶的是约拿的妻子，当她听了鲸鱼的故事就会心满意足[①]。奥雷里亚诺第二不动声色地连听了两个多小时，仿佛耳聋似的。他一直没有打断她，但那聒噪的轰响令他头痛不已，到黄昏时再也无法忍受。

“拜托你别说了。”他恳求道。

费尔南达反而抬高了嗓门。“我为什么不说，”她说，“谁不愿意听谁就走。”这一次奥雷里亚诺第二按捺不住了。他缓缓站起身，仿佛只想舒舒筋骨，然后开始有条有理地发泄怒火，抓起一盆盆秋海棠、欧洲蕨、牛至砸在地上摔碎。费尔南达吓呆了，实际上她并不清楚自己的唠叨所蕴含的可怕力量，但事到如今怎样努力弥补都已太迟。奥雷里亚诺第二的怒火一发不可收拾，他打破玻璃柜，不慌不忙地一件接一件取出里面的器皿摔在地板上砸个粉碎。他镇静自若，有条不紊，就像当初用钞票贴满房子时那样从容，将波希米亚水晶器具、手绘花瓶、玫瑰花舟少女图、金框镜子，总之从客厅到谷仓一切可以打碎的东西，都掷在墙上打碎，最后以一声巨响在院子中央摔碎厨房里的大瓮告终。随后他将手洗净，披上油布出了门，直到午夜前才回来，带着几串硬邦邦的咸肉、几袋生了虫的大米和玉米，以及几把干瘪的香蕉。从那以后，家里再没缺过食物。

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和小奥雷里亚诺后来追忆起下大雨的日子，都会觉得那是一段美好时光。尽管有费尔南达的严厉管束，他们仍常常在院中的泥坑里玩水，捉住蜥蜴解剖，趁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不备往汤里撒蝴蝶翅膀上的粉末玩下毒游戏。乌尔苏拉是他们最喜爱

的玩具。他们把她当作一个陈旧的玩偶在角落里拖来拖去，给她披上花布条，往她脸上涂满油烟和胭脂。有一次，他们险些把她的眼睛挖出来，就像用修枝剪对蟾蜍所做的那样。没有什么比她的呓语更能令孩子们快活。实际上，在雨下到第三年的时候，她的头脑中一定发生了某种变化，因为她从那时起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意识，把当下错认为久远的往昔，有一次甚至为了她曾祖母佩德罗妮拉·伊瓜兰的去世接连痛哭三天，而那老人下葬都已经一个多世纪了。她沉浸在极其荒唐的混乱状态中，甚至以为小奥雷里亚诺是上校，是被领去见识冰块时的小儿子，还把正在神学院学习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当作跟着吉卜赛人出走的长子。她一次次说起家人，于是孩子们便学会了为她安排想象中的造访，只是这些访客不仅早就不在人世，而且还是不同时代的人。她坐在床上，发间满是灰尘，脸上蒙着一块红手帕，在虚拟亲友的环绕中十分幸福。孩子们把客人描述得活灵活现，仿佛他们真的相识似的。乌尔苏拉与祖先谈论自己出生前的往事，为他们带来的消息高兴，并一道为那些比他们更晚离世的逝者难过。孩子们不久就发现，乌尔苏拉在与亡灵的交谈中总会问起有谁在战时寄存了一尊真人大小的圣约瑟石膏雕像，等待雨季过后来取。就这样，奥雷里亚诺第二想起了这笔只有乌尔苏拉知晓埋藏地点的财富，但他的一切探问和狡计都没能得逞，因为在她谵妄的迷宫里仿佛还留有一线清醒来保守这个只能向宝藏主人透露的秘密。她如此机智而缜密，当奥雷里亚诺第二找来一位酒肉朋友假冒财宝的主人时，面对她细细追究、步步设陷的盘问那人旋即败下阵来。

奥雷里亚诺第二认定乌尔苏拉会把秘密带进坟墓，便借口要在前后院子开挖排水渠，雇来一队人手进行挖掘，他自己则拿着铁镐和各式金属探测器在地上查探，可经过三个月的仔细勘察却没找到任何类似金子的东西。后来他又去找庇拉尔·特尔内拉，希望纸牌能比挖掘工看得更清楚。但她向他解释，除非由乌尔苏拉亲自切牌，否则任何努力都是徒劳。不过她证实了财宝的存在，并算出了精确的数目，说

共有七千二百一十四枚金币，装在三个用铜丝绳束口的帆布袋里，埋藏在以乌尔苏拉的床为中心、半径为一百二十二米的圆圈内。她同时又提醒，必须等到雨过天晴，连续三个六月的阳光将泥潭晒为尘土才能找到。这样虚无缥缈又不乏细节的预言让奥雷里亚诺第二觉得好似巫师的神话，因此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努力，全然不顾当时已是八月，还要等上至少三年才能达到预言所说的条件。首先令他吃惊又困惑的是，经证实从乌尔苏拉的床到后院院墙的距离不多不少正是一百二十二米。费尔南达见他四下测量，不由担心他会变得像他的孪生兄弟一样疯狂，后来见他向挖掘工下令将排水渠再深挖一米时担心更甚。奥雷里亚诺第二完全沉浸在一种可与曾祖父当初寻找伟大发明之路时相媲美的探索激情中，耗尽了身上残存的脂肪，渐渐恢复了昔日与孪生兄弟的酷似，不光是瘦削的外表，还有那漠然孤僻的神态。他不再照管孩子，吃饭没个定时，常常不顾从头到脚一身泥污在厨房匆匆吃完，对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不时的问话勉强答上几句。费尔南达做梦都没想到他会如此卖力， 见他这样投入地干活，就将他的冒进当作勤勉，贪婪当作忘我，固执当作坚毅，内心深深悔恨不该用那样恶毒的言语来攻讦他的懒散。然而，奥雷里亚诺第二此刻无暇理会出于怜悯的和好。他翻遍了前后院子的土地后，又一头钻进满是枯枝败叶残花腐蕾的齐颈深泥坑中，把花园的土地捣弄了一遍。他在家中东侧的地基上凿出深洞，结果一天夜里家人在大难临头的恐惧中惊醒，感觉房子在颤动，地下还传来可怕的吱吱声。三间屋子正摇摇欲坠，更有一道骇人的大裂缝从长廊直延伸到费尔南达的卧室。奥雷里亚诺第二并未因此放弃探索。尽管最后的希望都已破灭，唯一似乎还有意义的就是纸牌的预言，他也只是加固松动的地基，用灰浆抹平裂缝，又继续到西边挖掘。直到次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雨水开始减弱，云层渐渐消散，看上去随时会雨霁天晴。果然如此。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两点，一轮砖红色的太阳照亮世界，那阳光如砖末般粗粝，又几乎如水般清凉。此后十年中滴雨未降。

马孔多满目疮痍。街巷间的泥潭中残留着破烂家具，被红色百合覆盖的动物骨架，都是外来人潮留下的最后遗物，他们一拥而至又一哄而散。香蕉热潮期间匆忙盖起的房子都已废弃。香蕉公司撤走了一切设施。当初电网包围的城市只剩下一地瓦砾。那些木屋，那些午后常有轻松牌戏的清凉露台，都被飓风刮走，仿佛是多年后马孔多必将从世间被抹去的预演。这场狂野风暴过后留下的人迹，只有帕特里夏·布朗的一只手套，落在已被九重葛淹没的汽车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当年创业时探索过的着魔之地，后来变成繁盛的香蕉种植区，此时却沦为腐烂根系的沼泽，多年以后从这里仍能遥遥望见远方大海无声的泡沫。雨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奥雷里亚诺第二穿上干衣服出门，故园面目全非的景象令他心痛不已。那些灾难幸存者，那些早在香蕉公司的风暴席卷之前就生活在马孔多的老住户，都坐在街头享受雨后初晴的阳光。他们皮肤上仍残存着绿色的水藻，身上雨水留下的墙角霉味犹未散去，但在内心深处正为收复了自己出生于此的市镇而欣慰不已。土耳其人大街又恢复了昔日景象，就像当年阿拉伯人到来时一样。那些穿尖头靴戴耳环的阿拉伯人走遍世界用小玩意儿交换金刚鹦鹉，最终在马孔多找到安身之处，结束了千年流浪生涯。市集上的商品破败不堪，店门口的货物苔藓满布，柜台被白蚁蛀坏，墙壁受潮气侵蚀，然而第三代阿拉伯人仍坐在同样的地方，带着和祖辈父辈同样的神态。他们沉默寡言，镇静自若，不受时光与灾难的影响，就像失眠症肆虐之后以及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三十二场战争之后那样生死莫测。面对破烂不堪的赌桌、油炸食品摊子、打靶屋、已成一片废墟的算命解梦的小巷，他们表现出的镇定着实令人惊诧。奥雷里亚诺第二不禁以一贯的随便态度，问他们凭借了怎样的神奇方法从暴风雨中幸存，怎么会见鬼似的没被淹死，而家家户户都报以狡猾的微笑和梦幻般的眼神，人人都不谋而合地给出同样的答案：

“游泳。”

佩特拉·科特斯或许是本地唯一拥有阿拉伯人那般心气的人。她眼见暴雨卷走牛棚与马厩最后的残迹，仍努力撑起门户。最近一年，她托人给奥雷里亚诺第二带去紧迫的消息，而他回答说还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回她家去，但无论如何都会为她带去一箱金币铺满卧室的地面。于是她遍寻自己的内心，寻找能够助她战胜不幸的力量，找到的却是经过深思熟虑、有理有据的怒气。她怀着这怒气，发誓要重新挣出被情人挥霍、被暴雨吞噬的财富。她的决心不可动摇，当奥雷里亚诺第二最后一次接到口信八个月后回到她家时，就看见她脸色青绿，蓬头散发，眼窝深陷，皮肤遍布疥疮，却仍忙着在小纸片上写数字，准备经营彩票生意。奥雷里亚诺第二愣在原地，那瘦削严肃的样子让佩特拉·科特斯难以相信回来找她的是陪伴一生的情人，而不是他的孪生兄弟。

“你疯了，”他说，“除非你想用骨头当奖品。”

这时，她让他去卧室看一眼，他便看到了那头母骡。它和主人一样瘦得皮包骨，但也和她一样精神抖擞，神情坚定。佩特拉·科特斯用自己的怒气培育它，没有草料、没有玉米也没有树根时便把它安置在卧室，喂它棉布床单、波斯地毯、长毛绒床罩、天鹅绒窗帘，以及主教式大床上用金线刺绣、带真丝流苏的华盖。

---

①此处指《旧约·约拿记》中的情节，先知约拿被大鱼所吞，在鱼腹中待了三昼夜。

十七

乌尔苏拉颇费了一番工夫，才兑现雨停就死去的诺言。雨天里她难得神智清明，八月后却频显清醒，那时开始刮起干燥的热风，令玫瑰萎谢泥沼枯涸，在马孔多遍撒滚烫的尘沙，将生锈的锌皮屋顶和百年的巴旦杏树永远覆盖。乌尔苏拉发现自己整整三年都被当作孩子们的玩具，不禁难过地哭了一场。她洗去脸上的涂鸦，拿掉挂满一身的花布条、蜥蜴和蟾蜍干尸、念珠和阿拉伯人的古旧项链，自阿玛兰妲死后第一次不用人搀扶离开了床榻，重新投入家庭生活。她那不可战胜的心气成为她在黑暗中的引导。每当有人注意到她磕磕绊绊，不小心撞到她那天使长般高举过头的手臂，都会认为她身体状况堪忧，却未曾料到她其实已经失明。她无需双眼就发现，早在第一次扩建家宅时精心培育的花圃都已毁于大雨和奥雷里亚诺第二的大肆挖掘。她还发现，从墙壁到地基处处开裂，家具退色散架，房门脱轴，家中弥漫着一种在她那个时代无法想象的听天由命的悲戚氛围。她摸索着走过一间间空荡荡的卧室，听到白蚁蛀蚀木头低鸣不止、蠹虫在衣柜中沙沙大嚼，听到暴雨期间大肆繁殖的红色巨蚁挖掘地基时的毁灭之声。一天，她打开装圣像的箱子，里面跳出的蟑螂当即爬上身来，她不得不向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求助才得以脱身。箱里的衣服早已被咬噬成灰。“这日子没法过，”她说，“照这样下去我们非让虫子吃了不可。”她没有一刻的空闲。她天不亮就起床，谁有空就找谁帮忙，哪怕是孩子也一样。她把不多几件还能穿的衣服拿出来晒太阳，喷洒杀虫剂驱赶蟑螂，刮去门窗上的白蚁蚁路，撒下生石灰将蚂蚁毒死在巢窝里。最终，她受重振家业的热情驱使，来到那些被遗忘的房间门前。她清理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绞尽脑汁研制点金石的屋子，除去了瓦砾和蛛网，又把被士兵翻得一片狼藉的金银器作坊收拾整

齐，最后要来梅尔基亚德斯房间的钥匙，打算看看里面的样子。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曾说过除非他确实已不在人世，否则谢绝一切打扰，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为尊重他的意愿想出无数托辞来搪塞乌尔苏拉。但她的决心不容动摇，绝不肯将任何隐蔽的角落留给虫子，为此她消除了一切障碍，经过三天不懈的坚持终于让人打开房门。她不得不扶住门枢才没被臭气熏倒，但只用了两秒钟便想起这里存放着女学生们用过的七十二个便盆，还想起雨天伊始的一天夜里一队士兵为捉拿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曾来家中搜查，却没能找到他。

“上帝啊！”她喊了出来，仿佛一切都逃不过她的眼睛，“费了那么大力气培养你的好习惯，结果你倒活得像猪一样。”

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仍在研读羊皮卷，在他那蓬乱成团的须发间只能隐约辨出长着绿色苔藓的牙齿和木然的双眼。听出是曾祖母的声音，他转头往门口望去，努力挤出笑容，却在无意中重复了乌尔苏拉当年的一句话。

“您还能指望什么？”他喃喃道，“时间过得很快。”

“话是没错，”乌尔苏拉说，“可也没那么快。”

话一出口，她便意识到正在重复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死囚房里对自己说的话，再次在战惊中证实了时间并没有像她刚承认的那样过去，而是在原地转圈。但即使到了此时她也没向命运妥协。她像训斥孩子似的把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教训了一顿，坚持要他洗澡剃须，并来帮助自己重振家园。一听说要离开让自己得到安宁的房间，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顿时惊恐不已。他喊道，没有人能让他迈出半步，因为他不愿看到两百节车厢的火车满载死人，每天傍晚从马孔多出发驶向大海。“车站里所有的人都在上面，”他嚷道，“三千四百零八人。”乌尔苏拉这时才明白他生活在一个比自己眼前更幽深的黑暗世界，和他曾祖父的世界一样牢不可破、孤寂无伴。她同意他留在房间里，但征得他的许可不再让房门上锁，并且每天打扫，还丢掉所有便盆只留下一个，让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像当初在栗树下囚禁多年

的曾祖父一样保持清洁体面。开始时，费尔南达把她的忙碌只当作老来发狂，勉强压下怒火。就在那时，她收到何塞·阿尔卡蒂奥寄自罗马的来信，说他想在誓发永愿之前回一趟马孔多。这个好消息令她兴奋不已，她一天之内浇四次花，一心想让儿子对家里有个好印象。出于同样的原因，她更频繁地与隐身的医生通信，在长廊里重新摆放一盆盆欧洲蕨、牛至和秋海棠，而乌尔苏拉要到很久以后才知道之前的那些已经毁于奥雷里亚诺第二的怒火。不久，她又卖掉银餐具，买来陶瓷盘碟、白汤盆汤勺和镍银刀叉，使得那一向摆放西印度公司瓷器和波希米亚玻璃器皿的碗橱从此寒碜了许多。乌尔苏拉仍未满意。"把门窗都打开，"她叫道，"要做鱼做肉，要买最大个儿的乌龟，要让外乡人在角落里铺满席子，往玫瑰花里撒尿，上桌想吃多少回就吃多少回，让他们随便打嗝胡扯穿靴子乱踩一气，爱怎样就怎样，只有这么着才能赶走衰气。"但这理想难以实现。她已经太老，活得太久，无力重现糖果小动物时代的奇迹，而且她的后代中没有一个继承了她的坚毅与活力。家里按费尔南达的吩咐依然大门紧闭。

奥雷里亚诺第二又把衣箱搬回了佩特拉·科特斯家，他此时只能勉强维持不致让家人饿死。用卖骡子彩票挣的钱，佩特拉·科特斯和他又买了别的牲畜，由此起家经营起彩票生意。奥雷里亚诺第二走街串户兜售彩票，那些彩票都是他自己用彩笔所画，以求更吸引人也更有说服力，但他或许没有觉察到有些人购买是出于感激，大多数人是出于怜悯。不过，即使是最富于同情心的购买者，也不会放弃花二十生太伏得一头猪或三十二生太伏得一头小牛的机会，每到星期二晚上都满怀希望，挤满佩特拉·科特斯家的院子，等待那个随机选出的孩子从袋子里抽出中奖号码。不久这里就变为每星期一次的集市，一到星期二傍晚院中便支起油炸食品摊子和饮料台，很多中奖者只要有人奏乐和上酒就当场杀掉牲畜，而奥雷里亚诺第二也不曾想到自己又拉起手风琴，加入因陋就简的饕餮比赛。这些宴席仿佛昔日盛况的寒酸翻版，也令奥雷里亚诺第二发现自己当年的活力荡然无存，昔日的昆

比安巴舞高手雄风不再。他已然变了一个人。当年遭遇“母象”挑战时高达一百二十公斤的体重如今已减至七十八公斤，当年快活圆鼓的乌龟脸变成了鬣蜥脸，总是带着无聊和疲惫。然而对佩特拉·科特斯来说，他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好，她或许是将他在自己心中激起的同情，以及贫困引发的患难与共当作了爱情。光秃秃的大床不再是纵情欢愉的地方，而变成私密的避难所。天花板上的照影镜已被卖掉换来做奖品的牲畜，引人绮念的锦缎和天鹅绒也已被骡子啃光，他们好像一对欲望全无的老夫老妻，直到夜深仍不能成眠，便将以前白白浪费的时间用在算账和摆弄零钱上。有时他们一直忙到听见第一声鸡叫，把一堆堆零钱搬来弄去，这里减一点儿那里加一点儿：这些用来哄费尔南达开心，那些用来给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买鞋，还有这些给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她自从混乱时期起就再没穿过新衣服，这些用来给乌尔苏拉预备寿材，那些用来购买隔三个月每磅就涨上一生太伏的咖啡，这些用来买越来越没甜味的白糖，这些用来买暴雨过后还没干透的木柴，那些用来买画彩票用的纸和彩墨，剩下的补上四月份那头小牛造成的亏损，它在彩票卖光的时候突然患上红斑症，最后只侥幸落下一张牛皮。在这些无私的贫寒弥撒中，他们总把最多的一部分留给费尔南达，倒不是出于愧疚或善心，而是因为比起自己来他们更在乎她能否过得舒适。尽管两人都没察觉，他们其实都把费尔南达当成了求之不得的女儿，甚至有一次甘心情愿连喝三天玉米糊，只为了能让她买下一块荷兰桌布。然而，他们拼命劳作，努力省钱，想出无数花样，守护天使却依然在疲倦中沉睡，任他们怎样把硬币挪来移去也仅仅勉强糊口而已。因入不敷出而彻夜难眠时，他们不禁自问这世界是怎么了，为什么牲畜不再像当年那样疯狂繁殖，为什么钱从手中溜走，为什么不久前人们还肯为昆比安巴舞花上大沓钞票，现今却认为能得六只母鸡的彩票定价十二生太伏就是抢劫。奥雷里亚诺第二嘴上没有说，心里却相信不是世界的问题，而是佩特拉·科特斯神秘心灵的某个隐秘角落在暴雨期间出了毛病，使牲畜不再多产，令钱财滑不

留手。他带着这个谜团，深入她的心灵反复探究，想要找寻利益却找到了爱情，他本想让她爱自己结果自己却爱上了她。而佩特拉·科特斯见他越发亲热也就越发爱他，于是在暮年将至时又重拾青春时代的迷信，相信贫穷是爱情的奴仆。想起往昔，两人都把荒唐的欢宴、离奇的财富和毫无节制的私情当作妨碍，一同感慨浪掷了多少时光才找到共享孤独的天堂。两人在无儿无女的多年相伴之后疯狂相爱，奇迹般从桌上到床上都如胶似漆无比幸福，直到年老体衰时仍像小兔一样嬉戏，像狗一般打闹。

彩票生意一直没能兴旺起来。开始时，奥雷里亚诺第二每星期都抽出三天关在过去的牧场办公室里，一张一张绘制彩票，根据每次抽奖的牲畜，颇具神采地画上一头红色小奶牛、一只绿色小猪或是一群蓝色小母鸡，还娴熟地模仿印刷体题上“天赐彩票”几个字。佩特拉·科特斯觉得这名字起得很好。但时间一长，他每星期要画两千张彩票而深感疲倦，便请人把牲畜图案、彩票名字和号码刻在橡皮章上，这样只需在不同颜色的印泥里蘸色盖章即可。最后几年，他曾想到用谜语代替数字，让所有猜中者平分奖品，但这一规则太过复杂且令人生疑，他就没有再继续尝试。

奥雷里亚诺第二忙于经营彩票生意，几乎没有时间去看望孩子。费尔南达把阿玛兰妲·乌尔苏拉送到一所只收六名学生的私立学校，但连公立学校也不许奥雷里亚诺上。在她看来，任由他走出房间已经是莫大的让步。另外，当时的学校只接收天主教婚姻中诞生的合法子女，而奥雷里亚诺被送来时，外罩衣上用别针系着的出生证书注明他是弃婴。因此他被关起来，全靠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的好心看护和乌尔苏拉间或清醒时的照管，通过老祖母们的解说逐渐认识了家中的狭小世界。他面容清秀，身材修长，好奇心之强常常将大人们惹恼，但他那闪烁的眼神却与上校在他这个年龄时刨根问底、有时洞察一切的目光不同，显得有些漫不经心。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在花园里寻捉蚯蚓折磨虫子。有一次，他把蝎子装进盒

子准备放到乌尔苏拉的床席上，被费尔南达当场抓到，关进以前梅梅的卧室，他便在那里翻看百科全书里的插图打发孤寂的时光。一天下午，乌尔苏拉拿着荨麻枝在家中四处洒过夜的凉水。她明明已经见过多次，这时仍问他是谁。

“我是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他说。

“没错，”她回答，“现在你该去学金银匠手艺了。”

她又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儿子。暴雨过后的热风曾吹得乌尔苏拉头脑间或清醒，但那情形已一去不返。她再没恢复过理智。当她走进卧室，会遇见佩德罗妮拉·伊瓜兰，她穿着碍事的撑裙和缀有小玻璃珠的收腰外套，一身出门赴约的打扮；遇见她的外祖母特兰奇丽娜·玛利亚·米尼亚达·阿洛科克·布恩迪亚，她瘫痪在摇椅上，晃着一根孔雀翎毛扇风，还有她的曾外祖父奥雷里亚诺·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他身穿仿制的总督卫兵制服，还有她的父亲奥雷里亚诺·伊瓜兰，他曾发明咒语，能让奶牛身上的虫子干瘪自行脱落，还有她胆小怯懦的母亲，长猪尾巴的表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和他们死去的子女。所有人都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不像是来造访，倒像是在守灵。她眉飞色舞地谈天说地，所讲述的事件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每当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从学校回来或奥雷里亚诺翻厌了百科全书，总会看到她坐在床上喃喃自语，迷失在亡灵的迷宫里。“着火了！”有一次她突然惊恐地大喊，当即在家中造成恐慌，实际上她是在说自己四岁时马厩发生的火灾。她将过去与现在完全混淆，即使在她死前的两三次清醒时刻，家人也无法判断她说的是当下的感受还是过去的回忆。她日渐一日越发瘦小，变成胎儿，变成木乃伊，到最后几个月仿佛裹着睡衣的李子干，那永远高举的手臂活像蜘蛛猴的爪子。她一连几天一动不动，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不得不时常摇晃她的身体看她是否还活着，让她坐在自己腿上用小勺喂她糖水。她就像一个刚出生的老妪。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和奥雷里亚诺在卧室里把她挪来移去，让她躺在祭坛上，看看是不是比圣婴大一点儿，一天下午还把她

藏进谷仓的柜子险些被老鼠吃掉。棕榈主日费尔南达去望弥撒的时候，他们来到卧室，一个抓脖子一个抄脚踝把乌尔苏拉抬了起来。

“可怜的老老祖母，”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说，“她老死了。”

乌尔苏拉大吃一惊。

“我还活着！”她说。

“你看，”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说着，强忍住笑，“都不喘气了。”

“我在说话呢！”乌尔苏拉叫道。

“连话也说不出，”奥雷里亚诺说，“像只小蟋蟀似的死了。”

于是乌尔苏拉在事实面前屈服了。“上帝啊，”她低声叫道，“原来死就是这个样子。”她开始一场漫长、急迫、深切的祈祷，足足持续了两天多，到星期二的时候那祷词已经沦为诚心祈求与实用忠告的混合：不要让红蚂蚁毁掉房子，不要让蕾梅黛丝照片前的长明灯熄灭，不要让布恩迪亚家的人近亲结婚，生下长猪尾巴的孩子。奥雷里亚诺第二试图利用她呓语的当儿求她说出藏金币的地方，但恳求再一次落空。“等主人出现的时候，”乌尔苏拉说，“上帝必然会带领他找到。”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猜到她随时会离开人世，因为这些天来已经观察到自然事物的异常：玫瑰发出土荆芥的气味；一个加拉巴木果壳杯失手掉落，鹰嘴豆和谷粒洒落在地排列出完美的几何图形，组成海星形状；一天晚上她还看见夜空中有一排发光的橙色圆盘飞过。

她死在圣星期四一早。人们最后一次帮她数算年龄是在香蕉公司时期，当时得出的结果在一百一十五到一百二十二岁之间。她被放进一口比当年装奥雷里亚诺的篮子略大的小棺材，只有很少的人出席葬礼，一方面是因为记得她的人已经不多，另一方面因为那天中午极其炎热，连飞鸟都昏头昏脑像霰弹一般纷纷撞向墙壁，撞破铁窗纱死在卧室里。

最初人们以为是瘟疫。家庭主妇们为清扫死鸟累得精疲力竭，特别是在午休时段，男人们则用小车推着倒进河里。复活主日，年过百岁的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在布道坛上断定是“流浪的犹太人”作祟

造成飞鸟的死亡，说那个怪物他前一晚亲眼见到了。他将其描述成公山羊和女巫杂交的产物，口中呼气能化作焚空热浪，所到之处新娘会暗结怪胎。他启示录般的预言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市镇上的人都确信这位教区神甫已经老迈昏聩。但星期三一早一个女人将所有人叫醒，她发现了一行偶蹄双足动物的脚印。面对这确凿无疑的证据，所有目击者都不再怀疑存在着与神甫所说相似的可怕生物，齐心协力在各家院中设下陷阱。于是它就这样遭擒。乌尔苏拉去世两个星期后，佩特拉·科特斯和奥雷里亚诺第二被邻家传来的一阵格外刺耳的小牛哀鸣惊醒。等他们起床，已经有一群人在把那怪兽从枯叶覆盖的深洞里的尖木桩上拔下来，它已然停止哀鸣。尽管身形不过未成年人大小，它却有一头牛那么重，伤口流淌着碧绿滑腻的血液。它一身粗硬的毛发上遍生小扁虱，皮肤上覆盖着鱼般的硬壳，但与神甫的描述不同，它人形的部分更像是娇弱的天使，双手光润灵巧，眼睛大而朦胧，肩胛上强壮的翅膀只剩下已经结痂的残根，应当是被樵夫的斧子所砍伤。它被捆住脚踝倒吊在广场的巴旦杏树上，让所有人都能看见。它开始腐烂的时候，人们无法确定应该把它当作动物丢进河里还是当作人类下葬，便点起一堆火焚化了。永远无从得知它是否就是导致飞鸟暴死的元凶，新娘们倒是不曾生出预言中的怪胎，但炎热的天气也未得到缓解。

丽贝卡死于那年年底。毕生服侍她的女仆阿尔赫尼妲请求当局强行打开卧室的房门，她的主人已经在里面关了三天。人们看到她躺在孤寂的床榻上，像虾米般缩成一团，头发因生癣而落尽，大拇指含在嘴里。奥雷里亚诺第二负责料理了丧事，并打算把房子修葺好卖掉。然而那房子已破败得无可挽救，墙皮刚抹好即纷纷脱落，刷上再厚的灰浆也无济于事，只能眼看着杂草穿透地面、蔓藤侵蚀椽柱。

暴雨过后的情形便是如此。人们一派懈怠，而遗忘却日益贪婪，无情地吞噬一点一滴的记忆。就在尼兰迪亚协定签订的又一个周年纪念日，共和国总统特使赶来颁发曾被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多次

拒绝的勋章，他们足足花了一个下午四处打听，发现竟无人知晓在哪里能找到上校的后人。奥雷里亚诺第二想到那是一枚纯金奖章，一度禁不住诱惑，但最终被佩特拉·科特斯说服，为了尊严而拒领，尽管那时使者们已然张贴公告并准备好仪式上的讲演。吉卜赛人也在那个时期再次到来，这最后一批继承梅尔基亚德斯学问的人发现市镇满目颓唐、居民与世隔绝，于是又一次拖着磁铁走街串户，仿佛那真是巴比伦智者的最新发明，并又一次用巨型放大镜聚焦阳光。一见水壶坠地炒锅翻滚就目瞪口呆的不乏其人，愿意破费五十生太伏观看吉卜赛女人装卸假牙并为之惊叹的也大有人在。当年满载旅客的火车曾拖来布朗先生配备玻璃车顶和天鹅绒安乐椅的车厢，还有一百二十节车厢的香蕉运送车一过便是一下午，到如今只剩下一列破旧不堪的黄色火车，而且因为无人搭乘几乎不在荒废的站台停留。教廷派代表团赶来核查关于飞鸟暴亡和“流浪的犹太人”被杀的报告，他们发现安东尼奥·伊莎贝尔神甫在和孩子们玩捉迷藏，认定他的报告乃是老年癫狂的产物，随即将他送进养老院。不久，又派来奥古斯都·安赫尔神甫，一个干劲十足的当代卫道士，为人苛刻又大胆莽撞，每天多次亲自敲钟催人警醒，挨家挨户叫起贪睡的人去望弥撒。但不出一年，他便被空气里弥漫的惰性所感染，被能令一切衰朽、停滞的炙烈尘埃所降服，被午饭中的肉丸在酷热难熬的午休时刻搅得昏昏欲睡，最终彻底妥协。

乌尔苏拉一死，家里重又陷入荒废状态，连果断坚定、雷厉风行的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也没法扭转，多年以后她将出落成一位开明、欢快又新潮的女性，在世上稳稳占据一席之地。那时她打开门窗驱散颓气，修整花园，杀灭大白天就在长廊猖獗活动的红蚂蚁，努力恢复遗忘已久的好客氛围，可一切仍归于徒劳。费尔南达闭门幽居的执著成为一道坚不可摧的堤坝，遏阻住乌尔苏拉积蕴百年的洪流。她不仅拒绝在热风经过时开门，还命人用十字木条钉死窗户，严格遵循娘家教导过着活死人的生活。她与隐身医生频繁的通信以失败告终。经过

无数次拖延后，她在约定的日期和时间把自己关进卧室，头向北躺着，周身上下只裹了条白床单。到凌晨一点，她感到有人用浸过冰凉液体的手帕盖上自己的脸。等她醒来，阳光在窗前闪耀，她身上多了一道可怕的弧形伤口，从腹股沟一直延伸到胸前。但还没等静养期结束，她便收到隐身的医生表达迷惑的来信，信中称经过六个小时的检查，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与她反复详尽描述的症状相符的疾病。实际上，这是她不按本来名称称呼事物的恶习造成的又一次混乱，通过心灵感应实施手术的外科医生们只查出她子宫下垂，建议用子宫托加以矫正。失落的费尔南达还希望得到更清晰的说明，但从未谋面的医生们不再回信。那个陌生的词语成了她心头的重负，她最终决定按下羞赧去询问究竟什么是子宫托，到这时才得知那位法国医生已在三个月前悬梁自尽，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一位旧日同袍不顾全市镇人的反对将他下了葬。于是她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子，何塞·阿尔卡蒂奥也从罗马给她寄来了几个子宫托。她把附带的说明书背熟后立即丢进厕所，以免让人知晓自己隐痛的根源。这一防范未免多余，因为家中仅剩的几个活人对她根本未加在意。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浑浑噩噩地度过孤独的晚年时光，每日给家人准备所需的少许食物，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来照料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继承了几分美人儿蕾梅黛丝的魅力，她把以前折磨乌尔苏拉的时间都用于做家庭作业，并开始在学业上显出聪颖和专注，令奥雷里亚诺第二重新燃起当年寄托在梅梅身上的希望。他答应按照香蕉公司时期形成的惯例，送女儿到布鲁塞尔完成学业，并在这一期望的激励下试图令毁于暴雨的土地重获生机。那时节在家中很少看到他的身影，他出现也只是为了看望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时间已经把他变成费尔南达眼中的陌生人。小奥雷里亚诺渐渐步入青春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变得难以捉摸。奥雷里亚诺第二曾寄希望于费尔南达人到老年会心肠变软，允许孩子踏入市镇上的生活，而那时不会再有人费心猜测他的出身。但奥雷里亚诺似乎甘守被囚的孤独，从未动念要去见识大

门外的世界。乌尔苏拉命人打开梅尔基亚德斯房间的时候，他常去门前走动，往半掩的房门内张望。没人知道从何时起他和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成了朋友。奥雷里亚诺第二直到很久以后听男孩说起车站的屠杀，才发觉这段友情。那天有人在餐桌上感叹香蕉公司的撤离造成了市镇的败落，奥雷里亚诺当下予以反驳，言语间带着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成熟。他的观点与常见的解释不同，他认为马孔多本是一个欣欣向荣、前程远大的地方，却被香蕉公司所扰乱、败坏、压榨，而且他们的工程师还引来暴雨，借此逃避履行对工人的承诺。他说得头头是道，在费尔南达眼中不啻对少年耶稣辩倒文士的渎神戏仿。他还以令人信服的精确细节描述了军队如何向被包围在车站的三千多工人开枪射击，如何将尸体装上两百节车厢的火车抛进大海。像大多数人一样，费尔南达接受的是官方说法，相信在车站没有发生任何事，因此一见孩子承袭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便大为惊骇，立即命令他闭嘴。奥雷里亚诺第二却听出了那是自己孪生兄弟的说法。事实上，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尽管被当作疯子，却是家里最清醒的人。他教小奥雷里亚诺读写，领他入门研究羊皮卷，就香蕉公司对马孔多的影响灌输给他与众不同的看法，而多年以后奥雷里亚诺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时，将会意识到那种说法显得荒谬不经，因为与历史学家在教科书中奉为圭臬的错误观点大相径庭。偏居一隅的小屋，无论热风、灰尘还是酷暑都无法侵及，两人身处其中，眼前都浮现出祖辈遗传的一幕记忆：远在他们出生以前，一位头戴鸦翼状礼帽的老人背对着窗户侃侃而谈。两人同时发觉屋内永远是三月，永远是星期一，于是明白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并不像家人说的那样昏聩，实际上只有他足够清醒能洞察真相：原来时间也会失误和出现意外，并因此迸裂，在某个房间里留下永恒的断片。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把羊皮卷上费解的字母一一归类。这些字母单独看起来好像蛛爬虱走，以梅尔基亚德斯细密的字迹呈现出来则像挂在铁丝上的衣物，但他确信它们属于一个字母总数在四十七到五十三之间的字母

表。奥雷里亚诺想起在英语百科全书上见过类似的图表，便拿到房间里与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的成果对照。结果完全相同。

想要发行谜语彩票的那段时期，奥雷里亚诺第二每天醒来都觉得喉咙里打了个结，就像想哭又强忍住的哽咽感。佩特拉·科特斯认为这是艰辛生活引发的又一麻烦，连续一年多每天用小刷子蘸了蜂蜜为他擦拭上颚，给他喝萝卜糖浆。喉咙里的硬结大到妨碍呼吸的地步了，奥雷里亚诺第二去找庇拉尔·特尔内拉，看她有没有什么缓解病痛的草药。这位年逾百岁、老而弥坚的妇人经营着一家地下妓院，她并不相信那些迷信的偏方，而是乞灵于纸牌的引导。她看到金元骑士的咽喉被宝剑仆侍的利刃所伤，由此推断出费尔南达在试图用大头针扎刺丈夫照片的拙劣手法引他回家，但由于巫术不精使他体内长了肿瘤。奥雷里亚诺第二除了结婚照再无其他照片，而那些都收在家庭相册里，他便趁妻子不备在家中四处寻找，结果在衣柜深处发现了半打未拆封的子宫托。他认为这些红色小橡胶圈必定是巫术用具，就揣了一个在兜里拿给庇拉尔·特尔内拉看。她判断不出它具体是什么，但感觉十分可疑，便让他把半打全部拿来，在院中付之一炬。为了对抗预想中费尔南达的巫术，她指点奥雷里亚诺第二将一只抱窝的母鸡浸湿后活埋在栗树下，他满怀信心地依计而行，用枯叶掩上新土的一瞬间便感觉呼吸顺畅了许多。而费尔南达那边，则把失窃当作隐身医生们的报复，她在内衣里面加缝了一个衣袋，将儿子新寄来的子宫托藏在其中。

埋下母鸡六个月后，奥雷里亚诺第二半夜在咳嗽中醒来，感觉像有一对蟹螯正扼住自己的咽喉。这时他明白无论销毁多少魔法子宫托，浸湿多少驱邪的母鸡，都没法改变一个简单而悲哀的事实：他快要死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满心担忧死前不能送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去布鲁塞尔，于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卖力地干活，把彩票销售从每星期一次增加到三次。每天一早就能看见他在市镇上奔走，连最偏僻最穷苦的街区也不放过，那种迫不及待的势头只能在垂死之人身上

看到。“天赐彩票到了，”他吆喝着，“大好机会别错过，一百年就这一次。”他竭力装出快活、亲切又健谈的样子，但只要看看他的冷汗和苍白脸色就知道他是在勉强支撑。有时他躲到无人看见的荒地上，坐下来忍着体内魔爪带来的撕心裂肺的剧痛喘息片刻。直到半夜他还在花街柳巷游走，向那些伴着唱机抽泣的孤独女郎努力兜售好运。“这个号已经四个月没出啦，”他边说边展示手中的彩票，“别错过机会，人生比你想象的要短。”后来人们对他失去了敬意，开始取笑他，最后几个月都不再像一直以来那样称他堂奥雷里亚诺，而是当面叫他堂“天赐”先生。他喉间杂音日增，说话渐渐走调，最后喑哑嘶叫如狗，但仍努力使人们对佩特拉·科特斯院中的开彩保持兴趣。然而彻底失声时，他意识到自己即将被剧痛压垮，同时也明白靠猪羊彩票无法将女儿送去布鲁塞尔，因此突发奇想，要拿被暴雨毁坏的土地来举行一场豪华抽彩，那些土地只要有资金投入就能重新派上用场。这一想法手笔之大，甚至惊动了市长亲自颁发公告。人们合伙购买面额一百比索的彩票，一个星期之内就抢购一空。开彩当晚，中彩者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庆会，堪与香蕉公司黄金时代的聚会相媲美。奥雷里亚诺第二最后一次拉起手风琴，演奏好汉弗朗西斯科已被人遗忘的歌曲，只是他再也无法伴唱。

两个月后，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去了布鲁塞尔。奥雷里亚诺第二把这次卖豪华彩票所得的钱，加上此前几个月攒下的积蓄，以及出售自动钢琴、古钢琴和其他破烂家什的微薄收入都给了她。根据他的计算，这些钱足够支付她的学业开支，只剩下回家的旅费没有着落。费尔南达考虑到布鲁塞尔毗邻堕落的巴黎，一直反对女儿远行，后来安赫尔神甫写了推荐信给一家修女开办的天主教膳宿公寓，她才放下心来，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也保证会在那里待到学业结束。另外，神甫还安排她和一群去托莱多的方济各会修女同行，到了那里她们会托可靠的人送她去比利时。在通过书信往来加紧联络以上接送事宜的同时，奥雷里亚诺第二在佩特拉·科特斯的帮助下忙着准备阿玛兰妲·

乌尔苏拉的行李。他们在费尔南达的一个陪嫁衣箱里把衣物摆放整齐，这个女学生当晚就已一一记住，哪些是穿越大西洋期间要穿的衣服和灯芯绒便鞋，哪些是下船登岸时要换上的铜扣蓝呢外套和山羊皮鞋子。她还记住了上船后要怎样走才不至于落水，任何时候都不要与修女们分开，除非吃饭不要走出舱室，旅程中遇见陌生人无论男女提问题都不要回答。她带上一小瓶防晕船的滴剂和一个本子，本子里有安赫尔神甫亲手写下的六句抵御风暴的祷词。费尔南达为她缝制了一条藏钱的帆布腰带，教她怎样贴身使用，睡觉时也不必摘下。她还把金溺盆用碱水洗净又拿酒精消毒，想让女儿带上，但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害怕同学取笑没有接受。几个月后，奥雷里亚诺第二在临终时将会想起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样子，那时在二等车厢里的她为了听清费尔南达最后的叮咛，想把满是灰尘的车窗摇下却没能做到。她穿着粉色的丝裙，左肩搭扣上别着一束小小的假三色堇，脚上是平跟系绊山羊皮鞋，配吊带丝光长袜。她个子娇小，长发披肩，双眼灵动一如乌尔苏拉当年，告别时不哭也不笑，流露出同样的坚毅性情。奥雷里亚诺第二追着渐渐加速的火车，同时挽着费尔南达免得她摔倒，女儿用指尖送来飞吻时他几乎来不及挥手回应。夫妻俩在烈日下一动不动，看着火车变作地平线上的黑点，这是自从婚礼那天后两人第一次挽臂并肩。

八月九日，在寄自布鲁塞尔的第一封信到达之前，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与奥雷里亚诺在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里交谈，突然说道：

“你要永远记住那是三千多人，都被扔进了海里。”

说完他一头扑在羊皮卷上，死的时候还睁着眼睛。同一时刻，在费尔南达的床上，他的孪生兄弟也不用再忍受铁蟹噬咬喉咙的漫长又可怕的煎熬。一星期前他回到家里，彻底失声，呼吸困难，只剩一把骨头，还带着他的流动衣箱和浪荡子的手风琴，只为履行死在妻子身边的承诺。佩特拉·科特斯帮他收拾好衣服，告别时没洒下一滴眼泪，但却忘了给他带上那双想穿到棺材里去的漆皮靴。因此听到死讯

时，她穿上黑衣，用报纸包好靴子，登门请求费尔南达让她看一眼遗体。费尔南达没让她进门。

“你站在我的位置想想，”佩特拉·科特斯恳求道，“想想我是多么爱他才甘心受这种羞辱。”

“对一个姘头来说什么羞辱都是应得的，”费尔南达反驳道，“反正你有的是男人，把这靴子留给下一个死的时候穿吧。”

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履行了诺言，用菜刀砍下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的头，以保证他没有被活埋。两具尸体被放进同样的棺材，他们在死亡中重新变得酷似，就像童年时一样。奥雷里亚诺第二旧日的酒肉朋友在棺材上摆放了花圈，花圈的紫色缎带上写着一句悼词：让一让，母牛们，生命短暂啊。费尔南达对这一不敬举动大为光火，让人把花圈丢进了垃圾堆。在最后一刻的慌乱中，悲伤的醉汉们抬棺材出家门时弄混了，把两人各自下葬在对方的坟墓里。

十八

奥雷里亚诺很长时间都没有走出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他将那些散页书中的传奇怪谈，瘫子赫尔曼的研究大要，鬼魔学的笔记，点金术的关钥，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及其疫病研究，都一一烂熟于心，故此当他步入青年时期虽然仍对所处时代一无所知，但已具备一个中世纪人的基本学识。不论何时走进房间，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总看见他在专心阅读。她早上给他端来一杯不加糖的咖啡，中午则是一盘炸香蕉片配米饭，自从奥雷里亚诺第二死后家中餐餐如是。她整日为他操心，给他理发、除虱，把已被遗忘的衣箱里的旧衣服拿出来按他的身材修改，在他开始长胡须时送来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剃刀和盛在加拉巴木果壳杯里的剃须膏。上校所有的儿子，包括奥雷里亚诺·何塞在内，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与上校酷似，特别是那凸起的颧骨，以及唇际那坚毅又略带冷酷的线条。正像当年乌尔苏拉见到奥雷里亚诺第二在房间里研读时的感觉那样，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也以为他在自言自语。实际上他正和梅尔基亚德斯交谈。那对孪生兄弟死后不久，一个炎热的中午，他在窗前光线的明灭中看见一位头戴鸦翼状礼帽的阴郁老者，仿佛远在出生前就扎根于他脑海的一段回忆已化身成人。奥雷里亚诺已经整理出羊皮卷中的字母表，所以当梅尔基亚德斯问他可曾看出那是以何种文字书写的，他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回答。

“梵文。”他答道。

梅尔基亚德斯向他透露自己回到这个房间的机会已经屈指可数，但他能够安心走向最终死亡的大牧场，因为羊皮卷须历时百年才可破译，在那之前奥雷里亚诺还有多年时间学习梵文。他告知奥雷里亚诺在通往河边的小巷里，即香蕉公司时期算命解梦的地方，一位加泰罗

尼亚智者开了家书店，店里有一本《梵文入门》，如果他不赶紧买下，六年后那书将被蛀虫啃食殆尽。奥雷里亚诺托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去书店把第二排书架最右端，放在《解放了的耶路撒冷》和《弥尔顿诗集》之间的那本书买回来。她在漫长的人生中第一次流露出情绪波动，那是一副惊愕的神情。她不识字，便硬记下这一长串指引；她还卖掉一条小金鱼得到了购书钱，只有她和奥雷里亚诺知道那天晚上士兵搜查作坊后所剩十七条小金鱼的藏处。

奥雷里亚诺学习梵文不断进步，梅尔基亚德斯却日渐生疏遥远，身影消融在正午的阳光中。奥雷里亚诺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几乎只剩下模糊的影子，还在喃喃自语："我已经在新加坡的沙洲上死于热病。"从此，房间再无法幸免于灰尘、热浪、白蚁、红蚂蚁的侵蚀，蠹虫注定要将书本和羊皮卷中的智慧化为粉末。

家里并不缺少食物。奥雷里亚诺第二死后次日，曾经写下不敬悼词献上花圈的朋友中有一个向费尔南达提出要偿还欠她丈夫的债务。从那以后，每个星期三都会有跑腿的人送来一筐食物，足够家里吃一个星期。没有人知道，这些食物是佩特拉·科特斯让人送去的，她想要通过持之以恒的善行来羞辱那羞辱过自己的人。然而怨恨远比想象中消失得快，但她仍出于骄傲继续送去食物，到最后变成出于怜悯。很多次她没有精力去兜售彩票，人们对抽彩也失去了兴趣，但她为了让费尔南达有的吃宁可自己挨饿。她坚持履行对自己的承诺，直到看见对方下葬为止。

对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来说，家里人口的减少理应成为她喘息的机会，这是她操劳半个多世纪后应得的。从未听见她有过一声怨言，这个沉默寡言、难以捉摸的女人在家中留下了美人儿蕾梅黛丝这样天使般的后代，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这样带着神秘的庄严气息的子嗣，她把孤独而沉寂的一生都用来抚养孩子，却几乎记不清他们是自己的子辈还是孙辈。她照料奥雷里亚诺如同己出，却不知道自己正是他的曾祖母。只有在这样一个家里才能想象这种情形，她竟然一直

以来都铺席子睡在谷仓地板上，夜间忍受着老鼠的喧闹。一天晚上她突然感到黑暗中有人盯着自己，吓醒过来才发现是一条毒蛇从肚子上滑过。她从未告诉任何人，心里清楚假若让乌尔苏拉知道，一定会让自己睡她的床。那段时间，除非你到长廊里喊叫，家里人对任何事都浑然不觉，面包房里的忙碌，战争的惊扰，照料孩子的操劳，让人无暇再顾及他人的福祉。从未谋面的佩特拉·科特斯是唯一顾念她的人。她一直关心她是否有一双穿着出门的好鞋，会不会缺衣服穿，即使在靠彩票收入创造奇迹的时期依然如此。费尔南达进这个家门时有充分理由认为她只是一名终身女仆，她虽然不止一次听说那是丈夫的母亲，却实在难以置信，转眼就抛在脑后。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对这种低人一等的待遇并未流露出任何不满。相反，她给人的感觉是似乎很爱在角落里忙碌，一刻不停、一声不吭，把她从年轻时起一直居住的这座大宅打理得整洁有序。特别是在香蕉公司时期，家里更像一座热闹的军营，全亏了她才能运转正常。但在乌尔苏拉死后，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身上渐渐不见了往日非凡的勤劳、惊人的能干。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已年迈力竭，还因为整个家在一夜之间进入了暮年。柔嫩的苔藓在墙上蔓延。杂草荆棘占满庭院之后又顶穿长廊的水泥地如同击碎一面玻璃，那裂缝间还涌出小黄花，与一个世纪前乌尔苏拉在梅尔基亚德斯放假牙的杯中发现的花朵一般无二。面对自然界的疯狂，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无暇也无力对抗，她整天往来于各卧室之间，好不容易赶走那些蜥蜴，可一到夜间它们又将泛滥。一天清早，她看到红蚂蚁离开千疮百孔的地基，穿过花园，沿着扶栏爬过已蒙上土色的秋海棠，一直侵入到家中深处。她起初试图用扫帚杀灭，后来换成除虫剂，最后用上石灰，但第二天它们又在原地出现，杀不尽灭不绝。费尔南达忙于给儿女写信，对势不可当的毁灭大潮毫无察觉。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继续孤身作战，奋力抗击不让杂草侵入厨房，扯下墙上短短几小时内就会重生的蛛网，刮去白蚁蚁路。但当她看到连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也覆满灰尘和蛛网，看到纵然自己

一天清理三遍拼了命地打扫，房间仍难逃荒凉破落的命运，呈现出当年只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和那个年轻军官预见到的残败景象，便明白自己已然失败。于是她穿上多处磨损的主日正装、乌尔苏拉的一双旧鞋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送她的长棉袜，把两三套换洗衣服打了个小包。

“我不行了，”她对奥雷里亚诺说，“我这把老骨头管不了这么大一个家了。”

奥雷里亚诺问她要去哪儿，她做了个含糊的手势，似乎对自己的归宿没有任何打算。但她也试图说明白要去投奔里奥阿查的一个表妹，在那里度过晚年，只是这说法不太可信。自从父母双亡，她从未和市镇上的人有过接触，从未收到过邮件或口信，也从未说起过哪个亲戚。奥雷里亚诺给了她十四条小金鱼，因为她上路前只打算带走自己的那点儿财产：一比索二十五生太伏。透过房间的窗户，他看着她拿着衣物小包，弓着衰老的腰背，脚步蹒跚地穿过院子，看着她出门后把手伸进门洞带上门闩。从此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得知她的离去，费尔南达不停不休地骂了一整天，还翻箱倒柜挨个检查，确认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没有卷走什么东西。她平生第一次试着生火却烫到了手指，不得不请奥雷里亚诺教她煮咖啡。时间一长，便由他承担起厨房的活计。每天费尔南达起床时早饭已做好，她只需走出卧室，取走余火上奥雷里亚诺盖好留给她的食物，放到铺着亚麻桌布的桌上，坐到上首，在烛台环绕中面对着十五把空椅子独自用餐。即使到了这步田地，奥雷里亚诺和费尔南达也从未分享孤独，仍然各行其是，各自打扫房间，任凭蛛网落雪般笼在玫瑰枝头，又在梁上垂丝，绕四壁飘絮。那个时期，费尔南达感觉家中到处都是鬼怪精灵。各样物品，特别是日常用具，仿佛都有了自由移动的能力。费尔南达找了很长时间明明放在床上的剪刀，在家中四处翻遍后，结果在厨房里的隔板上找到，而她却认定自己已经有四天不曾迈进厨房一步。叉子从装餐具的抽屉里不翼而飞，她却在祭坛上找到六

把，洗衣盆里也有三把。她坐下来写信，这种现象更令她绝望。一向放在右手边的墨水瓶跑到左手边；吸墨垫突然消失，两天后又在枕下现身；写给何塞·阿尔卡蒂奥的信与给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的弄混，她总是为装错信封而烦恼，这种事也确实发生了不止一次。有一回她丢了钢笔，十五天后邮差送了回来，他是在自己的邮袋里发现的，挨家挨户问了一圈才找到失主。开始的时候，她以为这和子宫托的消失一样是隐身的医生们所为，准备写信央求他们放过自己，但写信中途为别的事走开了一会儿，结果回来的时候不仅找不到已经开了头的信，甚至想不起写信的初衷。有一段时间她怀疑奥雷里亚诺，就开始监视他，故意把东西放在他经过的地方，想等他挪动时一举抓获，但很快她便证实奥雷里亚诺除了去厨房和厕所之外从不离开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而且他也不是爱开玩笑的人。最终她相信是精灵们在淘气，于是决定把每样东西都固定在要用的地方。她拿一根龙舌兰线绳把剪刀拴在床头。她把钢笔和吸墨垫绑在桌腿上，又用胶水将墨水瓶粘在桌面右手边的位置。事情并未立竿见影地解决，她才做了几个小时的针线活儿，拴剪刀的线绳便已不够长，仿佛精灵们正暗中将它裁短。钢笔上的线绳也是一样，她没写多久手就已经够不着墨水瓶。但无论是远在布鲁塞尔的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还是罗马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对这些琐碎的不幸都毫不知情。费尔南达总告诉他们自己很幸福，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她感觉卸去了一切重担，仿佛生活又把她带回到她父母的天地里，那里没有日常生活的困扰，一切都已在幻想中解决。无休无止的通信使她丧失了时间概念，特别是在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走后。她本来已习惯根据儿女们预定的归期来数算日日月月、岁岁年年，但他们一再推迟归期，使她混淆了日子，颠倒了年月，何况每一天都如此相似，简直感觉不到时光的流逝。但她并未失去耐心，反而对拖延深感欣慰。何塞·阿尔卡蒂奥多年前就宣称即将誓发永愿，但仍在推说结束高等神学的课业后还需转攻外交。费尔南达未觉不安，她理解通往圣彼得宝座之路任重道远，绝非一帆风顺。

与此相反，一些在旁人看来无关紧要的消息却能令她兴奋不已，譬如儿子亲眼见到教皇。当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告诉她，自己由于成绩优异，赢得了当初父亲未曾预料的奖励而得以继续学业，她也同样为之欣喜。

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买来语法书三年多后，奥雷里亚诺译出了第一张羊皮卷。这工作并非没有意义，但也不过是无法预计的漫漫长路上的第一步，因为译出来的卡斯蒂利亚语看不出什么含义，仍是有待破解的神秘诗行。奥雷里亚诺手头缺乏可供深入研究的资料，但好在梅尔基亚德斯说过加泰罗尼亚智者的店里有能助他破译羊皮卷内容的书籍，于是他决定去找费尔南达，请她允许自己出去找书。在那个被日益加增的垃圾所吞噬的房间里，他考虑着如何以最合宜的方式提出请求，预想各种情形，等候恰当时机，但事到临头看见正从余火上取下食物的费尔南达，他却错过了与她搭讪的唯一机会，事先周密酝酿的请求噎在喉中，一时发不出声音。那是他唯一一次窥看她。她在卧室中的脚步声牵动着他的注意力。他凝神聆听她走到门口收取儿女的来信，同时把写好的信交给邮差，到深夜还在倾听她用笔尖划过纸张时那急迫有力的沙沙声，然后是关灯的声音，黑暗中的喃喃祈祷。这时候他才睡下，相信第二天期待的机会便会到来。他满心以为不会遭到拒绝，因此一天早上剪短垂到肩膀的长发，刮净杂乱的胡须，穿上不知是谁传下的紧身裤和假领衬衣，在厨房等待费尔南达来吃早饭。出现在眼前的不是每日里那个头颈高昂、步伐刻板的女人，而是一位美貌超凡的老妪，她身披已经泛黄的白鼬皮斗篷，头戴金色纸板制成的王冠，举手投足带着几分倦怠，好像刚在暗中哭过。事实上，自从在奥雷里亚诺第二的衣箱里发现了这套蛀痕斑斑的女王行头，费尔南达已经穿戴多次。若是有人看到她站在镜子前，满心陶醉地摆出女王模样，必定会认为她已陷入癫狂。然而并非如此。她不过是把女王盛装当成追忆时光的机器。她第一次穿上时不禁心结暗生，双眼含泪，她又闻到了当年来家里接她去做女王的军官的鞋油气味，

追忆起破灭的梦想时心头一阵激荡。她觉得自己如此老迈、衰弱，离生命中的美好时光已如此遥远，竟开始怀念那些最不如意的时刻，而直到此时她才发现自己多么需要长廊里飘来的牛至香气、黄昏时的玫瑰芬芳，甚至渴望外乡人带来的野蛮生机。她本已心如死灰，在日常忧患的痛切打击下若无其事，却在怀旧伊始被击溃了防线。随着岁月的摧残，她对自怜自伤的需求渐渐沦为一种恶习。她在孤独中变得更有人情味。然而那天早上走进厨房，见一个瘦骨嶙峋、面色苍白的年轻人递上一杯咖啡，眼中闪耀着狂热的光芒，她立时因尴尬而痛苦万分。她不仅拒绝了请求，从那以后还把家里的钥匙藏在存放待用子宫托的衣袋里。这一防范并无必要，因为奥雷里亚诺若是愿意，早就能够偷偷自由出入。然而漫长的囚禁、对外界的陌生，以及顺从的习惯，早已使他心中反抗的种子干枯。于是他又回到自己的囚室，把羊皮卷读了又读，聆听费尔南达在卧室里抽泣直到深夜。一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生火，发现前一天留给她的饭菜仍在已熄灭的炉火上。于是他朝她的卧室里张望，只见她躺在床上，白鼬皮斗篷遮身，皮肤显出象牙般的质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美丽。四个月后，何塞·阿尔卡蒂奥赶回家时，眼前的她仍保持着这个样子。

很难想象有谁比他更像他母亲。他穿着阴沉的塔夫绸外套、硬圆领衬衣，没打领带只系着打花结的细缎带。面容苍白，神情怠惰，眼神中透出惊愕，嘴唇流露出软弱。头发乌黑锃亮又平直，在正中间分出笔直稀疏的缝来，与圣徒像头上的假发一样。胡须齐齐拔去，在石蜡般的脸庞上留下阴影仿佛流露出良心的重负。苍白的双手青筋毕现，手指仿佛蠕动的绦虫，一枚镶着圆形蛋白石的纯金戒指戴在左手食指上。奥雷里亚诺为他开门时，无须听他自报身份就能看出他是远道而来。随着他一路走过，花露水的气味在家里弥漫开来，当年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乌尔苏拉曾洒在他头上好在黑暗中找到他。在某种无法说清的意义上，离家多年后何塞·阿尔卡蒂奥仍然是个孩子，悒郁孤独入骨。他径直走进母亲的卧室，奥雷里亚诺已经用祖父的祖父那

个炼金炉在屋内连烧了四个月水银，靠梅尔基亚德斯传下的这一方法保存尸体。何塞·阿尔卡蒂奥什么话都没问，他在死者额头吻了一下，从她的裙下衣袋里取出三个还未开封的子宫托以及衣柜的钥匙。他做这些时干脆决绝，一反平日的怠惰。他从衣柜里取出一个带有家族纹章的金银嵌花小匣，在里面找到一封散发出檀香气味的长信，信中费尔南达倾诉了对他隐瞒的一切真相。他站着读信，贪婪而不失耐心，读到第三页时停下来，将奥雷里亚诺重新审视一番。

“看来，”他的声音里有种剃刀般的锐利，“你就是那个野种了。”

“我叫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

“回你屋去。”何塞·阿尔卡蒂奥说。

奥雷里亚诺走了，甚至在听见那冷清葬礼上的声响时也没有好奇地出来。有几回，他从厨房看见何塞·阿尔卡蒂奥在家中游荡，急切地喘息，并且午夜过后还能听到他在破败的卧室间踱步。好几个月过去，他从未听到何塞·阿尔卡蒂奥的说话声，这不仅仅因为何塞·阿尔卡蒂奥不和他交谈，还因为他自己毫无交流的愿望，也没有时间花在羊皮卷以外的事上。费尔南达一死，他便从仅存的两条小金鱼中取出一条，赶到加泰罗尼亚智者的店里寻找所需的书籍。一路上不曾有任何事物引发他的兴趣，或许是因为他缺乏相关记忆可以比对，而且那些荒凉的街道、残破的房屋都与他过去的想象一模一样，那时的他为看到这些情愿付出一切。当初被费尔南达拒绝，这次他自己批准自己出门，不过仅此一次，也只有一个目的，并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于是他没有停留片刻，穿过十一个街区来到当年算命解梦的小巷，气喘吁吁地走进杂乱阴暗的店铺。那里面连转身都很难，与其说是书店，倒更像是旧书回收店，旧书胡乱堆在白蚁蛀坏的书架上，堆在蛛网横结的角落里，甚至堆在本应留出的过道上。一张同样堆满厚书的长桌上，店主正在写一篇奇长无比的文字，紫色的笔迹带着几分谵妄，布满了学生练习本松散的纸页。他那一头漂亮的银发遮住了额头活像白鹦鹉的羽冠，蓝色的眼睛细长灵动，流露出遍览群书后的温

润气质。他穿着短裤，满身大汗，只顾写作甚至看都没看来人一眼。奥雷里亚诺毫不费力地从惊人的混乱中拯救出所需的五本书，因为它们都放在梅尔基亚德斯告知的地方。他一言不发，把书和小金鱼递给那位加泰罗尼亚智者，他接过去检视，眼皮又如贝壳般合拢。“你一定是疯了。”他用自己的语言说道，耸了耸肩，然后把五本书和小金鱼一起还给了奥雷里亚诺。

“你拿走吧，”他用卡斯蒂利亚语说，“最后一次读这些书的人应该是瞎子伊萨克[1]，所以你想想自己在干的事吧。”

何塞·阿尔卡蒂奥将梅梅的卧室修整一新，找人清洗缝补天鹅绒窗帘和总督式大床上的织锦华盖，重新启用荒废已久的浴室，那水泥池中已结上一层黑黝黝的硬壳。他将这两处地方变成充塞着次等品、异域旧货、伪劣香水和廉价宝石的王国。家中其他地方只有祭坛上的圣徒像让他觉得碍眼，于是一天下午他在院里生起火来把它们烧成灰烬。他每天睡到十一点之后才起床，然后穿着磨损的金龙图案长袍、缀有黄色穗子的拖鞋走进浴室，随后所践行的仪式其节奏之从容、用时之长久不禁令人想起美人儿蕾梅黛丝。入浴前，他先用三只仿雪花石膏小瓶里的浴盐为池水增香。他不拿加拉巴木果壳瓢舀水洗浴，而是全身泡在芳香的水中，仰面漂上两个钟头，在池水的清凉和对阿玛兰妲的回忆中获得慰藉。到家没几天，他就脱下了塔夫绸外套，因为天气太热，而且他也只有这么一件。他换上与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当年在舞蹈课上所穿非常相似的紧身裤，胸前绣有姓名首字母的真丝衬衣。他每星期两次脱下全套衣服在水池里洗净，披上睡袍等候晾干，因为再没有别的可穿。他从不在家吃饭。他在午后热气渐消时出门，直到深夜才回来。之后继续焦灼地踱步，像猫一般喘息，想念着阿玛兰妲。她和夜晚灯下圣徒像的骇人眼神，是他对这个家存留的两样记忆。许多次，在罗马令人昏昏欲睡的八月，他在梦中醒来看见阿玛兰妲从杂色大理石浴池中浮现，身穿花边裙，手缠黑纱，在他那久居异乡后产生的幻梦中显得分外美丽。与奥雷里亚诺·何塞试图将这形象

扼杀在战争的血腥泥潭里不同，他努力在淫乱的沼泽中维持它的鲜活，同时用杳无尽头的教皇之路来骗取母亲的欢心。无论他还是费尔南达都未曾想到，两人之间的通信是一场幻梦的交换。何塞·阿尔卡蒂奥刚到罗马便抛弃了神学学业，但仍不断编造研习神学和教会法的神话，以免失去母亲在狂热的字里行间不断提及的惊天遗产，那笔财富必能将他从特拉斯特维雷区与两个朋友合住的小屋，从穷困潦倒的生活中拯救出来。费尔南达在最末一封信中已透露对死期将近的预感，他接信后立即收拾起虚假荣光的最后遗存塞进行李箱，登上轮船，在底舱和移民们像屠宰场的牲口似的挤在一起，吃着冰冷的通心粉和生虫的奶酪越洋归来。费尔南达的遗嘱不过是一份迟到的不幸的清单，未读之前他就已经从散架的家具、长廊里的荒草看出自己陷入了永难摆脱的圈套，再也见不到罗马春天那钻石般璀璨的阳光，闻不到那亘古不变的气息。在哮喘发作的难眠夜晚，他反复思量自己的不幸，在幽暗的家中游荡，当初年迈昏聩的乌尔苏拉便是在这里用唬人的胡话向他灌输对世界的恐惧。为了在黑暗中找得到他，她给他指定卧室里的一个角落，说傍晚过后亡灵就在家中徘徊，而那里是唯一不受惊扰的地方。“你做了什么坏事，”乌尔苏拉对他说，“圣徒们都会告诉我。”他童年时的恐怖之夜都集中在那个角落，他在爱告密的圣徒冰冷目光的监视下，坐在凳子上冷汗直流，一动不动待到上床睡觉为止。这种处罚本无必要，因为那时他就害怕周边的一切，日后也会为生活中所遇的一切而惊恐：街上的女人会使人流血，家里的女人会生下长猪尾巴的孩子，斗鸡会让男人丧命、终生内疚，枪弹一沾手便会引发二十年的战争，冒失的事业只会将人导向失落和疯狂—总之，一切，上帝以无边美意所创造，又被魔鬼所败坏的一切，都是他恐惧的对象。当他从噩梦的轮番折磨中醒来，窗前的光亮，水池中阿玛兰妲的爱抚，她用丝绸香包在他两腿间搽粉时的舒服感觉，都令他从恐惧中解脱出来。连乌尔苏拉在花园的灿烂阳光中也显得不同了，因为她不再说起那些可怕的事物，只是用炭灰擦拭他的牙齿，让他显露出一

位教皇应有的灿烂笑容；为他修剪指甲，让从世界各地赶到罗马的朝圣者在接受祝福时惊叹于教皇的美手；又为他梳起教皇的发型，将花露水洒遍他的身体和衣裳，让他散发出教皇的馨香之气。他在冈多菲堡的院中看见教皇站在阳台上，面对无数朝圣者用七种语言发表同一内容的演讲，那时唯一引起他注意的便是教皇那仿佛用碱水洗过的双手的白皙，那夏装的煌煌光彩，以及那古龙水的氤氲。

回家将近一年，何塞·阿尔卡蒂奥为糊口已经卖掉银烛台和刻有纹章的溺盆——这时才发现只有纹章部分是金的——他唯一的消遣就是招聚市镇上的孩子来家里玩。午睡时间他和他们待在一起，让他们在花园中跳绳，在长廊里唱歌，在客厅的家具间玩杂耍，他自己则在孩子当中巡视，教导他们良好的仪态。那时他已经没有紧身裤和真丝衬衣可穿，换上了在阿拉伯人店里买来的寻常衣衫，但仍保持着慵懒的尊贵和教皇的风范。孩子们像当初梅梅的同学一样占领了屋子。直到入夜还能听见他们的唧唧喳喳和歌声舞步，家里变成一个缺乏管束的寄宿学校。奥雷里亚诺对这种侵犯并不在意，只要他们不来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打扰。一天上午，两个孩子推开房门，只见一个蓬头垢面、周身腌的男人正伏案研读羊皮卷，立刻被这景象吓住了。他们不敢进去，却仍围着房间打转。他们一边窃窃私语一边从罅隙间向内张望，又从气窗扔进活蹦乱跳的动物，有一次还从外边把门窗钉死，奥雷里亚诺费了半天时间才强行打开。看到淘气行为并未招来惩罚，他们越发兴致高涨，一天有四个孩子趁奥雷里亚诺在厨房的时候闯进房间，准备把羊皮卷毁掉。但泛黄的羊皮卷刚到手，一股神力就将他们平地托起，悬在半空，直到奥雷里亚诺回来夺下羊皮卷。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来捣乱。

其中四个最大的孩子，快进入青春期却仍穿着短裤，他们负责何塞·阿尔卡蒂奥的仪容修饰。他们比旁人来得更早，整个上午为他剃须，用热毛巾按摩，修剪手脚指甲，洒花露水。他们不时也跳进水池，为他从头到脚打上肥皂，他自己则仰面漂在水上，想着阿玛兰

妲。随后他们为他擦干身体，搽粉，穿衣。其中有个孩子长着金黄色鬈发，一双玻璃球似的红眼睛活像兔子，他时常在家里过夜。这孩子与何塞·阿尔卡蒂奥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在他患哮喘失眠时也陪伴一旁，默默跟随他在漆黑一片的家中游荡。一天晚上，他们在乌尔苏拉的卧室中看到一片金光自水泥地下映出，仿佛地下有一轮太阳把卧室地板变成了彩色玻璃窗。屋里亮得不用开灯，他们只是掀开断裂的石板，就在昔日放置乌尔苏拉卧床的角落、光芒最盛的地方，发现了奥雷里亚诺第二曾经疯狂挖掘却未能寻获的秘密地窖。里面藏着那三个用铜丝绳束口的帆布袋，袋中是七千二百一十四枚面值为四多卜拉的多卜隆金币，[2]在黑暗中仿佛炭火般艳艳放光。

财宝的发现仿佛燎原之火迅速显出影响。何塞·阿尔卡蒂奥并未像贫贱时朝思暮想的那般，凭借飞来的横财回罗马去，而是把家里变成了一座浪荡乐园。他把窗帘和床上的华盖换成崭新的天鹅绒，浴室石板铺地，墙面贴上瓷砖。饭厅的食橱里塞满了蜜饯、火腿和醋腌菜；废弃的谷仓再次打开，堆满何塞·阿尔卡蒂奥亲自去车站取来的葡萄酒和烧酒，一箱箱都写着他的名字。一天晚上，他和四个大孩子狂欢到天明。早上六点，他们赤身露体冲出卧室，放干水池然后用香槟灌满。他们扎进池里，仿佛飞鸟在充盈着芬芳泡沫的金色天空中翱翔，而何塞·阿尔卡蒂奥没有欢闹，只是仰面漂着，大睁双眼想着阿玛兰妲。他这样待了许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咀嚼着不伦之情的苦涩，直到孩子们玩腻了，一个个回到卧室，扯下天鹅绒窗帘擦干身体，混乱中打碎了水晶镜面，吵闹着躺下时弄塌了华盖。何塞·阿尔卡蒂奥从浴室回来，看见他们赤身裸体挤成一团睡着，俨然躺在溺水者的睡房里。比起家具的损坏，更令他怒火中烧的是在狂欢后的空虚中对自己的厌恶和怜悯。他从收着苦行衣及其他忏悔赎罪用的铁器的箱子底层抽出教堂赶狗人的鞭子，像个疯子似的叫吼着，以无情的鞭打将孩子们从家中赶了出去，下手比面对一群野狼还要狠毒。随后他就瘫倒了，哮喘持续发作了好几天，显出濒死的模样。到备受折磨的

第三天晚上，他已几近窒息，只得找奥雷里亚诺帮忙到附近的药房买些止喘的嗅粉来。奥雷里亚诺因此第二次出门上街。他只走了两个街区便来到了那间逼仄的药房，落满灰尘的橱窗里摆着带拉丁语标签的瓷瓶，一个宛似尼罗河水蛇般沉静美艳的姑娘按照何塞·阿尔卡蒂奥写在纸条上的药名给他拿了药。第二次看到的荒芜城镇在泛黄的街灯下犹显昏暗，仍像第一次那样并未唤起奥雷里亚诺的好奇。何塞·阿尔卡蒂奥刚开始怀疑他会逃走，他就拖着在长久的幽闭生活中缺乏运动、虚弱笨拙的双腿，重新出现在眼前，因匆忙赶路而嘘嘘带喘。见他对外界的确漠不关心，何塞·阿尔卡蒂奥几天后违背了对母亲的承诺，允许他自由出入。

“我没有什么事要上街。”奥雷里亚诺这般答道。

他仍关在房间里，全神贯注读着羊皮卷，只是羊皮卷的研究虽渐渐深入，却仍未成功解读。何塞·阿尔卡蒂奥到房间给他送来火腿片，能在舌间留下春天滋味的百花蜜饯，有两回还送来一杯上好的葡萄酒。他对羊皮卷不感兴趣，认为那不过是晦涩的游戏，但这位孤寂的亲戚罕见的智慧和难以理解的博学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他发现，奥雷里亚诺能够阅读英语，在攻读羊皮卷的间歇从头到尾读完了六卷本百科全书，就好像读一本小说。他见奥雷里亚诺谈起罗马头头是道，仿佛在那里居住多年，开始时还归于以上缘故，但很快就意识到他拥有许多百科全书未载的知识，比如物品的价钱。“凡事皆可知。”他问起如何获得这些信息，却只从奥雷里亚诺那里得到这句回答。奥雷里亚诺这边，也惊讶于从近处看到的何塞·阿尔卡蒂奥与此前远远望见他在家中游荡的形象完全不同。他会笑，会偶尔怀念家中的过往，会为梅尔基亚德斯房间的衰颓担忧。同一血脉的两个孤独者之间的接近与友谊无涉，却有助于他们承受将两人分离又联合的神秘孤独。何塞·阿尔卡蒂奥可以拿烦扰自己的日常难题向奥雷里亚诺求助，而奥雷里亚诺也可以坐在长廊里读书，收取阿玛兰妲·乌尔苏拉

一贯准时寄来的信件，使用何塞·阿尔卡蒂奥归来后曾禁止他入内的浴室。

一个闷热的清晨，两人被大门口急迫的敲门声惊醒。那是一个肤色黝黑的老人，一双碧色的大眼睛在脸上平添了几分磷火般的鬼气，额头上赫然一个灰烬十字。他衣衫褴褛，鞋子破烂，唯一的行李就是肩头的旧背包，完全像个乞丐，但举止中自有一种与外表迥然不同的尊严。只需向他扫上一眼，即使是在客厅的阴暗中也不难发现，驱使他活下来的隐秘力量并非求生的本能而是恐惧的习惯。他是奥雷里亚诺·阿玛多，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十七个儿子中唯一的幸存者，在危机四伏的漫长逃亡生涯中寻找着片刻安宁。他说明了身份，恳求栖身家中，他在遭世界遗弃的黑夜中一直把这里当作此生最后的避难所。但何塞·阿尔卡蒂奥和奥雷里亚诺对他毫无印象。他们以为是个流浪汉，连推带搡把他赶到街上。这时候，两人从门口看到了远在何塞·阿尔卡蒂奥懂事之前就已开场的一场大戏的落幕。两个多年来追踪奥雷里亚诺·阿玛多的警察，已经像狗一般循着他的踪迹跑遍半个世界，此时突然出现在人行道上的巴旦杏树之间，射出两发毛瑟枪子弹干净利落地将他前额的灰烬十字洞穿。

自从把孩子们赶出家门，何塞·阿尔卡蒂奥一直在等候圣诞节前开往那不勒斯的远洋船的消息。他和奥雷里亚诺说过此事，还制定了计划，准备给他张罗起一桩足以糊口的生意，因为费尔南达死后就再没有食物筐送上门。然而这最后的梦想未能实现。九月的一天上午，何塞·阿尔卡蒂奥在厨房里与奥雷里亚诺喝过咖啡，快要沐浴完毕时，被他逐出门去的四个孩子突然从屋瓦的豁口中钻进来。没等他反抗，他们就穿着衣服跳进水池，抓着头发将他按进水中，直到垂死挣扎时的气泡不再涌出水面，海豚般苍白的身体静静滑向芬芳池水的深处。随后孩子们从只有被害者和他们知晓的地方将三袋金币掳走。这场行动迅捷、有序而残忍，不亚于一次军事奇袭。奥雷里亚诺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一无所知。当天下午，他在厨房里想起何塞·阿尔卡蒂

奥，在家中找了一圈后才发现他漂在平滑如镜的芬芳池水中，身躯硕大肿胀，仍在想着阿玛兰妲。到这时奥雷里亚诺才明白自己多么爱他。

---

①瞎子伊萨克（Isaac el Ciego，1160 — 1235），犹太拉比，犹太神秘宗大哲。

②西班牙古金币多卜隆有不同面值，此处为相当于四枚多卜拉金币（dobla）的一种。

十九

伴着十二月最初的跫跫足音，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牵着绕在丈夫颈间的丝带，一路顺风回到家乡。她事先没作通知突然现身，身穿象牙色外装，手戴翡翠和黄玉戒指，珍珠项链几近垂膝，平直的头发梳作浑圆的发型，用燕尾形别针拢在耳旁。她六个月前下嫁的男子是个气质成熟、身材匀称的佛兰德人，一副海员的模样。她一推开客厅房门便意识到，自己离家的时间远比想象中长久，造成的后果也比预料中更严重。

“上帝啊，”她喊道，兴奋大于惊讶，“一看就知道这家里没有女人！”

长廊里放不下她的行李。除了上学时带去的费尔南达的古老衣箱，她还运回两个立式衣柜，四件大行李箱，一整袋阳伞，八盒礼帽，一只关有五十只金丝雀的巨大鸟笼，还有丈夫的自行车，拆卸开来装在一个特制的盒子里，可以像大提琴一样拎着。尽管刚结束长途跋涉，她却一天也没休息。她从丈夫骑摩托的行头里拣出一件旧粗布工装穿上，开始着手重整家宅。她把占据长廊的红蚂蚁赶走，使玫瑰复活，将杂草拔除，在扶栏上挂的花盆里重新栽下欧洲蕨、牛至和秋海棠。她率领一队木匠、锁匠和泥瓦匠补上地面裂缝，修好门窗合页，又将家具翻新，把里外墙壁刷得雪白。在她回来三个月后，屋里又充满了自动钢琴时代那种青春欢快的气息。家里从未有谁像她这般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保持乐观，永远歌声不断舞步不歇，随时准备将陈腐的事物和习俗丢进垃圾堆。她扫帚一挥便抹去了守丧的惨淡记忆，将堆积在犄角旮旯里的一堆堆无用破烂和迷信物品扫地出门，仅仅出于对乌尔苏拉的感激才留下客厅里蕾梅黛丝的银版照片。“真厉害，”她笑得喘不过气来，“一位十四岁的老祖母！”一个泥瓦匠告诉她

家中到处都有鬼魂出没，只有去发掘他们埋藏的财宝才能将其吓走，她却大笑着回答说自己根本不相信男人们的迷信。她如此天真率直、无拘无束，一派现代自由女性的风范，奥雷里亚诺在见到她进门的一瞬间竟手足无措。“好家伙！”她快乐地叫着，同时大张双臂，“瞧瞧我亲爱的小野人都长多大了！”没等他反应过来，她已经在随身携带的手提唱机里放上唱片，要传授他时髦的舞步。她又逼他换掉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传下来的邋遢裤子，送给他年轻款式的衬衣和双色皮鞋，并且一见他在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里待得太久就把他推上街去。

她像乌尔苏拉一样身材娇小却活力十足、不受拘束，拥有与美人儿蕾梅黛丝相近的美貌和诱惑力，生来就具备预见时尚的罕见天赋。邮寄来的最新时装图样的唯一功用就是验证她的先见之明，都与她用阿玛兰妲留下的手摇式缝纫机缝制出的样式一般无二。她订阅许多欧洲出版的时装、艺术和流行音乐方面的杂志，但只需扫上一眼就能发觉世界风潮的发展和她想象的一丝不差。实实难以理解，这样引领风尚的女人竟会回到一个死气沉沉、饱受酷热扬尘之苦的市镇，更不用提她丈夫的钱财足够他们在世界任何地方生活都绰绰有余，并且他又爱她到了甘愿被一根丝带牵着走的地步。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她留下定居的意愿越发明显，她制定的计划无不立足长远，作出的决定都是为了在马孔多安度晚年。从那一笼金丝雀便可看出，她的这些想法并非心血来潮。她记得母亲曾在信中提到飞鸟的暴亡，因此特地将行程推迟几个月，搭上一艘中途在幸福群岛停靠的航船，在岛上精心选购了二十五对最好的金丝雀，准备用来重新装点马孔多的天空。这后来成了她众多失败举措中最令人遗憾的一项。随着鸟儿不断繁殖，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一对对放生，但它们乍出樊笼便立刻从市镇上飞走。她试图利用乌尔苏拉第一次扩建家宅时制作的巨大鸟舍吸引它们入住，却没能奏效。她用针茅草在巴旦杏树上搭鸟窝，又在屋顶撒草籽，还逗引笼中的鸟儿放声啼叫来挽留那些已出笼的同伴，却都归于

徒劳，因为那些鸟儿全都毫不迟疑地振翅高飞，在空中打个转，只一辨出方位就立刻奔向飞往幸福群岛的归途。

归来一年后，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没能与任何人结下友谊也没能举办一场聚会，但她依然确信能将这个受厄运青睐的城镇拯救出来。她的丈夫加斯通一向不拂逆她的意愿，但他在那个可怕的中午一走下火车就已经明白，妻子作此决定完全出于对某种虚无蜃景的怀恋。他确信现实很快会打破她的幻想，于是连自行车都没费心组装，只忙于在泥瓦匠扯下的蛛网间寻找最光亮的蛛卵，用指甲剖开，一连几个小时拿放大镜观察爬出来的小蜘蛛。过了些日子，他见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一意孤行继续在家中实行变革，终于下决心装配起那辆前轮比后轮大出许多、分外引人注目的自行车，专心在附近捕捉本地各种昆虫，并制成标本装在果酱瓶里寄给他以前在列日大学的自然史老师。尽管他的主业是飞行驾驶，但也曾在那里深入学习过昆虫学。他骑车时身着杂技演员长裤，脚穿风笛手长袜，头戴侦探遮阳帽，步行时则是一身无可挑剔的天然亚麻外装，脚下白鞋子，颈间真丝蝴蝶领结，头上窄边草帽，手中柳木手杖。他那浅色的眸子尤显海员的神采，唇边留着松鼠毛似的小髭须。他比妻子至少大了十五岁，但论兴趣爱好更像年轻人，并时刻留意哄她开心，拥有好情人的各种优点，这些都弥补了年龄差异。实际上，任谁看到这个四十多岁、举止谨慎的男人，还有他颈上的丝带、所骑的马戏团自行车，都不会想到他和年轻的妻子之间富有默契的疯狂激情，兴之所至还会在最不相宜的地方释放彼此的冲动。他们从最初相识以来一直如此，而随着时间流逝、场所越发奇异，激情也越发深沉澎湃。加斯通不仅是一位火热的情人，拥有无尽的智慧和想象力，而且很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仅仅为了和女友在一片紫罗兰原野上做爱而紧急着陆，险些双双丧命的人。

他们在结婚三年前相识，当时他驾驶着双翼运动机在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读书的学校上空翻滚腾跃，正要大胆操作避开旗杆，由帆布和铝箔构成的粗陋机身尾部却挂在了电线上。从那时起，他不顾腿上

还绑着夹板，每到周末都去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一直居住的修女膳宿公寓接她—显然那里的规定没有费尔南达期待的那般严厉—随后带她去自己的竞赛俱乐部。他们星期天在野地上五百米的高空相爱，看着地上的人影愈变愈小，愈觉彼此心意相通。她时常和他说起马孔多，仿佛那是世界上最幸福最恬静的市镇；说起一座满溢牛至芬芳的大宅，她愿与一位忠贞的丈夫在那里相伴终老，生下两个野性十足的儿子分别叫作罗德里戈和贡萨洛，绝不叫奥雷里亚诺和何塞·阿尔卡蒂奥，还要养育一个女儿名叫维吉尼娅，绝不叫蕾梅黛丝。她思乡情切，念念不忘被回忆美化的市镇，加斯通便明白若想娶她必须带她去马孔多生活。他表示同意，后来也同样接受了颈上的丝带，因为他相信那不过是一时的任性，终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但在马孔多待了两年，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仍像第一天那样快活，他不禁警惕起来。这时他已经把本地所有能制成标本的昆虫都制成了标本，卡斯蒂利亚语也说得像本地人一样流利，还做完了杂志中所有的填字游戏。他无法拿气候当作归返的借口，因为他天生一副殖民者的体格，能毫无困难地忍受闷热天气里的午睡和含蛆虫的水质。他酷爱美洲食物，有一次连吃下八十二个鬣蜥蛋。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反而只吃火车用冰柜运来的鱼虾海鲜、罐头肉和蜜饯，穿衣打扮依然按照欧洲时尚并继续订阅时装图样，尽管她在这里无处可去也无人可拜访，并且这时她丈夫也没有心思欣赏她的清凉短装、斜戴的毡帽和环绕七转的项链。她的秘密似乎在于永远保持忙碌，处理自己一手造成的家务问题，时常出错以备次日纠正，费尔南达若是有知，一定会把这种有害的勤勉归咎于且做且毁的祖传恶习。她天性未改依然喜好玩乐，每当收到新寄来的唱片，都会叫上加斯通去客厅演练同学为她画在纸上的舞步，一练练到很晚，通常会以维也纳摇椅中或光地板上的做爱告终。对她来说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尚未有儿女诞生，但她依然尊重当初和丈夫的约定，婚后五年内不生孩子。

为了打发空闲时间，加斯通常常去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一上午都和难以捉摸的奥雷里亚诺待在一起。他很喜欢和他一起追忆自己故乡最不为人知的角落，奥雷里亚诺都了如指掌，仿佛曾经在那里居住多年。加斯通问他是如何获知百科全书上没有的信息，得到的回答与当初何塞·阿尔卡蒂奥听到的一模一样：“凡事皆可知。”除梵文外，奥雷里亚诺还学会了英语和法语，以及一点儿拉丁语和希腊语。那时候他每天下午都出门，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又每星期给他零用钱，很快他的房间成了加泰罗尼亚智者书店的分部。他贪婪地阅读到深夜，但从他所提及的阅读方式来看，加斯通认为他买书并非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验证自己已有的知识。没有任何书籍能比羊皮卷更有吸引力，他总是把上午最宝贵的时光用来研读那些手稿。加斯通和妻子都希望奥雷里亚诺能融入家庭生活，但他已献身于奥义研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笼罩在他周围的神秘迷雾也越发浓重。这种障碍无法打破，加斯通想与他深交的努力宣告失败，只得寻求其他消遣方式来打发时间。就在那时候，他产生了建立航空邮政服务的设想。

那算不上什么新计划。实际上，他早在结识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之时就已考虑得相当成熟，只不过当初设想的不是马孔多而是比属刚果，他的家族在那里投资了棕榈油产业。婚后为了取悦妻子，他决定到马孔多过上几个月，因此推迟了计划的实施。但当他发觉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已经在努力组织公共事业委员会，对他回国的暗示加以嘲弄，便明白事情需要从长计议。考虑到成为先行者是在加勒比海还是在非洲并不重要，他又开始与自己已遗忘的布鲁塞尔合伙人联系。推行计划的同时，他在旧日的着魔之地，如今布满破碎燧石的平原上清理出一个停机坪，并着手研究风向、沿海地理状况，设计最合宜的航线，却没想到自己的忙碌与当年的赫伯特先生颇为相像，以至于在市镇上引起警觉，让人怀疑他不是要开航线而是要种香蕉。他终于为自己在马孔多的定居找到了理由，兴奋不已，因此多次奔赴省城与当局洽谈，获得许可并签下了独家运营权。与此同时，他与布鲁塞尔的合

伙人保持着一如当初费尔南达与隐身医生之间的通信联系，最终说服他们派一位熟练技师乘船带第一架飞机来，技师到了最近的港口会组装好飞机驾驶到马孔多。在初步的气象预测工作完成一年后，他对合伙人信中的多次应承深信不疑，养成了在街上散步时仰望天空的习惯，随时留心风中的响动，期待飞机的出现。

尽管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自己毫无察觉，她的归来却给奥雷里亚诺的生活带来了根本的改变。自从何塞·阿尔卡蒂奥死后，他成了加泰罗尼亚智者书店的忠实主顾。他那时自由自在，时间充裕，不禁对市镇产生了些许好奇心，但却没有发现任何惊喜。他走在覆满灰尘的孤寂街巷，怀着科学考察般的兴趣不带感情地审视几成废墟的房舍内部，观看因锈蚀和飞鸟的垂死撞击而变得破烂不堪的铁窗纱，打量在往事中消沉下去的居民。他试图以想象重建昔日香蕉公司已荡然无存的辉煌，可视线所及却是当初的泳池里堆满男人的鞋子女人的拖鞋直至池沿；遭到毒麦毁坏的房屋里残留着一具德国犬的骨架，依然被一根钢链拴在铁环上；一部电话响了又响，奥雷里亚诺只得拿起话筒，他听见一个焦虑的女声遥遥传来，说的是英语，便回答说是的，罢工已经结束，三千个死人已经被扔进海里，香蕉公司已经撤走，马孔多最终获得了久违多年的平静。他又走到业已败落的花街柳巷，曾几何时这里大捆大捆的钞票被烧掉只为给昆比安巴舞助兴，如今却已成为分外凄凉冷落、起伏不平的窄巷，几盏红灯尚未熄灭，无人光顾的舞厅只剩些残破的花环点缀，苍白臃肿的无主孀妇、年老色衰的法国女郎和巴比伦女族长还守在唱机旁等待主顾上门。除了安的列斯群岛黑人中最年迈的那个，奥雷里亚诺不曾遇到一个还记得他家族的人，连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也无人知晓。那黑人一头棉花似的白发给人以照片底片的印象，他一如以往在家门口唱着傍晚时凄恻的圣诗。奥雷里亚诺只用了几个星期就学会了复杂的帕皮亚门托语用来和他交谈，有时还一起享用他曾孙女烹制的鸡头汤。那是个高大的黑人姑娘，长着结实的骨架、母马般的臀部和活甜瓜似的乳房，浑圆美丽的

头颅上密密覆了一层铁丝般的头发，仿佛戴着中世纪武士的帽盔。她名叫尼格罗曼妲。那时奥雷里亚诺还在靠变卖家里的餐具、烛台和其他小物件过活。他时常落到囊空如洗的地步，便去市场的小吃摊上讨些人家准备丢进垃圾桶的鸡头，请尼格罗曼妲添上马齿苋做汤，又加进薄荷调味。她曾祖父死后，奥雷里亚诺不再去她家，但常在广场上巴旦杏树幽暗的树荫下遇见她用粗野的呼哨声吸引稀少的夜游者。很多次他都去陪她，用帕皮亚门托语和她谈起鸡头汤及其他贫寒生活中的美味。若不是她表示他待在一边吓走了潜在的主顾，他还会和她这样聊下去。尽管他有几次感受到了诱惑，尽管尼格罗曼妲也会将那看作共享怀旧之情的自然结果，他却没有和她睡觉。因此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在回到马孔多那天送出一个令他窒息的友爱拥抱时，奥雷里亚诺仍然是未经人事的处男。每次看到她，特别是在她传授最新舞步的时候，他总会感到骨头里充满无助的泡沫，跟当年高祖父与借口玩纸牌带他钻进谷仓的庇拉尔·特尔内拉独处时的感觉一般无二。他试图强压下痛苦，更加投入地研究羊皮卷，尽量避开那位姨妈天真烂漫的讨好，避开她身上散发出的令他夜夜饱受荼毒的气息，然而他越是逃避，越是渴望听见她咯咯的笑声、牝猫般快活的尖叫和欢畅的歌声，她随时随刻在家中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享受情爱的欢娱声。一天夜里，距离他床铺十米远处，在金银器工作台上，那夫妻俩肆意欢爱间将玻璃瓶打碎，最后在盐酸横流中成其好事。奥雷里亚诺一分钟都没能合眼，而且次日整天都在发热，在愤怒中抽泣。他在巴旦杏树荫下等待尼格罗曼妲的第一个夜晚无比漫长，惴惴不安的感觉仿佛冰针穿心，手中紧紧握着那一比索五十生太伏。他向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要来这钱固然因为需要，但更多地是为了让她也以某种形式卷入自己的冒险，从而折辱她，占有她。尼格罗曼妲把他引向诱人的烛火映照下的卧室，引向那张因反复接客而脏污不堪的折叠床，引向她冷酷无情、精壮如母狗般的身体，她本打算像安慰受惊的孩子似的将他打发，不

料遇上的却是一个勇猛异常的男人，搅得她五脏六腑都在巨震中错位。

他们成了情人。奥雷里亚诺上午钻研羊皮卷，午睡时分赶去尼格罗曼妲的卧室，在她的引领下花样百出，一开始像蠕虫，然后像蜗牛，最后像螃蟹，直到她不得不出门去追踪误入歧途的猎物。几星期后，奥雷里亚诺才发现她腰间有一圈饰带，宛如大提琴的琴弦，却像钢铁般坚硬，不分首尾无始无终，伴她出生成长。他们几乎总在欢爱的间歇，在令人迷乱的酷热中，在锌皮屋顶的斑斑锈孔透出的白日星辰下，赤着身子在床上吃饭。奥雷里亚诺是尼格罗曼妲头一个固定的男人，一个床上伙伴—她每次这样称呼都会笑得半死。就在她开始产生幻想时，奥雷里亚诺向她倾诉了自己对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的暗中相思，说找人代替不但没有缓解煎熬，反而随着情爱经验渐增越发痛苦。从此，尼格罗曼妲仍然热情不改地接待他，却执意要他为服务付费，遇到他没钱时便记账，不写数字只用大拇指指甲在门后划出道道。每到傍晚，当尼格罗曼妲在广场的阴影里徘徊，奥雷里亚诺就像陌生人一般穿过长廊，勉强与通常在此时吃晚饭的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和加斯通打个招呼，回到自己的房间关起门来。他无心阅读写作，甚至无法思考，心潮如沸，耳边则不断传来朗朗笑声，窃窃低语，开场的嬉闹和随后激情爆发时响彻家中的喊叫。他在加斯通开始等候飞机之前的两年都是如此度过，那天下午也没有什么不同，他在加泰罗尼亚智者的店里遇见四个胡言乱语的年轻人，他们正在激烈地争论中世纪是如何杀灭蟑螂的。老店主知道奥雷里亚诺喜爱那些只有“可敬的比德”[①]读过的冷僻典籍，便怀着父亲捉弄儿子似的心态逼他加入论争，于是他不假思索地开始解说，蟑螂这种世界上最古老的有翅昆虫早在《旧约》时代就已成为人们用拖鞋击打的重点对象，但这一物种凭借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从蘸硼砂的番茄片到拌糖的面粉等一切杀灭方式，以其一千六百零三个变种抵抗住人类最古老、最执著也最残酷的迫害，人类自起源以来对其他物种包括自身在内都没施展过这样的

手段，故而杀灭蟑螂可称为人类除繁衍后代之外更明确、更迫切的本能，而蟑螂之所以能逃过人类凶狠的捕杀，只是因为它们成功地躲入黑暗，利用了人类与生俱来对黑暗的恐惧，但同时它们也变得对正午的阳光十分敏感，故此，无论在中世纪、在如今还是在将来的世代，有效杀灭蟑螂的方式唯有光照而已。

这段旁征博引的宿命论讲谈成为一段深厚友谊的开端，从此奥雷里亚诺每天下午与四位论争者聚会，他们分别是阿尔瓦罗、赫尔曼、阿尔丰索和加夫列尔，他一生最初也是最后的朋友。对于像他这样耽溺在书本世界中的人来说，那些下午六点在书店开始，凌晨在妓院结束的激烈讨论，不啻一种全新的启示。他此前从未想过文学可以成为世上最佳的嘲讽工具，就像阿尔瓦罗一天晚上在欢宴席间所说的那样。过了一段时间，奥雷里亚诺才发觉许多惊世骇俗的高论都来源于加泰罗尼亚智者作出的榜样，据他说智慧如果不能用来创造出一种烹制鹰嘴豆的新方法，就根本一文不值。

奥雷里亚诺发表蟑螂宏论的那天下午，讨论最后在那些卖身糊口的女孩们家里结束，那是一家充满假象的妓院，位于马孔多郊区。老鸨是个笑容可掬的好心妈妈，有着喜欢开门关门的怪癖。她不变的微笑仿佛在嘲弄那些信以为真的主顾，他们真的把只在想象中存在的一切当作了实在，因为这里连可触可感的物品也同属虚假：家具坐上去便散架，唱机的空膛里藏了一只抱窝的母鸡，花园里全是纸花，日历上还是香蕉公司到来之前的年份，画框里的版画剪自从未出版过的杂志。连那些一听到老鸨招呼接客便从四邻赶来的羞怯小妓女，也同样当不得真。她们出现时并不打招呼，穿着五年前的印花小衣裳，怎样天真无邪地穿上也怎样脱下，在情爱的高潮则大声惊呼“好家伙，你看房顶都要塌了”，而一拿到那一比索五十生太伏就立即去老鸨那里买面包和干酪。每到这时老鸨的笑容更加欢畅，因为只有她知道那些食物同样并非真实。奥雷里亚诺那时的世界始于梅尔基亚德斯的羊皮卷，终于尼格罗曼妲的床铺，他却在这家小妓院里找到了医治腼腆的猛

药。最初他毫无进展，因为老鸨常在正销魂时走进，对双方的情爱魅力大加评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最终对这世上的种种扫兴习以为常，甚至在一个最疯狂的夜里到待客的小厅中脱个精光，用他那难以想见的阳具托着个啤酒瓶逛遍整幢房子。他还创造出许多荒唐的花样，老鸨只是带着不变的微笑旁观，从未抗议，从未当真，一如赫尔曼试图点燃房子来证明其不存在，阿尔丰索拧断鹦鹉的脖子丢进刚开锅的香蕉木薯炖鸡里的时候。

奥雷里亚诺与四位朋友同样亲密友好，甚至在想起的时候把他们当成一个人，但他还是与加夫列尔走得更近些。这一关系诞生于一个夜晚，当时他偶然谈起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只有加夫列尔一个人没有把他的话当成玩笑。那晚连通常不参与谈话的老鸨也以长舌妇般的热情异常兴奋地加入讨论，说她的确听人说起过几次，但仍认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其人只是政府编造的人物，用来作为屠杀自由派的借口。相反，加夫列尔却毫不怀疑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存在，因为他祖上就是上校的同袍和密友，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他们谈起对工人的大屠杀，记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每当奥雷里亚诺触及这个话题，不仅老鸨一人，一些比她年长的老人都会驳斥所谓工人被包围在广场、两百节车厢的火车满载死尸之类的谣言，并且坚决捍卫已然在法庭案卷和小学教科书中根深蒂固的说法：根本没有过什么香蕉公司。因此奥雷里亚诺和加夫列尔因着一种建立在无人相信的事实基础上的默契联结在一起，他们的生活被这些事实深深改变，他们在只余怀缅的末日世界的退潮中漂泊。加夫列尔一向想睡便睡，随处过夜，很多次奥雷里亚诺把他安置在金银器作坊，他却被卧室间游荡的亡灵搅得彻夜不眠。后来奥雷里亚诺又把他托付给尼格罗曼妲，她空闲下来就将他带回自己常有客人光顾的房间，在门后刻满奥雷里亚诺债务所余的少许空处划上竖道记账。

尽管生活方面混乱不堪，这群年轻人仍试图创出一些不朽的业绩，这要感谢那位加泰罗尼亚智者的敦促。正是他，凭着旧日当过古

典文学教师的资历以及珍本书籍的收藏，使他们得以在一个居民既无兴趣也无条件接受小学以上教育的市镇，整夜探讨第三十七种戏剧情境。奥雷里亚诺为友情的发现而迷醉，为新世界的魅力而惶惑，而他以前由于费尔南达的悭吝从未有机会认识这个世界。就在那些用密码写就的预言诗行向他初显端倪之时，他却中断了对羊皮卷的研究。但后来事实证明时间足够，并不妨碍他在妓院流连，他重受鼓舞又回到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决心继续努力直至揭开最后的秘密。正是从那时起，加斯通开始等待飞机的到来，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觉得寂寥孤单，一天上午她出现在房间里。

“你好，野人，”她说，“又回到洞穴里啦。”

她身着自己设计的服装，戴着自己制作的鲱鱼椎骨项链，魅力无可抗拒。出于对丈夫忠贞的信任，她不再使用那根丝带，自回乡后第一次拥有了片刻空闲。奥雷里亚诺无须抬眼便察觉到她的到来。她双肘抵在工作台上，触手可及，毫无戒备，奥雷里亚诺感觉到自己骨节的深沉耸动声，而她却将全部兴趣落在羊皮卷上。他试图克服慌乱，追回逃逸的声音、渐远的生机、正在化作珊瑚石的记忆，便跟她谈论梵文的神圣功用，谈论如同逆光观看纸背字迹一般在时间中洞彻未来的科学可能性，谈论将预言编成密码以防其自行毁灭的必要性，以及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和圣米扬关于坎塔布里亚毁灭的预言。突然间，奥雷里亚诺被自出生时起便沉睡于内心深处的冲动所驱使，一边继续谈话一边把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以为这最后的决定将结束自己的不安。不料她一下握住他的食指，在他继续回答问题时一直没有松开，那天真无邪的亲昵就像她童年时常有的样子。两人就这样由并未传达任何意义的冰凉食指联结在一起，直到她从这瞬间的梦幻中惊醒，拍了下额头。“蚂蚁！”她叫了一声。随后她丢下手稿，翩然一步到了门口，从指尖向奥雷里亚诺递出一个飞吻，当年那个下午他们送她去布鲁塞尔时她曾用同样的飞吻与父亲告别。

“以后再给我讲吧，”她说，“我忘了今天是往蚂蚁洞里撒石灰的日子。”

她有事经过时偶尔还来他的房间逗留片刻，而她丈夫仍继续仰望天空。这一转机给奥雷里亚诺带来了希望，他于是留在家里吃饭，而从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回来后的头几个月起他从未这样做过。加斯通为此而高兴。在往往超出一个小时的饭后谈天中，他诉说着被合伙人欺骗的痛苦。他们通知他飞机已装船，只是尚未到达，而他在海运公司的代理人则认为永远不会到达，因为那船根本没有出现在加勒比海的船只清单上。他的合伙人坚称已经发货，甚至暗示加斯通可能在信中撒谎。通信时彼此间的怀疑达到如此程度，加斯通决定不再写信，开始筹划布鲁塞尔之行，准备速战速决弄清事情原委，并带飞机回来。但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再次表明她的决定，宁可独自留下也不愿离开马孔多一步，这一计划立即告吹。最初，奥雷里亚诺和旁人一样把加斯通当作骑自行车的傻瓜，并隐约抱有怜悯之情。后来，他在花街柳巷中对男人的本性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便想到加斯通的温顺实际源于内心不羁的情欲。但当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才发觉加斯通真实的个性正与表面的顺服相反，因此不无恶意地怀疑他连等待飞机都是在做戏。他觉得加斯通并不像表面那样愚蠢，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拥有无限坚忍、能力与耐心的男人，打算以无穷尽的讨好、无止境的迁就、永不说“不”，令妻子感到厌倦，陷入自己织下的罗网，直到有一天再也无法忍受幻梦沦为庸常，主动收拾行李返回欧洲。奥雷里亚诺曾经的怜悯化作强烈的敌意。他发觉加斯通的计划如此险恶又如此有效，不禁鼓起勇气提醒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但她却把他的疑虑当作笑柄，丝毫没有觉察到其中蕴含着撕心裂肺的爱意、犹疑和忌妒。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在奥雷里亚诺身上引发手足之情以外的情愫，直到有一天他见她开桃罐头时刺伤了手指，立刻冲过去吮吸鲜血，那贪婪和狂热的样子令她感到皮肤上传来一阵寒意。

“奥雷里亚诺！”她神情不安地笑着，“你太坏了，当不了一只好蝙蝠。”

于是奥雷里亚诺的激情爆发了，他像个被抛弃的孩子似的在她受伤的手上吻了又吻，敞开内心所有最隐秘的甬道，倾吐百转愁肠，释放煎熬中孕育出的寄生怪兽。向她诉说自己如何在深夜起来，扑在她晾在浴室的内衣上因无助和愤怒而哭泣。向她诉说自己如何热切要求尼格罗曼妲像牝猫般尖叫并在他耳边呜咽“加斯通，加斯通，加斯通”，如何费尽心机搜罗她的香水瓶好在那些卖身糊口的女孩颈项上闻到她的香味。这激情四溢的倾诉把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吓得不轻，她渐渐蜷起手指像软体动物般缩了回去，那受伤的手不再感到疼痛也不再有分毫的怜悯，化作一团翡翠、黄玉以及僵硬麻木的骨头拧成的死结。

“真过分！”她说话的样子像在啐出什么东西，“我这就坐第一班船回比利时去。”

这些天里的一个下午，阿尔瓦罗来到加泰罗尼亚智者的书店，扯着嗓门宣告他的最新发现：万牲妓院。该处名叫“金童”，是一座豪敞的露天大厅，至少有两百只石鸻徜徉其间，报时的嘶鸣震耳欲聋。在环绕舞池的铁丝围栏中，大株亚马逊山茶的掩映下，有缤纷五色的草鹭、猪一般肥硕的鳄鱼、十二节尾环的响尾蛇，还有一只金背龟在小小的人工海洋中潜游。另有一条温顺的白色大狗，常与同性来往，但也为妓女们提供保护来换取食物。四周弥漫着混沌初开的气息，仿佛这里刚刚被创造出来。黑白混血的姑娘们在血红的花瓣和过时的唱片中间无所期盼地等待，对这尘世乐园中被人遗忘的风月行当熟稔于心。在那群年轻人光顾这家幻觉温室的头一夜，入口处藤摇椅上沉默肃穆的看门老妪从五人当中看到了一个瘦骨嶙峋、神情忧郁、颧骨如鞑靼人，带着从创世之初直到永远的孤独印记的男子，顿时感到时光倒流回到了最初的源头。

“啊，”她惊叹道，“奥雷里亚诺！”

她又一次看到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就像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在他荣誉扫地失意退隐之前的那个遥远的清晨，她在一盏灯光下看见他走进自己的卧室发布平生第一道命令：命令给予他以爱情。她是庇拉尔·特尔内拉。多年前，当她过了一百四十五岁的生日，便放弃了计算年龄的恶习，继续在摆脱了记忆的静态时光中生活，在清晰可见确定无疑的未来中生活，不再被纸牌占卜中那些叵测的猜度和潜伏的陷阱所烦扰。

从那夜起，奥雷里亚诺在高祖母的温情和理解中找到了安慰和庇护，尽管他并不知道两人之间的血脉关联。她端坐在藤摇椅上追溯过往，讲述家族的伟业与不幸，马孔多已消逝的辉煌，与此同时阿尔瓦罗以响亮的大笑惊散鳄鱼，阿尔丰索编造石鸻的恐怖故事，说上星期有四位行为不端的客人被啄出了眼珠，而加夫列尔待在一个满腹心事的混血姑娘屋里，她不收费只求代写情书寄给她在奥里诺科河另一侧坐牢的走私贩男友，他被边防警察灌下泻药后又被勒令坐在小便盆上，盆里很快就盛满了粪便与钻石。这家真正的妓院，连同慈祥的老鸨，是奥雷里亚诺在漫长的囚禁中梦寐以求的世界。他在这种近乎完美的陪伴中感觉无比惬意，因此那天下午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让他梦想破灭后，他立即来到这里寻求慰藉。他本想一吐为快，让人帮他解开重重心结，结果却只能扑在庇拉尔·特尔内拉怀里热泪滚滚尽情宣泄。她用指肚爱抚着他的头，静静等他哭完，没听他说出哭泣的缘由便已认出人类历史上这最古老的哀恸。

“好吧，孩子，”她安慰他说，“现在告诉我她是谁。”

奥雷里亚诺说罢，庇拉尔·特尔内拉发出一阵深沉的笑声，这古老而豁达的笑声最后几近鸽子的呢喃。对她而言，布恩迪亚家男人的心里没有看不穿的秘密，因为一个世纪的牌戏与阅历已经教会她这个家族的历史不过是一系列无可改变的重复，若不是车轴在进程中必不可免地磨损，这旋转的车轮将永远滚动下去。

“不用担心，”她微笑道，“无论她现在在哪儿，她都在等你。”

那是下午四点半，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走出浴室。奥雷里亚诺看见她从房门外走过，身上披着一件细褶浴衣，头上裹着一条毛巾。他几乎是踮着脚尖跟在她后面，酒醉般颤抖着走进新房，那时她正解开浴衣，吓得立刻重新裹上。她打个手势指向隔壁半掩着门的房间，奥雷里亚诺知道加斯通正在那里开始写信。

“你走。”她压低声音说。

奥雷里亚诺笑了，双手将她拦腰抱起好像托着一盆秋海棠，仰面丢在床上。没等她反抗，他粗鲁地一把剥去浴衣，新浴后的胴体令他震撼不已，每一寸肌肤、每一丝茸毛，甚至连最隐秘处的痣斑他都在别处房间的幽暗中想象过。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奋力反抗，凭着训练有素的雌兽般的狡黠，如鼬鼠般扭动光滑、柔韧而芬芳的身体，同时试图用膝盖顶住他的腰，似蝎子般抓挠他的脸。但两人发出的声响极小，至多好像有人在敞开的窗户前观赏四月凝远的暮色时发出的轻叹。这是一场激烈的争斗，一场殊死的恶战，却好像与暴力无涉，因为其中只见似是而非的进攻，恍如幽灵的闪躲，缓慢、谨慎而庄重。于是在进攻间歇便有足够的时间让牵牛花再次绽放，让隔壁房间里的加斯通忘却关于飞机的梦想，他们俩就仿佛一双敌对的情侣在清澈的水塘深处寻求和解。在激烈而富于仪式感的争斗中，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想到刻意保持静寂更为反常，这比他们努力抑制的打斗声更容易引起隔壁丈夫的怀疑。她便抿着嘴笑出声来，同时并未放弃搏斗，不过防御时只是装模作样地撕咬，也渐渐不再扭动身体，最后双方都意识到彼此既是对手又是同谋，由此争斗沦为惯常的嬉闹，攻击变作爱抚。突然间，近乎玩耍或又一次恶作剧，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放松了防御，但当她被自己造成的后果吓住并试图应对的时候已经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震撼将她定在原处动弹不得，她的反抗意志被不可抵御的热切欲望压倒，她想要知道那些在死亡彼岸等待她的橙色呼啸和隐形球体究竟是什么。她只来得及伸出手臂摸索到毛巾用牙齿咬住，以免传出那撕心裂肺的牝猫尖叫。

①“可敬的比德”（Beda el Venerable，672 / 673 — 735），即 Saint Bede，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神学家、历史学家，以博学多闻著称。

二十

庇拉尔·特尔内拉死在藤摇椅上，那是在一个欢宴的夜晚，她当时仍在自己的乐园入口看门。根据她的遗愿，人们没有将她入棺，而是让她坐在藤摇椅上，由八条大汉用龙舌兰粗绳缒到舞池中央挖出的大坑里。那些混血姑娘身着黑衣，哭得脸色苍白，按她们即兴想出的告别仪式纷纷摘下耳坠、胸针和戒指扔到墓穴中，随后用一块全无姓名日期的墓碑封住，在上面用亚马逊山茶堆成小丘。而后她们将动物全部毒死，用砖头和灰泥封牢门窗，这才带着自己的木衣箱各奔他乡，箱内贴满了圣徒像、杂志彩画，以及那些遥远而神奇的露水情人的肖像，他们或屙钻石，或吃人肉，或在公海上被尊为纸牌之王。

这便是结束。在庇拉尔·特尔内拉的墓前，在妓女们的圣诗唱诵和念珠拨动中，旧日世界最后的零星残余也销蚀殆尽，而在此之前加泰罗尼亚智者已耐不住对四季长春的故乡的思念，将书店清仓，回到了他出生的地中海村庄。这一决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在香蕉公司全盛时期逃避连绵不断的战乱来到马孔多，异想天开地创办了这间书店经营古籍和各种文字的原版书。偶尔有等着去对面屋里解梦的人走进来，不无疑虑地翻上几页，仿佛那些书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他半生都在闷热的书店后堂度过，用紫色墨水在撕下来的学生练习本散页上胡乱涂写细密的字迹，没人知道其中的确切内容。奥雷里亚诺与他结识的时候，他已经攒下两大箱文稿，让人想起梅尔基亚德斯的羊皮卷，到临走时他又装满了第三箱，由此可见他在马孔多期间没做别的事。与他来往的只有那四个朋友，他在他们还在上小学时就用书籍跟他们交换陀螺和风筝，又带他们读塞内加和奥维德。他谈起那些古典作家就像在说自家人，仿佛历代先贤都曾当过他的室友。他还知道一些本不该知道的隐秘，譬如圣奥古斯丁在法袍内穿了件紧身羊毛坎肩

十四年不曾离身，巫师阿尔纳多·德·比拉诺瓦幼年被蝎子蜇咬便从此不举。他对文字的狂热中既有崇高敬意又有冷嘲热讽，对自己的手稿同样采取这种双重态度。阿尔丰索为翻译这些手稿学会了加泰罗尼亚语，常把一卷稿子揣在兜里—里面总满满塞着各色剪报和奇特行业的手册—结果一天晚上在卖身糊口的女孩们家里丢失了。老智者得悉后，居然没有大动肝火，反而大笑不已，说那正是文学的自然归宿。到他返乡时情形却与此相反，他不顾一切劝说执意要带上那三大箱文稿，甚至操着卡塔赫纳方言对建议托运的列车员恶言相向，最终他争得许可带着箱子一起登上了旅客车厢。“等到人类坐一等车厢而文学只能挤货运车厢的那一天，”他那时说道，“这个世界也就完蛋了。”这是他留下的最后的话。他最后准备行装的那个星期可谓苦不堪言，随着行期渐近他脾气越发恶劣，越发想不起该做的事情，明明把东西放在某处却在另一处发现，仿佛被当初折磨费尔南达的精灵所包围。

“见鬼[①]，”他恶狠狠地说道，“去他的伦敦教务会议第二十七条！”

赫尔曼和奥雷里亚诺负责帮他准备行程。他们像是对待一个孩子，把车票和护照放进他的兜里用安全别针别好，为他开列出从马孔多出发直到抵达巴塞罗那一路应做事项的详细清单，但他还是在无意中将一条装着一半家财的裤子丢进了垃圾堆。出发前夜，他钉上文稿箱，把所有衣物塞进来时带的行李箱，然后揉了揉贝壳似的眼皮，指着一堆陪他度过流亡岁月的书本，以粗鄙无礼的祝福口吻宣布：

“这些破烂就留给你们了！”

三个月后，他们收到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二十九封信和五十多张照片，都是他在海上的空闲中攒下来的。尽管没有标明日期，但并不难看出写信的前后顺序。在最初的信件中，他以一贯的幽默谈起旅途中的种种风波：他是如何渴望将那个不许他把三个箱子搬进舱室的监运员扔进大海；一位女士如何愚蠢至极地对数字“13”怀有恐惧，但并非出于迷信，而是因为她感觉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数字；他如何在吃第一顿晚饭时，尝出船上的饮用水有莱里达泉水仿佛夜间甜菜的味

道，为此打赌取胜。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对船上的现实生活渐渐失去兴趣，而马孔多的一切，连晚近的琐碎事件也成为他怀恋的对象，因为随着航船渐行渐远，记忆也染上愈来愈浓烈的悲凉色彩。怀念的加深在照片里也得到了清晰的体现。最初的照片里，他身穿运动衫，额前银发飘飞，背衬十月加勒比海的浪花飞溅，一副快活的模样。最后一批照片里，他站在甲板上裹着暗色大衣，系着丝围巾，脸色苍白，神不守舍，脚下沉郁的航船开始在秋天的大洋上梦游般前行。赫尔曼和奥雷里亚诺给他回了信。最初几个月他频繁来信，让人觉得比他在马孔多时与他更为接近，几乎不再为他的离去而痛苦。一开始，他在信中说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他出生的家里仍有粉色的蜗牛，夹在面包里的鲱鱼干仍是当年的味道，村里的瀑布黄昏时仍弥散出芬芳的气息。练习本的散页上重又布满紫色的字迹，其中还有分别献给他们四人的段落。然而尽管他自己表面上并未察觉，那些在心绪转好后写下的热情洋溢的信件，却渐渐变成了灰心丧气的牧函。冬夜，汤锅在炉上沸滚，他却在怀念书店后堂的闷热，烈日照在蒙尘的巴旦杏树上的嗡响，午休的昏恹中响起的火车汽笛，正如他在马孔多时怀念冬天炉上的热汤，咖啡小贩的叫卖，以及春天里疾飞的云雀。两种怀念如同双镜对立，他夹在其间不知所措，无法再保持高妙的超脱，最后甚至劝说他们全都离开马孔多，忘掉他传授的一切世道人心知识，让贺拉斯见鬼去，还说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记住，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没有归路，春天总是一去不返，最疯狂执著的爱情也终究是过眼云烟。

阿尔瓦罗第一个听从忠告离开了马孔多。他变卖一切，包括家中院里吓唬路人的老虎，买下一张永久车票，登上一列永无终点的火车。他从路经的车站寄来明信片，兴高采烈地描述车窗外瞬间闪过的世间万象，仿佛将一首飞逝的长诗撕成碎片向着遗忘之乡一路抛洒：路易斯安那棉田里奇怪的黑人，肯塔基蓝色草丛中疾驰的骏马，亚利桑那地狱般暮色里的希腊情侣，密歇根湖畔画水彩画的红衫少女—她

举起画笔向他致意，不是为了告别而是盼望再见，因为她并不知道眼前所见的火车没有归路。随后，阿尔丰索和赫尔曼在一个星期六离开，计划下星期一回来，却从此再无音讯。加泰罗尼亚智者走后一年，只有加夫列尔还留在马孔多，仍然一事无成，靠尼格罗曼妲不稳定的周济过活。他参加了一家法国杂志的有奖问答，头奖是一次巴黎之旅。订阅杂志的人其实是奥雷里亚诺，他帮加夫列尔填写答案，有时在家里，更多的时候在马孔多仅存的一家药房中，在瓷瓶和缬草气息的环绕间，加夫列尔沉静的女友梅尔塞德斯所住的地方。这是往昔的最后遗存，这往昔日渐衰落却不会彻底消亡，因为它是在自身之中无休无止地败落下去，每过一刻便向彻底灭亡更近一步，却永远无法抵达最后的终结。整个市镇如此死气沉沉、与世隔绝，当加夫列尔赢了大奖，带着两套换洗衣服、一双鞋和一套拉伯雷全集要去巴黎的时候，不得不向司机挥手致意才让火车停下将他接上。昔日的土耳其人大街已沦为被遗忘的角落，最后一批阿拉伯人沿袭千年传统端坐在门口等待死亡的到来，尽管最后一码斜纹布早已售出，幽暗的橱窗里只剩下一个个无头的模特。至于香蕉公司的城镇，或许帕特里夏·布朗在阿拉巴马州普拉特维尔难耐的长夜里会就着醋拌黄瓜对儿孙们说起，但此时它已沦为一片野草丛生的平原。安赫尔神甫的继任者是一位老神甫，没人愿意费心打听他的名姓。他为关节炎及疑虑引发的失眠所苦，懒懒地躺在吊床上等待上帝的慈悲，任凭蜥蜴和老鼠在隔壁的教堂里争夺领地。在那个连飞鸟也厌弃，长久的扬尘与酷热令人呼吸艰难的马孔多，奥雷里亚诺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被爱情、被孤独、被爱情的孤独幽禁在因红蚂蚁疯狂啃噬的轰响而难以入睡的家里，他们是唯一幸福的生灵，世上再没有比他们更幸福的人。

加斯通已经回到布鲁塞尔。他厌倦了苦苦望天的等待，有一天把往来信件和生活必需品塞进一只小箱子，抱着乘飞机归来的希望离去。他一心想要赶在一群德国机师前面，因为他们已经向省府当局提交了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从第一次欢爱的那天下午起，奥雷里亚诺

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一直在利用她丈夫难得的疏忽冒着风险幽会，紧张地避免发出响动，却几乎总被她丈夫无从预料的返家打断。然而一旦有机会在家中独处，他们便彻底沉浸在迟来的爱情狂潮中。那是一种癫狂失常的激情，令费尔南达的骨骸在墓中惊恐地颤抖，令双方耽溺于持久不衰的亢奋中。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的尖叫、高潮时的歌唱响彻家中，或在下午两点的餐桌上，或在凌晨两点的谷仓里。“最让我难过的是，”她笑着说道，“我们竟然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在意乱神迷间，她看见蚂蚁横扫花园，受远古的饥饿驱使啃食家中的一切木制品获得餍足，看见有生命的岩浆洪流再次席卷长廊，却只是在卧室里发现敌踪时才去费心抵挡。奥雷里亚诺丢下羊皮卷，不再出门一步，对加泰罗尼亚智者的来信也胡乱答复。他们丧失了现实意识、时间观念和日常生活节奏。他们重又紧闭门窗，为的是省下宽衣解带的工夫，就像当初美人儿蕾梅黛丝期待的那样在家中赤身来去，在院中泥地里一丝不挂地嬉闹，一天下午在水池中欢爱时还险些双双溺死。短短时间内他们造成了比蚁灾更大的破坏：客厅里的家具四分五裂，曾经承载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军旅生涯中哀伤情爱的吊床被疯狂撕裂，床垫的芯子被剖出洒满地板，扬起满屋飞絮几令人窒息。奥雷里亚诺这位狂野的情人比起对方并不逊色，但却是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凭借自己荒唐的才华和饥渴的柔情统治着这座灾难的乐园，仿佛在爱情中秉承和凝聚了高祖母制作糖果小动物时的无穷精力。当她为自己的新花样欢快歌唱或纵情大笑的时候，奥雷里亚诺却变得越发沉默入神，因为他的激情是在内敛中暗自烧灼。他们的情爱技艺登峰造极，在高潮后的疲惫中也能另辟佳境。他们全心膜拜对方的肉体，发现情爱的低潮里存在着未开发的领域，那比欲望的空间更丰饶幽美。他蘸着蛋清揉搓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挺立的乳峰，或用椰子脂润滑她充满弹性的大腿和仙桃般甜蜜的小腹，而她则把奥雷里亚诺超群的阳物当作玩偶摆弄，用口红给它画上小丑眼圈，用眉笔给它描出土耳其人胡子，为它戴上透明的硬纱细领带和锡纸小帽。一天晚上，他们互

相用桃子糖浆从头到脚涂满全身，像狗一般彼此舔舐，像疯子一样在长廊地板上欢爱，直到被蚂蚁的洪流唤醒，险些被活活吞噬。

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在迷狂的间歇回复加斯通的来信。她感觉他是那样遥远又那样忙碌，似乎不可能再回来。在最早的一封来信中，他提到合伙人的确已将飞机发出，但布鲁塞尔的海运公司错运到了坦噶尼喀，交付与当地散居的马空多人村社。这一失误导致诸多耽延，仅将飞机讨回就可能拖上两年时间。于是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不再担心丈夫会不合时宜地归来。至于奥雷里亚诺，他与外界的联系只剩下加泰罗尼亚智者的来信，以及那位沉静的药房少女梅尔塞德斯转达的加夫列尔的消息。开始的时候这些联系还很真实。加夫列尔退掉了返程票留在巴黎，把多芬尼大街上一家阴森旅馆的女招待扔出来的过期报纸和空酒瓶拿去换钱来度日。奥雷里亚诺能够想象他整日穿着高领红绒衫的样子，只在春天来临，蒙帕尔纳斯的路边咖啡馆坐满一对对情侣时才脱下；白天睡觉、晚上在弥漫着煮花椰菜气味的房间里写作以转移饥饿感，而日后罗卡玛杜[2]将在同一房间离开人世。然而，他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含糊，加泰罗尼亚智者的信件也越来越稀少，愈显颓伤，奥雷里亚诺慢慢习惯了这种疏远，一如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对丈夫的感觉。两人飘荡在一方空渺的天地，在那里日复一日、永恒不变的现实只有爱情。

突然间，这个幸福的梦幻世界中响起一声晴天霹雳，传来了加斯通返家的消息。奥雷里亚诺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睁开眼睛，审视各自的灵魂，手抚胸口相对而视，心下明白两人已连成一体，宁可死也不愿分开。于是她给丈夫写了一封信，信中饱含真情又自相矛盾，重申了对他的爱意和想见到他的渴望，同时也坦承由于命运的捉弄，自己无法与奥雷里亚诺分离。出乎两人的预料，加斯通的回复十分平和，甚至显出父辈的温情，那满满两张信纸都在提醒他们提防激情的起伏无常，最后一段更明明白白祝他们幸福，就像他在短暂的婚姻生活中经历的那样。这态度太过出人意表，令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有蒙

羞的感觉，仿佛主动给了丈夫期望的借口抛弃自己。六个月后她的愤恨更加强烈，因为加斯通从利奥波德维尔写信来说，他终于在那里等到了飞机，请求将自行车寄过去，称那是他在马孔多唯一割舍不下的东西。奥雷里亚诺耐心地承受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的怨气，努力向她证明无论顺境逆境自己都能成为一位好丈夫。加斯通留下的钱财用尽了，迫在眉睫的窘困在两人之间促生出一种新的紧密关联，虽然不像激情那样令人迷醉，但仍能使他们与情欲泛滥的日子里一般的相爱、同样的幸福。庇拉尔·特尔内拉去世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期待新生命的降生。

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在孕期的昏倦中试图经营鱼脊骨项链生意，但除了梅尔塞德斯买了一打，再无他人光顾。奥雷里亚诺第一次发觉自己的语言天赋、百科全书般的博学，以及不需实地了解便能对远方事物了如指掌的罕见能力，都像自己女人的那匣珠宝一样毫无用处，尽管那时马孔多所有剩余居民的全部家资加在一起才抵得上那些珠宝的价值。他们奇迹般地勉强度日。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仍能保持良好心态，继续制造情趣花样，但她也养成了午饭后坐在长廊里的习惯，似睡非睡，若有所思。奥雷里亚诺则在一旁陪伴。有时两人会一直默默坐到傍晚，面对着面，彼此凝视，在静谧中相爱，并不比当初在癫狂中相爱减色。未来的不确定使他们的心绪回到了过去。他们看见自己置身暴雨时期失落的乐园，在院中的泥坑里玩水，捕杀蜥蜴挂到乌尔苏拉身上，拿她玩活埋游戏。这些回忆令他们恍然觉察，两人自从记事以来共度的时光总是十分幸福。追忆往事时，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记起一天下午她走进金银器作坊，母亲告诉她那个小奥雷里亚诺不是任何人的孩子，因为他是躺在一个篮子里顺水漂来的。这一说法似乎让人难以置信，但却没有任何真实的信息可以取代。在研究过所有可能性之后，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费尔南达不是奥雷里亚诺的母亲。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倾向于认为他是佩特拉·科特斯的儿子，尽管她只是记得那女人的一些丑闻。这一推测使两人内心因恐惧而纠结。

想到妻子竟是自己的姐妹，奥雷里亚诺心悸不已，便去了一趟神甫的住所，期望在那些潮湿又遭虫蛀的档案中找到有关自己身世的蛛丝马迹。最久远的受洗记录可以追溯到阿玛兰妲·布恩迪亚那里，她是在年轻时由尼卡诺尔·雷伊纳神甫施洗的，那也正是神甫凭借巧克力戏法四处证明上帝存在的时期。他甚至幻想自己可能是十七个奥雷里亚诺之一，在四册洗礼簿中遍查他们的出生记录，但受洗时间与他的年龄相比都太过久远。患关节炎的神甫躺在吊床上一直观察，见他迷失在血脉的迷宫，因犹疑而颤抖，不禁同情地问起他的名字。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他回答。

“这样的话你不必拼命找了，”神甫以确信无疑的口吻说道，“多年以前有条街叫这个名字，那时人们就形成了习惯，用街名给自己的孩子起名。”

奥雷里亚诺愤怒得浑身颤抖。

“哈！”他说，“这么说您也是不相信了。”

“不相信什么？”

“不相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发动了三十二场内战但全部失利，”奥雷里亚诺回答，“不相信军队包围人群并开枪杀掉三千工人，然后把死尸装上两百节车厢的火车丢进大海。”

神甫用怜悯的目光打量着他。

“噢，孩子，”他叹息道，“对我来说，只要能确定你我在这一刻的存在就够了。”

奥雷里亚诺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接受了篮中弃婴的说法，并非因为相信，而是因为能够借此脱离恐惧。随着产期的临近，两人渐渐变得仿佛一人，不分彼此，在那幢吹口气就会倒塌的房子里的孤寂中融为一体。他们退到一个仅能栖身的空间，从费尔南达的卧室，在那里他们得以享受情爱的静谧之美，到长廊的起点，在那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坐下来为即将降生的孩子缝制小靴子和小帽子，奥雷里亚诺则在一旁回复加泰罗尼亚智者偶尔的来信。家中其他地方已在毁灭的

重围中沦降。金银器作坊，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当年料理之下的原始而沉寂的王国，都已沉陷在一片家居密林的深处，没人胆敢涉险探入。在大自然吞噬之力的重围中，奥雷里亚诺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仍然栽种牛至与秋海棠，保卫自己用石灰圈出的领地，为永恒的人蚁之战挖出最后的战壕。长发久未梳理，清晨起来脸庞生出淤斑，腿上出现浮肿，当初饱含爱意如鼬鼠般的胴体也脱了形，阿玛兰妲·乌尔苏拉已不复当年带着一笼不幸的金丝雀和俯首帖耳的丈夫回家时的青春模样，但她依旧未改欢快的心境。“见鬼，”她常常笑着说，“谁能想到我们最后真变成野人啦！”她怀孕六个月时，一封明显不是加泰罗尼亚智者写来的信斩断了他们与外界的最后一线联系。信从巴塞罗那寄出，但信封上是用常规的蓝色墨水写就的公文字体，带着不祥邮件特有的无辜而漠然的气息。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正要拆开，奥雷里亚诺一把从她手中抢了过来。

“这一封不看了，”他说，“我不想知道里面说些什么。”

就像他预感的那样，加泰罗尼亚智者再没来过信。那封陌生人的信件无人拆阅，丢在费尔南达曾经遗忘结婚戒指的壁架上任凭蠹虫吞噬，被信中噩耗燃出的火焰焚烧渐渐成灰，与此同时那对孤独的情侣顶着末后的时光之潮逆流而上，这顽固的不祥时光枉费力气，未能将他们引向幻灭与遗忘的荒漠。奥雷里亚诺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觉察到了危险，最后几个月手挽着手，让那源自癫狂私情的小生命在忠贞爱情中孕育而成。夜里，两人相拥在床上，蚂蚁在月光下激增的响动，蠹虫搞破坏的轰鸣，杂草在邻近房间里持续而清晰的生长之声都无法令他们产生惧意。许多次两人被鬼魂的忙碌声吵醒。他们听到乌尔苏拉为了使血脉流传与造化法则抗争，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探索伟大发明的神奇原理，费尔南达忙于祈祷，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战争的幻象和打制小金鱼的辛劳中日渐木然，奥雷里亚诺第二在狂乱的欢宴中深感孤独苦苦挣扎，便明白生前的执念能够战胜死亡，于是重又欢欣鼓舞，确信他们变成鬼魂后还会继续相爱，确

信即使有朝一日蚂蚁从人类手中夺取的这座破败乐园又被其他物种夺走，那时他们仍会一直相爱下去。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六点，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迎来了产前的阵痛。那位一脸微笑、为卖身糊口的女孩们接生的产婆，让她躺上饭厅的餐桌，跨坐在她的腹部，粗暴地摆弄直到她的尖叫被一个巨大男婴的洪亮哭声压过。透过朦胧泪眼，阿玛兰妲·乌尔苏拉看到又一个真正的布恩迪亚，如同所有的何塞·阿尔卡蒂奥一般粗壮任性，如同所有的奥雷里亚诺一般大睁着洞察一切的双眼，注定要从头更新家族的血脉，涤除其中顽固的恶习和孤独的天性，因为他是一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在爱情中孕育的生命。

“完全是个野人样，”她说，“叫他罗德里戈吧。”

“不，”她丈夫表示反对，“要叫他奥雷里亚诺，他会打赢三十二场战争。”

剪断脐带后，由奥雷里亚诺举着灯，产婆用布擦去孩子身上的淡蓝色黏浆。直到把他翻过身来，他们才发现他比其他人多了些什么，于是弯下腰去仔细查看。那是条猪尾巴。

他们并没有慌乱。奥雷里亚诺和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未曾听闻家族中的先例，也没能想起乌尔苏拉可怕的警告，产婆最后还安慰他们，估计等孩子换牙的时候就可以把这条多余的尾巴顺便切掉。后来他们便无暇顾及这个问题，因为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下身血如泉涌，无法止住。他们试图用蛛网和厚厚的尘土敷上止血，却像用手捂住喷泉一样徒劳。最初的几个小时，她努力保持乐观。她握着惊恐的奥雷里亚诺的手，请他不要担心，说像她这样的人只有想死的时候才会死去，同时还为产婆各种耸人听闻的止血方法大笑不已。然而随着希望一点一滴弃奥雷里亚诺而去，眼前的她渐渐模糊仿佛在光线中慢慢消失，最终陷入昏睡。星期一清晨，他们请来一个女人在床前念诵对人类和动物一向灵验的止血咒，但爱情之外的任何方法面对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激情澎湃的血液都无能为力。经过绝望的二十四小时，当天

下午当那泉源无助地耗尽，他们知道她已经死亡。她的侧影更加线条分明，脸上淤肿散尽显出雪花石膏般的光晕，并且重又露出了笑容。

奥雷里亚诺这时才明白自己多么爱他的朋友，多么需要他们，多么想在此时此刻有他们的陪伴。他把孩子放进他母亲预备好的篮子，用毯子盖住死者的脸庞，然后跑到市镇上漫无方向地游荡，寻找回到往昔的途径。他来到最近一阵未曾拜访的药房前叫门，发现那里变成了一家木匠作坊。提灯为他开门的老妇人对他的胡言乱语表示同情，但同时一口咬定，这里从没有过什么药房，她也从不认识一个脖颈纤细、眼神迷离，名叫梅尔塞德斯的姑娘。他来到加泰罗尼亚智者的书店旧址，一头抵在门上放声痛哭，心中明白这迟来的眼泪是为那桩死丧而流，当时没有哭泣是不愿破坏相爱的美好。他捶打着“金童”乐园的灰泥墙直到双手俱裂，呼唤着庇拉尔·特尔内拉。空中有发光的橙色圆盘飞过，他在过去无数个欢闹的夜晚曾经从养着石鸻的院中像孩子般着迷地仰头观看，此时却无动于衷。花街柳巷最后一家营业的舞厅里，手风琴乐队弹唱起主教的侄子，好汉弗朗西斯科的绝艺传人拉斐尔·埃斯卡洛纳的歌曲。店主曾对自己的母亲不敬，出手向她动粗，结果落得一只手臂萎缩，他邀请奥雷里亚诺喝了瓶烧酒，奥雷里亚诺也请他喝了一瓶。店主对他讲起自己手臂的不幸遭遇，奥雷里亚诺对他讲起自己心灵的不幸遭遇：因为对自己的姐妹倾心而落得枯焦。最后，两人齐声痛哭起来，奥雷里亚诺一时间感到痛苦已经结束。然而，当他在马孔多的最后一个清晨再次变成独身一人，他站在广场中央大张双臂，仿佛要唤醒整个世界一样声嘶力竭地吼道：

“什么朋友，都是婊子养的！”

尼格罗曼妲把他从一摊泪水与呕吐物当中救了出来。她将他带回自己的房间，为他清洗干净，让他喝下热汤。她又用炭条涂掉了他到如今一直欠着的无数爱情债务，认为这能让他开心些，还主动追忆起自己最孤单时的悲伤，以免他独自哀恸。天亮的时候，奥雷里亚诺从短暂的沉睡中醒来，重又感到头痛欲裂。他睁开眼睛，想起了孩子。

孩子不在篮子里。最初一瞬喜悦的火花在他心头闪过，他以为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死而复活来照料孩子了。但尸体分明仍在毯子下隆起如一堆石头。奥雷里亚诺想起进家时卧室门正敞开着，便穿过弥漫着清晨牛至芳香的长廊，探身向饭厅里望去，那里仍是分娩时的一片狼藉：大锅，染血的床单，灰盆，留在桌上摊开的尿布里萎缩的脐带，剪刀和渔线丢在一旁。产婆夜间过来抱走了孩子，这想法使他终于能够喘口气思考片刻。他倒在摇椅上，在家族早年的日子里丽贝卡曾坐在上面传授刺绣技法，阿玛兰妲曾坐在上面与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下跳棋，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曾坐在上面缝制婴儿衣物。在一道清醒的电光中，他意识到自己的心灵承载不起这么多往事的重负。他被自己和他人的回忆纠缠如同致命的长矛刺穿心房，不禁羡慕凋零玫瑰间横斜的蛛网如此沉着，杂草毒麦如此坚忍，二月清晨的明亮空气如此从容。这时他看见了孩子。那孩子只剩下一张肿胀干瘪的皮，全世界的蚂蚁一齐出动，正沿着花园的石子路努力把他拖回巢去。奥雷里亚诺僵在原地，不仅仅因为惊恐而动弹不得，更因为在那神奇的一瞬梅尔基亚德斯终极的密码向他显明了意义。他看到羊皮卷卷首的提要在尘世时空中完美显现：家族的第一个人被捆在树上，最后一个人正被蚂蚁吃掉。

奥雷里亚诺平生从未像此刻一般清醒，他忘却了家中的死者，忘却了死者的痛苦，用费尔南达留下的十字木条再次钉死门窗，远离世间一切干扰，因为他知道梅尔基亚德斯的羊皮卷上记载着自己的命运。他发现史前的植物、湿气蒸腾的水洼、发光的昆虫已将房间内一切人类踪迹消除净尽，但羊皮卷仍安然无恙。他顾不得拿到光亮处，就站在原地，仿佛那是用卡斯蒂利亚语写就，仿佛他正站在正午明亮的光线下阅读，开始毫不费力地大声破译。那是他家族的历史，连最琐碎的细节也无一遗漏，百年前由梅尔基亚德斯预先写出。他以自己的母语梵文书写，偶数行套用奥古斯都大帝的私人密码，奇数行择取斯巴达的军用密码。而最后一道防线，奥雷里亚诺在迷上阿玛兰妲·

乌尔苏拉时就已隐隐猜到，那便是梅尔基亚德斯并未按照世人的惯常时间来叙述，而是将一个世纪的日常琐碎集中在一起，令所有事件在同一瞬间发生。奥雷里亚诺为这一发现激动不已，逐字逐句高声朗读教皇谕令般的诗行，当年阿尔卡蒂奥曾从梅尔基亚德斯口中听闻，却不知道那是关于自己死亡的预告。他读到羊皮卷中预言世上最美的女人的诞生，她的灵魂与肉身正一起向天飞升；他读到那对遗腹孪生子的来历，他们放弃破译羊皮卷不仅因为缺乏才能和毅力，更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读到这里，奥雷里亚诺急于知道自己的身世，跳过几页。此时微风初起，风中充盈着过往的群声喊喳，旧日天竺葵的呢喃，无法排遣的怀念来临之前的失望叹息。他对此毫无察觉，因为他发现了关于自己身世的初步线索。他读到一位好色的祖父一时迷了心窍穿越幻象丛生的荒野，寻找一个不会令他幸福的美女。奥雷里亚诺认出了他，沿着亲缘的隐秘小径追寻下去，找到了自己被赋予生命的一刻，那是在一间昏暗的浴室里，蝎子和黄蝴蝶的环绕间，一个工匠在一个因反叛家庭而委身于他的少女身上满足了欲望。他读得如此入神，仍未发觉风势又起，飓风刮落了门窗，掀掉了东面长廊的屋顶，拔出了房屋的地基。到这时，他才发现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不是他的姐妹，而是他的姨妈，而当年弗朗西斯·德雷克袭击里奥阿查不过是为了促成他们俩在繁复错综的血脉迷宫中彼此寻找，直到孕育出那个注定要终结整个家族的神话般的生物。当马孔多在《圣经》所载那种龙卷风的怒号中化作可怕的瓦砾与尘埃旋涡时，奥雷里亚诺为避免在熟知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又跳过十一页，开始破译他正度过的这一刻，译出的内容恰是他当下的经历，预言他正在破解羊皮卷的最后一页，宛如他正在会言语的镜中照影。他再次跳读去寻索自己死亡的日期和情形，但没等看到最后一行便已明白自己不会再走出这房间，因为可以预料这座镜子之城——或蜃景之城——将在奥雷里亚诺·巴比伦全部译出羊皮卷之时被飓风抹去，从世人记忆中根除，羊皮卷上所载一

切自永远至永远不会再重复，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

---

①原文为加泰罗尼亚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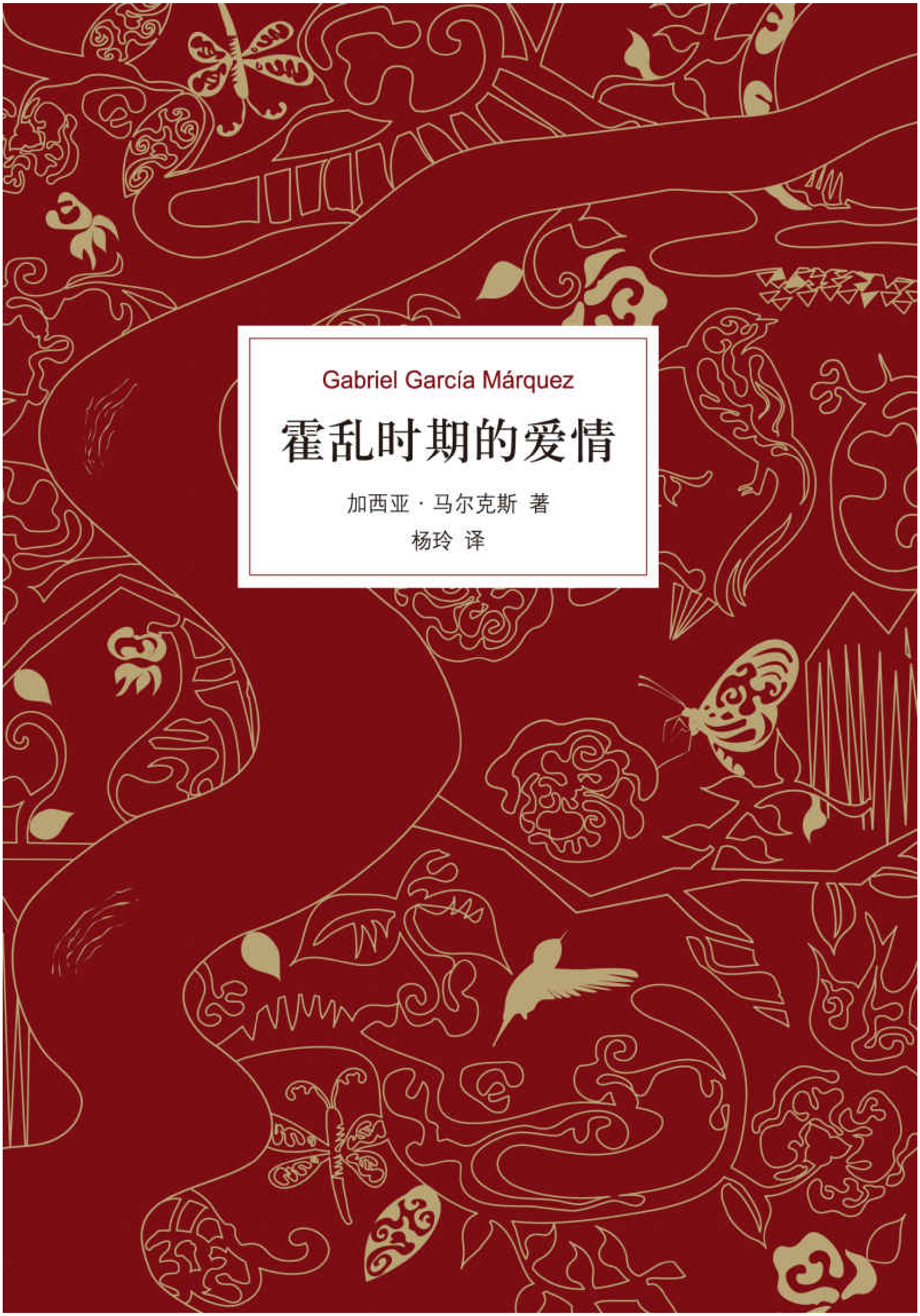
②罗卡玛杜（Rocamadour），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笔下的人物，见《跳房子》第28章。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霍乱时期的爱情

加西亚 · 马尔克斯 著

杨玲 译



加西亚 · 马尔克斯 著
杨玲 译

霍乱时期的爱情

南海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霍乱时期的爱情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译者：杨玲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5-06

ISBN：9787544277617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正文

自然，此书献给梅塞德斯

这些地方走在众人之前，它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花冠女神。

——莱昂德罗·迪亚斯[1]

---

[1] 莱昂德罗·迪亚斯（1928— ），哥伦比亚盲人音乐家。

不可避免，苦杏仁的气味总是让他想起爱情受阻后的命运。刚一走进还处在昏暗之中的房间，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就察觉出这种味道。他来这里是为了处理一桩紧急事件，但从很多年前开始，这类事件在他看来就算不上紧急了。来自安的列斯群岛的流亡者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曾在战争中致残，是儿童摄影师，也是医生交情最深的象棋对手，此刻已靠氰化金的烟雾从回忆的痛苦中解脱了。

医生看到死者身上盖着一条毯子，躺在他生前一直睡的那张行军床上。旁边的凳子上放着用来蒸发毒药的小桶。地上躺着一条胸脯雪白的黑色大丹犬，被拴在行军床的床脚。狗的尸体边是一副拐杖。闷热而杂乱的房间，既是卧室也是工作室，此刻，随着晨曦从打开的窗子照进来，才开始有了一丝光亮。但只这一丝，已足以让人即刻感觉到死亡的震慑力。另外几扇窗子和房间的所有缝隙，不是被破布遮得严严实实，就是被黑色的纸板封了起来，这更加重了压抑的气氛。一张大桌上，堆满了没有标签的瓶瓶罐罐。两只已经掉皮的白镴小桶，笼在一盏红纸罩的普通聚光灯下。尸体旁边的那第三只桶则是用来装定影液的。到处都是旧杂志和报纸，还有一摞摞夹在两块玻璃片之间的底片，家具也破败不堪，但所有这些都被一双勤劳的手收拾得一尘不染。尽管窗外吹来的凉风使空气变得清新了一些，但熟悉的人仍旧能够闻到苦杏仁的气息中那种不幸爱情的温热余味。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曾不止一次地在无意中想过，这里并不是蒙上帝恩召而死去的合适场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最终揣摩到，或许这里的混乱无章，也正是遵从了全能上帝的秘密旨意。

一名警官带着一个正在市诊所进行法医实习的年轻学生，已先行赶到这里。正是他们，在乌尔比诺医生到来之前，打开窗子通风，并把尸体遮盖起来。两人庄严地向医生致意。这一次，这庄严中的哀悼之意多过崇敬之情，因为无人不知医生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之间的深厚友谊。德高望重的医生和两人握了握手，就像一直以来，他在每天的普通临床课前都会和每一位学生握手一样。接着，他用食指和拇指肚像拈起一枝鲜花似的掀开毯子的边缘，以一种神圣的稳重，一寸一寸地让尸体显露出来。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浑身赤裸，躯体僵硬而扭曲，两只眼睁着，肤色发蓝，仿佛比前一晚老了五十岁。他瞳孔透明，须发泛黄，肚皮上横着一道旧伤痕，还留有很多缝合时打的结。由于拄着双拐行动十分吃力，他的躯干和手臂就像划船的苦役犯一样粗壮有力，而他那无力的双腿却像孤儿的两条细腿似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注视了尸体片刻，内心感到一阵刺痛，在与死神做着徒劳抗争的漫长岁月中，他还极少有这样的感触。

“可怜的傻瓜，”他对死者说，“最糟的事总算结束了。”

他盖上毯子，又恢复了学院派的高傲神情。去年，他刚刚为自己的八十大寿举行了三天的正式庆典。在答谢辞中，他再次抵制了退休的诱惑。他说：“等我死了，有的是时间休息，但这种不虞之变还没有列入我的计划当中。”尽管右耳越来越不中用，也尽管他得靠一根银柄手杖来掩饰自己蹒跚的步履，但他的穿着依旧像年轻时一样考究：亚麻套装，怀表的金链挂在背心上。他的巴斯德式胡子是珍珠母色的，头发也是，梳理得服服帖帖，分出一道清晰的中缝，这两样是他性格最忠实的体现。对于越来越令他不安的记忆力衰退，他通过随时随地在零散的小纸片上快速记录来做弥补，可最后，各个口袋都装满了混在一起的纸片，难以分辨，就像那些工具、小药瓶以及别的东西在他

那塞得满满的手提箱里乱作一团一样。他不仅是城中最年长、声望最高的医生，也是全城最讲究风度的人。然而，他那锋芒毕露的智慧以及过于世故地动用自己大名的方式，却让他没能得到应有的爱戴。

他给警官和实习生下的指示明确而迅速。不必解剖验尸。房里的气味足以确定，死因是小桶中某种照相用酸液引起的氰化物挥发，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对这些事十分清楚，所以绝不可能是意外事故。面对警官的犹疑，他用自己典型的方式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您别忘了，在死亡证明上签字的是我。"年轻的医生非常失望：他还从来没有机会在尸体上研究氰化金的作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惊讶于自己竟从未在医学院见过这个学生，但那动不动就脸红的样子和安第斯口音立刻便使他明白了：也许这年轻人才刚刚来到这座城市。他说："要不了几天，这里的某个爱情疯子就会给您提供这样的机会。"话一出口，他这才意识到在自己所记得的数不清的自杀事件中，这还是第一起不是因爱情的不幸而使用氰化物的。于是，他一贯的口吻有了一丝改变。

"到时候好好留意，"他对实习生说道，"死者的心脏里通常会有金属颗粒。"

接着，他就像对下属说话似的同警官交谈起来。他命令警官绕过一切程序，以便葬礼能在当天下午举行，而且要尽可能秘密地举行。他说："稍后我会去和市长说。"他知道，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是个极端俭省的人，生活近乎原始化，他靠手艺挣来的钱远远超过他的生活所需，因此，在房间的某个抽屉，想必会有绰绰有余的存款来支付安葬的费用。

"没找到也没关系。"他说，"全部费用由我承担。"

他让警官告诉报界，摄影师是自然死亡，尽管他相信这消息根本不会引起记者们的丝毫兴趣。他说：“如果有必要，我会去和省长说。”警官是个严肃而谦卑的公务人员，知道医生对公事向来一丝不苟，有时甚至因此激怒最亲近的朋友，所以很惊讶他竟会如此轻率地为了加快安葬进程而跳过法律手续。他唯一不愿做的，便是去和大主教商量，让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葬在圣地。警官对自己的失礼有些后悔，试图做出解释。

“我知道，他是一位圣人。”

“更为罕见的是，”乌尔比诺医生说，“他是一位无神论的圣人。但这些就是上帝的事了。”

远处，在这座曾经的殖民城市的另一端，教堂里响起了召集人们去望大弥撒的钟声。乌尔比诺医生戴上半月形的金丝眼镜，看了看挂在金链上的怀表——方形的怀表做工精致，盖子是靠弹簧打开的——再不走就要错过圣神降临节的弥撒了。

客厅里有一架底座带轮子的巨型照相机，就像公园里用的那种。幕布上用手工作坊的颜料画着黄昏海景。墙上挂满了孩子的照片，拍的是各种值得纪念的时刻：第一次领圣体，戴兔子面具，幸福的生日。年复一年，乌尔比诺医生就在这里，在下午全神贯注的棋局中，看着墙壁逐渐被照片覆盖。有很多次他都心痛地想，在这个由一张张不经意间拍下的照片组成的画廊里，就孕育着这座城市的未来：它将由那些性格不定的孩子们统治，并最终被他们毁灭，连一丝昔日荣耀的灰烬也不复存在。

写字台上，一个装了几支水手烟斗的罐子旁边，是一盘还没下完的棋。尽管乌尔比诺医生急于离开，而且心情阴郁，但还是抵不住对这盘残局研究一番的诱惑。他知道这一定是前一晚留下来的，因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每天黄昏都下棋，而且每星期至少跟三个不同的人对弈，但他一向都会把棋下完，然后把棋盘和棋子收进盒子，放进写字台的一个抽屉。医生知道他惯执白子，而这一局，白棋在四步以内必输无疑。“如果真是谋杀，这里面一定有不错的线索。”他自言自语道，“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一个能布下如此精妙的埋伏。”为何这位向来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从不屈服的战士，竟没有完成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战斗？若不调查清楚，他简直会活不下去。

早晨六点，巡夜人在做最后一圈巡逻时，看见钉在临街大门上的一块牌子上写着：*请进，无需敲门，并请通知警察*。很快，警官和实习生就赶来了。两人把房子搜查了一遍，试图在无可置疑的苦杏仁味之外寻找由其他原因致死的证据。就在医生驻足分析那盘未下完的棋局的短短几分钟里，警官在写字台上的纸堆中发现了一封写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信。信封被厚厚的火漆封得严严实实，为取出信，不得不撕烂信封。为了让屋里的光线亮一点儿，医生拉开黑色的窗帘，先飞快地扫了一眼这沓工工整整写满了正反两面的十一页纸。而当他开始读第一段时，就明白自己肯定赶不上圣神降临弥撒的圣餐了。他读着信，激动得气喘吁吁，时而为找回中断的头绪往回翻上几页。等读完后，他看上去就好像刚刚从很远的地方、花了很长的时间回来似的。尽管努力克制，但他的沮丧显而易见：嘴唇发蓝，一如尸体的颜色；而把信折起来放进背心口袋时，他也无法控制手指的颤抖。这时，他才又想起身边的警官和年轻的医生来，透过一片沉痛的迷雾，他冲他们笑了笑。

“没什么特别的。”他说，“不过是他最后的一些嘱托。”

这只是一半的真相，但他们却把它当作事实的全部接受了，因为他们按医生的指令揭开一块地砖，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一本陈年账簿，上面记着保险箱的密码。死者的钱虽没有他们想象的多，但也足够应付葬礼并结清一些小额账目。这时，乌尔比诺医生意识到，在神甫宣讲福音之前，自己也无法赶到教堂了。

“自我懂事以来，这还是第三次错过星期日弥撒。”他说，“但上帝会原谅我的。”

尽管他几乎按捺不住想与妻子分享信中秘密的急迫心情，但还是宁愿再耽搁几分钟，把细枝末节安排妥当。他答应去通知城里为数众多的加勒比流亡者，因为或许他们会想向这样一位最受人尊敬、最活跃、也最激进的人表达最后的敬意，尽管很显然，他最终还是向令人绝望的坎坷屈服了。他还会去通知死者的棋友，无论是杰出的专业棋手还是无名小卒，另外，也会通知其他一些和死者交往不那么频繁但也可能想参加葬礼的朋友。在看那封遗书之前，他本决定要做主事的第一人，但读过信后，他什么也不敢确定了。不过不管怎样，他还是要送一个栀子花的花圈，因为也许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在最后一刻表达了悔意。葬礼安排在下午五点，在炎热的季节，这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如果有事找他，他从中午十二点起就会一直待在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的乡间别墅，他这位爱徒那天将举办豪华午宴以庆祝自己从医二十五周年。

自从度过最初艰苦奋斗的岁月，赢得了全省无人能及的尊敬和名望，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便过起了规律的生活，每日的行踪都有律可循。他每早鸡鸣即起，并从那一刻开始服用一些秘方：溴化钾以提

神醒脑，水杨酸盐以缓解阴雨天的骨痛，几滴黑麦角汁以克制眩晕，颠茄以保证良好睡眠。他在不同时刻服用不同药物，而且总是背着人偷偷服下，因为在漫长的医生和教师生涯中，他向来反对为人开具延缓衰老的药方：对他来说，忍受别人的病痛要比忍受自己的容易得多。他的兜里总是带着一小包樟脑，没人看见时便取出来深吸上一口，以消除那么多药物混在一起带来的恐惧。

他会先在书房里待上一个小时，为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早八点在医学院讲授的普通临床课备课，这门课他一直教到了去世前一天。他也是文学新作的忠实读者，他在巴黎的书商会把书邮寄给他，本地书商也会为他从巴塞罗那订购，尽管他并没有像关注法语文学那样关注西班牙语文学。但不管怎样，他从不在早晨阅读文学，而是在午睡后读上一小时，晚上睡觉前再读一会儿。备完课，他在浴室里对着敞开的窗子，做十五分钟呼吸运动，冲着鸡鸣的方向吸进呼出，因为那边空气清新。然后，他洗澡，整理胡子，在正宗法里纳·赫赫努贝古龙水的香味中为胡子上胶，接着，穿上白色亚麻套装，搭配背心和软帽，以及一双鞣制的软山羊皮靴。八十一岁的他仍旧保持着温文尔雅的风度和振奋的精神，一如当年大霍乱后不久他刚从巴黎回来时的样子。他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梳得十分整齐，就和年轻时一样，只不过颜色变成了金属色。他在家中用早餐，但食谱是单独的：一杯用以养胃的大苦艾花茶，外加一头大蒜，一瓣一瓣地掰下来，就着面包有意识地细细咀嚼，以预防心脏衰竭。上完课，他很少没有活动，要么去践行市民的参与精神，要么去尽教会中的义务，再不就是与他的艺术和社会革新事业有关。

他几乎总是在家中吃午餐，然后坐在院子的露台上午睡十分钟。睡梦中，他听见女仆们在枝繁叶茂的芒果树下唱歌，听着街上的叫卖

声，以及海湾里燃油机和马达发出的轰鸣声——炎热的下午，它们排出的废气在整座房中弥漫，就像一个被判腐烂而死的天使在扑腾翅膀。之后，他会花一个小时阅读新书，特别是小说和历史书籍。然后，他给家里养的鹦鹉上法语和声乐课，这只鹦鹉从很多年前起就是当地的一道风景。四点钟，他喝下一大杯加冰柠檬水后，就出门去看望病人。虽然上了年纪，他还是坚持不在诊所接诊，而是继续到病人家里出诊。自从城市建设得越来越方便，人们可以步行到达城中的任何地方以来，他就一直这样做。

他第一次从欧洲回来时，是用家中那辆由两匹泛着金光的枣红马拉的四轮马车代步。后来车坏了，他便改用一辆单匹马拉的敞篷车。后来，马车开始从世界上消失，城中也仅剩下几辆以供游客观光或在葬礼上运送花圈，他却仍旧带着某种对时尚的轻蔑，继续使用这辆马车。尽管拒绝退休，但他心里很清楚，现在人们只在基本上已无力回天的情况下才请他前往，不过他认为这也是一种专业的体现。只需看一眼病人的气色，他便知道病情如何。他越来越不相信特效药，而眼瞅着外科手术得到推广，他感到非常不安。他常说："手术刀是药物无效的最有力证明。"他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所有药物都具有毒性，而百分之七十的日常食物也会加速死亡。"事实上，"他常在课堂上说，"只有少数医生真正了解为数不多的几种药物。"他从年轻时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他自己所谓的宿命论的人道主义者："每个人都是自己死亡的主宰者，时间一到，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助他们没有恐惧和痛苦地死去。"尽管拥有这些极端思想（它们甚至都已成为当地民间医学传说的一部分了），但他昔日的学生即便已经开了自己的诊所，也还是会来向他请教，因为他们视他为当时人们所谓的那种具有"诊断慧眼"的人。总而言之，他一直是位收费昂贵、出类拔萃的医生，病人都集中在总督区的名门望族。

他每天的工作井井有条，所以在下午出诊期间，如果出现什么紧急事件，他的妻子向来知道该往哪儿给他捎口信。年轻时，他回家前总会在教区咖啡馆逗留一会儿，他的象棋技艺就是在那里同岳父的狐朋狗友以及几个加勒比流亡者一起精进的。但从新世纪伊始，他便不再去教区咖啡馆了，而是试图组织由社交俱乐部赞助的全国性比赛。而正是在这个时期，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来了，那时他双膝已经坏死，还不是儿童摄影师，但不到三个月时间，所有只要会在棋盘上摆弄个一兵半卒的人全都认识了他，因为根本没人能下赢他一盘棋。对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来说，这是一次奇迹般的相识，因为那时的他已无法自拔地迷上了象棋，而能使他满意的对手却没有几个了。

多亏了医生，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才成为这里的一员。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成了他无条件的保护人和一切事务的担保者，甚至都没去调查一下他是个怎样的人，以前是做什么的，究竟在怎样一场不名誉的战争中流落成这副残废而茫然的模样。最后，医生借钱给他开了一家照相馆，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自从为第一个被镁光灯的闪光吓了一跳的孩子拍照以来，像编制绳索般严谨地还清了最后一分钱。

这一切都是因为象棋。起初，他们从晚餐后的七点钟开始下，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棋艺明显更胜一筹，所以他合理地让给医生几步。但让得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一步不让。后来，加利略·达孔特开了第一家电影院，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成了那里最准时的观众之一，二人的对弈便被挤到没有电影首映的夜晚。那时，他已成为医生的挚友，医生甚至心甘情愿地陪他去看电影。但医生从不带妻子，一方面是因为妻子没有耐心跟随复杂的情节线索，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仅凭敏锐的嗅觉，便能感觉到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都绝非一个好伙伴。

唯一与平时安排不同的是星期日。他会到教堂去望大弥撒，然后回家，一整天都在院子的露台上休息、读书。若非极端紧急的情况，安息日他很少出诊，而且从很多年前起，除非迫不得已，他也不再在安息日参加社交活动。但在这个圣神降临节，出于意外巧合，两件罕有的事赶在了一起：朋友之死和得意门生从医二十五周年纪念。然而，他并没有像自己预计的那样，签署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死亡证明后就直接回家，而是听任了好奇心的驱使。

一上马车，他便迫不及待地又看了一遍那封遗书。接着，他命令车夫带他前往奴隶老区的一个偏僻地址。这个决定与他平日里的习惯迥然不同，以至于车夫不得不确认自己是否听错了。确实没错：地址很清楚，而且，写下这个地址的人有充足的理由对它再熟悉不过了。乌尔比诺医生又翻回到遗书的第一页，再次沉浸在信中披露的那段不堪回首的秘密往事之中。倘若他能让自己相信，这些并非一个将死之人的胡言乱语，那么，尽管到了这把年纪，生活也还是有可能因此改变。

从一大早开始，天空就没有好心情，阴云密布，透出阵阵凉意，但好在中午之前还没有下雨的危险。车夫试着抄近道，拐进了这座殖民城市崎岖的石子路。有好几次，为了不让马儿受惊，他们不得不停下车，因为从圣神降临节的庆祝活动中归来的学生和宗教团体造成了一片混乱。街道被纸花环、音乐和鲜花填满了，还有撑着各色阳伞、身穿荷叶边薄纱裙、站在阳台上观礼的姑娘们。在大教堂广场上，解放者的雕像被淹没在非洲棕榈树和崭新的球形路灯之中，几乎已经辨认不出。教堂的出口处堵满了汽车，庄严而又喧闹的教区咖啡馆里连一个空位也没剩下。那里唯一的一辆马车便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和城中屈指可数的那几辆剩余的马车区别明显：它的漆皮顶棚总

是闪闪发亮，把手等装饰物也都是铜制的，以防被硝腐蚀，轮子和车辕则都漆成了红色，还镶着金边，仿佛在参加维也纳歌剧院的盛装演出一般。此外，那个时候就连那些最喜欢装模作样的家庭都已经允许司机穿上干净的衬衫，可他却仍旧要求自己的车夫身穿软塌塌的丝绒制服，头戴马戏团驯兽师那般的礼帽，这种做法不仅让人觉得不合潮流，而且在加勒比地区的酷暑季节，显得尤为缺乏怜悯之心。

尽管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对这座城市的热爱近乎疯狂，也尽管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它，但他很少有机会像那个星期日那样毫无顾忌地来到这片喧嚷的奴隶老区探险。车夫绕了很多圈，打听了一次又一次才找到地址。乌尔比诺医生也终于切近地体会到泥沼的阴郁可怕，它那不祥的寂静，以及那令人窒息的恶臭，这种气味曾在无数个不眠的清晨，混着院中的茉莉花香飘进他的卧室，而他却总觉得它就像昨日的一阵风一样转瞬即逝，和他的生活没有半点关联。然而，当马车在街道的泥泞中颠簸，几只兀鹫争夺着被海水裹挟的屠宰场残渣时，那种曾无数次被他的思乡情怀美化了的恶臭变成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现实。与总督区的石砌房屋不同，这里的房子都是由褪色的朽木和锌皮屋顶盖成，而且大部分建在木桩上，以免西班牙人遗留下来的那些露天污水沟里的臭水漫到屋里来。一切都显得凄凉无助，可那一间间肮脏的小酒馆里却传来震耳欲聋的鼓乐声，那是穷人的狂欢，既无涉上帝，也无涉圣神降临节的诫命[1]。等他们终于找到地方，马车后面已经跟了一群光着身子的小孩，他们哄笑着车夫戏剧式的装扮，迫使他不得不用鞭子吓跑他们。本打算做一次私密拜访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此刻为时过晚地领悟到，没有哪一种天真比他这个年龄的天真更危险了。

这是一座没有门牌号的房子，从外表看，除了镶花边的窗帘和一扇从某座古老教堂里卸下来的大门，其余并没有什么能把它和其他更为破败的房子区别开来。车夫叩了叩门环，确认地址正确后才扶医生下车。大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门里的昏暗处站着一个妇人，全身上下穿着丧服，耳边别着一枝玫瑰。这是个黑白混血女人，年纪不下四十，但身材依旧高挑，金色的眼睛有些冷酷，头发紧紧地贴在头上，仿佛戴着一个棉制头盔。乌尔比诺医生没能认出她来，尽管在摄影师的工作室里，他曾在那些云山雾罩的棋局间见过她几次，有一次甚至还给她开过几服医治间日热的奎宁药方。他向她伸出手，而她用双手握住，但与其说是为了向他表示问候，倒不如说是为了扶他走进屋子。客厅里的氛围让人仿佛置身于一片看不见的树林，到处是鸟语花香，摆满了精致的家具和器物，每一件东西都在它应在的位置。乌尔比诺医生由此毫无感伤地想起了上世纪一个秋日的星期一，他所经过的那爿坐落在巴黎蒙马特大街二十六号的古董商小店。女人在他的对面坐下来，开始用不流利的卡斯蒂利亚语[2]和他交谈。

“医生，您把这儿当成家里就行。”她说，“我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来了。”

乌尔比诺医生瞬间感到自己的意图暴露无遗。他用心打量了女人一番，注意到她一身素孝，以及她悲痛中的不卑不亢。于是，他明白了，这次拜访早已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对于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在遗书中所提到和指明的一切，她比他知道得更多。的确如此。她一直陪伴着他，直到他死前几个小时，一如她半生都怀着仰慕和谦卑的温柔陪伴着他一样。这种情感几乎与爱情无异，但在这座连国家机密都处于众人掌控之中的昏睡省城，竟然无人知晓。他们是在太子港的一家慈善医院认识的，她在那里出生，而他在那里度过了最初的流亡岁

月。她比他晚一年来到这座城市，声称是短期拜访，但二人心照不宣，都明白她是要永远地留下。她每星期打扫整理一次他的工作室，可就连那些最爱捕风捉影的邻居都混淆了表象与真实，因为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都以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残疾不仅仅是无法走路。甚至连乌尔比诺医生也从医学的角度合理地做出了这样的推测。要不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自己在信中吐露了实情，医生永远也不会相信他竟会有一个女人。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很难理解，两个没有过往包袱的自由的成年人，并且处在这个封闭社会的偏见之外，却像那些禁忌之爱一样选择了这样一种飘忽不定的方式。对此她解释说："他就喜欢这样。"况且，同这个始终也不曾完全属于她的男人分享这份秘密恋情，加之两人都不止一次地从中享受到那种瞬间爆发的喜悦，这在她看来并不是一种难以接受的方式，恰恰相反：生活已然向她证明，这或许倒是一种典范。

前一晚他们还去了电影院，各付各的账，座位也是分开的。自从那个意大利移民加利略·达孔特在一座十七世纪的修道院废墟上建起了露天电影院，他们每个月都至少像这样去两次。那晚，他们看的是《西线无战事》，一部由上一年流行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那本小说乌尔比诺医生也读过，并为书中战争的野蛮悲痛不已。之后，他们在工作室会合，她发现他心事重重，怅然若失，以为是电影中受伤的士兵在淤泥中垂死挣扎的残酷场面所致。她邀他下棋，借以分散他的注意力。而为了让她开心，他答应了，但下得心不在焉，当然，他还是用白子。最终，他比她先看出，再有四步自己就要输了，于是毫无颜面地投了降。这时，医生才明白，那最后一盘棋局的对手是她，而不是他之前猜想的赫罗尼莫·阿尔戈特将军。他惊奇地嘟囔了一句：

"那盘棋下得真是精妙！"

她坚持说，那并不是她的本事，而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被死亡的迷雾弄得晕头转向，移动棋子的时候心中已没有了爱。对弈中断时大约十一点一刻，因为公共舞会的音乐已经停止。他请求她让他单独静一静。他想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写封信。他一直把医生视作他所认识的最值得尊敬的人，而且，就像他常说的，尽管能将两人联系起来的不过是象棋这个嗜好，但医生是他真正能够交心的朋友。在他和医生看来，下棋与其说是一门学问，不如说是一种理性的对话。于是，她知道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已经走到了解脱的边缘，他的生命所剩下的不过是写一封信的时间。医生对此简直无法相信。

“这么说，您早就知道！”他惊呼道。

她证实说，她不仅早就知道，而且还曾怀着爱意帮他分担过这种垂死的痛苦，就像她也曾怀着同样的爱帮他发现幸福。因为他生命中最后十一个月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残酷的垂死挣扎。

“您的责任应该是把这件事通报给大家。”医生说。

“我不能这样做，”她有些震惊，“我太爱他了。”

自认为什么话都听过的乌尔比诺医生，却从未听谁说过这样的话，而且还说得如此坦荡。他全神贯注地直视着她，想把这一刻铭记心中：她就像一尊河神的雕像，眼睛如蛇眼一般，无所畏惧地裹在一袭黑衣之中，耳边别着玫瑰花。很久以前，在海地一片荒凉的沙滩上，两人做爱后赤裸地躺在那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突然感叹道：“我永远也不会变老。”她把这句话理解为他要与时间的劫掠进行殊死搏斗的英勇决心，但接下来他说得更为清楚直白：他决定，要在六十岁结束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他在这一年的一月二十三日刚刚年满六十。于是，他把圣神降临节的前一晚定为最后的期限，对于这座将自己奉献给圣神的城市来说，这是最大的节日。昨晚发生的事，没有一个细节是她事先不知道的。他们经常谈起它，一同承受着时间流逝的痛苦，可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阻止这不可逆转的岁月洪流。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以一种毫无意义的热情热爱着生活，他爱大海，爱爱情，爱他的狗，也爱她。随着死期临近，他越来越向绝望屈服，就仿佛他的死并不是当初由他自己决定的，而是无情的命运使然。

“昨晚，我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的时候，他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她曾想过把狗带走，但他看了看它在拐杖边瞌睡的样子，用指尖轻抚了它几下，说：“对不起，伍德罗·威尔逊先生得跟我在一起。”他写信时，让她把狗拴在行军床的床脚上，可她却系了个活扣，好让狗能够自己松脱。这是她对他唯一的一次不忠，但情有可原，因为她希望今后还能从狗那双冰冷的眼睛里忆起它的主人。乌尔比诺医生打断了她，告诉她狗最终没有挣脱。她说：“那就是它自己不想了。”随后，她又高兴起来，因为她宁愿如他请求的那样去纪念这位死去的恋人，昨晚，他写信时突然停下笔，最后看了她一眼，说：

“请用一枝玫瑰纪念我。”

她到家时，刚过半夜。她和衣躺在床上抽烟，不断用烟蒂点燃另一支香烟，以给他足够的时间写信，她知道，那一定是封又长又难写的信。快到三点时，街上的狗开始狂吠，她把用来煮咖啡的水放到火炉上，从上到下换上丧服，并在院中剪下清晨绽放的第一枝玫瑰。乌尔比诺医生早就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厌恶这个无可救药的女人的回忆，

他认为他自有他的理由：只有没有原则的人，才会从痛苦中得到满足。

拜访结束前，她又对医生讲了很多事。她不会去参加葬礼，因为她答应了自己的情人，尽管乌尔比诺医生认为，信中有一段话的意思正好相反。她不会流一滴眼泪，不会浪费自己的余生，在慢火煮炖的回忆的蛆肉汤中煎熬，不会把自己活活埋葬在四面墙壁之间，成日为自己缝制寿衣，尽管这是当地人乐见寡妇做的事情。她打算卖掉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房子：根据遗书上的安排，这座房子连同里面的一切从现在起都属于她了。之后，她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住在这座穷人等死的墓穴中，无怨无悔，因为在这里，她曾体验到幸福。

回家路上，这句话一直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耳边回响："穷人等死的墓穴。"这个评价绝非信口胡言。因为这座城市，他的城市，至今仍处在时代的边缘：它依旧是当初那座炎热干燥的城市，夜晚也仍旧充斥着那些让他觉得恐怖不已的事，但同时，也仍能让人感受到青春期那种孤独的快乐。在这里，鲜花会生锈，盐巴会腐烂。四个世纪以来，除了在凋谢的月桂树和腐臭的沼泽间慢慢衰老，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冬天，瞬间而至、席卷一切的暴雨使厕所里的污水漫溢，把街道变成令人作呕的泥塘。夏天，有一种看不见的灰尘，粗糙得就像烧红的白垩粉，被狂风一吹，便会从各个缝隙钻进屋里，堵得再严实也无济于事。此外，狂风还会掀开屋顶，把小孩抛向空中。星期六，那些黑白混血的穷人们会乱哄哄地离开用纸板和锌铜合金板搭建在沼泽边的棚屋，带着牲畜和吃饭饮水的家什，一窝蜂兴高采烈地去占领殖民区那布满岩石的海滩。直到前几年，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身上还带着真真正正的奴隶印记，那是用烧红的烙铁印在胸口的。整个周末，这些人都毫无节制地纵情跳舞，拼命用自家蒸馏酿制

的烧酒把自己灌得烂醉，在梅子丛中交欢。而到了星期日的半夜，他们会以一场血腥的群体争斗来结束自己的方丹戈舞。一周的其他几天，这群风风火火的人则混迹于老城区的广场和大街小巷，摆起小摊，做起各式各样的生意，为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注入一种散发着炸鱼味的集市的躁动：一种新的生活。

先是从西班牙的统治中取得独立，而后又废除了奴隶制，这些都加速了贵族的衰落，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便是在这种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昔日的显赫家族在他们撤消了守卫的城堡里渐渐归于沉寂。一条条铺着石砖的崎岖街道曾经那么有效地抵御了突然来袭的战争和登陆的海盗，而如今，杂草从阳台上沿街垂落，石灰和石块砌成的城墙裂开一道道缝隙，即便是最好的府邸也难逃衰败的厄运。下午两点，唯一有点儿生气的迹象，就是在午休的昏暗中传来的阵阵无精打采的钢琴练习声。府邸里，凉爽的卧室中弥漫着熏香的味道，女人们躲避着阳光，就像躲避某种令人不齿的传染病，就连在清晨的弥撒中，她们也用纱巾遮着脸。她们的爱情迟缓而艰难，常常被不祥的预兆干扰，生命对她们来说简直没完没了。傍晚，街上车水马龙，一大群嗜血的蚊子从沼泽中飞起，带着一股柔柔的人粪气味，温热而感伤，扰得灵魂深处泛起对死亡的坚信。

因此，这座殖民城市的所谓独特生活不过是记忆中的一种幻觉，年轻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每每在巴黎心生伤感之时，总是把它美化了。十八世纪，这座城市的商业在加勒比地区最为繁荣，尤其是靠着那项令人厌恶却又得天独厚的优势，即它是美洲最大的非洲奴隶市场。此外，它还是新格拉纳达王国总督的常驻地。总督们喜欢待在这里，面对大洋施行统治，而不是在遥远且天寒地冻的首都，那里的连绵阴雨会扰乱他们对现实的感知。在这座城市的辉煌时期，每年，满

载着波多西、基多和维拉克鲁斯各地财富的大帆船船队都会在这里的海湾聚集多次。一七〇八年六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点，圣何塞号大帆船载着当时价值五千亿比索的宝石和贵金属，刚刚起锚开往加的斯，就被英国舰队击沉在港口的入海处，漫长的两世纪后依旧没被打捞上来。这批躺在珊瑚丛中的珍宝，连同侧着身子漂浮在驾驶舱的船长尸体，常常被历史学家们提起，作为这座淹没在记忆之中的城市的象征。

在港湾另一边的拉曼加住宅区，坐落着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家，这里的一切仿佛属于另一个时代。房子又大又凉爽，只有一层，室外的露台上有着多利克式的柱廊，站在那儿可以将海湾里弥漫瘴气的水域和沉船残骸尽收眼底。从门口到厨房，铺的是象棋棋盘式的黑白相间的地砖——人们不止一次地将之归因于乌尔比诺医生的个人嗜好，却忘了这也是加泰罗尼亚建筑大师们的通病，而在本世纪初，这个地区暴发户的房子都是由他们建造的。大厅很宽敞，天花板像所有其他房间一样很高，还有六扇面向大街的落地窗。大厅和厨房之间，由一扇装饰繁复的巨大玻璃门隔开，上面雕着葡萄藤枝蔓和一串串的葡萄，铜制树林里，几个少女正陶醉在农牧神的笛声之中。主客厅中的所有家具，连同大厅里那座像个活岗哨的摆钟，全都是十九世纪末的正宗英国货。吊灯上装饰着水晶坠子，塞弗勒的瓷瓶、花瓶以及以情爱为主题的雪花石膏异教小雕塑也随处可见。不过，这种欧式风格在房子的其余地方就见不到了，那些空间混杂着藤制扶手椅、维也纳摇椅和当地手工制作的皮凳子。卧室里除了床，还有张精致的圣哈辛托吊床，上面用丝线绣着主人的名字，哥特式字体，两边还垂着彩色的流苏。饭厅一侧原本是设计用来举办豪华晚宴的，后来变成了一个小音乐厅，每逢有著名的演奏家来到此地，都会受邀来这里举行私人音乐会。地砖上铺着从巴黎世博会上买回来的土耳其地毯，为的是让

环境显得更加幽静。摆放整齐的唱片架旁是一台最新款的电唱机。角落里放着一架钢琴，上面盖着一块马尼拉披肩，乌尔比诺医生已经有很多年没弹琴了。整座房子里，随处可以看出一个脚踏实地的女人的精明与细心。

然而，没有一个地方能像书房那样尽显庄严与肃穆。在衰老将乌尔比诺医生掳获之前，那里曾是他的圣地。在父亲的胡桃木写字台和带皮制软垫的安乐椅四周，他让人用上釉的隔板架把墙壁连同窗子都挡得严严实实，然后以一种近乎癫狂的秩序，往上面整整齐齐地码放了三千册书，每一册都装裱着小牛皮，书脊上用烫金字印着书名的首字母缩写。其他房间都不得不忍受着港口的嘈杂和各种难闻的气味，书房却截然相反，永远弥漫着修道院的幽静气息。加勒比地区的人有一种迷信，以为打开门窗可以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凉爽引至屋内。在这里出生并长大的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妻子，起初也曾因门窗紧闭而感到压抑，但最终，他们还是采纳了罗马人抵御炎热的绝妙法子，即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八月紧闭门窗，不让街上炽热的空气钻进来，等到了晚上再全部敞开，让凉风入户。从那时起，他们家便成了拉曼加区炎炎烈日下最为凉爽的处所。先在卧室的昏暗中睡个午觉，然后下午坐在门廊上，望着来自新奥尔良的沉甸甸的灰色货船和带木制桨轮的内河船来来往往，简直是一种享受。一到黄昏，那些内河船便灯火通明，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将淤积在海湾里的垃圾卷走。每年的十二月到次年三月，北方的信风会肆意地掀开屋顶，夜里像饥饿的狼群一样在房子周围呼啸盘旋，寻找可以钻进来的缝隙。在这种时候，医生的家也是保护得最好的。从来没有人想过，安居在这样一座坚实牢固的房子里的夫妻，会有什么理由不幸福。

但不管怎样，那天早上乌尔比诺医生在十点之前回到家时，并没有感到幸福。两次拜访搅得他心烦意乱，还不仅仅是因为让他错过了圣神降临弥撒，而是在这样一个一切似乎都应该尘埃落定的年纪，它们险些把他变成另一个人。他本想在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的豪华午宴前凑合睡上一会儿，却赶上仆人们乱哄哄地在捉鹦鹉。那只鹦鹉趁着人们把它从鸟笼里抓出来修剪翅膀上的羽毛时，飞到了芒果树最高的枝杈上。这是一只毛羽稀疏且性情怪僻的鹦鹉，别人求它开口，它偏不说，而就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它却说个没完，而且表达得十分清楚明白，那种条理甚至在人类身上都难得一见。它是由乌尔比诺医生亲自训练的，这让它拥有了家中谁都没有的特权，就连医生的孩子们小时候都没有享受过。

它在这个家已待了二十多年，但谁也不知道这之前它还活过多少年。每天下午午觉醒来，乌尔比诺医生都与它为伴，坐在整个家中最凉爽的地方，院子的露台上。医生怀着教育家的热情，借助了最为艰辛的手段，一直训练到鹦鹉能把法语讲得像个学者一样好。之后，纯粹是出于对美德的癖好，他又教鹦鹉学会了拉丁弥撒中的伴唱和从《玛窦福音》[3]中挑出来的几段经文，甚至试图机械地向它灌输四则运算法则，可惜最终没有成功。他最后几回到欧洲旅行时，有一次带回了城中第一台带喇叭的留声机，还有许多流行唱片和他最喜欢的古典作曲家的唱片。接下来的几个月，他日复一日，一次又一次地让鹦鹉聆听上个世纪风靡一时的依维特·吉尔贝和阿里斯蒂德·布里昂的歌曲，直到鹦鹉最终把这些歌都背了下来。唱那位女歌手的歌，它用女人的嗓音，唱那位男歌手的歌，它则用男高音，最后，还用一阵放荡的笑声来收场，和女仆们听完它用法语演唱的歌曲后爆发出的哄笑声一模一样，惟妙惟肖。这只鹦鹉美名远扬，常有一些乘内河船从内陆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要求一睹它的风采。那时期，有很多英国旅游者

乘坐来自新奥尔良的运输香蕉的船只途经此地。有一次，几个英国佬甚至不惜任何代价想要把它买走。然而，鹦鹉最为荣耀的时刻还得数共和国总统马尔科·菲德尔·苏亚雷斯带着他的全体内阁部长来到这座府邸，想亲眼证实它声誉的那天。他们大约下午三点钟到达，个个头戴礼帽，身穿呢子长礼服，热得喘不过气来。三天以来，他们一直在进行正式会晤，在八月炽热的天空下始终不曾脱去这身装束。可最终，他们却不得不怎么带着好奇心来，还怎么带着好奇心回去，因为在两小时的绝望等待中，不管乌尔比诺医生如何恳求或威胁，鹦鹉始终一言不发，仿佛在说“嘴长在我自己身上”，可就连这句话也绝不宣之于口。医生当众出了丑，怪只怪他当初不听妻子明智的提醒，执意发出了这个莽撞的邀请。

在那次历史性的无礼举动之后，鹦鹉仍旧保持了在家中的特权，这充分证明了它的神圣地位。在这个家，除了它和一只陆龟，不许饲养其他任何动物。那只陆龟曾消失过三四年时间，大家都以为永远地失去它了，可它竟又在厨房里出现。不过，它并不被视作一件活物，而更像是一种矿物质，一个能带来好运的护身符，且向来没人能说清它究竟待在什么地方。乌尔比诺医生拒不承认自己厌恶动物，相反，他用各种杜撰的科学或哲学借口来掩饰这一点。这些理由总是能说服很多人，只除了他的妻子。他常说，过分爱动物的人可能会对人类自身做出至为残忍的事来。还说狗并非忠诚，而是卑躬屈膝；猫则是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孔雀是死神的传令官；金刚鹦鹉不过是惹人厌的装饰物；兔子助长贪婪；长尾猴会传染欲火；公鸡则该遭天谴，因为正是它造成了基督三次被人否认[4]。

与此相反，他的妻子费尔明娜·达萨却是个热带花卉和家养动物的盲目热爱者。她如今七十二岁了，早已失去年轻时小母鹿一样的身

姿。刚结婚时，她利用两人间爱情的新鲜劲儿，在家里养了许多动物，远远超出了理性范畴。最先养的是三只达尔马提亚斑点狗，分别给取了三个罗马皇帝的名字。它们为了在一只母狗面前争宠，撕咬得你死我活。而那只名叫麦瑟琳娜[5]的母狗也真无愧于它的名字，刚刚产下九只狗崽，就又迅速怀上了十只。之后，费尔明娜·达萨又养了几只集老鹰轮廓和法老风范于一身的阿比西尼亚猫、几只斜眼的暹罗猫和橘黄色眼睛的宫廷波斯猫。它们像幽灵的影子一般在各个卧室里窜来窜去。到了发情期，从它们的妖魔聚会上传来的号叫声搅扰着夜晚的平静。有几年，在院子里的芒果树上，竟还有一只用铁链拴着腰的亚马逊长尾猴，由于其痛苦的面容、天真的眼神和极其丰富的肢体语言都酷似大主教奥布杜利奥- 雷依，常常引来人们的某种同情。但费尔明娜·达萨最后之所以抛弃它，还并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它有向女人们献殷勤并自鸣得意的坏毛病。

走廊的鸟笼里养了各种各样的危地马拉鸟，此外，家中还有几只未卜先知的石鸻、几只黄腿修长的沼泽草鹭和一只常常从窗外探进头来啃咬花瓶中的火鹤的小鹿。在最后一次内战爆发前不久，当第一次有传言教皇可能会来到此地时，他们从危地马拉弄来了一只天堂鸟。可当得知教皇来访的传闻不过是政府为了恐吓图谋不轨的自由党人而散布的谣言时，这只鸟又被送回了故土，去得比来得还快。还有一次，他们从库拉索岛走私者的帆船上买回六只关在一个金丝鸟笼里的香乌鸦，和费尔明娜·达萨小时候起就在父亲家养的香乌鸦一模一样，她希望嫁人以后还能继续养这种鸟。可它们总是不停地扇动翅膀，弄得家里充满了它们身上那种殡葬花圈似的气味，谁都无法忍受。他们还曾带回来一条四米长的蟒蛇，为的是用它那死亡的气息吓跑蝙蝠、蝾螈，以及雨季里侵入家中的多种害虫。尽管也达到了目的，可这位不眠猎手嗤嗤的呼吸声扰乱了卧室黑暗里的宁静。当时正怀着职业道

德忙得不可开交，并且醉心于社交和文化事业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虽然身处这样一大堆令人厌恶的活物之中，但只要想想他的妻子不仅是加勒比地区最美，而且也是最幸福的女人，他也就知足了。然而，一个雨天的下午，他筋疲力竭地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竟撞进一场将他推回现实的灾难。从客厅一直到他目所能及的地方，动物的尸体连成了串，漂浮在血泊之中。女仆们都爬到了椅子上，满脸的不知所措，显然，是对这场大屠杀惊魂未定。

事情是这样的：几只德国獒中的一只突然得了狂犬病，发起疯来，不管见到什么动物都扑上去咬，最后还是邻居家的园丁挺身而出，挥刀把它砍成了碎片。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咬过哪些动物，又或者它嘴里吐出的那些绿色泡沫沾染过哪些，于是，乌尔比诺医生下令杀掉所有幸存的动物，并把尸体带到偏远的旷野焚烧，还请仁爱医院的工作人员到家里进行了一次彻底消毒。唯一幸免于难的就是那只象征好运的雄性美洲陆龟，因为根本没人想起它来。

费尔明娜·达萨头一次在家庭事务上完全赞同丈夫，并且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小心翼翼地没再提过动物的事。她用林奈《自然史》中的彩色插图聊以自慰，还叫人把这些图镶上画框，挂在大厅墙上。若不是有天清晨几个小偷打破浴室窗子，偷走了一套五代家传的银制餐具，或许她早已断了念头，以为再也没有希望在家中看到动物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窗子的铁环上装了双锁，各道门也都用铁闩加固，并把最贵重的物品放进保险箱，还养成了某种迟来的战时习惯：睡觉时把左轮手枪放在枕头底下。但他反对再买一条烈狗，无论是否注射过疫苗，也无论是散养还是拴着：就算让贼把家里偷个精光，他也绝不同意。

“凡是不会说话的，一律不许进这个家。”

这么说是为了让妻子不再为此事纠缠，因为她又固执地想买一条狗回来，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句自己匆忙说出并且意义过于宽泛的话竟会有朝一日要了他的命。费尔明娜·达萨那桀骜不驯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了微妙的变化，她立刻抓住丈夫用词轻率的疏漏：失窃案发生几个月后，她又去了一艘来自库拉索岛的帆船，买下一只帕拉马里博皇家鹦鹉。虽然它只会说些水手的粗话，但说得竟和真人一模一样，也算值了十二生太伏的高价。

这只鹦鹉的确品种优良，而且比看上去还要灵巧，长相上唯一区别于热带丛林鹦鹉的地方就是它头黄舌黑，可即使用松节油栓剂也无法让丛林鹦鹉学会说话。乌尔比诺医生向来是个输得起的人，他在妻子的才智面前低了头，并惊讶地发现，自己也觉得鹦鹉在女仆们的嬉笑中取得的进步十分逗趣。雨天的下午，这只羽毛被淋透的鹦鹉尤其欢快，放开了舌头，滔滔不绝地说出很多它不可能在这个家里学到的老话儿，让人觉得它恐怕比看上去要老得多。乌尔比诺医生的最后一丝保留终于在某天晚上被彻底瓦解。那天夜里，几个盗贼再次试图从屋顶平台的天窗钻进屋里，而鹦鹉用几声德国獒的狂吠把他们吓得落荒而逃，即使是真狗也无法叫得更逼真了，而它一边叫，还一边喊着“有贼”、“有贼”，这两种有趣的救命本事可都不是在这个家学的。自那以后，乌尔比诺医生就亲自接管了它。他命人在芒果树下搭起栖木，上面放两个容器，一个盛水，一个盛熟香蕉，此外，还挂了根吊杆供鹦鹉练习杂耍。尽管乌尔比诺医生怀疑，它的慢性鼻疽病对人的正常呼吸有害，但从十二月到翌年三月，夜晚转凉，当北风使得鹦鹉无法再在室外待下去时，它便会被放进一只罩有毯子的笼子里，接进卧室睡觉。多年来，他们总是为它剪短翅膀的羽毛，放它自在地迈着那老骑士般的步伐，曲着腿走来走去。但有一天，它正在厨房的横梁上兴致勃勃地耍着杂技，却一下子掉进了炖杂烩的锅里，嘴里还念叨

着它那一串叽里呱啦的水手呼救语。幸而它的运气足够好，厨娘用做饭的大勺把它捞了起来。它被烫得全身通红，羽毛也掉光了，但还活着。从那以后，就连大白天它也被关在笼子里，顾不上民间流传的关于笼中的鹦鹉会忘记所学东西的说法了，只有在凉爽的四点钟，乌尔比诺医生在院子的露台给它上课时，它才会被放出来。谁也没有及时发现它翅膀上的羽毛已经过长，而就在那天早晨，大家正准备给它修剪羽毛，它逃到了芒果树的树冠上。

他们花了三个小时还没有捉住它。女仆们在邻居家女仆的帮助下，用尽各种办法想把它哄下来，可它依旧固执地待在原地，一边放声大笑，一边高喊着:“自由党万岁！他妈的自由党万岁！”近来，因这种莽撞的呼号而丢了性命的快活酒鬼已不下四个。乌尔比诺医生几乎看不清繁叶中的鹦鹉，他试图用西班牙语、法语，甚至拉丁语来说服它，而它则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重音和同样的音色回答他，却始终寸步不离树梢。乌尔比诺医生见谁也无法让鹦鹉心甘情愿地下来，便下令找消防队员来帮忙，这是他作为一名爱国市民，最新搞出来的一项玩意儿。

事实上，直到不久前，火灾还是由自发的人们用泥瓦匠的梯子和一桶桶随便从什么地方运来的水扑灭的。那种混乱无序的法子有时甚至会造成比火灾本身更大的危害。而从去年起，多亏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担任荣誉主席的公共改善协会发起的一项募捐，这里开始有了一支专业的消防队，外加一辆带有汽笛、警铃和两条高压水管的蓄水卡车。这些东西红极一时，甚至每逢听到教堂敲响警报的钟声，学校都会停止上课，好让学生们前去观看消防员如何救火。起初，他们唯一的任务便是灭火。但乌尔比诺医生告诉市政当局，他曾在汉堡看到消防员们救活了一个于三天的大雪后在地窖中冻僵的孩子，还在那

不勒斯的小巷里看见过他们从十层楼的阳台上抬下一口装着死人的棺材，只因那座楼的楼梯太过曲折，死者的家人无法将棺木抬到街上。就这样，本地的消防员们开始学习提供其他紧急服务，比如撬开门锁、杀死毒蛇等等，医学院还专门为他们开设了一期小事故急救课程。因此，请他们帮忙从树上捉下一只像绅士一样品格高贵的鹦鹉并不能算过分之举。乌尔比诺医生说："告诉他们，是我请他们来的。"说完便径直走到卧室去换衣服，准备参加午宴。事实上，此时此刻，他正被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那封信弄得晕头转向，根本无心顾及鹦鹉的命运。

费尔明娜·达萨穿了件宽松的丝绸衬衣，下摆长至臀部，并戴了一条货真价实的长珍珠项链，在脖子上绕了大大小小六个圈，脚下一双缎面高跟鞋，是在极为庄重的场合才穿的，因为年龄已经不允许她经常如此大费周章地打扮了。这身时髦装束似乎并不适合一个备受敬重的老妇人，但在她身上却十分得体。她骨架修长，身材依旧苗条挺拔，富有弹性的手上连一块老人斑都没有，一头紧贴脸颊的短发泛着钢铁般的蓝色光芒。和新婚时的照片相比，她此刻还能保持不变的就只剩下那一双清澈的杏核眼和她那民族特有的高傲了，但她因年龄而减损的，又因性格而弥补回来，更因勤劳赢得了更多。她觉得现在这样很好：那穿铁丝紧身胸衣、束起腰身、用布片将臀部垫高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身体得到解放，呼吸也变得顺畅，原本什么样就表现出什么样。尽管她已经七十二岁了。

乌尔比诺医生看见她坐在梳妆台前，在缓缓转动的电风扇扇叶下，正把一顶饰有紫罗兰毡花的钟形帽往头上戴。卧室宽敞而明亮，英式大床上挂着玫瑰色的针织蚊帐，两扇敞开的窗正对着院里的几棵树。知了们被即将下雨的征兆扰得惊慌失措，刺耳的鸣声阵阵传进屋

来。自从新婚旅行回来后，费尔明娜·达萨便一直根据天气和场合为丈夫挑选合适的衣服，并在前一晚把它们按顺序整齐地放在椅子上，好让丈夫从浴室出来时能方便地穿上。她也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帮他穿衣服，而后又变成完全替他穿。她心里很清楚，起初她这样做只是因为爱，而自五年前起，却是无论如何不得不这样做了，因为他已经不能自己穿衣。两人才刚刚庆祝完金婚，谁离开谁都无法生存片刻，甚至每一刻都不能不想着对方，而且随着年纪越来越老，就越来越是如此。可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说清这种相互依赖究竟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还是习惯使然。他们从不曾为此问过自己，因为两人都宁愿不知道答案。她早就发觉了丈夫脚步的日益蹒跚，脾气的反复无常，记忆中出现的裂痕，以及新近养成的在睡梦中抽泣的习惯，但她并没有把这些当作他最终衰老的确凿标志，而是视之为一次幸福的返老还童。她把他当作一个老小孩，而非一个难以伺候的老人。这种自欺欺人对两人来说或许都是一种上天的恩赐，因为这让他们避免了互相同情。

如果两人能及时明白，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灾难，日常的琐碎烦恼更加难以躲避，或许他们的生活完全会是另一副样子。而如果说，他们在共同的生活中也多少学到了点什么，那就是智慧往往在已无用武之地时才来到我们身边。多年来，费尔明娜·达萨一直痛苦地忍受着丈夫每天清晨起床时的快乐。她竭力抓住自己的最后一丝困意，以免去面对一个新的充满了不祥之兆的早晨所预示的宿命，而他却带着一个新生儿的天真醒来了：新的清晨，意味着他又赢得了一天的时间。她听着他伴随着鸡鸣醒来，活着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一声无缘无故的咳嗽，好像故意要把她吵醒似的。她听着他一边摸索应该就在床边的拖鞋，一边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扰得她不得安宁。她听着他在黑暗中一路跌跌撞撞地摸向浴室，然后，他会在书房待上

一个小时，可她才刚刚重新入睡，就又听见他回来穿衣服，仍旧没有开灯。（有一次，在玩沙龙游戏时，人们问他如何定义自己，他说："我是一个在黑暗中穿衣服的男人。"）她就这样听着他，心里清楚，这些声响中没有一个是必要的。他假装无意，但其实是有意弄出这许多动静，就像她明明醒着，却假装没有醒。他的理由十分明确：他从未像这些不安的时刻里那样迫切地需要她，需要她活着，并且头脑清醒。

没有人比她的睡姿更优雅，一只手搭在前额上，像一幅舞蹈的素描。但是，若有人打扰了她将醒未醒时浅浅的睡意，她又会比任何人都凶悍。乌尔比诺医生知道，她正侧耳等着他发出哪怕最微小的一丝响动，甚至还会为此感谢他，因为这样，她就可以把清晨五点被吵醒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有几次，他由于没有在老地方找到拖鞋，正在黑暗中摸索，她突然用半梦半醒的声音说："你昨晚把它们放在浴室里了。"接着，她又用愤怒而清醒的声音骂道：

"这个家里最倒霉的事，就是从来不让人好好睡觉。"

于是，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对自己不抱一丝怜悯地打开灯，为这一天的头一个胜利而扬扬得意。事实上，这是两人间的一种游戏，神秘而邪恶，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重新振奋起来：这是居家爱情的众多危险性快乐的一种。然而，也正是一次类似这样的日常消遣，差点让他们头三十年的共同生活走到尽头。事情的起因是有一天，他们的浴室里没香皂了。

一切本和平常没有两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浴室回到卧房，那时，他还能自己洗澡而无需别人帮助。他开始穿衣服，没有开

灯。她则跟往常这个时候一样，像胎儿似的躺在温暖的被窝里，闭着眼睛，呼吸很轻，那只跳着神圣舞蹈的手臂放在头顶。她正处于半梦半醒之间，而他心里十分清楚这一点。黑暗中，浆过的亚麻衣服窸窣了好一阵子后，乌尔比诺医生自言自语道:

“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了，我洗澡的时候都没有香皂。”

于是她想起这件事，醒了，然后对全世界都没好气地翻了个身，因为她的确忘记往浴室里放上新的香皂了。她是在三天前发现这件事的，那时她已经站在了淋浴喷头下，于是想之后再放上，但过后却忘了，直到第二天淋浴时才又想起。而第三天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事实上并不到一个星期，他这样说是为了夸大她的错误，但三天确实是有的，而且不可原谅。那种被人当场抓住错误的感觉让她老羞成怒。像往常一样，她以攻为守。

“这几天我每天都洗澡，”她失态地叫嚷道，“一直都有香皂。”

尽管他太了解她的战术，但这一次却无法再忍了。他编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搬到了仁爱医院的实习医生宿舍里去住，只在黄昏出诊前回家换衣服。而她每一听到他回来的声音，就立刻跑到厨房里去，假装在忙着什么，直到街上再次响起马车的铁蹄声。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每次他们试图解决分歧，结果都是把怒火越拨越旺。只要她不承认浴室中没有香皂，他就不打算回来；而她呢，只要他不承认自己为折磨她而故意说了谎，她就不准备接受他回来。

当然，这次事件也让他们有机会联想起其他无数个朦胧清晨发生的无数次口角。一阵反感掀起另一阵反感，旧伤疤被揭开，变成了新伤口。两人都十分惊愕，因为他们痛苦地证实了，在这么多年的夫妻

争斗中，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培养了仇恨。他甚至提出，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去大主教先生那里做一次公开忏悔，让上帝裁决浴室的香皂盒里到底有没有香皂。这一下，本来还很好地保持了理智的她，终于爆发出一声历史性的叫喊:

“让大主教先生见鬼去吧！”

这声辱骂震动了城市的地基，引起各种各样难以澄清的流言蜚语，而且像说唱剧中的顺口溜一样变成了民间俚语:“让大主教先生见鬼去吧！”她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于是先发制人，抢在她预料丈夫会有的反应之前，威胁他说，自己要一个人搬到父亲的老房子里去住，虽然那里现在租出去成了公家的办公室，但仍旧是属于她的。这并非虚张声势:她真的想走，根本不会顾及什么社会舆论。而她丈夫及时发现了这一点。他没有勇气去挑战这一有失偏颇的判断，于是让步了。当然，他并没有承认浴室中确有香皂，因为那是对真理的侮辱，而只是接受两个人继续生活在同一幢房子里，但分房住，而且互不说话。于是吃饭时，为避免尴尬，他们巧妙地通过孩子们从桌子一头传话到另一头，而孩子们竟然也从未发现，他们彼此间从不搭腔。

书房里没有浴室，这反倒避免了因早晨的声响而引起摩擦，因为乌尔比诺医生改为备课后再进屋洗澡，并且小心翼翼，唯恐吵醒妻子。有好几次，他们睡前撞到了一起，于是便轮流刷牙。四个月后的一天，她从浴室中出来，发现他在他们那张大床上看书（这是常有的事）竟看睡着了。她在他身边躺下，动作很大，希望能吵醒他，让他离开。而他也的确迷迷糊糊地醒了，但并没有起身，而是关掉床头灯，然后又舒服地倒在了他的枕头上。她晃了晃他的肩膀，提醒他该去书房了，但此时此刻，他再次回到了祖传的羽毛床上，感觉是那么的舒服，宁愿缴械投降。

“让我留在这儿吧。”他说，“的确有香皂。”

当他们步入老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相信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即那次吵架竟是他们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最为严重的一次，也是他们唯一一次萌生了放弃的念头，希望开始过另一种人生。尽管现在他们老了，已经心平气和，但还是注意不去提它，因为那刚刚愈合的伤口会再次流血，仿如就发生在昨日。

他是让费尔明娜·达萨听到小便声的第一个男人。那是新婚之夜，在那艘载着他们前往法国的轮船的舱室中。当时，她正因晕船萎靡不振，而他那公马一般的小便声是那么的强劲威严，这更增加了她对那场一直令她提心吊胆的灾难的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那股泉水声越来越弱，可那段记忆却频繁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因为她从来都无法忍受他在用马桶时把池子的边缘弄湿。乌尔比诺医生试图用一个任何有意听懂的人都能明白的浅显道理说服她，告诉她这种事故并非如她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他每天不小心才造成的，而是身体机能的原因：年轻时，他尿得又准又直，在学校里，他曾是瞄准瓶子撒尿的冠军，但随着岁月的消磨，不仅小便的势头减弱，而且还歪歪斜斜，分成许多支流，最后变成了一股无法驾驭的虚幻之泉，尽管他每次都做出极大努力想让它走直线。他说：“抽水马桶一定是某个一点儿也不了解男人的人发明的。”他只好用日常行动来为家庭和平做出贡献，但这更多的是出于屈辱，而非谦恭：每次小便后，他都会拿卫生纸去擦干马桶池的边缘。她对此心知肚明，但只要卫生间里的氨气味不过于明显，她便从来都不说什么，而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她就会像发现一桩罪行似的宣告：“这儿的味道呛得就像个兔子窝。”在步入老龄的前夕，乌尔比诺医生终于找出了对抗这项身体障碍的终极解决办法：像

她一样坐着撒尿，如此一来，不仅保持了马桶池的清洁，他自己的姿势也惬意了许多。

那个时候，他的自理能力已经很差了，在浴室中滑上一跤都可能是致命的，所以他警惕地反对淋浴。他们家是现代化的，没有在老城区的宅子里普遍使用的带狮子腿的白镴浴缸。当初，他出于卫生的理由拒绝了它：他认为浴缸是欧洲人最肮脏的发明之一，他们只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洗澡，却还把自己浸泡在一缸污水里，里面尽是些他们费力从身上褪下来的脏东西。因此，他让人用实心愈疮木做了一只特大号的木桶。而费尔明娜·达萨就用这只桶，依照给新生儿洗澡的程序给丈夫洗澡。每次沐浴都长达一个多小时，水中掺入用锦葵和橙皮煮沸的汤水，这对他有很好的镇静效果，有时，他甚至会在香气四溢的汤水中睡着。洗完澡，费尔明娜·达萨帮他穿衣：先在两腿间撒上滑石粉，在灼伤的红疹上涂上可可油，然后温柔地给他穿上衬裤，就仿佛那是一块尿布，接着，再从袜子一直穿到别着黄玉别针的领带。终于，夫妻俩的清晨恢复了平静，因为他又回到被儿女夺走的童年，而她呢，最终也和家庭日程协调起来，只因岁月同样也在她身上流逝：她睡得越来越少，还没满七十岁，她就醒得比丈夫早了。

圣神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当掀开毯子看到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尸体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发现了某种自己在光辉的医生生涯和信徒生活中一直都否认的东西：即在和死神熟识了那么多年，在同它战斗，翻来覆去与它接触了那么久之后，那还是他第一次敢于直视它，而与此同时，它也在注视着他。这并不是对死亡的恐惧。不，不是：自从很多年前的一天晚上，他从噩梦中惊醒，意识到死亡并非仅仅如他所感觉的那样，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而是一个切近的现实时，这种恐惧就已经在他心里、与他共存了，就像他影子之上的另一

个影子。事实上，那天他所看到的是一个真切的存在，而在那之前，死亡不过是他想象中的某种确定的东西。他很欣慰，全能的上帝出其不意地向他揭示这个奥秘所用的工具竟然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他一直认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是个圣人，只不过他从不自知所蒙受的恩宠罢了。然而，那封信却又向他揭示了他的真实身份、他黑暗的过去和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伪装能力，这让医生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无可挽回的事情。

不过，费尔明娜·达萨并没有感染他的忧郁。当然，他也试过要感染她，就在她帮他把两条腿塞进裤筒，又为他扣上衬衫那排长长的纽扣时。但他没有成功，因为费尔明娜·达萨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动的，更何况这只是一个她并不喜欢的男人的死。她从没见过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仅仅知道他是一个拄拐的残疾人，是在安的列斯群岛众多岛屿中的一座，众多起义里的一次，从行刑队的枪口下逃出来的，因生活的需要当上了儿童摄影师，并最终成为全省最受欢迎的一位；她还知道，他曾经赢过一个她记得好像叫托雷莫里诺的人一盘象棋，尽管那个人实际上叫卡帕布兰卡。

“他其实是卡宴的一名逃犯，因犯了重罪而被判终身监禁。”乌尔比诺医生说，“你能想象吗，他居然还吃过人肉呢。”

他把那封信交给她，信中的秘密他打算一直带到坟墓里去。可她并没有看，而是把折得整整齐齐的信纸收进梳妆台的抽屉，用钥匙锁了起来。她已经习惯了丈夫那深不可测的大惊小怪的能力，习惯了他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小题大做，以及他那种与他的公众形象大相径庭的狭隘见解。而这一次，他甚至比以往表现得更糟。她本来以为，丈夫敬重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并非因为他之前是个怎样的人，而是因为他除了一个流亡者的背包以外身无别物地来到

这里之后的所作所为，于是她不明白，为何这个人迟迟曝光的身份会让丈夫如此沮丧。她也不理解，丈夫为何会对他私下里有一个女人这件事如此厌恶。这可以说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那类人世代相传的一个习惯；更何况，丈夫自己也曾在某个忘恩负义的时候这样干过；再者，她觉得那个女人能够帮助他践行死亡的决定，这本身便是令人心碎的爱的明证。她说："如果你也像他那样，因为如此严肃的理由而决定去死，那我的责任便是做和她同样的事。"乌尔比诺医生又一次处在茫然的十字路口，妻子这种武断的不理解已经让他恼火了整整半个世纪。

"你什么都不懂。"他说，"我生气的并不是他以前是谁，曾经做过什么，而是他竟然骗了我们所有人这么多年。"

他的眼睛里开始噙满瞬间而来的泪水，但她装作没有看见。

"他做得对。"她反驳说，"如果他说了实话，那么无论是你还是那个女人，以及这里所有的人，都不会像曾经那样爱他了。"

她帮他把怀表链挂在背心的扣眼上，又为他最后调整了一下领带结，扣上黄玉别针。接着，她用喷了香水的手绢为他擦干眼泪，又弄干净胡子上沾着的泪珠，然后把手绢的四角打开，折成一朵洋玉兰的形状，放进他的上衣口袋。这时，摆钟敲响的十一下钟声在整座房子里回荡。

"快点。"她边说边挽起了他的手臂，"我们要迟到了。"

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的妻子阿敏塔·德昌普斯和他们那七个一个赛一个机敏的女儿已经筹划好一切，志在让这次二十五周年纪念午宴成为当年的社交大事。他家的房子坐落在历史悠久的老城区正中

心，是过去的造币厂所在，经一位佛罗伦萨建筑师的捣鼓而改头换面。这位建筑师像一股革新的邪风途经此处，把不下四处十七世纪的遗址变成了威尼斯式的大教堂。医生家有六间卧室和两个用来会客兼用餐的大厅，十分宽敞，而且通风效果极佳，但还是接待不了人数众多的城内来宾，更何况还有一批着意挑选的外埠宾客。至于他家的院子，则如同修道院里带回廊的院落一般，中央有一座石砌的喷泉在低声吟唱。黄昏时，花坛中香水草的芬芳在整幢房子里弥漫。但拱廊下的这片天地仍不足以容纳那些姓氏显赫的贵宾。因此，他们最终决定把午宴设在乡间别墅，开车走皇家公路需要十分钟。那里有一个几千平方米的大院子，种着高大的印度月桂树，缓缓流淌的小河中漂浮着土生土长的睡莲。堂桑丘餐厅的伙计们在奥利维利亚夫人的带领下，在没有树荫的地方支起彩色的帆布篷，而在月桂树下则用许多张桌子拼起了长长的餐台，全部铺上亚麻桌布，摆了一百二十二套餐具，主宾席上还摆放着一簇当天采下的玫瑰花。他们为乐队搭了一个台子，其中，管乐队只负责演奏对舞舞曲和民族华尔兹，还有一支从艺术学校请来的四人弦乐队，是奥利维利亚夫人专门为丈夫德高望重的老师准备的惊喜——午宴将由老师主持。尽管这天并非医生实际的毕业纪念日，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这个圣神降临节的星期日，为的是突出喜庆的气氛。

准备工作早在三个月前就开始了，生怕有什么必要的事因为时间不够而不能完成。他们派人从希耶纳加·德奥罗带来了活母鸡。这些鸡在整个沿海地区都很有名，不仅仅因为个大味美，更因为殖民时期，它们在冲积土区域觅食，从它们的砂囊中可以找出纯金的沙粒。奥利维利亚夫人还在几个女儿和仆人的陪伴下，亲自登上豪华的远洋轮船，挑选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好的东西，以颂扬丈夫的成就。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只除了一点，那就是庆典设在六月的一个星期日，而

这一年的雨季姗姗来迟。当天早晨，她出门去望大弥撒时便感到危机四伏。空气中的潮湿让她惶恐，接着又发现天空阴沉，气压很低，甚至连海平线都看不见了。尽管出现这些不祥的征兆，她在望弥撒时碰见的天象观测台台长却提醒她，在本城多灾多难的历史当中，即便在最严酷的冬天，圣神降临节这天也从来没下过雨。然而，十二点的钟声刚刚敲响，正当很多客人在露天开始品尝开胃酒时，一声孤独的霹雳震颤了大地，一阵从海上席卷而来的恶风掀翻了桌子，把篷布吹到了天上，灾难性的暴雨倾泻而下，天仿佛塌了下来。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他在路上碰见的最后一拨客人一起，终于在暴风雨的混乱中艰难到达。他本想和那些客人一样，下车后踩着一块块石头，跳着跃过一片汪洋的院子冲进屋去，但最终还是难堪地被堂桑丘的伙计们遮在一顶黄色帆布的华盖下，用胳膊抱了进去。七零八落的桌子已经被尽可能完善地重新安置在室内，就连卧室也摆满了，而客人们没有做出丝毫努力来掩饰他们那副落难的模样。屋里热得像船上的锅炉房一样，因为所有的窗子都关上了，以免雨水被风斜吹进来。在院子里时，桌上每一个位置都摆放着写有宾客姓名的卡片，并且按照习惯，一侧是男士，另一侧是女士。但到了屋里，名签被混在一处，众人只得随便找个地方坐下，这场人力不可抗拒的天灾造成了男女混坐的局面，破天荒头一遭地打破了我们的社交迷信。在这场灾变中，阿敏塔·德奥利维利亚[6]仿佛时时刻刻都无处不在似的。尽管头发被淋得透湿，华美的衣服上也溅满了泥点，但她从容地承受着这场不幸，脸上始终挂着从丈夫那里学来的不可战胜的微笑，不让厄运有片刻得意的机会。她靠着和她在同一个熔炉里锻造出来的女儿们的帮助，尽可能地重新安置了主宾席，让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坐到正中间，大主教奥布杜利奥- 雷依坐在他的右首。费尔明娜·达萨则像往常一样紧挨着丈夫落座，因为她担心他会在午宴上睡着或是把汤

洒在翻领上。对面的位子坐着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他已年过半百，略带女人气，保养得非常好，那股子爱热闹的劲头与他精湛的医术毫不相称。主桌的其余位置都被省市要员占满了，还有一位前一年的选美皇后，省长挽着她的手臂，把她安排在自己身边。尽管当地并没有习惯要求来宾的穿着，更何况这还是一次乡间宴会，但女人们个个都身着晚礼服，佩戴着全套的珠宝首饰，而男人们大部分身穿深色礼服，打着黑色领带，有的还穿上了呢子长礼服。只有那些见过世面的人才会穿日常的服装，这其中就包括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每一个座位上，都有一份烫着金边的法文菜单。

奥利维利亚夫人担心闷热难耐，走遍整个屋子恳求客人们在用餐时脱掉外套，但没有谁敢率先轻举妄动。大主教提醒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午宴：在这里，自独立以来一直把国家弄得血雨腥风的内战双方，头一次抚平创伤，摈弃仇恨，坐到了同一张桌子上。这种想法颇合那些激情澎湃的自由党人，尤其是年轻党员的意，在保守党独揽大权四十五年之后，他们终于选出了一位自己党派的总统。乌尔比诺医生却不以为然：他完全不觉得一位自由党总统和一位保守党总统有何不同，最多是前者的衣着稍差一点。但他不想反驳大主教，尽管他本想向他指出，午宴中的所有人之所以来到这里，并非由于他们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的家世，而后者向来都是凌驾于政治的动荡和战争的恐怖之上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会座无虚席。

暴雨骤然停息，就像它突然开始那样。太阳立刻炽热地燃烧起来，万里无云。只是刚才的暴风雨太过猛烈，有几棵大树被连根拔起，泛滥的积水把院子变成了沼泽。最大的灾难发生在厨房。有几个烧柴火的炉灶是用砖在后院里露天搭建的，厨师们没来得及把上面的

锅从大雨中抢救出来。他们紧张地忙乱了好一阵儿，才把被大水淹了的厨房清理干净，并在后廊上临时架起了几个新炉灶。不过等到下午一点，紧急情况已经解决，只差由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嬷嬷们负责的饭后甜点了，她们原本承诺会在十一点之前送达。大家担心皇家公路旁的溪水又漫上来，就像在不太冷的冬天那样，果真如此，那甜点便不可能在两小时内送来了。雨刚一停，窗子就马上打开，被暴雨中的硫磺清洁过的空气吹进来，屋里一下子变得清爽了。随后，乐队奉命在门廊的露台上演奏节目单上的华尔兹舞曲，但他们唯一起到的作用却是加剧了人们的躁动，因为铜管乐器发出的声响回荡在整座房子里，人们不得不大声叫嚷才能交谈。阿敏塔·德奥利维利亚已经厌倦了等待，微笑得快要落泪，于是下令立即上菜。

接下来轮到艺术学校的乐队演奏。在为最初的旋律争取来的一阵表面的肃静中，一曲莫扎特的《狩猎》缓缓响起。尽管人们的说话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嘈杂，也尽管堂桑丘的黑人仆役们端着一盘盘热气腾腾的菜肴在餐桌间挤来挤去、磕磕碰碰，乌尔比诺医生却始终能保持一条畅通的渠道，把所有曲目听完。他集中精力的能力一年不如一年，甚至下棋时都必须把每一步记录在纸上，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儿了。然而，他竟仍然能够在进行一场严肃交谈的同时，不错失音乐的旋律，尽管还没有达到他的一位挚友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奥地利结交了一名德国管弦乐队的指挥，能够一边听着《唐豪瑟》，一边看《唐璜》的乐谱。

第二首曲子是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乌尔比诺医生觉得他们把戏剧性表现得过于肤浅了。他一边透过餐具和盘子发出的新一轮噪音，艰难地听着演奏，一边把目光落到一位正向他微微点头致意的面色微红的年轻人身上。无疑，他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又想不起究竟

在哪里。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特别是对人名，即便是那些他最熟悉的人，而对过去听过的某段旋律也常常如此。这给他带去了极大痛苦，某天夜里，他甚至宁愿死掉，也不愿忍受失忆的煎熬直到天亮。正当他又差点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时，一道仁慈之光照亮了他的记忆：这个年轻人去年曾做过他的学生。他很惊讶在这里见到他，在这个被拣选者的王国里。可奥利维利亚提醒他，那是卫生部长的儿子，来这里准备法医论文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高兴地向他挥手致意，年轻的医生站起身，鞠躬回礼。但无论那时还是以后，乌尔比诺医生从未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就是那天早上和他一起在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家的实习医生。

由于再一次战胜了衰老，他感到轻松了许多，陶醉在最后一支曲子那清澈而流畅的抒情旋律中，虽然他并没有听出是什么曲子。后来，乐队中年轻的大提琴手告诉他，那是一首加布里埃尔·福雷的弦乐四重奏。乌尔比诺医生一直十分关注欧洲的新鲜事物，但这位作曲家的名字他甚至听都没听人说起过。费尔明娜·达萨像往常一样时刻留意着他，特别是看到他当众陷入沉思时。她停止用餐，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上，将他拉回现实，对他说："别再想那件事了。"乌尔比诺医生茫然失神地冲她笑了笑，在这时，他才再次想起那件她所担心的事。他想起了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仿佛看见他此刻正穿着那身假军装，戴着那些道具勋章，躺在棺材里，暴露在墙上照片里孩子们指责的目光下。他转过身，把自杀事件告诉大主教，可大主教早已经知道了。大弥撒一结束人们就议论纷纷，大主教甚至接到了赫罗尼莫·阿尔戈特将军的申请，代表所有加勒比流亡者请求把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安葬在圣地。大主教说："我认为这申请本身就是缺乏敬意的表现。"接着，他又用更具一点儿人情味的口吻问医生，是否有人知道自杀的原因。乌尔比诺医生则用一个自认为瞬间发明但准确无误的词回

答了他：衰老恐惧症。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身边几位客人身上的奥利维利亚医生，此刻稍稍怠慢了他们，加入到老师的谈话中来。他说："现在还能碰见不是因爱情而自杀的人，真是遗憾。"乌尔比诺医生见爱徒的想法竟和自己如出一辙，并没有感到惊奇。

"而且，最糟的是，"他说，"他用的是氰化金。"

说这话时，他感到对死者的同情再次战胜了那封信带来的痛苦，对此他并不感谢妻子，而是感谢音乐的奇迹。于是，他向大主教说起这位他在对弈的漫长下午认识的世俗圣人，说起他用自己的艺术为儿童的幸福所做的奉献，说起他对一切世事罕见的博学，以及他那简朴的生活习惯。说着说着，医生自己突然也对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那纯洁的灵魂惊讶不已，这种纯洁早已彻底地将他同他的过去割裂开来。随后，医生又向市长提议，应当买下摄影师所有照片的底片，以把一代人的形象保存下来——或许这代人在照片以外再也无法获得幸福，但这座城市的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大主教对一位有教养的天主教战士竟会将一个自杀者称为圣徒感到十分恼火，但他赞同留存底片的提议。市长想知道该向谁去购买底片。乌尔比诺医生的舌头被秘密之火灼烧着，但他咬紧牙关，没有把底片的秘密继承人说出来。他说："我来负责此事。"并为自己对那位女士保持了忠诚而感到释然，因为就在五小时前，他还鄙视过她。费尔明娜·达萨看出了这点，她低声让他保证会去参加葬礼。当然会去，他轻松地说，责无旁贷。

宴会上的讲话简短而浅白。管乐队开始转为通俗风格，演奏起节目单上没有的曲子来。宾客们在露台上散着步，等待着堂桑丘餐厅的伙计们把院子里的积水排干，然后看谁有兴致跳上一曲。唯有主宾席的客人们还留在大厅里，正为在最后祝酒时把小半杯白兰地一饮而尽的乌尔比诺医生喝彩。谁也不记得他曾有过这样的举动，平常，只有

为了搭配极为特殊的菜肴，他才会偶尔喝上一杯上好的葡萄酒。但那天下午，心情使然，他的懦弱被很好地弥补了：过了那么多、那么多年之后，他终于再一次有了唱歌的兴致。若不是因为一辆崭新的汽车突然到来，他无疑会应自告奋勇为他伴奏的年轻大提琴手的邀请高歌一曲。汽车穿过泥泞的院子，溅了乐师们一身泥浆，并用它那鸭子叫似的喇叭声，把围栏里的鸭子惊得一阵乱叫，最终停在了门廊前。马可·奥雷里奥·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妻子一边笑得前仰后合，一边从车上走下来，四只手各端着一个用镂空花边布盖着的托盘。还有很多同样的托盘放在车里副驾驶的位置上，一直摆到了司机脚边。原来，这些就是迟来的餐后甜点。在众人的掌声和亲切的哄笑声停息后，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圣克拉拉修道院的修女们在下雨之前就请他帮忙把甜点带过来，但他开上皇家公路后又折了回去，因为有人告诉他，他父母家中失火了。还没等儿子把话讲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便大惊失色。但妻子及时提醒他，是他自己把消防员叫去抓鹦鹉的。尽管大家都已经喝过了咖啡，但阿敏塔·德奥利维利亚容光焕发，决定让客人们再去露台上享用餐后甜点。不过，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妻子没有去，因为几乎已经不剩什么时间能让他在葬礼前睡上他那神圣的午觉了。

他终究还是睡了，但睡得很短，而且很糟，因为回家时，他发现消防员造成的灾害不亚于一场火灾。他们为了吓唬鹦鹉，用高压水管把一棵树冲得光秃秃的，还有一股水流瞄错方向，射进了主卧室的窗子，对家具和墙上那些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祖先画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坏。邻居们听见消防车的鸣笛，还以为发生了火灾，纷纷从家中赶来。幸好，学校星期日关门，这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混乱。当消防员们发现，即使站在加长梯上也仍旧够不到鹦鹉时，便开始用砍刀砍断树枝。幸亏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及时出现制止，他们才没有连树干都

一并砍倒。他们留下话说，五点钟后还会回来，看到时是否需要他们继续修剪枝叶。出门时，他们把内阳台和客厅踩得满是泥巴，还弄破了费尔明娜·达萨最爱的一块土耳其地毯。而最糟的是，这一切灾难性的破坏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大家普遍认为，鹦鹉已经趁乱逃到邻居家的院子里去了。的确，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又在树丛中找了好一会儿，却始终都没有得到鹦鹉用任何语言做出的回应，就连吹口哨和唱歌也无济于事。他认定它丢了，快到三点时才回去睡觉。上床前，他去小便，还快乐地闻到他那被温热的芦笋净化了的尿液中那种神秘花园的芬芳。

他被悲伤惊醒了。不是上午他站在朋友尸体前的那种悲伤，而是一种无形的伤感迷雾，在午觉后充斥着他的灵魂。他将之理解为一种神谕，预示他正在度过自己一生中最后的几个下午。五十岁前，他从未感觉过自己各个内脏器官的大小、重量和状态。但五十岁后，慢慢地，每天午觉后他闭着双眼躺在那里，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感觉到它们存在于自己体内，甚至能感觉到他那不眠不休的心脏的形状，以及他那神秘的肝脏和密封的胰脏。他逐渐发现，周围就连最老的人也比他小，在他们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人中，他已经成了唯一的幸存者。当他发现自己开始健忘，便求助于在医学院时从一位老师那里听来的方法："没有记性的人，便靠纸来代替。"然而，这不过是个短暂的幻想，因为到最后，他连兜里那些纸条们究竟想说些什么都忘了。他会戴着眼镜却满屋子找眼镜，锁上门后又把钥匙转回来，看书时也会丢掉线索，因为忘了情节的前因后果或人物间的关系。而让他最不安的，是他无法再信任自己的理智：他感到自己正逐渐失去判断力，陷入不可抗拒的灾难之中。

尽管没有科学根据，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仅凭经验就知道，大部分致命的疾病都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却没有一种像衰老这样独特。这种味道他在解剖台上开膛破肚的尸体中察觉得到，甚至在那些极好地掩饰了年龄的病人身上也辨认得出，在自己衣服上的汗气和妻子熟睡时毫无戒备的呼吸中，他也闻得到。若非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老基督徒，或许他也会赞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看法：衰老是一种不体面的状态，应当及时制止。唯一的一点安慰——即便是对他这样一个曾是床上好手的男人来说——就是性欲缓慢而又仁慈的消亡：性的平静。八十一岁时，他仍旧足够清醒地意识到，把自己拴在这个世界上的，仅剩下几根细细的丝线，睡梦中简单地改变一下姿势都可能让它们毫无痛苦地断开。而如果说，他还在尽可能地维持它们，那完全是出于在死亡的黑暗中找不到上帝的恐惧。

费尔明娜·达萨一直忙着收拾被消防员毁得一塌糊涂的卧室。快到四点钟时，她让人给丈夫送去一杯他每日都喝的加碎冰块的柠檬水，并提醒他该穿好衣服去参加葬礼了。这天下午，乌尔比诺医生的手边有两本书：亚历克西·卡雷尔的《人体未解之谜》和亚克塞尔·蒙特的《圣米歇尔的故事》。后一本书的书页尚未裁开。乌尔比诺医生吩咐厨娘蒂戈娜·帕尔多把他忘在卧室里的象牙裁纸刀取来。刀子取来时，他正在读《人体未解之谜》中用信封夹着的那一页：只差几页，这本书就要读完了。由于头部隐隐作痛，他读得很慢，他将这如河流一般连绵曲折的头痛归咎于最后碰杯时的那小半杯白兰地。在阅读间隙，他不时地呷上一口柠檬水，或是慢慢嚼上一块冰。他已经穿好了袜子，但衬衫还没有装上假领，绿色条纹的松紧背带也还耷拉在腰身两侧。一想到要换衣服去参加葬礼，他就心烦不已。他很快停止了阅读，把手上的书放到另一本书上，然后靠在藤条摇椅上慢慢摇晃，心情沉重地看着一片汪洋的院子，以及院子里的香蕉树丛、被砍得光秃

秃的芒果树、雨后出现的飞蚁和又一个一去不返的下午所释放出的短暂而华美的光辉。他都已经忘了自己曾经拥有一只帕拉马里博鹦鹉，他曾像爱一个人一样爱它，但突然，他听见它的说话声：“皇家小鹦鹉。”声音很近，几乎就在他身边，随即，他在芒果树最低的树枝上看到了它。

“不知羞耻的家伙！”他对它喊道。

而鹦鹉用一模一样的声音反驳道：

“你更不知羞耻，医生。”

他一边目不转睛地继续和它说话，一边小心翼翼地穿上短靴，以防吓跑它。他把两条背带搭在肩上，来到满是泥泞的院子里，走下露台的三级台阶时，他用手杖试探着，以免绊倒。鹦鹉没有动。它站得很低，于是他把手杖伸过去，好让它像往常一样站到银手柄上来，可它却躲开了。它跳到相邻的树枝上，虽然高了一些，但更容易够到了，因为家里的梯子在消防员来之前就支在那儿了。乌尔比诺医生估摸了一下高度，认为只需登上两级，就能够到它了。他登上第一级，嘴里唱着表示友好的歌，用来分散这只不听话的动物的注意力。鹦鹉没有跟唱，只是重复着歌词，并在树枝上往远处横挪了几步。他用两手抓牢梯子，没费劲就登上了第二级。鹦鹉开始完整地唱起整首歌来，没有挪地儿。他爬上第三级，接着又爬上第四级，因为他错误地估计了树枝的高度。接着，他左手紧紧地握住梯子，右手则试探着去抓鹦鹉。老女仆蒂戈娜·帕尔多走过来提醒他葬礼就要迟到了，却看见梯子上一个男人的背影，要不是那两条绿色条纹的松紧背带，她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乌尔比诺医生。

"至圣的上帝啊！"她喊道，"您会摔死的！"

乌尔比诺医生抓住鹦鹉的脖子，发出一声胜利的感叹：总算好了[7]。但随即又放开了它，因为梯子在他脚下滑了出去。他在空中悬留了片刻，意识到自己来不及领受圣体，来不及为任何事忏悔，来不及向任何人告别就要死掉了，死在圣神降临节的星期日下午四点零七分。

费尔明娜·达萨正在厨房里品尝晚餐的汤，忽然听见蒂戈娜·帕尔多的一声惨叫和仆人们的骚乱，紧接着是邻居们的喧闹。她丢下尝汤的勺子，拖着她这个年龄不可战胜的沉重身躯，尽可能快地跑了出去，疯了似的叫喊着——尽管她还不知道芒果树的枝叶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看到丈夫仰面朝天地躺在泥水之中，她的心仿佛要爆裂一般。丈夫已经奄奄一息，但还在坚持与死神这致命的一击做着最后一分钟抗争，好让她及时赶来。要这样撇下她独自离去，他感到无比痛苦，透过泪水，他在慌乱的人群中认出了她。他诀别地看了她最后一眼，在两人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她从未见过他的眼神如此闪亮，如此悲痛，而又如此充满感激。他用尽最后一口气，对她说道：

"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死是值得纪念的，这无可非议。刚从法国学成归来，他就运用全新的有力手段，制止了本省最后一次霍乱的流行，由此声誉传遍全国。前一次霍乱流行时他还在欧洲。那次疫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造成了四分之一城市居民的死亡，其中就包括他的父亲，一位同样受人尊敬的医生。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靠着迅速获得的声望，并从家产中捐赠出可观的数目，创建了医学协会，这是加勒比各省开办的第一家医学协会，而且在很多年内都是唯一的

一家，乌尔比诺医生担任协会的终身主席。他督促建设了城里的第一条高架水渠、第一个下水道系统，还建起了有篷顶的市场，使原本垃圾成堆的灵魂湾符合了卫生标准。此外，他还是语言学院和历史学院的主席。而由于他对教会做出的贡献，耶路撒冷拉丁教长封他为圣墓骑士团骑士。法国政府则授予他指挥官级别的荣誉军团勋章。他是本城所有宗教团体和市民团体的积极支持者，特别是爱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具有影响力且没有政治利益的市民组成，以在当时来讲相当大胆的进步思想对政府和商界施加压力。在这些想法中，最值得纪念的莫过于一次浮空气球试验。首次气球飞行就把一封信带到了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比人们最终把航空通邮视作一种理性的可能要早得多。成立艺术中心也是医生的主意。后来，艺术中心又在同一座房子里开设了艺术学校，至今还屹立在那里。另外，很多年来，他都是四月花会[8]的赞助者。

看似不可能在一个世纪里办到的事，只有他办到了，即重建从殖民时期起就变成了斗鸡场和公鸡饲养场的喜剧剧院。那是一次壮观的市民运动高峰，本城各界人士无一例外地参与了这次全民总动员，很多人认为它堪称伟业。最终，焕然一新的喜剧剧院举行了落成典礼，尽管当时剧院里还没有座椅和灯光，来看演出的人不得不自带座椅和供场间休息时照明用的灯具。剧院照搬了欧洲人那套盛大的首演礼仪，贵妇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加勒比的伏天里炫耀她们长长的礼服和皮大衣。但同时，剧院也不得不允许仆人进入，以便让他们搬座椅和灯具，并带上他们认为必要的吃食，以应付无休无止的演出：要知道，有的节目甚至会演到次日首台弥撒的时候。首季度的演出由一个法国歌剧团拉开序幕。剧团管弦乐队中的一把竖琴让人大开眼界，而令人无法忘怀的荣耀，则属于剧团中一位土耳其女高音，她拥有完美无瑕的嗓音和戏剧天赋，赤着脚演唱，脚趾上还戴着贵重的宝石戒指。一

盏盏椰油灯散发出浓浓的烟雾，从第一幕起，人们就几乎看不清舞台，歌手们也因此走了音，但城中的记者巧妙地忽略了这些微不足道的瑕疵，赞颂了值得纪念的东西。无疑，这堪称乌尔比诺医生最富感染力的一次倡议，戏剧热甚至感染到本城那些最意想不到的阶层，由此产生了一代形形色色的特里斯坦们和奥赛罗们、阿依达们和齐格弗里德们。不过，热潮也从未达到过乌尔比诺医生所期待的那种极端程度，即见到意大利派和瓦格纳派在幕间休息时棍棒相见，大打出手。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不接受任何官方职位，虽然有人经常无条件地提供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向来无情地批评那些依靠职业威信爬上政治高位的医生。尽管他一直被视作自由派，选举中也通常会把票投给自由党人，但他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传统而非信念。在那些显赫家族中，他或许是唯一一个遇到大主教华丽的四轮马车经过时会在街上跪下来的人。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主张为了国家的利益，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应该彻底妥协。然而，他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特立独行却让任何一方都不把他当自己人：自由党视他为山洞里的哥特人，保守党则认为他基本上算是共济会成员，而共济会的人不接受他，认为他是为罗马天主教廷服务的秘密教士。那些不那么刻薄的批评者则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当民族在无休止的战争中倾流鲜血之际，却依旧醉心于四月花会的贵族而已。

只有两件事似乎与他的这一形象不符。第一件是他把家搬到了暴发户的居住区，离开家族居住了一个多世纪的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另一件则是他和一位既没有高贵姓氏也没有万贯家产的平民姑娘结了婚，这位姑娘曾被那些有着一长串姓氏的夫人们背地里嘲笑了很久，直到她们最终折服，承认她的出众和品行比她们所有人都要胜过数倍。乌尔比诺医生对于他的公众形象在这些以及其他很多方面所

受的微词一直十分清楚，而且他比谁都明白，自己是这个濒临灭绝的姓氏最后的一位主角。他的两个孩子是家族的终结，而且没有任何闪光之处。儿子马可·奥雷里奥和他一样是个医生，与家族历代的长子一样毫无建树，而且现已年过五十，膝下却连一儿半女都没有。唯一的女儿奥菲利娅嫁给了一个人品不错的新奥尔良银行职员，现在已经到了更年期，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虽然家族的血统在历史的长河里就此消亡令乌尔比诺医生痛心不已，但对于死亡，他最担心的，还是费尔明娜·达萨失去他后的孤独生活。

总而言之，这场悲剧不仅震动了医生的家人，而且感染了平民百姓。他们纷纷来到大街，幻想一睹医生的风采，哪怕那风采只是一种传说。全城宣布哀悼三天，公共机构降半旗，所有教堂的钟声都响个不停，直到家庭墓地的墓穴被封上为止。艺术学校的一班学生为遗体做了一个面部模型，打算以此为模子塑造一尊真人大小的半身像，但最后又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大家都认为真实地塑造这最后一刻的惊恐有失庄重。一个前往欧洲恰好途经此地的知名画家用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手法画了一幅巨大的油画，画中乌尔比诺医生站在梯子上，定格在伸手去抓鹦鹉的那个死亡瞬间。唯一和冷酷的现实不符的是，他没有穿无领衬衫，也没有戴绿色条纹背带，而是头戴常礼帽，身着黑色呢子长礼服外套，这个形象参考自霍乱时期一份报纸上的插图。这幅油画在悲剧发生几个月后就展出在“金丝”商店宽敞的长廊里，为的是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因为“金丝”是一家卖进口物品的商店，全城人都会光顾，络绎不绝。之后，油画又出现在所有自认为有义务纪念这位杰出人士的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墙上。最后，它被挂在了艺术学校，那里还为医生举行了第二次葬礼。而多年以后，同样是那里的美术系学生把油画搬出学校，作为某个令人厌恶的时代和某种美学的象征，在大学广场上一把火烧掉了。

从成为寡妇的第一刻起，费尔明娜·达萨便没有表现得像丈夫担心的那样无依无靠。她下了不可动摇的决心，不允许用丈夫的遗体为任何事业谋取利益，甚至对共和国总统在唁电中发出的命令也不予理会，即把遗体置于棺木中，停放在省政府的大厅里供人瞻仰。她以同样的冷静反对在教堂守灵，但由于大主教亲自提出请求，她同意在举行为亡者祈祷的葬礼弥撒时将遗体停放在教堂里。甚至当儿子被各种请求弄得不知所措，出面说项时，费尔明娜·达萨仍旧毫不动摇地坚持着她的乡土观念：死者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他的家人；他们将在自己家里，喝着苦咖啡、吃着奶酪饼为他守灵，并且每个人都有想怎么哭就怎么哭的自由。他们将免去传统的九日守夜礼，下葬后就紧闭大门，除了接待最亲近的来访者，否则不会敞开家门。

家里笼罩在一片丧葬的气氛之中。所有贵重物品都被妥善地保管起来，墙上光秃秃的，只剩下一幅幅绘画曾挂在那里的痕迹。自家的和从邻居家借来的椅子靠墙放着，从客厅一直摆到卧室。大家具都被搬走了，只留下一架三角钢琴蒙着白布躺在角落里，空旷的房间仿佛没有边际，声音像幽灵似的回荡着。在书房中央，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德拉卡列的遗体躺在他父亲的写字台上，没有棺木，脸上凝固着那最后的惊恐，身穿黑色披风，佩戴着圣墓骑士团战斗的长剑。在他旁边，全身孝服、颤颤巍巍、但自制力仍然很强的费尔明娜·达萨接受着吊唁，毫无失态之举，甚至都没有移动过身子，直到次日上午十一点。那时，她站在门廊上，挥挥手帕，说一声“再见”，送别了丈夫。

自从听见蒂戈娜·帕尔多在院子里的喊叫声，看见心爱的老头儿在泥水里垂死挣扎，到如今她能恢复如此自控的状态实属不易。起初她的第一反应是仍有希望，因为丈夫还睁着眼，而且他眼中那四射的光芒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她恳求上帝能够给她哪怕片刻的时间，好让

丈夫在离去之前知道，无论两人间有过什么样的猜疑，她始终是那么爱他。她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强烈愿望，希望能与他从头再来，重新开始生活，好让两人把所有没说出口的话都告诉对方，把所有过去做错了的事重新做好。但面对毫不让步的死神，她只得投降。她的痛苦化作一股对世界、甚至对自己的盲目怒火，而这反而给她注入了自控的力量和独自面对孤独的勇气。从那时起，她心头没有片刻安宁，但她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任何表情泄露出内心的痛苦。唯有那么一瞬间她身不由己地流露出某种凄楚，那就是星期日晚上十一点钟，人们把那口只有主教才有资格使用的棺材抬走的时候。棺木散发出轮船上那种萨波林油漆的味道，配有铜制把手，衬里是带夹层的丝绸。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下令立即盖棺，因为天气热得难以忍受，那许许多多鲜花散发出的气味使得整个家里的空气都稀薄了，而且他隐约在父亲脖子上看到了最初的紫色斑痕。沉静之中，一个漫不经心的声音说道："活到这把年纪，人还在的时候就已经腐烂一半了。"盖棺前，费尔明娜·达萨摘下结婚戒指，把它戴在了亡夫手上，然后把自己的手盖在他手上，就像往常发现他在公共场合信口开河时一样。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她对他说。

隐身在众多社会名流中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突然感到体侧仿佛被刺了一刀。费尔明娜·达萨在第一批吊唁者的混乱中没有认出他来，尽管在那个慌乱的晚上，没有人比他出现得更及时，也没有人比他更尽力。是他把人满为患的厨房安排得秩序井然，让咖啡供应充足。当从邻居家借来的椅子不够用时，是他找来更多的椅子；当屋里的花圈堆得多一个也放不下时，又是他让人把余下的都放在院子里。他忙前忙后，留意不让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家的客人缺少了白兰地。这些客人在二十五周年庆典的高潮时听闻噩耗，惊慌失措地赶来，围坐

在芒果树下继续他们的欢闹。当逃跑的鹦鹉昂着脑袋，张着翅膀，大半夜出现在客厅中时，全屋人都不寒而栗，认为那是被悔恨所驱使，唯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如何及时应对。他一把抓住鹦鹉脖子，让它来不及叫出任何一句愚蠢的口号，便被关进一个盖着布的笼子，带到了马厩。他就这样打理着一切，那般地谨慎有效，谁也没有认为他是在干涉别人的家事，恰恰相反，在这个家庭处于危难的时刻，他的所作所为被视作一种让人无以为报的帮助。

一如看上去的那样：他是一个乐于助人且举止稳重的老人。他身体硬朗挺拔，皮肤是褐色的，汗毛稀少，银色金属架的圆眼镜后面藏着一双充满渴望的眼睛，唇上留着浪漫的小胡须，胡子尖上涂着胶，虽然这种做法已有些过时。他把最后几绺鬓发向上梳起，用发蜡粘在光亮的脑壳中央，以此作为解决完全秃顶的最终办法。他那天生的文质彬彬和忧郁的气质能让他迅速地赢得好感，但也往往被视作一个顽固的单身汉身上的两种可疑品质。为了不让人察觉在刚刚过去的三月他已达七十六岁高龄，他花了很多金钱，也费了很多心思，并付出了坚毅的努力。作为一个仍处在孤独中的灵魂，他坚信自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默默爱得更深。

尽管六月热得如同地狱，但在乌尔比诺医生去世的那天晚上，他始终都穿着自己刚刚听到消息时穿的那身衣服。他平时也总是这身打扮：配有背心的深色呢子外套，赛璐珞衣领上系着一条丝带，一顶毡帽，手里一把兼作拐杖的黑绸雨伞。但当天蒙蒙亮时，他从守灵的地方消失了两个小时。而伴随着第一缕阳光，他又神采奕奕地回来了，胡子刮得整整齐齐，身上散发着沐浴露的馨香。他换上了一件黑色呢子长礼服，这样的衣服他平时已经不穿了，只有参加葬礼和复活节圣周活动时才穿。他没有打领带，而是在翼领上打了一个艺术家式的蝴

蝶结，头上戴了一顶常礼帽。他仍旧带上了雨伞，但这次并不仅仅是出于习惯，而是他确定当天十二点以前就会下起雨来。他把可能下雨的事告诉了乌尔比诺·达萨医生，看他是否可以把葬礼提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来自航运世家，本人就是加勒比河运公司的董事长，可以说对预测天气十分在行，因此他们也的确尝试这么做了。但实在是没有办法在政界、军界、公共和私人团体、军乐队和艺术学校的乐队、各教会学校和宗教团体间进行及时协调，因为大家本已商定在十一点举行葬礼。于是，这场预计将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的葬礼最终被一场毁灭性的暴雨浇得七零八落，狼狈不堪。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哗啦哗啦地踩着泥泞，最终到达乌尔比诺医生家的墓地。墓地被一株殖民时期的木棉守护着，它那繁茂的枝叶一直延伸到围墙之外。就在这同一片树荫下，在墙外的一小块专门用来埋葬自杀者的土地上，加勒比的流亡者们前一天下午刚刚安葬了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并且按照他的遗愿，把狗葬在了他身边。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最终到达墓地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连内衣都被淋透了，惊恐万分地回到家，担心自己会染上肺炎，让这么多年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地保护身体的努力付之东流。他让人为自己准备了一杯加白兰地的热柠檬水，坐在床上用它冲服了两片阿司匹林，然后裹在羊毛被里出了一身大汗，直到恢复了体力。再次回到守灵处时，他感到精神饱满。费尔明娜·达萨重新执掌起家务来。家里已经打扫过，准备接待客人。书房的小祭台上摆放了一张已故男主人的画像，是用蜡笔画的，画框上系着黑丝带。晚八点时，宾客满堂，天气就像前一晚一样炎热。念过玫瑰经后，有人四下请求大家早些回去，以便让亡者的遗孀好好歇歇，因为她从星期日下午以来还不曾休息过。

对大部分客人，费尔明娜·达萨站在祭台旁向他们告了别，而对那些留到最后才走的挚友亲朋，她一直送到了街边的大门口，并准备像往常那样，亲自将大门关好。正当她打算用最后一丝力气把门合上时，看见了身穿丧服站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她高兴起来，因为在很多年前，她就已将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抹掉了，而此时是第一次真切地看见他，看见他的样子从遗忘中清晰地显现出来。可费尔明娜还没有来得及对他的到访表示感谢，他便颤抖而又庄重地将帽子放到胸口的位置，让许久以来支撑他活下来的相思之苦一股脑儿迸发出来。

“费尔明娜，”他对她说，“这个机会我已经等了半个多世纪，就是为了能再一次向您重申我对您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若不是有理由认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一刻是受到了圣神恩典的启示，费尔明娜准会以为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疯子。她即刻的反应是想咒骂他在自己丈夫尸骨未寒时就来亵渎自己的家庭。但盛怒带来的威严制止了她。“你滚开！”她对他说，“在你的有生之年，都别再让我看见你。”她将正要关闭的大门再次完全敞开，斩钉截铁地说：

“我希望这也没有几年了。”

她听着脚步声在寂静的街道上渐渐消失，然后慢慢地关上大门，上了门闩，别好锁头，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在这一刻之前，她从未充分认识到自己年仅十八岁时造成的那个悲剧的分量和后果，从未意识到它竟会一路跟随自己直至死亡。从丈夫出事的那个下午以来，她第一次哭了，哭的时候没人在场，这也是唯一能让她哭出来的方式。她为丈夫的死而哭，为自己的孤独和愤怒而哭。走进空荡荡的卧室时，她又为自己而哭，因为自从她不再是处女之身以后，很少独自睡

在那张床上。和丈夫有关的一切都令她触景伤怀：带穗的拖鞋，枕下的睡衣，梳妆台上没有了他身影的镜子，以及他留在她皮肤上的味道。一个莫名的念头使她浑身一颤：“当被人爱着的人死去时，真该带上他所有的东西。”她不想让别人搀扶她上床，也不想在睡前吃任何东西。痛苦压得她喘不上气来，她祈求上帝今晚就让她在睡梦中死去。带着这个幻想，她脱掉鞋，和衣躺下，顷刻间便睡着了。她在不知不觉中入睡，但她知道自己仍旧活着，她知道床空出了半边，自己像往常一样躺在左边，却没有了右边的另一个身体来保持平衡。她一边睡，一边想。当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睡觉了，她在睡梦中哭了起来。她一边睡，一边抽泣，却始终没有变过姿势，仍旧躺在床的左边。直到公鸡打鸣，直到这个没有了他的清晨那不受欢迎的阳光惊醒了她。之后，她又躺了许久。到了这时，她才发现自己睡了很久却并没有死去，而是一直在梦中哭泣；才发现自己边睡边哭，想得更多的竟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而非她那死去的丈夫。

---

[1] 圣神降临节是纪念耶稣复活后第五十日圣神降临的日子，也是纪念上帝在西奈山向摩西颁布十诫的日子。

[2] 卡斯蒂利亚语，即通常意义上的西班牙语，同时也是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官方语言，其中包括哥伦比亚。

[3] 《玛窦福音》即《马太福音》，是天主教的通常译法。

[4] 据《新约》记载，耶稣在受难前夕，曾预言他的门徒中最忠诚的伯多禄（即圣彼得）会在天亮鸡叫前三次背叛他。结果预言应验，耶稣被抓走后，伯多禄被人问起时，三次否认自己认识耶稣。

[5]麦瑟琳娜，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的第三任妻子，以狠毒和放荡著称。

[6]即前文的阿敏塔·德昌普斯，这是冠夫姓后的名字。

[7]原文为法语。

[8]四月花会，为纪念花神芙洛拉而举办的庆祝活动，起源于古罗马。

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从当初费尔明娜·达萨在两人那段长久而受阻的爱情之后不留余地地拒绝了他，便没有一刻不在思念她。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无需每天在地下室的墙上划条线备忘，因为没有哪一天不发生点什么让他想起她来。决裂那年，他和母亲特兰西多·阿里萨住在窗户街一座租来的普通房子里。母亲从年轻时起就在那儿开了一家杂货铺，还拆些旧衬衫和破布，卖给战争中的伤员当药棉用。他是独生子，是母亲和那位鼎鼎有名的船主皮奥第五[1]·罗阿依萨先生一次偶然结合的产物。后者兄弟三人曾共同创建了加勒比河运公司，为马格达莱纳河上的蒸汽机船航行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皮奥第五·罗阿依萨先生去世的时候，这个儿子只有十岁。虽然他一直暗中承担着儿子的抚养费用，但从未在法律上承认过他，也没有为他的前途做好安排。因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只用了母亲的姓氏，尽管他真正的出身人人皆知。父亲死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得不辍学到邮电局当了学徒。在那里，他被安排给邮袋拆封，分发信件，并负责在邮件到达时通知大伙儿，哪个国家的邮件到了，他就要在邮局门口升起哪个国家的国旗。

他的聪明伶俐引起了电报员洛达里奥·图古特的注意。洛达里奥是个德国移民，除了这份报务工作，还在大教堂的重要仪式上弹管风琴，并兼做音乐家教。他教弗洛伦蒂诺摩尔斯电码，教他发电报，还教他拉小提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只上了几堂课，就能像一个职业小

提琴手那样，耳听乐曲，跟着旋律拉琴了。他在十八岁认识费尔明娜·达萨时，是他那个圈子中最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最会跳时髦的舞曲，还会朗诵伤感的诗歌，而且随叫随到，用小提琴为朋友的女友献上一曲小夜曲独奏。从那时起，他就一直骨瘦如柴，印度人似的头发上打着飘香的发蜡，一副近视眼镜更让他显得楚楚可怜。除了视力上的缺陷，他还患有长期便秘，这迫使他一辈子都依靠灌肠剂。他只有一套像样的礼服，是父亲的遗物，但特兰西多·阿里萨把它打理得很好，弗洛伦蒂诺每个星期日穿起来都像新的一样。尽管他身材瘦削，性格内向，衣衫简陋，他那个圈子里的姑娘们却都靠私下里抽签来决定谁做他的女伴，而他也一直这样与她们厮混。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费尔明娜·达萨，天真的日子就此结束。

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下午。洛达里奥·图古特让他去给一个叫洛伦索·达萨的人送一封电报，电报上未写明住址。他最终在福音花园找到了这位洛伦索·达萨。他家是福音花园中最古老的房子，旧得几乎要倒塌下来，里面的院子也像个修道院的内院。花坛里杂草丛生，石砌的喷泉池里一滴水也没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跟着赤脚的女佣走在走廊的拱顶下，没有听见一点儿人声。走廊上堆着尚未打开的搬家箱子，泥瓦匠的工具扔在用剩的石灰和一包包堆起的水泥中间，因为当时那所房子正在进行一次彻底修缮。院子尽头有一间临时办公室，一个男人正坐在写字台前午睡。男人很胖，鬈曲的络腮胡和嘴上方的胡子连在一起。他的名字正是洛伦索·达萨。这个人在城中并不出名，因为他不到两年前才来到这里，而且不喜欢交际。

他收下电报时的样子就仿佛仍处在一场噩梦当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带着礼貌的同情看着他那双青紫色的眼睛，看着那颤抖的手指费劲地撕开封口处的邮票。这种内心的恐惧弗洛伦蒂诺在很多收信人身

上都看到过，他们始终无法不将电报同死亡的消息联系到一起。但读罢电报，他恢复了情绪，长吁一口气说：“好消息。”他递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实打实的五个里亚尔，并用一个轻松的微笑让他明白，若是坏消息，自己绝不会如此慷慨。接着，他和弗洛伦蒂诺握手道别，这可不是通常和电报邮递员告别的方式。女佣把他送至临街的大门口，但与其说是为给他领路，不如说是为了监视他。他们原路返回，又走过那个带拱顶的走廊。但这一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现房子里还有其他人，因为敞亮的院子中回响着一个女人的声音，正在反复朗读一篇课文。从缝纫室前经过时，弗洛伦蒂诺透过窗子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和一个少女。两人坐在两把紧挨的椅子上，一起读着一本摊开在妇人裙兜上的书。这一幕看上去颇为奇特：竟然是女儿在教妈妈读书。但弗洛伦蒂诺其实只猜对了一半，这位妇人是女孩的姑妈，并非母亲，虽然一直以来，她就像母亲一样抚养着她。朗读没有中断，但女孩抬眼看了看是谁走过窗前。正是这偶然的一瞥，成为这场半世纪后仍未结束的惊天动地的爱情的源头。

关于洛伦索·达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唯一打听到的就是在霍乱后不久，他带着自己的独生女儿和独身妹妹，从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来到这里。当初看见他们下船的人毫不怀疑他们是来此定居的，因为这家人把一个配备齐全的家所需要的一切都带来了。女儿还很小时，他的妻子就去世了。妹妹名叫埃斯科拉斯蒂卡，四十岁，因为正在还愿，上街时总是身穿圣方济各会的修士服，回家后则只在腰间系上修士服的腰带。女孩十三岁，和已故的母亲同名，叫费尔明娜。

大家推测洛伦索·达萨是个有钱人，因为没人知道他有什么职业，但他生活却很富足。他用真金白银买下了福音花园的房子，而修缮费用至少是他买房所用的二百个金比索的两倍。女儿在至圣童贞奉献日

学校上学。两个世纪以来，上流社会的小姐们都会到那里去学习相夫教子的艺术和职责。在殖民时期和共和国初期，那里只接收名门望族的千金。但后来，那些被独立战争搞垮了的古老家族不得不向新时代的现实妥协，于是学校向所有付得起学费的人敞开大门，不再忧心她们的门第出身。但仍有一个基本条件，即入学的姑娘们必须是天主教家庭合法所生。不管怎样，那都是一所昂贵的学校，仅仅是费尔明娜·达萨在那里上学就表明了她家的经济实力，即便其社会地位未必出众。这些消息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受到鼓舞，因为这一切都表明，这位长着一双杏核眼的美丽少女是他梦寐以求的姑娘。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姑娘父亲的严厉管教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他女孩们都是结伴或是由一位年长的女佣陪伴上学，而费尔明娜·达萨不同，她的身边总跟着那位独身的姑妈，而且她的言行举止处处表明，她不被允许参加任何娱乐活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天真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开始了他孤独狩猎者的秘密生涯。从早七点起，他就独自一人坐在花园中一条不易被发现的长椅上，在杏树的树荫下假装读一本诗集，直到看见那位可望而不可即的姑娘走过。她身着蓝色条纹校服，带吊袜带的长袜一直拉到膝头，脚下一双系着交叉鞋带的男士短靴，一条粗粗的辫子从后背垂至腰间，辫梢上系着一个蝴蝶结。她走起路来有一种天生的高傲，昂首挺胸，目不斜视，步履轻快，鼻翼微收，交叉的双臂紧抱着胸前的书包。她走路的样子就像一头小母鹿，仿佛完全不受重力的束缚似的。在她身旁，身穿圣方济各会的褐色修士服、系着修士腰带的姑妈以吃力的步伐紧紧跟随，不给别人留出丝毫靠近她的空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每天看着她们来回经过四次，星期日还有一次看着她们望完大弥撒从教堂走出来的机会。只要能看见自己心爱的姑娘，他就心满意足了。慢慢地，他将她理想化了，把一些不可能的美德和想象中的

情感全都归属于她。两个星期后，除了她，他已经什么都不想了。他决定给她写一张简短的便条，便条两面都被他用书记员般漂亮的字体写得满满当当。但便条在口袋里装了好几天，他却一直不知该如何交给她。就在想法子的过程中，他每晚临睡前又会写上好几页。于是，最初的一封短信变成了一部写满甜言蜜语的宝典。里面词句的灵感都来自在花园等待时因反复阅读而背下来的书籍。

为找到送信途径，他试图认识几个奉献日学校的学生。可是，她们和他的世界相距太远了。而且，反复衡量后，他觉得让其他人知道自己的意图并非明智之举。他还打听到，费尔明娜·达萨刚到这里不久，有人邀请她参加一次星期六舞会，而她的父亲只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就阻止了她："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信已经正反两面写了六十张纸了，此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再也无法承受心事的负担，将自己的秘密一股脑儿地倾诉给了母亲，他唯一可以交心的人。特兰西多·阿里萨被儿子的纯真爱情感动得老泪纵横，尝试用自己的智慧之光为儿子引路。她首先说服儿子不要把那沓写满情诗的信纸交给她，因为那样只会吓着他梦中的姑娘。她猜想在有关心灵的事上，姑娘和他一样是个嫩瓜。第一步，她对儿子说，应该首先让她发现他的热情，这样他的表白才不会令她感到唐突，而且也让她有时间考虑。

"但最重要的是，"她对儿子说，"你首先要攻克的不是她，而是她的姑妈。"

两个忠告无疑都很明智，只是来得晚了点儿。事实上，就在那天，就在费尔明娜·达萨从正在教姑妈阅读的课文中失神，抬头去看是谁经过走廊的那一刹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副无依无靠的可怜样儿已经在她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饭时父亲谈起电报的事，于是她也就知道了他从事什么职业，来她家干什么。这些信息增加了她

的兴趣，因为同那个时代很多人的想法一样，她觉着电报的发明与魔法有着某种关联。所以当她第一次看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坐在花园的树下看书时，一眼就认出了他。但若非姑妈告诉她，他已经在那里好几个星期了，她也不会感到心中不安。后来，她们星期日望弥撒出来时又看见了他，姑妈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那么多次的相遇绝非偶然。她说："他肯定不是为了我而如此大费周章。"埃斯科拉斯蒂卡·达萨姑妈虽然行事严厉，身上还穿着忏悔服，但对生活的敏感和参与热忱是她最大的美德。单单是想到一个男人对自己的侄女感兴趣，她便生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激动。然而，费尔明娜·达萨却连对爱情基本的好奇心都没有。她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唯一怀有的是一丝同情，因为她觉得他是得了什么病。但姑妈告诉她，要想看清一个男人的真正性情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她敢肯定，那个为了看她们经过而坐在花园中的小伙子得的只可能是相思病。

对于这个源自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的孤独女孩来说，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是她倾吐心事的对象和情感的避风港。自从母亲死后，是姑妈一手将她带大。而在同洛伦索·达萨的关系上，埃斯科拉斯蒂卡表现得更像是女孩的同谋，而非姑妈。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出现成了她们俩私下里发明的又一种打发沉闷时光的消遣。她们每天经过福音花园四次，每一次两人都用快速的眼神急切地寻找那位清瘦的哨兵。他腼腆害羞，毫不起眼，不管天气有多炎热，始终穿着一身黑衣。他总是坐在树下假装看书。"他在那儿！"两人中最先发现他的那个会这样说，同时强忍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抬眼看她们之前。等他抬起头，看到的则是两个一本正经、与他的世界相距遥远的女人，穿过花园时甚至看都不会看他一眼。

“可怜的孩子，”姑妈说，“因为我在你旁边，他不敢走过来。但如果他是认真的，总有一天，他会过来交给你一封信。”

预见到将来种种可能的困境，姑妈教女孩如何用手语和人交流，对于受阻的爱情来说，这是必须借助的手段。这种漫不经心、几近幼稚的嬉闹，令费尔明娜·达萨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好奇。但几个月过去了，她没有想到这种好奇心竟会有所发展。不知从哪一刻起，这种消遣竟然变成了渴望。她浑身热血沸腾，急切地想要见到他。一天夜里，她惊醒了，因为她看见他就站在床脚，在黑暗中凝视着她。于是，她一心盼望姑妈的预言能够成真。祈祷时，她甚至祈求上帝赐予他勇气，让他把信交给她，只因她想知道他到底会写些什么。

然而她的祈祷并没有被接纳。事与愿违：这一切恰好发生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他的母亲倾诉心事之时，而后者正劝他不要交出那封近七十页的情书，于是，在那一年余下的日子里，费尔明娜·达萨只能是等待。随着十二月假期的临近，她的渴望慢慢变成了绝望。她反复不安地问自己，在不上学的三个月里，要怎么做才能见到他，并让他见到自己。到了圣诞夜，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直至她感觉到他正在子时弥撒的人群中凝视着她。她浑身战栗，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她不敢回头，因为她坐在父亲和姑妈之间。她必须极力克制自己，以免让他们察觉出她的慌乱。但当人们在一片混乱之中走出教堂时，她感到他和她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他的身影在躁动的人群中显得那般清晰，就在她迈出正殿时，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她回过头，从肩膀上方望去。于是，在距离自己的双眼两拃远的地方，她看见了他那冰冷的眼睛、青紫色的面庞和因爱情的恐惧而变得僵硬的双唇。她被自己的胆大吓得魂不附体，一把抓住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的手臂才没有摔倒。透过女孩的蕾丝无指手套，姑妈感觉到她冷汗涔涔，于

是用一个不被人察觉的暗号安慰了她，向她表示自己无条件的支持。在举国上下一片爆竹和鼓乐声中，在家家门口悬挂的彩灯灯光中，在渴望平安的人群的欢呼声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像个梦游者般徘徊到天亮。他透过泪眼打量着眼前的节日景象，被幻觉弄得精神恍惚，仿佛那一夜降生的不是上帝，而是他自己。

接下来的一周，他的神志更加恍惚。午休时分，他无望地走过费尔明娜·达萨家，看见她和姑妈正坐在门廊旁的杏树下。此情此景正是在露天再现了那天下午他第一次在缝纫室见到她时的画面：女孩正在教姑妈读书。但没有穿校服的费尔明娜·达萨变了个样，她穿着一件针织长袍，许许多多的褶皱从肩膀处垂下来，就像古希腊女子穿的袍子。她头上戴着新鲜的栀子花编成的花环，看上去就像一位头顶王冠的女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坐在花园中，断定她们能看见自己。这次他没有假装看书，只是将书打开，眼睛则始终盯着自己朝思暮想的姑娘。可她却连一个怜悯的眼神都没有给他。

起初，他认为她们在杏树下读书只是个偶然变化，或许是因为房子在不断修缮。但接下来的几天，他看出费尔明娜·达萨在三个月的假期里，每天下午的同一时刻都会出现在那里，出现在他的视线中。这种确信给他注入了新的勇气。在他的印象中，她似乎并没有看见过他，他也从没察觉到她有任何感兴趣或者反感的表现。但是，在她的冷漠中闪烁着某种别样的东西，鼓励着他坚持下去。忽然有一天，在一月份的一个下午，姑妈将手中的活计放在椅子上，把侄女独自留在门廊旁边，留在了那散落一地的黄色杏树叶之间。这也许是一次故意安排好的机会，受到这个鲁莽假设的鼓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穿过大街，来到了费尔明娜·达萨面前。他离她那么近，甚至能听到她每一次的呼吸声，闻到她身上散发的馨香，在此生余下的岁月中，他正是靠

着这种馨香来辨认她。他扬着头，坚定地对她说了一句话，这种坚定他半个世纪以后才再次拥有，而且为的是同一个缘由。

“我对您唯一的请求，便是请您收下我的一封信。”他对她说。

他的声音与费尔明娜·达萨期待的不同：口齿清晰，透出一股和他那忧郁的行为方式截然不同的自制力。她的目光没有离开手上的刺绣，回答他说：“没有父亲的允许，我不能收。”她温暖的声音使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浑身颤抖，低沉的音色令他终生难忘。但他努力让自己站稳，马上又说：“那就去征得他的同意。”接着，他又将命令的语气转为柔声恳求，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费尔明娜·达萨没有看他，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刺绣，但她的决定却像打开了一道门缝，足以让整个世界通过。

“请您每天下午都到这里来，”她对他说，“等待我换椅子的时刻。”

直到第二周的星期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才弄明白她的意思。那天，坐在花园的长椅上，他看到了与以往同样的场景，只有一处改变：在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进屋的时候，费尔明娜·达萨站起身来，坐到了另一把椅子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身穿长礼服，扣眼上别着一朵白色山茶花。他穿过街道，站到她的面前，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费尔明娜·达萨没有抬头看他，而是环顾了一下四周。旱季的一片昏沉中，街上空无一人，风席卷着枯叶。

“把信给我吧。”她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想把自己那读了太多遍、已背得滚瓜烂熟的七十页情书全都带给她，但后来还是决定只给她一封简明扼要的半页

纸的短信。在这半页纸中，他对最为本质的东西做出了承诺，即他那可以经受住任何考验的忠诚和至死不渝的爱。他把信从长礼服的内兜里掏出来，放到备受煎熬的绣花姑娘眼前。直到这时，她都不敢看他一眼。她看见蓝色的信封在他那只因害怕而僵硬的手上颤抖，于是举起绣花绷子，好让他把信放在上面，因为她无法接受让他发现自己的手指也在颤抖。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一只鸟儿在杏树的枝叶间抖动了一下身子，于是，一摊鸟粪不偏不倚正掉在绣花布上。费尔明娜·达萨立刻撤回了绣花绷子，将它藏到椅子后面，以免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注意到这件事。她第一次抬起她那羞得通红的脸颊，瞥了他一眼。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若无其事地用手举着信，说："这是个好兆头。"她又第一次用微笑向他表达了感激之情。随后，她几乎可以说是把信从他手中夺了过来，折好塞进紧身背心里。他将扣眼上别着的那朵山茶花献给她。她拒绝了："这是定情之花。"随即，她意识到时间已到，于是又恢复了原先的姿势。

"现在，您走吧，"她说，"没有我的通知，请您不要再来了。"

自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见到她后，他的母亲其实还没等儿子说起，便发现了他的心事，因为他开始寡言少语，茶饭不思，辗转反侧，夜夜难眠。但在他等待姑娘的第一封回信时，焦虑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了。他腹泻，吐绿水，晕头转向，还常常突然昏厥。这一次可把他的母亲吓坏了，因为这状况不像是因为爱情而心神不宁，倒像是染上了霍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教父是一个精通顺势疗法的老头儿，从特兰西多·阿里萨还在当地下情人时起，就一直是她最信赖的人。老人看到病人的情况也吓了一跳，因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脉搏微弱，呼吸沉重，像垂死之人一样冒着虚汗。但经检查后得知，病人并没有发烧，浑身也没有哪一处疼痛，唯一确切的感觉就是迫切地希望

自己死掉。老人随后探询了隐情，先是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而后又向他的母亲，于是再一次证实了相思病具有和霍乱相同的症状。他开出方子，用椴树花熬水来镇定神经，并且建议病人外出去散散心，希望通过距离让他得到安慰。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愿望却恰恰与之相反：他甘愿享受煎熬。

特兰西多·阿里萨是个随性的黑白混血女人，向往幸福，却为贫穷所累。她对儿子的痛苦感同身受，并从中得到满足。儿子神志不清时，她喂他喝椴树花水；儿子浑身发冷时，她为他裹上羊毛毯子。与此同时，她还为他鼓劲，让他在灰心丧气时也能得到安慰。

“趁年轻，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尽力去尝遍所有痛苦，”她对儿子说，“这种事可不是一辈子什么时候都会遇到的。”

但邮局里的人当然不这样想。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甘堕落，成了一个懒汉。他总是心不在焉，以至于把通告邮件到达的旗子都搞混了。一个星期三，他升起了德国旗，而到达的船只却是利兰[2]公司的，运来的邮件是利物浦的；还有一天，他升起了美国旗，而来船却是大西洋轮船总局[3]的，运送的是来自圣纳泽尔[4]的邮件。爱情扰得他心神不宁，频频出错，引起了众人的抗议。他没有丢掉工作，完全是因为洛达里奥·图古特把他留在了电报室，还带他去教堂唱诗班拉小提琴。他们之间的友谊令人费解，毕竟，两人年龄悬殊，几乎是爷孙两辈。但他们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港口的小酒馆里，都相处融洽。港口的小酒馆是那些彻夜不归的人的去处，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从靠人施舍的酒鬼到衣着考究的少爷，而后者往往是从社交俱乐部的豪华宴会中溜到这里来吃炸梭鱼和椰汁饭的。洛达里奥·图古特常常在电报室值完最后一班后到这里来，一边喝着牙买加甜酒，一边和那些在安

的列斯群岛跑船的疯狂水手们一起拉手风琴，直到天亮。他身材高大，动作有点像老乌龟，胡子是金黄色的，每次晚上出门，总带着一顶弗里吉亚帽。就差在头上插一串风铃草，否则他就和圣尼古拉[5]一模一样了。每个星期，他至少要和一只“夜鸟”过上一晚，他就是这么称呼那些在小旅馆里向水手出卖应急爱情的姑娘们的。刚认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时，他以言传身教的喜悦带着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领到自己的秘密天堂。他为他挑选自己认为最好的夜鸟，同她们讨价还价，商定方式，还用自己的钱提前付了账。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接受：他还是童男，并且决心除非因为爱情，否则绝不失掉童贞。

这家旅馆是一座殖民时期的贵族府邸，如今辉煌不再。宽敞的大厅和大理石房间被硬纸板隔成了一个个小房间，硬纸板上满是大头针刺出的小孔。房间租给来此寻欢作乐的人，同样也租给那些偷窥的人。据说，有些偷窥者被毛衣针戳瞎了一只眼睛，还有的竟发现窥到的是自己的妻子，也有一些出身名门的贵族，化装成淫荡的女人来到这里，为的是寻找途经此地的水手长们发泄一番。此外，还有种种关于偷窥者和被偷窥者不幸遭遇的传说，以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单是想到探头去偷看一下隔壁房间，都吓得心惊肉跳。因此，洛达里奥·图古特最终也没能使他相信，看别人和让别人看都是欧洲皇室和贵族的雅好。

与他高大的身材使人产生的联想相反，洛达里奥·图古特有一个只有天使才有的那种小玩意儿，就像玫瑰花的骨朵儿。但这恐怕是一个幸运的缺陷，因为那些最放荡的夜鸟都争先恐后地抢着跟他睡觉。她们像被扼断了喉咙似的叫声震动了整座宫殿的立柱，吓得鬼魂们都直打哆嗦。据说，他是用了一种用蛇毒配制的油膏，能让女人们欲火焚身，但他发誓说，除了上帝赐予的东西，他没有使用其他任何手段。

他大笑着说："这完全是因为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要经过很多年，才能理解洛达里奥·图古特或许说得不假。而直到他受到更进一步的感情教育，认识了一个同时压榨三个女人、过着皇帝般生活的男人时，才彻底相信了这句话。那三个女人每天清晨都向这个男人交账，跪在他脚边，请求他原谅自己收入之微薄。而她们唯一能够期待的奖赏就是，他将同她们中给他挣钱最多的那个女人睡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以为只有恐惧才能造成这样的屈辱。然而，其中一个女人的回答却令他大吃一惊。

"这一切，"她对他说，"只可能是因为爱。"

洛达里奥·图古特之所以成为旅馆中讨人喜欢的客人，与其说是因为他床第间的本事，倒不如说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呢，由于他沉默寡言，且个性难以捉摸，也受到旅馆主人的青睐。在那些最痛苦艰难的日子里，他常常把自己关在旅馆闷热的房间中，朗读催人泪下的诗歌或连载的爱情小说。他的梦幻在阳台上筑起黑燕子的巢穴，在午睡的昏沉中留下亲吻和扇动翅膀的窸窣。黄昏时，酷热渐渐退去，他不可避免地听到隔壁传来的谈话声，人们来此借由片刻的欢愉以缓解一天的疲劳。就这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听到了许多私下议论，甚至有一些是国家机密，由那些身份显赫的客人甚或地方官员透露给他们一夜情的爱人，却没有想到隔墙有耳。也正是由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得知，索塔文托群岛以北四西班牙海里的地方，躺着一艘十八世纪的西班牙沉船，上面载有五千多亿纯金比索还有宝石。这个故事令他惊诧不已，但要等到几个月后，他才会再次想起这件事。爱情的疯狂魔力激起了他打捞这座沉没宝藏的欲望，为的是能让费尔明娜·达萨在金子池里打滚。

多年以后，当他试图回忆那个被诗歌的魔力理想化了的姑娘原本的模样时，却发现自己无法将她从昔日那些支离破碎的黄昏中分离出来。即便是在急切等待着她的第一封回信的那些日子里，在他悄悄地望着她却不让她发现的那些日子里，他看到的也只是午后两点的阳光下和纷纷扬扬的杏花中她隐约的轮廓，无论季节如何变化，那情景始终都停留在四月。而他之所以愿意站上唱诗楼的首席位置，用小提琴与洛达里奥合奏，唯一的目的就是看她的长裙如何在赞美诗的歌声中轻轻飘动。但他的出神最终让他丧失了这种愉悦的机会：神秘的宗教音乐对他当时的灵魂来说是那么不痛不痒，于是他试着用爱的华尔兹为它注入激情，最后，洛达里奥·图古特不得不把他从唱诗班中开除了。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屈从于自己的欲望，偷食了特兰西多·阿里萨在院中花坛里种的栀子花。就这样，他知道了费尔明娜·达萨的味道。同样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偶然间在母亲的一个箱子里找到一瓶一升装的香水，是汉堡至美国航线的海员的走私品。他禁不住诱惑尝了尝，想从中寻找深爱的女人其他的味道。他喝了一口又一口，细细品味直到天亮，最终醉倒在费尔明娜·达萨的芬芳之中。他先是在港口的小酒馆里喝，然后又来到海边的防波堤上。在那里，无家可归的恋人们通过做爱彼此安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出神地望着大海，最终失去了意识。特兰西多·阿里萨提心吊胆地等他到早晨六点，然后跑遍各个意想不到的角落去找他。午后不久，她终于在一个常有人跳海的海湾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在一摊散发着香气的呕吐物中翻滚。

她在儿子身体康复期间，训斥了他被动等候回音的消极状态。她提醒他，弱者永远无法进入爱情的王国，因为那是一个严酷、吝啬的国度，女人只会对意志坚强的男人俯首称臣，因为只有这样的男人才能带给她们安全感，她们渴望那种安全感，以面对生活的挑战。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领会了这一课的精神，甚至也许领会得有些过头。当特

兰西多·阿里萨看到儿子身穿黑色礼服，头戴呢帽，赛璐珞衣领上打着富有诗意的蝴蝶结，走出杂货铺的那一刻，她难以掩饰心中的骄傲，内心生出的爱欲甚至多过母亲的慈爱。她戏谑地问儿子是不是要去参加葬礼。儿子面红耳赤地说："差不多。"她注意到他紧张得几乎喘不上气来，但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她最后叮嘱了儿子几句，祝福了他，还嬉笑地向他许诺，会再给他弄瓶香水以庆祝他的凯旋。

其实自从一个月前把信交给费尔明娜·达萨，他已经多次违背不再去小花园的承诺，只不过加倍小心不让自己被发现罢了。一切与以往并无不同。费尔明娜·达萨和姑妈在树下读书，到下午两点左右、全城刚刚从午睡中醒来时结束，然后一起刺绣直到热浪退去。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等姑妈走进屋，便迈着英姿飒爽的步伐穿过马路，这种步伐帮助他那软软的膝盖支撑住身体。但他没有走向费尔明娜·达萨，而是径直朝姑妈走去。

"请让我单独和小姐待片刻，"他说，"我有重要的事要对她说。"

"放肆！"姑妈对他说，"她的事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听的。"

"那么我就不说了，"他说，"但我要提醒您，您要对此负责。"

埃斯科拉斯蒂卡·达萨心目中的理想爱情并非如此，但她还是吓得站了起来，因为她生平头一次被这样一个想法震慑住了，即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在圣神的启示下讲话。于是，她走进屋去换绣花针，把两个年轻人留在门口的杏树下。

事实上，对这位像冬天的燕子一样出现在她生活中的默默追求者，费尔明娜·达萨了解得很少。要不是信上的落款，她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那以后，她打听到他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母亲是一

位勤劳而正派的独身女人，无奈却被年轻时唯一的一次不检点打上了永久的烙印。她还得知，他并非像她猜想的那样是一个送电报的邮递员，而是电报室出色的副手，而且很受器重。她甚至认为他那天来给父亲送电报，只是一个为了见到她的借口。这个猜测让她感动不已。她还知道他是唱诗班的乐师之一。尽管在望弥撒时，她从不敢抬眼去证实一下。但一个星期日，她突然发现其他乐器都是在为众人演奏，只有小提琴是为她一个人拉的。他原本不是她会选择的那种人，但他那过时的眼镜、神甫似的长袍，以及举手投足间的神秘感激起了她难以抵抗的好奇心，而她却从来没有想过，好奇心也是爱情的种种伪装之一。

她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要收下他的信。她并不为此自责，但越来越急迫的作答需要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负担。父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偶然的眼神，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动作和表情，在她看来都像是为套出她的秘密而设下的陷阱。她惊恐万分，在饭桌上尽量避免讲话，唯恐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她甚至对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也闪烁其词，虽然姑妈像对待自己的心事一样，分担着她压抑在心中的烦恼。她常常动不动就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一遍又一遍地读那封信，试图从中发现某种秘密代码，某种隐藏在那三百一十四个字母、五十八个单词间的神秘暗语，希望这些词句能表达出比它们原本所表达的更多的含义。然而，她并没有发现比她初读时所理解的更多的意思。当初刚拿到信时，她冲进卫生间，把自己锁在里面，心怦怦跳个不停。她撕开信封，幻想这必定是一封感情丰富、热情似火的长信，但看到的却只是一页散发着芳香的纸，不过信中表露的决心着实吓了她一跳。

起初她都没有认真想过一定要回信，但信上说得清清楚楚，她无法逃避。正是在这时，在她反反复复犹豫不决时，她惊讶地发现自己想念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频繁和深切程度已经超过了原本的意愿。她甚至痛苦地问自己，他为什么没有在往常的时间出现在小花园，竟忘记了正是自己让他在她思考如何回信的这段日子不要再来。她从未如此这般地思念某个人。他明明没有在那里，她却设想他在；她盼望他出现在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她从梦中惊醒，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她睡觉时他就在黑暗之中凝视着自己。如此种种，以至于当她觉察到他坚定的脚步踏在小花园那黄色的落叶中时，费了很大努力才相信这不是幻觉对她的又一次戏弄。但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一种和他的郁郁寡欢极不相称的威严向她索要回信，她终于从惶恐之中回过神来，试图逃避，直言说，她不知道如何答复。然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并没有知难而退。

“既然您收下了信，”他说，“那么，不回信是不礼貌的。”

于是，兜兜转转到此结束。费尔明娜·达萨终于下定了决心，为自己的拖延致歉，并郑重承诺：假期结束前他一定会收到答复。她也的确履行了承诺。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就在学校开学前三天，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来到电报室，询问发一封电报到磨盘村需要花多少钱，而这个地名甚至都不在电报服务的区域范围内。她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接待了她，装作完全不认识对方。临走时，她假装把一本用蜥蜴皮装裱的弥撒经书落在了柜台上，里面夹着一个烫着金色花纹的亚麻信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幸福弄得神魂颠倒，一边嚼着玫瑰花瓣一边读信，度过了整个下午。他逐字逐句、反反复复地读着，读得越多，吃下的玫瑰花瓣也越多，以至于他的母亲不得不像对付小牛犊一样强按着他的头，逼他吞下一剂蓖麻油。

这是爱情之火熊熊燃烧的一年。无论在他还是她的生活中，除了想念对方、梦见对方、焦急地等信并回信，便再没有其他事情。在那个如痴如醉的春天，以及接下来的第二年，他们再没有面对面地讲过话。甚至于，自从他们第一次见到彼此，直到半个世纪后他对她重申自己的誓言，在此期间他们再也没有单独见过一面，互诉爱语。但在最初的三个月，他们没有一天不在给对方写信，有一段时间甚至一天两封。面对自己助燃的这把吞噬一切的烈火，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都有些害怕起来。

自从她带着心中残存的那点儿对自己命运的报复之心，将第一封回信带到电报室起，她便开始允许两人每天看似偶然地在街上相遇，交换信件。但她始终没有勇气为他们安排一次哪怕是平常而又短暂的谈话。就在第三个月末尾的时候，她明白了侄女的所作所为并非像她起初认为的那样是青春期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她自己的生活也受到了这场爱情之火的威胁。事实上，除了哥哥仁慈的接济，埃斯科拉斯蒂卡·达萨并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她知道，以哥哥专横的性格，他绝不会原谅自己如此嘲弄他的信任。但到了最后抉择的关头，她还是不忍心让侄女遭受自己从年轻时起就遭受的那种无可挽回的不幸。于是，她允许侄女采用一种可以给她带来天真幻想的策略。方法很简单：费尔明娜·达萨把信放在每天从家到学校途中某个隐秘的地方，同时在信上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指明她希望在哪里取到回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如此照做。就这样，在那一年余下的日子里，埃斯科拉斯蒂卡·达萨内心矛盾地看着他们从教堂的圣水池转移到树洞，再到殖民时期城堡废墟的裂缝中。有时候，他们找到信时，它已被雨水淋湿，沾满泥点，或是不幸被弄烂了。还有时，由于种种原因信丢了，但他们总有办法重新建立起联系。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每晚都不顾自己的身体拼命地写信。在杂货铺的里间，忍受着椰油灯散发出的有损健康的烟雾，他一字一句地写着。他越是努力模仿自己喜爱的“人民图书馆”那几位诗人近八十册的作品，信就写得越长，且越混乱。他的母亲曾那般热情地鼓励他尽情享受痛苦，如今也开始为他的健康忧心。“你把脑子都要耗尽了，”天明鸡叫时，她在卧室对他喊道，“没有哪个女人值得你这样。”她从不记得有谁曾如此迷失。但他没有理会母亲的话。有时，他彻夜不眠，为了能让费尔明娜·达萨在上学路上拿到信，他一大早就将信放到约定的秘密地点，然后带着一头因爱情而蓬乱的头发，来到办公室。而费尔明娜·达萨则在父亲的监视和修女们不怀好意的窥探下，把自己关进洗手间，或是在课堂上假装做笔记时，用练习本写上不到半页。但不仅由于时间紧迫和害怕，更由于性格使然，她的信从不触及感情问题，而只是像工工整整的航海日志一样讲讲日常琐事。事实上，这些信对她而言只是一种消遣，用来维持炭火不灭，但不必把手伸到火中，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在信中的每一行里把自己燃烧殆尽。他渴望用自己的狂热感染她，用大头针在山茶花的花瓣上为她刻下微型诗句。是他而非她，大胆地将自己的一缕头发夹进信中，却没有收到渴望的回赠——费尔明娜·达萨一根完整的秀发。不过，他至少让她向前迈了一步，因为从那之后，她开始给他寄来用字典夹干的叶脉、蝴蝶的翅膀和奇异的羽毛。在他生日时，她甚至送了他一块一平方厘米大小的圣佩德罗·克拉维尔[6]曾经穿过的教士服上的布料，那是那个时期人们私下买卖的，对于她这个年龄的学生来说，绝对是个不小的数目。一天晚上，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费尔明娜·达萨被一首小提琴独奏的小夜曲惊醒，曲中不断重复着一段华尔兹的旋律。她颤抖了，因为她听得分明，每一个音符都表达出感激之情，感激她送的花瓣，感激她占用算术课的时间给他写信，感激她因想他胜过了关心自然科学

而造成对考试的恐惧。但她还是不敢相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竟会做出如此莽撞的事来。

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时，洛伦索·达萨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一是他不知道在小夜曲的语言中，反复演奏同一段旋律有何深意，二是虽然他听得专注，但还是不知道乐曲是为哪户人家而奏。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的冷静让侄女恢复了心神。她肯定地说自己透过卧室的纱帘看到那个孤独的小提琴手坐在花园的另一边，还说不管怎样，单曲重复代表的是决裂。在当天的信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证实了自己就是献上小夜曲的人，那曲华尔兹是他自己写的，曲名代表着费尔明娜·达萨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花冠女神。他再也没有在花园中拉过小提琴，但常常会在有月亮的夜晚，精心选择合适的地方献上一曲，既让她在卧室里就能听到，又不必再提心吊胆。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就是贫民墓地。它坐落在一座贫瘠的小山上，整日经受着日晒雨淋，很多秃鹫栖息在那里。从那里奏出的音乐有一种空灵的回声。后来，他还学会了分辨风向，以确定他的乐声能到达它应该到的地方。

那年八月，一场新的内战即将再次危及全国。半个世纪以来，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不断蹂躏着这个国家。政府施行军事管制，在加勒比沿岸的几个州从下午六点起开始宵禁。虽然已经发生过几次骚乱，军队多次滥用暴行，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仍然迷迷糊糊，对世界的状况一无所知。一天清晨，他正在用他那爱情的呼唤扰乱亡者的宁静时，一支军事巡逻队逮捕了他。他被指控为间谍，以高音谱号的形式向在附近水域游弋的自由党船舰发送暗号，但他奇迹般地逃过一劫，没有被当场处决。

“什么间谍？什么乌七八糟的玩意儿？”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我不过是个可怜的恋人。”

他被带上脚镣，在当地警备队的牢房里睡了三个晚上。但当他被释放时，却为囚禁的时间太短而感到沮丧。甚至在上了年纪以后，那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早已在他的记忆中混淆，他却仍旧在想，他是这个城市，或许是整个国家中唯一一个因爱情而戴上五磅重的镣铐的人。

狂热的通信即将满两年时，在一封只有一段话的信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费尔明娜·达萨正式求婚了。之前的六个月里，他曾给她寄过好几次白色山茶花，但她都在下一封信中还给了他，为的是既让他不要怀疑她愿意继续给他写信，又不愿背上承诺的重负。事实上，她一直把山茶花的一来一回当作一种调情，而从未视之为决定自己命运的十字路口。但当接到正式求婚的那一刻，她感觉自己仿佛第一次被死神抓伤了。她大惊失色，把这件事告诉了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姑妈勇敢而睿智地担起了为侄女答疑解惑的责任，这两种品质是当初二十岁的她被迫决定自己命运时所不曾具有的。

“回答他说你愿意，”她对侄女说，“即便你害怕得要死，即便你以后可能后悔。因为如果你说不，无论如何你都会后悔一辈子。”

然而，费尔明娜·达萨是那么茫然，她请求给她一段时间考虑。先是要求一个月，而后又是一个月，接着再是一个月。四个月过去了，她依旧没有回复，这时她再一次收到了白色山茶花。和前几次不同，这次信封中装着的不只是山茶花，还有一份最后通牒：要么现在，要么永远都不。这一次，换作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到了死神的面孔，因为当天下午，他收到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从学校练习本的边缘撕下来的纸条，上面只有一行用铅笔写的回答：好吧，我同意结婚，只要您保证不逼我吃茄子。

这个回答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措手不及，但他的母亲却早有准备。自从他六个月前第一次说起结婚的打算，特兰西多·阿里萨就开始着手张罗，把之前一直和两家人合租的房子整幢承租下来。这是一座十七世纪的民用建筑，上下两层，曾是西班牙人治下的烟草专卖商店。它的所有者破产后，无力维持房子的日常开销，只好将它分成几小块空间租出去。房子的一部分临街，是曾经的店面所在；另一部分位于地上铺着方砖的院子深处，是原来的厂房所在；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马厩，如今被房客共用来洗晒衣服。特兰西多·阿里萨租的是临街部分，虽然是最小的，却也是整幢房子中最有用且保持得最好的部分。昔日烟草店大厅的位置正是现在的杂货铺，有一扇临街的大门，旁边那间只靠一扇天窗通风的古老库房是特兰西多·阿里萨睡觉的地方。店铺里间是原大厅的一半，是用一道木隔扇隔出来的，那里有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既是餐桌又是写字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如果不写信写到天亮，就会在那里支起一张吊床。对两个人来说，这个空间还不错，但再多一个就有些不够了，特别是对一个就读于至圣童贞奉献日学校的小姐来说。而且，这位小姐的父亲还曾把一座瓦砾中的房子修缮一新，要知道，当时一些头顶七个姓氏的家族，睡觉时都要提心吊胆，生怕房顶塌下来压到他们身上。于是，特兰西多·阿里萨征得房东的同意，占用了院子的走廊，条件是五年内保持房子处于良好状态。

她有资本这样做。杂货铺和拆旧衣做止血药棉所带来的殷实收入已足够维持她节俭的生活，此外，她还把自己的积蓄借给那些新沦落为穷人却爱面子的主顾们。他们为感激她口风严密而愿意接受高额利息，特兰西多·阿里萨借此让积蓄翻了好几番。在杂货铺门前，那些夫人们像王后一般雍容华贵地从华丽的四轮马车上走下来，身边并不带着碍手碍脚的奶妈和仆人。她们装作来买荷兰的花边和金银绦子的边

饰，然后一边抽泣几声，一边把自己那失落的天堂中最后的几件仿金首饰典当掉。特兰西多·阿里萨为她们排忧解难的同时，对她们的家世仍毕恭毕敬，以至于很多人临走时更多地是感激她的尊重而非帮助。不到十年时间，她对那些几次赎回又几次含泪典当的首饰已经熟悉得如同自家的东西一样了。当儿子决定结婚时，她的收益早已变成法定标准的黄金，埋在床下的一只罐子里。她盘算了一下，发现这笔钱不仅够她把别人的这座房子维持五年，而且靠着她的小聪明和再多一点好运气，或许还能在死前把整座房子买下来，留给她满心期盼的十二个孙子孙女。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已被任命为电报室的临时第一助理，如果洛达里奥·图古特能到来年即将成立的电报磁力学校去当校长，他希望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留下来当电报室的头儿。

因此，结婚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但特兰西多·阿里萨认为慎重起见，还有两个条件需要考虑。第一，要调查一下洛伦索·达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口音无疑表明了他来自哪里，但他的身份、他谋生的手段却没有人准确知道。第二，这对恋人的恋爱期应当更长一些，这样才能让两人通过亲身交往彼此更加了解；同时，他们要对此段恋情严格保密，直到已经非常确定自己的感情。她建议他们等到战争结束再结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同意绝对保密，因为母亲说得很有道理，也因为他自己向来不愿多言的性格。另外，他也同意延长恋爱时间，但他认为要等到战争结束再结婚是不现实的，因为独立后的大半个世纪以来，国家没有一天是太平的。

“我们会等老的。”他说。

他那位精通顺势疗法的教父偶然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他并不认为战争是什么障碍。在他看来，那不过是被领主像赶牛一般驱使的穷人跟被政府驱使的赤脚的士兵在打架罢了。

“仗是在山上打的。”他说，“自打我生下来，在城里杀我们的就从来不是子弹，而是法令。”

不管怎样，结婚的细节问题在接下来这个星期的信中得以商定。费尔明娜·达萨接受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的忠告，同意以两年为期，保持绝对贞洁，并建议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她完成中学学业的圣诞节假期里向她求婚。届时她将征得父亲的同意，两人可以根据她父亲赞同的程度，决定如何正式订婚。与此同时，他们以一如既往的热情和之前一样频繁通信，但再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担惊受怕，信中的口吻慢慢变得如同夫妻之间。已经没有什么会扰乱他们的梦想。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生活变了。得到回报的爱情给予了他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力量。他在工作中表现出色，洛达里奥·图古特没费吹灰之力就使他被任命为自己的终身助手。那时，电报磁力学校的计划失败了，于是，这个德国人把全部空闲时间都献给了他唯一真正喜欢的事情，即到港口去和水手们一起拉手风琴、喝啤酒，最后再到小旅馆过上一夜。又过了许多时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才发现，洛达里奥·图古特在那个欢愉场所有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他已经变成那栋建筑的主人，而且还成了那些港口夜鸟的老板。他用自己多年的积蓄把那里一点一点买了下来，但替他出头露面的是一个又瘦又小、头发像刷子一样的独眼人：这个人心地善良、性格温顺，谁也想不到他会是一位出色的经理。但事实的确如此。至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这样认为的，因为这位经理在他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告诉他说他在这里长期拥有一个房间，不仅可以供他在确定有需要时解决下半身的问题，还可以供他安静地阅读和写情书。因此，在等待正式订婚之前的一个个漫长的月份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这里度过的时光比在办公室和家里

都多。有那么一段时间，特兰西多·阿里萨只有在他回家换衣服时才能见到他。

阅读是他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一项嗜好。自从教会他认字，母亲便给他买来很多北欧作家写的配有插图的书。它们是作为故事书卖给孩子们看的，但其实里边都是些极其残忍、邪恶的故事，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看。五岁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能在课堂上或学校的晚会上背诵它们。但对它们的熟悉并没有减少他的恐惧。相反，是更加重了。因此，转向诗歌对他来说是一种心灵上的舒缓。青春期伊始，他就按到手顺序读完了“人民图书馆”的所有诗集。那些书是特兰西多·阿里萨从“代笔人门廊”的二手书商那里买来的，从荷马史诗到当地诗人最名不见经传的作品，应有尽有。但他没有区别对待，而是哪本来了，就读哪本，仿佛命中注定一般。他阅读的年头还不足以让他在自己读过的众多图书中分辨出好坏。他唯一清楚的，便是在散文和诗歌中，他更喜欢诗歌，而在诗歌中，他又更喜欢爱情诗。凡爱情诗他每读到第二遍，就能不知不觉地背诵下来，越是讲究格律和用韵，越让人撕心裂肺的诗，他背得越容易。

这就是他写给费尔明娜·达萨最初几封信的源泉。在那些信中，他曾整段照搬西班牙浪漫主义作家的诗篇，而直到现实迫使他更加关注尘世琐事而非心灵的苦痛，他才朝着当时那些催人泪下的连载小说和一些更为世俗的散文作品靠拢了一步。他学会了跟母亲一起一边落泪一边朗读当地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作在广场和各个城门口花两个生太伏就可以买上一册。但同时，他也会背诵黄金世纪最经典的卡斯蒂利亚语诗歌。总之，他严格按照到手顺序阅读一切能够到手的书籍。甚至在他那初恋的艰难岁月过去很久之后，他早已不再年轻，却还会把二十卷《青年宝库》、全套翻译过来的加尔涅尔·诺斯社的经典著作，

以及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收在普罗米修斯文丛中的较为简单的作品，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

但不管怎样，他在那所小旅馆中度过的青年时光并非仅限于阅读和书写炽热的情书，还初识了那种没有爱情的爱的秘密。中午过后，旅馆里生机勃勃起来，他的那些夜鸟朋友如降生时一般赤裸着身子起床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下班回来，会看到一座到处都是光着身子的仙女的宫殿。她们大声地谈论着当事人向他们透露的这座城市里的秘密。其中很多人的裸体上展示着岁月留下的痕迹：小腹上的刀疤，子弹留下的疤痕，爱情留下的刀痕，以及剖腹产后惨不忍睹的缝合痕迹。有些人白天会把最小的孩子带在身边，这些孩子是她们年轻时叛逆或失足带来的不幸果实。孩子刚一进来，她们就把他们的衣服脱光，以免他们在这个裸体的天堂里感到与众不同。她们各烧各的饭，所以没有人比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吃得更好，因为她们邀请他时，他总是从每个人那里挑最好的吃。每天都像过节，直到黄昏。那时，她们便光着身子，唱着歌，排着队去盥洗室梳洗。她们互相借香皂，借牙膏，借剪刀，互剪头发，互相换衣服穿，再把自己的脸化得跟可怜的小丑似的，出门去捕捉当晚的第一批猎物。从这时起，旅馆里的生活就变得没有人格、无情无义了，没有钱就休想参与其中。

自从认识费尔明娜·达萨以来，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自在了，因为这儿是唯一不让他觉得孤独的地方。甚至可以说，这里最终成了唯一能让他感到仿佛和她待在一起的地方。或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位上了年纪、举止优雅、有着一头漂亮银发的妇人也住在这旅馆里。她从不参与裸体女人们的日常生活，她们对她则怀有一种神圣的敬意。她年轻时，一位少不更事的恋人把她带到这里，享用了一段时间后抛弃了她，任她自生自灭。不过，虽然带着

这个污点，她还是嫁得不错。成为寡妇时，她已经年纪一大把了。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都争相让她和自己一起生活，可她却想不出有什么地方比自己年轻时曾在此放荡过的这个旅馆更合适了。她在这里的房间是她唯一的家，这让她立刻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身上找到了共鸣。她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有朝一日会成为闻名世界的学者，因为他可以在淫荡的天堂里用阅读来丰富自己的灵魂。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很喜欢她，常帮她去市场买东西，而且经常和她一聊就是一下午。他觉得她在爱情方面是个智者，因为尽管他没有向她透露自己的秘密，她却已经多次为他的爱情指点迷津。

如果说在爱上费尔明娜·达萨以前，他都不曾陷入那么多唾手可得的诱惑之中，那么如今费尔明娜·达萨已成为他的正式恋人，他就更不可能如此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同那些姑娘们共同生活在旅馆里，分享她们的喜悦和愁苦，但无论他还是她们，都没有想过要越雷池一步。一次意外事件证明了他的决心之坚定。一天下午六点，就在姑娘们穿衣准备接待晚间客人的时候，旅馆中负责清洁的女孩走进了他的房间。她是一个年轻姑娘，但看上去衰老而憔悴，在那些裸体女人的光芒之中，就像一个穿着忏悔服的罪人。他每天都能看见她，但从没感觉到她也注意到了自己：她走过每个房间，手里拿着几把扫帚，一只装垃圾的桶，还有一块专门用来从地上捡起用过的避孕套的抹布。她走进房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正像往常一样在读书。而她也像平时一样小心翼翼地扫着地，以免打扰他。突然，她朝床边走过来。他感到她那只温热而柔软的手放在了自己的小腹上，在寻找着什么，接着它找到了，便开始解他的扣子，同时，她的呼吸声充满了整个房间。他装作读书的样子，直到再也装不下去，只好挪开身子。

她害怕了，因为当初他们给她这份清洁工作时提出的第一个警告就是不能跟客人上床。其实，他们没有必要对她说这个，因为她属于那样一类女人，认为当妓女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跟陌生人上床。她有两个儿子，是和不同的男人生的，并非因为她生性水性杨花，而是因为她从来没能爱上一个来了三次以后再来的男人。在来这里之前，她并不是一个在那方面有急迫需要的女人。她生性平和，始终耐心等待，并没有绝望。然而，旅馆中的生活比她的美德更强大。她每天下午六点来这里上班，整晚都在房间之间穿梭，用四把扫帚清扫房间，捡避孕套，换床单。很难想象，男人们在爱情过后会留下那么多东西。呕吐物和眼泪是她可以理解的，但他们还留下了各种隐私的谜团：血污、排泄物、玻璃眼球、金表、假牙、藏着一缕金发的遗物盒、情书、商务信函和吊唁信等各种信件。有些人会回来寻找他们丢失的东西，但绝大部分物品都会被遗忘在这里。洛达里奥·图古特把它们锁起来保存好，认为就算有一天这座宫殿不幸衰落，单靠这数千件被遗忘的私人物品，它也早晚能成为一座爱情博物馆。

她的工作艰苦，酬劳很低，但她做得很好。她不能忍受的是床第之间的抽泣和呻吟，还有床下弹簧嘎吱作响的声音。这一切在她的血液中沉淀堆积，令她热血沸腾，痛苦不堪，天亮时恨不得跟大街上碰到的第一个乞丐睡上一觉，或者不求其他、不问究竟地找个烂醉如泥的酒鬼助她完成心愿。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这样一个身边没有女人、年轻而又干净的小伙子出现，对她来说简直是上天的恩赐，因为从第一眼看见他的那一刻起，她就发现他和自己一样，迫切需要爱情的抚慰。但他却对她的急切渴望毫无察觉。他一直为费尔明娜·达萨保持着童贞，这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和理由能改变他的决心。

这就是他在两人约好的正式订婚时间的四个月前所过的生活。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天早上七点，洛伦索·达萨突然出现在电报室里，点名要见他。当时他还没到，洛伦索·达萨就坐在长凳上等，一直等到八点十分，不停地把他那只镶嵌着名贵蛋白石的沉甸甸的金戒指从一根手指摘下，又戴到另一根手指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走进来时，他立刻就认出了这个曾给他送过电报的小伙子，一把将他拉了过去。

“年轻人，跟我来。”他对他说，“我们聊五分钟，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对话。”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脸乌青得像死人一般，跟着他去了。对这次会面，他毫无准备，因为费尔明娜·达萨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办法提前告诉他。事情是这样的：上星期六，至圣童贞奉献日学校的校长弗兰卡·德拉路斯修女像蛇一样悄无声息地溜进了“世界之本源”课的课堂，从各位女学生的肩膀上方窥探她们，正好抓到费尔明娜·达萨假装在本子上做笔记，实则是在写情书。根据学校的规定，犯了这种错误的人要被开除。洛伦索·达萨被紧急叫到校长办公室，由此发现自己铁一般的家规出了疏漏，瓦解在即。费尔明娜·达萨带着她骨子里的倔强承认了自己写信的错误，但拒绝说出这位秘密恋人的身份。由于她在教会法庭上再次拒绝说出恋人是谁，法庭批准了将她开除的处罚决定。父亲对她的房间进行了搜查，而在此之前，那里一直被视作不可侵犯的圣地。他在一只箱子的夹层里找到了三年来累积的一摞摞信件，显然，它们用爱写成，同样也被用爱收藏着。信上的签名确凿无疑，但洛伦索·达萨当时及以后永远都无法相信，女儿对她这位秘密恋人的了解仅仅限于他是个电报员和他喜欢拉小提琴，再无其他。

他确信只有在自己妹妹的同谋下，两人才有可能维持这种艰难的联系。于是，他甚至都没有给妹妹解释的机会，便把她塞上了开往圣

胡安·德拉希耶纳加的轻便船。费尔明娜·达萨永远也忘不了那天下午，发着高烧的姑妈在门廊上向自己告别的情景。姑妈穿着她那件褐色修士服，脸色苍白而憔悴。她看着姑妈消失在小花园的蒙蒙细雨中，手里拿着生活中仅剩的东西：一包单身女人的铺盖和只够用一个月的钱。钱被她用手绢包着，攥在手中。后来，费尔明娜·达萨一从父亲的淫威下解脱出来，就派人到加勒比各省四处去寻找她，向一切可能认识她的人打听消息，但一直没有任何音讯。直到三十年后，她才收到一封经多人之手费了很长时间辗转到她手中的信，信上说她的姑妈已经在“上帝之水”麻风病院去世了。洛伦索·达萨没有想到自己这次不公的惩罚会造成女儿如此强烈的反应，他让姑妈成了牺牲品，而女儿因对母亲的记忆所剩无几，一直是把姑妈视为母亲的。她将自己锁在卧室里，不吃不喝。洛伦索·达萨先是威胁，然后用蹩脚掩饰的恳求。当她终于把房门打开，他看到的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十五岁少女，而是一个受了伤的坚强女人。

他说尽了各种好话来打动她，试图让她明白她这个年龄的爱情不过是海市蜃楼，一厢情愿地希望能说服她退回那些情书，回到学校去，跪下来求得校方原谅。他还许诺说，到时他会第一个为女儿找一位配得上她的求婚者，让她得到幸福。但他仿佛就像在对着一个死人说话。他被彻底打败了。于是，星期一午餐的时候，他终于失控了，就在他极力忍住那些就要破口而出的辱骂和诅咒时，费尔明娜·达萨把切肉的刀子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并没有表现得很激动，但十分坚定，呆滞的眼神吓得他不敢再发出挑战。也就是在那时，他决定试试去找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与他男人对男人地谈上五分钟。他根本不记得曾经见过这个不合时宜地闯进他生活来的小伙子。纯粹是出于习惯，他在出门前带上了左轮手枪，但小心地把它藏在了衬衣下面。

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洛伦索·达萨拉着胳膊穿过教堂广场，直走到教区咖啡馆的拱廊下，并被邀请坐在露台上时，他连气都喘不上来了。这个钟点还没有其他客人，一个黑女人正在冲洗宽敞大厅的地砖。大厅的彩色磨砂玻璃满是裂痕和灰尘，厅里的椅子四脚朝天地放在大理石桌子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经好几次看见洛伦索·达萨在这里跟集市上的阿斯图里亚斯人一边赌钱，一边喝桶装的红酒，还大声地为连年的战争而争吵，但吵的是其他地方的战争，并不是我们这里的。他相信爱情的宿命，很多时候他都会问自己，迟早有一天他会和洛伦索·达萨见面，那情形将是什么样子。这场会面没有任何人的力量能够阻止，因为它是两人命中注定的。他设想会有一场不平等的争吵，因为不仅费尔明娜·达萨在信中提醒过他她父亲性格暴躁，他自己也亲眼见识过：即便是在牌桌上大笑的时候，洛伦索·达萨的眼神看起来也像暴怒一般。他全身上下都是粗鲁的明证：丑陋可憎的大肚子，拿腔拿调的说话声，像猞猁一样的络腮胡子，粗糙的双手，以及无名指上那只蛋白石的戒指。他唯一能打动人的地方，也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看见他走路时便注意到的，就是他和女儿一样，走起路来像头小母鹿。然而，当他指了指椅子示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坐下时，他觉得他没有看上去那么粗鲁了。当他邀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喝一杯茴香酒时，后者恢复了平稳的呼吸。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没在早上八点钟喝过酒，但他还是心存感激地接受了，因为此时此刻他正迫切地需要喝上一杯。

事实上，洛伦索·达萨没用五分钟就说明了来意。他放下架子，说得那么诚恳，以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时间不知所措。自从妻子死后，他给自己定下的唯一目标，就是让女儿成为一位高贵的夫人。而对一个大字不识、靠贩卖骡子为生的商人来说，这条路漫长而且没有把握，更何况在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省，他那盗马贼的名声虽没有坐

实却流传很广。他点燃了一支脚夫的雪茄，感慨地说："唯一比坏身体更糟的，就是坏名声。"然而他又说，他变得富有的秘密就在于，在他那众多的骡子中，没有哪一头能像他本人这样勤劳和坚韧，即便是在最艰苦的战争时期，在村庄一夜间被烧为灰烬，田园荒芜殆尽的时候，他仍旧如此。虽然女儿并不知道父亲对自己前途的高瞻远瞩，但她却一直表现得像一个积极的同谋。她聪明，而且做事有条不紊，甚至刚一学会认字就想到要教父亲识字。十二岁时，她就已经非常懂事，甚至不需要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的帮忙就能操持家务。洛伦索·达萨感叹道："这真是一头金骡子啊。"当女儿以门门功课都是五分的成绩小学毕业，并且在毕业典礼上获得荣誉奖状时，他意识到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太狭小了，在那里无法实现他的梦想。于是，他变卖了田地和牲口，怀着全新的热情，揣着七万金比索，来到了这座破败的城市。尽管城市的昔日辉煌已不复存在，但在这里，一个美丽的、受过古典教育的女人尚有机会通过一桩美满的婚事获得新生。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闯入给这个需要全力一搏的计划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障碍。"所以，我是来恳求您的。"洛伦索·达萨说。他把雪茄的烟头浸到茴香酒中，然后又吸了一口已经没有烟雾的烟，用忧伤的口吻最后说道：

"请您别挡我们的路。"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边听他说，一边小口呷着茴香酒，完全沉浸在对费尔明娜·达萨过去生活的勾勒之中，甚至都没有思忖一下轮到自己开口时该说些什么。但到了这个时候，他意识到无论说什么都会牵动自己的命运。

"您跟她谈过吗？"他问道。

“这您可管不着。”洛伦索·达萨说。

“我这样问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是因为我认为她才是有权决定的人。”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洛伦索·达萨说，“这是男人的事，应该在男人之间解决。”

他的语气变得带有威胁性，邻桌的一位客人回过头看了看他们。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语调却是再温和不过了，但表现出他所能表现的最坚定的决心。

“无论如何，”他说，“如果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我无法给您任何回答。否则，那就是背叛。”

洛伦索·达萨朝身后的椅背靠去，眼皮通红而湿润，左眼在眼眶里转了一下，歪向外眼角。他同样也压低了声音，说：

“您别逼我给您一枪。”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腹中充满寒气。但他的声音没有颤抖，因为他觉得自己此刻被圣神之光照亮了。

“您朝我开枪吧。”他把手放在胸膛上说，“没有什么比为爱而死更光荣的了。”

为了让歪了的眼睛看到他，洛伦索·达萨不得不侧过头来，就像鹦鹉一样。他说出的仿佛不是一个词，而是从他嘴中吐出的一个一个字：

“婊——子——养——的！”

就在那个星期，他带着女儿去旅行了，为了让她忘掉一切。他没有向女儿做出任何解释，而是冲进她的房间，嘴唇上方的胡子沾着因暴怒而嚼碎的雪茄沫，命令女儿收拾行李。她问他去哪里，他回答说：“去死。”她被这个听上去过于真实的回答吓了一跳，试图用前几天的勇气面对他，但他解下自己带有实心铜扣的皮带，在拳头上绕了一圈，然后狠狠地在桌子上抽了一下，声音像来复枪的枪声一样响彻整座房子。费尔明娜·达萨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所能发挥的限度和时机，于是将两张草席和一个吊床打成铺盖卷，把所有的衣服都装进两个大箱子，她确信这是一次永远不会再回来的旅行。穿上衣服之前，她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匆忙地从卫生纸卷上撕下一张，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写了一封简短的告别信。接着，她用修枝条的剪子从后颈处齐根剪下自己的发辫，将它卷好装在绣有金线的天鹅绒盒子里，连同那封信一起寄给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

那是一次疯狂的旅行。最初，他们同安第斯山的脚夫们组成骡队，同行了十一天。一行人骑在骡背上，在内华达山的悬崖峭壁上前行，一时被炎炎烈日烤得皮肤干裂，一时又被十月的水平雨浇得浑身湿透，几乎每时每刻都被陡峭山峦上那令人昏昏欲睡的雾气弄得呼吸艰难。上路第三天，一头母骡子被牛虻叮后发了疯，连同背上的骑手一起摔下了悬崖，还把同它拴在一起的几头骡子也带了下去。骑手和七头畜生的惨叫声在山谷和峭壁间回荡了好几个小时，而后又在费尔明娜·达萨的记忆中年复一年地回响着。她的全部行李都同骡子一起坠入了深渊，但在那个仿佛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永恒瞬间，在从骡子和骑手掉下去，直到他们惊恐的惨叫声消失在深谷中的这段时间里，费尔

明娜·达萨心里想的并不是那位摔死的可怜骑手，也不是那队粉身碎骨的骡子，而是遗憾自己骑的骡子没有和它们拴在一起。

那是她第一次骑牲口，但若不是想到肯定再也见不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再也得不到他的信带来的慰藉，旅途的可怕以及数不清的艰辛原本也不会令她如此痛苦。从旅行一开始，她就再没和父亲说过一句话，而他自己也心烦意乱，只在必要时和她说上两句，或者让脚夫给她捎个口信。运气好时，他们会在路边遇到一家客栈，那里提供一些山里的食物，而她却拒绝吃。客栈还租给他们几张铺着麻布的床，上面被发霉的汗渍和尿渍弄得污秽不堪。但更多时候，他们只能在印第安人的村落过夜。那里有一些建在路边的露天公共住所，用粗树枝架起围墙，苦棕榈叶搭成屋顶，所有路过的人都可以在里面睡上一晚，直到天亮。旅途中，费尔明娜·达萨没有睡过一宿整觉，总是吓得直冒冷汗，在黑暗中感觉到过路的人们悄悄忙碌着，把牲口拴在树干上，并尽可能地找一个地方挂起吊床。

傍晚，当第一批旅行者到达时，这里还空旷安静，但天亮时却已变成热闹的集市。吊床层层叠叠地挂着，从山里来的阿劳科人则蹲着睡了一宿。拴起来的山羊愤怒地叫着，斗鸡在它们那法老式的箱子里扑腾，而山里的野狗默不作声地喘着粗气，因为它们常年处在战争的危险当中，早已学会了不能乱吠。这些艰苦对于在本地做了半辈子买卖的洛伦索·达萨来说司空见惯，他甚至还总能在天亮时碰见个把老朋友。可对于他的女儿来说，却是长久的痛苦。摞成堆的咸鲇鱼散发出恶臭，加上她本来就因相思之苦而没有胃口，最终导致她茶饭不思。而如果说她到底没有因绝望而发疯，那是因为她从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回忆中找到了一丝安慰。她毫不怀疑这片地方是遗忘之地。

另一件时常令人恐惧的事就是战争。旅行伊始，大家就说起遭遇散兵游勇的危险。几个脚夫教了他们好几种方法以分辨来者是哪一派别，便于到时见机行事。他们经常会碰到一队执行征兵任务的骑兵，由一名军官带领，像绑牲口似的把新兵绑在一起，拖着他们全速前进。费尔明娜·达萨被这种种恐怖的景象压垮了，甚至忘记了那个对她来说更像是传奇而非近在咫尺的人，直到一天晚上一支不明党派的巡逻队绑架了骡队中的两名旅行者，把他们吊死在距离印第安人村落半里[7]地的一棵树上。洛伦索·达萨与他们非亲非故，却让人把尸体放下来，按照基督教礼节将他们埋葬，并行了感恩礼，感谢上帝没有让自己遭此厄运。他这么做是绝对有道理的。之前，那伙袭击者曾突然闯进来，把枪筒顶在他的肚子上，叫醒了他。一个衣衫褴褛、脸上涂着黑灰的军官用灯照着他，问他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

“我既不是自由党，也不是保守党。”洛伦索·达萨答道，“我是西班牙平民。”

“算你走运！”军官说完，将手臂高高举起，向他告别道：“国王万岁！”

两天以后他们下山，来到明亮的平原，快乐的巴耶杜帕尔镇就坐落在那里。院子里有人在斗鸡，街角回荡着手风琴的乐声，骑手骑在良种马上，四处响着鞭炮声和钟声。一座燃放烟火的高塔正被架起。费尔明娜·达萨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一派欢闹的景象。他们寄宿在她母亲的兄弟利希马科·桑切斯舅舅的家里。舅舅率领着浩浩荡荡的一队年轻亲戚，骑着全省最好的良种骏马，到皇家公路上来迎接他们，引领他们在烟火的轰鸣声中穿过镇子的一条条街道。舅舅家的房子在大广场区，就在几经修缮的殖民时期的教堂旁边，看上去更像一座庄园工

厂，因为各个房间都宽敞而阴暗，走廊对面是一座种满果树的园子，散发出一股热甘蔗酒的味道。

他们在马厩刚一下坐骑，一群陌生的亲戚就从主客厅里涌出来，用他们那令人无法忍受的热情扰得费尔明娜心烦意乱。此刻，她再没有心思去爱这世上的其他什么人，而且骡背上的长途跋涉弄得她浑身灼痛，困得要死，更何况还在闹肚子。她唯一渴望的，是找个僻静的地方，痛快地哭上一场。她的表姐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比她年长两岁，和她一样如女王般傲视一切。唯有她，从看见费尔明娜的第一眼起，就看穿了她的心事，因为她自己也在经受一段莽撞爱情的煎熬。傍晚时，她把费尔明娜带到准备好的卧室，让她同自己住在一起。她不明白，臀部磨出那么多火泡的费尔明娜是怎么活下来的。在母亲的帮助下——她母亲是一个极温柔的女人，和丈夫长得很像，就像孪生兄妹——伊尔德布兰达表姐为费尔明娜安排了坐浴，还为她敷上山金车花，以减轻灼烧的痛楚。与此同时，烟火塔的隆隆声震颤着整幢房子的地基。

夜半时分，来访的客人相继离开，庆祝相聚的人群也三三两两地散去。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借给费尔明娜一件马大普兰亚麻棉织睡袍，让她躺在一张铺着整洁床单的床上，枕着羽毛枕。这一切使得一种幸福而慌乱的感觉顿时传遍费尔明娜的全身。终于，房中只剩下她们两人了。表姐插上门，从床席下取出一个马尼拉纸信封来，上面盖着国家电报局的火漆封印。只看了一眼表姐脸上那光芒四射神秘兮兮的表情，一股沁人肺腑的白色栀子花香便在费尔明娜的心头复苏了。她用牙将火漆印章咬得粉碎，泪水淌在那十一封言辞大胆的电报上，就这样，她沉浸在眼泪汇成的汪洋中，直到天明。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洛伦索·达萨在旅行前犯了一个错误，他通过电报把行程告诉了小舅子利希马科·桑切斯，后者又把消息传给了人数众多、关系复杂、分布在全省各个村庄和角落里的亲戚们。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仅了解到他们的整个路线，还建立起一条长长的电报员兄弟阵线，以便追寻费尔明娜·达萨的踪迹，一直到他们之前落脚的烛头村。而自从费尔明娜来到巴耶杜帕尔镇，弗洛伦蒂诺便得以和她频繁通信。她在这里住了三个月，然后动身前往别处，直到旅行的最后一站里奥阿查。在外漂泊了一年半后，洛伦索·达萨认定女儿已经忘记过去，便决定回家。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放松了警惕，被妻子亲戚的甜言蜜语弄得飘飘然了。这么多年之后，妻子的族人终于放下了家族偏见，张开双臂接纳他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次探亲是一次迟来的和解，尽管这并非此行的目的。原来，当初费尔明娜·桑切斯的家庭不惜一切代价反对她嫁给一个来历不明的外来者。此人夸夸其谈，举止粗鲁，且四处漂泊，靠贩卖未经驯化的骡子为生，这种生意太过低级，难免有坑蒙拐骗、不干不净的时候。洛伦索·达萨赌得很大，因为他追求的是当地最显赫家庭的掌上明珠。这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女人们泼辣豪放，男人们心地仁厚却容易冲动，为了荣誉往往会失去理智甚至癫狂。然而，费尔明娜·桑切斯对这段受阻的爱情盲目而义无反顾地下定了决心，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他。她嫁得那么匆忙，那么秘密，就好像不是为爱而嫁，而是为了用那块神圣的头纱掩盖某种早熟的过失。

二十五年后，洛伦索·达萨没有意识到，他对女儿恋爱的苛刻态度正是自己那段往事的再现。如今，他向这些曾经反对过自己婚事的大小舅子们倾诉不幸，而正是这同一批人，曾经也因同样的原因向他们的亲戚倾诉苦水。不过，他在自怨自艾中消磨掉的这些时间，却被他的女儿赢去享受自己的爱情了。当他在舅子们的肥沃土地上阉割牛

犊、驯服骡子时，女儿正像脱缰的野马，和一群以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为首的表姐妹们一同漫步。这些表姐妹中，数伊尔德布兰达最漂亮，也最乐于助人。她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岁且已有妻室儿女的男人，这种没有未来的炽热爱情只能通过暗送秋波聊以自慰。

在巴耶杜帕尔镇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继续旅行，翻山越岭，穿过鲜花盛开的草原和梦境般的高原。在所到的每个村庄，他们都受到和第一站同样的欢迎，音乐、鞭炮、新一拨串通一气的表姐妹，以及电报局里准时到达的信件。很快，费尔明娜·达萨发现他们到达巴耶杜帕尔的那个下午并不是特例，在这个富饶的省份，每一天人们都像在过节。来此地的客人天黑时随处都可睡下，饿了也随时都有饭吃，因为家家户户大门都是敞开的，屋里都挂着吊床，炉子上都炖着一锅热气腾腾的三肉炖杂烩，以防哪位客人在通知来访的电报到达之前就到了，而这是常有的事。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在余下的旅程中一路陪伴着表妹，兴致勃勃地向她讲述血脉融合的秘密，一直追溯到生命的起源。费尔明娜·达萨重新认识了自己，第一次感觉到成为自己的主人，感觉到被陪伴和被保护，胸中充满自由的气息，这让她恢复了宁静，又有了活下去的愿望。甚至到了暮年，她还会想起那次旅行，而且记忆犹新，越来越历历在目。

一天晚上，她像每日那样散步回来，惊愕地听说不仅没有爱情能够幸福，而且与爱情背道而驰也能幸福。这个说法让她惊慌失措，因为一个表姐妹无意间听到了自己父母和洛伦索·达萨的谈话。洛伦索·达萨提到想把女儿嫁给克莱奥法·莫斯科特万贯家产的唯一继承人。费尔明娜·达萨认识这个人。她曾经看见他在广场上遛他那些完美无缺的良驹。马身上的披挂令人眼花缭乱，就像祭台上的装饰。他风度翩翩，身手矫健，迷人的眼睫毛甚至会令石头动心。费尔明娜将他和自己记

忆中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个坐在小花园的杏树下，可怜兮兮、骨瘦如柴、膝头放着诗集的小伙子作了一番对比，心里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犹豫。

那些日子，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在拜访了一位料事如神、令她惊讶不已的女巫后，整日沉浸在胡思乱想中。费尔明娜·达萨被父亲的意图吓坏了，也去向女巫求教。算命的纸牌告诉她，未来没有任何障碍阻挡她享有一段长久而幸福的婚姻。这个预言让她松了一口气，因为她根本没有想到，和自己分享如此美满命运的人可能并不是她此刻爱着的这个人。对未来有了把握之后，她兴奋不已，开始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于是，她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之间的电报往来不再是堆砌着憧憬和虚幻的山盟海誓，而变得有条有理，实实在在，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他们定下了日子，明确了方式，用生命许下诺言，共同决定只要两人再次见面，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无论情形如何，都不征求其他任何人的意见，直接结为夫妻。费尔明娜·达萨恪守着这份誓言，以至于那天晚上在丰塞卡镇，父亲允许她参加第一次成年舞会，她却认为没有征得未婚夫的同意就出席舞会是不贞的表现。那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正在小旅馆里和洛达里奥·图古特玩纸牌，有人通知他有一封加急电报。

是丰塞卡的电报员在线上等他。这位电报员联通了七个中转台，只为了帮助费尔明娜·达萨征得参加舞会的许可。但得到许可后，费尔明娜并不满足于这个简单的肯定答复，反而进一步要求证明在线路那端操控发报机的确实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人。受宠若惊的他发出了一句足以证明身份的话：*请告诉她我以花冠女神的名义起誓*。费尔明娜·达萨认出了这句暗语，便安心去出席了自己的第一次成年舞会。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她才匆匆换下衣服，赶去望弥撒。那个时候，她

箱底藏着的信件和电报已远远多于当初父亲抢走的那些，而她也学会了让自己的行为举止像已婚女人那样成熟稳重。洛伦索·达萨将女儿举止上的改变理解为时间和距离已经治愈了她的青春妄想。但他从未向她提起过自己为她定下的那桩婚事。自从他把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赶走后，女儿如今在表面上都对他客客气气，父女关系也融洽了许多，这让他们得以和睦共处，谁也不会怀疑这种和睦并非出自真心。

正是在这个时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决定在信中告诉她，他正准备努力为她打捞那艘沉船里的财宝。事实的确如此。那是一个明媚的下午，无数条鱼被毒鱼草熏得浮上水面，大海仿佛铺上了一层铝箔，此时他脑中灵光一现，冒出了这个主意。空中的鸟儿都被这场屠杀惊扰得乱成一片，渔民们不得不用船桨吓唬它们，免得它们争夺这次违禁捕捞带来的奇迹般的果实。虽然毒鱼草只是把鱼熏得昏睡过去，但自从殖民时期起就被法律禁止使用。可它始终都是加勒比地区的渔民光天化日之下的惯用手段，直到被炸药取代为止。在费尔明娜·达萨外出旅行的这段日子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消遣之一便是在防波堤上看渔民如何将满载着睡鱼的巨大拖网装上他们的独木舟。与此同时，一群像鲨鱼一样水性极好的孩子请求看热闹的人们往海里扔硬币，然后他们再到水底把硬币捞上来。这些孩子还抱着同样的目的，游到海里去迎接远洋轮船。由于他们娴熟的潜水技能，在美国和欧洲已有很多旅游纪实报道描写过他们。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很早以前就认识他们，甚至比他初识爱情还要早，但他从未想过或许他们可以让沉船的财宝浮出水面。那天下午，他突然想到了这一点，于是从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日开始，直到差不多一年后费尔明娜·达萨归来，他的胡思乱想又多了一种动力。

在这群戏水的男孩中有一个叫欧克利德斯的，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聊了不到十分钟，便和他一样对海底探险兴奋不已。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并没有向他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只是深入了解了一下他的潜水和航海本领。他问他是否能憋气下沉到海底二十米，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他问他是否能孤身一人驾着打鱼用的独木船出海，不靠任何工具，仅凭本能冒着暴风雨在开阔的海面上行驶，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他问他是否能准确定位距离索塔文托群岛最大岛屿西北方向十六海里的一个地方，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他问他是否能在夜间航行，靠星星分辨方向，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他问他是否愿意按照他帮渔民打鱼的日工资来完成这项工作，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但星期日要多付五个里亚尔的加班费。他问他是否能在遇到鲨鱼时自卫防身，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因为他会魔术可以吓跑鲨鱼。他问他是否能保守保密，即便被押到宗教裁判所的刑具上拷问，欧克利德斯回答说行。没有一件事他回答说不行，而且“行”字说得那么理直气壮，让人无从置疑。最后，他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列出了花销清单：独木船的租金，宽叶桨的租金，捕鱼装备的租金，后面这一项是为了让别人不对他出海的真实目的起疑。此外，还需要带上食物，一大罐淡水，一盏油灯，一捆用动物油脂做的蜡烛，以及一只猎人用的牛角号，以便危急时刻求救。

欧克利德斯约莫十二岁，身手敏捷，鬼心眼儿多，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身体就像欧洲鳗鲡，仿佛生来就是为了在船舷上的牛眼窗中钻来钻去的。他的皮肤久经风吹日晒，粗糙得已经想象不出原本的颜色，这让他那双黄色的大眼睛显得更加炯炯有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当即认定，他就是自己这次寻宝冒险的完美同谋。于是，两人没有再多耽搁，就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日开始行动了。

天刚刚亮，他们便装备齐全、满怀信心地从渔民的港口起锚出发了。欧克利德斯几乎全身赤裸，只穿着他平日的那块遮羞布。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则穿着他那件长礼服，头戴黑帽，脚踏漆皮皮靴，脖子上系着诗人式的领结，还随身带着一本书，作为到达群岛之前一路上的消遣。从第一个星期日起，他便发现欧克利德斯不仅是个潜水好手，还是个熟练的水手，对大海的天性以及港湾处的废铜烂铁了如指掌。他可以讲出那里每一条被氧化得锈迹斑斑、只剩下一具空壳的破船的历史，并说出很多意想不到的细节来。他知道每只浮标的年龄，每一片瓦砾的来历，以及西班牙人用来封锁港口的铁链上有多少圈铁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担心他对此次探险的真实目的心知肚明，便拐弯抹角地问了他几个问题，结果发现他对那条沉船一无所知。

自从在小旅馆里第一次听说那个宝藏的故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便开始尽一切可能打听关于沉船的各种信息。他了解到，圣何塞号并非唯一一艘躺在珊瑚丛中的沉船。事实上，它是陆地号船队的旗舰，于一七〇八年五月后到达这里，来自巴拿马波多贝罗那个闻名遐迩的集市。在那里，它装上了第一批财宝：三百只装满秘鲁和维拉克鲁斯白银的箱子，以及一百一十箱在孔塔多拉岛集中并清点好的珍珠。这只舰船在那里逗留长达一个月，人们日夜狂欢，最后装上了足够把西班牙王国从贫穷中拯救出来的其余财宝：一百一十六箱穆索和索蒙多科祖母绿宝石，以及三千万枚金币。

陆地号船队由至少十二艘大小不同的船只组成。它从这个港口起锚出发，一路上由一支法国舰队护航，但这支装备优良的舰队最终没能把远征队伍从英国舰队的精准炮击中拯救出来。那些英国人在卡洛斯·瓦格尔指挥官的带领下，在索塔文托群岛附近海湾的出口处伏击了他们。所以说，圣何塞号并非唯一的沉船，尽管究竟有多少船被击

沉、又有多少船从炮火中逃脱，并没有确切记载。但毫无疑问的是，这艘旗舰是最先沉入大海的船之一，和它一起葬身大海的，还有全体船员以及纹丝不动站在后甲板上的船长，而船上载着船队大部分的货物。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当时的航海图上找到船队的路线，并相信自己已经确定了沉船的位置。两人从博卡奇卡的两座碉堡间驶出海湾，航行四个小时后，进入群岛内部的静止水域，水底珊瑚丛中熟睡的龙虾伸手可及。风平浪静，海水清澈见底，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觉得自己仿佛与水中的倒影合而为一。滞流区的尽头，距最大岛屿两小时航程的地方，就是沉船的位置所在。

穿着那身肃穆的黑色礼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仿佛来自地狱的烈日烤得浑身燥热。他让欧克利德斯潜到二十米深的水下，无论找到什么东西都带回来给他。海水很清，他看见欧克利德斯在水下游动着，像一条鲨鱼一样在蓝色的鲨群中穿梭，一条条鲨鱼与他擦身而过，却没有碰他。之后，他看见他消失在珊瑚丛中。正当他认为欧克利德斯的氧气已经耗尽时，听到背后传来喊声。欧克利德斯站在水里，举着双臂，海水才到他的腰间。于是，他们继续寻找更深的地方，一路向北，从自在的蝠鲼、胆小的鱿鱼和阴暗中的玫瑰丛上方驶过。最后，欧克利德斯明白了他们是在浪费时间。

“如果您不告诉我您要找的是什么，我就不会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他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

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是没有告诉他。于是，欧克利德斯建议他脱掉衣服，下去和他一起找，哪怕就只看看珊瑚丛深处处于世界下方的另一片蓝天也好。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总说，上帝造海是为了让

人们通过窗子去欣赏，再说他也从来没有学过游泳。不久，下午的天空中云多了起来，空气变得阴冷潮湿。天黑得很快，他们靠灯塔才找到港口的方向。驶进海湾之前，他们看见法国的远洋轮船从身边驶过。轮船是白色的，体形巨大，船上灯火辉煌，留下一股柔柔的饭香和煮花椰菜的味道。

他们就这样白白浪费了三个星期日，若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最终决定和欧克利德斯分享他的秘密，他们还会继续浪费掉所有的星期日。这之后，欧克利德斯修改了整个寻宝计划。他们沿着大帆船的古老航线行驶，比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预测的地方往东移了二十西班牙海里。不到两个月，在一个海上飘着雨的下午，欧克利德斯潜到水里很久。在这期间，独木船漂出很远，以至于欧克利德斯游了近半个小时才赶上它，因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能用桨把船划到他那边去。他终于上船之后，从嘴里取出两件女人的首饰，作为坚持不懈的战利品展示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

接下来他描述的情景是那么令人陶醉，以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誓要学会游泳，潜到尽可能深的地方，只为能亲眼证实一下。欧克利德斯说，在那里，在那个只有十八米深的地方，那么多古老的帆船躺在珊瑚丛中，数都数不清。它们分散得很广，一眼望不到边。他说最令人惊讶的是，海湾漂着的那么多散了架的破船中，没有一艘能像海底这些沉船保持得这样完整。他还说，有好多艘三桅帆船甚至连船帆都完好无损，在海底看得清清楚楚，就仿佛它们是连同当日的时空一道沉下去的，照在它们身上的，还是它们沉入大海时那个六月九日星期六上午十一点的阳光。他被自己想象力的激情压得喘不上气来，接着说道，最容易分辨的就是圣何塞号大帆船，它的名字是用金字写在船尾的，看得清清楚楚，但同时，它也是被英国人的大炮打得损伤

最严重的船。他说他看见一只足有三百多岁的大章鱼困在船内，触角从各个炮筒里伸出来，它在厨房里长得太大了，要想把它放出来，得先把船拆掉才行。他说，他还看到了身穿军服的船长，身体侧着漂浮在船首楼甲板变成的水箱里。他还说，他之所以没有下到装财宝的船舱，是因为他肺里的空气不够了。但他带回了证据：一只祖母绿耳环，还有一个链子被硝腐蚀了的圣母圣牌。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一封寄往丰塞卡镇的信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向费尔明娜·达萨提到了财宝的事，而过不了多久她就要回来了。她对这艘沉船的故事并不陌生，因为她曾多次听洛伦索·达萨提起过。洛伦索·达萨为了说服一家德国潜水公司和他合伙打捞沉没的财宝，曾花费了不少时间和金钱。要不是历史研究院的几位研究员说服了他，告诉他沉船的传说不过是某个穷凶极恶的总督为了侵吞王室的财富而编造出来的故事，他肯定还会对这项事业坚持到底。总之，费尔明娜·达萨知道，大帆船沉在海底两百米的深处，根本没人能够到达，并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所说的二十米。但她已经习惯了他那诗意的夸张，所以也就把这次寻找大帆船的冒险当作他的又一次丰功伟绩祝贺了一番。可当她继续收到写满荒唐细节的来信，见他像书写爱情誓言一般严肃地描绘这些细节时，她不得不向伊尔德布兰达袒露了自己的心事，说她担心自己那位浮想联翩的恋人失去了理智。

就在那些日子里，欧克利德斯又捞出了许多件能够证明他所编织的神话的证据，两人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为那些散落在珊瑚丛中的耳环和戒指欢呼雀跃了，而是计划要筹钱建立一家大公司，打捞那五十多艘船上的巴比伦宝藏。于是，迟早都要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母亲求助，希望她帮助自己完成这项冒险。而母亲只是咬了咬那些首饰上的金属，又对着阳光看了看那些玻璃块，就明白了有

人想利用她儿子的天真发财。欧克利德斯跪在地上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誓说自己没做过任何骗人的勾当。但接下来的星期日，他就没在渔港露面，以后也再没在别的地方出现过。

这次受骗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找到了灯塔这个爱情的避风港。一天晚上，他们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遭遇暴风雨，欧克利德斯用独木船将他载到了这里。从那以后，他便常常在下午来和灯塔看守人聊天，听看守人讲他所知道的那些陆地上和大海里数不尽的奇迹。这是一段将要历经沧海桑田的友谊的开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学会了如何维持灯火不熄，先是用柴火，而后又用油罐子，那时电力的使用还没有传到我们这里。他还学会了如何用镜子引导灯火的方向并增加它的亮度。有几次，灯塔看守人有事不能看管灯塔，他便留下来，在塔上整夜注视着大海。他学会了利用声音和船上灯光映在地平线上影子的大小来辨别船只，还学会了在灯塔闪动的光亮中分辨船只给他发回的信号。

白天，特别是星期日，还有另一种乐趣。在老城的富人们居住的总督区，女人使用的海滩和男人的海滩是由一堵石灰墙分开的：女人的在灯塔之右，而男人的在左边。于是，灯塔看守人在塔上架起了一台望远镜，只要花上一个生太伏，就能用望远镜观赏一下女人的海滩。那些上流社会的小姐们不知道自己正被人偷窥，只管穿着宽荷叶边的泳衣，脚踩着拖鞋，头顶着宽檐帽，尽情地展现着身姿。这副装扮将她们的身体遮掩得像上街时穿的衣服一样严实，却又不像那些衣服那样迷人。母亲们则坐在烈日下的藤条摇椅上，穿得和望大弥撒时一样，同样的衣服，同样的羽毛帽子，也打着同样的绢制遮阳伞，在岸边注视着女儿们，生怕隔壁海滩上的男人从水下引诱她们。事实上，从望远镜里看到的并不比在街上看到的更多、更刺激，但每个星

期日赶来这里的客人还是很多，他们争先恐后地抢着望远镜，只为一饱眼福，享受一下围墙那边枯燥乏味的禁果。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与其说他是为了寻找乐子，不如说是因为无聊。但他和灯塔看守人结交，并不是因为这个额外的诱惑。真正的原因是，自从费尔明娜·达萨对他失去了爱慕，而他开始狂热地寻花问柳以取代她的时候，没有一处地方让他觉得比在灯塔里的分分秒秒更加快乐，或能找到更好的安慰来抚平自己的痛楚。这里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他甚至花了很多年求母亲，而后又求他的叔叔莱昂十二[8]，求他们帮他买下灯塔。那个时候，加勒比地区的灯塔是私人财产，灯塔主人根据船只的体积来收取入港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认为那是唯一一种能够靠诗情画意营生的体面方式。可他的母亲和叔叔都不这么看。当他终于可以靠自己的财富这样做时，灯塔却又成了国家的财产。

但这些幻想并非全是徒劳。无论是沉船的传说，还是后来对灯塔的兴趣，都帮他减轻了见不到费尔明娜·达萨的相思之苦。而就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传来了费尔明娜·达萨即将归来的消息。原来，在里奥阿查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洛伦索·达萨决定回家。十二月正值信风季，并非风平浪静的时节，那艘唯一敢于冒险出海的老旧轻便船，很可能一夜间又被逆风拖回到出发的港口。而事实果真如此。费尔明娜·达萨度过了苦不堪言的一宿，她把自己绑在舱室的床铺上，把胆汁都吐出来了。那间舱室简直就像小酒馆的茅厕，不仅因为它狭小压抑的空间，更因为里面的恶臭和闷热。船摇晃得那么厉害，好几次她都觉得床上的皮带就要断裂了。甲板上不时传来一阵阵像遭遇了海难似的惨叫声，而父亲在隔壁床上发出的老虎般的鼾声更加重了恐怖的气氛。近三年来，这还是她第一个片刻也不曾想到弗洛伦蒂诺·阿里

萨的不眠之夜。而此刻，他正躺在杂货铺里间的吊床上辗转难眠，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她回来前的时间，仿佛每一分钟都是永恒。天亮时，风突然停了，海面又恢复了平静，费尔明娜·达萨发现自己尽管饱受晕船之苦，但最终还是睡着了，因为她是被锚链丁零当啷的巨大响声吵醒的。于是，她解开床上的皮带，凑到舷窗前向外张望，幻想着能在港口躁动的人群中发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身影，但她看到的却是被第一缕阳光染成金黄色的棕榈树丛中的海关仓库，以及里奥阿查那用腐朽的木板钉成的码头，而他们的船前一天晚上正是从这里起锚的。

当天余下的时间就如幻觉。她又一次待在一直住到前一天的房子里，接待了同一拨来向她告别的客人，说着同样的话。她恍惚觉得，自己在重复一个已经度过的生活片段。这种重复是那么的彻底，而一想到乘船旅行也将如此重复，费尔明娜·达萨颤抖起来：单是回想一下船上的情景就让她不寒而栗了。但要想回家，唯一一个不同的选择就是骑在骡子上沿着悬崖峭壁走上两个星期，而且情况会比来时更加危险，因为在安第斯山考卡省爆发的一场新内战正在加勒比各省蔓延。于是晚上八点，她又一次被同一拨喧喧嚷嚷的亲戚送至港口。他们挥着同样的告别眼泪，在最后时刻送上了那同一批大包小包七零八碎、舱室里塞都塞不下的礼物。起锚时，家里的男人们朝天开了几枪，为帆船送行。洛伦索·达萨则站在甲板上，用他的左轮手枪打了五枪作为回应。费尔明娜·达萨的忧虑很快便烟消云散了，因为整晚都是顺风。大海散发着一股花香，这甚至让她没有系上安全皮带，就恬然入梦了。她梦见自己又见到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梦见他竟然摘掉了她一直以来看到的那副面孔，原来那是一只面具，但他真实的面孔又和那面具一模一样。她很早便起床了，因为这个梦中的谜团让她大惑不解。她看见父亲正坐在船长的饭厅里，喝着兑了白兰地的不加糖的浓

咖啡。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的眼睛又斜了，但没有流露出对这次回家的丝毫顾虑。

他们驶进港来。轻便船在公共市场港湾里停泊的那些小船组成的迷宫中静静滑行。市场散发的臭味在几里外的海上就能闻到。晨曦在清澈的蒙蒙细雨中显得格外饱满，可小雨很快变成了瓢泼大雨。守候在电报室阳台上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轻便船驶入灵魂湾的那一刻就认出了它，船帆被雨水打得耷拉下来，船在市场码头下了锚。前一天，他一直等到上午十一点，才从一份电报中偶然得知船因为逆风而延误了。于是，他又从第二天的凌晨四点起开始等待。此刻，他的眼睛始终不离那一艘艘运送旅客的小船。它们负责把少数不顾暴风雨而决定上岸的旅客送至岸边，可最后，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得不在中途走下搁浅的小船，蹚着泥泞攀上码头。船中的客人一直徒劳地等到八点钟，雨还是没有停。一个黑人搬运工蹚着齐腰深的水走到船舷上把费尔明娜·达萨接了下来，一直把她抱到岸上。但她浑身上下湿得就像落汤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竟然没有认出她来。

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在这次旅行中她竟成熟了那么多——直到踏入家门的那一刻。她一走进大门紧闭的房子，便立刻在黑人女仆的帮助下，开始了让房屋恢复生气的壮举。黑人女仆名叫加拉·普拉西迪娅，刚一接到他们即将归来的消息，就从她那古老的奴隶住所赶了回来。费尔明娜·达萨已经不再是那个既受父亲宠爱又受他严加管束的独生女了，而变成了这个满是尘土和蛛网的王国真正的女主人。如今，只有不可战胜的爱的力量，才能拯救这个王国。她没有气馁，因为她感到自己受到一股升腾的勇气的召唤，足以撼动这个世界。回家当晚，他们在厨房的餐桌上喝热巧克力、吃奶酪饼的时候，父亲把管理

家务的大权交给了她，那么郑重其事，就像进行神圣的宗教仪式一般。

“我把你生活的钥匙交给你。”他对她说。

年满十七岁的她坚定地接过这个权力。她知道，她所赢得的每一分自由都是为了爱。这一夜，噩梦连连。第二天，她打开阳台的窗子，又看见小花园中伤感的蒙蒙细雨、那尊被斩首的英雄塑像，还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拿着诗集常坐的那条大理石长凳，她第一次感到回家的惆怅。她已经不再把他当作一个遥不可及的恋人，而是当作可以托付一切的确定无疑的丈夫来想念。她突然感到，自己走后，二人所虚度的光阴是多么的沉重漫长，活下来又是多么的艰辛不易，而她又该付出多少爱，去按照上帝的旨意爱这个属于她的男人啊。可她惊讶地发现，他并不在小花园，不像以前很多次那样，即使下雨也会出现在那里。她发现自己没有通过任何渠道接到他的任何信息，甚至一点征兆都没有。突然间，一个念头令她浑身一颤：他死了。但随即，她又排除了这个坏念头，因为在最后几天狂热的电报往来中，他们的确是忘了商定一种她回来以后能继续保持联系的方式。

事实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十分肯定地以为她还没有回来，直到里奥阿查的电报员向他证实她星期五就上船了，并且就是那艘前一天因逆风而没有到达的轻便船。于是周末时，他守在她家门口，注视着里面的动静。而星期一，从傍晚开始，他便透过窗子看见一盏灯火在阳台所在的那间卧室里来回移动，九点刚过就又熄灭了。他一夜没睡，而是受着和恋爱之初的夜晚同样的煎熬，紧张得直想呕吐。特兰西多·阿里萨在早上第一拨公鸡打鸣时就起了床。她被吓慌了，因为儿子自从半夜走进院子就再没回来，而她在家里也没有找到他。原来，他一直在防波堤上徘徊，迎着风背诵爱情诗，高兴得流泪，直到天

明。八点钟，他坐在教区咖啡馆的拱廊下，因彻夜未眠而精神恍惚，正想着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向费尔明娜·达萨表示欢迎。就在这时，他感到地动山摇，浑身一震，五脏六腑都要碎了。

是她。她正穿过大教堂广场，加拉·普拉西迪娅手里提着买东西的篮子陪伴着她。这是她第一次没有穿校服出门。她比离开时长高了，线条更加分明，身材更加丰盈，一种成熟的矜持使她的美更为纯净。她的发辫又长出来了，但不是披在后背，而是斜搭在左肩上，这个简单的变化让她脱去了少女的稚气。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直到这个宛如梦幻的姑娘目不斜视地穿过广场。接着，那股使他浑身酥软动弹不得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又迫使他跟在她后面追了上去。而这时，她已经拐过教堂边的街角，混入市场喧闹嘈杂的人群中。

他紧跟着她，却不让她发现，一路观察着世界上他最爱的这个人的举手投足，她的优雅，她的早熟。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无拘无束的样子。他惊讶地看着她自如地穿行于人群之中，而加拉·普拉西迪娅却东碰西撞，手中的篮子钩来刮去，不得不一路小跑才跟得上她。她在混乱的大街上穿梭，自由自在，不曾与任何人相撞，就像在黑暗中飞翔的蝙蝠。她曾多次和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来到市场，但从来只是买一些小玩意儿，因为那时父亲亲自负责家中的采购，不单包括家具和食品，甚至还包括女人的衣服。所以，这第一次出门采买，对她来说是在童年的梦想中便一再憧憬过的神奇冒险。

她没有理会耍蛇人向她兜售永葆爱情的糖浆时的那番饶舌，也没有理睬躺在别人大门前浑身长癞流脓的乞丐的恳求，更没有搭理试图把一条受过训练的鳄鱼卖给她的假印第安人。她走得很远，逛得很仔细，但漫无目的，每一次停下来，都仅仅是因为她喜欢不慌不忙地欣

赏每一件东西的灵魂。只要有点儿东西卖的门廊，她都要走进去看看，而每到一处，她都能找出点儿什么来增添她对生活的渴望。她兴高采烈地闻着大木箱里呢料散发出的香根草的味道；她把印花的丝绸裹在身上；她戴上压发梳，拿起花扇，在“金丝”商店的全身穿衣镜里看着自己扮成马德里妇女的模样，忍不住笑起来，接着，又被自己的笑逗得哈哈大笑。在进口食品店，她打开一桶卤汁鲱鱼，这让她想起自己还是个小姑娘时，在东北部的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度过的那些夜晚。她又尝了尝带甘草味的阿利坎特血肠，买了两根作为星期六的早餐，还买了几片鳕鱼肉和一罐酒浸红醋栗。在调料店，她用两个手掌揉碎了几瓣鼠尾草和牛至叶，纯粹是为了闻味儿，还买了一把丁香和一把大料，一小包姜和一小包刺柏。走出来时，由于被卡宴的胡椒呛得直打喷嚏，她笑得满脸泪水。在法国药店，当她试用路特香皂和安息香液的时候，售货员在她耳后喷了一揿巴黎正流行的香水，还给了她一片吸烟后用的祛味剂。

她是在边买边玩，的确如此，但对于那些真正需要的东西，她会毫不迟疑地买下来。那股当机立断的劲头让人绝对想不到这是她第一次买东西。她知道，她不只是在为自己买，也是在为他买。她买下了十二码亚麻布，用来为两人做台布；一块细棉布，用来做新婚之夜的床单，天亮时上面会浸染上两人幸福的气息。每一件精美的物品，他们都将在他们的爱巢共同享用。她讨价还价，且十分在行。她优雅而又不失尊贵地议价，最后总能赢得最大的优惠。她用金币付账，店主们假装检验真伪，其实只是为了听听金币落在大理石柜台上那悦耳的声音。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惊奇地窥视着她，跟在她身后气喘吁吁，好几次都撞到了女仆的篮子上，对他的道歉，女仆回以微笑。她和他擦肩

而过，距离如此之近，他闻到了她身上的一阵芳香。如果说她那时并没有看到他，可不是因为她无法看到，而实在是因为她那傲视一切的走路方式。他觉得她是那么美，那么迷人，那么与众不同，所以不能理解为何没有人像他一样，为她的鞋跟踩在路砖上那响板似的美妙声音而神魂颠倒，也没有人像他那样被她裙摆的窸窸窣窣弄得心怦怦乱跳，为何全世界的人没有因她那飘逸的发辫、轻盈的手臂和金子般的笑声而爱得发狂。他没有错过她的一颦一笑，也没有错过她那高贵品行的任何一点展现，但他不敢走近她，害怕扼杀这样如痴如醉的感觉。然而，当她钻进鱼龙混杂的“代笔人门廊”时，他意识到自己正在铤而走险，眼看就要失去几年来梦寐以求的机会。

费尔明娜·达萨赞同她的女同学们的古怪看法，认为“代笔人门廊”是个堕落淫荡、藏污纳垢的地方，自然，是对那些体面的小姐们而言。那是一个有很多拱门的长廊，对面是一个小广场，停着可供出租的马车和驴子拉的大车，老百姓的生意做得如火如荼，热热闹闹。“代笔人门廊”这个名字起源于殖民时期，因为从那时起，那些穿着呢子背心、戴着套袖的沉默寡言的书法家们就坐在这里，以低廉的价格代人写就各种文书：受屈或申诉的诉状，法庭证词，贺帖，悼词，以及各种年龄阶段的情书。当然，这个喧闹市场的坏名声并非来自这些代笔先生，而是来自后来出现的小商小贩。他们在柜台底下出售由欧洲船走私来的假货，从淫秽下流的明信片、春药油膏到著名的加泰罗尼亚避孕套，应有尽有。那种避孕套有的装着鬣蜥身上的鬣毛，到时候可以撩动心房；还有的在末端饰有花朵，花瓣可以按照使用者的意愿张开。费尔明娜·达萨并不熟悉这条街道的风俗，为了找一处阴凉来避一避十一点钟火辣辣的太阳，她走进了门廊，根本没留意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

瞬时间，她被淹没在一片叽里呱啦的火热叫卖声中，有擦鞋匠、卖鸟人、二手书商、江湖郎中，还有卖甜食的女人。其中，卖甜食的女人们的吆喝声力压众人，她们大声叫卖着姑娘们爱吃的菠萝酥，疯子爱吃的椰子饼和小甜心米卡拉爱吃的红糖糕。可她对这些嘈乱的嚷声无动于衷，因为她一下子就被那个卖文具的吸引住了。那人正在演示各种具有魔力的神奇墨水，有像血一样鲜红的红墨水，有透着一股悲伤的写悼文用的墨水，还有便于在黑暗中阅读的磷光墨水，以及只有灯照下才能看得见的隐形墨水。她本来打算各种墨水都买一点儿，好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闹着玩儿，用自己的天才吓他一跳。但她试了好几种之后，决定只买一小瓶金色墨水。随后，她走到那些坐在一排大罐子后面的卖甜食的女人面前，每样买了六块。她用手一一指着玻璃罐中的甜食，因为在嘈杂声中根本无法让她们听见自己在说什么：六块天使发丝饼，六块炼乳饼，六块芝麻糕，六块木薯夹心酥，六块魔鬼巧克力饼，六块奶油卷，六块王后乳酪糕，六块这个，六块那个，每样六块。她用一种令人难以抵御的优雅把这些糕点一一扔进女仆的篮子，全然没有理会叮在糕点上的密密麻麻的苍蝇，周围不绝于耳的嘈杂声，以及在那要命的酷热中闪烁的腐臭汗珠所发出的蒸蒸热气。一个头上包着花头巾、圆润而漂亮的黑人妇女，满面笑容地递给她一角插在刀上的菠萝块，令她从陶醉中清醒过来。她取下菠萝块，整个放进嘴里，一边细细品尝着，一边把目光扫向周围的人群。突然，一个晴天霹雳将她定在了那里。在她背后，嘈杂之中一个唯有她能够听见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这可不是花冠女神该来的地方。”

她回过头，在距离自己的双眼两拃远的地方，她看见了他那冰冷的眼睛、青紫色的面庞和因爱情的恐惧而变得僵硬的双唇。他离她那

么近，就像在子时弥撒躁动的人群中看到他的那次一样。但与那时不同，此刻她没有感到爱情的震撼，而是坠入了失望的深渊。在那一瞬间，她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对自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她惊慌地自问，怎么会如此残酷地让那样一个幻影在自己的心间占据了那么长时间。她只想出了一句话："我的上帝啊！这个可怜的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冲她笑了笑，试图对她说点什么，想跟她一起走，但她挥了挥手，把他从自己的生活中抹掉了——

"不，请别这样。"她对他说，"忘了吧。"

那天下午，父亲睡午觉的时候，她交给加拉·普拉西迪娅一封只有两行字的信：*今天，见到您时，我发现我们之间不过是一场幻觉。*女仆还给他带去了他的电报、他的诗和他送的已经风干了的山茶花，并要求他归还她曾送给他的信件和礼物：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的那本弥撒经书，植物叶脉标本，一平方厘米大小的圣佩德罗·克拉维尔的教士服布料，几块圣牌，还有她那条系着校服配套丝带的十五岁时的发辫。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濒临疯狂，给她写了无数封绝望的信，缠着女仆带给她。但女仆坚决执行女主人斩钉截铁的指示：不接收除归还的礼物以外的任何物品。在女仆的再三坚持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所有东西都还给了她，只除了发辫。他不会归还发辫，除非费尔明娜·达萨亲自来拿，并和他谈上哪怕片刻的时间。但他的愿望没有达成。特兰西多·阿里萨担心儿子会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冲动决定，放下自己的骄傲，去恳求费尔明娜·达萨开恩给她五分钟的时间。费尔明娜·达萨在家中的前厅站着接待了她，只花了一小会儿工夫，甚至没有请她进去，更没有表现出丝毫软弱。过了两天，在同母亲吵了一架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他卧室的墙上取下了那个落满灰尘的玻璃龛，里面像供奉圣人遗物似的供奉着那条发辫。特兰西多·阿里萨把它装进那

只绣有金线的天鹅绒盒子，亲自还了回去。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再没有机会单独见过费尔明娜·达萨，在他们漫长一生的几次相遇中，也再没有单独和她说过话，直到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之后，她成为寡妇的第一个晚上，他才再一次向她重申自己对她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

[1]教皇“庇护五世”在西班牙语中的叫法。

[2]利兰，英国西北部城镇。

[3]大西洋轮船总局，法国航运公司。

[4]圣纳泽尔，法国西部城市。

[5]圣尼古拉，天主教圣人，被视为水手的保护神。

[6]圣佩德罗·克拉维尔（1580—1654），西班牙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曾在哥伦比亚的黑奴中传教。

[7]本书中的里均指西班牙里。

[8]教皇“利奥十二世”在西班牙语中的叫法。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二十八岁时，是最受人青睐的单身汉。他曾去巴黎进修药科和外科，待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刚一踏回这片土地，他就充分证明了自己没有在外虚度每一寸光阴。他比走的时候更加仪表堂堂，文质彬彬。同辈之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在学问上一丝不苟，知识渊博，同时，也没有一个人时髦舞跳得比他好，或是即兴钢琴弹得比他棒。他的翩翩风度和殷实家境迷倒了周围很多姑娘。她们靠私下里抽签来决定谁做他的女伴，而他也乐得与她们相处，但总是若即若离，始终保持着清雅，直到最后，他不可救药地被费尔明娜·达萨那种质朴的魅力迷住了。

他总是津津乐道，说他们的爱情是一次误诊的果实。他自己也无法相信事情就那么发生了，特别是在那个时候，他正把自己积蓄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到这个城市的命运之中。对于这座城市，他常常不假思索地说，它是举世无双的。在巴黎，当他挽着某位临时女友漫步在姗姗来迟的秋色中，仿佛不会再有比那些金色的下午更为纯真的幸福了：到处弥漫着炭烤栗子的山野气息，手风琴声悠扬婉转，还有那一对对贪婪的情侣，在露天阳台上仿佛永远也亲吻不够似的。然而，他把手放在胸口，对自己说，眼前的这一切都不足以让他用故乡加勒比四月的一瞬间来抵换。他还太年轻，尚不知道回忆总是会抹去坏的，夸大好的，而也正是由于这种玄妙，我们才得以承担过去的重负。可当他站在甲板的栏杆前，再一次看到殖民区那白色的山冈，屋顶上一动不动的兀鹫，以及阳台上晒着的穷人的破衣烂衫——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是那么轻易地掉进了思乡之情设下的慈悲圈套。

轮船从水面漂浮的一层溺水而亡的动物尸体间开出一条道来，驶进了港湾。为躲避恶臭，大部分旅客都进了船舱。年轻的医生从舷梯上走下船，身穿上好的羊驼毛西服和背心，外套一件长罩衣，留着巴斯德年轻时的那种胡子，头发由中间分开，露出一道清晰而苍白的中缝。他极好地掩饰了自己因恐惧而非伤感造成的哽咽。码头上几乎没什么人，只有几个没穿制服的赤脚士兵在看守。两个妹妹和母亲，以及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在那里等他。他发现他们尽管表面上开心，但脸色憔悴，毫无生气。谈到危机和内战时，他们仿佛在说距离自己很远、甚至毫不相干的事，可那隐隐颤抖的声音和游移不定的眼神背叛了他们的言辞。令他感触最深的还是他的母亲。她是一个还很年轻的女人，曾以热情火辣的社交活力从容优雅地投身于生活，而如今，在那身散发着一股樟脑味的寡妇黑绸丧服中，她就像被文火煎熬一般慢慢枯萎了。想必是在儿子一脸的困惑中察觉到了自己的改变，她先发制人，以攻为守，问儿子的脸色为何像石蜡一样苍白。

“是生活所迫，母亲。”他说，“人人在巴黎都会变得脸色发青。”

稍后他挨着母亲坐在封闭的车子里，空气闷热得令人窒息，他再也无法忍受从车窗里钻进来的那一幕幕残酷的现实了。大海如死灰一般，一座座古老的侯爵府几乎被淹没在不断增多的乞丐之中，露天的污水沟散发出死亡的味道，再也闻不到昔日那浓郁的茉莉花香。他觉得一切都变得比他走的时候更渺小，更破败，更萧条。街道的垃圾堆上到处都是饥饿的老鼠，惊得拉车的马儿走得磕磕绊绊。从港口到他家这段漫长的路上，在总督区的中心地带，他没有碰到任何能对得起他的思乡之情的东西。他沮丧之极，为了不让母亲看见，便把头扭向一边，默默地淌下眼泪。

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即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族世代居住的宅邸，在这场浩劫中也未能独善其身。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看到家中的景象，心都要碎了。他从阴暗的前厅走进来，看到花园的喷泉池里积满尘土，鬣蜥在一朵花也没有的杂草丛中乱爬。他发现通往主要居室的那段装着铜扶手的宽楼梯上，缺了好几块大理石板，还有的板已经裂了缝。他的父亲，一位献身精神超过医术水平的医生，死于六年前那场席卷整个城市的亚洲霍乱。从此，这个家的灵魂也随之而去。他的母亲布兰卡夫人，早已用黄昏时的九日祷告代替了亡夫生前常举办的远近闻名的音乐晚会和室内音乐会，想到自己将穿着丧服度过余生，她压抑得喘不上气来。两个妹妹也违背了风趣快乐的本性，成了修道院的盘中餐。

回家的那天晚上，由于害怕黑暗和寂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片刻也没有睡着。一只石鸻从没关严的门缝钻了进来，每隔一小时，刚好整点的时候，就在卧室里叫上一阵儿。他数着念珠念了三串《圣三光荣颂》，还念了所有他能记得的其他经文，以祈祷消除灾祸和不幸，驱散专在夜间窥视的各种鬼魅魂灵。附近圣牧羊女[1]疯人院里，传来疯女人在幻觉中发出的尖叫声，水瓮里的水一滴一滴落在水盆中，无情地在整幢房子里回荡，迷途的长腿石鸻在卧室里来回乱跑。他生性怕黑，再加上父亲无形的亡灵就存在于这座沉睡的宽阔宅邸，这一切都令他毛骨悚然。早上五点，石鸻和邻居家的公鸡一起啼鸣，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把自己的肉身和灵魂完全交托给全能的上帝，因为他感到再也没有勇气在祖国这片废墟上多住一天。然而，亲戚们的关怀，几个星期日的郊游，以及那些和他门当户对的姑娘们的倾心仰慕，最终减轻了回家的第一印象所带来的苦涩。他慢慢习惯了十月的闷热，周遭刺鼻难耐的气味，以及朋友们不成熟的看法，习惯了大家的那句“明天见，医生，您不要担心”。最终，在习惯的魔力面前，

他屈服了。很快，他便为自己的屈服想出了一个简单理由。这里就是他的世界，他对自己说，这个悲伤而压抑的世界是上帝安排给他的，他属于这里。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管了父亲的诊所。他把那些英国家具原地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尽管它们硬邦邦的，非常古板，而且还会在清晨的寒风中吱扭作响。但是那些有关总督时期科学以及浪漫主义时期医学的著述，他都让人搬到了阁楼，带玻璃门的书柜中则放进了法国新一派的著作。他摘下那些褪了色的廉价彩画，只留下画着医生和死神争夺一位裸体女病人的那幅，还有那张用哥特字体印刷的希波克拉底誓词。在空出的位置上，他挂上了自己在欧洲各所学校以优异成绩取得的各式各样的文凭，紧挨着父亲唯一的那张。

他试图在仁爱医院推行新观念，但这并不像他曾满怀青春的激情所设想的那样。在这座古老的医院里，人们固执地恪守着代代相传的迷信观念。比如，把床腿分别放进四只装着水的罐子里，以防疾病爬上床来，又或者在手术室中要求穿礼服，戴羚羊皮手套，因为他们认定优雅是无菌操作的一个基本条件。他们无法忍受这个新来的年轻人用嘴去尝病人的尿液以检验是否含糖；无法忍受他动不动就提到沙可[2]和特鲁索[3]，好像他们是他的同窗室友；也无法忍受他在课堂上严肃地警告说接种牛痘有致命的危险，但同时又对栓剂这一新发明抱着令人怀疑的信念。他在所有方面都和别人格格不入：他的革新精神，他近乎偏执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身处这片到处是嘻嘻哈哈的老顽童的土地上，他的幽默感却异常迟钝，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他难能可贵的美德，却引起了年长同事的猜忌和年轻同事暗地里的嘲笑。

最令他苦恼的是城里危险的卫生状况。他向最高当局请求填平西班牙人建造的污水沟，因为那里是老鼠的巨大温床。他建议代之以封闭的下水管道，污水不应像一直以来这样排到市场港湾，而应该输往偏远的垃圾场。殖民时期建造的讲究一点的房子都有带化粪池的茅厕，但那些挤在沼泽边窝棚里的老百姓，有三分之二是在露天大小便。排泄物在太阳下风干，变成粉尘，随着十二月凉爽而幸福的微风，被所有人带着圣诞节的喜庆吸入体内。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试图在市政府开办强制学习班，教穷人建造自家的厕所。他曾徒劳地斗争，希望人们别把垃圾扔到树林里，几个世纪下来，那里已经成了一片片腐烂的池塘。他建议至少一星期收两次垃圾，然后运到无人区烧掉。

他明白，饮用水是致命的隐患。然而，单是建一条高架水渠都纯属幻想，因为凡是有能力推动此事的人，都拥有自己的地下雨水池，存着多年积蓄的雨水，被一层厚厚的浮藻覆盖着。当时最值钱的家具之一，便是装水瓮用的精雕细刻的木架柜，里面的石制过滤器日夜不停地把水滴到水瓮里。为了防止有人从汲水的铝罐中喝水，罐子的边缘有一圈锯齿，就像一个滑稽的王冠。在阴暗的陶制水瓮中，水看上去清清凉凉，带着一股树林的余味。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没有被这种过滤的假象蒙蔽，因为他知道，尽管用了那么多防范措施，瓮底却还是孑孓的圣殿。童年时期，为了打发漫长的时间，他曾怀着莫名的惊恐观察这些孑孓，因为那时的他和很多人一样，相信它们是精灵，是超自然的生命，它们在水底静止的沉积物中追求少女，也会为了爱情而疯狂报复。小时候，他曾见学校的女老师拉萨拉·孔德因为竟敢对精灵出言不逊，家里的房子被砸得支离破碎。他看见她家的碎玻璃像河水一样流到了街上，还看见铺天盖地的一大堆石头——人们用这些石头朝她家的窗子扔了三天三夜。过了很久他才学到，原来孑孓

是蚊子的幼虫。而一经知晓就再也忘不掉了，因为此后他发现不只孑孓，还有很多恶魔都可以安然无恙地通过我们那天真的石制过滤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将阴囊疝气的来源归功于雨水池。城中很多男人都忍受着这种病的折磨，可他们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流露出某种爱国主义的傲慢。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上小学时，总是不可避免地撞见令他胆战心惊的情景：患疝气的人在烈日炎炎的下午，坐在自家门口，用扇子给自己那硕大的睾丸扇风，那睾丸大得简直就像一个趴在两腿间睡着了的孩子。据说，在暴风雨的夜晚，疝气会发出凄楚的鸟叫声，而若在附近点燃一根兀鹫的羽毛，它便会绞起来，让人痛得死去活来。然而，没有人为这些倒霉事抱怨，因为有这样一个巨大的阴疝挂在下身，完全可以被视作男人的荣誉，比什么都值得炫耀。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欧洲回来时，已经非常清楚这种观念绝对是伪科学。但它在当地根深蒂固，很多人甚至反对在雨水池中加入各种矿物质，因为担心这样会使他们失去培养令人骄傲的硕大阴囊的能力。

和水质不净一样，公共市场的卫生状况也一直让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感到忧虑。市场位于灵魂湾正对面一片开阔的空地，那些来自安的列斯群岛的帆船就停靠在这个港湾。当时的一位著名旅行家曾把此地描绘成世界上货物最丰富的市场之一。的确，这里货品充足，种类繁多，热闹非凡，但同时，它或许也是最让人担心的一个市场。由于潮水无规律的涨落，海湾海水一漾一漾地把污水沟排出的垃圾又推回岸上，因此，整个市场就坐落在自己的垃圾堆中。紧邻的屠宰场也把乱七八糟的残渣丢到这里来：剁碎的脑袋，腐烂的内脏，动物的粪便，在阳光下静静地漂浮在一片血沼泽中。为了这些食物，兀鹫常常跟老鼠和狗争抢得无止无休，时而穿梭于挂在棚檐下的索塔文托美味

鹿肉和阉鸡之间，时而跃过摆放在席子上的阿尔霍纳春季菜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想改善这里的卫生条件，比如让屠宰场换个地方，再重新建一个有彩色玻璃穹顶的市场，就像他在巴塞罗那看见的那些古老菜市场一样，那里供应的食物干净而漂亮，几乎让人不忍心吃掉。然而，他的那些有声望的朋友们，即便是那些一向对他有求必应的，也只能对这份不切实际的热情抱以同情。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一生都在喧嚷自己骄傲的出身，歌颂这座城市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它珍贵的文物、它的英雄主义和它的美，却对时光对它的侵蚀视若无睹。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与他们不同，他对这座城市的爱恋之深，使他能用真实的眼光来看待它。

“这座城市还真是伟大，”他常常说，“我们用了四百年的时间来摧毁它，至今仍没有达成目的。”

然而，它其实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了。先前那场肆意流行的霍乱，继最初暴毙在市场水坑里的几个牺牲者之后，在十一周内已创造了我们这里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高的纪录。在那之前，凡地位显赫的死者都会被葬在教堂墓地的石板下，与主教和教士团成员专享的幽静场所为邻。而不那么富有的死者就葬在修道院的庭院中。穷人们则被埋在殖民时期的墓地里，位于一座当风而立的小山上，和城市隔着一条干涸的小河沟。河上有一座灰浆筑的小桥，桥头的避雨亭竖着一块牌子，一位未卜先知的市长曾命人在上面刻下了一句话：入此地者应抛开一切希望[4]。霍乱刚刚流行两个星期，墓地就已经满了。尽管已将一大批不知名的贵人的枯骨迁进了集体掩埋的万人坑，教堂里还是腾不出一块可以使用的空墓地来。从没有封严的墓穴中逸出的水汽令大教堂内空气污浊，不得不将大门紧闭，直到三年以后，费尔明娜·达萨在子时弥撒中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那个时候才

再次打开。第三周时，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回廊里已堆满了死人，一直堆到两边种着杨树的林荫道。最后，只得把比回廊大两倍的教会菜园辟出来当墓地。人们在那里挖掘出一个个很深的墓穴，不带棺木地草草葬下三层死人。但很快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方式，因为被填得满满当当的土地变成了一块海绵，脚一踩，就渗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血水来。于是，人们准备在“上帝之手”庄园开辟新战场。那里是一座育肥牧场，距离城市不到一里地，后来被誉为“普世公墓”。

自从发布了霍乱公告，本地驻军便不论白天黑夜，每隔一刻钟在碉堡上鸣炮一响。这么做是应迷信的市民要求，因为他们认为火药能净化环境。受霍乱之害最深的要数黑人，因为他们人数最多，也最贫穷。但实际上，这种疾病既不分肤色，也不分血统。而就如突然开始一样，它又突然停止了。从来没有人知道它到底造成了多大规模的伤害，不是因为无法统计，而是因为我们最常见的美德之一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马可·奥雷里奥·乌尔比诺医生，胡维纳尔的父亲，是这段不幸岁月里的民间英雄，也是最受人瞩目的牺牲者。根据政府的指令，他本人实际上只需制订方案并领导卫生部署，可他自己却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所有社会事务中去，事实上，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在他之上几乎就没有更高的权威了。多年以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翻看当时的记录，证实了父亲所采用的方法仁爱多于科学，在很多方面都有悖医学原理，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疫情的迅速蔓延。他是怀着儿子对父亲的同情心证实这一点的——生活慢慢地把儿子变成了父亲的父亲，他第一次为自己当初没能和孤军作战而犯下错误的父亲站在一起感到心痛。但他也没有贬低父亲的功绩：他的勤奋、他的牺牲精神，尤其是他个人的胆识，这一切都让他无愧于这座城市从灾难中死而复

生后给予他的那些荣耀，他的名字理所应当和那些不计其数的战争英雄列在一起，因为比起这场战斗，那些战争可要不光彩得多。

父亲未能及身见证自己的荣耀。当他发现那种他在别人身上见到并深表同情的无法医治的病症出现在自己身上时，甚至都没有徒劳地去尝试抗争，便把自己隔离起来，以免传染给他人。他把自己关在仁爱医院的一个杂物间里，对同事的叫门声和亲人的哀求声充耳不闻，对人满为患的走廊地板上那些垂死挣扎的霍乱病人的惊恐号叫也泰然处之，他给自己的妻子儿女写下了一封充满炽烈爱意的信。在信中，他流露出对生命无比的热爱与眷恋，以及由此而生的感恩之情。那是一封长达二十页的诀别书。信纸被揉搓得皱皱巴巴，从越来越糟糕的字迹中可以看出他的病情每况愈下。不需要认识写信的人，也能看得出那个签名是用尽最后一口气写上去的。遵照他的遗愿，他那灰白色的遗体被混葬在公共墓地，没有让一个爱他的人看见。

三天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巴黎接到了电报。当时，他正在和朋友共进晚餐，当即以香槟祝酒来纪念他的父亲，说道：“他是一个好人。”过后，他将为自己的不成熟而自责：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他竟不断地逃避现实。但三个星期后，他收到了父亲那封身后才被发现的遗书的抄本。那一刻，他向现实投降了。骤然间，那个他生命中最早认识的男人，那个养育他、教导他，和他的母亲同床共枕三十二年，却在这封信之前仅仅因为淳朴的腼腆，从未向他如此赤诚地袒露过心声的男人的形象，一下子深刻地浮现在他眼前。在那之前，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家人一直都将死亡视作发生在别人家的不幸，它发生在别人的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妻子身上，却从来不会降临在自己的亲人头上。他们一家人的生命节奏都很缓慢，在他们身上看不出衰老、生病和死亡的迹象，他们只会在自己的时间里慢慢消

失，然后变成一个时代的回忆和云雾，直至最终被遗忘吞没。父亲的遗书比那封传达噩耗的电报给了他更沉重的打击，让他确信人终有一死。尽管，他最早的回忆之一——九岁或十一岁时——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从父亲身上看到了死亡早早发出的信号。那是一个下着雨的下午，他们两人待在家中的办公室。他正用彩色粉笔在地砖上画云雀和向日葵，父亲则对着窗子的亮光在看书，背心敞着扣，衬衫袖子上勒着橡皮筋。忽然，他停止了阅读，用一根末端带有银抓手的爪杖挠了挠后背。因为够不着，他又让儿子用指甲帮他抓一抓。儿子这样做时，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感觉不到自己的脊背似的。最后，父亲从肩膀上方看着儿子，凄惨地笑了笑。

“如果我现在就死了，”他说，“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可能都不记得我了。”

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他就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死亡天使在办公室那凉爽的昏暗中一闪而过，又从窗子飞了出去，所到之处，散落下几片羽毛，但孩子却没有看见。自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胡维纳尔·乌尔比诺马上就要到父亲那天下午的那个年纪了。他知道自己和父亲很像，而现在除了这一点外，他还惊愕地意识到，和父亲一样，自己也终将会死的。

霍乱成了他的心病。之前，除了在某门边缘课程中学过一些常识外，他对此了解得并不多。他曾觉得很难置信，仅在三十年前，在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霍乱就造成了十四万多人的死亡。但在父亲死后，为了抚平记忆的伤痛，也是作为一种悔过，他学习了一切能学到的有关各种形式的霍乱的知识。他成了当时最杰出的流行病学家、疫区封锁理论的创始人、那位伟大小说家[5]的父亲阿德里安·普鲁斯特的

学生。因此，当他回到故土，从海上闻到市场的恶臭，看见污水沟中的老鼠和在街上的水坑里光着身子打滚的孩子们时，不但明白了这场不幸因何而起，而且确信它随时都会重演。

果然，没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还不到一年，他在仁爱医院的几个学生请他帮忙去为一个浑身泛着罕见蓝色的病人义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只在门口看了一眼，便认出了他的敌人。但运气还不错：这个病人三天前乘坐一艘来自库拉索的轻便船到达此地，是自己来到医院门诊的，似乎还没有传染给其他人的可能。不管怎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还是提醒了同事们，并最终说服当局向附近港口发出警报，以便找到并隔离被污染的轻便船。此外，他还劝阻了要塞军事长官，这位长官想发布戒严令，并立即施行每一刻钟鸣炮一响的治疗法。

“省下那些火药，等自由党人来的时候再用吧。”他温文尔雅地说，“现在已经不是中世纪了。”

四天后，病人死了，被白色颗粒状的呕吐物窒息而死。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大家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却没有再发现一起新病例。没过多久，《商业日报》刊登消息说，在本城的不同地方，两名儿童死于霍乱。经证实，其中一名得的是普通痢疾，而另外那个五岁的小女孩，看上去的确是霍乱的牺牲品。她的父母和三个兄弟姐妹被分别单独隔离起来，整个街区也被置于严格的医疗监控之下。三个孩子中的一个也感染了霍乱，但很快就康复了。危险过去后，一家人回了家。三个月内，又发现了十一例病例。第五个月时，出现了一次令人担心的爆发。但快到一年时，大家普遍认为疫情已得到了控制。没有一个人怀疑，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严格的医疗措施创造了奇迹，效果比他的宣传还要切实有力。从那时起，直到进入本世纪很长一段

时间，尽管霍乱仍然是本城，而且几乎是整个加勒比沿海地区及马格达莱纳河流域的常见病，但并没有再度发展成瘟疫。对霍乱的惊恐使得当局更加严肃地听取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警告。在医学院，霍乱和黄热病被规定为必修课；并且，大家明白了填堵污水沟、把市场建到远离垃圾堆的地方去的紧迫性。然而，此时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并没有热衷于宣告他的胜利，也没有精神百倍地去坚持他的社会使命——如今的他成了折翼的天使，不知所措，心神不宁，决意要忘掉生活中其余的一切，只因为他被自己对费尔明娜·达萨的爱火闪电般地击中了。

的确，那是一次误诊的果实。他的一位医生朋友，认为自己在一个十八岁的女病人身上看出了霍乱的先兆症状，请求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前来看看。由于害怕疫情侵入老城的宝地——毕竟，之前的所有病例都发生在边缘地区，且几乎全是黑人——他当天下午就去了。结果，他收获了惊喜而非忧患。那所房子坐落在福音花园的杏树树荫下，外面看上去同殖民老区的其他房子一样破旧不堪，但里面却井井有条，美轮美奂，光彩照人得仿如世外桃源。房子的前厅直接通向一个塞维利亚式的方形庭院，院子里刚刚刷过白白的石灰，橘树盛开着鲜花，地上铺着和墙上一样的彩色瓷砖。虽然看不见泉水，却听见潺潺的流水声不绝于耳，屋檐下装饰着一盆盆康乃馨，连拱下吊着一只只装有珍禽的鸟笼。其中最为稀有的，是三只关在一个大鸟笼里的乌鸦，它们每一次振动翅膀，都会令院子里弥漫开一种莫名的香气。用链子拴在角落里的几条狗嗅出了生人的味道，突然狂吠起来，但一声女人的叫喊立刻又使之戛然而止。许多只猫被这声严厉的喊叫吓得从四处窜了出来，又藏进花丛中。之后，一片寂静，在鸟儿的扑腾声和流过石头的淙淙水声中，仿佛能隐隐听到大海忧伤的呼吸。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真切地感觉到上帝就在此处，不由得浑身一颤。他想，如此一个家是不会受到瘟疫侵害的。他跟着加拉·普拉西迪娅穿过带拱顶的走廊，走过缝纫室的窗前，那里曾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看见费尔明娜·达萨的地方，当时院子还处在一片瓦砾之中。他沿着崭新的大理石台阶来到二楼，等候传禀，以进入女病人的卧室。可加拉·普拉西迪娅走出来时，带来了这样的口信：

“小姐说，您现在不能进去，因为她父亲不在家。”

于是，他按照女仆的指示，下午五点钟又来了。洛伦索·达萨亲自为他打开大门，把他领到了女儿的卧室。医生为病人检查时，洛伦索·达萨坐在角落的一片昏暗之中，双臂交叉，徒劳地控制着自己杂乱的呼吸。很难说清楚究竟谁更拘谨：医生羞怯地抚摸着病人，病人则带着处女的矜持，把自己裹在丝绸睡袍里。两人谁也没有看对方的眼睛，只是他用仿佛不是自己的声音问着问题，而她则用颤抖的声音回答，不约而同地忌惮着那个坐在阴影中的长者。最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请病人坐起来，小心翼翼地将她的睡衣解至腰间：霎时间，那对完美无瑕、高高隆起、有着孩子般稚嫩乳头的乳房，在昏暗的房中发出耀眼的光芒。她赶紧将双手抱在胸前遮住身体。而医生沉着地将她的手臂移开，没有看她的眼睛，直接用耳朵贴在她的皮肤上为她听诊，先是胸部，然后是背部。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总是说，他初识这位将与他共度一生的女人时，心里没有丝毫波澜。他记得，那件天蓝色的睡袍镶着花边，她的眼神炽热如火，长长的秀发披在肩上，但他当时极度担心霍乱侵入殖民老区，压根儿没有注意到正值花样年华的她所拥有的诸多美妙之处，而是全心查看她身上可能存在的哪怕微乎其微的瘟疫征兆。而她更是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这位因霍乱而常常被人提起的年轻医生，

在她看来根本是个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会爱的学究。诊断的结果是，这只是一次食物引起的肠道感染，在家中治疗三日即可痊愈。证实女儿没有染上霍乱，洛伦索·达萨松了一口气。他亲自把医生送上车，并付给他一个金比索的出诊费用。他认为即便是对专为富人看病的医生来说，这也算是过高的酬劳了，但告别时，他还是表达了自己的千恩万谢。他被医生那荣耀的姓氏弄得眼花缭乱，对于这一点，他非但没有丝毫掩饰，反而表示无论如何希望再次见到医生，当然，是在非正式的场合。

事情本该就此结束了。然而第二周的星期二，没有受到邀请，也没有事先知会，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又在下午三点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来了。费尔明娜·达萨正在缝纫室和两个女伴一起上油画课。他穿着一身一尘不染的白色长礼服、戴着一顶白色高顶帽出现在窗前，朝她做了个手势，示意她过来一下。她把画框放在椅子上，踮着脚尖向窗子走过去，为了不让裙子拖到地上，她把荷叶边提到了脚踝。她戴了一只发箍，亮闪闪的宝石坠子垂在额头上，与她那高傲的双眸有着同样的颜色，整个人都透出清爽。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注意到，她在家中作画时竟也穿戴整齐，就好像参加节日庆典一般。他从窗外给她号了脉，又让她把舌头伸出来，用一块铝制压舌板为她检查了喉咙，还看了看她的内眼睑。每检查一项，他都做出放心的表情。他不再像上次那样拘束，但她却更拘谨了，因为她不明白他此次意外到访的原因，毕竟他曾亲口说过，若没有什么新情况需要叫他来，他就不再来了。更何况：她也并不想再见到他。检查完毕，医生把压舌板放进了装满各种工具和小药瓶的手提箱，然后啪的一声关上箱子。

“您就像一朵初开的玫瑰。”

“谢谢。”

“应该感谢上帝。”他说，之后又突兀地引用了一句圣多默[6]的名言：“您要记住，一切美好的东西，不论来自何处，都源自圣神。您喜欢音乐吗？”

他问话时，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做出很随意的样子。但她却没有回答。

“您为什么要问这个？”她反问道。

“因为音乐对健康至关重要。”他说。

他是真的这样以为的，很快，她便会知道这一点，并将终身都深有体会——音乐这个话题是他用来建立友谊的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带有魔力的方式。而那时，她却把它理解成了一种嘲笑。更何况，他们在窗前谈话时，两个假装在画画的女伴发出了像老鼠一样的窃笑声，并用画框挡住了脸。这使得费尔明娜·达萨乱了方寸。她气晕了头，砰的一声关上了窗子。而医生面对着镶花边的薄纱帘不知所措，试图找到通往大门的路，可是却转了向。慌乱中，他撞上了香乌鸦的笼子，几只鸟惊得发出一阵凄厉的叫声，扑扇起翅膀来，顿时，医生的衣服沾染上一股女人的馨香。紧接着，洛伦索·达萨霹雳般的声音把医生钉在了那里：

“医生，请在那里等我一下。”

他从楼上看见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一边扣衬衫扣子一边走下楼梯，脸有些肿胀，且肤色发青，由于刚从午觉的噩梦中醒来，络腮胡还乱蓬蓬的。医生极力掩饰自己的尴尬。

“我已经告诉您的女儿了，她健康得就像一朵玫瑰。”

“是啊，”洛伦索·达萨说，“就是刺儿太多。”

他从乌尔比诺医生身边走过去，没有跟他寒暄，而是推开缝纫室的两扇窗子，粗野地冲女儿叫喊，命令她说：

“过来跟医生道歉！”

医生试图劝阻他，但洛伦索·达萨根本不加理会，斩钉截铁地说：“快点！”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女伴，默默地请求她们谅解。她反驳父亲说，她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她关上窗子是避免阳光晒进来。乌尔比诺医生竭力想证明她的理由是正确的，但洛伦索·达萨坚持自己的命令。于是，费尔明娜·达萨再次走到窗前，气得脸色煞白，右脚向前，用指尖提起裙子，向医生戏剧性地躬了一下身子。

“我万分诚恳地向您道歉，先生。”她说。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幽默地学着她的样子，像火枪手似的拿着他的高顶礼帽鞠躬还礼，却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和善微笑。洛伦索·达萨邀请他去办公室喝杯咖啡以示道歉。为了表示自己心里没有留下一点芥蒂，他欣然接受了。

事实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除了早餐前会喝上一杯咖啡，其余时间都是不喝的。他也不喝酒，只是偶尔在正式场合喝一杯佐餐的葡萄酒。但这一次他不仅喝了洛伦索·达萨给他端来的咖啡，还喝下了一杯茴香酒。之后，又喝了一杯咖啡和一杯茴香酒。接着，他一杯一杯地喝下去，尽管还需要赶去其他几个地方出诊。起初，他还认真地听着洛伦索·达萨以女儿的名义向他致歉，听他说自己的女儿是个聪明

端庄的姑娘，配得上这里或者任何一个地方的王子，可她唯一的缺点，按他的话来说，就是像骡子一样的倔脾气。可当第二杯酒下肚后，医生似乎听见从院子深处传来费尔明娜·达萨的声音，他的思绪便随她而去了：他想象着自己跟随她穿行于刚刚被夜幕笼罩的房子里，点上走廊各处的灯，给各间卧室喷上杀虫剂，打开火炉上的汤锅盖子，里面盛着她和父亲当晚要喝的汤。他仿佛看见父女俩单独坐在桌前，都没有抬眼，也没有喝汤，因为谁都不愿打破这种斗气的乐趣，最终，父亲投降了，请求女儿原谅他下午的严厉。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非常了解女人，他知道，只要他不走，费尔明娜·达萨就不可能经过这间办公室。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拖延着离开的时间，因为他明白，下午的这场屈辱伤害了他的自尊，将不会让他好过。洛伦索·达萨几乎已经醉倒，似乎并没有发现他的心不在焉，只顾自己唠叨个没完。他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一边咀嚼已经熄灭的雪茄里上好的烟叶，大声咳嗽，使劲清着嗓子，竭力在旋转靠背椅上寻找舒服的姿势，弄得椅子的弹簧发出一阵阵发情动物般的呻吟。客人每喝一杯，他就会灌下三杯。最终他发现两人已经互相看不见对方，这才暂停下来，起身去点灯。借着新点亮的灯光，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正面打量他，只见他的眼睛像鱼一样斜了出去，而他说出来的话也和口形对不上。医生想，这一定是酒精过量带来的幻觉。于是他站起身来，但恍惚中感觉到身体仿佛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而且那个别人此刻仍坐在自己刚才坐过的位置上。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让自己失去理智。

当他在洛伦索·达萨的引领下走出办公室时，已经七点多了。一轮满月挂在空中。在茴香酒的作用下，院子变得如梦似幻，好像浮在一个水底世界。一只只罩着布的鸟笼仿似一个个熟睡的幽灵，沐浴在新

开的橘树花散发出的暖香里。缝纫室的窗子敞开着，工作台上亮着一盏灯，一幅幅未完成的画作像参加画展似的摆在架子上。“不在这儿的你，会在哪儿呢？”乌尔比诺医生走过时这样说道。但费尔明娜·达萨没有听到，也无法听到，因为她正趴在卧室的床上愤怒地哭泣，等待着父亲过去，为自己下午所受的屈辱讨回公道。医生没有放弃向她道别的念想，可洛伦索·达萨却并未提议他这样做。他思念着她天真的脉搏、猫一样的舌头和柔软的扁桃体，可一想到她将再也不愿见到自己，甚至不会允许自己尝试与她见面，他立刻又垂头丧气起来。洛伦索·达萨走进前厅时，蒙在布中的乌鸦被惊醒了，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它们会把你的眼睛啄出来。”医生心里想着她，大声说道。洛伦索·达萨回过头来，问他说什么。

“不是我说的，”他说，“是茴香酒。”

洛伦索·达萨把他送到马车前，试图说服他收下这第二次出诊的一个金比索，但他没有接受。他准确无误地向车夫下达指令，让他把自己送到另外两个约好的病人家去，然后，没有靠别人帮忙就上了车。可马车在石子路上的颠簸让他开始感到难受，于是他让车夫掉转了方向。他对着车上的镜子看了好一会儿，发现镜中的自己也依然在想着费尔明娜·达萨。他耸了耸肩，然后打了个嗝，脑袋垂在胸前，睡着了。睡梦中，他听见丧钟敲响了。先是大教堂的钟声，而后，所有的教堂都传来钟声，一处接一处，连乐善好施者圣胡利安[7]修道院那破瓦似的钟声也响了起来。

“见鬼，”他在睡梦中嘟囔了一句，“有人死了。”

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正坐在大饭厅的正式餐桌前，喝着牛奶咖啡，吃着奶酪饼。正在此时，只见他带着一副痛苦不堪的面容出现在

门口，浑身散发着从乌鸦那里沾染来的淫荡香味。隔壁大教堂的钟声在家里宽阔的水池上空回荡。母亲惊慌地问起他究竟去了哪里，因为大家到处找他去给伊格纳西奥·玛利亚将军看病，将军是哈拉依斯·德拉维拉侯爵的最后一个孙子，那天下午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丧钟就是为他敲响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对母亲的话完全没有反应，他抓住门框，转过半个身子，试图走到卧室去，却一头栽倒在从自己嘴里喷吐出来、溅得到处都是的茴香酒中。

“圣母马利亚，”他的母亲喊道，“一定是出了什么怪事，才让你这副模样回到家里。”

然而，最为奇怪的事还没有发生呢。著名钢琴家罗密欧·卢西奇造访本城，城中的民众刚刚从对伊格纳西奥·玛利亚将军的哀悼中恢复过来，他就献上了一组莫扎特的奏鸣曲。趁这个时机，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叫人把音乐学校的钢琴搬上了骡车，为费尔明娜·达萨送去了一首划时代的小夜曲。乐曲刚开始演奏，她就醒了。无需从阳台的花边窗帘后探出身子，她就知道谁是这次不同寻常的献礼的策划者。她唯一感到遗憾的，便是她还没有胆量像那些刁钻的姑娘们一样，把尿盆一股脑儿地扣在不受青睐的追求者头上。而洛伦索·达萨呢，小夜曲演奏到一半，他便迅速穿好了衣服，乐曲一结束，他就把身着音乐会礼服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钢琴家请进了会客厅，用一杯上好的白兰地对小夜曲表达了谢意。

费尔明娜·达萨很快发现，父亲在试图软化她的心。小夜曲演奏次日，他便看似随意地对她说：“想想看，要是你母亲知道你被一个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族的人看上了，她会是什么感觉啊。”她冷冷地反驳道：“她会在棺材里再死一次。”和她一起画画的女友告诉她，洛伦索·达萨受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之邀，到社交俱乐部用了一次午餐，为

此，医生因违反俱乐部章程而受到了严厉的警告。直到这时，她才知道了父亲曾多次申请加入社交俱乐部，次次都被拒绝，而每次所收到的反对票之多，已使他彻底地死了这条心。可洛伦索·达萨以桶匠[8]的大度吞下所受的侮辱，继续执著地依靠智慧创造偶遇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机会，却没有发现其实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付出了更为超常的努力，尽一切可能让两人相遇。有时，他们会在办公室里聊上好几个小时，而这时，家里的一切就像处在时间的边缘停滞了似的，因为只要医生不走，费尔明娜·达萨就不会让任何事照常进行。于是，教区咖啡馆成了理想的中间港。正是在那里，洛伦索·达萨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上了象棋启蒙课。这位学生非常勤奋，象棋成了他无药可救的嗜好，直到他死的那一天。

就在小夜曲风波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洛伦索·达萨在家中的前厅发现了一封信，是写给女儿的，火漆上押着J. U. C. 几个首字母[9]组成的花押字。从费尔明娜的卧室前走过时，他把信从门下滑了进去。费尔明娜想不通信是如何到她房间里来的，因为她怎么也不相信父亲竟然会替追求者送信：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转变。她把信放在床头柜上，不知该如何处理。就这样，信没被拆开，在那里放了好几天，直到一个飘雨的下午，费尔明娜·达萨梦见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又到家里来，要把那块曾经用来为她检查喉咙的压舌板送给她。梦中的压舌板并非铝制，而是用一种她曾在别的梦里开心品尝过的美味金属做成，于是，她开心地品尝着它，并把它掰成了大小不等的两段，小的那段给了他。

醒来后，她拆开了信。信写得简洁而得体。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唯一恳求的，就是请她允许自己征得她父亲的同意前来拜访她。他的简单和认真打动了她，那么多天以来她用心培育出的恨突然平息了。她

把信收在一个不用的珠宝盒里，压到箱底。但她忽然又记起来，那里曾经保存过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些飘散着香味的信，一阵羞愧让她浑身一颤，于是她把信从珠宝盒里取出来，想换个地方。这时，她所能想到的最体面的做法就是权当没有收到过这封信。于是，她把它放到灯上烧起来，边烧边看着一滴滴火漆在火苗上飞溅，变成了缕缕青烟。她叹息道："可怜的人。"突然，她意识到这是自己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第二次说这句话了。片刻间，她又想起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她自己也很惊讶，他已经离她的生活那么遥远：可怜的人。

十月里，伴随着最后几场雨，又来了三封信。同其中的第一封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小盒弗拉维格尼修道院的紫罗兰香皂。三封信中前两封都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车夫送到大门口的，医生还从车窗里向加拉·普拉西迪娅打了个招呼，一来可以让大家确认信就是他写的，二来也让谁都没法否认收到过这些信。此外，这两封信都用押着花押字的火漆封着，费尔明娜·达萨已能辨认出医生那龙飞凤舞、密码似的字迹。两封信都简明扼要地表达了和此前那封同样的意思，也怀着同样的谦卑，但在那温婉措辞的背后，开始流露出一种迫不及待的渴望，这是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些含蓄委婉的信中从未显露过的。两封信之间相隔两个星期，费尔明娜·达萨每次一收到信便拆开来读，而她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何就在要烧掉它们的前一刻，她改变了主意。但是，她从未想过要给医生回信。

十月的第三封信是从大门底下滑进来的，和之前的几封截然不同。字体像孩子写的一样幼稚，无疑是出自左手。但费尔明娜·达萨起初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直到读完了信的内容，才发现这是一封无耻的匿名信。写信的人认定费尔明娜·达萨用迷魂汤让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着了魔，并由这个假设出发得出了恶意的结论。信的结尾是一句

威胁：倘若费尔明娜·达萨不放弃借由这个全城最受倾慕的男人飞上枝头的想法，一定会当众出丑。

她感到自己成了严重不公的牺牲品，但她的反应并非报复，而是相反：她想找出这封匿名信的作者，用种种适宜的解释向他证明他错了，因为她非常确定，自己永远也不会因为任何理由，被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殷勤打动。接下来的几天，她又收到了两封没有署名的信，和第一封一样信口雌黄，但三封信中没有任何两封出自同一人手笔。看来，要么她是某个阴谋的牺牲品，要么就是关于她私订终身的虚假传闻传得比想象的要远。一想到这一切都可能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某个简单的冒失行为造成的后果，她就惶恐不安。她想，或许他的为人与他那庄重的外表差距甚远，或许他在出诊时喜欢信口开河，就像他那个阶层的很多人那样，到处吹嘘自己幻想出来的对她的征服。她想写信给他，指责他玷污了自己的名誉，但随后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万一这正是他想要的呢。她试图从那几个来缝纫室和她一起学画的女友们那里打听消息，但她们唯一听说的就是关于那次小夜曲独奏的无关痛痒的评论。她感到无比愤怒，却又无能为力，备受屈辱。和最初想找出这个看不见的敌人，说服他承认自己错误的想法完全不同，现在她只想用修枝剪把他碎尸万段。她整晚睡不着觉，分析那些匿名信中的细节和用词，幻想能从中找出一丝安慰。但这是徒劳的：从本性而言，费尔明娜·达萨和乌尔比诺·德拉卡列一家的内心世界相去甚远，对于他们的明枪，她尚有武器可以自保，但对于暗箭，她就束手无策了。

这个信念在黑色洋娃娃带来的惊吓之后变得更加苦涩。娃娃也是那些天里送来的，没有附任何信件，但是其来源似乎显而易见：只有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会送她这样的东西。从上面带着的商标来看，

娃娃是在马提尼克岛买的，身上穿着精美的衣服，鬈曲的头发用金丝做成，躺下时眼睛还会闭上。费尔明娜·达萨觉得十分好玩，于是便放松了警惕，白天让娃娃躺在她的枕头上，晚上则习惯了和它睡在一起。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她从一个令人精疲力竭的梦中醒来，竟发现洋娃娃正在变大：它来时穿的那身漂亮衣服已遮不住它的大腿，鞋子也被脚撑破了。费尔明娜·达萨曾经听说过非洲的巫术，但都没有像眼前这件事这样令人毛骨悚然。况且，她也实在无法想象胡维纳尔·乌尔比诺这样的男人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来。她是对的：娃娃不是车夫送来的，而是突然冒出的一个卖虾人带来的，他的来历谁也说不清楚。费尔明娜·达萨试图解开这个谜，甚至有那么一瞬间想到过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他那忧郁的气质曾使她害怕，但生活渐渐让她相信，她想错了。这个谜一直悬而未解，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她就不寒而栗，直到婚后很久仍是如此，尽管那时她已经有了孩子，并且相信自己是被命运拣选的宠儿，是最幸福的女人。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最后的尝试是请至圣童贞奉献日学校的校长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为他们撮合。嬷嬷无法拒绝医生的请求，因为自从她所属的修会在美洲建立以来，这个家族就给予了很多赞助。上午九点，她在一个新入会的修女的陪伴下，出现在费尔明娜·达萨家。两人不得不同笼子里的鸟儿逗趣了半个小时，才等到费尔明娜·达萨沐浴完毕。嬷嬷是个男性化的德国女人，说起话来像金属发出的声音一样，目光中带着命令的神色，同她那孩子般幼稚的喜好一点儿也不相符。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她以及和她有关的一切更令费尔明娜·达萨痛恨了，只要一想起她那假慈悲的模样，费尔明娜就感觉像五脏六腑里有蝎子在爬一样厌恶。刚一出浴室门，她就认出了她，学校里所受的种种折磨一股脑儿地涌上心头：每日弥撒那难以忍受的无聊，考试的惊恐，新入会修女的卑躬屈膝，以及被精神上的空虚所毁掉的全

部生活。而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恰恰相反，她带着看似由衷的喜悦同费尔明娜打了招呼，对她长高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表示惊喜，夸奖她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还称赞了院子的高雅品位和火盆中生长的橘树花。她吩咐新入会的修女在原地等候，并嘱咐她不要和那些乌鸦靠得太近，否则一不小心它们就会把她的眼睛啄出来。接着，她想找一处僻静的地方，坐下来和费尔明娜单独聊一聊。于是，费尔明娜邀请她来到客厅。

这是一次简短而不愉快的会面。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没有把时间浪费在拐弯抹角上，而是单刀直入地提供给费尔明娜·达萨一次体面复学的机会。当初被开除的原因不仅可以从档案里而且可以从大家的记忆中一笔勾销，这样她便可以完成学业，获得文学学士的文凭。费尔明娜·达萨一头雾水，想知道这其中的缘故。

“这是一位值得拥有一切的人的请求，而他唯一希望的，就是让你幸福。”修女说，“你知道他是谁吗？”

她明白了。她心想，一个因为一封纯洁无辜的信而毁掉了她的人生的女人有什么权利充当爱情的使者呢？但她没敢说出口。她只是说，是的，她认识这个人，但同样也知道他无权干涉她的生活。

“他唯一恳求你的，是请你允许他同你谈五分钟。”修女说，“我相信，你的父亲一定会同意的。”

想到父亲也是这次会面的同谋，费尔明娜·达萨的怒火烧得更旺了。

“我们见过两次，在我生病的时候。”她说，“现在没有任何必要再见面了。”

“只要是有点脑子的女人都明白，这个男人是全能上帝的恩赐。”修女说。

她继续述说着他的种种美德，他的虔诚，还有他救死扶伤的献身精神。她一边说，一边从袖中掏出一串坠有象牙雕刻的基督像的金念珠来，在费尔明娜·达萨的眼前晃了晃。这是件家族圣物，有上百年的历史，由一位锡耶纳的金匠雕琢而成，被克莱蒙四世[10]祝福过。

“它是你的了。”她说。

费尔明娜·达萨只觉得自己血管中血液翻涌，胆子一下大了起来。

“我不明白您怎么会干这种事，”她说，“您不是一向认为爱情是罪过吗？”

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装作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但眼皮却红得冒火。她依旧在她眼前晃着那串念珠。

“你最好放明白些，”她说，“因为在我之后，大主教可能会来，跟他谈，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让他来好了。”费尔明娜·达萨说。

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把金念珠藏进衣袖，然后从另一只袖子里抽出一块很旧的手帕，攒成一个团，紧紧地握在拳头里。她带着同情的微笑，仿佛从很远的地方看着费尔明娜。

“我可怜的孩子，”她叹了口气，“你还在想着那个人。”

费尔明娜·达萨努力咽下了一句无礼的话，眼睛眨都不眨地看着修女，目不转睛，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咬着牙。最终，她满意地看见修女那男人般的眼睛被泪水淹没。弗兰卡·德拉路斯嬷嬷用手绢团擦掉眼泪，站起身来。

“你父亲说得一点儿不错，你就是一头骡子。”她说。

大主教并没有来。而如果不是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来找表妹过圣诞节，让两个姑娘的生活都发生了改变，这件难缠的事情本该在那天就已结束。早晨五点，他们在来自里奥阿查的轻便船上接到了她。在一群因晕船而奄奄一息的混乱的旅客中，她容光焕发地下了船，举手投足尽显女性的妩媚，并为终于告别了昨夜的颠簸而兴奋不已。她背来了几篓子活火鸡，还有她家肥沃庄园里出产的各色水果，为的是在她做客期间谁也不缺吃的。她的父亲利希马科·桑切斯让她问问达萨家复活节时是否需要乐师，他有最好的乐师可以差遣，并许诺过些时候会用船运一些烟火来。他还说，自己三月份之前都不能来接女儿，所以她可以尽情地在这里住上一段日子。

表姐妹俩立即开始享受共度的时光。她们从第一个下午起便一同沐浴，赤身裸体，用浴池里的水互施洗礼。她们互相擦肥皂，捉虱卵，比臀部，比结实的乳房，把对方当作镜子，细细比较自上次两人赤身相见以来，无情的时光如何改变了各自的身体。伊尔德布兰达个头高大，身体结实，皮肤是金黄色的，但全身长着混血女人的毛发，短而鬈曲，如同一层金属丝形成的泡沫。而费尔明娜·达萨则不同，她赤裸的身体有些苍白，线条修长，皮肤光滑，毛发柔顺。加拉·普拉西迪娅为她们在卧室里摆好了两张一模一样的床，可她们有时却睡在一张床上，熄着灯一直聊到天亮。她们还会抽上几支拦路劫匪抽的那种细雪茄，这是伊尔德布兰达藏在箱子里衬带过来的。抽完后，烧上几

张亚美尼亚纸，以祛除卧室里茅草房子似的浓烈气味。费尔明娜·达萨第一次抽烟是在巴耶杜帕尔镇，之后又在丰塞卡和里奥阿查抽过。在里奥阿查时，十几个表姐妹一起关在一间房里，一边谈论男人，一边偷偷抽烟。她还学会了反着吸烟，即把香烟有火的一头放进嘴里，就像战争中的夜晚，男人们为了不让香烟的火光暴露自己所做的那样。但她从未独自抽过烟。伊尔德布兰达住在她家的那段日子，她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抽烟，正是那时她养成了烟瘾，不过始终是偷偷抽，甚至背着丈夫和孩子们，不仅因为女人当众抽烟很不雅，还因为偷偷做的事情别有一番乐趣。

伊尔德布兰达的旅行也是父母强迫的，为的是让她远离不可能的爱情，尽管他们想让她相信此行是为了帮费尔明娜拿个主意，定一门好亲事。伊尔德布兰达接受了旅行的建议，并计划像当初表妹所做的一样，再次对遗忘女神加以嘲弄。她已经和丰塞卡的电报员说好了，以最秘密的方式帮她传递消息。因此，当她得知费尔明娜·达萨已经拒绝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时，不禁大失所望。而更糟的是，伊尔德布兰达抱有一种整体的爱情观，认为每一个人的爱情变故都会影响到全世界所有的爱情。然而，她并没有放弃计划，反而以一种令费尔明娜·达萨惊慌失措的胆量，独自一人去了电报室，准备取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帮助。

她起初没能认出他来，因为她根据费尔明娜·达萨的描述想象出来的样子与他本人完全不符。第一眼看到他时，她觉得表妹不可能为了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职员到了几乎疯狂的地步。他的气质就像一条挨了打的狗，衣着则像落难的犹太教士，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根本不会让任何人动心。但很快，她就推翻了对他的第一印象，因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不知道她是谁的情况下——即使到了最后，他也完全不知情

——无条件地为她效劳。没有人像他这样善解人意，既没有要求她证明身份，也没有向她索要地址。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每星期三下午，她到电报室来，他便会把回复交到她手中，仅此而已。另外，当他读完伊尔德布兰达写好带来的字条后，问她是否接受一点修改，她同意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先是在行与行之间做了一些改动，而后又涂掉，重新写过，写到没有空地儿了，干脆把纸撕掉，重新写了一封和原来完全不同的电文，她觉得新的电文内容感人肺腑。走出电报室的时候，伊尔德布兰达差点掉下眼泪来。

“他很丑，而且可怜兮兮的，”她对费尔明娜·达萨说，“但他身上洋溢着爱。”

最引起伊尔德布兰达注意的，是表妹的孤独。她对表妹说，她就像个二十岁的老处女。伊尔德布兰达习惯了在一个人数众多且人员分散的庞杂家庭里生活，谁都无法准确说清家里到底住着多少人，也不知道每餐究竟会有谁来吃饭。她无法想象，一个像表妹这样年龄的姑娘会把自己封闭在一种修道院般的私人生活中。毫不夸张：每天从清晨六点起床开始，直至熄灭卧室里的灯光，她全然把自己献给流逝的时间。生活是从外部强加给她的。首先，伴随着最后的鸡鸣，送牛奶的男人叩响门环把她吵醒。接着，卖鱼的女人来敲门，带着一箱躺在一层海藻上的半死不活的红鲷鱼，还有那些豪爽的帕伦克女人，带着产自玛利亚·拉巴哈的蔬菜和圣哈辛托的水果。再往后，这一整天里，各色人等都会来敲门：乞丐，卖彩票的女郎，募捐的修女，吹着笛子的磨刀匠，收旧瓶子的，收碎金子的，收报纸的，还有用纸牌、手相、咖啡渣或水盆里的水算命的假吉卜赛女人。加拉·普拉西迪娅的一周都是在开门、关门中度过的，她反复地说着“不”、“请改天再来”，或者气急败坏地从阳台喊道：“别再来烦我们了，该死，该买的我们都

买齐了！”她以极大的热情和风趣代替了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以至于费尔明娜·达萨已经把她当成姑妈，甚至喜欢上她了。她当女仆当上了瘾。只要有一小会儿空闲，就跑到工作间去熨烫白色的衬衣和床单，把它们熨得平平整整，再收入放有薰衣草的衣柜中，而且不仅是对刚洗过的衣服熨了又叠，对那些久置不用而褪了色的衣服，她也如此对待。她还同样精心地保管着费尔明娜·桑切斯的衣服，费尔明娜·桑切斯是费尔明娜的母亲，已经去世十四年了。不过，家里拿主意的还是费尔明娜·达萨。她下令该吃什么，该买什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就这样，她决定着一个根本不需要决定什么的家庭的全部生活。每当她清洗完鸟笼，给鸟儿们喂过食，又侍弄过那些其实不需要侍弄的花草后，就没有了方向。被学校开除后，好几次她都睡午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才醒来。绘画课不过是又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罢了。

自从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被赶走后，她同父亲的关系就不再亲热，但两人找到了一种互不干扰的共同生活的方式。她起床时，他已经出门去做生意了。他很少不回家吃午饭，尽管几乎从来都吃不下什么，因为教区咖啡馆的开胃酒以及加利西亚的小菜和点心已经把他填饱了。他也不吃晚饭：她们把他的那份留在桌子上，所有的食物都放在一只盘子里，再用另外一只盘子扣在上面，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是不会吃的，直到第二天早上重新热过之后拿来当他的早餐。每个星期，他会给女儿一次钱，用于家中的花费。这笔钱他估算得很合适，女儿也精打细算，但每次她提出任何临时性开支，他都从容愉快地接受。他从不少给一分钱，也从不查账，但她却非常自律，就好像要向圣职部的法庭交账似的。他从未对女儿说起自己生意的性质和状况，也从没有带她去看过他在港口的那些办公室，因为它们所在的地方是正派小姐们的禁区，即便有父母陪同也不宜前往。洛伦索·达萨晚上十点前不会回家，这个钟点是战争不那么严重时宵禁开始的时间。在这之

前，他会一直待在教区咖啡馆里，随便什么都玩，因为他是室内游戏的行家，样样精通。他总是神志清醒地回到家，从不吵醒女儿，尽管每天一睁开眼，他便喝下了第一杯茴香酒，白天则一直嚼着熄灭的雪茄烟头，时不时地再喝上几杯。然而一天晚上，费尔明娜·达萨感觉到了他进屋的声响。她听见他走在楼梯上那哥萨克人似的脚步声，他在二楼走廊上沉重的喘气声，还有他用手拍打她卧室门的声音。她给他开了门，头一次，他那歪斜的眼睛和笨拙的说话声让她感到害怕。

“我们完了，”他说，“全完了，你马上就会知道的。”

这是他所说的全部，后来再也没有重新提起过，也没有发生什么证明他所说的是真的。但从那晚起，费尔明娜·达萨意识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竟是孤身一人，一直都生活在社会的净界[11]之中。昔日的同学处在一个禁止她入内的天堂里，尤其是她蒙受了被开除的耻辱后，更是如此；而她也没能融入到邻里之间，因为他们中没人知道她的过去，他们眼中的她仅仅是那个穿着至圣童贞奉献日学校校服的姑娘。父亲的世界里只有商人和码头搬运工，以及那些缩在教区咖啡馆里的战争流亡者，全都是些孤独的男人。最近这一年，绘画课稍稍为她减轻了一点幽居的寂寞，因为那位教画画的女老师喜欢上集体课，常常把其他学生带到缝纫室来。不过，这些姑娘的社会地位参差不齐，三教九流。在费尔明娜·达萨看来，她们不过是些借来的朋友，每次课一结束，情意也就随之消散。伊尔德布兰达想敞开房子的大门，让屋里透透气，还想把父亲的乐师、鞭炮和烟火塔一起弄来，搞一场狂欢舞会，让它的劲风把表妹的沉闷吹得烟消云散。但很快，她发现自己的设想是没有用的。原因很简单：根本没有人会来。

不管怎样，是她把表妹带进了真正的生活。每天下午绘画课后，她都让表妹带她上街，去认识这座城市。费尔明娜·达萨指给她看以前自己和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每日走过的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边假装看书一边等她时所坐的花园里的那条长凳，他们藏信的隐蔽处所，以及过去圣职部监狱所在的阴森宫殿，也就是后来经修缮后变成的至圣童贞奉献日学校，她对它简直恨之入骨。她们登上贫民墓地所在的小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在那里根据风向为她拉小提琴，好让她躺在床上就能听到。在那里，她们俯瞰这座历史古城的全貌：破旧的屋顶，断壁残垣，杂草丛中城堡的废墟，海湾里断断续续、大大小小的岛屿，沼泽四周寒酸可怜的窝棚，还有那一望无际的加勒比海。

圣诞夜，她们到大教堂去望子时弥撒。费尔明娜·达萨站在当初可以最好地欣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秘密为她演奏的位置上，带表姐看了自己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看见他的准确地点，就在与此同样的一个夜晚，她的目光撞上了那双惊慌的眼睛。她们还冒险独自去了“代笔人门廊”，买了一些甜食，又在卖神奇纸的商店玩了一会儿。之后，费尔明娜·达萨向表姐指出了那个她猛然发现自己的爱情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地方。她并没有察觉，从家到学校，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地方，她短暂过去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因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而存在的。伊尔德布兰达向她指出了这一点，但她却不肯承认，因为她永远也不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好也罢坏也罢，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她生活中唯一曾发生过的事。

就在那些日子，来了一个比利时照相师，在“代笔人门廊”的楼上开起了照相馆，所有能付得起钱的人都利用这个机会去给自己照张相片。费尔明娜和伊尔德布兰达是最先去的一批。她们把费尔明娜·桑切斯的衣柜翻了个底儿朝天，瓜分了那些最耀眼的衣服、阳伞以及节日

里穿的鞋帽，把自己打扮得像世纪中叶的贵妇人似的。加拉·普拉西迪娅帮她们束紧身胸衣，教她们如何在裙撑的金属丝架子中扭动身体，如何戴手套，如何系上高跟靴上的扣子。伊尔德布兰达看中了一顶宽檐帽，上面插着几根鸵鸟羽毛，一直垂到后背。费尔明娜则戴了一顶样式更新一些的，上面装饰着彩色石膏做成的水果和马鬃花。最后，她们在镜子里照见自己就像银版相片中的祖母一样，互相嘲笑起来。她们笑得前仰后合，兴高采烈地出门去拍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加拉·普拉西迪娅从阳台上看着她们撑起遮阳伞，穿过花园，一边尽可能地在高高的鞋跟上保持身体的平衡，一边像孩子拖学步车似的使上全身的劲儿拖着裙撑，她祝福她们，祈求上帝帮她们拍张好照片。

比利时人的照相馆前人山人海，因为里边正在给近日刚刚赢得了巴拿马拳击冠军的贝尼·森特诺拍照。他穿着比赛时的裤子，戴着拳击手套，头上顶着桂冠。给他照相可不容易，因为他必须保持进攻姿势一分钟，并尽可能地屏住呼吸，可他刚刚抬起手臂，摆出防守的姿势，他的崇拜者们就爆发出一阵欢呼，而他便无法抵制取悦他们的诱惑，将本领尽数抖搂出来。轮到两个表姐妹时，天空已布满了乌云，眼看就要下雨，但两人还是任凭别人在她们脸上涂满淀粉，然后靠在雪花石膏柱上，姿势那么自然，一动不动，甚至超过了所需的时间。那是一张永恒的照片。当伊尔德布兰达活到近百岁，最终在马利亚之花庄园去世的时候，人们在锁着的卧室衣柜中发现了她保存的这张玉照，它被藏在一摞飘着香味的床单之间，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封被岁月磨去了字迹的信，上面负载的情思早已凝成了化石。费尔明娜·达萨则一直把她的那张照片保存在家庭相册的第一页，但后来不知怎的，也不知何时，它突然不翼而飞，经过一番不可思议的巧合，最后竟到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手中，而那时两人都已年过花甲了。

当费尔明娜和伊尔德布兰达走出比利时人的照相馆时，“代笔人门廊”对面的广场上挤满了人，连阳台上都站满了。她们忘了自己脸上还涂着白色的淀粉，嘴唇上涂了巧克力色的油膏，而她们的衣服也不合时宜且不属于这个时代。迎接她们的是满街的哄笑和嘘声。她们躲到角落里，试图逃避众人的嘲弄。就在这时，骚动的人群分作两边，一辆被几匹泛着金光的枣红马拉着的四轮马车驶了过来。哄笑停止了，不怀好意的人群散开去。伊尔德布兰达肯定永远也忘不了她第一次看见那个站在马车踏板上的男人时的情景：他那高高的缎子礼帽，他的锦缎背心，他的文质彬彬和他双眸的柔情，还有他出现时的威严。

虽然她从未见过他，但立刻就把他认了出来。费尔明娜·达萨曾跟她提起过他，只是在不经意间，而且兴味索然。那是一个月前的一天下午，她死活都不愿从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门前经过，因为那辆金色马拉着的四轮马车正停在那里。她告诉表姐马车的主人是谁，并试图向她解释为何反感他，但对于他追求自己的事只字未提。伊尔德布兰达本来早已把他忘到脑后了。但当她在车门前认出他，看见他一只脚站在地上，一只脚放在马车的脚踏板上，像童话般出现在眼前，她不明白表妹为什么不喜欢他。

“请上车，”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对她们说，“想去哪儿两位尽管吩咐，我带你们去。”

费尔明娜·达萨正要拒绝，可伊尔德布兰达已经接受了邀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走下来，用指尖扶她上了马车，几乎没有触碰到她。费尔明娜别无选择，跟在她身后也上了车，脸涨得绯红。

她家离那里不过三个街口。表姐妹并没有发现乌尔比诺医生向车夫下了什么特别的指令，但想必如此，因为马车足足走了半个多小

时。她们坐在主座上，而他坐在对面，背朝着车子前进的方向。费尔明娜把脸转向窗子，陷入一片茫然。伊尔德布兰达则恰恰相反，表现得十分开心，而乌尔比诺医生见她开心，自己更是高兴。车子刚一动起来，伊尔德布兰达就感觉到了座椅的天然皮革散发出的温暖气味，以及包厢内的严实温馨，她说，其实住在这里也挺不错。很快，两人便开始大笑，像老朋友一样互相开起玩笑来，接着又玩上了智力游戏。这是一种简单的暗语游戏，就是在每个音节之间都插入一个事先说好的音节。他们假装费尔明娜听不懂，但其实他们知道她不仅听得懂，而且还一直在留心听，而这正是他们玩这个游戏的目的。他们笑了一阵后，伊尔德布兰达坦白说，她再也受不了脚下那双靴子的折磨了。

“这再简单不过了。”乌尔比诺医生说，“我们来比比，看谁先脱掉。”

他开始解靴子上的绑带，伊尔德布兰达也接受了挑战。但这对她来说并非易事，因为紧身胸衣的架子让她弯不下腰。乌尔比诺医生故意放慢了速度，一直等到她从裙子下面掏出自己的两只靴子，就好像刚刚从池塘里钓上来似的。这时，两人看了一眼费尔明娜，只见在黄昏火红的霞光映衬下，她那黄鹂般的倩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轮廓清晰。她正在为三件事愤怒不已：一是她的尴尬处境，二是伊尔德布兰达的放肆行为，三是她十分确信，为了拖延时间，车子一直在漫无目的地兜圈子。可伊尔德布兰达却像脱缰的野马。

“现在我发现了，”她说，“让我不舒服的不是鞋，而是这个钢丝鸟笼。”

乌尔比诺医生会意她指的是裙撑，于是赶紧抓住了这个良机。“这再简单不过了，”他说，“脱了它。”说着，他以魔术师般的敏捷动作，从兜里掏出一条手帕，绑在自己的眼睛上。

“我不看。”他说。

蒙在眼睛上的手帕一下子让他那圆润下巴上的黑胡子和用胶刷出胡尖的短髭之间的两瓣嘴唇显得分外纯美，伊尔德布兰达突然惊得浑身一颤。她又瞥了费尔明娜一眼，这一次她看见她并没有生气，而是惊恐万状，害怕表姐真的会把裙子脱下来。伊尔德布兰达严肃起来，用手语问她：“我们该怎么办？”费尔明娜·达萨同样也用手势做了回答，告诉她若不直接回家，她就从行驶的马车上跳下去。

“我在等着呢。”医生说。

“已经可以看了。”伊尔德布兰达说。

摘掉手帕，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发现她变了脸色，于是明白游戏已经结束，而且结束得很糟糕。他做了个手势，车夫掉转方向，在街灯管理人开始点亮一盏盏街灯的时刻，把马车驶进了福音花园。所有的教堂都已念起了《三钟经》。伊尔德布兰达飞快地下了车，想到自己惹得表妹不悦而有些慌张，和医生随意地握了一下手，以示告别。费尔明娜也做了同样的动作，可当她想把戴着绸缎手套的手撤回来时，乌尔比诺医生却用力攥住了她的中指。

“我在等您的回答。”他对她说。

费尔明娜更用力地把手一抽，空空的手套挂在了医生的手上，但她并没有停下来索回它。这一天，她没吃晚饭便睡下了。可伊尔德布

兰达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同加拉·普拉西迪娅一起在厨房吃过晚饭，这才走进卧室，用她那天生的风趣把下午的事评判了一番。她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对乌尔比诺医生，对他的优雅和翩翩风度，都充满了兴奋与热情。费尔明娜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但已经从反感中冷静下来。终于，伊尔德布兰达坦白说，当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蒙上眼睛，她看见他那玫瑰色的双唇间两排闪亮的完美牙齿时，曾泛起过一种想去狂吻他的难以抑制的渴望。费尔明娜·达萨翻过身去，面向墙壁，用一句话结束了她们的谈话，不带丝毫恶意，而是挂着发自肺腑的微笑。

“你真是个小娼妇！”她说。

睡梦中，她惊吓连连，到处都看见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看见他笑，看见他唱，看见他蒙着眼睛，两排牙齿间迸发出硫磺的火星，看见他坐着一辆和以前不同的马车，驶在通往贫民墓地的山坡上，用一种没有固定规则的暗语嘲笑她。距离天亮还有很久，她就醒了，精疲力竭，清醒地闭着双眼，想着她今后还要活的那无数个年头。之后，趁着伊尔德布兰达洗澡的时候，她飞快地写了一封信，飞快折好，又飞快地装进信封，赶在伊尔德布兰达走出浴室之前，交给加拉·普拉西迪娅，派她送到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府上。那是一封具有她独特风格的信，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只是写着：可以，医生，去找我父亲谈吧。

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得知费尔明娜·达萨即将嫁给一位门第显赫、家财万贯、在欧洲受过教育而且在同龄人中声誉非比寻常的医生时，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他从消沉之中振作起来。看到儿子不说一句话，不吃不喝，整夜不歇地流泪，特兰西多·阿里萨做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用尽了情人间的甜言蜜语来安慰他，终于在一星期后让他重新开始进

食。之后，她找到莱昂十二·罗阿依萨，也就是那三兄弟中唯一还活着的一个，和他谈了一次话。她没有说明原因，只是请求他在航运公司给侄子找份差事，不论干什么都行，但地点得是在马格达莱纳流域丛林中的某个偏僻的港口，那里既不能通信，也不能发电报，更不能让他看见什么人，打听到这座堕落的城市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叔叔最终并没能向他提供这样一份工作，主要是出于对哥哥遗孀的尊重——单是丈夫在外有个私生子的事实就让她无法忍受——但他还是给侄子在维拉·德雷伊瓦找了个电报员的职位。维拉·德雷伊瓦是一座梦幻般的城市，距本地有二十多天的路程，海拔比窗户街高出近三千米。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那次疗伤之旅一直都没有什么清晰的印象。他将始终透过一层忧愁的薄雾来回忆这次旅行，就像那个时期发生的一切一样。当他收到委任电报时，甚至都没想接受，但洛达里奥·图古特用德国人的理由说服了他，那就是在公共管理领域有一份光辉的前途在等着他。他说："电报员这一行大有可为。"他送给他一双带兔皮衬里的手套，一顶草原上用的帽子和一件经受过巴伐利亚冰冷一月考验的长毛绒领大衣。莱昂十二叔叔送了他两件呢子衣服，几双防水靴，都是他父亲的遗物，还给了他一张下一班船的寝舱船票。特兰西多·阿里萨按照儿子的身材改小了这些衣服——他不像父亲那样高大，比德国人也矮许多，她还给他买了几双羊毛袜和几条连体裤，好让他不缺少衣物去抵御寒冷荒原上的恶劣天气。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经过了一系列的挫折后变得异常冷漠，就像死人为自己的葬礼做准备似的，参与着为这次远行所做的工作。他没有把自己要走的消息告诉任何人，也没有跟任何人道别，就像当初他只向母亲倾诉了心中悄悄压抑的激情一样。但临行的前一天晚上，他还是故意放纵了内心的最后一丝疯狂，做出了一个很可能断送自己性命的举动。半夜里，他穿上星期日的礼服，独自站在费尔明娜·达萨的阳台下，拉响了那曲他为她创

作的爱的华尔兹。这支曲子只有他们俩知道，也是三年来他们所经历的种种挫折的象征。他一边拉，一边低诵着歌词，琴渐渐被泪水打湿。他拉得是那样激情澎湃，刚奏出头几小节，整条街上的狗便开始狂吠，接着，全城的狗都跟着吠叫起来。但过了一会儿，在音乐的魔力下，它们又慢慢安静下来，华尔兹最终结束在一片空灵的寂静之中。阳台的窗子没有打开，也没有人向街上探出头来，甚至连那位几乎总是拎着油灯赶来，试图从演奏小夜曲的人身上捞点油水的巡夜人也没有出现。而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来说，这次演奏就像一道宽慰的符咒，因为当他把琴收进琴盒，头也不回地在死一般寂静的街道上渐行渐远时，心中感到的并不是明天即将远行，而是仿佛多年前就已抱定永不回来的决心离开了此地。

那船是加勒比河运公司所拥有的三条一模一样的船之一，为纪念公司的创建者被重新命名为“皮奥第五·罗阿依萨号”。那是座漂浮在水上的双层木屋，建在一个又宽又平的铁壳上，最深吃水五英尺，这让它能够更好地在水深莫测的河流中消灾避祸。最老的一批船是世纪中叶在辛辛那提建造的，依照的是往来于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上的轮船的传奇样式，两侧各有一个桨轮，靠烧柴的锅炉驱动。同这些老船一样，加勒比河运公司的船的底层甲板几乎与水面齐平，安有蒸汽发动机并设有厨房，还有一大排鸡笼似的舱室，船员们把自己的吊床横七竖八、高高低低地挂在里面。顶层则设有驾驶室、船长和高级船员的舱室，还有一间休息室和一间饭厅，身份高贵的旅客至少会被邀请到这里一次，用餐或者打牌。中间层有六间一等舱，设在一段被当作公共餐厅的甬道两侧。船头是一个露天起居室，配有雕花的木头栏杆和铁柱子，很多普通旅客晚上就把吊床挂在这里。但和那些老船不同的是，船的两侧并没有桨轮，而是在船尾有一个装有水平桨叶的巨轮，就位于旅客甲板上那令人窒息的便池下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

七月一个星期日的早晨上了船，但他并没有像第一次旅行的人几乎出于本能所做的那样，一上船就不厌其烦地四处勘察。黄昏，当船经过卡拉玛尔村时，他到船尾去小便，透过便池洞，他看见巨大的桨轮在他脚下转动，卷起翻腾的泡沫和蒸汽，发出火山爆发般的隆隆巨响。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新环境。

他从没出过远门。他带着一只马口铁皮箱子，里面装着荒原上要穿的衣服，几本他自己装订的插图小说——把买来的月刊连载小说订在一起，再加上硬纸作为封皮——还有几本烂熟于心、已经快翻碎了的爱情诗集。他把小提琴留在了家里，因为它与他的不幸关联得实在太紧密，母亲则逼他带上了铺盖卷。这是一套很普通也很实用的寝具：一只枕头，一条床单，一个白镴尿壶和一顶针织蚊帐，所有这些都卷在一张席子里，用两根龙舌兰绳捆着，席子和绳子在急需时还可以用来做吊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不想带这些，因为舱室里自有铺开的床铺，这些东西根本用不着。但到了第一个晚上，他不得不又一次感谢母亲的明智。原来，在最后时刻，上来一位身穿礼服的旅客。他是当天清晨乘坐一条欧洲船抵达这里的，此刻由省长亲自陪同登船。他带着妻子、女儿、身穿制服的男仆以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通过楼梯的七只镶着金边的箱子，希望即刻继续行程。为了将这几位不速之客安顿下来，船长，一位身材魁梧的库拉索人，试图唤起船上土生白人的爱国情怀。他用库拉索方言和西班牙语掺杂在一起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解释，说那位身穿礼服的人是新上任的英国全权公使，正在前往共和国首都的途中，并且提醒他说，那个王国为了帮我们从西班牙人的统治下取得独立，向我们援助了决定性的物资，所以，为了能让一个如此高贵的家庭在船上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任何牺牲都是微不足道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于是理所当然地让出了自己的舱室。

起初，他并没有后悔，因为每年这个时期，河中都水量充足，所以前两个晚上船并无颠簸。每天吃过晚饭，下午五点钟，船员们会给旅客发一些帆布底的折叠床。每个人便找地方把自己的床打开，铺上行李中的铺盖，再在上面支起针织蚊帐。有吊床的人会把吊床挂在大厅里，什么都没有的人就睡在餐厅的桌上，把整个旅途中绝不会更换两次以上的桌布盖在身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基本上大半宿都睡不着，他仿佛在河面凉爽的微风中听到了费尔明娜·达萨的声音，对她的回忆抚慰着他的寂寥。黑暗里，船踏着野兽般的大步前行，在它的喘息声中，他倾听着她的歌唱，直到第一缕霞光出现在地平线，新的一天突然绽放在荒无人烟的草原和烟雾弥漫的沼泽之上。他觉得这次旅行再一次证明了母亲的智慧，他感受到了在遗忘之中存活下来的勇气。

然而，在顺畅的河水中走了三天后，船开始行进在意想不到的浅滩和迷惑人心的暗流之间，前进得格外艰难。河水变得浑浊，而且越来越窄，两岸是参天大树纵横交错的丛林，只能偶尔遇到一间茅屋，旁边堆着船上锅炉用的柴火。鹦鹉叽里呱啦的叫声和看不见的长尾猴的喧闹仿佛加剧了午间的闷热。晚上，船不得不停在岸边，让大家休息。在那种时候，单单是活着这件事，都变得让人无法忍受。除了闷热和蚊子的烦扰，还得加上晾在栏杆上的一块块腌肉发出的恶臭。大部分旅客，特别是欧洲人，都走出腐臭的舱室，在甲板上来回踱步以度过漫漫长夜，用毛巾一边擦拭不断渗出的汗水，一边驱赶各种活物。天亮时，他们都精疲力竭，个个被叮咬得鼻青脸肿。

此外，由于那一年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时断时续的内战又爆发了新的事端，为了维持船上的秩序，保证旅客安全，船长采取了极为严格的防备措施。他禁止了那个时期旅途中人们最为热衷的一种消遣，

即朝岸上晒太阳的短吻鳄开枪射击，以避免误会和冲突。后来，有旅客为此争论，分成敌对的两派，于是，船长没收了所有人的武器，并以荣誉保证旅行结束后悉数奉还。甚至对英国公使他也没有网开一面：这位公使在起锚后的第二天早晨，便穿上狩猎服，拿着一支精密卡宾枪和一支猎杀老虎的双筒猎枪出现在大家面前。过了特内里费岛，限制变得更为严格，因为在这个岛，他们遇上了一艘高高悬挂着瘟疫黄旗的船。关于这个警告标志，船长没能获得更多信息，因为那艘船没有回答他发出的信号。但就在同一天，他们遇到了另一艘前往牙买加运送牲口的船。船上的人告诉他们，挂瘟疫旗的那条船上有两个得霍乱的病人，疫情正在侵袭前方流域。于是，不仅在接下来的港口，甚至在那些为装柴火而停靠的无人区，旅客都一律禁止下船。就这样，在到达目的港之前最后的六天旅途中，旅客们染上了一些监狱中的习惯。其一便是恶劣地传看一套荷兰的色情明信片。这套明信片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谁也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尽管没有一个跑船的老手不清楚，这不过是船长著名收藏中的一套样品而已。但就是这点儿没有盼头的消遣，最终也停止了，因为只会徒增烦闷。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他那种令母亲忧伤不已、令朋友痛心疾首的矿石般的耐心忍受着旅途的艰辛。他没有跟任何人打交道。日子在他身上轻而易举地流逝。他坐在栏杆前，看着岸边一动不动晒太阳的短吻鳄张着血盆大口等着捕捉蝴蝶，看着受惊吓的草鹭突然从沼泽中飞起，看着海牛用巨大的乳头喂养幼崽，并发出如女人哭泣般的叫声，令旅客惊诧不已。在同一天，他看见河上漂过三具膨胀发绿的尸体，上面还站着几只兀鹫。最先是两具男尸，其中一具没了头，而后漂过一具只有几岁的女童的尸体，她那美杜莎般的头发在船尾的航迹中上下漂浮。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根本没人知道，他们到底是霍乱还

是战争的牺牲品，但那令人恶心的强烈气味污染了他心中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思念。

向来如此：每一件事，无论好坏，都与她有着一定关联。晚上，船停泊下来，大部分旅客都在甲板上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而他却在餐厅的瓦斯灯——唯一一盏直到天亮都不会熄灭的灯下，复习着那些他几乎可以背下来的连载插图小说。当他用现实中认识的人去代替小说中想象的人物时，那些反复读过多遍的情节又恢复了最初的魔力，而他向来把那些坏运气的情侣角色留给自己和费尔明娜·达萨。另外一些夜晚，他会给她写下一封封伤心欲绝的信，而后，任它们的碎片漂散在那一刻不停地向着她的方向奔流而去的河水之中。就这样，他挨着那些最难熬的分分秒秒，时而化身为一位腼腆的王子或爱情的卫士，时而又回到他那伤痕累累的皮囊，变回一个被遗忘的恋人，直到清晨吹来第一缕微风，他才坐到栏杆旁的靠背椅上打起盹来。

一天晚上，他比往常早一些中断了阅读。正当他漫不经心地朝厕所走去时，空无一人的餐厅里突然打开了一扇门，挡住了他的去路，一只鹰爪般的手抓住了他衬衫的袖子，把他拉进一间舱室，随即又关上了门。黑暗中，他甚至看不清这个不知年龄的裸体女人的样貌，她浑身淌着湿热的汗水，喘着粗气，一把将他仰面朝天地推倒在简易床上。她解开了他的皮带，又解开他裤上的扣子，接着便骑在他身上，毫无光荣可言地夺取了他的童贞。两人恣情陷落一个无底的深渊，四周泛着爬满青虾的咸水沼泽的味道。之后，她在他身上躺了一会儿，无声无息地喘着气，然后消失在黑暗中。

“现在，您走吧，忘了它。”她对他说，“就当这件事从没有发生过。”

这次突袭是如此迅速而成功，令人无法视之为一次无聊时突发奇想的疯狂举动。它必然是从容计划的结果，甚至连细枝末节都考虑到了。这个令人愉悦的信念增加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躁动，因为当他处于欢愉的顶峰时，曾有一个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甚至也不愿承认的发现，那就是，他对费尔明娜·达萨的虚无缥缈的爱可以用世俗的激情来替代。于是，他千方百计想找出那个技艺精湛的强奸者，或许在她那豹子般的本能中，他能找到医治自己痛苦的良方。但他没有找到。相反，调查越是深入，他感到自己距离真相越发遥远。

袭击发生在最后的那间舱室中，但这一间和倒数第二间有一扇门相通，所以两间舱室组成了一间有四个床位的家庭卧室。里面住着两个年轻女人、一个上了年岁但风韵犹存的妇人，还有一个几个月大的男孩。她们是从巴兰哥·德洛巴上的船，自从蒙波斯城因其河水变化无常而被从蒸汽船的航线上取消后，该城的货物和旅客都是从巴兰哥·德洛巴港上船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之前就曾注意到她们，但那只是因为她们把熟睡的孩子放在一只巨大的鸟笼里随身携带。

她们穿得仿佛是在时髦的远洋轮船上旅行似的：丝绸裙底衬有裙撑，蕾丝饰领，宽檐帽上缀着马鬃花。年龄较小的那两个女人每天都要从头到脚换好几身华丽衣服，就在其他旅客热得快要窒息的时候，她们却仿佛置身于自己随身携带的一片春光之中。三人灵巧地撑着阳伞，摇着羽毛扇，但就像所有的蒙波斯女人一样，她们的意图令人费解。毫无疑问，她们是一家人，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甚至连她们之间的关系都搞不清楚。起初，他认为那个年长的妇人可能是另外两个的母亲。但随后他注意到，她的年纪根本不足以当她们的母亲，而且她戴着半孝[12]，而另两个女人却没有着孝。他无法想象，她们中的一个敢在另外两人睡在旁边的床铺时做出那种事来，唯一合理的假设就是

这个女人利用了偶然的，又或者是安排好的空当，在舱室里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下手。他观察到有时她们中的两人会出去乘凉，很晚才回来，而第三个人就留下来照看孩子。但在一个更热的晚上，她们三人带着孩子一起出了门，孩子睡在柳条编的鸟笼里，外面还罩着纱幔。

尽管迹象混乱如麻，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是很快就排除了年长妇女是那次袭击的罪魁祸首的可能性。接着，又宣布了最小的那位，也是她们中最漂亮、最大胆的那位的清白。他做出如此判断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只因为通过对她们的密切监视，他最终倾向于将自己内心的希望当作真相：他发自肺腑地希望自己那一夜情人是鸟笼孩子的母亲。这种假设是如此地吸引他，以至于他开始想念她胜过了想念费尔明娜·达萨，而忽略了这位新晋的年轻母亲心里只有孩子这一明显事实。她应该还不到二十五岁，身材纤瘦，头发金黄，一双葡萄牙人的眼睛更令她显得遥不可及，她在孩子身上慷慨倾注的无限温柔，任何男人只要能分得一丁半点就会心满意足。从早餐直至入寝，她都在大厅里照顾孩子，而另外两个女人则在玩中国跳棋。等孩子睡着了，她便把柳条鸟笼挂在天花板上，靠近栏杆凉爽的那一侧。即便是孩子睡觉时，她也不会对他置之不理，而是一边摇着鸟笼，一边哼着少女情歌，任由思绪飞离这枯燥的旅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执著地幻想着她迟早会露出马脚，哪怕只是一个表情。他毫不掩饰地越过假装在读的书看她，甚至借由她挂在细布衬衫上的圣物盒的一起一伏，观察她呼吸的变化，还甘冒无礼之嫌，明目张胆地在餐厅调换座位，只为能与她对面而坐。但最终，他都没有看出哪怕最细微的一点迹象，能够表明她当真就是收藏着他另一半秘密的人。他唯一得到的，只是一个没有姓氏的名字，因为那位年轻的女伴是这样叫她的：罗萨尔芭。

第八天，船艰难地在水流湍急的狭窄河道里航行，两边是大理石的悬崖峭壁，午饭后，船停靠在纳雷港。那些去往安蒂奥基亚省的旅客要在此地下船，安蒂奥基亚省是受新一轮内战影响最深的省份之一。港口由六间棕榈屋和一间锌顶的木制仓库组成，几队武器简陋的赤脚士兵在此巡逻守卫，因为有消息说，暴动者正计划抢劫船只。房屋背后，杂草丛生的山峰高耸入云，一块马蹄铁似的岩石为悬崖镶上了飞檐。夜晚，船上没有一个人睡得安稳，但是并没有袭击发生。天亮时，港口摇身变成了一个星期日的集市，印第安人兜售着用植物象牙做成的护身符和爱情药水，夹杂在一群群整装待发、准备用六天的时间攀到中部山区那长满兰科植物的丛林中去的牲口之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着黑人们把货物背下船，以此打发时间。他看见他们卸下一箱箱中国瓷器，还有运给恩维加多独身姑娘们的三角钢琴。当他发现下船的旅客中也包括罗萨尔芭一行人时，已经太晚了：她们已经侧坐在马背上，脚踏亚马逊皮靴，手撑厄瓜多尔的彩色阳伞。这时，他迈出了之前这些天都未敢迈出的一步：向罗萨尔芭挥手告别，三个女人也用同样的动作回答了他，那股亲切劲儿让他为自己迟来的大胆痛彻心扉。他看着她们从仓库后面绕过去，身后跟着几头骡子，驮着箱子、帽盒和婴儿的鸟笼。不一会儿，就看见她们像一队搬运东西的小蚂蚁似的，攀行在悬崖上，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这时，他突然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孤身一人，而这几日一直在暗中窥视他的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思念，突然用它那锋利的爪子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他知道她即将举行隆重的婚礼，而他这个最爱她、且将永远爱她的人却连为她而死的权利都没有。之前一直被压抑在哭泣之中的忌妒，此刻占据了他的整个灵魂。他祈求上帝，就在费尔明娜·达萨即将

为爱情宣誓，顺从于那个只为把她当作社交点缀而娶她为妻的男人时，让公正的闪电从天而降，劈在她身上。这位新娘，只能是他的新娘，否则就谁的也不是。他满心狂喜地想象着，她仰面朝天躺在大教堂的石板上，四周满是沾染了死亡露珠的雪白的橘树花，那泡沫般倾泻而下的头纱垂落在主祭台前安葬着十四位主教的大理石棺之上。然而，复仇的幻想刚一结束，他便为自己的邪恶后悔起来，于是他又看见费尔明娜·达萨完好无损地站了起来，虽然于他遥不可及，但却活着，因为他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她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他没有再睡着过，而如果说他偶尔能坐下来随便吃口东西，那也是因为幻想着费尔明娜·达萨坐在桌前，或者相反，是因为他不愿给予她那种殊荣，不愿让她认为自己是在为她禁食。有时，他会用这样的信念来安慰自己：在醉人的婚礼中，甚至在火热的蜜月里，费尔明娜·达萨会有那么片刻的心痛，至少有片刻，无论怎样，一定会有那么片刻，她的心里会浮现出这个被嘲弄，被侮辱，被唾弃了的恋人的影子，而她的幸福也将会荡然无存。

到达旅途终点卡拉科利港的前一天晚上，船长举行了传统的告别晚会，船员组成一支吹奏乐队，驾驶室里还放出了五彩的烟花。那位大不列颠公使以堪称典范的克制力忍受了一路的艰辛，用照相机猎获了那些不允许他用猎枪屠杀的动物，并且，没有一个晚上不是穿着礼服走进餐厅。但在这最后的欢庆活动中，他穿了一身苏格兰麦克塔维什部族的服装，兴致勃勃地吹起风笛，还教所有想学的人跳他们的民族舞蹈。还没到天亮，大家便不得不半扶半拖地把他搀回舱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正被痛苦折磨得垂头丧气，躲在甲板最偏远的角落，完全听不到人们的欢闹声。他把洛达里奥·图古特的大衣裹在身上，努力抵御着发自骨髓的寒意。就像死刑犯在行刑的清晨一样，早晨五点他就醒了，一整天什么也没做，只是一分钟一分钟地想象着费尔明娜·达

萨婚礼的每一步骤。后来，他回到家时，才发现自己弄错了日期，而且一切都和他想象的不同，他甚至清醒地嘲笑起自己的幻想来。

但不管怎样，那是一个受难的星期六，最终他发起了高烧，因为他仿佛看到一对新人正悄悄地从一扇假门溜走，去尽情享受新婚之夜的狂欢。有人看到他烧得发抖，便报告了船长。船长担心这是一起霍乱病例，带着随船医生离开了晚会。医生出于谨慎，把他送进了隔离舱室，还给他用了大剂量的溴化物。然而第二天，当人们远远看见卡拉科利的礁石时，他的烧已经退了，而且精神抖擞，因为在镇静药物所导致的沉滞中，他义无反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让电报员的光辉前途见鬼去吧，他要乘这同一条船回他的窗户街去。

鉴于之前曾把舱室让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代表，他要求随船返航并不是一件难事。船长以电报是一项前途无量的科学为由试图说服他。他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这一点千真万确，因为已经有人发明了一种可以安装在船上的电报系统。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为任何理由所动，船长最后只得带他返航，并不是为了舱室里的人情，而是因为他知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加勒比河运公司的真正关系。

下水航行用了不到六天的时间。自从他们清晨驶入梅塞德斯湖，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见捕鱼的独木舟上点点灯火在轮船激起的回头浪中波动起伏，便感觉自己重新回到了家里。当他们在迷失的男孩湾靠岸时，已经是晚上了。在西班牙人的古航道被疏通并投入使用之前，那里是蒸汽船的最后一个港口，距离海湾还有九里。旅客必须等到早晨六点，才能登上租用的小艇，驶往最后的目的地。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归心似箭，提前坐上邮局的小艇走了，因为邮局的职员认出他是自己人。下船之前，他忍不住做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把铺盖卷扔进水里，目送它穿过那些看不见的渔夫手中的火把，直到离开潟

湖，消失在大海之中。他确信，在今后的日子里，他再也不需要它了。永远不，因为他将永远不再离开费尔明娜·达萨的城市。

黎明时分，海湾里风平浪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透过第一缕阳光，在飘浮的大雾上方看见了金色大教堂的拱顶，看见了屋顶上那一座座的鸽子屋，并顺着它们找到了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的阳台，想象着在那座房子里，那个带给他不幸的女人还倚在餍足的丈夫肩上贪睡。这个假想令他肝肠寸断，但他并没有制止它，相反，他在痛苦中感到满足。太阳开始升温，邮局小艇在停泊帆船组成的迷宫中穿梭。公共市场的无数种气味裹挟着水底散发出的腐烂味，混合成一股恶臭。来自里奥阿查的轻便船刚刚抵达，一队队搬运工蹚着齐腰深的水去接船上旅客，一直把他们背到岸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个从邮局小艇跳上岸。从那一刻起，他就再没有闻到海湾的臭气，只闻到弥漫在城市中的费尔明娜·达萨特有的气息。一切都散发着她的味道。

他没有回电报室去工作。他唯一关心的似乎只是连载的爱情小说和“人民图书馆”的书籍，母亲继续给他买，而他则躺在吊床上一遍又一遍地读，直到把它们背下来为止。他甚至都没有问小提琴在哪儿。他和最亲近的朋友恢复了来往，有时一起打打台球，或者到大教堂广场拱门下的露天咖啡馆聊聊天。但他再没有去过星期六的舞会：没有她，他无心跳舞。

从那次未完成的旅行回来的当天早上，他就得知费尔明娜·达萨正在欧洲度蜜月。他那颗茫然的心当即认定，她即使不会在那里永远住下去，也会住上很多年。这个信念为他注入了忘记过往的第一线希望。他想念起罗萨尔芭来，随着对另一个人的回忆慢慢平息，对她的思念变得越来越炽热。正是在那个时期，他蓄起了小胡子，胡子尖还涂上胶，决意在有生之年都不再剃掉它。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用一段

爱情来取代另一段爱情的想法让他误入歧途。渐渐地，费尔明娜·达萨的味道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难以闻见，最后只留在了白色的栀子花上。

他随波逐流，不知道生活该从哪里继续。战争时期的一个晚上，那位远近闻名的拿撒勒[13]的寡妇惊慌失措地躲到他家，因为在叛军将军里卡多·加依坦·奥贝索围城的时候，她自己的家被炮弹炸塌了。特兰西多·阿里萨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借口说自己的房间没有地方，把寡妇安排在了儿子的卧室，实际上，她是盼望用另一段爱情来疗愈那份让儿子痛不欲生的爱。自从在船上的舱室被罗萨尔芭夺去了童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再没有做过爱。他觉得，在这样一个有紧急情况的夜晚，寡妇睡床上，自己睡吊床是很自然的事。可寡妇已经替他做了决定。躺在床上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而她坐在床沿，开始讲述三年前丈夫的死给她带来的无法慰藉的痛苦，边讲边脱掉外面披着的一层守寡黑纱，把它抛向空中，甚至把结婚戒指也从手上摘了下来。她脱掉镶着小珠子的塔夫绸衬衣，抛到房间另一头角落里的安乐椅上，又把紧身背心从肩膀上方扔出去，丢到了床的另一头，然后，迅速褪掉了长至脚踝、带荷叶边的百褶裙、绸缎束腹带，还有守寡的黑丝袜。她把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整个房间都被她那身丧服的零七八碎覆盖了。她兴高采烈地做着这一切，而且间隔恰到好处，仿佛每个动作都有进攻部队那震得城市地基颤抖的炮声为之庆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想帮她解开胸衣上的按扣，但她以娴熟的动作抢在前面，因为在五年恩爱的夫妻生活中，她已经学会了做爱的每一个步骤都自给自足，甚至包括前戏，无需任何人帮忙。最后，她脱掉蕾丝花边的内裤，以游泳运动员的敏捷将它从双腿上褪下来，露出自己的玉体。

她二十八岁，生育过三个孩子，但她的裸体还完美地保持着独身时那动人心魄的魅力。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永远也不会明白，之前那几件忏悔服是如何掩盖住这匹未被驯服的小母马的热情的。她脱光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衣服，被自己的狂热弄得喘不过气来，要知道，她对丈夫都不曾这么做过，怕他认为自己是个淫荡的女人。她带着五年忠贞婚姻生活的迷茫与无知，试图一举满足守丧期间被严酷禁止的欲望。自她从娘胎里生下来的那个美好时刻起，到这个夜晚之前，除了死去的丈夫，她甚至从未跟别的男人共过一张床。

她并没有让内疚扫自己的兴。而是恰恰相反。屋顶上呼啸而过的火球让她睡不着觉，她继续讲述丈夫的种种优点，直到天亮。除了抛下她死去这一点，她没有责怪他的任何不忠。事实上，她感到释然，因为她确信丈夫如今比任何时候都更完全地属于自己，他已躺在那个钉了十二枚三英寸钉的棺材里，埋在地下两米深的地方。

“我很幸福，”她说，“因为只有现在我才十分肯定地知道，他不在家时到底在哪儿。”

那天晚上，她一步到位地脱掉了丧服，没有经过穿灰色小花衬衫的多余的过渡阶段。她的生活一下子充满了情歌和撩人的衣衫，件件都绘着五彩的鹦鹉和蝴蝶。她开始把身体分给所有向她索取的人。围城六十三天后，加依坦·奥贝索将军的军队被击退了，她重建了被大炮炸穿了底儿的房子，还在防波堤上建起一座漂亮的观海露台，暴风雨来时，可以观赏愤怒咆哮的海浪。这里是她的爱之巢，她毫无讥讽之意地如是说。在这里，她只接待合她胃口的人，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想以何种方式就以何种方式，不向任何人收取一分钱，因为她认为，是那些男人施惠于她。只在极少的情况下，她才接受礼物，而且不能是黄金。她做得如此恰到好处，谁也拿不出她行为不端的确凿证

据。只有一次，她险些在公众中闹出丑闻，当时谣言四起，说大主教但丁·德鲁纳并非死于误食了一盘毒蘑菇，而是有意服毒，因为她威胁他说，如果他再继续亵渎神明地纠缠她，她就抹脖子自尽。但没有人问过她这是不是真的，她自己也从来没有提起过，她的生活毫无变化。确实，正如她自己常常大笑着说的那样，她是全省唯一的自由女人。

对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偶尔相邀，拿撒勒的寡妇即便在最忙的时候也从不爽约，而且也从不抱着爱上他或被他爱上的假想，只是希望能找到某种类似爱情却又没有爱情之烦恼的东西。有时他也会去她家，两人喜欢坐在观海露台上，浑身被硝石味儿的海水泡沫打得湿漉漉的，眺望地平线上即将照亮整个世界的黎明之光。他尽全力地教她那些他从旅馆的小孔里学来的颠鸾倒凤的花样，并实践洛达里奥·图古特在狂欢之夜吹嘘的那些理论成规。他说服她在两人做爱的时候让人观看，并改变常规的传教士体位，代之以“海上自行车”，“烤架上的烤鸡”，又或者“被肢解的天使”等等姿势。当他们试图在吊床上发明出与众不同的花样，吊床的挂绳断了，两人摔下来差点送了命。这些课程的效果微乎其微，因为事实上，她虽然是个无所畏惧的莽撞学徒，却缺乏最起码的天赋，难以消化这些指导。她永远也不理解在床上保持肃穆的乐趣，从未有过灵光乍现的瞬间，性高潮也总是来得不合时宜，且浮于表面：一种乏味的欢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有很长时间都受到蒙骗，以为自己是她唯一的男人，而她也乐意让他这样以为，直到有一回她运气不佳，睡着的时候说漏了嘴。渐渐地，通过偷听到的梦话，他把她梦中的航海地图拼凑起来，然后穿梭于那不可计数的秘密岛屿之间。由此，他知道了她并不想嫁给他，但又觉得与他的生活紧密相连，因为她无限感激他让她得以堕落。有好几次，她对他说：

“我崇敬你，因为是你把我变成了娼妇。”

如果换个方式说，其实她不无道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她这里夺走了正常夫妻间所保有的那种贞洁，这比夺走童贞或让寡妇失节更加有破坏力。他让她明白，只要是为了让爱情长久，床上所做的任何事都算不上不道德。另外，还有些东西自此成为她生活的信条：他说服她，一个人在这世上能交欢的次数是有限的，如果不充分利用，那不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的原因，也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永远失去了这些机会。她的优点就在于一字不差地听从了他的话。然而，正是因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认为比任何人都了解她，他不能理解，为何这样一个缺乏情趣、喜欢在床上不停唠叨丈夫之死给她带来的痛苦的女人，会有这么多的追求者。他唯一能想到的不可辩驳的解释，就是拿撒勒的寡妇的温柔弥补了她床上功夫的不足。随着她领地的扩大，而他也开始慢慢探索自己的领地，试图在另外一些支离破碎的心灵中寻找抹平旧日伤痕的慰藉，两人见面越来越少，最后毫无痛苦地忘掉了对方。

这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第一次床上之爱。但他没有像母亲做梦都盼望的那样和她结成稳固的关系，相反，两人都利用这次机会，投入到各自的生活当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明出许多方法，对像他这样一个郁郁寡欢、骨瘦如柴、穿得仿佛另一个时代的老头儿的男人来说，颇不可思议。然而，有两个优势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其一就是他独具慧眼，即便在人群中也能一下子认出哪个女人正期待着他这样的男人，但尽管如此，他献殷勤的时候也小心翼翼，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比遭到拒绝更让人感到羞辱了。他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她们会当即认定他是一个急需爱情抚慰的孤独者，一个流浪街头、丧家犬般的可怜人，这使得她们无条件地投降，没有任何索求，也不期待从他身上

得到任何东西，只求能够施恩于他，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安宁。这是他仅有的两样武器，凭借它们，他展开了一系列历史性的绝密战斗，并以公证人的严谨把它们一一记录在一个密码本上。这个本子在众多本子中能一眼辨认出来，因为上面写着一个说明一切的标题：*她们*。他做的第一个记录就是拿撒勒的寡妇。五十年后，当费尔明娜·达萨从她那通过神圣仪式所领受的判决中解脱出来时，他已经拥有了二十五个本子，里面有六百二十二条较长恋情的记录，这还不包括那无数次的短暂艳遇，因为它们甚至都不值得他怜悯地提上一笔。

和拿撒勒的寡妇疯狂而放肆地爱恋了六个月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信已经从费尔明娜·达萨之痛中幸存下来。他不只相信这一点，还在费尔明娜·达萨持续了近两年之久的新婚旅行期间，多次向特兰西多·阿里萨说起过。他相信自己的感情已经获得了无限制的解放，直到一个灾难的星期日，他在没有任何预感的情况下突然看见了她。当时，她刚望完大弥撒，正挽着丈夫的手臂，被她新圈子里的人好奇而又谄媚地包围着。当初，这些门第高贵的夫人们看不起她，嘲笑她家是无名无姓的暴发户，而如今，她用自己的魅力把她们迷得晕头转向，她们殷切地希望她能感觉到自己是她们中的一员。她如此驾轻就熟地胜任了尘世中妻子的角色，以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必须定睛反应片刻才把她认出来。她变成了另一个人：成年人的装扮，高高的靴子，面纱帽上插着一根东方鸟的彩色羽毛。她身上的一切都变了样，而且是那么的自然而然，仿佛她天生就是如此。他发现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更年轻，却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遥不可及，他不明白这其中的缘故，直到看见她真丝长裙下腹部隆起的曲线：她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然而，最让他感慨万千的，是她和丈夫组成了令人羡慕的一对，两人应付裕如地周旋于他们的世界，仿佛超然于现实的艰难险阻。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忌妒，也没有愤怒，而是感到一种巨大的

自卑。他觉得自己可怜，丑陋，低贱，不仅配不上她，也配不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

就这样，她回来了，对生活中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丝毫后悔地回来了。不仅如此，经历了最初几年的坎坷后，她越来越没有什么可后悔了。对于带着天真的懵懂步入新婚之夜的她来说，这种情况可以说尤其值得庆贺。其实，在去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家省份的那次旅行中，她就已经开始褪去天真。在巴耶杜帕尔，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公鸡要追着母鸡跑，还亲眼目睹了驴子交配的野蛮场面，看见过牛犊出生的情形，甚至听过表姐妹们大大方方地谈论家中的哪些夫妻还在做爱，而哪些尽管生活在一起却已经不做了，是从何时起，又是为什么不做的。正是在那时，她开始了独自一人的爱，奇怪地感觉到自己发现了某些本能中一早就知道的事，起先是在床上，屏住呼吸，以免被同屋的六个表姐妹发觉，后来则是放松地躺在浴室的地板上，用两只手，披头散发，还抽着她最初的几支脚夫的细雪茄。这样做时，她总是带着良心上的疑虑，直到婚后才消除，而且也总是秘密进行，不像那些表姐妹们，不仅炫耀每天能达到多少次高潮，甚至还讨论其形式和程度。然而，尽管享受过这些先导仪式的美妙，她始终还是怀着最初的信念，认为失去童贞定是一项血腥的祭祀。

因此，那场在上世纪末最为轰动的婚礼，对她来说，却仿佛灾难的前夕。比起和一位当时堪称独一无二的绅士缔结婚约所引起的流言蜚语，对蜜月的恐惧对她影响更大。自从在大教堂的大弥撒中发布了结婚公告，费尔明娜·达萨又收到了多封匿名信，有些甚至以死相胁，但她也只是草草地看上一眼，因为她将所有的恐惧都集中在自己即将被强奸这件事上了。尽管并非有意，但这样处理匿名信的方式是正确的，其实那些不敢留名的人所属的阶层，在历史的嘲弄下，早已习惯

了对既成的事实低头。渐渐地，由于知道婚礼势在必行，她们吞下了反对的声音。她从那些被关节炎和忌恨之心折磨得憔悴失色、面色惨白的女人越来越殷勤的态度中，看出了这一点。她们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阴谋是徒劳的，于是不请自来地出现在福音花园，就好像那里是她们自己家似的，还带来了菜谱和祝福吉祥的礼物。特兰西多·阿里萨了解那些人的世界，但只有那一次，她为此感到切肤之痛。她知道，主顾们会在重大庆典的前夕出现在她家，求她把罐子从地下挖出来，把典当的首饰借给她们二十四个小时，并额外支付利息。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出现过这种情形了：罐子全都空了，为的是让那些拥有一长串姓氏的夫人们走出她们阴暗的圣殿，戴着租来的曾经属于自己的首饰，珠光宝气地出现在那场盛况空前的世纪末婚礼上。婚礼的至高荣耀莫过于由拉法埃尔·努涅斯博士主婚。博士曾三次担任共和国总统，是哲学家、诗人和国歌的词作者，这些都已写入了当时一些新出版的辞典。费尔明娜·达萨挽着父亲的手臂，走到大教堂的主祭台前。那天，父亲的礼服为他注入了一种模糊的受人尊重的气质。在大教堂的主祭台前，在一台由三位主教共同主持的弥撒中，在圣三主日[14]早上十一时，她永远地结婚了，甚至不曾怜悯地想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片刻。而此时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正坐在一条风浪之中、最终也没能将他带入忘却之境的船上，烧得直说胡话，几乎为她而死。在整个婚礼仪式以及后来的庆祝活动中，她始终保持着仿佛被铅白定住的微笑，这种并非发自内心的表情被某些人理解为胜利者的嘲笑，但其实不过是她用来掩饰新婚处女恐惧的一种可怜手段罢了。

幸运的是，一些突发的状况，加上丈夫的善解人意，让她顺利度过了前三个晚上，没有丝毫痛苦。真是老天保佑。由于加勒比海天气恶劣，大西洋轮船总局那艘船的航线被打乱，提前三天才通知要提早二十四小时出发，也就是说，船不会像六个月以来一直预计的那样，

于婚礼次日前往拉罗切利，而是当晚就要起航。人人都以为，这个变化是婚礼预先为大家准备的众多华丽而高雅的惊喜之一：庆祝活动改在一艘灯火辉煌的远洋轮船上举行，直到午夜过后才结束，一支维也纳管弦乐队在席中首次演奏了约翰·施特劳斯最新创作的圆舞曲。最后，几个被香槟灌得醉醺醺的伴郎是被他们那受不了的妻子拖上岸的，当时他们正到处问侍者船上是否有空舱室好让他们把狂欢一直延续到巴黎去。最后下船的人在港口的酒馆前看见了洛伦索·达萨。他坐在大街上，礼服已经被扯烂，就像阿拉伯人为自己死去的亲人哭丧一样号啕不止。那摊他正坐在其中的几乎汇流成渠的臭水，很可能就是他的一汪眼泪。

无论是海上狂风巨浪的第一夜，还是接下来平缓航行的几天，抑或是在他们漫长的婚姻生活中，费尔明娜·达萨担心的那种野蛮举动都从没有发生过。尽管船很大，舱室豪华，但第一夜仍旧可怕地重复了里奥阿查那艘轻便船上的经历。她的丈夫充当了殷勤医生的角色，片刻未睡地安慰她，因为这是一位过于杰出的医生所知道的对付晕船唯一可做的事。第三天，过了瓜伊拉港后，风暴平息了，他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很长时间，交谈过很多，彼此感觉像老朋友一样了。第四天晚上，两人恢复了各自的日常习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惊讶于自己年轻的妻子睡觉前竟然不祷告。她坦诚相告：修女们的两面派作风造成了她对宗教仪式的抵触，但她的信仰是完整的，她学会了默默地保持它。她说："我更愿意直接与上帝沟通。"他表示理解，从那时起，他们就以各自的形式信奉着同一种宗教。两人曾有一段短暂的订婚期，但对那个时代而言是相当不正式的：不过就是医生每日黄昏都到她家去看她，而没有人在一旁监视。在主教祝福之前，她是连手指头也不会允许他碰一下的，而他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在海面平静下来之后的第一夜，两人和衣躺在床上，他开始了最初的爱抚，十分

小心翼翼，所以当他建议她换上睡衣时，她觉得很自然。她走到盥洗室去换衣服，但先把舱室里的灯熄了，等穿好睡衣出来，她又用几块布塞住门缝，然后才在完完全全的黑暗中回到床上。她一边这样做，一边心情不错地说：

“你想怎么样呢，医生？这是我第一次和陌生男人一起睡觉。”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感觉到她像一只惊慌失措的小动物一样滑到他身边，尽可能地离他远些，但在这样一张简易床上，很难做到谁也不碰谁。他抓住她冰凉、因害怕而有些发抖的手，把两人的手指交叉在一起，然后几乎耳语般讲起了自己另外几次海上旅行的经历。她再度紧张起来，因为回到床上后，她发现就在自己去盥洗室的时候，他已脱光了所有的衣服，这让她重新萌生了对下一步的恐惧。但这下一步却推迟了好几个小时，乌尔比诺医生只是继续缓慢地述说，一边说，一边一毫米一毫米地争取她身体的信任。他说起了巴黎，说起了巴黎的爱情，说起巴黎的情侣们在大街上，在公共汽车上，在向夏日火热的空气和慵懒的手风琴声敞开大门的咖啡馆那开满鲜花的露台上亲吻，在塞纳河的码头上站着做爱，而不会被任何人打扰。他一边在黑暗中呢喃，一边用指肚抚摸她脖颈的曲线，她手臂上如丝般柔软的茸毛，以及她那躲躲闪闪的腹部。当他觉得她的紧张感已经消除时，第一次做出了掀开她睡袍的尝试，但她以性格中特有的冲动制止了他。她说：“我自己知道怎么做。”果然，她脱掉了睡袍，然后就一动不动地躺着，要不是她的身体在黑暗中发出微光，乌尔比诺医生甚至以为她已经不在那里了。

片刻之后，他又抓住她的手，这次，她的手变得温暖而放松，但仍旧湿湿的，沁着柔软的汗珠。他们沉默地、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他在伺机进行下一步，而她在等待着，不知他会从何处开始。随

着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房间里变得越来越黑。突然，他松开她的手，一跃而起：用舌头舔湿了中指的指肚，轻轻碰了一下她那毫无防备的乳头，而她感觉到致命一击，仿佛他触到了她的一根活神经。她庆幸自己处于黑暗之中，不会让他看见她那使得全身震颤直至发根的滚烫羞红。“别紧张。”他对她说，语气极为温和，“别忘了，我是见过它们的。”他感觉到她笑了，黑暗中，她的声音甜美而鲜嫩。

“我记得很清楚，”她说，“而且我的气现在还没消呢。”

这时，他知道自己已经绕过了美好希望的海角[15]。他再次拿起她修长而绵软的手，用一个个孤零零的轻吻覆盖了它，从棱角分明的手背，到纤长灵敏的手指、透明的指甲，再到那沁着香汗的手掌上象征命运的掌纹。她不知道自己的手如何到了他的胸膛，碰到了一片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他说：“这是圣衣。”她抚摸着他胸口的软毛，又用五根手指抓住这片草丛，仿佛要把它们连根拔起。“再使点儿劲。”他说。她试着加了些力气，直到她确信不至于把他弄疼的程度。之后，竟然是她的手在寻找他那消失在黑暗中的手。但他没有与她十指相扣，而是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用一种无形、却又恰到好处的力量，引领她的手沿着他的身体游走，直到她感觉到一头赤身猛兽的炽热气息，没有固定的形状，却热切而高昂。与他的想象相反，甚至也与她自己的想象相反，她的手并没有撤回去，也没有停在他把它放下的地方。她将自己全身心地托付给了至圣童贞马利亚。她咬着牙，生怕会因这疯狂的举动而笑出声来：她开始通过触摸来认识那个昂首挺立的对手，认识它的体积，它那长茎的力量，它两翼的延伸，既对它的坚决感到害怕，又对它的孤独感到同情。她带着细致入微的好奇，一点一点地将它据为己有，若非丈夫是个富有经验的人，准会把她的举动错会成挑逗。他求助于自己的最后一点力气，抵抗着这番致命探究带

来的眩晕，直到她以孩子般的随性放开了它，就像把它丢进垃圾堆似的。

“我从来就搞不明白这东西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他如同上课一般认真地向她解释起来，一边讲一边带着她的手移过他所提到的各个部位，而她则像个模范学生一样，顺从地跟随着他。在一个恰当的时刻，他建议把灯点亮，让一切更清楚些。他正要去点，她却拦住了他的手臂，说：“我用手看得更清楚。”事实上，她也想把灯点亮，但她想自己点，而不是被别人命令。最后，她得偿所愿。他在突然出现的光亮中看见了她，胎儿似的蜷缩着，包裹在被单里。但他发现她丝毫没有忸怩作态，而是再一次抓住那只让她充满好奇的野兽，把它扭向右又扭向左，带着一种似乎已经超越了科学范畴的兴趣观察它，最后得出结论：“它多丑啊，比女人的更难看。”他表示赞同，并指出它的几种比丑陋更严重的弊端。他说：“它就像人的长子，你工作一辈子都是为了它，为它牺牲了一切，可到头来，它还是只做它想做的事。”她继续探索着，不时地问这是干什么用的，那又是干什么用的。当她认为已经了解得足够清楚了，就用双手掂了掂它，最终证实，即便是从分量上看，也颇不值得为它费心。她带着轻蔑的表情放开手，让它滑了下去。

“而且，我觉得它有很多东西是多余的。”

他大吃一惊。他毕业论文最初的想法正是这个：简化人类器官的好处。他认为人类的器官体系已经过时，很多功能是无用或者重复的，对于曾经的时代来说必不可少，但对我们的时代却并非如此。的确，可以更简单些，从而也就少一些脆弱。他总结道：“当然，这是上帝才能做的事，但不管怎样，在理论上明确下来也是好的。”她被逗笑

了，笑得那么自然，他趁机抱住她，第一次吻在了她的唇上。她回应了他，他一边继续轻吻她的脸颊、鼻子、眼皮，一边把手滑到被单下面，抚摸起她那毛发平直的圆润阴阜来：一个日本女人那样的阴阜。她没有把他的手推开，但她自己的手也处在警惕之中，以防他再前进一步。

“我们不要再上医学课啦。”她说。

“不，”他说，“这将是爱之课。”

他掀掉她身上的被单，而她不仅没有反对，还快速而使劲地用双脚把它踢得离床远远的。她的身体凹凸有致，富有弹性，比穿着衣服时要真实得多，并且散发出一种特有的山间野兽似的味道，让她能在全世界的女人中被分辨出来。她全然暴露在灯光之下，无处藏身，一股热血涌上她的脸颊。她唯一能想到的掩饰羞怯的办法，就是搂住丈夫的脖子，深深地、用力地吻他，直到两人把所有可供呼吸的空气都耗尽在亲吻之中。

他心里明白，自己并不爱她。同她结婚是因为喜欢她的高傲，她的严肃，她的力量，也因为自己的一点儿虚荣心，但当她第一次吻他时，他确定，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止他们建立一份完美的爱情。在那第一个晚上，他们什么都聊了，一直聊到天亮，就是没有谈到爱情，以后也永远不会谈到它。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两个人谁都没有做错。

天亮时，他们睡着了，她还是个处女，但很快就会不是了。果然，接下来的那个晚上，在加勒比海的满天繁星下，他教她跳了维也纳华尔兹，并在她之后去了盥洗室，等他回到舱室时，发现她正光着身子在床上等他。这次是她采取了主动，毫不畏惧，毫无痛苦，怀着

在公海中冒险的喜悦把自己交给了他，除了床单上那朵贞洁的玫瑰，没有其他任何血腥仪式的痕迹。两个人都做得很好，几乎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在余下的旅途中，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继续这样做着，而且一次比一次好。到拉罗切利时，两人已经默契得像相识已久的恋人了。

他们在欧洲待了很久，以巴黎为大本营，不时到邻近的国家去短期旅行。这段时间，他们每天都做爱，冬季的每个星期日甚至还不止做一次，在床上一直嬉闹到午饭时间。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男人，而且训练有素，她则天生不容许别人占据优势，因此两人在床上不得不平分主导权。三个月火热的恩爱生活过后，他意识到两人中有一个无法生育，于是，他们在他实习过的萨伯特医院接受了严格的检查。那是一次艰苦却徒劳无功的努力。然而，就在他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没有借助任何科学手段，奇迹发生了。回家时，费尔明娜·达萨已经怀孕六个月，她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两人期待已久的儿子在水瓶座的月份顺利降生，取了死于霍乱的祖父的名字，以示纪念。

说不清究竟是欧洲之行改变了他们，还是爱情改变了他们，因为这两者是同时发生的。它们都起了作用，更深一层说，改变的不仅是他们两人，也是所有人，就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那个不幸的星期日，他们回来两周后，看见他们望完弥撒从教堂中走出来时所察觉到的那样。他们带着一种新的生活观念回来了，满载着世界的新鲜事物，准备以此引领大众。他带回了文学、音乐，尤其是他所学专业的最新发展。为了不和现实脱节，他从巴黎订了一份《费加罗报》，为了不和诗歌脱节，他又订了一份《两世界杂志》。此外，他还和自己在法国的书商约定好，把读者最多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寄给他，比如阿纳托尔·法朗士和彼埃尔·洛蒂，再把他最喜欢的作家的作品也寄给他，

比如雷米·德古尔蒙和保罗·布尔热，但绝不要寄埃米尔·左拉的作品，因为他觉得尽管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勇敢地伸张正义，但他的作品让人无法忍受。那位书商还承诺把黎科迪出版社目录中最吸引人的乐谱篇章一并寄来，特别是室内音乐，如此，他便能保持父亲所赢得的本城音乐会第一倡导者的好名声了。

一向反对追求时尚的费尔明娜·达萨，这次带回了六箱不同时代的衣服，因为那些名牌服装没能让她动心。她曾在严冬去往杜伊勒里宫参加那位锋芒逼人的高级定制服装界霸主沃斯的服装展，唯一的收获就是让她在床上躺了五天的支气管炎。她觉得相比之下拉费里耶尔的服装倒没那么浮华和张扬，但她还是做出英明的决定，到二手商店去将自己喜欢的东西洗劫一空，尽管丈夫惊恐地发誓说那些都是死人的衣服。同样，她还带回了很多没有牌子的意大利鞋，比起名声在外而又稀奇古怪的费利牌鞋，她更喜欢自己买的这些。她还从杜布伊那里买回一把阳伞，红得像地狱之火，为我们那些总爱大惊小怪的社会新闻记者提供了很多写作素材。她只买了一顶瑞邦夫人设计的帽子，却装了满满一箱的人造樱桃枝，能找到的各式毡花束，一把把鸵鸟羽毛、孔雀毛、亚洲公鸡的尾羽，整只的雉鸡、蜂鸟，以及各式各样外国鸟的标本，有正在飞翔的，正在啼鸣的，还有奄奄一息的：所有这些在过去的二十个寒暑里都发挥了用途，让同一顶帽子变换出各种风貌。她还带回一套来自世界各国的扇子，每把都各有特色，适用于不同场合。此外还有一瓶能把人迷得神魂颠倒的香水，那是在春风席卷着灰烬将法国慈善集会夷为平地之前，[16]从集会上的众多香水中挑选出来的，但她只用过一次，因为换成这种香味后她都认不出自己了。她还带回一个化妆盒，这是诱惑品市场的最新玩意儿，她是第一个带化妆盒去参加节日聚会的女人，当时，仅仅在公众场合补妆都被视作不正经的表现。

此外，两人还带回了三段不可磨灭的记忆：《霍夫曼的故事》那盛况空前的首演；圣马可广场对面那场几乎烧毁了威尼斯所有贡多拉的触目惊心的大火，他们透过酒店的窗子痛心地亲眼目睹了那一幕；还有一月份的第一场雪时，他们匆匆邂逅奥斯卡·王尔德的情景。但在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回忆之间，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还保留着一段他一直遗憾没能与妻子共享的回忆。那是他独自在巴黎上学期间一段关于维克多·雨果的记忆。在我们这里，雨果除了他的作品之外，还享有一份感人的声誉，据说他曾经说——其实并没有人真的听他说过——哥伦比亚的宪法不是给人制定的，而是给天使制定的。从那时起，人们就对他有了一种特别的崇拜。去法国旅行的同胞很多，其中大部分都热切地盼望能够见到他。曾经有六名学生，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就是其中之一，有段时间总是守候在埃洛大街他的住所前，以及听说他必去的几家咖啡馆里，但他从未出现过。最后，他们写信向他申请一次私人会见的机会，署名为里奥·内格罗宪法[17]的天使们，也没有收到回音。但有一天，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偶然从卢森堡花园经过，竟看见雨果从参议院走出来，被一个年轻女人搀扶着。他看上去十分苍老，举步维艰，胡子和头发都不像画像上那样光亮，身上的衣服也好像属于一个比他高大许多的人。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不想用一个不合时宜的问候毁掉这段回忆：就这样近乎虚幻地看上一眼，已足够令他终身难忘。等他结婚后重返巴黎，有条件更为正式地见上一面的时候，维克多·雨果却已经辞世了。

作为安慰，胡维纳尔和费尔明娜拥有这样一段共同回忆。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一群人冒着暴风雪站在卡布奇诺街上的一家小书店门前，引起了他们俩的好奇。原来，奥斯卡·王尔德在书店里。终于，他从里面走出来，果然气宇不凡，但也许他自己过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人群将他团团围住，请他在书上签名。乌尔比诺医生停下来只

是想看看，可他冲动的妻子却要穿过大街去，由于没有带书，她想请求王尔德把名字签在她唯一觉得合适的地方：那副美丽的羚羊皮手套上，手套修长、光滑、柔软，与新婚的她的皮肤同样颜色。她确信，一个像他那样高雅的男人定会欣赏她的举动。但丈夫坚决反对，而当她无视劝阻硬是要去时，他感到羞愧得无地自容。

“如果你穿过这条街，”他对她说，“等你回来，就会看见我已经死在这里了。”

这是她本性使然。结婚不到一年，她便到处游逛，就像小时候走在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那片死亡之地上一样自如，仿佛这是她天生的本事。她和陌生人打起交道来得心应手，令她的丈夫困惑不已。而且，她有一种神秘的才能，可以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靠卡斯蒂利亚语进行交流。“语言嘛，如果你是想卖东西，当然得要懂的。”她常常略带嘲笑地说，“但如果是想买东西，那不管怎样，别人总有法儿听得明白。”很难想象有人能像她那样，那么快，那么兴高采烈地适应了巴黎的日常生活。尽管巴黎阴雨连绵，她还是学会了去爱记忆中的它。然而，当她带着那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的无数经历，带着旅途的疲惫，昏昏欲睡地回到家时，港口的人们问她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对欧洲的种种神奇之处有何感受，而她用一句四个字的加勒比俚语就概括了这许多个月的幸福生活：

“浮华而已。”

---

[1] 圣牧羊女，指圣母马利亚。

[2] 让一马丁·沙可（1825—1893），十九世纪法国神经学家、心理学家。

[3]阿尔芒·特鲁索（1801—1867），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医生。

[4]但丁《神曲》中的名句，写在地狱之门上。

[5]指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作家，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

[6]圣多默，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又译圣多马。

[7]乐善好施者圣胡利安，天主教传说中的圣人，许多旅店主视其为主保圣人。

[8]“桶匠”在西班牙文中有“大肚子的人”之意，转义指气量大的人。

[9]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德拉卡列的缩写。

[10]克莱蒙四世（1200—1268），1265至1268年间的天主教教皇。

[11]天堂与地狱的边界，是没有接受洗礼或没有机会认识上帝的义人等待救赎的地方。

[12]根据西方习惯，守丧后期可以穿黑色以外的深色衣服，称为“半孝”。

[13]拿撒勒，位于今天的以色列，传说耶稣在此度过青年时期，故常被称为“拿撒勒的耶稣”。

[14]圣三主日，天主教传统节日，旨在纪念三位一体的奥秘，日期依复活节而定，即圣神降临节之后的第一个主日。

[15]即“好望角”的典故，绕过此海角就意味着好运来临。

[16]1897年，法国慈善集会毁于一场大火。

[17]里奥·内格罗宪法，哥伦比亚于1863至1885年间施行的宪法。

那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大教堂前见到怀有六个月身孕、对自己的新角色驾驭得八面玲珑的费尔明娜·达萨，便下定了狠心，要赢得名誉和财富以配得上她。他甚至没去考虑她已是有夫之妇这个障碍，因为他同时认定，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是会死的，就好像这件事取决于他似的。他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会如何发生，但他把它当作一件势不可挡的事。他决心既不着急也不躁动地等下去，即便等到世界末日。

他从头做起，没有事先通知便来到加勒比河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莱昂十二的办公室，表示愿意听从他的差遣。叔叔仍在为他白白浪费了维拉·德雷伊瓦那份电报员的好差事而不悦，但还是情愿相信他的说辞——人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一成不变的，相反，生活会逼迫他一次又一次地脱胎换骨。再者，哥哥的遗孀已在前一年带着刻骨的仇恨死去了，没有留下一个继承人。于是，他给了这个流浪的侄子一份差事。

这是莱昂十二·罗阿依萨的典型决定。在这个没有灵魂的商人的躯壳里，藏着一份本性的疯狂，可以让瓜希拉沙漠涌出一眼甘泉，也可以用他那令人撕心裂肺的《在那幽暗的坟墓里》的歌声，让一场高举大十字架的葬礼被泪水淹没。他一头鬈发，嘴唇像农牧神那样肥厚，只差一把里拉琴和一顶桂冠，就和基督教传说中的纵火者尼禄一模一样了。除了管理他那些老得掉渣的破船——它们还能漂在水面完全是因为命运之神的疏忽——以及航运中日益繁杂的问题以外，他空余的

时间全都花在了丰富他的抒情曲目上。没有什么比在葬礼上唱歌更让他喜欢的了。他有一副划船苦役犯的嗓子，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却能驾驭令人惊讶的音域。有人告诉他，恩里科·卡鲁索仅靠声音就能把花瓶震成碎片，于是他花了几年时间试图模仿他，甚至想震碎窗玻璃。朋友们把旅行时能找到的最薄的花瓶带给他，还专门组织了一次次聚会，好让他达成梦想。他却从没有成功过。然而，他那雷鸣般的歌声中自是闪烁着一丝柔情，让听众的心都碎了，丝毫不亚于伟大的卡鲁索震碎细颈瓶。正因为这一点，他在葬礼上总是备受尊敬。除了有一次，他灵光一现想要唱《在光荣中醒来》，一首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美丽而忧伤的挽歌，结果被神甫勒令制止，因为神甫不能允许马丁·路德涉足他的教堂。

就这样，伴随着一首首歌剧曲目和那不勒斯小夜曲，他靠着自己的创造天赋和不屈不挠的实干精神，让他在河运事业最辉煌的时期成了这一领域的显赫人物。像两位已故的兄长一样，他也是白手起家。兄弟三人尽管背负着私生子的烙印，而且始终也没被家族承认过，但却都达到了设定的目标。他们是当时人们所说的“柜台贵族”中的佼佼者，商业俱乐部就是他们这类人的圣殿。然而，尽管已经拥有了可以过得像那位与他样貌相似的罗马皇帝一样的财富，莱昂十二叔叔却为了工作方便仍旧住在老城，生活十分节俭，房子也万般简陋，因此从未摘掉人们不公平地加在他身上的吝啬恶名。而他唯一的奢侈竟然更为简单：一座距离办公室两里地的海边房子，里面的家具不过就是六只手工做的凳子、一个装水瓮的木架柜，以及露台上的一张吊床，星期日，他可以躺在上面思考。有人说他是富人，可事实上，没有人比他更好地给自己作了定位。

“富人？不，”他说，“我只是个有钱的穷人，这压根儿不是一回事。”

他的这种奇怪脾性——曾有人在某次演讲中称之为大智若愚——让他立刻就洞悉了此前和此后都未有人发现过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身上的某种特性。自从那天一脸忧郁、虚度了二十七年光阴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到他的办公室来申请一份差事，他便用军营里那种足以让最坚强的硬汉折腰的严酷制度来考验他。可最终也没有使侄子胆怯。莱昂十二叔叔从不怀疑，侄子的这种坚韧既非来自生存的需要，也非继承了其父亲粗鲁的冷漠，而是源自一种爱的雄心，无论是这个世界，还是另一个世界中的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将它摧垮。

最艰苦的是最初几年。他被任命为总经理的书记员，这个职务就像是特意为他而设的。洛达里奥·图古特曾是莱昂十二叔叔的音乐老师，正是他建议叔叔给侄子安排一个抄写的工作，因为他是个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文学而不知疲倦的人，尽管读的好作品没有坏作品多。莱昂十二叔叔并未理会洛达里奥·图古特对侄子做出的读坏书的评价，因为洛达里奥·图古特也曾说过他是他唱歌唱得最差的学生，可他还不是能让墓碑也落泪。但不管怎样，德国人在某些他最没有留意的地方还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无论写什么都激情澎湃，以至于公文读上去就像情书。尽管他刻意避免，但出自他笔下的载货清单依然带着韵脚，那些常规商业信函透出的抒情味道更是削弱了它们的权威性。一天，叔叔亲自来到他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包他甚至都没有勇气签上自己名字的信件，给了他最后一次拯救灵魂的机会。

“如果你连一封商业信件都写不好，那就去码头扫垃圾吧。”他对他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接受了挑战。他尽了最大努力去学习简单而世俗的商贸文体，就像当初模仿流行诗人一样勤奋地模仿着公证员文件的范本。那个时期，他的空闲时间都是在“代笔人门廊”度过的，帮助大字不识的恋人们书写香飘四溢的情书，以此释放内心积聚的那些在海关报告中毫无用武之地的绵绵情话。六个月过去了，尽管他竭尽全力，却依然没有扭断心中那顽石一般的天鹅脖子[1]。因此，当莱昂十二叔叔第二次训斥他时，他认输了，只是仍旧带着几分倨傲。

“我唯一感兴趣的是爱。”他说。

“糟糕的是，”叔叔对他说，“没有河运就没有爱。”

叔叔把威胁付诸行动，派他去码头清扫垃圾，但同时向他保证，如果干得好，就会一步一步把他提升上去，直到他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事实也正是如此。没有任何一种工作能击败他，不管多么艰难，多么屈辱；少得可怜的工资没有让他垂头丧气；面对上司的傲慢无礼，他也不曾有片刻失去骨子里那无畏的勇气。但他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所有挡在他路上的人都尝到了苦果，在那副无助的外表之下，有着势不可挡的决心，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正如莱昂十二叔叔所预见和期望的那样，在三十年的勤奋与各种考验的磨炼中，他做过所有职务，也洞悉了公司运作的每一项秘密。他以令人钦佩的能力胜任了每一个岗位，研究了那些与诗歌相通的神秘经络中的每一条丝线，但终究还是没能得到那枚他梦寐以求的勋章——写一封说得过去的商业信函，哪怕只有一封。在无意之中，甚至是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他用自己的生活证实了父亲的理论。父亲甚至在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在说，没有人会比诗人具有更敏锐的判断力，没有哪个石匠会比诗人更顽固，也没有哪个经理会比诗人更精明、更危险。至少，莱昂

十二叔叔是这样告诉他的。叔叔在心情闲适的时候，会和他讲起他的父亲，给他的印象是与其说父亲是个企业家，毋宁说他是个梦想家。

叔叔告诉他，皮奥第五·罗阿依萨给办公室增添了工作以外的愉快用途。他总是在星期日离家到此休闲，借口要接船或者派船。更有甚者，他还叫人在仓库的院子里架起一只废弃的锅炉，上面安有汽笛，有人会按照航行信号鸣笛，以防他的妻子生疑。莱昂十二叔叔细想了一番，就肯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在一个闷热的星期日下午，在某间门都没关严的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怀上的，而当时，他父亲的妻子正在家里听着一艘永远也不会起航的轮船发出一声声告别的汽笛声。当她发现此事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甚至都来不及让丈夫为自己的卑鄙行为付出代价，因为他已经死了。她比他多活了许多年，没有孩子的痛苦毁掉了她的生活，她在祷告中祈求上帝永远诅咒那个私生子。

父亲的这个形象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困惑不已。母亲曾把父亲说成一个缺乏商业天赋的了不起的男人，他最终从事了河运生意是因为他的大哥与航运先驱、德国海军准将胡安·B. 埃尔勃斯关系亲密。兄弟三人是一母同胞的私生子，这位母亲是个厨娘，和不同的男人生下他们。他们用了母亲的姓氏，而姓氏之前的名字则是她从瞻礼单上教皇们的名字中随便挑选的，只有莱昂十二用了他出生时在位的那位教皇的名字。他们的外公叫弗洛伦蒂诺，于是，这个名字跳过教皇一代，落到了特兰西多·阿里萨儿子的头上。

弗洛伦蒂诺一直保留着父亲写情诗的一个本子，其中有几首的灵感来自特兰西多·阿里萨，而每一页上都画有破碎的心作为装饰。有两件事让他惊奇。其一是父亲那独特的字体竟与他的一模一样，而他其实是从一本教科书上的众多字体中挑出最喜欢的一种学的。其二是他

找到了一句格言，他本以为那是自己的心声，可父亲在他出生前很久便写下了它：死亡让我感到的唯一痛苦，便是不能为爱而死。

他还看见了父亲仅有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在圣菲照的，很年轻，就像他第一次见到父亲时父亲的那个年纪，照片中的他穿着一件大衣，仿佛钻进了一只熊的身体，倚在一座只剩下绑腿的雕像底座上，身边站的少年是莱昂十二叔叔，头上戴着一顶船长小帽。另一张照片上，父亲和一队士兵在一起，不知是那么多战争中的哪一场，他手里拿着最长的一杆猎枪，小胡子散发出的火药味都飘到照片外面来了。和两个兄弟一样，他是自由党，也是共济会成员，可他却希望儿子能进神学院。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觉得自己如人们说的那样和父亲很像，但据莱昂十二叔叔说，皮奥第五也曾被人指摘文件写得具有抒情色彩。不管怎样，他不像照片中的父亲，也不像自己记忆中的父亲，不像母亲因爱而描绘得走了样的父亲，更不像莱昂十二叔叔以其残酷的幽默描绘出的那个褪了色的父亲。然而，多年以后的某一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对镜梳头的时候，终于发现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也就是在那时，他明白了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开始变老，是源于他发现自己开始长得像父亲了。

他脑海中没有父亲出现在窗户街的记忆，只隐约知道有段时间他住在那里，就在与特兰西多·阿里萨相爱之初，但自己出生之后，父亲就再没来看过她。在很多年里，洗礼登记是证明我们身份的唯一有效途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洗礼是在圣托利维奥教区登记的，只写着他是一个名叫特兰西多·阿里萨的独身私生女的私生子。登记上没有出现父亲的名字，但父亲秘密地供养儿子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这种社会地位使神学院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关上了大门，但也让他在我

们连年战争最为血腥的那个时期逃过了兵役，因为他是一个未婚女人的独生子。

每个星期五放学后，他都坐在加勒比河运公司的对面，看一本翻了无数遍、已经散架的动物画册。父亲一眼也不瞧他就走进了办公室，脸上的神情和祭台上的福音圣胡安[2]一模一样，身上穿着一件呢子长礼服，就是后来被特兰西多·阿里萨改了给他的那件。好几个小时后，父亲走出来，趁着连车夫都没有看到的时候，把一周的生活费递给他。两人都不说话，因为父亲不愿说，也因为他惧怕父亲。有一天，他等了比平常更久的时间后，父亲把钱交给他，说：

"拿着，以后不要再来了。"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但后来他知道，钱由比父亲小十来岁的莱昂十二叔叔继续带给特兰西多·阿里萨。而在皮奥第五死于一次治疗不善的肠绞痛后，也是叔叔担起了照顾母亲的责任。父亲只字未留，也没有做出任何有利于他这个唯一儿子的安排：一个被丢在街上的儿子。

在加勒比河运公司当书记员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悲剧就在于他无法摆脱抒情体，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在思念费尔明娜·达萨，也永远都学不会在写作时不去想她。后来，他被调到别的岗位，内心的爱依然满溢，他不知如何是好，便把爱送给那些大字不识的恋人们，在"代笔人门廊"为他们免费写情书。下班之后，他就到那里去，从容地脱掉长礼服，挂在椅背上，然后戴上半截套袖，以免弄脏衬衫袖子，再解开背心扣，以便更好地思考。有时，他一直在那里待到夜深，用一封封令人疯狂的情书鼓舞着那些无助的人。有时，他会遇到一位跟孩子之间出了问题的可怜女人，或是一位坚持申领养老金的退伍老兵，又

或是某个被偷了东西想向政府申诉的人，可无论他多么尽心竭力，也还是无法让他们满意，因为他唯一能令人信服的就只有情书。他甚至无需向新来的顾客提问，只消看一眼他们翻起的眼白，便清楚他们的处境。他为他们写下一页又一页的情信以倾诉胆大妄为的爱情，依循着十分可靠的模式——写信时一直想着费尔明娜·达萨，什么都不想，只想着她。第一个月后，他不得不建立起预约制度，以免自己被焦虑的恋人们淹没。

那个时期他最愉快的记忆是关于一个羞怯的姑娘的，她几乎还是个小女孩，颤抖着请求他为自己刚刚收到的一封无法拒绝的信写一封回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认出那封信正是自己前一天下午写的。于是，他依照姑娘的情感和年龄，回了一封风格迥然不同的信，甚至笔迹也像出自这位姑娘之手，因为他会根据每个人的性格，为不同的情况模仿出一种字体来。他写信时，一直幻想着如果费尔明娜·达萨像这个无助的小姑娘爱她的追求者一样爱他，会给他回一封怎样的信。自然，两天后，他又不得不为这位情郎写回信，用他早在第一封信中就定下的笔迹、风格和爱情的类型。就这样，他最终陷入了自己给自己写信的狂热之中。不到一个月，姑娘和小伙子分别来向他道谢，因为他在男孩信中提出的建议在姑娘的回信中被热情地接受了：他们就要结婚了。

直到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才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发现，原来两人的信是同一位代笔先生所写。于是，他们头一次一起来到了门廊下，请求他做他们孩子的教父。看到自己梦想的明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极为兴奋，百忙中挤出时间写了一本《恋人指南》，比一直在门廊里卖二十生太伏且已经被半城人背得滚瓜烂熟的那一本更富有诗意，内容也更广泛。他把想象中费尔明娜·达萨和他遇到的各种情况排

列成序，为每种情况都写了无数封信件作范例，包含各类他觉得可能的去信和回信。最后，他共写了一千多封，分为三卷，每卷都是科瓦鲁维亚斯的字典那样的大部头。但城中没有一个印刷商肯冒险出版它。他只好将它们束之高阁，和过去的一些手稿堆在一起，因为特兰西多·阿里萨断然拒绝从地下挖出她的罐子，把一生的积蓄浪费在一次出版书稿的疯狂举动上。若干年后，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终于自己有钱出版这部书时，又费了很大努力才接受了这些情书已经过时的现实。

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加勒比河运公司迈出了最初几步并在“代笔人门廊”为人免费写信时，他年轻时的朋友确信他们已在慢慢地失去他，再也回不到过去了。的确如此。当初他从河上旅行回来，还去见了一些朋友，希望借此减轻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思念。他和他们一起去打台球，参加了最后几次舞会，偶尔还甘愿做姑娘们争抢的对象，并做所有他觉得有助于让他回到从前的事。后来，莱昂十二叔叔聘他为公司职员，他便开始和办公室同事一起在商业俱乐部玩多米诺骨牌。等到他和他们只聊河运公司里的事，且从不提公司全称，而用缩写字母CFC指代时，他们开始把他视作自己人。他甚至连饮食习惯都改变了。之前，他对餐桌上的事并不在意，也毫无规律可言，但自那时起，他的饮食开始每日相同，且极为节俭，直到他人生最后的日子：早餐是一大杯苦咖啡，午餐是一块炖鱼配白米饭，睡觉前再喝一杯咖啡加牛奶，配一块奶酪。他随时随地、不分场合地喝苦咖啡，一天甚至能喝上三十小杯。那是原油似的汤剂，他喜欢亲自煮，总是装在一只保温瓶里，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虽然他抱着坚定的决心，也付出了热切的努力，想回到遭受爱情致命打击前的那个他，但事与愿违。

事实是，他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了。重新赢得费尔明娜·达萨的芳心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目标。他坚信自己早晚能夺回她，于是说服特兰西多·阿里萨继续修缮房屋，以便随时在奇迹发生时迎接她的到来。与对出版《恋人指南》这一提议的反应不同，特兰西多·阿里萨在这件事上甚至超前一步：她当即买下房子，开始全面翻新。原来的卧室变成了一间会客厅，又在二层建起了一间供小两口使用的卧室，以及一个为两人将来的孩子准备的房间，两间房都宽敞明亮。在以前烟草厂房的位置，建起了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面种了各个品种的玫瑰，全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利用清晨的空闲亲自栽种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经住的店铺里间永久地保持了原貌，吊床仍旧挂在那儿，写字台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而他却已搬到二层预备做婚房的那个房间去了。那是整座房子中最宽敞、最凉爽的一间，阳台建在了屋内，晚上海风轻拂，空气中飘着玫瑰园的馨香，坐在那里惬意无比，但同时，这间屋也最符合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特拉普派修道士式的清苦生活。用生石灰抹的墙壁光秃而粗糙，家具不过是一张苦役犯式的床，一个床头柜，上面放了支插在瓶口的蜡烛，还有一个陈旧的衣柜和一个放着水舀和脸盆的盆架。

房屋修缮持续了将近三年，恰与本城的重建工作步调一致。城市迅速复兴，因为河运和贸易往来正处于鼎盛期，在殖民时期，正是这两个因素维持着这座城市的繁荣，让它在两个多世纪里成为美洲的门户。但也是在这段日子，特兰西多·阿里萨的不治之症表现出最初的征兆。老主顾们每到她的杂货铺来，一次比一次衰老，一次比一次干瘪，也越来越令人难以捉摸。她跟她们打了半辈子交道，竟然认不出她们来，或者常常把一个人的事和另一个人的搞混了。这种问题对于做她这类生意的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为了维护双方的名誉，她们从不签字据，一句口头承诺即是保证。起先，她以为是自己的耳朵

聋了，但很快便证实是记忆从她年久失修的身体中溜走了。于是，她清算了她的典当生意，罐子里的财富足够完成房屋修缮并添置家具，此外还能剩下很多件全城最贵重的古老首饰，它们的主人根本无力赎回。

那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要同时兼顾许多事务，但这并没有减弱他越来越频繁地窃玉偷香的热情。和拿撒勒寡妇那段飘忽不定的经历为他打开了街头爱情之门。此后的很多年，他都一直在猎捕夜间的孤鸟，幻想能减轻费尔明娜·达萨之痛。但到后来，他已说不清这绝望的通奸习惯到底是出于内心需要，还是单纯的身体恶习。他去小旅馆的次数越来越少，不只因为他的兴趣改变了方向，而且他不愿让熟人看到，他已远不是当初那个温顺而纯真的少年了。然而，有三次在情急之下，他借助了一种古远年代惯用的简单手法：把害怕被人认出的女友化装成男人，然后装作打算整晚狂欢的人傲慢地走进小旅馆。但至少有两次都被不少人发现，他和那位所谓的男同伴没有去酒吧间，而是进了一个房间。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本来已经相当糟糕的名声经历了致命一击。最后他干脆就不再去了。只有极少的几次，他又重游故地，并不是为了及时行乐，而是恰恰相反：为了寻找一个避难所，从荒淫无度中恢复过来。

他这么做绝对是有道理的。下午五点左右，刚一离开办公室，他便像鹰捉小鸡一样展开猎捕行动。起初，无论夜晚带给他什么，他都满足。公园中的女仆，市场上的黑女人，海滩上风情万种的淑女，新奥尔良船上的外国妞儿，他照单全收。他把她们带到防波堤上，从日落开始，半城人都在那里做着同样的事。他把她们带到所有能干那种事的地方，有时连没法干的地方也去：有不少次，他都不得不急匆匆地钻进某个漆黑的门洞，躲在门后尽力做着他所要做的事。

灯塔一直是个幸福的避风港。当他刚刚迈入暮年，生活中的一切都已安定时，他还时常怀念它，因为那里的确是个让人享受欢愉的好地方，尤其是在晚上。他总觉得，自己偷欢的情景会通过灯塔的每一次闪烁传到航海者那里去。所以，他继续到灯塔去，比去其他任何地方的次数都多。那位看灯塔的朋友总是很高兴地接待他，满脸的忠厚老实，这对那些惊慌的小鸟来说是最好的镇定剂。灯塔下面有一座房子，紧挨着在峭壁上撞得粉碎的咆哮的海浪，在那儿做爱，爱欲更加浓烈，因为仿佛遭遇了海难。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更喜欢待在灯塔，破晓时分，从那里可以隐约看见整座城市，海上渔船那一串串的灯火，甚至还有远处的沼泽。

在那段时期，他形成了关于女人的身体和她们爱的能力之间关系的相当粗浅的理论。他不相信外表性感的那类，看上去能生吞一只短吻鳄的女人，通常在床上是最被动的。恰恰相反，他喜欢瘦得皮包骨的小青蛙似的女人，走在街上甚至没有人愿意费力气回头看她们一眼，仿佛脱掉衣服后就什么也不剩了，一碰之下，那骨头还咯吱作响得让人可怜，然而，她们却能让最爱吹嘘床上功夫的男人自愧不如。他记下这些尚不成熟的观点，准备为《恋人指南》写一卷实用增订本，但奥森西娅·桑坦德尔的出现使这个计划遭受了和之前的出版打算同样的命运。这个女人用她那老狗一样的智慧，将他上下左右结结实实地调教了一番，让他彻头彻尾地重生了一次，同时，也击碎了他那些精妙绝伦的理论，给他上了一堂唯一该上的爱之课——谁也别妄图当生活的老师。

奥森西娅·桑坦德尔曾有一段长达二十年的普普通通的婚姻，育有三个子女，而后，子女又结婚生了子女，所以她自夸是全城最享清福的祖母。始终没人能弄清楚，究竟是她抛弃了丈夫，还是丈夫抛弃了

她，抑或是两人同时抛弃了对方。总之，他和一直以来的情人住在一起，而她也终于感到了自由，可以大白天从前门，而非以往那样晚上从后门接待内河船长罗森多·德拉罗萨了。正是这位船长，想都没想，就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带到了她家。

船长是带他去吃午饭的。此外，还带去了一瓶家酿的烧酒和各种质量上乘的配料，足以做一锅史诗般的炖杂烩——只有用家养的鸡、脆骨肉、垃圾堆里养的猪，以及河边村落里种的菜豆和蔬菜，才能做出这道大菜。然而一开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既没有对美味的菜肴动心，也没有对风韵犹存的女主人表现出多大热情，而是对她家漂亮的房子欣赏有加。他喜欢这幢房子，它明亮凉爽，有四扇大窗面朝大海，还能远眺古城的全貌。他也喜欢那些琳琅满目、光彩照人的陈设，全都是罗森多·德拉罗萨船长每次出海时带回来的各式精美的手工艺品，多得连再放一件的地方也没有了，让客厅看上去既神秘复杂又精致无比。朝海的露台上，一只马来西亚白鹦鹉站在只属于自己的铁环上，羽毛白得令人难以置信，它摆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带给人无限的思考——这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见过的最美的动物。

看见客人兴奋，罗森多·德拉罗萨船长也高兴不已，细细讲述了每件东西的来历。他一边讲，一边喝着烧酒，虽是小口小口地啜，却没有停过。他看上去仿佛钢筋水泥做成的：身形巨大，除了脑壳是光的，全身上下都是毛，髭须像把粗刷子，声音像绞盘一样，除了他不会再有第二个人有这样的嗓音，而他的待客礼节却又是极周到的。不过，没有任何人的身体能顶得住他那种喝酒方式。还没上餐桌，他就已经喝掉半瓶酒了。终于，他趴倒在放杯子和酒瓶的托盘上，发出一声长长的爆炸般的轰响。奥森西娅·桑坦德尔只好请求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帮忙把这头搁浅的鲸鱼毫无生气的身体拖到床上去，并给睡着了的

他脱去衣服。之后，两人感谢彼此星辰的交会所带来的灵感火花，在隔壁房间脱掉了衣服，没有商量，没有暗示，甚至也没有谁提议，并且在此后的七年里，每当船长出海，两人一有机会便继续如此脱衣服。没有丝毫被发现的危险，因为船长有一个优秀海员的习惯，即到港之时，哪怕是黎明，也要拉响船上的汽笛，先用三声长鸣通知妻子和九个孩子，再用两声短促而忧伤的笛声知会情人。

奥森西娅·桑坦德尔已年近五十，看起来也绝不会小于这个年纪，但她对爱有一种独特的本能，任何民间或科学的理论都不能干扰它。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通过轮船行程表就知道什么时候能去拜访她，他从不事先通知，想去的时候便去，不管白天黑夜，而没一次她不是在等他。每次她给他开门，都是像母亲把她一直养到七岁时的那个样子：全身赤裸，只在头上用薄纱系着一个蝴蝶结。在脱掉他的衣服之前，她不会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再往前踏一步，因为她一直认为家里有个穿着衣服的男人是不吉利的。这也是她和罗森多·德拉罗萨船长常常发生分歧的原因：船长迷信地认为光着身子抽烟会招致厄运，所以有时宁可推迟做爱，也不愿熄灭他那支不可或缺的古巴雪茄。相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十分迷恋裸体的魅力。刚一关上门，甚至都不给他问候的时间，也不等他摘掉帽子和眼镜，她便带着真诚的喜悦，为他脱去衣服，一边脱一边吻他，同时也让他一连串地亲吻她。她为他自下而上解开扣子，先是裤子的门襟，每解一颗扣便吻他一下，然后是腰带上的卡子，最后是背心和衬衫的扣子，直至他看上去就像一条被活生生开了膛的鱼。接着，她让他在客厅里坐下，为他脱掉靴子，从裤腿处将裤子和里面的衬裤一同拉到脚踝，最后，松开他腿肚子上的松紧袜带，为他褪下长袜。这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停止吻她，也不让她亲吻自己，而是着手进行这套精准仪式中他所唯一负责的部分：从背心的扣眼上取下怀表，再摘下眼镜，然后把两样东西一起放进靴

子，以确保不会落在这里。在别人家脱光衣服时，他总是这么谨慎行事，从不疏漏。

他刚一做完这些，她便从不给他留下一丁点儿多余的时间，立刻就在她为他脱去裤子的沙发上向他发起进攻，只有很少几次是在床上。她钻到他身子下面，将他完全地占为己有。她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闭着眼在身体内部的绝对黑暗中探寻，一会儿往这边进，一会儿往那边退，不断纠正那看不见的方向，尝试开辟一条更为强烈的途径，寻找另一种方式，以免迷失在腹内流出的黏稠泥沼之中。她用一种难懂的家乡话像牛虻一样发出嗡嗡的声响，自问自答着哪里才是黑暗中只有她自己知晓、也只被她自己所渴求的那个地方。最终，她独自一人先迫不及待地屈服了，坠入自己的深渊，伴随着一声大获全胜的喜悦的爆炸，震动了整个世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精疲力竭，兴犹未尽，漂浮在两人汗水形成的水洼之中，觉得自己不过是别人享乐的工具而已。他说："你对我不过就像在众多男人中又加上一个罢了。"她淫荡地放声大笑，说："恰恰相反：是众多男人中又少了一个。"他顿时觉得她怀着吝啬的贪婪，想把一切都据为已有，于是，一股傲气涌上心头，他从她家走了出来，决心不再回去。但很快，带着午夜孤独中可怕的清醒，他无缘无故地又醒悟过来，回想起奥森西娅·桑坦德尔那自我陶醉的爱欲，他豁然明白了事情的本来面目：这是一个幸福的陷阱，他既厌恶又渴望，但总之，他逃不掉。

相识两年后的某个星期日，他到她家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为他脱衣服，而是摘掉他的眼镜，以更好地亲吻他，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明白，她开始爱上他了。尽管从第一次到这所房子的那天起，他就觉得很自在，像喜欢自己家一样喜欢这里，但每次他待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两小时，也从没有在这里睡过觉，饭只吃过一次，那是

她向他发出了正式的邀请。事实上，他每次来，都只是为了那一个目的，带一枝孤零零的玫瑰作为唯一的礼物，完事之后便消失，直至下一次不可预见的机会到来。但就在她为了吻他而摘下他眼镜的那个星期日，一方面因为这个，另一方面也因为两人平静地做完爱后睡着了，他们竟赤身裸体地在船长那张巨大的床上度过了整个下午。从午觉中醒来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记得那只白鹦鹉的尖叫声，它铜管乐器般凄厉的声音与它美丽的外表背道而驰。但在下午四点的炎热中，一切都静得仿佛透明一般，从卧室的窗子可以望见老城的轮廓——下午的阳光照在它的脊背上——一个个金色的屋顶，还有仿佛在燃烧的通往牙买加的大海。奥森西娅·桑坦德尔伸出一只探险的手，摸索着那只躺卧的猛兽，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她的手移开了。他说："现在不行，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人在看着我们。"她又一次用欢快的笑声惊扰了白鹦鹉。她说："这个借口就连约纳的老婆都不会信。[3]"她当然也不会信，但她承认这是个不坏的说法。于是，两人又静静地温存了许久，没有再做爱。五点钟时，太阳还高高挂着，她跳下床，一如既往地赤裸着身体，头上系着薄纱蝴蝶结，想去厨房找点儿喝的东西。但她还没有迈出卧室门一步，便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

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家中唯独剩下的就只有几盏吊灯了。其余的，诸如带签名的家具、印度地毯、雕塑、戈博兰挂毯，以及无数件珍贵的石头和金属小摆设，所有那些曾让她的家成为全城最赏心悦目、装饰最精美的家之一的东西，所有的一切，甚至连那只神圣的白鹦鹉在内，全都不翼而飞了。东西是从观海露台搬走的，丝毫没有惊扰他们的恩爱。现在，只剩下空空如也的客厅、四扇敞开的窗子，以及靠里的墙上用粗刷子写下的一行字：*这就是淫乱之人的下场*。罗森多·德拉罗萨船长永远也无法理解奥森西娅·桑坦德尔为什么不去报案，

不试图跟那些销赃的商人们联系一下，甚至连提也不让别人再提她这件倒霉事。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继续到被洗劫一空的家里去看她，如今这里的家具只剩下窃贼忘在厨房的三只皮凳子，以及他们当时所在的卧室里的东西。不过，他去看她的次数不像以往那么多了，倒不是因为家当失窃——她曾这样猜想并当面质问过他——而是因为新世纪之初出现了骡子拉的轨道车这种新鲜事物。这种车被他视作盛产零散小鸟的原始巢穴，他每天乘坐四次，两次去办公室，两次回家。有时，倒也当真在车上读点什么，但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假装阅读，伺机为日后的幽会建立起最初的联系。后来，莱昂十二叔叔给了他一辆由两头棕色骡子拉的车，骡子身披金色披挂，就跟为拉法埃尔·努涅斯总统拉车的骡子一样，但他仍旧怀念以前乘坐轨道车的日子，认为那是自己猎艳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他是对的：对于秘密的爱情而言，没有什么比等在门口的车子更危险的敌人了。既如此，他便几乎总是把车藏在家里，走着去展开他的新一轮猎捕行动，以免车轮在尘土上留下痕迹。所以，每当他想起那些由毛皮斑驳的瘦骡拉着的老式轨道车时，都无比怀念，在那样的车上，他只需瞟上一眼，就能看出哪儿蕴含着爱情。在无数动人的回忆之中，他最无法忘怀的是与某只无依无靠的小鸟间的一段故事。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因为他们只在一起度过了半个疯狂的夜晚，但仅仅这半个夜晚就足以让他余生都对狂欢节上无知的混乱心有余悸了。

在轨道车上，她面对游行人群的喧闹所表现出的无动于衷吸引了他。她应该还不到二十岁，若不是装扮成了一个残疾人，真看不出她对狂欢节有丝毫热情。她的长发又亮又滑，自然地披在肩上，身上是一件没有装饰的普通麻布长袍。街上音乐嘈杂，人们互相撒着一把把

大米粉，每当轨道车经过时，人们都往乘客身上泼洒颜料，在那疯狂的三天，轨道车的骡子也用淀粉涂成了白色，还戴上了花环。然而对这一切，她仿佛全然无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趁着混乱，邀请她去吃冰激凌，因为怕她不会接受更多的要求。她看了看他，没有表现出丝毫惊讶，说："我很乐意接受，但我要先提醒您，我是个疯子。"对这个出其不意的回答，他笑了，接着便把她带到冰激凌店的阳台去看彩车游行。之后，他穿上租来的斗篷，两人钻进海关广场跳舞的人群。他们在一起陶醉的样子就像一对新结合的恋人，因为她的冷漠在夜晚的喧闹中一扫而光，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她跳得像专业舞者一样，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大胆且富有想象力，具有一种令人倾倒的魅力。

"你不知道和我搅在一起的麻烦。"在狂欢节的狂热中，她一边笑得要死，一边喊道，"我是疯人院里的疯子。"

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来说，那晚仿佛回到了年轻时还未遭遇爱情不幸的纯真胡闹之中。然而他知道，易得的幸福无法持久，这点体会更多地是源自教训而非经验。夜晚的狂欢将在颁出最佳化装奖后开始消退，在那之前，他向姑娘提议到灯塔去看黎明。她高兴地答应了，但说要等到颁奖之后。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很肯定，正是她的拖延救了自己一命。当姑娘最终向他示意一起去灯塔的时候，圣牧羊女疯人院的两名看守和一名女护士一下子扑到了她的身上。自从她下午三点逃跑后，他们就一直在找她，不只是他们，城里所有的警察也都在找。她用一把从园丁那里抢来的砍刀，砍掉了一名守卫的脑袋，又重伤了另外两名，只因为她想出来到狂欢节上跳舞。但谁也没想到她就在大街上，还都以为她会藏在某幢房子里，他们地毯式地搜查了无数幢房子，甚至连地下雨水池都没放过。

带走她可真不容易。她用一把藏在贴身背心里的修枝剪自卫，六个男人一起才给她穿上了紧身衣，拥挤在海关广场的人群开心地鼓掌哄笑，以为这血腥逮捕的场面是狂欢节刻意上演的无数闹剧之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心痛如绞，从圣灰星期三开始就一直徘徊在圣牧羊女大街，手里拿着一盒要送给她的英国巧克力。他看着那些被囚禁的疯女人从窗口向他嚷出各种辱骂或哀求的话，而他向她们晃着手中的巧克力，希望能恰巧碰上她也出现在铁窗前。但他始终没有再见过她。几个月后，他走下骡子轨道车时，一个由父亲领着的小女孩向他索要盒中的一块巧克力。父亲责备了她，并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道歉。可他却把整盒巧克力都给了小女孩，期望这个举动能帮他从所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他拍了拍那位父亲的肩膀，让他放心。

“它原本是为一份已经见了鬼的爱情准备的。”他说。

仿佛命运要给他以补偿，同样是在骡子轨道车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认识了莱昂娜·卡西亚尼。她是他生命中真正的女人，尽管两人始终都不知道这一点，也从未做过爱。他乘五点钟的轨道车回家，在看见她之前便感觉到了她的存在：那是一道结结实实的目光，仿佛一根手指似的触动了他。他抬起眼，看见她坐在车子的另一端，在乘客中显得十分出众。她并没有把目光移开，而是恰恰相反，继续无所避忌地盯着他。毫无疑问，他不能不这样想，这个年轻漂亮的黑女人是个妓女。他决意不去理会她，因为他想象不出有什么比花钱买爱情更可耻：他从没有这样做过。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轨道车的终点站车站广场下了车，然后飞快地消失在商业区的迷宫之中，因为母亲在等他六点钟回去。而当他从人群的另一头穿出来时，身后传来了女人的高跟鞋踩在石砖上的欢快声响，他回过头去，证实了自己早已猜到的事：是她。她装扮得和版

画上的女奴一样，穿一条荷叶长裙，走过街上的水坑时要用跳舞般的姿势提起裙角，领口开得很大，露出了双肩，脖子上戴着一大串五颜六色的项链，头上包着白色头巾。这样的女人他在小旅馆见过。她们常常在下午六点才只吃过早餐，于是别无他法，只能拿色相来充当拦路劫匪的尖刀，把它架在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男人脖上：要么一夜良宵，要么性命不保。为了做最后的验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掉转方向，钻进了空无一人的麦仙翁巷，而她仍旧跟着他，且越跟越近。于是，他停下脚，转过身，双手拄着雨伞，在人行道上挡住了她的去路。她在他面前站住了。

“美人儿，你弄错了，”他说，“我是不会就范的。”

“您一定会，”她说，“从您脸上就看得出来。”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想起了从小听家庭医生，也就是他的教父，就他的长期便秘发表的一句言论：“世上的人分两种，大便通畅的和大便不通畅的。”在这一信条的基础上，医生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性格的理论，自认为比星象学还要准确。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随着阅历的丰富，从另一角度改写了这个理论：“世上的人分两种，会勾搭的和不会勾搭的。”他不信任后面这种人：他们一旦越轨，便觉得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于是四处炫耀爱情，就好像那是他们刚刚发明出来的似的。而经常做这种事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他们感觉良好，也守口如瓶，因为知道谨言慎行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他们从不谈论自己的丰功伟绩，也不向任何人吐露秘密，反而装出一副对这种事漠不关心的样子，以致常常招来性无能、性冷淡，甚至不男不女的名声，就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这样。但他们乐意将错就错，因为这种误解同样也能保护他们。他们是秘而不宣的共济会组织，全世界的成员都能认出彼此，根本不需要讲同一种语言。因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

对姑娘的回答并不惊讶：她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她也很清楚，他知道她知道。

这是他一生的错误：他的良心在此后每天的每时每刻都这么提醒他，直到他生命的末日。她想向他恳求的不是爱情，更加不是用金钱来交换的爱情，而是加勒比河运公司里的一份工作，不管做什么，也不管工资如何，随便什么样的工作都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自己的行为万分羞愧，于是把她带到了人事部门的头儿那里。头儿在总务处给她安排了一个最低等的职位，而她却抱着严肃认真、谦卑奉献的态度，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年。

从创建之日起，CFC的办公室就位于内河码头的对面，那里与海湾另一侧的远洋轮船港口截然不同，也不同于灵魂湾的市场泊船处。那是一座木制楼房，双坡锌顶，只在正面有一个用石柱支撑的长长的阳台。房子四面都有装着铁丝网的窗子，从屋里就能看到码头上停着的所有船只，与看挂在墙上的图表无异。当初建造房子时，德国先驱们把锌顶漆成了红色，四周的木墙则涂了耀眼的白，为的是让整座楼看上去就像一条内河船。后来，人们又把它整个儿漆成了蓝色，而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进公司时，这座楼已变成了一个落满灰尘、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棚屋，生锈的屋顶上，补丁摞补丁。楼后是一个砂土院子，围着鸡笼用的那种六角网眼铁丝网，里面有两个较新的大仓库，仓库后面则是一条堵死了的下水道，又脏又臭，半个世纪的河运垃圾都在那里腐烂：各种古旧船只的残骸，从西蒙·玻利瓦尔剪彩下水的原始单烟囱船，到舱室装有电风扇的较新的船。其中大部分已被拆散，零部件用到了其他船上，但也有不少还相当完好，似乎只要动手刷刷漆，便可以下海航行，都用不着吓跑船上的鬣蜥，或除去那些让这一条条旧船看上去更加伤怀的茂盛的大黄花。

楼顶层是管理处，一间间的办公室都很小，但很舒服，设备齐全，就像轮船上的舱室，因为它们并非由城市建筑师而是由造船工程师设计的。走廊的尽头，莱昂十二叔叔就像一名普通员工，在一间和所有人的办公室相同的屋里办公，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每天清早都能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一束插在玻璃瓶里的随便什么种类的芳香四溢的鲜花。底层是旅客接待处，先是一间摆放着粗糙板凳的候船室，以及一个售票和行李托运的柜台。再往里才是混乱的总务处，单是这名字就给人一种职能模糊的感觉，那些其余部门无法解决的问题最终就送到这里来不了了之。那天，莱昂十二叔叔亲自来此，想看看到底能不能想出什么见鬼的办法，好让总务处起点作用，而当时，莱昂娜·卡西亚尼就默默地坐在一张堆满了玉米袋和无法处理的文件的小桌后面。在对满屋子全体职员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询问、理论假设和具体调查后，莱昂十二叔叔懊恼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因为这一趟不仅确定了那种种问题根本找不到解决方案，而且雪上加霜，又发现了各种无法解决的新问题。

第二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走进办公室，看见了莱昂娜·卡西亚尼提交的一份备忘录，请求他研究一下，如果觉得合适就转呈他的叔叔。在前一天下午的视察中，她是唯一一个一言未发的人。她心里始终清楚自己是因他人的施舍而受雇，在备忘录中，她表明自己没有发言并非因为漠不关心，而是出于对本部门领导的尊重。她的建议之坦率令人惊讶。莱昂十二叔叔本是想将总务处彻底改组，但莱昂娜·卡西亚尼的想法恰恰相反，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事实上总务处根本不存在：它不过是个垃圾站，收容了其他部门推卸掉的各种麻烦而又无关紧要的问题。因此，解决办法就是撤销总务处，将问题返回原部门解决。

莱昂十二叔叔完全不知道莱昂娜·卡西亚尼是谁，也记不起前一天下午的会议中见过的哪个人可能是她。但看完备忘录后，他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和她闭门交谈了两小时。他们天南地北地什么都聊，这是他了解人的一贯做法。那份备忘录显露了质朴的常识，解决方案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这些对莱昂十二叔叔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本人。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她小学毕业以后，就只在制帽学校学习过。但在此之外，她正用一种速成法在家自学英语，三个月前还开始上夜校学习打字，这可是一门大有前途的全新职业，就像从前的电报业和更早时期的蒸汽机行当一样。

等她谈完话走出去时，莱昂十二叔叔已经开始叫她“同名人[4]莱昂娜”了，后来就一直这样称呼她。根据莱昂娜·卡西亚尼的建议，他决定当机立断撤销使人头疼的总务处，把问题交回那些制造问题的人去解决。他为她专门设立了一个既无名称也无具体职能的岗位，实际上就是当他的私人助理。那天下午，总务处被无声无息地埋葬后，莱昂十二叔叔问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从什么地方把莱昂娜·卡西亚尼找来的，他据实做了回答。

“那么你就再到轨道车上去，把所有像她一样的姑娘通通给我带回来。”叔叔对他说，“再有两三个这样的，我们就能把你那艘大帆船捞上来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为这只是莱昂十二叔叔的一句典型的玩笑话，但第二天他便发现六个月前指派给自己的那辆车不见了，就为了让他继续在轨道车上寻找隐藏的人才。至于莱昂娜·卡西亚尼，则很快放下最初的顾忌，把前三年深藏不露的所有本领都拿了出来。又一个三年过后，她已掌控了一切，再过四年，她与总秘书的位置就只一步

之遥了，但她拒绝接受这个职位，因为那只比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低一级。到那时为止，她一直都听命于他，她愿意继续这样下去，尽管真相并非如此：就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己也没有注意到，其实是他在听命于她。事实上，他在董事会中不过是依照她的建议行事，完全是她帮他战胜了隐藏的敌人设下的种种圈套，节节高升。

莱昂娜·卡西亚尼具有一种魔鬼般的才能，能够操控秘密，总是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在合适的地方。她精力充沛，沉默寡言，温柔聪慧。但在必要的时候，尽管要忍受灵魂的痛苦，她也会放任自己施展铁腕。然而，她从不会为了自己这样做。她唯一的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扫清障碍，别无他法时甚至不惜流血，好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扶摇直上，坐到他自不量力想要坐到的位置上去。当然，出于一种无法控制的权力欲，她无论如何也会这么干，但事实是，她有意识地做这一切，纯粹是为了报恩。她的决心之坚定，就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一度认不清她的意图。曾有那么一个不幸的时刻，他试图挡她的路，因为他认为是她在挡自己的路。莱昂娜·卡西亚尼让他重新清醒过来。

“您别弄错了，”她对他说，“只要您愿意，我随时可以退出，但您可要想清楚。”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确从未想过，这个时候他尽可能清醒地想了一想，于是向她缴械投降。事实上，在一直危机四伏的公司里那场肮脏残忍的内斗中，在他战战兢兢却又一发不可收拾的猎捕行动中，在对费尔明娜·达萨越来越渺茫的幻想中，面对这个勇敢的黑女人所做的壮举，面对她在那白热化的斗争中惹上的一身污秽又一身情爱，表面上无动于衷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内心不曾有过一刻平静。很多时候他都暗自伤心，只为她当真不是他认识她的那天下午所想象的那种女人，不然他早就把自己的原则抛到脑后，哪怕要付出实打实的金疙

瘩，也要去和她做爱。莱昂娜·卡西亚尼依旧和那天下午在轨道车上时一模一样，穿着那身叛逃奴隶似的俗丽衣服，裹着疯狂的头巾，戴着骨头耳环和手镯，还有那一大串项链和满手的假宝石戒指：完全是个街头荡妇。岁月在她的外表没有刻下多少痕迹，反而适当地增添了她的姿色。她正值成熟丰润的年龄，散发出的女性魅力比以往更令人躁动，那热情似火的非洲女人的身体也更显丰满结实。十年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再向她示过好，以此为他最初犯下的过错赎罪，而她帮他做了一切，却唯独没在这件事上帮他。

一天晚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工作到很晚——母亲去世后，他常常如此——正要回家时，他看见莱昂娜·卡西亚尼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他没有敲便推开了门。她果然在那里：独自一人坐在办公桌前，神情严肃，陷入沉思，新配的眼镜让她看上去像个学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惊又喜地发现这座房子里只有他们两人，码头上也空无一人，城市在沉睡，无尽的黑夜笼罩着阴郁的大海，一艘一小时后才能到达的轮船发出悲凄的哀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双手拄着雨伞，就像当年在麦仙翁巷挡住她的去路时一样，只不过现在他这样做是为了掩盖自己膝盖的颤抖。

“请告诉我，我亲爱的母狮，”他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种困境？”

她没有惊讶，神情自若地摘下眼镜，阳光般的笑声使他头晕目眩。她还从未用“你”称呼过他。

“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她对他说，“十年来，我一直坐在这里等你问我这句话。”

已经太迟了：机会曾经就在那辆骡子轨道车上，后来也一直在她所坐的这把椅子上，而现在却已一去不复返了。事实上，在为他干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卑鄙事，为他忍受了那么多肮脏的勾当之后，她的生命已经走到了他的前面，尽管他原本比她年长二十岁：她为他衰老了。她是那么地爱他，她愿意继续爱他而非欺骗他，但她不得不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点醒他。

“不，”她对他说，“那样我会觉得我是在和自己的儿子睡觉，虽然这个儿子并不是我生的。”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如鲠在喉，因为最终的拒绝竟不是出自自己之口。他一贯以为，当一个女人说“不”的时候，是在等待对方的坚持，然后再做出最后的决定，但事情到她这里就完全不同了：他不能冒险再犯第二次错误。他很有风度地退了出去，甚至还带着一点儿实属难得的优雅。从那晚起，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一点阴影都不费吹灰之力地消散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终于明白，不跟女人睡觉，也能成为她的朋友。

莱昂娜·卡西亚尼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试图向其透露费尔明娜·达萨秘密的唯一一人。由于不可抗力，为数不多的几个知情人都已经开始淡忘这件事了。毫无疑问，他们中的三个已把它带进了坟墓：一是他的母亲，她在去世前很久就把这件事从记忆中抹掉了；二是加拉·普拉西迪娅，她服侍着像自己孩子一样的女主人，直至善终；三是令人难忘的埃斯科拉斯蒂卡·达萨，是她把他人生中收到的第一封情书夹在一本弥撒经书中带给他，而如今过去了那么多年，她不可能还活在世上。此外还有洛伦索·达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当年为了避免女儿被开除，或许曾将此事透露给弗兰卡·德拉路斯修女，但由此再往外传的可能性不大。再者就是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所

在的遥远省份的十一位电报员，他们发报时是知道他们俩的全名和准确地址的。最后，就是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和她那帮桀骜不驯的表姐妹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知道，其实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也应该算在其中。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在最初几年对本城的频繁拜访中，曾有一次向他透露了这个秘密。但她是偶然且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说起的，乌尔比诺医生甚至不是如她所想象的那样左耳进右耳出，而是压根儿就没从任何一个耳朵听进去。原来，伊尔德布兰达是在讲到可能在花会上夺魁的诗人时提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她认为他是被埋没了的诗人之一。乌尔比诺医生怎么也想不起这人是谁，而她则毫无必要却也没有半点恶意地告诉他，那是费尔明娜·达萨婚前的唯一一位恋人。她告诉他，是因为她相信这件事是那么的纯真而且短暂，以至于它所激发的情绪不过是令人感动罢了。乌尔比诺医生看都没看她就答道："我倒不知道那家伙还是个诗人。"随即，他便从记忆中将他同其他事情一起抹掉了，因为他的职业早已让他形成了某种道德准则，那就是适时地选择忘记。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现，这些秘密的保管人中，除了自己的母亲，其余都属于费尔明娜·达萨的世界。他这方只有他一人，孤独地背负着这个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包袱，多少次都想与人分担，但至今还没有人值得他如此信任。莱昂娜·卡西亚尼是唯一可能的人选，只不过他需要找到合适的方式和机会。那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他正想着这事，可巧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竟爬上了CFC陡峭的楼梯。为了克服三点钟的炎热，他每爬一级便停下来歇一会儿，最终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办公室时，裤子都被汗水浸湿了。他用尽最后一口气说道："我相信一场飓风就要刮过来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

在这里接待过他好几次，都是来找莱昂十二叔叔的，但从没有像此时这样清晰地感觉到这位不速之客与自己的生活有着某种联系。

那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已经度过了自己的职业难关，正像个乞丐一样，手里拿着帽子，挨家挨户地为他的艺术事业寻求资助。一直以来，他最长久也最慷慨的资助人之一便是莱昂十二叔叔。而此刻，莱昂十二叔叔正坐在书桌前的弹簧靠背椅上，刚开始睡他那每日十分钟的午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稍等片刻，这里与莱昂十二叔叔的办公室相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叔叔接待访客的前厅。

他们两人在很多不同的场合见过，但从未像这样面对面坐在一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一次感到自卑得恶心。在这仿佛无穷无尽的十分钟里，他三次起身，盼望叔叔提前醒来，还喝了整整一保温瓶的苦咖啡。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连一杯也没接受。他说："咖啡是毒药。"接着便聊起一个又一个的话题来，根本也不管对方是否在听。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无法忍受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出众。他用词精准流畅，身上散发出隐隐的樟脑味，魅力独特，风度翩翩，谈吐高雅，就连最为轻浮的言词，只因从他口中说出，也变得精妙无穷。突然，医生一下子转换了话题：

"您喜欢音乐吗？"

这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有些意外。事实上，城中举办的所有音乐会或歌剧演出他都会前往，但他自觉并没有能力进行一番批评式的或全面的讨论。他对流行音乐情有独钟，尤其是伤感的华尔兹，很显然，它们和他年轻时作的曲子以及他那些秘密诗句异曲同工。他只需随意地听上一遍，接下来的整整几夜，就连全能的上帝也无法将旋律

从他的脑海中抹掉。但这不是一个对专家提出的严肃问题的严肃回答。

“我喜欢加德尔。”他说。

乌尔比诺医生明白了。“嗯，”他说，“他现在正流行。”接着就巧妙地把话题转到自己那许多新计划上去了：像往常一样，这些计划将在没有官方资助的情况下实现。他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强调，现在能拉来的演出质量低劣，令人泄气，与上世纪能欣赏到的那些节目简直有云泥之别。的确如此：他花了一年的时间预售门票，就为了能把柯尔托、卡萨尔斯和蒂博的三重奏搬上喜剧剧院的舞台，可政府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三位是谁，而就在眼下这一个月中，拉蒙·卡拉尔特的侦探剧团，马诺罗·德拉普雷萨先生的小歌剧和说唱剧团，洛斯·圣塔内拉剧团（那些难以形容的、善于模仿和表演幻术的小丑们能借着磷火闪动的瞬间在舞台上换衣服），丹妮塞·达尔泰内（据广告称她是牧羊女游乐园的老牌舞蹈演员），甚至还有那个令人厌恶、敢跟斗牛近身搏斗的巴斯克疯子乌尔苏斯，所有这些人的演出票竟然都销售一空。不过，这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就连欧洲人自己也又一次做了坏榜样，正进行着野蛮的战争，而我们倒已经在连绵半世纪的九次内战后，开始过上太平日子了。仔细算算，其实那九次内战完全可以视作一次：自始至终不过是同一场战争。这场令人陶醉的演说中，最引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注意的一点就是花会有可能重开，这曾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发起的活动中最轰动、也最持久的一项。阿里萨不得不咬住舌头，以免说出自己曾经是它的执著参与者，那项一年一度的比赛吸引了很多大名鼎鼎的诗人，不仅有来自国内其他地方的，还有来自加勒比其他国家的。

谈话刚刚开始，热腾腾的空气就骤然凉了下来，一阵四处乱窜的狂风把门窗摇晃得噼啪作响。办公室连同房子的地基都咯吱咯吱地响起来，仿佛汪洋中的一叶孤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些。他随便提了几句六月肆虐的飓风后，出其不意地谈起了他的妻子。他不仅视她为最热情的合作者，还把她视作自己一切倡议的灵魂。他说："没有她，我会一事无成。"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无动于衷地听着他的话，微微点头表示赞同，他不敢开口说话，因为害怕声音会背叛自己。但再听了两三句话后，他便明白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那么多耗费精力的应酬之余，仍有富裕的时间去仰慕自己的妻子，而且程度几乎与他不相上下。这个事实令他茫然。但他没有做出自己本想做出的反应，因为此时，他的心对他要了一个只有心才能要出的婊子花招：他的心告诉他，他和这个他一直视作死敌的男人是同一命运的牺牲品，遭受着同一种激情带来的厄运——是两头套在同一架轭上的牲口。在二十七年无休止的等待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头一次无法承受这种内心的刺痛：眼前这个令人钦佩的男人必须死掉，只有这样他才能幸福。

飓风终于扬长而去，但这强劲的西北风在十五分钟内已席卷了沼泽附近的好几个街区，毁掉了几乎半座城市。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又一次对莱昂十二叔叔的慷慨表示满意，没等雨完全停就离开了，还无意中带走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借给他撑到车前的雨伞。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介意。甚至刚好相反：他很高兴地想着费尔明娜·达萨知道伞的主人是谁时会作何感想。当莱昂娜·卡西亚尼走过他的办公室，他还沉浸在这次激动人心的会面所带来的恍惚之中。他觉得这是唯一的机会，无需兜圈子便可以向她吐露自己的秘密，就仿佛挑破要命的腋下脓疖似的：要么现在，要么永远都不。他开始问她对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这个人怎么看。她几乎想都没想便回答说："他做了许多

事，或许做得太多了，但我相信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接着，她思索了片刻，一边想一边用她那只有高大的黑女人才有的又大又锋利的牙齿，把铅笔上的橡皮一块块咬下来，最后，她耸了耸肩，以此结束这个与自己毫不相关的话题。

“也许正因为此，他才做那么多事吧，”她说，“这样可以免得去想。”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试图留住她。

“让我难过的是，他不得不死。”他说。

“世上的人都是要死的。”她说。

“是的，”他说，“但他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死。”

她一点儿也没听懂，又耸了耸肩，没说话便走了。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在将来的某个晚上，同费尔明娜·达萨躺在一张幸福的床上时，他将会告诉她，他没有把他的爱情秘密透露给任何人，甚至对唯一一个赢得了知情权的人也没有说。不：他将永远不会向人吐露这个秘密，即便是对莱昂娜·卡西亚尼，这并非因为他不想向她打开这只他珍藏了半辈子的宝箱，而是因为直到开启的那一瞬间他才发现，他已把钥匙弄丢了。

然而，那天下午最震撼他的还不是这件事。他沉浸在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当中，一场场花会的情景历历在目。每年的四月十五，喧嚣声都会响彻整个安的列斯群岛，他始终是主角之一，但也和在几乎所有其他活动中一样，始终是秘密的主角。自首届诗赛以来，他参加过好几次，可就连末等奖中也从未出现他的名字。不过他不在乎，因为他

参赛并非出于获奖的野心，而是因为这项赛事对他来说别具吸引力：第一次比赛中，负责打开火漆封口的信封并宣布获奖名单的人是费尔明娜·达萨，从那时起，他就注定要在此后的每一年都参加比赛了。

那天夜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躲在前排靠背椅的阴影中，翻领的扣眼上别着一枝娇艳的山茶花，随着他强烈的渴望上下起伏。他看见费尔明娜·达萨站在古老的国家剧院的舞台上，打开三只用火漆封着的信封。他问自己，当她发现金兰花奖的得主是他时，心里会有怎样的波澜？他能肯定她认得出他的笔迹，在那一瞬间，她定会回想起小花园杏树下刺绣的那一个个下午，想起信中那些干枯的栀子花的芳香，想起清晨风中那曲只属于两人的花冠女神的华尔兹。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更糟糕的是：金兰花奖，这个万人渴望的国家诗歌大奖竟授给了一个中国移民。这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引起了公众的骚动，甚至令大赛的严肃性受到质疑。但评判是公正的，评委会一致认为那首十四行诗精妙绝伦。

没人相信获奖的中国人是那首诗的作者。上个世纪末，为了逃避修建两大洋铁路时席卷巴拿马的黄热病瘟疫，他和其他很多中国人一起来到这里，到死都没有再离开。他们用中文生活，用中文繁衍后代，彼此间长得十分相像，以至于没人能分得清他们谁是谁。起初，一共也没有十个人，有几个带着妻子儿女和用来食用的狗。但没过几年，他们和那些入境时未在海关留下丝毫记录的不期而至的中国人，已经从港口郊外的四条巷子中满溢出来。一些年轻人在匆忙间变成了令人敬仰的族长，谁都无法解释他们哪里来的时间衰老。人们普遍凭直觉把他们分为两类：坏中国人和好中国人。坏的那些都窝在港口阴郁的餐厅里，面对着一盘葵花子炒鼠肉，或者像国王一样大吃大喝，又或者随时准备在桌前暴毙，大家怀疑，那些餐厅不过是在掩人耳

目，里面进行的其实是贩娼之类的勾当。好中国人则是那些洗衣店里的人，他们继承了一门神圣的学问，能让交回的衬衫比新的还整洁，领口和袖口都熨烫得像刚出模子的圣体一样。那位在花会上击败了七十二名有备而来的对手的男人，就是这些好中国人之中的一个。

当费尔明娜·达萨头晕眼花地读出那个名字时，谁也没有听懂。不仅因为那名字本身就不同寻常，更因为无论如何没人说得准中国人的名字到底该怎么读。但也无需劳神，因为获奖的中国人已经从包厢的尽头走了出来，脸上带着中国人早早回家时的那种完美微笑。他显然早已胜券在握，所以还特意为领奖穿上了春节时穿的黄色丝绸衬衣。他接过18K的金兰花，在质疑者震耳欲聋的嘘声中，幸福地亲吻了奖杯。他面不改色，只是在舞台中央静静等着，沉着得就像一位全能上帝的使徒：很明显，他那位上帝的神意远不及我们这位如此富有戏剧性。台下刚一安静下来，他便朗读了获奖的诗作。谁也没有听懂。但新的一阵嘘声过后，费尔明娜·达萨冷静地用她那撩人的沙哑嗓音又读了一遍，从第一句起就震惊了全场。那是一首正宗的帕尔纳斯派十四行诗，完美无瑕，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缕灵感的清风，显露出一位高手的深厚功力。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某位大诗人想出了这个玩笑似的主意，以此捉弄花会，而这个中国人自告奋勇助他一臂之力，并且抱定了至死保守秘密的决心。我们的传统报纸《商业日报》试图挽回市民的荣誉，发表了一篇博学或者说是晦涩难懂的文章，讨论了中国人在加勒比地区的久远渊源和文化影响，以及他们参加花会的充分权利。撰写此文的人毫不怀疑十四行诗的作者就是那位自称是作者的人，并以文章的题目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理由：《中国人皆是诗人》。即使真有阴谋，阴谋的发起者也早已带着秘密烂在坟墓里了。获奖的中国诗人活到了东方人的高寿，死前并没有忏悔。下葬时，棺材里放着那枝金兰花。他多少有些饮恨而终，因为生前没有得到他唯

一渴望的东西，即人们对他诗人身份的认可。为纪念他的辞世，报界又回顾了那次已被淡忘的花会事件，再次刊登那首十四行诗，并配上盈润少女手捧丰饶之杯的现代主义插图。而诗歌的守护神也利用此次机会让一切归回原位：新一代觉得那首十四行诗糟糕透顶，于是谁也不再怀疑它的作者当真是那位已故的中国人了。

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记忆中，这场闹剧总是与当时坐在他身边的一位体态丰腴的陌生女人联系在一起。典礼一开始他便注意到了她，但之后，由于忐忑的等待，他又把她忘记了。她那珍珠母一样白皙的皮肤，她身上那种幸福丰盈的女人所特有的芳香，以及她那女高音般的宽大胸脯上别的一枝人造洋玉兰，这一切都引起他的注意。一袭黑色的天鹅绒长裙紧裹着她的身体，黑得就像她那双充满渴望和热情的眼睛。头发更是乌黑，用一把吉卜赛人的发梳别在后颈处。耳坠和项链是同一款式的，好几根手指上戴着一模一样的戒指，而所有的首饰都嵌着闪闪发亮的泡泡钉，右边的脸颊还用眉笔画了一颗痣。在最后那片混乱的掌声中，她怀着真诚的哀伤看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眼。

“请相信我，我真心为您感到遗憾。”她对他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很感动，倒并非因为这份他应得的同情，而是惊讶竟有人知晓他的秘密。她向他道明原委：“我是从开信封时您翻领上那枝山茶花的起伏中看出来的。”她把手中的长毛绒洋玉兰拿给他看，并向他敞开了心扉。

“所以我才老早就摘下了我这朵。”她说。

她因失败而马上就要落下泪来，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用他那夜间狩猎者的本能改变了她的情绪。

“咱们找个地方去一起哭一场。”他对她说。

他把她送回家。到了门口，几乎已是午夜时分，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他便说服她邀请自己进去喝一杯白兰地，边喝边看看她提到的这十多年来积攒的有关公众大事件的剪报和相册。这个花招即使在当时也已经很老套了，但这一次却不是他主动出击，而是她在从国家剧院回来的路上就说起她的剪报。他们进了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进客厅的第一眼便注意到，唯一一间卧室的门敞开着，床宽大而豪华，铺着锦缎床罩，床头饰有铜树枝。这让他有些慌乱。她想必注意到了这一点，上前一步穿过客厅，关上了卧室门。她请他坐在一张印花布的长沙发上，上面有一只猫在睡觉，然后她把收集的几个册子放到了中间桌子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紧不慢地翻着册子，想得更多的是接下来的行为，而非正在看的东西。忽然，他抬起眼，看见她双眼噙满泪花。他劝她想哭就哭，用不着难为情，因为没有什么比哭泣更能减轻痛苦了，但他建议她先松开紧身背心再哭。他上前去帮她，因为那件紧紧束在身上的背心后面有两根带子来回交叉地系着。他并不需要将带子完全解开，刚解到一半，紧身背心就因内部的压力自己松开了，那对硕大的乳房终于自由地呼吸起来。

即便是在最顺手的场合，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从未摆脱第一次的紧张。他鼓足勇气用指肚轻抚她的脖颈，而她蜷起身子，像个被娇宠的小姑娘似的呻吟着，但始终没有停止哭泣。于是他又轻吻了一下她的脖子。他没来得及吻第二下，她就将她那贪婪、火热的庞大身躯整个地掉转过来，两人抱滚到地上。沙发上的猫惊醒了，尖叫一声跳到他们身上。两人像窘迫的新手一样忙乱地摸索着对方，但不管怎样总

算找着了。他们在散了页的剪报册上翻滚着，身上还穿着衣服，大汗淋漓，比起自己闯下的爱的灾祸，他们更担心猫儿疯狂的抓挠。但从伤口还在流血的第二天晚上起，他们又继续这样做了好几年。

当他发现自己开始爱上她时，她已整整四十岁，而他即将年满三十。她叫萨拉·诺列加，年轻时以一本描写穷人爱情的诗集赢过一次比赛，曾有那么一刻钟出尽风头，但书从未出版过。她是公立学校修养与公民教育课的老师，靠工资生活，住在鱼龙混杂的赫塞玛尼老区恋人巷一幢租来的房子里。她曾有过几个短暂的情人，但没一个抱有跟她结婚的打算，因为想让那个时代和环境中的男人跟哪个女人睡过觉就娶哪个女人实在是太难了。自从她的第一个正式未婚夫逃婚以后，她自己也不再让这样的幻想滋生。她以十八岁所能付出的全部疯狂与热情爱着他，而他却在婚礼的前一星期逃避了自己的承诺，将她抛弃在绝境，成了被人耻笑的新娘。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成了被人用过的未婚姑娘。然而，那第一次的恋爱经历虽然残酷而短暂，却没有给她留下任何痛苦，而是让她有了一个模糊的信念，那就是不管有没有婚姻，有没有上帝，甚至有没有法律，如果床上没有个男人，那日子根本就不值得过。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最喜欢她的一点，就是她在做爱时必须吸吮一个婴儿用的奶嘴才能达到幸福的顶峰。他们把市场上能找到的各种大小、形状和颜色的奶嘴买来了一大串，萨拉·诺列加把它们挂在床头，以便在紧要关头伸手就能够到。

虽然她和他一样都是自由身，或许也并不反对把他们的关系公开，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是一开始便把这种关系界定为秘密探险。他几乎总是在深夜才从后门溜进来，天亮前不久再踮着脚逃走。他和她都明白，在这样一所合租的人口众多的房子里，邻居们总是要比他们佯装的知道得多。虽然这只是走走形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非要

如此，在有生之年，他和女人交往时也一直如此，从未出过差错，无论是和她，还是和其他女人，都从未被抓住偷情的把柄。这么说一点儿也不夸张：只有一次，他留下了牵连的痕迹，或者说手写的证据，差点要了他的命。事实上，他一直都表现得就像是费尔明娜·达萨彻头彻尾的丈夫：肉体上不忠，心灵上却死心塌地；不停地努力摆脱自己所受的奴役，却又从不让自己的背叛给她带去痛苦。

但如果没有误解，这种秘密也不可能一直成功地深藏不露。就连特兰西多·阿里萨死前都坚信，她以爱抚养长大的儿子因为年轻时的首战失利，从此对一切形式的爱情都具备了免疫力。不过，他身边很多人的想法就没那么仁慈了，他们了解他诡秘的性格，知道他爱好各种秘教服饰和奇怪的沐浴露，于是都怀疑他并非对爱情，而是对女人具备了免疫力。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这些揣测，但从来置之不理，并不澄清。萨拉·诺列加也毫不在乎。和无数爱过他的女人一样，甚至也和那些并不爱他却在交往中让彼此都收获了满足的女人一样，她是按照他真实的样子来接受他的：一个过客似的男人。

到了最后，他随时都可能出现在她家里，尤其是在星期日的早晨，那一向是最平静的时间。她无论正在做什么，都会放下来，将整个身体奉献给他，在那张装饰繁复的大床上，尽全力让他幸福。床一直是准备好的，在那里，她从不允许仪式性的做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明白，一个没有什么阅历的独身女子怎么会如此精通男人之事，也不明白她怎么能如此轻盈、如此温柔地控制她那鼠海豚似的柔软身体，就仿佛在水底游动一般。她辩解说，爱情，首先是一种本能，“要么生下来就会，要么永远都不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浑身抽搐了一下，对她的过去重新萌生了忌妒。他想，或许她要比她装出来的样子饱经沧桑得多，但他只好咽下这些猜疑，因为就像对其他女人说的一

样，他也告诉她，她是他唯一的情人。很多事情他都不十分喜欢，比如不得不忍受那只暴怒的猫待在床上，萨拉·诺列加磨钝了猫的爪子，以防做爱时被它抓得稀烂。

然而，几乎就和喜欢在床上闹到筋疲力尽一样，她还喜欢将爱的疲惫献给对诗歌的崇拜。她不仅对她年轻时代的伤感诗有着惊人的记忆——当年，那些新创作的诗歌会装订成小册子在街上出售，两个生太伏一册——还会用大头针把自己最喜欢的诗钉在墙上，以便随时用生动的嗓音朗读。她还把修养与公民教育课的课文编成十一音节双行诗，就像正字法双行诗那样，但终究没能得到官方的赞同。她痴迷于朗诵，以至于做爱时还常常扯着嗓子背起诗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得不把奶嘴硬塞进她嘴里，就像制止孩子哭泣一样。

在两人感情最好的时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问自己，究竟哪一种状态是爱情，是床上的颠鸾倒凤，还是星期日下午的平静。萨拉·诺列加用一个简单的结论让他平静下来，那就是：凡赤身裸体干的事都是爱。她说："灵魂之爱在腰部以上，肉体之爱在腰部以下。"萨拉·诺列加觉得这个结论很好，可以用来写一首关于貌合神离的爱情的诗。两人联手把这首诗写了出来，她还拿它去参加了第五届花会，并坚信从未有人以如此具原创性的诗歌参加过比赛。但她又一次失败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送她回家时，她怒气冲天。她也说不清为什么，但就是认定费尔明娜·达萨针对她搞了鬼，为了不让她的诗获奖。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理睬她。从颁奖仪式开始，他便心情忧郁，他已许久没见到费尔明娜·达萨了，而那天晚上，他感到她发生了某种深刻的变化：他头一次一眼便能看出她已身为人母。这对他来说并不是新闻，因为他早知道她的儿子已经上小学了。然而，在那一晚之前，

她已到了当母亲的年龄这件事在他看来从未如此明显过，她的腰身粗了，走起路来有些气喘吁吁，宣读获奖名单时，声音也磕磕绊绊。

他试图理清自己的回忆，在萨拉·诺列加准备饭菜时，又翻起有关花会的剪报和相册。他看见杂志上的彩色画，门廊下作为纪念品出售的泛黄明信片，这一切就仿佛是对他荒谬一生幻影般的回顾。在此之前，一直支撑他的是一个假象，那就是世界在变，习惯在变，风尚在变：一切都在变，唯独她不会变。但那个晚上，他第一次头脑清醒地看见生活如何在费尔明娜·达萨身上留下痕迹，又如何在他自己身上留下痕迹，而他却除了等待之外什么都没有做。他从未和别人说起过她，因为他知道无法在说出她的名字时，不让别人看出他嘴唇的苍白。但那天晚上，正当他像之前无数个乏味的星期日晚上一样，翻看着那些剪报和相册时，萨拉·诺列加突然下了一句足以让他血液凝固的评断。

"真是个婊子。"她说。

她走过他身边，看到费尔明娜·达萨在一次化装舞会上扮成黑豹的图片时，说出这样一句。无需指名道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便知道她在说谁。他担心她将揭穿他的秘密，搅乱他的人生，连忙谨慎地展开自卫。他说，他只是认识费尔明娜·达萨而已，关系很浅，与她从来只是礼节性的问候，对她的私事也一无所知，但他十分肯定，她是一个令人景仰的女人，白手起家，凭自己的美德而备受赞扬。

"凭的是她为了钱而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萨拉·诺列加打断他说，"这是婊子的下下策。"

虽然不像她这样粗鲁，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母亲当初为了安慰他的遭遇，也说过同样的话，而且在道德上同样严厉。他惊慌失措得直入骨髓，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反驳她的尖刻，于是试图绕开话题。但萨拉·诺列加还没有发泄完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怒气，不允许他逃避。凭着某种说不清也道不明的直觉，她认定费尔明娜·达萨就是夺走她奖杯的幕后主使。没有任何理由能让她这样想：她们互不相识，甚至从未见过面，而就算费尔明娜·达萨了解比赛内情，比赛的结果也跟她没有分毫关系。但萨拉·诺列加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女人是有直觉的。"说完就结束了这场争论。

从那一刻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她。岁月也在她身上留下痕迹。她那天生的丰腴悄无声息地枯萎了，她的爱欲总是因抽泣迟迟不来，她的眼皮开始显露饱经风雨的阴影。她已成昨日之花。而且，在失败的愤怒中，她没有在意自己喝下了多少白兰地。那一晚的她变了性情：就在他们吃重新热过的椰子米饭时，她试图算清他们两人在那首落榜诗作中的贡献，好知道各自应当分得多少片金兰花的花瓣。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以这种锱铢必较的拜占庭式竞赛自娱自乐，但他却利用这个机会来抚平自己刚刚开绽的伤口。两人陷入斤斤计较的争执当中，将近五年来貌合神离的爱情所积累的怨忿浮出了水面。

差十分十二点时，萨拉·诺列加爬到一把椅子上去给挂钟上发条，凭记忆调准了时间，或许是想不说话就提醒他该走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迫切地感到要彻底斩断这种无爱的关系，于是开始寻找采取主动的机会。他恳求上帝让萨拉·诺列加允许他留下来过夜，好让他有机会说"不"，有机会告诉她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为此，她上完发条后，他让她坐到自己身边来。可她却宁愿和他保持距离，坐在客厅的

安乐椅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蘸了白兰地的食指伸过去让她吮吸，以往前戏时，她总喜欢这样。她却避开了。

“现在不，”她说，“我在等人。”

自从被费尔明娜·达萨拒绝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学会了始终把决定权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不是处于如此尴尬的局面，他一定会继续进攻萨拉·诺列加，当晚的结局定是和她滚在床上，因为他坚信，如果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睡过一觉，那么，只要他想，并且懂得如何打动她，她便会一直和他睡觉。基于这个信念，他什么都曾忍受过，哪怕在最为肮脏的爱情交易中，他也能看淡一切，只要不把最后的决定权让给女人就行，无论哪个女人。然而这一晚，他受到了如此的侮辱。他一口咽下白兰地，尽一切可能表达他的怒火，然后没有告别便扬长而去了。从此再没有见过面。

同萨拉·诺列加在一起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最为持久和稳定的一段关系，虽说并不是他那五年中唯一的关系。他发现自己虽然在她身边感觉也挺不错，尤其是在床上，但她始终无法取代费尔明娜·达萨，于是他夜晚孤独狩猎的毛病又犯了。他把自己的时间和体力分配得井井有条，以让它们物尽其用。但无论如何，萨拉·诺列加曾一度奇迹般地减轻了他的痛楚。至少现在，他见不到费尔明娜·达萨也能正常生活了，不像从前，常常要随时放下手中的事，凭着自己的猜想四处去寻找她的踪迹，漫无目的地徘徊在一些最不可能的街道，以及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的虚幻之地，只要一刻见不到她，他内心的渴望便一刻不能停歇。如今，与萨拉·诺列加的决裂，让他那沉睡的思念又苏醒了，他仿佛再一次回到了小花园的下午，回到了那永无止境的阅读中去，而且这一次，思念更加浓烈，他迫切地意识到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必须死掉。

很早以前他就知道，他生来就能让寡妇幸福，而寡妇也能让他幸福，对此他从不苦恼。恰恰相反，他时刻待命。在一次又一次孤独的狩猎行动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已对她们了如指掌，并最终明白了，这世界上到处都是幸福的寡妇。他曾看见她们在丈夫的尸体前痛苦得发疯，恳求别人把自己也放入同一口棺木，活活埋入地下，以免独自面对前路无法预知的苦难。可随着她们接受了现实，适应了新的境况，人们就会看到她们从尘土中站起来，获得新生。起初她们像阴影中的寄生虫一样生活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向女仆们倾诉着心声，整日赖在枕头上：当了那么多年无所事事的囚徒，她们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为了打发绰绰有余的时间，她们为死者的衣服钉上以前从来没有时间去钉的扣子，把他们的衬衫熨了又熨，还给袖口和领口上蜡，让它们时刻保持完美。她们继续为死去的丈夫在浴室放上香皂，在床上铺好带有他们名字首字母的床罩，在餐桌他们的位置上摆好餐具，以防死者说不定什么时候没有事先通知就回来了，就像他们生前常做的那样。但当她们独自去望弥撒时，才逐渐意识到，自己又一次成为自己意愿的主人，当初，为了换取一种安全感，她们不仅放弃了自己家庭的姓氏，甚至放弃了自我，可那种安全感不过是她们做姑娘时许多幻想中的一个罢了。只有她们自己知道，她们曾经疯狂爱着的那个男人——尽管他或许也爱着她们——给她们带来的负担有多么沉重，她们不得不照顾他们直到最后一口气，喂他们吃喝，给他们换下脏兮兮的尿布，用母亲式的巧妙花招哄他们开心，以减轻他们清晨走出家门去直面现实的恐惧。可当看到他们受自己的鼓动离开家门，准备一口去吞掉整个世界时，她们又开始害怕男人会一去不复返。这就是生活。而爱，如果真的存在，则是另一回事：另一种生活。

然而，在孤独中休养生息时，寡妇们发现，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的时候才吃饭，爱的时候不必撒谎，

睡觉的时候也不用为了逃避可耻的爱情程式而装睡，自己终于成了整张床的主人，它的全部都归自己独享，再没有人跟她们争一半的床单、一半的空气和一半的夜晚，甚至身体也终于能尽情做属于自己的梦，能自然而然地独自醒来了。在偷欢过后的清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见她们望完五点钟的弥撒出来，身上裹着黑纱，厄运的乌鸦从她们肩上飞过。一旦她们在晨曦中隐约看见他的身影，便会迈着小鸟般的碎步，穿到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去，因为单是从一个男人身边走过也会玷污她们的清誉。然而他坚信，一个忧伤的寡妇比其他任何女人心里都更可能藏着幸福的种子。

从拿撒勒的寡妇开始，他一生中结识了太多寡妇，这让他懂得在丈夫死后，一个女人会变得多么幸福。多亏了她们，之前对他来说不过是个单纯幻想的东西，变成了一种他可以触摸到的可能性。他想不出费尔明娜·达萨有什么理由不像其他寡妇一样，因生活的锤炼而变得可以欣然接受他，而不必为死去的丈夫感到虚妄的自责。她将毅然决然地和他一起，去发现另一种双重的幸福，怀着一份能将每时每刻都变成生命奇迹的寻常之爱，以及另一份只属于她一个人、因死神的豁免而出淤泥不染的爱。

但事实上，他哪怕只是去怀疑一下费尔明娜·达萨距离他这些如意算盘有多么遥远，或许就不会如此热情高涨了：结婚那时，她才刚刚隐约望见地平线上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切都在向她招手致意——除了挫折。在那个年代，富有有很多好处，当然，也有很多坏处，但半个世界的人都对它梦寐以求，认为它是获得永生的最可能的途径。费尔明娜·达萨当初在某种乍现的成熟之光中拒绝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而很快，她就因遗憾与负疚感到了痛苦，但她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那时，她也无法解释究竟是什么深藏不露的理智让她做出了

那样高瞻远瞩的决定，但多年以后，当她即将步入老年的时候，不知怎的，在一次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偶然谈话中，她突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所有参加那次聚会的人都知道他是正值鼎盛时期的加勒比河运公司的接班人，很多人都十分肯定曾见过他多次，甚至还和他打过交道，但没有一个人记得清他是什么模样。于是，费尔明娜·达萨发现了潜意识中阻碍她爱他的原因。她说："他就好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影子。"的确如此：他是一个谁都不认识的人的影子。然而，就在她抵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一个恰恰相反的男人的纠缠时，她却感到自己被负罪感的幽灵所折磨：这是她唯一无法承受的感觉。当它来袭时，她整个人都被惊恐笼罩着，只有找到某个能帮她减轻良心谴责的人，才能控制住这种情绪。从很小的时候起，每当她在厨房打破盘子，有人跌倒，或她的手指被门夹到时，她都会惊慌失措地跑到离她最近的大人跟前，赶忙指责他："都是你的错。"虽然事实上她并不在乎到底是谁的错，也不在乎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无辜——只要把这种无辜从言语上确定下来就足够了。

这个弱点是如此明显，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及时发现了它对自己家庭的和睦具有何等威胁，所以每当他隐约看见它时，就赶紧对妻子说："别担心，亲爱的，都是我的错。"没有什么比妻子突如其来的果敢决定更让他害怕了，而且他确信，这种决定的根源往往是某种负罪感。然而，拒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所带来的彷徨，绝非几句安慰就可以解决。有好几个月，费尔明娜·达萨总是在早晨打开阳台的窗子，思念着那个在空荡荡的小花园里窥视她的孤独幽灵。她望着那棵属于他的树，望着那条最不起眼的长凳，他曾坐在那里，一边想她一边读书，为她备受煎熬。接着，她又不得不关上窗，感叹道："可怜的人。"直到后来，想要弥补过去已为时过晚，她甚至还为他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坚韧而失望痛苦过，并且不时地感到某种迟来的渴望，盼能收

到一封永远不曾到达的来信。但当她不得不正视自己嫁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决定时，她在一场更大的危机中被击垮了，因为她发现自己在没有任何有力的理由就拒绝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后，也同样没有任何有力的理由更喜欢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事实上，她喜欢后者的程度不比喜欢前者多，而了解则更少，他的信不像前者那样炽热，也没有做出过那么多能证明其决心的感人举动。事实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追求从来不是用爱的语言表达的，而且奇怪的是——至少可以说是奇怪——像他那样一个天主教的卫士，向她提供的竟然仅限于世俗的好处：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但它们终究不是爱情。这些疑虑增加了她的彷徨，因为她也并不坚信爱情当真就是她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

不管怎样，她反感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和洛伦索·达萨一心想为女儿选择的理想男人太像了，都不仅仅是酷似——简直如出一辙。不可能不把他看作父亲密谋的同伙，即使事实上他并不是。自从看见他第二次不请自来为她看病，费尔明娜·达萨就认定了他与父亲相勾结。和表姐伊尔德布兰达谈过之后她更加迷茫了。表姐由于自己也是爱情的受害者，于是更倾向于认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甚至忘记了洛伦索·达萨让她来是为了给乌尔比诺医生说好话的。只有上帝知道费尔明娜·达萨做出了多大努力，才没有在表姐去电报室找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时陪她一起去。她的确想再见他一面，与他当面对质以消除疑问，和他单独聊一聊，深入地了解他，以确认她冲动的决定不会将自己推向另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即在和父亲单打独斗的战争中俯首投降。但她最终还是投降了，在她人生的千钧一发之际，丝毫没有考虑那位追求者的男性魅力、他传说中的财富、他的年轻有为，以及他那许多实实在在的美德中的任何一项，而只是因为害怕失去稍纵即逝的机会，在发现二十一岁已迫在眉睫时慌了手脚。二十一

岁在她心里是向命运屈服的秘密界限。这个关键时刻足以让她按照上帝和凡人的戒律做出并承担自己的决定：至死不渝。于是，一切的疑虑都烟消云散，她毫无内疚地做出了理智指示她做的最体面的事：用一块没有泪水的海绵将有关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记忆彻底抹掉，让他在她记忆中所占据的那块空间里长出一片罂粟花。她唯一允许自己做的是和往日一样的一声深深叹息，最后一声：“可怜的人！”

然而，最可怕的疑虑是从新婚旅行刚一回来开始的。他们才刚打开箱子，拆开家具包装，掏空她为胜任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女主人和夫人角色而带回来的那十一只盒子，她就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一个错误的人家，这让她险些晕死过去，而比这更糟的，是还和一个没法指望的男人关在一起。她用了六年才逃脱出来。那是她一生中最糟糕的六年，婆婆布兰卡夫人的刻薄和小姑子们的愚昧陈腐让她绝望，而如果说她的小姑子们竟没有活活腐烂在修道院的囚室里，那是因为她们已经把囚室带入自己的内心了。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甘愿屈从于家族礼教，对她的恳求置若罔闻，他相信上帝的智慧和妻子无限的适应能力定会将事情协调妥当。母亲的消沉让他痛心，曾几何时，她对生活的喜悦能给最缺乏信念的人注入希望。的确如此：这个美丽、智慧、敏锐得超凡脱俗的女人，在将近四十年中都是她那个社交天堂里的灵魂和主体，然而，守寡的痛苦让她自己都无法相信她还是原来的那个她，她变得懈怠，刻薄，与所有人为敌。对于这种蜕变，唯一可能的解释——就像她常说的那样——便是她怨恨丈夫明知故犯地为一群黑人牺牲了性命，而唯一正确的牺牲应该是为了她活下去。不管怎样，费尔明娜·达萨幸福的婚姻生活仅限于新婚旅行的那段日子，而那个唯一能帮她免于最终沉沦的人，却在母亲的淫威面前吓得浑身瘫软。是他，费尔明娜·达萨把这个

套住她的死亡圈套全部归咎于他，而非那几个愚蠢的小姑子和那位半疯的婆婆。但已经太晚了，她到此时才怀疑，在职业权威和世俗的迷人外表下，她嫁的这个男人其实是个无药可救的懦夫：一个靠姓氏带来的社会地位而耀武扬威的可怜虫。

她在新出世的儿子身上找到了寄托。当他从她的身体里滑出去时，她感到一种摆脱了某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轻松。而当接生婆把活生生、浑身沾满油脂和血污、脐带还缠在脖子上的婴儿抱给她看时，她发现自己对这个从她腹中出来的小牛犊竟然没有一丁点儿感情，这把她自己也吓了一跳。然而，在孤独的侯爵府邸，她学会了认识他，母子俩相互熟识了，她欣喜万分地发现人们爱孩子并非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孩子，而是因为养育中产生的情意。最终，在这个给她带来不幸的家里，除了儿子以外，她无法忍受任何事、任何人。内心的孤独，坟墓般的花园，以及整日在那一间间没有窗子的巨大房间里消磨时间，这一切都让她窒息。在没有尽头的夜晚，她觉得自己就要被隔壁疯人院里传来的疯女人的叫声击垮了。每天都要摆好宴会用的桌子，铺上绣花台布，摆上银制的餐具和仿佛在葬礼上用的那种大烛台，就为了让五个幽灵般的人用上一杯牛奶咖啡加奶酪饼当作晚餐，这种习惯让她感到羞耻。她诅咒每日下午的玫瑰经祷告，诅咒餐桌上的矫揉造作，诅咒众人对她无休止的批评：批评她拿刀叉的方式，批评她像街边女人一样卖弄风情地大步走路，批评她穿得像马戏团里的人，甚至还批评她像乡巴佬一样粗鲁地对待丈夫，以及给孩子喂奶时没有用披肩遮住胸口。当她第一次按照英国最新的时髦做法，邀人下午五点来家里喝茶，款以皇家饼干和花香蜜饯时，布兰卡夫人就出来反对在她的家里喝那些发汗时当药用的饮品，认为应该喝巧克力，配烤奶酪和木薯面包圈。甚至连她做的梦也逃不过她的指责。一天早

上，费尔明娜·达萨说自己梦见一个陌生男人赤身裸体地在侯爵府邸的大厅里走来走去，还一把一把地撒灰。

“正派女人不会做这种梦。”

除了寄人篱下的感觉，还有两件更不幸的事。一是每天的食谱里都有各式各样做法的茄子，布兰卡夫人为了尊重死去的丈夫不肯改变这一习惯，而费尔明娜·达萨则拒绝吃。从小时候起，在还没有尝过之前，她就讨厌茄子，因为她总觉得它的颜色像毒药。只不过这一次，不管怎样，她不得不承认生活中的某些东西已经向好的方向转变了，五岁时，她曾在餐桌上说过同样的话，而父亲则强迫她吃下了为六个人准备的整整一锅茄子。当时她相信自己就要死了，先是因为她把已经变成碎末的茄子稀里哗啦地吐了出来，接着又因为大家为了医治她而强迫她灌下一碗蓖麻油。这两样东西，不仅因其味道，更因她对毒药的恐惧，在她记忆中被混作同一种类似泻药的东西。在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邸令人作呕的午餐中，她不得不移开自己的视线，以免回想起蓖麻油造成的那种令人全身发凉的恶心。

另一件不幸的事是竖琴。一天，布兰卡夫人说：“我不相信一个不会弹钢琴的女人会是一个体面的女人。”这很显然是有的放矢。但这次连她的儿子都表示反对，因为他最好的那段童年岁月就是在苦役般的钢琴课上度过的，尽管成年后他对此心存感激，但他无法想象自己的妻子也遭受同样的刑罚，她才二十五岁，而且又个性十足。但他从母亲那里唯一争取到的，不过就是把钢琴换成了竖琴，并且用的是一个极为天真的理由，即竖琴是天使的乐器。于是，他们从维也纳弄来一把精美无比的竖琴，看上去就像金子做的，声音也像。它后来成为了城市博物馆中最珍贵的文物之一，直到这座博物馆连同里面的一切被一场大火吞没。费尔明娜·达萨屈从于这项奢侈的刑罚，尽力用最后的

牺牲避免与婆婆冲突。她先是师从一位特意从蒙波斯城请来的顶级大师，可十五天后他竟突然去世了。之后，她又跟着神学院最好的乐师学了好几年，这位老师掘墓人般的气质让她的和弦都走了音。

她对自己的顺从感到惊讶。虽然内心深处，以及在和丈夫以前用来相爱如今却用来无声地争吵的时间里，她始终都不曾承认这一点，即她已陷入这个新世界里常规与偏见的乱麻之中，比她自己想象的要快得多。起初，她常爱用一句话来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的自由：“让扇子见鬼去吧，现在已经是微风的季节了。”但后来，她开始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特权，开始惧怕丢脸和别人的嘲弄，于是表现出准备承受一切的样子，甚至包括屈辱。但她心中抱着一个希望，那就是上帝最终能怜悯布兰卡夫人，应答她在祈祷中孜孜不倦地恳求上帝赐她一死的要求。

乌尔比诺医生找了些宏大的理由来为自己的懦弱辩解，甚至都不自问一下它们是否有悖他的信仰。他不承认自己和妻子的矛盾源于家中压抑的气氛，而是认为那源于婚姻本身的性质：一项荒谬的、只能靠上帝的无限仁慈才得以存在的发明。两个几乎完全互不了解的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性格不同，文化不同，甚至性别都不相同，却突然间不得不承诺生活在一起，睡在同一张床上，分享彼此也许注定有所分歧的命运，这一切本身就是完全违背科学的。他说：“婚姻的问题在于，它终结于每晚做爱之后，却在第二天早餐之前又必须重新建立起来。”而他们之间的婚姻则更糟，他说，因为两人来自两个敌对的阶层，却又生活在这样一座依旧梦想着回到总督时代的城市。唯一像水泥一样把他们黏合在一起的，却是爱情这种既不可能、又反复无常的东西——如果它果真存在的话。但对他们来说，两人结婚时是没有爱

情的，而就在他们差一点要把它创造出来时，命运所做的却只是让他们面对现实。

这就是竖琴时期他们的生活状态。那些令人愉快的偶然片段已成了往事：曾经，虽然他们之间争吵不断，虽然她每天都要吃毒茄子，虽然他的妹妹们疯疯癫癫，虽然他的母亲依然如故，但如果她在他洗澡时走进浴室，他仍有足够的爱来邀请她为他擦香皂。而她会怀着欧洲之旅剩余的爱的碎屑顺从地为他效劳。接着，两人会忘掉种种不快，不由自主地心软，无声地渴求起对方来，最终在地上爱得死去活来，浑身沾满芳香的泡沫，耳朵里却听着女仆在洗衣房里议论："他们没有再生孩子，是因为他们不再做那事了。"有时，他们从疯狂的节日庆典回到家，在门后伺机而动的怀旧之情也会一下子将他们扑倒在地，于是就会有一次美妙的爆发，一切又回到往昔，五分钟后，他们就又像蜜月中连门襟都无暇扣上的恋人们一样了。

但除了这些极少数的情况，一般到了睡觉的时候，他们中总有一个比另一个更为疲倦。她在浴室里耗时间，用香纸卷起一支支烟，独自抽着，又像年轻时独自在家那样，重新陷入自我慰藉的爱中，又成了自己身体的唯一主人。她总是头痛，要么就抱怨天气太热；总是装睡，要么就是又来了月经，月经，永远是月经。以至于乌尔比诺医生为了发泄一下难言的苦衷，竟然在课堂上说，结婚十年后，女人一星期甚至能来三次月经。

祸不单行，费尔明娜·达萨不得不在她最糟糕的岁月里面对自己怎么也躲不掉、迟早都要来的事：她父亲那些无人知晓、神话般的生意背后的真相。省长在办公室召见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把他岳父无法无天的行径一股脑儿全告诉了他，最后一言以蔽之："凡天上人间的法律，没有什么是这个家伙不曾冒犯过的。"其中有几件最严重的纠

纷，是他依仗着女婿的权势做的，让人很难相信这位女婿和他的妻子能够独善其身。鉴于目标其实是保住自己的名誉，因为也就剩他的名声还站得住脚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动用了所有的权力，最终用他的担保掩盖了丑闻。就这样，洛伦索·达萨坐着最早的一班船离开了这个国家，并将永远不再回来。他回到他的故土去了，表现得就像以往为了慰藉思乡之情而不时地进行一次短期旅行一样，但这也不完全是自欺欺人：从很早以前开始，他便常常登上祖国的轮船，仅仅是为了喝一杯水箱里装着的来自故乡的泉水。他走了，没有俯首认错，而是坚称自己无辜，并试图让女婿相信自己是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他走了，为他的姑娘而痛哭流涕——自从费尔明娜·达萨嫁人后，他一直这么叫她——还为他的外孙而哭，为这片土地而哭，在这里，他变得富有、自由，并靠着不清不白的生意，成功地把他的姑娘变成了高雅的夫人。他走了，苍老且带着一身病痛，但他之后还活了很久，远比那些因他而遭殃的人希望的要长久得多。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费尔明娜·达萨不禁舒了一口气。为了避免他人问起，她没有为他戴孝，但接下来好几个月，每当她把自己关在浴室中抽烟时，便会带着一股无名火哭泣起来，她是在为父亲而哭。

这对夫妻最为荒谬的是，在那段不幸的岁月里，他们在公众面前却表现得无比幸福。实际上，那正是他们战胜周围隐藏的敌意，取得最大胜利的几年。人们不甘心接受他们的那副样子：与众不同，行事新派，从而与传统秩序格格不入。不过，这对于费尔明娜·达萨来说却是手到擒来的事。所谓的世俗生活，虽然在她了解之前曾让她有过许多疑虑，但其实那不过是一套沿自传统的规矩，庸俗的仪式，事先想好的言词，在此之下，人们彼此消遣，为的是不致互相杀戮。在这个轻浮的世俗天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她用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为它下了定义：“社交生活的关键在于学会控制恐惧，夫

妻生活的关键在于学会控制厌恶。”自从拖着没有尽头的新娘头纱，步入社交俱乐部宽阔的大厅时，她就突然清楚地发现了这一点。厅里弥漫着无数鲜花混在一起的香气，华尔兹乐曲绕梁飞旋，男人们汗水涔涔，女人们浑身颤抖，他们看着她，不知如何才能清除这个外部世界来的令人眩晕的眼中钉。所有这一切让空气变得稀薄。她刚刚年满二十一岁，除了去学校，几乎没有出过家门，但她仅仅环顾了一眼，便明白她的对手并非因仇恨而生出胆怯，而是因惧怕而茫然无措。她没有继续吓唬她们，而是大发慈悲，帮助她们了解她。没有一个人出乎她的意料，就像她对那些城市的看法一样，她没有觉得哪座更好或哪座更糟，它们只是和她心里想象的一模一样。比如巴黎，尽管那里阴雨连绵，尽管那里的店主个个贪吝，车夫个个粗鲁，她仍将永远在记忆中把那里当作人间最美的城市，这与它实际是否如此毫不相干，而只是因为它与她最幸福岁月的回忆紧密相连。至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他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且手段更为机敏也更加堂皇。没有什么事少得了他们的参与：市民郊游、花会、艺术活动、慈善抽奖、爱国演出，乃至第一次气球旅行。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也永远是活动的发起者，且永远身先士卒。在他们那些不幸的岁月里，任谁也无法想象有谁能比他们更幸福，有哪对夫妻比他们更般配。

父亲留下的房子成了费尔明娜·达萨逃避那座令人窒息的家庭宫殿的避难所。一离开公众视线，她便悄悄躲到福音花园。她在那里接待新朋友，会会学校和图画课的老朋友，以此作为不忠的某种纯洁的替代品。她会像独身母亲似的平静地度过几个小时，细细咀嚼儿时的回忆。她又买了香乌鸦，还从街上捡回了几只猫，把它们交给加拉·普拉西迪娅照料。此时的加拉·普拉西迪娅已经年迈，而且因为风湿行动有些不便，却满怀着重建这个家的热情。费尔明娜又重新启用了缝纫

室。在这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见到她，也是在这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让她伸出舌头，试图窥测她的内心。于是，她把缝纫室当成了回忆过去的圣地。一个冬季的下午，她赶在暴风雨呼啸而至之前去关阳台的窗子，竟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坐在小花园杏树下的那条长凳上，穿着那件改小了的父亲的礼服，膝头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但她看见的，并非之前好几次在不同场合偶遇他时的模样，而是他留在她记忆中的那个多年前的模样。她害怕那是死神送来的通知，伤心不已。她竟对自己说，也许和他在一起她会更加幸福，和他单独待在这所她以爱为他整修的房子里，就像他也以同样的爱为她整修了房子一样。单是这个假想就让她大惊失色，她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已到了何种程度。于是，她打点起最后一丝力气，逼迫丈夫不再闪烁其词，与她面对面地争吵，并和她一起为失去的天堂痛哭，直到听见最后一次鸡鸣，曙光照进绣花的窗帘，太阳灼烧起来。丈夫因说了太多话而脸庞肿胀，因没有睡觉而筋疲力尽，因哭得太多而心坚意决。他系紧靴带，又扎紧腰带，束紧一个男人所剩下的全部，对她说，行，亲爱的，咱们去寻找在欧洲丢失的爱情：明天就走，不再回来。他决心坚定，和他的资产总代理——财富银行达成了协议，立即清算丰厚的家产，它们从一开始就分散在各种生意、投资、神圣债券和长期债券中，只有他自己清楚它们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无穷无尽，只不过是够他们衣食无忧而已。所有的财产都会被变卖成刻有印记的黄金，一点一点地转到国外的银行去，直到他和妻子在这片无情的国土上连手掌大的葬身之地都不剩为止。

但与她猜想的不同，事实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活着。当她和丈夫、儿子乘着金色四轮马车到达法国远洋轮船的码头时，他就在那里看着他们从车上走下来，与他曾无数次在公共庆典上看见他们的样子分毫不差：依旧是那么完美无瑕。他们带着儿子同行，从那男孩现

在的教养便能看出，他成年后将会是什么模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高兴地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脱帽致意：“我们要去远征弗兰德。”费尔明娜·达萨向他点了点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脱下帽子，微微鞠躬。她看着他，对他那过早谢顶的惨状没有半点同情的表示。他就像她所看见的那样，是某个她从不认识的人的影子。

那段日子也不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最走运的时期。工作日益繁重，对偷欢之事也日益厌倦，岁月蹉跎。此外，特兰西多·阿里萨也已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光，她已丧失了记忆：几乎是一片空白。甚至有几次，她转向儿子，看着他坐在椅子上看书，吃惊地问道：“你是谁的孩子？”他总是如实回答，但她又会立刻打断他。

“告诉我一件事，孩子，”她问他说，“我是谁？”

她已经胖得不能动了，整日待在杂货铺里，虽然那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卖。她在第一遍鸡叫时便起床，然后一直到第二天黎明，她都在梳妆打扮，因为她只睡很少几个小时。她把花冠戴在头上，涂上口红，在脸上和胳膊上擦上粉，然后逢人就问自己打扮得怎么样。邻居们都知道她永远只期待一个回答：“你是小蟑螂马丁内斯。”这是从童话里偷借来的身份，却是唯一能让她满意的答复。她继续摇晃着身子，扇着一把粉红色大羽毛做的扇子，直到把一切再从头来过：戴上纸做的花冠，把麝香涂在眼皮上，涂上口红，脸上擦上一层干硬的铅白粉。她又一次问身边的随便什么人：“我打扮得怎么样？”当她成了邻居们的笑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夜之间拆掉了这间古老杂货铺的柜台和所有带抽屉的柜子，封死了朝街的大门，并按母亲的描述，把这个地方装饰成了小蟑螂马丁内斯的卧室。从此，她再没问过别人她是谁。

他听从莱昂十二叔叔的建议，找了个上年纪的女人照顾母亲，但这个可怜的女人睡的时候总是比醒的时候多，有几次她似乎也忘了自己是谁。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出办公室便回家，直到把母亲哄睡着为止。他不再去商业俱乐部玩多米诺骨牌，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再去见那为数不多的几位常会面的老相好，因为自从和奥林皮娅·苏莱塔那段可怕的交往后，他内心深藏的某种东西起了变化。

那是一次突发性事件。当时正赶上十月那几场让我们休养生息的暴风雨中的一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刚把莱昂十二叔叔送回家，就从车里看见一个娇小灵巧的姑娘，身上穿着一身满是荷叶边、像极了婚纱的薄纱衣裳，惊慌失措地从马路的一边跑到另一边，因为狂风掀翻了她的雨伞，卷着它在海边飞来飞去。他把她救上车，掉转车头，送她回了家。她家是一座小教堂改建的，依海而立，从街上就能看见院子里到处都是鸽子屋。路上，她告诉他自己刚刚嫁给一个在市场卖日用品的商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公司的船上见过这个人很多次，见他卸下一箱箱各式各样的旧货来卖，还有一大群鸽子，装在一个藤条编的笼子里，就像那些内河船上的母亲用来放新生儿的笼子一样。奥林皮娅·苏莱塔看上去就像来自胡蜂家族似的，不只因为她那上翘的屁股和娇小的上半身，而且因为她的全部：如铜丝一般的头发，脸上长满雀斑，两只活泼的圆眼睛之间的距离比一般人的都大些，声音尖细，恰好适合她那机智有趣的谈吐。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觉得，与其说她诱人，倒不如说她滑稽，送她到家后，他很快就把她忘了。她和丈夫、公公以及其他几个家庭成员一起生活。

几天后，他在港口看见了她的丈夫，这一回他正往船上装货，而非卸货。船起锚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清清楚楚地听到耳边响起了魔鬼的声音。那天下午，送莱昂十二叔叔回家后，他佯装偶然路过奥林

皮娅·苏莱塔家，从围墙外看见她正在喂那群乱哄哄的鸽子。他隔着墙从车上冲她喊道："鸽子多少钱一只？"她认出了他，高兴地回答说："不卖。"他又问："那怎么才能得到一只呢？"她一边继续喂食，一边答道："在大雨天碰见养鸽子的女人，用车把她送回家。"就这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回家时，带着一份奥林皮娅·苏莱塔道谢的礼物：一只腿上拴着金属环的信鸽。

第二天下午，同样是喂食的时候，美丽的养鸽女看见送出去的鸽子又回到了鸽子屋。她以为是它偷跑回来的。可当她抓住它检查时，发现金属环上缠着一张纸条：一封求爱信。这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留下字迹，却绝非最后一次，虽然这一次，他出于谨慎没有签名。接下来的一天是星期三，下午他正要进家门时，一个街上的小孩把装在笼里的那同一只鸽子交给他，并带口信说，是鸽子夫人让他来的，并让他嘱咐一声，请用笼子把它关好，否则它还会飞走，而这是她最后一次把它送回来了。他不知道对这一切应作何解释；或许鸽子在路上把信弄丢了，或许是养鸽女在装糊涂，又或许她把鸽子送来是为了让他再送回去。不过，如果是最后一种情况，按理说她应该在送鸽子的同时附上一封回信。

星期六早晨，思来想去之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派鸽子送去了一封没有签名的信。这一次，没等到第二天，当天下午就由同一个小孩把装在另一只笼子里的鸽子送了回来，并捎来口信说，前天把它送回来是出于礼貌，而这一次是出于遗憾，但如果他再让它飞走，就真的不会再送回来了。特兰西多·阿里萨逗鸽子玩到很晚，把它从笼子里抓出来，放在臂弯里，冲它咕咕叫，还试图哼儿歌哄它睡觉。突然，她发现鸽子脚上的金属环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我不接受匿名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狂喜地读完纸条，仿佛回到初次冒险的

高潮。那晚，他几乎无法入睡，心情烦躁地翻来覆去。第二天一早，在去办公室之前，他再一次放飞鸽子，它身上带着一封清清楚楚签着他名字的情书，除此之外，他还在金属环上别了一枝他花园中最新鲜、最火红、最芬芳的玫瑰。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纠缠了三个月后，美丽的养鸽女仍旧还是那个回答："我不是那种女人。"可她从没有拒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来信，也会去赴那些他安排好的貌似偶然的约会。他与以往判若两人：这个从不露面的情人，这个对爱情如饥似渴却又极其悭吝的人，这个从不付出、又想得到一切的人，这个不允许任何人在他心里留下足迹的人，这个藏头露尾的猎人，竟然跑到大街上，狂热地送出了一封封署名的情书，一件件殷勤的礼物，毫不谨慎地一趟趟跑到养鸽女家里去，甚至有两次是在她丈夫既没有出远门、也没有去市场的时候。从最初猎艳以来，这是他唯一一次感到自己被爱情之箭射穿了。

邂逅六个月后，他们终于在码头边一艘正在重新油漆的内河船的舱室里私会了。奥林皮娅·苏莱塔的爱欢喜愉悦，是活泼的养鸽女的爱情。她喜欢光着身子，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处在一种缓慢的休憩状态之中，这种休憩对她来说就像爱情一样，同样是柔情蜜意的。舱室已被拆得七零八落，油漆才刷了一半，松节油的味道很适合留存在一个幸福下午的回忆之中。忽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灵机一动，打开一罐从简易床上触手可及的红油漆的盖子，用食指蘸漆，在美丽的养鸽女的小腹上画了一个朝下的箭头，并在肚皮上写下了一行标牌似的字：这小东西是我的。当晚，奥林皮娅·苏莱塔忘了那行字，在丈夫面前脱掉衣服。丈夫一句话都没说，甚至连呼吸都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她穿睡衣的时候，到浴室取来刮脸用的刀子，一刀割断了她的喉咙。

很多天以后，在逃的丈夫被捕，向报界讲述了他犯罪的缘由和方式，直到这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才知道养鸽女被害的事。很多年里，想起那些署了名的信，他都提心吊胆，并且默默地计算着罪犯的刑期。由于船上的生意，那人对他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但他并不怎么怕他给自己的脖子来上一刀，也不怕传出丑闻，而是怕运气不好，让费尔明娜·达萨知道他的不忠。就在等待的那几年里，一天，照料特兰西多·阿里萨的那个女人由于一场不合季节的大雨，不得不在市场上耽搁得久了些，回来时，发现特兰西多·阿里萨已经死了。她坐在摇椅上，像往常一样把脸涂得花里胡哨，打扮得花枝招展，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还挂着坏笑，以至于这位保姆两小时以后才发现她死了。不久前，她把埋在床下的那几个财宝罐里的黄金和宝石分给了街坊四邻的小孩，告诉他们可以当糖果吃，其中几件最值钱的如今已经怎么也找不回来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她葬在了古老的“上帝之手”庄园，也就是当时的“霍乱墓地”，还在她坟前种下了一丛玫瑰。

头几次去墓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发现养鸽女奥林皮娅·苏莱塔葬在很近的地方，没有墓碑，但有人在坟上的水泥板未干之前，用手指刻下了死者的姓名和日期。他不禁毛骨悚然地想，那一定是她丈夫开的一个血淋淋的玩笑。玫瑰花开的时候，只要四周无人，他就摘下一枝放在她的墓前。后来，他干脆从母亲的玫瑰丛中挖出一株，种到她的坟前。两丛玫瑰发了疯似的越长越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得不带一把大剪子和其他园艺工具来修枝剪叶。但玫瑰的长势渐渐超越了他的能力范围：多年以后，两丛玫瑰已如杂草般在一座座坟墓间蔓延开来。从此，这座著名的霍乱墓地改叫“玫瑰墓地”，直到一位不具民间智慧之现实性的市长，一夜间铲除了所有的玫瑰丛，在墓地入口的拱门上挂起一块政府的牌子，上面写着：“普世公墓”。

母亲死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再次陷入疯狂的困境：到办公室上班；按照严格顺序与各个长期情人轮流幽会；到商业俱乐部玩多米诺骨牌；继续阅读爱情小说；星期天到墓地去凭吊。生活规律得仿佛生了锈一般，既让人轻蔑，又让人害怕，但同时也是一种保护，让他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然而，十二月的一个星期日，当墓地的玫瑰丛已经战胜了修枝的大剪子，几只燕子停在为通电灯而刚刚架起的电线上时，他蓦然间发现，母亲去世后竟已过去了这么多年，距离奥林皮娅·苏莱塔被杀，则过去了更多年，而距离那个遥远的十二月下午，费尔明娜·达萨给他回信说“可以”，并说“会永远爱他”，更不知已经流逝了多少岁月。在这之前，他活得就仿佛时间从没有在自己身上流走，而只是在他人身上留下痕迹似的。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他在街上碰见了因他写的情书而终成眷属的那许多对恋人中的一对，他甚至没有认出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自己的教子来。他用一句人们惯用的惊呼缓解了尴尬：“好家伙，都长成大人了！”尽管身体已向他发出最初的警告，但他依然故我，因为在容易生病的人堆儿中，他的身体就像是铁打的。特兰西多·阿里萨常说：“我儿子唯一得过的病就是霍乱。”在记忆混乱之前，她就已经把霍乱和相思病混为一谈了。但不管怎样她都错了，因为她的儿子暗地里得过六次淋病，尽管医生说那不是六次，而是一次，后来都只是因治疗不力又反复发作而已。此外，他还得过一次腹股沟淋巴腺炎、四次龟头疣病和六次股癣，但无论他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男人，都绝不会把这些当作疾病，而只会把它们当成战利品。

刚满四十岁，他就不得不因全身上下莫名其妙的疼痛去看医生。做了很多次检查后，医生都只对他说：“年岁不饶人啊。”但他每次回家，甚至从没有想过这一切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他的过去唯一的参照点就是与费尔明娜·达萨短暂的爱情，只有和她相关的事才能让他找到

岁月的支点。所以，看见燕子停在电线上的那个下午，他从最久远的记忆开始回顾自己的过往，回顾了一桩桩猎艳的情事，回顾了为爬上发号施令的位置曾跃过的无数处暗礁，以及种种数都数不清的往事，而这一切皆由他那刻骨的决心而起：他誓要让费尔明娜·达萨属于他，而他也属于她，这个决心高于一切，所向披靡。可直到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的一生几乎都已经过去了。五脏六腑的一阵寒战传遍他的全身，他眼前一黑，不由得松掉了手中的园艺工具，靠在墓地的围墙上，这才没有因衰老的第一次打击而倒下。

“见鬼，”他惊恐地自言自语道，“都已经三十年了！”

的确如此。当然，对费尔明娜·达萨来说，同样也过了三十年，但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也最舒心的三十年。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的那些可怕日子已被扔进了记忆的垃圾堆。她住在拉曼加的新房子里，成了自己命运的绝对主人，同丈夫和一双儿女生活在一起。如果再让她选一次，她还是会从世间所有的男人中选中她的丈夫。儿子在医学院里延续着家族传统，女儿则长得和她年轻时一模一样，有时连她都糊涂了，好像自己重生了似的。在那次誓不回来在无尽的惊恐中度日的倒霉旅行之后，她又去过欧洲三次。

上帝一定是听到了某人的祈祷——就在费尔明娜·达萨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在巴黎逗留了两年，刚刚开始从废墟中寻找爱情的碎屑时，一封半夜到达的电报惊醒了他们：布兰卡·乌尔比诺夫人病重。另一封传达死讯的电报接踵而至。他们即刻赶了回来。费尔明娜·达萨身着一袭丧服下了船，宽大的衣服已不足以掩饰她的身形。没错，她又怀孕了。这个消息造就了一首民间歌谣的诞生，歌词并无恶意，只是有些打趣，其中的叠句在当年颇为流行：*美人在巴黎究竟有何秘密，每每回来都喜得贵子*。虽然歌词鄙陋，但直到很多年后，在社交俱乐部的

节日庆典中，胡维纳尔·乌尔比诺都会点这首曲子，以示自己的风趣大度。

关于远近闻名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及其家族徽章，向来没有准确的记载。府邸先是以一个合适的价格卖给了市财政厅，而后一位荷兰学者在那里进行了挖掘工作，试图证明那里是哥伦布真正的坟墓——已是迄今发现的第五座了——所在，于是，它又以巨额价格卖给了中央政府。乌尔比诺医生的妹妹们住进了萨勒斯修道院，没有发愿，却过着隐居生活。费尔明娜·达萨一直住在父亲的老房子里，直到拉曼加的别墅修建完毕。她步伐坚定地踏入新宅，一搬进去就开始当家做主。她带去了新婚旅行时带回来的英国家具，以及这次和好之旅后又叫人运来的补充物件。从第一天起，她就在屋子里塞满了自己亲自到安的列斯帆船上买回来的各种珍禽异兽。她挽着重修旧好的丈夫，带着茁壮成长的儿子和回来四个月后降生、取名为奥菲利娅的女儿，搬进了新居。乌尔比诺医生心里明白，自己已无法找回新婚旅行时那个完整的妻子了，因为他希望得到的那部分爱已被她连同她的大好青春一起给了儿女们。但他学会了享受爱的残羹，并从中得到幸福。朝思暮想的琴瑟和谐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实现了。一次晚宴中，侍者端上了一道费尔明娜·达萨认不出是何物的美味佳肴。她吃完了一大份，喜欢之极，又要了同样的一份，正当她感到遗憾，碍于惺惺作态的文明礼仪不便再要第三份时，竟得知自己刚刚怀着毫无顾虑的喜悦吃下去的满满两大盘美食全都是茄泥。她雍容大度地认了输：从那时起，在拉曼加别墅，三天两头就端上各式各样做法的茄子，频繁程度堪比曾经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而且每个人都脾胃大开。以至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老年的闲暇时光常常津津乐道，说他真希望自己再生一个女儿，为的就是给她取一个定会让全家都开心的名字：茄子·乌尔比诺。

到那时，费尔明娜·达萨才明白，私生活跟社会生活恰恰相反，是变化无常、不可预见的。要找出孩子和成年人之间的真正差别，对她来说殊非易事。但再三分析后，她还是更喜欢孩子，因为孩子的想法更加真实。她的人生才刚迈入成熟，刚刚摒弃了形形色色的海市蜃楼，便又隐隐伤感起来，因为她始终没有成为自己年轻时住在福音花园里所憧憬的样子，而是成了这副甚至自己都一直不敢承认的模样：一个华贵雍容的女仆。在社交圈里，她最终成了最受爱戴，最心满意足，但也因此最为胆怯的女人。然而，没有什么让她比在治家方面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也没有什么比这方面更让她对自己的疏忽无法原谅。她一直觉得她的生活是从丈夫那里租借来的：她是这个辽阔的幸福帝国至高无上的君主，但这个帝国是丈夫建造的，且仅为他自己而建。她丈夫爱她胜过一切，胜过世间所有的人，但这也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这是他的神圣义务。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在折磨着她，那就是一日三餐的永久刑罚。因为它们不仅仅必须按时，而且必须完美无瑕，必须符合他的喜好，但同时却又不能去问他。而如果她真的问了——依照着那无数条仪式性的家庭礼节中的一条——他就会看着报纸，连眼皮也不抬地回答说："随便什么都行。"他说的是真心话，而且和颜悦色，自认为没有哪个丈夫比他更好商量了。可到了吃饭的时候，"随便什么"就不行了，必须符合他的喜好，不能有半点瑕疵：肉不能有肉味儿，鱼不能有鱼味儿，猪肉不能吃出疥疮似的腥味，鸡肉不能吃出鸡毛的味道。即便不是吃芦笋的季节，也得不惜代价地为他找来，为的是让他能在自己尿液的芬芳气息中怡然自得。她不怨他，只怨生活。但他是生活中难以安抚的主角。只要稍有怀疑，他就会把桌上的盘子一推，说："这顿饭没有用爱来做。"在这方面，他的灵感真是鬼使神差。有一次，他刚尝了一口甘菊茶，便把它推到远处，只说了一句："这玩意

儿有股窗户味儿。”她和女仆们都大吃一惊，因为谁也没听说过有人喝过水煮窗户，她们尝了尝那壶茶，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结果，还真有股窗户味儿。

他是个完美丈夫：从不会捡起地上的任何东西，也从不关灯，不关门。黑暗的清晨，如果他发现衣服上缺了一颗扣子，她便会听见他说：“男人需要两个妻子，一个用来爱，另一个用来钉扣子。”每天，当他喝第一口咖啡，喝第一勺冒着热气的汤时，都要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号叫，大家对此已经不感到害怕了，接着他会长叹一声：“等我有一天离开了这个家，你们要明白，那是因为这种烫嘴的日子我过够了。”他说，只有在他服用泻药而不能吃饭的日子里，她们才把饭菜做得格外香，格外出色。他坚信这是妻子对他的背叛，以至于最后只要妻子不肯跟他一同吃泻药，他就坚决不吃。

他的不通情理让她十足厌烦，于是在生日那天，她向他要了一件不同寻常的礼物：由他掌管一天家务。他欣然接受了，而且果真从天一亮便开始掌权。他张罗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却忘了她不喜欢吃煎鸡蛋，也不喝加了牛奶的咖啡。接着，他下令开始准备招待八位客人的生日午宴，并吩咐收拾屋子。他努力想比她操持得更好，但不到中午就不得不投降了，脸上没有丝毫愧色。从一开始，他就发现自己对什么东西放在哪儿一无所知，尤其是厨房里的东西。而女仆们也从中取乐，任由他每次为了找一样东西把所有都翻遍。十点钟时，还没决定午餐吃什么，因为家里的卫生还没有搞完，甚至连卧室都没有收拾完，卫生间没刷，卫生纸忘了放，床单忘了换，还忘了派司机去接孩子。他把女仆们的职责全搞混了：命令厨娘去整理床铺，让收拾床铺的女佣去做饭。十一点，客人马上就要到了，家里还是一团糟。费尔明娜·达萨重新担起了指挥的职责。她笑得要死，但并不像之前期望的

那样感觉到胜利的得意，而是为丈夫在管理家务方面一无是处感到同情，这让她自己也很震惊。他为自己所受的重创叹了口气，找了个常用的理由来辩解：“至少，我管家不会比你给人治病差。”不过，这次的教训是有益的，而且不仅仅对他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殊途同归地得出了明智的结论，那就是：换一种方式，他们无法共同生活下去，换一种方式，他们也无法继续相爱——世上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了。

在新生活的全盛时期，费尔明娜·达萨在不同的公众场合见过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而且见得越是频繁，他的职位就升得越高。但她已经学会了看见他时表现得自自然然，以至于不止一次因为心不在焉而忘了和他打招呼。她经常听见别人谈论他，因为他在CFC公司步步为营而又势不可挡地扶摇直上，这已成了商界一个经常性的话题。她看到他改善了自己的言行和仪态，他的胆怯被过滤成了一种神秘的清高，微微发福的身材很适合他，岁月只留下了缓慢的痕迹对他很有利，而他也懂得如何体面地去打理他那惨不忍睹的谢顶。唯一挑战时代和潮流的是他阴郁的穿着：过时的礼服外套，始终不变的一顶帽子，母亲杂货铺里卖给诗人的那种窄条领带，还有那把阴沉的雨伞。费尔明娜·达萨逐渐习惯了以另一种方式去看他，终于不再把他同那个坐在福音花园、在卷着黄色落叶的大风中为她哀叹的忧郁年轻人联系在一起了。但不管怎样，她看见他时从来不是无动于衷的，听到有关他的好消息时，她总是很高兴，因为这样可以慢慢减轻她的罪责。

然而，就在她以为已把他从记忆中彻底抹掉的时候，他又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成为她怀旧思绪中的一个幽灵。那是衰老刚刚显露征兆的时期，每当听到下雨前的雷声，她就觉得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不可弥补的事。那孤独的、石头般冷酷、准时准点的雷声给她造成

了无法愈合的创伤。十月里的每天下午三点，雷声在维利亚奴埃瓦山上响起，往日的记忆随着岁月流逝越来越历历在目。新的记忆几天后就会在脑海中模糊，而在伊尔德布兰达家乡省份的那次传奇之旅却越来越清晰，一切宛如昨日，怀旧之情将记忆渲染得清晰得邪门。她还记得那个坐落在山上的名叫马纳乌雷的小城，记得城中唯一的那条笔直而翠绿的街道，记得那些象征吉祥的鸟儿，还有那座可怕的房子，在那里，她每天都穿着被佩特拉·莫拉雷斯的泪水浸湿了的睡衣醒来，多年以前，这个女人正是在她睡的那张床上为爱殉情。她还记得当时那番石榴的味道，如今再也找不回来；她记得那预示着山雨欲来的紧密雷声，最后和嘈杂的雨声混合在一起；她还记得在圣胡安·德尔塞萨尔的那一个个如黄玉般金光闪耀的下午，她和那一群兴高采烈吵吵闹闹的表姐妹出去散步，走近电报局时，她咬紧牙，生怕自己的心从嘴里跳出来。她最终还是卖掉了父亲的房子，因为她无法忍受少年时代的回忆所带来的痛苦，无法忍受站在阳台上看见那凄凉的小花园，无法忍受炎热的夜晚栀子花散发出的神秘芳香，也无法忍受回忆起那个决定她命运的二月下午，那张古老贵妇的照片所带给她的恐惧。无论她把那时的记忆转向哪里，都会迎头碰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可她始终还是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分辨出那并非对爱的回忆，也不是对后悔的回忆，而是对一个曾使她泪水涟涟的痛苦形象的回忆。她没有发觉，她正被同情的陷阱威胁，而正是这同样的陷阱，让那么多毫无准备的受害者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里失去了贞洁。

她倚仗着她的丈夫。而此时也正是丈夫最需要她的时候。他不幸比她年长十岁，正独自跌跌撞撞地走在暮年的大雾之中，而更不幸的是，他是个男人，比她更为脆弱。他们终于彻底了解了对方，在结婚将近三十年时，他们变得好似一个人被分成了两半，常常因为对方猜出自己没有说出口的心事，或者一个抢先把另一个想说的话公之于众

的荒唐事件而感到不悦。他们一起克服日常生活的误解，顷刻结下的怨恨，相互间的无理取闹，以及夫唱妇随的那种神话般的荣耀之光。那是他们相爱得最美好的时期，不慌不忙，适宜得体，对于共同战胜逆境所取得的不可思议的胜利，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了然于心，也更心存感激。当然，生活还将给他们更多致命的考验，但那已经无关紧要了：他们已到达了彼岸。

---

[1] 此处暗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文学，其代表作家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因偏爱运用唯美的天鹅形象，被称为“天鹅诗人”。

[2] 圣胡安，即圣若望，传说是《若望福音》的作者，又译圣约翰。

[3] 典出《旧约·约纳书》。约纳又译约拿。上帝曾安排一条大鱼吞掉了约纳，使他在鱼腹中待了三日三夜。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在一篇文章中幽默地说，虚构文学是约纳发明的，因为他迟了三天回家，并且让他老婆相信他的迟归是因为一条鲸鱼把他吞掉了。

[4] 莱昂十二叔叔的名字León和莱昂娜的名字Leona在西班牙语中是同一个名词的阴阳变位，分别代表“公狮”和“母狮”。

为了欢庆新世纪的到来，大家举办了一系列新颖的公众活动。其中最让人难忘的，便是第一次气球旅行。这也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那无穷无尽的首创精神结出的果实。半城人聚集在阿尔塞纳尔海滩，观看刷有国旗颜色的巨大塔夫绸气球升空，它将把第一批邮件送往东北方向直线距离三十里的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曾见识过巴黎世博会上热气球腾空的激动场面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妻子率先登上了藤制悬篮，同行的还有一名飞行机械师和六位贵宾。他们带了一封省长致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市政府的信函，信中极具历史意义地将这次飞行称为第一次空中通邮。《商业日报》的一名记者问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如果他在此次探险中不幸罹难，最后的遗言会是什么。乌尔比诺医生没有丝毫迟疑，做出了一个定会为他招致无数骂名的回答。

“我认为，”他说，“十九世纪对全世界来说都已经时过境迁了，唯独在我们这里没有。”

气球徐徐上升，人们慷慨激昂地唱起国歌。被淹没在沸腾人群中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觉得自己十分赞同人群中某个人的话，即这种冒险对女人不合适，尤其是已经这把年纪的费尔明娜·达萨。但说到底，这件事也没那么危险。或者说，至少沉闷多过危险。气球在蓝得有些不真实的天空经过一段平静的旅行之后，毫无波澜地到达了目的地。在风向有利的和风中，他们飞得很稳，很低，先是沿着白雪皑皑的山峦，然后又从无边无际的大沼泽上飞过。

他们就像上帝一样，从天上俯瞰卡塔赫纳这座英雄古城的废墟，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三百年来，它的居民抵御了英军的各种包围和海盗的不懈侵扰，如今却因对霍乱的恐惧将它遗弃。他们看到了完好的城墙、杂草丛生的街道、被三色堇吞没的古堡、大理石的宫殿，以及供奉着那些因瘟疫而在盔甲里腐烂的历任总督的金色祭坛。

他们从特洛哈斯·德卡塔卡的水上村庄上空飞过，那里的房子涂得五颜六色，到处是饲养食用鬣蜥的小棚，湖边花园里长着成串的凤仙和一簇簇的百合。听到人们的呼喊，几百个光着身子的小孩乱哄哄地跳入水中，有的是从窗子跳下来，有的是从房顶上，还有的是从他们以惊人的本领驾驶的独木舟上，他们如鲱鱼般潜入水中，打捞起一包包衣物，一瓶瓶大蜡烛木制成的咳嗽药水，还有救济食品，这些都是那位戴羽毛帽子的美丽夫人从气球的悬篮里抛给他们的。

他们从海洋般阴暗深邃的香蕉种植园上空飞过，园中的宁静像死亡的蒸汽一样上升到他们中间，费尔明娜·达萨想起自己三岁，又或许四岁时，拉着母亲的手在幽暗的树林里漫步的情景。那时的母亲，在一群和她一样穿着麦斯林纱衣、打着白色阳伞、戴着薄纱帽子的女人中间，也仿佛是个小姑娘。飞行机械师一直在透过望远镜观察地面，他对他们说："这里好像没有生命。"接着便把望远镜递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医生看到耕地上的牛车、从田野里穿过的铁轨和干涸的水渠，而目之所及，到处都有人的尸体。有人说，霍乱正在大沼泽的各个村庄里肆虐。医生一边应答，一边继续用望远镜四处眺望。

"那可得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霍乱，"他说，"因为每个死者的后脑勺上都挨了仁慈的一枪。"

不一会儿，他们飞过一片泛着泡沫的海水，安全地降落在一片灼热的沙滩上，含硝的土地干裂开来，烫得如烈火一般。政府官员们正在那里恭候，除了普通的雨伞，没有其他任何措施抵挡骄阳。一些小学生随着进行曲的节奏挥舞着小旗；历年的选美皇后头戴金光闪闪的纸王冠，手捧着已被晒焦的鲜花；还有从加勒比沿岸最好的镇子——繁荣的盖拉镇请来的吹奏乐队。费尔明娜·达萨唯一的希望就是回自己的故乡看看，和她脑海中最久远的回忆对照一下，但因为霍乱的危险，谁也没有得到去那里的许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呈上了那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函，但它后来被错放到其他文书之中，最终下落不明。接下来，一行人差点在令人瞌睡的演讲中窒息。由于飞行机械师没能再次让气球升空，人们最后只好用骡子把他们送到老村城的渡口，那里是沼泽和大海的会合处。费尔明娜·达萨十分肯定自己很小的时候曾和母亲乘着一辆两头牛拉的木轮大车来过这里。长大后，她好几次向父亲提起，但父亲到死都固执地认为她不可能记得此事。

“那次旅行我记得清清楚楚，你说的细节也都对，”父亲对她说，“但那至少是你出生前五年的事。”

三天后，气球探险队回到了出发的港口。被整整一夜暴风雨摧残得狼狈不堪的他们像英雄一般受到欢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然也淹没在人群中，他从费尔明娜·达萨脸上辨出了惊恐的痕迹。但当天下午，他又在同样由她丈夫赞助的自行车展览上见到了她，此时的她已没有一丝倦容。她骑着一辆与众不同的脚踏车，但那更像是一件马戏团道具，前轮很高，后轮却小得出奇，看上去几乎难以支撑，而她就坐在前轮上，穿一条镶红花边的灯笼短裤，这让很多上了年纪的太太们议论纷纷，也让绅士们有些不知所措，但对她的车技，人人都由衷叹服。

这一幕，和这许多年来的许多幕一样，总会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面对命运的紧要关头时突然出现在他眼前，然后又突然消失，在他心里留下焦急渴望的种子。它们标记着他人生的轨迹，因为他甚少从自己身上体会到时间的残酷，却能在每一次见到费尔明娜·达萨时，从她身上难以察觉的细微变化中感受到这一点。

一天晚上，他走进堂桑丘这家殖民时期的高级餐厅，像往常一样找了个偏僻角落坐下来。他每次来这里都只是独自坐上一会儿，简单吃些茶点。突然，他在餐厅尽头的大镜子中看到了费尔明娜·达萨。她和丈夫以及另外两对夫妇坐在一张餐桌边，从他这个角度正好能在镜中欣赏她那迷人的风姿。她举止自如，优雅地与众人交谈，笑声就像烟火一样，在晶莹的大吊灯下，她的美更加光彩夺目：爱丽丝再次走入了镜中。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屏息凝神，尽情地观察她，看她吃东西，看她抿了一小口酒，看她同第四代堂桑丘打趣。他坐在自己孤独的桌子前，和她共度她人生的片刻。在这一个多小时里，他悄悄地在她贴身的禁区周围走来走去，之后他又喝了四杯咖啡消磨时光，直到看见她与那群人一起步出餐厅。他们走过时，离他是那样的近，他甚至能从众女眷身上散发的香气中识别出她的味道。

从那晚起，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一直缠着那家餐厅的主人，愿意付出任何代价——金钱或者人情，又或者这位店主一生最想得到的东西——只求他把那面镜子卖给自己。可这并非易事，因为老堂桑丘相信传说中的故事——这个出自威尼斯工匠之手的精美雕花镜框原是一对，另外那件曾属于玛利亚·安托瓦内特，现已没了踪迹：它们是一对举世无双的珍宝。但最终，他还是让步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镜子

挂到了自己家中，却并不是因为那镜框的精雕细琢，而是因为镜子里的那片天地，他爱恋的形象曾在那里占据了两个小时之久。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每次见到费尔明娜·达萨时，她几乎总挽着丈夫的手臂，两人完美和谐地徜徉在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之间，像暹罗猫那样惊人地灵活自如。唯有在同他打招呼时，夫妻俩才表现出分歧。的确，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同他握手时亲切热情，有时甚至会拍拍他的肩膀。而她则相反，对他仅限于彬彬有礼，不带丝毫个人情感，从未流露出任何细微的表情能让他隐约感到她尚记得自己年轻时曾与他相识。他们生活在两个背道而驰的世界里。每当他竭力想要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时，她绝不会向前迈进一步，而是步步都朝着相反的方向。直到很长时间以后，他才斗胆设想，那种冷漠也许不过是抵抗恐惧的保护壳。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在当地船厂所造的第一艘内河船的命名仪式上突然想到这一点的，那也是他第一次作为CFC的首席副董事长，代表莱昂十二叔叔出席正式场合。这一巧合赋予了这次活动某种特殊的庄严意义。凡本城中稍有头脸的人物都来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轮船的主厅忙着接待来宾，那里还散发着一股新刷的油漆和熔化的沥青味。这时，码头上突然爆发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乐队奏起了凯旋曲。他不得不控制住几乎与他的年纪一样老迈的颤抖，因为他看见自己朝思暮想的美人挽着丈夫的手臂，从身穿制服的仪仗队中间徐徐走来，浑身散发着成熟的风采，如旧时的王后一般。人们从窗口撒下暴风雨般的彩带和花瓣，两人则挥手回应人们的欢呼。她是如此炫目，从脚上精致的高跟鞋，到颈上的狐尾围脖，再到头上的钟形帽，全身上下都闪耀着属于皇室的金色，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出挑。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省府要员一起在舰桥上迎候他们，周围响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和鞭炮声，轮船鸣了三声浑厚的汽笛，将码头笼罩在蒸汽之中。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以其特有的潇洒风度，向列队接待的人一一致意，令每个人都觉得他对自己亲切有加：首先是身着华丽制服的船长，接着是大主教，省长夫妇，市长夫妇，然后是一位刚到任的来自安第斯地区的要塞长官。在政府要员之后就是身着黑色呢子礼服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置身于如此众多的显赫人士当中，他几乎微不足道。费尔明娜向要塞长官问好后，面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伸过来的手似乎迟疑了一下。长官预备为他们引见，就问她是否与他相识。她既没有说“不”，也没有说“是”，只是带着一个浅浅的微笑把手伸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这种情景过去出现过两次，今后也一定会再次出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向将其视为费尔明娜·达萨个性的表现。但就在那天下午，他发挥了无边的想象力，问自己这种残酷的冷漠会不会是一种掩饰，底下隐藏的其实是一场爱情的风暴？

仅仅是这样一个设想便使他旧梦复苏。他又开始在费尔明娜·达萨的别墅周围徘徊，怀着多年以前盘桓在福音花园时同样的渴望。但他心里盘算的并非是让她看见自己，而只是想看看她，知道她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可如今他要让自己不被人察觉是很困难的。拉曼加区坐落在一个半荒凉的小岛上，一条绿色的运河把它同老城隔开。那里到处都是椰李丛，是殖民时期恋人们星期日的藏身之所。近几年，西班牙人建的老石桥已被拆除，新建了一座混合材料的水泥桥，上面还装了球形电灯，以便骡子轨道车通过。起初，拉曼加区的居民不得不忍受设计不周带来的折磨，睡在本市的第一座发电站旁边，那隆隆的震动声就好像地震在持续不断地爆发。就连调动了所有关系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也无法让它搬到不扰人的地方去。直到他那已被证明的和全能上帝之间的同谋关系出面调停，才让事情转向他的一边。一天晚

上，电站的锅炉爆炸，威力惊人，竟从一座座新建的房屋上空飞了过去，在空中穿过半座城市，最终摧毁了古老的乐善好施者圣胡利安修道院的回廊。尽管那座破旧的建筑在本年初已被废弃，但锅炉还是造成了四人死亡，他们是那天晚上从当地监狱里逃出来的犯人，当时正躲在修道院的小教堂里。

那片宁静的郊区曾有着美妙的爱情传统，但自从它变成奢华的住宅区，对受阻的爱情就不那么适宜了。大街上，夏天尘土飞扬，冬天到处泥泞，整年都冷冷清清。稀稀落落的房子淹没在树木繁茂的花园之后，过去那种伸出屋外的旧式阳台变成了镶嵌工艺的露台，仿佛故意要跟偷情的恋人过不去似的。所幸那个时期流行起午后租马车出游，用的是改装的单匹马拉的老式敞篷车，游览终点往往是一块高地，从那里可以欣赏十月绚丽的晚霞，比从灯塔上观看还要惬意，还可以看到悄悄游过来窥探神学院海滩的鲨鱼，而每星期四，白色的远洋巨轮从海港运河通过，几乎触手可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办公室忙碌一天后，总会租上一辆马车，但从不像人们在炎热的季节所做的那样折起车篷，而是始终独自躲在座位深处，藏在别人看不到的阴影里，而且为了不让车夫胡乱猜测，总是命令他驶向意想不到的地方。事实上，他在途中唯一感兴趣的，只有那幢掩映在枝繁叶茂的香蕉树和芒果树之间的粉红色大理石帕特农神庙，它仿佛是路易斯安那州棉花种植园的田园别墅走了样的复制品。费尔明娜·达萨的孩子们每天快到五点时回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着他们乘着自家马车归来，之后又看着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例行出诊。然而，他在那里转悠了将近一年，却没能看见半点自己渴望的征兆。

一天下午，尽管六月的第一场破坏性大雨倾盆而下，但他仍然坚持这种独自出行的习惯。马在泥泞中滑了一下，跌倒在地。弗洛伦蒂

诺·阿里萨惊恐地发现自己正好处在费尔明娜·达萨家别墅的门前，他顾不上这种惊慌失措可能暴露自己，竟然恳求起车夫来。

“这儿不能停，求您了！”他对他喊道，“别的什么地方都行，就这儿不行！”

车夫被他催得莫名其妙，试图不卸车辕而把马扶起来，结果车轴断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急忙下车，忍受着羞愧，站在残忍的大雨中，直到乘别的车路过的人伸出援手，把他带回了家。他等在那里时，乌尔比诺家的一名女仆见他浑身湿透，蹚着及膝的泥水跑来跑去，于是给他送来一把雨伞，还请他到露台上去避一避。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即使在最狂妄的遐想中也从未料到自己能交上这等好运，但那个下午，他宁死也不愿让费尔明娜·达萨看见他那副狼狈的样子。

住在老城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一家每星期日总要步行到大教堂去望八点钟的弥撒，这对他们来说与其说是宗教习惯，不如说是社交习惯。搬家以后的好几年里，他们仍旧乘马车去大教堂望弥撒，有时还会在公园的棕榈树下和友人聚上一聚。但自从拉曼加区建起了教会事务神学院的礼拜堂，并拥有自己的海滩和墓地后，他们便除了一些极为隆重的场合，不再到大教堂去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这个变化毫不知情，在教区咖啡馆的露台上白等了好几个星期日，目送着三台弥撒的人走得一个不剩。后来，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才改到新教堂去。在最近几年之前，新教堂一直都很流行。他在那里见到了带着孩子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八月的四个星期日他们都准时前来，但费尔明娜·达萨没有和他们一起。就在其中的一个星期日，他去参观教堂附近新落成的墓地，拉曼加区的居民在那里为自己建造了奢华的坟墓。当他在高大的木棉树下发现那座最讲究的坟墓时，他的心抽搐了一下。墓已经建成，镶有哥特式的彩色玻璃，竖立着大理石天使雕

像，全家人的墓碑都以金字镌刻而成。自然，其中就有费尔明娜·达萨·德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夫人的，紧邻她丈夫的墓碑，上面刻着同一句墓志铭：共眠于上帝的平安中。

那一年的其他时间，费尔明娜·达萨没有出席任何一次市民活动和社交场合，连圣诞节的活动也没有参加，而往年的圣诞节，她和丈夫都是耀眼的主角。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她在一年一度的歌剧节开幕式上也缺席了。幕间休息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意外发现有几个人在不指名地议论她。他们说，有人在去年六月的一天夜里看见她登上了库纳德公司开往巴拿马的远洋轮船，脸上蒙着黑纱，以免让人看出可耻的疾病正慢慢地吞噬她的生命。有人问，究竟是什么病如此可怕，竟敢侵染这样一位权力显赫的夫人，得到的回答则颇为恶毒：

“像她这样高贵的夫人，得的不可能是别的病，只能是肺结核。”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他家乡的有钱人从不会生小病，一得就是大病。要么是暴亡，而且几乎总是在盛大节日的前夕，往往使得节日的欢欣被葬礼冲掉；要么就是在令人生厌的慢性病中油尽灯枯，而个中内情到头来还是传得人尽皆知。到巴拿马去隐居，几乎是富人生活中迫不得已的悔罪之举。他们在基督复临派的医院中将自己交给上帝的意愿。那所医院是个巨大的白色棚屋，常年淹没在达连湾史前般的倾盆大雨之中。在那里，病人们忘记了自己已时日无多，日复一日地生活在粗麻布窗子的孤独病室里，任谁也说不清那石炭酸的气味代表的是健康还是死亡。康复的人带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礼物回到家乡，慷慨地分发给众人，急切地为自己的苟延残喘祈求原谅。有人回来时肚子上留下了粗糙的缝合疤痕，就像是用鞋匠的麻绳缝的。他们在前来探望的亲朋面前掀起衬衫，将自己的伤口同那些被过度的幸福窒息而死的人的伤疤进行比较。余生里，他们将反反复复地讲述在三氯甲

烷的作用下，他们是如何看见天使降临的。然而，从没有人知道那些没能回来的人都看见了什么，其中最悲惨的又莫过于被遗弃在肺结核区死去的人。他们的死更多是因为雨水的折磨，而非疾病的苦楚。

如果要他选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知道自己更愿意费尔明娜·达萨生还是死。但首先，他最想知道的是实情，哪怕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实情。他千方百计地寻找真相，可还是没有找到。他感到不可思议，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他哪怕一条线索，好让他判断传言的真伪。内河航运是他管辖的领域，对他来说那里不存在任何秘密，甚至连隐私都没有。然而，谁也没听说过戴黑面纱女人的事情。在这座城市里，一切都保不了密，甚至有很多事在发生之前就尽人皆知，特别是有关富人的事。唯独这件事无人知晓。也没有人对费尔明娜·达萨的失踪做出过任何解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继续在拉曼加区徘徊，毫无虔诚地到神学院的礼拜堂去望弥撒，参加一些以往根本不会理会的市民活动。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传言变得越来越可信了。乌尔比诺家一切正常，唯独缺少了母亲。

在四处打听中，他发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或者没有留意打探的消息，其中就包括洛伦索·达萨已死在他的出生地——坎塔布连的一个小村庄。他想起自己曾有很多年都在教区咖啡馆那如火如荼的象棋比赛中见过他，他的嗓子因说话太多而变得沙哑，而且随着陷入衰老的不幸流沙，他的身形更胖，脾气也更粗暴了。自上世纪那次令人不快的茴香酒早餐之后，他们之间再也没有说过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断定，就像他仍对洛伦索·达萨心存怨恨一样，洛伦索·达萨对他也一定还怀恨在心，尽管他已给女儿找到一门富贵的婚姻——那曾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下定决心要得到有关费尔明娜·达萨健康状况的准确消息，于是又来到教区咖啡馆，想从这位父亲那

里问出个名堂。那时，咖啡馆里正在进行历史性的对决：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独自一人对战四十二名棋手。就这样，他得知洛伦索·达萨已经去世，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尽管他知道，这份高兴是以仍旧找不到真相为代价的。最后，他把费尔明娜·达萨去了绝症患者医院的传言当作事实接受了，而他唯一能找到的安慰只是一句谚语：*女人生病，长生不死*。在那段沮丧的日子里，他只能想，如果费尔明娜·达萨真的死了，那根本不需要打探，消息是无论如何都会传到他这里来的。

但他永远也不可能收到费尔明娜·达萨的死讯。因为她还活着，而且是健康地生活在表姐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世外桃源般的庄园里，距离马利亚之花镇半里地。她是在和丈夫达成协议后悄然离开的。结婚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关系稳定，这唯一的一次严重危机竟让两个人都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乱了方寸。这件事出其不意地发生在他们最为成熟平静的时期，两人自诩已能豁免于命运中任何潜伏的坎坷，孩子们都已长大，而且受到了良好教育，摆在夫妻俩面前的本是一片坦途，可以毫无苦涩地学着慢慢变老。对两个人来说，事情都发生得太过突然，他们不愿像加勒比人常做的那样，靠吵闹、眼泪和调解人来解决问题，而是希望能靠欧洲人的智慧来解决。但争来争去，既没有采用这里的办法，又没有采用那里的办法，结果陷入了愚蠢的局面，哪儿的法子也不是。费尔明娜·达萨决定离开家，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离开，也不知道离开后要怎么办，她只是被气疯了，而他为良心的谴责所困，也无力去说服她。

费尔明娜·达萨的确是在半夜上船的，而且十分秘密，头上蒙着守孝的黑纱。但她登上的不是库纳德公司开往巴拿马的远洋轮船，而是开往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的普通小船。那座城市是她的出生地，她在那里一直住到青春期。随着岁月流逝，她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她不

顾丈夫的意见和当时的风俗，只带了一个在仆人中长大的十五岁教女同行。不过，她把自己的行程通知了她将搭乘的各船的船长和每个港口的官员。做出这个轻率的决定时，她对儿女们说自己要到伊尔德布兰达姨妈那儿调养三个月，可心里已决意要一直留在那里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十分了解她倔强的脾气，他痛苦万分，但还是低声下气地接受了，将它视为上帝对他严重过错的惩罚。然而，船上的灯光还没有在他眼前消失，两人就都已在为他们的软弱后悔了。

虽然他们保持着形式上的通信，谈论孩子们的情况和家里的其他事项，可几乎两年过去了，无论他，还是她，都没有找到一条回头之路，因为每条路都被他们的骄傲暗中捣毁。第二年学校放假期间，孩子们到马利亚之花去度假，费尔明娜·达萨尽一切可能及不可能，竭力表现出对新生活的适应。至少，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孩子们的信中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那段日子里，里奥阿查的主教骑着他那头著名的配有金线镶边鞍具的白色骡子，走在华盖之下到那里传教寻访。跟在他后面的，是从其他村子远道而来的朝圣者、拉手风琴的乐师，以及四处贩卖食品和护身符的小贩。整整三天，各种身患残疾和不治之症的人云集庄园。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来听主教博学的布道或请求全赦的，而是来乞求骡子赐福，据说，这头骡子背着主人创造了种种奇迹。当年主教还是个地位卑微的神甫时，和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十分熟识。这天中午，他从布道的地方溜出来，到伊尔德布兰达的庄园吃午饭。其间他们只谈了些世俗的事。而午饭过后，他把费尔明娜·达萨叫到一边，想听听她的忏悔。她委婉而又坚定地拒绝了，理由十分明确：她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尽管并非有意，但她也意识到了，自己这个回答将会传到它应该传到的地方去。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常常不无讥讽地说，那两年的痛苦生活并非源于他的过错，而是因为妻子的一种恶习——她喜欢闻家人和自己脱下来的衣服，从气味上判断该不该送去清洗，尽管有时候衣服看起来还很干净。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她从来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直到丈夫在新婚之夜注意到这一点。丈夫还发现她每天至少三次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抽烟，但对此倒没有在意，因为她那个阶层的女人本来就常常凑在一起关起门来谈论男人、抽烟，甚至喝两瓜尔蒂略一瓶的廉价烧酒，直喝到像泥瓦匠那样烂醉如泥地倒在地上。但是，对于她碰到衣服就闻的习惯，他认为不仅不恰当，而且有害健康。但她只把丈夫的意见当作玩笑。对所有不愿争论的事，她都是这样的态度。而且她说，上帝把这么一个黄鹂一样勤快的鼻子安到她脸上，不单只为了装饰。一天早上，她出去买东西时，家中仆人们的吵闹惊动了四邻：他们在找她三岁的儿子，寻遍房子的各个角落都没找到。正当所有人惊恐万状时，她回来了。她像能追寻踪迹的獒犬似的转了两三圈，就在一个衣橱里找到了熟睡的儿子，谁也没想到他会藏在那里。丈夫惊呆了，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回答说：

“因为有股屎味。”

事实上，她不仅仅能靠嗅觉判断衣服该不该洗，或是孩子丢在了哪里：嗅觉能在生活的每个方面指引她，尤其是在社交生活中。两人结婚后，特别是在刚刚结婚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是个初来乍到的外来者，闯入这个三百年来都时刻准备要和她对着干的环境中，然而，她却能在尖刀密布的珊瑚丛中穿梭自如，不与任何人发生磕碰，这般掌控世界的能力只可能来自超自然的本能。这可怕的本事或许源于千百年累积的智慧，又或许出自一副铁石心肠，而在一个倒霉的星期日，它终于招致不幸降临。去望弥撒

前，费尔明娜·达萨纯粹出于习惯，闻了闻丈夫前一天下午穿过的衣服，立时感到一阵错乱，就仿佛和自己同床共枕的医生变成了另外一个男人。

她先是闻了闻外套和背心，然后从扣眼上摘下怀表链，从兜里取出铅笔、钱包和为数不多的几枚硬币，把它们逐一放在梳妆台上。然后，她闻了闻褶边衬衫，同时取下领带夹、袖口上的黄晶袖扣和假领上的金扣。接着，她又一边闻裤子，一边取出串着十一把钥匙的钥匙环和带珍珠母手柄的铅笔刀。最后，她闻了闻内裤、袜子和绣着他姓名首字母花押字的手绢。毫无疑问：每件衣物上都带有一种他们共同生活这么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气味，一股形容不出的味道，既不是花香，也不是香水味，而是人身上的味道。她什么也没说，之后也并不是每天都能闻到这股味道。但从此，她闻丈夫的衣服，已不是为了判断该不该洗，而是出于一种侵蚀着她五脏六腑的无法忍受的焦虑。

费尔明娜·达萨不知该把这种味道还原到丈夫规律生活中的哪个环节。不可能是上午上完课到午饭之间的这段时间，因为她猜想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女人都不会在这种时候匆忙做爱，更不会是和来访的客人，她们得打扫屋子，整理床铺，上市场买东西，准备午饭，何况还有可能会赶上这样的倒霉事：某个孩子由于被石头打破了脑袋，提前从学校回家，竟一头撞上母亲十一点钟赤身裸体地躺在一片狼藉的房间里，更糟糕的是还有一位医生趴在她身上。再者，她知道，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只在晚上做爱，最好是在绝对的黑暗之中，最迟也得是在早餐之前，伴随着第一群鸟儿咕咕的叫声。据他自己说，过了这个时间，脱衣服和穿衣服所费的工夫可比享受到的片刻欢愉还要长。所以，衣服沾染上气味只可能发生在某次出诊时，或晚上借口下棋、看电影溜出去的某个时刻。后面这种情况很难搞清，因为费尔明娜·达

萨和她那众多女伴截然不同，她太骄傲，不屑于监视丈夫，或请求别人替她这样做。至于出诊，看似是不忠行为的最佳时机，但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因为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对每位病人都有一份包括酬金在内的详细记录，从第一次出诊，直到用一个十字和一句愿灵魂安息的话语把他从这个世界送走为止，全部有案可查。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费尔明娜·达萨先是好几天都没有从丈夫的衣服上闻到那种气味，然后突然又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再次发现了它。之后一连几天，那种味道都前所未有地强烈。其中有一天还是星期日，他们举行家庭聚会，他和她片刻也没有分开过。终于，一天下午，她违背自己的习惯与意愿，走进丈夫的书房，仿佛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女人在做一件她永远也不会做的事情：用一个精致的孟加拉放大镜，试图破解他最近几个月错综复杂的出诊记录。这是她第一次单独走进这间书房，空气中充斥着杂酚油的气息，到处塞满了用不知名的动物皮装裱的书籍、模糊不清的校园合影、荣誉证书，以及多年收集的等高仪和千奇百怪的匕首。这是一块秘密的圣地，一直被她视为丈夫唯一的私人领地，她从不涉足，因为这里与爱无关，少有的几次进入都是和丈夫一起，而且每次都是为了处理短暂的事务。她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单独进去，更不用说是为了进行在她看来有失体面的搜查。但她还是进来了。她想找到真相，心里既焦灼又恐惧，两种感觉几乎不相上下。她被一股无法控制的劲风所驱使，这风比她与生俱来的高傲，甚至比她的尊严都更强烈：一种教人心碎的折磨。

她什么也没有查清楚，因为除了两人共同的朋友，丈夫的其他病人也是他与世隔绝的王国的一部分。那些人没有注明身份，辨认他们不是通过面孔，而是通过病痛，不是通过眼睛的颜色或者心声，而是通过肝脏的大小、舌苔的情况、尿液中的凝结物，以及他们夜间发烧

时的幻觉。这些人相信她的丈夫，相信他们是因他而活，而事实上，他们是为他而活，最终，他们被归结为他亲笔在诊断证明书上写下的一句话：安息吧，上帝在门口等着你。经过两小时徒劳无功的搜查，费尔明娜·达萨离开了书房，觉得自己一时鬼迷心窍做出了不光彩的事。

在幻想的驱使下，她开始发现丈夫的变化。她发现他说话闪烁其词，在餐桌和床上都欲望不振，容易发火，而且言辞刻薄，在家的时候也不如原来那样平和，而是像一头被关在笼里的狮子。结婚以来她头一遭开始留意他晚回家多长时间，甚至精确到分钟。她对他说各种谎话，想骗他道出实情，过后又因为矛盾挣扎而痛苦万分。一天晚上，她被幻觉惊醒，看到丈夫正在黑暗中用仇恨的目光盯着自己。她不寒而栗，就像年少时曾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站在她的床脚一样，只不过后者的出现并非出于仇恨，而是出于爱。更何况，这次根本不是幻觉，事实是，她的丈夫凌晨两点还醒着，从床上坐起身来，注视着熟睡的她。可当她问丈夫怎么回事时，他却矢口否认，重新把脑袋放在枕头上说：

“一定是你在做梦。”

这晚之后，又发生了一些类似的事，费尔明娜·达萨已经分不清现实在何处结束，梦幻又在何处开始。恍惚间，她觉得自己就要疯了。最后，她突然发现在基督圣体节那天，丈夫居然没有领圣体，最近几周的星期日也都没有领，更没有腾出任何时间来进行灵修，反省这一年的生活。当她问他这些信仰生活中不同寻常的变化究竟是何原因时，得到的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回答。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自从八岁第一次领圣餐起，他从没有在如此重要的日子里不去领圣体。于是，她意识到丈夫不仅犯下了致命的罪过，而且下定决心执迷不

悟，因为他甚至都没有去找过忏悔神甫寻求帮助。她从未想过自己竟会为某种与爱情完全相悖的东西备受煎熬，可目前状况的确如此。她下了决心，唯一能让自己免于痛苦而死的办法就是在正侵蚀着她五脏六腑的毒蛇窝里放一把火。她真的这样做了。一天下午，就在丈夫快要结束午睡后的例行阅读时，她坐到露台上去补袜子。突然，她放下手中的活儿，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不带丝毫强硬迹象地对丈夫说：

“医生。”

他正沉浸于那个时期人人都在读的小说《企鹅岛》中，没有回过神来，只应了一声：“嗯。”[1]她没有放弃，继续道：

“你看着我的脸。”

他照她说的做了，透过老花镜的一片迷雾看着她。虽看不清楚，但他无需摘下眼镜，便能感受到她炙热的目光灼烧着他。

“出什么事啦？”他问。

“你应该比我清楚！”她回答。

她什么也没有再说，把眼镜从额头上放下来，继续补袜子。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明白，长久以来的焦虑就此结束了。与他预想的形式相反，这并不是一次心灵的地震，而只是平和的一击。他感到如释重负：既然迟早都要发生，那么晚来不如早到，反正芭芭拉·林奇小姐的幽灵早已进入这个家了。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是在四个月前认识她的，当时她正在仁爱医院的门诊候诊。见到她的那一刻，他便知道一件无可挽回的事终于

在自己的命运中发生了。她是个黑白混血姑娘，个子很高，仪态优雅，骨骼宽大，皮肤的颜色像蜜一样，质地也像蜜一样柔软。那天早上，她穿着一身红底白点的衣服，帽子也是同样颜色，帽檐很宽，阴影一直遮到眼睛，看上去比任何人都更具性的蛊惑力。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平时是不接门诊的，不过有空时常会进去提醒那些高年级的学生说，任何药物都比不上一次正确的诊断。于是，他设法让自己在这个不期而遇的混血女人接受检查时在场，同时小心翼翼地不让学生们觉得他的任何一个表情有什么异常。他几乎没有看她，却把有关她的信息一一记在心里。那天下午，看完最后一个病人，他让车夫从她问诊时提供的地址前经过。她果然在那里，正在露台上乘凉。

那是一座典型的安的列斯式的房子，整体都漆成了黄色，连锌皮屋顶也是黄色的，窗子是粗麻布的，门廊里吊着一盆盆康乃馨和蕨类植物。房子坐落在滨海的马拉·克利安萨沼泽区，建在木桩之上。屋檐下挂着个笼子，一只黄鸟在里面歌唱。对面人行道边有所小学校，一拥而出的孩子们迫使车夫收紧了缰绳，以免让马受惊。很幸运，芭芭拉·林奇小姐刚好在这个时候认出了医生。她用老友的手势向他打招呼，邀他进去喝一杯咖啡，等纷乱的人群过去之后再走。他一反平日不喝咖啡的习惯，高兴地一边喝一边听她介绍自己。那是自那天早上以来他唯一感兴趣的事，也是之后几个月里占据他全部注意力、扰得他片刻不得安宁的事。刚结婚时，曾有个朋友当着他妻子的面对他说，他迟早会遭遇一段疯狂的激情，使他们婚姻的稳固受到威胁。而当时他自认为十分了解自己，对内心坚实的道德根基也把握十足，对此预言只付之一笑。现在倒好：他果真处在了这样的境地。

芭芭拉·林奇小姐是一位神学博士，是受人尊敬的新教牧师约拿坦·B. 林奇的独生女。这位牧师又黑又瘦，经常骑着一头骡子到海滨沼泽

区的贫穷村落去宣讲众多上帝中的某一位的福音，而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看来，与他的上帝相比，其他这许多位上帝在书写时只能用小写。芭芭拉·林奇讲得一口流利的卡斯蒂利亚语，句法偶尔不通，但这种小小的磕绊反而令她别具韵味。到十二月，她就年满二十八岁了，不久前，她刚同另一位牧师——他父亲的学生——离了婚。她和他一起度过了两年糟糕的婚姻生活，因此再没有一点儿想重蹈覆辙的愿望。她说："我只爱我的小黄鸟。"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太过严肃，竟没有听出她的弦外之音。相反，他迷茫地问自己是否这所有的便利条件都是上帝的一个圈套，为的是以后连本带利地向他讨还，但随即他又把这个想法从头脑里清除出去，认为这纯粹是自己在困惑之中的胡思乱想。

就要告别时，他偶然提起了上午的检查，他知道，对于病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谈论病情更让他们感兴趣的了。说起自己的病，她滔滔不绝，于是，他答应第二天下午四点再到这里来，给她做一次更为详细的检查。她吓了一跳，因为她知道像他这个级别的医生远远超过她的支付能力。但他请她放心："干我们这个行当的，向来都是设法让富人为穷人付账的。"说完，他在自己的袖珍记事本上记下：*芭芭拉·林奇小姐，马拉·克利安萨沼泽区，星期六，下午四时*。几个月后，费尔明娜·达萨将会读到这页记录，其中还有再详细不过的诊断细节和处方，以及病情的发展。这个名字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突然觉得，这可能是新奥尔良水果船上那些行为放荡的女艺术家中的一个，可地址又让她想到应该是个牙买加人，那么，就是个黑女人了，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排除了她的嫌疑，认为她不可能是丈夫喜欢的类型。

星期六，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提前十分钟前来赴约，林奇小姐尚未穿好衣服准备迎接他。自从在巴黎参加某场口试以来，他再没有

如此紧张过。林奇小姐躺在麻布床上，穿着一件柔软的丝绸衬衣，美到了极致。她浑身上下都丰满而结实：美人鱼般的大腿，仿佛经文火炙烤的皮肤，惊艳的乳房，以及一口洁白完美的牙齿，整个身体都散发出健康的气息，也就是费尔明娜·达萨在丈夫衣服上嗅到的那种气味。林奇小姐去看门诊是因为一点小毛病，她诙谐地称之为“弯弯曲曲的腹痛”，可乌尔比诺医生认为这是非同小可的症状，因而，他触摸了她各个内脏器官所在的位置，与其说是认真仔细，不如说是别有用心。这样做时，他竟然渐渐忘了自己的医术，惊讶地发现这个天生尤物的内脏与她的外表一样美丽。他完全沉浸在愉悦的抚摸中，已不再是加勒比沿岸最优秀的医生，而成了上帝创造的一个被本能折磨得神志混乱的可怜男人。在他严肃的职业生涯中，仅仅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情，而那一天他蒙受了奇耻大辱，因为愤怒的女病人一把推开他的手，在床上坐了起来，对他说：“您想要的事情可以发生，但绝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林奇小姐则恰恰相反，她完全听任他的摆布。当她毫不怀疑医生心里所想已不再是科学时，便说道：

“我原以为这是伦理道德所不允许的。”

他大汗淋漓，就像穿着衣服从池塘里爬出来似的。他用毛巾擦了擦手和脸。

“伦理道德，”他说，“它把我们医生都想象成了木头。”

她感激地向他伸过一只手。

“我只是这样以为，但并不意味着您不能这样做。”她说，“您想象一下这有多不可思议，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女人，竟得到一位如此声名显赫的男人的垂青。”

“我一刻也无法停止想您。”他说。

他坦白时，声音颤抖得实在让人怜悯。但她用一阵照亮了整个屋子的笑声，让他从一切罪责中得以赦免。

“我在医院见到您时就看出来了，大夫。”她说，“我是黑人，但不是愚人。”

一切进展得并不容易。林奇小姐注重自己的清誉，她首先要安全，然后要爱情，必须按照这个顺序来，而且她认为自己完全配得上这些。她给乌尔比诺医生引诱她的机会，但不让他踏足自己的卧室，即便家中只有她一个人也不行。她至多允许他重复抚摸和听诊的仪式，以此对伦理道德进行肆意地践踏，但不能脱掉她的衣服。而他呢，一旦上钩便无法松开肉欲的诱饵，几乎每天都去纠缠。由于种种现实原因，他要维持和林奇小姐的这种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他太软弱，无法及时自拔，以致不得不继续走下去。这是他的弱点。

受人尊敬的林奇先生生活没有规律，随时都会骑上骡子出门去，也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回家来。骡子的背上一边驮着各种版本的圣经和宣传福音的小册子，另一边驮着食物。另外一处不便是对面的学校，因为孩子们朗诵课文时，眼睛总是看向窗外的街道，而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街对面的这所房子。从早上六点起，房子的各扇门窗便纷纷敞开，他们看见林奇小姐把鸟笼挂在屋檐下，让小黄鸟学习他们朗诵课文；看见她包着花头巾，一边做家务，一边用她那加勒比的清脆嗓音也跟着朗诵起来；之后，他们又看见她坐在门廊上，独自用英语唱着下午的赞美诗。

他们必须选一个孩子们不在的时间，只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十二点到两点午餐休息的时候，可这也是医生午餐的时间；其二是傍晚孩子们回家之后。后面这个时间点一向再好不过，可这时医生刚好结束了出诊，距离赶回家去吃晚饭只有几分钟了。第三个形成阻碍的问题，也是对他来说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他的社会地位。他不可能不坐车去，可他的车子尽人皆知，而且还必须停在门口。他本可以和车夫串通，他在社交俱乐部的朋友们几乎都是这样干的，可这又违背了他的行事风格。他如此频繁地拜访林奇小姐，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以至于穿着仆人制服的车夫竟斗胆问他自己是否应该先回去，过后再来接他，以免让车子在门前停得太久。乌尔比诺医生一改往日的温和，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的话：

“自从认识你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说出不该说的话。”他说，“好吧，我就当你没说过。”

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只要医生的车子停在门前，就休想隐瞒病情。有时如果距离允许，医生情愿自己走路去，或者租一辆马车前往，以免招来恶意的揣测和妄下的结论。然而，这种办法没多少用，因为拿去药店取药的处方会使真相大白。于是，乌尔比诺医生只得在开方时把真真假假的药写在一起，以保证病人神圣的权利，让他们能带着自己病痛的秘密平静地死去。同样，他也可以找出种种体面的理由为自己的车子出现在林奇小姐家门口做出解释，但那并不可能维持很久，更不会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维持一辈子。

世界对他来说变成了一座地狱，因为最初的疯狂刚一得到满足，两人就都意识到了危险，乌尔比诺医生永远也无法下定决心去面对丑闻。在狂热的胡言乱语中，他什么都可以许诺，但过后，所有的事情又都搁置再说了。另一方面，随着想跟她在一起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害怕失去她的恐惧也越来越强烈，因此他们的会面一次比一次仓促，一次比一次艰难。他无法去思考别的事情，每天都迫不及待地等着下午来临，忘记了其他责任，忘记了除她以外的一切。可是，每当车子距离马拉·克利安萨沼泽区越来越近，他又祈求上帝在最后一刻出点什么岔子，好迫使他过门而不入。他始终怀着这种痛苦的心情赴约，有几次，他从街角就看见头发像棉花一般厚软的受人尊敬的林奇先生正在露台上看书，而他的女儿正在客厅里用歌声向邻家的孩子宣讲福音，他甚至庆幸起来。那时，他便会幸福地往家走，不必继续挑战命运，但过后他又会发狂，渴望每一天的每时每刻都能变成下午五点钟。

所以，当车子停在门口变得过于惹人注目时，他们的爱就难以为继了，到第三个月的末尾，整件事甚至只能用荒唐来形容了。每次，两人都来不及寒暄，林奇小姐一看见自己的情人慌忙赶来，便迅速钻进卧室。在等他的日子里，她会事先做好准备，穿一条宽大的裙子——一条带荷叶边的精美牙买加裙，荷叶边上还印着红色的花朵——里面不穿内衣，什么都不穿，因为她相信行事便捷能帮助他克服恐惧心理。可她为使他幸福所做的一切却被他白白浪费了。他气喘吁吁地跟着她走向卧室，大汗淋漓，一进屋就惊天动地地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儿丢到地上，手杖、医药箱，以及巴拿马草帽，然后便惊慌失措地做起爱来，裤子只褪到膝盖处，而为了避免麻烦，连外衣的扣子都没有解，怀表链放到了背心里，鞋也还穿着，什么都穿着，心里时刻惦记的不是如何尽兴，而是尽早离开。她才刚刚进入孤独的隧道，便落得个被迫节食禁欲的境地，因为他已经开始重新系上扣子，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就好像刚刚在生死线上做了一场绝世之爱，而其实他不过是完成了爱情中生理的那部分仪式罢了。但他很会把握节奏：刚好是一次常规治疗中静脉注射的时间。然后，他便回家去，为自己的软弱

羞愧万分，恨不得死去，他诅咒自己缺乏勇气，不敢请求费尔明娜·达萨脱下他的裤子，把他的屁股放到炭火上去灼烧。他没吃晚饭，念祈祷也心不在焉，上床后，装作继续在读午休时读的书，而此时，他的妻子仍在房子里忙来忙去，要在睡觉前把一切料理妥当。他看着书，渐渐瞌睡起来，然后就一点点陷入林奇小姐那无法回避的湿热丛林，沉溺于她躺卧的那片林中空地的蒸汽，堕入他的死亡之床。此时，他什么也无法想，只想着明天下午五点差五分时，她将在床上等他，那条疯狂的牙买加裙下面一丝不挂，只露出她深色树丛中的那片高地：地狱之圈。

早在几年前，他就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走下坡路。他了解这些症状。他在书上读到过，也在现实中从上了年纪的患者口中听说过，那些人先前都没有什么严重疾病，但突然就觉得出现了种种不适，描述的竟然和医书上写的如出一辙，而最终却发现，那不过是他们的幻觉罢了。在萨伯特医院教授儿童临床医学的老师曾建议他专攻儿科，因为这是最诚实的专业：小孩子们只有在真生病时才生病，和医生交流时也不会说套话，只讲具体的症状，没有半点虚假。成人则正好相反，到了一定年龄，要么是只有症状而没有真生病，要么更糟：病得很重，症状却像其他一些无关痛痒的小病。他通常都用缓和性的药剂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把问题交给时间，让他们在暮年的一团乱麻中与自己的小毛病长期共处，最终学会熟视无睹。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没有想到，像他这个年纪的医生，自认为什么都见过了，竟然不能克服明明没病却觉得有病的焦虑。或者更糟：也许是真的有病，却仅仅凭着科学的偏见，不相信自己有病。四十岁时，他曾在课堂上半严肃半开玩笑地说：“我生活中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懂我的人。”然而，当他发现自己已迷失在林奇小姐的迷宫中时，便不能再把这话当作一句玩笑了。

他那些上了年纪的病人所有真实或假想的病症，全都集中到了他身上。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肝脏的形状，无须触摸就能说出它的大小。他感到自己的肾脏发出像熟睡的猫一样的哼叫；感到胆囊在闪闪发光；感到血液在动脉里嗡嗡作响。有时，他像一条喘不上来气的鱼一样醒来，觉得心脏里积满了水。他觉得心脏瞬间乱了步伐，觉得它的脉动延迟了一下，就像当初在学校里参加军训时那样，继而一次又一次地延迟。最后，他又觉得它恢复了正常，因为上帝是伟大的。但他没有求助于曾开给病人的那些分散注意力的药物，而是被恐惧折磨得晕头转向。的确，五十八岁时，他生活中唯一需要的，依然是一个懂他的人。为此，他求助于费尔明娜·达萨，这个世界上最爱他、也是他最爱的人，在她这里，他刚刚让自己的良心得到了平静。

这件事发生在她打断他下午的阅读，要求他看着她的脸之后。他的第一反应便是他的地狱之圈已经败露。可他不明白她是怎么发现的，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费尔明娜·达萨仅凭嗅觉就发现了真相。但不管怎样，从很久以前开始，这里就不是一座善于保守秘密的城市。第一批家用电话刚装上不久，几对看上去关系稳定的夫妻就因为匿名电话里的流言蜚语离了婚。很多因此而害怕的家庭暂停了电话服务，或者好几年都一直拒绝安装。乌尔比诺医生知道他的妻子自尊心很强，绝不会允许一通匿名电话就破坏掉自己的信心，这种事连想都别想，而他也无法想象有谁会大胆到用真名向她通报实情。然而，他害怕那种旧式的诡计：一张从门下塞进来、不知出自谁手的纸条，效果反倒可能立竿见影，不仅因为这么做让发信人和收信人都隐匿了姓名，而且因为这一伎俩古老而神秘，难免使人把它同全能上帝的安排联系在一起。

忌妒从不认识他的家门：三十多年平静的夫妻生活中，乌尔比诺医生曾多次在公众面前夸耀，他就像瑞典火柴，只能在自己的盒子上擦燃。这话原本也的确是真的。然而，他从没想过，一个像妻子这样高傲、这样自尊、这样倔强的女人，面对丈夫已被证实的不忠，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因此，他在如她所要求的那样看着她的脸之后，除了再一次低下头以掩饰自己的慌乱，想不出还能做什么。他继续假装陶醉于阿尔卡岛那一条条恬美蜿蜒的小河之间，暗自思考着对策。而费尔明娜·达萨也没有再说什么。她补完袜子，把东西乱七八糟地丢进针线盒，到厨房吩咐开晚饭，之后便回卧室去了。

于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下定决心，下午五点不再去林奇小姐家。那些至死不渝的爱情誓言，那单独为她找所幽静房子，使他不必担惊受怕地与她相会的梦想，以及两人一起从容地享受幸福直到死亡的向往——所有这些他在爱的火焰中许下的诺言都永远地付之东流。林奇小姐从他那里得到的最后一件东西是一个绿宝石发卡，车夫交给她时什么也没有说，没有捎任何口信，也没有字条。东西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外面包着一张药房的纸，就连车夫也以为那是应急药物。他后半生再没有见过她，甚至都没有偶遇过。只有上帝知道，这个英勇的决定给他带去了多少痛苦，而为了能在这场内心的灾难后继续活下去，他又把自己关在厕所里流下了多少苦涩的泪水。五点钟时，他没有和她在一起，而是在神甫面前深深地忏悔了自己的罪过。第二个星期日，他怀着破碎的内心领受了圣体，但灵魂终于得到了平静。

做出了断的当晚，他一面脱衣准备就寝，一面对费尔明娜·达萨反复唠叨着他清晨失眠的痛苦，一阵阵突然来袭的针扎似的疼痛，以及黄昏时想痛哭一场的渴望，至于秘密爱情带来的种种苦楚，他也把它们当作衰老的症状讲了出来。为了不至于死掉，并且为了不说出真

相，他必须这样向人倾诉一番。终于，他在象征着爱的家庭仪式中祭献了这一股脑儿的苦水。她认真听着，没有看他，又是一言不发，一件一件地接过他脱下来的衣服。她闻着每件衣服，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愤怒，然后随意揉成一团，扔进装脏衣服的藤条筐里。她没有发现那种味道，但这代表不了什么：明天又是新的考验。跪到卧室的小祭台前准备祈祷时，他伤心而又真诚地叹了一口气，结束了对种种苦痛的怨艾："我觉得我快要死了。"她眼睛都不眨地回答了他。

"那样最好，"她说，"那样我们就都平静了。"

几年前，在一次病重的危急时刻，他也曾讲过自己可能会死的话，而她当时给出的也是同样残忍的回答。乌尔比诺医生将之归咎于女人天性中的冷酷无情，正因为如此，地球才依旧围绕着太阳转。当时他并不知道，为了不让别人看出她的恐惧，她总是会抢先竖起一道愤怒的屏障。而那个时候，她所面临的正是她最恐惧的事情——永远地失去他。

这天晚上却相反，她全心全意地希望他死去，这种坚决让乌尔比诺医生吓了一跳。之后，他听到她在黑暗中缓缓抽泣，而且咬着枕头不让他听见。这让他不知所措，他知道，她不会由于身体或内心的任何痛苦而哭泣，只有在愤怒时才会这样，而如果这种愤怒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她对自己过失的惧怕，就会哭得更凶，并且越哭越气，因为她无法原谅自己竟然会软弱得哭出来。他不敢安慰她，因为他明白这无异于安慰一只被长矛刺穿的母老虎，他甚至没有勇气告诉她，引起她哭泣的理由已经在那个下午消失了，已被彻底、永远地从他的记忆中根除了。

有几分钟，困意俘虏了他。当他醒来时，她已点亮她那盏微弱的床头灯，仍旧睁着眼，但没有哭。在他睡着的时候，她身上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改变：多年来积聚在年岁深处的沉渣，此刻因忌妒的搅动浮现出来，她刹那间苍老了。看着她那瞬间出现的皱纹、枯萎的双唇、灰白的头发，他不禁伤怀，冒着风险劝她睡觉：已经两点多了。她没有看他，但声音里也没有愤怒的痕迹，语气几乎是温和的。

"我有权知道她是谁。"她说。

于是，他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感觉仿佛从身上卸下了全世界的重量，因为他相信她已经知道真相，不过是想确认一些细节。但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所以他讲的时候，她又哭了起来，不是像起初那样低声抽泣，而是泪如泉涌，咸咸的泪水从脸颊滑落，在她的睡袍里翻滚沸腾，灼烧着她的生命：他竟没有像她提心吊胆地所期待的那样，做出个男人的样子，抵死否认，为自己所受的诽谤大发雷霆，咒骂这个婊子养的社会肆无忌惮地践踏别人的名誉，即使面对自己不忠的毁灭性证据，仍能临危不乱。之后，当他告诉她已在下午见过忏悔神甫时，她简直怕自己会气瞎了双眼。从上学时起，她就认定教会里的人不具备上帝所启示的任何一种美德。这是他们和谐家庭中的一个本质分歧，两人一直都小心回避这一点，没有发生过什么碰撞。但丈夫竟然允许忏悔神甫掺和到这样一件不仅关乎他个人、也关系到她的隐私中来，实在是出了格。

"你还不如告诉一个在门廊里耍蛇的。"她说。

在她看来，一切全完了。她敢肯定，还没等丈夫做完忏悔，她的荣誉就已成为大街小巷的话题。这给她造成的屈辱感要比丈夫的不忠带来的羞愧、愤怒和不平更加难以忍受。而最糟的是，见鬼，竟然是

跟一个黑女人。他纠正说："是黑白混血的女人。"但此时，再精确的解释也是多余了：她已有了定论。

"一样是贱货！"她说，"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是黑女人的气味。"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星期一。而星期五晚上七点钟，费尔明娜·达萨就登上了开往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的常规小船，随身只带了一只箱子，由教女陪伴。为避免旁人发问，也避免有人将来向丈夫问起她来，她在脸上蒙了黑纱。按照两人的约定，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没有出现在港口。此前，他们进行了一场历时三天、精疲力竭的谈话，最终决定让她到位于马利亚之花镇的伊尔德布兰达表姐的庄园去，以便在做出最后的决定前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不明就里的孩子们把这理解为一次推迟了多次的旅行，很久以来，他们也一直盼望能到那里去。乌尔比诺医生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为的是让他那个不可信赖的小世界里没有人能做出居心叵测的推测。这一点他做得天衣无缝，所以，如果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能找到费尔明娜·达萨消失后的一丁点儿踪迹，那是因为事实上根本就无迹可寻，而不是因为他缺乏调查的手段。丈夫毫不怀疑妻子一旦平息愤怒就会马上回家。但她走时却坚信自己的愤怒永远也不会平息。

然而，她很快就会明白，这个过火的决定与其说是怨恨的果实，不如说是思乡的结果。蜜月旅行之后，她曾多次返回欧洲，虽然每次都要在海上漂泊十天，却总有足够的时间去感受幸福。她见过世面，已经学会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和思考，可自从那次糟糕的气球之旅后，她就再也没有回过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回到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居住的省份，对她来说即使太迟，也是一种补救。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倒并非因为婚姻的灾难。单是想到去重温少女情怀，也足以让她慰藉自己的不幸。

她和教女在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下了船，凭着那份保留至今的刚强性格，她不顾别人的种种警告，重游了那座城市。收到消息前来接待她的要塞行政和军事长官请她登上了官家的马车，将护送她直到登上前往圣佩德罗·阿莱杭德里诺的火车，她想到那里去，是为了证实解放者临终时睡的那张床是否真如人们所说，小得就像一张孩子的床。于是，费尔明娜·达萨在午后两点的疲倦中再次看到了自己广阔的故乡。她看到了故乡的街道，但它们看上去更像一片海滩，到处是覆盖着青苔的水洼；又看到了葡萄牙人的豪华住宅，大门上镌刻着家族徽章，窗前垂着铜制的百叶窗，阴暗的大厅里单调地重复着几首钢琴练习曲，颤颤巍巍，惨惨凄凄。她母亲当年刚结婚时，也曾拿这几首曲子教过富人家的姑娘。她看到广场上空无一人，炙热的石子地上连一棵树都没有；送葬似的带篷马车一字排开，马儿站在那里都睡着了；还有那辆开往圣佩德罗·阿莱杭德里诺的黄色火车。在城中最大教堂的拐角处，她看到了那所最雄伟、最漂亮的房子，它那青色石头的连拱廊、修道院式的大门，以及卧室的窗子，多年以后，当她已无法记清此段回忆时，阿尔瓦罗将在这间卧室出生。她想起了她无望地寻遍了天上地下的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而想到姑妈，便又想起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想起他那身文人的衣服，他在小花园的杏树下读的那本诗集。她偶尔几次回忆起学校里不愉快的岁月时，也会触动有关他的思绪。可她转了好几圈都没能认出自家的老房子。她认为它应该在的那个地方，除了一个猪舍以外什么都没有。拐角过去是一条妓院街，全世界来的妓女都在门廊上睡午觉，等待邮车或许会带来什么寄给她们的东西。这里已不是她的故乡了。

刚一上马车，费尔明娜·达萨就用面纱遮住了半张脸，不是害怕被人认出来，毕竟，这里谁也不可能认识她，而是因为从火车站一直到墓地的路上，日光暴晒下的肿胀尸体随处可见。要塞长官对她说：“是

霍乱。”她早已看出来了，因为那些晒焦的尸体嘴里都泛着白沫，但她同时也注意到，没有一具尸体像她乘坐气球时看见的那些那样，脑后挨了仁慈的一枪。

“的确如此。”长官说，“上帝也在改善自己的方法。”

从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到圣佩德罗·阿莱杭德里诺的古老甘蔗园只有九里路，可那列黄色的火车却走了一整天，因为火车司机跟常坐这列车的乘客们是朋友，他们时不时就央求他停下来，以便到香蕉公司高尔夫球场的草坪上去走走，舒展一下腿脚。男人们还光着身子到河里去洗澡，河水从山上倾泻而下，清澈冰凉。他们觉得饿时，就下车去，从牧场放养的奶牛身上挤些奶来喝。被这些情景吓坏了的费尔明娜·达萨终于到站，差点没时间去观赏解放者临死前悬挂吊床的那几棵史诗般的罗望子树，并且证实他当时所睡的床果真如人们所说，不仅对他这样一位荣耀的男人，即使对一个七个月的婴儿来说也极其狭小。不过，另一位看上去无所不知的参观者称，那张床是件假文物，事实上，国父是被人扔在地上死去的。费尔明娜·达萨对离家以来这一路的所见所闻感到万分压抑，以至于在之后的旅途中，再没有心情去回味前半段旅程。于是，尽管曾万般怀念，如今她却避免走过那些她思念的村庄。这样她才能在记忆中留住它们，让自己免受幻灭之苦。当她试图抄捷径以逃离烦恼时，她听到了手风琴声，听到了斗鸡场的叫喊声，也听到了或许是战争抑或是庆典的铅炮声。当她别无他法不得不穿过某个村庄时，便用面纱遮住脸，以继续把它幻想成以前的样子。

逃避了许许多多往事之后，她终于在一天晚上来到伊尔德布兰达表姐的庄园。而当她看到在门口等她的表姐时，差点昏厥过去：她就仿佛在一面真实之镜中照见了自己。表姐身材发福，年老体衰，身边

带着几个不听管教的儿女，孩子们的父亲并不是那个她仍旧无望地爱着的男人，而是一位靠丰厚的津贴生活的退役军人，当年，她在绝望之下嫁给了他，而他则疯狂地爱恋着她。尽管如此，在那被摧残的身躯里，她依旧是原来那个她。费尔明娜·达萨在乡下住了些日子，回忆起美好往事，渐渐从一开始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但她除了星期日去望弥撒，从来不出庄园。和她同去望弥撒的，是她昔日那些桀骜不驯的闺中密友的孙儿辈，此外还有骑着高头大马的商人，以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漂亮姑娘。她们一路站在牛车上，一如她们的母亲在她们这个年龄时的样子，齐声高唱着歌，直至来到山谷深处的教会教堂。费尔明娜·达萨原本只是路过马利亚之花镇，在昔日的那次旅行中，她自认为不会喜欢这里而没有来，可这次，她一眼就被它完全迷住了。但她的悲哀，抑或是这个镇子的悲哀在于，后来的她永远也想不起它真实的模样，只记得见到它之前她脑海中想象的样子。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接到了里奥阿查主教的消息后，决定亲自去接她。他的结论是，妻子迟迟不归，并非因为不想回家，而是想为她的傲慢找个台阶下。于是，在和伊尔德布兰达通过几封信后，他没有通知妻子便动身了。从信中他清楚地看出，妻子的思乡之情已经颠倒过来：现在她想的只有自己的家。上午十一点，费尔明娜·达萨正在厨房里做茄子馅饼，忽然听到雇工们的叫喊、马的嘶鸣和朝天放枪的声音，接着，门厅里响起了坚定的脚步声和那个男人的说话声。

“要赶好时辰，就得不请自来。”

她开心得要死，来不及多想，只胡乱地洗了洗手，喃喃道：“谢谢，我的上帝，谢谢，你真是太好了！”她想到因为这该死的茄子馅饼，自己还没有洗澡，伊尔德布兰达让她做馅饼，却没有告诉她谁要来吃午餐；她想到自己现在又老又丑，脸还被太阳晒脱了皮，如果他

看见她这副模样，一定会为赶来接她而后悔，真见鬼。可她还是匆忙地在围裙上擦干了手，尽可能地整理了一下仪容，带着母亲生她时给予她的全部高傲，理了理纷乱的心绪，前去迎接那个男人。她迈着她那母鹿般优美的步伐，昂着头，目光熠熠，翘起迎接挑战的鼻子，心中充满了对命运的感激，为能回家而感到无限轻松。当然，事情也并不像他想象的那般容易，她确实高高兴兴地跟他回去了，但同时也下定决心，要在余生默默地向他讨还自己所受的痛苦折磨。

于是，差不多就在费尔明娜·达萨失踪两年后，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特兰西多·阿里萨定会将其视作上帝对人生的嘲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电影的发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但莱昂娜·卡西亚尼还是毫不费劲地把他带到了《卡比莉亚》隆重的首映式上，广告中大肆宣传，影片对白是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写的。堂加利略·达孔特的露天大院子里照例坐满了贵宾，但在有些夜晚，人们欣赏的更多的是璀璨的星空，而非银幕中的无声爱情。莱昂娜·卡西亚尼的一颗心始终悬着，跟随着跌宕的故事起伏。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则恰恰相反，剧情的死气沉沉让他困得打瞌睡。在他背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仿佛猜中了他的心思:

“我的上帝，这比疼痛还要长！”

这是她说的唯一一句话，可能是发现自己的声音在黑暗中回荡，不由得克制住了。当时，这里尚没有用钢琴给无声电影伴奏的习惯，黑暗中的观众只能听着放映机那下雨似的沙沙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只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才会想起上帝，但这一次，他却对上帝充满感激。因为，即使深埋地下二十西班牙寻，他也能立刻认出那个深沉的金属般的声音，自从那天下午，在那个幽静小花园的漫天黄叶中，听见她说出那句“现在，您走吧，没有我的通知，请您不要再来了”，

这个声音便留在他的灵魂里。他知道，她就坐在他身后的座位上，当然，是在她丈夫旁边。他感觉到她那温热而均匀的呼吸，满怀爱意地吸纳着经她健康的气息净化过的空气。他感受到，她并没有像自己在最近几个月的沮丧中时常想象的那样，已被死亡的幼虫所侵蚀，而是让人再次回想起她最光彩照人、最幸福的时刻：穿着智慧女神的长衫，隆起的腹中孕育着她的第一个孩子。他没有回头去看，但她却如在眼前，而银幕上演出的那一连串历史性灾难他全然没有放在心上。他陶醉于从他的灵魂深处传来的杏果的芬芳，急切地想知道她认为电影中那一个个女人应该如何去爱，才能让她们的爱情比现实之中少一些痛苦。电影快结束时，他感到一瞬间的狂喜，因为他还从未和这个他深爱的女人如此贴近地待在一起这么久。

灯亮时，他等着其他人先站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起身。他漫不经心地转过身，把看电影时总是敞开的背心扣子扣起来，这时，四人站得如此之近，就算有人不情愿，也无论如何必须打招呼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首先问候了莱昂娜·卡西亚尼，他对她很熟悉，之后，又以其一贯的彬彬有礼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握了手。费尔明娜·达萨向他们致以礼节性的微笑，只是礼节性的，意思是这个微笑的主人已经见过他们很多次，也知道他们是谁，因而无需再向她做自我介绍。莱昂娜·卡西亚尼以她那混血女人特有的优雅回应了她。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不知该如何是好，因为刚一见到她，他就惊呆了。

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的脸上没有一丝可怕的流行病、或者其他疾病留下的痕迹。她还保持着豆蔻年华的体重和身段，但很显然，最近两年她经历了仿佛十年的艰辛与严酷。短发很适合她，两侧的鬓角像翅膀似的翘着，但已经不是蜜的颜色，而是铝的银白色。老花镜后，那双美丽的柳叶眼已失去了半生的光芒。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着

她挽着丈夫的手臂在散场的人群中远去，惊讶地发现她竟在公共场合披着穷人的头纱，穿着家用的便鞋。但最让他感伤的，是她的丈夫不得不抓住她的手臂，指引她该从哪里出去，而即便这样，她还是估计错了高度，差点在门口的台阶上跌倒。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年龄所致的步履蹒跚十分敏感。早在年轻时，在花园里，他就常常放下正在阅读的诗集，观察一对对老人互相搀扶着穿过街道的情景。那是生活给他上的课，让他得以隐约窥见自己年老时的境况。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看电影那晚的那个年纪，男人仿佛焕发了第二次青春，最初的几根白发使他们看上去更为庄重，充满智慧和魅力，尤其是在年轻女子的眼中，而与此同时，他们枯萎憔悴的妻子不得不拽着他们的手臂，才不至于被自己的影子绊倒。然而几年之后，丈夫的健康便突然一落千丈，身体和灵魂都迅速耻辱地衰老，而那时，妻子们又焕发了第二春，像拉着乞讨的瞎子一样拉着他们的手臂，为了不伤害男性的骄傲，轻声在耳边提醒他们注意脚下的台阶是三级而不是两级、街中间有一个水坑、横躺在人行道上的那团模糊的东西是个死了的乞丐，然后，艰难地帮助他们穿过马路，仿佛那是他们生命中最后一条河的唯一渡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无数次在那面生活之镜中照见自己，他对死亡的恐惧从来不及对那个可耻年龄的恐惧，到那时，他将不得不被一个女人搀扶着。他知道，到了那一天，也只有到了那一天，他终将放弃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渴望。

这次相遇驱走了他的困意。他没有用车送莱昂娜·卡西亚尼，而是陪她步行穿过老城区。他们的脚步踏在砖地上，像马蹄声一样回荡。敞开的阳台上时而飘来零星的说话声，有卧房中的喁喁私语，也有被虚无缥缈的声响和熟睡小巷中茉莉花的热烈芬芳升华了的爱的呜咽。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得不又一次竭力克制自己，避免把压抑在心中的对费尔明娜·达萨的爱吐露给莱昂娜·卡西亚尼。他们迈着缓慢的步伐一起走着，像一对不慌不忙的老情人一样亲昵无间，她想着卡比莉亚的种种美好，而他却想着自己的种种不幸。一个男人在海关广场的阳台上唱歌，歌声在四周回荡，连绵不绝：*当我穿过大海无尽的浪涛*。在石头圣人大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该在莱昂娜·卡西亚尼的家门前向她道别，而他却请求她邀请自己到她家里去喝一杯白兰地。这是他第二次在类似情况下提出这样的要求。第一次是在十年前，当时她回答说："如果你现在上去，那就必须永远留下来。"结果他没有去。如果换作现在，他无论如何都会上去的，即便日后可能不得不食言。然而，这一次莱昂娜·卡西亚尼邀他上去，无需任何承诺。

就这样，他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来到一座爱情圣殿，而这份爱尚未诞生就已被扑灭。莱昂娜·卡西亚尼的父母已经去世，唯一的兄弟在库拉索岛发了财，如今她一个人住在家里的老宅中。若干年前，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没有放弃让她成为自己情人的希望时，常常征得她父母的同意在星期日来拜访她，有时晚上还待到很晚。他对这所房子的修缮做出了很大贡献，以至于都把它当作自己的家了。然而，在看完电影的这天晚上，他似乎觉得客厅里有关他的记忆都被清除了。家具变换了位置，墙上挂了新的彩画。他想，这些显而易见的变化是刻意的，为的是证明他从未在此地存在过。而就连那只猫也没有认出他来。他被这种残忍的遗忘吓了一跳，说："它不记得我了。"可她一边倒白兰地，一边背对着他说，如果他是为此而忧心，那么大可不必，因为猫是从来也不会记着谁的。

两人倚在沙发上，靠得很近，聊着他们自己，说起他们相识前各自是什么样子，也就是在那个谁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的下午，在那辆

骡子轨道车上相遇之前。一直以来，他们都在两间相邻的办公室里工作，而在此刻之前，他们从未谈过日常工作以外的事情。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边聊着一边把手放到她的大腿上，像情场老手一样轻轻抚摸起来。她任由他这样做，但就连礼貌性的颤抖都没有回应给他。当他试图更进一步时，她拉起他那只探险的手，在掌心上吻了一下。

“注意你的举止，”她对他说，“很久以前，我就发现你不是我要找的男人了。”

在她很年轻的时候，一个强壮、敏捷、但她从未看清长相的男人，在防波堤上突然将她按倒，撕扯剥光了她的衣服，短暂而疯狂地跟她做了一次爱。她躺在石头上，浑身满是伤痕，却真心希望那个男人能永远留下来，直到她在他的怀中带着爱死去。她没有看见他的脸，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但她相信自己能根据他的体型、身材和做爱的方式，从千万个人中把他认出来。从那时起，她便对所有愿意听她讲的人说：“如果你碰巧听说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在十月十五那天晚上大约十一点半钟时，在殉情者的防波堤上强奸了一个可怜的过路的黑女人，那么请你告诉他在哪里能找到我。”这句话变成了她的一种习惯，她讲给过无数人听，最后彻底绝望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多次听她说起过这个故事，就像听到夜晚起航的轮船的告别声一般频繁。凌晨两点的钟敲响时，他们每人已经喝了三杯白兰地。他明确地知道了自己不是她所等的男人，他很高兴能明白这一点。

“干得不错，母狮！”他临走时对她说道，“我们总算把猛虎扼杀了。”

那晚终结的事还不止这一件。关于结核病医院的恶意传言曾打碎了他的梦想，因为那让他产生了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疑虑，即费尔明

娜·达萨也是会死的，既如此，那她也就有可能死在丈夫的前头。而当他看见她在电影院的出口险些绊倒时，他又进一步滑向深渊，忽然间意识到先死的人可能是他自己，而不是她。这是一个预兆，是所有预兆中最可怕的一种，因为它是有事实根据的。那些耐心等待、幸福憧憬的岁月已成为过去，如今，在地平线上隐约望见的，不过是充满了各种可以想见的病毒的茫茫大海，失眠的清晨一滴一滴排出的尿液，以及每日下午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曾经，每天的每分每秒都胜似他的盟友，如今却开始算计他。几年前他去赴某个约会时就已经开始提心吊胆，害怕发生意外。他发现门没有上闩，合页刚刚上过油，显然是为了让他进来时不会发出声响，但在最后一刻，他后悔了，担心自己死在她的床上，给一个无辜的热情女人造成无法消除的阴影。因此，有理由认为，那个世界上他最爱的女人，那个他毫无怨言地从一个世纪等到另一个世纪的女人，很可能会来不及挽着他的手臂穿过到处是圆形坟冢和在风中摇曳的罂粟花的漫漫长街，帮助他平安到达死亡的彼岸。

事实上，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已经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他已满五十六岁，认为自己没有虚度光阴，因为那都是充满爱的岁月。不过，在那个时代，没有哪个男人会像他一样勇于面对因看上去年轻而招来的耻笑，即使他们确实不老，或者心里也自认年轻；也不是所有人都敢于毫无羞愧地承认自己仍在因上世纪的挫折而偷偷哭泣。那个时代对年轻存在偏见：尽管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穿着方式，但老年的衣着在青春期结束后不久便开始穿上身了，而且一直持续到进入坟墓。这种穿戴与其说标志着年龄，不如说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年轻人穿得像自己的祖父，再早早地戴上一副眼镜，便会更加受人尊重；而从三十岁起，手杖就是让人刮目相看的物件。至于女人，则只有两个年龄：一是结婚的年龄，一般不超过二十二岁；一是

永远独身、再也嫁不出去的年龄。而其他女人，那些已婚的、当了母亲的、成为寡妇的、做了祖母的，都属于另外一类，她们不按已经度过的年岁来计算年龄，而是按距离死亡还有多久来计算。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则相反，他赤裸裸地大胆对抗着衰老的圈套，尽管心里清楚自己命运奇特，从小就像个老头儿。起初是情势所迫。特兰西多·阿里萨把他父亲决定扔进垃圾堆的衣服拆开后给他缝成新衣。于是，他不得不穿着礼服去上小学，一坐下，衣服便拖到地上；他头上戴的也是政府官员的那种帽子，尽管为了让它小一点，加了一圈塞满棉花的里衬，但还是连耳朵都盖上了。此外，他从五岁起就戴上了近视眼镜，而且头发和母亲一样，是印第安人的那种质地，粗硬得像马鬃，所以，从外表根本看不出他其实长什么样子。幸运的是，由于连年内战，政府混乱不堪，学校的入学标准不像从前那样严格了，在公立学校里，各种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学生都有。尚未长大的孩子们走进课堂，身上却散发着街垒战的火药味，穿着不知在哪次战斗中靠枪子儿得来的叛军制服，佩戴着他们的徽章，腰带上还明目张胆地别着与他们军衔相符的武器。课间休息时，随便一点争执就会让孩子们拔枪相向。如果老师在考试中给了他们低分，他们甚至用枪来威胁。拉萨耶学校的一个三年级学生，退伍的民兵上校，就一枪打死了修会会长胡安·埃雷米塔修士，只因为他在教理问答课上说，上帝是保守党的正式成员。

另一方面，那些遭遇了不幸的名门望族的孩子穿得就像古时的亲王，特别穷的孩子则光着脚。在这些来自四面八方、打扮得千奇百怪的学生之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无论如何都要算在最奇怪之列，尽管如此，他却并不十分引人注意。他听到的最难听的话，是街上的人冲他喊："穷光蛋，丑八怪，一切希望全落空。"但不管怎样，那身因生

活所迫而穿上的衣服，从那时起，及至他整个一生，都是与他那神秘的气质和忧郁的性格最为相配的。当他在CFC第一次被委以重任时，他让人为他量身定做了和父亲那件同样款式的衣服。他像怀念一位老人一样怀念着死于三十三岁的父亲，那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年龄：基督罹难时也是这个岁数。所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上去始终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得多，以至于口无遮拦的布里希达·苏莱塔，他的一个不假思索地说出真相的露水情人，从第一天起便对他说，她更喜欢他脱掉衣服后的样子，因为光着身子的他仿佛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然而，他永远也不知道如何弥补这一点：首先，他个人的喜好不允许他穿成别的样子；其次，那个时候二十岁的人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将自己打扮得更年轻，除非把短裤和见习水手帽再次从衣橱里翻出来；再者，他也不可能摆脱那个时代人们对老年所持的看法。因此，当他看见费尔明娜·达萨在电影院出口险些绊倒时，不禁打了个寒战，一个可怕的想法晴天霹雳般击中了他，即在这场血腥的爱情战争中，婊子养的死神很可能会不可逆转地夺去他的胜利。

到那时为止，他经历过的最大战斗是同自己的秃顶进行的，他一直顽强抗争，却最终落得惨败的结局。从看见缠在梳子上的最初几根头发开始，他便意识到自己被打入了地狱，这种痛苦是任何一个无此遭遇的人无法想象的。为了保住迅速荒芜的头顶的每一寸毛发，没有什么发蜡和生发水他没有试过，也没有什么信仰他没有求助过，更没有什么代价他没有付出过。他背下了《布里斯托年鉴》中关于农业的全部条文，因为他听说头发的生长和庄稼的收获周期有着直接的联系。他还放弃了自己一直光顾的理发师，因为这人是个实打实的光头，而换了一个新来的只在新月那几天理发的外乡理发师。可这位新理发师才刚刚证明了自己手艺不错，就被发现是安的列斯群岛好几家警察局通缉的强奸幼女犯，被戴上镣铐拖走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那个时期加勒比地区所有报纸上关于医治秃顶的广告都剪了下来。那些报纸通常刊登着同一个人的两张照片，第一张上，头秃得像个甜瓜，而第二张上头发比雄狮还浓密：这便是使用某种安全可靠的药水之前和之后的区别。六年里，他试验了一百七十二种药物，并践行了药瓶商标上写的所有其他辅助方法，而唯一的收获，是其中的一种药使他患上了头部湿疹，又痒又臭，马提尼克岛的教外苦行僧们称之为北极光癣，因为它会在黑暗中发出一种磷光。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他求助于在公共市场上售卖的所有印第安草药和在“代笔人门廊”出售的一切神奇特效药，包括东方汤药，可当他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时，头顶已经和一个削发僧人无异了。新世纪元年，千日战争把国家置于血泊中时，城里来了个意大利人，他会按照尺寸用真头发制作假发套，价格不菲，但只保质三个月，逾期概不负责。尽管如此，绝大部分有支付能力的谢顶者都愿意前往一试。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头一批尝试的人之一。他试戴了一个和自己原来的头发极为相似的假发套，以至于担心在自己情绪变化时那头发会竖起来。但他最终还是对这个把死人头发戴在活人头上的想法无法苟同。他唯一的安慰是如此风卷残云的谢顶让他不用眼瞅着自己的头发变白。一天，内河码头上一个欢快的醉汉看见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上前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拥抱了他，并在码头工人的起哄声中摘掉他的帽子，给他的脑袋来了响亮的一吻。

“神圣的秃头！”他喊道。

那天晚上，四十八岁的他让人把自己两鬓和后脑勺上仅剩的几根毛发全部剃掉，彻彻底底接受了全秃的命运。他甚至在每天早上洗澡之前，把下巴和脸上所有长出胡楂的地方都涂满肥皂沫，用一把剃刀把它们刮得像小孩的屁股一样光滑。以前，即使在办公室里他也从不

摘掉帽子，因为秃顶给他一种赤身裸体的感觉，让他觉得有失体面。但当他彻底接受秃头后，便把它归为男性的美德之一，其实他早就听人这样说过，却一直视其为秃头们的自欺欺人而予以蔑视。再后来，他又养成了新习惯，把右侧仅有的几根头发留长，让它跨过整个头顶，从此，他一直沿用这个办法。但尽管这样，他还是戴着帽子，而且总戴那个参加葬礼似的款式，即便当地已流行起一种被称为“塔尔塔里塔帽”的窄边草帽，他也依然不改旧貌。

然而，他失去牙齿却并非因为自然之灾，而是源于一个江湖牙医试图根治一次普通感染时的鲁莽举动。对脚踏牙钻的恐惧使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直不敢去看牙医，尽管他常常牙痛，甚至有时无法忍受。听到他在隔壁房间整夜无助地呻吟，母亲吓坏了，因为她觉得这声音跟儿子昔日某时的呻吟声如出一辙，而那原本早已消散在她记忆的迷雾之中了。但当她让儿子张开嘴，好看看爱情究竟伤到了他哪个地方时，却发现他是因牙龈化脓而痛苦不堪。

莱昂十二叔叔让他去找弗朗西斯·阿多奈医生。这是个打着绑腿、穿着马裤的高大黑人。他把一整套牙医器械都放在工头用的褡裢里，随身背着，穿梭于内河船之间，看上去倒更像一个令沿岸村镇都害怕的旅行代办人。他只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嘴里看了一眼，就认定他的牙齿全部要拔光，甚至包括那几颗好牙，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避免再次遭罪。与对秃顶的忧心相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这种野蛮的治疗方法没有产生任何顾虑，除了很自然地略微担心不用麻醉难免会有些血腥。装假牙的主意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快，这首先是因为他童年的一段难忘回忆：一个集市上的魔术师将满口牙齿取下，让它们自己在桌子上说话。其次，这可以结束从小就折磨他的牙痛，说起来，那种滋味就和爱情的痛苦一样强烈残忍。在他看来，这和秃顶不一样，并不

是衰老的一次狡猾袭击，因为他相信，虽然如此一来他的呼吸会有一股硫化橡胶的辛辣味，但矫形后的微笑会让他的外表看上去更有光彩。因此，他毫无抵抗地向阿多奈医生那把烧红的钳子屈服了，并以负重耐劳的驴子的坚韧意志经受了恢复期的考验。

莱昂十二叔叔亲自过问了手术细节，就好像是要给他动手术似的。他对假牙有着特殊的兴趣，这种兴趣产生于他沿马格达莱纳河航行最初几年，也可以说是他对美声唱法[2]的痴迷所造成的苦果。一个满月的夜晚，当船驶入加马拉港时，他和一位德国土地测量员打赌说，他只要站在船长室的栏杆处唱上一首那不勒斯浪漫曲，就能把森林里的动物都惊醒。他好险才赢了这一注。在河上漆黑的夜色中，只听见草鹭在沼泽里扇动着翅膀，鳄鱼甩着尾巴，鲱鱼惊恐地跳到陆地上。然而，当他唱到最高的一个音符，大家正担心曲调之高亢会让歌手的动脉迸裂时，他的假牙随着最后吐出的一口气飞了出去，沉入水中。

为了给他另配一副应急的假牙，轮船不得不在特内里费港耽搁了三天。新假牙做得完美极了。可返航时，莱昂十二叔叔又试图向船长解释他的上一副假牙是如何弄丢的。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森林中灼热的空气，放开嗓子唱出了他所能唱的最高音，并把这个音尽可能地延长，试图把那些一边晒太阳一边不眨眼地看着轮船驶过的鳄鱼吓跑。结果，新的假牙又沉入了河水。那以后，他配了很多副假牙，把它们放在家里的各个地方以及办公桌的抽屉里，公司的三条船上也各有一副。此外，他在外用餐时也会带上一副备用，就放在衣兜里一个装咳嗽药片的小盒中，因为他曾经在某天中午野餐时，为了吃煎猪皮而把假牙弄坏了。由于担心侄子也会有类似遭遇，莱昂十二叔叔让阿多奈医生一次性给他做了两副假牙：一副材质便宜，平时在办公室里用；

另一副则是为星期日和节日准备的，在微笑时总会露出的那第一颗槽牙上还薄薄地涂了点儿金子，看上去更为逼真。终于，在一个圣枝主日[3]，当节日的钟声带来一片喧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走到了街上，那完美无瑕的微笑几乎让他觉得是另一个人取代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这件事发生在他母亲去世，家中只剩他孤身一人的时期。他的家是一个绝佳的爱巢，尤其适合他的爱情方式，因为虽然街道名为窗户街，让人联想到一扇扇窗子的薄纱帘后藏着无数双眼睛，但其实是一条幽静的巷子。可问题是，这房子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费尔明娜·达萨幸福，也只为让她幸福。因此，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斩获最丰的那些年月，他宁可失掉很多机会，也不愿用其他爱情来玷污他的家。幸运的是，他在CFC每向上爬一级，就意味着获得某些新的特权，尤其是那些秘密特权。对他来说，其中最有用的一项，就是与门房串通好后，能够在晚上、星期日以及节日里使用办公室。有一次，就在他已当上公司的首席副董事长时，他正与一个星期日值班的姑娘匆忙做爱——他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姑娘骑在他身上——门突然开了，莱昂十二叔叔伸进头来，像走错了办公室似的，从眼镜上方看着惊呆了的侄儿。“见鬼！”叔叔毫无异色地说，“跟你爸真是一路货色！”在重新把门关上之前，他把目光落在空处，说：

“您，小姐，不必担心，请继续。我以我的荣誉向您起誓，我没有看见您的脸。”

没有人再提起过这件事，但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办公室变得无法工作了。星期一，电工们蜂拥而至，要在天花板上装一个叶式吊扇。锁匠们也没有事先通知就到了，吵吵闹闹像打仗

似的，在门上装了把锁，可以从里面把门锁上。木匠们量了尺寸，却没有说要做什么。窗帘装饰工带来印花装饰布，看看是否与墙壁的颜色匹配。再接下来一个星期，他们从窗户外塞进来一个印着酒神节花色的双人大沙发，因为从门口实在搬不进来。这些人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干起活来，但又并非肆意捣乱，对任何人提出的抗议，他们只有一句回答："这是董事会的命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直到最后也没弄明白，这些干涉行动究竟是叔叔出于对他的好意关心，还是在用特有的方式让他检讨自己的胡作非为。他始终没能看出真相，事实上，莱昂十二叔叔是在鼓励他，因为已经有一些传言传到他那里，说他侄子的兴趣有别于大部分男人，这让他烦恼无比，担心会妨碍侄子继承自己的衣钵。

与哥哥不同，莱昂十二·罗阿依萨维持了六十年稳定的夫妻生活，他星期日从不工作，并以此为荣。他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想把他们每一个都培养成自己帝国的接班人，但生活却将一系列意外摆在他面前，这些偶然在当时的小说里司空见惯，在现实生活中却令人难以置信：四个儿子随着职位步步高升，竟一个接一个地死掉了，而女儿则对河运事业毫无兴趣，宁愿从五十米高的窗子里看着哈德逊河上的船了此余生。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不乏有人把传言当真，认为外表阴郁、手里拿着吸血鬼雨伞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肯定是做了什么，才导致这一件件意外发生。

当叔叔遵照医嘱不情愿地退休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便开始甘愿牺牲他的星期日爱情，乘坐城中最早的一辆汽车，到叔叔的乡间别墅去陪他。汽车的起动摇柄反弹时力量很大，竟然打断了第一个司机的整条胳臂。他和叔叔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老头儿躺在用丝线绣着他名字的吊床上，远离一切，背对大海。那是一座古老的奴隶庄园，每

天下午，从种满百合的露台上，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山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叔叔的谈话向来难以脱离河运的话题，在那些漫长的下午也不例外，而死神一直是一位冷眼旁观的隐形客人。长久以来，莱昂十二叔叔最担心的事之一，就是河运公司落到一些同欧洲财团有联系的内陆企业主手中。“这一向是门粗人的生意，”他说，“要是被那些纨绔子弟拿去，他们会拱手奉还给德国人。”他的担心与他一直以来的政治信条连贯一致，有时即使场合不合适，他也喜欢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信条。

“我就快满一百岁了，我看到一切都在变，就连宇宙中星辰的位置都在变，可就是没看到这个国家有什么改变。”他说，“这里每隔三个月就会有新的宪法，新的法律，新的战争，但我们仍旧处在殖民时期。”

他的两位兄长都是共济会成员，将一切罪恶归因于联邦制的失败，对此，他总是反驳他们说：“千日战争在二十三年前，也就是七六年的战争中就失败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于政治几乎冷漠到极致，听叔叔越来越频繁的长篇大论，就像听大海的涛声。但对于公司政策，他是叔叔坚定的反对者。在他看来，河运事业一直处在灾难的边缘，要想根治它的落后，只有主动放弃对蒸汽船的垄断，虽然这项垄断权是国会授予加勒比河运公司的，为期九十九年零一天。叔叔抗议说：“这些思想肯定都是我那位满脑子无政府主义幻想的同名人莱昂娜塞到你脑瓜里的。”但他只说对了一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以德国海军准将胡安·B.埃尔勃斯为前车之鉴，此人无节制的野心毁掉了他出众的智慧。可叔叔却认为埃尔勃斯的失败并非因为他的特权，而是因为他同时做出了太多不切实际的承诺，就好像要把全国土地的责任都扛在肩上：他包揽了河流的通航、港口设施、陆地的交通枢纽和交

通工具。除此之外，叔叔接着说，西蒙·玻利瓦尔总统的强烈反对也是不容小觑的障碍。

大部分股东把这种争论视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老头儿的固执在他们看来是很自然的，倒不是因为像大家随口常说的那样，衰老使他不如当初那么高瞻远瞩了，而是因为放弃垄断对他来说，无异于把他的兄弟们在一场历史性的战役中缴获来的战利品扔进垃圾堆，那可是他们在英雄时代赤手空拳跟整个世界的强大对手作战得来的。因此，他大权在握的时候，谁都没有反对过，而且他握得那么紧，谁也不可能在它们合法消亡前触动它们。然而，突然有一天，就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已经预备在庄园下午的讨论中缴械投降时，莱昂十二叔叔同意放弃百年的特权，唯一一个有关荣誉的附加条件就是不要在他死前这样做。

这是他对公司最后的指示。他从此再也不提生意上的事，甚至不允许别人向他求教。他那头具有皇家风范的漂亮鬈发没有掉下一绺，他的睿智也没有减弱分毫，但他竭尽一切努力不让任何可能同情他的人见到他。他坐在露台上那把缓缓摇动的维也纳摇椅中，看着山顶终年的积雪，打发时日。旁边的小桌上放着女仆随时为他更替的一壶热黑咖啡和一杯小苏打水，里面浸着两副假牙，他在接待客人时才戴上。他只见很少的几位朋友，而且只和他们谈内河航运开始以前很久的遥远往事。不过，他也有一个新的话题：希望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结婚。他对他说起过好几次，而且总是以同样的方式。

“如果我年轻五十岁，”他说，“我就和我的同名人莱昂娜结婚。我想象不出还有比她更好的妻子。”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想到自己多年来的努力很可能因为这个意想不到的状况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不禁浑身发抖。他宁愿放弃一切、丢开一切，宁愿死，也不愿有负于费尔明娜·达萨。幸而莱昂十二叔叔没有坚持。满九十二岁时，他指定侄子为自己唯一的继承人，进而最终退出了公司。

六个月后，经股东们一致同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任命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就职那天，喝过香槟酒之后，引退的老雄狮请求大家原谅他坐在摇椅上说话，然后即兴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讲话，但与其说那是演讲，倒不如说是一曲为自己写的挽歌。他说，他这一生由两件上天安排的事开始和结束。一是解放者在奔赴死亡的不幸旅途中，曾在图尔瓦科镇抢过他。二是他扫清了命运给他设置的所有障碍，终于找到一个配得上他公司的继承人。最后，为了使这幕剧少一点戏剧性，他总结说：

“我这一生唯一的憾事，就是我在那么多葬礼上唱过歌，却不能为自己的葬礼唱一回。”

典礼结束时，他理所当然地高歌了一曲，唱的是《托斯卡》中的咏叹调《向生命告别》。清唱，没有伴奏，就像他最喜欢的那样，而他的声音依旧坚定有力。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十分感动，但只在他道谢时微微颤抖的声音中显露出这一点。他已经完成了生活中所有能想和能做的事，到达了人生的巅峰，而这一切都源自那个刻骨铭心的决心，那就是要活着，健康地活着，直到自己的命运得到费尔明娜·达萨庇护的那一刻。

尽管如此，在莱昂娜·卡西亚尼为他举办的晚会上，陪伴他的并不只是对费尔明娜·达萨的回忆，而是对所有女人的回忆：既有那些已经

在墓地里长眠的女人，她们透过他种在她们坟上的玫瑰思念着他；也有那些仍和丈夫同枕共眠的女人，她们丈夫头上的犄角[4]在月光下闪着金光。只因缺少那一个女人，他便希望同时和所有女人在一起，事实是，每当他感到恐惧惊慌，他便格外地需要她们。因此，即使在他最艰难的时期，最糟糕的时刻，他也始终和这许多年来数不清的情人们保持着哪怕最微弱的联系：他始终追随着她们的踪迹。

就这样，那天晚上他想起了罗萨尔芭，他最早的情人，那个把他的童贞当作战利品带走的女人。对她的记忆依旧像当初第一天那样让他痛心。他只要一合上眼，就看见她穿着麦斯林纱裙，戴着长绸带的帽子，在甲板上摇着装孩子的鸟笼。多年来，他曾好几次收拾好一切准备去找她，尽管既不知道她在哪里，也不知道她姓什么，甚至不知道要找的人究竟是不是她，但他确信能在兰花丛中的某个地方找到她。每一次，都是在船即将撤掉踏板的最后一刻，由于某种现实原因，或是他一念间的动摇，旅行又被推迟了：永远都是某个与费尔明娜·达萨有关的理由。

他想起了拿撒勒的寡妇，唯一亵渎过他母亲在窗户街的家的女人，虽然当初并不是他，而是特兰西多·阿里萨自己敞开门让她进去的。尽管她在床第间表现不佳，但他对她的理解比对其他任何女人都多，因为她是唯一一个温柔得可与费尔明娜·达萨相比的人。但她那难以驯服的野猫秉性，更甚于她那股温柔的力量，这使得他们注定无法忠于对方。然而，他们仍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断断续续的情人关系，这还得感谢他们信守的那句火枪手的座右铭：*可以不忠，但不可背信弃义*。此外，她还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唯一为之出头露面的女人：当他得知她已去世，需要靠施舍下葬时，他出钱安葬了她，并独自出席了葬礼。

他也想起了他爱过的其他寡妇。普鲁登西娅·皮特雷，他的情人中尚活在世上最老的一位，人们都叫她“二夫寡妇”，因为她曾两次守寡。还有另一个普鲁登西娅，阿雷利亚诺的遗孀，一个多情的女人。她扯下他衣服上的扣子，只为了让他在她家里多留一会儿，等她重新缝上。他还想起了何塞法，苏尼加的遗孀，她疯狂地爱他，即便不能让他属于自己，也不愿让他属于别人，差点儿在他睡梦中用修枝的大剪刀把他那陀螺似的玩意儿剪掉。

他想起了安赫莱斯·阿尔法洛。她的出现虽然短暂，却是所有女人中最让他喜欢的。她来本市是为了在音乐学校教六个月的弦乐课。在月光皎洁的夜晚，她像初来到这世上时一样赤裸着身子，和他一起坐在她家的屋顶天台上，用大提琴拉起一组最美的旋律，琴声在她金色的大腿间变成了男人的声音。从第一个月夜开始，他们就像如狼似虎的新手一般做爱，撕心裂肺。但是，安赫莱斯·阿尔法洛终于像来时一样走了，带着她女性的温柔和那把淫荡的大提琴，乘一艘挂着遗忘之旗的远洋轮船一去不返。在月光下的天台上，她唯一留下的是一个挥着白手绢告别的姿势，那手绢仿似一只地平线上的孤凄白鸽，如花会上的诗句中描写的一样。和她在一起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学会了一件他其实已在无意中多次体验过的事：可以同时爱上几个人，并带着同样的痛苦爱着她们所有人，不背叛其中任何一个。他孤身一人置于码头的人群中，突然发狠似的对自己说：“人心的房间比婊子旅馆里的客房还多。”告别的痛苦使他热泪盈眶。然而，轮船才刚消失在地平线上，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思念又占据了他全部的空间。

他想起了安德雷娅·瓦隆。上一个星期他都是在她家门前度过的，但浴室窗子里透出的橙黄色灯光提醒他不能进去：已经有人捷足先登。有人，但不知是男是女，因为安德雷娅·瓦隆的爱混乱不堪，她并

不在意这类细枝末节。在他名单上的所有女人中，她是唯一一个靠出卖肉体为生的，但她随心所欲地掌管着自己的身体，并没有老鸨。在最好的年景里，她曾做出一番传奇的地下交际花事业，无愧于她在战时获得的封号：大众圣母。她曾使省长和海军上将为之倾倒，也曾有些军界要人和文化名流趴在她肩头哭泣，他们个个都自认为卓荦不凡，有些的确如此，但有些却名不副实。不过，有一件事倒千真万确，拉法埃尔·雷耶斯总统曾在访问本城期间，利用两场会晤的间歇，用匆匆半小时授予了她一份终身抚恤金，以表彰她对财政部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虽然她并未在那里工作过一天。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自己的欢愉当作礼品分发给众人。她的不检点行为确实众所周知，但谁也无法拿出不利于她的确凿证据来，因为她那些身份显赫的同谋们像保护自己性命一样保护着她，他们知道一旦出现丑闻，损失最为惨重的将是他们，而不是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为她亵渎了自己不付钱的神圣原则，她也为他破了自己连丈夫也不免费的老规矩。他们以象征性的价钱成交，一次只收一比索，但她不亲手接，他也不亲手给，而是把钱放在一个小猪存钱罐里，攒够一定数量后，就拿到“代笔人门廊”去随便买一件别致的外国小玩意儿。正是她使得他在便秘时期使用灌肠剂时有了不同的快感，并说服了他与她分享灌肠剂，在他们疯狂的下午时光一起使用，试图在爱之中创造出更多的爱来。

在这许许多多的冒险幽会中，他认为唯有一个女人让他幸运地尝到了一滴苦涩的滋味，那就是令人难以捉摸的萨拉·诺列加。她在圣牧羊女疯人院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整日不停地背诵淫秽的旧诗句，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把她隔离，以免她让其他疯女人更疯。然而，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接管了CFC的全部重任后，就没有太多时间，也没有太多心情去找人代替费尔明娜·达萨了：他知道，她是不可取代的。渐渐地，他落入了常规，只去看那些他已经结交的女人，只要她们还能为

他提供欢愉，只要他还有能力，只要她们还活着，他就和她们做爱。而到圣神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只剩下一个情妇了，只有一个。她刚刚年满十四岁，具备一切能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爱得发狂的特质，这是到那时为止其他任何女人都没能做到的。

她叫阿美利加·维库尼亚，两年前从父亲港的海滨来到这里。她的家人请求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当她的校外监护人，并称二人间有亲戚关系。家里人送她来时，她身上带着一份供她接受高等师范教育的政府奖学金，还有铺盖卷和一只像洋娃娃用的马口铁皮小箱。从她穿着白色短靴、扎着金色辫子从船上走下来的那一刻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强烈地预感到，他们将在一起度过无数个星期日午后的小憩时光。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还是个孩子，锯齿般的牙齿，膝盖像小学生的那样光滑，但他即刻就隐约地预见到她将很快成为哪一种女人。在漫长的一年中，他为自己精心地培育着她，星期六带她去看马戏，星期日带她去公园，吃冰激凌，伴她度过一个个童年般纯真的黄昏，赢得了她的信任和喜爱。他以慈祥祖父般的温和，狡诈地牵着她的手，逐渐把她领向自己的地下屠场。对她来说，这一切都是在顷刻间发生的：天堂的大门为她敞开了。花蕾瞬时绽放，令她漂浮于幸福的净界之中。这对她的学业是一种有效激励，为了不失去周末离校的机会，她始终保持着班上第一名的成绩。而对他来说，这是他暮年港湾中最温暖的角落。在这么多年一次次精心算计的爱情之后，天真无邪的生涩味道别有一番新鲜的堕落的快乐。

两人契合之极。她表现的就是她本来的样子，一个在一位饱经风霜、对一切司空见惯的可敬男人的引领下，准备好去了解生活的姑娘；而他则有意识地扮演起他原本最怕成为的角色：一位年老的恋

人。他从没有把她和费尔明娜·达萨比较过，尽管两人的相似之处一目了然，不止是年龄、校服、发辫和欢快奔放的走路方式，就连那高傲任性的性格都十分相像。更有甚者，曾经爱情于他最大的诱惑便是找到一个费尔明娜·达萨的替代品，可如今这想法竟被彻底地抹掉了。他喜欢她本来的样子，而且最终，他怀着一份人到暮年的狂热欢欣，爱上了她本来的样子。她是唯一一个他倍加小心地防止其受孕的女人。幽会了六次以后，对两人来说，都再没有任何美梦可以和星期日的下午相比。

他是唯一有权把她从寄宿学校里接出来的人。他坐着CFC的六缸哈德逊汽车去找她。有时，在没有太阳的下午，他便降下车篷带她去海滩兜风。他戴着他那顶忧郁的帽子，她则笑得前仰后合，用两只手护住与校服配套的水手帽，以免它被风吹跑。有人跟她说，除非必要，否则不要跟她的校外监护人走在一起，不要吃他尝过的任何东西，也不要离他的呼吸太近，因为衰老是会传染的。可她毫不在乎。两人全然不理会别人的眼光，毕竟，他们的亲戚关系尽人皆知，更何况年龄相差甚远，这让他们避免了一切猜疑。

圣神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下午四点，丧钟敲响的时候，他们刚刚做完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得不竭力压制内心的惊慌。在他年轻的时候，丧钟仪式是包含在葬礼的价格中的，只有那些一贫如洗的人才会负担不起。但在最近的一次战争之后，保守党政府在世纪之交巩固了殖民时期的习俗，葬礼变得极其昂贵，只有最富有的人才付得起费用。大主教但丁·德鲁纳死的时候，全省的钟没有停歇地敲了整整九天九夜，公众惊恐万分，以至于他的继任者把丧钟仪式从葬礼中单列出来，只有最显赫的死者才有权享受。所以，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圣神降临节的下午四点听见大教堂响起丧钟时，他仿佛觉得早已逝去

的青年时期的幽灵又来拜访他了。他完全没有想到，这竟是自从在大弥撒的出口处看见怀有六个月身孕的费尔明娜·达萨的那个星期日起，多年以来他一直满心期待的丧钟。

“见鬼！”他在昏暗中说道，“肯定是哪条大鱼，才会让大教堂敲起丧钟来。”

全身赤裸的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刚刚醒来。

“应该是因为圣神降临吧。”她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教堂的事务丝毫也不在行，自从跟一个教他拉小提琴的德国人一起在唱诗班拉过一段时间琴之后，他便再也没去望过弥撒。那个德国人还教给他发电报的学问，但关于他的去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得到过任何确切的消息。不过，他确信无疑，这钟声不是为圣神降临而敲响的。他知道，城中确实有一场葬礼。那天早上，一个加勒比流亡者委员会的代表到他家，通知他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清晨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去世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虽然与他交情不深，却跟其他很多加勒比流亡者是朋友，常被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公共活动，尤其是葬礼。但他敢肯定，丧钟不是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而敲的，他是个不信教的军人，还是个顽固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何况，他是自杀的。

“不！”他说，“这样的丧钟只可能是为省长以上的人物敲的。”

阳光从没有关严的百叶窗里照进来，阿美利加·维库尼亚苍白的身体上映出一道道虎皮似的斑纹。她还远没有到能够想到死亡的年龄。午饭后，他们做了爱，此时正处在午睡后似醒非醒的昏沉中，两人赤裸着身体，躺在叶式吊扇下，吊扇的嗡嗡声并不足以掩盖那一只只在

晒得滚烫的锌皮屋顶上走动的兀鹫噼里啪啦的脚步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爱她，就像爱其他偶然出现在他漫长生命中的女人，但对她的爱却带有更多的辛酸，因为他确信，等她从高等学校毕业，他早已衰老而死。

这个房间更像船上的一个舱室，墙壁上嵌的木板条也给人轮船的感觉，一层层地刷过很多次漆。尽管床上方挂着吊扇，但下午四点时，由于金属屋顶的反射，这里比河道上的船舱要热得多。与其说这是间正式的卧室，不如说是间陆地舱室，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命人在他的CFC办公室后面建的，没有别的目的和借口，不过就是为了给他的暮年爱情提供一个不错的巢穴。平日里，码头工人吵吵闹闹，河道港口的吊车震耳欲聋，轮船的汽笛声也响彻云霄，在这里很难睡得着觉。但对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来说，这里是星期日的天堂。

圣神降临节那天，他们本想一起待到她必须回寄宿学校的时候，也就是《三钟经》祈祷前的五分钟，但丧钟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突然想起他许诺过去参加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葬礼，于是他比平时更快地穿好衣服。而在此之前，他像往常一样，先给女孩编好做爱前他亲手散开的辫子，然后把她抱到桌上，为她系上校鞋的鞋带，她自己总是系不好。他毫无邪念地帮她，而她也配合他完成这些事，就好像是一种义务：从最早的幽会起，两人便都失去了对年龄的意识，互相信任，就像一对一生中互相隐瞒了太多事情，以至于彼此间已无话可说的夫妻。

因为是假日，办公室的门都关着，漆黑一片。空无一人的码头上只停着一艘锅炉已经熄灭的船。天气闷热，预示着今年的又一场雨就要降临，然而，此刻空气纯净，加之星期日的港口格外宁静，这一切又似乎使人觉得这是个温和的月份。比起昏暗的舱室，这外部的世界

更加酷热难耐，丧钟也更让人悲伤，虽然还是不知它为谁而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女孩走下台阶，来到遍地硝石的院中，这里原是西班牙人贩卖黑奴的港口，至今仍留有磅秤的残件，以及现已生锈的曾在奴隶交易中使用的各种铁器。汽车正在仓库的阴凉处候着，他们在座位上坐好之后，才把伏在方向盘上睡着了的司机叫醒。车从鸡笼式铁丝网围着的仓库后面绕了一圈，然后穿过灵魂湾老市场的空地。那里有几个几乎全裸的成年人在玩球。在一阵飞扬的灼热尘土中，汽车驶出了内河港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十分肯定丧钟不是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而敲，但这一直响个不停的钟声让他心中疑惑。他把手搭在司机肩上，在他耳边大声问丧钟是为谁敲的。

“是那个医生，留山羊胡子的那个。”司机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用想就明白司机说的是谁。可当司机告诉他医生是怎么死的，他瞬间涌起的希望就又破灭了，因为他觉得那不像是真的。通常，一个人的死法最能彰显其为人，可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死法与他想象中的那个人更不相称了。尽管看起来荒唐，但那的确就是他：本城最高寿、医术也最高明的医生，此外，还由于其他诸多功绩，位列本城最杰出的人士之一。他八十一岁，试图去捉一只鹦鹉，结果从芒果树杈上摔下来，跌断脊椎而亡。

从费尔明娜·达萨结婚时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基于同一个希望，那就是有朝一日能听到这个消息。然而，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他却并不像他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中预见的那样，因胜利的激动而颤抖万分，相反，他颤抖是因为被一种恐惧感所包围：他以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清醒意识到，如果他死了，丧钟也会这样为他而敲。

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坐在他旁边的阿美利加·维库尼亚被他苍白的脸色吓坏了，问他出了什么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用自己冰冷的手握住了她的手。

“唉，我的孩子，”他叹了口气，“我得再活五十年才能把这一切讲给你听。”

他忘记了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葬礼。他把女孩放在了寄宿学校的大门口，匆忙向她允诺说下星期六再来接她。接着，他便命令司机送他到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家里去。他在附近的街道上看到蜂拥而至的汽车和出租马车，房前也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的宾客们在庆祝宴会的高潮时忽闻噩耗，乱哄哄地赶了过来。家里被挤得水泄不通，挪动一下都不容易，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愣是挤出了一条道来，走到主卧室门前。他踮起脚尖，从堵在门口的一群人的头顶望去，只见胡维纳尔·乌尔比诺躺在双人床上，正在蹚过屈辱的死亡之潭，就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第一次听说他起，就希望看到的样子。木匠刚刚为棺材量过尺寸。在他身旁，费尔明娜·达萨还穿着为参加午宴而换上的如同新婚老妇似的衣服，若有所思，神色黯然。

自从青年时代就完全献身于这项胆大妄为的爱情事业以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连这一刻最微小的细节都预想到了。为了她，他不太计较手段地得到了名誉和财富，为了她，他细心保护着自己的健康和外表，其严谨程度会让同时代的其他男人觉得缺乏男子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为了什么人或事物像他这样等待：片刻也不曾气馁。终于证实了乌尔比诺医生的死，这为他注入了足够的勇气，在费尔明娜·达萨成为寡妇的第一个晚上，他便向她重申了他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他心里并不否认，那是个轻率的举动，丝毫没有顾及时间和方式，但他如此匆忙是因为害怕机会失去就永不再来。他真心希望能以一种不这么莽撞的方式，而且他也的确曾设想过很多种可能，但命运不容他有别的选择。他从那个服丧的家里走出来，内心痛苦万分，因为他把她留在了和自己一样的激动状态之中。但同时他又无能为力，无法阻止事情发生，因为他感觉到，这个残酷的夜晚是从一开始就铭刻在两人命运之中的。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他不断绝望地问自己，没有他在身边的费尔明娜·达萨会在哪里，在想些什么，他把这样一个沉重的负担交到她手中，在余下的岁月里她会怎么做。他遭受了便秘的折磨，肚子胀得像一面鼓，不得不求助于缓和剂，这可并不比灌肠剂舒服。和新的疾病相比，他更能忍受这些老毛病，因为从年轻时起他就了解它们了。可此时，所有的老毛病却一齐向他袭来。休息一周之后，星期三他出现在办公室里。莱昂娜·卡西亚尼看到他竟苍白和邋遢到如此地步，不禁大惊失色。但他让她平静下来：不过是像平时一样，又失眠了。他再一次咬紧牙关，才没有让真相从他伤痕累累的心中滑落出来。大雨天，没有一丝阳光好让他静心思考。他在恍惚中又度过了一个星期，干什么都无法集中精神，吃不好，睡得更糟，一心寻找能给他指明获救之路的标记。但从星期五开始，一种平和的心境无缘无故地征服了他，他把这理解为一个征兆，预示着不再会发生什么新的事情了，他一生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而且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一切都已走到尽头。然而星期一，他回到窗户街的家中，竟发现有一封信漂在门厅的积水里。他立即认出了湿漉漉的信封上那高傲不屈的字体，生活中的无数波澜并没能改变它。他甚至相信自己闻到了凋谢的栀子花的夜间芬芳，因为在惊喜的第一瞬间，他

的心就把一切告诉了他：这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刻也无法平静地等待的，那封信。

---

[1] 原文为法语。

[2] 原文为意大利语。

[3] 圣枝主日，天主教节日，是复活节前的星期天，标志着复活节圣周的开始。

[4] 西班牙语中，称一个男人头上长犄角，暗指其妻子不忠。

费尔明娜·达萨没有想到，她在一股无名邪火的驱使下写的那封信，竟会被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视作情书。信中，她倾泻了所有她能倾泻的愤怒，说了最残忍的话，以及最伤人乃至不公的诋毁。然而，在她看来，这些跟她所受的巨大侮辱相比，仍旧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她痛苦地驱除心中魔鬼的最后努力，试图以此适应她的新处境。她想找回自我，重获半个世纪奴仆般生活中被迫放弃的一切。那种生活无疑曾使她幸福，然而丈夫一死，她甚至无法找到自我的一点点痕迹。她像是别人家中的一个幽灵，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一夜之间变得空阔而孤寂的房子里，不断痛苦地自问，究竟谁是亡者：是死去的丈夫，还是她这个留下来的人。

她无法摆脱隐藏在心底的怨恨，怨丈夫将她孤零零地遗弃在这汪洋大海之中。他的一切都会让她潸然落泪：枕头下的睡衣；那双在她看来只有病人才会穿的平底拖鞋；记忆里，她在床边梳头准备睡觉时，镜子深处的他脱掉衣服的情景；还有他皮肤的气味，在他死后还久久地留在她的皮肤上。无论正在做什么，她都可能会中途停下来，拍拍自己的额头，因为突然想起有什么事忘记告诉他了。她的脑子里每时每刻都会涌现出无数个日常问题，只有他才能回答。他曾经说过一件令她匪夷所思的事情：截肢后，患者仍能感受到已不存在的那条腿上的疼痛、痉挛和搔痒。这正如她失去他以后的感受，虽然他已经不在了，她却仍觉得他就在那里。

当她在成为寡妇后的第一个早晨醒来，闭着眼睛在床上翻了个身，想找一个更舒服的姿势继续睡下去，就在这一刻，她才真正意识到他死了。也只有在这时，她才察觉到，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没有在家过夜。另一个触动她的情境是在餐桌前，但不是因为感到孤单，尽管事实的确如此，而是因为她奇怪地相信，自己正在同某个已不存在的人一起用餐。直到她女儿奥菲利娅跟丈夫带着他们的三个女儿一起从新奥尔良来了以后，她才再次来到餐桌前吃饭，但也没用以前一直用的那张桌子，而是换了一张她让人放在走廊里、小一些的临时餐桌。在此之前，她没有正经吃过一顿饭。饿的时候，她就随时走进厨房，把叉子伸进锅里，有什么就吃点什么，也并不用盘子，而是站在火炉前，边吃边同女佣们说说话，她们是唯一能让她感到轻松一些、好过一些的人。然而，无论怎样努力，她死去的丈夫都仿佛无处不在：不论她去哪儿，从哪里走过，也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会碰到某件他的东西，让她又想起他来。尽管在她看来，悲痛是忠贞的，也是合理的，但她还是希望尽一切可能不在痛苦中沉迷下去。于是，她做出一个极端的决定：将所有能让她想起亡夫的东西全部清出家门，这也是她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唯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活下去。

这是一次毁灭性的清理仪式。儿子同意将书房里的所有东西都搬走，好让她把这里改成缝纫室，自结婚以来，她还从没有过一间缝纫室。女儿则会带走一些家具和许多件她觉得适合在新奥尔良的古董行里拍卖的东西。这一切都让费尔明娜·达萨轻松了许多，尽管当她了解到自己在新婚旅行中买回来的东西已变成了古董商的文物时，心中有些不快。她不顾佣人、邻居以及那些日子赶来陪她的女友们沉默的惊愕，让人在房子后面的空地上点起一堆篝火，一股脑儿地烧掉了所有能使她回忆起丈夫的东西：上世纪以来城中所能见到的最昂贵、最考

究的衣服，最精致的鞋子，比照片更具他本人风格的帽子，他临死前从上面起身的午睡摇椅，以及无数件与他的生活息息相关、已成为他本人一部分的物品。她做这些时没有一丝犹豫，完全确信丈夫也会同意这样做，还不仅仅是出于卫生的考虑。他曾多次表达过死后火化的愿望，不愿被囚禁在那黑暗的、没有一丝缝隙的雪松木盒子里。当然，他信奉的宗教禁止他这样做：他曾大着胆子探问过大主教的看法，但大主教斩钉截铁地予以否定。这纯属妄想，教会绝不会允许在我们的墓地上设置火葬炉，即便是专供非天主教徒使用也不行。事实上，除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谁也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但费尔明娜·达萨深深记得丈夫的恐惧，即便是在最初那几个小时的恍惚中，她也没有忘记吩咐木匠在棺材上留一道能透光的缝隙，以此作为对丈夫的安慰。

但不管怎样，那次焚烧行动是徒劳的。费尔明娜·达萨很快便发现，对亡夫的记忆不仅经得住火烧，而且似乎也经得住时间的流逝。更糟的是，当衣物化成灰烬，她不但依然十分怀念丈夫惹人喜欢的地方，而且也怀念起他令她心烦之处，比如每日起床时他弄出的声响。这些回忆帮助她走出了痛苦的丛林。于是，她再次下定决心，要带着对丈夫的回忆继续生活下去，就好像他没有死一样。她知道，每天早上醒来时依旧会很痛苦，但慢慢会好起来的。

果然，三个星期以后，她开始看到曙光。可是随着光线越来越强，越来越清晰，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有一个居心叵测的幽灵，让她一刻也不得安宁。他已不是当年那个在福音花园偷偷窥视她的让人可怜的幽灵，不是那个她进入暮年以后还时常怀着某种柔情想起的幽灵，而是那个穿着刽子手的长礼服、把帽子拿在胸前的令人厌恶的幽灵。他愚蠢的无礼行为让她心烦不已，以至于总是挥之不去。

自从十八岁那年拒绝他以后，她一直觉得自己在他身上播下了仇恨的种子，而时间将使这种子生根发芽。她时刻都感觉到这种仇恨，每当这个幽灵离她很近，她都能在空气中闻到仇恨的味道，单是看他一眼，就使她心慌意乱。她是那么怕他，以至于在他面前，她始终找不到一种自然的方式让自己举止得体。那天晚上，当他向她重申爱情时，纪念亡夫的鲜花所散发的芳香还在房子里弥漫，她不能不把这种无礼的言行视作他报复行为的第一步，谁又知道这之后究竟还隐藏着多少阴险的企图呢。

他固执地占据着她的脑海，这让她怒火中烧。葬礼的第二天，她一醒来就想起了他，但凭借着坚定的意志，她又成功地把他从头脑中清除出去了。但怒火总是会不断回来，她很快就发现，想忘掉他的极大渴望便是最强烈的诱因，迫使她不得不想起他来。于是，她第一次被怀旧的情绪笼罩，壮着胆子回想起那段缥缈爱情的虚幻时光。她试着细细回想那时的小花园，干枯的杏树，以及他坐的那条长凳，试着回想这一切原本都是什么样子，因为它们全已不再是当初的模样。一切都已改变。那些树，连同满地的黄色落叶都不见了。在那个被斩首的英雄塑像的位置，人们树起了另一尊穿着华丽制服的雕像，没有姓名，没有日期，也没有说明建造缘由，但它有一个很气派的墩座，里边安着该地区的电力控制装置。她家的房子早在多年前就已卖掉，如今在省政府的手里破败得快散了架。要想象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时的样子，对她来说已殊非易事，而要把那个站在雨中的沉默寡言、无依无靠的小伙子，和现在这个体弱多病的腐朽老头儿认作同一个人，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这个老头儿完全不顾她的处境，对她的痛苦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就那么站到她的面前，用烈火般的侮辱灼烧着她的灵魂，至今都让她心烦得喘不过气来。

当初，她为了从林奇小姐那桩倒霉事中恢复过来，到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表姐的马利亚之花庄园住了段日子，之后不久，表姐也来看望过她。表姐来的时候，又老又胖，但很幸福，由大儿子陪着。像父亲一样，她的大儿子已当上了陆军上校，但由于不光彩地参与了对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香蕉园工人的屠杀，曾被父亲拒之门外。两姐妹多次相见，每次都把时光消磨在回忆之中，回忆着她们初识的那个年代。最后一次来访时，伊尔德布兰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怀念古老的好时光，并为眼下的年老体衰感慨万千。为了更好地沉浸在往事中，她带来了那张她们打扮得像古老贵妇似的照片，是那个比利时摄影师拍的，也正是在那个下午，年轻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优雅地刺中了任性的费尔明娜·达萨的心房。费尔明娜·达萨自己的那张照片已经丢了，而伊尔德布兰达的这张也几乎快看不清了，但两人还是在那令人伤怀的模糊影像中认出了自己：那样的年轻、漂亮，而这一切已经一去不返。

要想让伊尔德布兰达不提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一直认为他的命运与自己的十分相似。她回想起她第一次发电报那天看到他的样子，那个注定被恋人遗忘的可怜小鸟的形象永远也无法从她心中抹去。而费尔明娜·达萨呢，她后来见过他很多次，当然，并没有跟他说话，但她无法相信他就是自己的初恋爱人。总是有关于他的消息传到她这里，就像城中所有那些稍有点影响的人物只要有消息迟早都会传到她耳中一样。人们说他从未结过婚，因为他的兴趣与众不同。但这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一方面是因为她从不理会传言，另一方面则因为人们对很多无可指摘的男人也会有类似的议论。但她觉得奇怪的，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始终穿着他那身古怪的衣服，使用奇怪的沐浴露，而且，在他以如此引人注目和值得尊重的方式为自己的生活开辟了道路之后，却仍然神秘得像个谜一样。她无法相信他就是

当初那个人，每当伊尔德布兰达感叹“可怜的人，他受了多少苦啊”的时候，她总是惊讶不已。因为从很久以前开始，她看到他时就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了：他已是一个从她心里被抹去的影子。

然而，在电影院遇到他的那个晚上——那也是她从马利亚之花回来后不久的事——一种奇怪的感觉油然而生。他身边有个女人，而且是个黑女人，她并不感到惊讶。她诧异的是他竟保养得那么好，举止甚至比以前更加洒脱自如。她没有意识到，当林奇小姐令人烦恼地闯入她的私生活后，发生改变的自然应该是她，而不是他。从那时起，二十多年里，她带着更为同情的眼光看他。在为丈夫守灵的那天晚上，她不仅认为他的出现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认为他对她的怨恨已自然地结束了：他的现身是原谅与遗忘的象征。所以，他竟然戏剧性地向她重申了在她看来从未存在过的爱情，实在出乎她的意料，而且还是在这样一个无论他还是她都只能安于天命的年纪。

在为丈夫举行了象征性的火葬仪式后，第一次冲击给她带来的不可遏制的愤怒不但丝毫没有削减，而且越来越无法控制，甚至节外生枝起来。更有甚者，她好不容易摆脱了对死者的回忆，记忆的空间却被那片罂粟花缓慢而无情地占据，那里埋葬的是有关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一切。就这样，她不情愿地想着他，越想越愤怒，而越愤怒就越想，直到最终无法忍受，几乎要发起疯来。于是，她坐到亡夫的写字台前，丧失理智地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写了一封长达三页的信，满是侮辱和恶毒的挑衅。如此主动地做了她漫长的一生中最不体面的一件事后，她内心感到安慰。

而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来说，那几个星期也是极其痛苦的。向费尔明娜·达萨重申爱情的那天晚上，他漫无目的地徘徊在被下午的大雨破坏殆尽的街道上，惊恐地自问，他刚刚杀死了围困自己半个多世纪

的老虎，接下来该拿虎皮怎么办。由于暴雨肆虐，城市处于危急状态。一些房子里，半裸着身体的男女正试图凭上帝的旨意从洪水中抢救出点儿什么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觉得这场众人的灾难仿佛也与自己息息相关。但此刻，风平浪静，加勒比的星星也静静地待在原来的位置上。忽然，在一片寂静之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听到一个男人的歌声，那正是许多年前他和莱昂娜·卡西亚尼在同一时刻、同一个街角听到的歌声：*我从桥上回来，泪流满面*。那样的一首歌，那样的旋律，那样的夜晚，仿佛只为他而存在，且与死亡有着某种关联。

他从没有像此时这样想念特兰西多·阿里萨，想念她睿智的话语，想念她用纸花装扮起来的可笑的女王发式。无可避免，每当处在灾难的边缘时，他都需要一个女人的庇护。于是，他一路寻着可以找到女人的方向，来到师范学校，看见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宿舍的一长排窗户上有一盏灯光。他做出了很大努力，才没让自己陷入老祖父的疯狂，在凌晨两点钟，把正在温暖的襁褓里安眠、还散发着摇篮的哭泣味道的孙女带走。

在城市的另一端，莱昂娜·卡西亚尼孤独而自由，毫无疑问，她愿意在凌晨两点、三点，或是在任何时刻、任何情况下为他提供他需要的同情。而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在失眠的荒原中去敲她的门，但他知道，她太聪明，他们彼此又爱得太深，他不可能只伏在她膝上哭泣而不告诉她原因。想了许久，也像梦游一样在荒凉的城市中徘徊了许久，他终于想起找哪个女人都不如找普鲁登西娅·皮特雷，那个“二夫寡妇”。她比他岁数小。他们上世纪就已相识，后来不再见面，是因为她坚持不愿让人看见她那时的样子：眼睛半瞎，已到了苍老的边缘。一想到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立刻回到窗户街，在一个购物袋里装

上了两瓶波尔多葡萄酒和一小瓶腌菜，然后便去看她，尽管他都不知道她是否还住在原来的地方，是否一个人，甚至是否还活着。

普鲁登西娅·皮特雷没有忘记他挠门的暗号，问都没问便给他开了门。在他们还自以为年轻其实不然的时候，他一直用这个暗号来表明身份。他穿着黑呢子衣服，戴着硬礼帽，胳膊上挂着一把蝙蝠似的雨伞，在漆黑一片的街上几乎辨不出身形。她的眼神不好，光线又暗，根本什么都看不清。但借着路灯照在他眼镜的金属框上反射出的光亮，她认出了他。他看上去就像个双手还沾满了鲜血的杀人凶手。

“请收留一个可怜的孤儿吧。”

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话，只是为了说点儿什么。他很惊讶，自从上一次见面以来，她竟衰老了这么多，而且他很清楚，她心里一定也是这样看他的。但他又自我安慰地想，等过上片刻，当两个人从最初的惊愕中恢复过来之后，慢慢就会发现其实生活在对方身上留下的伤痕并没有那么明显，然后就又会觉得彼此依然像当初认识时那样年轻了。

“你看上去就像要去参加葬礼。”她说。

确实如此。而她也像几乎全城的人一样，从十一点钟起就守在窗前，观看自大主教德鲁纳死后出席人数最多、也最豪华的送葬队伍。震撼大地的隆隆炮声、军乐队吹奏出的不和谐乐声，以及盖过了所有教堂自前一天起就敲个不停的丧钟的哀歌声，这一切交织在一起，把她从午睡中惊醒。她从阳台上看见穿着仪仗队制服骑在马上的军人、宗教团体、学校学生、政府要员乘坐的黑色长轿车、葬礼马车（拉车的马匹头上戴着插有羽毛的盔帽，身上披着金色披挂），以及一辆历

史悠久的炮车，上面载着盖有国旗的黄色棺木，走在最后的是一列至今仍用来运送花圈的老式敞篷马车。午后不久，送葬队伍刚从普鲁登西娅·皮特雷的阳台前经过，便下起了倾盆大雨，人群惊慌散开。

“这样的死法真是荒唐啊！”她说。

“死是不会有滑稽之意的。”他说，又感伤地补了一句：“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他们坐在露台上，面对广阔的大海，望着光晕几乎占据了半个天空的月亮，欣赏着地平线上一条条轮船的五彩灯光，享受着暴风雨后温和芳香的微风。他们一边喝着波尔多葡萄酒，一边就着腌菜吃着普鲁登西娅·皮特雷从厨房的一个乡村面包上切下来的面包片。她无儿无女，自从守寡后，他们一起度过了无数个这样的夜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刚遇见她时，正是她可以接待任何愿意陪她的男人的时候，即便那男人是按小时租来的。但两人最终却建立起一种比表面看上去更严肃、也更长久的关系。

尽管她从没有暗示过，但如果能与他一起再次步入婚姻殿堂，那么，即便是让她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她也会心甘情愿。她知道，要适应他的吝啬，他早熟外表下不谙世事的执拗，他古怪的性情，他只知索取、不愿付出的渴望，这一切都不容易，但尽管如此，却没有哪个男人是比他更好的伴侣了，因为这世上没有哪个男人比他更需要爱。但同时，也没有哪个男人比他更油滑，因此，他们的爱从不会超越他所掌控的界线：一切以不干扰他为费尔明娜·达萨保持自由之身的决心为准则。不过，他们的爱情还是持续了很多年，即便是在他安排好一切，让她嫁给了一个商业代理人后依旧如此。那个代理人每次在家里

待三个月，然后便要四处跑三个月，她和他有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据她发誓说，其中一个儿子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

他们不顾时间地交谈着，因为自年轻时起两人就习惯了分享失眠之夜，老了以后，失眠就更不会让他们失去什么了。虽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喝酒几乎从不超过两杯，可这回，三杯下肚后，他仍旧没缓过气来。他汗如雨下，于是“二夫寡妇”让他脱掉外套、背心和长裤，如果愿意，全部脱掉也可以，这他妈的又算什么，说到底，比起穿着衣服，他们赤身裸体时更加了解对方。他说，如果她脱，他就脱。可她不愿意：很久以前，她就在衣橱的镜子里照过，立刻明白，她不会再有勇气让他或者任何人见自己的裸体。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处于兴奋之中，喝了四杯波尔多还是静不下来。他继续回忆往事，述说着美好的过去，从很久以前开始，这就是他唯一的话题了。事实上，他迫切希望的，是从对往昔的回忆中找到一条秘密之路，以让自己得到发泄。因为这就是他急需的：把灵魂从嘴中释放出来。当他看到地平线上最初的几道光亮时，尝试着旁敲侧击地接近目标。他用一种看似随意的方式问道：“比如像你这样，身为寡妇，又到了这把年纪，如果有人向你求婚，你会怎么办？”她笑了，笑出一脸老太婆的皱纹，反问道：

“你是在说乌尔比诺的寡妇吧？”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总是在最不该忘记的时候忘记这一点：女人们对问题中隐含的意思比对问题本身想得更多，而普鲁登西娅·皮特雷尤其如此。她一针见血得令人心惊胆寒，他惊慌失措，想赶紧找一扇假门溜走：“我是说你。”她又笑了：“去逗你的婊子娘吧。愿她的在天之灵安息。”她催他把想说的事说出来，因为她知道，无论他，还是任何

一个男人，都不会在久别多年之后，仅仅为了喝波尔多、吃乡村面包就腌菜而在凌晨三点把她叫醒。她说："只有当一个人想找人大哭一场时，才会这样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败下阵来。

"这回你可错了。"他说，"我今晚来其实是为了唱歌。"

"那咱们唱吧。"她说。

他用动听的嗓音唱起了当时的流行曲：*拉蒙娜，没有你，我无法活下去。*这一夜就这样结束了，因为他不敢再和这个已反复证明了她了解月亮的另一面的女人玩这种禁忌游戏。他走出门去，仿佛来到了另一座城市，六月里最后的大丽花香飘四溢，而他仿佛走在年轻时的街道上，又一次见到一个接一个的寡妇在黑暗中去望五点钟的弥撒。但如今，是他，而不是她们，不得不走到另一边的人行道上去，为了不让人看到他止不住的泪水。他以为这都是从半夜开始才流淌不息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是五十一年九个月零四天以来，他一直强压在心头的泪水。

当他在一扇耀眼的窗前醒来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失去了对时间的把握。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和女佣们在花园里玩球的声音把他带回了现实：他躺在母亲的床上，这间卧室始终保持着原样，在少有的孤独让他不安的时候，他常常睡在这里，以减少一点寂寞。床对面是堂桑丘餐厅那面大镜子，每每醒来时就能看见它，看见镜子深处反射出的费尔明娜·达萨的身影，对他来说就已足够了。他知道今天是星期六，因为每到这一天，司机便会从寄宿学校把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接出来，送到他家。他意识到之前一边梦见自己无法入睡，一边却不知不觉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梦里被费尔明娜·达萨愤怒的脸庞扰得心神不宁。他一边洗澡，一边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不慌不忙地穿上最

好的衣服，喷了香水，给那两撇尖尖的白胡子上胶。刚走出卧室，他便从二楼的走廊上看见了那个穿校服的漂亮姑娘。她正在跃起身子接住空中的皮球，那迷人的身姿曾在那么多个星期六让他战栗不止，但这天早上，却没有在他心中激起丝毫涟漪。他示意她跟他走。上汽车前，他毫无必要地对她说："今天我们不玩小游戏。"他带她来到美洲冷饮店，那里挤满了和孩子一起在天花板的大吊扇下吃冰激凌的父母们。阿美利加·维库尼亚要了一个好几层的冰激凌，装在一只巨大的杯子里，每一层的颜色都不同。这是她最喜欢的冰激凌，也是这里卖得最好的，因为它能散发一种神奇的烟雾。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边喝着黑咖啡，一边一言不发地看着女孩，她用一把很长的勺子吃着冰激凌，一直够到杯底。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突然说道：

"我要结婚了。"

她拿着勺子的手停在空中，脸上露出一丝疑惑，她看着他的眼睛，随即又镇静下来，笑了笑。

"撒谎，"她说，"老头儿是不会结婚的。"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去看了公园里的木偶戏，在防波堤的炸鱼摊上吃了午饭，看了刚到本城的一个马戏团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在"代笔人门廊"那儿买了准备带回寄宿学校的各种甜食，又乘着敞篷汽车在城中转了几圈，这都是为了让她逐渐习惯一点，即他是她的监护人，而不是她的情人。之后，在一场没完没了的大雨中，刚好赶在《三钟经》祈祷之前，他把她送回了学校。星期日，他给她派了汽车，以便她和女伴们外出散心，但他不想见她，因为从上星期起，他已完全意识到了两人年龄上的差距。那天晚上，他下定决心要给费尔明娜·达萨写一封请求原谅的信，哪怕只是为了表明自己并没有放弃，但最后又

决定第二天再写。星期一，就在饱受煎熬整整三个星期的时候，被大雨淋得湿透的他走进家门，发现了她的信。

那是晚上八点。两个女佣都已睡下，她们留着走廊里唯一的一盏长明灯，好照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走进卧室。他知道，他那简单乏味的晚餐就摆在饭厅的桌子上，很多天以来，他都只是随便吃两口东西，而此刻，好容易累积下来的一丝饿意又因为激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由于双手颤抖，他费了好大劲才把卧室的大灯点亮。他把湿漉漉的信放在床上，点亮床头柜上的小灯，故作镇定——这是他让自己平静下来的一贯做法。他脱掉湿透的外套，把它挂在椅背上，又脱掉背心，折好放在外套上，然后，他解下黑色的丝质领结，摘下如今已经过时的赛璐珞衣领，把衬衫的扣子解至腰间，松开皮带，以便更好地呼吸，最后，他摘下帽子，把它晾在窗边。突然，他浑身颤抖了一下，忘记把信放到哪里去了，这让他紧张万分，以至于最后找到信时大吃一惊：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把它放到床上了。打开之前，他用手绢擦干信封，小心翼翼不让写着自己名字的墨水洇开。这样做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个秘密已非他们两人独享，而是至少有第三人知晓，因为不管送信人是谁，那人必会注意到乌尔比诺的遗孀在丈夫死后仅三个星期便写信给一个她圈子以外的人，而且如此急迫，没有通过邮寄，还如此神秘，嘱咐他不能交到对方手中，而是要像匿名字条一样，从门下塞进来。他无需撕坏信封，因为胶水已被水浸开了。但信还是干的：密密麻麻的三页纸，没有抬头，末尾签名是她婚后姓名的首字母。

他坐在床上，先飞快地读了一遍。比起内容来，信的语气更让他好奇。还没读到第二页，他就已经知道这正是一封他一直在等的辱骂信。他把信展开，放在床头灯的光亮下，然后脱下湿漉漉的鞋袜，走

到门口熄了大灯，戴上岩羚羊皮的护须罩，没脱裤子和衬衫就躺了下来，头倚在他阅读时常用来当靠背的两个大枕头上。他又读了一遍，这次是一字一句，逐字推敲，不放过任何一个隐藏的含义。之后，他又读了四遍，直到脑中充满了那些字句，而它们开始失去原本的意义。最后，他把没套信封的信放到床头柜的抽屉里，仰面躺下，两手交叉枕在脑后。四个小时里，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呆望着那面她曾出现在其中的空镜子，几乎没有了呼吸，比死人还像死人。午夜十二点整，他来到厨房，煮了一壶浓得像原油似的咖啡，拿到房间里，然后将假牙放进床头柜上一直为他准备好的硼酸水中。之后，他又恢复了刚才那种大理石像似的躺卧姿势，但每隔一段时间会呷一口咖啡，只在这片刻才动弹一下，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女佣又送来满满一壶咖啡。

这时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已经知道接下来的每一步该怎么做了。事实上，那些侮辱并没有让他心痛，他也无意去澄清那些不公的罪名，他了解费尔明娜·达萨的性格，也清楚她此番义正词严的理由，她的言词原可以更锋利些的。他唯一感兴趣的是这封信本身给了他机会，甚至是承认了他有权回复。进一步说，她其实是在要求他做出答复。这样一来，生活此刻正处于他期望中的转捩点。剩下的一切就看他的了，他十分确信，自己那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私人地狱还会将很多生死考验摆到他面前，而他也准备好了带着前所未有的热情、痛苦和爱去面对它们，因为这将是最后的考验。

接到费尔明娜·达萨的信五天以后，他来到办公室时，感觉自己仿佛漂浮在某种突如其来而又不同寻常的打字机真空之中，那机器雨点般的声音反而让寂静显得格外引人注意。原来，是它暂时停了下来。当声音重新响起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身子探进莱昂娜·卡西亚尼的

办公室，看见她坐在自己的打字机前，而那台机器像有灵气似的在她的指尖下听从着指挥。她发觉有人在窥视她，便带着她那令人生畏的灿烂微笑朝门口看了看，但没有停下来，直到把那段文字打完。

“告诉我一件事，我亲爱的母狮，”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问，“如果你收到一封用这玩意儿写的情书，你会有何感觉？”

早已处事不惊的她听了这话，也露出惊诧的表情。

“天哪！”她惊呼道，“我可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

因此，她也就无法做出其他回答。而在此之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但他决定冒险到底。他将办公室的一台打字机搬回家，引来下属一片友好的嘲笑：“老鹦鹉是学不会说话的啦。”莱昂娜·卡西亚尼对任何新鲜事都抱有热情，自告奋勇到家中去给他上打字课。可是，自从洛达里奥·图古特想教他按照乐谱拉小提琴的时候起，他就反对系统学习。洛达里奥·图古特吓唬他说，入门至少需要一年，要想得到专业管弦乐队的认可，需要五年，而若想真真正正拉好琴，则需要一生的时间，而且每天都要练习六个钟头。可他最终说服母亲给他买了一把盲人小提琴，按照洛达里奥·图古特教给他的五条基本规则练了不到一年，就敢去大教堂的唱诗班里演奏，还能从贫民墓地根据风向为费尔明娜·达萨送去一首首小夜曲。如果说能在二十岁学会像拉小提琴这样困难的事，他想不出自己为何就不能在七十六岁学会像打字这样只需要动用一根手指的活计。

他想得没错。他用了三天时间来记住键盘上字母的位置，又花了六天时间学会如何一边打字一边思考，最后用三天时间，在撕碎了半令纸后，打出了第一封准确无误的信。他用了一个庄严的抬头：夫

人，落款则是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就像年轻时那一封封飘香的信一样。他把信邮寄出去，用的是绘有哀悼纹饰的信封，这是给新近孀居的寡妇写信的规矩，并且，信封背面没有署寄信人的姓名。

这是一封六页的信，和过去他写过的任何一封信都大相径庭。没有了初恋时的语气、文风和飘逸修辞，论述得如此合情合理，而且恰如其分，以至于若配上栀子花的香气都会显得唐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写得最接近商业信函的信，尽管他从来也没写好过这类信件。多年以后，一封用机器打出的私人信件几乎会被视作一种侮辱，但在当时，打字机还是办公室里的一头猛兽，尚没有自己的伦理特征，礼仪教科书也还没预见到它将被驯化用于私人用途。这更像是一种大胆的现代主义行为，至少费尔明娜·达萨定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就在她写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第二封信中，一开头就请求他原谅她潦草的字体，因为她没有比钢笔更先进的书写工具。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信中甚至都没有提到她寄给他的那封可怕的信，而是从一开始就试图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诱导她，对过去的爱情只字不提，连带过去的一切都不再提起：所有往事一笔勾销，一切重新开始。他写下的更像是对人生的一种广泛性的思考，依据的是多年来他对男女之间关系的看法和经验，他曾一度想把这些作为《恋人指南》的增订本写出来，只不过此时，他把这种思考隐藏在一种家长式的淳朴文风之下，如同一个老者的回忆，为的就是不那么明显地被人看出，这实际上是一封倾诉爱情的书信。他原本也按照旧时的文风写了很多份草稿，但以冷静的头脑一读再读之后，最终在一瞬间把它们付诸一炬。他知道，任何一个不起眼的疏忽，或者哪怕轻率流露出的一点点怀旧之情，都可能搅起她对往事的反感。虽然他预料到她有可能在鼓足勇气打开第一封信之前先退上个上百封信，但还是盼望

这样的事一次也不要发生。所以，他像筹划最后一场决战那样，对每个细枝末节都思虑周详：一切都要与众不同，如此方能在一个于巅峰上过完一生的女人心中激起新的好奇、新的兴致和新的希望。这封信应该要提供一种蠢蠢欲动的幻想，并且给予她足够的勇气，把某个阶层的不公偏见扔进垃圾堆里去。她原本并不出身于那个阶层，可那个阶层最终却变得比其他任何阶层都更像她的出身之处。这封信应该教会她把爱情想成一种美好的状态，而非达到任何目的的途径，爱情自有其本身的起点和终点。

他清楚地知道不能期待立刻得到答复，其实只要信不退回，他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封信果然没有退回来，以后的每一封也都没有退回来。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焦虑与日俱增。越久不见退信，他就越希望得到一封回信。一开始，他写信的频率取决于他手指的灵活程度：先是每星期一封，后来每星期两封，最后是每天一封。对于邮电事业从他当旗手的时代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进步，他备感欣慰，因为他不必再冒被人发现每天到邮局去给同一个人寄信的风险，也不必冒险找人送信，因为这人有可能把事情说出去。相反，只要派一个职员买回能用上一个月的邮票，再把信塞进分布在老城区的三个邮筒中的任何一个，这简直易如反掌。很快，他把这个习惯纳入了他的生活常规：他利用不眠的夜晚写信，然后在第二天去办公室的路上，让司机在街角的邮筒前停一分钟，自己下车亲自把信放进去。他从不让司机代他投信，尽管在一个雨天的早晨，司机曾想帮他这样做。还有时，他小心谨慎，不止带一封信，而是同时带上好几封，为了显得更加自然。司机当然不知道，那些凑数的信件不过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寄给自己的几张白纸，因为他从不与任何人互通私人信件，除了每个月末会写信给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父母，作为监护人汇报一下他对姑娘的

行为、精神状态、健康情况以及她在学习上取得的好成绩的个人印象。

从第一个月起，他就开始给信编号，像报纸上的连载小说一样，在每封信的开头对上一封信做一小结，生怕费尔明娜·达萨看不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此外，自从信的频率变成每日一封后，他把带有哀悼纹饰的信封换成白色的长信封，这样一来，它们看上去就像千篇一律的商业信函，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从一开始，他就准备好让自己的耐心经受更大的考验，至少，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是在用所能想出的唯一与众不同的方法浪费时间，就要坚持下去。的确，他等待着，不像年轻时那样带有种种苦痛烦忧，而是以一个坚如磐石的老人的固执等待。反正，这个老人在一家已经一帆风顺、只身前进的河运公司里也别无他事可想，别无他事可做。他坚信自己能活下去，并能完美地保持他的男性机能，一直等到明天、后天，或者永远等下去。费尔明娜·达萨最终会说服自己，她那孤独寡妇的焦虑与痛苦没有其他出路，唯有向他放下吊桥。

与此同时，他仍旧过着有条不紊的生活。由于预见自己会得到一个圆满的答复，他对房子进行了第二次整修，以使它配得上那个自它被买下来那天起，就该来当女主人的人。他遵守承诺，又去看了几次普鲁登西娅·皮特雷，以向她证明尽管年岁不饶人，他还是爱她的，而且不只是在孤苦无依的夜晚，有几次还是在大白天，从敞开的大门走进去的。他仍旧从安德雷娅·瓦隆的家门前经过，直到有一天看见浴室的灯熄着，便进去在她的床上粗野地尝试各种疯狂的举动，尽管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让自己不失去爱的习惯，其依据是他的一个到那时为止尚未被证伪的迷信，即一个人只要坚持做爱，身体就会一直管用。

唯一的障碍是他与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关系。他继续让司机每星期六上午十点到寄宿学校去接她，但他不知道周末该拿她怎么办。他第一次没有亲自陪她，她对这一变化十分不悦。他将她托付给女佣，让她们带她去看下午场的电影，听儿童公园的露天音乐会，参加慈善抽奖；又或者为她安排好星期日的活动，让她和同学一起玩，为的就是不必再把她带进办公室后面那座隐秘的天堂——她第一次去过之后，就总想再去那里。他沉浸于对未来的崭新幻想之中，竟没有注意到，女人其实可以在三天内就变得成熟，而自从他到父亲港的机动帆船上把她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不管他如何想让这一变化进展温和，对她来说都是极其残忍的，而且她无法明白这其中的缘由。那天在冷饮店里，他告诉她真相，说自己就要结婚了，她霎时间被吓坏了，可随后又觉得这种可能性近乎荒谬，便又把它抛在脑后。然而，她很快看出来，他表现得就像真的一样，总是莫名其妙地支支吾吾、闪烁其词，就好像他不是比她大六十岁，而是比她小六十岁似的。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见她在他的卧室里试着用打字机打字。她打得相当不错，因为在学校学过这门功课。她已经打了多半页纸，全都是不假思索自动打出来的，但时不时就很容易从某个词中瞧出她的心境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弯下身子，趴在她肩上读着她写的话。他那男人的热气、断断续续的呼吸，以及衣服上散发出的和枕头上一样的香水味，使得她一阵慌乱。她已不再是那个初来乍到的小姑娘了。那时，他得一件一件地为她脱掉衣服，像哄骗婴儿似的哄她说：先脱掉小鞋子，给小熊穿，再把小衬衫脱下来给小狗穿，再把小花衬裤脱下来给小兔子穿，现在，亲亲爸爸香喷喷的小鸟。不，她如今已成了一个真真正正、地地道道的女人，喜欢享有主动权。她继续用右手的一个指头打字，左手却在摸索他的大腿，探寻着它，找到了它，感觉到它又复活了、生长了、急促地喘着气，他那

老人的呼吸变得磕磕绊绊，艰难无比。她了解他：从这一刻起，他就会失去控制，抛开理智，屈服于她的意志，在一切结束之前，无法再找到回头的路。她拉着他的手，慢慢把他带到床上，就像牵着一个走在街上的可怜的盲人。她带着居心不良的温柔，一块块地把他肢解，按照她的喜好撒上盐、胡椒，再放上一瓣蒜、一片月桂叶，倒进切碎的洋葱和柠檬汁，在盘中腌至恰到好处，而炉子早已调到合适温度，一切都准备妥当。家中没有别人。女佣们出门了，负责修缮房子的泥瓦匠和木匠星期六不干活——整个世界都是他们两个人的。但在深渊的边缘，他竟步出了销魂的仙境，推开她的手，坐起身来，用颤抖的声音说：

“小心，我们没有小橡胶套了。”

她仰面朝天地在床上躺了许久，一直在想。当她提前一小时返回寄宿学校时，已经完全不再有想哭的欲望了。她调整好嗅觉，磨尖了爪子，定要找出那只躲在背后搅乱她生活的狡兔的踪迹。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再次犯了一个男人的错误：他以为她在自己的努力徒劳无功之后，已经决定忘记一切了。

他忙着自己的事情。六个月过去了，完全没有一点回音。他在床上辗转反侧，直到天明，迷失在一种新的失眠的荒漠之中。他想，费尔明娜·达萨一定由于那淡雅的信封打开了第一封信，也一定看到了那在往日的信中熟识的首字母，她一定是把它扔进了烧垃圾的火堆，甚至都不愿费事去撕碎它。此后的信，她也定是一看到信封便连拆也不拆地做出了同样处理，直到时间的尽头，而最终，他也文思枯竭，再写不出什么新鲜东西来了。他不相信这世上有女人能抵制住这样的好奇，对半年来每天收到的信是用什么颜色的墨水写的都不关心。但如果真有这样的女人，那也只可能是她。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暮年的岁月不是奔涌向前的激流，而是一个无底的地下水池，记忆从这里慢慢流走。他的智慧渐渐枯竭。在拉曼加的那座别墅周围转悠了几天之后，他意识到，用年轻时的手段终究难以敲开被葬礼封死的大门。一天早上，他在电话簿上寻找某个号码时，偶然找到了她的号码。他拨通了电话。铃声响了好几遍，终于，他听到并辨出她的声音，声音严肃而微弱：“喂？”他没有说话，挂上了话筒，那个虚无缥缈的声音感觉无限遥远，削弱了他的意志。

就在那几天前后，莱昂娜·卡西亚尼庆祝自己的生日，把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邀请到她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心不在焉，把鸡肉的酱汁洒在了身上。她把餐巾的一角在水杯中蘸湿，为他擦净衣服的翻领，接着又给他戴上围嘴，以免发生更糟糕的事故：这样一来，他简直就像一个老婴儿。她发现，用餐时他好几次把眼镜摘下来，用手帕擦拭，因为他的眼睛不停地流泪。喝咖啡时，他竟然手拿着杯子睡着了，她想不吵醒他，悄悄地把杯子接过来，可是他却惊醒了，尴尬地掩饰道：“我只是在休息眼睛。”莱昂娜·卡西亚尼上床睡觉时，吃惊地想着，他竟已老得这般明显。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去世一周年时，他的家人送出请柬，邀请大家出席大教堂举行的纪念弥撒。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此时仍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这促使他大胆决定，尽管没受到邀请，也要去参加弥撒。这是一次奢华多过伤感的社交活动。前几排的座位是终身及世袭的荣誉席位，椅背的铜牌上刻着主人的名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最早到达的客人之一，为的是能坐在一个费尔明娜·达萨必然会经过并且看见的位置上。他想，最佳位置应该是正殿，在那些保留座位的后面。但出席的人太多了，那里根本找不到空位子。于是，他不得不坐到了穷亲戚们所在的中殿。从那里，他看见费尔明娜·达萨挽着儿子的手臂走

进来，穿着一袭黑色天鹅绒裙子，袖子长及手腕，没有佩戴任何首饰，一长排扣子从脖子直到脚尖，就像主教的长袍。她肩上搭着一块卡斯蒂利亚手工编织的窄披肩，而没有像其他寡妇，甚至许多渴望成为寡妇的女人那样头戴面纱帽。她那未施粉黛的脸颊发出一种雪花石膏般的光芒，柳叶形的眼睛在正殿巨大的吊灯下显现出特有的勃勃生机。她走路的时候，腰板是那样的笔直，神情是那样的高傲，姿态是那样的从容，看上去似乎还没有儿子年龄大。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站在那里，用指尖撑着前排座椅的靠背，直到一阵眩晕的感觉过去，他感到自己和她不止七步之遥，而是处在两个不同的时空。

费尔明娜·达萨在几乎整个仪式期间都站在正对主祭台的家族座位那儿，像看歌剧一样神态优雅。但最后，她打破礼拜仪式的常规，没有按照当时的习惯在原地接受人们向她重表哀悼之情，而是走了出来，向每一位来宾表示谢意：这是一个革新举动，与她的为人十分相配。她逐一向大家问候，最终来到穷亲戚的座位跟前。然后，她又环视了一下四周，以确保没有漏掉一位相识的客人。这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有一股超自然的风将他从众人中推了出来：她看见了他。费尔明娜·达萨以她在社交场合一贯的敏捷自如离开陪伴在她身边的人，向他伸过手来，带着极为甜美的微笑对他说：

“感谢您的到来。”

这是因为，她不仅仅收到了他的信，还以极大的兴趣读完了，并在其中发现了严肃而发人深省的理由让她活下去。收到第一封信时，她正坐在餐桌前，和女儿一起吃早餐。因为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她好奇地拆开了。认出签名的首字母时，她的脸一下子红得像烧着了一般。但她很快就恢复了自然的神态，将信收进围裙的口袋里，说：“是政府的吊唁信。”她的女儿很惊讶：“所有的吊唁信都已经到了呀。”她

泰然自若：“这是另一封。”她本打算等过后女儿不再追问的时候将信烧掉，可最终还是没能抵制住先看上一眼的诱惑。她以为信中是对她那封辱骂信应有的回应，事实上，那封信她刚一送出去便后悔了。可是，从庄重的称谓和第一段的主题，她便明白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她如此好奇，于是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以便在烧掉之前能从容地读上一读。结果，她一口气读了三遍。

那是对人生、爱情、老年和死亡的思考：这些想法曾无数次像夜间的鸟儿一般扑扇着翅膀掠过她的头顶，可每当她想抓住它们时，它们就惊飞四散，只剩下散落的片片羽毛。而如今，它们就在这里，清晰明了，正如她自己原本想表达的那样。她又一次感到难过，丈夫已经不在了，无法再和他一起讨论这些，就像每晚睡前他们都会讨论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一样。由此，她发现了一个陌生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他的真知灼见和他年轻时那些炽热的情书不相符，也和他一生阴郁的举止不相符。他的话更像是出自一个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所认为的受到圣神启示的男人之口。这个想法又让她像第一次收到他的信时那样害怕起来。但无论如何，最令她安心的是，她确信这封由一个睿智老人所写的信并非试图重申葬礼那天的无礼言语，而是意在抹掉过去，可谓高尚之举。

接下来的那些信最终使她平静下来。但不管怎样，她还是在怀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读过之后，便把它们烧掉了，尽管随着信一封封地被烧掉，她的心底渐渐沉积下一种挥之不去的愧疚。于是，当她开始收到有编号的信时，她终于找到了一直期待的不毁掉这些信的道德依据。无论如何，她最初的意图并非是为自己保留它们，而是想等待机会将它们还给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免这些在她看来对人类如此有用的东西被白白扔掉。但糟糕的是，随着时间流逝，信件一如既往地到

达，整整一年里每隔三四天便收到一封，她却不知道如何将它们归还，才能既不让他难堪，因为她已不想再如此，又无需写一封信前去解释，因为她的骄傲不会允许她这样做。

这最初的一年已足够她适应寡妇的生活。对丈夫的纯净回忆不再妨碍她的日常行动，不再妨碍她的内心思考，也不再妨碍她的一些最简单的意图了，而是变成一种时时注视着她的存在：指引她，但并不烦扰她。有时，她会看到他，并不是看到一个幽灵，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出现在当真需要他的场合。确信他就在那里，她感到鼓舞。他还活着，但没有了男人的任性，没有了家长式的命令，也没有了那些令她精疲力竭的需求：时时要求她以他爱她的那些方式来爱他，比如不合时宜的亲吻，以及时时挂在嘴边的甜言蜜语。她比他活着的时候更加理解他了，理解他对爱的渴望，理解他迫切地需要在她身上找到足以支撑起他的社交生活的安全感，而事实上，这种安全感他从未得到过。曾有一天，她绝望之极，冲他喊道："你就没有发现我一点也不幸福吗？"而他以他特有的姿势摘下眼镜，不温不火，用他那孩童般天真的眼睛中的一汪清水淹没了她，只说了一句话，就让她体会到他那令人难以忍受的智慧的全部分量："你要永远记住，对于一对恩爱夫妻，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稳定。"从守寡最初的寂寞时光开始，她便明白，这句话中隐藏的并不是她当初所认为的卑劣威胁，而是一块为两人带来过无数幸福时光的月亮宝石。

在多次周游世界的旅行中，费尔明娜·达萨买回所有因新奇而引起她注意的东西。她想要得到它们都是因为一时的冲动，但丈夫却乐于为她的冲动找出合适的理由。这些东西摆在它们原来的环境中，都是美丽且有用的，比如在罗马、巴黎、伦敦的玻璃橱窗里，或是在正因查尔斯顿舞而抖动不止、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的纽约的橱窗里。

然而，它们经不起施特劳斯的圆舞曲、煎猪皮，以及在四十度的高温下找个阴凉处举行节日庆典的考验。她每次回来都带着五六个巨大的立式箱子，由上过漆的金属制成，锁和包角都是铜的，就像神话故事中的棺材。带回来的东西让她成为世界最新奇迹的代言人，可实际上，除了他们本地的圈中人看见这些东西的第一瞬间，其余时候，它们根本不值那高昂的价格。不过，它们本来也就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一次才买的。她在步入老年之前很久，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公众形象不过是虚荣，因而常常能听见她在家里说："得弄走这些破烂才行，都没有住的地方了。"乌尔比诺医生嘲笑她的这种想法徒劳无益，因为他知道，腾出的地方只会被重新填满。但是她坚持要这样做，因为多一件东西确实也放不下了，更何况所有地方没有一件东西是真正能派上点用场的，比如挂在门把手上的那些衬衫，还有压了又压才塞进厨房柜子的欧洲冬衣。于是，一天早晨，她情绪高涨地爬起床来，翻箱倒柜，把阁楼翻了个底朝天，发动了一场战争般的扫荡，清理了一堆堆过时已久的衣服、一顶顶在流行时都没有机会戴的帽子，以及欧洲设计师们依据女王们加冕时穿的式样设计的鞋子——它们在本地被那些门第高贵的小姐们鄙视，因为款式和黑女人从市场上买回来的居家便鞋一模一样。整个早上，内阳台一直处于一片忙乱之中，樟脑球散发出的一阵阵刺鼻气味让家里的人呼吸困难。但几小时后，家中又恢复了平静，因为她最终心软了，那么多的丝绸衣物被扔在地上，那么多的锦缎、废弃的金银丝带、蓝狐尾，竟通通要被扔进火堆。

"烧掉这些东西真是罪过，"她说，"还有那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呢。"

就这样，焚烧活动被推迟了，而且是无限期地推迟。东西不过是换了个地方，从特权的位置挪到已变成废旧物品仓库的旧马厩里，而

腾出来的空间，正如他所言，又重新被塞进新的东西，满得几乎要溢出来。这些东西都只为一刻而活，注定要死在衣橱里，直到下一次清理焚烧。她说："真该发明个办法，好处理那些既派不上用场又不能扔掉的东西。"正是如此：物品的贪婪使费尔明娜·达萨害怕，它们逐渐侵占着空间，代替了人，把人挤到角落里去生活，直到她把它们放进看不见的地方去。她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有条理，但她有自己的办法，一个绝望中的办法：把混乱的东西藏起来。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去世那天，大家不得不腾出半间书房，把东西都堆到卧室里去，以便有个地方为他守灵。

死神的来访使问题得到了解决。在烧掉了丈夫的衣服后，费尔明娜·达萨发现自己的手并没有颤抖。于是，她以同样的动力继续每隔一段时间就点起火堆，把所有的东西都丢进去，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也不顾忌富人的忌妒和饿得要死的穷人的报复。最后，她让人把芒果树连根砍倒，让这场不幸彻底不留一点痕迹，又将活着的鹦鹉赠给了新建的城市博物馆。直到这时，她才得以在这个家里畅快地呼吸，像她一直梦想的那样：一个宽敞、自由、只属于她的家。

女儿奥菲利娅陪伴她三个月后就回新奥尔良去了。儿子每星期日都带着家人过来吃午餐，其他日子，只要有可能也会来。服丧期一过，费尔明娜·达萨最亲近的女友们便开始来看望她，面对着光秃秃的院子玩牌，试验新菜谱，还把她缺席的这些日子里这个依旧运转的贪婪世界里的种种秘闻讲给她听，以让她跟上潮流。最常来的女友之一是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一个老派贵族，费尔明娜·达萨一直和她很要好，自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死后，她和她更加亲近。被关节炎折磨得身体僵硬并对自己昔日的放荡生活感到懊悔的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不仅是她最好的女伴，还常常会向她询问城中正

在酝酿什么爱国举动或世俗活动。这让她感到自己还是有用的，而不是仅仅倚仗着丈夫的保护伞。然而，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把她同丈夫视为一体，大家不再像以前那样叫她做姑娘时的名字，而是开始称呼她乌尔比诺的寡妇。

这让她无法理解。但随着丈夫去世一周年的临近，费尔明娜·达萨觉得自己渐渐进入一种阴凉、清爽、安静的环境之中：无法避免的必然之境。但她还不十分清楚，之后的很多个月里她也没有意识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笔下的见解对她重获精神的平静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她将他的思考付诸实践，这才渐渐懂得了自己的生活，平静地等待着暮年的种种安排。周年弥撒上的相遇是上天赐予的一次机会，她借此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明白，多亏了他那些令人鼓舞的信，她也正准备忘掉过去。

两天以后，她收到一封他寄来的与往日截然不同的信，是手写的，用的是一张亚麻纸，信封背面清晰地署了寄信人的全名。和早年的那些信一样，同样的花体字，同样的情真意切，但内容就只有一段简短的感激之言，感谢费尔明娜·达萨在大教堂里对他与众不同的问候。读过之后的好几天里，费尔明娜·达萨都怀着一种躁动不断地想起这封信。她胸怀坦荡，于是，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四，她突兀地问起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问她是否凑巧认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内河航运公司的老板。卢克雷西娅回答说认识："好像是个放荡的魔鬼。"她重复了那个流行的说法，说他从不结识女人，但为人很大方，还说他有一间秘密办公室，专为把夜晚在码头上弄到手的男孩带去。费尔明娜·达萨几乎自打有记忆以来就听到这种传言，她从来不信，也不放在心上。但她听到也曾一度被认为有些怪异嗜好的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也言之凿凿地说起此事时，忍不住要

即刻把事情解释清楚。她告诉她，自己从小就认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她还说，记得他的母亲在窗户街有一家杂货铺，除此之外，还在内战时期收购旧衬衫和床单，拆开后当作急救药棉出售。最后，她十分肯定地得出结论："他是个正经人，全凭双手养活自己。"见她说得如此激动，卢克雷西娅收回了自己的话："说到底，别人也是这样说我的。"费尔明娜·达萨并没有好奇地自问，为何她会如此热切地维护一个不过是她生活中的影子的男人。她继续想着他，特别是当邮差到来却没有带来他的新信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了两个星期，直到这天，一个女佣用慌张的口吻小声地在她耳边把她从午睡中叫醒。

"夫人，"女佣对她说，"弗洛伦蒂诺先生来了。"

他真的来了。费尔明娜·达萨的第一反应是惊慌。她甚至想，不行，让他改日找个合适的时间再来吧，她现在无法接待来访，而且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但她马上镇定下来，吩咐女佣把他带到客厅，给他送上一杯咖啡，她收拾好就去见他。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等在临街的大门前，在下午三点地狱般的烈日下炙烤着自己，但自信十足。他已做好被拒绝的准备，尽管她的借口很可能是和善的。确信了这一点反倒使他非常平静。但她传来的口信之坚决让他颤至骨髓。走进阴凉的客厅中时，他根本没时间去思考自己正在经历的这一奇迹，因为他的腹部突然胀起来，像要爆炸一般，充满了疼痛的气泡。他屏住呼吸坐下来，被该死的回忆纠缠着，想起他的第一封情书落上鸟粪的情景。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阴凉处，第一阵寒战过去之后，他决心在此时接受任何不幸，只要不让那件不公平的倒霉事重演就行。

他非常了解自己：虽然患有先天性便秘，但这么多年来，肚子还是有三四次当众背叛了他，而每一次他都不得不投降。只有在那几次，以及另外几次紧急情况中，他才发现自己开玩笑时常说的一句话

千真万确：“我不信上帝，但我怕上帝。”他来不及去怀疑，试图找出任何一句所能记得的祈祷词来祷告，却一句也找不到。小时候，另一个小孩曾教过他一句用石头打鸟儿的神奇咒语：“打中，打中，若打不中，就把你变。”他第一次上山时，用一把新弹弓试验了这句咒语，鸟儿果然被击中，掉下来死了。他迷茫地想，一件事和另一件事之间总有些关联，便带着祈祷的热情重复了这句咒语，但没有产生同样的效果。肠子像根螺旋轴似的绞动着，使得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肚子里的气泡越来越密，越来越疼，最后发出了一声呻吟，他则出了一身冷汗。给他送咖啡的女仆看见他死人般的脸色，吓了一跳。他叹了一口气：“是因为热。”她打开窗，以为这样会使他满意，可下午的太阳正好照到他脸上，她不得不又把窗户关上。他心里明白，再多一分钟自己也忍不了了。正在此时，费尔明娜·达萨出现了，她的身影在阴暗之中几乎看不清楚。看到他这副样子，她也吓坏了。

“您可以脱掉外套。”她对他说。

比起要命的绞痛，若是让她听见自己肚子里叽里咕噜的声音，他会更加痛苦。他尽全力要多忍片刻，说了一声“不”，并说自己此次前来是为了问她何时能接受他的拜访。她站在那儿，困惑地说：“可您已经在这里了呀。”她请他随她到院子里的露台上去，那里会凉快些。他拒绝了，声音在她听来更像一声遗憾的叹息。

“我恳求您，明天吧。”

她想起明天是星期四，是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定时来访的日子，但她还是给了他一个不容申辩的解决办法：“后天下午五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她表示了感谢，拿着帽子匆忙地做了一个告别的姿势，一口咖啡也没喝就走了。她困惑地站在大厅中央，不

明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汽车的声音消失在街道尽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车后座上找了个可以减轻疼痛的姿势，闭上双眼，放松肌肉，让自己屈从于身体的意愿。他仿佛得到了重生。司机为他开了那么多年车，早已见怪不怪，对此泰然处之。但在家门口为他打开车门时，司机对他说：

“您要当心啊，弗洛伦先生，这可有点像霍乱。”

幸好，这不过是老毛病。星期五下午五点整，当女仆领他穿过阴凉的客厅，来到院子里的露台上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为此感谢了上帝。在那里，他见到了费尔明娜·达萨，她正坐在为两人准备好的小桌前。她问他要茶、巧克力，还是咖啡。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要了咖啡，那种很热很浓的咖啡，她则吩咐女仆说：“我还是老样子。”所谓老样子，就是好几种东方茶叶混合在一起的茶，可以在午睡后为她提神。她喝完一壶茶的时候，他也喝完了一壶咖啡。他们已经试着开始并又中断了好几个话题，并非因为真的对这些话题感兴趣，而是因为想避开另外一些无论他还是她都不敢触及的话题。两人都有些胆怯，都不知道在距离年轻岁月已如此遥远的时候，在一座不属于他们的房子里，在用来下象棋的露台上，在还飘着墓地花香的地方，究竟要做些什么。这是半个世纪后两人第一次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距离是如此之近，并且有充足的时间静静地看着对方。他们看得如此清楚：这两个被死神窥视的老人，没有旁的什么共同之处，一起享有的只是对那个短暂过去的回忆，然而那个回忆早已不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两个消失了的年轻人，那两个人足可以做他们的孙子了。她想，他最终会说服自己，会看到他的梦想是多么的不现实，从而把他从荒唐中解救出来。

为避免尴尬的沉默或不愿触及的话题，她问了一些有关内河船的浅显问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作为船主，只做过一次河上旅行，还是在多年以前，那时他和这家公司还没有任何关系。她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而如果能够告诉她，他真愿为此付出灵魂。而且她也不了解河道，她丈夫厌恶安第斯山地区的空气，却找出各种理由来掩饰，说什么高山对心脏有危险呀，有得肺炎的可能呀，那里的人虚伪狡诈呀，集权主义的不公正呀，等等。所以，他们走遍半个世界，却不了解自己的国家。现在，有一种容克斯水上飞机，能沿马格达莱纳河流域从一个村镇飞到另一个村镇，就像铝做的蚱蜢一样，上面载着两名飞行员、六名乘客，还有一袋袋的邮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评价道："就像一具空中棺材。"她参加过首次气球旅行，当时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害怕，但如今她几乎难以置信，那个敢于如此冒险的人是她自己。她说："一切都变了。"她是指她变了，而不是旅行的方式变了。

有时，飞机的声音让她吃惊。她在解放者逝世一百周年时看过飞行特技表演，它们飞得低极了，其中一架，黑得就像一只巨大的兀鹫，擦着拉曼加的房顶飞了过去，在邻居家的一棵树上碰掉一块翅膀，最后挂在了电线上。即便这样，费尔明娜·达萨还是没有接受飞机这种东西的存在。最近几年，她也完全没有兴趣到曼萨尼略湾去看看：自从警卫艇把渔民的独木舟和数量越来越多的游艇都赶走后，水上飞机就降落在那里。她都这么老了，人们还选她带着一束玫瑰花去迎接兴致勃勃开着飞机前来的查尔斯·林白，她不理解，一个那么英俊魁梧、头发金黄的男人，怎么会坐在那样一个皱巴巴的马口铁家伙里升到空中去呢，还得有两名机械师推着尾巴帮助那玩意儿起飞。而一些飞机看上去也不比那一架大多少，竟可以同时装下八个人，这个想法更是无论如何也塞不进她脑袋里。相反，她倒听说，乘坐内河船旅

行是很惬意的，因为不会像海轮那么摇晃，但也有另一些更严重的威胁，比如浅滩和强盗的袭击。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她解释说，那都是些过去的传奇：现在的船上有舞厅，有像饭店房间一样宽敞、豪华的客舱，里面有私人卫生间，还装有电风扇。而最后一次内战结束之后，武装抢劫的事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他还得意地告诉她，这些进步多要归功于他所倡导的航运自由，由此鼓励了竞争：原来的独家经营被取代，如今有了三家活跃、繁荣的公司。然而，航空事业的迅速发展对所有航运公司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她试图安慰他，轮船将会永远存在下去，因为愿意钻进那个看上去违反自然的玩意儿的人并不多。最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到邮政的发展，既包括运输也包括投递，试图引导她提起他写的那些信。但他没有达到目的。

然而，不一会儿，机会自己来了。就在他们远离这个话题时，女仆打断了他们，交给费尔明娜·达萨一封刚刚由城市特殊邮政送来的信，这是新开创的业务，和电报使用的是同一个分发系统。像往常一样，她又找不到看信的眼镜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保持了平静。

“没必要找了，”他说，“这信是我写的。”

的确如此。这封信是他前一天写的，当时他还无法摆脱第一次见面失败的羞愧，处于极度的沮丧之中。在信里，他请求她原谅自己没有事先征得允许就冒昧拜访的无礼行为，并且放弃了再次上门的打算。他没有再想第二遍，就把信投进了信筒，等到细想时已经太迟，信已经拿不回来了。然而，他觉得没有必要解释这些，只是请求费尔明娜·达萨不要再看这封信了。

“当然。”她说，“归根到底，信是属于写信人的。不是吗？”

他往前迈出了大胆的一步。

“正是，”他说，“所以，当关系破裂时，首先退还的就是信件。”

她没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把信还给了他，说：“不能读这封信真令人遗憾，因为之前的信让我获益良多。”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说得那么自然，远超他的期待，令他惊诧不已。他对她说：“您想象不到，能听到您这样说，我有多么幸福。”但是她改变了话题，下午余下的时光里，他都没能让她继续说起这件事。

六点过后，屋里四处亮起灯来，他起身告辞。他感到信心更加充足，却也不敢抱过多幻想，因为他没有忘记费尔明娜·达萨二十岁时反复无常的性格和令人无法预知的反应，他可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她已经改变了。因此，他怀着真诚的谦卑，鼓起勇气问她自己日后能否再来。她的回答又让他大吃一惊。

“您可以在任何想来的时候来，”她说，“我几乎总是一个人。”

四天后的星期二，他没有事先通知就又来了。没等仆人端上茶，她就对他讲起他那些信令她多么受益。他说，严格来讲，那些并不是信，而是他很想写的一部书里的零散篇章。而她也正是这样看的。因此，如果他不会把这当作一种轻视的话，她很想把信还给他，以便让它们有更好的用途。她继续讲着那些信在她最艰难的紧要关头给她带来的教益，说得那么热情激动，充满感激，甚至或许还满怀着深情，以至于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大起了胆子，不只是又往前迈了一步，而是拼死向前一跃。

“从前我们是以‘你’相称的。”他说。

这是个禁忌的词：从前。她仿佛看到曾经的那个空想天使又从身边经过，于是试图逃避。但他又深入一步：“我是说，在我们从前的信里。”她有些不悦，不得不做出极大努力来掩饰这一点。但他还是发现了，于是明白自己应该更加小心地摸索前进。虽然这个挫折向他表明，她仍和年轻时一样难以接近，但她毕竟已经学会让自己表现得温和一些了。

“我的意思是，”他说，“这些信已经完全不同了。”

“世界上的一切都变了。”她说。

“我没有变，”他说，“您呢？”

她的第二杯茶停在了半途，一双毫不留情的眼睛指责着他。

“已经无所谓了。”她说，“我都七十二岁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心里受到一击。他本想像箭一般快速地凭借本能做出反驳，但年龄的重负战胜了他：他从未在这样短暂的谈话中感到如此筋疲力竭，他觉得心脏在隐隐作痛，每跳一下，便在动脉中产生一声金属般的回响。他感到自己衰老、凄凉、无用，有一种想哭出来的急切渴望，以至于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在被各种预感犁出一道道沟壑的沉默之中，他们喝完了第二杯茶。她再开口时，不过是为了让女仆把收着信件的夹子取来。他差点就想请求她将信留下，因为他已用复写纸存下了副本，但又想到这种谨慎反而会让人觉得不够高尚。于是，已经无话可说。告辞前，他请她允许自己在下一个星期二的同一时间再来。她暗自思忖是否应该如此迁就他。

“我看不出，见这么多次面有什么意义。”

“我没想过见面要有什么意义。”他说。

于是，星期二下午五点他又来了。并且，以后的每个星期二都例行如此，从不按惯例事先通知，因为到了第二个月的月末，每星期的见面已纳入了两人的日常习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总是会带来喝茶时吃的英国饼干、糖渍栗子、希腊橄榄，以及远洋轮船上各种聚会时吃的精致美味。有一个星期二，他给她带来了她和伊尔德布兰达的照片，就是半个多世纪前比利时摄影师拍的那张，他在“代笔人门廊”的一次明信片拍卖中花了十五生太伏买下来。费尔明娜·达萨搞不明白照片怎么会到了那里，他也不明白，但他把这看作爱情的奇迹。一天早上，在花园中修剪玫瑰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禁不住诱惑，想在下次拜访时为费尔明娜·达萨带去一枝。但给新寡的女人送花，花语成了难题。红玫瑰象征着火一般的激情，对守丧的她来说可能是一种冒犯。而黄玫瑰呢，有时象征着好运，但更普遍的时候表达的是忌妒。他曾听人说起土耳其黑玫瑰，或许那是最合适的，但他一直没能让它们适应自己院子里的气候。想来想去，他决定冒险带一枝白玫瑰，他从不像喜欢其他玫瑰那样喜欢它，就因为它平淡无奇，无声无息：什么也不能表达。在最后时刻，为避免精明的费尔明娜·达萨赋予它什么含义，他剪掉了玫瑰上的刺。

作为一件没有任何隐藏含义的礼物，玫瑰被欣然接受了。就这样，星期二的例行仪式得以丰富，以至于每当他手持白玫瑰到来时，茶几上都已准备好了盛着水的花瓶。一个星期二，把玫瑰插在花瓶中时，他看似随意地说：

“在我们那个时代，送的可不是玫瑰，而是山茶花。”

“的确，”她说，“但用意不一样，这您是知道的。”

总是如此：他试图前进，而她却堵住他的去路。不过这一次，虽然她回答得恰到好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发现自己已经击中了目标，因为她不得不转过脸去，为的是不让他看到她脸上的红晕。那一片燃烧着的、青春萌动的红晕，仿佛拥有自己的生命似的，搅起费尔明娜·达萨心中的不悦：她为这种失态而怨恨起自己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小心翼翼地把谈话转向不那么敏感的话题，但他的彬彬有礼是如此明显，她知道自己已被识破，而这更增加了她的愤怒。两人度过了一个糟糕的星期二。她差点就让他不要再来，但想到两人竟在如此年纪和如此境况，像恋人一般吵架，她又觉得荒唐不已，险些笑出声来。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二，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玫瑰花插到花瓶里时，她检视了一下自己的内心，高兴地发现上星期的不悦没有留下哪怕最微小的一丝痕迹。

这种拜访很快便尴尬地扩展到家庭范围，因为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他的妻子常常意外地出现，而且还会留下来玩纸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来不会玩牌，费尔明娜·达萨在某次见面时教会了他，于是两人给乌尔比诺·达萨夫妇发出了下星期二一决高下的书面挑战。那几局牌大家都玩得很愉快，很快，牌局便像拜访一样被正式确定下来，并规定好每人需为此做出的贡献。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一家贡献出每次都不一样的别出心裁的蛋糕，因为他的妻子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糕点师。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继续带来在欧洲船上找到的新奇玩意儿。费尔明娜·达萨则每星期都绞尽脑汁搞出些令人惊喜的花样。纸牌比赛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二举行，赌注并不是钱，而是输者必须在下一次的牌局中做出点特别的贡献。

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本人与他的公众形象并无差别：头脑贫乏，行事笨拙，不论喜怒都爱一惊一乍，动不动就脸红更是让人担心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毫无疑问，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好人，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最怕别人这样评价自己。医生的妻子却正好相反。她活跃，有一股小老百姓的机灵劲儿，一切都能做得合乎时宜且恰到好处，这使她在优雅之外更添了一点儿人情味。没有比他们更完美的牌局对手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爱的贪婪需求由此得到了满足，他幻想自己是和家人在一起共享天伦。

一天晚上，他们一同走出家门时，乌尔比诺·达萨医生邀请他共进午餐："明天，中午十二点半，在社交俱乐部。"这就像是给一顿美味佳肴配上有毒的葡萄酒：出于种种考虑，社交俱乐部保留拒绝客人进入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规则之一就是拒绝私生子入内。叔叔莱昂十二就有过这类令人恼火的经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自己也曾在已就座的情况下受此侮辱。当时，邀请他的是俱乐部的一位合伙创始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在河运生意中帮过他很大的忙。最后，这位合伙人不得不带他到别的地方去吃饭。

"我们这些制定规则的人，更有责任身体力行。"他对他说。

尽管如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是跟着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冒了一次风险。结果，虽然没有人邀请他在金色的贵宾签名簿上签名，他却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午餐很简短，只有他们两人，在低沉的小调气氛中进行。第一杯波尔多开胃酒下肚，从前一天下午起便一直烦扰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愁云一下子消散了。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想和他谈一谈自己的母亲。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从他的话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现她跟儿子说起过他，而更让他吃惊的是，她竟然为他撒了谎。她告诉儿子，他们从小就是朋友，自从她从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

来到此地，他们就一起玩耍，是他教会她识字读书，因此，她对他一直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她还告诉儿子，每当她放学回家，都会先去特兰西多·阿里萨的杂货铺里和她一起做好几个小时的精美刺绣，因为她是一位出色的老师。后来，她没有再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经常见面，并非出于她的意愿，而是因为他们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

在没有深入谈到自己的意图之前，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先信口开河地谈论了一番对老年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没有老人阻碍，世界会发展得更快。他说："人类，就如同远征的军队一样，是以队伍中步伐最慢者的速度前进的。"他预见将会有一个更人道，从而也更文明的未来，那时，人到了不能自我料理的年龄，都将被隔离到边远城市，以避免老年的耻辱、痛苦和可怕的孤独。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界限应该是六十岁。但在社会达到那样一个仁慈的高度之前，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养老院。在那里，老人们可以互相安慰，分享自己的好恶、怪癖和痛苦，并逃开与下几代人不可避免的分歧。他说："老人在老人们中间，就显得没那么老了。"因而，他很想感谢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他母亲孤独的寡妇生活中，很好地陪伴了她，并恳求他为了他们两人好，也为了让所有人都舒心，继续这样做下去，另外，他还请他对母亲上了年纪后的坏脾气抱有耐心。这次会面的结果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如释重负。"请您放心，"他说，"我比她大四岁，而且不只现在如此，从很久以前，在您出生很久以前就是如此了。"接着，他忍不住用隐晦的讥讽一吐为快。

"在未来的社会里，"他总结道，"您这会儿就得去墓地为我和您母亲的午餐送上一束火鹤了。"

直到这时，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才意识到自己的预言是不恰当的。他匆忙钻进解释的峡道，结果又把自己绕了进去。但弗洛伦蒂诺·阿里

萨帮他走了出来。他容光焕发，因为他清楚自己迟早要和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有这样一次会面，以便履行一项不可避免的社会手续：向他的母亲正式求婚。这顿午餐很是振奋人心，不仅由于它的初衷，更是因为它向他表明，他那势在必行的求婚将会被愉快而顺畅地接受。事实上，要是他现在已经征得了费尔明娜·达萨的同意，那么没有比此刻更合适的机会了。甚至可以说，在这次历史性的午餐谈话之后，形式上的求得允许已显得多余了。

还年轻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上下楼梯就特别小心，因为他知道老年常常是在一次无关紧要的摔倒之后开始的，而死神则跟随着第二次跌倒到来。在所有楼梯里，他觉得办公室的楼梯最危险，因为它又陡又窄。而且，早在他还不太费力就能不拖着双脚上楼之前很久，他便在每次上楼时双眼紧盯台阶，双手紧扶栏杆。大家曾多次建议他换一个不那么危险的楼梯，但他总是推说下个月再做决定，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向衰老让步的表现。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上楼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但并非像他匆忙解释的那样，是因为越来越吃力，而是因为越来越小心。然而，在跟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共进午餐后回来的那天下午，由于喝了一杯波尔多开胃酒和半杯佐餐红葡萄酒，尤其是又进行了那么鼓舞人心的对话，他试图以年轻人的舞步一下跃上第三级台阶，结果扭伤了左脚脚踝，仰面朝天地跌下来，没有摔死已属奇迹。在摔倒的那一瞬，他头脑十分清醒地想，他不会跌一跤就死掉，因为在生活的逻辑中，两个在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深爱着同一个女人的男人，不可能前后只隔一年就以同样的方式死掉。他是对的。他从脚一直到小腿都被打上了石膏，并被迫卧床静养，但人却比摔倒之前还要精神。当医生命令他六十天不许走动时，他无法相信自己竟会如此不幸。

“请别这样对我，医生。”他哀求道，“我的两个月就如同您的十年啊。”

他好几次试图用双手抬着那条雕塑般的腿站起来，但每一次，现实都打败了他。当他终于拖着那只仍旧疼痛的脚踝、挺着裸露鲜肉的脊背重新开始行走时，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命运用一次天意的跌倒嘉奖了他的坚贞。

最糟糕的一天是跌倒后的第一个星期一。疼痛已经减弱，医生所下的诊断也令人鼓舞，但他拒绝接受第二天下午不能去看望费尔明娜·达萨的命运，这是四个月以来他第一次无法赴约。然而，无可奈何地睡过午觉之后，他向现实屈服了，给她写了一封表达歉意的信。信是手写的，写在一张散发着香味的纸上，用的是在黑暗中也能阅读的发光墨水。他毫不害羞地戏剧性夸大了这个不幸事件的严重性，企图引起她的同情。两天后，她给他回了信，很有感情，也很和善，但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中规中矩，就像当初热恋的日子里她写的那些信一样。他立即抓住机会，又给她写了一封信。她第二次回信后，他决定要前进一大步，超越每星期二那打哑谜似的交谈，同时，他以监督公司每日工作进度为借口，在床前装了电话。他请总机接线员接通了那个他从第一次拨过后就牢记于心的三位数号码。那个由于神秘的距离而有些紧张的低沉音色、那个他倾心爱慕的声音接了电话，并听出了打电话的人是谁，但只客套地问候了两三句就和他道别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因她的冷漠伤心欲绝：他们又回到了最初的阶段。

然而两天后，他收到一封费尔明娜·达萨的信。她在信中恳求他不要再给自己打电话。她的理由非常充分：城中的电话屈指可数，而且是通过同一位接线员转接，她认识所有用户，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奇闻逸事，而且不管用户是否在家，她能在任何地方找到他们。她那高效

工作的回报，便是她知晓用户之间的全部对话，能窥见他们私人生活中的大小秘密，发现他们那些隐藏得最好的动人故事。有时，她甚至会介入他们的谈话，发表自己的观点，或平息他们的情绪，这都不足为奇。另一方面，那一年城中创办了一份晚报，叫《正义报》，唯一的宗旨就是抨击拥有长长姓氏的家族，指名道姓，毫无顾忌。那是报纸主人的报复，因为他的子女未被获准进入社交俱乐部。费尔明娜·达萨向来洁身自好，尤其是此时，她比任何时候都更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即使是对最亲密的朋友。因此，她仍然采用通信这种不合潮流的方式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保持联系。最终，他们来往的信件如此频繁而密切，以至于他忘记了自己的脚伤，忘记了卧床的惩罚，忘记了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信之中，整日伏在一张医院里供病人吃饭用的轻便小桌上。

他们又开始以“你”相称了，又像昔日的信中那样交换起对生活的看法来。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一次操之过急：他把她的名字用大头针的针尖刻在一朵山茶花的花瓣上，夹在一封信中寄给了她。两天以后，他收到她退回的花，没有任何评论。费尔明娜·达萨无法不这么做，因为她认为这些都是小孩子的把戏。尤其是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坚持回忆他在福音花园中阅读伤感诗句的那一个个下午、她上学路上的那一个个藏信地点，以及杏树下那一堂堂刺绣课的时候，她更是如此以为。她怀着内心的痛苦，试图让他回到他应在的位置，用一个夹杂在平常评论中的看似偶然的问题点醒他：“你为什么偏偏要说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呢？”后来，她又责怪他那永不会有结果的固执，责怪他不肯顺从自然让自己老去。在她看来，这就是他常常堕入并迷失在回忆之中的原因。她不明白，一个善于思考并以其思考让她获益良多，帮她减轻了寡妇生活的种种苦楚的男人，为何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时，却用那样一种幼稚的方式陷入到一团乱麻之中。于是，两人的角色颠

倒过来。此时，反而是她尽力给予他展望未来的新的勇气，在信中写道：让时间流逝吧，我们会看到它究竟带来了什么。他在一时的茫然间不知该如何破解这句话，要知道，他从来不是一个像她那样的好学生。被迫卧床不动、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意识到时光飞逝，同时又要忍受想见她的疯狂渴望，这一切都在向他证明，他对跌倒的恐惧比他所预见的更加合情合理，也更具有悲剧性。他第一次开始用一种理智的方式思考死亡的现实。

莱昂娜·卡西亚尼每两天来帮他洗一次澡，更换睡衣。她为他灌肠，为他放好尿壶，为他在脊背的溃烂处敷上山金车花药膏，还遵照医生的嘱咐给他按摩，以免缺少活动让他患上其他更严重的疾病。星期六和星期日，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来替换她。这年的十二月，她就能获得教师学位了。他答应她，由河运公司出钱，送她到阿拉巴马州的高等学府去。这样做，部分是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但更多的是为了逃避她尚没有找到方式提出的指责以及他欠她的一个解释。他永远也想象不到她在寄宿学校里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在没有他的周末、没有他的生活中过得多么痛苦，因为他永远也想象不到她有多么爱他。从学校寄来的官方信件中，他得知她由原来一贯的第一名跌至最后一名，在期末考试中还险些没有及格。然而，他逃避了监护人的责任：他试图逃避自己的负罪感，因而没有向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父母报告任何情况，也没有跟她本人谈过此事，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害怕，她会把他和自己学业上的失败牵连在一起。于是，他对一切听之任之。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在开始拖延自己的种种问题，期盼死亡能解决一切。

不仅这两个照顾他的女人，就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人也对自己的变化之大感到吃惊。不到十年前，他还在家中的主楼梯后面突袭了

一个女仆。她当时穿着衣服站在那儿，而他竟以比菲律宾斗鸡还短暂的时间迅速让她受了孕。他不得不赠给她一幢带家具的房子，才让她发誓说使她失去贞洁的罪魁祸首，是那个每逢星期日才见上一面、连吻都没吻过她、顶多算半个情人的男人。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砍甘蔗的好手，强迫那小伙子跟她结了婚。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简直和过去判若两人。两个在几个月前还令他爱得颤抖的女人，如今在他身上摸来摸去，把他翻过来又掉过去，给他全身上下涂满肥皂，又用埃及棉毛巾为他擦干身体，给他做全身按摩，可他却连一声神魂颠倒的叹息也没有发出。对于他没有了欲望这事，两个女人各有各的解释。莱昂娜·卡西亚尼认为这是死亡的前奏。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则把它归为一个隐秘的缘由，但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她尚未琢磨清楚。事实上，只有他知道真相，而这真相只有一个名字。无论如何，这是不公平的：她们照顾着他，他享受着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她们却遭受着比他更大的痛苦。

仅仅三个星期二，就足以让费尔明娜·达萨察觉到自己有多想念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拜访。她和一直来往的女伴们相处得不错，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离死去丈夫的习惯越来越远，而她们也相处得越来越愉快。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去了一趟巴拿马，为的是治疗用什么办法都无法缓解的耳痛。一个月后她回来了，疼痛大为减轻，但别在耳上的助听器反而使她听到的东西比以前更少了。费尔明娜·达萨是她的朋友中最能忍受她答非所问的一个，这让她很受鼓舞，几乎每一天都随时可能出现在她家里。但费尔明娜·达萨无法用任何人来取代她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度过的那一个个平静的下午。

并不像他坚持相信的那样，回忆并不能拯救未来。恰恰相反，对过去的记忆更加坚定了费尔明娜·达萨的信念，那就是二十岁时的火热

躁动是某种高贵而美丽的东西，但绝不是爱情。尽管她率真到有些刻薄的地步，却也不愿亲自向他揭示这一点，无论是写信还是当面。她也没有勇气告诉他，在认识到他笔下的那些思考多么具有抚慰心灵的奇迹作用之后，他信中那些伤感主义的言语听上去有多么虚伪，那些抒情诗似的谎言又会多么贬损他的价值，那样发了疯似的坚持要回到过去更会多么损毁他的事业。不，他往昔的信中没有一行字，她自己那百无聊赖的青春中也没有片刻像此时这样，让她感受到没有他的星期二下午竟会如此漫长、如此孤独、如此不堪忍受，可事实的确就是这样。

有一次，她曾在单纯的冲动之下，把丈夫在某个结婚纪念日送给她的立式收音机发配到马厩里去。她也想过要把它捐赠给博物馆，因为这毕竟是本城的第一台收音机。在服丧的灰暗日子里，她决定不再使用它，因为像她这样姓氏高贵的寡妇，听任何一种音乐都有辱对死者的哀思，即便在私下里也不行。可是，在度过了第三个孤独的星期二以后，她命人把收音机搬回了客厅。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像以前那样欣赏里奥班巴电台的伤感歌曲，而是想用古巴圣地亚哥电台催人泪下的小说连播打发一潭死水的时间。这样做是明智的，因为自从女儿出生后，她便开始丢掉丈夫从新婚旅行起就努力在她身上培养的阅读习惯。随着视力的逐渐衰退，她最终完全放弃了这个习惯，以至于好几个月里都不知道眼镜放到哪儿去了。

她迷恋上了古巴圣地亚哥电台的小说广播，每天都焦急地等待收听新的章节。她偶尔也听听新闻，以便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极少数单独在家的时候，她也会把声音调到最低，遥远而清晰地听一听圣多明哥的美瑞格舞曲和波多黎各的普莱纳舞曲。一天晚上，她突然收到一个陌生电台，声音洪亮清晰，就像从邻居家里传来的。通过这个电

台，她听到一则令人心碎的消息：一对来到四十年前的故地重温蜜月旅行的老人，竟被载他们出游的船夫用桨打死了，为的是抢走他们身上带的钱：十四美元。当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把刊登在本地一份报纸上的整件事情的始末讲给她听时，她的感触更深了。警察发现两个老人是被活活打死的，女的七十八岁，男的八十四岁。他们是一对秘密情人，四十年来一直一起度假，但各自都有幸福而稳定的婚姻，而且子孙满堂。听小说连播时从未落过泪的费尔明娜·达萨，此刻却不得不强忍住哽在喉头的泪水。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将这则消息的剪报寄给了她，但没有做出任何评论。

这并不是费尔明娜·达萨最后一次必须强忍住的泪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没有完成六十天的幽禁，《正义报》就在头版以最大的篇幅披露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德尔奥比斯波之间可能存在的私情，还刊登了两位当事人的照片。报纸推测了他们私通的种种细节、频繁程度和方式等等，还提到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的丈夫对此欣然接受，因为他更热衷于鸡奸自己蔗糖厂中的黑人。用血红色的特大号印刷字体刊登出来的这篇报道，像一声灾难性的轰雷，震撼了本地早已四分五裂的贵族阶层。事实上，报道中没有一行字是真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从单身时起就是亲密的朋友，结婚后依旧如此，但他们从不是情人。无论如何，这篇报道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玷污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名誉，人们对他的回忆一致是充满敬意的，而是为了毁掉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的丈夫，他在上周刚刚被选为社交俱乐部的主席。没过几个小时，丑闻就被平息了。但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从此却再没去拜访过费尔明娜·达萨。费尔明娜·达萨把此举视作她默认了自己的过错。

然而，接下来的事很快就表明，费尔明娜·达萨也没能逃脱她这个阶层所要面临的危险。《正义报》残忍地攻击了她唯一脆弱的一面：她父亲的生意。当初父亲被迫远走他乡时，她只了解到他那龌龊生意中的一小段插曲，还是加拉·普拉西迪娅告诉她的。后来，乌尔比诺医生在和省长会面后向她证实了此事，但她仍然坚信，父亲是某桩卑鄙行径的牺牲品。事情是这样的：两名政府警探带着搜查令出现在福音花园的家中，从上到下搜了个遍，都没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最后，他们命令打开费尔明娜·达萨原来那间卧室中那个门上带镜子的衣柜。当时，只有加拉·普拉西迪娅一个人在家，而她又无法通知任何人，于是就借口没有钥匙，拒绝打开衣柜。这时，其中一个警探用左轮手枪的枪柄打碎了柜门上的镜子，结果发现镜子与木板之间的空隙里塞满了一百美元的假钞。这是他们原先发现的一连串线索的终点，最终指向洛伦索·达萨，表明他是一桩巨大的国际交易的最后一环。假钞做得很高明，居然带有真钞的水印：他们通过魔法般的化学手段抹掉了一美元纸币的票面，再将其印成一百美元的面值。洛伦索·达萨辩解说，衣柜是女儿结婚后很久才买回来的，假钞应该是买来时就已经藏在里边了。可警察却证实衣柜从费尔明娜·达萨上学时起就已经在那里，除了他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假钞藏到镜子后面去。这就是乌尔比诺医生当时告诉妻子的所有情况，他向省长许诺，会把岳父送回老家，以遮盖丑闻。但这一次，报纸上讲的要多得多。

报上说，在上个世纪那无数次内战中的一次，洛伦索·达萨曾是自由党总统阿吉莱奥·帕拉政府和一个名叫约瑟夫·科·科泽尼奥夫斯基的波兰人之间的牵线人。这个波兰人混在挂法国旗的商船圣安东尼号的船员中间，在本地逗留了数月，试图做成一笔不清不楚的军火生意。这位后来以约瑟夫·康拉德之名闻名于世的科泽尼奥夫斯基，不知怎么与洛伦索·达萨联系上了。后者用政府的钱向他买下了这船武器，手中

持有政府的委任状和正式收据，而且是用法定纯金支付的。之后，据报上的说法，洛伦索·达萨声称那批武器在一次偷袭中丢失了，而那次偷袭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上，他是以实打实的双倍价格把武器卖给了正在与政府作战的保守党人。

《正义报》还说，洛伦索·达萨曾以很低廉的价钱买下了英国军队一船多余的靴子，那时正值拉法埃尔·雷耶斯将军组建海军的时期，单凭这一笔买卖，他就在六个月里把自己的财富翻了一番。据报上说，这批货物到港时，洛伦索·达萨拒绝接收，因为运来的全都是右脚靴子。可当海关按照当时的法律将货物拍卖时，他却又是唯一的参加者，于是，他只以一百比索的象征性价格买下了货物。而几乎与此同时，他的一个同伙也在相同条件下买了一船进入里奥阿查港海关的左脚靴子。两批靴子配成对后，洛伦索·达萨利用自己与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族的亲戚关系，把它们以百分之两千的利润卖给了新建的海军。

《正义报》最后说道，洛伦索·达萨上世纪末之所以离开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并非像他常常爱说的那样，是要为女儿的未来寻找更好的天空，而是因为他在进口烟中掺杂碎纸屑的勾当被逮了个正着。他的手段极其精巧，就连最讲究的吸烟者也不会察觉到其中的骗局，他的生意因此十分兴隆。报纸还披露了他与一家地下国际公司之间的联系。这家公司在上世纪末利润最大的买卖便是从巴拿马非法引渡中国移民。看起来，曾最令他名誉受损的可疑的骡子生意反倒成了他唯一做过的诚实买卖。

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带着仍在灼烧的后背走下床来，第一次用雨豆树做的硬木拐杖代替雨伞出门时，去的第一个地方便是费尔明娜·达萨的家。他几乎认不出她来，在他面前的仿佛是一个备受摧残的陌生老妇，忿恨夺走了她活下去的欲望。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放逐于世

外般的养伤期间，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去看望过他两次，还把《正义报》的两篇文章给母亲带来的沮丧与绝望告诉了他。第一篇文章几乎使她丧失理智，对丈夫的不忠和女友的背叛愤怒之极，甚至放弃了每月都找某个星期日去家庭墓地祭奠的习惯，因为只要一想到他在那只盒子里根本听不见她的大声咒骂，她就不禁怒火中烧：她是在和死人吵架。她找愿意带话的人告诉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在和她上过床的那么多人中间，至少有一个男人，她也算有个安慰了。至于有关洛伦索·达萨的报道，她不知道究竟哪一点最让她难过，是文章本身，还是自己这么晚才发现父亲的真正身份。但这两者之一，或是两者一起，把她彻底击垮了。那曾将她的面容衬得高贵无比、有着纯净的钢铁颜色的头发，此时变成了黄色的玉米须，美丽的母豹眼睛即使闪烁着愤怒的火花，也已失去昔日的光芒。不愿再活下去的决心表现在她的一举一动之中。很久之前，她就已放弃了抽烟的习惯，无论是把自己关在浴室里，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可如今，她竟当众抽起烟来，而且抽得十分放纵。刚开始，她仍像从前喜欢的那样，抽自己卷的烟，但随后竟抽起从市场上买的最普通的烟来，因为她已没时间，也没耐心去卷了。事实上，除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外的任何一个男人，见此情景都一定会自问，像他这样一个跛着腿、后背像被磨破了皮的驴子一样火辣辣疼的老人，像她那样一个除了死亡已不再渴望其他任何一种幸福的女人，未来究竟还能给他们带来些什么？但阿里萨不这样想。他在灾难的瓦砾中找到了一线希望之光，因为他觉得，费尔明娜·达萨的不幸使她得到升华，愤怒使她更加美丽，对世界的怨恨使她恢复了二十岁时那桀骜的个性。

而她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感激刚刚又多了一个新理由，因为就在那两篇卑鄙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他给《正义报》发去了一封堪称典范的信，谈论报纸所应负的道德责任以及对别人应有的尊重。该信未

能得到发表，但他又把信的副本寄给了加勒比沿岸历史最悠久、态度也最严肃的一家报纸——《商业日报》。他们把信醒目地刊登到头版上。信上署的笔名是朱庇特，整封信文采斐然，有理有据，一针见血，以至于人们认为它定是出自本省最杰出的某位作家之手。那是汪洋大海中一个孤独的声音，但听上去是那么的深邃，一直传到遥远的地方。无需别人指明，费尔明娜·达萨也知道信的作者是谁，因为她看出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见解，甚至看到了一句有关道德思考的原话。因此，在她自暴自弃、心乱如麻的时候，还是怀着一种复苏的亲切接待了他。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独自一人在窗户街的卧室中，纯属偶然地发现了那些记录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思考的打字机信件的副本，以及费尔明娜·达萨手写的信件，就在一个没上锁的衣柜里。

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很高兴地看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重新登门极大地鼓舞了母亲。可他妹妹奥菲利娅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她刚一听说费尔明娜·达萨与一个品行不那么端正的男人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友谊，便立刻搭乘最早一班运送水果的轮船从新奥尔良赶了回来。从第一周起，她的惊恐就变成了一种危机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走进她家大门时对一切都很熟悉，随意自如，并且拜访一直持续到天黑后很久，其间不断传来两人的窃窃私语，偶尔还有像情人一样的短暂争吵。在乌尔比诺·达萨医生看来，两位孤独的老人情投意合是件有益健康的好事，可她却认为，那是一种无异于秘密姘居的丑陋行为。奥菲利娅一向是这个样子，她更像她的祖母布兰卡夫人，简直就像祖母的亲生女儿，甚至比女儿还像。她和她一样出类拔萃，和她一样自命不凡，也和她一样依靠偏见生活。她无法想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能有纯洁的友谊，就连五岁时都不可能，更何况八十岁。在与哥哥的一次激烈争论中，她嚷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差和母亲一起钻到她

那张寡妇床上去安慰她了。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没有勇气和她对峙，从来如此。但他的妻子为他解了围，平静地辩解道，任何年龄的爱情都是合情合理的。奥菲利娅失去了控制。

“我们这个年龄的爱情已属荒唐，”她叫喊道，“到了他们那个年龄，那就是卑鄙！”

她义无反顾，坚持要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家中赶出去。最终，她的话传到了费尔明娜·达萨的耳朵里。她把她叫进卧室——当她想说一些不让女仆听见的话时就会这样做——让她把那些指责再说一遍。奥菲利娅没有减缓语气，声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堕落行径尽人皆知，她敢肯定，他试图得到一种可疑的关系，而这会比洛伦索·达萨的胡作非为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天真冒险更加有损家庭清誉。费尔明娜·达萨一言不发地听着，甚至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但等女儿一说完，她就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她又有了生命。

“我唯一感到难过的，是没有力气用鞭子抽你一顿，那是你应得的，为的是你的无礼兼恶毒。”她说，“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出这个家，我以我母亲的遗骨发誓，只要我活着，你就休想再踏进这个家门。”

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她收回成命。奥菲利娅只好搬到哥哥家去住，并且从那里派来一位又一位德高望重的说客，转达了各种恳求。但无济于事。儿子的调停和女友们的介入都没能使她心软。最后，她用她最好岁月里的精妙口才，对一直以来与她保持着某种庸俗默契的儿媳道出了心里话：“一个世纪前，人们毁掉了我和这个可怜男人的生活，因为我们太年轻；现在，他们又想在我们身上故伎重施，因为我们太老了。”她用烟蒂点燃另一支香烟，将侵蚀着她五脏六腑的毒气彻底呼出体外。

“让他们见鬼去吧！”她说，“如果说我们这些寡妇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再也没人能对我们发号施令了。”

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奥菲利娅最终确信她的一切请求都徒劳无用时，就回新奥尔良去了。她从母亲那里唯一得到的，是允许跟她道别。这是她再三恳求后，费尔明娜·达萨才答应的，但不允许她踏进家门：她已向母亲的尸骨发了誓，对她来说，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母亲的尸骨是唯一干净的东西。

在最初的几次拜访中，说起自己的轮船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向费尔明娜·达萨发出过正式邀请，请她沿河去做一次散心旅行。而如果她愿意再坐一天火车，就可以到达共和国的首都，和同时代的大部分加勒比人一样，他们仍旧使用着首都在上世纪的旧名：圣菲。但她心中还保留着丈夫的偏见，不想去认识那座冰冷阴暗的城市。她曾被告知，那里的女人除了去望五点钟的弥撒，从不走出家门，既不能进冷饮店，也不能进公共事务场所；那里的街道每时每刻都挤满了送葬的队伍，而且从钉马掌的骡子[1]的年代起，就一直下着绵绵细雨，简直比巴黎还要糟糕。不过，她对河流有着强烈的兴趣，很想看看在沙滩上晒太阳的短吻鳄，还想在半夜被海牛那女人哭泣般的叫声惊醒。但想到自己这把年纪，又是孤身一人的寡妇，她便觉得如此艰难的旅行并不现实。

后来，当她决心没有丈夫也要继续活下去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又重提了他的邀请，她觉得可能性似乎大了一些。再后来，由于跟女儿大吵一架，再加上父亲所受的侮辱、对死去丈夫的怨恨，以及对卢克雷西娅·德尔雷亚尔虚伪恭维的愤怒——多年来，她一直视她为最好的朋友——这一切都让她痛心不已，她甚至觉得自己在家里已是个多

余的人。一天下午，她喝着那种用世界各地的叶子泡出的茶，望了一眼院中的泥塘，那棵带给她不幸的树再也不会长出新芽了。

“我真想离开这个家，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永远不再回来。”她说。

“乘船去吧。”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

费尔明娜·达萨沉思地看了他一眼。

“嗯，这是有可能的。”她说。

在说出这句话的前一刻，她其实还从未这样想过，但一旦承认了这种可能性，她就足以视其为铁板钉钉的事实了。儿子和儿媳听了很高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连忙保证，费尔明娜·达萨将在他的船上被奉为上宾，她会拥有一间专为她准备的舱室，让她感觉像在家里一样，还会享受到完美的服务，船长将亲自负责她的安全和起居。为了振奋她的精神，他给她带来了路线图，绚丽的黄昏景色明信片，还有歌颂马格达莱纳河畔原始天堂的诗篇，这些诗出自几位著名的旅行家之手，又或者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诗，他们才成了著名的旅行家。她心情好时，会把这些东西翻上一翻。

“你不必像哄小孩子那样哄我。”她说，“我去旅行，是因为我决定了要去，并不是因为对风景的兴趣。”

当儿子建议让自己的妻子陪同她去时，她断然拒绝了：“我这么大个人，不需要别人照顾。”她亲自安排了这次旅行的细节。想到那八天上行、五天下行的旅程，除了一些必需品什么都不用带，她就感到无

比轻松。半打棉制衣服、梳妆和洗漱用品、一双登船和下船时穿的鞋子，还有旅行中穿的家用拖鞋，此外别无其他：这是她一生的梦想。

一八二四年一月，海军准将、内河航运的创始人胡安·贝尔纳多·埃尔勃斯，注册了第一艘在马格达莱纳河上航行的蒸汽轮船，那是一艘四十马力的原始家伙，取名“忠诚号”。而一个多世纪以后，某个七月七日的下午六点钟，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妻子陪伴着费尔明娜·达萨登上了将载她进行第一次河上旅行的航船。这是当地船厂造出的第一艘轮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为纪念光荣的前辈，将它命名为“新忠诚号”。费尔明娜·达萨永远也无法相信，这个对他们来说如此意味深长的名字的确是历史的巧合，而非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旷日持久的浪漫主义的又一个花样。

不管怎样，与其他老式与现代的内河船都不同，“新忠诚号”在船长室旁设有一个宽敞舒适的加舱，包含一间摆着色彩喜庆的竹制家具的客厅，一间全部用中国图案装饰的双人卧室，一个同时装了浴缸和淋浴设施的卫生间，一个十分宽阔的吊着蕨类植物的封闭瞭望台（从那里可以完整地看到船的前方和两侧），还有一套安静的制冷系统，使整个环境免受外界的干扰，而且始终保持春天的气候。这套豪华的舱室被称为“总统舱”，因为到那时为止，已有三位共和国总统在此度过航程。它并不用于商业目的，而是留给高级官员和一些极为特殊的客人使用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刚被任命为CFC的董事长，就以树立公共形象为由，下令建造这个舱室，但他内心确信，迟早有一天，这里会成为他和费尔明娜·达萨新婚旅行中幸福的世外桃源。

这一天终于来了，她以女主人和夫人的身份占据了总统舱。船长迭戈·萨马利塔诺用香槟和烟熏鲑鱼款待登船的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夫妇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他身穿白色亚麻制服，从靴子尖一直到用金线

绣着CFC徽章的帽子，浑身上下完美无缺。和所有内河船长一样，他拥有木棉树般的魁梧身材、坚定果决的声音和佛罗伦萨红衣主教般的气派。

晚上七点，鸣响了第一声起航的汽笛。费尔明娜·达萨感到那回荡的汽笛声给自己的左耳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前一晚，她的梦中出现了好些不祥的预兆，她甚至不敢去分析其中的意思。一大早，她便让人把她带到离家不远的神学院墓地去，那里当时叫拉曼加墓地。她站在丈夫的墓前，自言自语地把从前压在心中的合理的斥责一股脑儿倾诉出来，最终原谅了这个死去的男人。之后，她对丈夫讲起这次旅行的细节，向他暂时告别。就像每次去欧洲旅行一样，她不想把自己出门的消息告诉其他任何人，以避免令人疲惫的送别。虽然她已有过很多次旅行，却感觉这仿佛是第一次。随着这一天的临近，她的忧虑不断增加。刚一登船，她便凄楚地感到自己被遗弃了，真想独自痛哭一场。

最后一声警示的汽笛响起时，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妻子程式化地与她道了别，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陪他们走到下船舷梯。乌尔比诺·达萨医生想为他让路，让他跟在妻子后面，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原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同去旅行。乌尔比诺·达萨医生顿时无法掩饰自己的手足无措。

“您没跟我们说过呀。”他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自己舱室的钥匙拿给他看，意思很明确：他住的只是公共甲板上的一间普通舱室。可乌尔比诺·达萨医生觉得这个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他的清白。他像遭遇了海难一般向妻子投去求助的一瞥，想为自己的彷徨无助寻找支点，但遇到的却是一双冰冷的眼

睛。她严厉地低声说：“难道你也一样？”是的，他也一样，同他的妹妹奥菲利娅一样，认为爱情到一定年龄就变得不体面了。但他善于及时做出反应，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握了握手以示告别，心中的无奈多过感激。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大厅栏杆处看着他们走下船去，正如他所等待与希望的那样，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妻子在上汽车前，转过身来看了看他，于是，他向他们挥手告别。他们也朝他挥挥手。他继续站在栏杆前，直到汽车消失在货场的尘土之中，他才回到自己的舱室，换上一套更适合在船长的私人餐厅里享用登船后第一顿晚餐的衣服。

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迭戈·萨马利塔诺船长用其四十年河运生涯的多彩故事为它增添了调料，可费尔明娜·达萨费了好大劲儿才装出开心的样子。虽然八点钟就拉响了最后一声汽笛，送行的人被请下船，舷梯也被升起，但直到船长用完晚餐，走上指挥台开始指挥，船才起锚。费尔明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站在公共大厅的栏杆旁，混在那些极力辨认着城中每一处灯火的嘈杂旅客中间，探身远眺，直到轮船驶出港湾，进入看不清的河道和散布着起伏的渔船灯火的沼泽之中，最后，它终于在马格达莱纳大河自由的空气里顺畅地呼吸起来。这时，乐队奏起了一首流行的民间乐曲，旅客中爆发出一阵欢腾，舞会在一片混乱中开始了。

费尔明娜·达萨更愿意躲到自己的舱室里去。整个晚上她都没说一句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任由她迷失在自己的思绪当中，只是在舱室前向她道了一声晚安。但她没有困意，只觉得有点冷。她建议两人一起坐上一会儿，在私人瞭望台上看一看河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两把靠背藤椅拖到栏杆前，关了灯，拿一条羊毛毯子披在她肩上，在她身边坐了下来。她从他送的一个小烟盒里取出烟丝，卷了一支，手

法熟练得让人吃惊。她把点着的一端放进嘴里，慢慢地吸着，一言不发，接着又连卷了两支，续着抽完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则一口接一口地喝下了两保温瓶的浓咖啡。

城市的灯火已消失在地平线上。从漆黑的瞭望台上看去，平缓而沉寂的河水和一轮满月下两岸的草丛，都变成了一片泛着磷光的平原。偶尔可以看到一间间茅屋，旁边点着熊熊的篝火，示意人们那里出售供轮船锅炉使用的木柴。对年轻时的那次旅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只保持着模糊的记忆，但河上的景象使那些回忆复活了，一幕幕争抢着闪现在眼前，宛如昨日。他给费尔明娜·达萨讲了当时的一些情景，以为可以使她振奋起来，可她只是抽烟，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放弃了讲述，让她独自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之中。她不断卷着烟，一支接一支抽着，直到盒里的烟丝全都抽光了。午夜过后，音乐停下来，旅客的喧闹声也消散了，变成了枕边的窃窃私语。只剩下两颗孤独的心留在黑暗中的瞭望台上，随着轮船急促的喘息声跳动。

过了好一会儿，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借着河水的反光看了看费尔明娜·达萨。她仿佛一个神秘的幽灵，雕塑般的侧影在微微的蓝色光芒下显得柔和甜蜜。他发现她竟在默默地哭泣。他没有安慰她，也没有像她希望的那样，在旁边耐心地等她眼泪流尽，而是有些惊慌失措。

“你是想独自待着吗？”他问。

“如果是，我就不会叫你进来了。”她说。

于是，他伸出冰冷的手指，摸索着黑暗中的另一只手，找到它时，他发现它正在等待着。一瞬间，两人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两

只苍老的手都不是他们在互相触碰之前所想象的样子。但片刻过后，它们就变成他们想象中的样子了。她开始讲起已故的丈夫，用的是现在时，好像他仍然活着。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明白，她是到了一个自省的时刻，她将带着尊严、带着高傲、带着无法抑制的活下去的渴望自问，她要如何对待心中这份无主的爱情。

为了把手留在他的手中，费尔明娜·达萨停止了抽烟。她迫切地渴望能理解自己。她不能想象有哪个丈夫会比她曾经的丈夫更好，然而，回忆起他们的一生，她想到更多的是挫折，而非满足，他们之间曾有太多的误解，太多无谓的争执，以及太多没有释然的怨恨。突然，她叹了口气："真无法相信，经历了那么多的吵闹与厌烦，这许多年竟还能感到幸福，见鬼，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爱情。"正当她把心里话一吐为快时，有人把月光熄灭了。轮船稳健地缓缓前行，一步接着一步，仿佛一只伺机而动的巨大猛兽。费尔明娜·达萨从热切的渴望中清醒了过来。

"现在，你走吧。"她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握紧了她的手，俯下身去，想亲吻她的面颊。她却躲开了，用沙哑而温柔的声音拒绝了他。

"已经不行了，"她对他说，"我闻起来尽是老太婆的味道。"

费尔明娜·达萨听见他在黑暗中走了出去，听见楼梯上响起他的脚步声，又听见他渐渐消失，第二天之前将不再出现。她又点燃了一支烟。正抽着，她看见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他穿着他那身完美无瑕的亚麻衣服，带着他那职业性的严肃，那令人头晕目眩的翩翩风度，以及那彬彬有礼的爱情，站在一艘往昔的船上，挥动着他白色的

帽子向她告别。“我们男人都是偏见的可怜奴隶。”有一次他对她说，“相反，当一个女人决定和一个男人睡觉时，就没有她跃不过去的围墙，没有她推不倒的堡垒，也没有她抛不下的道德顾虑，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能管得住她的上帝。”费尔明娜·达萨继续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直到天亮。她在想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但不是福音花园中那个忧郁的哨兵，那个人已无法在她心中激起丝毫思念的涟漪，她想的是此时的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却如此真实：这人一直就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她却从未认出他真实的样子。当轮船喘着粗气，拖着她驶向第一缕玫瑰色的霞光时，她唯一祈求上帝的，是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第二天应从何处重新开始。

他的确知道。费尔明娜·达萨吩咐侍者不要叫醒她，让她尽情地睡上一觉。她醒来时，床头柜上放着一个花瓶，里面插着一枝新鲜的白玫瑰，花瓣上还挂着露珠，旁边是一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信，厚厚的一沓，他一定是从她这里回去后就开始写，才能写出这么多页来。这是一封平静的信，仅仅为了表达他昨晚以来的心境：它和以往的信一样抒情，也和他所有的信一样字斟句酌，但却立足于现实。费尔明娜·达萨读完信，为自己那毫无顾忌的心跳感到有些害羞。在信的末尾，他请求她准备好之后通知侍者，因为船长正在指挥台上等着他们，想给他们展示一下轮船是如何运转的。

十一点钟时，她已准备停当，洗过澡，浑身散发着花一般的香皂气味，身着一套极为朴素的灰色纱罗寡妇服，已完全从夜晚的苦痛中恢复过来。她向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色制服、专为船长服务的侍者要了份简单的早餐，但没有让他捎口信叫谁来接她。她独自走到指挥台上，天空万里无云，有些晃眼。她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正在与船长交谈。她觉得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不是因为她此时已对他另眼相看，

而是因为他真的变了模样。他没有穿他那身穿了一辈子的参加葬礼似的衣服，取而代之的是一双舒适的白皮鞋，亚麻长裤，亚麻开领短袖衬衫，胸前的口袋上绣着他姓名首字母的花押字。此外，他头上还戴了顶苏格兰帽，也是白色的，那副他始终戴着的近视镜上则夹了一副可拆卸的深色镜片。显然，这些东西他都是第一次穿戴，而且是专为这次旅行才买的。只除了那条早已过旧的棕色皮带，费尔明娜·达萨一眼就看见了它，仿佛发现了汤中的苍蝇一般。看到他如此明显地为自己着意打扮，她的脸颊不禁泛起一抹火辣辣的红晕。跟他打招呼时，她心慌意乱。见她如此，他也慌乱起来。当两人意识到他们的举止竟像情侣一般，便越发不知所措，而当他们又意识到自己的窘态时，更是慌乱得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萨马利塔诺船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心中不禁同情地为之一颤。他把他们从尴尬中解救出来，花了整整两个小时，向他们讲解如何指挥轮船以及轮船的机械构造。他们缓慢地航行在一段看不见两岸的河道上，河水在荒芜的河滩间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与交汇处的浑浊水流不同，这里的河水平缓而清澈，在无情的烈日下闪烁着金属的光芒。费尔明娜·达萨觉得，这里就像一片被沙岛包围的三角洲。

“这是我们仅剩的一片河水了。”船长对她说。

的确，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河道的变化感到诧异。第二天，当航行变得更加艰难时，他就更是惊讶了。他发现，世界大河之一，他的父亲河马格达莱纳河，如今已成记忆中的幻影。萨马利塔诺船长向他们解释了毫无理性的滥伐森林如何在五十年里毁掉了河流：轮船的锅炉将茂密的雨林消耗殆尽，想当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旅行时还曾因那些参天的大树感到压抑呢。费尔明娜·达萨也不会看到她梦中的动物了：新奥尔良皮革厂的猎人们杀光了在河岸峭壁上一连几小时

张着大嘴装死、伺机捕捉蝴蝶的短吻鳄；随着枝繁叶茂的森林的消亡，叽里呱啦叫个不停的鹦鹉和像疯子一般吵嚷的长尾猴也逐渐销声匿迹；而用硕大的乳房在河滩上给幼畜喂奶、像悲伤的女人一样哭泣的海牛，也被寻开心的猎人用穿甲子弹灭绝了。

萨马利塔诺船长对海牛有着一种近乎母性的爱，因为他觉得它们就像是因某种误入歧途的爱情而被判罪的夫人们，而且，他相信传说，即海牛是动物王国中唯一一个只有雌性而没有雄性的物种。他一向反对人们从船上射杀海牛，但尽管有法律明令禁止这一行为，人们还是会习惯性地举枪。曾经有一个带着合法证件的北卡罗来纳猎人，违背船长的命令，用他那杆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一枪打爆了一只母海牛的脑袋，小海牛痛苦得发了疯，趴在母海牛的尸体上哭号。船长命人把孤零零的小海牛弄上船，亲自照料，而把猎人扔在了荒无人烟的河滩上，就在被他射杀的海牛妈妈的尸体旁。由于来自外交方面的抗议，船长坐了六个月牢，差点丢掉航海执照。但出狱后，他仍准备坚持己见——类似的事见一次就管一次。不过，这次事件已被载入历史：那只海牛孤儿后来在巴兰卡斯的圣尼古拉斯稀有物种动物园里长大，并且生活了许多年，它是人们在这条河上见过的最后一只海牛。

“每次经过这段河滩时，”船长说，“我都恳求上帝让那个美国佬再来坐我的船，我好再次把他扔在这里。”

起初对船长并没有什么好感的费尔明娜·达萨，此刻被这个充满柔情的彪形大汉深深打动，从这天早晨起，她就把他摆在了自己心里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她是对的，旅行才刚刚开始，日后她将有更多机会发现自己做得没有错。

费尔明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指挥台上一直待到午饭时间，那时船刚刚经过卡拉玛尔村。这个村庄在几年前还天天都像过节一样喜庆，如今，街道上却满目荒凉，成了一个废墟港口。从船上能看到的唯一生命是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正挥动手绢打着手势。费尔明娜·达萨不明白，她那么可怜，为何不把她接上船来。船长解释说，那是个溺水而死的女人的灵魂，做出欺骗的手势，为的是把船错误地引向对岸危险的旋涡。他们从离她很近的地方驶过，阳光下，费尔明娜·达萨真切地看清了所有的细节，毫不怀疑那个女人事实上并不存在，可她的脸却让费尔明娜·达萨觉得似曾相识。

那是漫长而炎热的一天。费尔明娜·达萨吃过午饭，便回到舱室去睡她那必不可少的午觉。但因为耳朵痛，她没能睡好。在“老峡谷”上游几里处，他们的船和另一艘CFC的船相遇，按规矩互相鸣笛致意，这让她的耳痛更严重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坐在大厅里打了个盹儿。和夜里一样，大部分没有舱室的旅客此刻都在那里睡觉。在离他当初看见罗萨尔芭上船的地方不远处，他在梦中见到了她。她在独自旅行，还穿着那身上世纪蒙波斯的衣服。但这一次是她，而不是那个婴儿，在那只挂在廊檐下的柳条鸟笼里午睡。这是一个既令人费解又十分有趣的梦，整个下午，他都一边和船长及两名旅客朋友玩多米诺骨牌，一边回味着这个梦。

太阳落山时，炎热消退，船上又恢复了生气。旅客们像刚从冬眠中苏醒一般，洗好澡，换上干净的衣服，纷纷露面，占据了大厅的藤椅，等待开晚饭。五点钟整，一名侍者从甲板的一头跑到另一头，在人们嘲弄的掌声中摇响教堂司事的铃铛，宣布晚餐开始。用餐时，乐队奏起方丹戈舞曲，舞会将一直持续到半夜。

费尔明娜·达萨由于耳痛的烦扰，不想吃晚饭。她看见了航船首次加装锅炉木柴的情景。那是在一个光秃秃的峭壁旁，除了成堆的木头，以及照顾这项生意的一个年迈的老头儿之外，周围什么也没有，甚至方圆几里都空无一人。在费尔明娜·达萨看来，一次如此漫长而枯燥的临时停靠，在欧洲的远洋轮船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即便在装有冷气的瞭望台里，她依旧感到酷热难耐。但当轮船重新起锚后，一阵清风吹来，仿佛让人闻到了森林内心的芬芳，船上的音乐也变得更欢快了。在希蒂奥·诺埃沃镇，只有一所房子中的一扇窗里亮着一盏孤灯，港口办公室也没有发出有货物或乘客登船的信号，因此，轮船没有鸣笛致意便开了过去。

整个下午，费尔明娜·达萨都在问自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会用什么办法在不敲开她舱门的情况下见到她。快到八点时，她再也按捺不住想跟他在一起的渴望。她来到走廊上，希望以一种看似偶然的方式遇见他。事实上，她不需要走多远：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坐在走廊的一张长靠背椅上，像在福音花园中一样沉默而忧伤，从两小时前，他就在问自己如何才能见到她。两人都露出同样吃惊的表情，但心里都清楚那是装出来的。他们一起漫步在一等舱的甲板上。那里挤满了年轻人，大部分是吵闹的学生，他们正急切地享受假期的最后狂欢，筋疲力尽地欢闹着。在小酒吧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费尔明娜·达萨也像学生一样，坐在吧台前各自喝下了一瓶冷饮。她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可怖的境地，不禁说道：“多可怕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问她在想什么，是什么带给她这样的感觉。

“我在想那对可怜的老人。”她说，“就是在小艇上被人用桨打死的那两个。”

他们在昏暗的瞭望台上畅快地长谈起来，直到音乐停歇，才回去睡觉。这晚没有月亮，天空阴沉，地平线上划过一道道无声的闪电，时而在一瞬间将他们照亮。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为她卷好一支支香烟，但她被耳痛折磨着，只抽了四支。疼痛偶尔会减轻一些，但每当他们的船与其他船只相遇，或是从某个熟睡的村庄前经过，又或是为了试探水深而缓慢前行时，它那汽笛的鸣叫声便会加剧她的痛楚。他告诉她，每当他在花会上，在热气球飞行时，在杂技脚踏车的展览中看见她，他的心情是多么激动，一年又一年里，他又是多么热切地盼望公众节日的到来，只为了能够看见她。她也曾见过他许多次，但从未想过他出现在那里仅仅是为了与她相遇。然而，不到一年前，当读到他的信时，她曾突然问自己，他怎么可能从未参加过花会的诗赛。毫无疑问，如果他参加了，一定会获奖。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向她说了谎：他只为她写作，所有的诗句都是献给她的，而只有他自己是那些诗句的读者。这时，换成她在黑暗中主动搜寻他的手，当她找到时，它并不像前一晚她的手那样在等待，而是在被抓住时惊慌失措。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心仿佛凝固了。

“女人多奇怪啊！”他说。

她发出一阵深沉的笑声，像年轻的小鸽子一般，但随即又想起小艇上的那对老人。命中注定，那影子将会一直跟随着她，但这天晚上，她承受住了，因为她觉得平静安详，这是她一生中少有的时刻：一身清白，毫无负罪感。她真想就这样一直待到天亮，什么也不说，只把他那汗涔涔的冰冷的手握在自己手中，但无奈，她忍受不了耳痛的折磨。当音乐停下来，普通舱的旅客在大厅里忙碌了一阵，纷纷挂起吊床之后，她感到自己耳痛的程度超过了想和他在一起的愿望。其实她知道，单是把疼痛告诉他就能减轻自己的痛楚，但她没有这样

做，为的是不让他担心。因为此时的她觉得自己已对他了然于心，就仿佛和他共度了一生似的，她相信，只要能让她减轻疼痛，他会下令让船开回港口。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预料到这一晚事情会如此发展，于是起身告退。走到舱室门口时，他试图亲吻告别，但她向他侧过了左脸。他一再坚持，呼吸急促起来。于是，她又凑过右边的脸颊，那妩媚的娇态甚至在她上学时他也不曾见过。他再次坚持，终于，她用双唇迎接了他。她发自内心地颤抖着，试图用自新婚之夜起就已经忘记的笑声压制住自己的颤抖。

“我的上帝！”她说，“在船上我多疯狂啊！”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战栗了一下：的确，如她先前所说，她身上有一股上了年纪的酸味。然而，当他在熟睡的旅客那一张张吊床组成的迷宫中辟出道路向舱室走去时，还是自我安慰地想，他身上肯定也有同样的味道，而且还要再老上四岁，而她一定也怀着同样的激情感受到了这一点。这是人发酵后的气味，他曾在那些最老的情人身上察觉到过，而她们也在他身上闻到过。拿撒勒的寡妇向来毫无顾忌，说的话更为刻薄：“我们闻上去已经有股兀鹫的味儿了。”两人互相忍受，是因为彼此半斤八两：我的味儿正好与你的味儿相当。然而，对阿美利加·维库尼亚，他很多时候都要小心翼翼，她身上那股襁褓中婴儿的味道时常唤起他内心母性的本能，可一想到她一定无法忍受他那股老色鬼的气味，他便十分不安。但这一切都过去了。重要的是，自从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将弥撒经书放在电报室的柜台上的那个下午，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未像今晚这样幸福过：这种幸福如此强烈，他甚至惶恐起来。

五点钟时，他才刚刚睡着，船上的会计在桑布拉诺港把他叫醒，为的是交给他一封加急电报。电报的署名是莱昂娜·卡西亚尼，于前一天发出。全部的惊恐集中于一行文字：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昨日死亡，原因不详。早上十一点，他通过电报与莱昂娜·卡西亚尼取得了联系，了解了事情的细节。他亲自操作发报设备，自从他不再当电报员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由于期末考试不及格，阿美利加·维库尼亚陷入了极度的沮丧，喝下了一瓶从学校医务室偷出来的阿片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内心深知，这并非事情的全部。但是，不，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能让人们将她的决定归咎于什么人。她的家人此刻正从父亲港赶来，是莱昂娜·卡西亚尼通知了他们，葬礼将在当天下午五点举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吸了口气。为了继续活下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这个回忆折磨他。他把它从记忆中抹掉了，尽管在余下的岁月里，他时常会不合时宜地突然想起这件不幸的事故，就像旧日的伤疤带来的那种瞬间的刺痛。

接下来的几天炎热而没有尽头。河水变得浑浊不堪，河道也越来越窄，初次旅行中曾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大吃一惊的那些纵横交错的参天大树已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烧焦的平地、被轮船锅炉耗尽的整片森林的残骸，以及被上帝遗弃的村庄的瓦砾——如今，这些村庄的街道，即使在最为干旱的时期也会洪水泛滥。夜晚，让他们醒来的不是河滩上的海牛那塞壬般的歌声，而是漂向大海的尸体恶臭。虽然战争已经结束，瘟疫也不再流行，但一具具肿胀的尸体还是源源不断地漂过。船长第一次欲言又止："我们奉命告诉旅客，这些人都是意外溺水而亡。"昔日里，鹦鹉叽里呱啦的叫声和看不见的长尾猴的喧闹，会加剧午间的闷热，而此时，只剩下荒芜的大地上无边的寂静。

供应木柴的地方少之又少，而且间隔很远，旅行的第四天，“新忠诚号”就断了燃料。船停泊了几乎一个星期，在此期间，船上的人分批深入到四处漂浮着灰烬的沼泽中去，寻找零星分散的最后几棵树木。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樵夫们已离开了林间小路，以逃避大地之神的暴虐惩罚，逃避看不见的霍乱，以及政府借转移视线的法令试图掩盖的隐秘战争。这段时间，百无聊赖的旅客搞起了游泳比赛，还组织了狩猎探险队。他们带回一只只活鬣蜥，从上而下剖开它们的肚子，取出一串串半透明、软乎乎的蛋，然后用打背包的针把肚子缝上，将那一串串蛋挂在栏杆上晒干。附近村庄的穷妓女们追随着探险队的足迹，在岸边的峭壁上搭起临时帐篷，带来音乐和酒桶，在停泊不前的轮船对面狂欢起来。

早在还没当上CFC的董事长之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多次接到过有关河流状况的警示性报告，但他几乎连看都没有看。他让股东们安心：“诸位别担心，等木柴烧光的时候，就已经有烧油的船了。”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激情使他晕头转向，从未为此事操过心，待到发现实情时，已经无计可施，除非能开辟一条新的河流。晚上，即使在河水情况最好的时候，也必须停下船来才能睡觉。此时，单是活着这件事，都变得让人无法忍受。大部分旅客，特别是欧洲人，都走出腐臭的舱室，在甲板上来回踱步以度过漫漫长夜，用毛巾一边擦拭不断渗出的汗水，一边驱赶各种活物。天亮时，他们都精疲力竭，个个被叮咬得鼻青脸肿。十九世纪初，一个英国旅行者在提及某次可能持续了五十天之久的驾独木舟与骑骡相结合的旅行时写道：“这是一个人所能经受的最糟糕、最难耐的长途跋涉。”在蒸汽船开航后的前八十年，情况已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当短吻鳄吞掉了最后一只蝴蝶，母海牛被赶尽杀绝，鹦鹉、长尾猴和村庄销声匿迹，所有都不见了踪影的时候，一切就又回到了老样子，而且将永远持续下去。

“没关系。”船长笑着说，“几年后我们再来时，将开着豪华汽车跑在干枯的河床上。”

旅行的前三天，费尔明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保护在瞭望台柔和的春光里。但自从木柴定量配给、冷气系统无法运行，总统舱就变成了一只蒸汽咖啡壶。她借着从敞开的窗子吹进来的河风，才得以熬过夜晚的难关，还得不停地用毛巾驱赶蚊子，因为船停泊时，杀虫剂喷筒已毫无用处。耳痛变得无法忍受。可一天早上她醒来时，疼痛突然消失了，就像一只唱破了肚皮的知了，歌声戛然而止。直到晚上，她才发现左耳已失去听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左边跟她说话时，她不得不转过头才能听见。她没有告诉任何人，顺从地忍受着，这不过是在年龄带来的那许多无法挽回的缺陷上再加一条罢了。

不管怎样，轮船的延误对他们来说是天意的磨难。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读到过这样一句话：“灾难中的爱情更加伟大而高尚。”总统舱里的潮湿使他们沉浸在一种超乎现实的昏睡之中，这种环境更容易使人相爱而互不询问。在难以想象的漫长时间里，他们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栏杆前的靠背椅上，手拉着手，缓慢地亲吻，陶醉于爱抚之中，从不会因失去耐心而扫兴。第三个昏沉的夜晚，她准备了一瓶茴香酒等他到来。她曾同伊尔德布兰达那群表姐妹们一起偷偷喝过这种酒，结婚生子之后，她又和那个本不属于她的世界的女友们一起关起房门来喝过。此刻，她需要让自己糊涂一点，为的是不必太清醒地去思索命运。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以为，她这样做是为了鼓起勇气迈出最后一步。在这种幻想的驱使下，他大起胆子，用手指肚探索着她那干瘪的脖颈，她那仿佛装着金属骨架的胸部，骨骼已被销蚀的臀部，以及那老母鹿般的大腿。她闭着眼，心满意足地任他抚摸，但并没有颤

抖，只是抽着烟，时不时地呷一口酒。最后，当他的爱抚滑至她的小腹时，她的心里已经充满了足够的茴香酒。

“如果我们一定要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那就干吧。”她说，“不过要像成年人那样。”

她把他带到卧室，亮着灯，开始毫不扭捏地脱起衣服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仰躺在床上，努力控制着自己，他又一次在杀死老虎后不知该如何处置虎皮了。她对他说：“你别看。”他问为什么，视线始终没有离开天花板。

“因为你不会喜欢的。”她说。

于是，他瞥了她一眼，看见她赤裸的上身，跟想象中的一模一样。她的肩膀布满皱纹，乳房耷拉着，肋骨被包在一层青蛙皮似的苍白而冰凉的皮肤里。她用刚刚脱下来的衬衫挡在胸前，关掉了灯。这时，他坐起身来，在黑暗中脱下衣服，每脱一件就扔到她身上，而她又把它们扔回去，笑得前仰后合。

两人仰面朝天地躺了好一阵子。随着醉意退去，他越来越不知所措。她却很平静，几乎失去了意志力，但她祈求上帝不要让自己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就像每次喝多了茴香酒时那样。他们交谈着，为的是消磨时间。他们谈起自己，谈起各自不同的生活，谈起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性：就在应该去思考时间对他们来说已所剩无几、只能用来等死的时候，他们却赤身裸体地躺在一艘停泊轮船的漆黑舱室里。在他们的城市，一切甚至在发生之前就会尽人皆知，可她却从未听说过他有女人，一次也没有。她以一种随意的方式提及此事，而他立刻做出了回答，声音中没有一丝颤抖：

“那是因为我为你保留了童贞。”

即便这是真的，她也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因为他写的那些情书里也尽是一些这样的句子，其价值并不在于它们准确的含义，而在于那种令人头晕目眩的力量。但她喜欢他说这话时的勇气。而此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突然问了自己一个从未敢问过的问题：她在婚姻之外，还有过怎样不为人知的生活。无论答案是什么，都不会让他感到惊奇，因为他知道，在秘密冒险这方面，女人和男人一样：同样的狡诈伎俩，同样的心血来潮，同样的没有丝毫愧疚的背叛。但他没有张口问她，这是对的。曾经，在她和教会的关系相当不愉快的那段时期，忏悔神甫竟出其不意地问她是否对丈夫有过不忠。她直接站了起来，没有回答，没有做完忏悔，甚至没有向神甫告别。此后，她再也没有做过忏悔，无论是向这位神甫，还是向其他任何一位神甫。此刻，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谨慎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回报：她在黑暗中伸出手去，抚摸着他的小腹，他身体的两侧，以及他那几乎已经没有毛发的耻骨。她说：“你的皮肤就像婴儿一样。”接着，她迈出了最后一步：她寻找着它，发现它并不在那里，她继续无望地找着，终于找到了那个手无寸铁的东西。

“它死了。”他说。

这种事在他身上常常发生，他已学会了和这个幽灵共处：只是每一次他都像第一次似的，要重新去学习面对之法。他拿起她的手，把它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费尔明娜·达萨几乎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他那颗不知疲倦的老人之心正以年轻人的力量、速度和慌乱跳动着。他说：“过多的爱和过少的爱都对它有害。”但他说这话时并没有信心，事实上，他羞愧难当，正和自己怄气，渴望找个理由把失败归咎于她。她看出了这一点，开始用嘲弄似的爱抚挑逗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

身体，就像一只残忍地幸灾乐祸的温柔小猫。终于，他无法再忍受这种折磨，起身回自己的舱室去了。她一直想着他，直到天亮，终于确认了自己对他的爱。随着茴香酒带来的醉意散去，她独自漂浮在缓慢的海浪中，忧郁渐渐袭上心头，她担心他生她的气，不会再来了。

然而，他当天就来了，在上午十一点这个不同寻常的时间，还容光焕发，精神抖擞。他带着某种炫耀的神情，当着她的面脱光了衣服。在光天化日之下，她高兴地看到他和自己在黑暗之中想象的一模一样：一个没有年龄的男人，皮肤很黑，像撑开的伞一样光亮、紧绷，除了腋下和耻骨处几根稀疏而平直的毛发，浑身再无其他茸毛。他的侍卫昂首挺立，她发现他并非偶然让她看见他的武器，而是像炫耀战利品一样有意地展示，以鼓舞自己的士气。他甚至没给她时间脱掉她在清晨吹起微风时穿上的睡衣，这种新手般的仓促慌乱使她因感到同情而浑身一颤。但这并没有令她不快，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她很难分清自己是出于同情还是爱情。然而，做完之后，她却感到心里空荡荡的。

这是她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做爱。整个过程中，她因为好奇而恍惚出神，体会着停歇了这么久之后，又在这样一个年龄，再做这件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但他没有给她足够的时间，让她想清楚自己的身体是否也同样爱他。一切迅速而可悲。她想："现在可好，我们把事情搞砸了。"但她错了。尽管他们都有些失望，尽管他为自己的笨拙而后悔，尽管她因茴香酒带来的疯狂而内疚，在余下的日子里，他们却片刻也没有再分开过，甚至连吃饭都几乎没再走出过舱室。萨马利塔诺船长凭借着本能，向来能够洞悉他的船上任何一个试图隐藏的秘密。他每天早上派人给他们送来白玫瑰，夜晚为他们演奏他们那个时代的华尔兹小夜曲，还打趣似的吩咐厨师为他们准备添加了催情佐料

的食物。此后很久，他们才又一次尝试了做爱——等到灵感自然而然地找上门来，而非他们刻意去寻找灵感。能够待在一起，这种简单的幸福对他们来说就已经足够。

他们从未想过要走出舱室，直到船长用一张纸条通知他们，经过十一天的航行，船在午餐后就将到达此行的最后一个港口：黄金港。费尔明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舱室中看见，山冈上的房子在苍白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便自以为理解了港口名字的由来，但当他们感到空气蒸得像在锅炉里一样，看见街道上的沥青都已沸腾时，又觉得那个名字没那么贴切了。他们的船并没有停靠在港口这边，而是停到了对岸，那里是开往圣菲的火车的起点站。

旅客们一下船，他们就离开了自己的避难所。费尔明娜·达萨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呼吸着未受污染的新鲜空气。两人从船舷上望向一群喧嚷躁动的游客，他们正在一列玩具一样的火车车厢里寻找自己的行李。他们很可能来自欧洲，尤其是那些女人，她们身上罩着的北欧式的大衣和上世纪的帽子同这里尘土飞扬的夏日气候格格不入。一些女人的头发上还装饰着的美丽的土豆花，已经开始在炎热中枯萎。他们坐了一天的火车，穿过梦幻般的大草原，刚刚从安第斯平原来到这里，还没来得及换上适合加勒比的衣服。

在喧闹的市场中，一位看上去很可怜的老人正从乞丐外衣的各个口袋里掏出一只只小鸡来。他是突然从人群中挤出来的，身上那件破烂不堪的大衣显然曾属于一个比他魁梧得多的人。他摘下帽子，口朝上放到码头上，看看是否有人愿意往里面扔一枚硬币。接着，他从各个口袋里掏出一只一只稚嫩的、几乎没有颜色的小鸡来，仿佛是从他的指间繁殖出来的。一时间，码头上像铺了一层小鸡地毯，它们惊慌失措地啾啾叫着，到处乱跑，有些匆忙的旅客把它们踩在脚下都全然

不知。费尔明娜·达萨被眼前神奇的景象迷住了，她觉得这仿佛是在欢迎她的到来，因为只有她看到了这一切。她看得出神，甚至没有注意到返程的旅客是何时开始上船的。她的节日狂欢结束了：在陆续登船的人中，她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其中一些是她的朋友，前不久还曾在服丧期间陪伴过她。她仓皇地躲回舱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发现她万分沮丧：她宁愿死，也不愿被那个圈子中的人发现她在丈夫刚去世不久就愉快地出门旅行。她的垂头丧气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心疼不已，他发誓要想出办法来保护她，而不是让她像坐牢似的待在舱室里。

当他们在私人餐厅用晚餐时，他突然想出了主意。船长一直在为某个问题烦恼，好久以前就想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讨论一下，但阿里萨总是以他那一贯的理由避而不谈："这些琐事，莱昂娜·卡西亚尼比我处理得更好。"然而，这一次他仔细听了船长的话。事情是这样的，船上行时载着货物，回程却是空的，而载客情况却正好相反。"载货是有利的，付的钱多，而且货物还不用吃饭。"他说。费尔明娜·达萨的这顿晚餐吃得索然无味，两个男人就设立不同票价制度的好处进行的冗长讨论让她感到无聊。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坚持到最后，才提出了一个在船长看来可能是拯救方案之前奏的问题：

"我们来假设一下，"他说，"有没有可能做一次直航，既不载货，也不运送旅客，不在任何港口停靠，总之就是，途中什么都不做？"

船长说，这只在假设中成立。CFC有各种劳务协议，这一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比谁都清楚，关于载货、载客、邮件运输以及其他很多项义务都签有合同，其中大部分是不能推卸的。唯有一种情况可以跳过一切条款，那就是船上发生瘟疫。轮船宣布进入隔离检疫，升起黄旗，在紧急状态下航行。由于沿河出现过很多次霍乱，萨马利塔诺船

长曾有好几次不得不这样做，尽管后来卫生部门强迫医生签署了死者死于普通痢疾的证明。此外，在这条河流的历史上，很多时候轮船升起代表瘟疫的黄旗是为了逃避税收，或是不愿搭载某个乘客，又或是躲避不合时宜的检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桌下找到了费尔明娜·达萨的手。

“那么好，”他说，“我们就这么办。”

船长大吃一惊，但很快，他就凭着自己老狐狸的本能洞察了一切。

“我指挥这条船，而您指挥我们所有人。”他说，“因此，如果您是认真的，就请给我一份书面命令，我们马上开船。”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当然是认真的。他签署了命令。不管怎么说，谁都知道，尽管卫生部门对形势估计乐观，但霍乱时期远未结束。至于船本身，并不是问题。已经装船的货物本就不多，它们被转移到了别的船上，旅客则被告知轮船的机器出了故障，当天清晨已被安排搭乘其他公司的一艘轮船。如果说这样做的理由并不道德，甚至有些令人不齿，但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来，既然都是为了爱，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不合理不合法的。船长唯一的请求是在纳雷港停一下，把一个陪他旅行的人接上船来：他也有自己隐秘的心思。

于是，“新忠诚号”在第二天天蒙蒙亮时就起锚了。没有货物，也没有旅客，主桅杆上一面标志着霍乱的黄旗欢快地飘荡。傍晚时，他们在纳雷港把一个比船长还要高大结实的女人接上了船。她的美与众不同，只差一把胡子就可以被马戏团聘用了。她叫塞娜依达·内维斯，可船长却称呼她“我的魔女”。她是船长的老情人，他常常把她从一个

港口接上船，再在另一个港口放下，而且每次她一登船，便会带来一股幸福的劲风。在这个令人伤心的死亡之地，看着恩维加多的火车在昔日骡子走过的飞檐般的峭壁上吃力爬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心中不由泛起对罗萨尔芭的思念。正在此时，亚马逊的暴雨倾盆而下，在余下的旅途中几乎没有停歇过。但谁都没有在意：旅行中的狂欢自有其避风挡雨的屋檐。那天晚上，作为个人对狂欢的贡献，费尔明娜·达萨在船员们的欢呼声中下了厨房，为大家做了一道她自创的菜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将其命名为“爱情茄子”。

白天，他们玩牌，吃到肚皮要爆炸，午觉也睡得酣畅淋漓，以至于醒来时精疲力尽。太阳刚一下山，乐队便开始演奏，他们饮茴香酒吃鲑鱼，直到餍足还不罢休。这是一次快速旅行，船轻水顺：那个星期乃及整个旅途中都在下雨，上游涨起的水滚滚而下，改善了河流的状况。一些村镇怀着同情为他们鸣炮驱赶霍乱，他们则用汽笛的哀鸣表示谢意。途中，无论哪家公司的船与他们相遇，都向他们发出致哀的信号。在马冈盖镇，梅塞德斯出生的地方，他们备足了余下旅程所需的所有木柴。

当费尔明娜·达萨那只好使的耳朵又听到轮船的汽笛声时，她吓了一跳，但在畅饮茴香酒的第二天，她的两只耳朵就都听得比以往更清楚了。她发现玫瑰花比从前更香，鸟儿黎明时的歌声也更动听了。她还发现，上帝又造了一头海牛，把它放到了塔玛拉梅克的河滩上，目的就是把她唤醒。船长也听到了海牛的叫声，命令改变航向。于是，他们看见了这个体形巨大、刚刚分娩的母亲，它正把幼子抱在怀中喂奶。无论是弗洛伦蒂诺还是费尔明娜，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彼此间是多么情投意合：她帮他灌肠，在他之前起床为他刷净他睡觉前放在杯中的假牙；她总找不着眼镜的问题也解决了，因为她看书和缝补时可以

戴上他的眼镜。一天早上她醒来，见他正在昏暗中钉衬衫上的纽扣。在他说出那句"男人需要两个妻子"的仪式性话语之前，她赶忙把活儿抢到自己手中。而她唯一需要他做的，只是给她拔火罐消除背痛。

至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则开始用乐队的小提琴来抒发旧情。只练了半天，他便能为她演奏"花冠女神"的华尔兹。他几小时不间断地拉着这首曲子，直到大家不得不强迫他停下来。一天夜里，费尔明娜·达萨平生第一次在痛苦而非愤怒的哭泣中因窒息醒来，由于她又想起了那两个在船上被桨活活打死的老人。一直下个不停的雨反倒没有在她心中激起波澜，她为时已晚地想着，或许巴黎并不像自己感觉的那样阴郁，圣菲的街道上或许也并没有那么多葬礼。未来再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起出游的梦想在天边浮现：那将是一次又一次疯狂的旅行，不带箱子，没有应酬：纯粹的爱之旅。

到港的前一天晚上，他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晚会，四处挂起纸花环和彩灯。黄昏时，雨停了。船长和塞娜依达搂得紧紧地跳了几曲波莱罗舞，在那年月，这种舞正开始迷醉人心。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大着胆子向费尔明娜·达萨提议，他们也伴着那首只属于两人的华尔兹跳上一曲，但她拒绝了。不过整个晚上，她都在用脑袋和鞋跟打着拍子，甚至有那么片刻，当船长和他那温柔的魔女在昏暗中如胶似漆地跳着波莱罗时，她竟不知不觉地在椅子上舞动起来。她喝了那么多茴香酒，以至于最后大家不得不扶着她走上楼梯。她突然一边哭一边笑起来，让所有人都慌了手脚。但在舱室里那凝滞的香气中，她最终控制住了自己。他们平静而健康地做了爱。这是满脸皱纹的祖父祖母之间的爱，它将作为这次疯狂旅行中最美好的回忆，铭刻在两个人的记忆之中。同船长和塞娜依达猜想的不同，他们之间的感觉并不像新婚燕尔的夫妇，更不像相聚恨晚的情人。他们仿佛一举越过了漫长艰辛的

夫妻生活，义无反顾地直达爱情的核心。他们像一对经历了生活磨炼的老夫老妻，在宁静中超越了激情的陷阱，超越了幻想的无情嘲弄和醒悟的海市蜃楼：超越了爱情。因为他们已在一起生活了足够长时间，足以发现无论何时何地，爱情始终都是爱情，只不过距离死亡越近，爱就越浓郁。

六点钟，他们醒了。她的头因昨晚的茴香酒还剧烈地疼着，而且心慌意乱，因为她仿佛觉得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回来了，比从树上摔下去时更胖了一些，也更年轻了，正坐在家门口的摇椅上等着她。然而，她很清醒地意识到，这并非茴香酒产生的作用，而是对马上就要到家的恐惧。

“这就像要死了一样。”她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吃了一惊，因为她的话道破了自返程起就时刻折磨着他的一个想法。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想象自己在舱室以外的另一个家里，吃着与船上不同的饭菜，投身到一种对他们来说将永远陌生的生活中去——那真的像死一样。他再也睡不着，仰面躺在床上，双手交叉枕在脑后。片刻之后，对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的回忆刺痛了他，他蜷起身子，再也无法逃避真相。于是，他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痛痛快快、从容不迫地大哭了一场，直至哭尽最后一滴眼泪。也只有在这时，他才有勇气向自己承认他曾多么爱她。

当他们起床穿好衣服准备下船时，轮船已把昔日西班牙人关口的狭窄水道和沼泽抛到身后，行驶在海湾破旧的船骸和废弃的油罐之间。一个灿烂的星期四从这座总督之城的金色穹顶上徐徐升起。然而，站在栏杆前的费尔明娜·达萨已无法忍受它那腐臭的荣耀，以及那

些早已被黿蜥亵渎的城堡的高傲：可怕的现实生活。两人都没有说话，但无论他，还是她，都感到自己无法如此轻易地屈服投降。

他们在餐厅里找到了船长。他那副狼狈的样子与平日里的干净利落判若两人：胡子没刮，双眼因失眠而布满血丝，衣服上还浸着昨晚的汗水，说话颠三倒四，不时地打着茴香酒嗝。塞娜依达还在睡着。当他们开始默默地吃早餐时，港口卫生局的汽油快艇命令他们把船停下来。

船长从指挥台上大声叫嚷着回答了武装巡逻队的问话。他们想知道船上染的是什么瘟疫，有多少旅客，又有多少病人，传染的可能性有多大。船长回答说，只有三名旅客，得的全是霍乱，但一直处于严格的隔离之中。无论是那些本应在黄金港上船的旅客，还是二十七名船员，都没和他们有过任何接触。但巡逻队队长并不满意这个回答，命令他们离开海湾，在为船办理隔离手续期间，他们要在拉斯·梅塞德斯沼泽等候到下午两点。船长狠狠地咒骂了一句，做了个手势，命令领航员掉头回沼泽去。

费尔明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餐桌前听到了这一切，船长却好像满不在乎。他继续默不作声地吃着饭，糟糕的心情一目了然，已顾不上保持内河船长在礼仪和修养方面一贯的好名声。他用刀尖剖开盘子里的四只煎鸡蛋，把它们同整块整块的油炸青香蕉卷在一起塞进嘴里，带着野蛮的喜悦大嚼起来。费尔明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就像坐在学校板凳上等待宣读期末考试成绩的学生。在船长和卫生局的武装巡逻队对话时，他们彼此一句话也没有说，今后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他们心中一点主意也没有。但两个人都清楚，船长正在为他们打算：从他太阳穴的跳动就可以看出。

就在船长打发掉那盘煎鸡蛋和油炸香蕉块，喝光一罐牛奶咖啡时，轮船带着安安静静的锅炉，驶出了海港，穿过狭窄的水道，在一层厚厚的凤眼莲、深紫色的莲花和心形的大荷叶中间开出一条路来，返回沼泽地去了。水面上闪着银光，到处都漂浮着横陈的死鱼，全是被偷偷捕鱼的渔民用炸药炸死的。陆地和水上的鸟儿在它们的上空盘旋，发出金属般刺耳的叫声。加勒比的海风伴随着鸟儿的喧闹从窗户飘了进来。费尔明娜·达萨感到自己血液中的自由意志一阵沸腾。右边，马格达莱纳大河潮淹区的河水，浑浊而缓慢地向世界的另一边延伸。

当盘子里再没有东西可吃时，船长用桌布的一角抹了抹嘴，放肆无礼地大骂了一通黑话，彻底毁掉了内河船长言行文雅的美誉。他不是冲他们，也不是冲着任何人说的，只是想要发泄心中的怒火。在一连串粗鲁的咒骂之后，他的结论是他实在不知道如何才能走出霍乱黄旗带来的困境。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眼睛都不眨一下地听他说完。然后，他透过窗子看了看航海罗盘上那一整圈刻度表，又望了望清晰的地平线，望了望十二月万里无云的天空和可以永远航行下去的一望无际的水面，说：

“我们走，一直走，一直走，重回黄金港！”

费尔明娜·达萨浑身一震，因为她听出了昔日那个被圣神恩典照亮的声音。她看了看船长：他是他们命运的主宰者。但船长没有看她，他被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灵感的巨大力量震慑住了。

“您此话当真？”他问他道。

“从我出生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说，“就没说过一件不当真的事。”

船长看了看费尔明娜·达萨，在她睫毛上看到初霜的闪光。然后，他又看了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到的是他那不可战胜的决心和勇敢无畏的爱。这份迟来的顿悟使他吓了一跳，原来是生命，而非死亡，才是没有止境的。

“见鬼，那您认为我们这样来来回回的究竟走到什么时候？”他问。

在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天以来的日日夜夜，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直都准备好了答案。

“一生一世。”他说。

---

[1] 钉马掌的骡子，典出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等国的一个传说。西班牙殖民时期，一个穷苦人家的姑娘嫁给一个西班牙贵族青年后，忘了本，最后受到上天的惩罚，变成一头钉马掌的骡子。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族长的秋天
加西亚 · 马尔克斯 著
轩乐 译
他在自己的荣光中如此孤独，
孤独得连一个敌人都没有剩下。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轩乐 译

族长的秋天

南海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族长的秋天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译者：轩乐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4-06

ISBN：9787544269209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正文

周末，一些兀鹫钻进了总统府的阳台，啄断了金属窗栅，振翅搅乱了屋内凝滞的时光，礼拜一的黎明时分，城市从几个世纪的昏睡中苏醒，一阵温软的微风拂过，伴着伟大的死尸与腐朽的伟大散发出的气息。直到此时我们才敢进去，并且无须像最勇猛的人期望的那样，强攻残败的石砌加固墙，也不必如另一些人建议的那般，用双驾牛车撞掉正门，因为只需一推，曾在这座府邸的英雄时代抵御过威廉·丹皮尔炮火的装甲大门便会转着合页屈从退让。就仿如进入了另一个时代的域界，因为在权力的空阔藏身之处的废窟中，空气更加稀薄，寂静更加古旧，而事物在颓弱的光线下已模糊难辨。我们走在第一个庭院中，那里的铺地细砖败给了杂草来自地下的压力，我们沿路看到逃跑的卫队散乱扔下的装备、丢弃在柜中的武器，以及一张粗木长桌，桌上摆着那场被恐慌打断的礼拜日午宴的残羹剩饭，我们看到幽暗光影间的一排宽敞平房，那里曾是民政办公室的所在，彩色的蘑菇和苍白的百合生长于尚未处理的公文之间，这些案牍的处理流程通常比最荒芜枯燥的生活都要漫长，我们看到庭院中间的洗礼池，曾有不止五代人在这里通过军事圣礼受洗，我们看到院子尽头总督那被改造成车库的旧马棚，继而看到山茶和蝴蝶之间停放着的噪音年代的四轮马车、瘟疫时期的运输车、彗星年代的彩车、有序进步时代的灵车、第一个和平世纪的梦游加长轿车，它们全部漆成了那面旗帜的色彩，在覆满尘土的蜘蛛网下被保存得完好无损。在下一个院落中，于一排铁栅栏后方，生长着一片蒙着月球尘埃的玫瑰花丛，在它雪白枝叶的阴影下，安睡着这座宅子鼎盛时期的麻风病人，他们在遗忘中腐化繁衍得如此猖狂，使这阵阵的玫瑰花香不再留有一丝干净无味的空气罅隙，

它混杂着从花园深处飘来的瘟疫的恶臭，混杂着鸡舍的腥臭，混杂着挤奶棚中母牛与卫兵的粪便和尿液发酵后的骚臭：这挤奶棚早先曾是有兵士守护的殖民地大教堂。迈步穿过令人窒息的杂草，我们看到有盆栽石竹、丛生的印加百合与三角梅相伴的拱廊，那里从前是妾侍们的破落屋舍，从生活垃圾的种类和缝纫机的数量上来看，可能曾有上千个女人带着她们成群的七个月的早产儿居住于此，我们看到厨房里如浴战火般的疮痍、阳光下洗衣池里朽烂的衣裳，以及妾侍与士兵混用的厕所暴露在外的阴沟，在尽头，我们看到几株巴比伦白柳，很久以前，它们带着自己的泥土、带着它们的浆液与细雨，被巨大的海运温室从小亚细亚载送过来移植在这里，在柳树后方，我们看到了民政大楼，它雄伟而哀伤，仍不断有兀鹫从破了洞的百叶窗钻入它体内。我们并不需要像预想的那样费力撞开大门，因为仿佛仅凭声音的推动它就已自动敞开，我们沿灰岩楼梯爬上主层，那石阶上铺就的歌剧院地毯已被母牛的蹄子踏得碎烂不堪，从第一门厅到私人寝室，我们沿路看到多个已成废墟的大小办公室，母牛木然地穿梭其中，咀嚼着天鹅绒窗帘，啃噬着扶手椅的缎面，我们看到破旧的家具与鲜软的牛粪之间散落的圣徒与军人的恢宏画像，看到一个被母牛吃光了的餐厅、一间被母牛的喧杂玷污了的乐室、几张被母牛毁坏了的多米诺骨牌桌以及绿毡被母牛啃秃了的台球桌，我们看到一架扔在角落的鼓风机，它可以仿造来自指南针上任何方向的海风，慰藉府中的人们对那片已经消失的海洋的怀念，我们看到随处悬挂的鸟笼上依然蒙着上礼拜某个夜晚的布罩，我们透过一扇扇窗户看到了这个城市，它仿佛一头伏地酣睡的巨兽，对正开始度过的这个历史性的礼拜一毫无概念，我们看到城市的那一边有广阔无垠的平原伸向天际，那里曾是一片汪洋，而如今只能看到一个个被粗糙的月球尘埃所覆盖的死火山口。在那个只有极少数特权人士才见识过的禁区内，我们第一次闻到了兀鹫寻食的腐肉味道，觉察到了它千年的咳喘和预卜的本能，由它翅膀扇起的

弥漫着腐烂气味的风指引，我们在会客厅看到了母牛被蛆虫蛀蚀后拱顶一般的躯体，在数面全身镜中它们雌性动物的后臀被反复映现，随后我们推开一道旁门，它通向掩于墙后的一间办公室，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他，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和军靴，左脚靴后跟扣有一根金质马刺，他比所有人、比所有陆上的水里的动物都更加年迈，面朝下趴在地上，弯着右臂垫在脸下当作枕头，在孤独暴君的漫长生命中，他用这样的姿势睡过了一个又一个黑夜。当我们把他翻转过来想看看他的脸时才意识到，即便他的面容没被兀鹫啄烂，也无人能将他辨认出来，因为我们之中没有哪一个见过他，尽管他的头像被刻在硬币的两面，被印在邮票上、净化剂的标签上、疝气带和僧侣的披肩上，尽管印着祖国的蛟龙标志、展现他胸裹那面旗帜的肖像的镶框版画无时无处不充斥眼前，也无人能将他辨认出来，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在彗星年代就已被认为是失真之作的复制品，我们的父辈所认识的他仅仅源自他们父辈的讲述，正如他们的祖辈曾讲给他们父辈听的那样，我们从小就习惯性地认为他活在那座权力之屋里，因为曾有人在一个节日之夜看到被点亮的彩光球，因为有人说曾在总统专车上看到了那悲伤的双眼、苍白的双唇，看到那隔着帷幔若有所思地向着无人缓缓道别的手，还因为在多年之前的一个礼拜日，一个流浪的盲人，一个只收五分钱就会朗诵被遗忘的诗人鲁文·达里奥的诗句的流浪盲人，被带去了他那儿，回来时美滋滋地揣着一枚货真价实的莫洛克塔金币，那是他为他个人奉上了一场诗歌朗诵会的报酬，流浪汉当然没有看到他，但这并非因为他是个盲人，而是因为自黄热病时期以来，没有任何凡人见过他，然而我们知道他在那里，我们知道，是因为世界继续运转，生活继续前行，邮件继续送达，是因为在武器广场上覆满尘土的棕榈树下，在萎靡的街灯下，市政乐团仍旧举办着愚蠢的礼拜六华尔兹音乐会，同时不断有年迈的乐手填补死去乐手的空位。近些年来，府中再也听不到人声嘈杂、鸟雀歌唱，装甲大门也永

远合上了，但我们知道民政大楼里仍有人在，因为靠海那侧的窗户晚上会透出导航灯一般的光亮，壮着胆子凑近的人还听到蹄子踩踏的纷乱声响以及围墙里大型动物的喘息，一月的一个下午，我们看到一头母牛在总统府的阳台上欣赏落日，您想象一下，一头母牛在国家的第一阳台上，这是什么世道，什么狗屎国家，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母牛不会爬楼梯，更何况是石砌阶梯，上面还铺着地毯，于是围绕为什么会有一头母牛跑到阳台上的问题出现了多种猜测，到最后我们已分不清究竟是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它，还是某天在武器广场上边走边幻想出了一头母牛出现在总统府阳台上的情形，那阳台已有多年没出现过任何东西，也不会有任何东西出现，直到上个礼拜五黎明时分第一批兀鹫的到来，它们离开了贫民医院的屋檐，那个它们先前用来打盹的栖身之所，一波一波地从内陆飞来，从昔日是海今日是尘埃之海的地平线飞来，一整日都在权力之屋上方慢慢回旋，直到一只周身洁白、颈羽鲜红的鸟王抛出无声的命令，于是玻璃的破碎声纷乱起伏，伟大死尸的味道渐渐飘出，而兀鹫从玻璃窗钻进钻出的景象只有在无主之屋中才会出现，因此我们也斗胆进去，在荒凉的圣殿中看到了伟大所残留的废墟，看到了被啄烂的身躯，看到了有着少女肌肤的光滑的手以及它无名指指骨上戴着的权力之戒，他周身长满了细小苔藓与深海寄生虫，以腋下与腹股沟最为密集，他患了疝气的睾丸上裹着帆布带，那部位膨肿硕大犹如阉牛肾脏，但却是兀鹫唯一避而不食的地方，即便那时，我们也不敢相信他已经死去，因为那是他第二次被发现死在那间办公室里，孤身一人、穿戴齐整，无异于睡梦中的自然死亡，正如多年前巫婆盆中的预卜之水宣称的那样。他们第一次找到他时，他的秋天才刚刚开始，国家还算兴旺，兴旺到他孤身一人在卧室时仍能感受到死亡的威胁，但他却仿佛知道自己注定永生般管理着国家，那时的总统府更像个市场，若想在里面迈步前行，需从赤脚勤务兵中破开一条路，他们正在走廊上为运送蔬菜和鸡笼的驴子卸下货物，需从带

着教子的妇女身上跨过，那些孩子饥饿难耐，在台阶上蜷身而睡，等待着政府发慈悲的奇迹，还需避开满嘴秽语的妾侍们泼出来的汩汩污水，她们用新鲜的花代替瓶中过了夜的花，她们清洗地面，在阳台上晾晒地毯，并伴着枯枝敲打毯面的节奏唱着虚妄爱情之歌，这一切的周围，还能听见终身官员因看到母鸡在书房的抽屉中下蛋而发出的大呼小叫和鸟雀纷乱的啾啁，还能看到厕所中妓女和士兵的来来往往以及会客厅里流浪狗的打闹，在那座大门敞开的宫殿里，无人知晓谁是谁而又代表谁，在它非同寻常的混乱里，根本无法确定政府究竟在何处。大宅之主不仅参与到这集会般的灾难中，同时也是它的鼓动者和指挥者，在公鸡打鸣之前，只要他卧室的灯一亮，总统卫队的起床号就会响起，向附近的公爵领区传达新一天到来的通知，后者会将号声传向圣赫洛尼莫基地，基地又会将之传向港口碉堡，而港口碉堡则会连吹六声号角，首先唤醒这座城市，随后唤醒整个国家，这个时候他已经坐在可移动式马桶上用双手捂住耳朵，试图止息那会儿刚开始困扰他的耳鸣，他一面沉思，一面望着那片变化无常的黄水晶般的海洋上来往船只的光亮，在荣光年代的彼时，那片海还存在于他的窗前。自从将这栋大楼占为己有，每一天，他都会在牛棚中细心查看挤奶的过程，并用手量出三辆总统府木轮大车需为各个城区配送的奶量，当他在厨房里就着木薯饼喝下大杯黑咖啡时，心中并不知晓新日程的疾风会将他拖向何方，他总是留心女仆间的闲谈，在府中只有她们与他用相同的语言，她们严肃的奉承之辞他最为看重，她们的各种心思他最善解读，快到九点时，他会来到自己隐秘院落中的花岗岩浴池，在杏树丛的阴凉下，在泡满药草的热水中不紧不慢地泡澡，直到十一点过后，他才能抑制住清晨的忧虑，才能面对现实中的种种意外。之前，在海军陆战队占领时期，他会将自己锁在办公室内，和登陆部队的司令一同决定国家的前途命运，因为当时不识之无，他用大拇指画押的方式确立了各项法律，签署了各种命令，然而当他们离去，让他

再一次独自面对国家和权力时，他没有再用沉睡的法律来荼毒自己的血液，而是凭鲁莽的口谕和无时无处不在的身躯，以严苛如石的节制沉缓，同时也以他这个年纪不可能拥有的勤奋统治着国家，他被大群的麻风病人、盲人和瘫痪患者包围，他们悲苦呼号，乞求他手中治病的盐，颇有学识的政治家和坚定无畏的谄媚者也将他围绕，共同推举他为地震、交食、闰年以及上帝所犯的其他错误的修正官，他拖着象腿一般的下肢踏着雪，在府中四处走动，用简单的方式处理着国家大事和家中琐事，正如他用同样简单的方式命令着，给我把这扇门拆掉安在那儿，他们拆了，再给我安回去，他们就再安回去，钟楼的钟在十二点的时候不要敲十二下而要敲两下，这样生命能显得更长一些，于是没有一丝犹豫，没有一刻停顿，他的指令被一一执行，只有致命的午休时段例外，那时他会躲在妾侍们的身影间，突然逮住其中一个，不褪她的衣服，不脱自己的衣衫，也不把门关上，于是整个府中都能听到他作为一个急迫丈夫的没有灵魂的紧促喘息，听到金质马刺充满欲望的叮当声，听到他如狗一般的呜咽和女人惊恐的叫喊，她虚度着她的欢爱时光，只想摆脱落在她身上的七个月的早产儿们那肮脏而萎靡的目光，滚开，去院子里玩吧，小孩儿不该看这个，那一刻仿佛有天使划过祖国的天空，于是话音止息了，生命停顿了，在那根食指压上双唇的瞬间，所有人都石化了，没有呼吸，安静，将军正干得火热，然而就连最熟悉他的人都不敢相信那个神圣时刻带来的停息，因为他仿佛总是分身两处，晚上七点有人看到他在玩多米诺骨牌，而同时也有人看到他在会客室点燃牛粪驱散蚊虫，在最远处的几个窗口的灯还没有熄灭时，在还能听见总统卧室的那三把门环、三道门闩、三个插销上锁的动静时，在还会传来那副疲累身躯轰然倒在石地面上的声音和那衰弱孩童般的随着涨潮而渐沉的呼吸声时，没有任何人抱有任何幻想，直到晚风的琴声平息了他耳膜间的蝉鸣，泡沫翻滚的宽广海浪席卷了那曾属于总督与海盗的古老城池的街道，直到海水如同

一个可怖的八月的礼拜六那样，从每一扇窗户涌入民政大楼，令龟足长满了镜面，任鲨鱼在会客厅中妄为，直到海面超过了史前海洋的最高高度，海水漫过地面，漫过了时间与空间，只剩他孑然一身趴在他孤寂梦中的月球水面，弯着右臂垫在脸下当作枕头，与他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他的军靴、他的金质马刺一同漂浮。第一次死亡前的那些严峻年头里，他之所以能同一时间在不同地方出现，之所以能在上楼的同时下楼，在海中迷醉的同时在失落的爱欲中残喘，并不是因为像他的谄媚者所说的那样，他拥有与生俱来的特殊本领，也并非如他的批评者所言的那般，只是群众的幻觉，而是因为他幸运地得到了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狗一般的忠诚和周全的服务，他是无意中被发现的完美替身，当时有人向他报告将军阁下，有一辆假冒的总统马车在印第安人的村子里到处招摇撞骗，生意很火，他们说看到了丧葬般阴影下的忧郁双眼，看到了那苍白的双唇以及敏感新娘的手，那只手戴着缎面手套，向跪在街旁的病人撒着一把把盐，而跟在马车后面的两个假冒的骑兵军官向人们收着治病的硬币，将军，您想想，这是多大的冒犯啊，然而他并没有下令制裁冒名者，而是让人将他秘密地带回总统府，为了避免混淆，还给他头上套了龙舌兰叶编织的口袋，于是他看到了自己在这般境况下的样子并为此饱尝屈辱之感，妈的，如果我是这个人呢，他说，因为我真的好像就是他，只不过他的声音中没有威严，那是他永远都模仿不来的，他也不是没有清晰的掌纹，他的生命线在大拇指根部周围恣意延伸，当时他没有立即将他枪毙并不是因为已经有意把他留作官方替身，而是因为他幻想着自己的命运密码被写在了他的冒名者的手掌上并因此坐立不安。当他彻底相信这个梦的虚无时，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已经不知不觉地逃过了六次刺杀，并习惯了拖着被木槌砸扁的双脚行走，他患上了耳鸣，在冬日清晨疝气会作痛，他还学会了摘戴金质马刺，仿佛皮带绑绳的相互纠缠只是为了拖延会见的时间，他会一边摆弄一边嘟囔，这些佛兰德斯铁

匠造的是他妈的什么扣襻，在这马刺上都不好用，他一改当年在父亲的玻璃窑厂吹瓶子时的饶舌与满嘴戏言，变得阴郁而审慎，他并不在意别人对他说的话，而是专注于探究他们眼中的晦暗，希望参透他们没告诉他的信息，在回答某个问题之前，他一定会先反问对方，您有什么看法，从前贩卖治病奇迹的时候，他是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如今却不停奔波，勤奋到近乎自虐的程度，他变得吝啬、贪婪，屈从于突袭式的泄欲，甘愿不要枕头，和衣趴着睡在地上，他摒弃了自己那早熟的狂妄个性，摒弃了遗传来的灵感满溢的吹制瓶子的天赋，他面对着权力最凶猛的风险，比如在不能垒上第二层石块的地方立起奠基石，比如在敌人的地盘上剪彩，比如承受着如此多的被慢火烹煮的梦、如此多的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带来的压抑叹息：他在为那么多一闪而过又遥不可及的美人们戴上后冠时，几乎没能碰到她们，但他已经永远地满足了，满足于那个一目了然的命运，那个他正走向的但并不属于他的命运，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贪欲或者信仰，而是因为他用官方替身这个终身职位换取了他的人生，每月象征性地付给他五十比索的工资，令他像帝王一样地生活却无须承受身为帝王的不幸，你还想要什么呢。在一个长风呼啸之夜，他们的身份混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撞见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正面朝大海，在一片茉莉味道的水汽中叹息，于是他带着合理的警觉问他，是不是有人在他的食物中放了乌头，所以他才流离到这儿，中了邪似的魂不守舍，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回答说没有，将军阁下，情况比这还糟，上个礼拜六他为一位狂欢节女王加冕并与她跳了第一曲华尔兹，从此便再也寻不着离开那段记忆的出口了，因为她是世上最美的女人，是那种我配不上的女人，将军阁下，您要是看到了她，但他叹了口气回应说，妈的，当男人对女人念念不忘的时候，麻烦就来了，他建议强行占有她，他从前就是这样对待众多迷人的后来成为他妾侍的女人的，我找人把她强按在床上，派四个士兵把她的手脚固定住，你就可以用大勺子享用她

了，妈的，把她放倒了享用她，他对他说，甚至连那些一开始会愤怒反抗的最矜持的女人随后都会向你哀求，别这样丢下我，将军阁下，就像正散落种子的悲伤蒲桃，但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不想要这么多而想要更多，他要她们爱他，因为她是那种知道那些歌手来自什么地方[1]的女人，您一见到她就能看出来，于是像是指出解脱方式一般，他向他指明了几条通往妾侍房间的夜访小径，他授权与他，让他可以像他本人一样使用她们，突然地迅速地不脱衣服地使用她们，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真挚地沉陷在那摊借来之爱的泥沼中，他相信有了这些爱，自己的渴望就可以被堵塞，然而他的热望是如此强烈，有时甚至令他忘记了借债的条件，他因疏忽而裤链大开，流连于细枝末节而耽误时间，他漫不经心地撞上最吝啬的女人所隐藏的石头[2]，他向她们倾付着自己的喘息，在黑暗中令她们惊喜淫笑，您真坏，将军阁下，她们会对他说，这么大岁数了还贪心，于是从此之后，他们俩和她们之中再没有谁知道哪个孩子是谁的，也没有谁知道是谁生下的，因为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的孩子和他的孩子一样，都是七个月的早产儿。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就这样变成了权力的核心，成了最受爱戴也许也是最令人畏惧的人，而他也得以像在统治的最初阶段那样，把更多时间与心思花在武装力量上，这并不是因为武装力量如我们所认为的，是他权力的支撑与保障，恰恰相反，因为它们是他最可怖的宿敌，所以他让一些官员相信他们被同僚监视着，他调换他们的职位以免有人结党营私，他配给每个营地的十颗子弹中有八颗做了假，向他们发放的火药中混了海滩沙粒，而将优质的军火都储藏于总统府与他咫尺之遥的仓库中，并把那里的钥匙，连同其他每一扇别人无法进入的房门没被复制过的钥匙，拴在同一个铁环上，他被我终生的兄弟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沉默的身影保护着，后者是军校出身的炮兵，担任他的国防部长，同时也是总统卫队司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

人，以及寥寥几个被允许在多米诺骨牌局中赢他的普通人之一，因为他曾在总统的四轮车还有几分钟就要经过行刺点的时候试图拆除甘油炸药装置而失去了右臂。在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的保驾与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的协助下他感到无比安全，竟开始疏于自我克制，越来越频繁地抛头露面，甚至敢只带一个随从就乘着没有标识的破车在城中闲逛，透过布帘的缝隙窥赏曾被他用法律条文定为全世界最美的那座由金色砖石砌成的傲慢的大教堂，他遥望着那些古老的灰岩大宅，它们拥有已沉睡时代的门廊和面朝大海的向日葵，他看着总督区透着烛芯味道的石墁路面，看着面色苍白的小姐们在阳台上日光下的石竹花与三角梅之间带着挥散不去的优雅勾织着蕾丝，看着比斯开修女们下午三点在有着棋盘纹饰的修道院中练习古钢琴，与当年庆祝彗星第一次经过时的方式一样，他穿过嘈杂的商业迷宫，经过那里致命的音乐、彩票店的旗帜、卖甘蔗汁的小摊、蜥蜴卵穿成的串儿、土耳其人被晒蔫的廉价玩意儿和那个因不从家长之命而变成南蝎的女人的可怖手绢，他穿过那条没有丈夫的女人们聚居的破落小巷，这些女人会在傍晚时分把衣服晾在刻有纹饰的木质阳台上，裸着身子外出购买蓝色的北美乌鱼和粉色的鲷鱼，还会和卖菜的妇女争吵骂娘，他闻到了风携带的腐烂海鲜的气味，看到了街角白鹈鹕日复一日散发的光芒，望见了海湾高岗上色彩凌乱的黑人棚屋，突然，就在那儿，港口，啊，港口，那里的码头铺着吸水木板，那里海军陆战队的装甲舰比真相更长更阴森，一个黑人码头女工面对慌乱的马车躲闪不及，于是看到了那个正用世上最悲伤的眼神望着港口的迟暮老人并因此感受到死亡的触动，是他，她惊呼，硬汉万岁，她喊道，万岁，男人、女人、从中国人开的小旅馆小酒店跑出来的孩子都这样呼喊着，万岁，绊住马腿拦住马车希望能握到那只权力之手的人也呼喊着，他们的行动精准而又出人意料，他差点没来得及推开随从持枪的手，他厉声呵斥道，别那么胆小，中尉，让他们来爱我吧，那一天以及随后几天人

们的狂热爱戴令他极度兴奋，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费尽功夫才打消了他那乘坐四轮敞篷彩车巡游，好让爱国者们都能看到我的全身的念头，真见鬼，他丝毫都不怀疑港口那次突然的热闹聚会不是民众自发的，也没有怀疑接下来的那几次是自己的安全部门为了毫无风险地取悦他而策划的，他受着他的秋天来临之前洋溢着爱的和风的哄骗，甚至敢在多年之后再次离开这座城市，重新启动漆着那面旗帜色彩的旧火车，沿着他广阔而沉重的王国的屋脊攀缘而上，从兰花的枝叶与亚马逊凤仙花中破开道路，惊扰了长尾猴群、天堂鸟和卧轨而眠的豹子，一直驶至他荒芜故土冰冷而凄凉的村庄，在那里的车站，乐队演奏着阴郁的旋律等待他的到来，他们为他敲着丧钟，展示一块块牌匾来欢迎坐于圣三一右侧的无名显贵，散居在乡村教区的印第安人下了山，向他围聚过来，期望见识一下隐藏于总统车厢内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的权力，但那些得以靠近的人透过布满灰尘的玻璃望到的只是惊恐的眼眸、颤抖的双唇、在荣光的边缘挥动致意却无人知其所属的手掌，卫队中的某个成员一直试图让他远离窗口，请您小心，将军，祖国需要您，但他却在半梦半醒间回答，别担心，上校，这些人爱我，在高地荒漠的火车上如此，在木舵航船中也是如此，这艘船绕过史前恐龙的残骸，绕过意外遇见的、美人鱼正要在那里分娩的岛屿，绕过令数座巨大城市消失的灾难性日落，在栀子花甜蜜的芬芳和赤道支流中蝾螈的腐烂味道间留下了自动钢琴奏出的华尔兹涟漪，一直开到炎热而荒凉的村落，那里的居民都在河岸翘首张望漆着国家色彩的木船，却只能勉强分辨出一只戴着缎面手套、不知其所属的手在总统寝舱的窗口挥动致意，而他则看到岸边以海芋叶代替旗帜挥舞的人群，看到他们跳入水中，带着活貘，带着巨如象脚的山药和装着长尾林鹑的背篓，期盼为总统的杂烩汤送上食材，他在幽暗如教堂的舱室中慨叹，看看他们是怎么过来的，船长，看看他们有多爱我。十二月，当加勒比世界变得晶莹起来，他会乘旧车沿峭壁山路而上，直至悬崖之

巅的房子，在那里同这片大陆其他国家的老独裁者以及被废黜的国父玩一下午多米诺骨牌，多年以来，他为他们提供了避难所，如今，他们正在他慈悲的阴影下老去，他们在露台的椅子上幻想着那艘会让他们东山再起的虚幻之舰，他们在他于大海的阳台为他们建的敬养院中孤独自语、渐成死尸，他接待了他们众人，却仿佛只接待了一人，因为他们都在黎明时出现，都在睡衣之外反穿着华丽的军服，都携着一个衣箱，里面装有搜刮民众而得的钱财，还带着一个行李箱，里面装有放勋章的小盒、贴在旧账簿上的剪报以及一本肖像相册，他们在第一次受他接见时，会像呈上身份证明一样向他展示自己的相册，您看，将军，这是担任中尉时的我，这是就职那天照的，这是执政十六年纪念，这里，将军您看，但他在提供给他们政治避难所时，并没有更多地在意他们，也没有查看身份证件，因为一个垮台的总统仅存的身份证明应该是他的死亡证明，他说着，也带着同样的鄙夷去听那不切实际的简短演说，我暂时接受您高规格的款待，这段时间内公正的人民会清算篡权者的，这庄重的永恒公式实在幼稚可笑，因为不久之后他又会听到篡权者这样说，再之后会听到篡了篡权者权的人这样说，仿佛那些孬种并不知道，在这笔男人的交易里，完蛋了就是完蛋了，他会将他们通通留下，请他们在总统府住几个月，强迫他们玩多米诺骨牌，直到将他们口袋中的最后一分钱掏空，随后他扶着我的手臂来到面海的窗口，他令我更因这苦恼的只向一方前行的生活而心痛不已，他用去那里的希望安慰我，瞧，那里，在那座像搁浅在悬崖顶端的远洋轮船的大房子里，我为您留了一个单人间，有明媚阳光、美味佳肴，有大把时间可以让您与其他深陷不幸的伙伴一同忘记烦恼，还有一个海景露台，他喜欢在十二月的午后坐在那里，倒也不是和那群傻瓜玩多米诺骨牌有多快乐，而是因为他会以小人之心享受自己不是他们之中一员的快感，因为他能一边在泥潭中把幸福搅得哗哗作响，一边在映照出他们落魄身影的警示之镜中端详自己，他独自做着

梦，打着鬼主意踮着脚尖跟踪正在黎明的昏暗中打扫民政大楼的温顺的穆拉托女人，他嗅着她们身上散发出的公共宿舍的臭气和药店里的发蜡味道，他窥视着，希望能撞到一个落单的好和她在办公室门后像鸡一样做爱，而她们会在黑暗中爆发出淫笑，将军可真坏啊，您可是伟人还这么好色，然而在做爱之后，他会陷入悲伤，会去没人听到的地方唱歌来安慰自己，他会唱，一月的明亮月光，他会唱，看看在你窗下刑场上的我多哀伤，在那些毫无凶兆的十月里，他是如此确信他的人民爱他，甚至会在没有卫队守护的情况下，在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居住的郊区大宅的庭院中，挂上吊床在罗望子树的阴凉下睡午觉，梦到那些流浪的鱼在卧室彩色的水中游动，他会叹息着说，母亲，祖国是最好的发明，却从不等待那个世上唯一敢因他腋下的烂洋葱味儿而斥责他的人的应答，他会走正门返回总统府，因加勒比一月奇迹般的时节、因在晚年的尽头与世界的和解、因与教皇使节重归于好后那些锦葵色的温和午后而倍感兴奋，那使节来访时并不会一味游说他皈依基督，他们会蘸着热巧克力吃着小饼干，而他则会笑到几乎背过气去地叫嚷着，如果上帝真像您说的那样好，让他把我耳朵里嗡嗡叫的屎壳郎拿走吧，他说着解开襟门上的九颗扣子，向他展示非同寻常的疝气，让他给我这东西放放气吧，他对他说，但使者转而开始进行冗长的禁欲主义教化，企望说服他，一切真理，无论出自何人之口，都来自圣灵，华灯初上时，他把他送到门口，带着一副少见的几乎要笑断气的样子，别白费口舌了，神父，他对他说，不管怎样，我做的就是你们希望我做的，都这样了您怎么还想让我信教呢，见鬼。然而这舒缓平和的气氛很快就在一片遥远荒漠的斗鸡场中耗尽了，那天，一只凶残的公鸡将对手的头扯了下来，并在嗜血的观众面前，在一场满是用欢快的音乐赞颂暴力的醉汉的家庭舞会上，将它啄食掉，而他是唯一一个察觉到凶兆的，他感觉它清晰而迫近，于是悄悄命令卫队逮捕了其中一个乐手，那个，正在吹大号的那个，果不其

然，他们在他身上搜出了一把双管霰弹枪，在严刑拷打之下他供认本来计划在散场时趁乱向他开枪，当然，再明显不过了，他解释道，因为我正看着所有人，所有人也在看着我，只有那个吹大号的狗娘养的一眼都不敢看我，可怜的家伙，然而他也清楚，那并非他的最后一劫，之后在民政大楼度过的夜晚中，虽然安全部门已经向他表示，您不必担心，将军阁下，一切都井然有序，但他仍焦虑不已，自从在斗鸡场尝过那种预感的折磨后，他便紧紧抓住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仿佛将他当成了自己，让他吃自己的菜肴，让他与自己用同一个勺子一起喝下他的蜂蜜，万一食物被下了毒，最起码两人会一起死，也算是个安慰，他们会像逃荒者一样在被遗忘的房间里走动，走在地毯上，不让别人听出他们鬼鬼祟祟的暹罗象般的脚步声，他们放步漫游在灯塔从窗口射入的断断续续的光亮中，每隔三十秒，那光线都会穿过沉睡的海上一艘艘夜航船的凄郁离愁、穿过燃烧牛粪升腾的烟射进来，用绿色充盈整个房间，他们会花一个又一个下午去赏雨，会在九月那些萧索的黄昏里像老迈的情侣一般细数飞燕，他们与世界那般疏离，以至于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他奋力而为的分身法正适得其反地滋养着猜忌：他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他进入了休眠，尽管警卫人数多了一倍并且不许任何人出入总统府，还是有人躲过了严格的排查，看到了笼中的喑哑鸟雀，看到了在洗礼池饮水的母牛，看到了玫瑰丛中睡着的麻风病人和瘫痪患者，每一个人都在正午就期盼着黎明，因为如预卜水盆宣称的那样，他已在睡梦中自然死亡，只不过高层对此秘而不宣，并试图在血腥的非法集会上调停迟来的冲突。虽然无视这些风言风语，但他很清楚有些事将要在他的生命中发生，于是他打断缓慢进行的多米诺骨牌局，问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局势怎么样，兄弟，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将军阁下，祖国很太平，他从走廊上稀软的牛粪燃起的祭坛之火中、从古老的井水里捕捉着预兆，却找寻不到什么能解释他的焦虑，当热浪消退时，他去郊区宅院拜访母亲本蒂希

翁·阿尔瓦拉多，两人在罗望子树下吹着午后的凉风，她坐在母亲的摇椅上，虽然虚弱却神志清醒，向鸡群和在庭院地面觅食的孔雀撒着玉米粒，而他，坐在漆成白色的柳木安乐椅上，拿帽子扇着风，用朽迈的饥渴眼神追逐着给他端上彩色水果饮料的壮硕的穆拉托女人，解解渴吧，将军阁下，他心里想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但愿你知道，我已经不行了，我想走得远远的，无论去哪儿，母亲，我要远离这么多的凌辱，然而即便对母亲，他也没有表露出内心的唏嘘，而是趁华灯初上就返回总统府，从旁门进去，经过走廊时听到哨兵的踏步声，他们如往常一样依次向他致敬，将军阁下，一切都井然有序，但他知道那不是真的，他们习惯性地欺骗他，因恐惧而欺瞒他，在那场从斗鸡场的不祥下午开始的毫无定数的危机中，在那场给他的荣光染上苦楚、剥去他由来已久的统治欲望的危机中，没有什么是真实的，直到夜很深了他还趴在地上没有睡着，从向着海敞开的窗口传来遥远的鼓声和哀伤的笛声，那里正在举行一场穷人的婚礼，他们也会这样欢快地庆祝他的死亡吧，他听到了一艘懒散的航船未经船长许可便在夜间两点起锚离开的动静，听到玫瑰清晨绽放时纸张一般的声响，他热得出汗汗液却冰冷，他无意识地发出叹息，他不曾有一刻心绪平静，凭借原始的本能，他预感到了那个他从郊区宅院迫切回府的下午，那天他在街上撞见了大批骚动的民众，窗子开开合合，燕子在十二月清透的天空中惊惧万分，他微微撩开马车窗帘想窥看发生了什么，他自言自语道，就是这样，母亲，就是这样，看着空中五彩缤纷的气球，他有了一种可怕的解脱感，红色的绿色的气球，忧郁的大橙子般的黄色气球，无数流浪的气球在惊恐的燕子间升空，在下午四点水晶般的光芒中飘浮片刻又很快在静默而一致的爆炸中破碎，从城市上空撒下千万张纸页，如同一场宣传单的暴雨，车夫趁势从公共市场的骚乱中溜走了，没有任何人认出最高权力的马车，因为所有人都忙于哄抢气球撒下的纸页，将军阁下，他们在阳台上吼着，在压抑

中背诵着，他们呼喊着，去死吧独裁者，甚至连他的哨兵都在走廊中高声朗读着，不分阶级、团结一致，共同反抗几个世纪的专制统治，以爱国之心统一战线反抗军队的跋扈与腐败，他们呼喊着停止杀戮、停止掠夺，在他进入车行门的那一刻，整个国家从千年的沉睡中苏醒了，他听到了可怕的消息，将军阁下，他们用浸了毒的标枪刺中了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他的性命危在旦夕。几年前的一个夜晚，他情绪不悦，向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提议玩猜硬币正反面的游戏，如果是正面，就你死，如果是反面，就我死，但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对他说这样两人都得死，因为所有钱币的正反面都铸着两人的肖像，于是他又提出在多米诺骨牌桌上决定生死，二十局分胜负，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接受了提议，我非常荣幸，非常乐意将军阁下，只要您能授予我战胜您的特权，他接受了，同意，于是他们就这样玩了一局，玩了两局，一直玩到第二十局，赢的都是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他从前能获胜只是因为战胜他是被禁止的，他们展开了激烈而漫长的战斗，直到最后一局他都未尝过胜利的滋味，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用衬衫袖子擦干汗，叹息道，实在抱歉，将军阁下，但我不想死，于是他开始把牌拾起来，一边按顺序码放在一个小木盒里，一边像一位正在讲课的教师那样，说着他也没理由就这样死在多米诺骨牌桌上，他将在应该死的时辰和地点在睡梦中自然死去，就像女巫的水盆在他的时代伊始就已预言的那样，甚至那样都不应该，好好想想吧，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把我生下来不是为了让我去理会那些水盆的，而是让我去发号施令的，无论如何，我就是我，而不是你，所以你应该感谢上帝，因为这不过是个游戏，他笑着对他说道，但那时甚至永远，他都无法料到那个可怕的玩笑在他踏入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房间的那晚变成了现实：他看到他已经生命垂危、无药可救，全然没有战胜剧毒而生还的希望，他站在门口伸出手向他致意，愿上帝拯救你，兄弟，为国而死是莫大的荣耀。在他漫长的弥留过程中，两人独处一室，他

一直陪伴在他身旁，一勺一勺地喂他止痛药，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喝着药水，毫无感激之意，每喝一口都对他说，我只会离开您的狗屎世界一小会儿，将军阁下，因为我的心告诉我，我们不久后就会在地狱深处再碰面的，因为中毒，我会比一条鳐鱼更加扭曲，至于您，手里提着自己的脑袋不知道该把它放到哪儿，说句大不敬的话将军阁下，现在终于可以告诉您了，我从来就没有像您想象的那样爱过您，而且自从在海盗猖行安的列斯群岛的时代不幸地被卷到您的多米诺骨牌局中，我就终日祈祷您被杀死，哪怕是被体面地杀死，这样您就能为您带给我的孤苦人生付出代价了，您先用木槌把我的脚掌打扁，让它们变得和您那双梦游人的脚一样，再用鞋匠的锥子穿过我的睾丸，好让我患上疝气，之后安排我喝下松节油，让我忘记怎样读写，那过程就好像当初我母亲教我读写时那样费劲，您总是强迫我去出席那些您不敢出席的公众活动，这并不是因为您所说的国家需要您活着，而是因为在给那些漂亮婊子戴上皇冠时，即使是最坚毅的人，也会夹紧屁股，完全不知道死亡会从何处而来将自己击倒，请恕我不敬，将军阁下，然而他并不在乎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的无礼却在意他的忘恩负义，我让你在这宫殿里过得像个国王，我给你的没有别人能给，世上再没有谁能像我这样甚至连自己的女人们都借给了你，咱们还是别谈这个了吧将军阁下，我宁愿被阉了也不想把那些做母亲的推倒在地，好像她们是需要被烙印的小母牛似的，只不过那些没心没肺的可怜荡妇甚至都感觉不到烙铁，她们不会尥蹶子不会挣扎不会像小母牛那样嚎叫，甚至屁股上都不冒烟闻起来都没有烧焦的肉味，好女人的标准她们都达不到，她们只会把自己死母牛一样的身体摆在那儿让人泄欲，同时还要继续削着土豆皮，对别的女人喊着帮我看着点儿锅，我休息一会儿，别让米煮糊了，说句大不敬的话，只有您才会相信这玩意儿是爱，将军阁下，因为这是您唯一知道的，听到这里他怒斥道，闭嘴，他妈的，闭嘴，不然我要你好看，但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

斯不带一丝玩笑口吻地继续说道，我为什么要闭嘴呢，您最多不过就是杀了我，而您此刻已经在杀我了，您最好还是趁现在好好看清真相吧，将军阁下，这样您会知道，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您他的真实想法，所有人告诉您的都是他们认为您想听到的，他们在您面前卑躬屈膝，背着您就冲您比画手枪，能碰到我这个全世界最怜悯您的人您就感谢上天吧，因为我是唯一一个长得像您的人，唯一一个敢如实告诉您人人都在说的话的人，他们说您谁的总统都不是，说您不是凭借自己的大炮登上的王位，说您能坐上宝座全是因为英国人让您坐，那些外国佬用装甲舰上的两门大炮维持着您的王位，当他们叫嚣着我们把你和你的黑人窑子留在这儿，看没了我们你可怎么办时，我看到您急得团团转，害怕得不知该如何发令，后来您并没有从位子上退下来，甚至从来都不曾退下来，那并不是因为您不想而是因为您不能，您就承认吧，因为您知道，当人们在街上看到您一身死人打扮的时候，他们会像狗一样扑上来，挖走这一块，因为桑塔玛丽亚德尔阿尔塔的屠杀，撕走另一块，为了被扔进港口碉堡的池塘里生生喂了鳄鱼的囚犯，揪走又一块，为了被活活剥了皮的人，那些皮还被寄到他们的家里以示警告，他说着，从无尽的迟来的怨恨中拽出一连串他臭名昭著的统治下的凶残罪行，一直说到他不能再说，一直说到一把火耙打下，令他肝肠寸断，他心软了，毫无冒犯之意地几乎是哀号着说了最后几句，我是说真的将军阁下，趁我就要死了和我一起死吧，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这么说，我从来都没有指望自己长得像另一个人，更不用说像一位国家政要，我只不过想当一个落寞的吹瓶子的玻璃工，就像我父亲那样，鼓起勇气试一下吧，将军阁下，没有看上去那么疼，他言之凿凿，语气沉着，甚至没能激怒他开口做出回应，他只是试着扶住椅子上的他，因为他开始抽搐，开始用双手抓扯腹部并流着疼痛与羞辱交织的泪水啜泣，将军阁下，真抱歉，我要拉出来了，但他却觉得他只是在用什么比喻来表达自己怕得要死，然而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说

道，不，我想说的是我在拉屎，在拉屎将军阁下，于是他终于开始哀求他说你忍忍，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你再忍忍，咱们是祖国的将军，即使死，也要死得像个男人，但已经晚了，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一头栽了下去，于是他扑落到他身上，恐惧地蹬着腿，浸在了粪便与泪水中。在与会客厅相邻的办公室里，他用丝瓜瓤和肥皂搓洗才把他身上死亡的恶臭除掉，他为他穿上了自己身上的衣服，为他裹上帆布疝气带，套上军靴，在左脚靴后跟戴上金质马刺，他在这样做的同时感到自己正逐渐变成世上最孤独的人，最后他抹去了所有虚假表象，将自己在预卜水盆中亲眼所见的丝毫不差地还原出来，如此一来，次日清晨府中的清洁女工就会发现他趴在地上死了，事实的确如此，她们看到了伪造的他第一次在睡梦中的自然死亡，看到了他身着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穿着军靴，戴着金质马刺，弯着手臂垫在脸下当作枕头。与他期盼的相反，那一次消息并没有迅速传开，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谨慎考证、秘密调查，各个法定继承者试图用五花八门、彼此矛盾的说法来澄清死亡谣言，以拖延时间，趁机进行肮脏的私下交易，他们把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带到商贸大街好让众人看到她未带愁容，主啊，他们让我穿上花衣裳把我打扮得像马里蒙达[3]一样，给我戴上鹦鹉帽让全世界都以为我是幸福的，他们非要我在商店里购物，但我和他们说不，主啊，我说现在不该买东西应该哭，因为甚至连我都相信我儿子死了，他们为我照全身像时还逼着我微笑，那些军人说为了祖国必须这么做，这个时候他则在密室中困惑地自问世界怎么了，怎么没有什么因他虚假的死亡而改变，怎么太阳会照常升起，并且毫无阻碍地一次又一次升起，为什么这礼拜日的空气，母亲，为什么没了我它仍是一样的热，当不合时宜的炮声在港口碉堡响起，当大教堂教益众人的钟声开始报丧，当骚动的人群得悉世上最大的新闻而从世俗的倦怠中挺直了身躯登上民政大楼，他这样惊

恐地问着，他将卧室的门开了条缝，探头望向会客厅，他在那个炽热的房间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比基督教任何一个死去的教皇都死得更加彻底、装饰得更加繁复的自己，他被恐惧和羞耻刺伤了心，因为他那军事巨头的身体周围放满鲜花，因为他的脸上扑了粉，唇上涂了彩，因为他那冷漠的年轻女子的僵硬双手放在了别满功勋奖章的胸前，因为在死后被尊为宇宙大将军的他穿着绣有十个朝阳的华贵制服，因为那把从未使用过的纸牌国王军刀、那戴有一副金质马刺的漆皮军靴，以及被束缚在他那躺卧的娇柔身躯里权力的广大附庸物与武力的阴森荣耀，他妈的，那个人不可能是我，他怒不可遏地自语道，他妈的，这不公平，他一面看着排队围起他尸体的随从一面说道，有那么一刻，他忘记了这出戏的模糊目的，他感到在庄严的权力面前，自己被死亡的无情贬低侮辱了，他看到了没有他的生活，他带着某种怜悯看到了失去他威权庇护的人们是怎样的状态，他带着某种深藏的不安看到了只为来弄清那是否真是他本人的人，他看到了一个以联邦战争期间共济会的方式问候他的老人、一个亲吻他戒指的戴孝男子、一个为他献上花束的女学生，以及一个因无法承受他死去的事实而将鱼筐打翻在地的鱼贩，她抱住喷过香水的尸体哭喊道是他，我的上帝啊，她哭泣着，没了他我们可怎么办啊，所以真的是他，人们叫嚷道，是他，烈日下武器广场上憋闷的人群叫嚷道，于是丧钟停了，大教堂和其他所有教堂的钟声一同宣布这是一个欢乐的礼拜三，于是复活节烟火绽放了，荣耀鞭炮炸开了，自由之鼓敲响了，他看到进攻队伍从窗户钻了进来而卫队在他们面前欣喜又沉默，他看到人头汹涌攒动，他们用棍杖驱散了侍从，又将那个悲戚无助的鱼贩推倒在地，他看到有人向尸体施暴，看到那八个人将尸体从无法追忆的遥远状态中、从百子莲与向日葵的虚幻时光里拽出来，在楼梯上拖扯着，他看到一些人破坏了那个富饶与不幸的天堂的脏腑却自以为永久地毁灭了它的内核，他们永久地摧毁了那个权力的巢穴，砸烂了纸纤维石膏雕

成的多立安式柱头、天鹅绒窗帘以及顶着石膏棕榈树的巴比伦柱，将鸟笼、总督宝座和三角钢琴抛出了窗外，推倒了存放有无名显贵骨灰的骨灰墙，割裂了绣有幻灭的冈多拉船上熟睡的少女的哥白林挂毯和绘有主教、古代军阀以及恢宏海战的巨幅油画，为了不让后代对军人的丑恶血统留有哪怕最轻微的记忆，他们毁灭了那个世界，他从百叶窗的缝隙望向街道，想看看那些从窗口扔出的灾难落到了何方，只消一眼，他就看到了太多的无耻与忘恩负义，比我有生以来见过的和为之哭泣的还要多啊母亲，他看到他那些幸福洋溢的寡妇从侧门离开了那座宅院，她们从我的牛棚里牵走了母牛，搬走了政府的家具，卷走了您的蜂房产的瓶装蜂蜜啊母亲，他看到他的七个月的早产儿们用厨具、琉璃工艺品、主教晚宴的餐具奏响喜乐，如街贩般高声喊着我爸爸死啦，自由万岁，他看到武器广场上的火堆里焚烧着自他统治以来便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官方肖像与平版日历，他看到自己的身体被拖行在大街上，慢慢留下一条散落着勋章、带穗肩章、军服纽扣、金丝银线、结绳盘扣，散落着纸牌国王军刀的流苏和宇宙之王的十个悲凉太阳的痕迹，母亲啊，看看他们是怎样待我的，他一面说，一面感受着切入肉身的耻辱，尸首被向前拖曳着，人们纷纷从阳台上向他啐吐唾液，倾倒病人的粪便，他不寒而栗，生怕自己被人肢解了并在庆祝我的死亡的狂欢节般的烟花爆竹声中、在发狂的嗥叫中沦为狗和兀鹫的吃食。当动乱过去，他仍旧能在无风的午后听到远处的音乐声，仍旧会扑杀蚊虫并试图将耳中阻碍思考的蝉鸣用手掌拍灭，仍旧望着地平线上燃烧的光亮，望着灯塔，任它的光芒每隔三十秒从百叶窗的缝隙中射进来在他脸上投下绿色的虎皮纹，他保持着亘古不变的寻常的自然呼吸，与此同时，他的死亡变成了另一个死亡，仿佛过往那些死亡中的一个，现实不停息的洪流逐渐将他裹挟向被怜悯与被遗忘的无人之境，妈的，让死亡见鬼去吧，他吼道，于是他抛弃了密室，确信自己的伟大时刻已经到来并为之兴奋不已，他在散发着垂死花朵味道

的黑暗里，在墓地的烛芯间，在他前生的碎片中拖着幽灵般的粗重双脚，穿过被洗劫的厅堂，推开部长会议大厅的门，在烟雾缭绕的空气中听到了胡桃木长桌周围疲弱的声音，透过烟尘，他看到了他希望在那儿看到的所有人：出卖联邦战争的自由派、把它买下的保守派、最高司令部的将领、他的三个部长、大主教以及施诺特涅大使，所有人都在一个陷阱之中召唤着所有人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独裁统治，好让所有人都能从他的死亡中分一杯羹，他们沉溺于贪婪之渊，竟没有一人觉察到并未下葬的总统的出现，他用手掌一拍桌子，喊道，啊哈！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用做，因为当他把手从桌上拿开时，惊恐的轰鸣已经散去，空旷的大厅里只剩下灰烬满溢的烟灰缸、咖啡杯、掀翻在地的椅子以及我终生的兄弟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他瘦小、冷漠，一身野战军装，用他唯一的一只手拨开烟雾向他比画着，趴到地上将军阁下，好戏就要开始了，于是两人一同倒在了地上，那一刻，大楼前开始了一场致命弹片的狂欢，一场总统卫队的血肉庆祝仪式，将军阁下，他们会非常高兴非常荣幸地听从您强有力的命令，不会让一个人从这场酝酿背叛的非法集会上活着走出去，他们向那些试图从正门逃跑的人扫射雨点般的子弹，将那些悬于窗口的人如鸟雀般击落，朝那些突出重围躲到邻近楼内的人投去手榴弹，而后又向伤者补上致命的枪子儿，因为依据总统的看法，所有幸存者都将是一生的死敌，他继续脸朝下趴在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身旁两步远的地方，忍受着每次爆炸从窗口砸进来的玻璃和泥浆，祈祷般不停地喃喃自语，好了，兄弟，好了，好戏结束了，从今往后我会独掌大权，再没有狗冲我叫了，明天早上我们就会看到这破烂摊子里什么是可以用的什么是不能用的，到时万一没有地方坐，就买六个最便宜的皮凳，买几张凉席铺在这儿铺在那儿把窟窿盖上，再买两三样旧家具，不要盘子也不要勺，什么都不要了，那些我从军营里拿就行，因为我不会再养什么士兵，也不会养官员了，他妈的，他们只会多费牛

奶，麻烦临头时，大家已经看到了，他们只会唾弃这只喂养他们的手，现在我只留下总统卫队那些正直勇敢的人，我不会再任命政府内阁，他妈的，只有一个好卫生部长是活下去所需要的，再来一个有学问的把该写的写一下，剩下的部长办公室和军营可以租，省下的银子用来支付佣工，这里缺的不是人而是钱，弄两个仆人，一个打扫做饭，一个洗衣熨烫，等有了奶牛和鸟儿，我自己来管它们，厕所里别再有脱衣服的婊子了，玫瑰树下别再有麻风病人了，别再有什么都知道的哲学博士和什么都能看清的政治家了，说到底这是个总统府而不是黑人窑子，听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和我说外国佬就是这么叫它的，我一个人就够了，继续统治到下次彗星经过简直绰绰有余，它不会只回来一次而是要回来十次，因为我就是这样，我不想再死了，妈的，让别人去死吧，他不假思索地说着，仿佛在背诵，因为自战争开始他就知道高声思考会赶走撼动大楼的甘油炸药所造成的恐惧，他为明天、为这个日暮途穷的世纪制定着计划，直到街头最后一声恩赐的枪声响起方才停止，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蛇一般地匍匐过去，从窗口命令人们去找垃圾车运走死人，随后从大厅出来向他问候，晚上好，将军阁下，晚上好，老兄，非常感谢，他趴在部长会议厅墓碑般的大理石地板上回应道，而后将右臂弯起放在脸下当作枕头，在那个夜晚，在那一具具冒着烟的身体里、在一汪汪红色的杀戮之月的血泊中，他秋日黄叶飘落的声响开始恒久地流传，他被那响声催了眠，很快睡着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他无须执行任何事先的决定，因为军队被击溃了，部队被解散了，在这座城市的军营中、在祖国其他地区的六个军营中抵抗至最后一刻的个别军官被公民志愿者所帮助的总统卫队消灭了，幸存的部长们在清晨时分逃亡了，只剩下两位最忠诚的，其中一位曾兼任他的私人医生，另一位是全国最出色的书法家，他不用屈从于任何一个外国政权了，因为意外出现的爱国者捐赠的婚戒和黄金王冠已将政府金库填满，他也不用去买凉席和最便

宜的皮凳来遮盖那时物品被扔出窗口造成的惨状，因为甚至在国家平定之前，会客厅就已被重整装修，变得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富丽堂皇，屋内处处悬挂着鸟笼，里面养着口吐秽语的金刚鹦鹉和在房檐唱着为西班牙不为葡萄牙的黄冠亚马逊鹦鹉，谨慎而勤劳的女人将房间收拾得如一艘纤尘不染、井然有序的航船，窗外仍旧传来同样的悦耳乐曲声、同样的欢快爆竹声和同样的喜乐钟声，它们先前庆祝他的死亡，现在接着庆祝他的永生，武器广场上的游行久久不散，人们呼喊着永远效忠的口号，举着写有上帝保佑在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的伟大领袖的大型牌板，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节日，他甚至不用像从前那样暗中使用手段来将它延长，国事自会重上正轨，祖国自会运转前行，他一个人就是政府，没有谁能通过言语或行动阻断他意志的源泉，他在自己的荣光中如此孤独，孤独得连一个敌人都没有剩下，他对终生的兄弟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充满感激，甚至不再为牛奶的消耗而不安，他将足够凶狠有责任感的列兵集合在院中，指着他们，心血来潮地随意提拔他们，同时也十分清楚自己正在整合一支武装力量，一支将会唾弃喂养他们的这只手的武装力量，你，当上尉，你，当少校，你，当上校，我说什么呢，你，当将军，剩下的所有人，都当中尉，朋友，这他妈的就是你的军队啦，他被那些为他的死而悲痛的人深深感动，命人带来了那位向他致以共济会问候的老人以及那名亲吻他戒指的戴孝绅士并给他们颁发了和平奖章，他还差人带来了那个鱼贩并赠予了她所需要的一栋有众多房间可供她与十四个子女共同居住的宅子，他命人带来那名向他的尸体献花的学生，并满足她最大的心愿，让她嫁给了一位海军，但是做完这些纾解心绪的事之后，他仍然不得一刻平静，直到在圣赫洛尼莫基地上，他看到了在总统府烧杀抢掠的突袭队被逮捕并遭人唾弃，他凭着无从回避的仇恨记忆，把他们一一识出又按罪行轻重加以划分，你，指挥袭击的人，站这儿，你们，把那个无助的鱼贩推倒的人，站那边去，你们，把尸体从棺材里拽出来

在楼梯上在泥潭里拖着走的人，站这儿，还有所有这边的人，浑蛋，事实上他对惩罚他们并不感兴趣，他只想向自己证明那出对他身体的亵渎和对总统府的劫掠并不是群众性的自发行为而是受人雇用指使的龌龊勾当，于是他亮开嗓子亲自质问俘虏，希望他们说出他内心需要的那个幻想的事实，然而他没能如愿，他把他们头朝下挂起来，像鹦鹉一样手脚绑在横梁上，一吊就是数个小时，然而他没能如愿，他命人把一名俘虏扔到院中的沟里，让其他人看着他被鳄鱼分尸吞食，然而他没能如愿，他从主力军里挑出一人，当众将他活剥了皮，于是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张皮，它又软又黄仿佛分娩后留下的胎盘，所有人都感到鲜肉的滚烫血汤溅到了自己，而那身体还在院中的石地上艰难待死，于是，他们说出了他想听的话，他们说有人付给了他们四百金比索，让他们将尸体拖到市场的垃圾站，他们说自己不想这么做，为情为钱都不想，因为他们对他从无异议，更别说在他亡故之后了，然而在一场有两位最高司令部的将军出席的秘密集会上，他们被人用各种方式胁迫恐吓，所以我们才会这么做，将军阁下，我们的话千真万确，于是他舒了一口气，下令给他们食物，让他们休息一晚，明早就把他们扔去喂鳄鱼吧，可怜的小伙子们，被骗了，他叹息着，带着从怀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灵魂回了总统府，嘴里念叨着，都看到了吧，妈的，都看到了吧，这些人是爱我的。他终于驱散了帕特里西奥·阿拉贡内斯在他心中种下的不安，连最隐秘的那些都一点不剩，他决定这是他在统治期内最后一次实施酷刑，于是他们杀死了鳄鱼，拆除了刑房，之前在那里他们把人的骨头一根一根打断直到全副骨架都碎裂却不将人杀死，他宣布大赦，在展望未来时有了神奇的想法，这个国家的问题就在于民众有太多空闲时间去思考，他琢磨着让人们忙碌起来的方法，恢复了三月诗会和一年一度的选美皇后大赛，建造了加勒比地区最大的球场并赐予我们球队不胜就死的口号，他下令在各省建造免费教授清洁打扫的院校，这些学校的女学生在总统的勉励下狂

热地打扫完家里又开始打扫街道，之后是城市的公路马路，因此大量的垃圾从一个省被带到另一个，运送它们的游行队伍举着那面旗帜和巨幅牌板，上面写着上帝保佑为民族清洁而操劳的至净者，但却无人知晓该如何处置那些垃圾，而他仿佛一头正在思考的牲畜，拖着迟缓的双脚，寻找着新的娱乐大众的方式，他在伸手向他乞求治病之盐的麻风病人、盲人和瘫痪患者之间开出一条道路，以他之名在院中喷泉为他教子的孩子们一一施洗，此时围绕着他们的，是坚定无畏的谄媚者，他们称颂着他的唯一，因为无法再指望与他相貌酷似之人的协助，于是他不得不在那座公共市场般的宫殿中假装能够分身两处，自从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养鸟贩鸟的消息传开，每日都有笼子和千奇百怪的鸟被送到那里，有些是奉承之礼，有些则含讥讽之意，没过多久，屋里便容不下更多的鸟笼了，他还希望在同一时间处理诸多公务，于是在庭院和办公室的熙攘人群中，已经无法分辨谁是仆人而谁又是被服侍的人，他们推倒了许多面墙以增加空间，凿出了许多扇窗以观望大海，从一个厅室走到另一个就如同冒险穿行在秋日侧风中的航船的甲板上一般。那是与往年无异的从窗子吹进府中的三月信风，而现在他们却对他说，这是和平之风，将军阁下，那是他几年之前就有的同样的鼓膜嗡鸣，但连医生都对他说，这是和平的嗡鸣，将军阁下，自从人们第一次发现他死去，天地万物都变成和平之物了，将军阁下，而他信以为真，到十二月时，他甚至回到悬崖上的房屋，在那些怀乡的老独裁兄弟的不幸中放松地玩乐起来，他们会中断多米诺骨牌局对他说，比如说我是一对儿六，再比如说那些保守党的追随者是一对儿三，我只是没发现共济会的人和那些神父暗中结了盟，谁他妈的能想到呢，这个人说着，已然忘记了在盘中渐渐凝固的汤，这时另一个人讲道，比如这个糖罐是总统府，在这里，而敌人剩的最后一门大炮有四百米的顺风射程，在这里，因此诸位看到我落到今日境地，就是因为那倒霉的八十二厘米，也就是说，甚至连那些心最硬的

人都远远望到了地平线上来自他们故乡的航船，他们通过烟气的颜色、通过汽笛的铁锈辨识出它们，他们穿过细雨般的缕缕晨光走到港口，找寻船员们用来卷裹船上外带食物的报纸，他们在垃圾箱里找到它们，翻来覆去地阅读直至最后一行文字，通过谁死了、谁和谁结婚了、生日宴上谁邀请了谁而谁又没邀请谁的消息来预测各自祖国的未来，他们将根据天上大片乌云的走向解析自己的命运，那乌云将在一场末日般的暴雨中经过他的国家，那暴雨将令河水泛滥离道，那河水将使水库堤坝坍塌，那水库之水将把平原淹没、把灾难散播、把瘟疫传至城市，到那时，他们将向我哀求，求我救他们脱离危难与混乱，走着瞧吧，然而在期盼着那重大时刻来临的同时，他们还需向流亡者中年纪最小的那位求助，请他帮我纫上针，好把这条裤子缝好，因为我对它深有感情，不舍得扔，他们会偷偷地洗衣服，会磨快被新来的人用过的刮胡刀，他们会关起门来吃饭，不想让别人发现他们活着却只剩庸庸残命，不想让别人看见他们因年老失禁而弄脏裤子的尴尬窘迫，而在一个不经意的礼拜四，我们会在其中一人的最后一件衬衣上用别针别上徽章，会用他的那面旗帜将他的身体包裹起来，会为他唱他的国歌，而后他们会将他送到海岸悬崖的深处去掌管那些被遗忘的人，除去他那颗被腐蚀的心外，他再没有其他压载物，除去那把放在视野狭窄的阳台上的浴场椅外，他再没为世界留出什么空位，而我们就坐在阳台上摆弄死者的物件，如果他们留下了什么的话，将军阁下，您想想，荣耀过后竟是这般平庸的生活。在另一个遥远的十二月，当这栋房屋落成之时，他曾从那个阳台上看到了别人一点一点指给他看的水平如镜的海面上的安的列斯群岛，看到了它幻象似的一溜岛屿，看到了马提尼克芬芳的火山，看那儿，将军阁下，于是他看到了他的痨病医院，看到了一个正在教堂入口向官员夫人们兜售栀子花的身着蕾丝衬衫的壮硕黑人，看到了帕拉马里博地狱般的市场，看那儿，将军阁下，于是他看到了大群通过厕所管道离开海洋又爬上冷饮

店桌子的螃蟹，看到了正稳稳坐在瓢泼大雨中贩卖印第安人头像和姜根的黑人老妪牙齿上镶嵌的钻石，看到了在塔纳瓜雷纳海滩上沉睡的纯金母牛，将军阁下，他看到了那个来自拉瓜伊拉的花两个里亚尔就能请他用单弦小提琴来驱散死亡召唤的盲眼通灵人，看到了特立尼达的炽热八月，看到了逆行的车辆，看到了那些在自家贩卖真丝衬衫和用整根象牙雕出的柑橘的店铺门口当街大便的年轻印度人，他看到了海地的混乱和它蓝色的狗，看到了清晨时沿街收尸的牛车，看到了库拉索油罐上重生的荷兰郁金香，看到了有防雪屋顶的风车房，看到了经由酒店厨房之间穿过城市中心的神秘的大西洋航船，他看到了西印度卡塔赫纳的石筑围捕鱼场以及它被链条封锁的海湾，看到了停落在阳台的光线，看到了出租马车那望着总督的饲料打哈欠的肮脏马匹，您闻到它的粪臭了吗将军阁下，多美妙啊，告诉我这世界是不是很大，它的确很大，不仅大还阴险狡诈，他嫌恶那些逃犯一如嫌恶不祥之镜中自己的身影，所以他在十二月攀上悬崖之屋并不是为了和他们交谈，而是为了置身于那时节日光初现的奇迹时刻，他可以再一次看到巴巴多斯到韦拉克鲁斯之间的安的列斯群岛的整个世界，于是他忘记了谁握着一对儿三的牌，于是他在观景台探出身去，凝望那一串犹如睡在海洋池塘中的鳄鱼的疯癫岛屿，看着那些岛屿，他回想起那个历史性的十月的礼拜五，仿佛再次身临其境：那日清晨他走出房间，看到总统府里所有人都戴着红帽，新来的妾侍们戴着红帽打扫厅室、为鸟笼换水，牛棚的挤奶员、站岗的哨兵、楼梯上的瘫痪患者、玫瑰丛中的麻风病人戴着礼拜日嘉年华的红帽四处走动，于是他开始仔细调查在他睡着时这世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竟让他府中的人和城市的居民都戴上了红帽并拖着一串串铃铛，最终他找到了吐露实情的人，将军阁下，之前来了些外乡人，一直用古卡斯蒂利亚语闲聊，把阳性的海说成阴性[4]，把金刚鹦鹉称为鹦鹉，把独木船叫作木筏，把鱼叉称

为标枪，他们看到我们去迎接他们，在他们的船只周围游水，便爬上了桅杆，相互喊道，你们看哪，他们长得多棒，身材健美，脸蛋俊俏，头发粗得像马鬃，他们看到我们为防晒而涂的油彩，便像一群被打湿的鹦鹉般哄闹叫嚷起来，你们看哪，他们把自己涂成了灰褐色，而他们是金丝雀颜色的，不黑不白，将军阁下，我们不明白，就凭他们的样子，怎么倒这样嘲笑我们，要知道我们像刚离开母亲身体时那样自然，而他们大热天却穿得好像棒花仆侍[5]，说起热这个词像那些荷兰走私犯一样用阴性，虽然个个是男人，却都把头发梳理得像女人一样，可在他们中一个真正的女人都找不到，当他们听不懂我们喊的话时，就用我们听不懂的卡斯蒂利亚语大喊，然后乘着之前提过的他们叫作木筏的独木舟，向我们划来，他们羡慕我们的鱼叉顶端有鲱鱼刺，管它叫鱼齿，我们拿出自己所有的东西换了这些红帽和玻璃串珠，把它们挂在颈子上讨他们开心，还换了这些黄铜串铃，值一马拉维迪币呢，另外还有些饭钵、眼镜和其他佛兰德斯的小玩意儿，都是最便宜的货色，将军阁下，我们看他们是好人，又聪明，就在不知不觉中把他们带上了岸，大家换这换那，换来换去，就形成了一家非常棒的旧货商店，最后，所有人都来换他们的鹦鹉、他们的烟、他们的巧克力球、他们的蜥蜴蛋，他们把上帝造的所有东西都拿来了，因为他们对每样东西的交换，无论给予还是获得，都欣喜乐意，最后他们甚至要用一件丝绒紧身衣换我们中的一个人去欧洲展览，您想象一下将军阁下，这太不成体统了，然而他困惑不已，辨别不出这疯狂之事对他的政府而言是不是灾祸，于是他回到卧室，打开面海的窗，希望发现一丝光明线索，好令他读懂人们所述的乱局，他看到了那艘永远被海军陆战队抛弃在码头的装甲舰，而在更远处的晦暗海面上，他看到了停在那里的三艘三桅船。

[1]古巴著名颂乐歌曲《小山曲》中唱道："妈妈，我想知道那些歌手来自什么地方。"

[2]哥伦比亚俚语，意指男性使女性达到高潮。

[3]由人装扮成的长鼻大耳、色彩鲜艳的形象，是巴兰基亚及其狂欢节的象征。

[4]西班牙语中，名词有阳性、阴性之分，"海"（mar）一般用作阳性，也可用作阴性。

[5]棒花是西班牙扑克牌中的一个花色，仆侍是每个花色的第十张牌，其上绘有人物形象，身穿长袖上衣，头戴红帽。

我们第二次在那间办公室找到被兀鹫啄烂的他时，他还是那身衣服还是在那个位置，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老到可以记起第一次发现他时的情景，但我们知道有关他死亡的任何证据都不能确凿地说明什么，因为真相之后永远都有另一个真相。甚至连我们这些最粗心大意的人都不会被表象说服，因为他分明曾被癫痫击垮，在觐见的人潮前身体抽搐痉挛，口吐胆汁泡沫，从王座上跌落下来，他分明早已因说话过多而丧失了语言能力，是帘后的口技演员在与他作双簧戏，他的周身分明渐渐长满了鲱鱼鱼鳞，仿佛是对他扭曲人格的惩罚，他的疝气分明在十二月的凉爽中对他唱起了水手之歌，于是他走路时只得将肿胀的睾丸放入矫正用的小轮车，也曾分明有军车在午夜时分从偏门塞入一口黄金包角、丝带绛紫的棺材，并且有人看到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在雨中花园里泣血，然而他死亡的谣传愈是翔实可信，他愈是威严活跃地在最令人始料不及的场合现身，并为我们的命运强加上难以预料的方向。人们很容易被总统印章戒上转瞬即逝的征兆，被他迈出不平静步伐的超自然尺寸的双脚，抑或被那诡异的证据——他患疝的、兀鹫不敢啄食的睾丸说服，但总有人能记起过去曾有些无足轻重的死者身上也显现出相同的特征。严谨的调查并没有为身份辨别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证据。在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如今我们只模糊记得她被法定为圣徒的故事——的卧室中，我们看到有缺口的鸟笼和被岁月变作化石的鸟骨，看到被母牛啃噬的柳木扶手椅，看到一套水彩颜料和一些笔洗，来自荒漠的鸟贩曾用它们为羽毛黯淡的鸟儿上色，仿冒黄鹂在集市上售卖，我们看到一口被蜜蜂花簇拥的陶瓮，花丛在遗忘中不断生长，枝丫攀墙爬壁，从肖像画上人物的眼中探出，又从窗口向

外爬去，最终与后院的野生枝叶纠结缠绕，但我们未能发现任何可以证明他曾到过这房间的哪怕最细微的痕迹。在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我们对她的印象极为清晰，因为她在距今很近的一段时期统领国家，还因为她一度在公共事务中大出风头——的婚房中，我们看到那张罩着纱帐、适合暴戾欢爱的床已变成了鸡窝，看到蓝狐围脖上的毛毡夜蛾在木箱中残留的痕迹，看到金属丝线扎成的裙撑，看到衬裙上遗留的寒尘，看到镶布鲁塞尔蕾丝花边的紧身背心，男式家用护腿，缎面高跟舞鞋，塑身腰饰，长及脚面配有紫罗兰毛毡花饰的袍服，看到她那第一夫人的华美葬礼所用的塔夫绸带，看到见习修女那绵羊皮般的土灰色粗麻布苦行衣，当初她正是穿着这身衣服被关在一个节日水晶箱中从牙买加绑架而来，而后又作为隐秘总统的夫人被安置在了王位上，但在那个房间里，我们也没有找到任何印迹以证明这海盗式的绑架行为是出于爱情。在他度过生命最后岁月大部分时光的总统卧房中，我们只寻到一张未曾用过的行军床和一个文物收藏家会从海军陆战队员抛弃的豪宅中搬出来的那种可移动式马桶，还有一个铁箱，装着他的九十二枚勋章以及与那具尸体所穿无异的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上面有六个大口径子弹的弹孔，自脊背射入从胸膛穿出，破口处已被烧焦，这令我们确定了那个流传甚广的传说的真实性，据说那颗背叛的子弹虽然射穿了他却没能伤害他，它坚决地射入，在他体内反弹，回射向袭击者，因为只有面对爱他爱到不惜为他去死的人射出的慈爱子弹时，他才是不堪一击的。对那具尸体来说，那两件制服都太小，但我们并不因此就断言它们不属于他，因为据说他直到百岁都在发育，一百五十岁时还经历了第三次长牙期，尽管事实上，那具被兀鹫啄食的残破躯体与这个时代普通人的身体大小无异，并有着乳牙般健康小巧不甚锋利的牙齿和布满老年斑且无伤疤的胆汁色皮肤，他周身满是垂坠的包囊，仿佛他一度臃肿发福，那曾经沉默的双眼已经几乎不见，只留下空洞的眼窝，除去肿胀的睾丸，看上去唯一与他尺

寸相符的就是那双方正扁平、趾甲碎裂、因嵌甲而扭曲的巨大的脚。与衣服所呈现的相反，他的历史学家们将他描绘成了一个伟岸的人物，幼儿园的教材上说他是一位身形魁梧的族长，因房门狭小而足不出户，他喜爱儿童与飞燕，通晓数种动物语言，拥有预测自然现象的能力，看人眼便能读人心，熟谙治病之盐的奥秘，能令麻风病人的伤口愈合，令瘫痪患者站立行走。尽管文本中表明他出身的蛛丝马迹都已被删除，大家还是从他毫无节制的权力欲，从他的政权的本性，从他的黑暗的统治，从他将海洋卖给外国政府的叵测居心中猜测出他来自高地荒漠，他的出卖使我们如受刑般居住在这片布满粗糙的月球尘埃并且没有地平线的平原上，它无所归依的落日令我们的灵魂作痛。据传，他一生中有不计其数的无关爱情的情人，她们一个接一个在他的淫窟中等他回来，等他来发泄欲望，他与她们生了五千多个孩子，每一个都是七个月的早产儿，却无人继承他的姓名，只有与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所生之子例外，他自出生那刻起便被任命为拥有司法权和统治权的少将，因为他认为一个人是他母亲的孩子，并且只是他母亲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孩子。他坚信的这个观点甚至对他本人也同样适用，因为众所周知，和历史上其他著名的独裁者一样，他没有父亲，他唯一承认或许也是唯一拥有的亲人就是我的灵魂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学校课本里宣扬着她的神迹，说她无玷受孕有了他，说她在梦中接受他作为救世主的命运的玄机，他言简意赅地立法将她尊为国母，说世上唯一的母亲即是我的母亲，而那是个出身不明、非同寻常的女人，她简单的头脑对于他统治初期那些狂热地维护总统尊严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丑闻，他们无法容忍元首母亲在颈上挂着樟脑香包以预防传染、用叉子串起鱼子来吃并且穿着漆皮鞋蹒跚行走，他们无法接受她在乐室的露台养蜂、在公共办公室养火鸡和用水彩上了色的鸟雀，或是在汇报厅的阳台晾晒床单，他们也无法忍受她在外交宴会上说，我已经厌倦了向上帝祈求，祈求让我儿子下台，因为主啊，生

活在总统府简直就像时时刻刻暴露在火光边，她说这句话时非常自然，一如在某个国庆日，她也是这样自然地挎着装满空瓶的篮子穿过荣誉卫士的队伍，赶上了在雷动的欢呼声里、在进行曲中、在花瓣雨下开始特赦游行的总统专车，她把篮子往车窗里一塞，向儿子喊道，既然你要过去，就顺便把瓶子还给街角那家商店吧，可怜的母亲啊。在我们庆祝希金森上将的海军陆战队登陆的晚宴上，她的不识大体达到了巅峰：她看到她的儿子穿着佩挂金牌的盛装礼服，戴着余生一直使用的缎面手套，便再也压抑不住呼之欲出的母亲的自豪，当着外交使团全体成员的面高声感叹道，主啊，如果当初知道我儿子能当共和国总统，我就送他去上学啦，那场面实在太过尴尬，随后她便被打发到郊区一栋有十一个房间的宅子里去了，这栋宅子是他在一个愉快的夜晚，在联邦战争的考迪罗[1]们于游戏桌上瓜分流亡保守党的良宅佳苑时得来的，只是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十分厌恶其中皇室风格的装饰，因为那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教皇的老婆，她更喜欢那些用人房，喜欢和派给她的那六个贫苦仆人住在一起，她在闲置的阁楼里架好缝纫机，挂起她那些染色鸟儿的笼子，阁楼里时时阴凉，也容易驱散清晨六点的蚊虫，她坐下来缝缝补补，面前是宽敞院落的闲适阳光和飘着药草味道的罗望子树，母鸡在厅堂中漫步，而卫兵们则在空房间里窥看着女侍应，她会坐下来向仆人们哀叹儿子的不幸，那帮海军陆战队的把我可怜的孩子撂在总统府，离他妈妈那么远，主啊，他半夜要是疼醒了，都没个热心勤快的老婆伺候，他就这么让共和国总统的活计给拴起来了，每个月只能领三百比索的工资，可怜的孩子啊。她对自己所说的情况一清二楚，因为他每天都会趁城市陷入昏沉的午睡时来看望母亲，带来她爱吃的水果软糖，并借机一吐做侵略军傀儡的苦水，他说他得像变魔术似的把蜜橙和甜无花果藏在餐巾中才能带出来，因为当权高层有一众会计，他们连午餐的剩菜都要记录在案，他

哀叹说，有一天装甲舰司令来到总统府，还带着一群什么陆地天文学家，他们什么都量，都没问候我就给我扔来一个卷尺，接着用英语数数算算，还让翻译冲我大呼小叫，你从这儿滚开吧，于是他滚开了，别挡光，他不挡了，哪儿不碍事就到哪儿待着去，他妈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能不碍事，因为连阳台上都有人在测量阳光的尺寸，但这些都不是最糟的，母亲，最糟的是他们把他仅剩的两个病恹恹的妾侍轰到了街上，因为海军司令认为对于一位总统来说她们太不体面，而他又实在离不了女人，于是便时不时地在午后假装离开郊区宅子，但母亲察觉到他其实是尾随女仆进了她们的阴暗卧室，她为此备感辛酸，于是将笼里的鸟儿搅得胡乱扑腾以掩饰儿子的窘迫，她拼命令它们鸣唱以防邻居觉察到那突袭的声响、羞辱的挣扎和压抑着的威胁，冷静些将军阁下，不然我会告诉您妈妈的，而她会搅扰拟黄鹂的午睡，强迫它们惊叫不止，以防任何人听到他那没有灵魂的急迫丈夫的喘息、他那不脱衣服的情人的粗暴、他那狗一般的呜咽，以及他的孤独的泪水，那泪水在急迫爱欲所引发的母鸡躁乱的咯咯叫声中，在那间卧室仿佛液体玻璃的空气里，在上帝缺席的八月的午后三点，如夜晚般降临，因悲伤而腐坏，我可怜的儿子。这种窘迫将会持续下去，直到侵略势力因某场瘟疫吓得离弃这个国家，尽管当时他们还远未实现在此登陆的目的，他们将官员府邸拆分成块放入木箱，把蓝色草坪全部铲除仿佛地毯一般裹挟而去，他们卷起为避免吃下我们河水中的蛆虫而从故乡带来的存放无菌水的橡胶蓄水囊，拆除他们的白色医院又炸毁军营以防任何人摸索出它们的建造方法，他们遗弃那艘破旧的装甲登陆舰，把它留在码头，因为一位在风暴中失踪的海军将领的亡魂会在六月的夜晚在它的甲板上行走，但是在用飞驰的列车带走那个移动式的战争天堂之前，他们为他戴上了一枚友邻奖牌并把国家元首的职位交给了他，为了让所有人都听到，他们大声对他嚷道，我们把你和你的黑人窑子留下来了，看看没了我们你可怎么办，他们居然走

了，母亲，他妈的，他们已经走了，于是自卑躬屈膝的沦陷期以来他第一次爬上了台阶，现身于向他悲号哀求的骚动人群之前并大声施令，人们求他恢复斗鸡比赛，他批准了，同意，求他撤销禁止放风筝的命令、重新开放各种被海军陆战队禁止的娱乐活动，他批准了，同意，他确信他是自己全部权力的主宰，于是颠倒了旗帜的色彩，将盾牌上的弗里吉亚猫换成了侵略者被降伏的龙，因为我们终究是自家的狗啊，母亲，瘟疫万岁。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一生都牢记着那些政变以及其他更古老更苦涩的灾难，然而什么都没能令她像那次诈死事件后那般哀痛，她不住地向愿意听的人抱怨着，当总统的妈妈太不值啦，除了这台惨兮兮的缝纫机外，我就再没别的什么了，她抱怨道，你们看到他坐着金丝银线装饰的马车，可我可怜的儿子为祖国卖了这么多年命，都没留个葬身的地方啊，主啊，这不公平，后来她停止了絮叨牢骚，倒不是因为她已经麻木或者不再抱有幻想，而是因为他不再向她讲述自己的颓丧，不再如往常一样疾奔回来与她分享权力的奥妙，自陆战队占领期以来他已经改变了太多，甚至令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觉得他比她更加衰老且已将她抛落在了时光里，她察觉到他说话结结巴巴，他对现实没有清晰的概念，有时还会不自觉地流下口水，他带着大包小包来到郊区的宅子，一心想把它们同时打开，在她从缝纫筐里找到剪刀前，他便焦躁得用牙齿去扯咬麻绳，还被铁箍伤了指甲，看到这幅情景，她就会被一种悲悯侵袭，这种悲悯不是母亲对儿子的，而是女儿对父亲的，而他沉溺在对飞翔的渴切中，从破烂儿堆里掏出所有东西，您看这些玩意儿多好啊，母亲，他说道，有水族箱里的活美人鱼，有真人大小会在房间里一边飞一边敲钟报时的绳编天使，还有这个大海螺壳，从它里面听不到海风海浪，却能听到国歌的曲调，多奇妙的东西啊，母亲，您看，人不穷有多好啊，他说，但她并没有迎合儿子的兴奋，而是开始啃咬她画黄鹂的毛笔以遮掩酸楚破碎的心，因为她忆起了唯有她才清楚的过往岁月，记起了他为保住那

把交椅而付出的巨大代价，我说的不是现在，主啊，不是现今这样轻松的光景，现在的权力正像他说的一样，是摸得着又独一无二的实在东西，就像手掌上的一颗玻璃珠，她说的是他被联邦战争中最后一群贪婪的考迪罗追逐迫害的时期，当时他好似一条逃命的鲱鱼，没有神明庇护，在附近一座宫殿里游窜，而那些考迪罗曾帮我扳倒了诗人将军劳乌塔罗·慕纽斯，一个有文化的暴君，他、他的苏埃托尼乌斯拉丁语弥撒和他的四十二匹纯种良驹如今已在上帝的神圣荣光里了，那些考迪罗还以武装援助从被流放的旧主手中换得了农场和庄园，以令人无可辩驳的理由将国家划分为各自治省区，这就是联邦制，将军阁下，我们为之抛洒热血的联邦制，他们在自己的领区完全自治，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国庆日、自主发行的纸币，自己的佩宝石军刀的制服、金穗装饰的军服，以及仿照他之前那些总督的插着孔雀尾翎装饰的旧式三角帽，主啊，他们真是粗野鲁莽又感情用事，他们未经许可就由大门闯入总统府，因为祖国是每个人的祖国，将军阁下，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才甘愿牺牲性命的，他们在节日宴会厅中安营扎寨，带着各自的女眷和农场动物，这些动物是以和平贡品之名从各处征收而来，以保证自己永远有的可吃，他们雇来野蛮的卫队，这些人不穿军靴，只用碎烂布头裹着双脚，几乎不会讲西班牙语，却是设置陷阱的高手，操起武器来娴熟而凶残，他们使总统府看起来像吉卜赛人的营寨，主啊，它有一种浓浓的河水涨潮的味道，高层官员已将共和国国有的家具都搬进了各自的庄园，他们在多米诺骨牌桌上用政府特权下注，对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哀求无动于衷，她一刻不停地收拾着集市上不绝的垃圾，尝试着在灾乱中规整出哪怕一点秩序，因为在自由派无可逆转地堕落时，她是唯一一个试图挽回局面的人，只有她看到总统府在那些该死的浑蛋手中腐化时，试图用扫帚将他们赶走，她看到他们为最高司令部的席位在牌局上明争暗斗，看到他们在钢琴后面做着鸡奸的勾当，尽管她发出了警告，却仍旧看到他们往雪

花石膏细颈瓶中大便，主啊，那不是可移动式马桶，而是从潘泰莱里亚的海中捞上来的细颈瓶，但他们坚称那是富人的便壶，主啊，没有任何凡人之力能说服他们，也没有任何神力能阻止阿德里亚诺·古斯曼将军来参加我的掌权十周年的外交庆典，尽管他出现在舞会大厅时没有任何人能料想到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他身穿特地为这个场合挑选的寒酸的白色亚麻制服，像他以军人之名对我保证的那样没佩武器，只由法国逃犯组成的卫队作陪，这些犯人都是平民打扮，肩上还扛着卡宴的火鹤花，他向大使和部长们行礼以请求许可，然后把花一支一支发给他们的夫人，他这诡异的绅士举动，全因为他雇来的法国人曾告诉他在凡尔赛宫这么做很得体，随后他在角落里坐定，认真看着人们的舞姿并点头称赞，非常好，他说，这些漂亮大方的欧洲年轻人跳得很好，各有各的特色，但安乐椅上的他被忘记了，只有我察觉到他每呷一口，都有一位副官会上前将香槟酒杯满上，几小时过去，他变得比平时更加紧张，面色更透着血红，每回压下去的气嗝直向上反涌到眼睛时，他都解开被汗水浸透的军服的一颗扣子，同时困乏地小声哼哼着，母亲啊，曲间的停顿中，他突然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把军服上的扣子通通解开，又把襟门的扣子也松了，两腿叉开，用萎谢的橡胶水管对着大使与部长的夫人们散着香气的领口一通喷洒，用战场酒鬼的酸臭尿液浇湿了丝棉及膝裙、金丝织锦紧身衣和鸵鸟羽毛的扇面，他在众人的惊恐中无所顾忌地唱着，我是孤独的情人，浇灌着你花园中的玫瑰，哦，玲珑无瑕的玫瑰，他唱着，没有一个人敢制止他，甚至连他也不敢，因为我知道自己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有权力，却敌不过他们当中任意两个人勾结在一起的力量，那时他还不知晓自己能看透所有人却从来没有人能看出这位花岗岩般的老人深藏不露的思想，他畅行无阻的智慧和无限忍耐的能力与他的冷静相得益彰，那时我们只看到那忧郁的双眼、惊愕的双唇和那羞怯少女的手，在他们带来那个消息的恐怖的中午，握着剑柄的这只手甚至没有丝毫颤抖，

他们说，将军阁下，纳尔西索·洛佩兹将军被绿色大麻和茴芹酒弄得神魂颠倒，把总统卫队的一个见习士兵拽进了厕所，按他的偏好用个野女人给他热了身，之后强迫他说，把所有东西都塞进来吧，他妈的，这是命令，所有东西，亲爱的，包括你的小金蛋，他痛苦地哭着，愤怒地哭着，直到发现自己四肢着地，脸埋在便池滚滚的恶臭里屈辱地吐着，于是他将那俊美的见习士兵吊了起来，用一根平原地区惯用的长矛把他像只蝴蝶一样钉在了会客厅那块春日风光的织毯上，一连三日都没有人敢将他放下来，可怜的人啊，他并不想干涉他们的生活，只不过想监视老战友以防他们暗中勾结，他原本以为这些人会自相残杀，直到又一则消息传来，将军阁下，赫苏克里斯托·桑切兹将军被猫咬了一口，染上了狂犬病，他的卫队不得不用椅子把他砸死了，可怜的人啊，之后另一则消息吹到他耳边时他几乎没从多米诺骨牌局中分神，将军阁下，罗达里奥·塞莱诺将军的马在过河时淹死了，他本人也溺水身亡了，可怜的人啊，再之后他们汇报时他甚至连眼都没眨一下，将军阁下，纳尔西索·洛佩兹将军因为克服不了鸡奸情结而羞愧，往肛门里塞上甘油炸药，内脏都被炸飞了，他说着可怜的人啊，仿佛自己同这些不光彩的死亡毫不相干，随后又对死者追加了荣誉，宣布他们为因公牺牲的烈士，在国家公墓举办了最高规格的隆重葬礼，因为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家，就好比一栋没有大门的房子，他说，当全国仅剩六位战争将军时，他将他们请到总统府来庆祝他的生日，同来的还有一堆战友，所有人聚在一起，主啊，连最阴险狡猾、曾试图和自己的母亲生个孩子并且只喝掺了火药的木醇酒的哈辛多·阿尔加拉维亚都来了，真像回到了从前的好日子，宴会厅里只有我们没有别人，大家像亲兄弟一样，没有人带武器，虽然邻屋挤着他们各自的卫兵，每个人都为我们当中唯一能理解所有人的那个人带来了上好的礼物，他们嘴上虽这样说，心里却把他想作唯一能摆布他们的人，唯一能把传奇的萨图尔诺·桑托斯将军从他遥远的荒漠老巢中揪过来的人，这位传

奇人物是血统纯正的印第安人，性情飘忽不定，将军阁下，我永远像我的婊子娘把我生下来时那样光脚走路，因为感觉不到土地，我们这些硬汉就没法呼吸，他到来时身体裹在印有色彩浓艳的奇禽异兽的毯子里，如往常一样被一道黯淡的光环笼罩，孤身一人，没带卫队，只在腰间别一把他拒绝卸下的甘蔗砍刀，因为那不是武器而是劳动工具，他送了我一只训练有素的同人一道打仗的老鹰，母亲啊，他还带来了一架竖琴，这神圣乐器的音符可以驱逐风暴，还可加速收割，萨图尔诺·桑托斯将军真诚的弹拨技艺唤起了我们所有人对那些可怕的战争之夜的怀念，母亲啊，它在我们心里翻搅起战争那狗的疥疮一般的气味，在我们灵魂里撩拨起将指引我们的、他们用灵魂合唱的金船战歌，母亲啊，从桥上回来时我已经哭成了泪人，他们一边唱着，一边就着李子吃着一只火鸡和半头乳猪，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瓶子，每个人都喝着自己的酒，除了他和萨图尔诺·桑托斯将军，他们俩一生都没碰过一滴酒，也不曾抽过烟、吃过维持生命所需之外的任何食物，他们为我合唱了那首大卫王曾唱晨曲[2]，他们哭着唱了一遍在赫恩曼领事带来那个新玩意儿——那是个带喇叭的留声机，将军阁下，它会滚动着唱生日快乐歌[3]——之前人们传唱的所有生日歌，他们唱得醉生梦死，似乎对那位沉郁的老人并没有真情实意，在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之时，他取下灯盏，依军营的习惯在睡前将宅子巡查了一遍，回来时路过宴会厅，最后看了一眼那六位在地上蜷成一团的将军，看到他们抱在一起，平静而了无生气，被那五支相互监视的卫队保护着，因为即便在睡梦中彼此拥抱，他们仍旧相互惧怕，那种惧意与每个人对他的恐惧几乎无异，也与他对他们当中任意两人勾结起来的畏惧基本相当，他又把灯挂回到门楣上，将卧室的三道门闩、三个插销、三把门环锁好，扑倒在地上，将右臂当作枕头，那一刻，所有卫队的武器同时开火，密集的爆炸令府内的柱子剧烈摇颤，天哪，片刻之后便不剩

一丝响动一声呻吟了，天哪，再一阵之后就结束了，当混乱过去，世界的阒寂中只剩下一缕火药气息，只剩下他，在权力的焦虑中永远安然无恙，他在新一天初生的锦葵色日光里看到了勤务兵正蹚过宴会厅中的血水，看到了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正害怕得眩晕颤抖，因为她发现，无论他们怎样用石灰涂抹墙壁，都有鲜血从中渗出，主啊，无论他们怎样用力拧挤地毯，都有鲜血从中滴落，他们越是急着清洗血迹遮掩杀戮的规模，就有越多的血液喷涌出来，沿走廊和办公室奔流而去，而根据官方公告，杀害这战争遗产的最后六名继承者的是他们自己发了疯的卫兵，他们的葬礼规格堪比主教的，他们裹在国旗中的遗体埋入了名人公墓，在那个血腥的圈套中，没有一个卫兵活着离开，一个都没有将军阁下，除了萨图尔诺·桑托斯将军，他当时被丁零当啷层层叠叠的披肩武装起来，因为通晓印第安人的意念易形术，他，这浑蛋，可能变成了犰狳或是池塘将军阁下，还可能变成了雷电，他知道事实的确如此，因为他最老练的探子自去年圣诞节起就已遍寻不着他的踪迹，最训练有素的猎豹犬在搜寻他时都会奔向相反的方向，他在他女巫的牌中看到他化身为黑桃K上的国王，依旧活着，白天睡觉，夜晚沿水上和陆上的小道外出，他一点点留下的祷文痕迹扰乱了追踪者的判断，消磨了敌人的意志，但他从未放弃，那些年对他的搜寻日日夜夜一刻未停，直到多年以后，他在总统专列上透过窗户看到了大群男女带着他们的孩子、牲口和厨具，与战时他多次在军队后方看到的场面一样，他看到那么多人在雨中列队前行，用系在棍上的吊床抬着病号，跟随着一个面色惨白、身罩粗麻长袍的男人，将军阁下，那人自称是布道者，于是他一拍脑门说道，原来在这儿，他妈的，萨图尔诺·桑托斯将军就在这儿用他那把缺了弦的竖琴的魔力乞求朝圣者的施舍呢，他落魄而阴沉，戴一顶破毡帽，披一件烂斗篷，就算是在那般可怜的境地，他也无法如他所料想的那样轻易被杀，反而用砍刀将他最厉害的三名手下斩了首级，鉴于他面对最凶狠

的对手时会勇猛异常又敏捷无比，他命令火车在那布道者传道的荒漠墓园前停下，当手持上膛枪支的总统卫兵从漆着那面旗帜色彩的车厢中冲出来时，所有人都惊恐地逃开了，于是视野中顿时空无一人，只剩手握砍刀站在那神话色彩的竖琴旁的萨图尔诺·桑托斯将军，他好似着了迷地看着在车厢外平台上现身的死敌，后者身着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没有携带武器，显得苍老而遥远，我们仿佛已经有一百年没见面了将军阁下，我觉得他看上去孤独疲惫，面色因肝病而发黄，两眼总是要流泪的样子，但他散发着苍白的光芒，那光芒属于那种不但能掌控自己的权力而且能从死于他手下的亡魂身上夺取权力的人，所以我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不会抵抗，因为对他来说，去对付一个远道而来、除了对指挥权怀有蛮横的渴望之外并无其他动机也无额外行动的老人是徒劳无用的，然而他却向他伸出那只鬼蝠魟样的手掌说道，愿上帝保佑你，孩子，祖国以你为荣，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清楚，想要战胜一个无法战胜的人，唯有将友谊作为武器，萨图尔诺·桑托斯将军亲吻了一下他方才踩过的土地，随后向他哀求道，我这双手还有耍弄砍刀的能力，将军阁下，所以希望您能赐我为您效力任您使唤的荣幸，将军阁下，于是他接受了，同意，并任命他为自己的私人保镖，唯一的条件是，你永远不能站在我身后，他把他变成自己在多米诺骨牌桌上的同伙，两人四手联合让多个落难的暴君输得一无所有，他把赤脚的他领上总统马车，带他去参加外交招待会，他的猛兽气息令群狗乱窜，令大使夫人眩晕，当生活变得异常艰涩，艰涩到令他想到自己在梦里的人群中将会形单影只时，他便吓得发抖，并开始害怕睡眠，于是让他横躺在自己卧室门口以减轻恐惧，多年来他一直信任他，让他待在离自己十掌的距离，直到痛风钳制了他舞弄砍刀的才能，他才向他请求您亲手杀了我吧将军阁下，免得杀掉我的幸运机会落在完全没有资格的人手里，他却在送他去死时，在荒漠的小路上给了他一笔丰厚的养老金和一枚感谢奖章，于是萨图尔诺·桑托斯将军

抛开面子，泣不成声地对他说，您也看到了，将军阁下，即使是最勇猛的汉子，也有娘娘腔的时候，这他妈是怎么回事啊，于是，在自己的出生之地，他再也抑制不住泪水。因此，当他以孩子气的快乐去补偿艰难的过往时，没有人比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更能理解他的这种快乐，当他为了在晚年拥有年少时亏缺的东西而挥霍权力的所得时，也没有人比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更能了解这样做多么缺乏意义，当他们利用他的天真卖给他那些破烂儿洋货时，她会愤怒异常，因为它们不像她那些高于四块便卖不出去的假鸟一样价廉又物美，去享受是好事，她说，但你得想想你的未来，如果明天或是哪天就算上帝不允许但他们硬是把你从现在的位子上拉下来，我可不想看到你拿着一顶帽子在教堂门口乞讨，你哪怕是会唱歌，或者是个大主教，或者是个水手倒也可以，但你只是将军，你只会命令不会别的，她向他建议说你还是把政府多出来的钱都埋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只有他能找到的地方，以备哪天需要逃走，就像那些可怜的、不知道哪里来的、在海岸悬崖之屋牧养着遗忘祈求着那艘船鸣响汽笛的总统一样，你去照照那面镜子吧，她对他说，但他没有理会，只是用他惯用的奇妙方式压倒了她的不安：别操心了母亲，这些人是爱我的。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将会在对贫穷的抱怨中度过多年，会和仆人因为购物账本而争吵，甚至会为了省钱而不吃午餐，没有任何人胆敢向她挑明她其实是世上最富有的女人，他从政府的生意中积累的钱财全数记在了她的名下，她不仅是无垠的土地无数的牲口的主人，也是本地有轨电车、邮政、电讯系统和国家水资源的拥有者，因此每一艘在亚马逊河或领水上通行的航船都必须付给她一笔她至死都不知晓的租赁费用，正如多年来她始终对另一件事毫不知情，她不知道儿子搬去了乡间宅院并沉溺于老年玩物时，并非如她所想的那样无助无依，因为除了从这个国家饲养的每头牲畜上所征收的个税，除了他的拥戴者为谋求私利投其所好为他付的钱送的礼，他还在很早以前就发明出一种能让自己万无一失

中彩票的体系并一直利用它敛财。这些都发生在他诈死之后的年代，也就是噪音年代，主啊，之所以这样称呼它，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所想，是因为某年在殉道者圣希拉克略的圣徒日夜晚，举国上下都感受到了从地下传来的轰鸣并且对此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而是因为那些在建工程制造的永久轰响，它们在筑起地基时就被宣告为全世界最宏伟的建筑，但永无竣工之日，那是一段和平时期，他会在午休时将政府顾问召到郊区宅邸，他躺在罗望子树甜蜜枝叶下的吊床上，用帽子扇着风，闭眼听着坐在吊床周围的博士们讨论，他们胡须硬挺，言谈松散，在布袍和塑料领子包裹起来的闷热中显得面色苍白，他听着那些他曾百般咒骂却为图方便重新任命的部长讨论国家大事，言语间还能听到庭院中公鸡追逐母鸡的骚乱声、持续的蝉鸣以及邻家的不眠唱机不停播放的苏珊娜来吧苏珊娜，突然间一切都停止了，安静，将军已经睡着了，但他会不睁眼也不停鼾声地咆哮，笨蛋们我没睡着，继续，于是他们接着讨论，直到他从午睡的恍惚中出来，判定在这么多个蠢材里只有我的兄弟卫生部长说得有道理，真他妈见鬼，完事了，在那乱摊子就要收场时，他和私人助理们谈着话，带着他们走来走去，同时一手端盘子一手拿勺子吃着饭，他在楼梯上冷漠地与他们告别，你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反正到头来管事的人是我，他妈的，之后他便再也不去问他们到底想干还是不想干了，他妈的，他为开业剪彩，在公共场合彻底现身，承受权力带来的风险，见鬼了，他在更和平的时期都从未做过这些，他与终生兄弟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以及兄弟卫生部长一起无休止地玩着多米诺骨牌，他们二人是绝无仅有的与他足够亲近的人，只有他们敢于向他请求赐予某个囚犯自由或者赦免某人的死罪，也只有他们敢于向他建议在特别召见会上接见穷人选美皇后，她是出自那片赤贫泥沼的不可思议的生灵，我们都称那片街区为斗狗区，因为那里所有的狗自很多年前就开始打斗，一刻都不曾休战，那里致命的多棱碉堡是国家安保巡警不敢踏足的地方，

因为只要有人手掌一拍，他们就会被剥光衣服，他们的汽车则会被拆卸成原始零件，不幸迷路的驴子从巷子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时已化作一袋白骨，他们会把富人的孩子烤着吃掉，或者做成香肠在集市上贩卖，您想想，我的厄运玛努艾拉·桑切兹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生在这个地方生活的，她是垃圾堆上的金盏花，她令人难以置信的姿色简直是这个国家的惊喜啊将军阁下，他们的讲述令他非常好奇，如果一切都像您二位说的那样，我不但要在特别召见会上接见她，还要和她跳第一曲华尔兹，他妈的把这写在报纸上，他命令道，穷人就喜欢这些。然而在召见会后的夜晚，在多米诺骨牌局上，他带着一丝苦涩对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说，穷人的选美皇后根本不配和我跳舞，她太普通了，和那个区其他的玛努艾拉·桑切兹一样，穿着荷叶边的仙女纱裙，戴着镶假珠宝的皇冠，手里拿一枝玫瑰，被母亲监视着，仿佛她是金子做的一样，于是他满足了她的一切愿望，其实不过是为他们斗狗区装上电灯和自来水，但他警告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满足人们的哀求，妈的，我再也不会跟穷人说话了，他说着，丢下牌局摔门就走，他听到了八点的钟声，在牛棚里给牛添上饲料，命人将牛粪带上楼去，又将整栋建筑巡视了一遍，边走边端着盘子吃着烧肉配菜豆、米饭和青香蕉片，他清点了自大门至卧室的哨兵，他们全数在自己的岗位上，共十四个，他看到了其余私人警卫都在第一庭院的哨位上玩着多米诺骨牌，看到了麻风病人都躺在玫瑰丛中，瘫痪患者都靠在楼梯台阶上，九点了，他把没吃完的饭放在一个窗台上，来到了妾侍那弥漫着沼泽气息的茅屋里，那里拥挤不堪，甚至三个人带着自己七个月的早产儿挤在一张床上睡觉，他骑到一堆散发着昨天剩菜味道的躯体上，拨开两个脑袋，推走六条腿再挤开三只胳膊，不问谁是谁，不管究竟是哪个女人在没有梦见他的睡梦中给他喂了奶，也不探究是哪个从邻床传来的声音困倦地喃喃道，别这么性急啊将军，会吓到孩子们的，他回到楼内，检查了二十三扇窗户的插销，点燃了自门厅至私人寝室每五

米一个共二十三个牛粪饼，他闻到了那烟气的味道，想起了一个可能属于他却不可能存在的童年，他只在熏烟初起的那刻记起了它，随后就永远地忘记了，他从寝室走回门厅，将灯依次熄灭，将睡着的鸟儿一一清点后又用粗布将鸟笼罩上，共四十八只，他持灯再次将整栋大楼巡查了一遍，他在一面面镜中看到一个个自己，十四位将军提着点亮的灯火走着，十点了，一切都井然有序，他回到了总统警卫的卧室，为他们关了灯，晚安，先生们，他查看了一层的公共办公室、前庭、厕所、窗帘后面、桌子底下，都没有人，他拿出那串他仅凭触摸就能一一分辨的钥匙，锁上所有办公室的门，上了主层，将房间一一检查并上锁，随后从一幅画后拿出他偷藏的一小瓶蜂蜜，在睡前喝了两勺，他想起了他睡在郊区宅院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正在蜜蜂花和奥勒冈草间沉睡于离别之中，她那养鸟人的描画黄鹂的手无力地低垂着，仿佛一个侧身躺着死去的母亲，愿您晚安，母亲，他说道，晚安，孩子，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在郊区宅院的睡梦中回应，他在将灯盏挂在卧室前大门的挂钩上时，下达了坚决的命令，在他睡觉时谁都不能将这盏灯熄灭，因为它是指引逃命的光亮，十一点了，他摸着黑将宅子最后查看了一遍，以防有人以为他已入眠而潜进来，在灯塔旋转相交又稍纵即逝的缕缕绿色微光中，他那金质马刺在尘灰上留下了一串星星点点的痕迹，他在两闪光亮间看到了一个漫无目的梦游的麻风病人，他挡住了他的去路，没有碰他，只用夜间巡逻灯为他照亮了道路，引他走过黑暗，将他安置在玫瑰丛中，他转而又在黑暗中清点了一遍警卫的人数，然后返回卧室，慢慢走过一扇扇窗，在每一扇中他都看到了一片相同的海洋，四月的加勒比海，他没有停步，一连欣赏了它二十三遍，它仍旧如从前在四月里那样，像一摊金色的沼泽，他听到了十二点的钟声，随着大教堂钟锤的最后一次敲击，他感到疝气发出了纤细扭曲的可怖哨声，于是世上再没有别的声音，他一个人就是国家，他将卧室的三把门环、三道门闩、三个插销锁好

后，坐上可移动式马桶小便，排出了两滴，四滴，七滴艰涩的尿液，随后扑倒在地，立刻睡着了，没有做梦，他在两点三刻醒了过来，大汗淋漓、战栗不安，因为他能肯定有人在他睡着时看着他，有人能不卸门环就进入房间，是谁，他问道，谁也不是，他闭上双眼，再次感到有人在看着他，他睁开双眼，惊恐地张望，于是看到了，他妈的，是玛努艾拉·桑切兹在房中走动，她没有卸掉门闩，因为她可以凭意念穿墙进出，我的厄运玛努艾拉·桑切兹穿着纱裙，手中拿着炭火般的玫瑰，喘息中透着甘草味道，告诉我这错乱景象不是真的，他说道，告诉我这不是你，告诉我这致命的眩晕不是来自你那疲惫的甘草味的呼吸，但这是她，是她的玫瑰，是她染香了整个卧房中的滚热气息，仿佛一声比海的喘息更古老强劲的挥之不去的低音，我的灾难玛努艾拉·桑切兹，你没有被写在我的掌心，也没有被写在我杯底的咖啡渣上，甚至没有被写在盆里我的死亡之水中，你不要再耗费我呼吸的空气了，不要再耗费我的睡梦和这个房间中的黑暗空间了，这里从没有进来也不会进来哪怕一个女人，为我熄灭那枝玫瑰吧，他一边哀求一边乱抓着寻找灯的开关，他寻它不着却看到了我的疯狂玛努艾拉·桑切兹，见鬼了，你又没有消失，我为什么要寻找你，如果你想的话，把我的房子带走，把整个国家连同它的龙都带走吧，但是让我点上灯，我黑夜里的蝎子，我的疝气玛努艾拉·桑切兹，婊子养的，他吼道，心里暗想光明能将他从巫术中解救出来，他大喊着把她拉走，把她从我身边带走，给她脖子套上铁锚，把她从海边悬崖上扔下去，免得再有人受她玫瑰刺眼光芒的折磨，他在惶恐中声嘶力竭地喊叫着跑到走廊上，把黑暗中的牛粪饼踢得四处飞散，他茫然地自问这世界怎么了，快八点了这邪恶屋子里的人还在睡觉，都起来，一帮浑蛋，他吼叫着，他们应声点亮了灯，在三点钟吹响了起床号，而后港口碉堡、圣赫洛尼莫基地以及全国的军营都响起了号声，随之传来惊慌失措的武器的轰鸣和结出露水两小时之前玫瑰绽放的轰响，传来梦游的妾侍们

在星光下敲打地毯、揭开沉睡鸟雀的罩布、将花瓶中隔夜的花朵换成昨夜花朵的喧嚷，与此同时，一群泥瓦匠正手忙脚乱地建起一堵堵紧急用墙，往窗玻璃上贴一个个金色的纸太阳，令向日葵迷失了方向，只为阻止人们看到天空依旧是夜晚模样、府中是二十五号礼拜日而海上正值四月，中国洗衣匠把最后一批睡梦中的人赶下床卷走了床单，盲人算命师宣称着爱情的来临而爱情却已不在，狡猾的公务员看到母鸡在下礼拜一的蛋而公文抽屉中还留着昨日的蛋，茫然无措的人群骚动不安，紧急召开的委员会议上群狗撕咬打斗，而他，则在坚定地称颂他为黎明的分解者、时间的司令与日光的保管人的谄媚者中间艰难地迈步离开了，走到前庭时，一位最高司令部的官员壮着胆子拦住了他，向他立正行礼报告说，将军阁下，还不到两点零五分，另一个声音插进来，还不到凌晨三点零五分将军阁下，他用手背狠狠地抽了他一巴掌，战栗的胸腔铆足了劲发出嗥叫，好让全世界都听到是八点，他妈的，八点，我说了这是上帝的旨意。当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看到他走进郊区宅邸时，便问他从哪里过来的，你怎么一副被狼蛛咬了的模样，手放在胸口做什么，她问他，但他没有回答，只是瘫倒在柳木安乐椅上，把手换了个位置，当他再一次把他母亲忘了时，她用描画黄鹂的笔戳了戳他，惊诧地问，他的两眼这样无神还把手放在胸口，是不是真的觉得自己在展示耶稣圣心，他敷衍地回避了，浑蛋母亲，他一摔门走了，在府中来回踱步，把手插入口袋，免得它们放在不该放的地方，他望着窗外的雨，望着那些为了使下午三点看起来像晚上八点而挂在窗玻璃上的银质月亮和锡箔纸星星，望着水滴从星星上滑落，他看到了院中冻僵的卫兵，看到了悲伤的海洋、玛努艾拉·桑切兹那落在了你的没有她身影的城市里的雨、可怕的空荡荡的厅堂、桌上倒扣的椅子，又一个短暂的礼拜六和它最初的阴影中无从抚慰的孤独，又一个没有她的夜晚，见鬼，他叹息道，至少让我忘了跳过的舞吧，那是最让我疼痛的东西，他为自己的处境感到羞愧难当，他摸索

着自己的身体，想将流浪的手安放在心脏之外的地方，最终把它搁在了受过雨水抚慰的疝气上，它和心脏一样，有着一样的形状、一样的重量，一样疼，但它更令人不堪承受，犹如在手掌上长出的活生生的心脏，直到此刻，他才明白了之前那么多人曾对他说的，心脏是第三颗睾丸将军阁下，见鬼，他离开了窗口，带着一个永恒总统的无从实现的热望和一根扎穿灵魂的鱼刺在会客厅中往复徘徊，他现身于部长会议，听着但如往常一样听不懂也听不进，他忍受着一篇催眠的财政报告，突然那情境中发生了什么，于是财政部长沉默了，而其他人都透过因疼痛而崩裂的保护壳的缝隙看着他，身为终身总统却被发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捂着胸口的他看见自己正手无寸铁地孤身坐在胡桃木长桌的一端，脸颊不断抽搐，他的生命已在我的兄弟卫生部长那金银匠的细小眼睛里的冰冷炭火中被烧焦了，部长一边转着背心上金质怀表的表链，一边用那双眼睛为他做内部检查，小心，有人说，应该是被刺伤了，但他却把他因愤怒而僵硬的美人鱼的手放在胡桃木桌上，脸上恢复了血色，用言语啐出一道致命的威严，你们是盼着我被刺伤吧，混账，继续啊，于是他们又开始了，然而众人虽在说话却顾不上彼此倾听，他们都认定他出了严重的状况否则不会如此愤怒，人们窃窃私语，于是传闻四起，大家指着他，你们看他有多沮丧，沮丧到在抓自己的心哪，他就要崩溃了，大家嘀咕着，于是一种说法流传开来，说他紧急召见了卫生部长，部长看到他把右臂搁在胡桃木桌上，仿佛一只将腿放在桌上的羔羊，身为总统的他为自己浸在泪水中的处境备感耻辱，于是他命他给我把这只手砍掉，兄弟，但卫生部长却说，不，将军，即使您枪毙了我我也不能从命，他对他说，这关乎正义，将军，我的命不及您的手臂珍贵。关于他状况的这般那样的流言愈发多样起来，他在牛棚中一边为各个军营称量着鲜奶，一边望着玛努艾拉·桑切兹的圣灰星期二[4]在天空中升起，他把麻风病人赶出了玫

瑰丛，免得他们给你玫瑰的玫瑰染上瘟疫，他在府中寻找着偏僻角落，只为哼唱你当上皇后的第一支华尔兹舞曲而不被别人听见，他唱道，为了你不把我忘记，他唱道，为了你感觉到如果把我忘记你便会死去，他陷入妾侍房间的烂泥中，试图为他所受的折磨寻找些许慰藉，于是他在作为瞬时情人的漫长人生中，第一次放纵了自己的天性，流连于细节，从最冷淡的女人身体中索取着呻吟，一次又一次，他在黑暗中令她们惊喜地笑道，您这把年纪，已经很不简单了，然而他再清楚不过，那种坚持的意志只不过是用来打发时间的自欺欺人，他的孤独的每一步，他呼吸中的每道藩篱，都不可避免地将他推向那无从逃脱的午后两点的酷热，在这片酷热中，在你的斗狗区那残暴王国的垃圾堆里，他祈求上帝垂爱令他得到玛努艾拉·桑切兹的爱，他扮成平民，没带卫队，坐上一辆燃放着爆竹的公务车，从昏沉午睡的衰败城市的陈旧汽油味中逃走，他躲开了市场那曲折小巷里亚洲商贩的喧嚷，看到了我的毁灭玛努艾拉·桑切兹的壮阔海洋和地平线上一只孤单的鹈鹕，他看到了一条通向你家的破旧电车轨道，于是下令将它们通通换成配有磨砂玻璃与玛努艾拉·桑切兹专享的天鹅绒宝座的黄色电车，他看到了你的萧索的礼拜日海滨浴场，于是下令建起更衣室、竖起一面随天气而变幻色彩的旗帜，再搭一圈钢丝网围出为玛努艾拉·桑切兹预留的私人海滩，他看到了一栋栋属于他当年随意令其致富的十四个家庭的别墅，有着大理石露台以及仿若在沉思的草坪，他看到了一栋更大的别墅，带有旋转喷泉和装彩色玻璃的阳台，我想看到你为了我住在那儿，于是那座宅子迅速被强征了，他在一辆如易拉罐拼起的汽车的后座上一面做白日梦一面决定着世界的运势，直到海风消失了，城市消失了，你的斗狗区的魔鬼喧嚣从窗户上的弹孔中钻进来，他看到了自己正身处何地却难以置信，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我的母亲啊，看看没有你我落到了什么地步，帮帮我吧，然而在纷乱的骚动中没人能认出那哀伤的双眼、虚弱的双唇和那只捂在胸口的无力的

手，还有那犹如曾祖父呓语般的声音，他身着白色亚麻衣，头戴监工帽，正从一块破碎的玻璃中探出身来寻找我的耻辱玛努艾拉·桑切兹的住处，他呓语着，她是穷人的皇后，女士，她手里总拿着一枝玫瑰，他惊恐地问自己你能住在这片骚乱中的哪个地方，在这里，拱起的脊椎关节暴力地冲撞上面布满了血腥犬牙撒旦一般的目光一串嗥叫转瞬即过在泥沼里撕咬得碎烂的两条狗腿之间还垂着尾巴在狗肉店里被挂上，你气息的甘草味道会在这里的哪个地方，在这里，婊子女儿的喇叭聒噪个不停而你将不断磨耗我的生命我会被人从餐厅的屠宰场踢出就像那堆醉鬼一样，你会迷失在哪一处无尽的寻欢作乐中，在这里，充斥着玛兰莞戈水和布隆丹加水和戈登洛沃和大麻和顶端有小洞的巨大香肠还有永远迷乱的黑人亚当[5]以及胡安希托·特鲁库佩伊的神秘天堂里的铜钱小费，见鬼，你的家是这糟乱房屋中的哪一个，在这里，有葫芦黄的斑驳墙壁主教长袍花边般的紫色纹饰鹦鹉绿的窗户地球蓝的隔断以及粉如你手中玫瑰的立柱，你生命的时钟究竟走到了哪一刻，如果在这个看起来像晚上八点的地狱中这些劣等人不知道我下令现在是三点而不是昨晚八点，你究竟是这些女人中的哪一个，她们穿着短裙在空荡房间的摇椅上叉开腿晃着脑袋吹着风呼吸着双腿间的热辣气息，他透过窗户的孔洞询问着我的躁怒玛努艾拉·桑切兹住在哪里，穿着泡泡纱裙、闪着钻石光芒、戴着加冕一周年仪式上他赠予的实心金王冠的她住在哪里，我知道她是谁了，先生，喧杂中有一个人，一个丰乳肥臀自以为是猩猩妈妈的女人应道，她住在那儿，先生，在那儿，在一栋和别家一样的房子里，那房子外墙上胡乱地刷了些颜色，马赛克台阶上还留着方才哪个人踩到狗屎而滑倒的新鲜痕迹，那是栋与坐在总督宝座上的玛努艾拉·桑切兹极不相称的穷人的房子，让人很难相信就是这一栋，但就是它，我的心肝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给我你的力量让我进去吧，母亲，就是那儿了，他在那个

街区转了十圈，恢复了呼吸，他用指节叩了三次房门，仿佛三声哀求，他在建筑物的阴影下等待，不清楚自己正呼吸的空气是因暴晒无风还是因渴望而变得腐臭，他等着，甚至毫不顾忌自己的身份，直到玛努艾拉·桑切兹的母亲让他进了飘散着剩鱼味道的宽敞而阴凉的厅室，整间房子昏昏沉沉，在里面看比从外面看要大些，玛努艾拉·桑切兹的母亲去叫午睡的她，而他坐在一个矮脚皮凳上审视着这令他失落的空间，他看到被旧时漏雨腐蚀的脏污墙面、一张破沙发、另外两个皮面小凳、角落里一架掉了弦的钢琴，再没有什么了，妈的，就为了这些受了这么多折磨，他哀叹道，当玛努艾拉·桑切兹的母亲挎着工具篮回来、开始坐下缝花边时，当玛努艾拉·桑切兹更衣、梳发、为了体面地迎接那位意外到访的老人而穿上她最好的鞋时，他正困惑地自问，你会在哪儿，我的厄运玛努艾拉·桑切兹，我来找你了可在这乞丐屋子里我找不到你，你的甘草味道在哪儿，这里可满是中午剩饭的恶臭，你的玫瑰在哪儿，爱在哪儿，把我从这迷惑人的狗牢笼里救出去吧，他哀叹道，他看到她出现在里屋门口，仿佛一个梦中影像映在另一个梦中的镜面里，她身着一码一夸蒂约的纱罗裙，头发用压发梳随意束起，脚穿一双破旧的鞋子，然而，手持炽热玫瑰的她是世上最美最亭亭玉立的女子，这一幕太过炫目，因而当她抬着头对他说上帝保佑阁下时，他竟几乎不能自已地要去倾身回礼，她在沙发上坐下，就在他面前，不过他汗液的恶臭还飘不到她那儿，这时我才第一次敢从正面看他，同时用两根手指转着玫瑰的光泽，好让他注意不到我的恐惧，我毫不留情地观察了他蝙蝠样的嘴唇和仿佛从水底看着我的喑哑双眼，他没有毛发的皮肤就好像一片和着苦涩油水的土地，他戴着总统印章戒、疲倦地放在膝上的右手皮肤更为紧绷，他的麻布衣裳干瘪细瘦，仿佛其中空空如也，他的死人鞋硕大无比，他有着看不见的思想和隐蔽的权力，这个世上最老的老人，这个举国最可怕、最遭怨恨、最不被怜悯的老人正用监工帽扇着风，安静地从他那边看着我，

我的上帝，他真是个悲伤的人啊，我惊恐地想，而她漠然地问道，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阁下，他庄严地回应说我只请求您一件事，殿下，请您接受我此次的探访。他接连数月不间断地探望她，每天都是趁着他从前去看望母亲的炽热僵死的时段，好让安全部门以为他就在郊区的宅子里，而众所周知那个时候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的步枪手会埋伏在屋顶平台上保护他，唯有他丝毫没有察觉，他们会阻截交通，用枪托轰走行人，清空他会经过的街道并加以封锁，在下午两点到五点的时段制造出一片空旷，并公布他那当场击毙胆敢在阳台探头者的命令，但哪怕最缺乏好奇心的人也能找到法子窥看那漆成公务车模样的总统专车一闪而过的影子，窥看那伏天里躲在麻布衣裳中乔装成平民的老人，他们看到了他那孤儿的苍白，看到了他那副守望了多个黎明、暗自落泪而已经不在乎别人怎么去想他放在胸前的手的面容，这古老沉郁的动物留下了一串幻想与猜疑，看看他，在禁道上闷热的空气里像丢了魂似的，而后关于他染上怪病的谣言开始四处散播，并且越传越疯，最终，流言蜚语撞上了事实：因为他不在母亲的居所，而在玛努艾拉·桑切兹隐蔽小海湾的阴暗厅室中，被她正屏息做针线活的母亲严酷地监视着，他是为她才买的那些让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伤心不已的灵巧机器，想要用玄秘的磁针，用石英镇纸捕住的一月暴风雪，用天文学家和药剂师的小玩意儿，用烙画笔、压力表、节拍器、陀螺吸引住她，他违逆着母亲的意思，违逆着自己对钢铁的贪婪欲望，不断从任何愿意出卖这些物件的人手中将它们买来，只为和玛努艾拉·桑切兹一起愉快地把玩，他会将那个爱国海螺壳放在她耳边，里面响起的不是涛声而是颂赞他的政权的军队进行曲，他点燃火柴凑近温度计，为的是让你看到被我的内心想法所挤压的水银高低涨落，他欣赏着玛努艾拉·桑切兹，却不对她提任何要求，不表明任何意图，只是将那些痴狂的礼物默默地向她压过去，并借机说出他没有能力说出的话，因为他只知道用他非凡强权的看得见的象征物来表达自

己最隐秘的热望，比如玛努艾拉·桑切兹生日那天，他请她把窗户打开，开窗后我被他们在我贫穷的斗狗区所做的事惊呆了，我看到挂着帆布窗帘的白色房屋，阳台上还种着花，看到装有旋转喷水器的蓝色草坪、孔雀、杀虫剂的凉风以及一夜之间悄无声息建起的沦陷期官员住宅的粗糙仿制品，他们屠宰了群狗，把没资格做皇后邻居的老居民一一从家中揪出并赶到另一片低贱场地任其腐灭，他们正是这样在数个夜晚悄悄建起了一个玛努艾拉·桑切兹的新区，好让你在以你之名命名的日子里透过窗子看到它，这是给你的，皇后，好让你过很多年幸福的日子，看看权力的施展是否可以软化你礼貌却不可征服的举止，别靠太近，阁下，我妈妈在那儿看护着我的名节，于是他被闷在了自己的渴望中，吞下愤怒，以祖父的迟缓一口一口抿着她为给他解渴而准备的充满怜悯的鲜番石榴汁，他强忍着太阳穴冰冷的刺痛，只是为了不让人发现他年老的衰残，只是为了让你在他耗尽了一切资源之后，因为爱而爱他而不是因怜悯而爱他，只有与你在一起时他才这般孤独，我甚至几乎没有气力待下去了，我摩挲着她，苟延残喘，直到真人大小的天使长在屋中敲着我的丧钟飞过，在她为避免海蛀虫把那些玩意儿蛀成粉末而将它们放回各自的匣子时，他喝下了这次探访的最后一口饮料，就一分钟，皇后，他的起身耗尽了自现在到明天的时间，耗尽了一生的时间，太糟糕了，几乎没有余下一刻能让他最后瞥一眼那无法触碰的少女，她已随着天使长的来临和他的离去而僵在原地，膝头的玫瑰也已枯萎凋亡，他在夜幕初垂时逃离，试图遮盖流言蜚语带来的羞耻，一首无名歌曲流传起来，除了他，所有人都会唱，甚至园中的鹦鹉也在唱，闪开吧，女人们，痛哭的将军捂着胸口来到这里，看看他吧，怎么已经无法主宰自己的权力，他昏庸地统领，还有一道伤口无法愈合，野生鹦鹉从家养鹦鹉那里学会了它，小鹦哥和松鸦也学会了它，它们成群结队地将这首歌一直带到他浩瀚的沉重王国的边疆，在祖国的每一片天空中，每到黄昏，便会响起那来自多个

游荡群体的齐刷刷的歌声，我爱戴的将军来到这里，他从嘴里排大粪，从屁股排法律，这首歌永无终结，所有人，甚至连鹦鹉都会添枝加叶地嘲弄那些试图阻挠这歌曲传唱的国家安保人员，那些为打仗而全副武装的巡逻队破院门而入，击毙了正立在木棍上捣乱的鹦鹉并将小鹦哥一把把扔去活生生地喂狗，他们宣称国家正在根除反动歌曲，以免任何人发现那尽人皆知的事：正是他，每到黄昏便如逃犯般穿过厨房，从总统府旁门溜出去，消失在私人房间牛粪的烟雾中，直到翌日凌晨四点，皇后，直到每日的同一时刻，他带着无数珍奇的礼物到玛努艾拉·桑切兹家中探访，那些礼物多到需要强占邻居的房屋、打掉隔断墙来摆放，于是原先的客厅变成了一个巨大阴森的棚屋，里面是数不尽的各个时代的钟表和各式各样的留声机，从最原始的蜡筒式到黑胶唱片式应有尽有，还有摇把的、踏板的、电动的五花八门的缝纫机，以及装有各式电表的完整卧室、顺势疗法药店、装满蝴蝶标本的玻璃柜、亚洲草药、理疗室、健身房、天文仪器、矫正术和自然科学设备，以及摆满各处的暗藏机械动能又有人类特质的娃娃、无人进入甚至无人去清扫的密室，所有东西当初如何搬来如今便如何摆在那里，乏人问津，玛努艾拉·桑切兹尤其不愿去过问，因为自那个我倒霉地成了皇后的黑色礼拜六之后，我就再也不愿去了解有关生命的任何事情，对我来说，世界已经在那个下午终结，她先前的追求者因身体无法遏止的崩溃和不可思议的疾病一个接一个暴亡，她的女性朋友也都销声匿迹，她未出家门就被带到一个尽是陌生人的街区，她形单影只、赤裸裸地被监视着，她沦为了命运陷阱的猎物，对那个可憎的追求者，既无胆量说不，也没勇气说好，他以庇护之爱窥视着她，带着崇敬般的惊愕欣赏着她，他用白帽子扇着风，仍远远出离了自己，于是她开始怀疑他是否真的在看她，抑或那只是因惊恐而生的幻象，她见过他在白日里彷徨，见过他咀嚼水果的汁液，见过他在如铜器震动般的蝉鸣让室内的阴暗更深浓时，手里拿着杯子坐在柳木安乐椅上打

着瞌睡，还见过他打鼾，请小心，阁下，她对他说，他于是惊醒，喃喃地说，没有，皇后，我没睡着，只是闭着眼睛而已，他说着，丝毫没察觉她已趁他睡着时将他手中的杯子拿走以免掉落，她狡黠地周旋着，直到那个不可思议的下午，他带着一则消息气喘吁吁地来到她家，我为你带来了全宇宙最大的礼物，一个上天的奇迹将会在今晚十一点零六分经过，只为你能看见，皇后，只是为了你能看见它，一颗彗星。那是最令我们失落的日子之一，因为很早以前就开始流传的众多说法中，有一种认为他的生命时钟与人类的时间法则无关，而与彗星的周期相合，他被孕育出来后，只能亲见它一次，任凭他的那些谄媚者再怎么狂妄地预言他也不会见它第二次，于是在那个百年一遇的十一月夜晚，我们如同企盼新生命诞生的人一般翘首以待，并且备好了喜庆的乐曲、欢快的钟声以及节日的焰火，一个世纪以来它们将首次不是为称颂他的荣耀而爆发，而是为宣告他时代的终结的十一点那十一声金属鸣响、为他在玛努艾拉·桑切兹家的屋顶平台上等待的天命盛事而爆发，他坐在她和她母亲之间，用力呼吸着，以免暴露出在这满是凶兆的僵冷天空下，他的心脏已衰弱无力，他第一次呼吸到了玛努艾拉·桑切兹夜晚的气息，感受到了她冷酷的力度、她放松的神态，他感觉到天际敲起了驱邪的鼓声，听到了遥远的哀叹和人群那如同火山泥涌动的声响，他们在一个先于他而生又将比他长寿且与他的权力格格不入的造物面前恐惧地屈膝跪拜，他因而感到了时间的重量，有那么一刻，他更是尝到了必有一死的凡人的痛苦，就在那时他看到了它，就在那儿，他说，刚才就在那儿，因为他认识它，在它向宇宙的另一边划去时他曾见过它，就是它，皇后，比世界还老，那天空大小的痛苦的发光水母，在轨迹上每走一拃都向自己的源头追溯了一百万年，她们听到了锡箔纸穗的簌簌声响，看到了他饱经磨难的面容和被泪水淹没的眼睛，以及彗尾上被太空的风吹得乱蓬蓬的冰冻毒药的痕迹，那阵风留给世界一串星辰残渣的发光尘埃，还有数个因柏油色的

月亮、因在地球纪元之前便存在的海洋火山口的灰烬而迟来的黎明，就在那儿呢，皇后，他喃喃道，好好看看它，一个世纪内我们再也看不到它了，她因而惊惧地画了个十字，在彗星的磷光光芒下，被星辰的残灰细雨和天空的尘渣染白了头发的她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美，于是事情就发生了，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那个时候玛努艾拉·桑切兹在天空中看到了永恒的深壑，她将手伸向了那缕空洞，想去抓住生命，碰到的却仅仅是那只不被喜欢的戴总统之戒的手，那只燥热、光润、被权力的文火灼烤的掠夺者的手。鲜有人为那圣经记载的发光水母的经过而感动，它惊跑了天上的鹿群，又以星辰残渣的发光尘埃熏燎了国土，即便是我们这些最没有虔诚信仰的人，也都在盼着那场将会摧毁基督教教义、确立第三约书基础的非同寻常的死亡的来临，为此我们白白守到天亮，直到拂晓的清洁女工已在街上打扫彗星留下的天体垃圾，我们回到家时已因等待而精疲力竭，比早先在这些街道上彻夜庆祝更为倦怠，即便那时，我们也不甘于相信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是认为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已经变成新一出历史骗局的受害者，因为政府机构宣称彗星的经过是体制对恶势力的胜利，他们利用这时机以当权者毋庸置疑的充满活力的行动澄清了他患有怪病的传闻，口号被更新，郑重的信息公之于众，通过它，他表达了我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决定，彗星下次回来时，我还要在为国效劳的岗位上，与此同时他听到的却是仿佛不属于他的体制的音乐与焰火声，他无动于衷地听着武器广场上群众的呼喊，他们举着巨大条幅，上面写着永恒荣耀归于那功勋卓著者，他必将长寿并将此讲述，他不在意政府的阻挠，将权力下放给下属，同时挨受着玛努艾拉·桑切兹手上的炙热留在他手中的记忆的折磨，他梦想着再次经历那幸福的瞬间，哪怕大自然扭曲方向，哪怕宇宙毁灭也在所不惜，他是如此渴切，甚至前去哀求他的天文学家为他发明一尾焰火彗星、一颗转瞬即逝的启明星、一条火龙，总之任何与星辰有关的可怕创造，只要可怕到能令一位美人迷

醉于永恒就好，然而他们唯一能计算出的就是下礼拜三下午四点有一次日全食，将军阁下，他接受了，同意，那是白昼里万分真实的黑夜，真实到星光燃起、花朵凋零、母鸡归巢、预感本能最强的动物皆惊惧畏怯，他则呼吸着玛努艾拉·桑切兹薄暮继而夜晚的呼吸，与此同时她手中的玫瑰也受暗影的欺骗而颓萎，在那儿，皇后，他说，你的日食，玛努艾拉·桑切兹没有回答，没有碰他的手，没有呼吸，她是那般的不真实，令他再也克制不住欲望，于是在黑暗中将手伸出去碰触她的手，然而却没有碰到，他用指腹在方才她的气味停留的地方摸索，却仍旧寻不见，他在那栋巨宅里用双手寻找，在黑暗中睁着梦游人的双眼探求，他苦苦问自己你在哪儿，我的厄运玛努艾拉·桑切兹，你让我在你不祥的日食之夜寻不到你，你无情的手在哪儿，你的玫瑰在哪儿，他仿佛一个迷失在盈满无形之水的池塘中的潜水员，在房间里找到了漂浮着的电流计史前龙虾、音乐钟螃蟹、你的无用机器螯虾，但却没有找到你甘草味道的气息，当短暂黑夜的暗影散去，他灵魂中逐渐燃起真理之光，他在这处荒凉居所下午六点的黎明的晦暗中，感到自己比上帝更加老迈，在这个没有你的世界的永恒孤寂里，他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悲伤、更加孤独，我的皇后，在日食之谜中永远消失了的皇后，她将永不再出现，因为在此后漫长的权力生涯中，他再也没有在她家的迷宫里找到我的堕落玛努艾拉·桑切兹，她已在那个日食之夜悄悄离开了，将军阁下，有人告诉他在波多黎各的一场布莱娜舞会上看到了她，他们在那里杀害了艾莱娜，但那不是她，还有人看到她出现在蒙特罗老爹[6]迷狂的舞会上，唉，穷苦的伦巴舞者，但那也不是她，又有人在巴洛温多矿上的破房子里、在阿拉卡塔卡的昆比安巴舞会上、在巴拿马小鼓漾起的美妙微风中看到了她，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她，将军阁下，她就是他妈的不见了，当时的他没有自暴自弃地屈从于去死的意愿并非因为怒火不够炽烈，而是因

为他无可奈何地被注定不会为爱而死，这一点他在帝国初年的某个下午就已知晓，那时他找了一名女巫来解读盆中之水隐含的命运密匙，它们没有被写在他的掌心中、纸牌上，没有被写在咖啡底的沉淀物里或者其他任何可被探察的介质上，只被写在那预卜之水的镜面中，在那里，他看到了自己在与会客厅相连的办公室里于睡梦中自然死亡，他看到自己面朝下趴在地上，与他自出世以来的一生中每个夜晚的睡姿无异，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和军靴，戴着金质马刺，右臂弯在脸下当作枕头，年龄在一百零七岁至二百三十二岁之间。

---

[1] 指以暴力攫取并靠暴力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独裁军人。源于拉丁美洲，后引申为军事独裁者。

[2] 在拉美部分地区，尤其是在墨西哥的庆典活动、生日聚会上，人们会唱一首以“大卫王曾唱晨曲”开头的歌。

[3] “生日快乐歌”原文为英文。

[4] 基督教中有圣灰星期三，是教会年历节期大斋期之始。部分教会会在那一天举行涂灰礼，用前一年棕枝主日祝圣过的棕榈枝烧成灰，涂在教友的额头上，作为悔改的象征。

[5] 在哥伦比亚指英俊的黑人男子。

[6] 古巴传说中的人物，一位热爱音乐和舞蹈的白发黑人。

他们就是这样在他秋日的前夕找到了他，而这具尸体实为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于是多年之后，在一个充满太多不确定因素的年代再次这样找到他时，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能够确定那具被兀鹫啄烂了的、布满深海寄生物的朽迈尸体是他本人。在他那只因腐烂而丑陋不堪的手上，没有任何残迹能表明，在噪音年代它曾因一名不太可能存在的少女的断然拒绝而捂在胸口，我们也没有找到任何他生命的蛛丝马迹来确定他的身份。这件事发生在我们的年代自然不足为奇，因为即便是在他的鼎盛岁月中，人们也有理由怀疑他的存在，要知道连他的心腹们都不知晓他的确切年龄，在某些时期这一问题着实令人困惑：他出现在慈善抽奖会上时看起来已年过八十，在民众接待会上时六十，在公共节日的庆典上甚至不到四十。帕梅斯通大使，最后一批向他呈交国书的外交官之一，在他被查禁的回忆录中谈到，我想象不出比他更年老的人，也想象不出如这里一般废怠混乱的国度，在此国总统府中前行，需从废纸堆、动物粪便以及睡在走廊上的狗的剩饭间探出道路，没有人向我说明贸易税费或公务情况，我只得借助已经侵入到最靠外的几个卧室中的麻风病人和瘫痪患者的指引去往会客厅，在那里，母鸡啄咬着哥白林织毯上它们臆想中的麦田，一头母牛撕扯咀嚼着一幅绘有主教像的画布，我当即便察觉到他比痴傻之人还要耳聋，因为他答非所问，还因为他为鸟雀喑哑无声而烦闷不已，但事实上，走过那里如同穿行于百鸟唧啾、嘈啐不堪的清晨山林，甚至令人感到呼吸困难，突然间，他用一抹明澈的目光中断了国书呈交仪式，将手掌放在耳后，指着窗外曾是汪洋的尘灰平原，以叫醒酣睡人的声音说道，听，有骡群从那边来了，听，亲爱的斯泰特森，是那片海要

回来了。实在难以相信这个无药可救的老人就是当年那位救世主，当年，在统治初期，他会出其不意地来到农村，没有卫队跟随，只带一个手持甘蔗砍刀的赤脚瓜希拉印第安人和一个他随意用手点到的议员代表，他会去了解庄稼的收成、牲畜的状况和人们的行为举止，他会坐在广场上芒果树荫下的藤编摇椅上，用那时戴的监工帽扇着风，虽然看起来因炎热而困顿，但他在同那些他召集到周围来的男男女女对话时，从不放过任何没有说清道明的细节，他叫着他们的姓名，仿佛头脑中有一份全国居民、统计数字与问题的书面记录，于是他闭着眼叫了我，来这儿，哈辛达·莫拉莱斯，给我讲讲那个小伙子的事，就是前一年那个为了喝一瓶蓖麻油把自己摔了一跤的小伙子，还有你，胡安·布列多，他对我说，你的种牛怎么样了，他曾经亲自为这头害了虫的牛祈祷，好让蛆虫都从它耳朵里掉出来，还有你，玛蒂尔德·贝拉尔塔，我把你那逃跑的丈夫给你完完整整找回来了，你拿什么报答我呀，他就在那儿呢，脖子上套着龙舌兰绳，被拖曳着上前领了他亲赐的警告：如果再敢抛弃他的合法妻子，他就让他烂在那套中国式枷锁中，他又以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命令一名屠夫在某场公开活动上剁下了一个挥霍无度的司库的双手，他会摘下私家菜园里的番茄，一边当着农业专家的面以内行的傲慢架势将它们吃下，一边说着这地里缺很多公驴粪，都给记在政府账上，他命令道，他突然停下在城里的漫步，冲着窗口对我狂笑着喊道，啊哈，罗伦萨·洛佩兹，二十年前我送你的那台缝纫机怎么样啦，我回答他道，它已经去见上帝了，将军，您想想，东西和人都扛不了一辈子啊，他却反驳说世界是永恒的，然后不顾当街等待的随行人员，拿起螺丝刀和润滑油壶就开始拆卸那台机器，人们能不时察觉到他公牛一般的喘息中流露出的绝望，他的脸也蹭上了发动机油，不过将近三个小时后，那机器便焕然一新，又能缝东西了，那个时候，日常生活中再微不足道的问题，都被他视作国家大事般重要，他由衷地相信幸福可以被分配，而死亡可以被军人的

诡计赎买。很难承认，那个无药可救的老人就是那个手掌大权的男人的唯一所剩，他从前的权力大到当他问时间时，人们会回答他，您说几点就是几点，将军阁下，这的确属实，他不仅会将时间按照最利于他行事的方式作调整，还会将法定节日按照他的计划进行变更，好让他可以一个节日挨一个节日地跑遍全国，他会带着赤脚的印第安人、愁苦的参议员以及装着在各个广场遭遇劲敌的优秀斗鸡的背篓，他会亲自下赌注，他笑起来可以撼动斗鸡场的地基，因为当他发出一串凌驾于音乐和焰火之上的鼓鸣似的怪异笑声时，我们都感到必须附和赔笑，而当他沉默时，我们便会备受煎熬，当他的鸡杀死了我们那些以失败为目标而训练已久的鸡时，我们会如释重负地欢呼，从没有哪一场失望而归，只有狄奥尼西奥·伊瓜兰的那只倒霉鸡是例外，它以利落精准的袭击杀死了当权者的灰公鸡，他第一个穿过战场握住胜利者的手，你真是条汉子，他愉快地对他说着，心怀感激，因为终于有人让他体会了一场无伤大雅的失败，买你的红鸡要付多少钱，他问道，狄奥尼西奥·伊瓜兰战战兢兢地回答说，它是您的了，将军，这是我莫大的荣幸，他在沸腾的乡亲们的掌声中、在音乐和爆竹的轰鸣中回了家，一路上向所有人展示他为了换得常胜红将军而赠予他的六只纯种公鸡，然而当晚，他将自己锁在卧室中，独自饮了一葫芦甘蔗酒，随后用吊床的龙舌兰绳把自己吊死了，可怜的人啊，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欢愉的现身会招致一系列家庭灾难，自己的所到之处会留下一连串令他意外的死亡，他也并不知道，如果自己在殷勤的心腹喽啰面前一时口误叫错了名字，他们便会当作不满的暗示，于是一些不幸的忠诚追随者便会受到无尽的折磨，他蓄着缓慢生长的胡茬，迈着诡异的犰狳步子走遍了全国，在各处留下了浓烈的汗臭，他会随兴走进某户人家的厨房，一副不中用了的爷爷的样子，吓得屋里的人都瑟瑟发抖，他会用加拉巴木瓢从瓮里舀水喝，用手从菜锅里捞出大块的肉吃，那么快乐、那么单纯，全然不顾那个家庭被永远地烙上了他来访过的印

记，而他如此行事并非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也并不像其他时候那样是为了爱情的需要，那就是他当时的自然状态，因为那时的权力还不是他晚秋时期的无边泥塘，而是在我们眼前的从源头喷放的激越洪流，因此他只需用手一指，该结果的树便结果，该成长的牲畜便成长，该致富的人便致富，他下令收起阻碍某个地区收割的雨水，并将之洒向干旱的地区，事情果然发生了，主啊，这是我亲眼所见，在他自信是他全部权力的主宰以前，他的传奇便早已开始流传，彼时他还迷信于各种预兆和对梦魇的解读，他会突然中断刚刚开始的旅程，因为听到了黄头叫隼在他头顶鸣唱，他会更改公开亮相的日期，因为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收获了一枚双黄蛋，他清除了那支由殷勤的议员和代表组成的跟着他各处游历、替他发表他从不敢发表的演讲的随从队伍，因为他做噩梦看到自己在那栋空洞的大宅中被一群面色惨白的灰衣助祭士包围，他们微笑着用切肉刀刺向他，带着熊熊怒火驱赶他，令他无论将视线转向何方，都能看到一把铁器向他的脸和眼直袭过来，他看到自己被团团围住，仿佛一头被杀手困住的野兽，他们安静而面带笑意，争夺着参与献祭和享用他血液的特权，然而他既不愠怒也不惧怕，只感到一种随生命的干涸而愈发辽远深邃的释然，他自觉轻盈纯净，因而在他们杀他时，他也报以微笑，在那栋石灰墙壁已被我的鲜血溅染的梦中屋内，为他们而笑，也为自己而笑，直到一个在梦中是他儿子的人一刀砍在了他的腹股沟上，从那里，我留存的最后一口气被排出，于是他用浸透了自己血液的毯子盖住了脸，这样，在他活着时认不出他的人也不会认出死后的他，在这般逼真的垂死感受中，他因自己的苟延残喘而颤抖崩溃，于是再也按捺不住，将那感受告诉了我的兄弟卫生部长，而他最终也不免令他惊恐，因为他向他揭示在人类历史上，将军阁下，这样的死亡已有过一次，他还为他读了拉乌塔罗·穆纽斯将军某本被熏黑的记事簿中的那段故事，母亲啊，和他的梦境一模一样，在念诵的过程中，他甚至记起了醒来后一度忘

记的细节：在他们杀他的时候，总统府的窗户全部自动打开了，但当时并没刮风，而府上窗户的实际数量正是梦中他伤口的数量，二十三，一个可怖的巧合，于是在那个礼拜，他在他冷漠的军队同谋面前，以海盗袭击的方式，取缔了议会和法院，焚毁了我们从前的显贵们的庄严宅邸，那燃烧的火光直到深夜仍能从总统府的阳台上看到，当有消息说将军阁下，他们连地基石块都没留下时，他丝毫不为所动，向我们承诺将严惩发动袭击的人以儆效尤，然而罪犯从未出现，他向我们承诺完全按原样重建显贵宅邸而那里直至我们的时代仍是一片焦黑的废墟，他从不遮掩自己那套可怕的驱魔手段，并利用这机会将老共和国的立法与司法系统全部铲除，他用名利将议员、代表和法官通通压垮，因为不再需要他们来维持执政初期的表象，他把他们打发到那些安逸而遥远的使馆，身边只剩下那个手持砍刀的印第安人的暗影，他与他形影相随，替他试吃食物和饮料，阻止人与他靠近，他待在我家时，他就去看门，来我家的举动滋长了他是我的秘密情人的流言，而事实上，在那段漫长年月中，他每月最多来两次，向我咨询纸牌的解读方法，当时他还相信自己是必有一死的凡人，还拥有怀疑的品德，还能认识到错误，并且相信纸牌胜过相信自己粗野的直觉，他来时总是像初次坐在我面前时那样惊恐苍老，一言不发地把双手摊开给我看，那对平滑紧实好似蛤蟆肚皮的手掌是我漫长的占卜生涯中不曾看到也不会再看到的，他把双手同时放在桌上，仿佛一个绝症病人无声的哀求，我能觉察到他是那样的急切无助，以至于令我印象更深的不是那荒芜的掌心，而是他无从排解的忧郁、他嘴唇的苍白和他被猜忌腐蚀了的可怜老人的心，他的命运，不仅从他的手上看起来深不可测，用当时已知的任何察探手段来看都是如此，他每一切牌，牌面都立即变成浑水井，他喝完了的咖啡的杯底沉淀也都浑浊不清，与他个人的未来、他的幸福或是财富相关的关键线索全都模糊难辨，然而任何和他有关涉的人的命运都明晰可鉴，于是我们看到了他的母亲

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在为外国名字的鸟雀涂颜料，那时的她年事已高，在因疫病而变得稀薄的空气中几乎辨不清颜色了，可怜的母亲啊，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城市被一场飓风摧毁，那场飓风极其可怕，简直不配它那女性的名字，我们看到了一个戴绿色面具、持利剑的男人，于是他苦恼地问这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纸牌回答说，他每个礼拜二都离他更近，他便说了声啊哈，随后问他的眼睛什么颜色，纸牌回答说，一只是甘蔗汁在日光下的颜色，另一只是甘蔗汁在黑暗中的颜色，他便说了声啊哈，随后问那个人有什么企图，那是我最后一次向他揭出纸牌的终极真相，因为我回答他，绿面具代表的是不忠和背叛，于是他带着胜券在握的口吻说，啊哈，我知道是谁了，他妈的，他喊道，是纳尔希索·米拉瓦上校，他最亲近的副官之一，两天后他往自己耳朵里灌了一枪，没有留下任何解释，可怜的人啊，纸牌的占卜就是这样主导着国家的运势、预设着它的历史，直到他听人说起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女巫，她能以万无一失的盆中之水破译死亡，于是他偷偷地前去寻她，除了砍刀天使外再没有其他人看见，他们沿着骡道一直走到荒漠中的那间茅屋，她和她的重孙女就住在那里，重孙女已有三个孩子，并且即将诞下上个月死去的那任丈夫的骨肉，他在近乎黑暗无光的卧房深处找到了她，她半失明地瘫在那里，但是当她请他将双手置于盆上方时，盆中之水顿时变得澄明，并散发出轻柔而透彻的光，于是他看到了自己，一模一样的自己，趴在地上，身穿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脚蹬军靴，戴着金质马刺，于是他问这是什么地方，那女人审视着平静的水面，回答说，是一个房间，不比这间屋子大，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好像有一张写字桌，还有一台电风扇，有面海的窗户，白墙上挂着骏马图，还有一面带龙的旗，于是他又说，啊哈，因为他已经识出，那无疑是与会客厅相连的那间办公室，他接着问是否死得很惨或者得了可怕的疾病，她回答说不是，是在睡梦中且没有痛苦，他应道，啊哈，又颤抖着问她是什么时候，她回答说他可

以放心睡觉，因为他死的时候年纪不会比现在的她小，也就是一百零七岁，但也不会比那晚一百二十五年以上，于是他说，啊哈，而后便杀害了那瘫在吊床上的老妇人以免除他之外还有谁知道他死亡时的情景，他是用马刺上的皮带将她勒死的，没有让她痛苦、呻吟，俨然一个老练的刽子手，尽管她是这世上唯一享有被他亲手杀死的荣耀的生物——无论人还是动物，无论在战争里还是在和平中，可怜的女人。在他秋日的夜晚，回忆自己这样阴险卑鄙的过往并没有使他良心不安，它们反而成了范本般的寓言，指明他应该这样做却没这样做的事，特别是在玛努艾拉·桑切兹消失在日食之影中时，他格外希望自己的残暴再次盛放，好以此根除煎熬他五脏六腑的羞辱感所触发的怒气，他会躺在罗望子树风铃下的吊床上，想着玛努艾拉·桑切兹，满怀那股搅扰他梦境的怨恨，而与此同时，陆海空三军都在寻找她，甚至连边境地区尚未开垦的硝石荒漠都没放过，却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细微的痕迹，你他妈的躲到哪儿去了，他自言自语道，你以为你他妈的钻到什么地方去就能逃出我的掌控，让你看看到底是谁说了算，他放在胸口的帽子随着心脏的剧烈跳动而不停震颤，他迷醉在盛怒中，丝毫不理会他母亲的坚持，她一直想打探出为什么从日食那天下午开始你就不说话了，怎么变内向了，但他没有回答就走了，狗屎母亲，他拖着那双孤儿的脚，心里不住地滴着苦水，自尊也被那无法补救的痛楚伤害了，这些坏事发生在我身上就是因为我变成了这么一个孬种，就是因为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就是因为进那臭娘儿们的屋还要经过她母亲的同意，当初去弗朗西斯卡·里内洛那个清凉寂静的庄园时就不用这样，那庄园位于桑托斯伊盖隆内斯教区，那时还是他自己而不是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代表权力抛头露面，他会由着自己的性子，在摆钟缓缓敲响十一点的钟声时，连门环都不叩就走进去，我在花园露台听到他金质马刺的碰击声，便立即明白那如捣臼木槌发出的声响、那踏在砖地上的威严步子不可能是别人的只可能是他

的，在看到他出现在天井露台的门洞之前，我就感觉已经真切地看到了他整个人，门口的石鸻正在金色天竺葵间歌唱着十一点的到来，而同在唱歌的拟黄鹂则在挂于屋檐下的小香蕉散发出来的丙酮气味中迷离，八月里不祥的礼拜二的日光在院中新长出的香蕉叶和我丈夫蓬修·达萨清晨刚捕猎来的一头小鹿的尸体间休憩，他把鹿腿绑上，挂在了那一把把因为糖分而长出黑斑的小香蕉旁以排干血水，然后我看到了他，比梦中的更高大更阴森，穿着一双满是烂泥的脏靴子和一件被汗浸湿了的军服上衣，皮带上没佩武器，但他仍旧放心，因为那个赤脚印第安人的暗影就一动不动地立在他身后，手中还握着砍刀刀柄，我看到了那双令人无法回避的眼睛和那只睡梦中的少女的手，他就近从一把香蕉中揪下一根，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一根又一根，他渴切地咀嚼着它们，整张嘴中涌动着沼泽地的声响，视线一刻未离开诱人的弗朗西斯卡·里内洛，而她以刚嫁作人妇的羞怯不知所措地看着他，因为他是来尽兴的，而又没有任何比他更强大的力量可以阻止他，我几乎察觉不到我丈夫畏怯的呼吸了，他在我身旁坐下，我们两人拉着手一动不动，两颗明信片一般的心在那个深不可测的老人黏韧的目光下一同惊惶地跳动着，他就在离门两步远的地方一根接一根地吃着香蕉，将皮往肩膀后的院子里甩，他的目光从开始看我的那一刻起就没有离开过，直到把整串香蕉全部吃完，直到死鹿身旁的香蕉杆变得光秃秃，他才向赤脚印第安人打了个手势，而后命令蓬修·达萨，和我带砍刀的朋友出去一趟吧，他有些事情要和你解决，我几乎要吓晕过去，但仍留有足够的神志，仍然清楚，能解救我的唯一办法就是任他在饭桌上对我随心所欲，甚至在他身上的氨气味儿让我窒息之后，在他一把扯下我的内裤并用手指胡乱摸索之时，我还帮他在衬裙的蕾丝花边之间找到位置，我不知所措地想着，圣体啊，这真是太羞耻了，真是太晦气了，因为那天早上我忙着收拾小鹿，都没有清洗一下自己，就这样，他在数月的烦闷之后得偿所愿，却做得仓促而糟糕，仿佛比他

本人苍老抑或年轻太多，他深陷在恍惚中，我甚至都不太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尽其所能完的事，他还忍不住呜咽起来，流下了孤独的大个子孤儿如发烫尿液一般的泪水，他哭着，好像受尽了苦难，使我不仅怜悯他，也怜悯起世上所有的男人，于是我开始用指腹抚摩他的脑袋，安慰他说，不至于这样，将军，人生很长，而就在此时，带砍刀的人把蓬修·达萨带到了香蕉园里，将他切成了纤薄的肉片，它们被野猪衔去了各处，再没可能复原，可怜的人啊，但没有别的办法，他说，因为他会成为终生的死敌。这些是他权力的影像记忆，它们远道而来，加深了他的苦楚：他的浓厚权力中究竟被掺了多少水，导致他竟已完全没有能力去驱散那日食造成的巫术伤害了，在砍刀天使的关节因尿酸过高而形成结晶后，他将自己的性命交付在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一人手上，面对后者在多米诺骨牌桌上冰冷的控制，他不由得因一丝躁郁而战栗起来，他自问，把这么多的信任和权威独独授予一个人难道不是招致他不幸的根源吗，难道不是我终生的兄弟剃掉了他内陆地区领袖的野性毛发从而把他变成一头阉牛和一个宫殿里的傀儡吗，他让他无力发出哪怕一道未被事先执行的指令，还想出了让别的面孔代替他抛头露面的伎俩，而在从前的好日子里，一个赤脚印第安人就足够了，他会挥舞砍刀在人群中开路，大喊着浑蛋们让开，管事的人来啦，但他无法区分那鱼龙混杂的欢呼队伍中，谁是真正的爱国者而谁又是投机者，因为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最居心叵测的就是那些最起劲地喊硬汉万岁的人，他妈的，将军万岁，但现在他却够不着他的军权，无力调兵去寻找那个厄运皇后，那个曾奚落过他老年色欲那无法逾越的围墙的皇后，他妈的，他把骨牌摔在地上，因看不见的缘由扔下残局离去，内心失落不已，因为他突然想到，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在这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的人但他除外，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衬衫在这么早的时间就已被汗液浸透，第一次察觉到随海洋水汽蒸腾的腐臭味道和因湿热而扭曲的疝气的温柔笛声，是闷热造成的，他一

边没有底气地自言自语，一边在窗口探看，试图看透这静止城市里的奇异光芒，这里仅存的活物似乎是那群正惊恐逃离贫民医院屋檐的兀鹫以及那位武器广场上的盲人，那盲人感觉到了在民政大楼窗口现身的颤巍巍的老人，他急迫地用手杖向他示意并对他喊了些不明所以的话，被后者解读为压抑情绪中的又一个信号，暗示即将有事发生，然而，在这个漫长而沮丧的礼拜一即将结束时，仍旧安然无恙，这种状况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是闷热造成的，他自言自语道，细流轻挠着雾气氤氲的安眠药水瓶滤嘴催他入眠，于是他很快睡着了，却又猛然惊醒，谁在那儿，他吼道，事实上那是他的心脏因黎明时分公鸡一反常态的沉默不打鸣而备感压抑，他感到宇宙的航船在他睡着时已经驶到了某个港口，而他正在一片蒸汽汤中漂浮，天空中、地面上那些比迟钝的预兆和人类最先进的科学知识更能敏锐地预见到死亡的动物都惧怕得噤声，空气已耗尽、时间正改向，他起身后感到每迈一步心脏都会刺痛而鼓膜正在爆裂，一种滚烫的物质从鼻孔流出，是死亡，他想，那军服上衣已被血水浸透，随后他才知晓，不是，将军阁下，是飓风，在把那个古老紧实的加勒比王国撕成一串散乱小岛的种种灾害中，它是最具毁灭性的，但它又太过隐秘莫测，唯有他早在鸡飞狗跳之前就凭预感的本能觉察到了这场灾难，它令人措手不及，惊慌的公务人员甚至都来不及为它起个女性的名字，他们前来向我汇报说，现在确定了，将军阁下，那玩意儿他妈的要把国家卷走啦，他却下令用船骨加固门窗，将哨兵绑在楼道上，把母牛母鸡关在一楼办公室里，将每样东西，从武器广场到他受惊的阴郁王国里最偏远的一块界碑，都钉在原位，整个国家仿佛都被锚固定住了，因为他下达了不容违抗的命令：一旦出现骚乱迹象就鸣枪，前两次向天，第三次就杀人，然而，旋风携着巨型刀刃以不可抗拒之势过了境，它干净利落地一刀斩断了主入口处的钢铁装甲大门并将我的母牛卷上了天，但他并未察觉到这些，因为他正身处不知从何而来的横冲直撞的暴雨的魔力中，雨

水在他周围洒下凶猛冰雹般的阳台碎片以及深海与丛林中的野兽，他也没有清醒的神志去考量这场灾变的规模，只是在滂沱大雨中徘徊着，在怨恨的麝香味道中兀自问着你在哪儿，我的苦水玛努艾拉·桑切兹，他妈的，你到底钻到哪儿去了，让我这场复仇的灾难都够不到你。飓风过后，在一处平静的水洼中，他发现身边只剩几个最亲近的随从，正和他一起在会客厅满目疮痍的水面上坐着划艇漂浮，他们划出车库门，在沙枣树冠和武器广场的锦缎灯笼间畅行，随后进入了大教堂中的一潭死水，有那么一瞬间，他再次因一个深刻的闪念而陷入痛苦，他想到自己从来就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他全部权力的主宰，在他仍为这苦涩确凿的讽刺而深感羞耻烦闷时，小船撞进了一个个空间，它们的密度各不相同，在彩色玻璃窗透进来的光的照耀下不断变幻，那光线落在了主祭台上纯金的枝叶和祖母绿的花簇上，落在了被活埋的总督和因幻想落空而死去的主教的贴地墓碑上，也落在了海军上将空荡荡的纪念堂那有三艘帆船侧影的花岗岩石刻上，他当初建起这纪念堂是考虑到将来兴许会想让自己的尸骨安息在我们之间，我们通过祭坛的水渠，划向一个已变成明亮鱼池的内院，看到一群群鲷鱼正贴着瓷砖池底在广藿香和向日葵的茎秆间游过，我们穿过比斯开修女修道院天井中的阴暗河道，看到了被遗弃的单人房间，看到了一架漂浮于乐室隐秘水池中的古钢琴，看到了食堂沉睡的水的深处，淹死在已摆好菜肴的长餐桌旁各自座位上的全院修女，从阳台离开时，他看到光亮天空下有一片浩渺湖泊，那里曾是那座城市的所在，直到此刻他才相信，消息属实将军阁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上演的这场灾难只是为了将我从玛努艾拉·桑切兹的折磨中解救出来，见鬼了，上帝的做法和我们的比起来简直太粗野了，他一面愉快地想着，一面望着那片曾是城市的浑浊泥潭，在无边无际的水面上漂浮着无数溺死的母鸡，兀立在那里的只剩大教堂的尖塔、灯塔的航标灯、总督区灰岩大宅的阳光露台以及贩卖黑奴的港口所在的零星的丘陵小岛，海上遭遇

飓风劫难的人在那些岛屿安营扎寨，我们这批最后的不信教的幸存者看到了那艘漆着那面旗帜色彩的小船在一只只母鸡僵死的尸体上的马尾藻之间安静地驶过，看到了那悲伤的双眼、黯淡的双唇和正为祈求雨过天晴而画着十字的若有所思的手，他命令溺死的母鸡重生又命令水位下降，于是水便退去了。在喜乐的钟声、愉快的节日焰火和荣耀的音乐声中，第一块重建的基石落定，人们聚集在武器广场称颂着赶跑飓风猛龙的功勋卓著者，在众人的呼喊声中，有人拽住他的手臂把他带上阳台，现在的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安慰的话语，在得以逃脱之前，他感受到了灌入他五脏六腑的犹如从凶险海洋刮来的风一般整齐划一的呼声，硬汉万岁，从统治的第一天开始，他便体会到一时间暴露于全城民众视野中的不安全感，于是他的言辞石化了，一抹凡人的神志闪过，他顿时明白自己没有勇气也永远不会有勇气将整个身体探向人群的深渊，于是在武器广场上，我们只是隐约察觉到那个一如既往转瞬即逝的身影，那个难以捉摸的穿粗布衣服的老人的鬼魅身影，他从总统阳台上撒下无声的祝福后便立即消失了，然而那个飘忽模糊的画面足以支撑起我们的信心，相信他就在那里，在郊区宅院的那一株株载入史册的罗望子树下，守候着我们清醒与安睡的时光，他悠然躺在柳木安乐椅上，手中握着一杯还没喝的柠檬水，听着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用加拉巴木瓢筛玉米粒的声响，透过午后三点的炽热看着她抓起一只可怜的母鸡，把它夹在胳膊下，不无温柔地拧转它的脖子，她看着我的眼睛用母亲的语气对我说，想的事情那么多，都要得痨病了，还不好好吃饭，今天晚上留下来吃吧，她央求着他，同时用那只被拧得奄奄一息但仍被紧紧抓在手中以防逃脱的鸡引诱着他，于是他说，好，母亲，我留下来，他闭着双眼在柳木安乐椅上待到了傍晚，虽然没有睡着，却也被锅里沸腾的鸡汤那淡淡香味熏得昏昏欲睡，他同时牵挂着我们的生命走向，说起来，地球上唯一能给我们安全感的就是确信他在那里，瘟疫和飓风伤不着他，玛努

艾拉·桑切兹的奚落伤不着他，时间也伤不着他，他全心投入到为我们着想的救世主的喜乐中，知道我们清楚他不会做出任何不顾及我们的决定，他之所以能历经风雨幸存下来，并不是因为他拥有超群的胆魄和无尽的谨慎，而是因为他是我们当中唯一知晓我们命运的真实样子的人，他甚至到了那里，母亲，他曾在遥远的东陲结束一段艰难旅程时，坐在最后一块具有历史意义的石头上休息，石上刻有最后一名为保卫国土而战死的士兵的姓名和生卒日期，他见过那座阴郁严寒的邻国城市，看到了隽永的细雨、烟油味的晨雾、电车上穿礼服的男士、由头顶羽毛饰物的佩尔切隆白马拉着高贵灵车的贵族葬礼，以及大教堂门廊上裹在报纸里熟睡的孩子，见鬼，这些人太奇怪了，他惊呼，他们好像是诗人，但他们不是将军阁下，他们是当权的哥特佬[1]，他们对他说，那次旅行回来后他兴奋不已，因为他发现这带有一丝腐烂的番石榴味道的风、这喧闹的市场、这悲惨国度在日落时分给人的深重苦闷感都无与伦比，于是此后他将不再跨越国界，这并不是因为如他的敌人所说，他害怕离开身下的交椅，而是因为一个男人就像山上的一棵树，母亲，就像山上的动物，除了去找吃的，不会离开巢穴，他说着，以午休困倦时常人的神志回想起多年前一个昏沉的八月的礼拜四，那天他居然敢坦言知道自己野心的局限，他那番话是对来自另一个时代、另一片土地的一名战士说的，他在办公室的炽热阴暗中单独接见了他，那是一个会在倔傲姿态面前茫然失措的年轻人，身上烙着永不合群的孤独印记，他在门口裹足不前，直到双眼适应了那片阴暗，那片在热气中流溢着一簇盛放紫藤的芳香的阴暗，然后才下决心跨过门槛，他认出了他，坐在旋转安乐椅上，一只手握拳静静地放在光秃秃的桌面上，那么平凡、黯淡，与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相去甚远，没有卫队，也未持武器，身上的衬衫被凡人的汗液浸湿，太阳穴上贴着治疗头痛的鼠尾草，当我确信了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确信

了那个生锈的老人就是我们童年时期的那位偶像，就是我们荣光梦想最纯粹的化身时，他才走进办公室，以清晰而坚定的声音报上了自己的姓名，期望自己能够有所作为而被赏识，而他用一只柔美的小手，一只主教的手握了握我的手，出人意料地聆听着那名异乡人的宏伟梦想，为了他的、同样也是您的事业，他需要武器和支援，阁下，为了打一场不分地域、一举扫除从阿拉斯加到巴塔哥尼亚的保守统治的仗，他需要后勤补给和政治援助，他为他澎湃的激情所感动，问他为什么要掺和到这破事里，他妈的，你为什么想死，那外乡人不带一丝羞耻地回答说，为祖国而死是至上的荣耀，阁下，而他带着怜悯的微笑回应他，别傻了，孩子，祖国就是活着，他对他说，就是这个，说着打开方才撑在桌上的拳头，向他展示了掌心的小玻璃球，这样东西要么有要么就没有，但是只有有它的人才有，孩子，这就是祖国，他说着，轻拍着他的脊背与他道了别，没有给他任何东西，哪怕一句敷衍的承诺都没有，当侍从关上门后，他命令道，别去动这个刚走的人了，都不用花工夫去盯他，他说，他的热情还在羽毛里，成不了气候的。这句话我们直到飓风过后才又一次听他说起，当时他再次宣布大赦政治犯，批准几乎所有流放的犯人返乡，只有文人除外，这些人自然永远别想，他说，他们就像正在长毛的良种小公鸡，热情还在羽毛里，成不了气候的，不过他们一旦成熟，就会比政客更糟糕，比教士更麻烦，想象一下吧，但其他人都要回来，不分肤色，让重建国家成为所有人的事业，让所有人都证明他在一众凶猛的武装力量的支持下，又一次成为他全部权力的主宰，这些武装力量得以重拾昔日的忠勇，全仰赖他将存粮、药品以及外国提供的公众生活保障品分配给政府高层，仰赖部长的家属可以用临时医院和红十字会的帐篷在海滩上消遣、可以向卫生部贩卖血库中的血浆与成吨落灰的牛奶并由卫生部转卖给贫民医院，国家公务员都将兴趣转向了公共工程合同和与沃仁大使以其国渔船无限制地在我国的水域捕鱼为条件而发放的紧急贷款

相关的重建工作，他妈的，只有有它的人才有，他想着向那个再也没有音信的可怜梦想家展示过的玻璃球，自言自语道，他因重建事业而兴奋难耐，发布了多道口谕，如执政初期那般事必躬亲、巨细靡遗，头戴草帽、脚蹬捕鸭猎人靴在街道的泥沼中蹚着水，生怕人们建起一座与他在憋闷孤独的梦境中为自己的荣耀构想出的城市相异的城池，他命令着工程师，给我把这儿的东西拆掉，放到那边不碍事的地方去，他们便拆掉了那些东西，把那座塔加高两米，让外海的航船都能看见它，他们便加高了那座塔，给我把这条河的流向掉个个儿，他们便没有一处差错也没有一丝不情愿地将流向掉了个个儿，在那场狂热的重建中，他是那样的急不可待那般的全心投入，把次要的国事全然忘却了，因而当某位副官一时失言提起孩子们的问题时，他猛地一下撞上了现实，云里雾里地问道哪些孩子，那些孩子，将军阁下，但是他妈的是哪些啊，因为他仍被蒙在鼓里，尚不知晓军队害怕总统的彩票一直中奖的原因被抽取中奖号码的孩子们泄漏出去而秘密地将他们软禁了起来，一边编造更好的理由，一边搪塞前来抗议的家长，说那不是事实，而是卖国贼的造谣、反对派的中伤，并用迫击炮驱赶那些在军营外造反的人，我们也对您隐瞒了这场公开屠杀，是为了不打扰到您将军阁下，我们还对您隐瞒了一件事，其实那些孩子被关在港口碉堡的地下室，那里条件优渥，他们精神状态极佳、健康状况良好，但问题是，现在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将军阁下，因为他们差不多有两千人了。那万无一失的中彩票的方法是他盯着台球上镶嵌的金银数字时无意中想到的，那是一个极为简单却令人琢磨不透的想法，因而在他看到正午时分就挤满了武器广场的渴切人群时，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人们在炽烈的阳光下展示着各自猜测的一组奇迹号码，感激地呼喊着，举着写有愿与民众分享喜乐的胸襟宽广者永享荣光的条幅，乐手和走钢丝的也来了，快餐、油炸食品、过时的轮盘赌桌以及褪色的动物彩票，这些其他时空和其他世界的废品都流连在财富的

边缘，希冀沾点福运的碎屑，发一笔横财，下午三点露台开放了，他们请上三个不到七岁的孩子，为了证明抽彩方式的公正，这些孩子都是人们随意选出的，他们发给每个孩子一个不同颜色的细长口袋，在此之前，具有资质的公证人员已经证实了每个口袋中都有十个从一到零标号的台球，请注意了，女士们先生们，于是大家屏住呼吸，每个已被蒙上眼睛的孩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球，首先是拿蓝口袋的孩子，随后是红口袋的，最后是黄口袋的，他们一一把手伸进各自的袋子，感觉到袋底有九个球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冷冰冰的，于是依我们之前秘密吩咐的，拿出那个冰冷的球向人群展示，随后念出数字，就这样，孩子们取出了那三个在冰块中放置了多天、与他所持的彩票号码相吻合的球，但是我们之前没有想过，那些孩子可能把秘密泄露出去，将军阁下，我们想到时已经太晚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他们三个三个地，之后是五个五个，再之后是二十个二十个地藏起来，您想想，将军阁下，他理清这团乱麻时才发现，整个国家的陆海空三军高官都卷入了这场奇迹般的国家彩票的钓号活动中，他得知最初那些孩子登上露台是经过父母同意的，他们甚至接受过家长的训练，掌握了摸出象牙上镶嵌数字的无用技巧，而后来的孩子都是在武力逼迫下被硬拽上去的，因为已有传言说，上去的孩子就再也没有下来过，于是家长们纷纷藏起自己的孩子，甚至在突击巡逻队半夜搜查时将他们活埋，而紧急部队封锁武器广场并非如此前他们告诉他的，是为了平息群众的疯狂情绪，而是为了将他们像畜群一样圈在那里并以死威胁，外交官们请求接见以调停冲突，但却碰上了格外荒唐的事，官员们居然亲自向他们证实他身患怪病的传说，说他不能接见他们，因为他肚子上长出了蛤蟆，脊椎上生出了鬣蜥的背刺，为避免戳伤自己只能站着睡觉，他们向他隐瞒了全世界的抗议与诉求，甚至拦截了来自罗马教皇的电报，它表达了我们的教皇对孩子们命运的担忧，监狱里已经没有空间关押更多造反的父母了，将军阁下，礼拜一已经没有孩

子能来抓球了，他妈的，我们这是惹上了什么麻烦啊。尽管如此，在看到那些孩子之前，在看到那些仿佛将要被屠宰的牲口一样憋在港口碉堡的天井中的孩子之前，他还没有真正意识到那道深渊究竟有多深，他看到他们在经历数月的恐怖黑夜之后从拱顶地下室出来，被炫目的阳光晃得茫然无措，如疯狂的山羊群一般四下窜开，一眼望去竟有那么多人，以至于他无法把他们当作两千个独立的孩子，而只能将他们看作一头宽广无形的动物，散发着被阳光炙烤过的皮囊的非人臭气，发出深水的汩汩响声，并凭借自己的多面特质拯救自身免于毁灭，因为一下子干掉这么多条性命不可能不留下恐怖的印迹，这种事可是能传遍全世界的，他妈的，什么都干不了，由于坚信这一点，他将最高司令们通通召来，那十四位战栗不安的将领从来不曾这般可怖，因为他们从来不曾如此惊恐，他不慌不忙地观察了他们每个人的眼睛，一个挨一个地，继而明了他正以一己之力对抗所有人，他昂起脑袋，绷起嗓子，教导众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捍卫军队的名誉，他赦免了他们的一切罪行，同时手握拳头抵着桌面以掩饰他正因犹疑而颤抖，他命令他们要一如既往地用极大的权力和极高的热情尽各自的本分，因为我不容更改的最高指示是，这里什么都没发生，散会，我会负责的。纯粹为以防万一，他将那些孩子移出港口碉堡并送上了夜间货车，拉到了国境里最荒凉的地区，与此同时他还得面对官方的严正声明引发的间歇性风波，声明中说事实并非如此，不仅没有孩子在当权者手上，而且监狱里都没有任何类型的囚犯，传言中的大规模劫持只不过是叛国者为了扰乱群情而进行的卑鄙挑拨，我国国门为澄清真相而敞开，欢迎大家前来搜寻，于是人们纷至沓来，一个国际联盟委员会甚至将国家最隐蔽的石块都搬开了，还事无巨细地质问了他们想质问的每一个人，惹得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不禁问起，那些穿得像招魂术士的都是什么人啊，一闯进家门就在床底下、针线篮里、玻璃涮笔缸里找两千个孩子，最终委员会做出了公证，他们只看

到关闭的监狱、和平的国家、井然有序的一切，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来证实公众的猜疑，即存在或可能存在对人权有意的抑或事实上的因主动或疏忽所造成的侵犯，安心睡吧，将军，他们走了，他在窗口挥舞着花边手绢向他们道别，如释重负地感到有些事永远了结了，再见了，傻瓜们，祝一路顺风、旅途愉快，他叹了口气道，麻烦过去了，但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提醒他说，还没有，麻烦还没过去，因为那些孩子还在，将军阁下，他手掌一拍脑门，他妈的，竟把这事忘光了，我们该拿那些孩子怎么办。他努力摆脱浑噩的思绪，一个更激进的方案在他脑中成形了，他让人将孩子们从密林中带出来，又沿着反方向把他们送至终年下雨的省份，那里没有播散他们声音的邪风，陆上的动物都有可能在行走时腐烂，人类的言语上能开出百合，章鱼在林间漫步，为了避免有人发现他们的行踪，他下令将他们带至安第斯山间永日云雾缭绕的岩洞，为了避免有人知晓他们在某一位置的确切时间，他命他们在一个个潮湿腐臭的十一月到晴朗清爽的二月间迁移，为了避免红十字会的飞机探出他们的身影，他让他们日夜藏身于烂泥没颈的稻田中，当得知他们因此而感冒发烧后又差人送去奎宁药片和羊毛毯，还将日光和星光染成红色以治疗他们的猩红热，并且派人从空中喷洒杀虫剂消毒，以免香蕉园的蚜虫将他们吃掉，他遣人用飞机为他们送去糖果雨和奶油冰棒雪、用降落伞送去圣诞礼物讨他们开心，并争取时间想个绝妙的解决办法，就这样他渐渐摆脱了自己的邪恶记忆，将他们遗忘了，陷入无数个寻常的不变的失眠夜晚的孤独泥沼，他听到九点钟的金属敲击报时声，便把在民政大楼屋檐下睡着的母鸡抓了下来放到鸡笼中去，他还没数完睡在脚手架上的动物，一个收鸡蛋的穆拉托女佣走了进来，他感受到她那个年龄的阳光和她紧身胸衣的声响，于是一下子扑到她身上，将军请您小心，她颤抖着低声说，鸡蛋要弄破了，破就破吧，他妈的，他说着一掌把她推倒，没脱她的衣服，也不解自己的衣衫，他急切地想要逃离这个被睡眠中的

动物那绿色粪便覆盖的礼拜二的抓不住的荣耀，却浑浑噩噩地打了个滑，坠入虚幻眩晕的深渊，坠入纵横交织的用来逃避的条条苍白道路、粗壮女人散发的喘息和汗液味道、遗忘的欺诈性威胁之间，在下落中他渐渐留下了金质马刺流星般的叮叮作响而充满渴求的弧线，留下了他的急迫丈夫的一串落石般的喘息痕迹，留下了他狗一般的呜咽与他对自己存在于那一闪光亮中的恐惧，留下了死亡的火星爆燃的刹那发出的一记无声巨响，然而触到深渊之底，周围仍只是覆满粪便的铺地稻草，仍只是不眠而梦的母鸡，仍只是那个痛苦的穆拉托女人，她衣服上满是蛋黄的黄色黏液，正一边起身一边抱怨着，您看我说的没错吧将军，鸡蛋都破了，他压抑着又一次无爱之爱激起的怒火嘟囔，数数有多少个，他对她说，都从你工资里扣，然后他走了，这时是十点，他在牛棚里一个挨一个地检查了母牛的牙床，看到了他的某个女人在自己窝棚的地上痛得几乎要散架，看到了接生婆已从她内脏中拽出一个湿乎乎的婴儿，颈上还缠着脐带，是个男孩，我们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将军阁下，随便，他答道，这时是十一点，如他统治期内的每一个夜晚，他清点了哨兵，检查了门锁，给鸟笼套上罩子，灭掉灯，这时是十二点，祖国很太平，世界已入眠，他在黑暗的宅子里穿过灯塔旋转交织的光线中一晃而逝的一个个黎明，向卧室走去，他把逃命用的提灯挂起来，把那三把门环、三道门闩、三个插销通通锁上，随后坐在了移动马桶上，一边挤着屈指可数的几滴尿液，一边用手抚慰着患疝的睾丸，抚摸着那个无情的孩子，直到将扭曲的部分扶正，直到它在他手中入睡，疼痛才得以止息，一阵来自边疆硝石荒漠的风从窗口吹进来，一道惊恐划过，疼痛立即复苏了，卧室中有稚嫩人群的歌声碎片弥漫开来，他们问起一位奔赴战场的骑士他们哀叹太痛了太苦了他们爬上高塔盼他回来他们看到他回来了他回来了太好了他在罩着天鹅绒的棺材里太痛苦了太哀伤了，这合唱的声音是那么浩大那么辽远，他甚至要带着那是星星在歌唱的幻觉而入眠，但他在

盛怒之下坐起身来，别唱了，他妈的，他吼道，不是他们死就是我死，他吼道，结果是他们，因为破晓之前，他就下令将那些孩子塞进一艘载有水泥的船，把唱着歌的他们带至领海的尽头，他没有给他们留受罪的时间，就用一捆炸药在他们歌唱的时候将他们炸飞了，三位执行该命令的官员在他面前立正报告，将军阁下，您布置的任务完成了，他将他们晋升了两级又为他们戴上了忠诚奖章，但随后就把他们都枪毙了，一如处置其他不光彩的普通罪犯，因为有些命令可以颁布但不能执行，妈的，可怜的孩子们啊。这样残酷的经历证实了他确信已久的道理：一个人最可怕的敌人就在他发自内心的信任里，恰恰是那些他武装培养起来维持他政权的人，迟早会唾弃喂养他们的这只手，于是他挥手之间将他们消灭殆尽，又随性将另一些无名之辈晋升至高位，你，上尉，你，上校，你，将军，其他人，都是中尉，见鬼了，他看着他们成长直到膨胀得将军服绷裂，直到他再也看不住他们，诸如发现两千个儿童被软禁这类的意外事件让他明白，令他失望的不止一个人，所有最高级别的将领都是如此，他们除了会耗费我更多的牛奶，别的一概干不了，一遇上麻烦，他们就会往刚刚用来吃饭的盘子里拉屎，我生养了所有人，他妈的，是我取出肋骨才成就了他们，他为他们争得了尊严与面包，但却一刻不得闲地打压他们的野心，将最危险的人物留在身边加以最严密的监视，将最软弱的派去戍守边疆，为了他们，他接受了海军陆战队的占领，母亲啊，这不像汤姆森大使在官方声明中所写的，是为了战胜黄热病，也不像那些流亡政客所说的，是为了避免让他卷入公众骚动，而是为了教导我们的军人如何做一个体面人，事实就是这样，母亲，每个人都各有所得，他们教会他们穿鞋走路、用纸洁身、使用安全套，他们教会我要两手养兵，形成对抗，互为牵制，他们为我建立了国家安全办公室、总调查局、国家公共秩序部，还有那么多我自己都记不得名字的玩意儿，他建立起名目各异而本质相同的组织，以便在风暴中以最轻松的方式取

得控制，他令人们相信每个人正被另一些人监视，他在发给军营的弹药里混入海滩沙粒，制造与自己的真实意图截然相反的表象，然而他们还是会谋反，他咀嚼着胆汁泡沫闯入军营，滚开混账，管事的人来了，他在那些用我的肖像做靶子来考核射击的惊慌的军官之中吼叫着卸下武器，他不停地命令着，但仅凭声音中怒不可遏的威严，众人便自觉卸了甲，把那身人皮扒下来，于是众人褪了衣服，圣赫洛尼莫基地起义了将军阁下，他拖着他悲伤老人的巨大双脚进了大门，穿过两列仍将他尊为最高统帅的叛变了的警卫队，出现在起义指挥部，没有带卫队，没有携武器，却以爆燃的力量吼道，都给我趴下，无所不能的人来了，都趴下，杂种们，于是司令部的十九位军官都扑倒在地，他命他们在沿海村落匍匐前行，吃泥嚼土，好让大家看看脱了军服的军人还有什么用，狗娘养的，在混乱军营里的各种叫喊声中，他听到了自己不可违抗的命令：把发动叛乱的人都从背后枪毙了，在他们脚踝系上绳子把尸体倒挂起来日夜示众，让所有人都清楚唾弃上帝的人是什么下场，狡猾的浑蛋，然而祸事并未因这些血腥清洗而停息，因为只要稍不注意，他就会再次受到那长触角的寄生虫的威胁，他本以为已经将它连根拔除，它却又开始在他权力的西北风里繁殖，在各种必要的特权的荫庇下、在权威的面包渣中、在种种有利可图的信任间繁殖，这种信任他必须给予那些最骁勇的将士，哪怕有违他的意志，因为离开他们，他无以为继，而拥有他们，情况也是一样，他注定要永远呼吸那一团令他窒息的空气，他妈的，这不公平，就像他不可能一辈子忍受我的兄弟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的突然惊吓：他绷着一张死人脸进了我的办公室，迫切地想知道我那两千个大奖儿童究竟怎么了，为什么所有人都说我们把他们淹死在了海里，他面不改色地说，别去听信那些卖国贼的造谣，兄弟，那些孩子正在上帝的平安中成长呢，他对他说，每天晚上我都能在那儿听到他们唱歌，说着，一只手泛泛地画了个圈，指向宇宙中某个不确定的位置，连伊万斯大使在听

到他的回答后也被卷入了一团疑云，因为他冷漠地说，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些孩子，贵国代表团都在国际联盟面前公证过了，学校里的孩子一个都没少，身体都健康，见鬼了，这破事已经过去了，然而他还是不能阻止半夜的消息将他惊醒，将军阁下，国内最庞大的两支驻军已经叛变，距离总统府两个街区的公爵领区也发生暴动，形势可怕极了，领头的是波尼文多·巴博萨将军，他已经有一千五百名军人的拥戴追随，他们武器精良，供应充足，装备都是从和反对派勾结的外交官那里买来的走私货，所以眼下的情况很是不妙啊将军阁下，咱们真的要完蛋了。如果是在其他时期，火山爆发般的造反一定会激起他冒险的热情，然而此时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的年纪意味着什么，他甚至没有心力去抵抗他隐秘世界的灾难：冬日的夜晚，如若不一边温柔地哼唱睡吧我亲爱的，一边捧起那个孩子，捧起那发出痛苦哨声的睾丸疝气并将之抚慰一番，他便不能入眠，他坐在马桶上一滴一滴挤按灵魂，在仿佛是通过一个已因太多夜晚的孤独排尿而长满绿苔的过滤器进行的艰涩过程中，他的精神渐渐涣散，记忆也散了架，已经不再能精准地猜中谁是谁而又代表谁，他被一段无从避开的命运控制在一栋他曾经想搬离的失落之屋内，他曾想远离这里，搬去任意一处印第安人的居所，那里不会有人知道他曾经是祖国那么多个连他自己都数不清的年头里那么漫长的岁月中唯一的总统，然而，当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自告奋勇充当调停人以竭力向造反派争取体面的和解时，发现自己遇到的不是在会客厅中酣睡的痴滞老人，而是那个野牛本性的人，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没门儿，他不走，这不是走不走的问题，而是所有人都在与咱们作对将军阁下，甚至教会都不例外，但他说不，教会是拥护当权者的，他说，最高司令们四十八小时前就聚集在一起，只是还没有达成共识，不要紧，他说，当他们明白谁给的钱更多时，你就能立马看到他们的决定了，民众反对派的头目终于现身了，还明目张胆地相互勾结，这样更好，他说，在武器广场的每个灯

笼上都吊上一个人，让他们知道谁才是无所不能的，不可能的将军阁下，群众都拥护他们，胡说，群众都拥护我，除非我死，否则任凭什么都别想把我从这儿带走，他就这样决定了，像以往做最后决定时那样用他笨拙的少女之手敲了几下桌子，而后一直睡到挤奶的时间，醒来时他发现会客厅一片狼藉，公爵领区的造反派投掷了石块过来，已将东侧长廊砸得一块完整玻璃都不剩，而从破碎窗户扔进来的火球更是令府中的人整晚都惊恐万状，您是没看到啊将军阁下，我们一刻没合眼地拿着毯子提着水桶跑来跑去，忙着去扑灭不起眼的犄角旮旯的火焰，但他似乎浑不在意，我已经和你们说了，别管他们，他一边说着，一边在满是尘灰、碎烂地毯和烧焦的哥白林挂毯的走廊上拖着灵柩一般的双脚走着，但他们不会罢休啊，他们对他说，他们捎来消息说那些火球只是警告，一会儿就要轰炸了将军阁下，但他没有理会任何人就径直穿过了花园，来到最后一片树荫下，感受着初生玫瑰的声响，感受着海风中鸡群的骚动，我们该怎么办啊将军，我已经说了别管他们，他妈的，他如往常一样准时去查看挤奶的情况，于是公爵领区的叛军们如往常一样准时看到了拉着六桶牛奶的总统牛棚的木轮骡车，驾驶座上坐的仍是一直以来的那位车夫，他捎来口信说，即使诸位继续这样忘恩负义，将军阁下还是给诸位送牛奶来，他大声喊着，声音中的无限善意使得波尼文多·巴博萨将军下令收下牛奶，条件是车夫需要试喝以保证牛奶未被投毒，于是铁门打开了，一千五百名叛军将士都从天井阳台探出身来，他们看到了骡车行到墁着石砖的院子中央，看到了一名勤务兵手持罐子和大勺爬上驾驶座向车夫递上试喝的用具，看到了他掀开第一个桶盖，看到了他在炫目爆燃的一瞬滞流中漂浮，那凄郁的黄色泥浆建筑在六桶炸药的可怖爆炸中化作瓦砾，在空中悬留了一刻，他们在那不会再生长任何花朵的地方如火山喷发般的滚烫中，直至时间的尽头都没有再看到别的东西。他在总统府感叹道，就是这样，那堪比地震引发的冲击气流摧毁了距离领区最近的四

栋房子，震碎了城郊婚礼的橱柜玻璃，也让他不由得战栗，他感叹道，就是这样，当垃圾车从港口碉堡的天井中运走那十八具为了节省弹药而两两一串枪毙的军官尸体时，他感叹道，就是这样，当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在他面前立正报告将军阁下，监狱里又没有地方关押政治犯了，他感叹道，就是这样，当喜乐的钟声敲响、节庆的焰火燃放、荣耀的音乐奏起，宣告又一个和平世纪的到来时，他感叹道，就是这样，他妈的，麻烦过去了，他说道，他如此确信这点，如此自我放松，又如此疏于保护自身安全，乃至有天早上挤奶回来穿过庭院时，他的预感本能居然失灵了，他竟没能及时发现那个从玫瑰丛中站起身来、在十月的绵缓细雨里截住他去路的假麻风病人，当他看到那把烤蓝左轮手枪一闪而过的光亮时已经太晚，那个食指开始扣动扳机，于是他张开双臂，挺起胸膛对着他喊道，来呀，你这杂种，来呀，心下却困惑这已经到来的一刻怎会与水盆中再清晰不过的预言相悖，你有种就开火啊，他吼道，就在那难以察觉的一瞬踌躇间，一颗苍白的星在刺杀者眼中的天空亮起，他的嘴唇枯萎了，意志颤抖了，于是他趁机紧握双拳朝对方的鼓膜挥去，出其不意地将他放倒，而后又以木槌捣物的方式猛踢他的下颌令他瘫软在地头晕目眩，这时他听到了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嘈杂声响，是卫队听到他的吼叫匆匆赶来了，为了避免活着落入总统卫队可怕的审讯官手里，假麻风病人用左轮手枪朝自己肚子连放了五枪，在一片血泊中扭动挣扎着，他走过那接连发出五声巨响的蓝色火光，在府内的骚乱中听到了自己不可违抗的命令，把他分尸，以示警告，于是他被剁成肉块，被石盐水浸泡的脑袋在武器广场示众，右腿在东陲的桑塔玛丽亚德尔阿尔塔，左腿在无限西部的硝石荒漠，一只手臂在荒原，另一只手臂在雨林，躯干切分成块在猪油里炸过后日夜暴露在外，直到白骨一如这黑人窑子里的不安和困苦般袒露无遗，好令每一个人都知道举手反对他们的父亲会有何下场，他带着仍未平息的怒火穿过玫瑰丛，总统护卫队正在那里

用刺刀清除麻风病人，看看他们到底露不露脸，狡猾的浑蛋，他踹开瘫痪患者上到主层，看看最后他们能不能搞清楚是谁让他们的妈生孩子的，婊子养的，他从楼道里张皇失措的办公人员和宣称他不朽的坚定无畏的谄媚者之中穿过，吼叫着都他妈的让开，管事的人来了，他在府中沿路如抛掷石头般留下了一串仿佛火炉声响的粗重喘息，随后消失在会客厅中，以闪电之势遁向私人寝室，他走进卧室，将三把门环、三个插销、三道门闩一一锁上，而后用指尖将浸满粪便的裤子剥了下来。他一刻不停地在周围嗅探，试图找出那个指使假麻风病人的隐秘敌人，他感觉到他就在自己身旁，是一个极其贴近他的生活、甚至知道他的蜂蜜藏在哪里的人，一个无论何时何地眼睛都盯着门锁、耳朵都贴着墙面好像我的画像似的人，一个在一月的信风里吹着口哨飘忽出现的人，他在一个个炎热的夜晚透过茉莉花丛的炭火认出了他，这个人在失眠的恐惧中拖着幽灵的可怖脚步一个月一个月地在黑暗宅邸最隐秘的房间里尾随着他，直到一个多米诺骨牌之夜，他看到征兆化作了一只若有所思的、用一对儿五结了牌局的手，那时身体里仿佛有个声音向他透露，这只就是背叛之手，他妈的，是他，他困惑地自语道，而后抬起双眼，透过桌子中央吊灯的一束光芒，看到了我的灵魂伴侣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那双美丽的炮兵的眼睛，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啊，他的坚实臂膀、他的神圣同谋，这不可能，他寻思着，然而越是深入辨别那虚假真相中的阴谋，他就越是痛苦不堪，原来多年来他们一直借这些假象转移他的注意，好掩盖那残酷的真相：我终生的兄弟是在替那群有钱的政客效力，而那些政客本是他当年出于利益考虑，从联邦战争最隐晦的角落中挑选出的，他令他们发家致富，赐他们惊人特权，任自己被他们利用，容忍他们借他之势扶摇而上，攀上当初被自由派的旋风扫落的旧时贵族做梦都不敢想的高位，然而他们还想要更多，他妈的，他们想要上帝选定的、他留给自己的位子，他们想成为我，畜生，他仗着得宠，仗着自己是唯一可以向他

提交文件进行签署的人，在他的统治之下积蓄了最多的信任和权威，因为他能提出冷静而睿智的方案，他本人又无比精明谨慎，所以才让他来高声宣读只有我才能签署的紧急命令和部级法律法规，他会指出需要修改的地方，用大拇指画押，再在下方用戒指盖上印章，随后将这枚印章戒收在一个只有他知道密码的保险箱中，祝您健康，兄弟，每次签署完文件交给他时，他都会这么说，给您点儿擦屁股纸，他笑着说，就这样，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在一个膨胀的、硕果累累堪比我的权力的权力中筑起了另一个权力系统，即便这样他仍不满足，进而接受了他逛荷兰窑子的伙伴与剑术老师诺顿大使毫无保留的扶持，与他暗中谋划，一起促成了公爵领区的叛变，正是诺顿大使借着外交豁免权的保护，把军备物资装在运送挪威鳕鱼的木桶内走私进来，同时又在多米诺骨牌桌上香薰蜡烛的芬芳里奉承我说，再也找不到比我的政府更友好、更公正、更模范的政府了，也是他们，将左轮手枪连同五千比索现金的一半交给了那个假麻风病人，后来我们在行刺者的家中找到了这笔被埋在地下的赃款，而另一半酬劳本来要在事后由我终生的兄弟亲自给他的，母亲啊，看看这多让人心酸，然而到了这一步他们仍没有认输，最终酝酿出了不掉一滴血的完美一击，连您都不会流血将军阁下，因为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已经搜集到了无懈可击的证据，证实我整夜不睡，在黑暗里与宅子中的花瓶、与显贵及大主教的画像聊天，证实我为母牛量体温、喂食非那西汀给它们退烧，证实我用仁慈的双眼望到三艘停泊在窗前的帆船时臆想出一个海军司令并为他建造了一座陵墓，证实我因为克制不住邪念，挥霍公款去购买精巧的机器，甚至试图让天文学家扰乱太阳系规律，只为取悦仅存在于他迷妄幻觉中的选美皇后，证实我在一次老年痴呆症犯病时下令将两千个孩子塞入一艘装载水泥的船中并在海里炸掉了它，母亲啊，您想想，真是帮婊子养的，依据那些庄严证词，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和总统护卫队的最高司令部一致赞同于接下来这个三月一

日的午夜，在一年一度纪念保镖的守护神圣守护天使的晚宴上将他关押到峭壁上的杰出老年人收容所中，也就是说在三天之内，将军阁下，您想想吧，尽管这场大阴谋已是剑拔弩张且来势汹汹，但他没有做出任何举动，仿佛还不知情，他在预定的时间如往年一样迎接了他的私人卫队，安排他们入席享用开胃菜，同时等待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前来敬酒，他和他们谈笑风生，而军官们则一个个好似漫不经心地偷偷看表，将表放在耳边，又给它们上弦，差五分就十二点了，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还没有来，这时飘来一阵花香味的船舶锅炉的热气，嗅起来像黄菖蒲和郁金香，像闭塞屋内的鲜活玫瑰，有人开了一扇窗，我们透了口气，看了看表，感受到了一丝来自海洋的、有着婚礼菜肴香柔味道的纤薄气息，我们所有人都在冒汗，只有他除外，我们都挨受着那一刻的憋闷，因为那头老迈的动物正在留存于另一个世代的自己的空间中睁开炯炯的眼睛，释放着纯净的火光，干杯，他说道，那只瘦弱百合一般的不容反抗的手又将酒杯举了起来，他整晚都在敬酒却一口都没喝下，在最后的深渊的静寂中，可以听到手表机械内脏的声响，十二点了，但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仍旧没有现身，有人试着站起身来，请，他说着，给了他致命的一瞥，以警告没有我的允许十二点钟声敲完之前谁都不能动、不能呼吸、不能活，于是那人瞬间怔在了那里，然后窗帘拉开了，尊贵的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大将军躺在与他身长相当的银质托盘中被端进了屋，身下还铺着花椰菜与月桂叶组成的配菜，他在调料中腌得瘫软，在烤箱中烤得金黄，身上套着出席庄重场合穿的饰有五颗金杏仁的制服，半袖上佩着一枚枚因无比英勇而被授予的肩章，胸口摆放着十四磅的奖牌，嘴上搁着一小把欧芹，只待切割匠人在这战友们的宴会上，在惊惧得石化了的客人面前将它们切分、装盘，我们屏息见证了这场精致的分尸与分享仪式，当每个盘子中都盛有一份分量相同、有着松仁与香菜

做馅儿的国防部长后，他下达了开饭的命令，祝各位好胃口，先生们。

---

[1] 拉丁美洲一些地区对本土西班牙人的蔑称。

他逃过了那么多陆上的劫难，那么多不祥的日月交食，那么多空中的火球，以致在我们的时代里，似乎不可能还有谁去相信纸牌对他命运的预测。然而在收拾尸首、为它涂抹防腐油的过程中，就连我们这些满心猜疑的人都在默默企盼着古老的预言成真，比如像其中一个预言所说的那样，在他死的那天，沼泽烂泥将溯源回流，天将降血雨，母鸡将下五角蛋，死寂与黑暗将再次笼罩宇宙，因为他是世间万物的终结者。人们不可能不信这些，因为少数还在发行的报纸仍然努力用旧时资料宣扬他的永恒，编织他的光辉，于静止的时光里日复一日地在头版中展示他穿着那身脱不掉的、别有他鼎盛时期的五个悲凉太阳徽章的制服的形象，尽管我们早已数算不清他的年龄，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威严、勤勉、健康，在一幅幅惯常的画面中，他又开始参加著名纪念碑或是没人真正见过的公共设施的落成仪式，又开始主持据称是昨日实际上是上世纪举办的盛大活动，然而我们都清楚那不是真的，因为自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暴亡之后，再没有人在公开场合看到过他，他从那时起便独自留在了那座无主之屋，政府的日常工作仅凭他无边权力多年的惯性自行运转，他直到死都将自己封闭在那座乱糟糟的宫殿中，而眼下我们正透过这里最高的窗，心情压抑地望着那个黄昏，那个他必曾千百次地从他的虚幻王位上望见的凄郁黄昏，我们看到灯塔时断时续的光，看到它以慵懒的绿水淹没废墟中的厅堂，我们看到蛋壳般的屋舍中穷人的灯火，这些屋舍从前是各个部委珊瑚礁般的日光玻璃楼，在我们经历的另一场飓风将港口山丘上的彩色棚屋夷为平地后，群起的穷苦人将它们侵占，我们看到在下方铺散开来的雾蒙蒙的城市，在那片已被出卖的遍布覆着尘灰的火山口的

海上，我们看到一道道苍白的闪电划过顷刻即灭的地平线，看到第一个没有他的夜晚、他的如湖泊一般满是带疟疾病原的银莲花的浩瀚帝国、他的泥浆支流三角洲处的炎热村落，以及他的一个个私人省份中围起的贪婪的带刺铁丝网，网中繁育着不计其数的新品种的优质母牛，它们生来就遗传了总统烙铁的印痕。最终，我们不但彻底相信了他注定可以活到第三颗彗星的降临，而且被这种确信灌注了平静与安全感，为了遮掩这种感受，我们想方设法地开起关于老年的玩笑，我们说他拥有乌龟的长寿和大象的习性，我们在饭馆里大谈有人告知国务院他的死讯，所有部长都吓得面面相觑，惊恐地互相询问该由谁去告诉他这个消息，哈，哈，哈，事实上，知不知道这则消息对他来说无所谓，而且他自己都不清楚这街头笑话是真是假，因为当时唯有他知晓，在他记忆的孔洞里只剩下往日散落的残迹碎片了，他在这世上是孤身一人，耳聋如一面镜子，他拖着沉重而老迈的双脚走在阴森的办公室中，在那里，一个穿着浆过领子的长礼服的人用一块白色手帕冲他做了个谜一般的暗号，再见，他对他说，于是一时的误解变成了法令，总统府的所有工作人员在他经过时都不得不持白色手帕起立，走廊里的哨兵、玫瑰丛中的麻风病人也持白色手帕向他告别，再见将军阁下，再见，但他听不见，自从那些追悼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傍晚过后，他就什么都听不见了，只觉得笼中的鸟雀因过度歌唱而失声，于是为了让它们叫得更响亮，他喂它们吃自己的蜂蜜，还用滴管往它们的喙中滴润喉药水，并给它们唱其他时代的歌曲，一月的明亮月光，他会这样唱着，因为没有察觉到并不是鸟雀丧失了歌唱的能力，而是他自己的听力每况愈下，直到一个晚上，他鼓膜的嗡鸣破碎了，结束了，变成了泥浆般的空气，其中只有来自权力暗影的虚幻航船的告别挽歌还会飘过，只有想象中的风还会吹拂，只有内心的鸟雀还会喧闹鸣叫，并最终于现实中鸟雀寂静的深渊里安慰着他。那时，极个别获准进入民政大楼的人会看到他坐在三角梅花廊下的柳木摇椅上，

忍受着午后两点的闷热，他已解开了军服上衣的纽扣，卸下了军刀和祖国色彩的皮带，脱去了靴子，但仍穿着那双紫色长袜，那是当年教皇送给他的，总共十二打，都出自他的私人织袜工之手，而隔壁学校的女孩总会爬上后门防卫稍松懈的土坯，令他从无眠的困倦中惊醒，他面色惨白，太阳穴处贴着草药，身上是透过藤蔓洒落的一道道阳光照出的虎皮纹路，好似池底一只仰面朝天的迷醉的蝠鲼，大老粗，她们会这样冲着他嚷，而他眼中的她们一个个在热气中光的折射下扭曲，他会对她们微笑，挥动没有戴缎面手套的手致意，却听不见她们的声音，他能感受到海风中虾和泥的恶臭，能感受到母鸡在他脚趾上的啄咬，却感受不到知了清晰的鸣叫，听不见女孩的叫嚷，什么都听不见。那时，他与这现实世界的联系仅剩最恢宏记忆的零星碎片，是它们，在他脱离了政务之后、在他于权力边缘的无知状态里浮游时维系着他的生命，只有凭借它们，他才能于傍晚在这座荒宅里漫步时，直面他过长的岁月吹来的毁灭之风，他会藏身在灭了灯的办公室中，撕下记事本的白边，在上面用他的花体字写下最后记忆的多余渣滓来抵御死亡，一个晚上，他写下了我叫撒迦利亚[1]，然后在灯塔忽闪的光亮中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又念了很多遍，最终那个被重复多次的名字竟让他觉得遥远又陌生，真他妈见鬼，他自言自语着将纸条撕碎，我就是我，他对自己说，接着又在另一张纸条上写他在彗星再次划过时已满百岁，尽管那时他不确定自己是第几次看见它划过了，他凭记忆在另一张更长的纸条上写道，向伤者致敬，向在外国人手里遇害的忠诚战士致敬，有那么几个时期，他会将所想的、所知道的通通写出来，他曾在一张纸板上写不许在侧所里干饿心的事，并用大头针将它钉在厕所的一扇门上，因为有一次他不小心开了那扇门，撞见一位高级将领正蹲在粪坑上自慰，他将自己仍记得的寥寥几件事情写下来，以确保永远不会忘记，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他写道，我唯一的合

法的妻子，她曾在他朽迈的年岁里教他读写，他拼命想忆起她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想再一次看到她撑着那面旗帜色彩的塔夫绸阳伞，看到她颈裹第一夫人的银狐尾毛领，但他能记起的，却只是午后两点的蚊帐中那粉尘般的朦胧光线下她赤裸的模样，他记起了你温顺而惨白的胴体在电风扇嗡鸣中的和缓宁静，他感受到了你活泼的乳房、你母狗般的味道和你那见习修女的凶残双手发出的侵蚀声响，这双手能让母牛断奶、让黄金氧化、让花朵凋零，但对爱情来说却是上好的，因为只有她取得了不可思议的胜利，脱了你的靴子，别弄脏了我的比利时短纤维亚麻布床单，于是他便脱了下来，摘下你的背带，它的扣襻弄得我心脏直疼，于是他便摘了下来，把你的军刀、疝气袋、绑腿都卸下来，把你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脱下来吧宝贝，我都感觉不到你，于是他为了你把一切都脱了下来，这是他以前没有做过以后也不会在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之外的任何女人面前做的事，我唯一的合法的爱，他叹息道，他将这哀叹写在发黄的记事本纸条上，把它们如烟一样卷起来，藏在屋中最令人料想不到的缝隙中，只有他能找到它们，并在什么都记不起的时候靠它们想起自己是谁，甚至在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形象最终都顺着记忆的下水道溜走时，也没有任何人能找到它们，而那时他所剩的唯有对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坚不可摧的记忆，他仍会记得她在郊区宅院那些个离别的午后的样子：他那垂死的母亲为了不让他发觉她正在死去，仍用加拉巴木瓢摇着玉米粒，发出招引鸡群的声响，为了不让他怀疑她疼得几乎无法呼吸，她仍会把果汁给他送到挂在罗望子树间的吊床边，他这独自怀上他、独自生下他的母亲正在孤独地渐渐腐烂，直到那孤独的痛楚愈演愈烈，终于让她的骄傲不堪承受，她才向儿子请求说，你帮我看看后背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觉得这么烫，烫得我都活不下去了，她把罩衫脱下，转过身去，他在喑哑的恐惧中看着那因湿热的溃疡而受尽折磨的脊背，看着那如番石榴果肉般的患处裹着蛆虫的小水疱正在破裂。那真是段糟糕

的日子啊将军阁下，没有任何国家机密不被公众掌握，而且自从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精美的尸体被呈上晚宴餐桌之后，再没有哪项命令会被精准地执行，不过他不在乎，他不在乎那几个苦楚的月份里权力所遭遇的阻挠，因为那时他的母亲正在紧挨他寝室的卧房里受尽煎熬、慢慢腐烂，对亚洲病菌最有研究的医生已经下了诊断，她患的不是鼠疫，不是疥疮，不是热带莓疮，也不是其他任何东方疫病，她是中了印第安人的巫术，只有下咒的人才能治好它，于是他明白了，那是死亡，他把自己关在房里，以母亲的忘我精神照顾着他的母亲，和她一起腐烂，以免别人看到她正在蛆虫的肉汤里煎煮着自己，他命人将她的母鸡带到民政大楼，他们还带来了孔雀和随后在厅堂与办公室中随意来去的上了色的鸟雀，以免他母亲挂念郊区宅院的农活，他亲自在卧室里点着了胭脂树的树干，以免哪个人嗅到他垂死的母亲临别时的腐臭味道，又亲自用杀菌油抚慰她因红药水而红、因苦味酸而黄、因亚甲蓝而蓝的身体，他不顾憎恶巫术的卫生部长的反对，亲自用土耳其香脂涂抹她湿烂的部位，真他妈见鬼，母亲啊，要是咱们一起死就好了，但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十分清楚，她是唯一正走向死亡的人，于是试着向儿子揭开她不想带入坟墓的家族秘密，向他讲述了他的胎盘怎样被扔去喂猪，主啊，为什么我没法确定郊区那么多个在小路上逃亡的人里谁才是你的父亲，她试着揭开历史，告诉他她怀上他时是站着的，连帽子都没摘，因为在酒馆后屋，在发酵糖浆的酒囊外有无数金属色的苍蝇滋扰，她于八月的一个黎明在一座修道院的门厅中艰难地将他产下，借着穿过天竺葵的仿如悲伤的竖琴琴弦的光线，她仔细地将他打量了一番，发现他的右睾丸大如无花果，吐气时好似一个鼓风袋，呼吸中还伴着风笛般的叹息，她用见习修女送她的破布条将孩子裹起来，带到集市广场上给众人看，希望能找到除了大家唯一推荐的蜂蜜之外，更好、最重要的是更便宜的医治他畸形的方法，大家说着陈词滥调让她宽心，人不该揣测命运，他们对她说，说

到底，这孩子什么都能干，只不过不能吹奏管乐器而已，他们对她说，只有一位马戏团的算命师猛然发现这初生儿竟没有掌纹，这说明他注定是要做一国之君的，事实的确如此，但他对这些并不感兴趣，只央求她睡觉，别再追究过去，因为对他来说，相信祖国历史中的那些小插曲不过是高烧中的胡话倒会让他更舒服一些，睡吧，母亲，他央求道，然后从一堆他命人做好的麻布床单中拿出一条将她从头到脚裹了起来以免伤到患处，他让她侧身躺下，把她的手放在心上，安慰她说，别去想伤心的破事了，母亲，不管怎样我都是我，您安心地睡吧。公务人员使出浑身解数却平息不了民众关于族母长正在溃烂中走向死亡的传言，于是便开始散布编造的医学诊断，然而，正是那些发布公告的信使证实了所澄清的谣言就是真相，证实了在那垂死之人的房间里，腐烂的气味浓烈得都令麻风病人恐惧，证实了需要宰杀绵羊用活血为她泡澡，证实了她的床单上会沾满由她的溃烂患处分泌出的能变色的物质，无论怎么清洗都无法还原布面本来的色彩，证实了再也没有人在牛棚中看到过他，也没有人在他妾侍们的房间中看到过他，而想当初，即使在最糟糕的年代，清晨时分也总能在那儿找到他，大主教亲自过来了，希望为弥留之际的她做临终圣事，他却将他拒之门外，没有人要死，神父，别听信谣言，他对他说，尽管在房间内吸着疫病诊所气味的空气，他还是会和她用同一把勺子分享同一个盘中的同一份食物，把她放上床之前还是会用犬类除蚤皂为她沐浴，她用最后的残喘之声发出的指示令他的心脏酸楚得几乎停止跳动，她希望自己死后那些动物可以被妥善照顾，希望孔雀的羽毛不会被人拔下来做帽子，好的母亲，他说着用一只手将克勒奥林液抹遍了她的身体，过节的时候，别逼着那些鸟儿唱歌，好的母亲，他拿起睡觉用的床单把她裹好，要是打雷的话，让他们把母鸡从窝里拿出来，省得它们孵出蛇怪来，好的母亲，他帮她躺好，把她的手摆在她的心上，好的母亲，安心睡吧，他吻了吻她的额头，趴在床边的地面上睡了仅剩

的几个小时，他悬浮在梦的漂流中，悬浮在愈发逼近死亡而愈益盛大的无尽迷妄中，他在夜夜积聚的怒火里学着去承受那个悲痛礼拜一的无边怒火，那天的黎明时分，世界的可怖岑寂将他惊醒，我的生命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已经停止了呼吸，于是他展开了她令人恶心的身体，伴着第一声鸡鸣时的微弱光线，看到了被画在床单上的另一具一模一样的将手放在心上的身体的侧影，那画就的躯体既无疫病的裂痕亦无衰老的伤损，它坚实而光润，仿佛用油画颜料在裹尸布的两面画出，还透着娇嫩花朵的自然芬芳，净化了这间病房的气息，无论用碎石揉搓还是碱水熬煮，那影像都无法从床单上除去，因为它已经从正反两面渗进了麻布，与织料融为一体，而那块麻布又是永恒的，但他没能静下心来思索这是一个多大的奇迹，而是愤怒地一摔门离开了卧室，那动静仿佛一声枪击回响在整座宅子中，就在那时大教堂敲起了哀悼的钟声，其余教堂紧随其后，举国上下每个教堂都敲响了百日无歇的钟声，被吵醒的人们绝望地明白他又做回了他全部权力的主宰，而他内心被死亡触发的盛怒压抑着的谜团则会借着空前的强劲力量蹿升，与一念间的理性、尊严和宽容针锋相对，因为我的生命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在二月二十三日礼拜一的凌晨死了，世界开始了一个新的混乱而躁动的世纪。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老到见证过那次死亡，但葬礼的喧嚣巨响一直延续至今，我们有可靠消息，他在余生中将不再与以前一样，在百日官方服丧期与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人有权搅扰他那孤儿的失眠，也没有人再在那栋弥漫着丧钟无休止的辽远鸣响的伤痛之宅里看到他，他的时间被哀痛占尽，他长吁短叹兀自言语，府中的卫兵只能如他统治初期那般赤脚行走，在这所禁苑内，唯有母鸡可以为所欲为，因为这儿的君主已经隐身，他坐在柳木摇椅上愤怒地流着血，而我的灵魂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正躺在一副棺材中，躺在以防她比活着时腐烂得更厉害而铺放的锯末和碎冰间，在那片悲惨炽烈的不毛之地前行，因为那具躯体被

带去进行了一场庄严的游行，直至他王国中最荒芜的边疆，好让所有人都享有追思致敬的殊荣，他们伴着颂歌和飘扬的黑丝带将它送至高地荒漠中的车站，在那里，仍是同样的沉郁人群与同样的哀乐迎接它，一如荣光年代里他们来见识他藏在总统阴暗车厢中的隐蔽权力时的情形，他们于仁爱修道院中展出了那具躯体，在那里，在时间的初始，一位无名养鸟人艰难地产下了一个没有父亲而最终成为皇帝的孩子，一个世纪以来，圣殿的大门第一次打开，骑兵队在村子里圈起印第安人，挟持了他们，挥着枪托把他们驱赶进教堂中庭，冰冷的日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射了进来，平添惨淡与落寞之气，有九位主教正唱诵着熄灯礼拜经文歌，在你的荣光中安睡吧，执事和信徒唱道，在你的骨灰中安息吧，他们唱道，教堂外雨水打在天竺葵上，见习修女将甘蔗酒配亡灵饼分发给众人，还在庭院中的石拱廊下贩卖排骨、念珠和小瓶的圣水，路边酒馆中放着音乐，外面放着烟火，门厅里有人跳着舞，从现在直到永远都是礼拜日，那些年人们一直在逃亡的小径和雾气氤氲的隘道上欢庆节日，而我的死亡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生前就是沿着这些地方追随她那沉迷于联邦制风潮的儿子的，她在战火中照顾他，在他裹着毯子瘫在地上时拦住要从他身上踏过去的军方骡队，那时的他因患间日疟发高烧而失去意识，满口胡话，她试着向他念叨自己由来已久的恐惧，她害怕那些阴森的海滨城市里埋伏在荒漠人周围的各种危险，她害怕总督，害怕雕像，害怕喝新生儿眼泪的螃蟹，她透过那个袭击之夜的雨幕，第一次见识到了权力之屋的巍峨并为之战栗，那时她不曾料到这就是她要死在其中的房子，是他要居于其中的孤独宅院，是他怒火中烧趴在地上自问的地方，母亲啊，你他妈的钻到哪儿去了，是哪一丛大萍把你的身子缠起来了，是谁把你脸上的蝴蝶吓跑了，他哀叹着，伤心得跪倒在地，与此同时，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则在香蕉叶的荫翳下穿过令人作呕的泥沼臭气前行，好在郊区的公立学校中、在硝石荒漠的军营内、在印第安人的

院子里被展出，他们将她带到大宅院中展示，旁边配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还年轻、瘦弱、美丽，当年那位欧洲王室御用的威尼斯摄影师为她拍摄第一夫人的官方肖像时，人们给她在前额戴上了王冠，又违背她的意愿给她系上了蕾丝饰领，并且仅此一次往她脸上抹了滑石粉、在她唇上涂了红唇彩，他们往她手里塞了一枝丝绸做的郁金香让她这样拿着，不是这样，女士，是这样，要不经意地放在膝头，这幅与尸体一同展出的肖像当年作为决定性的证据，压倒了任何有关政权将更迭的猜疑，而现今她的模样与照片上的没有分毫差别，因为不曾留有发生任何意外的余地，当化妆品日渐脱落、当龟裂皮肤上涂抹的石蜡在酷热中融化时，会有人暗暗重整这副躯体，雨季里会有人清理她眼睑上的苔藓，军队女裁缝会保养丧服，令它仿佛昨日才穿上的一样，还会打理橙花皇冠和她在世时从未戴过的处女新娘头纱，令它们永放光彩，这样一来，在这个崇拜偶像的下贱地方，没有谁敢再说你和你照片中的样貌不一样了，母亲啊，这样一来，没有谁敢忘记是谁在统治，统治到时间的尽头，统治到雨林中的沙丘和那些最贫困的村落，那里的人被遗忘了多年之后，在一个午夜看到了那艘灯火通明的陈旧的木轮航船，于是敲响了复活节之鼓，以为荣光年代再次到来了，硬汉万岁，他们喊道，以真理之名而来的人万福，他们喊着，带着肥硕的犰狳和大如阉牛的南瓜扑进水里，他们爬上木刻栏杆，向那个无形的权力、向那个其骰子能决定祖国运势的权力恭顺地奉上贡品，当他们看到总统餐厅里数面惊愕的镜子中反复映现的那张铺着碎冰和石盐的灵台时，都屏住了呼吸，风扇扇叶下的灵台就那样暴露着，任人审视，而载着它的破旧愉快的航船月复一月地在一条条赤道支流上、在一座座一晃而过的岛屿间前行，直至迷失在一个噩梦年代中，在那个年代里，栀子花被用作理性判断的依据，鬣蜥在黑暗中飞翔，世界终结了，木轮在黄金沙滩搁浅了断裂了，冰块消融了，盐粒腐坏了，那副肿胀的躯体在铺满锯末的水汤中随波漂浮却没有腐烂，

恰恰相反将军阁下，那时我们看到她睁开了双眼，看到了她的瞳孔澄澈，呈现一月里乌头的颜色，还有乌头月光石般的特质，即便是我们这些最不易轻信的人都看到了灵台的玻璃罩因她呼出的气而朦胧，看到了从她的毛孔渗出的富有生气的清香汗液，看到了她在笑。您都没法想象那场景将军阁下，那真是奇妙啊，我们看见骡子下崽儿，看见硝石荒漠上开出花，看见聋哑人因自己奇迹般的叫喊惊呆，奇迹啊，奇迹啊，为了瓜分圣骸，大家将棺材玻璃砸得粉碎，差点把尸体扯成块，于是我们不得不安排一个营的投弹手来抵挡狂热的人群，因为自从整个加勒比的海岛都被那个消息迷住，就是您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灵魂从上帝那里获得了逆自然规律而行的能力的消息，从那之后，人们便蜂拥而至，他们贩卖裹尸布上的线，贩卖披肩，贩卖她身旁的水和印着她皇后肖像的图，那躁动之势异常疯狂，他们就像一群咆哮而来的失控的公牛，所到之处无不被踩烂踏碎、无不震颤轰鸣，甚至只要您仔细听，在这里都能听到那声响，您听听看，他将摊开的手掌放到那时嗡鸣已减弱的耳朵背后，仔细听着，于是听到了，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他听到了无尽的轰响，看到了那一直延伸到海平线的宽广人群形成的沸腾泥沼，看到了正午清晰的明亮中席卷着另一个更加明亮的日子的烛光洪流，我的灵魂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回到了旧时所恐惧的城市，那情形与她随着战争中的骚乱人群、随着战场上的生肉味儿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一样，但后来她永远脱离了世上的危险，因为他下令撕毁了学校课本中所有关系到总督的页面，令他们从未在历史中存在，他还查禁了搅扰你梦境的雕像，母亲，于是现在她被和平的群众扛在肩上归来了，不再怀有与生俱来的恐惧，她归来了，没有棺材，直面天空，在禁止蝴蝶入内的空气里，隐没于黄金供品的重量之下，那些供奉都是人们在那场从雨林边界出发、穿越他辽阔而躁动的沉痛王国的无止境的巡游中挂在她身上的，于是她淹没在痊愈的瘫痪患者给她挂上的金质小拐杖中，淹没在

海难亲历者给她挂上的金质星星中，淹没在不能生育的女无神论者在灌木丛后紧急分娩完给她挂上的金质婴儿像中，就像在战争中一样，将军阁下，她在那场迫使举国上下都进行了一如圣经所记载的迁徙的洪水中心随波逐流，所有国民都找不到地方来安置她的厨具、她的动物和一个除了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秘密祷文之外不再有任何救赎希望的残存的生命，当年在战火中，她曾念着相同的祷文祈求向她儿子射来的子弹扭转方向，他在战乱中头裹血染的绷带，于高烧引发的神志错乱的清醒间隙大喊他妈的自由党万岁，必胜的联邦制万岁，狗屎哥特佬，尽管他投身战斗的实际动力源自他返祖式的好奇心：想看看大海是什么样，只是抬着他母亲的躯体侵入这座城市的大群贫苦人远比联邦战争的冒险中那些洗劫了整个国家的人更激荡更狂暴，他们比蚁害更贪婪、比动乱更可怖，他们是我的双眼在他掌权的无数年中所见过的最慑人的东西，整个世界啊将军阁下，您看，多么美妙。他被毋庸置疑的证据说服了，终于走出哀痛的迷雾，面色苍白、行动僵硬、臂上戴孝地走出来了，开始不遗余力地施展威权，以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令人目不暇接的圣徒美德为依据，推举她为圣徒，他派手下的文书部长去罗马，再次邀请教皇使节前来，在三角梅花廊下的一缕缕阳光中吃饼干喝热巧克力，他以惯常的方式接待了他，卧在吊床上，没穿衬衫，用白帽子扇着风，而教皇使节则坐在他对面，手里端一杯滚烫的巧克力，全然不顾他的礼拜日教士袍散发的薰衣草气息里的阵阵热浪与尘埃，不顾热带的颓丧，不顾那死去母亲的鸟雀在棚屋下荡漾的光线里肆意翻飞排便，只小心翼翼地啜饮着香草巧克力，带着新娘般的羞涩咀嚼着饼干，试图拖延上一口巧克力中不可避免的毒药的发作时间，僵直地坐在他从未让别人坐过的柳木安乐椅上，我只让您坐，神父，在荣光年代里一个个锦葵色的午后，另一位天真老迈的使节试图用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谜题来说服他皈依基督，只不过现在请求皈依的人是我，神父，这是世界运转的方式，现

在我相信了，他说道，而后毫不犹豫地重复了一遍，现在我相信了，虽然事实上他不相信这个世界或是其他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他只相信，我的生命他的母亲以她自身的美德，以她的奉献精神和模范式的谦卑，有权领受祭坛上的尊荣，作为要求封圣的依据，他并没有搬出坊间虚张声势的说法，什么北极星在向着送葬队伍行进的方向移动、衣柜中的弦乐器能感觉到那具遗体经过并自动拉奏乐曲，而是把那张床单铺开，将它的奇美呈现在八月的艳阳下，希望教皇使节能够看清他真真切切地看到的印在麻布织物上的图样，他看到了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侧身而卧的形象，既无衰老的印迹亦无疫病的伤损，一只手放在心上，他感受到了她手指上永恒的汗液，在鸟雀被奇迹之风鼓动得骚乱不安时呼吸到了馥郁的花香，您看多美妙啊，神父，他一面说着，一面轮番展示着床单正反面，甚至连鸟儿都认识她啊，但教皇使节以犀利的眼光全神贯注地盯着那块麻布，过去，正是凭借这种犀利他才得以辨清那些出自基督教大师之手的作品材料上的火山灰杂质，并依据颜色的深浅识出画师们性格上的瑕疵甚至信仰上的疑惑，他在一个时间不会流逝只是漂浮的虚幻城市中某座小圣堂的拱顶下平躺着经受了地球之圆带来的神迷状态，他这样沉思凝视着，直至鼓足勇气才将目光从床单上移开，并用轻柔却无可挽回的语气对他道出了自己的见解，麻布上所印的身体并不是神圣天父为了证明他的无限仁慈而施下的神迹，它不是，一点儿都不是，它是一个精通技艺也谙熟骗术的画家的作品，他玷污了阁下您的伟大心灵，因为那并不是油画，而是最廉价的装饰画，是用抹窗框的涂料画的，阁下，在已经渗透于画中的天然树脂味儿底下，还残留着松节油的低劣露珠，残留着灰泥干，残留着一种持久的湿润，那不是他们告诉他的死亡前的最后一个寒噤的冷汗，而是将麻布浸入亚麻油里并藏在暗处做出来的，相信我，我也深感遗憾，教皇使节真切而沉重地总结道，他没敢说更多，而那个花岗岩般的老人在吊床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于阴晦

的亚洲的安静泥沼中听他说着，他甚至没有开口辩驳，虽然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床单上玄妙奇迹的真相，是我亲手将你裹在里面的啊，母亲，你死后最初的寂静吓到了我，仿佛世界是从海底迎来了黎明，我看到了那个奇迹，他妈的，但即便如此笃定，他也没有去打断使节的论证，他如鬣蜥一般在不闭眼睛的情况下眨了两次眼，只是微笑着，没关系，神父，最后他哀叹道，也许您说得对，但我警告您，您要承担您言论的后果，我再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一遍，这样在漫长的余生里您就不会忘记了，您要承担您言论的后果，神父，我不负责。在那个充满凶兆的礼拜中，整个世界都停滞在了困顿里，他没有下过吊床，甚至连吃饭都不下来，他用扇子驱赶着停落在身上的狡猾的鸟儿，甚至把三角梅枝叶间漏下来的光斑也误认作狡猾的鸟儿驱赶着，他没有接见任何人，没有颁布任何一道命令，然而在受雇的暴民攻入教皇使节官邸时警察却漠然以待，任人洗劫那里的历史文物馆，任人在天井花园露天的柔缓池水中抓住了正在午休的教皇使节，他们把赤裸的他揪到街上，还在他身上拉屎将军阁下，您想象一下，但吊床上的他丝毫不为所动，眼皮都不抬地听他们报告新消息，人们让教皇使节骑着驴在商业街上游街示众，在阳台上朝他泼厨余脏水，冲他喊着漂亮小伙儿、梵蒂冈小姐、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2]，直到大家把半死不活的他抛在公共市场的垃圾堆里时，他才下了吊床，摆手赶走鸟雀，戴着黑纱，带着因缺觉而浮肿的双眼，拨开沉痛的蛛网，出现在了会客厅，他命人把教皇使节和三天的干粮放在一只救生筏上，将他推到通往欧洲的邮轮航线上，以昭告天下外国人举手反对这个国家的王权会有什么下场，甚至连教皇都会明了，在罗马他大可以从今往后永远手戴指环身居宝座做他的教皇，但是在这儿，我才是我，他妈的穿长裙的狗屎家伙。那手段行之有效，那一年年底之前，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封圣事宜就被提上了日程，她不朽的遗体被安置

在了大教堂最宏伟的中庭里受万众敬拜，大家在祭坛前高唱荣耀颂，而他为对抗圣座[3]而宣布的战时状态也被解除，和平万岁，武器广场上的人群喊道，上帝万岁，他们喊道，与此同时，他在庄严的会客厅接见了教廷的礼仪部顾问、信仰检察官兼列圣申请官，人称厄立特里亚人的德梅特里奥·阿尔窦斯阁下，他接受委托来调查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生平，不放过任何会对她的神圣性构成怀疑的蛛丝马迹，随便您去哪儿调查，神父，他一面对他说一面握住了他的手，并立刻对这个热爱生活胜过一切的忧郁的阿比西尼亚人产生了信任，他爱吃鬣蜥蛋，将军阁下，还酷爱斗鸡、穆拉托女人的脾气和昆比亚舞，和咱们喜欢的玩意儿一样，于是在他的命令下，原先戒备森严的大门悉数打开，以保证那位魔鬼代言人畅行无阻地进行视察，在他无节制的沉痛王国里，所有显露出来的和可见的事迹都无可辩驳地证明，我的灵魂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注定要享有祭坛上的荣耀，国家是您的了，神父，给您，于是整个国家自然都是他的了，军队恢复了教皇使节官邸内的秩序，在那座建筑门口，清晨时分会有一排排不计其数的麻风病康复者争相展示自己糜烂患处新生的皮肤，来自圣维多的昔日的瘫痪病人在质疑者面前捻线穿针，在轮盘赌中发了大财的人展示着财富并宣称是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托梦将号码告诉了他们，此外，得悉失踪者消息的人、找到溺水亲人的人、从前一无所有现在无所不有的人都接踵而至，排队涌入了那间以沃尔特·雷利爵士用于射杀食人族和史前巨龟的大口径火枪作为装饰的炽热办公室，而不知疲倦的厄立特里亚人听着众人的叙述，从不打断、从不开口，他周身浸在汗液里，与室内层层聚积的腐臭的人味保持着距离，并用他的劣质雪茄的烟雾稀释着空气，他将证人的声明详细记录下来并请他们在这里签下全名，或是画个十字，或是像将军阁下您一样按上指纹，怎样都行，但他们都会签字，下一个进来的和前面的说的大同小异，我从前得过

痨病，神父，他说，我从前得过痨病，厄立特里亚人这样写下来，但您看看现在我唱起歌来怎么样，我从前阳痿，神父，但您现在看看我，来个一整天都没问题，我从前阳痿，他这样写下，用的是永不褪色的墨水，以保证他严正的字迹直至人类的终结都不被更改，我肚子里以前有一只活的动物，神父，我肚子里以前有一只活的动物，他漠然地写下，同时因苦咖啡而迷醉，因用烟蒂点燃的雪茄的旧烟丝而中毒，他敞着怀，像个粗人一样将军阁下，这教士可真是条汉子，是啊先生，真是条汉子，真是一个人一个模样，为了节省时间，他什么都不吃，一直工作到深夜，到那时他仍不休息，洗个澡后出现在码头的小酒馆中，穿一身打着方形补丁的粗布教士服，一副快要饿死的样子，坐在长桌前和码头工人一起享用鲤鱼炖菜，他会用手指把鱼肉撕成块，然后用在黑暗里发亮的魔鬼牙齿把它们嚼烂，只剩鱼刺，您是没看见啊，他像搬运工一样直接用嘴挨着盘沿喝汤将军阁下，然后混进那些破船上衣衫褴褛的人渣里，他们的船正起锚，载着马里蒙达和青香蕉、载着一批批雏妓出发，他们要把她们送到库拉索的玻璃酒店，送到关塔那摩，甚至送到走海路无法到达的圣地亚哥，神父，送到那些直至曙光初现我们都还在梦着的最美丽最悲伤的岛屿，神父啊，请记得在三桅船离开后我们变得有多么不同，请记得玛蒂尔德·阿雷纳勒斯家那只会占卜的鹦鹉、从汤碗中爬出的一只只螃蟹、鲨鱼的风、遥远的鼓声、生活，神父啊，这狗日的生活和孩子们，将军阁下，因为他说起话来和我们一样将军阁下，好像他是在斗狗区里出生的一样，他在沙滩上打球，现学的手风琴拉得比本地人还好，歌也唱得比他们好，还学会了水手们花里胡哨的谈吐，并用拉丁语戏称他们为公鸡，他和他们一起醉倒在市场中娘娘腔们的窝棚里，与其中的一个打起架来，因为那个人说了上帝的坏话将军阁下，他们打起来了咱们该怎么办，他便命令道，谁都别管，于是人们纷纷围过去看，赢了，教士赢了将军阁下，我就知道，他满意地说道，他是条汉子，不

是人人想的那样没用，于是，在那些混乱的夜晚他探得了可观的真相，与他在教皇使节官邸中那些精疲力竭的日子里的收获相当，比那天在郊区那栋阴暗的宅子中的发现还要多，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他自以为逃过了总统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未经允许擅闯了那栋宅子，他被屋顶的漏雨打得湿透，却坚持仔细察看，连最隐秘的缝隙都不放过，不料竟在豪华卧室里被海芋和毒山茶的乱枝绊倒，这些卧室本属于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但她舍弃了它们，将它们分给了女仆而使她们备感幸福，因为她善良，神父，她很谦卑，她让她们睡在细棉布上，自己却睡在只铺着破烂卷席的行军床上，她让她们穿上她那第一夫人的礼拜日正装，她们用她的浴液洗得一身清香，赤身裸体地和勤务兵在白合金的狮腿浴缸里、在彩色泡沫中嬉闹，她们如女王一般生活，而她，却终日忙着为鸟雀上色，忙着烧柴、熬菜豆面糊，忙着种植草药，生怕半夜有邻居叫醒她说我胃痉挛了，女士，她便会拿出水田芥的籽让他们咀嚼，说教子眼睛斜视，她便会给他一副土荆芥制的驱肠虫的药，说我要死了，女士，但是他们不会死，因为她将健康握在掌中，她真是一位活圣人啊，神父，她在自己的纯净空间里穿梭于那栋欢乐之宅中，自从她被迫住到总统府去后这里便一直无情地下着雨，雨水落在钢琴的白莲上，落在华丽餐厅的大理石桌面上，这餐桌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从来没有用过，因为坐在那里吃饭就像在祭坛上进食，您想想，神父，这真是圣人的预感啊，但邻居们的证词再狂热，那魔鬼代言人仍在废墟中发现了一些痕迹，说明她的羞怯胜于谦卑，他还在漂浮于旧舞厅湿地间的尼普顿乌木像、土著妖魔像的碎块和战争天使像之间发现了证据，说明她的行为并非出于自我奉献，而是她精神的贫瘠使然，然而他始终没有发现另一位神明，那位艰深、唯一且三位一体的、将他从阿比西尼亚的燠热平原上派到压根儿没存在过真理的地方来寻找真理的神明的丝毫印迹，他什么都没找到将军阁下，他说什么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德梅特里奥·阿尔

窦斯阁下并没有满足于在城中的探察，他跨上骡背，爬上了高地荒漠的冰寒边界，试图找出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神性的种子，在那里，她的形象也许还未因权力的耀眼光芒而扭曲，他身裹劫匪毛毡、脚蹬远足皮靴，如撒旦一般在一片薄雾中渐渐现身，令从未见过这样肤色人种的高原人陡生恐惧，而后是惊诧，最后是好奇，但狡猾的厄立特里亚人鼓励他们来摸他，以此证明自己并不会分泌柏油，他还在黑暗中展示自己的牙齿，与他们一起就着手工奶酪、共用一个加拉巴木瓢喝奇酒直到喝醉，好赢得那些农村教区里一家家幽暗小店中人们的信任，在那里，在某个世纪的头几年，人们曾认得一个引人注目的鸟贩，她被背篓荒唐的重荷压弯了腰，那篓中满是被画成夜莺和金色大嘴鸟的小鸡，还有装扮成孔雀的山鸡，她会在凄凉的礼拜日赶高地集市，拿它们骗高地人，她会坐在那儿，神父，冲着火堆背着风，等待着谁能行行好，在酒馆后屋装糖浆的皮囊边上和她睡一觉，好弄口饭吃，神父，只是为了弄口饭吃，因为没有人傻到去买那些一下雨就掉色、一走路就散架的可笑假货，只有她才这么天真，神父，这个鸟雀的神圣赐福人[4]，或者高地荒漠人的神圣赐福者，随便怎么称呼她，因为没人清楚她那时的真实姓名，也无人知晓她到底从何时开始叫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这应该不是她的本名，因为它不属于这一片而属于海边人，真是一团乱，这惹是生非的撒旦检察官连这一点都发现了，尽管总统安全部门的爪牙用缕缕乱象围住他，以无形障碍加以阻挠，他仍旧将一切都挖掘出来了，您怎么想，将军阁下，可以像捕鹿一样把他逼到某个悬崖，或者将骡子绊倒，但他亲自下令阻止了他们，看住他但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我重复一下保证他的人身安全给他绝对的自由一切的便利让他完成任务这是发自最高权威的不可违抗的命令务必严格执行，签好了，我，他重复道，我本人，他深知这一决定所冒的巨大风险，也许他将知道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在戒

严时期的真实模样，彼时她还年轻、还瘦弱，裹着破布衣裳赤着脚，不得不靠下半身讨口饭吃，但她很美，神父，而且太过天真，她甚至给最廉价的鹦鹉插上漂亮公鸡的羽毛冒充金刚鹦鹉，还给残废的母鸡安上火鸡的羽毛冒充成天堂鸟来贩卖，没人上当，当然没有人单纯到落入那个孤零零的鸟贩的圈套中，她会在一个个礼拜日集市上的雾气中喃喃细语，看看谁会要一只，然后免费把她带走，荒漠上的每个人都记得她的纯真和她的贫穷，然而似乎无从查明她的真实身份，因为为她洗礼的修道院中有关她出生记录的那一页已不复存在，但拜国家历史的作者们所赐，却有三份她儿子的不同的出生证明，每一份上都是不一样的他，在三种场合三次被孕育并三次艰难出世，这些作者令丝丝真相错综纠缠，因而没有人能解开他身世的谜团、参透其中的玄机，只有厄立特里亚人成功地深入追踪，拨开了种种掩人耳目的不实之词，他已经隐约窥见谜底了，将军阁下，他伸手就能碰到它了，这时一记辽远的枪声响起，久久回荡在灰色的山脊和深邃的峡谷间，失足的骡子发出无尽的惊惧嗥叫，它在无底的眩晕中坠落，穿过自然科学图画中渐次变化而又须臾即逝的气候带，自永覆积雪的山巅经过了宽阔可航行的江河那细流潺潺的源头，它经过了陡峭的崖壁，曾有学识渊博的博士携带秘密植物标本骑在印第安人的背上攀爬至此进行植物考察，它经过了开满野玉兰的高原，为我们提供充足的食物、大衣和良好榜样的绒毛柔暖的山羊正在那里吃着牧草，它经过了咖啡种植园中的大宅，那里有无穷无尽的病人与堆放在孤寂阳台上的纸花环，它经过了地理分界处激越的河水永恒的咆哮，天气从那里开始转热，傍晚时分有几阵恶臭飘过，是一位死去的老人，他在可可种植园里被叛徒暗杀，孤独地死在大片的宿存叶、肉色的花朵与种子会成为巧克力主要成分的浆果之间，它还经过了静止的阳光、炽热的灰尘、西葫芦与甜瓜，在经过方圆二百西班牙里内唯一一所慈善学校中一头头干瘦而悲伤的大西洋省母牛后，尚存一息的骡子在赤道灌木丛和崖底受

惊的小母鸡中间肚皮爆裂，仿佛一个鲜美多汁的番石榴炸开，他妈的，他们像捕鹿一样去捕他，将军阁下，他们在孤魂隘口用打虎步枪把他放倒了，哪怕有我的威权作保护，这帮狗娘养的，哪怕我发布了不容更改的电报，他妈的，但现在他就要知道谁是谁了，他一边咆哮一边咀嚼着苦水，主要并非因为他们不服从，而是因为他确信，他们若是胆敢和他权力的电闪雷鸣对着干，就一定有大事瞒着他，他观察着报信人的呼吸，清楚唯有知道真相的人才有勇气来骗他，他探察着高级将领们的密谋，以期分辨出谁是叛徒，你，我把你从一个穷光蛋提拔上来，你，我看见你睡在地上就把你放到金床上去，你，我救了你的命，你，我买你的时候比买谁花的钱都多，你们这帮人，全都是狗娘养的，然而他们中只有一个敢玷污由我签署的、被他权力之戒的火漆封上的电报，于是他亲自担任救援任务的指挥，发布了不容重复的命令，限在四十八小时内找到活着的他给我带回来，如果找到他时他已经死了，也要把他活着给我带回来，如果没找到，也要把他活着给我带回来，这道命令如此明白如此恐怖，以致期限未满就有人来报告，将军阁下，他们在悬崖上的灌木丛中找到了他，他被金色的高山菊划伤了，但比我们每个人都有活力，将军阁下，多亏了您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美德他才安然无恙，正是在这个试图损害她在人们记忆中的形象的人身上，再次显示了她的仁慈和权能，他们把他放在吊床里用长棍抬着，沿印第安人的小路下山，后面有投弹手卫队的跟随，前方有骑马的法警开路，他手摇大弥撒所用的铃铛，以告知所有人事关当权者，他们将他安置在总统府的贵宾客房，由卫生部长寸步不离地照看，直到他可以为那份他亲笔所写的可怕文书收尾为止，那份文书共七卷，每卷三百五十页，每一页右侧的空白处都有他姓名首字母的签章，我签下我的名字，留下花押，并盖上我的印章作保证：蒙主恩典，我，德梅特里奥·阿尔窦斯，礼仪部顾问、信仰检察官、列圣申请官，受最高法典之委派，为人间正义之光辉，为天国上

帝之无上荣耀，于今年四月十四日，确证此乃唯一真相、完整真相、别无他物的纯粹真相，阁下，给您。它就在那里，真真切切，收在七本封了火漆的权威书卷中，无可回避、生猛粗野，只有对荣耀的魅力免疫、与那个冷漠老人的权力的利害绝缘的人才敢将它活生生地呈现在他面前，他眼睛一眨不眨地听着，坐在柳木摇椅中扇着风，只在每一条关键的证明被念出后才喘口气，只在每一次看到真理之光燃起时才会说上一句啊哈，他一遍一遍说着，啊哈，一边用帽子轰着四月里闹哄哄地争夺午餐剩饭的苍蝇，他吞咽着完整苦涩的真相，如炭火一般在内心的阴影中不断灼烧的真相，因为一切都是一出戏，阁下，是他决定将母亲的尸体放在冰制灵台上领受万众敬拜后未经思考就排演出的一出虚妄喜剧，只是为了澄清你还在世时就已腐烂的恶毒谣言，当时还远未有人想到你神性的美德，那是一场戏法骗局，自从他们报告说将军阁下，您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正在创造奇迹，他便不知不觉地陷落其中，命人将那具躯体带去进行盛大的游行，他们走遍了他的没有雕像的广袤国度，连最人迹罕至的角落也不遗漏，为的是在蒙受了如此多年乏味的羞辱之后，在无利可图地为如此多的鸟儿上色之后，母亲啊，在付出了如此多没有回报的爱之后，让所有人都了解你的美德，尽管我绝不会料到，那道命令竟变成了假冒的水肿病人的胡言乱语，他们给了这些人钱，请他们当众上吐下泻，他们还付两百比索让一个人装死，然后从坟墓中爬出来，披着碎烂的裹尸布，口中塞满泥土，膝盖跪地行走在惊惧的人群中，他们还付给一个吉卜赛女人八十比索，让她假装当街分娩，生出一个双头怪胎，因为她曾说那些奇迹都是政府的安排，事实就是如此，没有一个证明不是花钱买来的，那是一个可耻的阴谋，然而却并非如德梅特里奥·阿尔窦斯阁下在探察之初设想的那样，是谄媚者单纯为了讨他欢心暗中策划的，不是这样，阁下，那是他新的追随者搞出的肮脏勾当，是在他权力的荫庇下滋长的各种交易中最卑鄙、最渎神的一个，因为编造奇迹和收买

人做伪证的正是他政权的拥戴者，正是他们生产和贩卖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死去新娘的婚纱圣物，啊哈，正是他们印刷铸造有她的女王肖像的卡片和奖章，啊哈，是他们利用她大发横财，利用她的头发，啊哈，利用装着她身旁的水的小瓶，啊哈，利用她的斜纹裹尸布，布料上用刷门漆画着一个睡梦中将手放在心上的少女的侧影，在印度人集市的小店后屋中一码一码地出售，那非同一般的谎言经久不息，是因为大教堂宏伟中庭里的那具遗体在无尽的群众列队贪婪的观望下依旧没有腐烂，然而真相截然不同，阁下，事实上他母亲的躯体之所以得以保存，并不是因为她的美德，也不是因为他出于专横的孝心而安排的凡士林的补救和化妆品的矫饰，而是因为她与那些在科学博物馆中展出的动物尸体一样，被施以最邪恶的技艺而制成了标本，他用我自己的双手验证了这一点，母亲啊，我把水晶棺盖掀起来，它上面的丧葬标识已被呼出的气息腐蚀损毁，我从你发霉的头骨上把橙花王冠取了下来，其上原本如幼马鬃毛般的头发已被一根一根拔起作为圣物卖了出去，我从残损的新娘头纱的丝线中、从干枯的残渣中、从死亡那硝石般的艰涩黄昏里把你抱了出来，而你竟然轻得像个晒干的葫芦，散发出箱底的陈年味道，身体里透着灼热的不安，仿佛你灵魂的声响，那是从内部蛀蚀着你的毛毡夜蛾在扑腾，我想把你抱在怀里，你的四肢却散落了，因为他们已将支撑你鲜活身体的内脏掏空，已将你的手放在心上入睡的幸福母亲的内脏掏空，然后在里面填上废物，于是曾经的你的全部只剩下一片覆满尘土的酥皮，刚一拿起来，便在你骨头周围如萤火虫般闪着磷光的空气中粉碎了，黄昏的教堂里只剩玻璃眼珠的跳蚤在石砖地面跳跃的声音，一切都化为乌有，徒留一摊被摧毁的母亲的废墟，它们被那些法警用铲子铲起来胡乱地抛进了盒子，而目睹着这一幕的暴君表现出的只是巨石般的冷漠，那双如鬣蜥一般的眼睛中没有流露出一丝情绪，甚至在那辆没有标识的马车里与那个世上唯一敢让他直面真相之镜的人独处时，他也

没有表露出任何情感，他们透过迷雾般的薄帘看着燠热的午后待在大门的阴凉里休息的贫苦暴徒，那里本是人们贩卖讲述暴力犯罪、不幸爱情、食人花或者危害意志的异形果的故事书的地方，如今却只感受得到震耳欲聋的喧嚷，大家争相以低价卖着假冒的圣物，卖着假冒的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身体和衣物，此时一个清晰的念头令他苦恼起来，他觉得德梅特里奥·阿尔窦斯阁下已经干涉了他的想法，因为他将目光从骚乱的病人身上移开，轻声说道，不管怎么说，他艰苦的调查总算有点好处，那就是，他能肯定那些穷人爱您，阁下，就像爱他们自己的生命一样，德梅特里奥·阿尔窦斯阁下已经窥见了总统府内部的背信弃义，已经看见了那些在权力庇护下发迹的人的阿谀奉承与狡诈奴颜背后的贪婪，不过，他也见识到了一种穷人之中的新式的爱，他们对他不抱有任何指望，因为他们对任何人都不抱指望，他们对他怀有一种可以捧在手中的尘世的虔敬和一种如我们对待上帝那样的不抱幻想的忠诚，阁下，换作其他时候，听到那番表白他会惊得连内脏都翻搅痉挛，然而此时他却连眼都不眨、气都不叹，只是内心深处怀着不安兀自想着，别的不差，神父，现在只差没人爱我，您将会在您那虚假世界的金穹顶下享受我的不幸带给您的荣耀，而他则会背负着不应背负的沉重真相，都没有热心的母亲与他分担，在这个国家中，我会比一只左手更孤单，而这个国家并不是我由着自己的性子选的，而是像您所看到的一样是他们定好了塞给我的，从最开始就是这样不现实的感觉，这样的狗屎味道，这样的没有历史、只求苟活的小民，都没人问过我就把这国家强加给我了，神父，在总统房车这四十摄氏度、百分之九十八湿度的阴影里呼吸着尘土，在会客厅里忍受着像咖啡机一样发出微弱哨声的疝气的背叛带来的折磨，在多米诺骨牌局上没有一个人让我输上哪怕一局，也没有一个人让我相信他的真相，神父，您钻到我这副皮囊里看看吧，但他没说出口，只是叹了口气，飞快地眨了下眼睛，随后向德梅特里奥·阿尔窦斯阁下恳求，那个

下午的鲁莽谈话咱们两人知道就可以了，您没对我说什么，神父，我并不知道真相，请向我保证，于是德梅特里奥·阿尔窦斯阁下便向他保证说当然，阁下并不知道真相，此乃君子之言。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封圣申请因证据不足而被搁置，来自罗马的布告经官方许可自讲道台传播开来，政府也决心镇压一切抗议活动和试图扰乱秩序的行为，然而当暴怒的朝圣者在武器广场上用大教堂的木门燃起篝火、用石块将教皇使节官邸的绘有天使和角斗士的彩色玻璃砸毁时，警察们却按兵不动，他们把一切都捣毁了将军阁下，但他在吊床上无动于衷，他们包围了比斯开修女的修道院要把她们活活饿死，他们洗劫了教堂和传教所，毁灭了一切和教士有关的东西将军阁下，但他仍在三角梅清爽阴凉下的吊床上一动不动，直到他的国家最高司令部的全体成员宣布，如果继续按照约定不动武不流血，将无法安抚群情、重整秩序，他才站起身来，在怠惰了数月之后现身于办公室，亲口颁布了一份出自他个人灵感、不曾请武装力量参与、未尝向他的部长们咨询且风险由他本人承担的法令，他亲自担起传达民意的庄严责任，在第一项中，他宣布了独立自主的民族所做的最高决定，即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具有平民神性，他追认她为国母、病人的神医、养鸟的大师，将她的出生日定为全国性节日，在第二项中，他宣布自本法令发布时起，本国与圣座威权之间进入战争状态，并依适合该情况的国际公法与现行国际公约行事，在第三项中，他下达了紧急、公开、庄严的驱逐令，要大主教和追随他的主教、教长、神父、修女以及所有和上帝有关系的本地的、外来的人通通离开，无论何等情况什么名目，只要在本国境内与领海五十公里的范围内，都得离开，在第四项即最后一项中，他下令征用教会的资产，包括圣堂、修道院、学校、耕地和农具、牲畜，以及甘蔗园、工厂、作坊，还有所有被登记在第三者名下而事实上属于教会的东西，为了向养鸟人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献上辉煌祭礼与盛大纪念，上述资产都将纳入她的遗产，本法令由口头颁布

并盖上无上权力不容违背的至高威严的戒指印章，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务必遵守，务必执行。在喜乐的焰火、荣耀的钟声和愉快的音乐中，人们庆祝着她被封为平民圣徒的盛事，而他亲自上阵监督法令的执行，不容丝毫闪失，以确保自己不会再度沦为新骗局的受害者，他戴着结实的缎面手套，重新抓住现实的缰绳，仿如回到鼎盛的年代，那时，人们会在台阶上拦住他的去路，请求他恢复在马路上赛马，于是他下令恢复，同意，请求他恢复套袋跑比赛，于是他下令恢复，同意，他会出现在最破落的茅屋中教人们如何把母鸡放到鸡窝里如何骟牛犊，他并不满足于亲自监管教会财产的巨细靡遗的清点工作，于是主持了正式的征用仪式，以确保他的意志被天衣无缝地执行，他将现实生活中的欺人真相与纸上的真相核对，他监督了驱逐最大的团体的行动，并诬陷他们企图用复底袋和紧身胸衣偷运走最后一任总督的秘密宝藏，那些宝藏原本埋在穷人的坟墓中，为了找到它们，联邦考迪罗们曾在长年的对战中互相残杀，他不仅要求教会成员一概不能带走除换洗衣物外的任何行李，还下达了不容辩驳的指令，命他们如母亲生下他们时那样裸身登船，最前面的是穿不穿衣都无所谓、只求能换个命途的粗鲁农村教士，而后是被腹泻摧垮的传教区教长、清秀持重的主教，随后是女人，仁爱修道院腼腆的姐妹、已经习惯驯服自然且能在沙漠中种出蔬菜的粗野女传教士、弹奏古钢琴的身材修长的比斯开修女们以及双手细嫩身体清净的慈幼会姐妹，虽然众人都只剩初降世时的皮囊，但在列队经过海关宽广的货棚里那一包包可可、一袋袋腌鲇鱼时，可以看出各人原本的阶层、不同的境况和不等的职位，从那位如石像一般站在风扇扇叶下的老人面前经过时，她们像一群团团转的惊慌羔羊，手臂交叉在胸前，试图用他人的羞耻来遮掩自己的羞耻，他屏息看着她们，紧盯着那个将有一群别无选择的裸体女人如水流般经过的固定空间，他冷漠地望着她们，目不转睛，直到国境之内一个都不剩，这是最后一批了将军阁下，然而，在那群惊慌的见习修

女中，他记住了自己一瞥之下剥离出来的那个，尽管她并不出众，但他还是将她与别人区分开来，她矮小、结实、健壮，臀部丰满，乳房硕大硬挺，双手笨拙，私处荒蛮，头发剪得很短，牙齿稀疏却利如刀斧，塌鼻梁，扁平足，一个不比其他人起眼的普普通通的见习修女，他却觉得她是那群裸女中唯一一个女人，唯一一个在他面前走过时没有看他的女人，她留下一串山野动物的隐秘形迹并将我赖以生存的空气带走了，令他差点没来得及移开他无法被察觉的目光去看她第二眼、再看她最后一眼，这时核对身份的工作人员按字母顺序在名册上找到了她的名字并喊道莱蒂西娅·纳萨雷诺，而她用男人般的嗓音回答，到！就这样，他在余生拥有了她，到！直至最后的怀念从记忆的罅隙中滴落，直至她的形象只留存在一张张纸条上，他曾在一张上写道，我的灵魂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看看没有你我落到了什么地步，并且把它藏到保存蜂蜜的墙缝中，每当确定没人看着自己时，他便会拿出纸条来重读然后把它卷起收好，其间会有那么一霎重温那个雨水明亮的久远下午，那个下午，有人突然报告说将军阁下，他们执行了一道他从未下达过的命令，他们带你返回了祖国，而他所做的不过是在凝视着最后一艘灰色的运输船沉入地平线时低声念出了莱蒂西娅·纳萨雷诺，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为避免忘记这个名字他又高声重复了一遍，而这足以让总统安全部门将她从牙买加的修道院中劫持出来，他们堵住她的嘴，用拘束衣把她束住，将她放入松木箱，捆上铁箍封上火漆，还用焦油印上易碎标识，请勿抛掷此面朝上[5]，外加一份依据领事豁免权获得的运往总统酒窖的两千八百个天然水晶香槟杯的出口许可证，他们把她装在一艘运煤船的底舱里带了回来，给她灌了迷药，把她裸身安置在贵宾卧室有立柱装饰的床上，他将会记得，午后三点，在蚊帐中尘埃飘浮的光线里，她和其他那些无条件服侍他的呆滞女人一样，沉在自然的梦境中，恬静安适，他在这个房间里和她们

做时，甚至都不会将她们从鲁米那的迷睡中唤醒，同时也饱受着无助溃败的可怕感觉的折磨，但是他没有去碰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他带着一种孩童的惊诧看着安睡的她，因为自上次在港口货棚见过之后，她赤裸的身体竟然变了这么多，他们给她烫卷了头发，除去了体毛，甚至最私密处也不例外，他们给她的手指脚趾染了红甲油，给她涂上了唇彩，擦上了胭脂，在眼皮上抹了麝香，她口吐香甜气息，驱散了你那隐秘的山野动物的味道，天哪，他们把她拆毁了再重组，他们让她变得这般迥异，使他在望着迷醉于鲁米那的她时，都无法看清那拙劣粉饰下的裸颜，他看到她浮上来，看到她醒来，看到她看到了他，母亲啊，是她，我的慌乱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她面对那个正透过蚊帐中的轻薄水汽冷酷地盯着她的岩石般的老人，吓得一动不动，她因他沉默中无从猜测的目的而惶恐，而他，尽管已度过无数岁月，尽管权力无边，却不知如何是好，他比她更惶恐、更孤独、更不知所措，那茫然无助，恰似当年他遇见一个随军妇后初次做男人的情形，那是一个午夜，他撞见她裸着身子在河中洗澡，并通过她每一次浮出水面时那母马般的喘息想象她的力量和身形，他在黑暗中听着她黑暗而孤独的笑声，他在黑暗中感受着她身体的欢愉，却恐惧得瘫在那里，因为他尽管已在第三次内战中做了炮兵中尉却仍是处子，他畏缩不前，直到对失去机会的恐惧占了上风，他才跃入水中，仍带着全身装备，绑腿、背袋、弹药包腰带、砍刀、火门枪，他裹挟在那么多战争的负累和隐秘的恐惧中，让那女人一开始以为是有人骑着马蹚进了河里，但她随即明白那不过是个战战兢兢的可怜男人，于是便将他收留在了自己慈悲的缓流中，牵着他的手，在他眩晕的黑暗中引领着他，因为他在那缓流的黑暗中寻不到路，她在黑暗中用母亲的声音指引他，紧紧抓住我的肩膀，别被水冲倒了，在水中不要蹲下，要用力跪着，慢慢呼吸，调匀气息，他天真顺从地按她的每个指示做着，心想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怎么女人做起事来就好像他妈的在搞发明一

样，她们在这点上怎么这么像男人呢，而她已趁这工夫脱下了他身上其他战争的无用用品，那些战争远不如这场在没颈河水中的孤独战役可怕、悲凉，当她松开他两条皮带的扣襻时，他已经在那个松树香皂味的身体的庇护中恐惧得差点死去，解开他襟门的扣子后我便吓得抽搐起来，因为我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只是碰到了一个巨大的睾丸，像一只在黑暗中游水的青蛙，她惊恐地松开了手，她离开了，找你妈去给你换一个吧，她对他说，你不行，而他已被恐惧击溃，那种恐惧让他在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裸体面前无动于衷，若是她不发善心，不施以援助，他便不会进入她那流淌着不可预见之水的河流，哪怕他全副武装，他亲手将她裹在被单里，用唱机播放着被父亲的爱毁掉的可怜的黛尔加迪娜[6]的歌直到唱片播完，他在花瓶中插上毛毡做的花朵，免得它们像鲜花那样被他不祥的手一碰就枯萎，他做了所有他想到的能让她幸福的事，却丝毫不放松对她的严密囚禁和裸体的惩罚，好让她知道，她会被好好照顾、好好宠爱，但绝没有可能逃离那个命运，她深知这一点，于是在恐惧第一次有所缓和时便没有请求他而是直接命令道，将军，给我把窗户打开透透气，他便去开了窗，再把它关上吧，月光都照在我脸上了，他便去关了，他执行着她的每道命令，仿佛它们皆因爱而生，他愈是顺从和笃信，就愈是接近那个雨水明亮的下午，当时他钻进了蚊帐，和衣躺在了她身边，没有叫醒她，他整夜整夜地独自享受着她身体的隐秘气息，嗅闻着她那随岁月流逝而渐浓的山野母狗的气味，她腹部重新长出了苔藓，她惊惶地尖叫着醒来，走开，将军，于是他沉重地、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却会趁她睡着后躺回她身边，就这样，在软禁她的第一年里，他并没有碰她却享受着她，后来她甚至习惯了在他身旁醒来，但不明白那个捉摸不透的老人的暗流在向何处伸延，因为他舍弃了权力的奉承和世界的魅惑，一心欣赏她并为她服务，她愈是茫然，就愈是接近那个雨水明亮

的下午，当时他趁她睡着趴在了她的身上，仿佛带着全身装备，那没有军衔标志的制服、砍刀腰带、一串钥匙、绑腿、戴金质马刺的靴子，他钻进了水里，她被那可恶的袭击吓醒了，于是竭力想把那匹压在身上的武装齐备的战马推开，无奈他太过坚定，她便决定用最后一招来拖延时间，您把盔甲卸了吧将军，那些铁环硌得我心脏直疼，他便卸了，把马刺脱下来吧将军，那颗金星星弄疼我的脚踝了，把腰上那串钥匙摘了吧，它们顶着我的髋骨了，虽然用了三个月才让他解开令我呼吸困难的砍刀腰带，又用了一个月才让他脱掉用扣襻伤害我灵魂的绑腿，但他最终还是将她的命令一一执行，那是一场缓慢而艰难的斗争，她拖着他却没有让他失去耐心，而他最终让了步来讨她欢心，于是两人没有谁知道那场在她被掳来刚满两周年时的最终的灾难是如何发生的，他那不经意的温热柔嫩的双手偶然触到了那位睡着的新入教的女教徒的隐秘石头，于是她在黯淡的冷汗与死亡的震颤中醒来，没有尝试用巧计或诡计摆脱身上的那头野兽，而仅仅是请求他把靴子脱掉，免得弄脏我的细麻床单，这令他激动万分，竭尽所能地迅速把靴子脱去，把绑腿、裤子、疝气带，把所有东西都脱了吧我的宝贝，不然我都感受不到你，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已脱得精光，一如他母亲在穿过天竺葵的如悲伤的竖琴琴弦般的光线中看到的他那样，他已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恣意地变成了一头北美斗牛，它第一次进攻就将所到之处毁灭殆尽，它在静寂的深壑中匍匐前行，那里唯一能听到的只是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嘎吱嘎吱如木船一般的磨牙声，到！她用十指抓住了我的头发，以免自己在那片无底的眩晕中孤独死去，而我正在这眩晕中带着与身体所有急迫欲念等同的冲动向死亡走去，然而他还是把她忘记了，独自留在了黑暗中，在他微咸的眼泪里啊将军、在他徐缓而下的阉牛口水间寻索着自己，将军啊，他惊叹道，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我怎么可能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尝过这种折磨的滋味呢，他在这惊叹间哭泣着，在自己肾脏的渴求与肠子里的

一串鞭炮声响中不知所措，而有着温柔触角的死亡伸出爪子将他的内脏连根拔起，把他变成一只被砍了首级的动物，它临死前翻腾的痛苦借着一种酸烫的物质喷溅在了雪白的床单上，扭曲了他记忆中那个雨水明亮的下午蚊帐里如液体玻璃一般的空气，那是屎，将军啊，是他自己的屎。

---

[1] 圣经人物，“耶和华已纪念”之意。

[2] 出自《新约·路加福音》（18:16），“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3] 罗马主教（即教皇）的主教职权。

[4] 在西班牙语中，本蒂希翁（Bendición）的意思即为“赐福”。

[5] 原文为英语。

[6] 墨西哥民歌《黛尔加迪娜》讲述了一个叫黛尔加迪娜的女孩拒绝了想娶她为妻的父亲，悲剧性地死去的故事。

傍晚将至时，我们已把一头头母牛腐烂的皮囊剥落，又将那非同寻常的乱摊子整理了一番，还是无法断定那具尸体与传说中他的形象是否相仿。我们已用去鱼鳞的铁刀把他身上的短印鱼刮除，用克勒奥林和石盐把他清洗干净，把腐烂的疮口补平，我们用麻布打补丁，用石蜡填窟窿，重塑他被垃圾堆的鸟雀啄烂的面孔，而后又把淀粉扑在他脸上来掩饰这些填补物，我们为他擦上胭脂，涂上红唇彩，还予他生命的光彩，但即便是嵌进空洞眼窝中的玻璃眼珠也无法强加给他所需要的、能让他去接受民众注视的威严容貌。与此同时，我们在政务院大厅召开了全体大会来批驳几个世纪的独裁统治并商议如何公平地瓜分他权力的赃物，所有人都是获悉了他那秘而不宣却无法隐瞒的死讯后回来的，有带着被拖延了多年的野心的余烬重归于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有丧失了权力方向的最高司令部的将领们，还有最后三名民事部长和大主教，所有他不会希望在此出现的人都围坐在胡桃木长桌旁，期望能就如何恰当地公布那则天大的死讯达成一致，以避免街上的人群过早地炸开锅：首先，在第一晚发布一号简报，称他偶染微恙，不得不取消公众活动以及平民、军人接见会，随后，发布二号医疗简报，宣布那位尊贵的病人因年事已高造成身体不适，只能待在私人寝室中，最后，无须公告，只要在那个八月炎热的礼拜二耀眼的黎明敲响大教堂宣告他正式死亡的决绝丧钟，敲响那个事实上没有人能确定是不是宣告他死亡的丧钟。我们在这证据面前束手无策，在这具散发恶臭的躯体面前窘迫难堪，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能力替代他，因为他在晚年一直拒绝对他走后国家的命运做出任何决断，在政府搬迁至部长的阳光玻璃楼时，他留在了他绝对权力的荒芜房屋中独

自活着，并从此以老年人不屈的固执否决了种种进言，我们会看到他在梦中行走，在母牛的残骸间挥动手臂，而那时已无人供他支使指挥，除了那些盲人、麻风病人和瘫痪患者，而他们正在死去，并非因为疾病，而是因为在那片玫瑰丛中待得太久，不过他仍然无比清醒、执拗，因而我们每每向他提出处理遗产的建议时，得到的都只是他的推托，他说一个人去考虑自己死后的世界和死亡本身一样晦气，真他妈的见鬼，等哪一天我死了，那些政治家都会回来瓜分这个摊子，就和哥特佬的时代一样，走着瞧吧，他说，什么东西都只会让教士、外国佬和有钱人分了，穷人什么都得不到，当然了，他们一向这么浑蛋，要是哪天大便也值钱了，穷人会生下来就没有屁股的，走着瞧吧，他一面说着，一面举出荣光年代的某个人做例子，甚至还会自我打趣地对我们说他只会死三天，没必要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去埋葬，说到这里他笑得差点背过气去，而对于所有事前与事后的矛盾，他都会拿出一个论断：一件事如果现在不是真的，那没关系，他妈的，将来它全部会是真的。他说得有道理，因为在我们的时代，不曾有任何人去质疑他的历史的合理性，也不会有任何人能证实它或驳倒它，因为我们甚至都无从确定他尸体的真假，我们没有其他的祖国，只有那个依据他个人的想象和偏好建成的祖国，它拥有被他的绝对意志的构思改变的空间与被校正的时间，它被他从自己记忆中最模糊的源头重建起来，同时他会茫然游走在那栋臭名昭著、没有住过一个幸福的人的宅子里，他会向在他吊床周围啄食的母鸡撒谷粒，还会向仆从发出反复无常的命令，给我拿一杯有碎冰的柠檬水，却把它扔在手边一口也不喝，给我把这把椅子从这儿拿开，放在那儿，再放回来，他一面以这种渺小的手段维持着对发号施令的酣嗜所保留的温热余烬，一面在院中的木棉树下打着瞌睡，耐心地打捞着一晃而过的遥远童年的时光片段，以打发每日政务之余的闲暇，当捕捉到一段记忆，比如他统治之前的那个祖国无尽拼图中的一块时，他便会猛然醒

来，那是一个虚幻、没有边际的庞大国度，一个热带丛莽的王国，那里有着缓缓而行的竹排和巉岩深涧，那时的人勇猛无比，敢将长棍戳进鳄鱼嘴里并徒手将它们擒捕，就这样，他用食指在上腭比画着演示给我们看，他对我们说，在一个圣日礼拜五，他感受到了躁乱的风，嗅到了风中铜锈的味道，看到大片乌云般的蝗虫搅浑了正午的天空，将所到之处尽数糟蹋，留下一个疮痍满目的世界和一片惨淡的光线，仿若创世前夜，他经历了那场灾难，看到了一排没有脑袋的公鸡，它们被拴着爪子倒挂在一个屋檐下，血一滴一滴往下掉落，那栋房子在一个大而混乱的农村教区，那里刚死了一个女人，他抓着母亲的手往前走，赤着脚跟在要被送去埋掉的那具衣衫褴褛的尸体后面，没有棺材，人们只是用受蝗虫风暴抽打的担架抬着她，这就是那时的祖国，我们连棺材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看到有个男人正在村镇广场的一棵树上试着用吊死过一个人的绳子上吊，不料那朽烂的绳子提前断裂，可怜的男人半死不活地摔在了广场上，吓坏了刚刚望完弥撒的女士们，但他没死，大家用棍棒把他敲醒，不过没有费心去弄清他是谁，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是在教堂里认识，便没有人知道谁是谁，他们用中国式木枷锁锁住他的脚踝，将他和其他有罪的同伴安置在外昼夜示众，这就是那些哥特佬的时代，那个上帝比政府更有权的时代、祖国的倒霉时代，后来他下令把村镇广场上的树都砍掉，以免礼拜日上吊自尽的可怕戏码再三上演，他还禁止了公开枷刑，禁止了无棺下葬，禁止了一切能让人忆起他掌权之前的可耻法例的事物，他修建了直达高地荒漠的铁路，使驮运三角钢琴去咖啡种植园中的化装舞会的骡队从此告别了胆战心惊地攀爬悬崖峭壁的悲惨日子，因为他曾目睹三十架三角钢琴直坠崖底的惨剧，虽然目击者只有他一个人，但这桩事件通过口耳与笔墨相传，沸沸扬扬地甚至散布到了国外，他说他偶然间将头探出了窗口，就在那一刻，一头骡子脚下打了滑，并将其余的也都拽下了山崖，只有他听到了那群失足动物的惊惧嘶鸣以

及随畜群坠落的钢琴在空阔中兀自奏响的无休止的和弦，它们落入了那个祖国的深处，那个与在他之前存在的万物一样浩渺而模糊的祖国，浩渺模糊得甚至无以复加：那些从奥地利进口的钢琴粉碎在深渊中，而在渊面之上的热气薄雾里那永恒的微光中，竟无从分辨白昼与黑夜，他在那个遥远的世界里看到了这样那样的很多东西，尽管他自己都无法把握十足地判断，那一切到底是他真实的记忆还是在战时发着烧的不幸夜晚听来的，抑或源自他趁政局风平浪静时一连数小时迷醉其中的游记插画，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他妈的，等着瞧吧，将来它们全部会是真的，他说着，心下清楚自己真正的童年不是那些烂泥般的模糊回忆，不是那些只在牛粪燃起时被记起而后便永远被遗忘的东西，事实上，它是我在我唯一的合法的妻子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缓流中所经历的，她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都会让他坐在三角梅花廊下的课桌旁教他读写，她把她见习修女的执着都用在了这项英雄的事业上，而他则报之以老年人的可怕耐性、他无边权力的可怕意志和我全部的心，他会全神贯注地朗诵道，仙人掌上开花丁香盆里飘香玻璃糖缸透亮，他在他死去母亲那些被惊扰的鸟雀的聒噪中朗诵着，自己听不见，也没有其他人能听见，印第安人灌油膏进油罐，爸爸装烟丝进烟斗把烟抽，塞西莉亚卖葱头卖蜡油卖啤酒卖樱桃肉卖肉干卖肘片卖大麦，塞西莉亚什么都卖，他会大笑着，在震耳的蝉鸣声中重复着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伴着她见习修女的节拍器的节奏教给他的语句，直到世界因充满你声音的创造物而饱和，直到他辽阔的沉重王国中，除启蒙课本的典范真理之外再无真理，除云中的月亮、皮球和香蕉树、堂埃罗伊的公牛和奥蒂丽娅的漂亮浴袍之外再无他物，他无时无处不在朗诵课文，使得它们如他的画像一般随处出现，甚至与荷兰财政部长会面时也不例外，当时那位阴郁的老人在自己深不可测的权力的黑暗中举起戴缎面手套的手打断了会见，并邀请客人与我共同朗诵，令荷兰人顿时在这场官方会晤中迷失了方向，他高声念道，我妈妈爱我，伊

斯玛艾尔在海岛上待了六天，贵妇吃番茄，他一边念一边用食指模仿着节拍器的指针，他背诵着礼拜二的课文，发音无可挑剔，但却让场面十分难堪，于是会谈最终以他希望的结果告终，欠荷兰的债务拖到时机更成熟了再偿还，到时候再说吧，他这样决定，麻风病人、盲人和瘫痪患者清晨时从玫瑰丛中起身，看到了那位阴郁的向人们撒下安静祝福的老人，他在众人的讶异中依大弥撒的样子念诵了三遍我是皇帝我爱法例，他念诵道，算命老头就爱喝酒，他念诵道，灯塔是一种顶端发光、指引夜航人的高塔，他念诵着，心里十分清楚在他年迈的幸福的阴影中，除了与我的生命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在午休时间里一同度过的如翻腾虾汤般令人窒息的嬉闹时光之外，再无其他时光，除了与你赤裸躺在如被缚住的蝙蝠般的电风扇下那浸满汗液的凉席上的欲望之外，再无其他欲望，除了你臀部的光芒之外，再无其他光芒，莱蒂西娅，再没有别的什么，只有你图腾般的乳房、你扁平的脚掌、你药方中的一把芸香，以及遥远的安提瓜岛上压抑的一月时光，你就是在那座岛上，在一个被腐烂沼泽的热风犁过的孤独黎明来到了世上，他们两人将自己锁在那间贵宾卧房里，下令任何人都不得跨入距离房门五米以内的范围，因为我要专心学习读书写字，于是任何人都不敢去打扰他，甚至不去禀明将军阁下黑呕病正在农村地区肆虐，此时的我心跳却因你山野动物的隐形力量而加速，超过了节拍器的节奏，他朗诵道，侏儒单腿跳舞，母骡去上磨，奥蒂丽娅刷浴缸，baca写时要用burro的b，他朗诵着，而此时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正在一旁拨开他患疝的睾丸，清洗方才欢爱后留下的粪便残渣，她把他浸泡在白合金狮腿浴缸里用于净身仪式的水中，给他抹上路透牌香皂，用丝瓜瓤搓洗他的身体，又用草叶煎煮出的汁帮他冲干净，同时与他一起念着用j拼写的词有jengibre、jofaina和jinete，她在他的大腿根部抹上可可脂来抚慰被疝气带磨伤的皮肤，在他臀部凋萎的星星那儿扑上硼酸，又像母亲一样轻拍他的屁股蛋，啪，啪，来惩罚他在荷兰部长面前的糟糕表

现，她希望，作为补赎，他能允许那些不幸的团体回国，来负责孤儿院、医院等慈善机构的运行，但他却用他无法平息的怨恨的阴郁气氛将她笼罩，门儿都没有，他叹息道，在这个甚至另外那个世界上，都没有任何权力可以让他收回成命，在下午两点的爱欲的急迫喘息中，她向他请求，答应我一件事吧，亲爱的，就一件，让那些只游走在风云变幻的权力外围的教区团体回来，但他却在急迫丈夫的渴切呻吟中回答，门儿都没有，亲爱的，我死都不受那帮穿裙装的家伙的侮辱，他们骑在印第安人的背上而不是骡子背上，他们分发彩色玻璃项链换金鼻环和金耳坠，门儿都没有，他回绝着，对我的不幸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哀求置之不理，而她已将双腿并拢交叉，请求他恢复被政府征用了的教会学校，解除对资产的永久性占有，归还已变成军营的榨糖厂和教堂，但他把头扭过去冲着墙，准备拒绝你的迟缓而深邃的爱带给他的贪婪的折磨，以免自己的胳膊肘往外拐，去帮那些在几个世纪里净靠吃祖国的肝脏活命的上帝的强盗们，门儿都没有，他决绝地说，然而他们回来了将军阁下，那些可怜的团体通过最狭窄的缝隙重返国家，按照他的秘密指令在隐蔽的海湾静悄悄地登陆，并且获得巨额赔偿，重获被没收的财产，还加了利息，刚刚颁布的婚姻法、离婚法以及世俗教育法均遭废除，甚至当初在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愿她已在上帝的神圣国度中——封圣过程中举办的可笑的庆祝活动上他盛怒之下亲口颁布的命令也都悉数取消，真他妈的见鬼，但即便如此还是没能让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满足，她还想要更多，她让他把耳朵贴在我的肚子上，听听那个正在里面长大的小东西唱歌，她在半夜被那深邃的声音惊醒，它描绘着你那被锦葵色的傍晚和焦油味的风划过的脏腑以及脏腑间那个水的天堂，那内里的声音与她谈论着你肾脏上的息肉、你肠子中的柔软刀刃和在它的源头你那入眠的尿液的温热琥珀，他于是把嗡鸣声稍小的那只耳朵贴在了她的肚子上，听见了那个出自他的死罪的生灵的翻腾声，那是我们的淫秽腹部所孕育的

孩子，他将叫作厄玛奴耳[1]，其他神灵都是通过这个名字认识了上帝，他的额头上将有象征高贵出身的白色标记，他将继承他母亲的牺牲精神和他父亲的伟大以及他自己的作为无形领导者的命运，然而一旦他决定不在祭坛上将他那么多年来渎神的姘居圣洁化，那孩子便将因其违法本质而成为上天的耻辱、国家的污痕，于是他从旧时婚纱的泡泡袖间冲出一条路，带着从被压抑的可怖怒气深处发出的那航船锅炉般的鼻息咆哮道，门儿都没有，我死都不结婚，同时拖着他那双隐匿新郎的大脚，走在一栋陌生房屋的厅室中，那栋房子已经在官方服丧期旷日持久的黑暗之后恢复了往日的富丽堂皇，房檐上朽烂了的圣周绉绸已被扯了下来，房间中有海洋的光亮，阳台上繁花开放，军乐开始奏响，所有这些都是执行了一个他未曾下达但无疑出自于他的命令将军阁下，因为那命令中含有他声音的平静从容和他威权的不可悖逆的架势，他批准了，同意，被关闭的教堂纷纷重开，修道院与墓地也归还给了各自所属的教会，这些依据的是另外一道他没有下达却批准了的命令，同意，古老的瓜尔达尔节和四旬节恢复了，敞着的阳台上传来人群喜悦的颂歌，从前他们唱起它是为了赞美他的荣耀，而今他们在烈日下跪地而歌则是欢庆那则好消息，他们用一艘船把上帝带来了将军阁下，真的，他们听了你的命令把他带来了，莱蒂西娅，因为一条自卧室颁布的法令，那条法令与她未征询任何人就在暗中颁布的众多法令一样，会得到他当众首肯，好在人前掩饰他已丧失了威权的神位，因为你才是那些无止境的游行背后的隐秘力量，而他则会在自己的卧室窗口惊诧地望着那些队伍，直到它们到达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狂热暴徒都不曾涉足的地方，关于后者的记忆已被从人类的时间中抹灭，她嫁衣的烂布和骨骼的粉末已随风消散，她的墓碑被翻转，碑文向下，不让她那安睡的黄鹂画师养鸟人的名号流传到时间尽头，都是因为你的命令，因为你颁布了它们，就不会有任何关

于别的女人的记忆给关于你的记忆罩上阴影，我的厄运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婊子养的。她改变了他，在他到了人除去死之外不会再有任何改变的年纪，她用床笫间的花招摧毁了他那门儿都没有，我死都不结婚的天真坚持，她强迫他戴上新的疝气带，感觉一下，听起来好像黑暗中离群山羊的铃铛声响，从他与皇后跳第一曲华尔兹起，她便强迫他套上你的漆皮靴，并在左脚靴后跟扣上海军上将赠予他的、希望他能至死佩带的象征最高权威的金质马刺，她让他穿上你的镶金丝银线、配亚麻布金银绛带与流苏肩章的军服上衣，自之前那个民众可以隐约窥见总统马车薄帘后的忧伤双眼、若有所思的下颌以及戴缎面手套的沉默的手的时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穿戴过它们，她强迫他佩上你的战刀，喷上你的男士香水，戴上罗马教皇为表彰你将没收的财物归还教会而授予你的那块有圣墓骑士团饰带的奖章，你把我打扮得像个节日的祭坛，黎明时就带我走进昏暗的会客厅，那里飘散着守灵蜡烛的味道，窗口垂着橙花枝条，墙上挂着很多国徽，没有见证人，整个房间像被那位见习修女的牛轭套住了一般，而她的身子僵在粗麻布里，外面还罩了一层棉纱，好遮盖她暗中放纵了七个月的羞耻，凄肃的宴会厅周围隐形的海洋不安地散发着腐臭，在那片海的迷倦中，他们都在出汗，厅室入口则已奉命被封死，窗外也砌上了围墙，府中所有的生命踪迹都被灭绝，为的是不让世界捕捉到这场隐秘的盛大婚礼的哪怕一丝风声，而你，因为那个在你内脏沙丘的幽暗苔藓间游着水的早熟男儿的催促，热得差点喘不上气了，他已经决定了那将是个男孩，于是他便是个男孩，他在低于你的存在的地方唱着歌，那隐匿的泉水般的声音与穿法衣的大主教歌颂天国上帝的声音相同，为的是不让昏昏欲睡的哨兵听见，而他的迷失了的潜水员的恐惧与将自己的灵魂托付给了上帝的大主教的恐惧无异，主教向那不可捉摸的老人问了那个不曾有人问过、到世界末日也无人敢再问的问题，你是否愿意娶莱蒂西娅·梅塞德斯·玛丽娅·纳萨雷诺为妻，他只是眨了眨眼，同意，

胸前的战功勋章因心脏的隐隐挤压而轻微作响，然而他的声音太过威严，以至于你腹中的可怖生灵在那稠密液体中的自己的昼夜分割点完全翻转过来，他校正了东之所在并找到了光的方向，于是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俯下身子啜泣起来，我的父我的主，怜悯一下你这卑微的仆人吧，她是在触犯了你神圣的律法时得到了许多欢愉，但也心甘情愿地接受这可怕的责罚，她撕咬着蕾丝手套，以免脱了臼的髋骨的声响出卖粗布衬裙遮盖下的羞耻，她蹲了下来，身子在自己液体的水洼中散了架，而后从混乱的棉纱里，取出了那个七个月的怪胎，一个初生牛犊大小、有着未经烹煮的动物的无助气息的胎儿，她用双手将他托起，想在临时祭台的浑浊烛光下好好打量他，她看到他是个男孩，就像将军阁下决定的那样，一个脆弱腼腆的男孩，根据计划他将并不光彩地被命名为厄玛奴耳，而自从他将他放在石祭台上用军刀砍断脐带并承认他是我唯一的合法的儿子的那刻起，便任命他为拥有切实的司法权和指挥权的师长，神父，替我给他施洗吧。那个史无前例的决定将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序曲、一段邪恶时期的第一张布告，在那个时期，军队会于拂晓之时封锁街道，命人紧闭阳台窗户，挥舞枪托把市场里的人都轰走，不让任何人看见那道一闪而过的车影，它有耀眼的钢板外壳与总统专车的金质把手，而那些胆敢躲在被封锁的屋顶平台偷窥的人没有像从前一样看到那面旗帜色彩的薄帘后那位老迈的军人和他戴缎面手套的若有所思的手托起来的下巴，他们看到的是那个矮胖的昔日的见习修女，她戴着配毛毡花朵的草帽，不顾炎热地围着蓝狐毛领，我们会在礼拜三的清晨看到她在公共市场前下车，在巡逻队战士的护卫下，牵着不到三岁的小师长，他优雅而虚弱，让人无法相信他不是小女孩穿着盛装制服扮成的军人，那制服上的金线仿佛长在他身上一般，因为在他冒出乳牙前，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就为他穿上军服，把他放在婴儿车中让他代表父亲主持官方活动，抱着他检阅军队，在球场把他举过头顶接受人群的欢呼，于国庆阅兵式上在敞篷车

中给他喂奶，丝毫不顾一个佩戴五颗太阳徽章的将军像一头没了爹娘的牛犊般陶醉地吸着母亲乳头的荒诞场景所激起的窃笑，到了可以自理的时候，他就开始参加外事接待活动，并在制服上别上他从父亲拿给他玩的勋章匣子里随意挑出的战争勋章，他是一个严肃古怪的孩子，从六岁起便能得体地出席公开场合，他举着酒杯，以果汁代香槟，谈起成年人的事务来有一种并非遗传自何人的温文尔雅、自如合宜，只是有大片的乌云不止一次飘进宴会厅，于是时间凝滞了，被赋予了最高权力的面色苍白的王位继承人向困倦投降了，安静，人们窃窃私语，小将军睡着了，他的副官会将他抱起来，穿过被打断了的对话，经过纹丝不动的高级刺客，走过只敢把脸藏在羽毛扇后面憋着笑的羞怯妇人的小声嘟囔，真可怕，要是将军知道了的话，因为他成功地令众人相信他所编织的假象，即世上发生的一切，只要没有上升到关乎他的伟大的高度，他便不闻不问，于是才会有他儿子，那个他在不计其数的孩子中唯一承认的儿子，多次当众的放肆，才会有我唯一的合法的妻子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毫无节制的僭越，她会在礼拜三的黎明来到市场前，牵着她的玩具将军的手走在喧嚷的军营女仆和突击队的勤务兵当中，这些人在沐浴到加勒比呼之欲出的旭日光辉之前，先感受到一道意念的可见的奇异光芒，于是面貌大变，他们会钻进海湾没腰的臭水中，打劫停泊在古老的黑奴港口、风帆上打着补丁、满载马提尼克岛的鲜花和帕拉马里博的姜根的帆船，他们像战时扫荡那样将活鱼一一掠走，他们在旧时称量奴隶、现在仍在使用的磅秤周围挥舞枪托厮打抢夺猪猡，也是在这个地方，在他之前的那个祖国的另一个时代的另一个礼拜三，曾经举办过一场公开拍卖，一笔塞内加尔女俘虏的交易成交了，因为她梦魇般的美貌，购买她的黄金重量甚至超过了她的体重，他们扫光了一切将军阁下，比蝗虫还凶，比飓风还猛，但他仍置若罔闻，任凭丑闻愈演愈烈，任凭莱蒂西娅·纳萨雷诺闯入他本人都不敢闯入的鸟类和蔬菜市场琳琅满目的展厅，身后还跟着

一群会惊恐地朝蓝狐讶异的玻璃眼珠狂吠的躁动野狗，她带着自己权力的淫威，穿梭于纤细的精美铁柱间，柱身上方的铁质树枝中点缀着大片黄色玻璃叶、大个儿粉色玻璃苹果，穿梭于巨大的、开着蓝色玻璃花朵的炫目穹顶下那装满珍馐美馔的丰饶之角[2]，她挑选着最甜美的水果与最鲜嫩的蔬菜，然而她刚一碰到它们，它们便颓萎凋零，她并不知晓自己的双手竟有这般邪力，能令新出炉的面包发霉，令她金质的婚戒变黑，于是她冲着女商贩破口大骂，说她们把最好的货都藏起来了，只给权力之府留下了这些猪才吃的烂芒果，一帮女贼，这个瓜听起来空得跟乐手的葫芦似的，浑蛋，这狗屎肋条上长了虫的污血几里地外就能看见，这根本不是牛肉，是害瘟疫死的驴子的肉，婊子养的，在她声嘶力竭时，她的女仆会挎着篮子，与提着木盆的勤务兵一起，把一路所见的食物都掳个精光，一边打劫一边像海盗般吼叫，声音之尖厉，赛过野狗看到她从爱德华王子岛上活捉回来的蓝狐的尾巴有了雪白的栖身处后的狂吠，用语之刺耳，不输口吐秽语的金刚鹦鹉那血淋淋的模仿，这些鹦鹉在女主人们的暗中调教下学会了她们自己无法随意吼出的强盗莱蒂西娅、婊子修女，它们这样惊叫着飞上了市场穹顶处那些带有颜色陈旧的玻璃树叶的钢铁枝条，它们知道在那里是安全的，可以逃过劫掠般的桑巴帕洛舞的毁灭之风，在玩偶小将军喧杂的童年中，每个礼拜三清晨，这阵风都会刮起，他背起纸牌国王军刀，虽然走路时刀尖仍会拖着地，却愈发地像个男人了，声音也愈发亲切，举止也愈发温柔，他置身于抢劫之中却保持着沉着，保持着冷静、高傲，保持着他母亲反复教导他要保持的不可动摇的体面，好配得上他高贵的血统之花，而她自己却在市场里，在她疯狗般的冲动和酒后的詈骂中，在黑人老妪安然无恙的目光中将这血统之花挥霍，那些裹着鲜亮头巾的老妇人承受着侮辱、观赏着劫掠，她们扇着扇子，眼睛眨都不眨，带着神像般的深邃平静坐在那里，在凶残的袭

击队伍经过时，屏着呼吸，咀嚼着让她们在如此多的不齿行径中得以苟活的烟球、古柯球和镇静药物，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与她的乌合之军在狂暴野狗高耸的脊背之间破开一条路，和以往一样，在门口大喊着把账单拿给政府吧，但她们仍不敢喘息，哦，天哪，要是将军能知道，要是有人把这情况告诉他，她们被幻觉蒙蔽着，以为他至死都将忽略尽人皆知的、他记忆中最为可耻的事，我唯一的合法的妻子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从印度人的市场中掳走了蹩脚的玻璃天鹅、蜗牛壳做边框的镜子和珊瑚烟灰缸，从叙利亚人的商店中抢走了丧葬用的塔夫绸，从商业街银匠的移动摊位上劫走了一串串金质小鱼和拳头形的护身符，于是他们当面冲她喊，你比那些她围在脖子上的蓝色莱蒂西娅还要像狐狸，她将所到之处席卷一空，只为了满足昔日见习修女的身份留给她的仅有的东西，即糟糕幼稚的品位与不按需索求的恶习，只是这时，蒙上帝之爱，她无须在总督区充满茉莉花香的门庭前乞讨，无须牺牲什么就可以让军用辎重车把她喜欢的东西通通运走，只消说上一句命令般的把账单拿给政府吧，便不用再牺牲什么了。这和说跟上帝要钱去吧没有差别，因为那时已没有人确知他是否还存在，他已经隐形了，我们的确在武器广场的小山上看到砌起的高墙，看到权力之屋，它有着做传奇演讲的阳台、挂蕾丝薄帘的窗户以及架在飞檐下的花盆，它每到夜晚看起来就像一艘在天空遨游的蒸汽船，为了迎接著名诗人鲁文·达里奥的来访，它被刷成了白色又换上了玻璃球来照明，自那之后，不仅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而且从七西班牙里之外的海上都能看到它，然而这些表象中没有一个能确证他就在那里，相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那些对生命的炫耀只是为澄清广为流传的谣言而采取的军事策略，传闻说他已经陷进了老年玄思的危机，弃绝了权力的虚荣与奢靡，并强迫自己在一种可怖的颓萎状态中以忏悔苦行的方式度过余生，他身着折磨灵魂的苦行衣，背负各式摧残肉体的铁器具，除黑面包与井中水外无其他饮食，除比斯开修女修道院禁闭房光

秃秃的地板外无任何寝具，直到他偿清了自己违背意志与人发生关系并让一个被封禁的女人怀上男胎的罪过，幸而上帝宽宏大量，她尚未最终宣誓成为正式修女，然而在他广阔的沉重王国中，什么都没有因此而改变，因为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掌握了权力之匙，她只需说一句他让把账单拿给政府，那是一个老套的程序，最初看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却变得愈来愈恐怖，直到多年之后，一群勇敢的债主带着一个装满欠账单的箱子，壮着胆子出现在了总统府的警卫室，我们很惊讶，因为没人对我们说好，也没人和我们说不，他们只派了一个勤务兵把我们带入了一间中规中矩的等候室，一位海军军官接待了我们，他非常和蔼、年轻，语气徐缓，笑容可掬，他敬了我们每人一杯由总统府出产的咖啡豆制成的寡淡而清香的咖啡，又带我们参观了洁白光亮的办公室，办公室的窗上都安有铁丝网，简约的天花板下都悬着吊扇，一切都很明净、人性化，让人不禁困惑，那个空气中充斥着药香的政权去哪儿了，那个存在于那些身穿丝绸衬衫、迟缓而沉默地管理各项事务的书记员意识中的权力的吝啬与无情去哪儿了，他带我们参观了天井庭院，里面的玫瑰丛已被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修剪过了，为的是净化晨露，使它们摆脱有着麻风病人、盲人以及瘫痪患者等等已被送到收容所、在被遗忘中等待着死亡的人的记忆，他还带我们参观了妾侍们旧时的棚屋、生锈的缝纫机以及行军床，从前，供他泄欲的女奴甚至需要三人睡在同一张这样的床上，这些充满耻辱的房间就要被推倒，代之以私人圣堂，从窗口向外看去，他向我们介绍了民政大楼内最私密的亭廊三角梅花廊，四点的阳光照在绿绸帷幔上，将整个花廊染上一层金色，他刚与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在那里用过午餐，他们二人是仅有的有资格与他同桌的人，他带我们看了传说中的那株木棉，在它的绿荫下悬挂着那面旗帜色彩的麻布吊床，那是他在燠热的午后休息的场所，他带我们参观了牛棚、乳酪房、蜂房，当我们顺着他每天清晨去牛棚的小路返回时，他仿佛被雷电击中了一般，抬手

指出他在烂泥中发现的一个靴印，请看，他说，那是他的足迹，望着那个巨大粗糙的立体靴印，我们都呆若石像，它在宁静中饱含着光辉与权势，同时也散发出一头习惯了孤独的老虎留下的旧时疥疮的腐臭，在那个足迹中，我们看到了权力，感觉到了他的神秘，那揭示的力量竟比我们中的一人被选去见他本人时所能感受到的还要大，因为军方大佬们已经开始谋反，讨伐那个所积蓄的权力已大过最高司令部、大过政府、大过他的女暴徒，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已经戴着她的白色垂耳棉布皇后之冠，走到了这么远，于是总统府最高司令部冒着风险，向诸位中的一人敞开大门，仅此一人，为的是尝试请他出点儿主意，看看国家是怎么背着他运转的啊将军阁下，我就是这样见到他的，他一个人待在白墙上挂着英国骏马版画的闷热的办公室里，坐在吊扇下的弹簧安乐椅上，向后仰着身子，穿着皱巴巴的白色卡其布制服，上面钉有铜扣，没有任何军衔标志，他那戴缎面手套的右手放在木制写字台上，台面上除了三副一模一样的很小的金边眼镜外别无他物，他身后有一个玻璃书柜，一本本书上覆着尘土，看着更像是糊了层人皮的旧账簿，他右手边是一扇敞开的大窗，也安着金属网，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整座城市，以及延伸至海另一边的没有云也没有鸟的天空，我感到轻松了许多，因为看起来他对自己权力的重视程度比不上他的任何一位支持者，并且他本人比照片上要寻常许多，也更值得同情，因为他的一切全是老的、艰辛的，仿佛被一种贪婪的疾病侵蚀了，甚至都没有气力开口让我坐下，只是用缎面手套做了个悲伤的手势来示意，他听着我的论述，眼睛没有看我，呼吸中带着一种纤细而艰难的哨音，那隐秘的哨音在屋里留下了一种木馏油的潮气，他深深地沉浸在翻检我所呈上的账单中，而我用学生的列举方式向他描述着，鉴于他已经无法理解抽象概念，我便开始解释说，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欠钱买的塔夫绸已经有从这儿到桑塔玛丽亚德尔阿尔塔的距离的两倍那么长了，也就是说有一百九十西班牙里，他说啊哈，仿佛是说

给自己听的，最后我向他说明，在为阁下打了特别折扣之后，账目总额相当于一连十年次次彩票中头奖的金额总和的六倍，他又说了一句啊哈，直到那时他才从眼镜上方看了我一眼，我看到他的眼神是腼腆而宽厚的，直到那时他才用风琴似的诡异声音对我说，我们的理由清楚公道，各人有各人的理，他说，你们把账单拿给政府吧。事实上，在那个时期他就是这样，那时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一上来就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他从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那儿耳濡目染来的粗蛮，改掉了他边走路边一手拿餐盘一手拿勺子吃饭的习惯，于是他们三人才会在三角梅花廊下的一张小海滩桌上进餐，他与孩子面对面，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则坐在两人之间，教他们用餐时的礼仪与健康规范，教他们把脊柱靠着椅背坐好，叉子在左手，刀子在右手，每吃一口都要在一边嚼十五下，再换到另一边嚼十五下，嘴要闭起来，头要昂起来，他会抗议，这么多条条框框，跟在军营里似的，但她丝毫不予理睬，午饭后她会教他读官方报纸，上面会出现他作为守护者和名誉指挥官的形象，当她看到他在家里的庭院中那棵硕大木棉的树荫下的吊床上躺着时，便会把报纸塞到他手里对他说，堂堂一位国家元首，如果不掌握世界局势，就太不可理喻了，她给他戴上金边眼镜，让他来来回回阅读关于自己的新闻，而她自己则在一旁教孩子把皮球抛出又传回的见习修女的运动，这时他会看到自己出现在那么古旧的照片里，很多张上甚至根本不是他，而是那个为他而死、名字已被他忘记的老替身的，他会发现自己在主持从彗星年代开始他就没再参加过的礼拜二部长会议，他会知晓他的文书部长们用来赞颂他的历史性的词汇，他会在八月下午大片流浪的云朵下的闷热中边读边打瞌睡，一点一点地浸在午休时段黏稠的汗液中，嘴里嘟囔着，这狗屎报纸，他妈的，真不知道人们是怎么忍受它的，他嘟囔道，但那并不愉快的阅读还是为他留下了些什么，因为从短暂轻薄的梦中醒来后，他便已受新闻的启发想出了某个新主意，他会让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替他传令给各个部长，

而他们也会请她转达回复，并且试着从她的思想中窥探到他的思想，因为你就是那个我希望来传达我最高思想的人，你就是我的声音、我的道理和我的力量，在那个围困着他而他又无法进入的世界上，她是他在永恒熔岩的喧嚣声中最忠诚最专注的耳朵，然而最终掌控他命运的神明其实是写在仆人厕所墙壁上的匿名词句，从中他可以猜出无人敢向他揭示的隐秘真相，连你也不敢，莱蒂西娅，他会在清晨从牛棚回来的路上，趁负责清洁的勤务兵将它们擦除之前去读上一番，他还命人每天都用石灰把厕所的墙壁抹白，这样一来，便没有人能抵挡得住发泄深藏于心的怨恨的诱惑，在那里他了解了最高司令部的苦闷，知晓了那些在他的庇荫下发迹又在他的背后鄙弃他的人压抑着的企图，当他成功地从那个女恶棍的纸上的显影之镜中参透了人心之谜时，他感觉他就是自己全部权力的主宰，于是在多年之后，他又开始唱着歌，透过雾霭般的蚊帐望着他唯一的合法的妻子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搁浅母鲸的晨梦，起床吧，他唱道，我心里已经六点了，海洋已经归位，生活正在继续，莱蒂西娅，在他的那么多个女人中，唯有她的生命是不可预见的，她已经从他那里得到了几乎一切，只差一项简单的特权：让他在床上与她一同待到天亮，因为他在最后一次做爱后总会离开，会在他的老光棍的卧室门楣上挂起用来逃命的灯，会锁上那三把门环、三个插销、三道门闩，面朝下倒在地上，孤身一人，穿着衣服，与你出现以前他在每个夜晚所做的一样，与没有你以后直到他那孤独溺死者的梦中的最后一晚所做的一样，他会在去过牛棚之后回到你充斥着黑暗之兽味道的房间，继续给你你想要的一切，比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无法计量的遗产还要多得多，比古往今来任何人梦寐以求的还要多得多，而且不仅满足她，也满足她无穷尽的从安的列斯群岛中的无名小岛过来的亲戚，他们除了一身皮囊外一文不名，除了那个相同的纳萨雷诺，别无名号，那是一个粗俗乖戾的家族，男人鲁莽，女人则因为炽热的贪婪而面红耳赤，他们迅速垄断了

盐、烟与饮用水的买卖，那本是他为了打消各兵种的将军们别样的野心而赐予他们的旧时特权，却被莱蒂西娅·纳萨雷诺通过一个个他没有发布却批准了的命令一点点地卷走了，同意，他废除了五马分尸的野蛮刑罚，并用登陆军司令赠予的电椅取而代之，以让我们也能享有文明的杀人方法，他造访了港口碉堡的恐怖实验室，在那里他们挑选最精疲力竭的政治犯来演练如何操控死亡王位，它每一次放电都要耗去全城的发电量，而我们也因此知晓了死亡实验的精确时刻，因为我们的呼吸在那一刹那的黑暗中被恐惧切断了，我们会在港口的妓院里保持一分钟的安静，会为那个受刑的灵魂干杯，不是一杯而是很多杯，因为大部分受难者会带着血肠般的身体和冒着烟的肉挂在椅子的钢带上并且仍在痛苦呻吟，直到几次失败的实验后某个人发善心开枪把他们打死，这都是为了让你高兴，莱蒂西娅，为了你他清空了牢房，再一次批准他的敌人回国，并颁布了一则复活节公告，为的是不让任何人因持异见而受到惩罚、因思想问题而受迫害，他在他的深秋中真诚地相信了，哪怕是他最顽固的敌手，也有权享有他在一月迷人的夜晚与那个女人享有的那种欢愉，她是唯一配享有那份荣耀的女人，可以看见他不穿衬衫、只穿长衬裤的模样和那被总统府露台上的月光染成金色的巨大疝气，他们会一同欣赏巴比伦国王王后在那些年的圣诞节前后送来、让他们栽种在雨水庭院中的神秘白柳，会凝视永恒的水上那碎裂的太阳，会仰望被缠进繁茂枝叶的北极星，他们会听落地式收音机的节目探究宇宙，但不时会被一闪而过的星球的嘘声干扰，他们会一起收听每日连播的古巴圣地亚哥的小说，他们的灵魂也因它感染上焦虑情绪，不晓得咱们还能不能活到明天看着这不幸怎么解决，在哄孩子上床睡觉之前，他会陪他玩一会儿，教给他战争武器所有可知的使用和维护之道，关于那门他比任何人都精通的人类科学，他只给了他一个忠告，绝不要下达你不确定能否被执行的命令，他一遍遍地重复，直到放心他不会忘记，一个大权在握、发号施令的人一辈子唯

一绝不能犯的错误就是下达他不确定能否被执行的命令，这一忠告与其说来自一位英明的父亲，不如说是出自一位谨小慎微的祖父，那孩子即使与他同样长寿也永生难忘，因为他一边这样教导他一边准备让六岁的他第一次发射后坐力炮，它灾难般的爆炸声让我们错以为是一场干雷暴，伴随着闪电、火山爆发般的轰鸣与来自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的极地狂风，那风将海洋的腑脏翻转，将驻扎在旧时黑奴港口广场上的马戏团的动物席卷上天，于是我们用渔网捞到了大象，发现窒息的小丑和长颈鹿挂在秋千上，然而几小时后到来的运送香蕉的船奇迹般地没有被狂躁的风暴打沉，船上载着年轻的日后将以鲁文·达里奥的名字享誉的诗人菲利克斯·鲁文·加西亚·萨米恩托，幸运的是，海面在四点钟的时候平静了下来，洗涤过的空气里满是飞蚁，他从卧室窗户探出头去，看到了一艘已拆下桅杆的白色小船在港口小丘的庇护中，在被风暴的硫黄净化过的午后，向右舷倾斜着，在缓流中安然行驶，他看到了后甲板上的船长正指挥着繁复的操作以向那位穿深色呢子外套和双排扣马甲的尊贵旅客致敬，他直到这个礼拜日晚上才会听说来客的名字，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向他索求难以想象的恩宠，请他陪她去国家剧院观看诗歌晚会，他眼都没眨就答应了，同意。我们在池座的混浊空气中站着等了三个小时，穿着他们在最后一刻要求众人换上的晚礼服憋闷难耐，当国歌终于奏响、我们鼓着掌转身面向有国徽标识的包厢时，那个矮胖的见习修女出现了，她戴着饰有卷曲羽毛的帽子，身着塔夫绸裙，外披垂坠的夜狐尾巴，她没有行礼便坐在了身穿晚礼服的王子旁边，那孩子捏着缎面手套，用它百合般的空荡的手指向人们的欢呼回了礼，因为他母亲对他说过另一个时代的王子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没在包厢中看到别人，但在两小时的朗诵中，我们内心都承受着他在那里的事实，都感受到了那个监视着我们的命运以免它被诗歌的无序打乱的无形的存在，在漆黑的包厢角落，他规定着爱、决定着死亡的强度与期限，没有被看到的他在那个角落里看着那

头壮实的人身牛头怪，怪物发出如海上霹雳般的声音，将他从他的座位上、从他的时刻里举到空中，未经他允许便让他飘浮在马尔斯与弥涅耳瓦那凯旋门的清亮号角声的金色巨响中，那荣耀不是他的，将军阁下，他看到了扛战旗的骁勇大力士黑色的猎犬钉铁掌的强壮战马戴粗糙羽冠的勇士的长枪长矛，勇士们抓着那面怪异的旗帜，衬托着那些不属于他的武器，他看到了凶猛青年组成的军队顶着赤夏烈日、冒着寒冬风雪，挑战着夜晚、霜寒、仇恨与死亡，为的是那个比他在做赤脚游击队员时于长时间高烧的迷妄中所梦想的那些更为伟大、更为荣耀的不朽祖国的隽永辉煌，在他于阴影中批准的地震般的掌声中他感受到了自己的可怜与渺小，他想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这才叫游行，不是这帮人给我组织的那种狗屎玩意儿，他在倦意中，在长脚蚊、金色劣质漆涂抹的柱子以及尊贵包厢颓萎的天鹅绒间，觉得自己孤独且微不足道，他妈的，那个印第安人怎么可能用擦屁股的手写出这么美的东西，他自言自语道，他因那笔下彰显出的美而兴奋异常，于是拖着他那被俘大象般的腿、和着鼓手击出的战鼓节奏走起来，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会在院中木棉凯旋门的阴影下为他念诵热情合唱团的响亮颂歌，而他会伴着那光辉声音的节奏昏昏欲睡，他会在厕所的墙壁上写下诗句，会在牛棚里母牛粪便的温热仙境中试着背下整个诗篇，就在此时，停在车库中总统汽车里的炸弹提前引爆，撼动了大地，太可怕了将军阁下，那爆炸的威力如此巨大，甚至几个月后我们还能在全城范围内找到那辆装甲汽车的扭曲碎片，本来莱蒂西娅·纳萨雷诺要在一小时之后坐着它带孩子去礼拜三的市场，所以那袭击是针对她的将军阁下，毫无疑问，于是他一拍脑门，他妈的，我怎么就没早点想到呢，他传奇般的洞察力怎么了，从几个月前开始，厕所涂鸦的矛头就已经不再指向他或偶尔指向他的某些民事部长了，而是对纳萨雷诺家族的肆意妄为或教会人员的勃勃野心有感而发，前者就要开始啃噬专为最高司令们保留的肥差，而后者则企图从世俗权

力中获取不可计量的永恒利益，他发现针对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单纯抨击已经变成了鹦鹉口中的辱骂，变成了在厕所中温和的法外之地成熟起来的表达隐秘愤恨的匿名告示，直至最后它们被传到了街上，就像从前各种无伤大雅的丑闻一样，它们是由他自己负责传出去的，只是他从来不曾也无法料到，它们竟能如此凶猛，凶猛到放了两担炸药在总统府的高墙内，这帮阴险的杂种，他怎么可能如此痴迷于那些胜利的青铜，而使他的凶残老虎的敏锐嗅觉放过了散发着古老的甜美气味的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啊，于是他紧急召集了最高司令部的成员，十四位战战兢兢的军人，在做了这么多年的平庸工作、发布了这么多年的二手令后，我们又在两寻开外见到了那位不真切的老人，他的真实存在是他的谜团中最没有悬念的，他坐在会客厅中如王位一般的椅子上接待了我们，穿着有臭鼬尿液味道的列兵军服，戴着我们在他最新的肖像中都没见过的精致的纯金边眼镜，比任何人所想象的都更加苍老与疏离，只有那双没戴缎面手套的虚弱的手除外，它们不像军人应有的手，而像哪个更年轻、心肠更软的人的手，除了它们之外，其余的一切都压抑阴暗，我们越观察就越能断定，他只剩一口气了，但那一口却是拥有毁灭力量的不可悖逆的威权之气，甚至连他自己都需要使出驯服一匹桀骜野马的力气才能控制住它，当我们尊他为无上的将军领袖并向他敬礼时，他没有开口，甚至连头都没倾一下，直到我们在摆成一圈的安乐椅上面对他坐下后，他才摘下眼镜，开始用那双观察入微的能够发现我们别有用心的负鼠藏身洞般的眼睛端详我们，他毫不留情地观察着他们，一个挨一个，用尽所需要的每一分每一秒来确认自从记忆中那个模糊的下午、那个他随手一指将他们提拔至最高位的下午开始，我们每个人有了多大改变，在这一过程中，他愈发深信那场暗杀的始作俑者就在这十四个隐蔽的敌人当中，但他同时又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是那样孤独而缺乏保护，于是他眨了下眼，微微抬了下头，规劝大家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要为国家的利

益、为军队的荣耀着想，他为他们鼓气，忠告他们要谨慎，而后交给他们一项光荣的任务，毫不手软地揪出暗杀的发动者并把他们交给军事法庭严肃处理，就这些，先生们，他结束了讲话，心里清楚发动者就是他们中的一人，或者所有人，他遭到了致命的重创，因为他不可避免地确信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生死并不取决于上帝的意志，而是取决于智慧，凭借它，他也许能将她从那个早晚会到来并且无法化解的威胁中解救出来，他妈的。他强行取消了她的公开露面，强迫她最蛮横的亲属放弃了所有可能会触及军权阶层利益的特权，将那些最明事理的任命为徒有虚名的领事，而那些最嗜血暴戾的则被我们发现漂浮在市场下水道的烂泥中，他临时出现在部长会议中空了多年的座位上，决定限制教士阶层渗入国家事务，以保证你不受到敌人的伤害，莱蒂西娅，他在做出最初的震撼人心的决定后对最高司令部进行了深入的查探，于是深信，除了总司令这个最老的伙伴外，还有七名将军对他忠心耿耿，然而他仍乏力对付剩下的六个谜团，他们拉长了他的夜晚，让他无可避免地感觉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死期已近，他们正从他双手的空隙钻进来杀她，虽然他严格地检查她的食物，因为之前在面包里发现了一根鱼刺，他测量她呼吸的空气的纯度，害怕他们在杀虫剂中掺杂毒药，他看出她在饭桌上苍白无力，感觉到她在欢爱中声音喑哑，一想到他们可能在她的饮用水里放了黑呕病病菌、在眼药水中投了硫酸，他就备受折磨，精巧的死亡阴谋在那段日子里的每一天都让他苦楚难耐，让他在半夜惊醒，因为在他逼真的梦魇中，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中了印第安人的巫术血流不止，他因为如此多想象中的危险和现实中的威胁而惶惑失措，于是命令她出门时必须带上勇猛而训练有素的可以无条件杀人的总统护卫队，但她走了将军阁下，还带着孩子，他拼命抑制着不祥的预感，看着他们上了新的装甲车，他站在天井阳台上用驱邪的手势向他们告别，乞求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守护他们吧，让子弹打在她的紧身背心上反弹出去吧，让鸦

片瘾平息吧，让扭曲的思想都被矫正吧，他一刻不停地祈祷，直到听见武器广场上传来警笛声，直到看见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沐着灯塔最初的几缕光线穿过庭院，她激动而快乐地回来了，身边的卫队成员背着为圣诞节期间的夜晚准备的活火鸡、恩维加多的兰花与彩色串灯，街上也已有圣诞夜的宣传广告，那是他为了掩盖自己的不安而命人制作的有闪亮星星的牌板，他在楼梯上迎接她，好在蓝狐尾巴的樟脑丸味的湿气里、在你病人的发绺的酸臭汗液中感受你仍然活着，他帮你把礼物送到卧室，莫名其妙地笃信自己正在享用那场他宁愿未享用的该死欢乐的最后碎片，他越是确信自己为缓解无法承受的焦虑而采取的每项措施、为帮她避灾而走的每一步都将他无情地推向那个逼近的我的不幸的恐怖礼拜三，他便越是绝望，那天他做出了重大决定，不干了，他妈的，该来就快点儿来，他决定了，而那仿佛一个爆破令，还没来得及下达完就有两个副官闯入办公室报告了可怕的消息，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被市场里的野狗撕碎了，被它们一块块地吃掉了，活活吃掉了将军阁下，但它们不是寻常的街头野狗，而是一群猛兽，有着惊悚的黄眼珠和光滑如鲨鱼的皮，是有人养来对付那些蓝狐的，六十只一模一样的狗，没人知道它们是怎么从蔬菜摊中窜出来扑到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身上的，没给我们留一点射击的机会，因为我们怕错杀了他们，因为他们仿佛与那些狗一起憋在了地狱的旋涡中，我们只看见几只手向我们伸来一晃而过，其余的身体则在一块一块地消失，我们看到了几抹转瞬即逝、难以捉摸的表情，时而恐惧、时而悲哀、时而喜悦，它们最终都陷落进了抢夺的旋涡，只剩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淡紫色毛毡帽还在图腾柱般的女菜贩那冷漠的恐惧前飘浮，她们身上溅上了滚烫的鲜血，都在祷告说我的上帝啊，如果将军不想，或者至少，如果他不知情，这事便不会发生，这将是总统护卫队永难抹杀的耻辱，因为他们一枪未放，只救回来了散落在鲜血淋漓的蔬菜上的白骨，没有别的了将军阁下，我们唯一找到的是孩

子的这些奖章、没了流苏的军刀，以及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羊皮鞋，没人知道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离市场一西班牙里远的海湾，在水上漂着，还有彩色玻璃项链、钩织钱包，这些我们现在都交到您手上，还有这三把钥匙、这枚发黑了的黄金婚戒，以及这些放在写字台上请他数算的面值十分一共五十分的硬币，没有别的了将军阁下，这是他们留下的全部东西。如果那时候他知道自己不用太多年也不用太艰难就会将那个无法避免的礼拜三的最后一丝记忆彻底抹去，那么他们留下的东西再多一点或再少一点对他来说也便无关紧要了，他愤怒地哭着，因拴在院中过夜的狗的叫声而备受烦扰折磨愤怒地吼叫着醒来，同时琢磨着我们拿它们怎么办将军阁下，他茫然自问，是不是杀了那群狗就相当于把它们肚子里的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再杀一遍，他命人推倒了菜市场的钢铁穹顶并在原地建起了一座玉兰花与鹌鹑的花园，园中安置了一座大理石十字架，它散发的光辉比灯塔的光芒更高更亮，好让后代直至时间的尽头仍记得一个被载入史册的女人，一个早在那座纪念碑被一次夜间爆炸摧毁之前便已被他忘怀的女人，纪念碑后来也无人重建，玉兰花都被猪吃了，纪念公园也沦为充斥着恶臭烂泥的垃圾场，对此他一无所知，这不仅因为他命令总统司机哪怕绕世界一个圈也要避免经过从前的菜市场，还因为自从将办公人员送到各部委的阳光玻璃楼后，他就再也没有出过门，只是和极个别留下来的公务人员生活在那栋破败屋宇内，那里依他的命令，不再留存皇后你的迫切需求的任何痕迹了，莱蒂西娅，他在空洞洞的府中游荡，不处理任何为人所知的事务，只是回复司令部偶尔的问询、为某场艰难的部长会议做最终决断，或是应付威尔逊大使居心不良的来访，大使总是在木棉的繁茂枝叶下陪伴他直至午后许久，给他带来巴尔的摩的糖果和印有女人裸体彩画的杂志，以试图说服他将领水卖给他作为巨额外债利息的抵偿，他任他一直说着，只随自己的需要装出比实际能听见的更多或更少的样子，他听着隔壁女校的学生合唱着上了色的小

鸟停在青柠檬树枝上，借此抵御对方的巧言令色，暮色初降时，他会一直陪他走到楼梯口并试着对他解释，您可以带走任何您想要的，只除了我窗外的这片海，您想想，如果现在不能像以前一样，在这个时间看到它，看到那个火焰的泥塘，我一个人在这么大的房子里该怎么办，如果没有了十二月从破玻璃窗钻进来的呼呼风声我该怎么办，如果不见了灯塔的绿光我该怎么活，我离开了我雾蒙蒙的高地荒漠去参军，在联邦战争的混乱中发高烧差点丢了性命，您要相信我这么做不是因为字典上说的爱国主义，也不是出于冒险精神，更不是说我会在乎什么上帝在他的天国践行联邦制准则，不是，我亲爱的威尔逊，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看看海，所以您还是想点儿别的吧，他说，他会在楼梯上拍拍他的肩膀与他告别，折回去时把老办公室废弃厅堂的灯都打开，其间有一个下午，他在那里撞见了一头迷路的母牛，于是便往楼梯方向轰赶它，那牲畜被地毯上的补丁绊了一下，一头栽倒滚下去，扭断了脖子，这可为麻风病人提供了乐趣和吃食，他们一哄而上想将它扯碎，这些人是在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死后回来的，再一次和盲人及瘫痪患者聚在了院中的野玫瑰丛里，一起企盼着他手中的治病之盐，他会在有星星的夜晚听见他们唱歌，会和他们一起唱起那首他荣光年代的歌曲苏珊娜来吧苏珊娜，他还会在下午五点从谷仓的天窗探出头去看放了学的女孩子，那些蓝色校服裙、齐踝短袜与发辫让他看得入迷，母亲啊，我们会被那双仿佛患了结核病的鬼魅的眼睛吓跑，他就在那些铁条间，用破手套残缺不全的手指招呼着，小姑娘，小姑娘，他会这样叫我们，过来让我摸摸你，他会一边看着她们惊慌逃离，一边想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现在的年轻人可真年轻，他会自嘲，不过又会在请私人医生卫生部长来吃午饭时与自己和解，部长每次都会举着放大镜为他检查视网膜，还会测量他的脉搏，并试着强迫他吃下一勺勺富含钙和维生素的药片好堵住我的记忆的下水道口，真是胡闹，还给我喂药，我这辈子可是除了战争期间的间日

疟，还没得过什么灾病，狗屎医生，于是孤独的桌上就只剩下他一人仍在吃，他背朝着世界，因为马里兰来的博学的大使之前告诉过他，摩洛哥的国王王后就是这么吃饭的，他遵守着那个已被遗忘的女老师的严格规定，昂着头手握刀叉，他会跑遍整座房子去找刚藏完几小时便会忘记放在哪儿了的小瓶蜂蜜，却意外地发现了那些记事本的空白页边卷成的纸卷，那是他在从前的某个时代写下的，以备日后有一天什么都不记得时仍可以什么都不忘记，他读到一张，明天是礼拜二，他念道，在你的白手绢上有一个词的首字母，一个不是你名字首字母的红色字母，我的主人，他好奇地念道，我的灵魂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看看没有你我落到了什么地步，他到处都能念到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名字，却不能明白一个人要有多么不幸才能写下那串叹息，但这些是我的字迹，是那时厕所墙上独一无二的左手书写的字体，在那里他写下了将军万岁来安慰自己，万岁，他妈的，就为了一个从修道院跑出来的女人而沦为陆海空三军将士中最软弱的一个，他曾因此而愤懑，但这怒气已彻底消散，至于那女人，眼下已如他早先判断的一样，只剩下纸条上用铅笔写下的名字而已，他甚至都不愿再碰副官们放在写字台上的东西，看都不看就命令道，把那双鞋、那些钥匙，把所有能让人想到他们的死亡画面的东西都拿走，把所有曾属于那两人的东西都放到那间他们毫无节制的午休的卧房中去，将门窗封上，他最后下令任何人不得入内，我让进都不许进，他妈的，他认为对那些狗的任何伤害都会再次令他的亡者疼痛，于是几个月来一直把它们拴在院中，夜里它们可怖的叫声令他不寒而栗，但他艰难地活了下来，在吊床上自暴自弃，愤恨得颤抖痉挛，因为他明知谁是杀害他亲人的凶手，却不得不忍气吞声，还要在自己的屋子中与他们见面，因为那时他缺乏对抗他们的力量，他始终反对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禁止吊唁性质的探望与服丧，他在那棵木棉的庇佑下，在阴凉中的吊床上躁怒地晃来晃去，等待着他的时刻到来并听我最后一个兄弟表达了

最高司令部的得意，因为民众平静有序地承受了这场悲剧，而他微微一笑，别傻了朋友，什么平静什么有序，对这些人来说，这不幸就他妈的不算什么，他将报纸翻来覆去地反复研读，希望在他自己的出版机构杜撰的消息之外，再找到别的什么，他把收音机放在手边，听着从韦拉克鲁斯到里奥班巴的每个电台对同一条新闻的播报，说军队已经掌握了刺杀发动者的可靠线索，于是他喃喃道，当然了，你们这帮狼蛛崽子，他们已经确凿无疑地认定了他们的身份，当然了，还用迫击炮包围了躲在郊区一个地下妓院里的他们，好了，他叹息道，可怜的人啊，他仍旧待在吊床上，没有流露出一丝邪恶的神色，只是哀求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给我生命让我复仇吧，别松开你的手，母亲，给我些启发吧，他深深相信祈祷的力量，因而等我们这些负责维护公共秩序与国家安全的最高司令去向他报告时，看到他已经走出了伤痛，我们告诉他已有三名罪犯在与警方的交火中死亡，另外两名被关在圣赫洛尼莫的牢房中待您处置将军阁下，他坐在吊床上说了句啊哈，手中拿着罐果汁给我们每人分了一杯，平心静气得仿佛一名出色的神枪手，并且比任何时候都更谨慎殷勤，他甚至猜到了我想抽根烟的渴望，竟然打破不许现役军人抽烟的禁忌，给了我许可，在这棵树下咱们都一样，他说道，而后便开始不带怨愤地听起市场凶案的详细报告，他们从苏格兰分批把八十二只初生的猎犬带来，其中的二十二只在驯养过程中死掉，六十只接受了一个苏格兰驯兽师邪恶的杀人训练，被灌输了一种意在犯罪的仇恨，不仅针对蓝狐，也针对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本人及孩子，借助的是这些他们一点点从民政大楼洗衣房偷出来的衣物，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这件紧身背心、这块手绢、这些短袜，孩子的这一整套制服，我们把它们展示在他面前让他确认，他却看都没看，只说了句啊哈，我们向他讲述了他们如何训练那六十只狗，尤其是在不该叫时要保持沉默，他们让它们习惯并喜欢上人肉的滋味，一连进行几年的艰苦训练，将它们关在离首都七西班牙

里的中国人的旧农场内，与外界隔绝，那里有穿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的衣服的真人大小的半身像，还有这些原版画像和剪报，用来让那些狗认识他们，我们把它们都贴在了一个相册上，好让您看清这些杂种无懈可击的活计将军阁下，不管其他人怎么样，他竟看都没看，只说了句啊哈，最后，我们对他说，凶手并不是自发行动的，当然了，他们只是一个反动兄弟会的代办人，兄弟会基地在国外，标志是这个刀与鹅毛交叉的图案，啊哈，他们都是有前科的逃犯，犯过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上过军事法庭，我们在相册上给他指出这三个已死的罪犯，图片上的他们脖子上都挂着各自的备案编码，这两个是还活着的，正在监狱里等待您不容更改的判决将军阁下，他们是茅利希奥·彭塞·德莱昂和古马罗·彭塞·德莱昂两兄弟，一个二十八岁一个二十三岁，前者是部队逃兵，没有固定工作和住所，后者是工艺美术学校的陶艺教师，见到他们俩那些狗兴高采烈、十分亲密，这一点就足以作为罪证，将军阁下，而他只说了句啊哈，然后在当天的议事表格中记录下了三名破案的警官，并在一场庄严的仪式上授予他们军功奖章，表彰他们对祖国的贡献，就在那场仪式上，他决定速战速决，即刻审判了茅利希奥·彭塞·德莱昂和古马罗·彭塞·德莱昂两兄弟，并宣布处以死刑，四十八小时之内执行枪决，除非您能开恩将军阁下，您说了算。他一直孤独而出神地待在吊床上，对全世界要求赦免的呼吁无动于衷，他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国际联盟毫无成效的辩论，听到了邻国的谩骂和一些遥远国家的声援，他同样仔细地听了部长们的看法，他们有的委婉地支持网开一面，有的尖锐地陈述应当严惩不贷，他拒绝接见带着罗马教皇私人信函前来的使节，信中表达了教皇对那两只迷途羔羊的命运的关切，他听说全国的秩序因他的沉默而紊乱，他听见了遥远的枪声，感受到了大地因一艘停泊于海湾的战船无来由的爆炸而震动，十一人死亡将军阁下，八十二人受伤，船只报废，同意，他一面说着，一面从卧室窗口望向海湾燃烧的夜火，与此同时，那两个

死刑犯在圣赫洛尼莫基地灼热的圣堂内开始他们的最后一夜，他在照片上看到了他们遗传自同一位母亲的竖立眉形，于是想到了他们，想到了死亡狱室里永远亮着的灯盏下、颈上挂着相连两个号码牌的颤抖而孤独的他们，他感觉他们正想着他，知道他在被需要、被哀求，但惯常地重复了生命中的又一天后，他没有做任何会模糊自己意志方向的微小动作，他与侍从道了别，后者将通宵守在卧室前，时刻准备传达他在鸡鸣前下达的口谕，他经过时向他道了声晚安，上尉，但没有去看他，他将灯挂在门楣上，锁上那三把门环、三道门闩、三个插销，趴着沉入了一个警觉的梦，透过它脆弱的薄墙，他仍能听到院中群狗焦渴的叫声、救护车的警笛声、鞭炮声，以及在这个被严酷的判决搅得人心惶惶的城市的空气中飘荡着的一场可疑欢庆会的阵阵乐声，他在大教堂十二点的钟声中醒来，在两点时又一次醒来，在三点前打在窗户铁栅上的噼啪的雨声中再一次醒来，于是他以阉牛的姿势艰难地从地上起身，先抬起臀部，而后是前腿，最后是那颗茫然的、下唇上挂着一线口水的脑袋，随后他下了第一道命令，让安保官员将那群狗带到我听不见它们叫声的地方去，由政府负责照顾，直到它们自然死亡，第二道命令，他赋予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的卫队士兵无条件的自由，最后一道命令，一得到我这条不得上诉的最高指示就立即执行茅利希奥·彭塞·德莱昂和古马罗·彭塞·德莱昂两兄弟的死刑，但地点不是人们预想的枪决墙前，而是已废弃的五马分尸刑场，两人的肢体将被带到他过去浩瀚的沉重王国里最显眼的地方，曝于公众的激愤和恐惧之中，可怜的小伙子们，他一边拖着自己如受重伤的大象的脚掌般硕大的双脚，一边愤懑地哀求，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帮帮我吧，别松开你的手，母亲啊，让我找到那个能帮我报这无辜血仇的人吧，一个他在怨恨的谵妄中想象出的上天注定的人，他带着不可遏止的渴求在眼皮底下找寻着他，他试着在声音最纤细的痕迹中、在心脏的搏动中、在回忆里最被忽视的罅隙中发现躲藏着的

他，当他已不再指望能找到他时，却发现自己被我亲眼见过的最耀眼最高傲的人吸引住了，母亲啊，他好像从前的那些哥特佬一样，身着亨利·普尔牌上装，扣眼中插一枝栀子花，搭配派克维的裤子，外套一件泛着银光的锦缎马甲，散发着自然的优雅气质，并用皮带牵着一只有人类眼睛和牛犊身形的沉默的杜宾犬，在欧洲最难跻身的沙龙中大放光彩，在下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愿为阁下效劳，他自我介绍道，他是被联邦考迪罗扫除的我们的贵族阶层所遗留的最后子嗣，这一阶层连同他们贫瘠的伟大梦想、他们空阔而忧郁的豪宅与他们的法语口音，都被从这国家的脸面上扫除了，他是这个族群的绚烂尾声，除了三十二岁的年龄、七种语言以及在多维尔保持的四项射鸽比赛的纪录之外，他别无所有，他身形颀长而结实，皮肤呈铁色，混血人的头发梳成中分，其中一绺染成白色，两线薄唇透着永不屈服的毅力，有着天佑之人的果敢眼神，他握着樱桃木手杖在宴会厅田园春色的哥白林织毯前装出打板球的样子，让人为他照彩色相片，在看到他的那一刻，他松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就是他，于是就是他了。他投入了工作，并附以简单的承诺，您先支付我八亿五千万并允许我不用向任何人报账，除阁下您之外，我不再听命于任何人，两年之内我会向您交出杀害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及孩子的真凶的脑袋，他接受了，同意，在将权力之匙交到他手上之前，他让他经历了多场艰难的考验，以观察他精神的险境、他意志的局限、他品性的瑕疵，确证了他的忠诚和效率，在最终考验他的残酷的多米诺骨牌局上，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展示出了无所畏惧地擅自战胜他的魄力，于是他赢了，他是我亲眼见过的最大胆的人，母亲啊，他的耐心没有死角，他什么都知道，懂得七十二种煮咖啡的方法，分得出海贝的性别，读得懂乐谱和盲文，他会站在那儿盯着我的眼睛，也不说话，而面对他坚毅的脸庞、他懒懒地拄着樱桃木拐杖的双手、他无名指上戴着的晨水石，面对躺在他脚边的那只大狗，那只裹在天鹅绒般的睡着

了却有生命的皮肤中警醒而凶狠的狗，面对他那副对柔情与死亡免疫的身体，那副我见过的最俊美最自制的男人的身体所散发出的浴盐香气，我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这时他鼓足勇气对我说，若不是出于义务，我不会当兵的，因为那些军人都是和您完全相反的人，将军，他们的野心很肤浅，一会儿就没有了，相比权力，他们对管事更感兴趣，他们不为某件事服务只为某个人干活，因此，想利用他们太容易了，他说，尤其是用其中一些人去对付另一些，我知道在那个人面前隐瞒不住自己的想法，于是只好笑了笑，他给了他继我的兄弟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愿他已安坐于上帝右侧的圣位——之后在他的统治下无人能及的权力，他使他成为他的私人帝国中一个秘密帝国的绝对主人，那是一项执行镇压与灭口任务的隐形工作，不仅没有一个官方身份，甚至让人难以相信它的真实存在，因为无人负责它的行动，它连个名称、连个在这世上的落脚地都没有，然而它的确是一个可怖的事实，在最高司令部确认它的由来与深不可测的性质之前，它便早早地被诉诸恐怖手段并且凌驾于国家的其他镇压机构之上，即便您自己都没有预见到那台恐怖机器的作为，连我自己都不怀疑在他接受协议的那一刻，我便开始任由那个穿得像王子一样的野蛮人不可抗拒的魅力、任由他欲望的触角摆布，他给总统府寄来了一个龙舌兰叶编织袋，像是塞满了椰子，于是他命人将它拿到那边不碍事的地方，放进一个嵌入墙内装满资料的文件柜中，而后就把它忘记了，三天之后，府中便无法住人，牲畜尸体的腐烂味道穿墙而出，散着恶臭的水雾污染了镜面的光泽，我们去厨房寻找那臭气，在牛圈中也闻到了它，我们用薰香驱赶办公室里的味道，但它又散进会客厅去与他们碰面，它满溢着腐烂玫瑰的臭味渗入最隐蔽的缝隙，即便在当年的瘟疫时期夜晚空气中的种种香味里藏匿的疥疮那最细微的气息都无法钻入那里，事实上它在我们最不会去寻找的那个似乎装着椰子的口袋中，那是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按协议寄来的第一批成果，是六颗分

别附有死亡证明的头颅：石器时代的盲人显贵堂内波穆塞诺·埃斯特拉达的头，九十四岁，仅剩的一名经历过大战的老兵、激进党派创始人，据附加证明所述，他于五月十四日死于老年性衰竭，内波穆塞诺·埃斯特拉达·德拉富恩特医生的头，前者之子，五十七岁，顺势疗法医师，据附加证明所述，于他父亲死亡的当天死于冠状动脉血栓，埃利埃塞尔·卡斯托尔的头，二十一岁，人文科学学生，据附加证明所述，因在食堂里的一场斗殴中被利器刺伤多处，不治身亡，莉蒂瑟·圣地亚哥的头，三十二岁，地下活动家，据附加证明所述，因非法堕胎而亡，洛克·宾松的头，绰号无影者哈辛托，三十八岁，彩球制造者，于前者死亡当天因酒精中毒而亡，最后是纳塔利西奥·路易兹的头，十月十七日秘密运动的秘书，三十岁，据附加证明所述，因情场失意用手枪射穿上腭而亡，共六个，他一边在臭气与惧意的搅扰下火冒三丈地签下相应的收条，一边想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这个男人是头野兽，光看他那神秘的气息和扣眼上的花朵，谁能想象得到呢，他命令道，别再给我送肉来了，纳乔[3]，有您的一句话就够了，但萨恩斯·德拉巴拉反对说，那是君子之约，将军，如果您没有胆量直面真相，那就拿回您的金子吧，咱们还和从前一样是朋友，这算什么事儿，为了比这少得多的钱，他甚至连自己的母亲都能枪毙，但他没说出口，这倒不至于，纳乔，他说，尽您的责任去吧，于是一颗颗脑袋就这样被装在那些晦暗的像装了椰子的龙舌兰叶编织袋中滚滚而来，而他则会恶心得反胃，一边命人把它们拿得远远的，一边阅读详细的死亡证明以便签署收据，同意，在签下第九百一十八个他最激进的敌对者头颅的收条的夜晚，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仅有一根指头的动物，在潮湿的水泥平原上留下一串指印，他带着苦涩的胆汁醒来，摆脱清晨的不悦，在挤奶棚有酸臭回忆的粪坑中数算着脑袋的数量，他深深地沉浸在他老年人的思绪中，以致混淆了鼓膜的嗡鸣与腐烂草

叶上昆虫的叫声，他想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已经这么多脑袋了，怎么会还不见那些真凶的，但萨恩斯·德拉巴拉让他注意到，每六个脑袋都会制造出六十个敌人，每六十个都会制造出六百个，之后是六千个，再之后是六百万个，整个国家，他妈的，咱们永远都搞不完了，但萨恩斯·德拉巴拉无动于衷地回应说，您安心睡吧将军，等他们都完蛋了咱们也就搞完了，真野蛮啊。他从未有一刻犹疑，从不留一丝余地，他倚仗着那只永远待命一旁的杜宾犬的隐秘力量，虽然他在初次会面时便试图将它拒于门外，但它还是成为他们会面的唯一见证者，当时他看到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拽着那只神经躁动的动物，它只听从于那个我的双眼所见过的最潇洒英俊但也最不讨人喜欢的人那深微的控制，把狗留在外面，他命令道，但萨恩斯·德拉巴拉回答他，不，将军，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是我能进而科赫尔勋爵不能进的，于是它就进来了，它会一直趴在主人脚边睡觉，而他们二人则会按惯例计算被砍下的脑袋数目，当计算变得艰难时，它会带着令它呼吸困难的焦虑立起身来，它的女性的眼睛搅扰我思考，它的人类的气息让我不寒而栗，当他看到袋中有一颗脑袋是他过去的侍从同时也是多年的多米诺骨牌牌友的，便愤怒地一拍桌子，此时我看到它直起身子，鼻头喷着气，发出高压锅振动的声音，他妈的，这乱摊子就到这儿了，但萨恩斯·德拉巴拉每次都能说服他，主要并不在于他有理有据，而是因为他那野狗训练师的温柔的严酷，他斥责自己竟对这世上唯一敢待他如臣子的人这般顺从，那个人可是在以一己之力反抗他的帝国，于是他决定摆脱正在一点一点填满他威权空间的奴性，这乱摊子就到此为止了，他妈的，他说，说到底，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把我生下来不是要让我领受而是让我发布命令的，然而这夜间所下的决心在萨恩斯·德拉巴拉进入办公室的那一刻就立即崩塌了，他那温和的姿态那天然的栀子花那纯净的声音那芬芳的浴盐那祖母绿的皮带那石蜡般的拳头那宁静的手杖那庄重的美，这属于我的双

眼所见过的最令人爱慕又最教人无法容忍的男人的炫目的一切让他屈服，不至于这样，纳乔，他再次向他重申，尽您的责任去吧，然后继续收着那一袋袋的脑袋，继续看都不看就签下收据，他无可救药地陷入了他权力的流沙，在每个清晨每次路过每片海时都问自己这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马上就要十一点了，这栋坟墓似的房子里怎么一点生气都没有，有人吗，他问道，只有他，我在哪儿，为什么找不到自己了，他说道，那群赤脚勤务兵在哪儿，他们会挤在走廊上从驴子身上卸下蔬菜和鸡笼，我的妾侍们的污水坑在哪儿，她们满嘴秽语，会用新鲜花朵换下过夜的花，会清洗鸟笼，会在阳台上伴着枯枝敲打地毯的节奏唱着苏珊娜来吧苏珊娜，我想拥有你的爱，我那些瘦弱的七个月的早产儿在哪儿，他们会在门后大便，会往会客厅的墙上撒尿画骆驼，我的那群喧闹的官员怎么了，他们会在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母鸡在下蛋，我的妓女和士兵怎么了，他们会在厕所里来来往往，我的躁动的流浪狗怎么了，它们会边跑边向外交人员吼叫，谁又把我的瘫痪患者赶下了楼梯，把我的麻风病人轰出了玫瑰丛，又让我勇敢无畏的谄媚者从所有地方消失，他在重新组建的私人护卫队的紧密包围中隐约瞥见了他最高司令部的最后几位朋友，他们几乎没有给他参与新内阁会议的机会，这些内阁成员是应一个人但不是他的要求重新任命的新部长，有六个穿尖领丧袍的文科博士，他们会比他先有想法，不向我询问就擅自处理政务，可是说到底，我就是政府啊，但萨恩斯·德拉巴拉无动于衷地向他解释，您不是政府，将军，您是权力，他厌倦了熬夜打多米诺骨牌，因为尽管是和最老练的好手对阵，尽管他费尽心思为自己设下最高明的陷阱，都输不了哪怕一局，他必须屈从于那些在他吃饭前一小时就将他的食物糟蹋掉的试吃官的计划，他在储藏蜂蜜的地方再也找不到它们，他妈的，这不是我想要的权力，他抗议道，但萨恩斯·德拉巴拉回应他说，没有别的权力，将军，这是死亡的迷睡中唯一可能拥有的权力，那迷睡一度是他的礼拜日市场般的天

堂，而此时他已无事可做，只能等着四点一到收听本地电台每日连播的乏味的爱情故事，他会在吊床上听着，手里拿一杯一口未喝的果汁，飘浮在悬吊的空虚中，泪眼朦胧，焦急地想知道那个年轻的女孩会不会死，萨恩斯·德拉巴拉查清楚后说，是的将军，那女孩要死了，让她不要死，他妈的，他命令道，让她活到最后结婚生子然后变老，像所有人一样，于是萨恩斯·德拉巴拉修改了剧本以博他欢心，让他以为自己还大权在握，于是遵照他的命令没有人会死，为了让将军阁下高兴，不相爱的情侣结婚了，前几集中被埋葬的人物复活了，恶棍提前献身了，所有人都听从他的命令开心幸福，这样一来，生命对他来说便显得不那么没有意义了，当八点的金属敲击声响起时他会检查一遍宅子，会发现有人抢在他前面将母牛的饲料换过了，总统护卫队营地的灯已经熄了，公务人员入睡了，厨房齐整，地板洁净，用克勒奥林擦得不留一丝血迹的屠宰桌透着股医院的味道，虽然只有他才有那串钥匙，但已经有人将窗户的插销插上了，将办公室的门也都锁上了，从第一门厅直至他的卧室，那一盏一盏灯在他按开关之前就灭掉了，他拖着他那被囚禁的君王的笨重双脚在黑暗中走着，路过一面面晦暗的镜子，唯一的一个马刺上裹着天鹅绒套，以免任何人追踪他那星星点点的金色行迹，他在经过那些窗口时望着同一片海洋，一月的加勒比，他脚不停步地欣赏了二十三遍，在一月里它始终如一片绚烂的沼泽，他向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房间探进身去，想看到她留下的蜜蜂花、死鸟的笼子与族母长在其上度过腐烂晚年的痛苦床榻都还在原来的位置，愿您晚安，他喃喃道，同以往一样，尽管早就没有人回应他，愿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孩子，在上帝的佑护下睡吧，他提着用来逃命的灯向自己的卧房走去，这时突然感受到了阴影中科赫尔勋爵的瞳孔里那骇人炭火的寒意，他闻到一阵男人的香气，感受到了他的操控力的分量和他的鄙夷中的慑人光辉，是谁，他问道，虽然他知道是谁，是穿着礼服的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来提醒他，这是

一个历史性的夜晚，八月十二日，将军，一个伟大的日子，我们都在庆祝您上台执政的第一个百年纪念日，所以世界各地的宾客都慕名而来，因为哪怕是寿命最长的人，一生也不可能参加类似的盛事超过一次，举国都在庆祝，只有他除外，尽管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坚持让他在他的人民的呼喊与激昂中度过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他却比以往都更早地锁上了卧房的三把门环、三道门闩、三个插销，趴在光秃秃的砖面上，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裹着绑腿，戴着金质马刺，右臂弯在脸下当作枕头，一如我们将找到的那个被兀鹫啄食、被深海动物和花朵覆盖的他，透过安眠药水瓶滤嘴上的氤氲，他感觉到了没有他的庆典上那遥远的爆竹，感觉到了欢快的音乐、喜乐的钟声和仿如烂泥洪流般的人群，他们都来颂扬一份不属于他的荣耀，而他并不太感伤，只是痴迷地呢喃着，我的命运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已经一百年了，他妈的，已经一百年了，时间是怎么过去的啊。

---

[1]即以马内利，意为“天主与我们同在”。

[2]希腊神话中被宙斯赋予了神奇魔力的一只羊角，能生出各种美味佳肴。

[3]伊格纳西奥的昵称。

他就在那里，虽然那也许并不是他，却仿佛就是他，躺在宴会厅长餐桌上的鲜花中，带着死去教皇的女性光彩，这样的光彩让他在他第一次的死亡展示仪式上没有认出自己，那个死了的他比活着的他更可怖，一只填充着棉花的缎面手套放在胸口，胸前别满他无畏的谄媚者杜撰的巧克力战争虚假胜利的勋章，身上是奢华的晚会制服，腿上裹着漆皮绑腿，戴着我们在府中找到的唯一马刺，还有那十枚宇宙将军的悲凉太阳的徽章，那名号是最后一刻强加在他身上的，为了给他一个比死亡更高的级别，以死后新身份出现的他如此切近、清晰，令人终于能对他的真实存在深信不疑，虽然事实上没有人比那具玻璃棺中的尸体更不像他、没有人比它更像他的对立面，那尸体直至半夜仍在炽热棺盒的狭小空间内受着慢火煎熬，而在隔壁的政府议会厅内，我们正一字一句地讨论着那则无人敢相信的消息的最终通告，这时一辆辆卡车的噪声唤醒了我们，车上载着全副武装的部队，他们的秘密巡逻队自清晨起就占领了公共建筑，有的匍匐在商业街拱廊下的地面上做好了射击准备，有的藏在门厅中，黎明时分我推开自家的阳台门想找个地方摆放刚从院中剪下的湿漉漉的石竹时，看到他们正在总督区的一个个屋顶平台上架起三脚架机枪，看到阳台下方有一支由中尉指挥的巡逻队正在商业街上逐个命令几家已经营业的商店关门，今天是全国休息日，中尉喊道，这是最高指示，我向他们扔下一枝石竹，问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到处都有这么多士兵这么多枪炮声，那名军官从空中接住石竹，回答说，你自己想吧小姑娘，我们也不知道，可能那死人又活了吧，他说着大笑起来，没有人敢想发生了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恰恰相反，我们认为那是他在多年的淡泊之后重新抓起了他威

权的缰绳，并且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在玻璃球再次亮起的权力之屋中又一次拖动他那双虚幻君王的大脚，我们认为就是他放出了那些母牛，它们走在武器广场上，踢踏着铺路石的裂缝，广场上垂死棕榈树的绿荫下坐着那位盲人，他因为分辨不清牛蹄与军人靴子的声响，放声背诵着讲述远道而来战胜死亡的幸福骑士的诗句，还将手臂伸向那些习惯了上下楼梯去进食因而爬向音乐亭吃凤仙花花环的母牛，它们在头顶野山茶花冠的缪斯残躯和挂在国家剧院废墟中的里拉琴上的长尾猴间住了下来，因口渴难耐，它们伴着广藿香花盆嘈杂的破碎声闯进了总督区房屋门厅中的阴凉，纷纷把快要冒烟的嘴浸入天井庭院的池塘，但没有人敢打搅它们，因为我们认出了它们与生俱来的总统烙印，母的在臀部，公的在颈部，它们是碰不得的，连那些士兵在商业街的狭窄路段都会为它们让路，那条街昔日那地狱般的摩尔集市的喧嚣已不复存在，只剩下滚烫沼气池中满是碎烂肋条和杂乱桅杆的垃圾堆，当年我们还有海的时候，那里曾是一个公共市场，轻便船会停靠在菜摊旁，余下的一处处空地在荣光年代则是印度人的市集，不过印度人都走了，他们甚至没说声谢谢将军阁下，于是他吼道，他妈的，因暮年最后的怒火而茫然失措，滚蛋，都给英国人擦屁股去吧，他吼道，所有人都走了，在他们原先的地方又冒出卖印第安人护身符和蛇毒解药的摊位以及卖唱片的疯狂小店，小店后屋还出租床位，当士兵用枪托砸毁它们时，大教堂的铁钟敲响了哀痛的讣告，一切都在他消亡前消亡了，我们已在没有希望的守望中耗尽了最后一口气，我们曾希望那一再流传却永远被澄清的说他终于没能抵挡住某一种帝王疾病的传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现实，然而现在，我们却不相信它居然发生了，倒并不是因为我们真的不相信，而是因为我们不再希望它成真，到头来我们已不清楚没了他我们会怎样，不清楚在他死后我们的生活会怎样，我无从想象一个没有了那个男人的世界，他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带给我幸福，而且之后再没有谁能带给我那种感觉，那是很

久以前的下午，我们会在五点放学，他则会趴在牛棚的天窗口一边窥看那些穿着蓝色水手服、麻花辫垂在背后的女孩，一边想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在我的年纪看来，女人是多么美啊，他会叫我们，我们会看到他颤巍巍的双眼，还有那只手，戴着手指处破了洞的手套，像摇铃铛一般摇着福布斯大使的糖果，试图引诱我们，所有女孩都吓跑了，所有人，但不包括我，我趁着没人看见，独自留在学校外面的街上试着去够糖果，于是他抓住了我的手腕，仿佛老虎一般给了我温柔一爪，一点都没弄疼我，而后把我举到空中，又从天窗口抱了进去，动作那样小心，没有把我的衣服弄出一丝皱褶，他把我放在被陈年尿液染香的饲草上，试着告诉我一些他那干涸的口说不出的东西，因为他比我还要惊恐，他颤抖着，从他的上衣能看到他心脏的跳动，他面色苍白，眼里满是泪水，在我整个流亡生涯中再没有一个男人为我流过这样的眼泪，他静静地抚摸着我，缓缓地呼吸着，用我永不会再遇到的男人的温柔探索着我，他使我胸脯的花蕾绽放，他的手指从我内裤的边缘探进，沾染上某种味道，他让我闻，闻闻，他对我说，这是你的味道，他无须再借助巴尔德里奇大使的糖果便能让我从牛棚的天窗钻进去，去和那个内心健康而感伤的男人共度我青春岁月的幸福时光，他会带着一袋食物在饲草上等我，会用面包擦去我最初的少女的酱汁，会在吃东西前先把它们放进那里，喂我吃下，会把嫩芦笋放进我那儿，用我咸味的体液腌制，真鲜美，他对我说，你的味道像港口，他会幻想将我的肾脏放在他自己含氨的汤水中烹煮享用，放上你腋下的盐，他幻想着，加上你温热的尿液，他从脚到头将我肢解，用石盐、辣椒、月桂叶为我调味，把我放入我们没有未来的爱情那些瞬息即逝的傍晚的炽烈锦葵色中用慢火炖煮，他会从脚到头舔舐我，怀着热望和老人的慷慨，那是我在那么多男人中再也没有找寻到的，那些人急躁又吝啬，在我那没有他的余生中尝试着爱我却做不到，而他会在爱的缓慢消化中，一边和我一起推开想来舔我们的牛

嘴，一边跟我谈谈他自己，他告诉我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全身上下甚至连睾丸都是将军阁下的，他说这话时并不苦楚，也没有来由，仿佛在自言自语，仿佛飘浮在一片唯有惊叫方能打破的内在阒寂里无止歇的嗡鸣声中，没有人比他更殷勤更博学，没有人比他更男人，他变成了我十四岁时活着的唯一理由，那一年，两个最高军衔的军人出现在了我父母家，他们带着满满一箱多卜隆纯金币，在半夜把我和全家人都塞入了一艘外国船，并命令我们不得回国，直到他的死讯在全世界炸开，他死了却不知道我为他耗尽了余生，我为了找寻比他更好的人和街上的陌生人睡觉，我回来了，苍老痛苦，拖着这群孩子，虽然是与不同男人生的，我却幻想都是他的，而他则在没有看见她从牛棚天窗钻入的第二天起就把她遗忘了，此后每天下午，他都会找不同的人来代替她，因为那时他已经不太能够分辨那群衣着一样的女学生里谁是谁了，当他用拉姆菲梅耶尔大使的糖果招引她们时，她们会冲他吐舌头，对他嚷大老粗，他叫她们的时候并不加以区分，也不会问今天的这个与昨天的那个是否是同一人，他对她们一视同仁，躺在吊床上想着她们时也仿佛想的是一个人，在这半梦半醒间，他会听着施泰姆伯格大使永远不变的论调，之前他送了他一只听筒，长得和印着那只狗的他主人的声音[1]的听筒一样，附带一个电子扩音装置，为的是让他再听一遍他所坚持的狂妄，要拿走我们的领水作为外债抵押，而他还是重复着原来那句话，门儿都没有，亲爱的史蒂文森，什么都行只有海不行，他关掉助听器，拒绝再听到那电子生物的尖厉声音，因为它像是一张唱片换了面，又一次向他讲解起我自己的专家已经向我直截了当地坦陈过很多遍的情况，咱们已经分文不剩了将军阁下，咱们已经耗费掉了最后的资源，自独立战争以来连续百年为抵押外债而申请的贷款以及用来支付滞纳金利息的借贷已经把咱们榨干了，总是在拿东西去抵啊将军阁下，开始是让英国人垄断金鸡纳

和烟草，而后是让荷兰人垄断橡胶和可可，再之后是让德国人租借高地荒漠铁路和水运通航，按照秘密协议，所有东西都给了外国佬，但直到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愿上帝将他置于地狱深壑，受盆中烈火煎烤——轰然垮台、当众死亡之后他才得知这些协议，咱们什么都不剩了，将军，自艰难时期开始，他就听他每一任财政部长讲过同样的话，那时他宣布延期履行与汉堡银行家签订的协议，致使德国舰队封锁了港口，英国装甲舰发射了一枚警告性炮弹，将大教堂的钟楼炸出了一个窟窿，但是他喊着，我要在伦敦皇帝身上拉屎，宁可死也不能卖，他喊道，去死吧恺撒，最后关头，是他的多米诺骨牌牌友查尔斯·W.特莱克斯勒大使出面调停救了他，后者的政府为这些与欧洲人签的协议进行担保，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我们地下资源的永久开发权，自那时起，我们便连身上的内裤都是欠人家的了将军阁下，但他却始终会在下午五点把大使送至楼梯口，在他肩上拍一下以示告别，门儿都没有亲爱的巴克斯特，我宁愿死也不能没有海，他被这座墓地般的宅子的凄凉压垮了，自邪恶时期之后，自从我错用了那个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而任他砍掉所有人的脑袋却愣是没有砍掉他该砍的主使暗杀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的人的脑袋起，人们在这所宅院中便畅行无阻，好似在水下一般，笼中鸟雀也拒绝歌唱，无论他往它们的喙中滴多少润喉剂都无济于事，隔壁学校的女孩也不再于课间休息时唱上了色的小鸟停在青柠檬树枝上，他的生命在焦灼的等待中逝去，等着与你在牛棚中共度的时光，我的孩子，还有你果壳般的乳头和那里的小蛤蜊，他会在三角梅花廊中独自吃饭，会在午后两点地面蒸腾的热气中飘浮，打着瞌睡却抵抗着困意，只为了不错过电视上放的电影的线索，一切都依他的命令进展并与世事完全相悖，因为那无所不知的功勋卓著者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打从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的时代开始，我们就专门为他安装了一部播放小说的个人电台发射机，而后是一套闭路电视系统，

放送只有他能看到、依他的喜好编排的电影，其中只有恶棍会死，爱情会战胜死亡，生命短如一瞬，我们用欺骗让他幸福，幸福得堪比他晚年与穿校服的女孩一同度过的那么多个下午，如果他没有不幸地去问其中一个女孩问题，她们本将会一直满足他直至他死去，可他问她在学校他们都教你些什么，于是我回答道，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没教，先生，我其实是港口的妓女，他让我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仿佛没读懂我的唇语，于是我从头到尾重复了一遍，我不是学生先生，我是港口的妓女，卫生部门的人用克勒奥林和丝瓜瓤为她洗了澡，让她穿上这身水手制服和这双好女孩的短袜，每天下午五点走过这条街，不光是我，所有我这个年龄的妓女都被负责卫生的警察召去清洗了一遍，所有人都穿着一样的制服和一样的男鞋，扎着一样的马尾麻花辫，您看，把头发散下来再用一个发卡束上去，他们告诉我们不要害怕，那是个可怜的傻老头，他都不会让你们躺下，只会像医生一样用手指给你们检查身体，吸吮你们的乳房，把食物放入私处，总而言之，就是我过来后您对我做的所有事情，我们只需要把眼睛享受地闭起来说着亲爱的亲爱的，就像您喜欢的那样，他们给我们讲了这些，甚至还让我们从头开始彩排了一遍，才付了我们钱，但我觉得这破事儿做得太过分了，要在前面塞那么多的熟香蕉，在后面塞那么多的半熟海芋，就为了扣完卫生税和士官佣金后剩下的那抠抠缩缩的四个比索，他妈的，一个人上面还没的吃呢就把食物糟蹋在下面，这不公平，她在那个深不可测的老人阴郁的目光中说道，他目不转睛地听着，心想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个惩罚，但他丝毫没有表露出自己的哀伤，只是拼命进行各种秘密调查，最终发现民政大楼隔壁的女校很多年前就被关闭了将军阁下，由教育部部长本人提供资金，依照大主教及家长委员会的建议，在海边修建了一座三层楼的学校，去了那里，豪门千金便可以摆脱那迟暮引诱者的埋伏，后者那仰卧在宴会长桌上的如搁浅鲱鱼般的身体正在我们没有了他之后的第一

缕曙光中、在遍布月球火山口的地平线上那抹黯淡的锦葵色的映衬下显现出来，在雪白的百子莲间，他为万物所庇护，并且终于从他的绝对权力中解脱出来，多年的相互囚禁令人不可能分清在那座活总统们的墓地中，谁是谁的受害者，他们把它的内外墙都涂成了坟墓的白色，也不来问问我的意见，他们都没认出他来，还命令他别从这儿过先生，您会把石灰弄脏的，于是他便不从那儿过了，您留在楼上吧先生小心脚手架从上边掉下来砸到您，于是他便留在了楼上，在木工制造的嘈杂声和泥瓦匠的怒气中不知所措，那些泥瓦匠还会冲他大嚷滚开老笨蛋，你会把混合涂料都毁掉的，于是他便走开了，在那艰难的几个月里未与他商量就进行的装修中，他们新开了几扇迎着海风的窗户，而他则比士兵更顺从，比任何时候都更孤独，有卫队严密地警戒，但仿佛不是在保护他而是在监视他，他们会吃下他一半的食物，以免有人投毒，会转移藏起来的蜂蜜，为他戴上金质马刺，就像给斗鸡戴上那样，免得走路时叮当作响，他妈的，一连串牛仔的伎俩，都能让我的兄弟萨图尔诺·桑托斯笑死，他任凭十一个穿夹克系领带的野蛮人摆布，他们会整日演练日本杂技，移动一台有红绿灯的机器，当五十米内有人携带武器时，灯便会闪烁，而我们像逃犯一样坐着七辆一模一样的车前行，这些车总在相互赶超换位，因此连我都不太清楚自己坐的是哪一辆，他妈的，那真是无用功，就像拿弹药打兀鹫一样，因为当他把薄帘拨开想看看戒严多年之后的街道时，发现没有人会注意总统加长灵车车队正悄然经过，他看到了部长们那如悬崖般耸立的阳光玻璃楼建得比大教堂的钟楼还高，遮住了港口高岗上彩色的黑人棚屋，他看到了一队巡逻兵涂抹着前不久用粗油漆笔刷上的标语，于是问他们原来写的是什么，他们回答说，崭新祖国的建立者永享荣光，不过他知道那是谎话，当然是，否则他们根本不会抹掉，他妈的，他在原先是泥潭的地方看到了一条宽阔的椰林大道，大约六个车道宽，伴着一排一排延伸至海边的花坛，他看到郊区有一座座竖着

相同的罗马柱廊的别墅，还在从前是公共市场垃圾堆的地方看到了带亚马逊花园的酒店，他看到了市区高速路蜿蜒的迷宫中龟速爬行的汽车，看到了正午的酷热中向阳的人行道上挤挤挨挨的粗俗人群，而另一侧人行道上只有擅自收取在阴凉下行走税却没有生意的税收员，但这一次，没有人因总统加长轿车中冰棺内隐秘权力所预示的东西而震惊，没有人认出那失落的双眼、焦渴的双唇和那只在喧嚷的叫卖中无依无靠、茫茫然缓缓挥别的手，沿街有卖报纸和护身符的，有冰激凌小车、三数彩彩票的旗帜，有街巷世界的日常喧嚣，它离那个孤独军人内心的悲剧很远，他怀着乡愁一边叹息一边想，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我的城市怎么了，那条净是没有丈夫的女人的悲惨街道在哪儿，她们会在傍晚时裸着身子出去买蓝色的北美乌鱼和粉色的鲷鱼，还会一边和卖菜的妇女争吵骂娘一边把衣服晾在阳台上，那些会在小铺门口大便的印度男人在哪儿，他们那面色苍白、会唱令死亡都动容的哀歌的妻子在哪儿，那个因违抗父母之命而变成南蝎的女人在哪儿，那些雇佣兵的酒馆、他们发酵了的尿液溪流以及街角日复一日不变姿态的白鹈鹕在哪儿，突然间，啊，港口，如果它原来在这儿那它现在在哪儿，那些走私贩的轻便船只去哪儿了，那些载着步兵登陆的破铁船去哪儿了，我的大便味道去哪儿了，母亲啊，这世界发生了什么，怎么不再有人认得这只被遗忘的情人一晃而过的手了，它透过一列首次运行的火车飞速掠过的玻璃窗，沿路留下一串无谓的告别的痕迹，那列车呼啸着穿过一畦畦播撒了香菜种子的土地，那里曾是一片栖居着声音尖厉、患有疟疾的群鸟的水稻田，穿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蓝色牧场，惊动了有总统烙印的牛群，在挂着教会天鹅绒、驶向我无可挽回的命运的安魂车厢内，他一直问着自己，我的四只脚的老车在哪儿，他妈的，我的被森蚺缠绕的树枝和毒凤仙、我的喧闹的长尾猴、我的天堂鸟、整个国家与它的蛟龙都在哪儿啊，母亲，如果那些沉默寡言的印第安女人从前在这里，那她们现在在哪儿呢，当年她

们会戴着英国帽子，从车窗口往里面贩卖糖做的小动物，贩卖土豆，母亲啊，贩卖半生不熟的黄油烧鸡，就在那鲜花拼就的功勋卓著者永享荣光的拱形标牌之下，尽管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在哪儿，只要他一抱怨这逃犯的生活还不如死，他们就会回答他不，将军阁下，这是有序的和平，他们这样对他说，他终究会接受，同意，并再一次头晕目眩地折服在让我远离母亲的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的人格魅力之下，他曾那么多次在失眠的怒火中辱骂他、唾弃他，然而一旦面对他披着阳光走进办公室时洋溢的魔力，他又会屈从退让，他会牵着那只有着人类眼神的狗，甚至在小便时都不会撇下它，而且它还有个人类的名字，科赫尔勋爵，于是又一次地他背叛了自己，顺从地接受了他的方案，没关系，纳乔，他批准了，尽您的责任去吧，于是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重新全权执掌了刑讯工厂，它设于距离总统府不足五百米的一栋殖民时期的无辜的石砌建筑内，那里此前是一个荷兰人的精神病院，那建筑和您的这栋一样大将军阁下，它隐藏在一片杏树林中，被野生紫罗兰花地围绕，大楼一层用于认证和登记公民身份，其他层则安装了能想象到的最精巧最凶残的骇人刑具，他甚至都不想见识它们，只是建议萨恩斯·德拉巴拉，请您继续尽您的职责，怎样对祖国更有利就怎样做，但有一个条件，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看见也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萨恩斯·德拉巴拉向他许诺，很荣幸为您效劳，将军，他兑现了承诺，也执行了他的命令：别再折磨五岁以下的孩子别再用电线去电他们的睾丸迫使他们的父母招供，因为他怕那丑行让彩票时期那么多个夜晚的失眠卷土重来，尽管他不可能忘记那个距他卧室如此之近的恐怖作坊，因为在月色安详的夜晚，他会被布鲁克纳的如惊雷轰鸣的黎明中呼啸而过的列车一般的乐声吵醒，那旋律中夹带着暴雨洪荒的巨响，在荷兰疯子的老楼周围的杏树枝叶间留下身着破烂长衫的死去新娘的哀伤，于是街上听不到那些垂死之人痛苦的哀号了，但即便这样他都存不下一分钱将军阁下，因为

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把薪水都用来购买他王子的衣装、胸口有花押字的真丝衬衫、小羊皮皮鞋、一盒盒装饰领口的栀子花以及标签上印着家族徽章的法国原装润肤露，但他没有为人所知的女人也没人听说他是同性恋，他没有一个朋友也没有自己的居所，什么都没有将军阁下，他过着圣徒般的生活，在刑讯工厂像个奴隶似的一直干活直到累倒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他睡觉的方法很多，但从来不在夜间睡，也绝对不会睡上超过三个小时，门口不设警卫，手边没有武器，只有科赫尔勋爵跃跃欲试的保护，勋爵据传只吃一样东西，那就是被斩首者的热乎乎的肠子，因而它内心的焦渴就要冲破皮囊了，只要它那人类的目光隔着墙感觉到有人接近办公室，它便会发出高压锅那样咕噜咕噜的声响把他叫醒，无论是谁，将军阁下，那男人连镜子都不信，他在听完探员的报告后就会做出决定，不向任何人征询意见，凭借着覆盖全球的无形的检举与贿赂网络，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没有一件能瞒得住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哪怕一小会儿，甚至连流亡者在世界上任意角落发出一声哀叹他都会知晓，他的钱就花在这些地方，将军阁下，因为那些刑讯官并不像传言中的那样领着部长级的薪水，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分文不取自愿而来，以证明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母亲大卸八块把碎尸扔去喂猪并且不动声色，为了获得受命于法国施刑者的职位，需要出示的不是推荐信和品行良好的证明，而是凶残的履历，那些法国人都是唯理主义者将军阁下，因而实施酷刑时有条不紊、惨无人道，是他们让有序进步变得可能，是他们早早预见到了民众尚未开始酝酿的阴谋，他们在冷饮店的吊扇扇叶下心不在焉地喝着饮料，他们在中国人的小旅馆中看着报纸，在影院睡觉，在公共汽车上给孕妇让座，他们在做了半辈子的夜间强盗和拦路劫匪后通过学习成了电工和铅匠，他们是女仆的露水情人，是远洋轮船上和国际酒吧里的妓女，是迈阿密旅行社里推广加勒比天堂景区游的业务员，是比利时外交部部长的私人秘书、莫斯科国际酒店四层昏暗走

廊中的终身清洁女工，是形形色色遍布在地球最偏僻角落的默默无闻的人，但是您可以安心睡觉将军阁下，因为祖国优秀的爱国者们说您完全不知情，这些都没经过您的批准，要是将军阁下知道的话，就会把萨恩斯·德拉巴拉送进港口碉堡的叛徒墓地了，于是当人们一听说又发生了残暴事件，便会默默哀叹，要是将军知道就好了，要是我们能去告诉他就好了，要是有办法见到他就好了，而他则会命令前来报告的人永远不要忘记，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看到，也从没和别人说起过这件事，就这样，他恢复了平静，然而装着脑袋的口袋还是陆续被送来，数量之多，令他不禁觉得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手上沾满了鲜血却没有从中获利这一点简直不可思议，因为人是傻，但不至于傻到这个地步，他还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三军司令们却从不抗议自己听命于人这一点也没道理可言，他们甚至连加薪的要求都没提，什么都没提，于是他派出去一些探子，试图找出军队忍让的原因，查出为什么他们不图谋造反，为什么他们承认了一个平民的权威，于是他问了其中最贪婪的那几个，问他们不觉得现在就该把那个玷污了武装部队美德的嗜血的外人的鸡冠斩下来吗，但他们回答道，当然不将军阁下，不至于这样，于是从那时起我便不知道在这有序进步下的机器里谁是谁、谁联合了谁而谁又与谁为敌，这秩序在我眼里已经开始有陷阱的味道，就仿佛那些我都不愿想起的可怜的彩票儿童的陷阱，但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用他野狗训练师的温柔掌控力抚平他的冲动，安心睡吧将军，他对他说，世界是您的，他让他相信一切就是如此简单明了，他又把他留在了那栋不属于任何人的宅子的黑暗中，他会在里面从这头跑向那头，大声问自己我他妈是谁，我怎么感觉镜子里的影像颠倒了，我他妈在哪儿，都快上午十一点了可这沙漠里连一只母鸡，一只碰巧路过的母鸡都没有，想想从前是什么样子吧，他哀号着，想想那些乱哄哄和狗打架抢吃食的麻风病人和瘫痪患者吧，想想楼梯上把人滑倒的动物粪便，还有那些不让

我过去的吵吵嚷嚷的爱国者，他们都求我，往我身上撒点儿治病的盐吧将军阁下，帮我给孩子施洗看看他的腹泻能不能治好，因为他们都说我的按手礼比青香蕉疗效更好，请把手放在这里吧，看看能不能平复我的心悸，我都没有力气忍受这永远不停的地震了，请您把目光凝聚在海面上将军阁下，令风暴退却，再抬头望向天空，让日月交食悔悟，再低头看着地面，教瘟疫散去，因为他们说我是那功勋卓著者，我赋予自然谦卑、矫正宇宙秩序、打压上帝神圣意志的傲气，我给予他们向我讨要的一切，买下所有他们向我兜售的东西，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像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说的那样心太软，而是因为拒绝帮助颂赞他的人实在需要一副铁石心肠，而现在，却没有任何人向他讨要任何东西，甚至没有任何人问他早上好将军阁下，您昨晚睡得好吗，他甚至得不到那几声夜间爆炸的安慰，它们曾震得窗玻璃碎成冰雹把他吵醒，震得门框歪歪扭扭，在军队里撒下恐慌，但至少，那让他感觉自己还活着，并且不是活在这于我脑中嗡鸣、用轰响将我叫醒的静寂中，我现在只是这栋可怕房子里画在墙上的涂鸦，在这里他不可能下达一道没被事先执行的命令，他仍会于午休时间在吊床上看官方报纸，从第一张到最后一张，连广告都不放过，他会发现自己最隐秘的愿望都已在那上面被满足，他的每一口气息、每一种想法都被用硕大的字体印出来并配上了照片，有他忘了下令修建的桥梁，有教授清洁的学校的奠基仪式，有奶牛和结面包的树，旁边还有一张他在荣光年代里为别的开幕式剪彩的照片，但他却没能找到安宁，他拖着那双老年人的巨大象脚去寻找孤独之屋中他尚未失去的东西，他发现已经有人赶在他之前用破旧的丧葬布罩上了鸟笼，已经有人赶在他之前在窗口望过了海也数过了牛，一切都完满、有序，他提着油灯回卧房，却听到从总统护卫队的值班室传出他那被扩散开的声音，他从半掩的窗户探进头去，看到了烟雾缭绕的房间中有一群半梦半醒的军官，他们面前是闪着悲哀光亮的电视机屏幕，他就在那屏幕上，更瘦

更紧张，但那就是我，母亲，坐在他会死于其中的办公室里，身后挂着国徽，桌上放着那三副金边眼镜，正用自己往后永远不敢重复的充满智慧的词句背诵着国家的财务分析报告，他妈的，那画面比他在花簇间的尸体更令人不安，因为现在他看到自己活着，听到他在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我自己，母亲，我从来都承受不了现身阳台的窘迫，也始终没有克服当众讲话的羞怯，但他在那儿，那样真实平凡，他站在窗口困惑不已，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怎么可能有这样费解的事啊，然而面对他在无数年的统治中鲜少爆发的怒火，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仍旧无动于衷，不至于这样将军，他无比温柔地强调说，咱们得用这种不正当手段来保证这有序进步的航船免于遭殃，这可是个绝妙的想法，将军，多亏了它，我们才在这有血有肉的权力中打消了民众的疑虑，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您都会通过国家广播和电视台来发布您的安抚性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是由我来负责的，将军，我把这个花盆放在了这里，盆里有六只摆成向日葵样的话筒，它们记录下您说出来的想法，在礼拜五的接见中，由我提问他来回答，他没有察觉他幼稚的答话就是每月向全国演讲的内容的片段，我从来没有用过一幅冒充是他的画面，也从来没有用过一个他没有说过的词，您自己都可以用这张萨恩斯·德拉巴拉放在桌上的唱盘进行验证，还有这卷电影胶片，以及我的这封亲笔信，它是当着您的面写的，将军，为的是让您能依您的意思来决定我的命运，他茫然地看了看他，因为猛然发觉萨恩斯·德拉巴拉头一次没有带狗，手无寸铁、苍白无力，于是他叹了口气，好吧，纳乔，尽您的责任去吧，他一脸疲倦地说着，身子向后仰倒在弹簧椅中，目光直直落在了旧时显贵的肖像里那一双双告密者般的眼睛上，他愈发苍老、阴郁和悲伤了，脸上仍旧挂着一副让人猜不透的表情，两个礼拜后萨恩斯·德拉巴拉临时造访办公室见到的依然是这样一副面孔，这一回他几乎是拽着皮带把狗拖进来的，他带来了一则紧急消息，发生了一场武装暴乱，只有您的

介入才能平息，将军，于是他终于在那面迷人的黑曜岩墙上发现了自己苦寻多年却微不可见的裂缝，我的复仇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他自言自语道，这个可怜的娘娘腔现在吓得要拉裤子了，但他不露声色，只是用一种母性的光辉把萨恩斯·德拉巴拉笼罩起来，别着急纳乔，他叹了口气，没有人会来打扰，咱们有的是时间去想在那个真相自相矛盾并且看起来比假象还假的池沼里真相到底他妈的在哪儿，与此同时，萨恩斯·德拉巴拉看着短链怀表，确认快到晚上七点了，将军，三军司令就要在各自家中与妻儿吃完晚饭了，这样连家人都不会怀疑他们的企图，他们会打扮成平民，从仆役的侧门出去，坐上等在那里的通过电话预约的出租车，想骗过我们的眼线，这些眼线他们自然一个也看不见，虽然他们就在那里，将军，就是那些司机，他只说了声啊哈，微微一笑，不用这么急，纳乔，不如给我讲讲，既然根据您所统计的砍下来的人头数目，咱们的敌人已经比士兵都多了，那咱们现在怎么还能毫发无损地待在这里呢，但萨恩斯·德拉巴拉仅靠短链怀表微弱的跳动支撑着自己，只有不到三小时了，将军，陆军司令正朝公爵领区赶去，海军司令和空军司令正分别奔往港口碉堡和圣赫洛尼莫基地，现在仍有可能逮住他们，因为一辆装满蔬菜的保卫国家安全的载重汽车正紧跟着他们，然而他仍不为所动，只觉得萨恩斯·德拉巴拉愈渐强烈的焦虑将他从一种被奴役的惩罚中释放出来，那奴役比他对权力的渴望更难以纾解，冷静些，纳乔，他说，不如给我讲讲为什么您不买栋和轮船一样大的豪宅，为什么您并不在乎银子工作起来却像头驴一样，为什么连那些最矜持的女人都放松下来想钻进您的卧房而您却活得像个修士，您比神父还像神父啊，纳乔，但萨恩斯·德拉巴拉已浸在冰冷的汗水里喘不过气来了，在焚尸炉般的办公室里，他再也无法端着那副完好的高贵姿态，十一点了，已经太晚了，他说，那时一个关键信号开始沿着电报线路传送给全国的驻军，起义军司令们正在往阅兵式制服上别勋章，准备拍摄作为新政府委员会成员的肖

像照，他们的副官则趁这工夫传达了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的最后指令，这场战事唯一的目标仅在于获得对中央媒体与政府机关的控制，这个时候他看见科赫尔勋爵挂着一串无尽泪水般的口水立了起来，蠢蠢欲动，但他连眼都没眨，别害怕，纳乔，不如给我讲讲为什么您这么怕死，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一把扯下被汗水浸软的赛璐珞领子，那男中音歌唱家般的仪容顿时丢魂落魄了，这很正常，他回答道，对死亡的敬畏是给幸福添加的炭火，所以您才感觉不到，将军，他纯粹习惯性地站在那里数着教堂的钟声，十二点了，他说，这世上已经不剩您的人了，将军，我是最后一个，但他坐在椅子上没有动，也没有察觉到从武器广场地下传来坦克的轰鸣，于是他笑了，您别弄错了，纳乔，我还有人民，他说，如往日一样可怜的人民在受到了那揣测不透的老人的煽动后，于日出前冲上了街道，他以无比蓬勃的历史性的热情通过国家广播和电视台一视同仁地向各方爱国者宣布，三军司令在我个人的领导下，始终代表着至高无上的人民的意愿，他们受体制不容更改的理想所鼓舞，在这个光辉胜利的午夜，终结了一个嗜血平民的恐怖机器，这个人已经接受了群众盲目公正的惩罚，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已经被砸烂了，被拴着脚踝倒挂在武器广场的一只灯笼下，嘴里还塞着他自己的生殖器，正如将军阁下您命令我们封锁使馆区街道阻止他寻求政治避难时所预料的那样，民众已经用乱石制住了他，但首先我们得把那只嗜肉恶狗打成筛子，因为它吞下了四个平民的内脏，还让我们的七位战士受了重伤，当时人们已经突袭了他当作居所的办公室，从窗口扔下了两百多件还带着标签的花缎马甲，扔下了大约三千双从未穿过的意大利皮靴，三千双啊将军阁下，他就这样花政府的钱啊，还有不知多少盒要别在领口的栀子花，以及布鲁克纳的全部唱片和相应的指挥乐谱，上面还有他的亲笔注解，他们把地牢中的囚犯释放了出来，又点了一把火将从前是荷兰精神病院的刑讯室烧掉，他们大喊着将军万岁，伟人万岁，

他终于知道真相了，因为人人都说您什么都不知道将军阁下，说他们滥用您的善心把您排挤到了一边，到现在他们都还像逮老鼠一样四处猎捕国家安全刑讯官，遵照您的命令那些刑讯官已经不再受军队保护，这样一来，民众终于能从郁积的愤怒和恐惧中解脱出来了，于是他批准了，同意，他被喜乐的钟声、自由的音乐和武器广场上聚集的人群感恩的呼喊声所感动，他们举着巨大的牌匾，上面写着上帝保佑把我们从恐怖黑暗中解救出来的伟大领袖，在那对荣光年代的倏然即逝的复制中，他召集了协助他摘下权力的苦役枷锁的学校官员来到庭院，随手指点我们去填补他朽迈统治的最后一任最高司令部中由杀害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的凶手空出来的位置，那些人是穿着睡衣逃往使馆寻求避难时被捕的，但他几乎认不出他们了，也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他在心中搜寻着本想存留至死的仇恨，却只找到了不值得再留存的受了伤的自尊的残灰，叫他们都滚蛋，他命令道，他们被塞上了首班航船，去往一个不会有人记起他们的地方，可怜的浑蛋，他主持了新政府的第一场委员大会，它给他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象：从新世纪的新一代中挑选的模范还和从前一样出身平民，这些部长的长袍上满是尘土，内心脆弱不堪，只不过他们爱权力更贪恋荣誉，面对他已卸下防备的沉重王国那无比高昂的外债，他们比以往所有人都更胆小怕事、奴颜媚骨并且一无是处，没有什么可做的将军阁下，高地荒漠上的最后一列火车坠下开满兰花的深崖了，豹子在天鹅绒面的安乐椅上睡着了，轮船在水稻田里搁浅了，消息在邮政袋中腐烂了，有一对受骗的海牛幻想在总统寝舱镜子里那些阴郁的百合丛中产下美人鱼，而唯有他漠视这些，当然，他已经相信了有序进步的存在，因为他与现实生活的接触仅限于阅读只为您一人印制的官方报纸将军阁下，那是独一份的完整版本，里面都是您喜闻乐见的消息，有您希望看到的照片，有宣传广告，会让他幻想出一个世界，不同于他们在午休时段向他提供的那个，甚至连我的绝不轻信的眼睛都能证实，部长们的阳

光玻璃楼后那些港口高岗上的黑人的彩色棚屋从未改变，他们修建直通大海的棕榈树大道，就为了不让我看见那些门廊相同的罗马风格的别墅后面被我们的某次飓风摧毁的街区悲惨如故，他们在道路两侧播撒香料的种子，就为了让他能在总统车厢内看到，因为正在出售的我的心肝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画黄鹂的水，世界仿佛变得更加美好，他们骗他并不是为了取悦他，像荣光年代里罗德里戈·德阿吉拉尔将军做的那样，也不是为了给他省却无谓的烦恼，如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更多地出于怜悯而非发乎爱情所做的那般，他们骗他，是为了让他继续被自己的权力抓牢，留在院中木棉下的吊床上他那老年的倦怠中，在那院子里，到他终老时，连隔壁学校的上了色的鸟儿停在青柠檬树枝上的合唱都将是假的，这算怎么回事，然而那愚弄并没有影响到他，他甚至试着去与现实和解，试着立法恢复对金鸡纳和其他重要药材的垄断来换取国泰民安，但现实却再次给了他警告，令他始料不及，世界变了，世事继续游走在他的权力之外，因为已经没有金鸡纳了，将军，没有可可没有靛青了，将军，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他的个人财产例外，它是无法计量的、贫瘠的，受着好逸恶劳的威胁，然而在新的不幸面前他仍旧没有做出改变，只是派人给老大使洛克斯博瑞捎去了口头上的挑战，问他是否有可能在多米诺骨牌桌上找到解决办法，但大使借用他的风格回答说门儿都没有阁下，这个国家已经分文不值了，当然了，除了海洋，它明净丰饶，在底下燃一支蜡烛就足够在它自己的火山口熬一锅宇宙海鲜汤了，所以您考虑考虑吧，阁下，我们可以把它作为那笔即使有百代如阁下您一样勤勉的英才都无法偿清的拖欠款项的利息，然而第一次他甚至没有严肃对待，只是一面陪他走向楼梯，一面想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看看这些外国佬多野蛮啊，说到海他们怎么能就只知道吃呢，告别时他仍在他肩膀上习惯性地一拍，而后又回到孤身一人的状态，感觉自己正处在权力的荒漠里一团团虚幻之雾中，当武器广场上军队在欢呼间隙分发食物

饮料的激励消耗殆尽时，群众马上纷纷离去，他们带走了内容重复的标语牌，并把租来的口号板放在一旁以待将来在相同的庆典中使用，他们再次留下了荒芜而悲伤的厅堂，尽管他与从前，与这里还不是一栋死人的宅院而是一座比邻的宫殿时一样，下令任何时候都不要关门，让想进来的人都进来，但只剩下那些麻风病人了将军阁下，只有那些经年累月待在府前的盲人和瘫痪患者了，这些人与当年德梅特里奥·阿尔窦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个门口看到的他们一样，沐浴在金色阳光中，被摧毁却不可战胜，他们确信自己早晚会再进去，从他手中接过治病的盐，因为他熬过了所有的逆境、经受住了最无情的热情和最可怕的被遗忘的圈套，他是永恒的，他的确是，他会在从牛棚回去的路上再次遇见他们，看到他们正在院中临时搭起的砖灶上热着厨房里剩下的罐头，看到他们躺在凉席上伸展四肢呈十字状，而那凉席在玫瑰芬芳的影子中已被溃疡处的汗液泡软，他让他们建公用炉灶，为他们买新的凉席，并在院子尽头搭起一个棕榈叶凉棚，让他们不必栖身在楼内，然而没出四天，他不是发现一对在宴会厅的阿拉伯地毯上睡觉的麻风病人，就是撞见一个在办公室中迷了路的盲人，或者一名在楼梯上骨折了的瘫痪患者，他于是将楼门紧闭，以免墙壁上留下鲜活的糜烂印迹，也防止他们身上散发的医疗部门用来消毒的苯酚的气味熏染了空气，然而，他刚把他们从一处清走，他们就在另一处出现，在别人已对那个无用的老头不再抱有任何指望时，他们坚韧不摧地固守着自己的古老渴盼，那个老头会把写下的回忆塞入墙缝里，像梦游者一般摸索着穿过记忆的迷蒙池沼中的风，躺在吊床上度过失眠的时光，自问我他妈的该怎么做才能摆脱新大使费舍尔的诡计呢，他建议我宣布现在黄热病成灾，以便根据互助协定为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提供正当理由，为垂死的祖国注入新的气息需要多少年，这个协定就会有多少年的效力，他马上答道，门儿都没有，他再次经历了自己统治之初的情形，并且陶醉其中，当年面对平民起义的严重威胁，他便是依

靠这种手段得到了游走在军事法律之外的权力，他颁布法令宣告国家进入瘟疫时期，他在灯塔上升起黄色的旗帜，并关闭港口、取缔弥撒、禁止在公开场合哭丧或弹奏会唤起人们追忆死者的歌曲，他命令军队不眠不休地监察法令执行的情况并授权他们随意处置瘟疫病患，于是戴着医疗机构袖标的军人当众处死了健康状况各异的民众，他们如果怀疑哪些民宅不符合他的规定，便会在其门前画上红圈，还会在普通罪犯、娘娘腔与男人婆的额头上烙印，与此同时，一支由米歇尔大使向其政府紧急申请的医疗队伍正致力于防止总统府内的居民受到感染，他们从地上捡起七个月早产儿的粪便拿到放大镜下分析，在大水瓮中撒入消毒药丸，还给他们科学实验室里的动物吃蛆虫，他却笑得要背过气去，并通过翻译对他们说，别犯傻了，先生们，这里除了你们，没有别的瘟疫了，但他们坚持说有，他们有最高命令，上面的人说有，他们准备了一种有预防功效的黏稠的绿色蜜露，并一视同仁地把它涂在所有访客的全身，无论是最普通的平民还是最有声望的显贵，他们要求人们前来谒见时与他保持距离，要站在门槛上，而他则坐在能闻其声而远离其气息的房间深处，和出身高贵却赤身裸体的人喊叫着交谈，这些人用一只手比画着，阁下，另一只手则遮盖着那只被胡乱涂抹的颓萎的鸽子，这么做都是为了防止那个人受到感染，他已在失眠的虚弱中想到了这场虚假灾难的细枝末节，编造了扎根于土地的谣传，散播了末世的预言，因为他认为，人们越不明就里就越会恐惧，所以当他的一位吓得脸色惨白的副官在他面前立正站好报告消息时，他几乎连眼都没眨，瘟疫造成大规模的死亡，于是透过总统四轮马车愁云密布的玻璃窗，他看到了废弃的街道上应他的命令而被打断的时间，看到了黄色旗帜上的惊惧氛围，看到了一扇扇紧锁的大门，甚至连那些画了红圈的被遗弃的房屋也大门紧闭，他看到了阳台上饱食后的兀鹫，看到了那些死人、死人、死人，到处都有那么多的死人，在泥坑中他们已经难以计数，他们被堆放在露台上的阳光下，

摊开在市场里的蔬菜上，都是有血有肉的死人将军阁下，没人知道有多少，比他希望在敌军中看到的死人还要多，都像死狗一样被扔在垃圾箱中、抛在腐烂的尸体上，他闻到街上熟悉的恶臭，那就是瘟疫的疥疮味道，但他不为所动，不在任何哀求前让步，直到他不再感觉自己是他全部权力的绝对主宰，直到好像已经没有任何凡人之力或神力可以终结这场大规模的死亡，我们才看到一辆没有标识的四轮马车出现在街上，没有人一眼便从中察觉到王权的冰冷气息，但在包裹着森然天鹅绒的车厢内部，我们看到了那致命的双眼、颤抖的双唇和那只往门口一把把撒着盐粒的新娘手套，看到了攀缘而上的涂成那面旗帜色彩的火车，它从栀子花和惊恐万分的豹子间穿过，直至被迷雾笼罩的最陡峭的省份，我们透过孤独车厢的薄帘看到了那浑浊的双眼、那受尽折磨的面容，以及那只并不优雅的少女的手，它在他童年的阴郁荒漠上渐次留下一串盐粒，我们看到了一艘木轮汽船，它载着播放玛祖卡舞曲纸卷的奇异的自动钢琴，在暗礁、沙石浅滩和春日里巨龙在雨林中漫步时所引发的灾难留下的废墟间跌跌撞撞地航行，我们看到那苍白的双唇，看到那不知所属的手，它正向酷暑中倦怠的村庄抛撒一把把盐粒，那些吃下盐粒还舔了方才撒落之地的人马上恢复了健康，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能对肆虐的恶兆和幻觉免疫，因而在他秋日的暮色中，当他们又向他提出一套同样建立在政治性的黄热病的谎言之上的登陆措施时，他不会感到意外，当乏力的部长们呼喊着把海军陆战队召回来吧，将军，让他们带着消毒灭菌的机器回来吧，拿他们想要的和他们换，让他们带着他们的白色医院、带着他们的蓝色草坪和旋转喷水器回来吧，因为这些东西让人们健康地度过了很多个闰年，他却一捶桌子，决绝地说不行，他担负最高责任，直到粗鲁的麦昆大使回答他说现在咱们已经不是在商量了，阁下，支撑这制度的不是希望、顺从，甚至不是恐惧，而是无从挽回的古老幻灭中的纯粹惯性，请您上街去面对真相吧，阁下，咱们已经到最后关头了，要么

让海军登陆，要么把大海给我们，没别的路了，阁下，已经没别的路了，母亲啊，于是他们带走了四月的加勒比海，那些厄尔温大使的航海工程师把它分成小块标上号码带走，播散在了远离飓风的亚利桑那的血色曙光里，连同它里面的一切，将军阁下，连同我们城市的倒影、我们胆怯的溺水者和我们癫狂的蛟龙，虽然老谋深算的他已经做出了最大胆的努力，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次抗议掠夺的暴动，但是没有人响应将军阁下，无论好言相劝还是武力相迫，他们都拒绝上街，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他在耍新花招，和从前的那么多回没什么两样，不过是为了满足他那压抑不住的、甚至超越了极限的永久掌权的热情，我们觉得，即便他们带走了大海，他妈的，即便他们连同蛟龙一起带走了整个国家都无所谓，只要发生些什么就行，我们这样想着，对军人的各种利诱无动于衷，他们化装成平民出现在我们的家中，以祖国的名义央求我们冲上街去喊外国佬滚蛋，以阻止掠夺行动，他们鼓动我们去抢劫外国人的商店和别墅甚至纵火，他们给我们现金让我们出去与人民并肩抗议侵略，说有军队这坚强后盾做保护，但是没有人出去将军阁下，因为没有人忘记，有一次他们也是以军人的名义这样信誓旦旦地对我们说的，但他们开火屠杀了他们，理由是人群中混入了冲军队开枪的挑衅者，所以这一次，我们连人民都没有了将军阁下，于是我不得不独自扛起这惩罚的重担，不得不一面独自签字一面想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没有人比你更了解，失去海总比让海军陆战队登陆要好些，你想想，就是他们想出那些命令让我签署的，他们把艺术家变成娘娘腔，他们带来了圣经和梅毒，他们让民众以为生活很容易，母亲啊，他们让人觉得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到，让人觉得黑人有传染病，他们试图说服我们的士兵去相信祖国只不过是笔买卖，而荣誉感则是政府为了让军队免费打仗而发明出来的破玩意儿，我授权他们享有我们的领海，是为了避免这些祸事重演，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对人类的利益和民族间的和平非常有益，

他知道，所谓的转让，不光包括他能在卧房窗口看到的那延伸至天际的物理的水，同时也涵盖最宽泛意义上的与海相关的一切，或者说，涵盖了那海中独特的动植物群、它的风向规律、它变幻莫测的毫巴，它的一切，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能做到他们所做的事，将我古老的象棋海洋以标号水闸隔断，然后用庞大的吸扬式挖泥船带走，而在大海被撕裂的火山口，我们看到了瞬息间的光亮，它来自于桑塔玛丽亚德尔达里恩这座极其古老的因蚁害而毁灭的城市那埋于水下的废墟，我们看到了海洋上海军司令上将的旗舰，与我当年从窗口看到的一模一样，母亲啊，它周身布满了丛生的龟足，他还没来得及向那场海难足以载入史册的规模致以崇高的敬意，挖泥机的齿爪便已经将它连根拔起，他们带走了我投身战争的所有动机和他权力的全部动力，只留下那片他走过一扇扇窗时看到的覆满了粗糙月球尘埃的荒凉的平原，他怀着被压抑的心呼喊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请用你最智慧的光芒照亮我吧，因为在暮年的一个个夜晚，他会惊醒，会感觉到祖国的亡者正从墓穴中爬起来要跟他清算那笔大海的账，他觉得墙壁上布满了抓痕，听到他们未被埋葬的声音，感觉那些死后的目光正往锁眼中窥看，窥看他那如垂死恐龙一般的巨大脚掌在黑暗房屋里、在救赎的最后的沼泽烂泥中留下的印迹，他会在姗姗来迟的信风与鼓风机送出的人造西北风的交汇处一刻不停地走着，这台鼓风机是埃伯哈特大使为了让他别总惦记着那笔丑恶的海洋交易而送给他的，他看着悬崖顶端那栋收容独裁者的房子的孤独光亮，我备受煎熬，他们却在那里如坐着的阉牛一样睡觉，一帮浑蛋，他记起了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在郊区宅子里的告别的鼾声，记起了在被守夜的牛至草照亮的房间中，她那鸟贩的安眠，如果他是她就好了，他叹了口气，幸福地沉睡着的母亲，不曾被瘟疫惊扰，不曾受爱情恐吓，也不曾因死亡而畏惧，他却恰恰相反，那么的茫然失措，甚至以为那座失却了海洋的灯塔断断续续射入窗口的光束都被死人玷污了，

他惊惧万分地逃离这星辰般美妙的萤火虫，因为它正在旋转梦魇的轨道上为死人骨髓的发光粉尘散发出的可怖气息熏蒸消毒，把它灭掉，他吼道，于是他们把它灭掉了，他命人填实房屋里里外外的空隙，以免疥疮的哪怕最微弱的气息在死亡的夜晚从门窗的缝隙钻进来，哪怕它们裹藏在什么香气中也不许进屋，他留在了黑暗里，反复摸索着，在密不透气的炎热中费力地呼吸着，感觉自己正经过晦暗的镜子，他惊恐地走着，直到听到海洋火山口传来一阵混乱的蹄声，那时令人毛骨悚然的月亮正带着它朽迈的白雪升起，把它摘了，他吼道，把星星都灭掉，他妈的，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没有人理睬他的呼喊，没有人听见，只除了古老的办公室中被吓醒的瘫痪患者、楼梯上的盲人以及身上沾着晨露的麻风病人，他们在他经过最早绽放的玫瑰时纷纷站起身来，向他乞求手中治病的盐，事情就在那时发生了，全世界不信他的人，狗屎偶像崇拜者们，他边走边摸我们的头，一个挨一个地，用那只光滑智慧的手，用那真理之手摸了我们每个人有缺陷的地方，就在他碰触到我们的那一霎，我们都恢复了身体的健康和内心的宁静，重获了活下去的力量和信念，我们看到盲人因玫瑰的光辉而目瞪口呆，看到瘫痪患者在楼梯上磕磕绊绊地走起来，我们看到我自己这新生儿般的皮肤，我要在全世界的市集上展示它，让所有人都知道这神迹，我们闻到我溃疡的疤痕上这早熟百合般的芬芳，我要在整个地球表面撒播它，将它作为对不忠者的侮辱、对不信他的人的惩戒，他们在城市在乡村在方丹戈舞会和游行上大声疾呼，试图往人群中注入因奇迹引发的恐慌，但是没有人相信那是真的，我们觉得那只不过是又一则他们和赤脚医生一起带到村镇上的宫廷消息，为了让我们相信最不需要相信的事：他令麻风病人重生皮肤，使盲人重见光明，让瘫痪患者重获行走能力，我们都觉得那充其量是他的政权使出的最后一招，为的是唤起民众去关注一位不太可能存在的总统，这位总统的私人护卫系统仅剩下一队新兵，而这与政府委员会众口一词的建议相

悖，他们曾坚持说，不，将军阁下，一套严密的护卫系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他却固执地认为没有人需要也没有人渴望杀掉我，想这么做的只有诸位，我没用的部长们，我懒散的司令们，只是诸位不敢并且永远不会敢杀我，因为你们清楚，这之后你们会互相残杀，于是只剩下新兵来守护这栋已被毁灭的房子，在那里，母牛会肆无忌惮地徜徉于第一门厅和会客厅间，它们已经把哥白林毯上开着花的草原啃掉了将军阁下，他们把资料吃掉了，但是他听不到，在十月的一个下午，他头一回看到一头母牛爬上来，因为它受不了外面躁怒的暴雨了，他试着挥手轰它，母牛，母牛，却突然想起拼写母牛vaca的时候要用vaca的v，另一次他看到了它在吃灯罩，那时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某个阶段，开始明白不值得为了轰一头牛特地走到楼梯口去，还有一次，他在宴会厅看到了两头被母鸡激怒的母牛，因为母鸡跳到了它们背上想去捉虱子，于是在这些个切近的夜晚中，我们之所以看到航海灯一般的光亮，听到围墙后大型动物灾难般的踩踏声，是因为他正手持油灯与母牛抢夺睡觉的地方，而墙外尽管没有他，他的公共生活却在继续，我们每天都在当局的报纸上看到伪造的他接见平民和军人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总是穿戴合宜，这么多年来，每到祖国最重要的纪念日，我们都会从广播中听到他一再重复的演说，他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论我们出了家门、进入教堂还是吃饭睡觉的时候，他都在，而人人都知道他拖着乡下人的旅行靴在那栋朽迈的屋中都走不动路了，服侍他的也仅剩三四个勤务兵，他们负责他的饮食，保障储藏地的蜂蜜供应充足，还得赶走那些曾在封禁的办公室里闯祸、打碎了一套总参谋部元帅的陶瓷像的母牛，就是那间某个女巫预卜他将死在其中的办公室，只是他自己已将这预言忘记了，他们随时听候他偶尔发出的命令，直到他将灯挂在门楣上，直到他们听见那间因为没有海洋而变得诡异的卧室里传出三道门闩、三个插销、三把门环的轰响，才相信他已经把自己交给了孤独憋闷的梦境并且会一觉睡到天明，这时他们

才会撤回到位于底层的宿舍中，但他会意外地惊醒，会牧养着失眠，拖着他巨大的幽灵的脚行走在黑暗中辽阔的房屋里，他几乎注意不到母牛缓慢的消化和睡在总督衣架上的母鸡的愚钝呼吸，他在漆黑中听到了月球的风声，在漆黑中感到了时间的脚步，他看到了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正摸黑打扫，握在手中的绿色枝杈的笤帚也曾被她用来清扫先哲们被烧焦的智慧枯叶，其中有康涅利乌斯·尼波斯的原版文字以及塞西利奥·艾斯塔多和利维奥·安德罗尼可的古老辞令，它们都在他第一次踏入这权力的无主之屋的那个血腥夜晚化作了办公室的垃圾，当时，那位杰出的拉丁语学者劳乌塔罗·慕纽斯将军——愿他已在上帝的天国之中——的最后街垒还在负隅顽抗，而他们已在火光之城的辉映下穿过了庭院、跃过了博学的总统私人保镖的尸体堆，他正因间日疟浑身哆嗦着，而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没有一样武器，只拿着那柄绿色枝杈的笤帚，他们沿楼梯摸黑而上，一路被富丽堂皇的总统马厩中的马匹尸体绊倒多次，这些马就躺在从第一门厅到会客厅的地面上，仍旧血流不止，在那门窗紧闭的宅第中，在掺杂着马血味道的酸涩火药味里，呼吸变得艰难，我们在走廊上看到沾了马血的赤脚脚印，在墙上看到染了马血的手掌印，还在会客厅的血泊中看到一个血淋淋的美丽的弗洛伦西亚女人，一身晚礼服，心脏处插着一把战刀，她是总统夫人，在她身旁我们看到了一具小女孩的尸体，看起来像一个发条玩具舞蹈演员，额头上挨了一枪，那是他九岁的女儿，而后我们也看到了加里波第的恺撒，也就是劳乌塔罗·慕纽斯总统的尸体，他是当时的十四位联邦将军之一，他们在血腥敌对的十一年间不断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而他是其中最精干的一位，也只有他敢用母语对英国外交官说不，他就在那里，身体摊开犹如一条鲻鱼，赤着脚，承受着鲁莽行事后的处治，因为他不愿落入英国舰队远征军之手任人惩罚，便先杀了妻子、女儿以及四十二匹安达卢西亚马，然后吞枪自尽，脑袋都开了花，那时基齐纳司令指着尸体对我说，你看到了吧，

将军，这就是那些举起手来反对自己父亲的人的下场，你将来在你的王国里可别忘了这一点，他对他说，而他已经在那里了，经历那么多有所企望的失眠之夜、在长久的忍气吞声与一再的忍辱负重之后，我已经在那里了，母亲，被任命为三军最高统帅以及共和国的总统，任期与重建国家秩序、平衡国家经济需要的时间等长，这是经过参议院与众议院全体成员同意、由最后几位联邦考迪罗一致决定的，并且得到了英国舰队的支持，后者是我经过那么多场与麦克多诺领事的艰苦的多米诺骨牌夜战的成果，只是，无论我还是别人最开始都不相信这个事实，当然，谁又能在那个惊悚之夜的混乱中相信它呢，因为甚至当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已经在那张她后来腐烂其上的床上时，都还不能相信这个事实啊，她唤起了他对过去的回忆，在一片混沌之中，他找不到从哪里着手统治，在那栋大宅之中，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可以退烧的草药，也没有任何家具，那里已经不存在一样有价值的物品，只剩下风光不再的西班牙总督和主教的被蛀蚀的画像，其余一切都被历任总统据为己有，一点一点带走，甚至连墙上描绘英雄场景的壁画都不见了踪影，卧室中堆满军营垃圾，四处都是一场场历史大屠杀被遗忘的残迹以及一道道一夜之间作废的总统用手指写下的血诏，却没有一张可以让高烧中的他躺下来发汗的席子，于是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扯下一块窗帘把我裹起来，并让他靠在主楼梯上的一个角落里，而她则开始用绿色枝杈的笤帚打扫刚刚被英国人洗掠一空的总统寝室，她将整整一层都扫了一遍，还得用笤帚击退那帮想在门后奸污她的强盗，破晓之前，她在被风寒击垮的儿子身旁坐下来休息，他裹在长毛绒的窗帘中，在那栋被摧毁了的房子的主楼梯最后一级台阶上汗如雨下，她便试图以自己简单的盘算为他退烧，你别怕这乱摊子，孩子，只要买几个最便宜的皮凳就行了，再在上面画上彩色的花草鸟兽，我自己来画，她说，还需要买些吊床，等有客人的时候用，这个尤其重要，吊床，因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时不时就会有意外上门来

的客人，她说，买一张教堂长桌用来吃饭，买些铁餐具和合金盘，好让他们尝尝军旅生活的艰苦滋味，再买一口大瓮来盛饮用水，外加一个炭火炉，这就行了，反正是用政府的钱，她这样安慰着他，但他没有在听，因为当时，最初的几道晨曦将真相被隐匿的那一面有血有肉地照亮了，他因此萎靡沮丧，清楚自己不过是一个坐在楼梯上因发烧而不住哆嗦的可怜老人，心中没有爱的他想着我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啊，所以这就是整副乱摊子，他妈的，所以权力就是这栋遇难者的房子，这种像烧焦马匹的人味儿，这片又一个八月十二日、和其他所有八月十二日一样的权力之日的凄凉朝霞，母亲啊，咱们是钻到什么破烂摊子里了，他承受着最原始的不安和返祖似的恐惧，惧怕一个新的黑暗世纪未经他的允许便在世界上耸立起来了，公鸡在海上啼鸣，英国人唱着英语歌抬起庭院中的死尸，而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正好结束了愉快的计算，她以结清了债务般的轻松说，那些要买的东西没吓到我，要干的活儿也没吓到我，那些都无关紧要，孩子，吓到我的是这屋里需要洗的床单那么多，于是他倚仗着自己失落中的力量试着安慰她说，您安心睡吧，母亲，这个国家没有做得长的总统，他对她说，您看着吧，不出十五天，他们就会把我扳倒了，他对她说，他不仅在那个时候确信这一点，在之后漫长而稳固的暴君生涯中的每时每刻也如此确信，并且越来越深信不疑，因为生活告诉他，权力的漫长时光中没有哪两个日子是完全相同的，当一名总理在每个礼拜三的例行报告中突然引爆令人目眩的真相时，他的提议里永远另有图谋，所以他只会微微一笑，别告诉我真相，顾问，这很冒险，万一大家都信了，仅凭这么一句，他就毁了政府委员会为了让他问都不问就签下字而精心布置的一整套战略，当他在官方会面上不知不觉尿了裤子的谣言越传越逼真时，我觉得他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清醒，当他穿着无可救药的拖鞋、戴着用线拴住腿的眼镜沉入衰老的缓流中时，我觉得他比以往更为严肃，并且凭借日益暴烈的性情和更为

准确的直觉将不合适的撇开，将合适的拿来连读都不读就签署，他妈的，反正说到底，没人理我，他笑道，看看吧，我命人在第一门厅放一排栅栏防止母牛爬上楼梯来，但它又出现在那儿了，母牛，母牛，它把头伸进了办公室的窗户，正在吃国家祭坛上的纸花，但他只是笑着，您看看，我和您说过的，顾问，这国家变得一塌糊涂，原因就在于从来都没人理我，他说，以一种在他的年纪不可能存在的清醒神志说着，然而，凯普陵大使在他被查禁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在那时看到的他已经陷入了令人痛心的老年无意识中了，甚至连幼儿的基本活动都不能自己完成，他还说看到了他周身都浸泡在皮肤不断渗出的一种含盐物质中，并且拥有溺死之人的庞大身躯和溺死之人随波逐流的款缓安详，他解开衬衫向我展示他那在旱地上溺死的人紧实而明亮的身体，它的缝隙间已长满了深海礁石上的寄生物，背上吸附着印鱼，腋下长着珊瑚虫和极小的虾蟹，但他确信这些海岸新生命只是最初的征兆，预示着那片被你们带走的海会自愿回来，我亲爱的约翰逊，因为海就像猫一样，他说，总会回来的，他也确信他腹股沟处的那片龟足秘密地宣告着一个幸福的清晨会来临，到那个时候他打开卧室的窗户，将再一次看到远航舰队司令的那三艘三桅船，他疲惫地在全世界寻找它们，只为了看看他是否像大家说的那般，与他也与很多历史上的大人物一样有着光滑无纹的手掌，他命人把他带来，必要时可以用武力相逼，却听见其他航海者告诉他，他们见过他绘制邻海无数岛屿的地图，看到他用国王和圣人的名字取代岛屿原先的军人的名字，同时还从土著科学中寻找他唯一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能治疗他刚刚开始的谢顶的偏方，当我们放弃了再次找到他的希望时，他却坐在总统加长轿车中认出变了装的他，他身着深色苦行衣，腰间系着圣弗朗西斯科的棉绳，在公共市场礼拜日的人群中摇着忏悔木铃，陷落在反省道德缺失的状态中，这令我们很难相信他正是那个穿着胭脂红制服、戴着金框眼镜在陆地上迈着第一桨手的庄重步伐的人，但当他们想遵照

他的命令把他带上加长轿车时，我们连个影儿都没找到啊将军阁下，是大地把他吞下去了，他们说他成了穆斯林，说他在塞内加尔患了蜀黍红斑死了，还说他被埋在三个城市的三座墓中，而事实上他不在其中的任何一处，他因为他征程的扭曲命数，被判罚在墓与墓之间游荡直至时间的尽头，因为他是个会带来厄运的人，将军阁下，他比金子更晦气，但他始终没有相信，直到他晚年的尽头仍旧在盼望他回来，那个时候卫生部长用镊子为他夹除身上的阉牛虱子，他却坚持说那不是虱子，医生，那是大海要回来了，他说，他如此笃信，以至于卫生部长屡次认为，他并没有像他在公众面前表现的那么聋，也没有像他在场面难堪的接见中表现的那样精神涣散，虽然一次彻底的检查表明，他的动脉已经坚硬仿若玻璃，他的肾脏中有海滩沙粒沉积，他的心脏则因缺乏爱而破裂，于是年迈的医生以多年兄弟的信任为挡箭牌对他说，是该安排一下了将军阁下，至少决定一下您要把我们交到谁的手上，他对他说，救救我们，别让我们成为孤儿啊，然而他惊讶地问，谁告诉您我想死的，我亲爱的医生，让别人死去吧，他妈的，最后他很精神地开玩笑说，两个晚上之前我还在电视上看到自己了呢，感觉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像头斗牛一样，他说着笑得差点背过气去，他确实在恍惚中看到了自己，按照近来的孤独夜晚的习惯，他会脑袋上裹块湿毛巾，在无声的屏幕前打着瞌睡，有时的确比斗牛更果敢，因为看到了法国或者土耳其或者瑞典的大使的迷人夫人，他妈的，这么多长得一样的女人简直令他分辨不清，都过去这么久了，他已经记不起自己曾待在她们中间，身着晚礼服，手持一杯一口未动的香槟，参加八月十二纪念日庆典，或是一月十四胜利日仪式，还是三月十三复兴日庆祝，我怎么会知道，因为置身于他统治之下那晦涩难懂的历史日期中，连他自己都弄不清哪个在何时举办，哪个是为了什么举办，甚至那些他聚精会神、细致严谨地写下后藏于墙缝中的纸卷对他来说也都没用了，因为到头来他忘了自己该记得什么，他会偶然在藏

蜂蜜的地方找到那些纸卷，有一次他读到一张，四月七日是马科斯·德莱昂博士的生日，得送他一头老虎作为礼物，他念道，那是他亲笔写下的，但他丝毫记不起那人是谁了，于是觉得再没有什么惩罚比遭受自己的身体的背叛更不光彩、更不应该的了，关于这一点，他早在古老的何塞·伊格纳西奥·萨恩斯·德拉巴拉时期之前就隐约有所感触，那时他的思维还清晰，还能勉强分辨前来谒见的人群中谁是谁，想当年我可是能叫出他过于广袤的沉重王国里最偏远地区的所有民众的姓与名的啊，然而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在四轮马车里看到了人群中一个眼熟的男孩但记不起是在哪里见过他，于是惶恐至极，甚至命令护卫队将他逮捕，让我好好想想，那是个可怜的山里人，蹲了二十二年监狱，从被审的第一天起，就一直重复着既定事实，他名叫布拉乌里奥·利纳雷斯·莫斯科特，是淡水水手马科斯·利纳雷斯和猎虎犬饲养员德尔菲娜·莫斯科特非婚生但被承认的孩子，这两人在洛萨尔德尔维雷伊都有固定住所，那是他第一次来王国的都城，因为母亲派他到三月诗会上卖两只狗崽儿，他是骑着一头租来的驴赶过来的，也没有带什么衣服，只除了被逮捕的那个礼拜四清晨他穿着的那一身，当时他正在公共市场的一个摊位前一边喝苦咖啡一边询问卖油炸食品的女商贩知不知道有谁想买两只串种狗崽儿来猎老虎，当她们回答说没有时，鼓声、军号声、鞭炮声乱哄哄地响起来，人们纷纷喊道，那个人来了，他过来了，他于是问别人那个人是谁啊，他们回答他说还能是谁，掌权的人呗，于是他便把狗崽儿塞到箱子里，拜托卖油炸食品的小贩，劳驾帮我照看一下吧，我去去就回，他爬到了一扇窗户的窗框上，好越过人头望一望，于是他看到了那支连马匹都穿着金质华服、戴着羽毛头饰的护卫队，看到了印着祖国蛟龙的马车、那只戴着破手套的正挥动致意的手、那苍白的面孔、那沉郁的不带笑意的嘴唇，是那个掌权的人，那双哀伤的眼睛突然看到了他，那神色仿佛是在一座针山上发现了一根针，那手指指着他，那个人，爬在窗框上的那个，

把他逮起来，等我想想在哪儿见过他，他命令道，就这样，他们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揪住，用刀面拍得我遍体鳞伤，将我放在篦子上烤，让我坦白掌权的人曾在哪儿见过我，但在港口碉堡的可怖地牢中，他们始终没能从他身上剥下那唯一真相之外的任何真相，他在一遍遍复述真相时是那样肯定又带着那般胆量，令他最终承认是他弄错了，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说，因为他们对他这么凶，就算他以前不是敌人，现在也是了，可怜的人啊，于是他便在地牢中日渐腐烂，而我则在这栋阴影之屋里一边徘徊一边想着，我的好日子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帮帮我吧，看看没有了你的庇护，我都落到了什么地步，他独自呼喊着，如果无法在回忆时找到乐趣、得到滋养并因此在晚年的泥潭中幸存下去，那么便白白度过了这么长的光辉岁月，因为他那些重要日子里的最强烈的痛楚与最幸福的时刻也都无可奈何地从记忆的孔洞中溜走了，虽然他曾天真地企图用小纸卷将那些小洞堵住，他受到惩罚，将永远不会知晓这个九十六岁的弗朗西斯卡·里内洛是谁，根据亲笔写下的记录，他曾下令用皇后之礼厚葬她，他也被判定要戴着书桌抽屉中的十一副无用的眼镜来盲目地指挥，好掩盖他在和幽灵对话的事实，他甚至没法分辨他们的声音，也仅凭直觉来猜测他们的身份，他陷入了无依无靠的境地，在一次与他的战争部长的会面中这一境况的最大风险被清晰地呈现了出来：他倒霉地打了一个喷嚏，于是战争部长说愿您健康将军阁下，他又打了一个，于是部长又说了一遍愿您健康将军阁下，再一个，愿您健康将军阁下，但连续九声喷嚏过后，我没有再说愿您健康将军阁下，只觉得自己被他那张因惊愕而扭曲的脸庞的威胁推倒在地，我看到了那双溺在泪水中的眼睛正在垂死的颤动的泥沼中冲我无情地唾骂，我看到了这头老迈的野兽的舌头仿佛被绞死时那样伸在外面，他正在我的臂弯中死去，而没有人能证明我的清白，一个人都没有，那时我唯一能想到的便是趁还来得及赶紧逃离那间办公室，但他随即威严地挥了挥手阻拦我，在两次喷嚏间冲

我吼道，不要做懦夫，罗森多·萨克里斯坦准将，不要慌，他妈的，我还没有笨到要死在您跟前，他吼道，而事实就是如此，他不停地打喷嚏直到抵达死亡的边缘，他飘浮在一个生长着正午萤火虫的无意识的空间里，却仍固执地坚信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不会让他陷于打过一阵喷嚏后死在一名下属面前的耻辱中，门儿都没有，我死都不受侮辱，与一群母牛生活也好过与一帮会让人没有尊严地死掉的人生活在一起，他妈的，他已经不再与教皇使节谈论上帝，以免他察觉自己在用勺子喝热巧克力，也不再玩多米诺骨牌，怕有人敢出于怜悯故意输给他，他不想见到任何人，母亲啊，为的是不让任何人发现这些，虽然他缜密地警惕着自己的行为，虽然他碍于虚荣不去拖曳自己终究拖曳了一辈子的扁平足，虽然他在多年的羞耻中一直感觉自己处在最后的独裁者们那个痛心的深渊边缘，那些身陷不幸的最后的独裁者与其说是在受他保护，不如说是被他囚禁在那栋崖顶之屋，以防他们用自己可耻的瘟疫荼毒世界，当他在一个个不祥的早晨泡药浴时，会在私人庭院的水池中睡着，独自承受种种哀痛，并且梦到你，母亲啊，他会梦到是你在现实中盛开的枝枝杏花间制造了我脑袋里那么多噪音中的蝉鸣爆响，他梦到是你用毛刷画出了黄鹂的彩色鸣啭，于是他被腹部意外地在水底发出的声响惊醒了，母亲啊，他在我的尴尬的腐坏水池中醒来时，让怒火烧红了脸，因为水面上漂浮着牛至和锦葵芬芳的花瓣，漂浮着橙树刚刚绽放的花簇，也漂浮着因将军刚在芳香的水中排出的那串金黄松软的粪便而躁动的乌龟，这都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他挨过了这一幕，以及其他诸多这个年纪的糗事，也已经把侍从减到了最少，只为独自面对这些不让别人撞见，没有人会看见他头上裹着被油浸透的破布在空宅中整日整夜茫然游荡，倚着墙绝望地呻吟，因蜡烛木而反胃，被无法忍受的头痛逼疯，他甚至都没有对私人医生提起过这疼痛，因为他知道，这只不过是他衰老时期那么多无谓疼痛中的一种罢了，他会在大片暴风雨云出现之前便早早地感觉到

那疼痛仿佛石块爆裂一般到来，他刚把止血带缠在太阳穴上就发布了命令，不管发生什么，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府中，他命令道，在绑第二圈时，他感到头骨在嘎吱作响，连上帝来了都不许进，他命令道，即便我死了也不许进，他妈的，他因那残忍的疼痛而丧失了理智，那痛楚甚至没有留给他一刻思考的余地，直到绝望的数个世纪终结、大雨的祝福倾下，他才呼唤我们，而我们会看到他仿佛刚出生一般坐在备好晚饭的小桌边，面前是喑哑的电视屏幕，我们为他做了烧肉、肥肉配菜豆、椰香米饭和炸香蕉片，那是一顿对他的年纪来说难以负荷的晚餐，他一口都没尝就把菜放凉了，因为他一直在看电视上的同一部关于紧急救援的电影，他知道，如果政府在闭路电视上反复播放同样的节目并且没有察觉到录像带在倒放，那么他们一定有事想瞒着他，真他妈见鬼，他说道，想忘掉他们企图隐瞒他的事，如果是些更糟糕的事，他现在就会知道了，他一边这样说，一边在备好的晚餐前打起鼾来，直到教堂八点的钟声响起，他才拿着一口未动的饭菜站起身，把它们倒入马桶，从很久以前开始他每个晚上的这个时间都会这样做，为的是掩饰他的胃已经拒绝一切食物的耻辱，为的是借助他荣光年代的传说来打消老年疏忽之下的可憎行为所激发的自我怨恨，为的是忘记他还勉强活着，忘记是他而不是别人在厕所的墙壁上写下将军万岁、伟人万岁，忘记他曾经偷偷喝过一种巫医开的汤药，以期在一夜间想来多少次就来多少次，甚至和三个不同的女人来三次，他为老年的天真付出了愤怒甚于痛苦的泪水，他紧紧抓住厕所中的挂环哭喊着，我的心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憎恶我吧，用你的火焰之水净化我吧，带着骄傲执行你纯净的惩罚吧，因为他已经再清楚不过那时他所缺少的是什么，他在床上缺少的从来都不是荣耀而是爱情，他需要的不是他的外国部长兄弟为我奉上的那种贫瘠的女人，她们当初被送来是为了让他在隔壁学校关闭之后依然保持良好的习惯，都是些丰满不见骨的女人，是专门来伺候您的将军阁下，凭借外交豁免权，她

们从荷兰的玻璃展窗中、从布达佩斯电影节上、从意大利的大海里被飞机运来，您看多美啊，于是他看到了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仿佛歌唱老师一般端坐在他晦暗的办公室中，她们像艺术家一样褪下衣衫，躺在长毛绒的沙发上，温暖的金蜜色肌肤上还印着泳衣条带的印痕，仿佛胶卷底片一样，她们闻起来像薄荷味的牙膏，像玻璃瓶中的花朵，她们在那头不愿脱下军服的庞大的水泥阉牛旁躺下，而我试着用最温存的方式鼓励他，直到他厌倦了承受那死鱼的迷人的美，于是我对她说，这样就行了，姑娘，当修女去吧，他深陷在怠惰中，抑郁至极，于是在那个夜晚，在八点的钟声敲响时，他突袭了其中一个负责清洗士兵衣物的女人，他一把将她推倒在洗衣木槽上，虽然她惊惶地哀求说今天我不可以将军，相信我吧，是吸血鬼在的日子，并想借机逃跑，他却把她翻过身去让她趴在洗衣板上，使出一种圣经般的动力推撞着她，教那可怜的女人感受到了灵魂中死亡的嘎吱声响，她急促喘息着叫道太野蛮了将军，您一定学过怎么当驴吧，他在那痛苦的呻吟声中简直要飘飘然了，比听到那些职业谄媚者最狂热的赞歌还受用，于是他送给那洗衣工终身津贴，以方便她教育孩子，时隔多年在牛棚给母牛喂饲料时，他又重新唱起歌来，一月的月光明亮，他唱道，并没有想到死亡，因为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晚，他也不会允许自己脆弱地想起不合常理的事，他又数了两遍母牛，边数边唱，你是我黑暗小路上的光明，你是我的北斗星，他查出少了四头，而后回到楼内，一路上数着睡在总督衣架上的母鸡，为鸟笼盖上粗布罩时又点了酣睡的鸟雀，四十八只，他点燃了从第一门厅到会客厅之间被一头头母牛在白日里踢散的牛粪，他记起了遥远的童年，脑海中第一次出现了他自己瘫在荒漠冰原上的画面，还有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她从垃圾场的兀鹫口中抢下了一段羊肠当作午餐，十一点时，他又按反方向走遍了整栋房子，提着灯盏为自己照明，同时将屋子里直到门厅的灯一一熄灭，他在一面面昏暗的镜中看到一个个自己，十四位重复的

将军正拿着灯行走，他在镜子的尽头看到一头四仰八叉躺在乐室中的母牛，母牛，母牛，他喊着，它死了，这算什么事儿啊，于是他走过卫兵的卧室想对他们说镜子里有一头死牛，他命令他们明天尽早把它拖走，不得有误，要赶在兀鹫挤满大楼之前，他命令道，他举着灯将底层的老办公室又查了一遍，想找到另外那几头走丢的母牛，有三头，他在厕所中找，在桌子底下找，在每一面镜子中找，而后爬上主层依次检查一个个房间，却只在粉红斑点的蚊帐下找到了一只卧着的母鸡，那挂蚊帐属于另外时代的一位见习修女，她的名字他已经忘记了，他在睡前喝了一勺蜂蜜，然后将小瓶放回储藏处，那里还塞着一个小纸卷，上面写着一个日期，是杰出诗人鲁文·达里奥——愿他已坐在上帝天国的最高位——的某个纪念日，他将纸重新卷起来塞回了老地方，同时开始背诵准确无误的祷文，我们神奇的父与导师，那天才的里拉琴演奏者令飞机飘于天空令船舰浮于海上，他在无可救药的失眠中拖着那双大脚，穿过闪着旋转灯塔绿色朝霞的最后几个一晃而过的黎明，他听着来自那片离开了的海洋的风声，备感惋惜，他听着一支婚礼乐队奏响的灵魂哀乐，因为上帝的一个疏忽，他已在他背后、在那乐声中到了垂死的边缘，他撞见了一头迷路的母牛，于是挡住它的去路但没有去碰它，母牛，母牛，他向卧室走去，在经过的每一扇窗户中都看到了那座没有海的城市亮着光的街区，他感受到了它玄妙的脏腑的热气和它整齐划一的呼吸的秘密，他一连欣赏了它二十三遍，不曾停步，同时也像从前一样永远承受着那片浩瀚而无法参透的海洋、那属于把手放在心上入睡的民众的海洋的飘忽，他知道自己被最爱他的人厌恶，感到自己被圣人的烛光照亮，他听见自己的名字被人召唤，被唤去矫正分娩中的人的运气、改变濒死者的命数，他感觉自己的记忆被那些在看到他时骂他母亲的人拨动，而他们看到了那沉默的双眼、悲伤的双唇，以及那只若有所思、在遥远过去的梦游加长轿车上透明钢化玻璃后的新娘的手，我们亲吻他在泥地上留下的靴

印，炎热的夜晚从自家庭院中望见民政大楼窗口那没有灵魂的徘徊的光亮时，我们便给他送去神符避免横死，没有人爱我们，他叹息道，探头去看那死了的鸟贩、那黄鹂画家、他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的房间，她的身体横在一片青苔之上，愿你死得安详，母亲，他对她说，愿你死得非常安详，孩子，她在墓穴中答道，十二点整了，他将灯挂在门楣上，这时可怖的疝气放出了细弱的哨声，他的内脏因为这致命的扭动而受了伤，于是世上除了他疼痛的疆域之外再无其他空间，他最后一次锁上了卧室的三道门闩，在可移动式马桶上经受了微不足道的排尿的最终燔祭，而后倒在了光秃秃的地板上，穿着自终止了接见活动后他在府中一直穿着的粗俗的保暖裤，以及没有假领的条纹衬衣和一双残疾人的拖鞋，他面朝下趴在地上，右臂弯在头下当作枕头，片刻就睡着了，然而在两点十分，他在搁浅的思绪中醒了过来，衣服已被飓风来临前的暗淡而温热的汗液浸透了，谁在那儿，他战栗着问道，同时确信有人在梦中叫他但用的不是他的名字，尼卡诺尔，又一遍，尼卡诺尔，有人能够不开门锁就进入他的房间，可以随心所欲地穿墙进出，就在那时他看到了它，是死亡将军阁下，您的死亡，它穿着龙舌兰纤维编织的褴褛的忏悔长袍，手中抓着钩杆，头骨上遍布阴森的水藻嫩芽，骨缝中开出陆上的花朵，没了肉的眼窝里眼睛朽迈而惊恐，直到看到它的全身时，他才明白它喊的尼卡诺尔是死亡在我们死的那刻用来认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但他说不，死亡，他的时辰还没到呢，应该是在梦里在办公室的阴影里，就像盆中的预卜之水说的那样，但它回答说不，将军，就是这儿，光着脚，穿着您身上的破衣烂衫，不过找到他的那些人为了顺应女巫的预言，仍旧会说他死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左脚靴后跟上戴着金质马刺，在他最不想要它降临时，它降临了，在如此多年的贫瘠幻想之后，他开始隐隐明白，人不是在生活，真他妈见鬼，而是在苟活，人开始学习时已经太晚，即便是最博大最了不起的生命也仅

能达到学习怎么去活的程度，他从自己喑哑手掌的谜团里、从纸牌隐形的密码中，意识到了自己没有能力去爱，于是企图用权力的孤独罪恶的炽烈祭礼去补偿那无耻的命运，却在无尽燔祭的火焰中沦为自己献祭主张的牺牲品，他以诓骗与罪行养肥了自己，以无情与羞辱培育了自己，他克服狂热的贪婪与天生的怯懦只是为了将那颗玻璃球握在掌中直至时间的尽头，却不曾知晓这种罪恶没有尽头，正是它的饱足滋生着它的胃口，循环往复直至所有时间的尽头，将军阁下，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骗他是为了博他欢心，奉承他是为了赚他钱财，他们以武力逼迫民众聚集，要大家在他经过时欢呼雀跃，并高举讨好他的、上书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的牌板，那位领袖比他更老迈，但他学会了与这些相处，学会了与所有荣耀衍生的悲惨相处，并在无法数算的岁岁年年中发现，谎言比质疑更舒心、比爱更有用、比真理更持久，他已经并不意外地到达了可耻的臆想境地，无权力却在统治、无荣耀却受赞颂、无威信却被遵从，而此刻，在他秋天的那串飘落的黄叶中，他相信了，他从来就不会是他全部权力的主宰，他注定只能颠倒着认识生命，注定无法参透世事，无法在现实中的幻想的哥白林毯上捋直阴谋的线、解开诡计的结，同时丝毫不怀疑，哪怕死到临头也仍不怀疑，唯一可见的生活，就是被展示出来的那一个，我们从这边看到的并不是您的那个将军阁下，在穷苦人的这边，有我们无尽的不幸岁月的黄叶飘零，还有那些抓不住的幸福时刻，还有被死亡的幼芽污染的爱，但它是真真切切的爱啊将军阁下，在这边，您本人不过是个模糊的影子，是火车小窗灰蒙蒙的薄帘之后的哀怨眼睛，是那沉默嘴唇的颤抖，是那只戴缎面手套的无主之手一晃而过的挥别，那只手属于那个没有结局的老人，我们从来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什么样，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只是一个想象中的谎言，一个可笑的独裁者，我们从来不知道另一边在哪里、生命的权利在哪里，而我们仍以贪婪的热忱爱着这您不敢去爱的生命，您甚至不敢想象去爱它，因为您害怕知

道我们已经清楚得不能再清楚的事实：生命是艰辛又转瞬即逝的，然而再没有另一个生命了，将军，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谁，而他却永远不能知晓，他带着自己年迈死者那痴气的温柔哨声，被死亡一棍击中、连根折断，他在他秋天的最后几片冰冷树叶的阴暗声响中，飞向了被遗忘的真相的黑暗祖国，他惊恐地抓着死亡长袍上的破布烂线，远离了疯狂人群的呼喊，他们冲上街头唱着欢快的颂歌，庆祝他的死亡，他也将永久地远离那自由的音乐、幸福的焰火和那荣耀的钟声，它们正向世界宣告一则好消息，宣告那永恒的无尽时光终于结束了。

---

[1] “他主人的声音”是著名留声机品牌，商标图案上有只狗。


Del amor y otros demonios
爱情和其他魔鬼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陶玉平 译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陶玉平 译

爱情和其他魔鬼

南海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爱情和其他魔鬼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译者：陶玉平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5-11

ISBN：9787544278638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一
二
三
四
五

献给浸在泪水之中的卡门·巴尔塞伊丝[1]

---

[1] 卡门·巴尔塞伊丝（1930—2015），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经纪人。

看来，头发的复苏远比身体的其他部位缓慢得多。

——圣托马斯·阿奎纳[1]

《论人体复苏之整体性》（第五章，第八十问）

---

[1] 圣托马斯·阿奎纳（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托马斯哲学学派创立者，著有《神学大全》等。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这并不是一个有大新闻的日子。在我初涉记者行业的那家日报社，编辑部主任克莱门特·曼努埃尔·萨巴拉老师讲了两三句套话就结束了上午的会议。他没有给任何一位编辑下达具体任务。几分钟后，他从电话里得知有人正在挖古老的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墓穴，便不抱希望地给我下了一道命令：

“上那儿转一圈去，看看你能想到点儿什么可写的。”

这家克拉拉会的古老修道院一百年前就变成了一家医院，现在要被出售了，为的是在这个地方建一家五星级宾馆。由于房顶逐渐坍塌，它精美的礼拜堂几乎已经成为露天的了，可它的墓穴里还埋葬着三代主教、修道院的几位女院长和别的一些重要人物。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墓穴腾空，把遗骨交给相关人士，剩下的东西则扔进公墓里去。

他们采用的方法之原始令我震惊。工人们挥动着锄头铁镐打开墓穴，把那些一动就散架的腐朽棺木取出来，再把尸骨从混杂着破布和干枯头发的泥土块中分离出来。亡者的身份越尊贵，清理起来就越费事，因为得在一堆骸骨里扒拉半天，非常仔细地筛查，才能在残渣里找见宝石或是金银饰品什么的。

领班师傅在一个小学生用的本子上抄录下墓碑上的信息，并把骨头整理成小堆。为了不弄混，他在每堆骨头上都放了一张写有名字的纸条。这么一来，我走进殿堂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长溜的骨头堆，十

月的烈阳成束地从屋顶的豁口透下来，炙烤着它们，用铅笔写在纸条上的名字成了它们唯一的识别标记。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到现在还能感觉到那时光流逝的可怕见证带给我的惊愕。

在那些尸骨当中，有一位秘鲁总督和他的秘密情人；有堂托里比奥·德卡塞雷斯- 维尔图德斯，他当过这个教区的主教；有修道院的几位女院长，其中一位叫何塞法·米兰达嬷嬷；还有艺术学士堂克里斯托瓦尔·德埃拉索，他把半辈子都献给了制造镶板式天花板的事业。有一孔封闭的墓穴，墓碑上刻的是卡萨尔杜埃洛侯爵二世，堂伊格纳西奥·德阿尔法罗- 杜埃尼亚斯，可是人们把它打开后发现那是一处未使用的空穴。然而，侯爵夫人堂娜奥拉娅·德门多萨的遗骸却躺在紧挨着的一处墓穴里，且有自己单独的墓碑。领班师傅没把这当回事：一位土生贵族[1]给自己准备了坟墓，最后人们却把他葬在了另一座墓里，这是常有的事。

在主祭坛放《福音书》一侧的第三孔壁龛那里，出了点儿情况。铁镐刚一敲，墓碑便碎成了好几块，一绺古铜色的头发从墓穴里露出来，领班师傅叫了几个工人帮忙，想把头发完整地扯出来，可这头发越拉越长、越拉越多，最后竟然连着一个小女孩的头骨。壁龛里剩下的只有些散乱的细小骨头，石头墓碑被硝土腐蚀得漫漶不清，只能辨认出一个没有姓氏的名字：万圣护佑的谢尔娃·玛利亚。那头漂亮的长发在地上铺展开来，一量，有二十二米又十一厘米长。

领班师傅丝毫没有感到惊讶，他告诉我，人的头发每个月长一厘米，死后也是一样，就两百年而言，二十二米在他看来正好是个平均数。可我觉得这事儿并不寻常，因为小时候外婆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位侯爵的千金，一头长发拖在身后，就像新娘的纱裙；十二岁

那年她被狗咬了一口，得狂犬病死了；在加勒比地区的村子里，她因为多施奇迹而极有人望。这处墓穴有可能属于她，这想法就是我那天收获的特大新闻，也是我写作此书的源头。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西印度群岛卡塔赫纳，一九九四年

---

[1] 指在拉丁美洲出生的西班牙贵族。

一

十二月的头一个礼拜天，一条脑门上长着块白斑的灰狗在市场里错综的窄道上横冲直撞，先是打翻了卖油炸食品的桌子，接着把印第安人的货摊和卖彩票的棚子撞得稀烂，最后又顺道咬伤了沿路碰上的四个人。三个是黑奴，另一个就是万圣护佑的谢尔娃·玛利亚，她是卡萨尔杜埃洛侯爵的独生女，那天她带着一个混血女佣去买一串她十二岁生日庆祝会用的铃铛。

虽说事先叮嘱过她们不要走到商街的门廊外面去，可是那女佣被黑奴交易港口的吵闹声吸引住了，那里正在卖最后一批几内亚来的奴隶，她不顾一切地走到了客西马尼城郊的吊桥那儿。近一个礼拜以来，人们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期盼着加的斯黑奴公司的这条船，因为上面莫名其妙地死了许多人。为了掩饰，他们把尸体扔进大海，却连块石头也不绑，清晨海水一退潮，肿胀而变了形的尸体就都漂到了海滩上，泛出一种奇怪的紫色。船在港湾外抛了锚，因为人们担心这是某种非洲瘟疫的苗头，直到后来才弄清楚，那是由于吃了不新鲜的肉而食物中毒。

那条狗穿过市场的时候，剩下的“货物”已经卖完了，由于“货物”的身体状况极差没卖上好价钱，这会儿卖主正试图仅凭一件奇货挽回损失。这是一个来自阿比西尼亚的女奴，身高七拃半，身上涂抹的不是惯常的商业用油，而是甘蔗炼成的糖浆。她美得令人难以置信，人人见了都心荡神移。她的鼻子又细又长，头圆圆的，两眼微微斜

着，一口牙齿整整齐齐，又阴差阳错地长了一副罗马角斗士的身材。在围场里他们没往她身上打烙印，也没有报出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而是把她当作一件尤物出售。市长没还价，且一次性付清，花的钱是和她等重的黄金。

野狗们或是把猫追得满世界乱跑，或是同秃鹫为了争夺大街上的一块肉而打得不可开交，顺便咬伤个把人，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尤其是在去波托韦罗赶集的帆船队路过此地时人多货杂的日子里。一天当中有四五个人被咬，谁都不会因此而大惊小怪，像谢尔娃·玛利亚这样左脚踝上被咬了一口，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就更不值得一提了。所以那女佣并没在意。她自己用柠檬和硫黄给小女孩涂了涂伤口，又把她衬裙上的血迹洗干净，接着大家满脑子想的便都是这孩子十二岁生日的喜庆事了。

女孩的母亲贝尔纳达·卡布雷拉，是卡萨尔杜埃洛侯爵没有封号的妻子，这天一大早她喝下了一服大剂量泻药：七颗锑片外加一杯玫瑰糖水。她本是一个粗野的梅斯蒂索[1]女人，出身于一个人们所谓的“柜台贵族”家庭；她风流成性，贪得无厌，凡事爱热闹，胃口大得堪比一支军队。然而，不过几年时间，因为贪吃发酵蜂蜜和可可饼，她便美貌不再。一双酷似吉卜赛人的黑眼睛变得黯淡无光，那股机灵劲儿也不见了，下面便血，上面吐胆汁，从前美人鱼般的曼妙身材变得十分臃肿，皮肤蜡黄蜡黄的，活像一具停放了三天的死尸，而且放起屁来又响又臭，连猎犬都会被吓跑。她足不出户，难得走出房间时要么赤身露体，要么披一袭哔叽布长袍，里面什么也不穿，看起来比一丝不挂还要赤裸。

陪谢尔娃·玛利亚出去的女佣回来时，贝尔纳达已经狂泻了七次，女佣没对她提起被狗咬的事情，倒是讲起了港口那儿卖女奴惹的风波。“要是真像大家说的那么美，可能是个阿比西尼亚女人。”贝尔纳达说道。可就算是示巴女王，她觉得也不可能有人会花和她等重的黄金去买。

“他们说的恐怕是金比索吧。”她说。

“不，”他们跟她说得很明白，“是花了和那个黑女人一样重的黄金。”

“一个七拃高的女奴至少得有一百二十磅重吧，”贝尔纳达说，“一个女人，黑的也好白的也罢，怎么也值不了一百二十磅黄金吧，除非她能屙出钻石来。”

论起买卖奴隶，谁也比不上她精明，她知道，如果市长真的买下了那个阿比西尼亚女人，绝不是为了让她做点什么侍奉厨房之类高尚营生。她正这么想着，突然听见了第一阵笛号声和节庆的鞭炮声，紧跟着笼子里的几只猎犬一阵狂吠。她走了出去，来到橘园里，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堂伊格纳西奥·德阿尔法罗- 杜埃尼亚斯，卡萨尔杜埃洛侯爵二世兼达连的领主，此时正在橘园里两棵柑橘树之间的吊床上午睡，也听到了乐声。他长相苦巴巴的，好逞能，因为梦见被蝙蝠吸了血，此刻脸色惨白。在家里走动的时候他总穿件贝都因人那种带风帽的外衣，头上戴顶托莱多圆帽，更使他显出一副无依无靠的样子。看见太太完全赤裸着身子，他抢先开了口：

“这是什么音乐？”

“不知道，”她答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侯爵也不知道，他应该是真的感到十分不安才会这样问妻子的，而妻子这会儿的苦胆也一定是舒缓了许多，答话时没有丝毫挖苦的口气。侯爵心事重重地从吊床上坐了起来，这时鞭炮声又响了。

“老天爷，”他大叫一声，“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这座府邸旁边是一家叫作“神圣牧者”的女疯人院。关在那里的女病人被乐声和鞭炮声惊动了，纷纷跑上朝向橘园的露台，为每一响鞭炮声鼓掌欢呼。侯爵大声问她们是哪儿这么热闹，她们的回答使他恍然大悟。今天是十二月七号，圣安布罗斯主教日，奴隶们的院子里响起的乐声和鞭炮声是为谢尔娃·玛利亚庆生的。侯爵用手掌拍了一下脑门。

“没错没错，”他说，“她过几岁生日？”

“十二岁。”贝尔纳达答道。

“她才十二岁吗？”说着侯爵又在吊床上躺了下来，“这日子过得太慢了！”

这座府邸直到本世纪初还一直是本城的骄傲，现在已经破败了，阴森森的，空空荡荡，很多东西胡乱放置着，一副随时要搬家的模样。厅堂里棋盘似的方格大理石地面尚保存完好，几盏水晶灯的吊坠上面挂满了蜘蛛网。厚厚的石灰石墙壁和多年的封闭使得那些仍住着人的房间一年四季都凉凉快快的，当然更多的还是因为十二月的微风会带着哨音从缝隙里吹进来。如今，这里的一切都笼罩在邋遢带来的

压抑和阴暗之中。当年侯爵一世威严高傲的表征如今只剩下五条守夜的凶猛猎犬。

奴隶们的院子里吵吵嚷嚷，正在为谢尔娃·玛利亚庆祝生日，在老侯爵的年代，这里曾是一个城中之城。到了他的继承人这一代，在贝尔纳达在马阿特斯榨糖厂用一只左手便可以掌控奴隶和面粉这两宗不正当生意的年代，也还大体保持了原样，而现在，这一切的辉煌都成了过去。贝尔纳达因为贪得无度已经日薄西山，这院子也缩小成了两间用棕榈叶铺顶的木板棚，辉煌年代的最后一点余晖已消耗殆尽。

多明伽·德阿德文托，一个正派的黑女人，直到去世前夜一直用她的铁腕掌控着这个家，她是两个世界之间的纽带。这个又高又瘦的女人思维敏捷、洞察一切，谢尔娃·玛利亚就是她带大的。她早已皈依天主教，却没有放弃对约鲁巴教的信仰，她同时信着两个教，没什么规律和准头。她常说自己的灵魂很安宁，因为在一个宗教里找不到的东西，她会在另一个宗教里找到。她也曾是唯一能够在侯爵和他太太之间斡旋调停的人，他们两个人也都有心讨好她。碰见有奴隶躲在空屋子里鸡奸或是互相交换女人干那种事的时候，也只有她能拿起扫帚把他们赶出来。可是自从她死了以后，奴隶们为了躲避正午的炎热，就都从木板棚里逃了出来，随便找个角落往地上一躺，时不时从大锅里抠下点锅巴什么的吃吃，或是躲在过道里的凉快地方玩玩马库科牌或者响片之类的游戏。在那个受压迫的世界里，谁都没有自由，除了谢尔娃·玛利亚：只有她有，她也只有在那个地方才有自由。于是，那里就成了她庆生的地方，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家，有她真正的家人。

在如此喧闹的音乐之中，自家的和其他富贵人家的奴隶欢聚在一起，这样的歌舞场面不可能沉闷。女孩玩得很尽兴，她的舞跳得比非洲人还要欢快潇洒，又能改变嗓音用好几种非洲语言唱歌，模仿鸟鸣

和动物的叫声时搞得鸟儿和动物都有点不知所措。按照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去世前的吩咐，最年轻的几个女奴用烟灰给小女孩涂黑了脸，往她受过洗礼的肩上套上了一串又一串萨泰里阿教项链，又把她的头发梳理整齐。那头长发从来没有剪过，要不是每天把辫子盘成好多圈，连走起路来都要碍事。

在相反力量的交叉处，她一点一点长大了。她身上像妈妈的地方极少。相反，她瘦削的身材、无可救药的腼腆、白皙的皮肤、沉郁的蓝眼睛，以及那一头亮闪闪的纯铜色头发，都来自父亲。她一举一动都静悄悄的，无影无形。她的妈妈被她这种奇特的天性吓住了，在她的手腕上挂了串小铃铛，为的是在昏昏暗暗的家里能随时知道她在哪儿。

生日过去两天后，女佣无意间把谢尔娃·玛利亚被狗咬的事情告诉了贝尔纳达。贝尔纳达一边用香皂洗她当天第六次热水澡准备上床睡觉，一边把这事想了一下，等走回卧室的时候，她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再想起来已经是第二天的夜里了：猎狗们无缘无故地一直狂吠到天亮，她有点担心它们是不是得了狂犬病。于是，她拿起烛台来到院子里的木棚中，看见谢尔娃·玛利亚躺在油棕榈吊床上睡得正香，那吊床还是多明伽·德阿德文托留给她的。女佣没告诉她咬在了什么地方，她撩起女孩的袍子，用灯照着，顺着那条麻烦的辫子一点一点地查看女孩的身体，那辫子缠绕在她的身上，活像条狮子的尾巴。最后，她终于找到了被咬的地方：伤口在左脚踝上，已经结痂，另外，脚后跟上还有几处肉眼几乎看不出来的擦伤。

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上，狂犬病例既不少有，也不是无足轻重的。最臭名昭著的要数一个小贩那次，他平日里经常带一只养熟了的猴子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那猴子的行为举止和人几乎没什么两样。那畜

生在英国人海上围城期间得了狂犬病，往主人脸上咬了一口，逃进附近山里去了。那个倒霉的小贩后来在一次恐怖的发作中被人们乱棒打死，直到很多年以后，母亲们还把这事编成里巷小曲，用来吓唬孩子。小贩死后不到两个礼拜，一群恶魔般的野猕猴大白天从山上下来，祸害了猪圈和鸡栏，又闯进了教堂。它们嚎叫着，嘴上沾满了带血的泡沫，当时人们正在那里为庆祝英国军队失败大唱感恩诗。然而，那些最恐怖的场面并没有被载入历史，因为它们发生在黑人群体当中，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在野外围个场子，给被咬的人施一些从非洲传来的魔法，算是治疗。

尽管已经有了这么多的教训，在那些一经出现便已无可挽回的症状出现之前，无论白人黑人还是印第安人，谁都不会往狂犬病那儿去想，也不会往其他潜伏期长的疾病去想。贝尔纳达·卡布雷拉依然故我，她想，奴隶们编起故事来总是比基督徒更快更离奇，而哪怕是一个简单的狗咬人事件都可能会损害家族的声誉。她对自己的推断十分自信，就没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丈夫，直到下一个礼拜天，女佣一个人去了趟市场，看见巴旦杏树上挂了条死狗，好让大家都知道这条狗是得狂犬病死的，而女佣一眼便认出了那条狗脑门上的白斑，还有那一身的灰毛，正是咬了谢尔娃·玛利亚的那条。但是贝尔纳达听说了之后还是不以为然。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伤口早已经结痂，那几处擦伤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

十二月的天气一开始不太好，可过了不久，下午的天空就恢复了紫水晶一般的透亮，夜间也刮起了惬意的微风。因为从西班牙传来了好消息，这一年的圣诞节也比往年过得快活。但是这座城市已经没了往昔的模样。主要的奴隶市场已经迁到哈瓦那去了，这边大陆上的矿

产主和农场主都更乐意去英属安的列斯群岛购买更便宜的走私劳力，这样一来就好像有了两个城市：一个在那些大帆船停泊在港口的六个月里，欢天喜地，熙熙攘攘，另一个在剩下的六个月里，昏昏欲睡，等待着大帆船的归来。

此后再没有听说有狗咬人的事情发生，直到一月初的一天，一个喜欢走街串巷的印第安女人敲响了侯爵家的大门，当时正是神圣的午睡时刻。这女人大家都叫她萨坤达，已经老得不成样子，拄着一根长长的拐棍，赤着脚在大太阳底下行走，一条白床单把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的。这女人因干些修补处女膜或是打胎之类的营生而臭名远扬，但她也有好名声，那就是她通晓印第安人的各种秘密，能使被宣告不治的人起死回生。

侯爵在门厅里站着接见了她，心里很不高兴，这女人说话慢吞吞的，又爱绕弯子，侯爵费了很大劲儿才弄明白她想要说什么。她兜了一个又一个的圈子还没进入话题，侯爵终于失去了耐心。

“有什么话您就快说吧，别再拐弯抹角了。”侯爵说。

“我们正面临一场狂犬病瘟疫的威胁，”萨坤达说，“圣休伯特是猎人的保护神，也是狂犬病的治愈之神，而我是唯一一个握有他的钥匙的人。”

“我看不出会有什么瘟疫，”侯爵对她说，“没有什么预兆，既没发现彗星又没看到日食，而且据我所知，我们也没有犯什么大的过错，让上帝这么关照我们。”

萨坤达告诉侯爵，三月份会有一次日全食，并一五一十地对他讲了十二月第一个礼拜天发生的狗咬人事件。其中，两个人已经失踪

了，肯定是家里人把他们藏了起来以便对他们施魔法，第三个人在第二个礼拜发狂犬病死了。还有第四个人，并没有被狗咬，只是沾了些那条狗的唾沫，现在也在圣爱医院里等死。这一个月来，警长已经下令毒死了一百来条野狗，再过一个礼拜，大街小巷不会再有一条活着的狗。

“不管怎么说，我看不出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侯爵说，“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

“第一个被狗咬的就是您的女儿。”萨坤达说。

侯爵回答她的时候无比自信：

“要是真有这事的话，我准会第一个知道。”

他认为女儿平平安安的，假若她身上发生过这么可怕的事情，他不可能一无所知。所以他果断地结束了会见，回去继续睡他的午觉。

不管怎样，下午他还是去了趟奴仆们的院子找谢尔娃·玛利亚。这孩子脸被抹得漆黑，光着脚，头上缠了条女奴们缠的红头巾，正在帮忙给兔子剥皮。侯爵问她是不是真的被狗咬了，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没有。可这天晚上贝尔纳达向他证实了这事。侯爵有点不知所措，问道：

“那谢尔娃为什么不承认呢？”

“因为你就没办法让这孩子说句实话，哪怕是在她大意的时候。”贝尔纳达说。

“看来得做点什么了，”侯爵说，“因为那条狗得了狂犬病。”

“恰恰相反，”贝尔纳达说，“你还不如说，那条狗是因为咬了她才活不了的。出事的时候是十二月，而直到现在这小贱人还活得像一朵花一样。”

他们都继续关注着有关疫情的各种愈演愈烈的议论，两人虽都不大情愿，还是就这个共同的话题又交谈了一次，倒有点像过去他们之间结怨还不太深的时候。对侯爵而言，事情很清楚。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爱这个女儿的，可现在，对狂犬病的恐惧使他不得不承认他为了省心一直在自己骗自己。贝尔纳达正好相反，问都没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她十分清楚地知道，她不爱这个女孩，这个女孩也不爱她，她觉得这样很公平。他们之间会因为这女孩产生怨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身上既有这个人又有另一个人的影子。不管怎样，只要这女孩死得其所，贝尔纳达已经准备好演一出号啕大哭的好戏，表现一个伤心欲绝的母亲的哀伤，以此维护她自己的名誉。

“她怎么死都可以，”她把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只要别跟狗的病有关系就成。”

就在这一刻，侯爵仿佛被天火灼痛一样，突然明白了他这一生的意义所在。

“这孩子不会死的，”他坚定地说，“即便真的要死，那也一定是按上帝的意愿死去。”

礼拜二他去了趟位于圣拉匝禄山上的圣爱医院，想去看看萨坤达对他提起过的那个狂犬病人。他没有去想他车上那些吊丧用的皱巴巴的丝绸挽带会给正在孕育中的灾难增添点什么凶兆，因为好多年了，

他没什么大事是不出门的，而好多好多年以来，除了丧事就没发生过什么大事。

这座城市浸没在几个世纪之久的荒凉中，尽管如此，影影绰绰地看见这位心神不定的绅士那憔悴的面容和躲闪不定的眼神的人却不在少数；他就这么乘着马车、穿着塔夫绸丧服出了城，穿过田野，朝着圣拉匝禄山驶去。医院里那些躺在砖地上的麻风病人看见他迈着死人一般的步态进来，便上前挡住去路向他讨施舍。就在那间关着长年躁狂的疯子的病房里，一根柱子上拴着那个狂犬病人。

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穆拉托人[2]，头发和胡子像棉花一样白。他本来已经半身不遂，可自从得了狂犬病之后，他另外半个身子力量大得出奇，人们不得不把他拴在柱子上，免得他在墙上把自己撞得粉身碎骨。他的话没留下丝毫疑问：咬他的正是那条脑门上有白斑的灰狗，也就是咬了谢尔娃·玛利亚的那条。实际上那条狗只是舔了他，不过不是舔在好皮肤上，而是舔在他小腿肚子的一处旧伤上。这个细节没能使侯爵放下心来，他离开了医院，因看见那个人垂死的模样而惊恐万分，他觉得谢尔娃·玛利亚一丝希望也没有了。

顺着山坡回城的路上，他碰见了一个相貌非凡的人，那人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身旁是一匹死马。侯爵吩咐停车，那人站起身来，他这才认出原来是阿布雷农肖·德圣佩雷拉·卡乌医生，他是这座城里最有名气也最有争议的医生。他的长相和棒花纸牌里的国王一模一样，头戴一顶遮阳的宽边草帽，脚下踏着马靴，身披一件自由人的黑斗篷。他以一种很不寻常的方式向侯爵问好。

“上帝保佑一切正派人。[3]”他说。

他的马上坡时一路小跑，下坡时却没能抗住，心脏爆裂累死了。侯爵的车夫奈普图诺打算把那匹马的鞍子卸下来，却被鞍子的主人劝住了。

“我连马都没有了，还要鞍子做什么呢，”他说道，“就让它和那匹马一块儿烂在这里吧。”

车夫费了挺大劲儿才把他孩子般的肥胖身躯弄上车，侯爵格外照顾，让他坐在自己的右边。阿布雷农肖还在想他的马。

“好似我这个人死去了一半一样。”

“这世上没有比办一匹马的后事更容易的了。”侯爵对他说。

阿布雷农肖突然来了精神。“这匹马可不一样，”他说，“要是办得到，我会找块圣地把它埋了。”他看了一眼侯爵，想知道他有什么反应，然后接着把话说完：

“十月份它刚满一百周岁。”

“没有任何一匹马能活那么大岁数。”侯爵说。

“但这一点我可以证实。”医生说。

他每个礼拜二到圣爱医院来给那些麻风病人看些麻风病以外的疾病。他是胡安·门德斯·涅托医师的得意门生，后者也是葡萄牙籍犹太人，为了躲避在西班牙的迫害才来到加勒比。阿布雷农肖从他的老师那里继承来的是广行妖术和出言不逊的坏名声，可没有人会去怀疑他的学识。别的医生容忍不了他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诊断和异乎寻常的疗法，他也经常为这类事和他们打得头破血流。他发明过一种药丸，

一年只需服一颗，能强身健体、益寿延年，但这药丸在服用的头三天里会引发智力错乱，以致除了他自己没人敢冒险服用它。他以前还常在病人床头弹奏竖琴，为的是用某些特意创作的曲子使病人镇静下来。他从不做外科手术，因为他一向认为那都是骗子和剃头匠们搞的低劣把戏，而他骇人听闻的本领是预测病人死亡的日期和钟点。然而，好名声也罢，坏名声也罢，都是建立在同一件事情上的：据说，而且从来没有任何人出面否认，他曾让一个死人起死回生。

尽管见多识广，阿布雷农肖还是被那个狂犬病人的情况震撼了。“人的身体被创造出来，不是为了受这样的罪的。”他说。他这番详尽而富有感情的评论，侯爵没敢漏掉一个字，等到他无话可讲了，侯爵才开了口。

“能为这个可怜人做点什么吗？”他问道。

“只能把他杀了。”阿布雷农肖答道。

侯爵看了他一眼，心中惊恐万分。

“如果是善良的基督徒，我们至少应该做到这一点。”医生无动于衷地继续说道，“您别担心，先生：这世上善良的基督徒还是要比我们想象的多一些。”

其实，他指的是住在城郊和乡村的各种肤色的贫苦基督徒，他们确实有胆量在得了狂犬病的家人的饭菜里下毒，好让他们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不要太过吓人。上世纪末，发生过一次全家人一块儿喝下毒汤的事件，因为谁都没有勇气单独毒死一个五岁的小男孩。

“人们都以为我们这些当医生的对发生的这一类事情一无所知，”阿布雷农肖总结道，“其实不然，可问题是要支持这样做我们又缺乏道德权威。于是只能反其道而行，对那些垂死之人做一些您刚才看见的那种事。我们把他们交托给圣休伯特，把他们绑在柱子上，让他们受更长时间的苦，死得更惨。”

“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吗？”侯爵问道。

“自打狂犬病首次爆发到现在，就从来没有过什么办法。”医生说。他又谈起一些过于乐观的文章认为狂犬病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并给出了好几种处方：地钱草、朱砂、麝香、水银，以及紫叶花。“净干蠢事儿。”医生说，“事实上是有些人会得这病，另一些人却不会得，于是人们就轻易地得出结论，说没得这病的是因为这些药起了作用。”他寻找着侯爵的目光，以确定他仍旧醒着，然后结束了他的谈论：

“您为什么对这事有这么大兴趣？”

“同情而已。”侯爵撒了谎。

他从车窗向外面看去，下午四点，大海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发现燕子已经归来，他心头一紧。还没有起风，泥泞的海滩上，一群孩子正用石头追打一只迷途的鹈鹕。侯爵目送鹈鹕躲闪、飞翔，最后消失在城墙内闪闪发亮的穹顶间。

马车从一座被叫作“半个月亮”的土门进入城里，阿布雷农肖给车夫指着路，马车穿过布满作坊的喧闹城区，往他家驶去。这一路可不容易，奈普图诺已经年过七十，做事没一点主意，还是个近视眼，他更习惯的方式是让马自己顺着认识的路走，因为马比他还认路。当他

们终于到了医生家，阿布雷农肖在门口用一句贺拉斯的诗句向他们道别。

“我听不懂拉丁语。”侯爵道歉说。

“您根本就没必要听懂！”医生说。当然，这句话他也是用拉丁语说的。

看样子侯爵是被深深触动了，他回到家中做的第一件事是他平生最怪异的举动。他吩咐奈普图诺去圣拉匝禄山把那匹死马收拾好，葬进一块圣地，第二天一大早，又给阿布雷农肖送去了他马厩里最好的一匹马。

泻药给贝尔纳达带来的轻松转瞬即逝，接着，为了扑灭五脏六腑里燃烧的火焰，她开始了一日三次的安慰性灌肠，或是一天六回的香皂热水澡，好让神经放松下来。刚结婚时的那种劲头现在已经荡然无存，想当年，她也曾以占卜师般的胸有成竹在商场上叱咤风云，成果辉煌，直到那个倒霉的下午，她认识了犹达斯·伊斯卡柳特，从此一蹶不振。

她是在某次集市上的一个围场里偶然看见他的，当时他身上几乎一丝不挂，没有任何保护，徒手在和一只公牛格斗。他看上去那么俊美，那么勇猛，她一见不忘。几天后，在狂欢节的昆比亚舞会上她又遇见了他，那一次她戴着面具，化装成一个女乞丐，身边簇拥着一大群装扮成侯爵夫人、穿金戴银、珠光宝气的女奴。犹达斯在一个看客围起的场子中央，跟付他钱的女人跳舞，还有人在焦急等待和他跳舞的女人间维持着秩序。贝尔纳达问他要多少钱。犹达斯一边跳一边回答说：

“半个里亚尔。”

贝尔纳达一把揭下了自己的面具。

“我是问买下你的一辈子要花多少钱。”她说。

犹达斯看出来了，露出的面孔和女乞丐可没多大关系。他推开自己的舞伴，迈着水手般的高傲步伐向她走来，好让她知道他价格不菲。

“五百金比索。”他说。

她用资深评估师的眼光打量了他一番。他身材魁梧，皮肤像海豹一样光滑，躯体曲张有致，窄窄的胯部，修长的双腿，两只手温润平和，与他的职业不大相符。贝尔纳达估测道：

“你有八拃高。”

“外加三西班牙寸。”他说。

贝尔纳达让他低下头，以便自己够得着看看他的牙齿，他胳肢窝里的氨气味儿熏得她心荡神移。他的牙齿完整、结实、排列整齐。

“你的主人要是以为会有人出一匹马的价钱把你买下，那他准是疯了。”贝尔纳达说道。

“我是自由之身，我自己卖自己。”他回答道，接着又拿腔拿调地补了一句：“太太。”

“叫侯爵夫人。”她说。

他向她行了一个宫廷式的鞠躬礼，搅得她喘不上气来，最终，她花了要价的一半把他买了下来。“就因为他看上去很舒心。”她是这样解释的。条件是，她尊重他自由人的身份，也给他继续和马戏团的公牛戏耍的时间。她把他安顿在离自己的卧室很近的一个房间里，那儿原来是马夫住的，从第一天晚上起她就脱得一丝不挂，虚掩房门，等候着他的到来，信心满满地以为他一定会不请自来。可是她足足等了两个礼拜，欲火烧身，彻夜难眠。

其实，自打知道了她的身份、看见了府邸内貌，他便立刻保持了仆人的距离。然而，当贝尔纳达不再等候他，插上房门、穿上睡袍睡觉，他却从窗户进了她的房间。他的汗臭味充斥在整个房间里，把她从梦中惊醒。她感到他像人身牛头怪似的喘着粗气，在黑暗中摸摸索索地寻找着她。压在她身上的躯体火辣辣的，一双捕猎的手抓住了她的领口，把睡袍撕成两半，耳边是他压低的嗓音：“婊子，婊子。”从这个夜晚开始，贝尔纳达明白了：她这辈子再也没有别的渴求了。

她为他发狂。每晚他们一起到城郊去参加烛光舞会，他一身绅士打扮，长礼服加圆礼帽，都是贝尔纳达按他的喜好买给他的，起初她还把自己装扮成各色人物，后来索性就以本来面目示人。她让他浑身披金戴银：金链子、金戒指、金手镯，还给他牙上镶了钻石。当得知他和遇到的每个女人都上床时，她觉得自己就要死了，可最后她认命了，自甘残羹剩饭。就是在这段时间的一天里，多明伽·德阿德文托以为贝尔纳达在榨糖厂忙碌，午睡时间进了她的房间，撞见他们一丝不挂，在地上做爱。女奴把手停在了门环上，与其说是被吓住了，不如说看得眼花缭乱。

“别像个死人似的待在那里，”贝尔纳达冲着她大吼，“你要么滚开，要么就过来和我们滚在一起。”

多明伽·德阿德文托走开时用力甩上了房门，贝尔纳达听着就像一记耳光那样响亮。这天晚上，贝尔纳达把她找来，威胁她说，要是她敢把今天看见的事透露半个字，就让她吃不了兜着走。“您别担心，主人，”女奴对她说，“您有权禁止我做任何事情，我一定照办。”然后她又加了一句：

“可糟糕的是，我心里想什么您没法禁止。”

后来侯爵知道了这事，也假装毫不知情。说到底，他和妻子之间仍旧共有的只有谢尔娃·玛利亚，而他并没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看待，而是当成妻子一个人的女儿。贝尔纳达则对女儿根本不上心。她把这个女儿远远地抛在了脑后，以至于有一回，她在榨糖厂待的时间有点儿长，女孩长个子了，模样也变了，回来后她竟然把她当成了别的女孩。她把女孩叫过来，打量了老半天，又盘问了半天她是怎么过活的，可就是没能从女孩嘴里套出哪怕一个字的回答。

“你和你爸一个样，”贝尔纳达对女孩说，“都是怪物。”

侯爵那天从圣爱医院回家后，两人仍保持着各自先前的态度，侯爵向贝尔纳达宣布，他决定用作战式手段掌控家中大权。他的口气是那样强硬，容不得贝尔纳达反驳。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女儿的祖母——老侯爵夫人——的卧房归还给孩子，当年是贝尔纳达把女儿从这间卧房赶走，让她去和奴仆们住在一起的。虽然到处都蒙上了一层灰土，这间卧房的辉煌气派却不减当年：帝王级别的大床上闪闪发光的黄铜部件一直被女奴们当成纯金的；蚊帐是用新娘才用的纱幔做成的，各式各样的金银丝带让人眼

花缭乱，雪花石洗脸池旁放着数不清的香水瓶，梳妆台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各色化妆品；尿壶、瓷质痰盂、吐漱口水用的小盅之类物品应有尽有：老太太因患风湿病瘫痪在床，她梦想有朝一日能把这个梦幻般的世界留给自己的女儿，可她从未生育过女儿，又想留给孙女，可到死她也没能见上这个孙女。

女奴们收拾这间卧房的同时，侯爵忙于在家中建立自己的法度。他把躲在拱廊的阴凉里打瞌睡的奴隶们都轰了出去，又吓唬他们说，要是再看见他们在角落里解手，或是关起门来赌钱，就要用鞭子抽他们，还要把他们监禁起来。这些并不是什么新规定。在贝尔纳达掌权、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充当执行官的年月里，这些规定执行得比现在严厉得多，当年侯爵也曾当众得意扬扬地宣扬他那句历史性的名言："在我的家里，我不用发号施令，只须服从。"可是后来，贝尔纳达深陷于可可之中不能自拔，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又死了，奴隶们便悄悄地钻了空子，先是女人们把孩子带过来帮忙做点小事，后来男人们也都偷起懒来，躲在走廊里乘凉。那时，贝尔纳达被破产的幽灵吓得半死，就让奴隶们上街去自己讨饭吃。在一次危急时刻，她甚至决定，只留三到四人照料家务，其余的一律放出去，但侯爵却不讲理地反对道：

"要是他们一定会饿死，就让他们死在这里好了，总比死在荒郊野外强。"

谢尔娃·玛利亚被狗咬后，侯爵不再墨守这些简单的成式。他找来一个既有威望又值得信赖的奴隶，授予他权力，向他下达的严厉指令连贝尔纳达都为之一惊。当天晚上，这座府邸自多明伽·德阿德文托死后第一次显得井然有序，侯爵在女奴的棚屋里找到了谢尔娃·玛利亚，

她和五六个年轻的女黑奴一道睡在横七竖八、高高低低的吊床上，侯爵把她们全叫了起来，向她们宣布了新政权的规定。

“从今天起，这个女孩要住在自己家里，”他告诉大家，“你们大家都听好了，在这个王国里，她只有一个家，那就是白人的家。”

他想把她抱去卧房的时候，女孩一直在反抗，他不得不让她明白这个世界是由男人统治的。到了老祖母的卧房，他给她脱下女奴们穿的粗布衬裙，换上睡衣，女孩始终一言不发。贝尔纳达站在房门口看着他们：侯爵坐在床边，女孩站在他面前毫无表情地看着他，扣眼是新的，侯爵费了好大劲儿也没能把扣子扣上。贝尔纳达忍无可忍了。“你们俩怎么不结成两口子呢？”她嘲笑道。侯爵没理她，她又说道：

“到时候产下个土生的女侯爵崽子，长着一双母鸡的脚，卖给马戏团也能挣不少钱呢。”

她也有了些许变化。虽说她的笑声依然疯狂，脸上却少了些尖刻的表情，在她的不知廉耻底下沉淀了些许同情，侯爵却没能察觉。刚觉得她走远了，侯爵便对女孩说道：

“她是个脏女人。”

侯爵觉得女孩闪现了一丝兴趣的火花。“你知道脏女人是什么意思吗？”他问女孩，渴望她能有所回应。谢尔娃·玛利亚没有答话。她听任自己被放倒在床上，听任自己的头被安置在羽毛枕头上，听任还散发着松木箱气味的麻布被单一直拉到她的膝盖处，却看也没看侯爵一眼。侯爵感到心里一阵颤动：

“你睡觉前做祷告吗？”

女孩还是没看侯爵一眼，她蜷起身子——这是在吊床上养成的习惯——连晚安也没说就睡着了。侯爵小心翼翼地把蚊帐拉好，免得蝙蝠在她睡着的时候来吸她的血。已经快十点钟了，因赶走了奴隶而清静了不少的府邸里充斥着女精神病人的吵闹声，让人受不了。

侯爵放出猎犬，它们都像受了惊似的向老祖母的卧房窜去，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围着门缝嗅来嗅去。侯爵用手指挠了挠它们的头，用一则好消息让它们安静了下来：

“是谢尔娃，从今晚起她就和我们住在一起了。”

疯人院里的女病人们一直唱到夜里两点，侯爵睡得又少又糟糕。鸡叫头遍，侯爵起了床，第一件事就是到女孩的房间去，可她已经不在那里了，而是在女奴们的棚屋里。离她最近的那个女奴被叫醒时吃了一惊。

“是她自己跑来的，老爷，”没等侯爵开口问话，她抢先说道，“我连知都不知道。”

侯爵知道她说的是实话。他问谢尔娃·玛利亚被狗咬的时候是谁陪在她身边。她们当中唯一一个穆拉托女奴，叫卡莉达·德尔科布雷的，吓得哆哆嗦嗦地说是她。侯爵叫她别害怕。

“从今往后，你就把自己当成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像她那样照料她。”

侯爵向她说明了她的职责。他提醒她要寸步不离地跟着女孩，要爱护她，理解她，但不要宠惯她。他说他马上会在奴隶们的院子和府

邸其余的房子之间修一道带刺的篱笆，最要紧的便是不要让她越过这道篱笆。早上醒来之后，晚上睡觉之前，不等他开口询问，就必须把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他。

“做什么，怎么去做，都要想仔细了，”侯爵最后说道，“我的命令执行得好坏，就看你了。”

早上七点，侯爵先把猎犬都关进笼子里，之后便去了阿布雷农肖的家。医生亲自给侯爵开的门，因为他既没有奴隶也没有仆人。侯爵一上来就先表达了歉意。

“这个时候登门造访一定很唐突。”

医生刚刚收到侯爵相赠的马匹，心存感激，诚心诚意地接待了侯爵。他领着他穿过院子，来到一个棚子下，那里过去是个打铁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个破烂不堪的炉子。一匹漂亮的两岁大的枣红马因为离开了旧槽，看上去有点躁动不安。阿布雷农肖拍拍马的脸，安抚着它，一面对着马耳朵用拉丁语嘟囔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许诺。

侯爵告诉他，那匹死了的马已经被埋在了圣爱医院的老果园里，那是霍乱时期埋葬有钱人的墓地。阿布雷农肖对侯爵这一特别的善举深表感谢。他们聊天的时候，他注意到侯爵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侯爵承认自己从来没敢骑过马。

“我害怕马，也害怕鸡。”他说。

“真遗憾，人类正是因为缺乏和马的交流才止步不前的，”阿布雷农肖说道，“如果什么时候消除了这种障碍，我们就可以造出半人马

来。”

屋内，朝向大海开着两扇窗户，十分明亮，房间的布置显出无可救药的单身汉那种过于讲究的风格。空气里飘散着一股药膏的香味，使人不由得对医药产生一种信任感。写字台上整整齐齐，玻璃柜里满满当当地摆着各种小瓷瓶，上面都贴着拉丁文的标签。他那架治病用的竖琴被弃置于房间的一个角落，上面落了一层金黄色的尘土。最引人注目的是书籍，好多都是拉丁文的，书脊的装饰精致华美。书要么放在玻璃书橱里和敞开的书架上，要么被很小心地摞在地板上，医生在字纸围成的狭窄通道里穿行自如，如同一头犀牛穿行在玫瑰丛中。看到这么多的书，侯爵有些惊诧。

“所有能知道的知识大概都在这间房子里了吧。”他说。

“书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阿布雷农肖心情很好，“我这一辈子都耗在医治别的医生用他们的药治出的病上了。”

医生从那把专属于他的大安乐椅上赶走了一只睡觉的猫，让侯爵坐下，又在他的炼丹炉上煮了一杯草药茶递给侯爵，然后对侯爵大谈特谈他的从医经历，直到发现侯爵对这些事失去了兴趣。确实如此：侯爵突然站起身来，背对医生，从窗口瞭望空旷的大海。最后，还是那样背对着医生，他找到了开口说话的勇气。

“大夫。”他嘟囔道。

阿布雷农肖没预料到他会叫自己。

“嗯？”

“在医生严格保守医疗机密的前提下，我只向您一个人坦白：大家说的都是真的，”侯爵的声音里透着一种庄重，“那条疯狗也咬过我的女儿。”

说完他看向医生，看到的是一个平静的灵魂。

“这事我知道，”医生说，“我猜想这就是您一大早到我这里来的原因。”

“正是如此。”侯爵答道。他把先前就医院里那个被狗咬的人提的问题又问了一遍：“我们能做点什么吗？”

这回，阿布雷农肖一改头一天那种粗鲁的回答方式，要求见一见谢尔娃·玛利亚。这正中侯爵下怀。意见一致，马车就等在大门口。

到了府邸，侯爵看见贝尔纳达正独自坐在梳妆台前梳理头发，一副卖弄风骚的样子，很多年以前他们最后一次做爱时他看见过这样子，如今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房间里弥漫着她的香皂那春天般的芳香气息。她从镜子里看见了侯爵，不动声色地问了句：“我们是什么人物呀，能这样随随便便把马送给别人？”侯爵避而不答，从乱七八糟的床上捡起一件日常穿的长袍，扔在贝尔纳达身上，毫不留情地说道：

“把衣服穿上，医生来了。”

“还是让上帝来救救我吧。”她说。

“不是来给您看病的，虽说您病得也不轻，”侯爵说，“是给孩子看病。”

“对她不会有任何用处的，”她说，“她要么死要么不死：没别的可能了。”可说完她的好奇心又占了上风：“请的是谁呀？”

“阿布雷农肖。”侯爵告诉她。

贝尔纳达惊骇不已。她宁愿就这样光着身子孤零零地死掉，也不会把自己的名誉交到这样一个伪善的犹太人手中。这人曾是她父母的医生，他们都恨透了他，因为他常常为了吹嘘自己的诊断泄露病人的病情。侯爵站到了她面前。

“尽管您不愿意，而我更不愿意，但您终究是孩子的母亲，”他说，“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神圣的权利，我请求您准许这次检查。”

“我无所谓，你们想干吗就干吗吧，”贝尔纳达说，“就当我死了。”

出乎意料的是，女孩毫不忸怩地接受了对她身体的仔细检查，甚至带着一种观察发条玩具似的好奇。“我们医生看病靠的是两只手。”阿布雷农肖这样对她说。女孩很开心，第一次对他露出了笑容。

女孩的健康状况显然毫无问题，她的神情看着孤苦伶仃，可她的身材十分匀称，布满了若有若无的金黄色茸毛，一副蓓蕾初开的样子。她牙齿齐整，眼睛炯炯有神，两脚沉稳，双手灵巧，每一绺头发都预示着这孩子能长命百岁。她愉快而不容置疑地回答了种种巧妙的问题，不是十分了解她的人根本听不出来她的回答没有一句是实话。直到医生摸到她脚踝下方那处伤口时，她才紧张起来。狡黠的阿布雷农肖抢先问道：

“你跌过跤吗？”

女孩眼睛眨也不眨地回答：

“从秋千上摔下来过。”

医生自言自语地说起了拉丁语。侯爵打断了他：

“请您讲拉迪诺语。”

“这话不是说给您听的，”阿布雷农肖说，“我这是在用中古的拉丁语思考。”

阿布雷农肖的这套把戏让谢尔娃·玛利亚感到很开心，最后他又把耳朵贴在她胸口听诊。女孩的心脏像是受了惊，怦怦乱跳，皮肤上渗出苍白冰冷的汗珠，隐隐散发出洋葱的气味。医生检查完，亲切地拍了拍她的脸颊。

“你很勇敢。”他说。

等到单独和侯爵在一起时，医生对侯爵说，这孩子其实知道那是条疯狗。侯爵一时没有听懂他的话。

“她跟您撒了好多谎，”侯爵说，“但并没有提过这件事啊。”

“不是她告诉我的，先生，”医生说，“是她的心告诉我的：她的心跳得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青蛙。”

侯爵细细回味女儿说过的那些令人吃惊的谎话，非但没有生气，反倒有一种做父亲的骄傲。“说不定这孩子以后会成为诗人。”他说。阿布雷农肖不赞同撒谎是一种艺术天分的想法。

“话说得越透亮，才会越有诗意。”他说。

医生唯一无法解释的是女孩的汗水为什么会散发出洋葱味。由于对气味和狂犬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一无所知，他就认为那算不上是什么病症。后来侯爵从卡莉达·德尔科布雷那里得知，谢尔娃·玛利亚悄悄地试过奴隶们的法子，他们让她嚼一种叫刺藤黄的药膏，又脱光她的衣服把她关在洋葱窖里，说这样能抵抗狗的妖术。

阿布雷农肖直言狂犬病的种种细节。“咬的伤口越深，离脑部越近，最初发作起来就越严重，也越快。”他说。他回忆起他过去的一个病人，那人五年之后才死，但不能确定的是，那人会不会后来受过别的感染而自己毫无察觉。很快就结痂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在一段无法预知长短的时间之后，伤疤可能会肿胀、溃烂、化脓。临死时的痛苦不堪忍受，可谓生不如死。到了那个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圣爱医院求助，那里有几个训练有素的塞内加尔人专门对付发了疯的异教徒和中了邪的人。否则，侯爵本人就得承担起责任，把女孩用链子拴在床上，直到她死去。

“在人类已经很漫长的历史上，”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谈论，“还没有哪一个狂犬病患者可以活下来给人讲这些事情。”

侯爵做出决定：不管是什么样的十字架，也不管有多重，他都要扛起来。这女孩要死也得死在自己家里。医生报以与其说是尊敬不如说是怜悯的眼神。

“从您的角度来说，没有比这更高尚的做法了，先生，”他对侯爵说，“我坚信以您的灵魂所具有的勇气，您一定撑得住。”

他再一次强调说，看上去不是很要紧，受伤部位离危险区域很远，也没有人记得那里出过血。可能性最大的是谢尔娃·玛利亚根本没

得狂犬病。

“那这段时间还该做些什么呢？”

“这段时间，”医生说，“为她演奏音乐，给家里放满鲜花，让小鸟唱唱歌，带她去看看大海边的黄昏，为她做一切能使她快乐的事情。”医生告别时在空中挥了挥礼帽，用拉丁语说了句客套话。可这回他出于对侯爵的尊敬把这句话翻译了过来：“凡是幸福无法治愈的，任何药物也都无法治愈。”

---

[1] 指欧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所生的混血儿。

[2] 指黑白混血儿。

[3] 原文为拉丁语。

二

没有人知道侯爵是怎么走到如此狼狈的地步的，也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维持如此糟糕的婚姻，而未在当年选择过一种鳏夫的平静生活。他本可以凭借父亲的显赫权势畅所欲为，要知道他的父亲侯爵一世曾是圣地亚哥骑士团的骑士、靠绞架和刀剑发家的黑奴贩子、毫无心肝的军团长官，国王陛下曾不吝赐予他各种荣耀和俸禄，亦从未对他的种种劣行加以惩处。

伊格纳西奥作为唯一的继承人，却没能显示任何本领。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表现出无可否认的智力迟缓的迹象，到了该知书达理的时候却仍是一个大字不识，也没爱过任何人。他体验的第一个生命征候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出现，当时他坠入爱河，准备娶被关在神圣牧者疯人院里的一个女病人为妻，她们的歌声和号叫声曾是他童年的摇篮曲。她叫杜尔丝·奥莉维亚，是一个给王室制作皮革用品的家庭的独生女，从小就被迫学做马鞍，以免这个有着近两百年历史的家族手艺在她手里失传。硬着头皮闯入属于男人的行业，这是人们能给出的造成她精神失常的原因，她疯得太厉害，连让她明白不能吃自己身上的虱子都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如果不考虑这点，对一个愚钝的土生侯爵来说，她倒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结婚对象。

杜尔丝·奥利维亚天性活泼，脾气很好，轻易发现不了她是个精神失常的人，年轻的伊格纳西奥从第一次看见她起，就能从露台上乱哄哄的人群中辨出她来，也就是那一天，他们通过打手势互通心意。她

是个扎风筝的能手，用小纸鸽给他传递信息，而他正是为了与她通信才学会了读书写字，这段正正当当的恋情就这样开始了，但注定得不到理解。老侯爵吓坏了，逼迫儿子当众否认。

“首先，这是真事儿，”伊格纳西奥回答道，“而且我已得到她的允许，准备向她求婚。”对于她是精神病人一说，他这样反驳：

“一个疯子，只要有人能接受他的逻辑，他就不能算是疯子。”

父亲以他原本不屑行使的一家之主的权威把他赶到了庄园里。伊格纳西奥成了活死人。除了母鸡之外，他什么动物都害怕。然而，在庄园里，他近距离地观察了一只活母鸡，在脑海里把它想象成一头母牛那么大，既而意识到母鸡是一种比水里陆上其他任何生物都要可怕得多的怪物。夜色深沉时，他浑身冒冷汗，而破晓时分醒来时又因牧场那吓人的静寂而喘不上气来。一条眼睛眨也不眨地守在他卧房门口的猎犬，反而比其他任何威胁都更令他感到不安。他曾这样说：“我活在自己竟然还活着的恐惧当中。”在流放的日子里，他养成了阴郁的性格，为人处事小心翼翼，好沉思冥想，总是无精打采，说话慢吞吞的，从此，他仿佛因身负一项神秘天命而被关进了修道院的单人清修房间一般。

在流放的第一年里，有一回他在睡梦中被巨大的响声惊醒，那声音就像发洪水，那是一个满月的夜晚，庄园里的牲畜都悄无声息地从过夜的圈栏里跑到了旷野中。它们沿着一条直线，一声不吭，把一切挡道的东西都踩倒在地，穿过牧场和甘蔗田，蹚过湍急的河流和沼泽地。打头阵的是大牲畜群，外加驮马和走马，后面跟着猪羊和各种家禽，它们排成怪异的行列，消失在黑夜中。就连擅长长途飞行的鸟儿们，包括鸽子，也都大摇大摆地步行离去。清晨，留下的唯有那条守

在主人房门口的猎犬，从那时起，侯爵便和那条猎犬以及后来陆陆续续养在府中的其他猎犬结下了近乎人类间的情谊。

年轻的伊格纳西奥心中充满了对荒芜庄园的恐惧，他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屈从于父亲。父亲并未满足于儿子在爱情上做出的牺牲，在遗嘱里列下条款，命儿子娶一位西班牙显贵的女儿为妻。就这样，伊格纳西奥在一场豪华铺张的婚礼上迎娶了堂娜奥拉娅·德门多萨，这是一个长相漂亮又多才多艺的女子，可伊格纳西奥碰也没碰过她，根本不给她生孩子的机会。除此之外，他继续过着他有生以来一直在过的生活：一个无用无能的单身汉的生活。

堂娜奥拉娅·德门多萨把他带回了人间。他们一起去望大弥撒，与其说是出于信仰不如说是为了去亮相，她穿着镶了重重叠叠花边的裙子，披肩闪闪发光，头巾上的花边按照卡斯蒂利亚白人女子的法子浆过，身后跟着一群身着绫罗绸缎、披金戴银的女奴。她脚上穿的不是那种连最讲究的女人去教堂时都会穿的居家便鞋，而是一双山羊皮缝制的饰有珍珠的高筒皮靴。其他有钱有势的男人都戴着不合时宜的假发，衣服上的扣子都是用绿宝石做的，侯爵和他们不一样，他身穿棉布衣裳，头戴一顶白色礼帽。不过他都是被迫去参加这些公众活动的，因为他始终无法克服对社交生活的恐惧。

堂娜奥拉娅曾在塞戈维亚拜斯卡尔拉提·多梅尼克为师，而且获得了在学校和修道院教授音乐和唱歌的资格。她从娘家带来了一架拆散了的古钢琴，自己把它组装好，还带来了几件弦乐器，并以卓越的技艺弹奏和教学。她成立了一个见习修女乐团，每到下午，府邸里便飘荡着来自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新曲调，人们说，这个乐团一定是受圣灵抒情诗的启示而诞生的。

侯爵似乎对音乐一窍不通。按法国人的说法，他是艺术家的手、炮兵的耳。可自打乐器从箱子里取出来的那一天起，他就迷上了那把意大利古诗琴，它那奇特的双琴头、巨大的指板、众多的琴弦和清澈的声音令他痴醉。为了让他弹得和自己一样出色，堂娜奥拉娅费尽了气力。他们一上午接一上午地在果园里的大树下磕磕巴巴地演奏，她满怀爱意，竭尽耐心，他则像石匠一样执着，直到忏悔的牧曲心悦诚服地把自己交到他们手中。

琴瑟和谐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堂娜奥拉娅鼓足勇气迈出了一直没能迈出的那一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也许是装出了一副害怕的样子，来到了从未亲近过的丈夫的卧室。

“这张大床有一半是我的，”她对他说，“我现在来要回我的那一半。”

侯爵不为所动。她也毫不动摇，满怀信心地认为无论是讲理还是用强，总有打动他的那一天。但是，十一月九号这天，空气纯净，天高云淡，他们正在柑橘树下弹琴，突然一道闪电使他们眼前一黑，天崩地裂一声巨响，堂娜奥拉娅被闪电击中身亡。

满城的人都被这事震惊了，议论纷纷，说这个悲剧一定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孽引得天怒爆发所致。侯爵下令举办女王级别的葬礼。在葬礼上，他头一次身穿黑色塔夫绸露面，面色憔悴，这副样子将跟随他一辈子。从墓地回来，他惊异地发现，纷纷扬扬的小纸鸽像雪花似的飘洒下来，落在果园里的柑橘树上。他随手抓住一只，拆了开来，看到上面写着：那道闪电是我发出的。

在九天的祭祀结束之前，侯爵把他继承下来的遗产的重头都捐给了教会：蒙波斯和阿亚佩尔的两处牧场、距离此处只有十来西班牙里的马阿特斯的两千公顷土地、好几群驮马和走马、一座农场以及那座加勒比沿岸最好的榨糖厂。然而，他的财富之所以披上传奇色彩凭借的却是那片闲置的辽阔无垠的庄园，人们早已不记得它的边界，在想象中，它越过了拉瓜里帕沼泽和拉普雷萨低地，直抵乌拉巴丛林。他留下的只有那座庄严的府邸、那个已经缩小到不能再小的奴隶们住的院子，以及马阿特斯的榨糖厂。他把家中的管理大权交给了多明伽·德阿德文托。老迈不堪的奈普图诺从侯爵一世开始就当车夫，侯爵维护了他的尊严，让他照看家中已经所剩无几的马匹。

他第一次孤身一人待在先人留下的阴沉沉的大宅里，夜不能寐，怀着土生贵族与生俱来的恐惧，生怕睡梦中被奴隶杀害。他经常从梦中惊醒，恍然不知那些从天窗偷窥的炽热眼神到底来自阳世还是阴间。他会踮起脚尖走到门口，突然打开房门，让正从锁眼里偷看他的奴隶吃上一惊。他感觉到他们迈着老虎般的脚步悄无声息地在走道里窜来窜去，身上一丝不挂，涂满了椰子油，以免被人捉住。深受种种恐惧的折磨，侯爵下令家里的灯火要一直点到天明，并把逐渐占据了各处空间的奴隶全都赶了出去，又给家里带回了第一批受过格斗训练的猎犬。

大门关上了。法式家具上的天鹅绒因为受潮发出臭味，被整个儿清理掉了，挂毯、瓷器和精美时钟也给卖掉了，被拆空的房间里炎热难当，于是挂上了几张牛蒡草编的吊床。侯爵再也不去望弥撒，也不再静修，宗教游行时也不再举着至圣至灵的华盖，不再过各种宗教节日，也不遵守斋戒，但仍坚持按时向教堂缴纳税金。他把吊床当成了自己的庇护所，在昏昏欲睡的八月里睡在卧室，但几乎总是在果园里

的柑橘树下睡午觉。那些疯女人朝他扔厨房的垃圾，喊各种挑逗的脏话，可当有一天政府向他提出要把疯人院迁走的时候，他却因为对这些疯女人心存感激而断然拒绝了。

意中人的冷落使杜尔丝·奥莉维亚感到气馁，她靠回味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获得安慰。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从果园里的小门逃出神圣牧者疯人院。她用满怀善意的食物收服了那些猎犬，用睡觉的时间来照料这座从来也不属于她的大宅，她用罗勒草编成的扫把打扫，以求好运，又在卧室里挂起一串串的蒜瓣驱赶蚊虫。多明伽·德阿德文托是那种对什么事都要求万无一失的人，她到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早上起来走廊里总是比头天晚上干净许多，又为什么她归置好的东西第二天早上总会变了次序。直到丧妻快一年的时候，侯爵才第一次在厨房里撞见杜尔丝·奥莉维亚，她正在清洗厨房里的家什，因为她觉得女奴们洗得太马虎。

“我没想到你这么大胆。”侯爵对她说。

“这是因为你一直都是个可怜虫。”她说。

就这样，他们之间被禁的友谊又得以恢复，并且至少一度与爱情相像。他们常常聊到天亮，既无幻想也无怨恨，就像一对注定要回归平淡的老夫老妻。他们觉得自己很幸福，兴许也真的幸福，直到他或她多说了一句或是少走了一步，于是这一夜就完全变了味儿，成了汪达尔人之间的战场，连猎犬们都会垂头丧气。于是，一切又会回到起点，杜尔丝·奥莉维亚会从这个家消失很长一段时间。

侯爵坦诚地告诉她，他蔑视地产、改变生活态度，并非出于虔诚，而是当他看见妻子的身体被闪电烧焦时，一下子失去了信仰，取

而代之的是恐惧。杜尔丝·奥莉维亚主动安慰他，对他说从今往后无论在厨房还是在床上都将做他温顺的奴隶，但侯爵还是不为所动。

“我这辈子再也不会结婚了。”他对她发誓。

然而，只过了不到一年的光景，侯爵就悄悄地娶了贝尔纳达·卡布雷拉，她父亲曾是老侯爵的总管，后来靠做进口食品生意发了财。他们是在她父亲让她送盐渍鲱鱼和黑橄榄到侯爵家时认识的，这些都是堂娜奥拉娅的至爱，她死后，贝尔纳达继续给侯爵送这些东西。一天下午，贝尔纳达在果园里的吊床上发现了他，并读出了他左手皮肤上的命运符号。她算得很准，侯爵惊叹不已，从此以后一到午睡时间就派人把她叫来，即使他什么也不买。可是，两个月过去了，侯爵一点主动的迹象也没有，于是她就替他做了。在吊床上，她猛然骑在了侯爵身上，用他长袍的下摆堵住他的嘴，几乎让他背过气去。就这样，她以一种侯爵在自慰带来的可怜兮兮的欢愉中想象不到的热情和技巧使他重新焕发了生机，毫不留情地剥夺了他的童贞。此时侯爵已经五十二岁，她则只有二十三岁，但相比之下，年龄差异带来的危害算是最微不足道的。

午睡时分，在柑橘树福音般的阴凉下，他们继续这样做爱，无心无肺，匆匆了事。女疯子们在露台上唱着肆无忌惮的歌给他们鼓劲，为他们的每一次成功爆发出体育场里那种雷鸣般的掌声。不等侯爵对渐渐逼近的危险有所察觉，贝尔纳达便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把他从麻木中惊醒。她提醒侯爵，她不是黑人，她是一个拉迪诺印第安男人和一名卡斯蒂利亚白人女子的女儿，所以，弥补她名誉的唯一办法就是举行一场正式的婚礼。侯爵迟迟不作答复，直到有一天她的父亲斜挎着一杆老式火枪，在午睡时分敲响了他家的大门。他

说话慢条斯理，态度温和，没有直视侯爵的眼睛，而是把枪递了过去。

“您认识这是什么吗，侯爵先生？”他问道。

侯爵手里拿着火枪，有点不知所措。

“要我说，我觉得这是一杆火枪。”侯爵说，然后带着真诚的好奇问道：“您拿它干什么用呢？”

“保护我不受海盗的欺负，先生，”印第安人说这话时还是没去看侯爵的脸，“我现在把它带来，是希望在我动手杀死阁下之前，您开开恩先把我杀了吧。”

说完他直视侯爵的脸，那双小眼睛悲伤而默然，可侯爵还是读懂了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他把火枪还给了他，邀请他进屋庆祝协议达成。两天后，附近一座教堂的神父主持了婚礼，出席的有贝尔纳达的父母和双方的教父教母。婚礼结束时，萨坤达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给新婚夫妇戴上了象征幸福的花冠。

一天清晨，在一场迟来的暴风雨中，被怀了不足七个月的万圣护佑的谢尔娃·玛利亚在人马座下艰难诞生，她看上去就像一只透明无色的小蝌蚪，脐带缠在脖子上，差点把她勒死。

“是个女孩，”接生婆说，“我看她活不了。”

这时，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向她的神灵许愿，说只要让这孩子活下来，她的头发将一直留到新婚之夜再剪。许愿的话声未落，女孩哇地哭出声来。多明伽·德阿德文托高兴地大声唱道：“她会成为一位圣

女！”侯爵并没有这样的先见之明，他见到女孩的时候，她已经被洗得干干净净，穿好了衣服。

“她会成为一个婊子，”他说，“要是上帝肯赐予她生命与健康的话。”

这个女孩，一个贵族与一个平民结合而生的女儿，像个弃婴一般过完了童年。母亲给她喂了唯一一次奶之后就视她为仇敌，不肯把她带在身边，说是害怕自己会杀了她。是多明伽·德阿德文托把她喂养长大，给她施了基督教洗礼，同时把她奉献给了奥罗昆，这是约鲁巴族的一位神灵，性别不明，面容据猜测十分可怕，只能在睡梦中见到，而且总戴着面具。谢尔娃·玛利亚在女奴们的院子里长大，还不会说话就学会了跳舞，又同时学会了三门非洲语言，学会了在斋戒期间喝公鸡血、在基督徒中间来无影去无踪地穿行，像个无影无形的精灵。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在她周围安排了一大群欢乐的女黑奴、梅斯蒂索女佣和印第安女跟班，她们用据说对她有好处的水给她洗澡，用叶玛雅[1]的马鞭草净化她的心灵，像照看玫瑰园一样照看她那头瀑布似的长发——她五岁的时候已经长到齐腰长。时光流逝，女奴们一串接一串地给她戴上了代表各种各样的神灵的项链，总共有十六串。

就在侯爵整日在果园里消磨时光的时候，贝尔纳达已经用她的铁腕掌握了家里的大权。她的第一项作为就是在老侯爵往日权势的庇护下，把被丈夫散去的家财补回来。当年老侯爵曾获准在八年内卖出五千名奴隶，条件是每进口一名奴隶必须同时进口两桶面粉。经他云山雾罩的一番游说，再给海关人员一些好处，他卖掉了规定量的面粉，但私底下又多卖了三千名奴隶，这使他一举成为他那个世纪最飞黄腾达的个体商贩。

是贝尔纳达意识到，最赚钱的买卖不是奴隶，而是面粉，不过，实际上她的大笔生意主要靠的是她那不可思议的说服人的本领。仅靠在四年内进口一千名奴隶、每个奴隶搭配三桶面粉这样一项许可，她就发了大财：她卖掉了协议规定的一千名奴隶，但她并非只进口了三千桶面粉，而是一万两千桶。这是那个世纪规模最大的走私。

她有一半时间待在马阿特斯榨糖厂，她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办事中心，原因是那里离马格达莱纳河最近，同总督管辖区的内陆交通方便。不时会有关于她发了财的零星消息传到侯爵府来，但她从不向任何人透露账目。而住在府邸里的时候，甚至在她陷入危机之前，她总像是另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猎犬。多明伽·德阿德文托说得好："她的身体已经装不下她的屁股了。"

她的老女奴死后，谢尔娃·玛利亚第一次在这座府邸里有了自己稳定的居所：人们把老侯爵夫人住过的豪华卧室给她收拾了出来。他们请了一位家庭教师给她教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语，也讲点算术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常识。家庭教师竭尽全力想教会她读书写字，她拒绝了。据她自己说，她根本就理解不了那些字母。一个从世俗学校来的女教师启发她欣赏音乐，女孩表现出了兴趣和良好的品位，可她对学习任何一种乐器都没有耐心。女教师惊愕之余辞去了工作，告别时对侯爵说：

"与其说这女孩对任何事情都关上了大门，不如说她根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贝尔纳达也曾想抚平自己对女孩的怨气，但事实很快就证明，责任既不在她这边，也不在女孩那边，水火不容的是她们的天性。从自以为发现女儿身上有一种幽灵似的特质开始，她就总是心悬一线。只

要想到自己一回头就可能看见那个郁郁寡欢的女孩——身上穿着薄薄的纱裙，疯长的头发已经披到脚踝，两只眼睛神秘莫测——她就不寒而栗。“丫头！”她大声训斥，“不许这样看着我！”每当全神贯注地投入到生意当中，她总感觉脖子后面有一条蛇伺机而动，发出嘶嘶的声响，这时她就会吓得跳起来。

“丫头！”她会高声嚷道，“你进来之前出点儿声好不好！”

而女孩总会用一长串约鲁巴语让她更加恐惧。到了夜里情况就更糟糕，因为贝尔纳达常常从梦中惊醒，感到有人触碰她，其实是女孩站在床脚看她睡觉。给她手腕上拴上铃铛也不管用，因为谢尔娃·玛利亚一举一动都悄无声息，铃铛根本不会发出响声。“这孩子身上唯一属于白种人的东西就是她皮肤的颜色。”她妈妈这样说。这话一点不错，因为女孩甚至给自己起了一个非洲名字：玛利亚·曼丁加。

一天早晨，潜伏在她们之间的危机爆发了：贝尔纳达因为服用了过多的可可饼，早晨醒来时口渴得要命，却发现水罐底漂浮着谢尔娃·玛利亚的一个洋娃娃。她并不认为这只是漂在水里的一个洋娃娃，而把它想成更恐怖的东西：一个死洋娃娃。

她坚信这一定是谢尔娃·玛利亚在对她施一种非洲巫术，于是狠下决心：这家里有我无她。侯爵怯生生地试图调解，可贝尔纳达干脆地打断了他：“要么留她，要么留我。”就这样，谢尔娃·玛利亚又回到了女奴的棚屋里，就连她妈妈去榨糖厂的时候也不例外。她还是像刚出生时那样静默，也还是一个大字不识。

但贝尔纳达的状况仍不见好转。她一心想留住犹达斯·伊斯卡柳特，不惜让自己变得像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她的生意和生活便

都出了问题。她常常把他打扮成努比亚海盗、金杯纸牌里的A或是梅尔基奥王，把他带到郊外，特别是在大帆船停泊在港口、举城狂欢的那半年里。他们随心所欲地光顾城外的酒馆和妓院，那都是为从利马、波托韦罗、哈瓦那和维拉克鲁斯来的商人们开的，这些人为争夺整个新大陆的商品和货物而来。一天晚上，在一家为划船奴开的酒馆里，喝得醉醺醺的犹达斯神秘兮兮地靠近了贝尔纳达。

“张开嘴，闭上眼睛。”他对她说。

她照他说的做了，于是他在她的舌头上放了一片瓦哈卡的神奇巧克力。贝尔纳达尝出了味道，把那玩意儿吐了出去，因为她从小就特别厌恶可可。可犹达斯劝她说，这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吃了能愉悦身心、增强体力，还能让人精力充沛、性欲旺盛。

贝尔纳达爆发出一阵大笑。

“要真是这样的话，”她说，“那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小修女们早都变成斗牛了。”

她吃发酵蜂蜜上了瘾，结婚前她就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吃，而现在，被榨糖厂炎热的空气包围，不光是嘴，她的五种感官都在享用这东西。她跟着犹达斯学会了嚼烟叶和掺了号角树燃烧后的余烬的古柯叶，像内华达山的印第安人那样。在小酒馆里，她尝过印度大麻、塞浦路斯松节油、里尔－德卡托尔塞的佩奥特掌，也至少尝过一次由菲律宾商人带来的中国鸦片。不过，她对犹达斯为可可做的宣传也并非充耳不闻。把各种东西品了一圈之后，她知道了可可的好处，这玩意儿成了她的最爱。犹达斯最后沦为小偷和皮条客，偶尔也犯一回鸡奸什么的，为了堕落而堕落，因为他什么都不缺。在一个活该他倒霉的

夜晚，他在牌场上跟人起了纠纷，当着贝尔纳达的面，他赤手空拳和三个划船奴打了起来，结果被他们用椅子砸死了。

贝尔纳达躲进了榨糖厂。侯爵的府邸像一艘船似的随波逐流，如果说那时还没有沉没，那全是因为多明伽·德阿德文托的老练操控，最终，她按照她那些神灵的愿望把谢尔娃·玛利亚抚养长大。侯爵对妻子的崩溃知之甚少。榨糖厂那边传来消息说，她精神失常了，总是一个人自说自话，还时不时挑一些殷勤卖力的奴隶陪她及她的老同学们共度良宵。钱财流水般来，也流水般去。幸亏她东一点西一点地藏了几皮囊的蜂蜜和几口袋的可可，才不会在瘾头上来的时候耽误时间。当时，她剩下的唯一实在的东西是满满两罐面值一百块和四块的达布隆金币，那是她在生意顺风顺水的时候埋在床底下的。她被毁得不成样子，连续三年没有回家，最后一次从马阿特斯回来的时候，连她的丈夫都认不出她了，之后没过多久，谢尔娃·玛利亚就被狗咬了。

到了三月中旬，感染狂犬病的危险似乎消除了。侯爵十分庆幸于自己的好运，决定弥补过去的缺失，用阿布雷农肖开的幸福疗方征服女儿的心。他把全部时间都投在了女儿身上。他努力学着给女儿梳头，给她编辫子，努力教她做一个真正的白人女孩，让她重拾一个土生贵族失落的梦想，要她戒除爱吃腌鬣蜥和烧犰狳的毛病。他几乎什么都试过了，只除了一件事，那就是问问自己，这样做是不是真的能使女儿幸福。

阿布雷农肖继续来侯爵府探望。和侯爵交流对他来说并不容易，但侯爵那种超脱于宗教法庭威权之外的糊里糊涂的态度使他颇感兴趣。炎热的月份就这样消磨过去了，医生在柑橘花盛开的树下自言自

语，而侯爵则在离一个从未听见过他名字的国王一千三百西班牙海里远的地方，躺在吊床上自生自灭。就在某一次这样的探访期间，他们突然被贝尔纳达的惨叫声打断。

阿布雷农肖吃了一惊，而侯爵却装作没听见，可接下来的又一声惨叫太凄厉了，侯爵不能再装聋作哑了。

“不管这人是谁，都需要帮助。”阿布雷农肖说。

“是我的第二任妻子。”侯爵说。

“她的肝坏掉了。”阿布雷农肖说道。

“您怎么知道的？”

“因为她呻吟时嘴是张着的。”医生说。

医生没得到准许就推开了门，想看看待在黑暗屋子里的贝尔纳达，可她没在床上。他叫了叫她的名字，她也没有答应。接着他打开了窗户，在四点钟刺眼阳光的照射下，她一丝不挂，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致命的胀气使她浑身发亮。她的皮肤因胆汁外溢颜色暗淡。她抬起头来，被突然打开的窗户那儿射进来的光刺得睁不开眼。逆着光，她一下子没认出医生来。而医生只消瞧上一眼就知道了她的结局。

“猫头鹰已经在冲你唱歌了，我的孩子。”他对她说。

医生告诉她，只要她肯接受一次净化血液的紧急治疗，还来得及救她的命。这时，贝尔纳达认出了医生，用力支起身子，发出一阵辱

骂。阿布雷农肖平静地忍受了那些脏话，又关上了窗户。临走时，他在侯爵的吊床前停下脚步，发出再清楚不过的预告：

“侯爵夫人活不过九月十五号，除非她在此之前把自己吊在房梁上。”

侯爵面不改色，说了句：

“唯一不幸的是现在离九月十五号还远着呢。”

他继续在谢尔娃·玛利亚身上施行幸福疗法。站在圣拉匝禄山上，向东望去是一片不祥的沼泽，往西面看，一轮巨大的红日正沉入燃烧着的洋面。女孩问他在大海的那一边有什么，他说：“世界。”他发觉自己的每一个举动都会在女儿身上引起出乎他意料的反应。一天下午，他们看见鼓满帆的大帆船队出现在地平线上。

城市一下子变了样。木偶戏、吞火人，无穷无尽的新鲜玩意儿在那个充满好兆头的四月涌向港口集市，令父女俩大为开心。谢尔娃·玛利亚在这两个月里学会的白人的东西超过了以前所有的时光。让女儿改头换面的同时，侯爵自己也变了样，而且变得如此彻底，已经不像是性格上的变化，更像是天性发生了改变。

家里到处都摆满了上发条跳舞的小人儿、各色各样的八音盒以及众多的机械钟表，都是从欧洲货集市上买来的。侯爵掸去那把意大利古诗琴上的灰尘，装上弦，又调好了音，那股不屈不挠的专注劲儿只能用爱来解释。他在伴奏下唱起了当年的歌，他耳朵不行，但嗓子不错，多少年过去了，记忆早已漫漶不清，他这个特点却始终未变。这些天里，女孩问过他，是不是真的像歌里唱的那样，爱情能战胜一切。

“没错，”他答道，“可你最好别信。”

好事一桩接一桩地发生，侯爵欣喜不已，开始考虑去塞维利亚旅行一趟，好让谢尔娃·玛利亚从她沉默的悲伤中恢复，完成对世界的认知。就在日期和目的地都已经商量好了的时候，他却在睡午觉时被卡莉达·德尔科布雷叫醒，后者带来了一个糟糕透顶的消息：

“先生，那可怜的孩子就要变成一条狗啦。”

阿布雷农肖接到紧急召唤，他否认了民间的迷信说法——得了狂犬病的人最后会变得和咬了自己的畜生一模一样。但他证实了女孩稍稍有点发烧，虽说发烧本身也是病，并不一定是别的什么疾病的症状，他还是没有掉以轻心。他提醒被痛苦折磨着的侯爵，女孩得任何病的可能性都存在，因为被狗咬，无论是不是条疯狗，都并不能预防其他疾病。和以往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侯爵问了他一句：

“您最终要告诉我的就是这些吗？”

“科学还没法让我多告诉您点什么，”医生的回答同样酸溜溜的，“不过，如果您不相信我说的，您还有一个办法：指望上帝吧。”

侯爵没听懂他的意思。

“我本认定，您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他说道。

医生甚至没有回头看他一眼：

“我倒真希望自己是那样的人呢，先生。”

侯爵没有指望上帝，而是选择相信一切能给他带来哪怕一点点希望的事物。城里还有三位有行医执照的医生、六位药剂师和十一位会给人放血的理发师，以及数不清的江湖郎中和精通巫术的人，尽管在近五十年里，宗教法庭给一千三百人判了轻重不等的刑罚，还有七个人被处以火刑。一名从萨拉曼卡来的年轻医生揭开谢尔娃·玛利亚已经愈合的伤口，敷上一些发散的药膏，为的是把脓拔出来。另一位医生出于同样的目的用蚂蟥吸她背上的血。一名会放血的理发师用女孩自己的尿液为她清洗伤口，另一位直接让她喝自己的尿。在整整两个礼拜里，她每天洗两次药水澡，每天为软化大便灌两次肠，天然锑熬的汤剂和其他致命的药水把她折腾得奄奄一息。

烧退了，但没人敢宣称躲过了狂犬病的危险。谢尔娃·玛利亚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一开始，她还用她与生俱来的傲气对抗了一阵，可两个礼拜过去了，没有任何效果，她脚踝上溃烂的伤口火烧火燎的，皮肤因敷了各种各样的药膏而疼痛不已，胃像被剥了一层皮。她什么罪都受了：呕吐，抽筋，痉挛，说胡话，大小便失禁，在地上滚来滚去，痛苦而愤怒地号叫。就连那些最胆大的江湖郎中都相信，这孩子要么是疯了，要么是魔鬼缠身，就让她听天由命吧。就在侯爵彻底绝望之时，萨坤达拿着圣休伯特的钥匙出现了。

这算是最后一招了。萨坤达解下自己身上的床单，涂上印第安人的油彩，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在赤身露体的孩子身上蹭来蹭去。女孩虽说极度虚弱，仍拳打脚踢地反抗着，萨坤达强压住她。贝尔纳达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到疯狂的喊叫声，跑过去一探究竟，结果看见谢尔娃·玛利亚在地上乱踢乱蹬，萨坤达压在她身上，被女孩一头波浪般的金发缠绕，嘴里吼着圣休伯特的祈祷词。贝尔纳达用吊床的挂绳对着两人

一顿猛抽。一开始她站着抽在地上惊呆了的两人，后来又追着她们跑遍了每一个角落，直到她喘不上气来。

教区主教堂托里比奥·德卡塞雷斯- 维尔图德斯，听到有关谢尔娃·玛利亚失常变疯的公众丑闻后很是吃惊，派人去请侯爵，没说原因，也没说日期或时间，这表明十分紧急。侯爵克制住自己的犹豫，未经预先通告，当天就赶了过去。

主教上任的时候，侯爵已经退出了公众生活，他们俩几乎没见过面。此外，主教是一个身体状况极差的人，肥胖到几乎不能自理，还饱受哮喘病的折磨，这考验着他的信仰。他没在太多大场合露过面，尽管他在这些场合的缺席令人难以置信，而在他参加过的为数不多的活动中，他总是保持低调，就这样，他渐渐变成了一个虚幻的人。

侯爵在一些公众场合远远看见过他几回，但记得住的只有一次在联合弥撒上，主教由几位政府大员用轿子抬着，头顶上方还撑着华盖。由于身躯庞大、法衣奢华，猛地看上去他就是一位体形肥大的老人，但他的面庞——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棱角分明，长着一双很少见的绿眼睛——却保持着一种不随岁月变化的华美。被抬在轿子上，他身上笼罩着教皇般的神奇光环，凡是近距离接触过他的人，都会感到他周身散发着权力意识和智慧的光芒。

他住的是全城最古老的府邸，两层楼，很宽敞，只是已经破败，而他的活动范围连一层楼的一半都没占满。府邸就在大教堂隔壁，有一道共用的回廊，拱顶已经发黑，院子里有个水池，早已破败不堪，

长满了荒芜的杂草。就连那面有着精美石雕的威风凛凛的正墙，以及那几扇用整块木板做成的大门，也都因为没人照料而残破不堪。

侯爵在大门口受到一位印第安执事的接待。他向那些匍匐在门廊前的乞丐散了些零钱，然后走进了府邸的阴凉之中，这时，大教堂里响起了下午四点的洪亮钟声，侯爵肚子里也一阵回响。中央走廊黑黢黢的，侯爵跟在执事身后却看不见他，小心翼翼地迈出每一步，生怕碰倒了那些胡乱放置的雕像或是踩上横在路中间的残砖碎瓦。走廊尽头有一间不大的等候室，因为有扇天窗，里面稍微亮一些。执事停住脚步，对侯爵做了个手势，让他坐下等待，自己进了里面一扇门。侯爵没有坐下，而是看着主墙上一幅巨大的肖像油画，那是一个年轻的军人，身穿国王卫队旗手的礼服。侯爵看了看画框上的铜牌才知道，原来是年轻时的主教。

执事打开门，请侯爵进去，侯爵没动身子就又一次看见了主教，只不过比肖像画上老了四十岁。尽管饱受哮喘病和炎热天气的折磨，他还是比人们所形容的要庞大许多，也威严许多。他浑身大汗，在一把菲律宾摇椅上慢慢地摇晃着，手里轻轻摇着一把棕榈叶扇子，身子前倾，这样呼吸能畅快一些。他脚上套着双乡下人穿的凉鞋，身上的粗棉布无袖外袍因为用肥皂洗的次数太多，已经发花。他真的很清贫，这一眼就可以看出。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却是他那双清澈的眼睛，透过它们看到的只有高尚的灵魂。他看见侯爵走到门口，立即停止了摇晃，用扇子打了个亲切的手势。

“请进，伊格纳西奥，”主教对他说，“把我这儿当成你的家。”

侯爵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上的汗，穿过门，来到一个黄色风铃草和吊蕨覆顶的露台上，所有教堂的塔楼在这里尽收眼底，还可以看见大

户人家的红屋顶、在大热天里昏昏欲睡的鸽舍、玻璃似的天空下轮廓清晰的军事碉堡，以及暑气蒸腾的大海。主教特意伸出他那军人的手，侯爵亲吻了他的戒指。

因为哮喘，主教的喘气声又粗又重，说的话也不时被喘息声或急促刺耳的咳嗽声打断，但他的口才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立刻轻松地与侯爵交谈起日常琐事。侯爵坐在主教对面，对这样一个东拉西扯的安慰性开场白心存感激，这时，五点的钟声响起。这不只是一串声音，更是一股震颤，下午的光影都抖动了起来，天空飞满了受惊的鸽子。

“太可怕了，”主教说，“每个钟点都像地震一样在我的五脏六腑里回响。”

听了这话侯爵吃了一惊，因为四点的钟声响起时，他脑海中曾浮现同样的想法。主教觉得这种巧合很正常。“想法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他说，一面伸出食指在空气中画出一个个连续不断的圆圈，又说：

“它们就像一群小天使，在那儿飞来飞去。”

一个做杂务的修女端来一只双耳瓶，浓浓的葡萄酒里泡着切碎的水果，又端来一个热气腾腾的水盆，空气里顿时弥漫一股草药味。主教闭上双眼吸了会儿蒸汽，从那种迷醉的状态中回过神来时，他已与先前判若两人：他成了自己权威的不二主人。

“我们请你过来，”他对侯爵说，“是因为我们知道你需要上帝的帮助，而你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他的声音里已经没有了器官的响声，他的双眼恢复了俗世的光亮。为了鼓足勇气，侯爵一口喝下了半杯酒。

“最最尊贵的阁下，您想必知道我正经历人生中所能遭受的最大不幸，”他说道，语气中饱含谦卑，“我已失去信仰。”

“我们知道，我的孩子，”主教毫不吃惊地说，“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呢！”

主教说这话的时候显得有些兴奋，因为二十岁那年，在摩洛哥的国王卫队做旗手期间，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也曾失去信仰。“刹那间我觉得上帝已不复存在。”他说，他吓坏了，从此把一生都献给了祈祷和悔罪。

“直到上帝怜悯我，向我指明我的天命之路，”他最后这样说道，“所以说最重要的不是你失去了信仰，而是上帝继续信任你。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正是天主用他无穷无尽的智慧照耀着我们，赐予我们慰藉。”

“我本想默默承受自己的不幸。”侯爵说。

“但看来你根本就做不到。”主教说，“你可怜的女儿在地上滚来滚去，抽搐不已，嘴里狂吠异教徒的黑话，这已是尽人皆知的秘密了。这些不正是魔鬼附体的明确无误的症候吗？”

侯爵吓得目瞪口呆。

“您想告诉我什么？”

“我想告诉你，魔鬼的诡计数不胜数，其中之一便是披上一种肮脏疾病的外衣，进入无辜的身躯，”他说，“一旦进入，靠人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将他们驱除出去的。”

侯爵从医学角度讲了女儿被狗咬的伤口的变化，可主教总能找到一个有利于他的观点的说法。他向侯爵问了一个他无疑早就知道答案的问题：

“你知道阿布雷农肖是谁吗？”

“他是第一个来看我女儿的医生。”侯爵说。

“我想听你亲口说说他。”主教说道。

他摇了摇手边的一个铃铛，一位三十岁左右、衣着整齐的神父应声而至，快得就像从瓶子里放出的精灵。主教只介绍说这是卡耶塔诺·德劳拉神父，就让他坐了下来。天太热，德劳拉神父穿着一件长袍，脚上是双和主教穿的一模一样的凉鞋。他神色紧张，面色苍白，目光敏锐，满头乌发里有一绺白发搭在额前。他呼吸急促，两手发烫，似乎不是生活幸福的人。

“关于阿布雷农肖，我们都知道些什么情况？”主教问他。

德劳拉神父想都没想就给出回答。

“阿布雷农肖·德圣佩雷拉·卡乌。”他拼读似的说出医生的名字。随即他转向侯爵：“侯爵先生，您有没有注意到，他姓氏最后那个词[2]在葡萄牙语里是狗的意思？”

严格地说，德劳拉继续说道，大家并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真名实姓。根据宗教法庭的档案，他是葡萄牙籍犹太人，被逐出半岛，在这里受到一位对他心存感激的市长的庇护，因为他用取自图尔瓦科的有净化之效的水给他治好了重达两磅的疝气。他又说那人有些神奇的偏方，曾狂妄地宣称自己能预知人的死亡，说他可能有鸡奸癖，什么书都敢看，而且在生活中不信上帝。然而，人们对他唯一的明确指控是他曾使客西马尼一个缝缝补补的小裁缝起死回生。有很可靠的证词表明，当阿布雷农肖命令他站起来时，那人已经被装裹停当入殓了。幸亏那个复活了的裁缝在宗教法庭上声明，其实他一直都没有丧失意识。“这才把阿布雷农肖从火刑柱上救了下来。”德劳拉总结道。最后他又提到一件事，说那匹死在圣拉匝禄山上的马被埋进了圣地。

“他爱那匹马，就像爱一个人一样。”侯爵插了句人情话。

“这是对我们的信仰的亵渎，侯爵先生，”德劳拉说，“马活百岁可不是上帝要管的事。”

侯爵警觉起来：一句私下里的玩笑话也能进宗教法庭的档案。他小心翼翼地辩解道：“阿布雷农肖说话口无遮拦，可以我之愚见，这离异教思想还有很远的距离。”要不是主教把他们从偏离的方向拉回来，这场辩论一定会变得激烈且没完没了。

“医生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主教发话了，“让人得上狂犬病是上帝的敌人惯用的一种鬼花样。”

侯爵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主教给出了一个戏剧性的解释，听上去有点像万劫不复的判词的前奏。

“幸运的是，”他总结道，“尽管你女儿的身体治不好了，上帝总还是给了我们办法来拯救她的灵魂。”

夜色渐渐笼罩大地，侯爵看见绛紫色的天空中亮起了第一颗星星，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她孤零零一个人待在脏兮兮的家中，拖着那只被江湖郎中们折腾坏的脚。他带着天生的谦卑问道：

“那我该做些什么呢？”

主教逐条向他交代。他准许侯爵在办事的时候提起他的名字，特别是在圣克拉拉修道院，说侯爵应该尽快把女儿送到那里去。

“你把她交到我们手上，”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谈话，“剩下的事情上帝会处置的。”

告别时侯爵觉得比来的时候更加痛苦。从马车车窗看出去，街道破破烂烂的，孩子们光着身子在水坑里洗澡，到处散落着秃鹫们丢下的垃圾。在街角拐弯处，他看见了大海。大海一直就在那里，可他心里涌上一阵犹豫不安。

侯爵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奉告祈祷的钟声敲响了，自从堂娜奥拉娅死后他第一次高声祈祷起来：“主派天使告知玛利亚。”古诗琴的弦声在黑暗中回响，像是从一个水塘底部传来的。侯爵顺着乐声摸索着走到了女儿的房间。女儿就在那里，坐在梳妆凳上，身上披了件白色长袍，头发一直拖到地面，正弹着一首跟他学的入门练习曲。侯爵记得中午他留在家中的是一个被江湖郎中折腾得虚弱不堪的女儿，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除非发生了什么奇迹。但这只是他一时的错觉，谢尔娃·玛利亚察觉到父亲来了，停止了弹琴，又陷入了痛苦之中。

侯爵陪她待了整整一夜。他引导她在卧室里做了晚祷，像个临时借来的爸爸一样笨手笨脚。睡袍也给她穿反了，她不得不脱下来重新穿正。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女儿的裸体，她紧贴着皮的肋骨、小不丁点儿的乳头和柔软的茸毛看得侯爵一阵心痛。一个火红的圈环绕在她发炎的脚踝周围。他帮她躺下的时候，女儿依然独自忍受着痛苦，发出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呻吟，侯爵惊慌失措，因确信自己是在帮她走向死亡。

自从失去信仰以来，侯爵第一次产生了做祈祷的强烈愿望。他来到祈祷室，竭力想寻回抛弃了自己的上帝，可是一点用都没有：怀疑比信仰更有耐力，因为全部的感官都在支持前者。清晨，天气凉爽，他听见女儿咳嗽了好几次，便向她的卧室走去。途中他看见贝尔纳达的房门半开着。他想和她谈谈心中的困惑，便推开了房门。贝尔纳达脸朝下睡在地上，呼噜打得震天响。侯爵手放在门闩上，看了看，没去叫醒她。他自言自语地说了句："用你的命换她的命。"随即纠正道：

"用我们俩的贱命换她的命，妈的！"

女儿还在睡觉。侯爵看着她一动不动、虚弱无力的样子，心中不禁自问，是情愿看见她死掉，还是情愿见她受狂犬病的折磨。他担心蝙蝠来吸女儿的血，给她整理好蚊帐，怕她咳嗽，给她盖好被单，然后就这样守候在床边，心中泛起一种新的快意，觉得自己今生今世从未像此刻这般爱过女儿。接着，他既没请示上帝，也没和任何人商量，就做出了他人生中的重大决定。清晨四点钟，谢尔娃·玛利亚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侯爵坐在她的床边。

"咱们该走了。"侯爵对她说。

女孩一句话也没说就起了床。侯爵帮她装扮起来。他在大木箱里找到了一双丝绒套鞋，这样她的那双小靴子就不会伤到她的脚踝，又顺手取出一条他母亲小时候的礼服裙，时间太久了，裙子皱巴巴的，但是一眼便可看出，只穿了一次就再没上过身。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侯爵把裙子套在了谢尔娃·玛利亚的萨泰里阿教项链和受洗时穿过的无袖衣上。裙子穿上有点紧，但正好突出了它的古韵。他又从大木箱里找出一顶帽子，帽子上飘带的颜色和裙子一点也不配。女孩戴上大小正好。最后，他又为女儿整理出一只小手提箱，里头装了一条睡裙、一把齿密得能篦下虱子来的梳子，以及她祖母的一本小小的祈祷书，那本书的合页是用纯金打造的，封面上还镶嵌着珍珠母螺钿。

这一天是圣周的礼拜日。侯爵带谢尔娃·玛利亚去望了五点钟的弥撒，女孩虽不明就里，还是心绪极佳地接受了抚顶祝福。出来时他们从马车上看见天渐渐亮了。侯爵坐在主位上，膝盖上放着那只小手提箱，女孩漠然地坐在他对面，看着车窗外面的街道，这是十二岁的她最后一次看见这些街道了。她没有表现出哪怕一丝好奇，来问问一大早把她穿成疯女王胡安娜的模样，给她戴上顶怪模怪样的帽子，究竟是要带她上哪儿去。沉思了许久，侯爵问她道：

“你知道上帝是谁吗？”

女孩摇了摇头。

地平线上电闪雷鸣，天阴沉沉的，大海波澜起伏。转过一个街角，迎面便是圣克拉拉修道院，那是一座孤零零的白色三层楼房，蓝色的百叶窗正对着海边一个垃圾场。侯爵用食指指了指。“就是那儿，”说着他又向左边指，“你随时都可以从窗户看见大海。”见女儿没

理会他，他做出了唯一的一次解释，关于女儿的命运，他此后再也没多说过半句话：

“你在这里和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嬷嬷们一起住几天吧。”

因为是圣周礼拜日，大门口附近的乞丐比平日里要多一些。几个原本在同乞丐争抢厨房的剩饭剩菜的麻风病人跑了过来，向侯爵伸出了手。侯爵掏出自己所有的零钱散给了他们，一人一份。看大门的修女看见了穿黑色塔夫绸衣的侯爵和他穿得像女王一样的女儿，穿过人群来接待他们。侯爵对她解释道，他是遵照主教的意思把女儿带来的。守门人见他话说得诚恳，没有丝毫怀疑。她查看了一下女孩的外表，摘下了她的帽子。

“这个地方是不许戴帽子的。”她说。

她把帽子没收了。侯爵想把小箱子也交给她，可她没有接过去：

“她在这里什么都不需要。”

胡乱编起来的辫子松开了，几乎拖到了地面。守门人不相信那是真头发。侯爵试图把女儿的头发再盘起来，却被她一把推开，女孩自己把头发整理好，手法之利索让守门人吃了一惊。

“这头发该剪了。”她说。

“这是在圣母面前许过愿的，要到她结婚那天才能剪。”侯爵解释道。

守门人被这个理由说服了，她牵起女孩的手，连说再见的时间都没给她留，就把她带进了大门。因为走路的时候脚踝还有些疼，女孩

脱下了左脚的套鞋。侯爵看着女儿拖着那只光脚，手上拎着一只套鞋，一瘸一拐地渐渐远去。他期待女儿会有那么一刻的心软，回过头来看他一眼，但是没有。他对女儿的最后记忆就是她拖着一只受伤的脚，穿过花园里的走廊，消失在那座活死人的楼房里。

---

[1] 约鲁巴人敬奉的女海神。

[2] 即卡乌，原文为Cao。

三

圣克拉拉修道院面对大海，是一座方方正正的三层楼房，窗户很多，都一模一样，一道半圆形拱顶回廊围着中间的花园，花园里杂草丛生，阴沉沉的。芭蕉和野生蕨类植物之间有一条石头铺成的小路，一株瘦长的棕榈树为了采光，长得高过了楼顶的平台，从另一棵庞然大树的枝条上，垂下一绺绺香荚兰的藤萝和一串串兰花。大树下面是一池死水，池边的铁围栏锈迹斑斑，几只家养的金刚鹦鹉在上面像在马戏团一样走钢丝玩。

花园把这座楼一分为二。右面三层住的是那些活死人，这里的寂静偶尔会被悬崖峭壁下面的海浪声、诵经时的祈祷声和唱赞美诗的声音打破。这一侧有一扇内部的小门与小礼拜堂相通，这样，幽居清修的修女们便可以不经过对公众开放的大堂直接进入唱诗的地方，听弥撒、隔着格子窗吟唱，她们能看见别人，别人却看不见她们。用名贵木材打造的华美的镶板式天花板遍布整座修道院，那出自一个西班牙工匠之手，他在这里费尽半生心血，为的是死后能在主祭台旁的壁龛里占一席之地。如今，他就在那里，在大理石石板下，和近两百年来的历任修道院院长、主教以及另外一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挤在一起。

谢尔娃·玛利亚进修道院的时候，那里的幽居修女有八十二位是西班牙人，各自都带着各自的仆从，还有三十六位本地修女，出身于总督区的显赫门第。自从选择了安贫恭顺和守贞，她们和外面的唯一接触就是偶尔在会见室接受探望，那里隔着木头百叶窗，听得见声音，

却看不见人。会见室设在大门口，规矩很多，管得很严，而且每次会见都要有监听的人在场。

花园的左面是教室和各种手工作坊，住着人数众多的见习修女和手工艺老师。勤务处设在这儿，一间宽敞的厨房里有几个烧柴的大火炉、一张和肉铺里用的差不多大小的案台，以及一个大面包炉。后面有个院子，住了几户奴隶家庭，地上永远脏水横流，再后面是马厩、羊圈、猪圈、菜园和蜂房，总之，一切能改善生活的东西，该养的该种的，应有尽有。

最后，极远处，仿佛被上帝抛弃了似的，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房子，有六十八年的时间，这房子被宗教法庭当监狱用，现在仍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关押那些走上歧路的克拉拉会修女。距离谢尔娃·玛利亚被狗咬伤已经有九十三天了，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狂犬病的症状，却被关进了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最靠后的一间牢房。

守门人牵着女孩的手，走到过道尽头时碰见一个见习修女正要去厨房，便让她把女孩带去见院长。这个见习修女想，带这样一个无精打采、穿着体面的姑娘到乱哄哄的厨房去有点不合适，便让她坐在花园里的一条石凳上，说一会儿再来接她。可回来的时候，她把这事儿忘了个一干二净。

稍后从这里路过的两个见习修女对女孩的项链和戒指挺感兴趣，问她是什么人。女孩没有回答。她们又问她会不会讲西班牙语，她还是像个死人一样一言不发。

“这是个聋哑人。”年轻一点的修女说道。

“要不就是德国人。”另一个修女说。

年轻的那个开始摆弄女孩，好像后者完全没有知觉一样。她把女孩盘在脖子上的辫子解开，用手量了量。“差不多有四拃长。”说这话时她已经坚信这女孩什么都听不见。她开始把女孩的辫子散开，但这时女孩的一个眼神吓住了她。修女把辫子托在手里，对她吐了吐舌头。

“你有一双魔鬼的眼睛。”她对女孩说。

她摘下女孩的一枚戒指，女孩毫无反抗，可是当另外一个修女想取下她的项链时，女孩像蛇一般扭动起来，又快又准地在她手上咬了一口。那修女飞跑着去清洗手上的血。

谢尔娃·玛利亚站起身来，想到水池边喝口水，这时，午前祷告的歌声响了起来。她吓了一跳，没喝上水就又坐回石凳上。不过，当她听出这是修女们在唱赞美诗，便又走回水池边。她挥手拨开一层烂树叶，连水里的虫子都没赶一赶，便就着水池喝了个饱。接着她蹲在树后撒了泡尿，怕有不知好歹的动物或心怀叵测的男人闯过来，她在手里拿了根棍子，这都是多明伽·德阿德文托当年教给她的。

过了一会儿，有两个女黑奴经过，她们认出了萨泰里阿教项链，对女孩说起了约鲁巴语。女孩兴奋起来，用同样的语言答话。因为谁也不知道这女孩为什么会待在这里，女奴们就把她带到了吵吵闹闹的厨房，奴仆们一片欢腾地迎接了她。有人注意到了她脚踝上的伤，想知道她究竟出了什么事。“是我妈用刀子划伤的。”她说。又有人问起她叫什么，她说出了那个黑人名字：玛利亚·曼丁加。

她一下子变得如鱼得水。有只山羊不肯乖乖就死，她上前去帮忙砍掉了它的头，她挖出山羊的眼睛，割下山羊的睾丸，这些部位是她

的最爱。她在厨房里同大人们一起玩空竹，又在院子里和孩子们一起玩，赢了所有人。她用约鲁巴语、刚果语和曼丁加语唱歌，连那些听不懂歌词的人都听得十分入迷。吃午饭时，她把山羊的睾丸和眼睛用猪油煎熟，撒上热辣辣的调料吞了下去。

这时，整个修道院都知道了女孩在那里，只除了一个人，那就是女院长何塞法·米兰达。这女人精瘦、干练，至于思想狭隘则得自家传。她在宗教法庭的阴影下，于布尔戈斯接受了教育，可她的领导才能和死板的固执脾气却是与生俱来的。她手下有两个非常能干的助理，但她们都显得有些多余，因为她什么都管，不需要任何人帮忙。

她对当地主教的敌视几乎从她出生前一百年就开始了。同历史上一些大的纷争一样，起初是因为克拉拉会修女和方济各会主教之间在金钱和管辖权上的一些小矛盾。主教摆出一副毫不让步的架势，而修女们则获得了世俗政府的支持，一场战争就此拉开了序幕，进展到某个时刻，就成了席卷一切人的大战。

主教在其他一些团体的支持下，把修道院团团围住，想以断粮绝草的方法迫使修道院投降，还颁布了“停止一切圣事”[1]的命令，也就是说，在新秩序建立之前停止全城的一切宗教活动。居民们分裂成彼此对立的派别，世俗和宗教当局互相对抗，各有各的支持者。然而，被围困了六个月后，修女们活了下来，仍抗争不已，直到一条秘密地道被发现，修女们的支持者就是从那里给她们提供给养的。最后，方济各会争取到了一位新任市长的支持，攻破了圣克拉拉修道院，把里面的修女都遣散了。

此后过了二十年，双方情绪才得以平息，克拉拉会修女们被拆的修道院也得到了恢复，可是，一百年过去了，何塞法·米兰达心中仍留

存仇恨的火种。她对新来的修女们反复灌输仇恨思想，要把仇恨刻进她们的心里乃至五脏六腑中，将一切责任都归罪于德卡塞雷斯-维尔图德斯主教以及所有和他有关的人和事。因此，当她接到来自主教方面的通知，说卡萨尔杜埃洛侯爵已经把他那个魔鬼附体、死态毕露的十二岁女儿送到了修道院，她的反应可想而知。院长只问了一句："可是，真的有这么一位侯爵吗？"她的这个问题包含双重恶意，一是因为这事情是主教交办的，二是因为她从来不承认土生贵族的合法性，她把他们叫作"漏雨漏下来的贵族"。

午饭时间到了，院长还没在修道院里找到谢尔娃·玛利亚。守门人告诉过一位院长助理，说一大早来了一位穿丧服的男人，把一个装扮得像女王似的金发小姑娘交到了她的手中，但她没去询问女孩的情况，因为当时有一大群乞丐正为抢夺圣周礼拜日的木薯汤闹得不可开交。她把饰有彩色飘带的帽子作为证据交给了助理。在她们寻找女孩的同时，助理把帽子拿给院长看，院长对于谁是帽子的主人十拿九稳。她用指尖捏起帽子，伸直胳膊审视了一番。

"一位货真价实的侯爵小姐，却戴了顶脏兮兮的仆人帽子，"院长说道，"撒旦才知道她想干什么。"

上午九点，院长在去会见室的路上曾路过那个地方，还在花园里停留了一会儿，为一处泥水活和几个泥水匠讨价还价，可她没看见女孩坐在石凳上。另外几个修女也曾几次路过那里，也都没看见她。那两个摘下她戒指的见习修女赌咒发誓，说午前祷告之后，她们又从那里经过，可都没看见她。

院长午觉醒来，突然听见一个声音在唱歌，那声音传遍了整座修道院。她拉了一下挂在床边的绳子，一个见习修女应声而至，出现在

房间的暗影里。院长问她是谁唱得这样动听。

“是那个女孩。”见习修女说。

院长半睡半醒，嘴里嘟囔了一句：“嗓音真美。”可话音未落她就惊得跳了起来：

“哪个女孩？”

“我也不知道，”见习修女对她说，“就是那个从一大早就让后院吵翻了天的女孩。”

“老天爷啊！”院长惊叫起来。

她从床上一跃而起，飞一般地穿过整座修道院，顺着声音来到了奴隶们住的院子。谢尔娃·玛利亚正坐在一个矮凳上唱着歌，她的长发顺着地面铺开，身边围着一群着了迷的奴仆。她一看见院长，便立即停止了歌唱。院长举起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

“最最纯洁的玛利亚。”院长说。

“无玷成胎的圣母。”人们齐声应和。

院长朝谢尔娃·玛利亚挥舞着手中的十字架，仿佛那是一件武器。“全体退下。”她高声叫道。于是奴仆们都退开了，只剩女孩孤零零一个人留在原处，她的双眼紧紧盯住院长，十分警惕。

“撒旦的怪胎，”院长高声叫道，“你居然敢用隐身术来迷惑我们。”

谁都没办法让她开口说话。一名见习修女想去牵她的手，但被惊恐万状的院长制止了。“你不要碰她。”院长大声喝道，然后又转向所有在场的人：

“谁都不许碰她。”

最终，她们把她强行带走，塞进了牢房楼最靠后的一间屋子，任凭她乱踢乱蹬，嘴里发出狗一般的撕咬声。抬到半路，她们发现女孩浑身都是她自己拉出来的屎尿，便在马厩里拿水桶给她冲洗了一番。

“城里有那么多家修道院，主教偏把这堆臭狗屎送到我们这儿来。”院长埋怨道。

那间牢房还算宽敞，墙壁粗糙，房顶很高，顶棚上有几处白蚁窝。唯一的一道门旁有扇落地窗，用木板条钉得死死的，窗框也被一根铁栓牢牢固定。牢房尽头的墙上还有一扇高高的窗户，面朝大海，钉着木十字花格。一块泥灰砌成的台子上放着麻布垫子，里头塞了些干草，就是睡觉的床，用的日子长了，脏乎乎的。有一个石凳可以坐，墙上孤零零地钉着个十字架，下面放了张粗木桌子，既当供桌又做洗漱台。谢尔娃·玛利亚被扔在了这间牢房里，浑身上下连辫子都湿透了，害怕得抖作一团。外面守着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立志在抗击魔鬼的千年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女看守。

她坐在床上，两眼死死盯住那扇包了铁皮的门上的一根根铁条，下午五点钟，当一个女仆来给她送饭时，看见的她就是这副模样。女孩一动不动的。当女仆试图解下她的项链时，她一把抓住了女仆的手腕，迫使她松开了手。从那天晚上开始记录的修道院言行簿上，女仆宣称一股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力量把自己打倒在地。

门关上了，能听见尖厉的铁链声和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两圈的声音，女孩还是一动不动。她看见了摆在眼前的食物：几粒咸肉丁、一块木薯饼和一小杯巧克力。她尝了一口木薯饼，嚼了两下便吐了出去。她仰面躺下，耳边传来大海的喘息声、饱含雨水的风声和这个季节最初的雷声，一次比一次响得更近。第二天早晨，女仆又给她送来了早饭，发现她睡在一堆干草上，那是她用牙齿和指甲从垫子里面掏出来的。

午饭时，她乖乖地随人去了还无需隐居清修的修女们吃饭的大饭堂。这是一间大屋子，有高高的拱顶和大大的窗户，大海明灿耀眼的光亮和海浪打在峭壁上的巨大声响从窗户涌入。二十个新近入院的修女，大多很年轻，坐在两排粗木桌子旁，她们身穿粗哔叽布长袍，剃了光头，开开心心，没心没肺，一点也不掩饰和一个被魔鬼附体的女孩同桌共享军营式份饭的乐趣。

谢尔娃·玛利亚坐在离大门很近的地方，身边一左一右坐着两个女看守，她几乎没吃什么东西。她们给她穿上了一条和见习修女一样的长袍，她的套鞋还是湿的。吃饭的时候没有人看她，但饭后有好几个修女围住了她，欣赏她的小玻璃珠项链，其中一个还试图把它摘下来。谢尔娃·玛利亚挺直了身子，两个女看守试图按住她，她只一顶便拱开了她们。她爬上桌子，从这头跑到那头，嘴里高声尖叫着，像魔鬼附了体一般横冲直撞。她把一路上遇见的所有东西都打得稀烂，最后从窗户跳了出去，撞坏了院子里的藤萝架，踢翻了蜂箱，碰倒了畜栏。蜜蜂满世界乱飞，受惊的牲畜吓得大叫，到处乱跑，甚至闯进了清修修女们的卧房。

从此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没有一件不被归罪于谢尔娃·玛利亚的有害影响。好几个见习修女都在记录簿上写道，这女孩长了对透明的

翅膀，发出奇怪的嗡嗡声，飞来飞去。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和一大帮奴隶才把牲畜关进畜栏，把蜜蜂引回蜂房，让院内恢复了秩序。谣言传开了，说猪中了毒，说水会映出预兆，说一只被吓坏了的母鸡飞过屋顶，消失在海平线上。可是，修女们的恐惧中也带着矛盾：尽管院长有言在先，尽管每个人都战战兢兢，谢尔娃·玛利亚的那间牢房还是成了所有人好奇的焦点。

修道院里从晚上七点做晚祷到第二天早晨六点望弥散之间实行宵禁。灯火都要熄灭，只有几个经过特许的房间可以点灯。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修道院里的生活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和自由，走廊里人影来来往往，随处可闻窃窃私语和压不住的匆忙的脚步声。自从何塞法·米兰达在修道院里明令禁止以来，宵禁时间，在谁都想不到的房间里有赌钱的、玩西班牙纸牌的、掷色子的，还有偷偷喝酒的、悄悄卷烟抽的。一个被魔鬼附体的女孩出现在修道院里，足以引发种种新奇的冒险。

宵禁开始以后，就连那些最守清规的修女们都逃出自己的清修场所，三三两两地来和谢尔娃·玛利亚聊天。一开始，女孩用指甲来对付她们，然而她很快就学会了根据来者的秉性和自己当晚的情绪操控她们。最常见的要求是希望她充当魔鬼的差使，向他们讨要些平日里想都不敢想的恩惠。谢尔娃·玛利亚会模仿过世的人的声音、被斩下脑袋的人的声音、魔鬼生下的怪胎的声音，而很多修女都对她的恶作剧坚信不疑，并把这些当成真事登记在了言行簿上。一个邪恶的夜晚，一群乔装打扮的修女袭击了那间牢房，她们堵上谢尔娃·玛利亚的嘴，抢走了她的萨泰里阿教项链。可她们的胜利十分短暂，就在仓皇逃走的路上，领头的修女在漆黑的楼梯上滑了一跤，跌破了脑袋。她的同伴

们也一刻不得安宁，直到把抢来的项链物归原主。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在夜里来打搅这间牢房。

对卡萨尔杜埃洛侯爵来说，这些日子就像家里死了人一样难熬。自从把女儿送进去之后，他一直为自己做事仓促而后悔不已。他愁得大病了一场，再也没能恢复元气。他围着修道院转来转去，一转就是好几个小时，一面自己问自己，这修道院有这么多扇窗户，谢尔娃·玛利亚会在哪一扇窗户后面想念自己呢。回到家里，他看见贝尔纳达正在院子里乘夜凉。他浑身打战，生怕她问起谢尔娃·玛利亚，可贝尔纳达看都没看他一眼。

他把猎狗放了出来，在卧室里的吊床上躺下，心想最好能一睡不醒。可是，他怎么也睡不着。信风季节已经过去了，夜里酷热难当。各种各样的小虫子也难耐酷暑，纷纷从沼泽那边飞来，饿蚊成阵。人们不得不点燃牛粪来驱赶蚊虫。一切生物都昏昏沉沉的。一年中这个时节，人们焦切地渴盼着第一场大雨的降临，就像六个月之后，人们又会同样焦切地祈求天气永远晴朗一样。

天刚刚破晓，侯爵就去了阿布雷农肖家里。他刚一落座就预感到一阵轻松：终于有人分担他心中的苦楚了。他直截了当地开了口：

“我把女儿送进圣克拉拉修道院了。”

阿布雷农肖一时没明白，侯爵趁他迷惑不解，又给了他新的一击。

“给她驱驱魔。”侯爵说。

医生深深吸了口气，以一种常人难有的平静口吻说：

“请您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我。”

于是，侯爵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自己是如何去探访主教的，如何有了祷告的愿望，如何一时冲动做出决定，又如何一夜难眠。这是一个老基督徒的告解，没有为自己保留一丝一毫的秘密。

“我坚信这是上帝的旨意。”他总结道。

“您的意思是说，您又恢复信仰了？”阿布雷农肖问道。

“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完全放弃信仰，”侯爵说，“只要有疑问在。”

阿布雷农肖这回听懂了。他一向认为，一旦放弃信仰，在原来信仰存在之处就会留下一个永不磨灭的伤疤，这伤疤使人无法忘却信仰。他唯一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怎么可以把女儿送去受那样一种驱魔的惩罚。

“这和黑人的巫术没多大区别，”他说，“恐怕还要更糟糕一些，因为黑人不过是杀几只公鸡作为牺牲奉献给他们的神，而宗教法庭更喜欢把无辜的人放到刑具上肢解，或是当众架在火上活活烧死。”

至于在探访主教期间那位卡耶塔诺·德劳拉阁下的出现，在他看来更是一个灾难性的预兆。“这人就是一个刽子手。”他直截了当地说。他开始细数过去发生过的把精神病人当成中魔的人或异教徒处死的信仰案例。

“我觉得与其把她这样活活埋葬，不如直接把她杀了，那样还更符合基督的精神。”他这么总结道。

侯爵画了个十字。阿布雷农肖看了侯爵一眼，只见他浑身都在颤抖，身上的塔夫绸丧服使他看上去像个幽灵，他的双眼又闪动着那种与生俱来的犹豫不定的亮点，像萤火虫似的。

“把她从那儿弄出来。”他对侯爵说。

“这也正是我眼见着她走进那座活死人大楼时心里所想的，”侯爵说，“可问题是我感觉自己没有力量去违背上帝的意志。”

“那请您试着感觉自己有这样的力量吧，”阿布雷农肖说道，“也许哪一天上帝会因此而感谢您的。”

这天晚上，侯爵写了封信请求主教接见。他亲自执笔，行文混乱，笔迹稚嫩，他把信亲手交给了看门人，以确保信能送到收信人手里。

礼拜一这天，主教接到通知，说谢尔娃·玛利亚已经准备停当，可以进行驱魔活动了。他刚刚在他那垂盖黄色风铃草的露台上用完点心，对这则口信并没太在意。他吃得很少，可他那股子慢条斯理的劲儿能让这个仪式持续三个小时。卡耶塔诺·德劳拉神父坐在主教对面，正用纯正平稳的嗓音和有些夸张做作的风格为对方大声朗读，这和他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观点挑选出来的书很相配。

这座古老的府邸对主教来说太大了，他只需要一个接见厅、一间卧室，再加上那个供他在雨季到来之前睡午觉、吃饭的露台就足够了。对面是官方图书馆，是卡耶塔诺·德劳拉创办并充实起来的，也由

他娴熟地管理着，曾是整个西印度群岛最棒的几家图书馆之一。剩下的十一间房子都关闭着，里面堆满了两个世纪以来废弃不用的东西。

除了在餐桌旁伺候的那个修女之外，卡耶塔诺·德劳拉是唯一能在用餐时间进入主教府的人，并非如人们所说，他有什么个人特权，而是因为他是尊贵的读经师。他没有什么明确的职务，头衔也只是个图书管理员，但因为他是主教身边的人，人们都把他当成实际意义上的助理，谁都知道，没有他在场，主教不会做出任何重要决定。他的私人房间就在和主教府相通的旁边一座楼房里，那里有教区官员们的办公室和卧室，另外还住着半打为主教做家务的修女。然而，卡耶塔诺真正的家却是图书馆，他每天花十四个小时工作和读书，还在那里放了张行军床，供困乏时睡觉用。

在那个可以载入史册的下午，出了件怪事：德劳拉在朗读的时候结巴了好几次。更不寻常的是，他居然漏掉了一页，并且毫无察觉地念了下去。主教透过他那副小小的炼金术士的眼镜打量他，直到他又翻到下一页，才颇觉好笑地打断了他：

“你在想什么？”

德劳拉吓了一跳。

“大概是天太热了，”他说，“怎么了？”

主教依然直视着他的双眼。“肯定不只是天热的缘故。”主教说，然后用同样的语气又问了一遍：“你刚才在想什么？”

“那个女孩。”德劳拉答道。

他没说是哪个女孩，因为自从侯爵来访之后，他们的世界里就再没有别的女孩了。他们议论了很久那个女孩的事。他们一起一遍又一遍地重温那些被魔鬼附体的人的案例，一起回忆那些驱魔圣者。德劳拉叹了口气：

“我梦见她了。”

“你怎么会梦见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呢？”主教问道。

“她是一个土生的侯爵小姐，十二岁，长长的头发拖在身后，就像女王的长袍，”他说，“还会是谁呢？”

主教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从未沉迷于奇迹或天谴，他活在当下。只见他不太信服地摇了摇头，继续吃他的饭。德劳拉继续朗读的时候小心了许多，等主教吃完饭，他帮他在摇椅上坐好。主教坐稳之后，又开了口：

“现在好好给我讲讲你的梦吧。”

其实很简单。德劳拉梦见谢尔娃·玛利亚坐在一扇窗前，外面是一片大雪覆盖的原野，她怀里兜了一串葡萄，正一颗一颗地摘着吃。每摘下一颗葡萄，枝上马上又长出一颗新的来。在梦里能明显看出，女孩已经在那扇无始无终的窗户前待了很多很多年，一直想把那串葡萄吃完，她看起来一点也不着急，因为她知道，最后一颗葡萄意味着死亡。

“最怪的是，”德劳拉说，“她观看雪原的那扇窗户就是萨拉曼卡的那扇，那年冬天下了三天大雪，小羊羔都在雪地里闷死了。”

主教被触动了。他太了解、太喜爱卡耶塔诺·德劳拉，没怎么在意他梦中的谜团。他才华横溢、品格优良，不管是在教区，还是在主教的心目中，他都有着牢不可破的地位。主教闭上眼睛，黄昏时分他总要打个三分钟的小盹。

与此同时，德劳拉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接下来他们还要一起做晚祷。他饭还没吃完，只见主教在摇椅上展了展身子，做出了影响他一生的重大决定：

“你来负责这件事情。”

主教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仍然闭着，随即发出狮子般的鼾声。德劳拉吃完饭，在鲜花盛开的蔓藤架下他常坐的那把靠背椅上坐了下来。这时，主教睁开了双眼。

“你还没有答我的话呢。”他对德劳拉说。

“我以为您是在说梦话呢。”德劳拉答道。

“那么我现在醒着再说一遍，”主教说，“我把那个女孩的健康托付给你了。”

“我从来没干过这么奇怪的差事。”德劳拉说。

“那么你的意思是拒绝了？”

“我的神父，我不是驱魔者，”德劳拉说，“我不具备做这件事所需的性格、训练或知识。此外，您和我都知道，上帝已经给我设定了另一条道路。”

这话一点不错。经过主教的斡旋，德劳拉已经成为梵蒂冈图书馆西班牙犹太人基金会监理的三名候选人之一。这件事尽管两人都心知肚明，但在他们之间提起这还是第一次。

“这就更合情合理了，”主教说，“女孩的事如果处理好了，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助力，这正是我们眼下所缺乏的。”

德劳拉有自知之明：他不太擅长和女人打交道。在他看来，女人天生被赋予了某种自成一套的理性，可以让她们在现实世界的种种机缘巧合之间纵横驰骋。一想到要和她们打交道，哪怕只是面对一个像谢尔娃·玛利亚这样毫无自卫能力的小女孩，他手心里就冒出了冷汗。

“不，阁下，”他做出了决定，“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你不仅有这个能力，”主教回答他说，“还绰绰有余地拥有别人都没有的东西：灵感。”

这个词牵涉的话题太大了，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完的。然而主教并没有强迫他立即接受，而是给了他一段思考的时间，那天起圣周服丧就开始了，他可以在那之后再作答复。

“你先去看看那个女孩，”主教对他说，“深入了解一下她的情况，然后再汇报给我。”

就这样，年满三十六岁的卡耶塔诺·阿尔西诺·德尔埃斯皮里图·桑托·德劳拉- 埃斯库德罗步入了谢尔娃·玛利亚的生活，步入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当年主教在萨拉曼卡主持著名的神学讲坛时，他曾是他的学生，并以最优秀的成绩从那一级毕业。他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的直系后裔，他对这位先人有一种近乎宗教性的崇拜，逢

人必说。他的母亲出生在蒙波斯省圣马丁- 德罗巴市的一个西班牙人家庭，后来随父母去了西班牙。德劳拉一直认为自己和母亲没什么关联，直到后来到了新格拉纳达王国，他才意识到自己承袭而来的那份乡愁。

自打第一次在萨拉曼卡同他谈话开始，德卡塞雷斯- 维尔图德斯主教就认定他是一个能给基督精神增添荣耀的不可多得的人才。那是二月里一个寒冷的早晨，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冰雪覆盖的原野，远处河岸上的白杨树排列成行。这幅冬日图景将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梦境，在这位年轻神学家的余生中始终追随他。

他们的谈话理所当然包括了读书这个话题，主教简直不敢相信，德劳拉年纪轻轻就已经看过那么多的书。他对主教谈起加尔西拉索，老师坦率地承认对这位诗人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一位不信教的诗人，在他全部的作品中提到上帝的地方不超过两处。

“不止两处。”德劳拉说，“而且在文艺复兴时期，即便是出色的天主教诗人，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

就在他第一次发誓愿那天，老师提议让他陪自己一同前往尤卡坦那个充满未知的王国，说自己刚被任命为那里的主教。德劳拉所了解的生活都是书本上的。对他而言，母亲的辽阔世界只是一个梦，永远也不会成为他的世界。当他从雪地里往外刨冻得硬邦邦的小羊羔时，他很难想象那令人窒息的炎热、那永远散发着臭气的腐肉和那蒸汽升腾的沼泽。而对在非洲打过仗的主教来说，想象这些就要容易得多。

“我听说我们有些教士在西印度群岛快乐得疯掉了。”德劳拉说道。

“还有好几个上吊的呢，”主教说，“那是一片被鸡奸、偶像崇拜和嗜食人肉威胁着的土地。”

然后他又不带丝毫偏见地加了一句：

“就和摩尔人的土地一样。”

可他同时又认为，这也正是它最大的魅力所在。那里需要一批勇士，他们要像在沙漠里传道一样，给那片土地带去基督教的文明。不过，二十三岁的德劳拉认为自己已经确立了通向圣灵精髓的道路，他对圣灵怀有绝对的虔诚。

“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图书馆馆长。”他说，“这是我唯一能派上用场的工作。”

他参加过一次录用考试，为的是竞争托莱多的一个将为他开启梦想之门的职位，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获得任命。可是他的老师十分固执。

“在尤卡坦做图书管理员比在托莱多做殉道者更容易成为圣人。”主教说。

德劳拉的回答一点也不客气：

“如果上帝肯降恩于我，我宁愿当个天使，而不当圣人。”

他还没考虑好老师给他的建议，他在托莱多的任命就下来了，但他最终选择了尤卡坦。然而他们两个谁也没能到达那里。在七十天的惊涛骇浪之后，他们在狂风海峡遭遇海难，被一支饱受摧残的护卫队救了上来，然后又被抛弃在达连。他们在此地待了一年多的时间，不

切实际地苦盼着大帆船队给他们带来信件，直到这一方土地的主教突然死去，留下了空缺，德卡塞雷斯主教被任命为代理主教。从带他们来新目的地的小船上，德劳拉望见了乌拉巴那无边无垠的热带雨林，明白了在托莱多那些阴沉沉的冬天里，母亲为什么会苦苦思念这里。那迷人的彩霞、梦魇中的小鸟、莽莽丛林中醉人的腐叶气味，一切都像是一段他从未经历过的往昔的珍贵回忆。

“唯有圣灵才能安排得如此妥当，把我带到母亲生活过的土地上来。”他这样说道。

十二年后，主教早已放弃了尤卡坦之梦，他已经七十三岁了，得了要命的哮喘，他心里明白，自己再也看不到萨拉曼卡的雪景了。在谢尔娃·玛利亚被送进修道院的那些日子里，他已经做出决定，只等给自己的学生铺平了通往罗马的道路，他便退休。

第二天，卡耶塔诺·德劳拉去了趟圣克拉拉修道院。虽说天气有点热，他还是穿上了粗羊毛长袍，带着装有圣水的小桶和一只盛圣油的小盒子，这些都是对魔鬼作战的首要武器。院长此前从未见过他，可有关他的聪明才智和本领的传言早已打破了修道院的寂静。院长清晨六点在会见室里接待他的时候，他的青春朝气、他殉道者般的苍白脸色、磁性的声音，以及那谜一样的一绺白发，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他的种种过人之处，并不足以让她忘记这位是奉主教之命前来作战的战士。而对德劳拉来说，那天唯一引起他注意的，是公鸡们骚动不安的啼鸣。

“一共就六只公鸡，叫起来却像有一百只，”院长说，“另外，有一头猪突然开始说话了，还有一只山羊产下了三胞胎。”院长又恳切万分

地加了句："自从您那位主教施恩给我们送来那个祸害，一切就都成了这副样子。"

花园里鲜花盛开，旺盛得有点不合时令，这也让院长觉得有点不对劲。穿过花园时，她指给德劳拉看，不少花的大小和颜色都像假的一样，还有一些散发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怪味。在她看来，一切日常事物都披上了某种超自然的色彩。她的每一句话都让德劳拉觉得这女人比他强势得多，于是他抓紧时间磨利自己的刀剑。

"我们并没有说那女孩被魔鬼附体了，"他这样开了口，"我们只是说有理由这样怀疑。"

"我们现在的亲眼所见足以证实这一点。"院长答道。

"请您注意，"德劳拉说，"有时候我们会把某些我们搞不懂的事情归结为魔鬼在作祟，而不去想，会不会是我们对上帝的理解还不够深刻。"

"圣托马斯说过，而且我拥护他的说法，"院长说，"对于魔鬼说的话，哪怕是真理，也不要相信。"

二楼安安静静的。一边是一排空着的单人房，白天都上着锁，前方是一排窗户，朝向浩瀚的大海。那些见习修女表面上看都在专心干活，可实际上，当院长和来访者一路走向那座牢房楼时，她们关注着二人的一举一动。

谢尔娃·玛利亚的牢房在走廊尽头，走到那里之前，他们路过马尔蒂娜·拉波尔德的牢房，此人也曾是个修女，因为用刀子捅死两名女伴而被判处终身监禁。她一直不肯吐露动机，已经被关了十一年了，她

的名声更多地来自一次次未遂的逃跑而非她的罪行。她从不认为终生被关在这里和在修道院里当修女有什么分别，她的这种想法从未改变，以至于曾主动提出是否可以到活死人的楼里去当女佣来代替服刑。她自打有了这个念头就从未安生过，像对待信仰一样为此投注了无限的热忱，说穿了，她就是想获得自由，哪怕她不得不再次杀人。

德劳拉抑制不住孩童般的好奇心，透过小窗的铁栅栏向牢房里看去。马尔蒂娜背对着他们，觉察到有人在看自己，朝门口转过身来。德劳拉立刻感受到这女人的魔力。院长有些不安，把他从窗前一把拉开。

“您小心点，”院长对他说，“这女人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有这么厉害吗？”德劳拉问道。

“就是这么厉害，”院长回答道，“如果这事儿归我管，她早就给放出来了。她是这座修道院里一个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女看守打开谢尔娃·玛利亚的牢门，一股腐臭的气味扑面而来。女孩仰躺在没铺垫子的石头床上，手脚被皮带捆着，看上去就像死了一样，可她的眼睛泛出大海的光亮。德劳拉看到她和自己梦境中的女孩一模一样，不禁浑身发抖，冷汗淋漓。他闭上双眼，用尽信仰的全部力量低声祷告了几句，做完这些，他觉得自己恢复了镇定。

“就算这个可怜的人儿没有被任何魔鬼附体，”他说，“她在这里的环境也会将她推向这样的境地。”

院长答道：“我们可没有这般能耐。”她们的确已经尽了全力来把这间牢房维持在最佳状态，可谢尔娃·玛利亚自己弄出了一堆垃圾。

“我们的作战对象不是她，而是附在她身上的魔鬼。”德劳拉说。

他踮起脚，绕过地上的污秽，走进了牢房，一面用小掸子在牢房里洒着圣水，一面按例行程序喃喃祷告。院长被水在墙上浸出的大片水渍惊呆了。

“血！”她尖声叫道。

德劳拉对她的这种轻率判断不以为然。首先，不能因为水是红颜色的就认定那是血，其次，即便是，也不一定就是魔鬼的。“设想这是一个奇迹，而只有上帝才有这般本领可能更合理。”他说。可是，二者皆非，因为石灰墙上的水渍干了以后不再是红颜色，而是显现出一种深绿色。院长的脸一下子红了。不光是克拉拉会修女，在她那个年代，所有女性都被禁止接受任何类别的学校教育，可她生长在一个杰出的神学家和了不起的异教徒相混合的家庭，从年少时起就学会了学院式的辩论。

“可是至少，”她反驳道，“我们不能否定魔鬼也会有改变血的颜色这种简单的本领。”

“能及时提出疑问最好不过，”德劳拉应声答道，两眼直视着院长，“请您读一读圣奥古斯丁吧。”

“圣奥古斯丁的著作我已读得滚瓜烂熟。”院长说道。

“那就请您再去读一遍。”德劳拉说。

在处理女孩的事情之前，他先好声好气地请那位女看守离开了牢房。然后他又对院长发了话，声音里少了些刚才的温和：

“您也请便吧。”

“这样做您可得负责。”院长说。

“这里权威最高的是主教。”他说。

“这一点用不着您来提醒，”院长语带讥讽，“我们早就知道你们是上帝的管家。”

德劳拉没去理睬院长最后那个用词，他在床边坐了下来，带着一种医生的细致神情查看女孩的身体。他还有点发抖，但已经不出冷汗了。

靠近了看，谢尔娃·玛利亚身上有抓挠的痕迹，青一块紫一块的，皮肤被皮带勒破了皮，可她身上最触目惊心的还是脚踝上的伤口，因为江湖庸医的胡乱治疗，伤口红肿，还化了脓。

德劳拉一边给女孩检查，一边向她解释说，把她送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害死她，而是怀疑有个魔鬼进了她的身体想偷走她的灵魂，说他需要她的配合才能弄明白真相。可是，德劳拉无法确定女孩是否在听他说话，又是否明白他是真心真意地在请求她配合。

检查完毕之后，德劳拉让人拿来一个药箱，但他没让那个药剂师修女进入牢房。他在女孩的伤口上抹了些药膏，又轻轻吹了吹，以缓解又红又肿的皮肤的灼痛，女孩对疼痛的忍受力令他钦佩不已。谢尔娃·玛利亚没有回答他任何一个问题，对他的布道也未流露出丝毫兴趣，更没有一丁点的抱怨。

这样的一个开端使德劳拉回到图书馆这个宁静港湾后还一直很沮丧。图书馆在主教府里算是最大的一间屋子了，一扇窗户都没有，沿

墙满满当当都是红木玻璃柜，书很多很多，放得整整齐齐。屋子正中央是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些航海图、一个星盘和其他一些航海仪器，还有一架地球仪，随着世界的不断扩大，上面有历代绘图师手工修修补补的痕迹。房间的一头有一张粗木书案，上有墨水瓶、削笔刀、几根用当地的火鸡羽毛做的笔、吸墨粉和一个花瓶，花瓶里插着一枝枯萎的康乃馨。整间屋子里光线幽暗，弥漫着一股陈年的书卷味，透着森林里的那种清新与宁静。

房间深处一个很小的角落里放着一个书橱，用粗木板封住。被监禁于其中的是神圣宗教法庭清除的禁书，因为“其内容亵渎神明、随意编造，故事虚假”。除了卡耶塔诺·德劳拉以外，谁都不能打开这个书橱，只有他得到了教皇的特别许可，可以去研究那些迷途的文字会把人带进什么样的深渊。

自从认识了谢尔娃·玛利亚，这个多年的宁静港湾却成了他的地狱。他再也不和教会里的或是世俗的朋友们聚会了，这些人曾与他一起分享纯洁思想带来的愉悦，进行学术竞赛，举办文学聚会和音乐晚会。现在，他的全部激情都投注在识破魔鬼的各种狡诈伎俩上，他用了五天五夜的时间阅读和思考，之后才又返回了修道院。礼拜一，主教看见他步履坚定地走了出来，便问他感觉怎么样。

“此刻我就像长出了圣灵的翅膀一样。”德劳拉答道。

他穿上了粗棉布长袍，这赋予他一个樵夫的胆气，他的灵魂披上了对抗气馁的盔甲。这都是必需的。对他的问候，女看守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作为回答，而谢尔娃·玛利亚见到他时一脸阴沉，牢房里满地的剩饭和大小便令人喘不上气来。祭台上，在圣灯旁边放着当天的午餐，动都没动过。德劳拉端起盘子，舀了一勺裹在凝固的油脂里的黑

豆喂她。她躲开了。他又试了几次，女孩的反应每次都一样。于是德劳拉自己吃掉了那勺黑豆，在嘴里咂了咂味儿之后，他嚼也没嚼就咽了下去，脸上满满地写着厌恶二字。

“你做得对，”他对女孩说，“这太不像话了。”

女孩根本没理会他的话。德劳拉替她治疗脚踝上的伤口时，她的皮肤抽搐了一下，眼睛也湿润了。德劳拉以为她被打动了，便细声细气地用一个温柔的牧羊人的言语安慰她，最后还壮起胆子松开了她手脚上的皮带，让她缓一缓被勒坏了的身体。女孩把手指蜷了好几次，直到感觉到它们还是自己的，又伸了伸被捆得麻木的双脚，这才头一次看了看德劳拉。她上下打量了他一会儿，突然像一头被困的野兽似的一跃而起，准确地扑到了他身上。女看守帮着把女孩制服，又将她绑好。临走之前，德劳拉从衣兜里掏出一串檀香木念珠，挂在了谢尔娃·玛利亚那些萨泰里阿教项链上。

主教看见德劳拉脸上的抓痕和手上被咬的伤口大吃一惊，那伤口光是看一看就让人疼从心起。可是，令主教更为吃惊的是德劳拉的反应，他把他的伤当成战利品一样炫耀，还开玩笑说自己会不会染上狂犬病。不过，主教的医生还是认认真真地给他处理了伤口，因为医生和另外一些人担心，下礼拜一的日食会是巨大灾祸的预兆。

不过，杀人犯马尔蒂娜·拉波尔德却没有在谢尔娃·玛利亚那里遭到任何抵抗。她曾踮着脚尖假装碰巧进了那间牢房，看见女孩手脚被绑躺在床上。女孩起初很紧张，两眼警惕地直愣愣盯着她，直到后来马尔蒂娜朝她微微一笑，女孩便也报以微笑，无条件地投降了。就好像多明伽·德阿德文托的灵魂一下子塞满了这间牢房。

尽管因为不停申明自己的无辜而哑了嗓子，马尔蒂娜还是告诉了女孩她是谁，又为什么要在那里度过她的余生。当她问谢尔娃·玛利亚因为什么缘故被关在那里时，女孩只能用自己从驱魔师那里听到的那点儿说法回答她：

“我身体里有个魔鬼。”

马尔蒂娜没再追问，她想，要么是女孩本人在撒谎，要么就是有人对女孩撒了谎，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听到女孩吐露实情的少数几个白人之一。她给女孩露了一手她的刺绣手艺，女孩请求她把自己松开，好能跟着她学。马尔蒂娜给她看了看自己长袍衣兜里装着的剪刀，以及其他几件做针线活的家什。

“你想要的不就是让我把你放开吗，”她说，“可是我警告你，如果你对我使什么坏的话，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谢尔娃·玛利亚毫不怀疑这个女人的决断力。松了绑的她学起刺绣来又快又巧，耳朵也好使，就像当初她学古诗琴一样。临走时，马尔蒂娜答应女孩，争取下礼拜一带她一起去看日全食。

礼拜五清晨，燕子要飞走了，它们在天空中围成了一个大圈，令人作呕的蓝色粪便雪花般落在街道和房顶上。人们吃不下、睡不着，直到中午的太阳晒干了发硬的鸟粪，晚风吹净了空气。但惊恐已然蔓延。从来没有人看见过成群的燕子一边飞一边屙下粪便，也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燕子粪便发出的恶臭能让人难以过活。

自然，在修道院里，谁都不怀疑谢尔娃·玛利亚拥有改变迁徙规律的本领。礼拜天做完弥撒后，德劳拉提着一小篮从外面买来的甜食穿过花园时，甚至从空气中感觉到了这种紧张的氛围。谢尔娃·玛利亚对

这一切无动于衷，脖子上还戴着那串念珠，可她没有回应德劳拉的问候，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他在她身边坐了下来，从篮子里取了块奶酪饼，兴致勃勃地嚼起来，嘴里含满了食物对她说：

“这东西吃起来有股天堂的味道。”

他把剩下的一半奶酪饼递到谢尔娃·玛利亚嘴边。她躲开了，但没有像前几次那样转过身去面对着墙，而是向德劳拉指了指：女看守正在监视他们呢。他朝着大门的方向用力挥了挥手。

“走开。”他命令道。

女看守离开后，女孩想用这半块饼垫垫早已饥肠辘辘的肚子，可刚吃到嘴里就吐了出来。“一股燕子屎的味道。”她说。但她的脾气却改了不少。他给她治疗后背上火辣辣的脱皮伤口时她挺配合，而且当她发现德劳拉手上包着绷带时，第一次对他投来关注。她带着一种绝非装出来的天真问他怎么了。

“被一条尾巴有一米多长的小疯狗咬了一口。”德劳拉告诉她。

谢尔娃·玛利亚想看看伤口。德劳拉解开绷带，她用食指轻轻碰了碰肿起来的紫红色伤口，仿佛那是一块烧红的炭，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我比瘟疫还要讨人嫌吧。”她说。

德劳拉没有引用《福音书》来回答她，而是用了句加尔西拉索的诗：

“只要对方能承受，万事皆可为。”

德劳拉心情激动，预感到某件重大的、无可挽回的事情已经开始步入他的人生。出门的时候，女看守以院长的名义提醒他说，外面的食物是不许带入的，怕有人把有毒的食品送进来，过去修道院被围困期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德劳拉对她撒谎说，带这个篮子来是经过主教同意了的，他还正式提出抗议，说在这样一座以厨艺闻名的修道院里，犯人的伙食实在是太糟糕了。

晚饭期间，他为主教读书时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像往常一样陪主教做了晚祷，祷告时他一直闭着眼睛，为了能更专心地想念谢尔娃·玛利亚。他回图书馆的时间比往日早了一些，他一直惦念着她，而且越是去想她，思念的渴望就越强烈。他高声诵读加尔西拉索的那些爱的十四行诗，心中惊惶不安，他怀疑每一句诗都是用密码写成的预兆，与他的生活密切相关。他难以入眠。天快亮的时候，他才趴在书案上睡着了，额头压在那本他只字未读的书上。睡梦深处，他听见隔壁教堂传来三声新一天的晨祷钟声。“万圣护佑的玛利亚，愿上帝保佑你。”他在睡梦中说道。他被自己的声音突然惊醒了，看见谢尔娃·玛利亚穿着囚袍，火焰般的长发披散在肩头，她把桌上花瓶里枯萎的康乃馨扔掉，换上了一束含苞欲放的栀子花。德劳拉用炽热的声音诵出加尔西拉索的诗句：“*我为你而生，因为你，我有了生命，我必为你而死，因为你，我奄奄一息。*”谢尔娃·玛利亚没有看他，只是莞尔一笑。他闭上双眼，好确定这并不是什么幻影在作怪。当他再次睁开眼睛，刚才的景象消失了，可整个图书馆里都飘荡着栀子花的香气。

---

[1] 原文为拉丁语。

四

卡耶塔诺·德劳拉神父应主教的邀请到开满黄花的风铃草藤萝架下观看日食，这里是整个府邸里唯一能将海天一览无余的地方。鹈鹕展开双翅，停在高空中一动不动，仿佛飞着飞着突然死去了一般。主教躺在一张吊床里，吊床两头拴在叉形支棍上的船用绞盘上，他刚睡完午觉，正缓缓地摇着扇子。德劳拉坐在他旁边的一把柳条摇椅上晃着。两个人都悠然惬意，一面喝着罗望子水，一面越过屋顶望着万里无云的辽阔天空。两点钟刚过，天空开始暗了下来，母鸡都蜷缩在架上，满天的星星同时亮了起来。整个世界都好像打了个超自然的寒战。主教听见几只迟归的鸽子扑打着翅膀，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鸽舍。

“上帝是伟大的，”他叹息道，“连动物都能感觉得到。”

值班的修女给主教送来一盏灯，以及几片用来看太阳的烟熏玻璃。主教在吊床上坐直了身子，开始透过玻璃片观察太阳。

“得用一只眼睛看才行，”主教说着，一面努力不让自己的呼吸发出哨音，“否则，就有两只眼睛都瞎掉的危险。”

德劳拉用手举着玻璃片，并没有去看日食。在长时间的寂静之后，主教暗中瞄了他一眼，看见他两眼发光，对这个虚假夜晚的魅力无动于衷。

“你在想什么？”主教问他。

德劳拉没有回答。此刻，他看见太阳像一轮越来越小的月亮，尽管隔着熏黑的玻璃片，他的视网膜还是被灼痛了。但他没有停止观看。

“你还在想那个小女孩吧。”主教说。

尽管主教常常料事如神，卡耶塔诺还是吃了一惊。“我刚才在想，老百姓会把他们的厄运同这次日食挂上钩的。”他说。主教摇了摇头，眼睛还是盯着天上。

“谁知道他们的想法有没有道理呢？”他说，“天主怎么出牌不是那么容易看得懂的。”

“这种现象早在几千年前就被亚述王国的天文学家们算出来了。”德劳拉说道。

“那是耶稣会教士的说法。”主教说。

卡耶塔诺继续望着太阳，但因为心烦意乱而没有使用玻璃片。两点十二分，太阳变成了一个完完整整的黑色圆盘，一时间，白天变成了午夜。随后，太阳恢复了它的人间本色，雄鸡也像在清晨一样啼鸣起来。等到不再盯住太阳看的时候，德劳拉的视网膜上仍然闪动着那个火的圆盘。

“这会儿我还能看见日食，”他开心地说，“不管我往哪边看，都能看见它。”

主教认为这项活动已经结束。“过几个小时就会消下去的。”说着，他在吊床上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并感谢上帝带来了新的一天。

德劳拉没有丢掉方才的话头。

“我尊敬的神父，”他说，“我不觉得那女孩被魔鬼附了体。”

这回轮到主教大吃一惊了。

“你为什么这样说？”

“我觉得她仅仅是受了惊吓而已。”德劳拉说道。

“我们有大量的证据，”主教说，“难道你没有看过那些记录吗？”

岂止看过，德劳拉对那些记录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其说这有助于了解谢尔娃·玛利亚的状况，还不如说这有助于了解院长的心思。女孩入院头一天早晨待过的地方、碰过的所有东西都给驱了一遍魔。所有和她接触过的人都接受了斋戒和净化。第一天抢了她戒指的那个见习修女被罚在园子里强迫劳动。大家纷纷传言说那女孩徒手杀死了一只山羊，开开心心地肢解了它，又兴高采烈地就着调料吃下了山羊的睾丸和眼睛。她还炫耀自己的语言天分，和非洲各个国家的人都谈笑自如，比他们自己彼此之间交流还要顺畅，此外她还能与各种动物对话。修道院里养的十一只金刚鹦鹉，二十年来一直装点着花园，女孩来的第二天，一大早，它们无缘无故地死得一只不剩。她还用假嗓音唱魔力十足的歌曲，把奴仆们迷得神魂颠倒。当她知道院长在找她时，她使出只让院长看不见她的隐身法术。

“不管怎么样，”德劳拉说，“我认为所有我们觉得是恶魔作祟的那些东西，都是黑人的习俗，是那女孩在被父母弃之不管的情况下学会的。”

“小心一点吧！”主教警告德劳拉，“比起利用我们的错误，主的敌人更善于利用我们的智慧。”

“这么说，我们能给主的敌人送去的最好礼物就是在一个健健康康的女孩身上驱魔喽？”德劳拉反驳道。

主教被激怒了。

“我可以理解为你要造反吗？”

“请您理解，我只是坚持我的疑问，主教大人，”德劳拉说，“可我绝对谦卑地顺从您。”

就这样，他没能说服主教，便又回到了修道院。他的左眼上蒙了块单眼眼罩，那是他的医生让他戴上的，一直要戴到他视网膜上印下的太阳消散为止。在花园和一道道走廊里行走的时候，他始终感到有许多目光在追随着自己，一直追到那间牢房，可是没有一个人对他开口说话。整座修道院似乎正在从日食的惊扰中慢慢恢复。

女看守为他打开谢尔娃·玛利亚的牢门时，德劳拉只觉得心脏在胸膛里怦怦乱跳，他几乎站不稳。为了探一探她那天早晨情绪如何，德劳拉问女孩看没看日食。实际上，她在露台上看了，可她不明白他为什么在眼睛上戴这么个罩子，她看的时候也没用任何防护，却什么问题也没有。她告诉他，修女们看日食的时候都跪倒在地，整个修道院

都瘫痪了，一直到后来公鸡啼叫起来。可她一点也没觉得这和另一个世界有什么关系。

“我看到的和我每天晚上看到的没什么两样。”她说。

她身上已经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只是德劳拉一时还拿不准，最明显的是，她有了一丝忧伤的情绪。他没有弄错。他刚开始给她治疗伤口，女孩就满眼急切地盯住了他，声音颤抖着对他说：

“我要死了。”

德劳拉浑身一颤。

“谁跟你说的？”

“马尔蒂娜说的。”女孩告诉他。

“你见过她了？”

女孩告诉他，这女人已经来过她牢房两次，教她刺绣，她们还一起看了日食。她还说，这女人挺好的，脾气温和，院长批准她在露台上教大家刺绣，在那里还能观赏海上的黄昏。

“啊哈，”德劳拉答道，眼睛一眨不眨，“她跟你说过你什么时候死吗？”

女孩咬紧了嘴唇，差点没哭出来。

“日食以后。”她说。

“日食以后，那也可能是一百年以后呀。”德劳拉说道。

不过，他得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治疗上，以免女孩看出他嗓子眼发紧。谢尔娃·玛利亚没再说什么。他觉得这沉默有点怪，便又看了女孩一眼，这才发现她的双眼湿润了。

“我害怕。”女孩说。

说完她倒在床上，放声大哭。他稍稍坐近了点，用告解神父的和缓口吻安慰她。谢尔娃·玛利亚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卡耶塔诺不是来给她看病的，而是来给她驱魔的。

“那你为什么还要给我疗伤呢？”她问道。

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因为我非常爱你。”

她对他的鲁莽没什么反应。

离开时，德劳拉往马尔蒂娜的牢房里看了看。他第一次看清了，她一脸麻子，头上没一根头发，鼻子奇大无比，满嘴的老鼠牙，但从她身上立刻能感觉到一股诱惑力在涌动。德劳拉宁愿站在门口同她说话。

“那个可怜的孩子已经有够多的理由担惊受怕了，”他说，“我请求您别再给她添乱了。”

马尔蒂娜愣住了。她从来没想过预言任何人的死期，更不会对一个如此可爱无助的小女孩这样做。她只不过问了问她的状况，女孩刚回答了三四个问题她就明白了这孩子撒谎成性。马尔蒂娜说话时的认

真态度足以使德劳拉明白，原来谢尔娃·玛利亚对他也说了谎话。他为自己的轻率向马尔蒂娜道歉，并请求她不要去找女孩理论。

“至于我要做什么，我自然会知道的。”他最后说道。

马尔蒂娜开始对他施展魔力。“我知道阁下是什么人，”她说，“我也知道您一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这回德劳拉折了一只翅膀，因为他证实了一点，那就是牢房里的孤独足以培育对死亡的恐惧，在这一点上，谢尔娃·玛利亚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这个礼拜，何塞法·米兰达嬷嬷派人给主教送去一份她亲笔写的备忘录，其中满是抱怨和抗议。她请求免去克拉拉会修女监守谢尔娃·玛利亚的职责，因为她们的罪过早已赎清，而谢尔娃·玛利亚的到来无疑是对她们追加的惩罚。她还列举了记录在案的一连串新的大事件，这些事件只能用女孩无耻地和魔鬼勾结在一起来解释。最后她怒气冲天地控告了卡耶塔诺·德劳拉的傲慢，说他思想放纵，对她本人心怀私怨，还说他违反戒律，擅自带食物进修道院。

德劳拉刚回来，主教就给他看了那份备忘录，他站着读了起来，脸上肌肉纹丝不动。看完，他怒气冲天。

“如果说这世上有谁被所有魔鬼附了体，那这个人就是何塞法·米兰达。”他说，“怨恨的魔鬼，狭隘的魔鬼，愚蠢的魔鬼。这女人该受到诅咒！”

主教对他说出这样恶毒的话感到惊讶，德劳拉注意到了这一点，试图用一种平静的语气为自己解释。

“我的意思是说，”他说道，“她赋予邪恶势力这么大的能耐，让人感觉她似乎更崇拜魔鬼。”

“我的职权不允许我同意你的说法，”主教说道，“可我心里很想表示赞同。”

主教训导他凡事都要有尺度，不可过分，并要求他一定要有耐心，以便对付院长那不幸的坏脾气。“《福音书》里像她这样的女人多了去了，有的比她毛病还多，”他说，“尽管如此，耶稣还是对她们颂扬备至。”主教没能说下去，因为一声惊雷响彻整个府邸，接着轰隆隆地向海面滚去，一场如《圣经》里描述的大雨把他们和余下的世界隔绝开来。主教躺回摇椅上，陷入对故土的怀念。

“我们离得太远了！”他叹了口气。

“离哪儿太远？”

“离我们自己，”主教说，“一个人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弄明白自己是个孤儿，你觉得这公平吗？”等不来答案，他便坦承自己的思乡之情：“一想到此刻在西班牙，人们已经入睡，我的心就充满恐惧。”

“地球的转动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德劳拉说。

“可是我们可以假装不知道它在转动，这样心里会好受一些，”主教说，“伽利略缺失的不光是信仰，他更缺的是心。”

德劳拉十分清楚是些什么样的危机在一个个淫雨霏霏的夜晚折磨着主教，这从他突然老去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从这种分泌黑色胆汁的状态下岔开，直到睡意将他征服。

月底，贴出来一张公告，宣布新任总督堂罗德里戈·德布恩·洛萨诺在去圣菲就职途中将在此地停留访问。随行人员有法官、公务人员、仆人和私人医生，还有一支四人弦乐队，这是女王送给他的礼物，以助他打发在西印度群岛的无聊时光。总督夫人和修道院院长有点亲戚关系，便请她安排自己住在修道院里。

到处都弥漫着生石灰刺鼻的气味，沥青冒着蒸汽，榔头叮叮当当地敲得人心烦，各色人等的叫骂声一直传进清修的内院里来，在这样的环境中，谢尔娃·玛利亚被遗忘了。一个脚手架轰然倒下，死了一个泥瓦匠，还有七个工匠受了伤。院长认定这次灾祸是谢尔娃·玛利亚施展妖术所致，并利用这个新的机会再一次要求把她打发到别的修道院去，直到办完这桩大事。这次院长的主要理由是，让总督夫人住在这么一个被魔鬼附体的女孩旁边实在太不合适了。主教没有答复她。

堂罗德里戈·德布恩·洛萨诺，阿斯图里亚斯人氏，英俊老练，得过巴斯克球和射石鸡比赛的冠军，这多少弥补了他比妻子大二十二岁的缺憾。他笑起来浑身都在抖，就连自嘲时也是如此，他从来不放过任何展示自己体魄的机会。刚刚感受到加勒比海夹杂着夜间鼓声和番石榴成熟香气的第一缕微风，他便脱去了春季的华服，袒露着胸膛，在女士们的圈子里走来走去。从船上下来的时候，他身着衬衣，既没有发表演讲，也没有受到鸣炮相迎。尽管主教有禁令，但为了欢迎总督，人们还是被准许跳起了方丹戈舞、奔德舞和昆比亚舞，并在空旷的地方举行了斗牛和斗鸡表演。

总督夫人几乎还是个妙龄少女，活泼好动，还有点任性，像一阵革新的风暴刮进了修道院。没有她搜寻不到的角落，没有她理解不了

的问题，也没有她不想改善一下的东西。初来乍到，她在修道院里跑来跑去，想穷尽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到后来，院长认为，还是别让她对监狱这一块留下什么坏印象为好。

“那地方没什么看头，”她对总督夫人说道，“总共只有两个犯人，其中一个还被魔鬼附了体。”

这话足以引起总督夫人的兴趣。这时再说什么牢房还没有准备好呀、犯人也没能事先告诫一番呀，通通没有用处了。牢门刚一打开，马尔蒂娜·拉波尔德就一头扑倒在总督夫人脚下，请求得到宽恕。

这可不大容易：她已经逃亡过两次，一次失败一次成功。第一次是在六年前，她，还有另外三个因犯了不同罪过被判处不同刑罚的修女，试图从面向大海的那个露台逃跑。一个修女成功逃脱。从那以后，窗户就都封上了，露台下面的院子也设了防。第二年，剩下的三个人捆住了当时睡在楼里的女看守，从一扇供奴仆们进出的小门逃了出去。马尔蒂娜的家人听从了她的告解神父的建议，把她又送回了修道院。在此后漫长的四年里，她始终是那里唯一的犯人，没有权利去会见室见家里人，礼拜天也不能去小教堂望弥撒。这一切都使得宽恕看起来根本不可能。然而，总督夫人答应替她向丈夫求情。

谢尔娃·玛利亚的牢房里，生石灰和沥青的怪味儿还很刺鼻，但已是面貌一新。女看守一打开牢门，总督夫人就感到一股寒气扑面而来。谢尔娃·玛利亚穿着一件磨破的长袍，脚下一双脏兮兮的套鞋，坐在一个被她自身的光照亮的角落里，慢条斯理地做着针线活。直到总督夫人向她问了声好，她才抬起眼来。总督夫人在她的目光里看见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启示的力量。“至圣至尊的圣体啊。”她喃喃说道，向牢房里迈了一步。

“您小心点，”院长附在她耳边告诉她，“她就像头母老虎。”

院长抓住了总督夫人的胳膊。总督夫人没再往里走，可只看了谢尔娃·玛利亚一眼，就足以让她决定要救赎这个女孩。

该城的市长是个女里女气的单身汉，他为总督举办了一场只有男人参加的午宴。那支西班牙四人弦乐队和另一支来自圣哈辛托的风笛鼓乐队演奏了乐曲，一队黑人跳起了群舞和化妆舞，拙劣地模仿白人的舞蹈。最后，大厅尽头的帘幕拉开了，市长用等重的黄金买的那个阿比西尼亚女奴现身了。她身着一件几乎透明的长袍，这让她的裸体更具诱惑力。在近距离地向普通观众展示自己之后，她停在了总督面前，长袍也一下子从她身上滑落到脚下。

女奴完美到了惊人的地步。她的肩膀上没有被黑奴贩子打上烙印，后背也没有烙上第一个买主姓氏的首字母。她全身散发出一种神秘的气息。总督脸色发白，喘了口粗气，挥了挥手，把这个消受不起的场面从脑海里抹去。

“看在主的分上，快把她带走，”他吩咐道，“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她。”

兴许是为了报复市长的轻浮举动，在院长于自己的私人餐厅举办的晚宴上，总督夫人向大家介绍了谢尔娃·玛利亚。马尔蒂娜·拉波尔德警告过他们：“千万别试图取下她的项链和手镯，然后你们就会看到她表现得有多棒。”果然如此。她们给她穿上了她来修道院时穿的那件她祖母的衣服，给她洗了头，又把她散乱的长发梳得整整齐齐，使其拖在她的身后，总督夫人亲自牵着她的手，把她带到丈夫桌前。就连院

长都被她的优雅、她的光彩照人和那一头非比寻常的长发给震住了。总督夫人在丈夫耳边轻轻说道:

“这个女孩被魔鬼附了体。”

总督不肯相信。他先前在布尔戈斯看见过一个被魔鬼附体的女人，她一整夜不停地拉屎，最后粪便都从房间里溢了出去。为避免谢尔娃·玛利亚也遭此厄运，总督把她交给了自己的几个医生。他们都肯定地说，这女孩没有一丝一毫狂犬病的症状，和阿布雷农肖一样，他们也认为她已经不可能再染上那病了。可是要说她没有被魔鬼附体，他们谁都没有把握。

主教利用这次盛会的时间仔细想了想院长的那份备忘录，想了想谢尔娃·玛利亚最后的结局。至于卡耶塔诺·德劳拉，则试图在驱魔前做些自我净化的准备，他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只带了些木薯饼和水。他没能成功，而是整夜神志昏迷，白天也不能合眼，片刻不停地写着放荡不羁的诗句，只有这样他才能使自己骚动的躯体安静下来。

差不多一百年以后，在拆迁这间图书馆的时候，人们在一札几乎已经无法辨读的文卷中发现了其中几首诗。第一首，也是唯一一首可以完整辨读的，写的是他对自己十二岁时的回忆：那一天春雨绵绵，在阿维拉神学院铺着鹅卵石的院子里，他坐在一口学生用的木箱上。那时他刚从托莱多骑了几天的骡子来到这里，身上穿着一件用父亲的衣服按他的身材改小了的衣裳，那口木箱足有他身体两倍重，因为母亲把一切可能用得着的东西全都放了进去，好让他体面地过完实习期。守门人帮他把箱子搬到了院子中央，然后就把他扔在了雨地里。

“你自己把它搬到三楼去吧，”守门人对他说，“到了那儿有人会告诉你宿舍里哪一块地方是你的。”

一时间，整个神学院的人都汇聚在面朝院子的阳台上，想看看他怎么搬这口大木箱，这时的他就像是一出戏中的唯一角色，只有他自己浑然不知。当他明白了不会有任何人来帮忙，便顺着石块砌成的陡峭台阶，用自己的两条臂膀搬起尽可能多的东西上了三楼。新学员的寝室里有两排床，指导老师给他指了指他的地方。卡耶塔诺把东西放在自己的床上，再回到院子里，就这样又跑了四趟才把东西搬完。最后他抓住空木箱的把手，硬把木箱从台阶上拖了上去。

他经过每一层楼的时候，那些站在阳台上看他的教师和学生都没有转回身来看他，但是当他拖着箱子上到三楼时，担任院长的神父在楼梯平台那里等候他，并带头鼓起了掌。其他人也都跟着鼓掌喝彩。于是卡耶塔诺明白了，神学院的第一课就是自己把箱子搬到三楼，不作任何询问，也不向任何人求助，这一关他算是漂漂亮亮地通过了。他思路敏捷、性情温顺、果断坚强，这些都被当成教育新生的典范。

然而，让他记忆最深刻的却是那天晚上在院长办公室的一次谈话。院长叫他去是想跟他谈谈在他箱子里找见的唯一一本书，那书已经散了页，书页不全，又没了封面，是他偶然从他父亲的抽屉里翻出来的。来的路上他已经尽量看了一部分，这会儿正满心想知道结尾如何。院长想听听他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

“读完我就知道了。”他回答道。

院长面露轻松的微笑，把书锁了起来。

“你再也不会知道了，”院长告诉他，“这是一本禁书。”

二十四年以后，在主教府那间幽暗的图书馆里，他意识到，从他手里经过的每本书他几乎都读了，经过批准的也好，被查禁的也好，就是没读完那本书。他感到，就在那一天，一段完整的人生结束了，另一段不可预知的人生开始了，想到这儿，他不寒而栗。

在他斋戒的第八天，他已经开始做下午的祷告了，这时有人来通知他说，主教在大厅里等他，他们要一起迎接总督。即使对总督本人来讲，这也是一次意料之外的访问，他是在城里首次巡游的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决定来访的。他不得不在鲜花盛开的露台上凝视了好一会儿四周的建筑，与此同时，离得近的要员们被紧急召来，大厅也经过了简单收拾。

主教同他智囊团的六名教士一起接待了总督。他让卡耶塔诺·德劳拉坐在他的右手边，介绍他的时候没有说他的头衔，只说了他的全名。谈话开始之前，总督先用怜悯的目光扫视了一番斑驳不堪的墙皮、破破烂烂的窗帘、廉价的手工家具，以及几位身穿寒酸长袍、早已被汗湿透的教士。主教带着一股受伤的自豪说："我们都是木匠若瑟[1]的儿子。"总督摆出一副理解的姿态，开始回顾自己在第一个礼拜里的印象。他讲到他那不着边际的计划：在医好战争的创伤之后如何增加与英属安的列斯群岛的贸易；讲到官方在推广教育上的种种功绩；还讲到如何激励艺术和文学，以使这些边缘的殖民地与世界同步。

"这是个革新的时代。"他说。

主教又一次证实了一件事：掌管世俗权力是多么的容易。他伸出一根颤巍巍的手指指向德劳拉，看都没看他一眼，对总督说：

"在这里，最能跟上这些新形势的是卡耶塔诺神父。"

总督顺着主教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遥不可及的面孔和一双紧盯着他、一眨也不眨的惊恐的眼睛。总督怀着真诚的兴趣问德劳拉：

“莱布尼茨的书你读过吗？”

“读过，阁下。”德劳拉答道，还加了句解释：“因为职务的需要。”

直到这次访问接近尾声时，大家才弄清楚总督最关心的其实是谢尔娃·玛利亚的状况。总督解释道，这既是为了她本人，也是为了让修道院院长得到安生，院长的烦恼实在让人同情。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但是修道院的记录簿告诉我们，这个可怜的女孩确实被魔鬼附体了，”主教说，“关于这一点院长比我们清楚。”

“她认为你们陷入了撒旦布下的一个圈套。”总督说。

“陷入圈套的不光是我们，而是整个西班牙，”主教说道，“我们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为的是推行基督的准则。我们在望弥撒的时候做到了，在举行宗教游行的时候做到了，在各个守护神的节日里也做到了，可就是没能使之浸入人们的灵魂。”

他谈起了尤卡坦，在那里，他们建起了豪华的大教堂来掩蔽异教的金字塔，可他们并不知道，那些土著去望弥撒，是因为在那些银质祭坛下面，他们自己的神庙依然存在。他还谈到从征服时期就开始了的血统混杂：西班牙人血统和印第安人血统混在一起，这两种血统又和各种各样的黑人血统甚至曼丁加穆斯林血统混在一起，他自问，这

样混来混去，上帝的天国里能装得下吗？尽管呼吸不畅，岁数大了老咳嗽，他还是把话一口气对总督说完：

“如果这一切不是上帝的敌人的圈套，那还能是什么呢？”

总督脸色一变。

“阁下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吧。”他说。

“请阁下不要这么看这个问题，”主教彬彬有礼，“我只是想强调我们需要信仰的力量，这样，这里的人才值得我们做出牺牲。”

总督回到刚才的话题。

“据我所知，院长的忧虑还是很现实的，”他说，“她觉得，对这样一个棘手的案例而言，也许别的修道院条件更好一些。”

“阁下知道，因为何塞法·米兰达的正直、高效和她的权威性，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圣克拉拉修道院，”主教说道，“上帝知道，我们这样选是有道理的。”

“我会把这一点转达给院长。”总督说。

“这一点她非常清楚，”主教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她为什么不敢相信这一点。”

说着说着，主教感觉自己的哮喘就要发作了，便匆匆结束了这次接待。他说他收到了院长的一份控诉备忘录，他答应，只要他的健康状况稍有好转，便当全力以赴去解决。总督向他表达了谢意，以一种

私人化的礼仪结束了这次访问。总督也患有哮喘痼疾，他把自己的几个医生推荐给了主教，可主教似乎不以为然。

“我的一切都掌握在上帝手中，”他说，“再说我已经活到圣母故去时的年龄了。”

与初见时的问候不同，他们之间的告别进行得缓慢而又充满仪式感。三位教士，包括德劳拉，陪同总督顺着阴暗的走廊走到大门口。总督的卫兵们手持十字戟列成方阵，隔开了成群的乞丐。上马车前，总督朝德劳拉转过身来，不容分说地指着他，说了句：

“不要让我忘记你。”

这句话说得太突然，又不好琢磨，德劳拉只来得及鞠了一躬，作为回答。

总督的马车向修道院驶去，他要把这次访问的结果告诉院长。几个小时以后，就要离开时，他不顾总督夫人的催促，拒绝了对马尔蒂娜·拉波尔德的赦免，因为他觉得这样会给许多他先前在监狱里遇到的触犯人类尊严的罪犯开一个不好的先例。

德劳拉回来时，主教一直向前佝偻着身子，闭着双眼，努力克服呼吸时发出的哨音。侍从们都已踮着脚尖悄悄退下，客厅里一片昏暗。主教四下环顾，看见空空的椅子靠着墙排成了一排，客厅里只剩下卡耶塔诺一个人，便用很低的嗓音问他：

“我们还从未遇见这么好的人，是吗？”

德劳拉摆出模棱两可的姿态，算是回答。主教艰难地抬起身来，手臂支在摇椅扶手上，直到呼吸慢慢平复。他不想吃晚餐了。德劳拉

连忙点亮一盏油灯，照亮主教回卧室的路。

“我们对总督太不友好了，是吗？”主教问道。

“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对他友好呢？”德劳拉反问道，“不预先正式通知，是不能来敲一个主教的大门的。”

主教不同意这个说法，他的口气变得异常严厉。“我的大门就是教会的大门，而他所做的和从前的基督徒没什么两样，”他说道，“失礼的是我，因为我的胸部有问题，我应该做点什么去弥补一下。”走到卧室门口，他话锋一转，改变了语气，还亲切地拍了拍德劳拉的肩膀跟他告别。

“今天晚上为我祷告祷告吧，”他对德劳拉说，“我怕这一夜会很难熬。”

确实如此，在接待来访的时候，他就预感到这次哮喘发作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吐酒石和其他各种虎狼之剂都没能缓解症状，只能给他紧急用上了放血疗法。天亮的时候他恢复了元气。

卡耶塔诺在隔壁图书馆里彻夜未眠，浑然不知这边的情况。他刚要开始做晨祷，有人来通知他说主教在卧室里等他。他看见主教的时候，后者正坐在床上吃早饭，一碗巧克力配面包和奶酪，呼吸时就像是一口新做成的风箱，精神矍铄。卡耶塔诺一看见主教的模样，心里就明白了，主教已经拿定主意。

果然，和院长的请求相悖，谢尔娃·玛利亚将继续留在圣克拉拉修道院，而卡耶塔诺·德劳拉神父将得到主教的完全信任，继续负责她的事情。她将不再像现在这样被迫遵守牢规，而是和修道院里其他人一

样，享有普遍待遇。虽说主教感谢那本记录簿，但那些记录不够严谨，反而会干扰整个过程的清晰度，因此，驱魔师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主教最后授命德劳拉以自己的名义去拜访侯爵，并授予他解决一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权利，而主教自己只要时间与身体状况允许，随时可以接见侯爵。

“不会再有别的指示了，”主教这样为自己的话作结，“愿上帝保佑你。”

卡耶塔诺一路小跑来到修道院，心怦怦直跳，但他在牢房里没找见谢尔娃·玛利亚。她在礼堂里，浑身披满了货真价实的珠宝，长发委地，姿态里带着一个女黑奴的优雅端庄：总督随从里的一位著名画师正在为她画像。无论是她的美貌，还是她听从艺术家摆弄时的灵性，都令人惊叹不已。卡耶塔诺深深地陶醉了。他找了个阴凉处坐了下来，他看得见女孩，而女孩却看不见他，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消除心中的任何疑问。

做午后祷的时候，画像画好了。画师远远地瞄了瞄，又加上最后两三笔，在签上自己的名字之前，他让谢尔娃·玛利亚先看看画像。画得真像，她站在云端，身旁是一群顺从的魔鬼。她缓缓地观赏画像，认出了正值花样年华的自己，最后说了句：

“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连魔鬼都像吗？”画师问道。

“他们就是这样的。”她回答道。

姿势摆完了，卡耶塔诺陪她走回牢房。他从未见过她走路的样子，她的步伐和跳舞一样优雅敏捷。他也从未见过她穿囚服以外的衣裳，而她这一身女王装束使她显得成熟华贵，不难看出，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已经长成一个女人了。他们从未并肩而行，这样无忧无虑地走在一起使他很开心。

牢房也变了模样，这是总督夫妇的劝告起了作用，他们在辞行时用主教那些合情合理的理由说动了院长。垫子换了新的，上面有麻布床单和羽毛枕头，还放了些日常的洗漱和洗浴用品。海上的光从没有了十字格的窗户涌进牢房，辉映在刚用石灰粉刷一新的墙上。既然她吃得和修道院里的其他人一样，也就没有必要再从外面带吃食进来了。尽管如此，德劳拉还是一直变着法地偷偷从外面买好吃的东西带进来。

谢尔娃·玛利亚邀请他一起吃午后甜点，德劳拉只尝了一块饼干，那是修女们做的，很有名气。正吃着，女孩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

“我见过雪。”

卡耶塔诺并不感到惊讶。据说从前有一位总督，想从比利牛斯山带些雪过来，好让这边的土著看看雪是什么样子，殊不知这里其实就有雪，就在临海的内华达山上，在圣马尔塔。兴许这回堂罗德里戈·德布恩·洛萨诺搞了什么新花样，实现了这个奇迹。

“不是的，”女孩说，“我是在梦里看见雪的。”

她告诉他：梦里她站在一扇窗户前，窗外下着大雪，她一颗一颗地摘着吃怀里兜着的一串葡萄。德劳拉有种被恐惧用翅膀扇了一下的感觉。最后的答案近在咫尺，他浑身发抖，壮起胆子问道：

“最后怎么样了？”

“我不敢告诉您。”谢尔娃·玛利亚说。

对他来说，这一句话就足够了。他闭上眼睛为她祈祷。祷告完，他像换了个人一样。

“你别担心，”他对女孩说，“我保证不久你就会自由自在、快快乐乐的，圣灵会保佑你的。”

贝尔纳达一直不知道谢尔娃·玛利亚已经被送进了修道院。她是偶然知道这件事的。一天夜里，她撞见杜尔丝·奥莉维亚在打扫房屋、归置东西，恍惚之中她以为那又是自己的幻觉。为了找到能说服自己的解释，她开始一间房一间房地搜查，找着找着，她突然觉得已经有好些日子没见过谢尔娃·玛利亚了。卡莉达·德尔科布雷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她：“侯爵先生通知我们，说她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说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看见丈夫的卧房里还亮着灯，贝尔纳达没敲门就走了进去。

侯爵躺在吊床上，还没睡着，身边用牛马的粪便点着小火，冒出烟来驱赶蚊虫。看见这个被丝绸睡衣衬得怪模怪样的奇怪女人，脸色苍白、萎靡不振，就像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侯爵心中也闪过一个念头：自己是不是见了鬼了。贝尔纳达问他谢尔娃·玛利亚上哪儿去了。

“她有好多天没和我们在一起了。”侯爵回答道。

她从最坏的角度来理解侯爵这句话，不得不在离她最近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好喘口气。

“您的意思是说，阿布雷农肖把该做的事都做了？”她说。

侯爵画了个十字说：

“愿上帝拯救我们！”

侯爵把真相告诉了她。他小心翼翼地解释说，之所以没有及时把这件事告诉她，是因为她自己说过，大家就权当她已经死了。贝尔纳达两眼一眨不眨地听着，那股专注劲头是他在他们十二年不幸的共同生活中从未见过的。

“我知道，这样做会要了我的命，”侯爵说道，“但只要能换回她的命就行。”

贝尔纳达叹了口气：“您是想告诉我，现在我们家的耻辱已经路人皆知了。”她看见丈夫的眼圈里有一滴泪花在闪动，一阵战栗自她的五脏六腑里升起。这一次不是因为死亡，而是因为体悟到该发生的必然会发生，怎么也回避不了。她没有猜错。只见侯爵用尽最后一丝气力从吊床上起身，瘫倒在她跟前，发出一个老人无力回天的号啕大哭。汩汩涌出的男人的眼泪浸透了她的丝绸睡衣，顺着她的大腿根流淌，贝尔纳达投降了。不管她有多恨谢尔娃·玛利亚，她承认，知道她还活着，她总算松了口气。

“我一向对什么都能理解，除了死亡。”她说。

她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陪伴她的只有蜂蜜和可可。两个星期后，她走出房间时活像一具移动的死尸。一大早，侯爵就发觉有人在忙着做外出旅行的准备，但他没太上心。在阳光开始变暖之前，他看见贝尔纳达骑着一头温顺的骡子出了院子的大门，后面还跟着另外一

头，驮着行李。她这样出门是很经常的事，不带骡夫，不跟奴隶，不向任何人告别，也不说出门的理由。可侯爵知道，她这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因为除了每次都带的箱子之外，这次她还把多年来埋在床底下的满满两罐黄金也带走了。

侯爵懒懒地躺在吊床上，那种恐惧再次袭上心头：奴隶们会用刀子把自己捅了，于是他下令连白天也不许他们进到府邸里来。所以，当卡耶塔诺奉主教之命来拜见侯爵的时候，不得不自己推开大门，不请而入，因为任他把门环敲得当当响，就是没人应答。猎犬们在笼子里一阵狂吠，可卡耶塔诺继续向里走。在果园里，侯爵身穿撒拉逊人的外衣，头戴托莱多小帽，正躺在吊床上睡午觉，身上落满了朵朵柑橘花。德劳拉看着侯爵，没去叫醒他，觉得就像看见了苍老的、被孤独摧毁了的谢尔娃·玛利亚。侯爵醒了，因为那个眼罩的缘故，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认出这人是德劳拉。德劳拉举起手，伸开五指，摆出一副讲和的态势。

“上帝保佑您，侯爵先生，”他开了口，“您好吗？”

“就这样，”侯爵答道，“一点一点烂下去。”

他疲惫地挥了挥手，把午睡的蛛网拨开，在吊床上坐起身来。卡耶塔诺先为自己擅自进了大门表示了歉意。侯爵向他解释说，敲门环是不会有人理睬的，因为这里的人早已不习惯迎接访客了。德劳拉用一种庄重的音调说：“主教大人事务繁忙，并且饱受哮喘的折磨，授命我以他的代表身份前来拜访。”说完这段开场白，他在吊床旁边坐了下来，直奔那件令他五内俱焚的大事。

“我想通知您，我受委托负责您女儿的精神健康问题。”他说。

侯爵向他表示了感谢，同时想知道女儿近来如何。

“挺不错的，”德劳拉说，“不过，我想帮她恢复得更好一点。”

他向侯爵介绍了驱魔术的意义和方法，对他讲起了由耶稣传授给门徒的这种把妖魔鬼怪从身体里驱除出去，从而治病扶弱的能力，讲起了《福音书》里提到的群魔以及两千头被其附体的猪的故事。当然，眼下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谢尔娃·玛利亚是不是真的被魔鬼附了体。他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但他需要侯爵的帮助来消除任何疑问。首先，他说，他想了解一下在进修道院之前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不知道，”侯爵答道，“我的感觉是，我越多地去了解她，对她的了解就越少。”

侯爵一直心存内疚，被往事折磨：当年，是他把女儿扔在了奴隶们的院子里不管不顾。女儿有时长达数月的沉默、她突然发作的莫名其妙的暴躁、她与母亲斗智斗勇的那份狡黠（把母亲戴在她手腕上的铃铛拴在猫身上），这些被他通通归咎于此。而了解她的最大障碍则是她那以撒谎为乐的毛病。

“就像黑人一样。”德劳拉说。

“黑人也只是对我们撒谎，他们自己之间可不这样。”侯爵说。

在她的卧室里，德劳拉一眼就看出哪些是老祖母的东西，哪些是谢尔娃·玛利亚新添的：能活动的玩偶、上了发条能跳舞的小人、八音盒。床上放着侯爵送女儿去修道院时带的那只小箱子，箱子原封未动。那把古诗琴上布满灰尘，被随意扔在一个角落。侯爵解释道，那是一种早已无人弹奏的意大利乐器，并称赞说女儿弹这个很有天分。

他漫不经心地给琴调了调音，最后，靠着不错的记忆，他不但弹而且唱起了他和谢尔娃·玛利亚一起唱过的歌曲。

这是一个吐露心声的时刻。德劳拉从乐声里听到了侯爵没有对他讲出的那些有关女儿的事情。侯爵情不能自已，没能把歌唱完。他叹息道：

“您可能想象不出那顶帽子戴在她头上有多合适。”

德劳拉也被他的情绪感染了。

“我看得出来，您很爱您的女儿。”他对侯爵说。

“您想象不出我有多爱她，”侯爵说道，“只要能见她一面，让我付出我的灵魂我都在所不惜。”

德劳拉又一次感觉到，圣灵不会漏过任何一个细枝末节。

“没有比这更好办的了，”他说，“只要我们能证明她并没有被魔鬼附体。”

“您去和阿布雷农肖谈谈吧，”侯爵说，“他从一开始就说过，谢尔娃很健康，可这一点只有他能解释清楚。”

德劳拉拿不定主意。阿布雷农肖可能是天主的安排，可是同他谈话也可能会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牵连。侯爵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侯爵说。

德劳拉晃晃头，摆出一副意味深长的姿态。

“我对宗教法庭的那些文件太熟悉了。”他说。

“只要能重新得到女儿，我做出再大的牺牲都不为过。”侯爵坚持道。看到德劳拉没有任何反应，侯爵给自己的话作了结：

“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求求您了。”

德劳拉心都要碎了，对侯爵说道：

“我也求求您不要再让我为难了。”

侯爵没有再坚持，他拿起床上的小箱子，请德劳拉帮忙带给女儿。

“至少这样她会知道我在挂念着她。”他对德劳拉说。

德劳拉没有告别就逃走了。大雨倾盆，他用斗篷包住小箱子，再裹住自己。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发觉自己正在心里重复着古诗琴演奏的那首歌里不连贯的诗句。被大雨一激，他大声唱了起来，并且凭着记忆唱完了那首歌。在工匠作坊区，他在一座修道院那里向左拐去，嘴里仍唱着歌，敲响了阿布雷农肖的大门。

好半天没人应声，之后才听见一瘸一拐的脚步声，一个半睡半醒的声音问道：

“谁呀？”

“公家人。”德劳拉说。

这是他不想喊出自己的名字时唯一能想到的说法。阿布雷农肖打开大门的时候真的以为来的是政府的人，一下子没认出他来。“我是本

教区的图书管理员。”德劳拉对他说。医生把他让进昏暗的门厅，又帮他脱下湿漉漉的斗篷。照着习惯，医生用拉丁语问他：

“请问您是在哪一场战斗中失去那只眼睛的？”

德劳拉用他那一口古典拉丁语给他讲了日食那天的倒霉事，又细细说明这种伤害一时半会儿还消不下去，尽管主教的医生打包票说戴上这个眼罩就没什么问题了。可是，阿布雷农肖的注意力全在他那一口纯正的拉丁语上。

“说得太棒了，”他颇为惊讶，“请问府上是？”

“我是阿维拉人。”德劳拉回答道。

“那就更值得赞赏了。”阿布雷农肖说。

他让德劳拉脱下长袍和草鞋，放在一旁晾一晾，还用自己那件自由人的斗篷裹住他的长袜，接着又替他摘下眼罩，扔进了垃圾箱，说：“要说这只眼睛有什么毛病，那就是它看见了许多不该看见的东西。”德劳拉被客厅里堆了一地的浩繁书卷吸引住了，阿布雷农肖注意到了这一点，便把他领到了药房，那里有更多的书卷，放在直抵天花板的书架上。

“圣灵啊！”德劳拉失声叫道，“这简直就是彼特拉克的图书馆呀。”

“比他还多两百来本书呢。”阿布雷农肖告诉他。

他让德劳拉随意翻阅。这里有一些孤本书，在西班牙拥有这些书是要坐牢的。德劳拉认出了这些书，神往地翻了翻，把它们再放回书

架上时心中惋惜不已。在最明显的位置，同那本永远的《赫伦迪奥教士》放在一起的是法语版伏尔泰全集和一本翻译成拉丁语的《哲学通信》。

“翻译成拉丁语的伏尔泰，这简直是异教。”他开玩笑说。

阿布雷农肖告诉他，这是科英布拉的一位僧侣翻译的，他很乐于做一些怪书，供朝圣者消遣之用。德劳拉正翻看这本书，医生问他懂不懂法语。

“我不会讲，但能阅读。”德劳拉用拉丁文回答，然后又加了一句，丝毫没有假装客气：“此外，我还会希腊语、英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德语我也懂一点。”

“我问您这话是因为您刚才提到了伏尔泰，”阿布雷农肖说，“他的散文简直无可挑剔。”

“也最让我们心痛，”德劳拉说，“真遗憾，这些是由一个法国人写的。”

“您这么说是因为您是西班牙人。”阿布雷农肖说道。

“到了我这个岁数，又经历了这么多的血统混杂，我已经不能准确地知道我是什么地方的人了，”德劳拉答道，“也不知道我是谁。”

“在这边的国度里，谁都不知道，”阿布雷农肖说，“我觉得大家也许要花上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弄清楚这一点。”

德劳拉一边说话一边继续在这个书库里徜徉。突然，就像往常很多时候一样，他记起了他十二岁时被神学院院长没收的那本书，他只

记得其中的一个情节，有生之年，只要碰见有可能帮到他的人，他就会对他们重复一遍那个情节。

“您记得那本书的名字吗？”阿布雷农肖问道。

“从来都不知道，”德劳拉说，“只要能让我知道那本书的结局，叫我拿什么换都可以。”

医生一句话没说，把一本书放在了他面前，他一眼就认了出来。这是塞维利亚古版的《四卷本高卢的阿玛迪斯》。德劳拉颤抖着翻了翻，明白了自己差一点就堕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最后，他鼓起勇气问道：

“您了解这是一本禁书吗？”

“就像了解几百年来最优秀的小说一样，”阿布雷农肖说道，“现在已经不印这样的书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给有学问的人看的专著。那么今天的穷人呢，他们如果不偷偷地看这些骑士小说，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还是有书可看的，”德劳拉说，“初版《堂吉诃德》在开印当年就有一百本在这里被争相阅读。”

“争相阅读谈不上，”阿布雷农肖说，“只是通过了海关，传到了这边各个地区而已。”

德劳拉没去理会他，因为他终于弄清楚了就是这本珍贵的《高卢的阿玛迪斯》。

“这本书九年前从我们图书馆的保密书架上丢失了，我们一直没能找到它的踪影。”他说。

“这我可以想象，”阿布雷农肖说道，“但是，它被当作一本具有历史意义的书，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它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被至少十一个人传读，其中至少有三人死亡。我敢肯定他们的死必有奥秘。”

“我有责任向宗教法庭告发你。”德劳拉说。

阿布雷农肖把这当成一句玩笑话：

“我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吗？”

“我这么说是因为您这儿有一本外面传来的禁书，而您却没有上报。”

“何止这一本，那儿还有好多呢。”说着，阿布雷农肖伸出食指，向着一排排满满当当的书架画了一个大大的圈。“可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件事的话，您恐怕早就来了，而我也就不会为您打开大门了。”他转过身面对着德劳拉，非常愉快地总结道：“从另一方面说，我很高兴您现在来了，能在这里接待您，我深感荣幸。”

“侯爵为她女儿的命运万分担心，是他建议我到您这儿来的。”德劳拉说。

阿布雷农肖让他在自己对面坐下，两个人畅谈起来，这时，一阵可怖的风暴正席卷海面。医生旁征博引，谈到狂犬病自人类起始以来的历史，谈到这种病肆无忌惮的破坏力，以及千百年来医学在防治方面的无能为力。他列举了种种令人惋惜的例子，说明人们如何总是把这种病同魔鬼附体混为一谈，对待其他的一些疯症和精神失常之疾也

是如此。至于谢尔娃·玛利亚，阿布雷农肖总结道，这么多个礼拜过去了，看起来她不大可能染上这种病。对她来说，眼下唯一的危险，是她会像从前许多人一样，死于驱魔用的残忍手段。

在德劳拉听来，这最后一句话不过是中世纪医学特有的一种夸大其词，但他没有争辩，因为这与他从神学出发得出的主张甚是相符，即，女孩并没有被魔鬼附体。他说，谢尔娃·玛利亚会讲的那三种非洲语言，虽说和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毫无共同之处，但也并非如修道院里说的那样，是什么撒旦在操纵。有不少证据显示她的力气大得惊人，但没有一条能证明那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也没有什么能证明她曾升空或预测未来——事实上，这两种现象亦可作为成圣的辅助证明。然而，当德劳拉试图从一些杰出教友和别的一些团体那儿得到支持时，谁都不敢站出来对修道院的记录和民间的传言提出质疑。他也清楚地知道，不管是他的还是阿布雷农肖的观点，都不足以说服任何人，而要是他们俩联手，情况会更糟。

“那将意味着您和我要对付所有人。”他说。

“正因为如此，您到我这里来，我有些吃惊，”阿布雷农肖说，“我只不过是宗教法庭围猎场里一只令人垂涎已久的猎物。”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德劳拉说，“除非那个女孩是圣灵派来考验我的信仰是否坚定的。”

这句话一出口，他就觉得折磨着自己的那个困惑的死结解开了。阿布雷农肖紧盯住他的眼睛，一直看到他的灵魂深处，他看出来，这人马上就要哭出声来了。

“不要这样平白无故地折磨自己，”他用抚慰的语气说，“说不定您来这里只是因为需要找个人说说她的事情。”

德劳拉觉得自己没了遮拦，浑身赤裸。他站起身来，寻找着大门的方向，但他并没能立刻逃走，因为衣服还没有穿好。阿布雷农肖帮他把湿漉漉的外衣穿上，一面想留他再聊一会儿。“和您聊天，我能就这么一刻不停地聊到下个世纪。”他对德劳拉说。为了留住他，医生拿出一小瓶透明洗眼水，说能治好他看日食留下的伤。他还把德劳拉从门口叫回来去拿他落在屋里的小箱子。可德劳拉就像被什么致命的痛苦折磨着一样。他对阿布雷农肖这个下午的接待、对他提供的医疗帮助、对洗眼水表示感谢，可他最后只勉强答应了改天再来多待点儿时间。

他禁不住想尽快见到谢尔娃·玛利亚。他已走到门口，却尚未发现天已经黑了。雨停了，可暴雨过后，下水道泛滥成灾，德劳拉蹚着齐脚踝的雨水，疾步走向街道中部。快到宵禁时间了，修道院的守门人想拦住他，他一把把她推开：

“奉主教大人之命。”

谢尔娃·玛利亚从梦中惊醒，黑暗中没认出他来。德劳拉不知该如何解释为何在如此蹊跷的时间来到这里，便随便找了个借口：

“你父亲想见你。”

女孩认出了那口小箱子，怒火一下子冲上了她的脸颊。

“可我不想见他。”她说。

德劳拉不知所措，问她为什么。

“因为不想，”她说，“我宁愿去死。”

德劳拉想松开她那只健康的脚踝上的皮带，以为她会很乐意。

“放手，”她说道，“不许碰我。”

德劳拉没有理会她的话，女孩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他镇定自若，只是把另一边脸转向了她。谢尔娃·玛利亚又朝他吐了口唾沫。他又换了一边脸，一股被压抑的快感自他的五脏六腑升腾而起，使他不禁飘飘然。他闭上双眼，心中暗暗祈祷着，而女孩则一口接一口地不断朝他吐唾沫，她吐得越凶，他就越享受，直到女孩明白，她的怒火毫无用处。德劳拉这才见识了一个真正的中邪者的疯狂表演。谢尔娃·玛利亚的长发突然像活了一样竖立起来，简直和美杜莎头上的蛇一样，嘴里冒出绿色的口水，喷出一连串用偶像崇拜者的各种语言骂出的脏话。德劳拉举起十字架，放到女孩嘴边，惊恐地吼道：

“不管你是谁，快从这里滚开，你这地狱里的畜生。”

他的吼声激起了女孩的尖叫，她仿佛马上就要把皮带扣挣断。女看守被吓得面无人色，冲了进来，想制服她，但最后还是马尔蒂娜用她那一套完美手段制服了女孩。德劳拉仓皇逃走了。

晚餐时间德劳拉没来给他读书，主教心中惴惴不安。德劳拉发觉自己最近飘浮在一朵自己的云彩上，除了被魔鬼拖下地狱的谢尔娃·玛利亚的恐怖形象，这世或者来世的其他任何事物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他躲进图书馆，却看不进去书；他心不在焉地做祷告，并唱起了那把古诗琴演奏过的歌曲，他哭了，眼泪就像滚烫的油滴，使他五内俱焚。他打开谢尔娃·玛利亚的小箱子，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放在桌上。他挨个辨认，带着肉体的贪婪嗅闻它们，抚爱它们，用淫秽的

六韵步诗对它们说话，直到自己再也无法忍受。于是，他脱光衣服，从工作台的抽屉里取出那把平日里碰都不敢碰的铁戒尺，满腔仇恨地抽打起自己来，狠了心地要把谢尔娃·玛利亚的影子从他的身体里彻底赶出去。主教心里一直牵挂着他，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一摊鲜血和眼泪中打滚。

“是魔鬼，我的神父，”德劳拉对主教说，“是最可怕的那种魔鬼。”

---

[1] 又译约瑟，为圣母玛利亚的丈夫，耶稣的养父。本书中采用天主教译名。

五

主教传召德劳拉去他的办公室，听他一五一十、不加修饰地忏悔，主教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心中清楚，他主持的不是一项圣礼，而是一场司法审讯。在德劳拉这件事上，他唯一的仁慈之举就是对他真正的罪孽保守秘密，但是，在没有做出任何公开解释的情况下，他剥夺了他的尊贵身份和各项特权，并把他派到圣爱医院去护理那些麻风病人。作为安慰，德劳拉请求主教准许他为麻风病人主持五点钟的弥撒，主教答应了。他感到莫大的解脱，跪了下来，他们一起向天主做了祷告。主教为他祈过福，把他扶了起来。

“愿上帝怜悯你。”主教对他说完这句话，便将他从心头一笔抹去。

就在卡耶塔诺开始履行对他的判决之后，教区里各路头面人物纷纷替他说情，可是主教不为所动。他拒不接受那种理论，说什么驱魔师到头来反而被他们想要驱除的魔鬼附了体。他的最终说法是，德劳拉没有限制自己只用基督不容争议的权威去对付那些魔鬼，而是自负地和他们讨论起信仰的问题。正是这一点，主教说，使他的灵魂遇到麻烦，把他推到了异教的边缘。然而，人们更感到惊奇了：作为主教十分信得过的人，犯下这么一点过失，充其量也就是点几根绿蜡烛忏悔忏悔，主教怎么会表现得如此严厉。

马尔蒂娜带着一种堪为众人表率的虔诚负起了对谢尔娃·玛利亚的责任。她因请求赦免遭到拒绝而痛苦不堪，但女孩一直没有察觉，直到有天下午，在露台上做刺绣活的时候，女孩一抬眼，看见她泪流满面。马尔蒂娜没有掩饰自己的绝望：

“像这样被关在这里一点一点地死去，我还不如干干脆脆地死了算了。”

如今她唯一的愿望，她说，就是弄清楚谢尔娃·玛利亚是怎么同她的那些魔鬼打交道的。她想知道他们都是谁，长什么样，怎么和他们周旋。女孩一气儿给她说出了六个，马尔蒂娜认定其中一个是非洲魔鬼，有一次他曾把她父母的家搅得鸡犬不宁。一个新的幻想使她精神一振。

“我想同他谈谈，”马尔蒂娜说，接着又把话说得更直截了当：“我拿我的灵魂做交换。”

谢尔娃·玛利亚狡猾地开心一笑。“他不会讲话，”她说，“你只要看着他的脸，就知道他讲什么了。”她又一本正经地答应马尔蒂娜，等下次他来访时一定通知她和这魔鬼见上一面。

卡耶塔诺低三下四地忍受着医院里糟得不能再糟的条件。等死的麻风病人睡在棕榈叶窝棚的泥地上。许多人除了在地上爬来爬去之外什么都做不了。每个礼拜二是集体治疗日，也是最令人吃不消的日子。为了赎罪，卡耶塔诺承担的任务是在马厩的木槽里给那些最严重的病人洗澡。第一个礼拜二，他正在干这样的活——他身为教士的尊严简化为身上的一件粗布护士长袍，这时阿布雷农肖骑着侯爵送给他的那匹枣红马出现了。

“您那只眼睛怎么样了？”他问德劳拉。

卡耶塔诺没给来访者机会谈论他的不幸，或是对他的状况表示同情，他感谢阿布雷农肖给他的洗眼水，那东西确实把日食在他视网膜上留下的痕迹消掉了。

“您不用感谢我，”阿布雷农肖对他说，“我给您的是我们所知治疗太阳灼伤最好的药：几滴雨水而已。”

他邀请德劳拉去他那里做客。德劳拉对他解释说，未经准许他是不能出这个大门的。阿布雷农肖不以为然。“如果您了解我们这些地方的弱点的话，您就会知道，在这里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是能被实施三天以上的。”他说。他告诉德劳拉他的书库随时为他敞开大门，这样他就可以在受罚期间继续他的研究。卡耶塔诺饶有兴趣地听着他的话，心中却没抱任何幻想。

“我把这个谜团给您留下了，”说完，阿布雷农肖用马刺踢了一下马，“没有哪个神能创造出一个像您这样才智非凡的人，然后又将其浪费在替麻风病人搓澡这件事上。”

接下来的那个礼拜二，他给德劳拉带来一件礼物，就是那本拉丁文版《哲学通信》。卡耶塔诺翻了翻，打开闻了闻，算了算这书的价值。他越是看重这书，就越觉得无法理解阿布雷农肖的做法。

“我想知道您对我这么好是为了什么。”他对阿布雷农肖说。

“因为我们这些不信神的人没有教士相伴就活不下去，”阿布雷农肖说，“病人托付给我们的是他们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灵魂，而我们就像魔鬼一样，要从上帝那儿把他们的灵魂夺过来。”

“这可不太符合您的信仰。”卡耶塔诺说。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信仰是什么。”阿布雷农肖说道。

“宗教法庭知道。”卡耶塔诺说。

出人意料的是，这句尖酸刻薄的话一下子使阿布雷农肖兴奋起来。“上我家去吧，咱们可以慢慢讨论，”他说，“我一晚上最多能睡两个钟头的觉，还总是断断续续的，所以你什么时候来都行。”他用马刺刺了一下马，走了。

很快，卡耶塔诺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一旦失势，那就是一落千丈。从前他受宠的时候追随在他身边的那些人现在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仿佛他也是一个麻风病人，他在世俗圈子里的文艺界朋友也因为不想同宗教法庭有什么瓜葛而躲得远远的。可是，对他来说这都无所谓。他的全部心思都在谢尔娃·玛利亚身上，即便如此也还嫌不够。他坚信，无论海洋还是高山，无论人间还是天国的法律，乃至地狱里的权势，都无法把他们分开。

一天夜里，他突然心血来潮，从医院逃了出去，他想偷偷钻进修道院里去，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行。修道院有四道门，大门是旋转门，靠海的那一边还有一扇同样大小的门，另外两扇小门是供奴仆们进出用的。想从两道大门通过是不可能的。从海滩上朝牢房楼看过去，卡耶塔诺没费多少工夫就找见了谢尔娃·玛利亚的窗户，因为唯有这扇窗子没有封死。他从街道上一点一点地打量这座楼，却还是一筹莫展，因为连一条能爬上去的小缝都没有。

就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在那次“停止一切圣事”[1]的围困期间，居民们是通过一条地道给修道院里送给养的。在那

个年代，不管是兵营还是修道院，都很流行挖地道。城里广为人知的不下六条，还有另外几条随着年岁推移陆续被发现，且每条地道都富有传奇色彩。一个当过掘墓人的麻风病人向卡耶塔诺指明了他要找的那条：一条废弃了的下水道，连接修道院和它旁边的一块空地，那个地方在上个世纪是为最早的一批克拉拉会修女做墓地用的。出口就在牢房楼下，面对着一堵粗石垒成的高墙，看上去难以逾越。然而，卡耶塔诺在失败了很多次之后，终于爬了上去，他心中有数：凭借祈祷的力量，什么事情都办得到。

午夜过后，那座楼静悄悄的。他知道女看守睡在外面，他只须提防马尔蒂娜·拉波尔德就可以了，那女人的牢门虚掩着，鼾声阵阵。直到此时，他的心因为紧张的冒险一直悬在半空，但一走到牢房门口，看见门环上的锁开着，他的心就像要跳出来一样。他用指尖推开了门，随着铰链吱吱作响，他觉得自己的生命静止了，他看见了在圣灯的亮光里睡着的谢尔娃·玛利亚。突然，女孩睁开了双眼，可是因为他穿着一件麻风病院的护士长袍，女孩花了好大工夫才认出他来。他把血淋淋的指甲伸到女孩眼前：

“我是爬墙上来的。”他压低嗓音对她说。

谢尔娃·玛利亚无动于衷。

“您这是为了什么呢？”女孩问。

“为了见你。”他说。

他两手发抖，嗓音嘶哑，恍恍惚惚的，不知再说点儿什么好。

“您走吧。”谢尔娃·玛利亚说道。

他怕自己的嗓音会辜负自己，便拼命摇头。“您走吧，”女孩又说了一遍，“不然我就要叫人了。”这时，他已离女孩如此之近，都能感觉到她处女的呼吸。

“就算杀了我，我也不会走的。”说完他突然觉得自己无所畏惧起来，随即用坚定的口气加了一句：“你想叫就叫吧。”

女孩紧紧咬住自己的嘴唇。卡耶塔诺在床边坐了下来，详细地给她讲述了自己受罚的事情，只是没告诉她是因为什么受的罚。他说出来的和没说出来的女孩都听懂了。她看着他，目光里不再有怀疑，又问他眼睛上怎么不戴眼罩了。

“我已经不需要戴它了。”他受到了鼓励，说道，“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能看见一头长发，像一条金色的河流。”

两个小时后，他开开心心地离开了，因为女孩答应他，只要从外面给她带些心爱的甜点，就可以再来看她。第二天夜里他早早就到了，修道院里还有人没有睡觉，女孩正在灯下赶着把马尔蒂娜交给她的那点刺绣活做完。第三天夜里，他带去了灯芯和灯油，给那盏油灯添上。第四夜是个礼拜六，他花了好几个小时帮她捉在这间牢房里又卷土重来的虱子。当女孩的长发最终干干净净、梳得整整齐齐的时候，他又一次感受到一种诱惑，冰冷的汗水又流了下来。他在谢尔娃·玛利亚身边躺了下来，呼吸也变得不均匀，女孩那双清澈透亮的眼睛离他的眼睛只有咫尺之遥。一时间两个人都有点不知所措。他心中害怕，祷告起来，仍没有移开目光。女孩则鼓起勇气开口说了话：

“您多大岁数了？”

“三月份刚满三十六岁。”他回答道。

女孩仔细打量了他一番。

“那您已经是个小老头了。”她的话里有一点嘲弄的意味。她盯着他额头上的皱纹，用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全部的无情又加上一句：“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头。”他听了倒很开心。谢尔娃·玛利亚又问他为什么长了一绺白头发。

“那是个记号。”他回答说。

“是人为的吗？”她又问道。

“天生的，”他说，“我母亲当年也有这么一绺白头发。”

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眼睛，她也丝毫没有躲闪的意思。他深深叹了口气，念出一句诗来：

“哦，甜蜜的爱人，我生不逢时。”

女孩没听懂。

“这是我曾祖母的爷爷的一句诗，”他向女孩解释道，“他一共写了三首牧歌、两首挽歌、五首歌词和四十首十四行诗。大多数都是写给一位才貌平平的葡萄牙女士的，而这位女士从来都没有属于过他，一是因为他自己已经结婚了，二是因为她也嫁给了另一个男人，而且死得比他早。”

“他也是一个教士吗？”

“他是当兵的。”他答道。

谢尔娃·玛利亚的心被什么触动了，她想再听一遍那句诗。他重复了一遍，这一次他一直念了下去，语气热烈，抑扬顿挫，直到念完了那四十首十四行诗的最后一首，那是爱情和武艺之骑士堂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留下的诗句，血气方刚的他在一场战斗中被石头砸死了。

念完诗，卡耶塔诺抓住谢尔娃·玛利亚的一只手，把它放在自己胸口。她感觉到了他胸膛里狂风暴雨般的轰鸣。

“我总是这样。”他说。

他没有再让自己陷入恐惧之中，而是从那种令他活不下去的混沌状态中脱身而出。他向女孩坦承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不管吃什么喝什么，都能尝出她的味道；无论何时何地，她就是他的生命，一如只有上帝才有这样的资格和能力；在她身旁死去将是他的心所能获得的最大快乐。他没有看她，一直往下讲，像他刚才朗诵诗歌一样酣畅淋漓，直到他以为谢尔娃·玛利亚已经睡着了。可她一直醒着，像一只受惊的小鹿似的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她差一点就没敢问出来：

“那现在呢？”

“现在好了，”他答道，“你知道我的心思，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寂静中，他泣不成声，把手臂滑到她头下给她当枕头，而她在他的身边蜷成一团。他们就这样躺着，不睡觉也不再说话，直到鸡打起鸣来。他必须赶回去准时参加五点钟的弥撒。他走之前，谢尔娃·玛利亚把那条宝贵的奥杜瓦项链送给了他：那是一条十八西班牙寸长的项链，是用珍珠母贝和珊瑚串成的。

内心的恐惧已被渴望代替。德劳拉再也无法平静，他做起事来随随便便、心不在焉，直到那个幸福时刻降临：逃出医院去见谢尔娃·玛利亚。他每次赶到牢房时都气喘吁吁的，浑身被绵绵不绝的雨浇得精湿，而她每次也都是焦急地等待着他，只有看见他的微笑她才能安下心来。一天夜里，女孩主动念起了那些诗句，听了这么多遍她早已烂熟于胸。“*当我停下来凝视自己，回望那条你带我走过的路时——*”她背诵道，随后又淘气地问道：

“接下来呢？”

“*我到达了我的终点，因为我已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那个毁灭我、终结我的人。*”他接了下去。

她用同样温柔的语气重复着这些诗句，他们就这样一会儿从这一句跳到另一句，一会儿又一起把那些十四行诗改得面目全非，随心所欲地拿一句句的诗做起游戏，自如得就像他们是这些诗句的作者一样。最后，他们困倦得睡着了。五点钟的时候鸡叫了，女看守进来送早饭，两个人才惊醒过来。他们的生命在这一刻停止了。女看守把早饭放在桌上，举着灯在房间里例行巡视了一番，居然没看见卡耶塔诺也躺在床上，就又走了出去。

“路西法真是个怪物，”卡耶塔诺惊魂稍定，便开起了玩笑，“他把我也变成了隐形人。”

那一天，谢尔娃·玛利亚不得不变得十分机警，为的是不让女看守再到这间牢房里来。夜深了，经过一整天的嬉戏，他们觉得仿佛自己一直都这样彼此相爱。卡耶塔诺半是戏耍半是当真，壮着胆解开了谢尔娃·玛利亚胸衣的带子。她用双手护住胸口，眼里闪过一丝恼意，额

上泛起一道红晕。卡耶塔诺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她的双手，就像捏着一块烧红的炭，把它们从她的胸前移开。她试图反抗，可他用一种温柔却又坚决的力量阻止了她。

“跟我一起读，”他对她说，“*最终我来到了你的手中。*”

她顺从了。“*我知道自己将在这里死去。*”他接着背诵下去，一面用冰冷的手指解开了她的胸衣。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重复着那些诗句，害怕得浑身发抖：“*利剑在降服之躯上能砍多深，尽管来吧，唯我的身躯可供试验。*”就在这时，他第一次吻了她的双唇。谢尔娃·玛利亚的身体伴着呻吟颤抖起来，飘散出一丝纤弱的海风，接着就听由命运摆布了。他的指尖掠过她的皮肤，几乎没有触碰到她，他第一次体验到，自己在另一具躯体里，这种感受是何等美妙。他的身体里有个声音告诉他，在那些苦读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不眠之夜，在深深痴迷于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在禁欲苦修的荒野上，他曾经离魔鬼那么远，而她，却在奴隶们的棚屋里同奔放爱情的全部力量相伴而生。他依从着女孩的指引，在黑暗中试探着，摸索着，可就在最后一刻，他后悔了，在一场道德灾变中坠入深渊。他仰面躺下，两眼紧闭。谢尔娃·玛利亚被他的静默和他死一般的沉寂吓住了，用手指碰了碰他。

“您这是怎么了？”她问道。

“这会儿先别理我，”他喃喃低语，“我正在祷告。”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只有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获得片刻的平静。他们不知疲倦地互相诉说爱恋之苦，忘情地接吻，流着热泪诵读情诗，依偎在对方的耳畔唱歌，在欲望的泥塘里尽情翻滚，直至精疲

力竭，却都保持着童贞。因为他已决定坚守自己的誓愿，直到接受圣礼的那一天，她也同意了。

在激情稍退的间隙，他们互相做了一些很过头的爱的测验。他对她说，为了她，他可以做任何事情。谢尔娃·玛利亚带着孩子气的残忍让他为自己把一只蟑螂吃下去。她没来得及拦住他，他就捉住了一只，活生生吞了下去。在另一次癫狂的挑战中，他问她能不能为自己把辫子剪掉，她说可以，但随即像是开玩笑又像是一本正经地警告他说，这样一来他就必须娶她为妻，以履行先前的那个誓愿。他把一把菜刀带进牢房，对她说："让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她转过身去，好让他能齐根剪掉，嘴里还催促着："胆子大点儿。"他没敢去剪。几天后，她问他会不会像一只山羊那样任人割断喉咙。他满口答应了。于是她掏出一把刀子打算试一试。他吓得浑身冒冷汗，赶紧闪开，嘴里连声说道："你不能试，你不能试。"女孩笑得死去活来，想知道为什么，他说了实话：

"因为你真的做得出来。"

当激情渐趋平缓，他们也开始体验日常爱情的琐碎平淡。她把牢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像等待着丈夫一身轻松地回家一样期盼着他的到来。卡耶塔诺教她看书写字，带她欣赏诗歌、崇信圣灵，盼望着那幸福的一天：他们获得自由，结为夫妻。

四月二十七号那天清晨，卡耶塔诺离开牢房后，谢尔娃·玛利亚刚要入睡，一伙人没有任何预告就闯了进来，驱魔开始了。那分明是对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囚犯进行的仪式。他们把她拖到牲口圈的饮水槽那

里，往她身上浇了好几桶水，扯下了她的那些项链，给她套上一身异教徒的粗布袍子。一个管理花园的修女用一把修剪树枝的大铁剪咔嚓四下就把她的一头长发齐后脑勺剪断，扔进了院子里熊熊燃烧的火堆。负责剪头发的修女又把剩下的头发剪得只剩半西班牙寸长，那是克拉拉会修女们包在头巾下的发型，一边剪一边往火堆里扔。谢尔娃·玛利亚看见火堆里迸射出金色的火焰，听见原木燃烧时噼啪作响，闻到一股烧焦的牛角的臭味，她那木雕石刻一般的面孔上肌肉纹丝不动。最后，他们给她穿上一件束缚衣，又给她蒙上一块死人用的盖布，两个奴隶用一副军用担架把她抬进了小礼拜堂。

在此之前主教召集了教士会议，由一群最杰出的领俸教士组成，他们从中选出了四个人，陪同主教参加谢尔娃·玛利亚的驱魔仪式。在最终确定此事的会议上，主教从病痛中振作起来，做出安排：这次的仪式将不像其他一些值得纪念的典礼那样，在大教堂里举行，而要在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小礼拜堂举行，而且他本人将亲自主持这次驱魔活动。

晨祷还没开始，修女们就在院长带领下齐集唱诗班，并在管风琴的伴奏下做了祷告，庄严的一天就要开始了，她们激动不已。随后进来的是教士会议的几位高级神职人员、三家教会的首脑人物和宗教法庭的长官。除了最后提到的这几位，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世俗人士出席。

主教最后一个到场，他身着参加盛大仪式的华服，坐着由四名奴隶抬着的轿子，笼罩在一种无法劝慰的忧伤氛围里。他面对主祭台，在通常举行盛大葬礼时才用得着的大理石灵柩台旁坐了下来，为了便于挪动身体，他坐在一把高背转椅上。六点整，两个奴隶用担架把谢尔娃·玛利亚抬了进来，她穿着束缚衣，身上仍盖着那块深紫色的布。

唱弥撒的时候酷热难当。管风琴的低音在天花板上回响，几乎没有给躲在唱诗班格子窗后面的修女们乏味的声音留下一丝空隙。赤裸着上身的两名奴隶用担架把谢尔娃·玛利亚抬进来后，站在她的两旁当起了看守。弥撒结束的时候，他们揭开了盖在她身上的布，把她放在了大理石灵柩台上，仿佛她是位死去的公主。主教的奴隶们把主教连同转椅一起抬到她的身边，然后离去，主祭台前宽阔的空间里只剩他们两人。

接下来的紧张气氛令人难以忍受，一片死寂仿佛预示着有什么奇迹要从天而降。一位辅祭把装着圣水的小桶放在了主教手边。主教抓起圣水掸子，就像抓住一柄作战用的大锤，朝谢尔娃·玛利亚俯下身去，向她全身洒满圣水，嘴里念念有词。突然，他大声喊出一句咒语，整个小礼拜堂的地基都为之震动。

“不管你是谁，”主教高声叫道，“以基督和过去、现在、未来可见与不可见之万物之主上帝的名义，我命令你离开这具经过洗礼得到救赎的躯体，回到黑暗中去。”

惊恐万状的谢尔娃·玛利亚也开始高声叫喊。主教抬高嗓音想盖过她的叫声，可她叫得更凶了。主教深深吸了口气，张开嘴巴，打算接着念出咒语，可那口气卡在了胸膛里没能吐出来。主教脸朝下栽倒在地，像一条被钓上岸的鱼似的喘着气，仪式在一片混乱中结束了。

那天夜里，卡耶塔诺见到谢尔娃·玛利亚的时候，她正在束缚衣里发着高烧，浑身发抖。最使他气愤的是她被剪去头发所受的侮辱。“天主啊，”他一面压抑着自己的怒火，一面给她松开皮带，“您怎么能允许他们犯下这样的罪行。”刚一解脱，谢尔娃·玛利亚就扑上来一把搂住了卡耶塔诺的脖子，两个人相拥着一言不发，女孩还在抽泣。等她

稍稍平静下来，他抬起她的脸，对她说："不要再流泪。"随后配上了一句加尔西拉索的诗：

"我为你流的泪足矣。"

谢尔娃·玛利亚讲述了她在小礼拜堂里的可怕经历。她对他讲起唱诗班如打仗般的喧闹声，讲起主教幻觉般的喊叫声，讲起他那炽热的气息和他那双被激情点燃的美丽的绿眼睛。

"他就像魔鬼一样。"她说。

卡耶塔诺竭力想让她安静下来。他对她说，主教尽管身躯庞大，声如雷鸣，手段严酷，可他是个好人，也是位智者。因此，谢尔娃·玛利亚的害怕可以理解，但她并没有身处危险之中。

"我现在只想死。"她说。

"你感到愤怒、失败，我也是，因为我没法帮你，"他说，"可到了复活的那一天，上帝一定会补偿我们的。"

他看见谢尔娃·玛利亚脖子上一根项链都没有了，便解下她送给他的那串奥杜瓦项链，给她戴上。他们紧挨着躺在床上，互相诉说心中的愤恨，世界慢慢静了下来，只有天花板上的白蚁在窸窣作响。女孩的烧退了。黑暗中，卡耶塔诺开了口。

"《默示录》里有一个预言，说是有那么一天，黎明永远不会到来，"他说，"但愿上帝说的就是今天。"

卡耶塔诺离开之后，谢尔娃·玛利亚才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被一种新的声音惊醒了。一位老祭司由院长陪同，站在她面前。他身材

高大，皮肤被硝石熏得黝黑，头发像竖立的鬃毛，眉毛粗重，双手粗糙，眼睛里透着可以信赖的神情。不等谢尔娃·玛利亚完全醒来，他就用约鲁巴语对她说道:

“我把你的项链都带来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项链，这是在他一再要求之下修道院的女管家还给他的。他一边把项链戴在谢尔娃·玛利亚的脖子上，一边用好几种非洲语言逐条说明它们的含义：红白相间的代表了羌格的爱和鲜血，红色和黑色的是爱勒瓜的生命与死亡，而七颗念珠则象征着叶玛雅的水和淡蓝色。他自如地从约鲁巴语转到刚果语，又从刚果语转到曼丁加语，而她则优雅流利地附和着。最后他转而讲起西班牙语，那也仅仅是因为有院长站在一旁。院长说什么也不敢相信，谢尔娃·玛利亚居然有如此温顺的一面。

这是托马斯·德阿基诺·德纳瓦埃斯神父，他从前在塞维利亚当过宗教法庭的检察官，现在是奴隶区的堂区神父，主教因身体欠佳选中他来接替自己进行驱魔活动。从他的履历看，他是个不容置疑的强硬派，曾经把十一个异教徒送上火刑架，当中有犹太人也有穆斯林。然而，他的威望主要来自他曾经将无数灵魂从安达卢西亚最难对付的魔鬼手中解救了出来。他品位高尚，举止文雅，说起话来有一种加那利群岛居民的甜甜的口音。他是在这边出生的，父亲是国王的一名议院代表，娶了自己的一个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女奴为妻。在证明了祖上四代白人的血统之后，他在本地的神学院度过了见习期。他成绩优异，在塞维利亚获得了博士学位，五十岁以前一直在那里生活、传教。回到出生地后，他要求到最贫穷的堂区去，他对非洲的宗教和语言有着极大的热情，就像奴隶群里的又一个奴隶。说到和谢尔娃·玛利

亚沟通，合情合理地对付她身上的魔鬼，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谢尔娃·玛利亚立刻就把他当成了救命天使，她也确实没有弄错。他当着她的面逐条批驳了记录簿上的论据，并向院长证明里面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他对院长说，美洲的魔鬼和欧洲的魔鬼其实都一样，只不过他们的叫法和行事方法有所不同。他向院长解释说，要认清是不是魔鬼附体有四条适用原则，又指出，魔鬼也很容易利用这四条原则来使人们得出错误的结论。和谢尔娃·玛利亚告别时，他亲切地捏了捏她的脸颊。

“放心睡吧，”他对她说，“我遇见过的魔鬼比这厉害多了。”

院长心情极好，邀请他去品尝她们修道院名声远扬、香甜可口的巧克力，还有专为尊贵客人烘制的茴芹饼干和妙不可言的甜点。在院长的私人餐厅里喝着巧克力的时候，他就接下来的几步程序做了指示，院长满心欢喜，一一遵从。

“这个可怜的女孩最后是好是坏，对我没有任何意义，”院长说，“我只恳求上帝让她赶紧离开这座修道院。”

神父答应她用最快的速度，多则几天，少则几个小时，把这件事情办好。在会见室告别的时候，两个人都高高兴兴的，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此后再也不会见面了。

事实如此。阿基诺神父——他堂区里的教民都是这样称呼他的——徒步朝他的教堂走去，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他很少祷告，每天用乡愁折磨自己作为对上帝的补偿。他在拱廊便道上停留了一会儿，卖杂货的小贩们正等待着太阳落山，好穿过港口的烂泥地，他们的叫卖

声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他买了点儿最便宜的甜食，以及一张专为穷人发行的彩票，心里一如既往地在想，什么时候能中个奖，好把他那经常丢东西的教堂修理修理。地上铺着几块黄麻编织的席子，席子上陈放着些不值钱的小工艺品，几个黑人大妈如石雕般一动不动地坐在旁边，他和她们东拉西扯地聊了半个钟头。快五点钟的时候，他穿过客西马尼吊桥，那里刚吊起一条肥胖的恶犬尸体，以昭告大家这条狗死于狂犬病。空气里弥漫着玫瑰花的香气，天空无与伦比地透彻清亮。

奴隶区邻近海边的沼泽地，贫困得令人心悸。棚屋都是以土为墙，棕榈叶做屋顶，人们在那里与秃鹫和猪混杂而居，孩子们喝水都是在街边的泥塘里就地解决。然而，这里却是最快乐的街区，色彩最鲜亮，人们说话的声音也最响亮，特别是到了日落时分，人们纷纷把椅子搬到大街上乘凉的时候更是热闹。堂区神父把甜食分给了沼泽地边的孩子，给自己留下三块当晚餐。

这座教堂其实就是一所用土和藤条搭建的农舍，房顶上铺的是苦棕榈叶，屋脊上立了个木头做的十字架。长长的靠背椅是用厚厚的木板钉成的，祭坛只有一个，圣像也只有一尊，布道的讲台用木头搭建，每个礼拜天，神父就在那里用各种非洲语言讲经说法。教堂的祭坛后面伸出去一块，那就是神父的住所，居住条件简陋得不能再简陋，小房间里唯有一张吊床和一把粗木椅子而已。后面还有个小小的院落，乱石丛生，架子上的几串葡萄干瘪瘪的，一排带刺的栅栏隔开了海滨的沼泽地。院子一角有个用灰浆浇成的水池，除此之外再没有能喝水的地方了。

一个年老的教堂司事，一个十四岁的孤女，两人都是曼丁加人，皈依了天主教，他们便是教堂里和家里的助手，可念完玫瑰经之后他

们也就没什么活可干了。关上大门之前，堂区神父就着一杯水吃掉了最后三块甜食，然后照惯例用西班牙语同坐在大街上的邻居们告别：

“在这神圣而美好的夜晚，愿上帝保佑你们。”

清晨四点钟，住在离教堂一个街区远的教堂司事敲响了做联合弥撒的第一阵钟声。快五点钟了，神父还不见踪影，司事便去他的房间找他。神父不在房间里。院子里也没找见。因为神父有时候会一大早就去附近的院子和人聊天，司事又到周围寻找了一番，也没找见。零零星星的几个教民到了教堂，他告诉他们，因为没找到神父，今天的弥撒不做了。八点钟，太阳已然火辣辣的，帮佣的女孩到水池边去打水，这才发现了阿基诺神父，他脸朝上漂在水池里，脚上还穿着睡觉的袜子。他凄惨的死使人们悲痛不已，同时也成了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修道院院长宣布，这便是魔鬼对她的修道院心怀仇恨的有力证据。

这消息没能传进谢尔娃·玛利亚的牢房，她一直怀着一种天真的幻想期盼着阿基诺神父。她不知道怎么向卡耶塔诺解释那是个什么样的人，但因为他把项链还给了她，又答应解救她出去，她告诉卡耶塔诺自己对这位神父心存感激。在此之前，他们两人还都觉得只要拥有爱情就足以使他们幸福了。还是谢尔娃·玛利亚率先从阿基诺神父的话里受到启发，明白了要想获得自由，只能靠他们自己。一天清晨，在长时间的热吻之后，她请求德劳拉不要离她而去。他没把这话当真，又吻了她一下打算告别。女孩从床上一跃而起，张开双臂挡在了门口。

“要么您别走，要么就带我一起走。”

她有一次对卡耶塔诺说起过，真想和他一起逃到帕伦克的圣巴西里奥去躲起来，那是一个逃亡奴隶的村子，离这里只有十二西班牙里的路，那里的人一定会像迎接女王一样迎接她。卡耶塔诺觉得这主意倒不坏，可就是没把它和逃亡联系在一起。他更相信那些正式的、合法的手段，相信在确证女孩并没有被魔鬼附体之后侯爵会把她接回去，相信他自己一定能得到主教的宽恕和允准，融入世俗社会，在那种情况下，教士和修女结婚将变得司空见惯，没有人会为此大惊小怪。因此，当谢尔娃·玛利亚给他出了个到底是留下来别走还是干脆带她一起走的难题时，他想的是怎么把这个话题岔开。女孩吊在他脖子上，威胁说要大声喊叫。天快要大亮了，德劳拉惊恐不已，甩开女孩脱身出来，在晨祷开始的时刻逃走了。

谢尔娃·玛利亚的反应是变得异常疯狂。她先是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抓破了女看守的脸，接着又插上门闩把自己锁在里面，威胁说要是不放她走就放火把这间牢房烧了，把自己烧死在里面。女看守满脸是血，气急败坏地朝她吼道：

“你敢！你这头贝耳则步的畜生。”

谢尔娃·玛利亚唯一的回应是用圣灯点燃了床垫。幸亏马尔蒂娜赶来，用上了她特有的镇静疗法，才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不管怎么样，在这天的报告中，女看守还是恳求把女孩转移到内院更保险的牢房里去。

谢尔娃·玛利亚的渴求促使卡耶塔诺也有了这样的愿望，他需要立即找到一种逃亡以外的好法子。他两次去见侯爵，两次却都被散放在家里的几条猎犬挡住了，主人不在家。实际上，侯爵再也不会住在那里了。他已经被自己心中那无穷无尽的恐惧打倒，曾经想去杜尔丝·奥

莉维亚那里寻求庇护，可她让他吃了闭门羹。从感到孤独的那一刻起，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叫她过来，可每次见到的只是嘲弄他的用纸叠成的小鸟。冷不防，在没有叫她的时候，她却不期而至。厨房因为长期闲置已经无法使用，她把它打扫干净，归置整齐，旺旺的炉火上，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气泡。她穿得像过礼拜天一样，衣服上镶着花边和各种装饰，还搽了时兴的香脂，唯一能让人看出她是疯子的是那顶宽檐大草帽，上面缀了许多碎布条做成的小鱼和小鸟。

“你能来这里，我感激不尽，”侯爵对她说，“我太孤独了。”他又叹了口气，说：

“我失去了谢尔娃。”

“那是你的错，”她满不在乎地回答道，“失去她还不是你一手造成的。”

晚饭吃的是按当地方法烹制的辣椒烧肉，肉有三块，辣椒是从果园里精挑细选摘来的。杜尔丝·奥莉维亚把菜端了上来，完全是一副女主人的派头，这和她那一身华丽的装扮倒很相配。那几条凶猛的猎犬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跟着她，在她腿边窜来窜去，而她则轻声细语地抚慰着它们。她在侯爵对面坐了下来：早就该这样了，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在他们对爱情无惧无畏的时候。他们静悄悄地吃着饭，互不相视，一面浑身冒汗，一面像彼此漠然的老夫老妻那样喝着汤。第一道菜吃完之后，杜尔丝·奥莉维亚停下来叹了口气，生出岁月不饶人的感慨。

“我们本可以有这样的生活。”她说。

她的直率触动了侯爵。此刻在侯爵眼里，她又胖又老，嘴里掉了两颗牙，眼神也黯淡无光。他们本可以有这样的生活，或许吧，要是他当年有勇气和父亲抗争的话。

“当你脑子好使的时候，你就是这个样子。”他说。

“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她说道，“是你从来就没有看见过我真实的样子。”

“我是在一大群姑娘中间发现你的，那时候你们每一个人都很年轻，很漂亮，我好不容易才挑出了个最好的。”侯爵说。

“是我自己把自己挑出来送给你的，”她说，“不是你挑的。你一辈子都是这个德行：一个可怜鬼。”

“你居然敢在我的家里骂我。”他说。

这样一句接一句的斗嘴让杜尔丝·奥莉维亚兴奋起来。“这个家是你的，也是我的，”她说，“因为那女孩是我的，虽说把她送到这世上来的是一条母狗。”她没等侯爵接话，又继续道：

“最糟糕的是，你把这孩子送到了最不该送的人手中。”

“她在上帝的手中。”他说。

杜尔丝·奥莉维亚近乎疯狂，高声喊道：

“她在主教的儿子手中，他把她变成了婊子，让她怀上了自己的孩子。”

“你再敢这么嚼舌头，迟早自己把自己毒死。”侯爵恼羞成怒。

“萨坤达是喜欢说大话，但她从不说假话，”杜尔丝·奥莉维亚反驳道，“你也别想羞辱我，因为等到你死的那一天，也只剩下我来给你脸上盖土了。”

结局一如既往。她的眼泪掉了下来，落在盘子上，像是一滴一滴的汤汁。本来早已睡着的猎犬，此刻又被激烈的争吵声惊醒，纷纷警惕地扬起了头，嗓子里发出吼声。侯爵觉得自己有点喘不上气来。

“你看见了吧，”他怒声说道，“这就是我们本可以有的生活。”

她没等吃完就站起身来，撤了桌上的家什，带着一股无名火去洗盘子和锅，一边洗一边在洗碗槽里把锅碗瓢盆打得粉碎。侯爵任由她哭泣，哭到最后，她把打碎了的家什像一阵冰雹似的倒进了垃圾桶。她没打招呼就走了。侯爵百思不得其解，恐怕谁都想不出，杜尔丝·奥莉维亚是从什么时候起变得不像从前了，如今，她成了这座宅邸里的一个夜间幽灵。

从前有流言蜚语说主教和卡耶塔诺从在萨拉曼卡的时候起就是情人，现在这则谣言被另一个传闻代替了：卡耶塔诺其实是主教的儿子。杜尔丝·奥莉维亚的版本，经过萨坤达的证实，再被添油加醋，变成了这样：谢尔娃·玛利亚被绑架到了修道院里，用来满足卡耶塔诺魔鬼般的欲望，而且她已经怀上了一个长了两个脑袋的孩子。萨坤达还说，他们的纵欲和淫乱已经带坏了整个修道院里的修女。

侯爵再也没能恢复过来。他摸索着行走在记忆的沼泽之中，想找一处安身之地以躲避心中的恐惧，但他能找到的唯有对贝尔纳达的记忆，在孤独中，记忆中的她变得高尚起来。侯爵试图用贝尔纳达身上那些最可恶的东西来抵消这些记忆，她身上的恶臭、她粗鲁的举止、

她脸上像鸡一样高耸的颧骨，然而，他越是去想她的坏处，记忆里的她就变得越是完美。最后，他抑制不住思念之苦，派人给马阿特斯榨糖厂那边送去了试探性的口信，自从她走后，他一直觉得她会在那里，而她也确实在那里。他传话给她，让她忘掉那些仇恨，回到家里来，这样至少他们俩死的时候还能有个伴。一直没等到回音，侯爵决定亲自去找她。

他不得不沿着回忆的溪流摸索前行。当年在整个总督区数一数二的庄园，现在已经一片荒芜。杂草丛生，想找到一条路难之又难。榨糖厂成了一堆废墟，机器都锈迹斑斑，最后两头牛已经成了骨架，仍然套在压榨机的横杆上，只有加拉巴树下那片长满牵牛花的水池仿佛还有点生机。在透过甘蔗园里烧焦的荆棘丛望见房屋之前，侯爵就先闻见了一股贝尔纳达特有的肥皂味儿——这已然成了她身上固有的气味——他发觉，自己是如此渴望见到她。她坐在门口平台栏杆旁的一把摇椅上，嘴里嚼着可可，目光一动不动，死死地盯着远处的地平线。她穿着一条粉色的棉布裙子，刚在水池里洗过澡，头发还湿漉漉的。

在登上门口的三级台阶之前，侯爵先打了声招呼："下午好。"贝尔纳达回了声好，并没有看他，就好像这声问候来自虚空。侯爵走上了围着栏杆的平台，目光越过荒草，向远处巡望了一周。目光所及之处，唯见荒山野岭和水池那儿长着的几棵加拉巴树。"这儿的人呢？"侯爵问道。贝尔纳达和她父亲当年一样，看也没看侯爵。"人都走光了，"她回答说，"方圆几百里见不到一个活人。"

侯爵走进门去想找把椅子。房子已经破烂不堪，地砖缝里冒出了几丛灌木，开着紫色的小花。餐厅里有一张古老的餐桌和几把餐椅，都被白蚁蛀得不成样子；钟停了摆，谁也不知道它是在哪一刻停了

的；呼吸之间能感觉到，空气里飘浮着一层看不见的灰尘。侯爵给自己搬来一把椅子，挨着贝尔纳达坐下，低声对她说：

“我是专为找您而来的。”

贝尔纳达不动声色，但还是几乎难以觉察地点了一下头。他把自己的现状告诉了她：家里空空荡荡的，奴隶们躲在树丛后面磨刀霍霍，夜晚漫长得没有尽头。

“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他说。

“我们从来就没有过过人过的日子。”她回答道。

“说不定能过上呢。”他又说道。

“要是您知道我有多恨您，您就不会跟我说这样的话了。”她说。

“我也一直以为我恨您，”侯爵说，“可现在，我似乎没有那么确定了。”

于是，贝尔纳达向他敞开了心扉，好让他明白事情的原委和真相。她对他讲了她父亲是如何让她打着送鲱鱼和醋渍菜的幌子来找他的，如何用看手相这样的老伎俩欺骗了他，在他装聋作哑的时候又是如何唆使她强行和他干了那事儿，他们又如何冷静、准确地策划让她怀上了谢尔娃·玛利亚，从而把他一辈子牢牢掌握在手心。侯爵唯一应该感谢她的，就是她没有去做和她父亲商量好的最后一步：给他的汤里下点鸦片酊，彻底将他摆脱。

“我是自己把绳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她说，“可我并不后悔。让我难以承受的是，在种种折磨之外，我还不得不爱那个可怜的七个月

的早产儿，或是爱您，要知道您可是我一切不幸的根源。”

尽管如此，失去犹达斯·伊斯卡柳特才是她滑向堕落的最后一级台阶。她在其他男人身上寻找着他的踪影，她毫无节制地投身于和榨糖厂的奴隶们通奸，这样的事在她第一次干出来以前想想都觉得恶心。她把奴隶们分成组，排成队，就在香蕉园间的小径上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干那事儿，直到她的魅力被发酵蜂蜜和可可饼消磨殆尽，她变得浑身虚肿，丑陋不堪，这样的身体令奴隶们望而却步，于是她开始用钱说话。刚开始，根据样貌和体格付点铜板，就可以找到年轻力壮的，到后来，随便来个什么人都得付真金白银。过了好久她才发现，为了躲开她那永远不知满足的欲望，奴隶们成群结队地逃到帕伦克的圣巴西里奥村去了。

“这下我才知道，我早该用砍刀把他们都砍死的，”她这么说着，眼中没有一滴眼泪，“不光要砍死他们，还有您，那个女孩，我那一毛不拔的父亲，以及所有那些把我的生活弄得一团糟的人。可那时，我已经砍不动任何人了。”

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待着，看着夕阳照耀在荆棘丛生的峭壁上。地平线那里远远传来成群动物的声响，还有一个女人绝望的声音正挨个呼唤它们的名字，天渐渐黑了。侯爵舒了口气:

“我算是看清了，我真的没什么好感谢您的。”

他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把椅子放回原处，顺着来路走了，没有道别，也没有带上一盏灯。又过去了两个夏天，在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小路上，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只剩下一堆被秃鹫吃剩的白骨。

那天，马尔蒂娜·拉波尔德为了做完一件被耽搁下来的活，整整一上午都在刺绣。中午她在谢尔娃·玛利亚的牢房里吃了午饭，随后回她自己的牢房去睡了个午觉。下午，绣到最后几针时，她带着一种不常见的伤感和谢尔娃·玛利亚说起话来。

“要是哪天你从这里出去了，或者要是我先出去的话，你可千万别忘了我，”她说，“这将是我唯一的荣耀。”

谢尔娃·玛利亚直到第二天才明白她说这番话的用意，女看守大叫大嚷把她吵醒：早上起床的时候，牢房里不见了马尔蒂娜。她们把修道院翻了个底朝天，也没能发现她的一丝踪影。有关她的唯一消息，是谢尔娃·玛利亚在枕头底下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用花体字写着：*我会一天三次为你们祈祷，祝愿你们幸福。*

没等谢尔娃·玛丽亚从惊恐之中回过神来，院长就带着副院长和院里的其他几位手段冷酷的大人物闯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队扛着火枪的卫兵。院长怒不可遏地伸出一只手，按住了谢尔娃·玛利亚，对她大声吼道：

“你是同谋，你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女孩抬起那只没被按住的手，那股坚决让院长一下子愣在了那里。

“他们出去的时候我看见了。”她说。

院长目瞪口呆。

“她不是一个人？”

“他们一共有六个人。”谢尔娃·玛利亚说道。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更别说从露台上逃走了，从那里走就必须经过有人看守的院子。“他们长着蝙蝠的翅膀，”谢尔娃·玛利亚一边说，一边张开双臂，做出飞翔的样子，“他们在露台上张开翅膀，把她带走了，飞呀飞呀，一直飞到了大海的另一边。”卫队队长吓得面无人色，画着十字，跪倒在地。

“最最纯洁的玛利亚。”他嘴里念道。

“无玷成胎的圣母。”众人齐声应和。

这是一次完美的逃亡，自从发现卡耶塔诺经常在修道院里过夜，马尔蒂娜就不露声色地谋划着，把一切细节都考虑到了。她唯一没有预见到的，或者说她根本就不在乎的是，理应从里面掩上下水道的入口，以免引起怀疑。调查这次逃亡的人发现下水道敞开着，勘察了一番，弄清了真相，便把下水道两头都砌死了。谢尔娃·玛利亚被强行带到了活死人住的那座楼里，关进了一间上锁的牢房。这天夜里，皓月当空，卡耶塔诺把两只手都挖烂了，也没能打穿封住地道的那堵墙。

他近乎疯狂，跑去找侯爵。他没敲就一把推开了大门，闯进了空空荡荡的侯爵府，府邸里的光线和大街上一样明亮，因为那石灰墙在月光照耀下仿佛透明的一般。被遗弃了的府邸里干净整洁，家具都归置到位，硕大的花盆里鲜花盛开，一切都井井有条。铰链的吱呀声惊动了那几条猎犬，可杜尔丝·奥莉维亚一声喝令，它们又一下子安静下来。卡耶塔诺看见她站在院落绿色的浓荫里，美丽动人，浑身散发着光芒，身穿侯爵夫人的长袍，鬓间插着颜色鲜艳、气味浓郁的新采的山茶花，他抬起手，用食指和大拇指比画出一个十字。

“以上帝的名义，请问你是哪位？”他问道。

“一个正在接受惩罚的幽魂，”她答道，“您又是哪位呢？”

“我是卡耶塔诺·德劳拉，”他告诉她，“我来这里是为了跪求侯爵先生听我讲两句话。”

杜尔丝·奥莉维亚眼睛里冒出了怒火。

“侯爵先生没时间听一个无赖讲什么废话。”她说。

“那么你究竟是何许人，能有权在这里发号施令？”

“我是这府中的女王。”她说道。

“看在上帝的分上，”德劳拉说，“请您告诉侯爵，我是来和他谈他女儿的事情的。”他不再兜圈子，把手放在胸前，说道：

“为了爱她，我可以去死。”

“再敢多说一个字，我就放狗了。”杜尔丝·奥利维亚勃然大怒，用手指着大门：“从这里滚出去。”

她的口气是如此决然，卡耶塔诺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一步一步退出了大门。

礼拜二，阿布雷农肖走进麻风病医院里德劳拉的小房间时，看见他因为不要命地熬夜已经垮掉了。德劳拉把一切对他和盘托出，从他受罚的真实原因一直讲到他在那间牢房里度过的每个良宵。阿布雷农肖一时有点不知所措。

“我能想象您干出任何一件蠢事，可像这种疯狂至极的事儿我还真没想到。”

这下卡耶塔诺也吃了一惊，问他道：

“难道您就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吗？”

“从来没有，我的孩子，”阿布雷农肖说，“性是一种天赋，而我没有这种天赋。”

他试图劝服卡耶塔诺。他说，爱情是一种违背天性的感情，它把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带进一种自私的、不健康的依赖关系之中，感情越是强烈，就越是短暂。可是卡耶塔诺一点都听不进去。他的脑子里只转着一个念头，那就是逃离这个基督教世界的压迫，逃得越远越好。

“现在只有侯爵能从法律上帮助我们，”他说，“我曾经想去跪着求他，可是没在府中找见他。”

“您永远都找不见他了，”阿布雷农肖说，“传到他那儿的声音是，您一直想欺侮她的女儿。而我现在明白了，以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来看，他没有弄错。”说完他直直盯住卡耶塔诺的双眼：

“您就不怕下地狱吗？”

“我觉得我已经在地狱里了，但把我打下地狱的并不是圣灵。”德劳拉回答时无所畏惧，“我一向认为比起信仰来，圣灵更关心的是爱情。”面对这样一个刚刚从理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人，阿布雷农肖无法掩饰自己的敬仰之情。可他并没有对这个人许下什么虚假的诺言，更何况还有宗教法庭横梗在中间呢。

“你们信仰的是一个崇尚死亡的宗教，它给了你们面对死亡的勇气和乐趣，”他对德劳拉说道，“我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唯一最要紧的，是活着。”

卡耶塔诺又跑到了修道院。他在大白天从奴仆们进出的门走了进去，大模大样地穿过了花园，自以为靠着祈祷的力量，一定不会有人看见他。他登上二楼，穿过一条空无一人的走廊，这条有着低矮的天花板的走廊连接着修道院的两座建筑，他就这样走进了活死人的那个寂静而又冷清的世界。他经过那间新牢房时，谢尔娃·玛利亚正在里面为他哭泣，可他无所察觉。他就要走到那座牢房楼时，身后一声喝令叫住了他：

“站住！”

他转过身来，只见一个脸上蒙着面纱的修女正朝着他高高举起一个十字架。他朝前迈了一步，却被那修女用基督的十字架挡住了。修女大声喝道：“向后退！[2]”

这时他身后又传来另一个声音：“向后退！[3]”接着是一声接着一声的“向后退！[4]”。他转了好几个圈才弄明白自己被一群修女团团围住了，她们像幽灵一般，脸上都蒙着面纱，手上都举着十字架，高声追逼着他：

“向后退，撒旦！[5]”

卡耶塔诺精疲力竭。他被送上了宗教法庭，在一个公共广场上接受审判，被指控有异教徒的嫌疑，这在教会内部引发了群体的骚乱和争论。由于得到了特殊恩惠，对他的最终处罚是在圣爱医院做护士。

他在那里又活了很多年，整日和病人混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在地上睡觉，在病人的木槽里用他们用过的水洗澡，他坦承自己渴望染上麻风病，却一直没能如愿。

谢尔娃·玛利亚空等了他一场。三天后，她起而反抗，开始绝食，这使她更像被魔鬼附体了。主教被卡耶塔诺的堕落和阿基诺神父离奇的死亡所困扰，被公众对超出了他的智慧和能力范畴的不幸事件的反响弄得昏头昏脑，于是，他爆发出就他的身体状况和年龄而言不可思议的能量，重操驱魔大业。这一次，谢尔娃·玛利亚的头用剃刀剃得精光，又套上了束缚衣，她以一种撒旦的凶猛面对主教，嘴里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不时发出地狱里禽鸟的悲鸣。第二天，人们听见受惊的畜群发出一阵阵吼叫，大地都为之震动，这时再说她和地狱里的大小魔鬼没什么牵连已经没人会相信了。带她回牢房的路上，人们用圣水给她灌了肠，这是法国人的法子，为的是把可能残留在她五脏六腑里的魔鬼赶走。

这样的折腾又持续了三天。尽管有一个礼拜没吃东西了，谢尔娃·玛利亚还是把一条腿挣脱了出来，照着主教的小腹就是一脚，把他踢翻在地。这时人们才发现，原来她早就可以挣脱出来，因为她的身体太瘦弱，皮带已经绑不住她了。这一事件提醒人们，驱魔活动可以停一停了，对此教士会议表示赞同，但主教却执意反对。

谢尔娃·玛利亚始终没能弄明白卡耶塔诺·德劳拉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他不再带着装有精致甜食的篮子来和自己共度良宵。五月二十九号这天，已经气息奄奄的她又一次梦见了那扇窗户，窗外是大雪覆盖的原野，那里没有卡耶塔诺·德劳拉，他永远也不会出现在那里了。她的怀里兜着一串金色的葡萄，她每吃掉几颗，葡萄串上就马上长出新的来。可这一次，她不再是一颗一颗，而是两颗两颗地摘，为了把

最后一颗吃进嘴中，她几乎喘不上气来。等到女看守进牢房来准备带她去进行第六次驱魔的时候，发现她已经为爱死在了床上，她的两只眼睛炯炯发光，皮肤像初生的婴儿一样。被剃得精光的头皮上，一缕缕的头发像冒泡泡一样涌出来，眼见着越长越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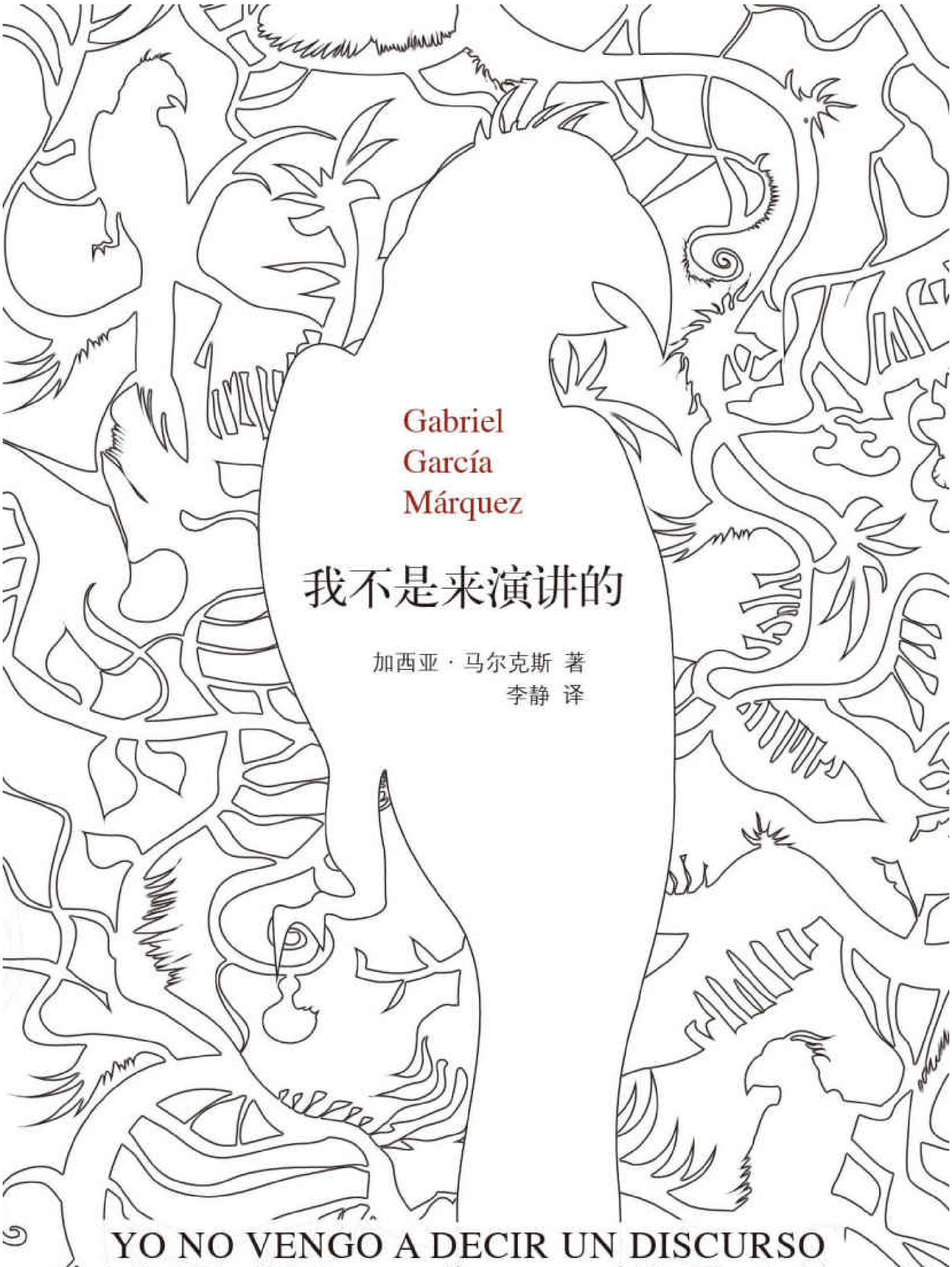
[1] 原文为拉丁语。

[2] 原文为拉丁语。

[3] 原文为拉丁语。

[4] 原文为拉丁语。

[5] 原文为拉丁语。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我不是来演讲的

加西亚 · 马尔克斯 著
李静 译

YO NO VENGO A DECIR UN DISCURSO

我不是来演讲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李静 译

南海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我不是来演讲的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译者：李静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2-01

ISBN：9787544251891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责任学堂

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

为了你们

另一个故乡

拉丁美洲的孤独

敬诗歌

致新千禧年

达摩克利斯之剑

无法摧毁的信念

新千年的序言

我不在这里

恭祝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七十大寿

我的朋友穆蒂斯

人见人爱的阿根廷人

拉丁美洲确实存在

不一样的天性，不一样的世界

新闻业：世上最好的职业

致语言之神的漂流瓶

二十一世纪遐想

远离却深爱的祖国

敞开心扉，拥抱西语文学

编者的话

责任学堂

1944年11月17日　哥伦比亚　锡帕基拉

在锡帕基拉国立男子中学1944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毕业生是比他高一级的学长。由于一笔奖学金，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在该校住校完成高中学业。

所有这种社会活动，都会指定某人做个演讲。而他总会找个最合适的话题，当着众人说上一通。但我不是来演讲的。今天，我选择了一个高贵的话题——友情。关于友情，该说些什么呢？趣闻轶事、名人名言？这能写上好几页纸，却失之空泛。各位不妨问问自己，为何会对某人最有好感，最愿说知心话，便会明白今日活动的目的。

这批同学即将踏入社会，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结成我们与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这就是友情，也就是今天我要谈论的话题。再次重申，我不是来演讲的。我只想请各位先公正地做个裁决，再与他们共伤离别之情。

在座即将各奔东西的有：运动场上可爱的达达尼昂[1]——亨利·桑切斯和他的三个火枪手豪尔赫·法哈多、奥古斯托·隆多尼奥和埃尔南多·罗德里格斯；形影不离的拉斐尔·昆卡和尼古拉斯·雷耶斯；伟大的“试管骑士”里卡多·冈萨雷斯和辩论场上的危险分子阿尔弗雷多·加西亚·罗梅罗，这二位情同手足，堪称典范；政界及报界的未来精英胡利奥·比利亚法尼亚和罗德里戈·雷斯特雷波；一丝不苟的米格尔·安赫尔·洛萨

诺和吉列尔莫·鲁维奥；心地淳厚的温贝托·海梅斯、曼努埃尔·阿雷纳斯、萨穆埃尔·韦尔塔和埃内斯托·马丁内斯；机智幽默的阿尔瓦罗·尼维亚；和而不同，但都向往成功的海梅·丰塞卡、埃克托尔·奎利亚尔和阿尔弗雷多·阿吉雷；同名且同想为国争光的卡洛斯·阿吉雷和卡洛斯·阿尔瓦拉多；手不释卷的阿尔瓦罗·巴克罗、拉米罗·卡德纳斯和海梅·蒙托亚；最后还有，决不会让我的预言落空的胡利奥·塞萨尔·莫拉莱斯和吉列尔莫·桑切斯。这批同学注定将成为哥伦比亚的栋梁。为了这个相同的理想，他们将动身去寻找光明。

听完每位同学的优点，就请各位与我一道，做出公正裁决：我谨代表国立男子中学和社会宣布，（借用西塞罗[2]的话）这批同学正步入责任学堂，成为智慧公民。

尊敬的听众，我的话完了。

---

[1] 达达尼昂和三个火枪手是法国作家大仲马（Alexandre Dumas，1802—1870）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人物。

[2]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文学家，著有“西塞罗三论”，其中之一为《论责任》。

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

1970年5月3日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在加拉加斯文化艺术中心的讲话。后被刊登在波哥大《观察家报》上。胡安·卡洛斯·萨帕塔在《加博[1]出生在加拉加斯，而非阿拉卡塔卡》一文中记述了当时情形：记者尼古拉斯·特林卡多得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出席论坛，前去采访，见他“身材消瘦，蓄着浓密的小胡子，点着根烟”。他给听众讲的那个“在脑子里想了好几年”的故事，后来成为1974年路易斯·阿尔科利萨执导的《预感》电影剧本。

首先，请原谅我坐着说话。因为如果我站着，恐怕会吓得两腿发软，瘫倒在地。真的！我原以为，这辈子最可怕的五分钟会是在一架飞机上面对着二三十名乘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面对着两百位朋友。说到这儿，正好给了我一个由头谈起文学。对我而言，文学创作就和登台演讲一样，都是被逼的。我承认，为了不来开这次大会，我什么点子都动过：我想生病，染上肺炎；想理发，让理发师用刀割了我的脖子；最后，我灵机一动，不穿西装，不打领带，这样，正式会议应该就会谢绝我入场了。可我忘了，这里是委内瑞拉，穿件衬衫哪儿都能去。因此，我还是坐在了这里，不知该说些什么，就说说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吧！

我本来没想过要当作家。学生时代，波哥大《观察家报》的文学副刊主编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在报上说，新生代对文学毫无贡献，写短篇小说的没有，写长篇小说的也没有。他只登老朽的文章，不登年轻人的。他说，不是他不登，是年轻人不写。

这话激发了我对同代人的集体荣誉感。我决定写个短篇，去堵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的嘴，他是我的挚友，至少后来成为了我的挚友。我坐下来，写了个短篇，投到《观察家报》，等到下一个周日翻开报纸，我吓了一跳：那个短篇登了个全版，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公开认错，说了些“此文标志着哥伦比亚文坛新星诞生”之类的话。

这下我可真犯了愁，我对自己说：“瞧我惹了多大的麻烦！怎样才能不让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下不来台呢？”答案是：继续写。但选材是个问题：动笔前，我得先想个故事。

出了五本书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坦白说，写作恐怕是这世上唯一越做越难做的行当。当年那个短篇，我坐一下午，轻轻巧巧就写完了；可如今，写一页纸都要费我老大的劲。我写作的方法便如刚才所说：事先根本不知道要写什么，写多少。得先想故事，有好故事，脑子里多过几遍，等它慢慢成形。想好了——有时候要想好多年，《百年孤独》就足足想了十九年——想好了，再坐下来写，接下来就是最麻烦、最无趣的阶段了。想故事最有趣，要怎么把故事编圆，一遍遍想，一遍遍琢磨。那么多遍想下来，真要动笔，反而没劲了，至少我觉得没劲。

我来讲一个在脑子里想了好几年、编得挺圆的故事。现在讲了，等哪天写出来，你们会发现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正好也可以观察其中的演变。想象一下：从前，有个很小的村子，村里住着个老太太。

老太太有两个孩子，儿子十七，女儿还不到十四。一天，老太太一脸愁容地端来早饭，孩子们见了，问她怎么了，她说："我也不知道，一早起来，总觉得村里会有大难。"

孩子们笑她，说老太太就这样，尽瞎想。儿子去打台球，碰到一个双着[2]，位置极好，绝对一击就中。对手说："我赌一个比索，你中不了。"大家都笑了，这儿子也笑了，可一杆打出去，还真的没中，就输了一个比索。对手问他："怎么回事？这么容易都击不中？"儿子说："是容易。可我妈一早说村里会有大难，我心慌。"大家都笑他。赢钱的人回到家，妈妈和一个表妹或孙女什么的女亲戚在家。他赢了钱，很高兴，说："达马索真笨，让我轻轻巧巧赢了个比索。""他怎么笨了？""笨蛋都能打中的双着他打不中。说是他妈一早起来说村里会有大难，他心慌。"

妈妈说："老人家的预感可笑不得，有时候真灵。"那女亲戚听了，出门买肉，对卖肉的人说："称一磅肉。"卖肉的正在切，她又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多备点好。"卖肉的把肉给了她。又来了位太太，也说要称一磅，卖肉的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得备点吃的，都在买。"

于是，那老妇人说："我孩子多，称四磅吧！"就这样称走了四磅肉。之后不再赘述。卖肉的半小时就卖光了肉，然后宰了头牛，又卖光了。谣言越传越广，后来，村里人什么都不干了，就等着出事。下午两点，天一如既往的热。突然有人说："瞧，天真热！""村里一直这么热！"这里的乐器都用沥青修补，因为天热，乐师们总在阴凉的地方弹奏，要是在太阳底下，乐器非晒散架不可。有人说："这个点儿，没这么热过！""就是，没这么热。"街上没人，广场上也没人，突然飞来

一只小鸟，顿时一传十，十传百：“广场上飞来一只小鸟。”大家惊慌失措地跑去看小鸟。

“诸位，小鸟飞来是常事！”“没错，可不是在这个点儿。”人们越来越紧张，万念俱灰，想走又不敢走。有人说：“我是大老爷们，有什么好怕的，我走！”说着，就把家具、孩子、牲口通通装上了车。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过中央大道，都说：“他敢走，我们也走。”于是全村都开始收拾，物品、牲口通通带走。就剩最后一拨人了，有人说：“还有房子呢！可别留在这儿遭难。”就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其他人也跟着烧，好比在经历一场战乱，个个抱头鼠窜。人群中，就见那有预感的老太太说：“我就说会有大难，还说我疯了！”

---

[1] 加夫列尔的昵称。

[2] 台球术语，指主球在一次击球期间与两个目标球接触。

为了你们

1972年8月2日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领取《百年孤独》赢得的第二届罗慕洛·加列戈斯[1]国际小说奖

颁奖地点在巴黎剧院。评委会成员有：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安东尼娅·帕拉西奥斯、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何塞·路易斯·卡诺和多明戈·米利亚尼。据报载，除获奖小说《百年孤独》外，入围的还有：胡安·贝内特的《沉思》、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的《三只悲虎》、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的《我想哭的时候，不哭》。

我曾发誓绝不做两件事：领奖和演讲。今天，我硬着头皮，头一回连破两例。在座的都是朋友，请大家在精神上支持我，帮我度过这个难挨的下午。

我一向认为：当作家，不是为了拿奖。对其他看法，我表示尊重。但为名所累的道理大家都懂。我也一向认为：作家之所以是作家，并无过人之处，不过是除了这行，别的什么都干不了。闭门码字并不比鞋匠制鞋高明多少，得名得利都不合适。然而，我来不是为了道歉，不是为了鄙薄以美洲经典文学大师命名的奖项，我来，是和大家联欢的。我想通了。是什么让我违背原则，放下顾虑的呢？朋友们，我来，是因为我在这片土地上年轻过、落魄过、幸福过，我对它一往情深；我来，是因为委内瑞拉的朋友为人仗义、一辈子爱说笑、

确实了不起，我爱他们，支持他们。我来，是为了他们，也就是说，为了你们。

---

[1]罗慕洛·加列戈斯（Rómulo Gallegos，1884—1969），委内瑞拉小说家、政治家，代表作为《堂娜芭芭拉》，1948年2月15日至11月24日任委内瑞拉总统。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创立于1964年8月6日，表彰西班牙语世界最杰出的小说。

另一个故乡

1982年10月22日　墨西哥城

领取阿兹台克雄鹰勋章后的讲话

授奖礼在总统官邸松林别墅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1]厅举行。在场的有墨西哥共和国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和哥伦比亚外交部长罗德里戈·略雷达。按照外交礼仪，勋章由墨西哥外交部长豪尔赫·卡斯塔涅达—阿尔瓦雷斯·德拉罗萨授予。这是墨西哥政府给予外国人的最高奖赏。

接过这枚阿兹台克雄鹰勋章，两种原本素不相识的情感——感激与自豪——同时涌上心头。勋章见证了我和妻子对这个国家的一往情深。二十多年前，我们选择在这里生活，我的孩子在这里成长，我的作品在这里完成，我栽的树苗在这里洒下绿荫。

六十年代，当我郁郁寡欢、落魄无依时，墨西哥的朋友支持我，鼓励我，让我继续创作。当年的处境被我写在了《百年孤独》里，具体哪章我忘了。过去十年，当成功接踵而至，宣传铺天盖地，扰乱我个人生活时，墨西哥朋友的谨言慎行和体贴入微，让我找回了内心的安宁，得以不受干扰地继续我的木匠活计[2]。墨西哥不是我的第二故乡，它是我的另一个故乡。它无条件地付出，从不计较我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我对祖国时时刻刻的思念。

然而，我感动于墨西哥政府授予我的这份荣耀，还不仅仅因为墨西哥是我生活过、并正在其中生活的国家。总统先生，我还认为，贵国政府的这枚勋章也同样授予了所有栖身于墨西哥的流亡者。我明白，我不能代表任何人，我的情况并没有代表性。我也明白，我目前在墨西哥的生存状况，与近十年来绝大多数侥幸逃来的难民不可相提并论。不幸的是，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大陆，独裁仍未远去，屠杀尚在眼前。今时今日，有太多被逼无奈的流亡，不同于我当年的自愿选择。虽然，这是我个人的言论，但我知道，许多人会有同感。

总统先生，感谢您打开的这扇门。拜托，无论如何，千万别关上。

---

[1] 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1859—1920），墨西哥革命领导人，1917年至1920年间任墨西哥第一届立宪总统，1920年5月21日被暗杀。

[2] 马尔克斯于1998年接受采访时曾说："文学创作就是催眠。作家给读者施催眠术，让他什么也不想，只想作家正跟他讲的这个故事。想让读者长眠不醒，得要大量的钉子、螺钉和铰链。我把这个叫木匠活，也就是讲故事的技巧、写作技巧和电影制作技巧。灵感是一回事，情节是另一回事，如何将情节呈现出来，变成真正能吸引读者的文学作品，没木匠活，做不了。"

拉丁美洲的孤独

1982年12月8日　瑞典　斯德哥尔摩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小说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六名科学家——肯尼斯·威尔逊（物理学奖），阿龙·克卢格（化学奖），苏恩·伯格斯特龙、本格特·萨米尔松和约翰·R.范恩（医学奖），乔治·J.斯蒂格勒（经济学奖）——从瑞典国王卡洛斯十六·古斯塔沃和王后西尔维娅手中接过著名的诺贝尔奖章。颁奖典礼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为焦点人物，没有穿庄重的燕尾服，而是身着地道的加勒比西装[1]，打破了诺贝尔奖的颁奖习俗。

随麦哲伦一道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水手安东尼奥·皮加菲塔，途经南美时如实记下的所见所闻，竟好似一部奇思妙想的历险记。他说见过肚脐长在背上的猪，雌鸟伏在雄鸟背上孵蛋的无爪鸟，以及形似鹈鹕、勺形喙的无舌鸟。他说见过骡头、骡耳、骆驼身、鹿脚、马嘶的怪物，还说曾给在巴塔哥尼亚遇上的第一个土著照镜子，那大个子土著一激灵，被镜子里的自己吓得魂飞魄散。

在这本篇幅不长、引人入胜的小书里，甚至已能窥见现代小说的萌芽，但它还远非当年最令人瞠目的史料。西印度群岛的史学家们留下了更惊人的书山文海。令人垂涎的黄金国，本是虚构的产物，却长年出现在不少地图上，位置形状随绘图员的臆想千差万别。为了寻找

永葆青春泉，传奇人物阿尔瓦尔·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耗时八年勘察墨西哥北部，远征队员痴念成疯，同类相食，六百人去，五人生还。还有很多其他的不解之谜，如一万一千头各驮一百磅黄金的骡子，从库斯科出发去赎还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可一头也没到达目的地。后来，殖民时期，卡塔赫纳出售过一批在冲积土上饲养的母鸡，鸡胗里发现了金粒。我们那些开国者的黄金热，直到不久前还阴魂不散。上世纪，有个德国代表团研究在巴拿马地峡建造跨洋铁路的可能性，下结论说这地方铁少，要建，就得用金。

我们摆脱了西班牙人的统治，却没有摆脱疯狂。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将军三任墨西哥独裁者，曾为自己在“糕点战争”中失去的右腿举办隆重的葬礼；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将军如专制君主般统治了厄瓜多尔十六年，死后身着戎装，胸前挂满勋章，端坐在总统宝座上供人吊唁；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萨尔瓦多的暴君，神智学者，曾惨无人道地一次性屠杀了三万农民，还发明了检测食物是否有毒的钟摆，下令用红纸罩住路灯，以防猩红热；特古西加尔巴中心广场上的弗朗西斯科·莫拉桑将军[2]像，其实根本是奈伊将军[3]像，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货。

十一年前，当代著名诗人、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4]曾用诗歌辉耀此地。那之后，拉丁美洲亦真亦幻的新闻如潮水般涌入了心地善良抑或居心不良的欧洲人的视野。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有胡思乱想的男人，有载入史册的女人，永不妥协的精神铸就了一段段传奇。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从未享过片刻安宁。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5]曾困守在火光熊熊的总统府，孤身抵挡一支军队，直至战死；另一位高尚

的总统[6]与一名重塑民众尊严、推行民主制度的军人[7]死于两起至今原因不明的可疑空难。

五次战争，十七次军事政变，还冒出一个恶魔似的独裁者，打着上帝的旗号率先开展了拉丁美洲当代的种族文化灭绝。与此同时，两千万拉美儿童不满两岁夭折，超过一九七〇年以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镇压与迫害造成的失踪人口近十二万，好比乌普萨拉[8]全城市民不知去向。难以计数的孕妇被捕后，在阿根廷监狱分娩，婴儿被军政府秘密送养或送进孤儿院，至今下落不明。为了让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约二十万拉美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十多万丧身于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这三个中美洲恣意妄为的小国。若以相同比例换算至美国，相当于四年内横死一百六十万人。

智利本是好客之国，居然也有百分之十的人口——一百万人亡命天涯。乌拉圭是个两百五十万人口的小国，在拉美国家中文明程度最高，却也流放了五分之一的人口。自一九七九年起，萨尔瓦多内战几乎每二十分钟就制造一名难民。拉美各国的流亡者与难民，加起来比挪威总人口还多。

我斗胆认为，是拉丁美洲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其文学的表现形式，引起了瑞典文学院的极大关注。现实并非纸上之物，它就在我们身边，每天左右无数生死，同时也滋养着永不枯竭、充满了美好与不幸的创作源泉，我这个四处漂泊、思乡心切的哥伦比亚人只是蒙幸运女神的眷顾。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

常规之法使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

如果连我们自己也被难倒，那么，生活在地球这边、理性至上、沉醉于自身文化的人自然就更无法明白我们了。不难理解他们会坚持用衡量自身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忘记了生活的苦难因人而异。自我追寻的路上荆棘丛生、鲜血淋漓，他们走过，我们在走。用他人的标准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拘束，越来越孤独。可敬的欧洲如果想想他们的过去，再来对比我们的现在——记起伦敦花了三百年才建起第一道城墙，又花三百年才有了一位主教；罗马迷失了两千年，才由一位伊特鲁里亚国王确立其历史地位；如今爱好和平，出产有孔奶酪、精密钟表的瑞士，十六世纪还在以雇佣兵的身份血洗欧洲；即便在文艺复兴顶峰，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中的一万两千名德国雇佣兵也曾对罗马烧杀抢掠，刺死八千罗马人——也许会更理解我们一些。

托尼奥·克勒格尔[9]的梦想是将纯洁的北方与热情的南方融为一体，五十三年前，托马斯·曼曾在此地对此大加赞赏。今天，我无意再次扮演这书中人的角色，但我相信，头脑清楚的欧洲人，同样为建设更人道、更公正的伟大国家而奋斗的欧洲人，只要彻底修正看待我们的方式，就能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帮助。对于梦想在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席之地的人民来说，如果支持仅限于声援，没有落实成合法的行动，我们的孤独感是丝毫不会因之减少的。

拉丁美洲不情愿、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人摆布的棋子，此外也不会去幻想西方国家能打心眼儿里支持我们独立、独特的发展计划。航海技术的进步缩短了美洲与欧洲的地理距离，却加大了彼此的文化距

离。为什么文学上的独特性可以被全盘接受，却对我们独立自主、举步维艰的社会变革疑虑重重、全盘否决呢？为什么认为欧洲发达国家在本国推行的社会公正无法在不同条件下、以不同方式成为拉美国家的奋斗目标？不，历史上众多的战乱与伤痛，源于世世代代的不公和无休止的苦难，而非千里之外的诡计阴谋。可许多的欧洲领导人、思想家偏不信。他们忘了自己也曾年少轻狂、锐意进取，幼稚地以为不听两个超级大国的摆布，只会走投无路。朋友们，瞧，我们有多孤独！面对压迫、掠夺和遗弃，我们的回答是：活下去。无论洪水、瘟疫、饥荒、灾难，还是连绵不绝、永不停息的战火，都无法战胜生的顽强，生命对死亡的优势。

如今，这优势还在扩大，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世界年净增人口已达七千四百万，相当于纽约人口的七倍。人口大多出生在贫困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拉美。与此同时，最繁荣的几个国家却积聚了足够大的破坏力，不仅能将现存总人口毁灭一百次，还能将在这个倒霉星球上存在过的所有生物尽数毁灭。

也是在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我的导师威廉·福克纳[10]在这里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如果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三十二年前被他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如今在人类历史上已首次从科学角度成为可能，我会愧对这个他曾经站过的位置。这令人震惊的现实在人类史上曾经只是个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寓言创造者有权相信：反转这个趋势，再乌托邦一次，还为时不晚。那将是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的生活方式：不会连如何死，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爱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那些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也终于永远地享有了在大地上重生的机会。

[1]liqui-liqui，哥伦比亚传统服饰。

[2]弗朗西斯科·莫拉桑（Francisco Morazán，1792—1842），洪都拉斯政治家、军人，出生于特古西加尔巴。

[3]米歇尔·奈伊（Michel Ney，1769—1815），法国军人，拿破仑一世麾下的18名“帝国元帅”之一。

[4]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诗人，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5]指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1970年11月4日至1973年9月11日间任智利总统。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阿连德困守总统府拉莫内达宫，直至战死。

[6]指海梅·罗尔多斯·阿吉莱拉（Jaime Roldós Aguilera，1940—1981），1979年8月10日至1981年5月24日间任厄瓜多尔总统，1981年因空难丧生。

[7]指奥马尔·托里霍斯·埃雷拉（Omar Torrijos Herrera，1929—1981），曾任巴拿马国民警卫队司令，1981年在一起空难中丧生。

[8]瑞典城市。

[9]Tonio Kröger，德国作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于1903年创作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10]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作家，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敬诗歌

1982年12月10日　瑞典　斯德哥尔摩

在瑞典国王与王后招待诺贝尔奖得主宴会上的讲话

晚宴设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府蓝色宴会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有幸不用排队》（发表于1983年5月4日，收录于《报刊作品5：新闻稿1961—1983》）中回忆道："他们让我在一张打印表上签名，将领奖辞与《敬诗歌》的版权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基金会。《敬诗歌》是我在最后一刻，和诗人阿尔瓦罗·穆蒂斯一起赶写出来的。之后，我又为基金会成员在瑞典语版作品上签名……"

感谢瑞典文学院颁给我这个奖，让我有幸与大师为伍。在我埋首读书、痴迷写作、自娱自乐的日子里，他们曾指引过我，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到今天，大师及其作品既成为了我的守护神，也意味着获奖后压在我心头沉甸甸的责任。他们获奖，我认为是实至名归；而我获奖，是上天又在敲打我，提醒我：天意莫测，人如棋子，大多惨淡收场，要么不被理解，要么被人遗忘。

因此，我不禁反躬自问，深入内心，寻找自我，寻找答案：是什么支撑了我的作品，是什么引起了评委的注意，能让挑剔的他们感同身受？不谦虚地讲，想通不易，希望我说出的答案能一语中的。朋友们，在我看来，这是对诗歌又一次表示敬意。因为诗歌，老荷马的《伊利亚特》中数不胜数的各色船只乘风破浪，穿越历史，勇往直

前；因为诗歌，但丁用区区三层脚手架就撑起了中世纪这座沉重宏伟的工厂；[1]因为诗歌，伟大的、最伟大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马丘比丘之巅》中用生花妙笔，描绘了破碎的美梦，抒发了千年的忧伤，重现了南美的辉煌。诗歌是平凡生活中的神秘能量，可以烹熟食物，点燃爱火，任人幻想。

写下每一行字，我都会祈求诗神的庇佑，运气时好时坏。诗神不易亲近、未卜先知，其力量从来都超越对一切充耳不闻的死亡之神。我希望写下的每个字，都能体现我对它的虔诚。获奖让我聊以自慰，还好，努力没有白费。在此，我提议，为伟大的美洲诗人路易斯·卡多索- 阿拉贡[2]干杯，是他将诗歌定义为人类存在的唯一实证。谢谢大家。

---

[1]这里指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创作的史诗《神曲》，全诗分三部分：《地狱》、《炼狱》和《天堂》。

[2]路易斯·卡多索—阿拉贡（Luis Cardoza y Aragón，1901—1992），危地马拉作家、诗人。

致新千禧年

1985年11月29日　古巴　哈瓦那

第二届“维护拉美各国主权”知识分子大会

美洲之家。在第二届知识分子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在场的有：弗雷·贝托、埃内斯托·卡德纳尔、胡安·博什、丹尼尔·比列蒂、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和其他三百多名拉美知识分子。

我常问自己：我们为何要召开知识分子大会？除了极个别的会议在我们的时代确有其历史意义，如一九三七年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召开的那次，其余大部分都只是聚众消遣，华而不实。然而，奇怪的是，世界危机越严重，会议就越多，规模就越大，成本也越高。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年便能招来近两千封邀请函，邀他出席各种形式的作家大会、艺术节、座谈会、讲习班，地点遍布全球，每天至少三场。有个机构，会议频仍，费用全包，一年之内就换了三十一个地点轮流召开，有罗马、阿德莱德这样令人垂涎的城市，有斯塔万格、伊韦尔东这样令人惊讶的城市，还有些城市的名字——波利法尼克斯、科诺克，简直能做填字游戏。会议多如牛毛，议题也多如牛毛，以致去年，在阿姆斯特丹的莫伊登城堡召开了世界诗歌大会组织者会议。知识分子只要愿意，可以在会议上出生，在会议上成长、成熟——除了赶场之外，绝无中断——直至在此生的最后一场会议上死亡。这不是危言耸听，绝对可行。

然而，想改变自平达罗[1]为古代奥运会唱赞歌以来，文化艺术家们早已养成的习惯，恐怕为时已晚。当年，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处得比现在融洽，运动场上，诗人的声音与田径运动员的成绩同样受人尊敬。而自公元前五〇八年起，罗马人就预见到，运动会若召开得太多，危害就会太大。那几年，设立了百年运动会，后来又设立了特伦蒂诺斯运动会，每一百或一百零三年举办一次，今天看来，实为典范。

至于文化聚会，早在中世纪就已出现。辩论赛、诵诗会、赛诗会，后来是诵赛诗会，开创了至今仍令人深受其害的传统：以比赛开场，以吵架结束。这些聚会曾盛极一时，路易十四在位期间，开幕式上的宴会气派非凡：十九头牛、三千块蛋糕、两百多桶葡萄酒。我发誓，今日重提此事绝非鼓励效仿。

最著名的诵赛诗会是图卢兹诗会，始于六百六十年前，经世不辍，是迄今开设最早、历时最久的诗会。创始人克莱门西亚·伊绍拉美丽动人，聪慧进取。唯一的问题是似乎并没有这个人，她只是创立比赛的七位行吟诗人为防普罗旺斯诗歌湮灭无闻的凭空杜撰。克莱门西亚·伊绍拉的不存在更加印证了诗歌的创造力，图卢兹有安葬她的金色教堂、以她名字命名的街道和专门缅怀她的纪念碑。

说了这么多，我们也该问问自己：来这里干什么？尤其是我，一个一向视演讲为畏途的人，高坐在这讲台上干什么？回答不敢，但可以向大家提个倡议：我们要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大会所不为——求务实、求延续。

这次会议的确与众不同。与会的除了作家、画家、音乐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有知名科学家。换言之，我们敢将科学与艺术混为一谈，将预言与实证，古往今来都势不两立的灵感与实验、直觉与理智相提并论。圣- 琼·佩斯[2]在他令人难忘的诺贝尔文学奖领奖辞中说：“科学家也好，诗人也罢，应该表彰的都是他们思想的无私。”至少在这儿，他们不再为敌，面对同样的奥秘，他们发出同样的追问。

科学只与科学家有关的想法本身是反科学的，正如诗歌只与诗人有关的想法反诗歌。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表述不清，祸害不浅，让人误以为科学、教育、文化是三码事——但其实是一码事。文化是创造力的总称，是人类智慧的社会成果，雅克·朗[3]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便是一切。”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共同的家。

我只想为这三天的精神归隐冒昧提几点思考。首先，我想提醒各位，又或许用不着提醒，各位早已明白：二十世纪末的任何中期规划都是二十一世纪规划。新世纪近在咫尺，拉美和加勒比人却将有如之前错过二十世纪一样，只受其苦，未得其乐。二〇〇一年来临时，全球将有一半人欢庆旧千年的结束，而我们才初享工业革命的成果。下个世纪，我们的命运将掌握在今天的小学生手中。有每秒运算十万次的电脑，他们却还像远古时代那样，只能扳着指头数数。更糟的是，在这一百年里，我们还丧失了十九世纪最可贵的美德：狂热的理想主义和对感情的重视，对爱的恐惧。

下一个千年的某一刻，基因学将使人长生不老，电子智能将创作出全新的《伊利亚特》，俄亥俄州或乌克兰的一对情侣将人在月球，心系地球，在地球光的照耀下，在花园暖房中坠入爱河。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仍将为现实所困：地质灾害、政治动荡、社会动乱、日常生

计，以及种种依附、穷困和分配不公，让我们无暇吸取昨日教训，思索明天的计划。阿根廷作家罗道尔夫·特拉格诺总结道：“我们也使用X光和晶体管收音机、冷阴极管和电子录像带，却从未将当代文化的基础吸收进我们的本土文化。”

幸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还有一项决定性的储备，那是一种足以改变世界的能量，即，危险的国民记忆。它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作为一项最早的多功能原材料，时刻陪伴在我们左右。它是一种抵抗文化，藏在语言的角落里，体现在手工业者的保护神、民众抵抗殖民教会所创造的真正奇迹——黑白混血的圣母像上。它是一种团结文化，面对累累罪行不屈不挠，为了主权身份揭竿而起。它是一种抗议文化，庙宇中手工打造的天使长着印第安人的脸庞，积雪之歌中苦苦祈求的是死神无声的力量。它是一种日常文化，体现在厨艺、服饰、独具特色的迷信和私密的爱情仪式里。它是一种欢庆、离经叛道、神秘莫测的文化，能够挣脱现实的束缚，化解理智与想象、言语与表情之间的矛盾，证明任何观念迟早都会被生命超越。这种力量来源于我们的落后。这种美丽新颖的能量，注定只属于我们，而我们有它便已足够。无论帝国主义如何贪得无厌，政府压迫如何粗暴残忍，心底梦想如何难以启齿，我们都不会屈服。革命也是一种文化产物，是志向与创造力的宣泄，要求我们、同时也让我们有理由去相信未来。

如果我们至少能找到新的方式，组织引导民众排山倒海的创造力，加强创造者之间的团结与交流，对创造出的作品赋予历史延续性以及更广的社会实用性，推动“精神创造”这一最神秘、最孤独的行业发展，那么，这次会议就比世界上每天举办的其他会议胜出一筹，贡献卓著。新千禧年即将到来，政治决策刻不容缓，让我们告别作为“局外人”的五个世纪，坚定不移地迈入新世纪。

[1] 平达罗（Pindaro，前518—前438），古希腊诗人，其诗作曾被选作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胜利者赞歌。

[2] 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1887—1975），法国诗人，196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3] 雅克·朗（Jack Lang，1939— ），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文化部长和教育部长。

达摩克利斯之剑

1986年8月6日　墨西哥　伊斯塔帕-锡瓦塔内霍

六国集团第二届峰会

在六国集团（阿根廷、墨西哥、坦桑尼亚、希腊、印度和瑞典）为应对核威胁而召开的和平与裁军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各国元首均出席了会议：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乌尔塔多、希腊首相安德里亚斯·帕潘德里欧、瑞典首相英瓦尔·卡尔松、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和坦桑尼亚总理朱利叶斯·尼雷尔。

最后一声爆炸。一分钟后，人类死亡大半，陆地浓烟滚滚，灰尘蔽日，世界重新陷入混沌。冬日，下着橙色的暴雨，刮着寒冷的飓风。海洋上气候颠倒，陆地上江河倒流。鱼儿在沸水中渴死，鸟儿找不到天空。积雪覆盖撒哈拉沙漠，冰雹砸毁广阔的亚马逊雨林，一把将它从地图上抹去。地球从摇滚乐与心脏移植的时代重归早期冰河时代。灭顶之灾于黑色星期一下午三点降临，有特权躲进防空洞的人和极少数幸存者只是暂时保住性命，之后还是会因恐怖的记忆而死去。万物毁灭，潮气漫天，黑夜无尽，唯一活下来的只有蟑螂。

总统们，首相们，朋友们:

我无意效仿使徒约翰流放拔摩岛时的胡言乱语[1]，只想提前描绘一下也许在此时此刻就会降临的宇宙灾难。世界强国弹药库里时刻高度警备的核弹药只要有意无意地爆炸那么一点，宇宙灾难便会即刻降临。

这是真的。在今天，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全球共部署了五万多枚核弹头。通俗一点讲，这意味着每个人——包括儿童在内——都坐在一只四吨重的火药桶上，这些弹药可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毁灭十二次。如此巨大的杀伤力，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理论上还能将围绕太阳公转的其他四个星球也一并毁灭，危及太阳系平衡。任何科学、艺术或其他工业都不可能像核工业那样，诞生区区四十一年，便以几何级数飞速发展。人类智慧的任何其他创造也都不可能像核工业那样，可以主宰地球的命运。

寥寥数语勾勒出的恐怖场景，如果说还能给我们留下一丝一点的安慰的话，那就是，在这个地球上，保护生命依然比制造核瘟疫的成本要低。然而，最富裕国家的地下核弹药库已足以制造出《启示录》中的可怕场景，人民的生活却因此而改善无期。

儿童方面。这笔账用小学算术就能算清。一九八一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制定了一项计划，旨在解决全球五亿最贫困儿童的最基本问题，包括基础医疗，基础教育，改善卫生条件，提供食品及饮用水，共需美金一千亿。听起来像做梦，不可能办到。然而，制造一百架B-1B战略轰炸机和不到七千枚的巡航导弹就要花掉美国政府二百一十二亿美金。

健康方面。美国政府计划在二〇〇〇年前建造十五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其中十艘的成本便足以在这十四年间实施疟疾预防计

划，使十多亿人免罹病痛，挽救一千四百多万非洲儿童的生命。

粮食方面。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计算，去年，全球共有五亿七千五百万人忍饥挨饿，以平均热量计，他们总共需要摄入的能量，成本还不到一百四十九枚MX导弹，而西欧正打算安置二百二十三枚。二十七枚MX导弹即可帮助贫困国家购买今后四年所需的农业器械，确保足够的粮食收成。该计划的花费还不到一九八二年苏联军费预算的九分之一。

教育方面。只需美国政府计划建造的二十五艘三叉戟核潜艇中的两艘，或苏联正在建造的台风级核潜艇中的两艘，全球扫盲便可最终实现。此外，今后十年内第三世界所需建造校舍、培养师资的费用，用二百四十五枚三叉戟II型核导弹就足以支付，余下的四百一十九枚可再支付十五年的教育投入。

最后，取消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切外债，确保十年内经济复苏，只需全球军费十年支出的六分之一多一点就能达成。除了大量的财力耗费，人力的耗费更让人痛心：军事工业网罗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人才队伍，其他行业望尘莫及。我们的人才不应该在那儿，而应该在这儿，在这张桌旁。把他们从那些位置上解脱出来，才能帮我们在教育界、司法界寻求摆脱野蛮的唯一方式：创造一种和平的文化。

尽管形势严峻，危害确凿，军备竞赛却一刻也未停止。就在吃午饭的这会儿，又造好了一枚新的核弹头；明早一觉醒来，富国的核弹药库里又会多出九枚核弹头。只需一枚，便能把尼亚加拉瀑布喷成檀香味儿，哪怕只香秋天一个周日。

当代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曾有过这样的疑问：地球是否会成为其他星球的噩梦？也许，地球只是一座从造物主手中滑落、遗留在广袤宇宙的远郊、失去记忆的村落，它没那么伟大。然而，我们越来越相信，它是太阳系唯一存在奇妙的生命活动的星球。这无情的现实令我们得出沮丧的结论：军备竞赛与智慧背道而驰。

军备竞赛不仅有悖人类智慧，也有悖连诗歌都无法捕捉其意图的自然本身的智慧。自地球出现生命以来，经过三亿八千万年，才开出一朵仅供欣赏的玫瑰花；又经过四个地质代，人类才使自己有别于祖先直立猿人，唱歌比鸟动听，懂得为爱而死。在科学的黄金时代，想按个按钮，就让苦苦走过几亿年的星球回到起点，对人类智慧而言，极不光彩。

今日我们相聚一堂，声援无数呼吁无核世界、公正和平的人，以防噩梦成真。不过，即使噩梦成真，我们今日的相聚也绝非徒劳无功。大爆炸后的几万万亿年，一只高歌凯旋的蝾螈将重新走上生物进化的道路。或许，它会被加冕为新世界里的绝代佳人。届时，出席加冕仪式的嘉宾是否会和我们此刻一样胆战心惊，这取决于我们：科学界、文学界、艺术界的人士，充满智慧、爱好和平的人士。在这儿，我下定决心，斗胆提议，此时此刻，让我们设计建造一艘能躲过核灾难的记忆方舟，往时间的海洋里扔一只漂流瓶，让新人类了解蟑螂无法传递的信息：这里有过生命。我们曾饱经磨难，忍受不公，但我们也曾体验过爱，甚至幻想过幸福。我们要让生活在所有世代的人知道：灾难由谁造成；是谁对我们的呼吁充耳不闻，无视我们对美好和平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又是什么混账发明，出于什么龌龊的利益，让我们在宇宙间消失。

---

[1] 典出《新约》，约翰被罗马王放逐到希腊拔摩岛，在那里完成《启示录》，描绘了世界末日的景象。

无法摧毁的信念

1986年12月4日　古巴　哈瓦那

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总部，EICTV学校揭幕式

基金会总部位于马里亚瑙的一座老宅——圣芭芭拉别墅。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会长身份，在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国际影视学校（EICTV，俗称“三个世界学校”）的揭幕式上发表讲话。

一切要从门口那两座高压线塔说起。两座可怕的塔，两只蛮不讲理的水泥长颈鹿。一位无情寡义的官员事先没跟屋主打招呼，便下令将它们建在屋前花园。此时此刻，一亿一千万伏的高压正从我们头顶经过，足以为一百万台电视机或两万三千台三十五毫米电影放映机供电。消息惊动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六个月前，他亲临现场视察，看看有没有什么补救之法，我们这才发现，我们魂牵梦绕的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可以设在这里。

高压线塔还在那儿，房子越修越美，它们自然就被越衬越丑。我们试过用棕榈和花枝遮掩，可它们实在太丑，怎么也遮不住。要想反败为胜，办法只有一个：别当它们是高压线塔，就当是两座无可救药的雕塑。

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的总部在此地定居之后，我们才知道，这座房子的历史既非自这双塔而始，也不会因它们而终；而且，与这房子有关的许多故事都既非真实，亦非虚假——它们是电影。各位想必都看得出，托马斯·古铁雷斯·埃雷阿在这里拍摄过《幸存者》。如今，电影完成八年，古巴革命胜利二十七年。影片中的画面既非幻想世界中的真实，也非古巴历史中的谎言，而是真实与虚构间的第三种现实——电影现实的一部分。

很少能有这么合适的房子让我们起程，迈向拉美电影融合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么单纯，就是这么狂妄。单纯固然不会招来批评，但头一年便口出狂言定会招来指责。今天是圣芭芭拉日，基金会恰好成立一周年，巧得很，这房子原本也叫圣芭芭拉。

下周，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将从古巴政府得到一项捐赠，对此，我们感激不尽。感激古巴政府前所未有的慷慨，让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名不见经传的电影人。我所说的这项捐赠，就是用当今最好的技术、为亚非拉培养专业人才的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国际影视学校。学校仅八个月就已落成，各国教师也已招募完毕，还录取了一批学生，今日大多在座。校长费尔南多·比利向来实事求是，前不久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对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说，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一所影视学校”。

办校自然是基金会工作的重头戏，但并非唯一要做的事。培养出专业人才，却无事可干，岂非花大代价增加失业人口？因此，在这头一年里，我们已开始为拉美影视业的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首批工作如下：

与独立制片人合作，制作了两部故事片、三部纪录片，均由拉美导演执导；五集电视剧，每集一小时，独立成篇，由拉美五个不同国家的影视剧导演执导。

近日正组织选拔，帮助拉美年轻电影人制作或完成影视剧。

争取在拉美各国乃至欧洲一些国家的首都开设专门的电影放映厅，常年放映拉美各时期电影，并做相关研究。此项目已正式进入运行。

每年在基金会拉美各国分会组织电影爱好者竞赛，挖掘人才，为国际影视学校选拔学生。

研究拉美影视现状，建立拉美电影视听信息库和首个第三世界独立影片资料馆。

撰写拉美电影史，编纂西班牙语影视词典。

由基金会墨西哥分会负责，以国别为单位，收集有关拉美新电影的重要文献资料。

在哈瓦那电影节期间，号召拉美各国政府及电影机构修正其国内的国产影片保护法，因其中不少条文与拉美电影融合的宗旨背道而驰。

一九五二年至五五年间，在座的四位——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胡利奥·加西亚·埃斯皮诺萨、拉丁美洲新电影教皇费尔南多·比利、杰出的艺术家托马斯·古铁雷斯·埃雷阿和一心想做电影导演却一直没做成的我，同在罗马电影实验中心学习。从那时起，我们就像今天这样，讨论拉美该做什么样的电影，又该怎样去做。我们都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中汲取灵感，一致认为那种我们一直没有尝试过的低成本、人性化的电影值得效仿。尤其是，从那时起，我们都意识到，真要做拉美电影，就要走融合之路。三十年后的今天下午，来自拉美各

国、各年龄段的人们还在如痴如醉地讨论着同一个话题，这又一次证明，无法摧毁的信念能够压倒一切。

在罗马的那段日子，我去摄制组帮过忙，平生唯一一次。学校选我在影片《可惜是个坏女孩》中担任亚历桑德罗·布拉塞蒂导演的第三助理，让我欣喜若狂。有机会使个人得到锻炼固然可喜，但更可喜的是，有机会见到女主角索菲亚·罗兰——虽然其实根本见不着：一个月里，我的工作就是在街角拉警戒线，不让好奇者闯入。不凭写小说换来的那些名声，就凭我好歹当过第三助理，从未当过一家之主的我斗胆在这个大家庭里当个会长，代表电影界的众多有识之士说两句话。

这里是你们的家，所有人的家。现在只缺一块醒目的招牌，写上紧急通告：“接受捐赠”。赶紧去挂。

新千年的序言

1990年3月4日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想象与虚构：1914- 1989，拉丁美洲绘画75年”画展开幕式

画展由委内瑞拉批评家罗伯托·格瓦拉编排设计，米拉格罗斯·马尔多纳多组织协调，加拉加斯美术馆展出。演讲作为序言，被收入展览画册。

参展的有：哥伦比亚的安东尼奥·巴雷拉和阿尔瓦罗·巴里奥斯，古巴的何塞·贝迪亚，巴西的西伦·佛朗哥，墨西哥的胡利奥·加兰，阿根廷的吉列尔莫·奎特卡，古巴的安娜·门迭塔，委内瑞拉的“小鸟”胡安·文森特·埃尔南德斯和潘丘·基利西，波多黎各的阿纳尔多·罗切，巴西的“老马”安东尼奥·何塞·德梅略·莫乌拉奥和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塞尔帕。

这个胆大妄为的画展开幕之时，正值人类求变的历史性时刻。三年前，米拉格罗斯·马尔多纳多起意组织画展时，世界还在这行将就木的千年里最糟糕的百年之一——二十世纪的阴影中徘徊。互不相容的教义，实用主义的想法，写在纸上，却进不了我们的内心。总以为我们正如火如荼地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不料何处刮来一阵大风，将泥足的巨人吹出了裂缝，提醒我们，不知何时，路走错了。但是，别以为这条路会越走越黑，相反，它会越走越亮，迎来一个思想彻底解放、无人约束、自我做主的新世界。

一四九二年，当一队欧洲航海者在前往印度的途中与这片土地不期而遇时，我们生活在前哥伦布时代的祖先也许有过与我们今天类似的经历。远祖们不识火药与指南针，却识鸟语，能用脸盆预知未来。也许当年，他们仰望浩瀚星空，早已猜到了地球就像橙子那样圆。他们对今天的学问一无所知，可他们善于想象。

于是，他们用黄金国的传说抗击侵略者。声称在那个神奇的国度，国王浑身涂满金粉，在圣湖中洗浴。侵略者问怎么走，他们五指张开，随手一指：“从这儿，转那儿，再往那儿。”路越指越多，混乱一团，错误不堪，永远都要再往前一点点，再往那儿一点点，再过去一点点，没有办法记认。贪婪的探险者们迷失了回程的路。黄金国没人找到过，没人见到过，因为它就没存在过。然而，它的诞生，宣告了中世纪的结束和一个伟大时代——文艺复兴的开始。社会变化之大，从名称一望便知。

五个世纪后，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留下足迹，人类又一次为之震动。另一个新时代到来了！当时，我们正在西西里南部的潘泰莱里亚荒岛上度假，盯着电视上那只神秘的脚在月球表面一通乱探，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我们是两对拉美夫妇，带着孩子，外加两对欧洲夫妇，也带着孩子。紧张的等待过后，那只对月球来说属于外星人的脚终于落在了冰冷的浮土上，节目主持人说出了那句几世纪前就想好的话：“终于，人类首次踏上了月球。”见证历史，大家都有些飘飘然，只有拉美孩子异口同声地问：“才首次？胡说八道！”之后就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房间。对他们来说，凡想象过的（如黄金国），都发生过。征服太空这种事，他们在摇篮里就想象过，当然早就发生过。只有拉美的儿童会这样。

在不远的将来，将再没有白纸黑字的预言，也再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许多事昨天是真的，明天未必就是。也许，形式逻辑学会退化成课本上的陈旧观念、错误典型。也许，当今社会复杂尖端的通讯科技会简化为传心术。那将是文化尚古主义的世界，基本的工具是想象。

我们将迈入拉丁美洲时代。创造性的想象是新世界最丰富、最必需的基础材料，而拉丁美洲是它的第一生产者。今天，这里有一百名想入非非的画家，他们的一百幅作品不仅生动展示了拉丁美洲的现状，还对这片有待发现的大陆做出了伟大的预测：这里的死神会败在幸福手下，这里的生活会永远更加太平，时间更充裕，身体更健康，食物更热乎，伦巴更柔美，一切会更好。一句话：会有更多的爱。

我不在这里

1992年12月8日　古巴　哈瓦那

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放映厅揭幕式

格劳贝尔·罗沙[1]放映厅是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总部的文化设施。放映厅也兼文化中心，除放映电影外，还举办讲习班、国内会议和国际会议，上演舞台剧、舞蹈表演及室内音乐会。

今天上午，我在欧洲的一份报纸上读到我不在这里。我不奇怪，因为我以前还听说过我卷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送给我的家具、书籍、唱片和官邸藏画，并通过使馆设法将一部拙劣的反古巴革命的小说原稿带离了古巴国境。

在座的各位刚才不知道，现在总该知道了。这就是今天下午我不能在这里为放映厅揭幕的原因。这间放映厅，就像电影本身（以及所有的电影人）一样，也许不过是个视觉幻象。它让我们如此担惊受怕、忐忑不安，时至今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五百年一个月零二十六天，我们依然不敢相信：梦想成真，它建成了。

历史上诞生过的奇迹数不胜数，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当属令人瞩目的科学发展。那是另一个照进现实的伟大梦想，电影从未有过这么优秀能干、乐于助人的邻居。当放映厅遇到困难、落成无望时，他们来敲我们的门，雪中送炭，不求回报。今天，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投

桃报李，与古巴科学界的朋友共同分享这一刻，相信，我们会有很多的共同语言。这说法一点也不新鲜。圣- 琼·佩斯在他精彩的诺贝尔文学奖领奖辞中就论证过，科学与艺术是如何溯本同源，异曲同工。你们瞧，我不在这里，能说的话也不少。说不定，经此盛事鼓舞，我还会高兴地把卷走的家具、书籍和手稿运回来。希望托里拆利定律能帮我们从别处搬来几块基石，多做几件这样的好事。

---

[1] 格劳贝尔·罗沙（Glauber Rocha，1939—1981），巴西导演、编剧、演员。

恭祝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1]七十大寿

1993年2月18日　哥伦比亚　波哥大

祝寿会在何塞·亚森松·席尔瓦[2]诗社举行。哥伦比亚前总统贝坦库尔出生于2月4日，提议为他祝寿的有：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阿尔瓦罗·穆蒂斯、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赫尔曼·阿西涅加斯、赫尔曼·埃斯皮诺萨、阿维拉多·福雷罗·贝纳维德斯、埃尔南多·巴伦西亚·戈埃尔克、拉斐尔·古铁雷斯·希拉多特、安东尼奥·卡瓦列罗、达里奥·哈拉米略·阿古德洛以及诗社主席玛丽亚·梅塞德斯·卡兰萨。

有一次，我算错了时差，凌晨三点往总统府打电话，结果还是总统亲自接的，让原本就失礼的我更觉慌张。“别担心，”他声若洪钟地对我说，“摊上这么个苦差事，我还真没别的点儿能读诗。”原来，位高权重的共和国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当时正在趁报纸没到，没被俗事困扰、忙得焦头烂额之前，重读堂佩德罗·萨利纳斯[3]的数学诗。

九百年前，伟大的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在与敌方交战之际，也曾夜不能寐，挑灯创作放荡不羁的讽喻诗和美好浪漫的爱情诗。亨利八世毁过珍稀书库，砍过托马斯·莫尔的脑袋，却也有作品被收入伊丽莎白时代的文集。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帮普希金改诗，免得他通不过自

己严格施行的书刊审查制度。历史没有对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如此绝情，因为与其说他是一名热爱诗歌的统治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位受到命运捉弄、饱尝了权位之苦的诗人。诗歌是他一生的志向，曾害他十二岁就在亚鲁马尔中学栽过大跟头。事情是这样的：贝利萨里奥当时被rosa、rosae、rosarum[4]烦得够戗，即兴赋诗一首。没念过克维多，诗句中却有明显的克维多痕迹；没念过冈萨雷斯，八音节诗倒也做得四平八稳。

主啊，主啊，求求你，
让拉丁文老师
遭天打雷劈吧！
我们会一直求下去。

第一个遭天打雷劈的是他自己——当场开除。上帝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否则，我们怎么能在这里祝贺哥伦比亚领袖的七十大寿?

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不出当年我们将诗歌置于何等崇高的地位。我们不说高中一年级，而说文学一年级；虽然也学了化学、三角，但学位还是文学。在我们这些外省人眼里，波哥大不是首都，不是政府所在地，而是冷冷细雨中，诗人的住所。我们相信诗歌，更坚信——如路易斯·卡多索-阿拉贡所说——它是人类存在的唯一实证。因为诗歌，哥伦比亚落后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才迈入二十世纪。那种激情四溢的狂热无处不在。掀开地毯，想用扫帚把垃圾扫进去，不行，那儿有诗歌；翻开报纸，哪怕是经济版、法制版，那儿有诗歌；咖啡杯里的残渣，写着我们的命运，那儿有诗歌；就连汤里都有[5]诗歌，爱德华多·卡兰萨[6]就找到过："双眼透过汤中冒出的居家天使凝望。"豪尔赫·罗哈斯[7]精妙绝伦的杂感文字中也有："美人鱼不张腿，因她只有带鳞

的鱼尾。”[8]丹尼尔·阿朗戈[9]也曾将“生存价值之完美体现”这样一句完美的十一音节诗潦草地写在食品店的玻璃橱窗上。连公厕便池中都藏着它，那是罗马人说的：“不惧上帝，要怕梅毒。”常常，我们怀着儿时去动物园的敬畏，前往黄昏时分常有诗人聚会的咖啡馆。大师莱昂·德格雷夫[10]教大伙儿输了棋不气恼、对帅小伙儿不手软，尤其在言语上不气短。当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和一群安蒂奥基亚地区的毛头小伙子一起，戴着蝙蝠式的宽檐毡帽，穿着中世纪学者长袍，神气十足地离乡闯荡时，波哥大就是这样一座城市。他来这儿，就是要去诗人聚集的咖啡馆。在那里，他如鱼得水，如鸟投林。

后来，他开始忙得不可开交。再后来，大家都知道，他当上了共和国总统，日理万机——那也许是他对诗歌的唯一一次背叛。哥伦比亚没有哪个总统像他那样，需要同时处理使人家破人亡的地震、伤亡惨重的火山爆发和两场血雨腥风的战争。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在一个多世纪前，人们还在为了生存自相残杀。我以为，他之所以能一一化解这些危机，不仅凭借其卓越的政治胆识——这当然不在话下——更仰赖他身为诗人战胜困境的超凡能力。

贝利萨里奥活了七十岁，终于丢掉形形色色不肯以诗人自居的借口，对一份青年杂志袒露心声，实可谓古稀之年，不失体面地重焕青春的美好方式。因此，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好友聚会选在诗社再合适不过，尤其是在这个依然能听见何塞·亚森松清晨蹑手蹑脚、倾听玫瑰花语的诗社。今天，许多热爱贝利萨里奥的朋友又相聚在这里。贝利萨里奥没当总统前，我们爱他；他当总统时，我们同情他；如今他无职无权、无欲无求、自在洒脱，我们更爱他。

---

[1]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Belisario Betancur，1923— ），哥伦比亚政治家，1982年至1986年间任哥伦比亚总统。

[2]何塞·亚森松·席尔瓦（José Asunción Silva，1865—1896），哥伦比亚诗人，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者之一。

[3]佩德罗·萨利纳斯（Pedro Salinas，1891—1951），西班牙“二七年一代”诗人，曾将数学符号融入诗中，创作出别具一格的数学诗。

[4]拉丁语中“玫瑰”一词的名词变格。

[5]此处原文为hasta en la sopa，原意为“连汤里都有”，引申义则为“无处不在”。

[6]爱德华多·卡兰萨（Eduardo Carranza，1913—1985），哥伦比亚诗人。

[7]豪尔赫·罗哈斯（Jorge Rojas，1911—1995），哥伦比亚诗人。

[8]杂感（greguería）是一种短小精悍、恢谐幽默的文体，往往也是一种文字游戏。此句也可理解为“美人鱼不张腿，因她心存疑虑”。

[9]丹尼尔·阿朗戈（Daniel Arango，1921—2008），哥伦比亚作家。

[10]莱昂·德格雷夫（León de Greiff，1895—1976），哥伦比亚诗人。

我的朋友穆蒂斯

1993年8月25日　哥伦比亚　波哥大

阿尔瓦罗·穆蒂斯七十大寿

哥伦比亚总统府纳里尼奥宫，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好友阿尔瓦罗·穆蒂斯七十大寿寿宴上的演讲，当时，总统塞萨尔·加维里亚授予穆蒂斯博亚卡十字勋章。2007年11月26日，在第二十一届瓜达拉哈拉书展上，哥伦比亚作为主宾国，前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经坐在一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意”，再次宣读该文章，向阿尔瓦罗·穆蒂斯致敬。

阿尔瓦罗·穆蒂斯跟我说好，绝不在公共场合谈论对方，好也不说，坏也不说，免得互相吹捧。然而，整整十年前，就在这个地方，就因为不喜欢我给他推荐的理发师，这好好的有益社会健康的约定生生被他撕毁。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伺机报复，今天这机会再好不过。

当时，阿尔瓦罗说起一九四九年，贡萨洛·马利亚里诺是怎样在恬静宜人的卡塔赫纳介绍我们俩相识的。我也一直以为那确实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直到三四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听他随口聊了几句费利克斯·门德尔松，让我猛然回想起大学时光。当时，我们几个同学没钱去咖啡馆学习，只好逃到波哥大国家图书馆鲜有人光顾的音乐厅。在下午那些屈指可数的听众里，我特别讨厌一个长着传令官的鼻子、土耳其人的眉毛、像水牛比尔一样身大脚小的人。他总是四点来，也总爱

点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十年后，直到那天下午，在他墨西哥城的家中，我才突然认出他那洪亮的嗓门、孩子般的小脚、抖抖索索连斗大的针眼都穿不过去的双手。“真见鬼，”我垂头丧气地说，“那人居然是你！”

我唯一遗憾的是，旧恨难平，却不能秋后算账。时光无法倒流，毕竟，我们一起欣赏过那么多乐曲。因此，尽管学识渊博的他居然对波莱罗[1]没有丝毫感觉，我们也没有分道扬镳，还是朋友。

阿尔瓦罗干过各种各样奇怪的行当，遇险无数。十八岁那年，他在国家电台当主播，节目中随口胡诌了几句，被一个爱吃醋的丈夫听成给他妻子打暗号，提着枪在街角埋伏。后来，总统府一次正式活动，两位耶拉斯总统的名字被他弄混了，颠来倒去地叫了半天。再后来，身为公共关系专家，他却在慈善会上放错了电影。原本应向社会上广发善心的太太们播放一部反映孤儿生活的纪录片，却被他放成一部修女与士兵乱搞一气，还有个漂亮名字叫《种植橙树》的色情片。此外，他还在航空公司做过公关部主管，后来那间公司在最后一架飞机坠毁后关门大吉。他工作的时间都花在认尸、通报死者家属、接待媒体上。家属毫无思想准备，本以为喜事临头，开门一见是他，惨叫一声倒地。

后来的工作稍好了一些，为了从巴兰基亚的一家酒店搬出世界首富的华美遗体，他在街角的殡仪馆紧急采购了一具棺材，装好后立在员工电梯里运下楼。侍应生问棺材里装的是谁，他说是“主教大人”。他在墨西哥的一家餐馆大声说话，邻桌的以为他是电视剧《铁面无私》里的沃尔特·温切尔[2]（阿尔瓦罗给他配过音），就扑上去要揍

他。他在拉美推销了二十三年电影，行程加起来绕地球转了十七圈，依然本性不改。

而我最欣赏他的，是他教师般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一心想做教师，却因为热衷台球这个不良嗜好，从未如愿。我所认识的作家中，没有谁像他那样关心他人、尤其乐于提携后辈的。他煽动年轻人违背父命，投身诗歌，用禁书毒害他们，用巧舌迷惑他们，鼓励他们闯荡世界，坚信在这世上做一个诗人还不至于饿死。

这么难能可贵的品质，最大的受益人是我。我说过，是阿尔瓦罗带给我第一本《佩德罗·巴拉莫》[3]，还对我说：“拿着，好好学学。” 他没想到，这么做等于自掘坟墓。读完胡安·鲁尔福，我不仅学会用另一种方式写作，还总备个故事，专用来搪塞别人。写《百年孤独》的时候，我的这种自救方式，绝对的受害人恰恰又是阿尔瓦罗·穆蒂斯。那十八个月里，他几乎夜夜登门，让我跟他说写了什么。尽管我说的是另一个故事，但依然能从他的反应中获得启发。他兴致勃勃地听，添油加醋地四处宣扬。之后，他的朋友们又把他讲的故事讲回给我听，我从中又汲取了不少养分。初稿完成后，我送到他家。第二天，他怒气冲冲地给我打电话。

“您让我在朋友面前没法儿做人，”他冲我嚷嚷，“这玩意儿跟您讲的不是一回事。”

从那以后，他总是我作品原稿的第一个读者，见解犀利，忠言逆耳。因为他，我最起码将三个短篇束之高阁。我也说不清我的作品里究竟有多少他的成分，但一定不少。

别人常问我，这年头，人心叵测，我们俩的友谊为何能天长地久。原因很简单：阿尔瓦罗和我为了做朋友，很少见面。尽管我们在墨西哥城一起住了三十多年，几乎算得上是邻居，但在那儿我们很少见面。我想见他，或他想见我的时候，得先电话联系，确定彼此都有见面的意愿。只有一次，我违背了这条基本原则，而阿尔瓦罗当时的表现，足以说明他是个什么样的朋友。

事情是这样：那天晚上龙舌兰酒喝多了，我和另一位好友凌晨四点去敲阿尔瓦罗独居的公寓大门。他睡眼惺忪地把门打开，我们俩二话不说，从墙上取下一幅珍贵的一点二米长、一米宽的博特罗[4]油画，抬了就走，然后胡乱糟蹋一通。对这次入室抢劫，阿尔瓦罗事后只字未提，也从未打听过那幅画的下落。而我也直到他今天迈入古稀之年，才说出内心的愧疚。

维系友谊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在一起时，多半在旅行，大部分时间都忙着应酬别人、处理其他事，不到万不得已，顾不上对方。对我而言，在欧洲公路上与他共度的无数时光相当于在大学补念了人文艺术专业。在巴塞罗那到普罗旺斯的艾克斯三百多公里的路上，我学到了有关阿维尼翁教皇与清洁派教徒的知识。去亚历山大、佛罗伦萨、那不勒斯、贝鲁特、埃及、巴黎，也都有同样的收获。

然而，疯狂旅行中，我也上过最让人琢磨不透的一堂课。当时，我们正穿越比利时的田野。十月里，雾蒙蒙的，刚被弃置的露营地里散发着人的粪便味。阿尔瓦罗开了三个多小时车，破天荒地一句话没说。突然，他冒出一句：“孕育伟大的自行车手与猎手的国度。”他从未解释过自己到底想说什么，但承认他体内有个毛茸茸、流口水的大

傻子，正式会见也好，总统官邸也罢，一不留神就溜出来说几句。写作时也得管着，这傻子疯得厉害，又踢又跳，总想篡改书稿。

但这所流动学校留给我最美好的回忆还不是课堂，而是课间。在巴黎等候夫人们购物时，阿尔瓦罗就往远近驰名的咖啡馆门前台阶上一坐，仰面朝天，翻出白眼，大手一伸，作乞讨状。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用地道的法国方式尖刻地对他说："穿羊绒衫讨饭，脸皮真厚。"可他还是给了一法郎。不到一刻钟，阿尔瓦罗就净挣四十法郎。

在罗马的弗朗西斯科·罗西[5]家，他用自创的意大利语，其中没有一个真正的意大利语单词，滔滔不绝地描述了自己在金迪奥的恐怖遭遇，迷住了意大利影视文化精英费里尼、莫妮卡·维蒂[6]、阿莉达·瓦莉[7]和阿尔贝托·莫拉维亚[8]，让他们津津有味地听了好几个小时。在巴塞罗那的一家酒吧，他用巴勃罗·聂鲁达灰心丧气的语调朗诵了一首诗，有个听过聂鲁达声音的人以为他就是聂鲁达本人，居然向他索要签名。

他写过一句诗："我知道，我永远去不了伊斯坦布尔。"读得我心惊肉跳。这首诗对于一个无可救药的君主制国家来说相当怪异，人家不叫伊斯坦布尔，只叫拜占庭，好比早在被历史证明其正确性之前，我们就一直只叫圣彼得堡，不叫列宁格勒一样。我也不懂为什么老觉得应该把诗里提到的去伊斯坦布尔变为现实。终于，我说动了他，一起坐船去，坐的是慢船，挑战命运时，得不慌不忙。在那儿待了三天，我老担心那诗句成谶，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直至今日，阿尔瓦罗已是年届七十的老人，而我还是六十五岁的孩子这一天，我才敢说：当年去伊斯坦布尔，我不是为了打败诗歌，而是为了挑战死神。

我以为自己就要一命呜呼的那次旅途，阿尔瓦罗也在身旁。当时，我们正驾车在明丽的普罗旺斯疾驰，突然，一位司机逆向行驶，发疯似的冲了过来。我只好往右猛打方向盘，根本来不及去看我们会摔在什么地方。刹那间，我有种奇妙的感觉，方向盘飞在空中，完全不听我使唤。一向坐在后排的卡门和梅塞德斯屏住呼吸，直到车子像孩子一般摔进春季葡萄园旁的排水沟。那一刻，我唯一记得的是副驾驶座上阿尔瓦罗的神情。摔落前，他看了我一会儿，满脸同情，似乎在说："瞧这傻瓜，干吗呢？"

在我们这些认识他母亲、并深受其害的人眼里，阿尔瓦罗的所作所为还算不上惊世骇俗。卡洛琳娜·哈拉米略人长得漂亮，脑子却不好使。她从二十岁起就不再照镜子，因为觉得镜子里的人不是自己。老太太年纪一大把，天天骑着自行车，穿件夹克，去草原给庄园里的工人义务打针。在纽约的一个晚上，我们出门看电影，拜托她照看我和妻子十四个月大的儿子。她一本正经地劝我们三思，说她在马尼萨莱斯也帮忙照看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哭个没完，她只好喂他一块有毒的桑葚糖，让他闭嘴。但即便如此，去梅西百货公司那天，我们还是把孩子托付给她，回来时只见她独自一人。保安四处找孩子的时候，她就跟她儿子一样沉得住气，还安慰我们："别着急，阿尔瓦罗七岁那年，也在布鲁塞尔走丢了，瞧他现在不是挺好！"阿尔瓦罗就是她的升级版，还比她有学问，当然更了不得！他名震寰宇，不仅诗写得好，人也特别好。所到之处，胡吃海喝，夸张怪异，胡说八道，令人难忘。只有我们这些了解他、热爱他的人才知道，他只是咋咋呼呼，虚张声势罢了。

阿尔瓦罗·穆蒂斯不幸是个太过和善的老好人，谁也想象不到他为此付出多大代价。我见过他在黑暗中，忧伤地躺在书房的沙发上。那

模样，不会让前一晚任何一位幸福的听众羡慕。幸好，那无法治愈的孤独也孕育出他广博的学识、非凡的阅读能力、无尽的好奇心和忧伤凄美的诗歌。

我见过他沉浸在布鲁克纳[9]气势恢弘的交响乐里，像在欣赏斯卡拉蒂[10]的嬉游曲。我见过他躲在奎尔纳瓦卡花园僻静的角落，趁着悠长假期远离尘嚣，徜徉在巴尔扎克全集奇妙的文字森林里。有些人隔些日子会看部牛仔片，而他隔些日子会把《追忆似水年华》从头到尾再看一遍，他的择书标准是不少于一千两百页。他蹲过墨西哥监狱，所犯的罪许多作家、艺术家都犯过，可只有他蹲过监狱。他说，那十六个月，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我一直以为，他写书慢，是因为工作忙，再加上他字写得不好，像鹅亲自抓着鹅毛笔写出的鬼画符，足以让猎狗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迷雾中惊恐地乱吠。多年前，我问他，他说等退了休，没有俗务缠身时，会潜心写作。果然，飞了那么多年，他一跃而下，没用降落伞，稳稳着地，文思泉涌，实至名归。六年写八本，创造了文学史上的伟大奇迹。

他的书，随便挑一本，读上一页，你就会明白：阿尔瓦罗·穆蒂斯的全部作品，连同他的一生，都在确信无疑地传递着一个信息：失落的天堂再也无法找回。麦克洛尔[11]不止是他——这话谁都会说——麦克洛尔是我们大家。

作为结束语，我斗胆提议：今晚来祝阿尔瓦罗七十大寿的人，第一次，别假客套，别怕流眼泪，别骂骂咧咧，真心实意地告诉他，我们有多崇拜他，妈的，我们有多爱他。

---

[1]拉美地区广受欢迎的一种舞曲。

[2]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1897—1972），美国新闻记者，曾在警匪剧《铁面无私》（*The Untouchables*）中任叙述者。

[3]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1917—1986）的代表作。

[4]博特罗（Fernando Botero，1932— ），哥伦比亚画家。

[5]弗朗西斯科·罗西（Francesco Rosi，1922— ），意大利导演。

[6]莫妮卡·维蒂（Monica Vitti，1931— ），意大利女演员。

[7]阿莉达·瓦莉（Alida Valli，1921—2006），意大利女演员。

[8]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1907—1990），意大利小说家。

[9]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1824—1896），奥地利作曲家，代表作为九部正式编号的交响曲。

[10]斯卡拉蒂（Giuseppe Domenico Scarlatti，1685—1757），意大利作曲家，代表作为555首键盘乐奏鸣曲。

[11]Maqroll，阿尔瓦罗·穆蒂斯多部作品的主人公。

人见人爱的阿根廷人

1994年2月12日　墨西哥城

在墨西哥城美术馆的演讲。讲稿第一次发表于1984年2月22日，胡利奥·科塔萨尔[1]去世后不久；科塔萨尔去世十周年时，曾作为纪念辞宣读；科塔萨尔去世二十周年的2004年2月14日，又在哈里斯科州的瓜达拉哈拉“又见胡利奥·科塔萨尔”座谈会开幕式上宣读。瓜达拉哈拉大学设有胡利奥·科塔萨尔教研室，由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2]主持。

约十五年前，我最后一次去布拉格，同行的还有卡洛斯·富恩特斯和胡利奥·科塔萨尔。我们三个都怕坐飞机，便从巴黎乘火车前往，夜晚穿越东西德的时候，聊起两国无边的甜菜地、什么都造的巨型工厂、大战所带来的浩劫和肆意的爱情，总之，无所不聊。

临睡前，卡洛斯·富恩特斯突然问科塔萨尔，是什么时候、由谁倡议将钢琴加入爵士乐的。他不过随口一问，想知道一个日期、一个人名，谁知竟引出一篇精彩的演讲，一听听到大天亮。我们大杯大杯地喝啤酒，大口大口地吃香肠拌凉土豆，科塔萨尔字斟句酌，深入浅出，从历史到美学，一一向我们道来，直到东方发白，才最终在对特洛尼斯·蒙克[3]的褒奖中结束。那长长的大舌音，管风琴般浑厚的嗓子和瘦骨嶙峋的大手，表现力可说是无与伦比。那个独一无二的夜晚所带来的惊愕，卡洛斯·富恩特斯和我永生难忘。

十二年后，我见胡利奥·科塔萨尔在马那瓜的一个公园，面对着一大群人，用美妙的嗓音朗读一个短篇，是最艰涩难懂的那种——故事中不幸的拳击手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底层方言诉说着自己的经历。没在那种乌糟的环境待过，根本听不懂那种语言。可科塔萨尔偏偏挑中这篇，在宽敞明亮的公园里，站在台上，读给一大群人听。听众鱼龙混杂，有著名诗人、失业泥瓦匠、革命领袖和反对派。那又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尽管严格来说，即便是那些精通底层黑话的人，也不容易听懂这故事，但听众却能对故事中的情感产生极大的共鸣。可怜的拳击手孤零零地站在拳台上挨打，听众能感受到他的痛，为他的梦想和苦难潸然泪下。科塔萨尔与听众建立的是心与心的交流，谁也不在乎语言的含义，坐在草坪上的人都陶醉在这天籁之音里。

对科塔萨尔的这两次令我感触至深的回忆体现了他个性的两个极端，是对他最好的定义。私底下，好比在去布拉格的火车上，他博闻强记，侃侃而谈，风趣幽默，笑中带刺，能跻身于任何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之列。而在大众面前，尽管他不愿做公众人物，可在无法回避的场合，他是那么非凡，那么细腻，那么奇特，那么令人着迷。无论哪种情况，他都是我有幸结识的令我印象最深的人。

第一次见他，是在一九五六年的悲秋之末，巴黎一家英文名字的咖啡馆。他时常去那儿，待在角落里，握着自来水钢笔在作业本上写作，手指上沾着墨迹。让- 保罗·萨特也在三百米外做着同样的事。当时，我已在巴兰基亚的朗塞旅社（每晚花一个半比索，与低薪的球员、快乐的妓女为邻）读过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翻开第一页，我就意识到他是我未来想要成为的那种作家。有人告诉我，他在巴黎圣日尔曼大街的“老海军”咖啡馆进行创作，我在那儿等了好几个星期，终于见他像幽灵一般飘了进来。他比我想象的要高，

穿着一件长得要命的黑大衣，就像鳏夫穿的那种，一张娃娃脸被衬得有些邪恶，牛犊般的眼睛分得很开，斜的，清澈透明，若非心在驾驭，活像魔鬼之眼。

多年后，我们已是朋友，我又见到了他那天的样子。他在一部短篇佳作中重塑了自己：《另一片天空》里那个旅居巴黎，完全出于好奇而去断头台观刑的拉美人。科塔萨尔似乎是对着镜子写道："他的表情很奇怪，既出神，又出奇地专注，仿佛一个在梦中停住脚步、不愿醒来的人。"故事中的人穿着黑色的长大衣，就像我第一次见科塔萨尔时他本人穿的那件。故事中的叙述者不敢上前去问他从哪里来，怕遭冷遇，因为如果碰到别人这么来问，自己恐怕也会生气。无独有偶，那天下午，在"老海军"，我也怀着同样的畏惧，不敢上前去问科塔萨尔。我见他不假思索、奋笔疾书了一个多小时，其间只喝了半杯矿泉水。天黑了，他把钢笔放进口袋，作业本夹在腋下，像世界上最高最瘦的一名学生那样出了门。多年后，我们时常碰面，他与当年唯一的变化就是浓黑的胡须。他一直在长，却一直如出生时那般模样，直到去世前两星期，还像一个年华永驻的不老传奇。我从未壮起胆子问他，也从没跟他提起，一九五六年的悲秋，那个坐在"老海军"的角落、让我不敢上前搭讪的人是不是他。我知道，无论他现在身处何方，都会骂我胆小。偶像让人尊敬、让人崇拜、让人依恋，当然，也让人深深地妒忌。而科塔萨尔正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唤醒所有这些情感的作家之一。此外，他还能唤醒另一种不太常见的情感：虔诚。也许，不经意间，他成了人见人爱的阿根廷人。不过，大胆设想一下，假若死者还能死，那么，眼下这种举世皆为他的辞世而悲的场景，恐怕会让他无地自容，再死一次。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书里，谁也不像他那样惧怕身后的哀荣、奢华的葬礼。更有甚者，我总觉得，在科塔萨尔心里，死亡本身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八十世界环游一

天》[4]中，一个人居然大出洋相——死了，朋友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所以，正因为了解他，深爱他，我才拒绝出席胡利奥·科塔萨尔的一切治丧活动。

我希望能以如他所愿的方式怀念他，为他存在过而高兴，为我结识过他而欣喜。他留给世人的回忆犹如一部未尽的作品，是那么的美好而不可磨灭，为此，我心怀感激。

---

[1] 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1914—1984），阿根廷作家，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主将之一，代表作为《跳房子》。

[2] 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1928— ），墨西哥作家，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主将之一，代表作为《阿特米奥·克鲁斯之死》。

[3] 特洛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1917—1982），美国爵士钢琴家、作曲家。

[4] 科塔萨尔一部文集的名字，是对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八十天环游世界》的戏仿。

拉丁美洲确实存在

1995年3月28日　巴拿马　孔塔多拉

孔塔多拉集团“拉丁美洲是否存在”专题“实验室”

在场的有：陈述人乌拉圭前总统路易斯·阿尔维托·拉卡列，参加者费德里科·马约尔·萨拉戈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后一个登台演讲）、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乌尔塔多（墨西哥前总统）、塞尔希奥·拉米雷斯（尼加拉瓜前副总统）、弗朗西斯科·维弗尔特（巴西文化部长）与奥古斯托·拉米雷斯·奥坎波（哥伦比亚前外交部长）。

孔塔多拉集团成立于1983年1月9日，正值中美洲遭遇危机之时，集团主旨即在推动中美洲和平与民主进程，最初有四个成员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和委内瑞拉。该集团由四国首脑在巴拿马孔塔多拉岛成立，因而得名。

等到最后一个发言，是因为昨天吃早饭时，我还不清楚在会上会听到些什么。我喜欢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可这种活动总爱唱独角戏，妙趣横生的即席质问一概不许。得做笔记，请求发言，然后等待，好容易等到，想说的都已经被人说完了。同胞奥古斯托·拉米雷斯在飞机上对我说：想知道谁老了很容易，就看他是不是说什么都会扯上趣闻轶事。我跟他说：要真这样，那我刚出生就老了，写的作品也全是老朽之作。下面的话可以作证。

拉卡列总统开场就让我们大吃一惊，说“拉丁美洲”这个名字并不是从法语来的。我本来一直以为它是从法语来的，但也确实不记得是从哪儿看到的，也就无法提出任何反证。当年玻利瓦尔[1]用的并不是这个词，他用的是“美洲”，没加形容词，但后来这名字被美国人拿去自己用了。好在在《牙买加信札》中，他用简短的一句话为我们混乱的身份下了定义：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这就将其他定义中没包含的因素——如多重起源、土著语言、欧洲语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法语、荷兰语等——全部包含在内了。

四十年代，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听到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素来与棒球无缘的荷兰竟然正在参加世界棒球比赛——库拉索[2]即将夺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说到加勒比地区，我觉得区域定位严重不合理，不该只看地理位置，得看文化，所以应该从美国南部一直囊括至巴西北部。中美看似属于太平洋地区，实际和它关系不大，文化上应属于加勒比。这个呼吁合情合理，至少具备了将福克纳和美国南方所有知名作家通通归入魔幻现实主义大家庭的优点。再有，还是在四十年代，乔万尼·帕皮尼[3]对大众宣称拉美从来对人类社会毫无贡献，连个圣徒都没出过，似乎出个圣徒是件很容易的事。但他说得不对，圣罗萨·德利马就是我们出的，也许因为她是个女圣徒，就没算。他的说法充分反映了欧洲人对我们的一贯看法：不像他们就是错，无论如何都要按照他们的方式加以纠正。美国也是如此。西蒙·玻利瓦尔听够了这些劝告和命令，发出感慨说：“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走过我们自己的中世纪吧。”

选择哪种政治制度，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这种来自老朽欧洲的压力，没有人承受的比他更多。许多文献都提到，君主制是他的梦想。但事实是，在当年，即便已发生过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君主制也不像如今在共和党人眼里那么过时。玻利瓦尔是这么想的：只要能让拉美团结、独立，按他的话讲，就是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富、最强的国家，选择哪种政治制度根本无关紧要。过去，我们就是各种教条之争的牺牲品；今天，我们依然饱受这种困扰。昨天，塞尔希奥·拉米雷斯提醒我们：不过就是一批人倒下去，另一批人站起来，民主国家的选举只是个堂皇的借口。

哥伦比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好像只要按时选举，就算落实了民主制度。走个过场就好，不用去管拉票、贪污、欺诈、贿选等种种弊病。M-19游击队司令海梅·百特门[4]说过："参议员不是用六万张选票选出来的，是用六万比索堆出来的。前不久在卡塔赫纳，一个卖水果的当街冲我嚷嚷：'你欠我六千比索！'原来，她想选的那个人名字跟我的很像，害她投错了票，事后才发现。我能怎么办？只好付给她六千比索。"

玻利瓦尔的政治融合之路越走越困惑，文学艺术界却甘冒风险，自顾自地走上了文化融合之路。我们亲爱的费德里科·马约尔说他担心知识分子的沉默，不担心艺术家的沉默，言之有理。艺术家终究算不上知识分子，因为太情绪化，从布拉沃河到巴塔哥尼亚，一路运用音乐、绘画、戏剧、舞蹈、小说、影视剧等各种方式尽情表达。广播剧之父费利克斯·B.卡格内特说："人爱流眼泪，而我给他们流眼泪的借口，仅此而已。"大众的表达方式是拉美大陆多语种环境下最简单、最丰富的表达方式。等到政治和经济方面开始融合，文化融合将早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美国耗费巨资进行文化渗透，而我们一分钱不花，就已经在改变他们的语言、饮食、音乐、教育、生活方式和爱情，即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

马不停蹄地开了两天会，最开心的是第一次与好邻居弗朗西斯科·维弗尔特见面。他说一口纯正的西班牙语，令人惊叹，而我不禁要问，在座各位中有没有两位以上会说葡萄牙语。德拉马德里总统说得没错，西语懒得越过马托格罗索州[5]，而巴西却全民动员，创造出葡式西语来和我们交流，没准在拉美融合之后能当作通用语使用。弗朗西斯科·维弗尔特——哥伦比亚人叫他帕丘，墨西哥人叫他潘丘，而西班牙的任何一家酒馆都会叫他帕克——他旗帜鲜明、有理有据地支持建立文化部。而我徒劳无功地——没准也是件好事——反对在哥伦比亚建文化部，主要理由是：建文化部会助长文化的官方化、官僚化。

别武断，我反对的只是容易沦为政治拉票或政治操纵的牺牲品的部委制。我提议：代之以国家文化委员会，不隶属于政府，只隶属于国家，不对国会负责，只对共和国负责，免得三天两头受部委危机、宫廷密谋、预算黑洞之累。多亏帕丘西语流利，因此尽管我的葡语拿不出手，我们还是达成共识：无论形式如何，保护及发扬文化的重任应该由国家来承担。

德拉马德里总统提到毒品买卖，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他说美国天天像送牛奶、送报纸、送面包那样毫无差错地给两三千万瘾君子上门送毒品，只有比哥伦比亚黑手党更有势力的黑手党、比哥伦比亚政府更腐败的政府才能做到。当然，毒品买卖问题，我们哥伦比亚人牵涉颇深，我们几乎是唯一的罪魁祸首。因为我们，美国才有如此庞大的毒品消费市场；又正因为有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哥伦比亚才有如此繁荣的毒品工业。在我印象中，人类已对毒品买卖完全失控。但这并

不意味着我们要悲观失望，乖乖认输。喷雾消毒没有用，面对现实、继续斗争才是正道。

不久前，我和一群美国记者来到一小块最多三四公顷、开满了罂粟的田野。他们向我们展示如何用直升机喷雾消毒。三次飞下来，估计成本大于收效。这么与毒品买卖作斗争，着实让人泄气。我对一些同行的美国记者说，应该先对曼哈顿岛和华盛顿市政府喷雾消毒。我还批评他们：他们和全球人民对哥伦比亚的毒品问题了如指掌，知道我们如何播种、如何加工、如何出口，是因为我们哥伦比亚记者深入调查，并向全球发布调查结果，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与之相反，却没有一位美国记者愿意着手调查，告诉我们毒品是如何进入美国、如何经销、如何实现境内商品化的。

我想，所有人都会赞同前总统拉卡列的结论：拯救美洲要靠教育。去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反思论坛上，我们得出过同样的结论，并萌生出建设“远程大学”的美妙构想。我还在那里再一次呼吁：对儿童能力早挖掘、志向早发现乃当务之急。理由是：如果在孩子面前放上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玩具，他一定会拿其中一个，而国家的职责在于创造条件，让这个玩具在孩子手上一直玩下去。我相信，如果每个人从出生到去世，都可以只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就是幸福长寿的秘诀。同时，我们似乎也一致认为：对国家漠视教育、将教育交予私人打理的趋势应保持警惕。理由很充分：私人教育，无论好坏，都是助长社会歧视的最有效手段。

拉丁美洲是否存在？前总统拉卡列和奥古斯托·拉米雷斯一开始就将问题像手榴弹一般抛了出来。四小时的接力赛跑完了，但愿能有一个拨云见日的答案。根据这两天各位的畅所欲言，毫无疑问，拉丁美洲确实存在。也许，对自身身份的不懈追寻是它俄狄浦斯般的宿命，

这种创造性的命运正是它与众不同之处。它伤痕累累，四散溃败，厄运迟迟未逝，道义还在追寻。拉丁美洲确实存在。证据在哪儿？这两天，我们找到了：我们思，故我们在。

---

[1]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1783—1830），拉丁美洲解放者，曾率领拉美各族人民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2]库拉索是一座位于加勒比海南部、靠近委内瑞拉海岸的岛，该岛原为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一部分，2008年12月15日后改制为荷兰王国辖下的自治国。

[3]乔万尼·帕皮尼（Giovanni Papini，1881—1956），意大利作家，天主教徒。

[4]海梅·百特门（Jaime Bateman，1940—1983），哥伦比亚M-19游击队的创始人、领导人。M-19游击队的力量曾仅次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现已解散，改名为M-19民主联盟。

[5]巴西西部地区，与拉美西班牙语世界毗邻。

不一样的天性，不一样的世界

1996年4月12日　哥伦比亚　波哥大

哥伦比亚讲坛

哥伦比亚武装部队召开“法治国家与警察部队”大会，正式启动“哥伦比亚讲坛”，由国防部长胡安·卡洛斯·埃斯盖拉·波托卡雷罗主持。

该学术讲坛的听众全部为军人，登上讲坛的有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罗德里戈·帕尔多·加西亚、检察官阿方索·巴尔迪维索·萨米恩托、历史学家赫尔曼·阿西涅加斯、前部长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和鲁道夫·奥梅斯、前制宪成员奥兰多·法尔斯·博尔达与作家古斯塔沃·阿尔瓦雷斯·加德亚萨瓦尔。

第一次听说军人时，我年纪还小。外祖父给我讲故事，讲香蕉种植园大屠杀，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哥伦比亚种植园工人举行罢工游行，在谢纳加火车站聚集时被开枪镇压，听得我毛骨悚然。外祖父是银匠出身，骨子里是自由党，参加过“千日战争”[1]，在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2]将军麾下任上校，战功卓著，参加过《尼伦蒂亚停火协议》的签署，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连绵不绝的内战，当时，桌对面就坐着他身为保守党议员的长子。

外祖父给我讲的香蕉种植园大屠杀成为我早年间印象最深、记忆最久的故事。童年时，它是亲朋好友一再谈论的话题，因此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此外，它也有其历史重要性：它提前结束了美国在哥伦比亚长达四十多年的霸权统治，对后来的军人政权无疑也有影响。

回到今天的正题，这个故事其实也是我对军人的第一印象，这印象在多年以后才有所改观，不再听风是雨，而是尽量做到客观公正。但尽管我有意识地修正脑海里的军人印象，这五十年来，我还从未有机会和六个以上的军人交谈，交谈时也很少能做到轻松自如，不背任何的思想包袱。彼此猜疑自然就导致交流不畅，我老觉得，同样的话，他们的理解就是和我的理解不同。说到底，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

别以为我对此全无所谓，相反，我很失落。我总问自己：毛病出在哪儿？军人身上，还是我身上？怎样才能推倒阻碍交流的堡垒？没那么容易！十九岁时，我在国立大学念过两年法学，有两个同学是中尉（希望他们此刻在座）。他们穿着干净挺括的军服，总是准时准点地一同来到课堂，单独坐在一边，不苟言笑，有条不紊。我老觉得，他们生活在不一样的世界。跟他们说话，他们很和气，你问多少，他们答多少，客套得很。考试前，我们四人一组去咖啡馆学习；星期六，我们要么在舞厅碰面，要么在街头闹事，去安静的酒馆喝酒，去幽暗的妓院鬼混。可在那些地方，我们从没遇到过军人同学，一次也没有。

他们的本性原与我们不同，诸如此类的想法不禁油然而生。通常，军人的孩子也会是军人，他们住在军人社区，在军人俱乐部会面，他们的世界谢绝观赏。很难在咖啡馆见到他们，电影院更难。他

们顶着神秘的光环，就算穿着便装，也能一眼认出。身为军人，他们四处漂泊，有机会踏遍全国的每一个角落，由内至外都与众不同，虽然没有投票权，但那也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我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背过无数次军衔，免得碰到时叫错，可每次都是背得慢、忘得快。

我对军人存在偏见，知情人会觉得，来这个讲坛简直是我做过的最奇怪的事。但其实，自从外祖父跟我讲过谢纳加惨案，我对各种权力形式的痴迷程度就超过了对文学的兴趣，甚至为此踏足人类学的范畴。多少次，我问自己，那个故事是否正是贯穿我所有作品的主题之源？《枯枝败叶》中，香蕉种植园迁走后的小镇复苏；《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和《恶时辰》中，对利用军人达到政治目的的反思；此外，还有在三十三场战争[3]的炮火中进行诗歌创作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4]，以及一辈子不会写字的两百多岁的族长[5]。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希望将来出更多本）书里，我对权力的本质进行了毕生的追问。

然而，是到了创作《百年孤独》的时候，我的意识才真正觉醒。正史宣扬大屠杀是法制的胜利，那时我想，我可以驳，可以为死者讨回公道，内心不禁大受鼓舞。但那其实是不可能的，我根本找不到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证明死者不止七个、屠杀规模远非民众所想。但即使如此，那场灾难的严重程度也丝毫不会因此而降低。

在座诸位有理由问我，为什么不实事求是，非得竭尽夸张之能事，说死了三千人，用一列两百节车厢的火车装着投进大海。理由很简单，可以用文学语言陈述如下：书中的香蕉种植园事件不是发生在某个国家的某个特定的历史悲剧，而是规模未知、死难人数不一、剑

子手无名无姓、没准谁也逃不了干系的事件。这么一夸张，我脑子里就浮现出那个住在母牛成群的宫殿里、拖着一匹孤零零的小母马的老族长。

不这么写，能怎么写？拉丁美洲唯一的历史传奇便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军事独裁者。许多曾是自由派的军事领袖，后来都蜕变为专制野蛮的暴君。我坚信，如果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能打赢那三十六场战争[6]中的哪怕一场，他也会是其中一员。

然而，当我圆梦，将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风烛残年写成《迷宫中的将军》时，我得拧断天鹅的脖子，不再去编造故事。[7]玻利瓦尔是一代伟人，他有血有肉，对自己的身体过分地不加爱惜。见证他生平事迹的只有那支陪伴他浴血奋战，最终送他入土的年轻卫队。我必须了解这支卫队，了解卫队里的每个人。通过这位解放者引人入胜、史料丰富的信札，我想我已经近距离地了解到了。说真的，《迷宫中的将军》是一部充满诗意、美不胜收的历史纪实小说。

这几天，其他朋友也跟大家做了交流。轮到我，我想说说文学之谜。促成讲坛的军方人士知道，我很愿为这讲坛尽一份力——办讲坛很有必要，我只愿它越办越好。大家谈的都是专业，而除了文学，我没有别的专业。即便文学，我也不是科班出身，有的只是一些经验。但我依然有能力引领大家加入不总是太平的文学队伍。先送大家一句话："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背包里放一本书，我相信，所有人的生活会更美好。"

---

[1]1899年至1902年哥伦比亚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进行的历时千余日的内战。

[2] 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Rafael Uribe Uribe，1859—1914），哥伦比亚军人，“千日战争”中自由党的领袖。

[3] 原文如此，但据《百年孤独》，应为三十二场战争。

[4] 《百年孤独》中的人物。

[5] 《族长的没落》中的人物。

[6] 原文如此。

[7] 拧断天鹅的脖子，典出墨西哥诗人冈萨雷斯·马丁内斯（González Martínez，1871—1952）的同名十四行诗。诗中对拉美现代主义诗歌代表人物、被称为“天鹅诗人”的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1867—1916）追求唯美雅致的美学观提出异议。文中这里是指摒弃了浪漫、唯美的创作手法。

新闻业：世上最好的职业

1996年10月7日　美国　洛杉矶

美洲报业协会（SIP，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第52届大会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伊比利亚美洲新新闻基金会会长的身份致开幕辞。

有人问哥伦比亚的一所大学，该怎样考查新闻学报考者的能力和志向。回答很干脆："记者不是艺术家。"这么回答，恰恰说明新闻报道也是一种文学体裁。糟糕的是许多老师和学生对这一点要么不清楚，要么不以为然。也许，大部分学生在解释自己为何报考新闻学时，理由都不确切。有人说："我选择新闻传播，是因为现在媒体报道的少，掩盖的多。"还有人说："它是通往政界的康庄大道。"只有一个人说，因为他喜欢报道，不喜欢被报道。

五十多年前，哥伦比亚报业在拉美遥遥领先。当时没有新闻学校，得在编辑室、印刷车间、对门酒吧和周末派对中学。记者总爱扎堆，过集体生活，无比热爱本职工作，其他话题一概不谈。做新闻讲究团队协作，没什么私人空间。不懂得在一天二十四小时精彩的流动课堂里学习的人，觉得老谈新闻实在无聊的人，也许他想当记者，也许他自以为是记者，但其实他既不是记者，也不想当记者。

曾几何时，媒体只是报纸和电台。电台花了好长时间才追上纸质媒体，之后个性张扬，势不可挡，略显冒失，眨眼间便征服听众。电视刚出现时，都传说它是魔盒。如今，其风靡程度难以想象。长途电话刚开通那会儿，要找接线员转接。电传发明前，只能通过信件和电报与国内外联系，好歹也能送到目的地。

电台接线员甘冒风险，在电波声中凌空捕捉世界各地的新闻。博学的编辑将前因后果、细枝末节搜集完整，如同从一根椎骨渐渐拼出整副恐龙骨架，只是不能妄加评论，那是主编的神圣领地。社论号称均出自主编之手，其实不然。而且主编的字几乎总是出了名的龙飞凤舞，过去的主编，如《观察家报》的堂卡洛斯·卡诺，或深受读者欢迎的专栏作家，如《哥伦比亚时代报》的恩里克·桑托斯·蒙特霍（“卡利班”），都有专门的铸排工辨认他们的手稿。在政治报道比重最大、影响最广的时代，编辑部最敏感谨慎，也最有名望。

新闻要边干边学

新闻分三大块：新闻信息、时事与报道、编者按。访谈并不常见，也不单独使用，多半作为时事与报道的原材料。因此，在哥伦比亚，“访谈”依然被称为“报道”。记者是弱势群体，相当于学徒加苦力，苦干多年、表现良好，才能晋升做领导。工作时间和工作性质表明：新闻从业人员的神经系统实际上是在逆向运转。

入行没别的条件，只要有做记者的意愿。即便出生在报业世家——我们知道，大部分报纸都是家族所有——也要通过实践证明自己的能力。俗话说得好：新闻要边干边学。进报社的人，有其他学科成绩不好的，毕业找不着工作的，后知后觉、兜了一圈才发现新闻是心之所爱的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士。心理素质一定要好，新人入行，会和

海军陆战队的新兵一样备受捉弄，以激发伟大的创造力为由，被人嘲笑、被人下套，或在最后期限前一小时被勒令重写。这是个培养人才、据实报道、士气高涨、积极参与、观点云集的地方。经验证明，对于有职业敏感、责任感和承受力的人来说，边干边学，易如反掌。实践本身所需的文化基础，在工作环境中就能得到加强。博览群书是职业病，记者们如饥似渴地进行着自我教育，一目十行，就凭着他们的自学，便让新闻业——他们称其为世界上最好的职业——蓬勃发展。阿尔维托·耶拉斯·卡马戈[1]做了一辈子记者，其间两次任共和国总统，他连高中都没毕业。

后来，世道变了。哥伦比亚发放了两万七千张记者证，大多没发给从业记者，只沦为从政府那儿捞好处、不排队、进体育场不买票，或参加其他休闲娱乐活动的通行证。绝大多数记者，包括一些鼎鼎有名的大记者，都没有、不想要、也不需要记者证。大家都说，新闻业没有输送后备人才的学校，于是，首批新闻传播系应运而生，记者证也随之出炉。然而，现在从业的专业人员多半没有学历，即使有，也是其他专业的，就偏偏不是新闻学。

接受采访的老师、学生、记者、经理、管理人员都对学校在新闻业人才培养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质疑。“显然，大家对理论思考与概念阐释都毫无兴趣。”一批正在做学位论文的学生说，“造成这一局面，部分责任在老师。他们规定我们必须读什么，读哪些书里的哪些章，让我们复印一大堆的资料，可他们自己却没有任何观点。”幸好，学生还能苦中作乐，自诩为“复印文稿专业人士”。大学也承认，目前，在人才培养上，尤其是人文学科的人才培养上，存在显而易见的不足。高中毕业、刚入大学时，学生不会写文章，会犯严重的语法和拼写错误，文章读不懂，深意悟不出，这都很正常，可许多人毕业时就和入

学时水平一个样。“他们只顾着贪方便，就是不爱动脑。”一位老师说，“让他们修改文章或重写，他们才不干。”看来，学生唯一的兴趣只是混完大学去当记者。他们脱离实际，无视重大问题，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不做社会调查，也不为社会服务。“获得高尚的社会地位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主要目的。”一位大学老师说，“他们不想发挥自身价值，利用专业的技能丰富精神生活，只想赶紧读完大学，提升社会地位。”

接受调查的学生大多对学校表示失望，他们理直气壮地指责老师，声称自己身上缺少的优良品质，尤其是对生活的好奇心，都源于老师没有好好培养。一位成绩优秀，多次获奖的女学生更是直言不讳：“读完高中，学生应该有机会接触不同的领域，找到兴趣点。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得将学校教的知识一字不漏地背下来，这样才能通过考试。”

有人认为，学生人数过多，造成教育质量下降，学校只管教书，不管育人，今天的人才都是对抗学校、单打独斗、自我努力的结果。还有人认为，注重培养学生能力和志向的老师寥寥无几。“这很难。教学往往是重复再重复，”一位老师解释道，“二十年教同一门课的老师还不如一个没经验的新手。”由此造成的结果令人悲哀：那些踌躇满志地离开校园，踏上工作岗位的学生，必须在实践中从头学起，才能成为真正合格的记者。

有些人四处吹嘘自己能反着看懂部长桌上的机密文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还会不经允许，擅自录音，或将事先说好绝不公开的谈话公之于众。最严重的是，这些有悖道德的行为，却正契合了新闻业勇往直前，不惜一切代价，冲破一切障碍，揭黑幕，抢独家的基本理念。因此，行内人士无不自觉并自豪地遵守实行，而对独家新

闻比的不是谁发得早、而是谁发得好这一点置若罔闻。这一弊端之外，另一个极端则是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工作完全依赖于冰冷、没人情味的机器。

满世界游荡的幽灵：录音机

录音机发明前，做新闻只需三件必不可少的工具，它们密不可分，“三位一体”：笔记本、千锤百炼的职业道德和善于倾听的耳朵。最早的录音机比打字机还重，声音录在磁带上，而磁带乱麻般地绕在线轴上。过了一段时间，记者开始用它帮助记忆，有的甚至连思考这么重要的事也请它代劳。

其实，录音机该怎么用，怎么用才道德，依然有待商榷。得有人提醒记者：它不是人脑记忆的替代品，而是早期派上过大用场的笔记本的升级版。录音机听得见，但并没有真的在听；能录音，但不思考；忠实，但没有人情味。总之，仅靠它逐字逐句、一字不漏地记，还不如现场仔细听、脑子里多琢磨，好歹心里有数。对电台来说，录音机特别有用，因为能直接录播，可弊端是不少采访者只顾想下一个问题，根本不听对方回答。对报社编辑来说，誊文字稿是最见功力也最伤脑筋的工作：辨音不清，词义不明，拼写错误，句法不通，种种问题就像一道道整得人头昏眼花、死去活来的关卡。也许，笔记本虽然寒碜，还是得用，好让记者边听、边记、边整理。

录音机是访谈类节目泛滥成灾的罪魁祸首。电台和电视台的性质决定了这类节目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本无可厚非，然而，纸媒也盲目跟风，竟误以为记者的话不如被采访者的话真实可信。访谈是记者与某个对事件有所思考、有所感悟的人之间的对话，而报道则负责细致入微地将事件如实还原，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两种体裁互为补

充，完全没必要互相排斥。“报道”的资讯性与完整性，只有最原始、最精湛、唯一能在电光火石间和盘托出、一语道尽的“简讯”体裁方能超越。因此目前，新闻学教学与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并不是混合或取消原有体裁，而是帮它们各自在不同的媒体形式中找到新的定位、新的价值。要时刻谨记——大家似乎都忘了——调查研究并非新闻学里的某个专业，从最根本的定义上来说，新闻学就是调查研究性的。

如今，信息和报道中加入了评论与观点，而社论中也加入了资讯，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一个重大的进步。不用记者证前，新闻简洁明了，一如早年的电报。如今一味滥用国际通讯社的固定格式，反使人不敢苟同。真真假假的话语，无处不在的引号，有意无意地犯错，恶意操纵，恶意歪曲，让新闻报道成为致命武器。出处来源都“绝对可靠”——来自消息灵通人士，来自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官，来自无所不知、但无人见过的观察家……借此肆意中伤，自己却毫发无损。不公布消息来源的做法成为作者手中最有力的挡箭牌。在美国，诸如此类的恶行四处横行，说什么“遇害者遗体上的珠宝首饰，确信是由部长拿走。但警方对此予以否认”。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诽谤已经造成。总之，许多有悖伦理、让当今新闻界羞愧难当的事，倒并非都出于道德败坏，只是缺少职业约束。这一点，对我们多少是个安慰。

新闻业对人的剥削

问题是新闻业的发展速度比不上技术工具的发展速度。科技进步一日千里，记者们得在科技的迷宫中摸索前行。大学以为毛病出在教学上，因此在开办纸质媒体专业（这当然很有必要）之外，还开办所有形式媒体的人才培养学院，连十五世纪行业创立之初朴实无华的行业名称也弃如敝屣。如今不叫新闻学了，叫传播学，或社会传播学。

在以往那些靠经验吃饭的记者眼里，这好比在淋浴房遇上宇航员打扮的教皇。

在哥伦比亚的大学里，传播学共开设了十四个学士点，两个硕士点，可见社会对其日益重视，可惜人才培养却陷入误区。教学满足了众多当前需要，却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两点：创造力与实践。

学校要将学生培养为书本上理想化的新闻从业人员。教师热切地传授新闻理论，而学生一旦与现实正面交锋，情绪便会一落千丈，紧攥着专业文凭也无济于事。新技术本为助翼，结果却适得其反，被它拖得筋疲力尽。巨大的工作压力，使他们与梦想背道而驰。人生道路上，他们受到各种利益的驱使，没有时间和精力思考，更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学习。

教育界的逻辑是，一些大学的工程学或兽医学专业的入学试题，也适用于另一些大学的社会传播学专业。一位成绩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曾开诚布公地说："工作了，我才真正学到新闻。在大学里也有机会写稿，可方法得边干边学。"一天不承认做新闻最重要的是创造力，这种状况就一天不会改变。至少，新闻与艺术应居同等地位。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技术的进步其实与我们这个行业的工作环境格格不入，更与众人参与、集思广益的传统方法背道而驰。编辑室变成一个冷漠、被隔成小间的实验室，走得进太空，却走不进读者的心。可以说，这一行业的非人性化速度惊人。过去定义明确、划分清晰的新闻专业，如今已不知始于何地、终于何方、欲往何处。

世界人民迫切希望新闻业恢复昔日的声望，对此最翘首以盼的自然是最大的受益人：媒体老板。媒体名誉扫地，最痛心疾首的也是他

们。社会新闻系会成为众矢之的，并非全无道理。也许是因为新闻知识教了不少，真正对职业有帮助的却没多少。也许，他们应该索性去教人文，虽然看上去没那么神气，却能帮学生把薄弱的高中文化基础夯实打牢。他们应该更加关注能力与志向，将各媒体细分为不同专业，因为要想在短暂的一生中将它们全数掌握，那是奢求。从其他专业改行的新闻学硕士似乎也很适合在科技进步下应运而生的各专业部门工作。自从两百零四年前，堂曼努埃尔·德尔索克罗·罗德里格斯[2]印出第一张报纸以来，这个国家的变化已经太多。

最终目的不应该是毕业证和记者证。还是该用老办法，用历史批评的眼光，以服务大众为目的，几人一组实践学习。媒体为自身计，应学习欧洲，多加演练，无论在编辑室还是工作室，都可以搭设场景，比如模拟空难，让学生在真正报道灾难之前，学会如何应对。新闻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激情，遭遇现实才能尽情挥洒。没有苦在其中的人无法想象那种世事难料、随时候命的状态；没有生在其中的人无法想象那种玄妙的新闻预感、抢到独家的快感和万念俱灰的挫败感；没有为此而生、打算为此而死的人无法坚守一份如此不可思议、强度极高的工作。新闻一旦发稿，一切便又回到起点，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下一分钟去，还真是永无宁日。

---

[1]阿尔维托·耶拉斯·卡马戈（Alberto Lleras Camargo，1906—1990），哥伦比亚记者、外交家，曾于1945—1946和1958—1962年间两次任哥伦比亚总统。

[2]曼努埃尔·德尔索克罗·罗德里格斯（Manuel del Socorro Rodríguez，1758—1819），哥伦比亚新闻业创始人。

致语言之神的漂流瓶

1997年4月7日　墨西哥　萨卡特卡斯

第一届西班牙语国际会议

会议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致敬，请他致开幕辞。文中废除拼写规则的观点引发了极大争议。

十二岁那年，我差点被一辆自行车撞着。一位神父经过那儿，大叫了一声："小心！"骑自行车的人应声倒地。神父没停脚，只对我说："瞧见没？语言的威力有多大！"没错，就在那天，我明白了语言的力量。而今天，我们知道，玛雅人更是早就明白了，还明白得相当透彻，专门设立了语言之神。

语言从未像今天这样威力巨大。在语言的统治下，人类即将迈入第三个千年。所谓图像正在取代语言、语言要遭灭顶之灾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相反，图像使语言威力倍增。现实生活中的巴别塔从未像今天这样气势恢弘，包括这么多有影响、有权威、有意志的语言文字：报纸杂志、休闲图书、广告海报上自创的、遭蹂躏的，抑或被神圣化了的文字；电台、电视台、电影、电话、扬声器里说出来、唱出来的文字；大街上醒目的粗体标语、阴暗处耳边的甜言蜜语。因此，不，要遭灭顶之灾的是沉默！同一个意思，在这么多语言里有这么多不同的说法，要想全搞明白，可不容易。于是，各种语言便离家漂泊，相互混杂，殊途同归地奔向早晚诞生的地球语。

西班牙语应严阵以待，迎接语言无国界的伟大时代的到来。它没有其他语言所具备的经济优势，但它有活力，有创造力，有丰富的文化经验和迅猛的扩张力。到本世纪末，它将拥有一千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四亿民众。难怪美国一位西班牙语教师说，课上一直在帮拉美不同国家的学生做翻译。令人惊讶的是，动词pasar[1]有五十四种含义；厄瓜多尔有一百零五个描述男性生殖器的名词，却没有一个condoliente[2]这种能够顾名思义，且亟待补充的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诗意的表达随处可见，令一名年轻的法国记者赞叹不已。羊羔一个劲地悲鸣，吵得孩子睡不着觉，孩子说："简直就是路灯。"哥伦比亚瓜希拉的一名供应军粮的妇人不爱喝蜜花茶，说有股耶稣受难日的味道。堂塞巴斯蒂安·德科瓦鲁维亚斯[3]在他那本令人难忘的词典中亲笔写下：黄色是恋人的颜色。难道我们没尝过窗户味的咖啡、墙角味的面包和亲吻味的樱桃吗？它们都是长久以来语言不甘寂寞、锋芒毕露的结果。我们不该限制它，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让它从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轻松迈入二十一世纪。

因此，我斗胆向在座睿智博学的各位提议：在语法简化我们之前，先让我们简化语法。将语法规则人性化；向表达丰富、值得借鉴的土著语言学习；在科技新词贸然闯入之前，彻底掌握，迅速吸收；真心实意地与野蛮的副动词、猖獗的que、寄生虫似的de que谈判；[4]将虚拟式现在时变位的重音落回至倒数第三个音节，不说vayamos，说váyamos，不说cantemos，说cántemos，不说刺耳的muramos，说悦耳的muéramos；废除我们自出娘胎起便无比痛恨的拼写规则，埋葬远古时代的h，明晰g和j的使用范围，多多使用方便合理的重音符号，让谁也不会将lágrima读成lagrima，谁也不会混淆revolver和revólver。b和

v有什么区别？西班牙祖先给我们带来两个字母，但似乎总有一个多余！[5]

当然，这些问题不过是随口一提，好比扔进海里的漂流瓶，希望能漂到语言之神的手里。如果这番话斗胆包天，属于大放厥词，那无论语言之神还是在座的各位都会自然而然地发出感叹：还不如让我在十二岁那年被自行车撞死算了！

---

[1]西班牙语，有“经过”、“移动”、“发生”、“遭受”等多重含义。

[2]马尔克斯根据西班牙语构词法生造的一个词，意指“哀悼的，哀悼者”。

[3]塞巴斯蒂安·德科瓦鲁维亚斯（Sebastián de Covarrubias，1539—1613），西班牙语词汇学家，1611年编辑出版的《西班牙语词典》是解读西班牙“黄金世纪”文学作品的主要工具书。

[4]这些都是西班牙语中常见的冗赘用法。

[5]b与v在西班牙语中发音相同。

二十一世纪遐想

1999年3月8日　法国　巴黎

“迎接新千年：拉美与加勒比地区”讲习班

讲习班由美洲发展银行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3月8日和9日在巴黎联合举办。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为特邀嘉宾，致简短的开幕辞。

四十年代，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帕皮尼说了句刻毒的话：“美洲是用欧洲的垃圾做成的。”气得我们的父祖辈暴跳如雷。可在今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说得没错。而且，更令人痛心的是：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错在我们自己。

西蒙·玻利瓦尔颇有先见之明，他在《牙买加信札》中精辟地写道，“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希望我们能有自己的身份认同。他还说，希望在拉美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富、最强的国家。他受英国人的罪——欠英国人的债我们到现在都没还清；他受法国人的罪——他们想卖给他法国大革命的残羹剩饭。风烛残年的他终于忍无可忍地说：“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走过我们自己的中世纪吧。”但到头来，我们还是沦为梦想破灭的试验基地。创造力原本是我们最大的优势，然而，当倒霉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寻找印度的途中偶然发现了我们之后，我们便一直在过时的教条和他人的战争中挣扎求生。

几年前，我们在巴黎的拉丁区比在拉美的任何国家都更容易碰面相识。在圣日耳曼德佩区[1]的咖啡馆，我们无需互问姓名，便谈起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2]的大风吹来查普尔特佩克区[3]的小夜曲、巴勃罗·聂鲁达在加勒比的黄昏中喝着康吉鳗鱼汤怀想千里之外的美丽故乡。因此今天，我们谁也不会奇怪，为什么我们要越过广阔的大西洋，在巴黎相见。

在座的四十岁以下的梦想家们，纠正过去那些大错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你们肩上。记住，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从心脏移植到贝多芬四重奏，在成为现实之前，都装在创造者的脑子里。不要对二十一世纪有所期待，是二十一世纪对你们有所期待。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纪，不是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而是要靠你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和想象塑造出来。只要你们敢想，它就会是和平的世纪，我们的世纪。

---

[1] 法国巴黎的一个城区。

[2] 阿根廷南部港口城市。

[3] 墨西哥城的一个城区。

远离却深爱的祖国

2003年5月18日　哥伦比亚　麦德林

“寻公平发展，在科技领域建立社会新契约”国际研讨会

为庆祝安蒂奥基亚大学两百周年校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录制此演讲，寄往麦德林，并于国际研讨会开幕当天下午六点在卡米洛·托雷斯剧院播放。

“别看咱们老赶上电闪雷鸣，这说明很快就要雨过天晴。咱们总会有赶上好事的时候，因为好事坏事都是有头的，既然坏事拖了这么长时间，好事也就不远了。”[1]

堂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这段精妙的论述当然不是指今天的哥伦比亚，而是指他自己生活那个时代的西班牙，但没想到这么贴切，搬过来就能用。不过，如果堂米格尔在世，生活在今天的哥伦比亚，这么漂亮的话他也说不出来。单是去年发生的两件事就足以让他幻想破灭：近四十万哥伦比亚人迫于暴力逃离家园；半个世纪以来，逃离总人数已约三百万。这么多人口，足以再建一个与波哥大密度相似、或许比麦德林面积还大的国家。在那里，人民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再无其他财产，漫无目的地四处流浪，只想找个栖身之所。不仅如此，在这个蛮不讲理的世界，有两桩一本万利的买卖：毒品交易和非法出售武器，由这两者衍生出来的暴力，更是令流亡的人民深受其害。

这只是让哥伦比亚民不聊生的冰山一角。巨大的黑市支撑着欧美乃至全球的毒品买卖，而哥伦比亚对此有着截然不同、互相对立的两副面孔：卖得凶，禁得也凶。任何买卖都是越禁越火，毒品不合法化，毒品交易就不能铲除，毒品交易不铲除，哥伦比亚的暴力就不会走到尽头。

公共秩序乱象丛生，四十年葬送了不止一代社会边缘人群。除了滋事犯罪，他们没有别的活路。作家R.H.莫雷诺·杜兰[2]一语中的："没有死亡，哥伦比亚便没有生的迹象。"我们自出生起就是犯罪嫌疑人，死亡时更是罪孽深重。从多少年前起，和谈就总会酿成血案，只有极少数例外，让人铭刻在心。跨出国门干任何事，从正常的出门旅行，到单纯的进出口贸易，哥伦比亚人都得首先证明自身的清白。

总之，我们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从不利于建设祖祖辈辈心中梦想的和平国家。哥伦比亚早早地饱尝了不平等的政体、宗教为本的教育、原始的封建制和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制带来的危害。首府波哥大高高在上，脱离现实，自我陶醉；两大党派亦敌亦友，天长地久；大选血流成河，落入人为操控；古往今来，就没有哪任政府真正为人民着想。两大政党，二十九场内战，三场军事政变，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哥伦比亚社会似乎魔鬼附体，厄运缠身。遭受压迫、深陷苦海的祖国渐渐学会了强作欢颜，甚至苦中作乐。

就这样，我们几乎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可一些幼稚的人依然当美国是北方乐土——他们坚信，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连平安入土都属不易——可到了那儿，他们才发现，那是一个鼠目寸光的帝国，哥伦比亚在他们眼里，既不是好邻居，也不是廉价可靠的盟友，而仅仅是帝国扩张的又一个对象。

好在有两个与生俱来的天赋帮我们弥补了文化条件的不足，让我们在摸索中寻求身份，在迷宫中寻求真理。一是创造力，二是提升自我的坚定决心，这两项天赋都是优点。早在很久很久以前，从西班牙人登陆那天起，拉美土著便有如神助，计上心来。见西班牙征服者读骑士小说读昏了头，他们便巧言劝诱，说什么有一座纯金打造的精美城池，浑身涂满金粉的国王在翡翠湖中洗浴。这都是为了活命想出的主意，是魔幻加创造性想象的杰作。

五百多万哥伦比亚人，就凭着胆子大、脑子灵，逃离苦难的祖国，去海外求生存。为了活命，他们身上依然能见到老祖宗当年的狡诈。在印度当托钵僧、在纽约教英文、在撒哈拉赶骆驼：是创造性的想象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不致饿死。正如我在一些书中所言（如果不是在所有书中的话），理论中的梦想多半只能聊以自慰，我更信赖现实中的荒唐。因此，我认为，在灾难中，还有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哥伦比亚：它藏身暗处，不会再陷入我们在历史上一错再错的覆辙。

眼见着哥伦比亚人的艺术创造力走向鼎盛，对于我们是谁、我们能做什么这些问题有了彻底清醒的认识，我一点儿也不奇怪。我想，哥伦比亚正学着靠坚不可摧的信念活下去，它愈挫愈勇，愈压愈强。残暴的历史打得它一盘散沙，但饱经苦难的经历却能使它重获新生，再度彰显这个民族的伟大。见证这一个个的奇迹，让我们永远都明白自己出生在什么国家，明白如何在两种互为矛盾的现实间求得生存。因此，看到仍然蒙受着历史灾难的祖国有了新的自我认识，开始健康蓬勃地发展，我一点儿都不感到奇怪。民众的智慧一路前行，我们千万别在家门口坐等，要去大街上盛迎，也许连祖国自己都没想到，我们最终会战胜一切，在四处寻觅中找到救国存亡的路。

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让我暂离我所困守并深深眷恋的书斋，为安蒂奥基亚大学两百周年校庆这个历史性的日子说几句话。这是个从头开始，对祖国倾注最大热爱的大好机会，我们无愧于祖国，祖国也会无愧于我们。就凭这点，我敢说，堂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愿望在今天已看到了曙光：折磨我们的坏事总会比好事短。如今，这么多条路，该走哪条才能让大家活得永远太平，享受应有的权利，就要靠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造力来确定了。

我的话完了。

---

[1]摘自《堂吉诃德》第十八章，此处参照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董燕生译本。

[2]R. H.莫雷诺·杜兰（Rafael Humberto Moreno Durán，1945—2005），哥伦比亚作家。

敞开心扉，拥抱西语文学

2007年3月26日　哥伦比亚　卡塔赫纳

面对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与西班牙国王

卡塔赫纳会议中心，第四届西班牙语国际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会议向3月6日年满八十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致意，并为纪念《百年孤独》出版四十周年、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二十五周年，发行《百年孤独》纪念版。

写《百年孤独》的日子里，我做过许多梦。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它会一版发行一百万册。一百万人决定去读一本全凭一人独坐陋室，用二十八个字母、两根指头敲出来的书，想想都觉得疯狂。今天，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又决定将一本已经在百万读者面前晃过无数次的小说再版发行一百万册，把我这个睡不着觉的写书匠着实吓了一跳，到现在都没恍过神来。

这不是，也不能算是对作者的承认。这一出版奇迹无可辩驳地表明：想读西语小说的人无以计数。今天，作为作者，我面红耳赤地接过这第一本超大发行量版的《百年孤独》。一百万册书，不是对作者的一百万次致敬，而是说明有几百万西语读者对这份精神食粮翘首以待。

从那时到现在，我的工作一直都没有变过。七十多年来，我埋头苦干，不停地用两根食指有节奏地敲出永恒不变的二十八个字母。今天，我抬起头，心怀感激地来参加这次纪念盛会，不禁要停下来想一想，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看到的是：当年，面对着空白稿纸，我还不知道读者会在何方；如今，无数人对西语文学如饥似渴。

如果把《百年孤独》的读者聚拢在一个国家，那里的人口排名能进全球前二十。这不是为了自吹，我只想说，这些人的阅读习惯表明，他们乐意敞开心扉，拥抱西语文学。这是对所有西语作家、诗人、叙述者和教育工作者的挑战。激发兴趣，壮大读者群，是我们这个行当，当然也是我们自身的真正使命。

我从二十岁开始出书，三十八岁已经出了四本。当我坐在打字机前，敲出“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时，压根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这句话从哪儿来，将往哪儿去。我只知道，十八个月里，我天天写，没有一天不写，直到写完。

很难相信，当时最窘迫的问题之一居然是缺打字机纸。我老觉得，文章有打字错误、语言或语法错误，都是创作上的失误。因此，我有错就撕，撕了就扔，重新再来。照这个用法，一年算下来，估计写本书，光买纸就得花掉六个月的稿费。

埃斯佩兰莎·阿拉伊萨，令人难忘的佩拉，她给众多诗人和电影人当过打字员，也誊过不少墨西哥名家名作，比如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最明净的地区》、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以及堂路易斯·布努埃尔的好几个原创剧本。我请她誊最终稿时，稿子涂改严重，为了避免混淆，我先用黑笔改，之后又用红笔改。可对于在此行摸爬滚

打了多年的佩拉来说，那实在算不了什么。多年后，她告诉我，那天瓢泼大雨，她带着我修改完毕的终稿回家，下公交车时滑了一跤，稿子飞了一地，又是泥又是水。在其他乘客的帮助下，她把被雨淋湿、几乎无法辨认的书稿一张张从地上捡起来，带回家用熨斗一张张熨平。

那段日子，我一分钱都不挣，梅塞德斯和我，外加两个孩子是怎么活下来的，这绝对能写本更好看的书。连我也不知道梅塞德斯是如何做到的，总之那几个月，家里天天都还能揭得开锅。一开始，我们还不想走借贷这条路，后来心一横，终于头一回去了当铺。

先当了些零头碎脑的玩意儿，以解燃眉之急，后来又去当梅塞德斯多年来从娘家得来的首饰。当铺的专家就像外科医生那样严谨，对耳环上的钻石、项链上的祖母绿和戒指上的红宝石一一用秤称、用“魔眼”看，最后，他像见习斗牛士那样立住脚不动，斗篷一甩，将首饰一股脑地抛还给我们，说：“全是玻璃的。”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梅塞德斯算了算账，不动声色地对房东说：

“我们想，房租六个月后一块儿付。”

“对不起，夫人，”房东对她说，“您知道那是多大的一笔数目吗？”

“我知道。”梅塞德斯依旧不动声色地回答，“您放心，到时候一切都会解决。”

好心的房东是政府高官，是我们所认识的最有风度、最有耐心的人之一，他一样不动声色。

“那好，夫人，有您这句话就行。”他算出那笔大数目，“九月七日，我等您。”

终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梅塞德斯和我去墨西哥城邮局，将《百年孤独》的定稿寄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书稿打印在普通稿纸上，双倍行距，共五百九十页，扎了个包裹。收信人是南美出版社的文学总编弗朗西斯科·波鲁阿。

邮局的人称了称包裹，算了算，说：

“八十二比索。”

梅塞德斯数了数钱包里剩的纸币加硬币，实话实说：

“我们只有五十三比索。”

我们拆开包裹，分成两半，先把一半寄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剩下那一半，要怎么凑钱寄过去，我们心里完全没谱。后来发现，寄走的是后半部，不是前半部。钱还没凑够，南美出版社的帕克[1]·波鲁阿就迫不及待地想看前半部，给我们预支了稿费。

就这样，我们获得了新生。

---

[1] 弗朗西斯科的昵称。

编者的话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都是公开演讲时朗读用的，时间跨度基本涵盖了他的一生，从一九四四年十七岁在锡帕基拉送别学长，到二〇〇七年面对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和西班牙国王。

从开头几篇能看出，这位哥伦比亚作家对演讲很排斥。“我不是来演讲的。”这是他首次登台演讲时对国立男子中学同学的提醒，被作者选来当书名。下一篇《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一九七〇年演讲时，《百年孤独》已大获成功，他又提醒听众自己对演讲有多反感：“对我而言，文学创作就和登台演讲一样，都是被逼的。”第三次，一九七二年领罗慕洛·加列戈斯奖，他说：“我曾发誓绝不做两件事：领奖和演讲。今天……连破两例。”

十年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必须要写一篇身为作家、一生最重要的一次演讲，结果诞生了一篇杰作：《拉丁美洲的孤独》。此后，演讲成为他作家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屡获大奖、备受仰慕的他，受邀去全球各地演讲。

为了出版这本集子，我有幸与作者并肩作战（真的是肩并肩，肘碰肘），修订书稿。除了正常校对，他还决定给有些原本只按场合来分的讲稿加个题目，如获罗慕洛·加列戈斯奖的那篇，叫《为了你们》。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向视演讲为畏途”，重读这些散落或被遗忘

的文字，让他与演讲冰释前嫌，握手言和。他说：“读这些讲稿，让我再一次发现，身为作家，我是如何一点点改变，一点点成长的。”演讲稿中，有关于文学的讨论，也有作者的人生轨迹，能使读者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

感谢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夫人梅塞德斯·巴尔恰，感谢他们在工作中永远热情好客，宽宏大度，使此书得以顺利完成。感谢他们的孩子罗德里戈和贡萨洛，感谢他们身在远方，依然对此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感谢他们发现了一篇被遗忘的演讲稿，感谢他们对标题和封面提出的宝贵意见。最后，感谢耶鲁大学的阿尼瓦尔·冈萨雷斯-佩雷斯教授，感谢他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一直陪伴着我，开篇演讲也是他找到的。

克里斯多瓦 • 佩拉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陶玉平 译
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陶玉平 译

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

南海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译者：陶玉平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7-06-01

ISBN：9787544289146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故事背后的故事
Part 1 我那些葬身海底的朋友们
　　死神的客人
Part 2 我在“狼船”上的最后几分钟
　　舞会开始
　　寂静无声的一分钟
Part 3 我眼睁睁看着四个伙伴活活淹死
　　仅仅相距三米！
　　孤身一人
Part 4 我孤身在加勒比海度过的第一夜
　　黑夜无边
　　每天的日光
　　海平面上的一个黑点
Part 5 筏子上我有了一个伙伴
　　他们看见我了！
　　五点钟鲨鱼来了
　　筏子上的伙伴
Part 6 救援船和食人族的小岛
　　我看见了一条船！
　　七只海鸥
Part 7 一个饿得半死的人的绝望办法
　　我已经是个死人了
　　鞋子的滋味如何？
Part 8 为了一条鱼我同一群鲨鱼大打出手

一条鲨鱼跳进了筏子！
可怜我这副躯壳
Part 9 海水的颜色开始有了变化
我的幸运之星
清晨的太阳
Part 10 希望丧失……唯有死亡
“我想死”
神秘的树根
Part 11 第十天，又一个幻觉：陆地
陆地！
可陆地到底在哪儿？
Part 12 复活在异乡的土地上
人的足迹
人、驴和狗
Part 13 六百人簇拥我到达圣胡安
故事终于有人信了
苦行僧的故事
Part 14 大难不死的我成了英雄
一则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
故事里的生意经

Obra de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70

Relato de un náufrago



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

Relato de un náufrago

没有食物也没有淡水

救生筏上的他在海上漂流了十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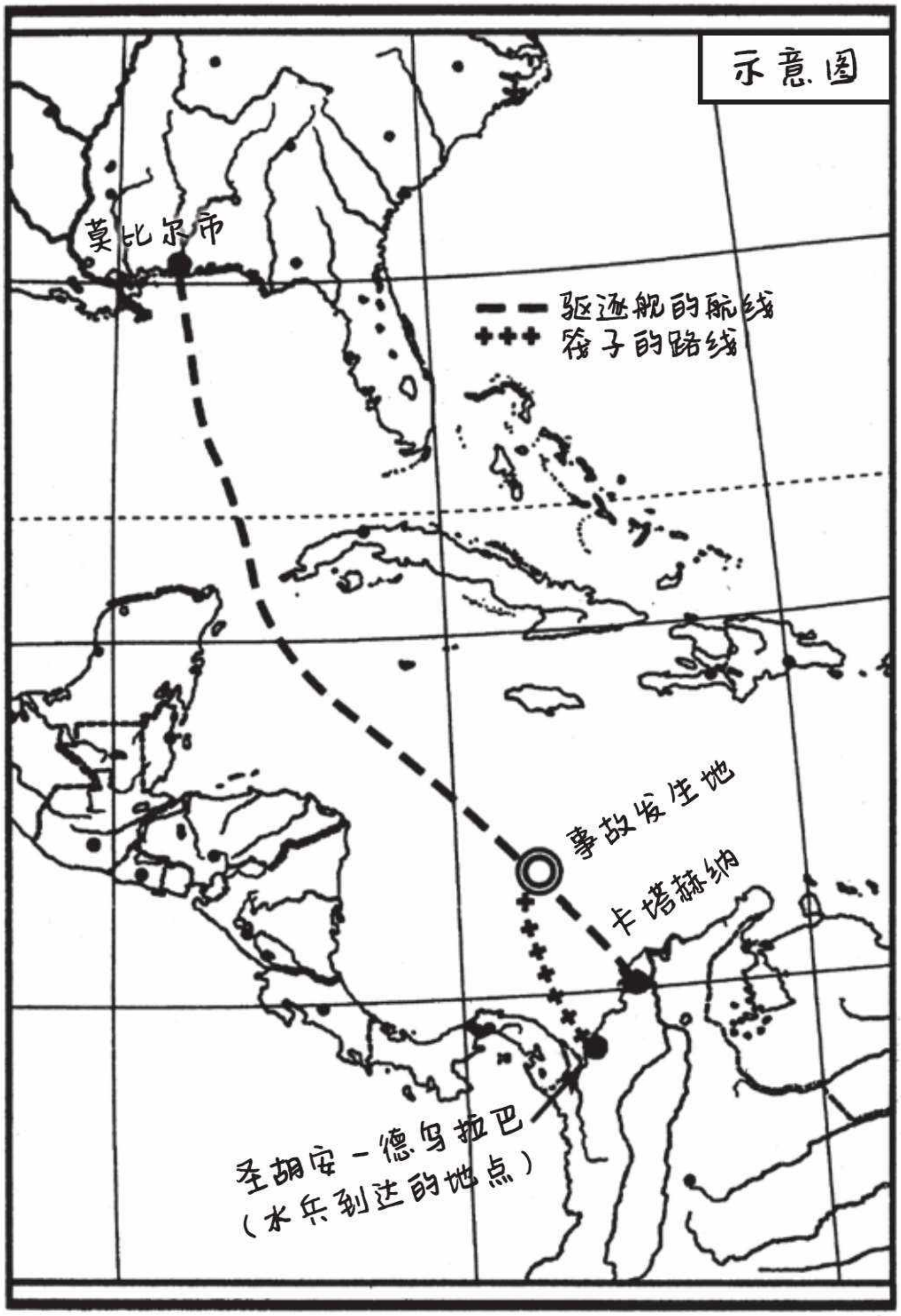
被授予民族英雄称号

得到了选美皇后的亲吻

通过广告大赚一笔

之后遭当局遗弃

被时代遗忘


示意图
莫比尔市
驱逐舰的航线
筏子的路线
事故发生地
卡塔赫纳
圣胡安－德乌拉巴
（水兵到达的地点）

故事背后的故事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这天，人们得知一条消息，在加勒比海的一次暴风雨中，哥伦比亚海军的卡尔达斯驱逐舰上有八名水兵落水并失踪。这艘军舰在美国莫比尔市经过维修，当时正驶回哥伦比亚港口卡塔赫纳，悲剧发生两小时后，该舰准点到达卡塔赫纳港。对海难者的搜寻工作立即展开，在南加勒比海地区实行警戒并从事其他善举的美国驻巴拿马运河区部队也参与了合作。四天后，搜寻结束，失踪水兵们被正式宣布死亡。然而，又过了一周，他们当中的一位气息奄奄地出现在了哥伦比亚北部一处荒僻的海滩上，他在一只随波漂流的筏子上没吃没喝地度过了十天时间。他的名字叫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事故发生一个月后，他给我讲述的故事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在波哥大《观察家报》上刊登，本书即由此而来。

当这位海难幸存者和我一起努力把他这次奇遇一点一点重构起来的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种详尽彻底的挖掘探询竟让我们卷入一场新的冒险，在国内酿成轩然大波，最终他损失掉的是他的荣耀与前程，而我则差一点送了命。哥伦比亚当时正处在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的军事专制统治之下，能让这位将军载入史册的有两桩最为昭著的功绩，一件是下令军队开枪驱散一次和平示威游行，在首都市中心对学生进行屠杀，另一件是，由于在一个星期天的斗牛场上，一群斗牛爱好者朝着独裁者的女儿发出嘘声，他授意秘密警察大开杀戒，遇害人数至今不详。新闻媒体受到监控，反对派报纸每天只能找一些和政治毫无关联的新闻来逗读者开心。在《观察家报》，从事这

项高尚的烘焙工作的人有：社长吉列尔莫·卡诺、主编何塞·萨尔加尔和当记者的我。我们三个人当时都未过而立。

当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主动跑来问我们能为他的故事出多少钱的时候，我们恰如其分地接待了他：这已经是一条被炒过很多次的新闻了。军方曾经将他在一家海军医院里软禁了好几个星期，其间他所能接触的只有官方记者，此外只有一位乔装打扮成医生的反对派记者。这个故事已经被拆解拼凑、翻来覆去地讲了许多遍，被加工修补，乃至歪曲颠倒，读者也早已厌倦了这位英雄人物。他出面替手表做广告，因为他那只手表历经风餐露宿分秒不差；他也替鞋做广告，因为他那双鞋结实异常，他几次想把鞋撕烂吃进肚子里都没能成功；诸如此类乌七八糟的广告他接了一大堆。他得了勋章，也在广播上发表过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讲，还作为未来一代的榜样上过电视，他在鲜花和音乐的簇拥下逛遍半个国家，给人签字留念，接受各地选美皇后的献吻。他也发了笔小财。我们找了他好多次都不得一见，这次他居然不请自到，可想而知，他已经没多少牛可以吹了，现在准是想编出点儿新花样挣钱，而且哪些能讲哪些不能讲，政府也一定早就给他画好了道道。于是，我们请他从哪个门进来还从哪个门出去。突然，吉列尔莫·卡诺心头灵光闪动，在楼梯那里又追上了他，接受了他的条件，把他交到我的手中。这简直就像是给我手里塞了个定时炸弹。

首先令我惊奇的是，这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拥有与生俱来的出众的叙事才能。他身材壮实，一张面孔与其说像民族英雄，还不如说像个小号手更为妥帖，他善于综合概括，记忆力极强，还拥有天然的可贵品格，懂得自嘲那些英雄壮举。就这样，我们每天交谈六个钟头，持续了二十天，其间，我一边做记录，一边不时提些迷惑性的问题，看他的叙述中是否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最后，我们完成了一篇文章，

那是对他在海上漂流十日实实在在、清晰扼要的记述。这篇记述如此详尽、扣人心弦，以至于对我来说，唯一有待解决的文学任务就是让读者相信它。出于这个考虑，加上我们认为这样比较合适，我们商定文章使用第一人称，并且署上他的名字。实际上，本次集结成书才使我的名字第一次和这些文字挂上了钩。

而第二件让我惊奇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事，发生在我们工作的第四天，当时我请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给我描述一下引发那起事故的暴风雨。他完全清楚他接下来要说的话字字千金，微微一笑，说道："根本就没有什么暴风雨。"还真是这样：气象部门证实了这一点，那一年的二月是加勒比海上又一个温和晴朗的二月。到那时为止从未在报端披露过的真相是，在波涛起伏的大海上，一阵风使舰船发生了猛烈倾斜，造成了胡乱堆放在甲板上的货物散落，八名水兵落水。这一披露揭示了三个重大失误：首先，驱逐舰上是绝对禁止运输货物的；其次，正是因为超载，这艘军舰没能采取任何措施救援落水者；最后，驱逐舰上运输的都是些走私货：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现在问题很明白了，这篇记述，就和那艘驱逐舰一样，带了些不够安全的政治和道德货物，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这篇故事被分为若干段，一连十四天在报上连载。一开始政府还颇为赞赏，认为他们的英雄终于奉献出一部文艺作品了。接下来，当真相慢慢被披露之后，再想阻止连载的发行，明显会被当作欲盖弥彰的政治手段。报纸的发行量几乎已经翻了一番，报社门前，读者们争相购买漏过的几期报纸，为的是收集完完整整的报道。专制机关，继承了历届哥伦比亚政府的光荣传统，想通过花言巧语来掩盖事实，就此翻篇儿。他们发布了一份严正公告，否认驱逐舰上装载有走私货物。我们则想方设法为我们的指控寻找证据。我们请路易斯·亚历杭德

罗·贝拉斯科提供了一份舰上拥有照相机的水兵的名单。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正在全国各地休假，我们还是找到了他们，并出钱买到了他们在航行途中拍摄的照片。在连载完成的一周之后，我们出了一期增刊，在登出全文的同时，还特别附上从水兵们那里买来的不少照片。从这些拍摄于公海上的朋友们的合影上可以看到，背景中摆放着不容置疑的走私物品的纸箱，上面甚至还可以看见厂家的商标。专制机关面对这一重击，采取了一系列激烈的弹压手段进行报复，最终让我们的报纸在几个月之后关张了事。

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遭遇种种威胁利诱，尽管如此，对这篇记述，他没有否定过哪怕一个字。他被迫离开了海军，那是他过去唯一熟识的工作，而且迅速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两年后，军政府倒台了，哥伦比亚政权又几度易手，表面上更光鲜了，可论起公正来，也未必能好到哪里去。与此同时，我在巴黎开始了我的流亡生涯，时时思念着故土，这倒真有点类似于筏子上的漂流生活。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人知道那个孤独的海难幸存者后来怎么样了，直到几个月前，才有位记者阴差阳错地在一家公共汽车公司的办公室里碰见了他。我见过那张照片，他年纪大了，有些发福，看得出来，他又有了不少的经历，同时身上也增添了些许沉着安详的气质，那是一个有勇气亲手将自己的雕像炸毁的英雄。

十五年过去了，我没再重读过这篇记述。尽管并不完全明白集结成书有什么用处，我还是觉得它完全值得再一次出版。使我沮丧的是，相比对这篇文字价值的兴趣，出版商们更在意它是由谁的名字发表的，其实我很难过，这个名字恰好属于一个当红作家。这一次它能以书的形式出版，是因为我并没有深思熟虑就同意了，而我又不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一九七〇年二月于巴塞罗那

Part 1
我那些葬身海底的朋友们

二月二十二日这天我们接到通知，说是要返回哥伦比亚。我们已经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市待了八个月，卡尔达斯号驱逐舰在这里修理它的电子系统和武器系统。在舰船维修期间，全体水兵会接受特殊训练。而不用上课的日子里，我们会干一些所有水兵在岸上时都会干的事情：约女朋友去看场电影，然后再到港口一家名叫乔艾·帕洛卡的酒馆，大家聚在一起痛饮威士忌，也时不时起起哄打打架。

我女朋友叫玛丽·埃德瑞斯，是我到莫比尔两个月后通过另一个水兵的女友认识的。尽管她学起西班牙语来一点儿都不费劲，我还是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我的朋友们都把她叫成玛利亚·迪莱克西奥[1]。一到假日我就会请她去看电影，可她好像更愿意让我请她去吃冰激凌。我们就这样用我的半吊子英语和她的半吊子西班牙语交流，反正不管是在电影院还是去吃冰激凌，我们总能互相听懂。

只有一次我不是和玛丽一起去看的电影：因为那天晚上我和伙伴们去看了《凯恩号哗变记》。我们中有些人听说，这是一部讲述扫雷艇上生活的片子，很不错。我们就都去看了。可那部电影里最精彩的并不是扫雷艇什么的，而是那场暴风雨。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在那样一场暴风雨里，最恰当的做法就是转变船只的航向，就像那些哗变者所做的那样。可是，不管是我还是那些伙伴们，谁都没有遇过那么大

的暴风雨，因此，整场电影看下来，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数那场暴风雨了。我们回去睡觉时，水兵迭戈·韦拉斯克思还深深沉浸在那部电影之中，想想几天之后我们就要去海上航行，他对我们说道：“要是我们碰上那样一场暴风雨会怎么样？”

我承认我也被那部电影震撼。八个月来我几乎已经忘记了海上那套生活习惯。我倒不是害怕，因为指导员早就教过我们落水时应该如何自救。可在看完《凯恩号哗变记》的那天晚上，我还是感到心中那阵不安并不寻常。

我并不是说从那一刻起我就对灾难有了什么预感。可是，我从未像这次这样在临近出航的日子里感到如此害怕。小时候在波哥大，我常看连环画，可从来也没有想过会有人淹死在海里。相反，每次想到大海，我总是信心满满。加入海军快两年了，每一次出海航行，我也从未有过任何不安。

不过承认这个也没什么丢脸的，在看完《凯恩号哗变记》后，我心里总有种近乎恐惧的感觉。我仰面朝天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我睡的是上铺—想念自己的家人，也想着我们回卡塔赫纳的航程，久久不能入睡。我用双手支着头，耳边回响着海水轻轻拍打码头的声音，以及睡在同一间舱房里四十名水兵宁静的呼吸声。在我下铺睡的是一等兵路易斯·任希弗，他的呼噜声大得像吹长号。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美梦，可倘若他知道八天以后自己将葬身海底，一定不会睡得这么香。

整整一个星期，我都被这种不安所笼罩。起锚的日子飞快地临近，我一直试图通过和伙伴们聊天来放宽心情。卡尔达斯号驱逐舰已经整装待发。这些天里，我们都情不自禁地谈论各自的家庭，谈论哥伦比亚，也谈及各自回去之后的打算。一点一点地，舰船上装满了我

们要捎回家的礼物：大都是些收音机呀电冰箱呀洗衣机呀电炉什么的。我只带了一台收音机。

出发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完全无法排解那种揪心的感觉，于是我做出一个决定：一回到卡塔赫纳，我就脱离海军。我可不想再经受这种航行的风险。出发前一天晚上，我去同玛丽告别，原本是想把自己的担忧和决定一并告诉她的，但后来没那么做，因为我曾向她保证过一定会回来，如果我跟她说以后我不再航行了，她就不会再相信我了。我只向我最要好的朋友、二等兵拉蒙·埃雷拉透露了这个决定，他也对我坦言，说等回到卡塔赫纳他也要脱离海军。拉蒙·埃雷拉和我忧心忡忡，我们约上水兵迭戈·韦拉斯克思一起去乔艾·帕洛卡酒馆喝杯告别威士忌。

本来我们只想喝上一杯，结果一下子喝了五瓶。几乎每晚都和我们厮混在一起的女友也对我们的行程了若指掌，她们决定为我们饯行，要喝个一醉方休，还要痛哭一场以表情义。乐队指挥是个神情严肃的男人，戴了副眼镜，这让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个音乐家，他把一组曼波还有探戈曲献给我们，他一定是把这些都当作哥伦比亚乐曲了。我们的女友全都哭了起来，喝了不少一块半美金一瓶的威士忌。

因为最后这个星期发了三回钱，我们决定好好挥霍一番。我是心里有事，想一醉解千愁。拉蒙·埃雷拉则是开心，他一向都开开心心的，他是阿尔霍纳人，打得一手好鼓，还特别擅长模仿各路时髦歌手的演唱。

正当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一个美国水兵走到我们桌前，请求拉蒙·埃雷拉允许他邀请拉蒙的女友跳一支舞，那女伴身材高大，一头金发，是那天晚上喝得最少却哭得最凶的一位－而且哭得真心实意。那

美国佬说的是英语，拉蒙·埃雷拉推搡了他一把，用西班牙语回答:“你说的我他娘一个字儿也听不懂！”

那算得上是莫比尔市最热闹的一次打斗了，椅子在脑袋上砸得散了架，还惊动了巡逻的警车，来了不少警察。那个美国佬头上吃了拉蒙·埃雷拉重重的两拳。等拉蒙·埃雷拉模仿丹尼尔·桑托斯唱着歌回到军舰上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他说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登上这艘军舰。实际上，这的确是最后一次。

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卡尔达斯号从莫比尔港起航开往卡塔赫纳。一想到要回家，大家都开心不已。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些礼品给家人。最开心的要数枪炮大副米格尔·奥尔特加。我觉得米格尔·奥尔特加是最仔细和节俭的水兵。在莫比尔的八个月里，他没浪费过一美元。发下来的每一分钱他都用来给在卡塔赫纳等他的老婆买礼物了。军舰起航的这天凌晨，米格尔·奥尔特加在舰桥上待着，还在讲他老婆孩子的事，这倒不算什么稀罕事，因为他只要一开口就不会说别的。他往回带了一台冰箱、一台全自动洗衣机、一台收音机，外加一个电炉。十二个小时后，米格尔·奥尔特加军士长将会躺在铺位上，晕得天旋地转。而七十二小时之后，他将葬身海底。

死神的客人

舰船起航的时候，通常会下达这样一道命令："全体人员各就各位。"这时每个人必须待在自己的岗位上，直到舰船驶出港口。我静静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对着鱼雷发射架，眼见莫比尔的灯火消失在雾霭中，可此刻我脑海里想的并不是玛丽。我想的是大海。我知道第二天我们将驶入墨西哥湾，在一年的这个月份里，这条航线不算太平。天亮后我一直没有看见海梅·马丁内斯·迪亚戈中尉，他是舰上的二副，是这次海难中唯一殒命的高级军官。他高大魁梧，寡言少语，我总共也没见过他几次。我只知道他来自托里玛，是个大好人。

不过这天凌晨我见到了一级士官胡里奥·阿玛多尔·卡拉巴约，他是我们的第二水手长，高高的个子，总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他从我身旁走过，看了一眼莫比尔逐渐淡去的灯火，便向他自己的岗位走去。我觉得这是我在舰上最后一次看见他。

整个卡尔达斯号上，要说起回家的快乐，谁也比不上士官艾里亚斯·萨博加尔，他是轮机长。他简直就是头海豹，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身体很壮实，特别能侃。他四十来岁，我猜这四十年他多半时间都在侃大山。

萨博加尔士官有理由比别人更高兴些。在卡塔赫纳等候他归来的有他老婆和六个儿女。六个儿女中他只见过五个：最小的那个是我们在莫比尔的时候出生的。

直到天亮之前，这趟航行还算是风平浪静。不到一个小时我就重新适应了航行生活。莫比尔的灯火消失在远方，消失在宁静清晨的薄雾中，东方已经能看到缓缓升起的太阳。这会儿我的不安情绪没有了，只觉得很疲惫。我一整夜都没睡觉，嘴里渴得慌，翻上来的全是威士忌的苦味。

早晨六点，我们驶出了港口。这时又有命令下来："撤岗，值勤人员各就各位。"声音未落，我便向卧室舱房走去。我的下铺，路易斯·任希弗已经坐起身来，正揉着眼睛，还没完全清醒。

"我们到哪儿了？"路易斯·任希弗问我。

我告诉他说，我们刚出港。说完我就爬上我的床铺，想好好睡上一觉。

路易斯·任希弗是个十全十美的水兵。他出生在远离大海的乔科，可他血液里流淌着航海之魂。当卡尔达斯号前往莫比尔大修时，路易斯·任希弗还不是这艘舰船的成员。当时他正在华盛顿学习枪炮制造。他严谨好学，英语讲得和西班牙语一样顺溜。

三月十五日，他在华盛顿拿到了土木工程的学位。一九五二年，他在那里和一位多米尼加姑娘喜结良缘。卡尔达斯号大修的时候，路易斯·任希弗从华盛顿赶过来，成了舰上的一员。离开莫比尔前不久，他对我说，一到哥伦比亚，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安排，把他的妻子迁到卡塔赫纳来。

路易斯·任希弗已经有好长时间没航行了，我敢肯定他会晕船。就在这次航行的第一天凌晨，穿衣服的时候他问我：

“你还没有晕船吗？”

我跟他说没有。然后任希弗说了句：

“再过两三个小时，我就会看见你连舌头都要吐出来。”

“我看你才会这样。”我回敬了他一句。他又说道：

“想看我晕船，那得整个大海都晕了才行。”

我躺在自己的铺位上，竭力想睡一会儿，可这时我的脑海里又出现了那场暴风雨。头一天晚上那种恐惧的感觉又从我心底升起。我又变得忧心忡忡。我转过身，冲着刚刚穿好衣服的路易斯·任希弗说：

“还是小心点儿。不要说不吉利的话了。”

---

[1] 在从英语转译为西班牙语的过程中，玛丽（Mary）等同于西语里的玛利亚（Mar í a），而埃德瑞斯（Address）在英语里有“地址”的意思，水兵们直接将之换作西语中的“地址”（Direcci ó n）一词，此处音译为迪莱克西奥。

Part 2
我在“狼船”上的最后几分钟

“我们已经到墨西哥湾了。”二月二十六日，我起来吃午饭的时候，一个伙伴这样对我说。前一天，我对墨西哥湾的天气着实有些担心。不过驱逐舰虽说有点晃动，前进得还算平稳。我很庆幸自己的担忧只是无端的瞎想，便走到了甲板上。海岸的轮廓早已看不见了。四周只剩下碧绿的大海和蔚蓝的天空。可在甲板中央，枪炮大副米格尔·奥尔特加面色煞白地坐在那里，脸都扭曲了，他在忍受晕船的煎熬。这有一阵子了，在莫比尔的灯火还依稀可见的时候就开始了，按说米格尔·奥尔特加在海上并不是什么新手，可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他连站都站不起来。

米格尔·奥尔特加在朝鲜待过，在帕迪亚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上服役。他算是经多见广，对海洋可以说再熟悉不过了。可这一回，尽管墨西哥湾风平浪静，他还是得靠人帮忙才能起身去值勤。他就像是奄奄一息了，什么都吃不下去，我们几个和他一起值勤的伙伴要么让他坐在船尾要么让他坐在甲板中央，直到最后命令下来把他送到卧室舱房里去。然后他就趴在铺位上，头朝外，随时准备撕心裂肺地大吐一场。

二十六日夜里，我记得是拉蒙·埃雷拉对我提起，说加勒比海上情况有点儿不妙。按照大家的计算，这一天的后半夜我们就应该能驶出墨西哥湾。我站岗的地方正对着鱼雷发射架，我正满心欢喜地想，就

快到卡塔赫纳了。这一夜很亮堂，高高的天穹上满布星斗。我自打进海军起就喜欢辨认星星。这天夜里，卡尔达斯号波澜不惊地驶向加勒比海，我则愉快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认为，一个游遍世界的老水手靠船只晃动的不同情况就能判断出这是哪一处海域。我第一次出海时的经历告诉我，此刻已经到加勒比海了。我看了看手表，是夜里十二点半钟。二月二十七日凌晨十二点三十一分。就算船不怎么晃动，我也一样能觉察出这是到加勒比海了。而实际上船晃动得厉害。我这个从来不晕船的人也开始感到不安。我有一种奇怪的预感。不知怎的，我想起了枪炮大副米格尔·奥尔特加，他正在下面的舱房，趴在铺位上，连肠子都快吐出来了。

早上六点，驱逐舰像蛋壳一样晃个不停。路易斯·任希弗躺在我的下铺，没有睡着。

“胖子，”他叫了我一声，“你还没晕船吗？”

我说没有，但我告诉他自己很担忧。我刚才说过，任希弗是个工程师，勤奋好学，是个好水手，他给我列举了种种理由，说卡尔达斯号在加勒比海上没有一丁点儿危险，绝不会出事。“这是一艘狼船。”他这样说道。他还跟我提起，就在这一片海域，二战时这艘驱逐舰还曾击沉过一艘德国潜水艇。

“这舰船稳着呢。”路易斯·任希弗说道。船晃来晃去，我躺在铺位上实在睡不着，他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可左舷风越刮越大，我想象着卡尔达斯号在这样的大浪之中会怎么样。就在这时，我想起了《凯恩号哗变记》。

尽管一整天的天气都没什么变化，但我们的航行还算是正常。值勤的时候，我努力想象着到卡塔赫纳之后要做哪些事情。我会给玛丽写信的。我打算每星期给她写两封信，说起写信我这个人从不懒散。自从我加入海军起，我每个星期都会给波哥大家里写信。我还常给奥拉亚街区我的那些朋友邻里写信，都还挺长的。因此我一定会给玛丽写信的，我这样想着，一面还每隔一会儿就算一算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卡塔赫纳：还得整整二十四个小时。这是我倒数第二次值勤。

拉蒙·埃雷拉帮我一起把枪炮大副米格尔·奥尔特加弄到了他的床上。他的状态越来越糟了。自从三天前我们驶离莫比尔港，他就什么东西都没吃过。他现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脸色发绿，整个人都走了形。

舞会开始

船从夜里十点钟开始跳起舞来。二十七日的白天卡尔达斯号也一直在晃动，可比起二十七日的夜里，就不算什么了。我躺在铺位上，为在甲板上值勤的伙伴们担心。我知道，躺在各自铺位上的人也没有谁睡得着。快十二点的时候，我对下铺的路易斯·任希弗说：

“你还没晕船吗？”

正如我所料，路易斯·任希弗也没睡着。不管船怎么颠簸，他的好心情丝毫不减。他答道：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想看到我晕船，那得整个大海都晕了才行。”

这句话他总挂在嘴边。可这天夜里，他几乎来不及把这句话说完。

我先前说过，我心里很不安。我说过这是一种类似恐惧的感觉。二十七日夜半时分，扩音器里传来了对全体船员的命令：“全体人员移到左舷。”我的感觉不再是捕风捉影了。

我非常清楚这道命令的意义所在。舰船正在向右舷倾斜，到了危险的程度，需要用我们的体重去恢复平衡。我在海上航行已经两年了，这是第一次对大海真正心存畏惧。上面，海风怒号，甲板上的人员一定都是浑身湿透，瑟瑟发抖。

一听到命令，我立刻从铺位上一跃而起。路易斯·任希弗十分镇静，他站起身来，走向靠左舷的几张空铺中的一张，那是在值勤的人的铺位。我手扶着一张张上下铺，努力想迈开脚步，这时，我忽然想起米格尔·奥尔特加。

他已经动弹不得了。听到命令，他也努力想爬起来，但因为他已经晕得七荤八素，又摔回了床上。我把他扶了起来，安顿到靠左舷的一张床上。他声音低哑、有气无力地对我说，他感觉自己不行了。

“要不我们去争取一下，别让你再去值勤了。”我对他说。

这样说不太合适，可如果米格尔·奥尔特加真的一直躺在他的铺位上，他也不至于死掉的。

二十八日凌晨四点，在船尾集合的我们六个，全都一夜没合眼。这中间有我朝夕相处的伙伴拉蒙·埃雷拉，还有领班的士官吉列尔莫·罗索。那是我在舰上的最后一次值勤。我知道下午两点钟我们就会到达卡塔赫纳。我打算交完班后好好睡上一觉，这样，当晚就可以上岸玩个痛快。离开卡塔赫纳已经有八个月了。清晨五点半钟，我在一个见习水兵的陪同下，去底舱检查了一回。七点钟，我们替换值勤的人，让他们去吃早餐。八点钟，他们又换下了我们。这就是我的最后一班岗。一切都太平无事，只是风越刮越大，浪也越来越高了，浪冲上舰桥，拍打着甲板。

拉蒙·埃雷拉在船尾待着。待在那里的还有头戴耳机的值勤救生员路易斯·任希弗。甲板中央半靠半躺着晕得半死不活的枪炮大副米格尔·奥尔特加。船的这个位置晃动得缓和一些。我和二等水兵埃德瓦尔多·卡斯蒂约聊了几句，他是舰上的仓库管理员，单身，波哥大人，为人

很拘谨。我也记不起来我们当时都聊了些什么。我只知道，从那时算起我们再一次碰面是在几小时后，他掉落海水，沉下去了。

拉蒙·埃雷拉正在搜集硬纸板，想用它们把自己遮起来，试图睡上一觉。舰船晃来晃去，卧室里根本睡不成觉。浪越来越猛，越来越高，一次次涌上甲板。我和拉蒙·埃雷拉在船尾绑得结结实实的冰箱、洗衣机和电炉之间找个地方妥妥地躺了下来，我们可不想被打上来的浪头卷走。我仰面躺着，看着天空发呆。这样躺着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了一些，心想过不了几个小时，我们就能到卡塔赫纳海湾了。没有什么暴风雨；天气十分晴朗，能见度很好，天空蓝得透亮。这会儿我也不觉得鞋子打脚了，刚才交班之后，我换了双胶鞋。

寂静无声的一分钟

路易斯·任希弗问我几点钟了。十一点半。一个小时了，舰船一直倾斜着，朝着右舷倾斜得很厉害。扩音器里又传来了昨天夜里发布过的命令："全体人员移到左舷。"我和拉蒙·埃雷拉没有动弹，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左边待着。

我想起了米格尔·奥尔特加，不久前我还在右舷见过他，就在这时，我看见他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靠着左舷躺下了，依然晕得死去活来。这时，驱逐舰突然令人恐惧地歪了一下；有点失控。我屏住了呼吸。一个巨浪向我们袭来，我们全身都湿透了，就像是才从海里被捞上来的一样。过了好一会儿，驱逐舰才好不容易恢复到正常的位置。路易斯·任希弗站在岗位上，脸色发青。他紧张地对我们说道：

"真见鬼！这条军舰失控了，控制不住了。"

这是我头一次看见路易斯·任希弗紧张。在我身边，拉蒙·埃雷拉若有所思，他也是浑身上下没一块干地方，依然是一声不吭。一时间，四下里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拉蒙·埃雷拉开口说：

"只要上头一发命令说砍断缆绳，让装的这些货滚下水里，我头一个就去砍。"

这是十一点五十分的事。

我也这么想，迟早他们会发出这样的命令，把绑着货物的绳索砍断。这种做法有个名字，叫"减轻负荷，轻装前进"。只要命令一下，

收音机呀冰箱呀电炉呀全都会滚进海里。我想，真到那个时候，我就得下到舱房去，因为虽说在船尾也很安全，可那是因为我们躲在了冰箱和炉灶中间。一旦没了这些东西，随便一个大浪就能把我们卷到海里。

舰船继续在波涛中挣扎前行，可倾斜得越来越厉害了。拉蒙·埃雷拉将一块篷布卷了卷，把自己裹了起来。我们都用篷布盖住了自己，又一个大浪，比刚才那个要大得多，直冲着我们扑来。我用双手护住脑袋等大浪过去，半分钟后，扩音器又沙沙响了起来。

“这回准是要求砍断缆绳。”我想。可传来的却是另外一道命令，那声音坚定自信，不慌不忙：“所有在甲板的人员，请套上救生圈。”

路易斯·任希弗无比镇静，他一只手扶住耳机，用另一只手去套救生圈。而我，每一次大浪过后，总会先感到一片真空，接下来是一阵寂静。我看见路易斯·任希弗已经套好了救生圈，又重新把耳机戴好。于是我闭上双眼，耳边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我的手表嘀嘀嗒嗒的声音。

我听了差不多一分钟手表的声音。拉蒙·埃雷拉一动也不动。我估摸着时间是差一刻十二点。离到达卡塔赫纳还有两小时航程。有那么一瞬，驱逐舰仿佛悬在了空中。我抽出手来想看看几点了，可我既没看见手臂，也没看见手，更没看见手表。我甚至连浪也没看见。我只觉得这艘船完全失控了，我们藏身其中的那些货物一下子都滚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我刚站起身来，海水已经没到我的脖子。我两眼瞪得溜圆，看见了路易斯·任希弗，他脸色铁青，牙关紧咬，想从水里探出身来，手里还高高举着耳机。这时，海水漫过了我的头顶，我急忙朝上方游去。

我朝着上方游去，竭力想浮出水面，一秒、两秒、三秒钟过去了。我还在拼命朝上方游着。气不够了。我快要窒息了。我竭力想抓住一件货物什么的，可那些货物都不见了。我的周围什么都没有。浮出水面时，我朝四下里看去，唯有茫茫大海。一秒钟之后，在离我一百米开外的地方，在波浪中，舰船露了面，它四面八方都在向外淌水，活像只潜水艇。直到此刻我才明白，自己落水了。

Part 3
我眼睁睁看着四个伙伴活活淹死

我第一个印象便是，在茫茫大海之中，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努力漂浮在水上，只见又一个大浪涌向驱逐舰。这时，它离我所在的地方已有二百米远，陷入波谷，从我视线中消失了。我想，它恐怕是沉下去了。过了一会儿，就仿佛是为了验证我的想法，我的四周一个接一个地漂起了无数货箱，都是驱逐舰在莫比尔装上的货物。我漂浮着，身边是装着衣服、收音机、冰箱和各式各样家居用品的箱子，被浪冲得七上八下。一时间，我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任何概念。恍惚中我抓住了一只漂浮着的箱子，傻傻地看着大海。天气无比晴朗。没有任何迹象能显示这里发生过一场海难，除了海风中起伏的巨浪，以及那些四散漂浮在海面上的箱子。

突然，我听见近处有叫喊声。透过凄厉的风声，我清清楚楚地辨认出那声音来自胡里奥·阿玛多尔·卡拉巴约，就是那个高高个子、总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的第二水手长，他正冲着什么人叫喊：

“抓住那里，从救生圈底下抓住了！”

这时，我才像是从一个短暂而深沉的梦中惊醒过来。我意识到落进海里的不止我一个人。就在那里，就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我的伙伴们在努力划水，互相呼唤着。我迅速盘算了一下。眼下我不能毫无方向地游动。我知道我们离卡塔赫纳只有不到二百海里远，可我完全

失去了方向感。这会儿我倒还没怎么害怕。有一会儿我甚至想，我可以就这么抓住这只箱子一直漂下去，直到救援到来。一想到在我周围还有其他水兵和我处在同样的境地，我心安了不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那只救生筏子。

筏子一共有两只，并排漂着，相距差不多七米远的样子。它们是突然出现在一个波浪的波峰之上的，就在那几个互相呼唤的伙伴们那边。奇怪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游到了筏子旁边。转眼间有一只筏子从我视线里消失了。我犹豫了片刻，是冒风险向另外那只游过去呢，还是老老实实地抓住这个箱子不动。不过，在我做出决定之前，我就已经朝那只能看见的筏子游过去了，而它也在越漂越远。我游了差不多三分钟。有一阵子我无法看见它，但我尽量认准方向。猛地一个浪打来，那筏子竟来到了我身旁，白色的，很大，里面什么都没有。我用力一把抓住边上的把手，想翻进筏子里去。一直试到第三次才成功。上了筏子，我气喘吁吁，寒风无情地鞭笞着身体，我好不容易才坐起身。这时我看见筏子周围有我三个伙伴，正努力朝这边游来。

我立刻就认出了他们。仓库管理员埃德瓦尔多·卡斯蒂约正紧紧搂着胡里奥·阿玛多尔·卡拉巴约的脖子。后者出事的时候正在值勤，身上套着救生圈，正高声喊道："卡斯蒂约，抓牢点儿。"他们在货物中间漂浮着，离我有十米左右的距离。

路易斯·任希弗在另外一边。几分钟前我还在驱逐舰上见过他，这时他右手还举着耳机，竭力想浮起来。他镇静如常，带着那种要他晕船得整个大海先晕的好水手的自信，已经脱掉了衬衫，以方便游泳，可他身上的救生圈不见了。我就算没看见他的身影，也能从他的喊声里辨认出他来：

“胖子，往这边划。”

我急忙抓起船桨，尽量向他们靠拢。胡里奥·阿玛多尔，以及紧紧挂在他脖子上的埃德瓦尔多·卡斯蒂约，离筏子越来越近了。再远一些的地方，我还看见了第四个伙伴，拉蒙·埃雷拉，身影小小的，只他一个，一只手抓住一只箱子，另一只手冲我打手势。

仅仅相距三米！

当时若要我抉择的话，我还真不知道先救哪一个伙伴为好。可一看见拉蒙·埃雷拉（就是那个在莫比尔大闹了一场、来自阿尔霍纳的快乐小伙子，几分钟之前他还和我一起待在船尾），我就立刻拼命地划起桨来。可这只筏子有将近两米长，在这怒海之上显得十分沉重，而且我还是顶风划行。我觉得划了半天，只前进了一米不到。我心中无比绝望，又向四下里看了看，这时水面上已经见不着拉蒙·埃雷拉了。只有路易斯·任希弗还在坚定不移地向筏子游着。我坚信他一定能游到筏子跟前来。我听过他在我下铺发出的如雷鼾声，我相信，他身上的那种镇定一定能使他比大海更强大。

这时，胡里奥·阿玛多尔正竭尽全力不让埃德瓦尔多·卡斯蒂约松开自己的脖子。他们离筏子不到三米远。我想，只要他们能稍微再靠近一点，我就可以把一根船桨伸过去让他们抓住。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大浪打来，筏子被抬到了半空。从那个巨大的波峰之上，我看见了驱逐舰的桅杆，它正在离我们而去。等我重新落下来的时候，胡里奥·阿玛多尔，连同挂在他脖子上的埃德瓦尔多·卡斯蒂约，两人都不见了踪影。只剩下路易斯·任希弗还在两米远的水中镇静地向筏子游着。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做了这件荒唐事：明知划不动筏子，我还是把桨插进水里，好像是想让筏子别晃来晃去，让它就这么钉在原地。路易斯·任希弗实在累得不行了，他停下来歇息了一会儿，扬起一只手，就仿佛还举着那副耳机似的，他又对我高声喊道：

“往这边划，胖子！”

风是从他那边吹过来的。我高声对他说顶风划不动，让他再加一把劲。可我感觉他根本听不见我的话。那些货箱都已经不见了，在波浪冲击下，筏子团团乱转。有那么一小会儿，我离路易斯·任希弗有五米远，他又从我眼前消失了。可他又从另一侧露出头来，他还没有慌乱，为了不被浪头卷走，还时不时没进水里。我站起身子，把船桨伸出去，希望路易斯·任希弗再游近一点儿，能抓住这支桨。可这时我看得出来，他已经精疲力竭，失去信心了。沉下去的时候他又一次向我高喊：

“胖子！胖子！”

我使劲划着，可……还是一点用都没有，和先前一模一样。我做出最后一次努力，想让路易斯·任希弗抓住船桨，可是这一次，那只曾经高高举起、那只几分钟前还高举耳机不让它沉没的手，在离船桨不到两米的地方，永远地沉了下去……

我不知道自己有多长时间就这样站立着，在筏子上竭力保持着身体平衡，手里还举着那支船桨。我一遍遍地察看水面，心里盼望着能有人再露出来。可海面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风越刮越猛，咆哮着鼓起我的衬衫。货箱也都不见了。驱逐舰的桅杆越来越远，它告诉我，船并没有像我一开始想的那样沉没了。我平静了下来：我想，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回来找我的。我想，说不定有哪位伙伴上了另一只筏子。这完全是有可能的。筏子上没有任何给养，事实上，这条驱逐舰上的救生筏都没有配备给养。可舰上总共有六只筏子，此外还有几只划艇和捕鲸艇。我相信会有伙伴像我一样抓住了一只筏子，这很合理，也许驱逐舰现在正在寻找我们呢。

突然，我觉得有阳光照在自己身上。那是正午的太阳，热辣辣的，闪亮刺目。我还没有完全醒过神来，茫然中看了看手表。十二点整。

孤身一人

路易斯·任希弗在驱逐舰上最后一次问我时间，是在十一点半。我后来又看过一次表，十一点五十，那时还没有出事。在筏子上我再一次看表的时候，时间是十二点整。原来，从我在驱逐舰舰尾最后一次看表，到爬上筏子，试图救起我的伙伴们，到现在一动不动地站在筏子上，看着空旷的大海，听着凄厉的风声，这一切都发生在十分钟之内，我却以为已经过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想，等到有人来救，起码得要两三个小时吧。

“两三个小时。”我这么盘算着。在我看来，对一个孤苦伶仃地待在海上的人来说，这段时间简直长得无法忍受。可我得尽量忍耐。没吃的也没喝的，我估摸着到下午三点，自己就会渴得喉咙里冒烟。太阳在头顶上炙烤着，我的皮肤被盐一腌，再被阳光一晒，变得又干又硬。落水时帽子弄丢了，于是我索性把头浇湿，在筏子边上坐了下来，静等救援。

直到此刻，我才感觉到右膝疼痛难忍。厚厚的蓝斜纹布裤子已经湿透了，我费了好大劲才把裤腿卷到膝盖上面。卷上去之后，我吓了一大跳：在我膝盖下方，有一道深深的月牙形伤口。我也不知道是碰到舰船的舷边磕破了还是落水时受的伤。我直到在筏子上坐下来才感觉到自己受了伤，虽说伤口还有点儿火辣辣的疼，但已经干了，也不流血了，我想可能是海水里盐的作用。我无所适从，便开始清点自己身上的东西。我得弄清楚，就这样孤身一人漂在海上，自己都有些什么装备。首先，我有只手表，它走得很准，我每隔两三分钟便忍不住要看看时间。我还有枚金戒指，那是我去年在卡塔赫纳买的，以及一

条挂着卡尔曼圣母像的项链，依然是在卡塔赫纳，我从一个水手那里花了三十五个比索买来的。我的衣袋里只有驱逐舰上我的衣物柜的钥匙，还有就是一月份在莫比尔，我和玛丽·埃德瑞斯在一家商场里买东西时，有人塞给我的三张名片。反正也无事可做，我便读那几张名片消磨时间，等人来救我。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那些名片就像是海难中落水的人装在瓶子里扔进大海的漂流信。那会儿我要是真有一只瓶子的话，我也一定会把一张卡片塞进去，走走遭难水手的求救流程，这样，等我这天晚上到了卡塔赫纳，也能对朋友们讲讲逸事逗逗乐。

Part 4
我孤身在加勒比海度过的第一夜

风是下午四点钟停的。放眼望去一片水天茫茫，没有任何参照物，因此，过了两个小时我才发现筏子在前进。其实，自从我上了这只筏子，它就一直在风的推动下笔直前行，速度恐怕比我用桨划行还要快得多。可我对行进的方向和此时的位置一无所知。我不知道这筏子是在向岸边驶去，还是在漂向加勒比海深处。我觉得多半会是后者，因为我始终认为，大海不大可能把一个离岸二百海里的东西推向岸边，更何况这东西还死沉死沉的，比如是一只筏子，筏子上还载着一个人。

最初的两个小时，我一直在心里追随着驱逐舰每一分钟的航程。我想，他们已经给卡塔赫纳发过电报了，也一定报告了事故发生的准确位置，那么，接到消息后岸上的人就会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来救我们。我算了算时间：不出一个小时，就会有飞机来到这里，在我头顶盘旋。

下午一点，我坐在筏子上注视着海平面。我卸下了三支船桨，放在筏子里，准备等飞机到来时迎着它们划过去。每一分钟都漫长而紧张。太阳炙烤着我的脸庞和后背，嘴唇由于沾了盐而开裂，火辣辣地疼。可这时的我既不觉得渴也不觉得饿。我唯一的需求就是飞机赶紧出现。我已经计划好了：一旦看见飞机，我就尽力朝它们划去，接下来，等它们飞到我头顶上的时候，我要在筏子上站立起来，用我的衬

衫向它们发出信号。为了做好准备，不耽误哪怕一分钟，我把衬衫扣子全解开了，坐在筏子边上，四下里搜寻观察，因为我对飞机会从哪个方向钻出来完全没有概念。

就这样到了下午两点。风还在呼啸，风声里我还能听见路易斯·任希弗的声音："胖子，往这边划。"这声音我听得清清楚楚的，好像他就在那里，就在两米开外，尽力想抓住船桨。可我知道，当海上有风在呼啸的时候，当巨浪撞击着悬崖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把记忆中的声音当成真实的声音。这声音会久久不散，迷人心智："胖子，往这边划。"

到三点钟的时候，我开始绝望。我知道，这个点驱逐舰应该已经停靠在卡塔赫纳的码头上了。我的伙伴们，满怀着归家的喜悦，不一会儿便都会融入城市的大街小巷。我有种感觉，他们不会忘记我，这个念头给了我力量和耐心，我坚持到了四点钟。就算他们没发电报，就算他们没有发现我们落水，到了这个时候，当舰船停靠码头，全体船员到甲板上集合时，他们也总该发现了吧。最晚应该在三点钟，他们会立刻发出通知的。就算飞机起飞前再耽搁一段时间，半个小时之内它们也总该往这边飞过来了吧。这么说四点钟—最迟四点半，飞机就应该在我头顶上盘旋了。我继续观察着海平面，直到最后风停了，我只觉得自己被一片无边的沉默所包围。直到这时，路易斯·任希弗的叫喊声才从我的耳边消失。

黑夜无边

一开始，我简直无法想象孤零零的一个人在海上待三个小时。可到了五点钟，已经过去五个小时了，我反倒觉得再等上一个小时也不成问题。太阳慢慢落了下去，在天边显得又大又红，这时我才算找到了方向。我总算知道飞机会在哪个方向出现了：太阳在我右手边，我就朝正前方看去，一动也不敢动，目光一刻也不敢离开，眼睛都不敢眨，就这样面对着我感觉中卡塔赫纳的方向。看到六点钟，我两眼又酸又疼，可我仍然坚持盯着。甚至天变黑了，我还在顽固地坚持着。我很清楚那会儿已经看不见飞机了，但我总能在听见马达的轰鸣前看见那些红红绿绿的灯光朝我飞来吧。我一心想着那些灯光，全然忘记了黑夜中飞机完全不可能看见我。天空突然变成了一片赤红，我继续盯着海平面。后来，天空又变成了深紫色，我依然在搜寻。在筏子的一侧，第一颗星星出现了，像颗黄色的钻石，一动不动地挂在暗紫色的天空中。这像是一个信号，随即夜晚降临，浓重而巨大的夜幕笼罩住了整片大海。

当我发现自己已经深深陷入黑暗，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时，心里升起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无法控制的恐惧。通过海水拍打筏子的声音，我知道筏子还在慢慢地不知疲倦地继续前行。在漆黑夜色的包围中，我感觉到比白天更加强烈的孤独。黑暗中我坐在筏子里，看不见筏子，只能感觉到它就在我身下，无声无息地在深沉的大海上滑行，海面下充斥着奇特的生物。我感到无比寂寞。为了驱走这种寂寞感，我看了看手表表盘。差十分钟到七点。又过了好久，我觉得应该过了两三个小时吧，手表显示七点还差五分钟。当分针指向十二这个数字

时，七点整了，天上布满了繁星。可在我的感觉里，好像已经过去了好长好长时间，天都应该快亮了才对。绝望之余，我只好继续想着飞机。

我开始有点儿冷了。想要在筏子上保持哪怕一分钟的干燥也是种奢望。就算你坐在筏沿上，下半身也都在水里泡着，因为筏子的底部就像一只挂在水里的篮子，吃水部分深达半米。八点时，海水比空气稍稍暖和一点。我知道待在筏子里面能让我免遭海洋生物的袭击，因为筏底有保护网把它们隔开。学校里是这么教的，在学校里你也就这么相信了，可那时的情况是：指导员在一个缩小了的筏子模型上做示范，时间是下午两点，而你坐在木凳上，身边还有四十个同学。如今，在晚上八点，当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在海上，没有任何希望，你就会觉得指导员的话毫无道理可言。我知道自己有半个身子泡在一个不属于我们人类、只属于海洋生物的世界里，虽说冰冷的风一阵阵地抽打着我的衬衫，我还是没胆量从筏沿上挪开。按照指导员的讲法，筏沿是最不安全的地方。可不管怎么说，只有坐在那里我才觉得自己离那些生物稍远一点：那些巨大的未知的怪物，我能听见它们正神神秘秘地在筏子四周游动。

那天夜里我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小熊星座，因为它淹没在密密麻麻无边无际的星斗之中。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那么多的星星。整个天空都布满了星星，几乎没有留白处。我找见小熊星座后，就不敢再看别的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眼里有了小熊星座，我的孤独感减轻了许多。在卡塔赫纳时，每当有了假期，我们常常在清晨时分坐在曼加桥上，听拉蒙·埃雷拉模仿丹尼尔·桑托斯唱歌，还有人用吉他为他伴奏。坐在石桥的栏杆上时，我总能在珀帕山那个方向找到小熊星座。那天夜里，我坐在筏沿上，仿佛回到了曼加桥，拉蒙·埃雷拉就在我旁边，

在吉他伴奏声里唱着歌，仿佛小熊星座也并不在离陆地两百海里的远方，而就在珀帕山的上方。我想象在此刻，卡塔赫纳一定也有人正眺望着小熊星座，就如同我在海上看着它一样，我的孤独便少了几分。

我在海上的第一夜显得尤其漫长，也因为那天夜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根本无法用语言形容在筏子上的这样一个夜晚，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你心中满是对那些未知生物的恐惧，此外，你还有一只夜光表，你随时都在看时间。二月二十八日的夜晚，在海上度过的第一夜，我每一分钟都在看表。那完全是一种折磨。绝望中，我发誓不再这么干了，想把它摘下来装进衣兜里，免得总去操心几点钟了。我坚持到了八点四十。我倒也不渴不饿，坚信自己一定能等到第二天飞机到来。可我又一想，这样下去这只手表就会把我弄疯的。深陷焦虑的我把表从手腕上摘下来，打算把它塞进衣兜里，可把表拿在手上的时候，我转念一想，还不如把它扔进大海一了百了。我犹豫了片刻，然后心中一阵恐惧：我想，没了手表我会更加孤独的。于是我又把表戴回手腕，继续每过一分钟就看一下时间，就像那天下午我瞭望海平面等候飞机时一样，最后看得两眼酸疼。

十二点以后，我很想哭。我一秒钟都没睡，而且一点儿也不想去睡。就像下午我期望能在海平面上看见飞机一样，夜间，我一直在寻找船舶的灯光。我久久地在海上搜寻；大海平静，辽阔，沉默，可我终究没能找到哪怕一盏和天上的星星不一样的灯火。

凌晨时分，天更冷了，我感觉前一天下午的阳光浸透了我的皮肤，我的身体在发出荧光。天越冷，这荧光反倒越亮。午夜过后，我的右膝开始疼痛，好像海水渗进了骨头里似的。可这些感受都非常遥远。我的注意力远不在自己的身体上，我在意的是过往船舶的灯光。

我想，在那无穷无尽的孤寂中，在那黑色大海的呢喃中，只要看见一条船上的灯火，我就会发出一声大吼，不管相距多远都能被听到。

每天的日光

天亮的过程不像在陆地上那么慢。天空的颜色淡了下来，星星开始消失不见，我还是一会儿看看手表，一会儿看看海面。逐渐能看清海的轮廓了。已经过去了十二个小时，这在我看来是件根本不可能的事。夜晚是不可能跟白天一样长的。你必须在大海上度过一个夜晚，而且得坐在一只筏子上，不断地看手表，才会知道其实夜晚比白天长得多。还有，天说亮就亮，你会厌倦地知道又是另外一天了。

这就是我在筏子上过完第一夜的感受。天空开始发白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我既不想喝水也不想吃东西。我什么都不去想，直到海风变得暖和，海面也变得平平展展、金光灿烂。这一整夜，我一秒钟都没合眼，可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刚刚从梦中醒来。我在筏子上伸了个腰，浑身上下的骨头都酸疼酸疼的，皮肤也有灼烧感。可白天毕竟是亮堂堂暖洋洋的，阳光明媚，海风渐起，仿佛在低声细语，我又重新鼓起力量，再继续等下去。坐在筏子里，我觉得很祥和宁静。在我有生以来的二十年里，我第一次感到无比幸福。

筏子还在继续前行，我说不准它在夜里到底走了多远的路，可海平面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就仿佛这筏子连一厘米都没挪动过。早上七点钟，我想起了驱逐舰。这会儿是早餐时间了。我想象着伙伴们坐在餐桌边吃苹果。接下来还会有鸡蛋。然后是肉。再然后是面包和加了牛奶的咖啡。我嘴里涌满了口水，胃也有点拧着疼。为了岔开这些念头，我把身体浸到筏子底部的水里，只露出脑袋。被晒得热乎乎的脊背泡进凉凉的海水里，我觉得自己强壮又轻松。我就这样在水里泡了好长时间，一面质问自己，干吗要和拉蒙·埃雷拉一起跑到舰尾，而

不是回去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我回忆着这场悲剧的每一分钟，认为自己真是个傻瓜。莫名其妙地，我成了一名落难者：又不该我值勤，我完全没必要待在甲板上。我想，这一切恐怕都是因为运气不好，这么一想，我又有些伤感。可看了看手表后，我又平静了下来。白天过得真快：已经是十一点半了。

海平面上的一个黑点

快到正午时，我又一次想起了卡塔赫纳。我想，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我失踪了。然后我竟为自己爬上了筏子而后悔，因为有一阵子我猜测伙伴们都已经获救了，唯一一个漂在海里没着没落的就是我，因为筏子被风吹远了。我甚至认为爬上筏子是走了霉运。

还没等我想得更远，海平面上似乎出现了一个黑点。我翻身爬起，两眼直勾勾地盯住那个前进中的黑点。这时是十一点五十分。我全神贯注地盯着，一时间，整个天空都光点缭乱。但那个黑点还在继续前进，直朝着筏子的方向飞来。发现它两分钟后，我已经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它的形状。在闪亮蔚蓝的天空中它越飞越近，射出刺眼的金属光芒。在一片光点当中，慢慢地它的模样越来越清晰了。我脖子酸疼，两眼也无法忍受天空的光亮。可我还在注视着它：它闪着光，速度飞快，直冲着筏子飞来。那一刻我反倒没觉得有多开心，我没有那种情绪爆发的感觉。站立在筏子上，随着飞机越飞越近，我只觉得异常清醒，十分冷静。我慢慢地脱下衬衫。我心中十分清楚什么时候是用衬衫打出信号的最佳时机。我手拿衬衫，等了一分钟，两分钟，等飞机离我再近一点。它朝着筏子飞来。我举起胳膊开始摇晃衬衫的时候，清楚地听见了它的发动机越来越大的震耳欲聋的轰鸣，盖过了波涛的声音。

Part 5
筏子上我有了一个伙伴

我激动地挥舞了衬衫至少五分钟时间。可很快我就明白自己搞错了：飞机并不是朝着筏子飞来的。在我看着那个黑点的时候，我以为它会从我头顶飞过。实际上它飞行的线路离我很远，而且从它飞行的高度也根本不可能看见我。然后它拐了一个大大的弯，往回飞去，又慢慢消失在了天空中它曾经现出身影的那个方向。我站立在筏子上，不顾烈日的炙烤，眼睛盯着那个黑点，脑子里一片空白，直到它完全从海平面消失。这时我才重新坐了下来。我觉得倒霉透了，可还没有完全丧失希望，便决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免受日晒。我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自己的胸肺被阳光直晒。这时是正午十二点。我已经在筏子上度过了整整二十四小时。我贴着筏沿仰面躺下，把打湿的衬衫盖在脸上。我不能睡着，因为我知道一旦在筏沿睡着了，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我还在想那架飞机的事：我不能肯定它是来找我的，而且我也认不出它是哪里的飞机。

躺在筏沿上，我第一次感到干渴难耐。开始是口水越来越黏稠，后来是嗓子眼发干。我想喝一点儿海水，可又知道那是对身体有害的。再过一会儿吧，实在不行就少少地喝上一点。接着，我就把口渴忘在了脑后，因为突然，就在我的头顶，传来另一架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压倒了波涛声。

我激动极了，从筏子上支起身子。飞机从之前那架飞机飞来的方向越飞越近了，这一架真的是直直地朝着筏子飞来的。就在它越过我头顶上空的时候，我再次挥动起衬衫。可这架飞机还是飞得太高。它离我太远了，就这样飞过去，最终消失了。后来它也拐了个弯，我看见了它在天空中的侧影，然后它就沿着来的方向飞走了。我想，这说明他们正在寻找我。于是我坐在筏沿上，手里紧握着衬衫，等待着别的飞机飞来。

通过飞机我弄清了一件事：它们总是从同一个地点来又飞回同一个地点去。这意味着那边就是陆地。我现在总算知道该朝哪边划行了。可怎么划呢？就算这筏子夜里前进了不少路程，可它离岸边还远得很呢。虽然我弄清了陆地的方向，可是要划多长时间才能靠岸，我就一点也不知道了，另外，太阳已经把我的皮肤晒起了泡，我又饿得胃发痛。尤其是我非常口渴。连呼吸都越来越困难了。

十二点三十五分，我甚至都没太注意，有一架黑色的大飞机飞了过来，机身携带着水面上起落用的浮筒，轰隆隆地从我头顶飞过。我不禁心头一动。我清楚地看见了它。这天光线很好，我可以一清二楚地看见驾驶舱里有人伸出头来，用一副黑色望远镜观察着海面。它飞得那么低，离我那么近，我好像感觉得到它强力的发动机叶片扇起一股风，掠过我的脸庞。我看得清它机翼上的字：这是一架运河区海岸警卫队的飞机。

当它轰鸣着向加勒比海深处飞去时，我再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了，那个拿望远镜的人肯定看见我挥动衬衫了。“他们看到我了！”我高声喊叫起来，手里还不停地挥动衬衫。我激动得忘乎所以，在筏子上跳了起来。

他们看见我了！

不到五分钟，那架黑飞机又飞了回来，高度和上一次差不多。它机身朝左倾斜着，透过这一边的窗户，我又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个拿望远镜搜索海面的人。我又一次挥舞衬衫，这回心里不再那样绝望了。我平静地挥动着，不像是在请求帮助，倒好像是在对发现我的人表示热情的问候，并感谢他们。

我觉得那飞机的位置越来越低了。有一阵子它几乎要擦着水面直直地向我飞来。我想它是要在水上降落了，便准备朝它降落的地点划去。可过了一会儿，它又重新拉升，转了个弯，第三次从我头顶上空掠过。这一回我没有再使劲地挥动衬衫。我想等它飞到筏子上空再说。我对着飞机打出简单的信号，想等它再飞回来，再飞低一点儿。可事情的发展和我的预想恰恰相反：它迅速爬高，又从飞来的方向消失了。这回我没有什么担心的理由。他们肯定看见我了。飞机飞得那么低，又刚好从筏子上空飞过，他们不可能看不见我。我放下心来，一点都不担忧，满心欢喜地坐下等待着。

我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我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先前那几架飞机来的方向毫无疑问是卡塔赫纳。那架黑色飞机消失的方向应该是巴拿马。我算了算，如果沿直线划动筏子，就算被风稍稍吹偏一点方向，我很可能能划到托卢温泉度假区，它大致是那些飞机消失的两个方位的中点。

我计算过了，一个小时之内就会有人来救我。可一个小时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蔚蓝色的大海还是那样清澈而宁静。又过去了两

个小时。很多个小时过去了，我在筏沿上，一动也不想动。我神经高度集中，两眼一眨不眨，搜寻着海平面。下午五点钟，太阳开始落下了。我还没有完全失望，可已经感到了不安。我敢肯定，那架黑色飞机上的人看见我了，可我无法向自己解释，为什么过去了那么长时间，还没人来救我。我的喉咙干渴难当，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漫不经心地观察着海平面。突然，不知缘由地，我猛地弹起，摔进了筏子中央。一条鲨鱼的背鳍，缓缓地，好像是在寻找什么猎物，从筏子一边擦了过去。

五点钟鲨鱼来了

这是我在筏子上待了几乎三十个小时里看见的第一个活物。鲨鱼的背鳍让人恐惧无比，因为谁都知道这些家伙的凶狠。可实际上，没有比鲨鱼背鳍显得更无害的东西了。它一点也不像是动物身上的某一部分，更别提是凶猛动物了。它颜色有点儿发绿，很粗糙，像块树皮。当我看见它从筏子旁边滑过去的时候，我有种感觉，这东西咬在嘴里应该很凉爽，带点儿苦味。这时已经过了五点。黄昏时分的大海一片宁静。又有几条鲨鱼游到了筏子旁边，它们不慌不忙，来回转悠，直到天完全黑下来。那时海上什么光亮都没有了，可我能感觉到它们在黑暗中游弋，用它们的背鳍划破宁静的水面。

从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没有在下午五点过后坐在筏沿上。第二天，第三天，一连四天时间里，我充分体会到鲨鱼是一种很守时的动物：它们五点一过就会到来，直到天黑才会离去。

黄昏时分，清澈的大海就是一幅美丽的画卷。五颜六色的鱼都游到了筏子跟前。硕大无比的黄鱼和绿鱼，还有红蓝条相间的鱼，圆滚滚的，或小巧玲珑的，都来陪伴我这条筏子，直到夜色降临。有时会亮起一道金属光泽的闪电，筏子旁的水面就会涌出一股带血的水柱，接着就漂起被鲨鱼咬得稀碎的鱼块。这时会有无数的小鱼游过来争抢这些残存的碎片。这种时候，如果能吃上鲨鱼的残羹，哪怕只是最小的那一块，即便要出卖自己的灵魂我都愿意。

那是我在海上度过的第二个夜晚。饥渴难当，失望已极。在只能寄希望于飞机来救我之后，我感到自己被抛弃了。这天夜里，我判定

要想得救，唯一能依靠的是我自己的意志和残余的体力。

有一件事情使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感到有点虚弱，但不是那种精疲力竭。我有将近四十个小时没吃没喝了，而且超过两天两夜没合眼，因为出事的前一天夜里我也没睡着。尽管如此，我觉得自己仍然有力气划桨。

我又一次寻找小熊星座。我两眼死死盯住这星座，又开始划桨了。刮起了微风，可这风并没有如我所愿把筏子送往小熊星座的方向。我把两支桨固定在筏沿上，从夜里十点钟开始划水。起初我毫无章法。后来我逐渐冷静下来，盯住了小熊星座的方向，根据我的计算，它应该正好就在珀帕山上空闪烁。

水声告诉我筏子在前进。划累了，我就把桨交叉收起来，把头靠在上面休息一下。过一会儿，再鼓足力气也鼓足希望，重新把桨握在手中。夜里十二点，我仍然在不停地划。

筏子上的伙伴

快两点的时候，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我把桨交叉着支了起来，打算睡一会儿。这时我更渴了。饥饿倒不太烦人。烦人的是口渴。我实在太累了，把头靠在桨上，心想还不如一死了之。就在这时，我看见了水手海梅·曼哈雷斯，他坐在驱逐舰的甲板上，用食指指向港口的方向。海梅·曼哈雷斯是波哥大人，是我参加海军以后最早结识的朋友之一。我经常会想起那几个努力想爬上筏子的伙伴。我问自己，他们有没有爬上另外那只筏子，驱逐舰是不是已经把他们救走了，或者，那些飞机是不是已经找到他们了。可我之前没想起过海梅·曼哈雷斯。可这会儿，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海梅·曼哈雷斯就出现在我眼前，笑嘻嘻的，先是指给我港口的方向，然后坐在食堂里，就在我的对面，手里端着一盘水果，还有炒鸡蛋。

一开始那只是个梦。我一闭上眼睛，准备睡上那么一小会儿，海梅·曼哈雷斯就准时出现，还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最后我决定同他聊聊。我记不清一开始问了他一个什么问题，也记不清他的回答了。可我记得我们正在甲板上说着话，突然一个大浪卷来，就是十一点五十五分的那个大浪，我猛然惊醒，用尽全力死死抓住筏子边上的绳子，才没掉进大海。

黎明前的天色更加暗沉。我再也睡不着了，因为我太累了，连睡觉的力气也没有了。黑暗中，我连筏子的另一端都看不清，可我还是在漆黑中竭力睁着眼睛，想把这黑暗看穿。于是，就在筏子的另一端，我又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海梅·曼哈雷斯，他坐在那里，穿了身工作

服，蓝衬衫蓝裤子，帽子稍稍往右耳斜戴着，虽然漆黑一片，但帽子上还是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卡尔达斯号”几个字。

“喂！”我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一点也没惊慌。我确信海梅·曼哈雷斯就在那里，而且确信他一直都在那里。

就算这是一场梦，那也没什么要紧的。我知道自己没有睡着，我清醒得很，我能听见风在呼啸，大海在周围轰响。我能感到饥渴。我一点儿都不怀疑，海梅·曼哈雷斯就在筏子上，和我在一起。

“你在舰上为什么不把水喝够？”他问我。

“因为那时我们就快到卡塔赫纳了，”我回答，“我当时和拉蒙·埃雷拉一起在舰尾躺着。”

这不是什么幽灵，我也一点儿都不害怕。这甚至有点可笑：先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孤零零的，竟不知筏子上还有一个水兵和我在一起。

“你为什么没吃饭？”海梅·曼哈雷斯问我。

我记得很清楚，我是这样回答他的：

“因为他们不想给我饭吃。我向他们要苹果要冰激凌吃，他们不给我。不知道他们把那些东西藏哪儿去了。”

海梅·曼哈雷斯没有答话。他沉默了一小会儿。又一次向我指了指卡塔赫纳的方向。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看见了港口的灯火，还有在港湾水面上下跳动的浮标。“我们到了。”我说道，眼睛还在专注地盯着港口的灯火，心中没有激动，没有高兴，就像是从一次普普通通的航行归来似的。我对海梅·曼哈雷斯说咱们一起再划两下。

可他已经不在那里了。他走了。剩我一个人待在筏子上。那港口的灯火不过是初升的太阳放出的光芒。这是我孤身一人在海上第三天的第一缕阳光。

Part 6
救援船和食人族的小岛

起初，我通过事件来记住日期：第一天，二月二十八日，是出事的那一天。有飞机飞来的是第二天。第三天是最困难的一天：什么特别的事都没发生。筏子由微风推动着向前航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划船了。天空布满了乌云，有点冷，因为看不见太阳，我迷失了方向。这天上午，我对飞机会从哪个方向飞过来都没了概念。这是条筏子，既没船头也没船尾，四四方方的，有时候还会横过来前进，不知不觉就转了个方向。因为没有参照物，就连它到底是在前进还是倒退我都搞不清楚。四面八方都是一模一样的海。有几次我参照筏子前进的方向躺在筏子的后部，用衬衫裹着脑袋歇一会儿。可等我爬起身来，筏子已经在朝我躺着的这一头前进了。我也无法弄清到底是筏子改变了前进的方向，还是说仅仅掉了个头。第三天之后，我对时间也产生了类似的疑惑。

中午，我拿定主意做两件事：首先，我把一支船桨固定在筏子的一端，这样我就可以知道筏子是不是总沿着一个方向前进；其次，我用钥匙在筏沿上每过一天就刻上一道印子，再刻上日期。我刻上第一道印子，并且标上了数字：28。

接着我又刻下第二道印子，标上又一个数字：29。第三天，在第三道印子旁边，我标上了30。我又把事情弄混了。我以为这一天是三十号，其实是三月二日。直到第四天，我拿不准这个月是三十天还是

三十一天时，才发现这个错误。我这才想起来刚过去的是二月份。现在说起来是够傻的，可当时就是这样一个错误弄乱了我的时间概念。到了第四天，我对自己在筏子上待过的天数有点拿不准了。到底是三天呢？还是四天？会不会是五天呢？根据刻下的印子来看，管他二月还是三月呢，应该是过了三天。可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就像我对筏子到底是在前进还是后退也没有把握一样。我决定干脆不去管它了，这样至少不会继续疑惑，而我也对获救彻底绝望了。

我还是没吃没喝。连想事情我都懒得去想，因为要把自己的想法理顺都很耗费精力。在烈日的炙烤下，我的皮肤火辣辣地疼，起了好多水泡。在海军基地的时候，指导员们总对我们说，不管怎么样都不要让胸肺在阳光下暴晒。这是眼下我伤脑筋的事之一。衬衫总是湿漉漉的，我早已把它脱了下来，拴在了腰间，因为我特别讨厌衬衫贴在身上的感觉。我已经三天没喝水了，几乎无法呼吸，嗓子、胸口、锁骨下方都生疼生疼的，因此第四天我喝了点儿咸咸的海水。虽说海水不能解渴，但总可以凉快一下。这口水我抿了好长时间，因为我知道，下一次我得喝得更少点儿，而且必须是间隔好多个小时之后。

鲨鱼倒是每天都来，而且准时得惊人，五点钟如约而至。筏子四周顿时就热闹起来。大一些的鱼会跃出水面，而片刻之后它们再一次出现的时候就尸骨不全了。发狂的鲨鱼们闷声不响，迅猛地冲撞被鲜血染红的水面。它们倒还没有想来攻击这条筏子，但因为筏子是白色的，它们都被吸引了过来。所有人都知道，鲨鱼最喜欢攻击的就是白色的东西。它们都近视，只能看见白色的发亮的东西。这又是一条指导员给我们讲过的准则:

“要把发亮的东西藏起来，免得招惹鲨鱼。”

我身上没有什么发亮的东西。就连我手表的表盘也是深色的。可万一鲨鱼打算跳过来攻击筏子，我倒真想有件亮晶晶的东西，可以远远地扔出筏子，那样我心里恐怕会踏实一点。为预防万一，从第四天开始，一过下午五点，我就会把船桨握在手中，以备防身。

我看见了一条船!

夜里，我把一支船桨横着搁在筏子上，想睡一觉。我也不知道这事儿是只在我睡着的时候才发生，还是我醒着的时候也会发生，反正每天夜里我都能看见海梅·曼哈雷斯。我们通常会就随便什么话题聊上几分钟，然后他就消失了。我对他的造访已经习以为常。太阳升起后，我会想，这恐怕是幻觉。可一到夜间，我毫不怀疑，海梅·曼哈雷斯就在那里，在筏沿上和我聊天。到了第五天凌晨，他也想睡上一觉。他靠着另外一支船桨静静地打着盹。突然，他在海面搜寻了一番，对我说:

“快瞧！”

我举目望去。在离筏子大约三十公里的地方，我看见了一艘船的灯光，那灯光一闪一闪的，但毫无疑问，是船上的灯光，在顺着风的方向移动。

我有好多个小时没有力气划桨了。可当我看见灯光时，立刻直起身来，用力握住了船桨，尽力向那艘船划去。我看见它走得并不快。有那么一小会儿，我不但看见了它桅杆上的灯光，还看见了船的影子，随着黎明初泛的光线移动。

风不大，阻力却不小。我用尽全力划桨，四天四夜我都没吃一点饭，没睡过一个囫囵觉，这力量简直不像是我能有的。可最终，我觉得我连一米也没能把筏子划离风吹的方向。

灯光越来越远，我开始浑身冒汗。我觉得力气已经用尽。过了二十分钟，灯光彻底消失了。星星一点点不见了，天空染上了一层铅灰色。大海之中，我心灰意懒，把船桨往筏子上一扔，站起身来，冰冷的晨风吹打在我身上，有两三分钟时间，我像发了狂一样大叫大嚷。

太阳又一次升起的时候，我靠在船桨上躺着。我觉得全身都虚脱了。现在我不再指望还会有人从哪里冒出来救我，我只想死去。可每当我想一死了之的时候，就会冒出奇怪的念头：我会马上想到某个危险。这样的念头给了我新的力量，帮我坚持下来。

在海上第五天的早上，我打算无论如何也要改变一下筏子前进的方向。我想到，如果我就这样顺着风向航行下去，恐怕会去到一个住着食人部落的小岛上。在莫比尔的时候，我在一本杂志上看过一篇报道，杂志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说的是有一个遇到海难的人被食人族吃掉了。可那会儿我想的倒不是这篇报道，而是我两年前在波哥大读过的一本书《变节水手》。它讲的是一个水手的故事，战争中，他所在的船触雷之后，他游到了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在岛上他待了二十四小时，靠吃野果充饥，直到被食人族发现，他们把他塞进一口装着沸水的大缸里，活活煮死了。那个小岛萦绕在我脑海里。现在我只要一想到靠岸，就会想起那居住着吃人生番的领地，于是，在海上独自漂泊了五天之后，我的恐惧头一次改变了方向：现在陆地对我造成的恐惧远远超过海洋。

中午我靠在筏沿上，在烈日和饥渴的折磨下昏昏欲睡。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对时间和方向都没了感觉。我想站立起来，看看自己还有没有力气，可我觉得自己已经指挥不动自己的身体了。

“到时候了。”我想。实际上，我觉得指导员给我们讲过的各种情况中最可怕的时刻已经来到：该把自己绑在筏子上了。有一阵子你不再有饥饿干渴的感觉，长满水泡的皮肤被阳光暴晒也不觉得疼痛。思想停滞。五感丧失。可还没有完全丧失希望。那就用最后一点力气解开筏子上的绳索，把自己绑在筏子上。在战争年代，很多尸体被发现的时候都是这副样子，他们已经尸骸不全，被鸟啄得不成模样，可依然牢牢地绑在筏子上。

我想我还有点精力熬到晚上，先不着急把自己绑起来。我滚到筏子底部，舒展双腿在水里待了几个小时，只露出脑袋。当太阳晒到我膝盖上的伤口时，疼痛感袭来。这伤口好像是苏醒了一样。而这一疼也让我知道了自己还活着。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在清凉的海水里泡着，我逐渐恢复了不少体力。这时，我觉得胃里拧着疼，肚子里一阵蠕动，发出又长又闷的声响。我想忍住，但不可能。

我艰难地支起身来，解下腰带，松开裤子，把肚子里的东西排出去之后，我轻松了一大截。这是五天里的第一次。于是，五天里，鱼群也第一次死命地冲击着筏沿，竭力想把结结实实的网绳咬断。

七只海鸥

鱼群闪着银光，近在咫尺，使我更加饥饿难熬。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绝望。但至少眼前我还有点诱饵。我不顾身体虚脱，抄起一支船桨，这时鱼群正在筏子边疯狂地争抢着，我准备使出最后一点力气，敲在往筏子上撞的某条鱼头上。我也不知道挥了多少下船桨。我觉得每一下好像都打中了，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我的猎物。一大群鱼在疯狂地互相撕咬，一条鲨鱼，翻着肚皮，正在搅成一团的海水中大快朵颐。

鲨鱼的到来使我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打算。我心灰意冷，放下船桨，贴着筏沿躺了下来。过了没几分钟，我心里一阵狂喜：有七只海鸥在筏子上空飞翔。

对一个独自漂流在大海上、饿得半死的水手来讲，海鸥就是希望的信使。海鸥一般是尾随着船舶飞行的，但一般它们只追到航行的第二天就会离去。筏子上空飞翔着七只海鸥意味着陆地不远了。

倘若我还有一丝力气的话，肯定会划桨的。可我太虚弱了。就连站我都站不了几分钟。我坚信此刻离陆地只有不到两天的航程，坚信我离陆地越来越近，便又用手捧了点海水喝，然后再一次仰面朝天在筏子边上躺了下来，避免阳光直射我的胸肺。我没有用衬衫盖住脸，因为我想一直看着那些海鸥慢慢飞行，斜斜地向着海面飞，逐渐消失在海的深处。这是我在海上第五天的下午一点钟。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飞来的。快五点了，我躺在筏沿旁边，正准备在鲨鱼群到来之前下到筏子中央去。可这时我看见一只小小的海鸥，大概只有巴掌大小，它绕着筏子飞行，时不时还在筏子的另一端停一会儿。

我的嘴里涌上一股凉凉的口水。我真没什么办法抓住那只海鸥。我什么工具也没有，只有一双手，还有就是被饥饿磨炼出来的狡黠。别的海鸥都已经飞走了。只剩下这一只，小小的，咖啡色的羽毛亮闪闪的，在筏子上跳来跳去。

我一动也不敢动，只觉得肩膀那里有鲨鱼锋利的背鳍划过，它们五点准时到来。可我还是决定冒一次险。我甚至没敢去看一眼那海鸥，不想让它察觉到我的头在动。我看见它从我身体上方飞过，飞得很低。它飞远了，消失在天边。可我依然满心期待。我也没去想怎么才能捉住它。我只知道我饿了，如果我待在那里完全一动不动，那海鸥迟早会飞到我手边来的。

我觉得等了足有半个小时。我看着它出现又消失好几次了。有那么一刻，我感到一条鲨鱼就在我的脑袋旁边掠过，把一条鱼咬得粉碎。可饥饿压倒了恐惧。海鸥在筏沿上跳来跳去。这是我在海上漂流的第五天的傍晚了。五天里我没吃一点儿东西。虽说我心里激动万分，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跳动着，可我还是纹丝不动，像死人一样。渐渐地，我感觉到那海鸥离我越来越近了。

我直挺挺地靠在筏沿上，两只手紧贴着大腿。我确信这半个小时我连眼皮都没敢眨一下。天空很明亮，眼睛受不了，可在那紧张万分的时刻，我不敢闭上眼睛。那海鸥正在啄我的鞋。

漫长而紧张的半小时过去了，我感觉得到那海鸥就歇在我的腿上。它轻轻地啄了啄我的裤子。它又狠狠地啄了一下我的膝盖，我还是一动不动。膝盖有伤，我差点儿没疼得跳起来。可我忍住了。接着，它又跳到我右边大腿那里，离我的手只有五六厘米的距离了。这时，我屏住了呼吸，绷紧身体，以一个难以觉察的动作，把手伸了过去。

Part 7
一个饿得半死的人的绝望办法

如果一个人躺在广场上试图捉一只海鸥，他可能在那里躺上一辈子也无法成功。可是在离海岸一百海里的地方，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陆地上，海鸥自我保护的本能很敏锐，但在海上，它们却有些盲目自信。

我一动不动，那只歇在我大腿上的贪玩小海鸥可能把我当成了一具死尸。我看着它歇在我大腿上，在我的裤子上啄来啄去，一点儿都没伤着我。我的手继续滑动，就在它感觉到危险、准备展翅飞翔的那一瞬间，我猛地抓住了它的一只翅膀，随即滚进筏子中央，准备将它生吞活食。

当我还在等它跳到我大腿上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只要能抓住它，我就把它活活吞下去，连毛都不拔。我实在是饿狠了，而且一想到还有血可以喝，我就更渴得受不住了。可是，当我已经把它抓在手中，感觉到它热乎乎的身体在颤抖，再看着它那又圆又亮的褐色眼睛时，我还是犹豫了片刻。

有一回，我在甲板上，手里拿了一支卡宾枪，想打一只尾随在我们船后面的海鸥。驱逐舰上的枪炮长是一个老水手，他告诉我说："别干没出息的事。对水手来说，看见海鸥就等于是看见了陆地。杀死海鸥可不是水手应该干的事。"就当我在筏子上打算杀死那只海鸥并把它

撕成碎块的时候，我想起了那天的情景，想起了枪炮长的话。不错，我是有五天没吃一点东西了，可他的话就在我耳边回响，仿佛在又一次讲给我听。然而，在那样的时刻，饥饿感压倒了一切。我用力抓住那家伙的头，像杀鸡一样拧断了它的脖子。

它非常脆弱。只拧了一圈，我就感觉到它脖子上的骨头全碎了。又拧了一圈，我感觉热乎乎的鲜血涌了出来，流在我的指间。我心里有些不忍。这简直就是一场残杀。它的头与身体分离开来，在我手中还一动一动的。

喷到筏子上的血刺激了鱼群。一条鲨鱼翻着白得发亮的肚皮从筏边掠过。在这种时候，鲨鱼若嗅到血腥味发起狂来，连钢板都能一口咬断。它的嘴长在身体下方，必须翻过身来才能吃到东西。而这个贪吃的家伙又是个近视眼，当它翻过身体肚皮朝上的时候，能把碰见的一切都卷走。我觉得那一刻鲨鱼是想把筏子掀翻。我吓得要死，赶紧把海鸥头扔了出去，于是我看见就在筏子旁边几厘米的地方，那群巨大的家伙，为了一个比鸡蛋还要小的海鸥头争得不可开交。

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海鸥的毛拔掉。它太轻了，骨头那么脆弱，手指一拧便都断裂了。我想拔下羽毛，可那海鸥的皮肤又嫩又白，羽毛又和皮肤粘得太紧，总是血淋淋的连毛带肉都拔了下来。那些黑黢黢、黏糊糊的东西粘在手指上，让人一阵恶心。

饿了五天的人什么东西都吃得下去，这话说起来轻巧。可不管这人饿成什么样子，当他看见羽毛和热乎乎的血粘在一起，散发出一股生鱼和疥疮的强烈腥味儿时，他还是会感到作呕的。

一开始我尝试仔仔细细地拔毛，可没想到它的皮那么嫩，拔完毛，我手里的海鸥也就不成样子了。我在筏子里把它洗了洗，又一下把它撕成两半，它粉嫩的肠子和蓝色的内脏让我的胃里又是一阵翻腾。我把一条腿塞进嘴里，可实在是咽不下去。原因很简单，我觉得自己是在嚼一只青蛙。我实在没办法压制住那阵恶心，把东西吐了出来，然后长时间地一动不动，手上还握着那团令人作呕的羽毛和血淋淋的骨头。

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这些我实在难以下咽的东西可以用来做鱼饵。可我什么捕鱼的工具都没有。哪怕有个别针也好呀，或是一小截铁丝什么的。可我身上除了几把钥匙、一块手表、一枚戒指和三张莫比尔某商场的名片，什么都没有。

这时我想到我还有条腰带。我想也许能把皮带钩改成个鱼钩。可我的努力全是白费心思。腰带怎么也改不成鱼钩。天渐渐暗下来，鱼群受到血腥味的刺激，在筏子旁边蹿来蹿去。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我把那海鸥剩下来的部分扔进水里，躺下身子等死。整理好船桨准备躺下时，我听见动物们在无声无息地争抢我没能吃下去的东西。

我觉得，这天夜里我恐怕要因为精疲力竭加上绝望而死去。天刚擦黑就刮起了大风。筏子颠簸得厉害，而我万念俱灰，甚至不想用绳索把自己固定住，只是疲惫不堪地躺在水中，仅仅露出脚和头。

可到了后半夜，天气变了：月亮出来了。这可是出事以后的头一回。蓝色的月光下，海面重又变成鬼影幢幢的模样。这天夜里，海梅·曼哈雷斯没来。我一个人，待在筏子底部，听天由命，心里充满绝望。

然而，每当我心灰意懒的时候，总会有件什么事情发生，重新燃起我的希望之火。那天夜里，是映照在波澜之上的月亮。海上微波荡漾，每一朵浪花在我看来都像藏有船上的灯光。两晚之前，我就对能有船来救我一命不抱希望了。然而，那个夜晚被月光照得透亮（那是我在海上度过的第五夜），我一整夜都在海平面上竭力搜寻着，紧张的程度和抱有的信念不亚于头一晚。如果现在再让我处在那种情况下，我一定会绝望而死：现在我知道了，那条筏子航行在一条没有任何一艘船的路线上。

我已经是个死人了

我记不清第六天天亮时的情景了。我只隐隐约约记得，那一上午，我都躺在筏子底部，在生死线上挣扎。那时我想起了我的家，而且看见了我的家人，和后来他们告诉我那些天里他们的情形一模一样。听到他们还为我举行了祭奠仪式，我一点儿也没感到惊讶。在海上孤身度过的第六个上午，我想到了正在发生的一切。我知道，我的家人已经得知了我失踪的消息。既然飞机没有再飞回来，我知道这是因为人们已经放弃了寻找的努力，并且宣告了我的死亡。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非假消息。当然我一直在寻求自救。而且我总能找到活下去的办法，找到一个支撑点以便继续坚持，不管它有多么微不足道。可到了第六天，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我成了筏子上的一个死人。

下午，想到马上五点钟，鲨鱼就要到来，我挣扎着起来想把自己绑在筏沿上。两年前，在卡塔赫纳的一处海滩上，我看见过一个人的残骸，已经被鲨鱼咬得零零碎碎的。我可不想这样死去。我不想被一群贪婪的野兽撕成碎片。

快五点了。鲨鱼群准时到达，在筏子旁巡弋。我艰难地爬起身来，去解开筏子边上的绳子。下午的空气新鲜清凉。海面一片平静。我觉得精神稍微恢复了一点。突然，我又看见了前一天曾来过的那七只海鸥，顿时又激起了我活下去的愿望。

那会儿，我恐怕什么东西都吃得下去。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而比饥饿更难忍受的是喉咙的溃烂和牙床的疼痛，因为老不用牙床，那里已经变得硬邦邦的。我嘴里得有点儿东西嚼嚼才行。我想把鞋子上的橡胶条扯下来，可又没什么东西能割得动它。这时我想起了莫比尔那家商场的名片。

名片在我裤子口袋里，因为泡了水，已经烂得不成样子。我把它们扯成碎片，塞进嘴里嚼了起来。这简直是奇迹：喉咙不那么难受了，嘴里也充满了唾液。我慢慢地嚼着，仿佛它们是块口香糖。咬第一口的时候嘴里还有点儿疼。之后，这些自打那天陪玛丽·埃德瑞斯逛商场就不知怎么留在我兜里的名片，让我越嚼越有力气，人也就乐观起来。我打算就这么一直嚼下去，至少能减轻一下嘴里的疼痛。我觉得把它们吐到海水里去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我感觉到，被咬得稀烂的硬纸片最后被咽进了胃里，从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自己一定会得救，一定不会被鲨鱼咬碎的。

鞋子的滋味如何?

嚼名片对疼痛的缓解刺激了我的想象力，我得再找点儿什么吃的。如果此刻我手头有把小刀的话，我一定会把鞋子割开，弄点儿橡胶条在嘴里嚼嚼。这是我能触及的范围内最能刺激我的东西了。我用钥匙割了半天，想把白白净净的鞋底弄下来。可力气全白费了。那橡胶在布上粘得太结实了，想撕一条下来根本不可能。

无奈之下，我只好去啃我的腰带，把牙齿啃得生疼。但连一小块都啃不下来。这会儿的我一定像头野兽，啃咬着鞋子、皮带和衬衫，试图从上面弄一小块下来。天黑了，我的衣服早已湿透，我索性把它们都脱了。我身上只剩一条裤头。也不知道是不是名片起了作用，随即我就呼呼大睡了。我在海上的第六个夜晚，也许是因为已经适应了筏子上的种种不适，又或许是因为一连七个晚上都没睡觉的我已经累极了，反正这一觉我睡了好长时间。有几回，梦里我被浪涛惊醒，于是一跃而起，警觉万分，生怕海浪把我冲进大海里。可每一次我都几乎立刻就重新进入了梦乡。

我终于迎来了海上漂流的第七个白天。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确信这不会是最后一天。海面风平浪静，天空布满了云。早上快八点钟，太阳出来的时候，由于头天夜里好好睡了一大觉，我觉得我又恢复了不少。铅灰色的天空低垂着，那七只海鸥又飞了过来。

两天前我看见那七只海鸥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可接连两天我都看见了它们，第三天再看见它们的时候，我心里重新升起了恐怖的念头。“这七只海鸥该不会是迷路了吧！”我绝望地想。所有海员都

知道，有时候海鸥也会在海上迷路的，它们会一连好几天毫无方向地飞来飞去，直到遇上一条船，给它们指明港口的方向。我一连三天看到的兴许总是那几只，它们也在海上迷失了方向。这意味着我的筏子离陆地越来越远了。

Part 8
为了一条鱼我同一群鲨鱼大打出手

当我想到这七天自己并不是离岸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深入大海时，支撑我奋斗下去的决心便被压倒了。可当一个人到了死亡的边缘，他自我保全的本能又变得更强烈了。由于种种原因，那一天—对我来说是第七天—和前面几天完全不一样：海面黑沉平静，太阳也不再有灼烧感，而是暖洋洋的，沁人心脾，微风轻轻地把筏子推向前方，我身上被晒伤的地方也舒服了一点。

鱼也不一样了。现在它们一大早就围着筏子，在水面上游来游去。我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它们：鱼儿有蓝色的、棕色的，还有红色的。五颜六色的鱼儿，形状大小各异。筏子和它们一同航行，就像是滑行在一个水族馆上。

我不知道是否一个人在海上漂流七天七夜，不吃不喝，就会适应这种生活。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前一天的绝望都变成了一种懒洋洋的、无知无觉的逆来顺受。我敢肯定地说，一切都变了模样，海洋和天空都不再饱含敌意，一路上陪伴着我的鱼儿们都是朋友，是我认识了七天之久的老相识。

这天上午，我没去想能到达什么地方。这筏子肯定是到了一处没有任何航船经过的地方，就连海鸥都会在这里迷失方向。

然而我又想到，在经历了七天的漂流之后，我一定已经适应了大海，适应了这种令人痛苦的生活方式，因而根本不需要再磨炼我的聪明才智以便生存下去。无论如何，我已经在同风浪的搏斗中存活了一个星期。为什么我就不能在这筏子上一直生活下去呢？鱼群在海面上四处游动，海水清澈而平静。筏子周围有这么多的活物，漂漂亮亮，撩人心弦，让我觉得一伸手就能抓上一把来。目力所及，看不到鲨鱼的踪影。我自信地把手伸进水中，想抓住一条不到二十厘米长的小鱼，一条圆滚滚的、身上泛出蓝色亮光的小鱼。可这个举动就像是扔进去一块石子一样，所有鱼都急忙下沉，鱼群消失在水里，只留下一片被搅乱的水面。过了好一会儿，它们才又逐渐浮上水面。

我想，若要用手捕鱼，还得更机智一点才行，因为手在水底下既使不上劲也不够灵活。我在一大群鱼当中选中了一条，试图抓住它。我也真的抓住了。可我发现它又从我的指缝间迅捷灵巧地溜走了，而我毫无办法。我就这样，满怀耐心，放松情绪，只想着抓住一条鱼。我没有去想鲨鱼什么的，兴许它们就在那里，在水底下，等着我把胳膊伸进水里，一直没过胳膊肘，就会准确一击，把我的胳膊咬下来。我就这么忙着捉鱼，一直到十点过后。可没有任何成果。鱼儿啄食着我的手指，开始时还轻轻地，就像是在啄食鱼饵。后来便越来越重。一条半米长的鱼，光溜溜的泛着银光，还长了一口密密的尖牙，把我大拇指的皮肤咬破了。这时我才发现，之前那些鱼来啄食我的手指，也都造成了伤害。我的每一根手指上都有在冒血的伤口。

一条鲨鱼跳进了筏子！

不知道是不是我流了血的缘故，片刻之后，筏子周围到处都是躁动的鲨鱼。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鲨鱼，也没见过它们表现得如此凶猛。它们像海豚一样高高跃起，就在筏子旁边追逐吞噬着一条条的鱼。我一屁股坐在筏子中央，恐惧万端，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大屠杀。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我根本没有察觉那鲨鱼是何时蹿出水面的，它的尾巴重重一甩，筏子左摇右晃，一下子陷入了闪亮的泡沫之中。海浪猛烈地冲击着筏子，只见一道金属般的亮光闪过，我本能地抓住一支船桨，准备发出致命一击：我当时确信有条鲨鱼跳进了筏子里。片刻之后，我看见一个巨大的背鳍从筏子旁边掠过，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条亮晶晶的翠绿色的鱼，大约能有半米长，在鲨鱼的追逐下，跳进了我的筏子里。我用尽全身力气，挥动船桨完成了对鱼头的第一击。

要在筏子内打死一条鱼真不是件容易事。你每敲一下，筏子都会晃个不停，也许就要翻个底朝天了。这是个危机重重的时刻，我必须用尽全身的力气，调动我全部的聪明才智。要是我不顾一切地乱敲乱打，筏子就会翻倒，我也会落到被一群饿得发慌的鲨鱼搅得天翻地覆的海水里。可如果我不能施以精确击打，那我的猎物又会逃走。我真是命悬生死之间。要么是落入一群鲨鱼的尖牙利齿，要么是得到四磅新鲜鱼肉，以解我七天以来的饥饿之苦。

我牢牢地把身体靠在筏沿上，又击打了第二下。我能感觉到，船桨刺进了那条鱼的头骨里。筏子猛地摇晃起来。好几条鲨鱼在筏子底

下的海里翻滚着。可我牢牢地倚住了筏沿。当筏子恢复平稳时，那条鱼躺在筏子底部，还活着。鱼在垂死状态是可以比平时跳得更高更远的。我知道，第三击必须十分精准，否则，我将永远失去我的猎物。

我猛地起身坐在筏子上，这样我更有把握抓住那条鱼。若是有必要，我还可以用脚踩住，或是用膝盖夹住，甚至用牙齿咬住它。我坐稳身体，相信我的生死就取决于这一击了，尽量不要出差错。我用尽全力把船桨打了下去。这一击过后，鱼一动不动，一缕暗红的血在筏子底部的积水里洇开了。

这回连我都闻到了血腥味，更别说鲨鱼群了。此刻，四磅鱼肉在手，我感到一阵难以抑制的恐惧：闻到了血腥味儿的鲨鱼正疯狂地全力撞击着筏子底。筏子左摇右晃。我知道这筏子随时会翻个底朝天，也就是分秒之间的事。在一闪而过的瞬间，我就会被随便哪条鲨鱼嘴里的那三排钢牙撕得粉碎。

然而，饥饿感压倒了一切。我把鱼紧紧夹在两腿之间，在鲨鱼群的一次又一次撞击下摇摇晃晃地竭力保持住筏子的平衡。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分钟。每当筏子稍稍恢复平稳，我便把血水从筏子边上泼出去。慢慢地，积水恢复了清澈，鲨鱼们也都安静了下来。可是我还得万分小心：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鲨鱼背鳍—那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大的鲨鱼或是别的什么家伙的背鳍—从筏子旁边划过，看上去超出筏沿一米多高。它游得很安静，可我知道，一旦它闻到血腥味儿，只需撞一下，便可以把筏子弄翻。我小心翼翼地准备把我的鱼撕成小块。

像这样一个半米长的家伙，身上有一层坚硬的鳞片包裹。当你想拔下鱼鳞时，会感到每个鳞片都像是铁片一样长在鱼肉上。我又没有任何可以切割的工具。我想用钥匙刮下鱼鳞，但它们纹丝不动。这时

我才发现，我这一辈子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一条鱼：翠绿的颜色，厚重的鳞片。我从小看见绿颜色的东西就会联想到各种毒药。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我想着新鲜鱼肉，胃痛苦地抽搐的时候，我竟然有过片刻的动摇，担忧那个怪异的动物会不会有毒。

可怜我这副躯壳

只有在毫无希望搞到食物的时候，饥饿才是可以忍受的。而当时，我坐在筏子底部，绞尽脑汁想用几把钥匙从那条绿得发亮的鱼身上割下鱼肉来，空前的饥饿感无情而强力地折磨着我。

就这样忙活了好几分钟之后，我才算明白了，要是我真想把这猎物吃进肚子里的话，就非得采取点儿更粗暴的手段不可。我站起身来，用力踩住鱼尾，把一支船桨塞进鱼鳃里。那鱼鳃有一层厚厚的硬壳。我用船桨又钻又凿，终于把鱼鳃弄破了。我发现那鱼其实还没有死透，就又用船桨在它头上给了重重的一击。接着我就努力去把鱼鳃外面那层坚硬的保护壳扯开，那时候，我真的搞不清我手指上流淌的鲜血是我自己的还是那条鱼的。我双手伤痕累累，指尖上的肉都翻出来了。

鲜血又一次激起了鲨鱼群的饥饿感。说起来也许没人相信，身处一群饥肠辘辘的野兽包围之中，心里又对那血淋淋的鱼肉异常厌恶，我差一点就把那条鱼扔到鲨鱼群里去，就像我曾经扔了那只海鸥一样。面对那结实、无法宰割的家伙，我非常挫败，觉得自己真没用。

我把那条鱼仔细察看了一番，想找到它身上最柔软的地方下手。最后，我终于在鱼鳃下方找到一条窄窄的缝；我把手指伸进去开始往外掏它的内脏。鱼的内脏软软的，并不结实牢固。据说，如果你猛地用力吊起鲨鱼的尾巴，它的肠子就会从嘴里溜出来。在卡塔赫纳的时候，我就看见过尾巴被高高吊起的鲨鱼，它那张大嘴里确实挂着一大堆黑黢黢黏糊糊的内脏。

真是走运，我那条鱼的内脏和鲨鱼的一样软和。不一会儿，我就用手指把它们掏了出来。那是一条雌鱼：和内脏一起扯出来的还有一串鱼卵。内脏都被掏干净后，我咬了第一口，没能咬透那层鱼鳞。我又死命咬了一口，连牙床都咬疼了。这回总算咬下一块，于是我开始嚼那又冷又硬的生鱼肉。

咀嚼的时候我一阵恶心。我一向不喜欢闻生鱼的气味，更别说嚼在嘴里的味道了：它隐隐地有一股生海枣的味道，可是比生海枣还要难吃，而且黏糊糊的。世上恐怕没有人吃过活鱼吧。而当我嘴里嚼着七天以来的第一口食物时，我就头一回体会到了那种可怕至极的感觉：生吃一条活鱼。

第一口下肚后，我立刻觉得好多了。我又咬下一块，在嘴里嚼着。就在刚才我还想着，自己饿得能吃下一整条鲨鱼。可这会儿刚吃到第二口，我就觉得肚子已经饱了。整整七天的饥饿一瞬间就得到了抚慰。我又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就像第一天一样。

现在我知道，生鱼肉还可以解渴。我当时不知道这个，但我意识到，鱼肉不但平息了我的饥饿，还帮我缓解了干渴。我心满意足，信心满满。剩下的食物还很充足，因为我才咬下了两口鱼肉，而那条鱼足足有半米长。

为了保鲜，我决定用衬衫把鱼包起来，存放在筏子底部。可首先得把它清洗干净。我漫不经心地抓住鱼尾巴，把鱼伸到筏子外面的水里泡了泡。可鱼血已经凝固在鱼鳞之间，得搓搓才能洗掉。我想都没想，又把鱼没进了海水里。说时迟那时快，我只觉得一条鲨鱼的利齿猛地撞过来。我用尽全身力气死死抓住鱼尾。那家伙猛地向外一拖，我便失去了平衡，重重地摔在筏沿上，但手里还紧紧抓着我的食物。

我像一头猛兽一样保卫着我的食物。那一瞬间，我根本来不及去想，只要那鲨鱼再咬上一口，恐怕就会把我的胳膊齐肩膀咬下来。我还在用尽全力拖扯，可这时我手中已经空空如也。那鲨鱼抢走了我的猎物。我怒火陡起，在绝望和愤怒中疯狂地抓起一支船桨，等那条鲨鱼又游到筏子旁边的时候，照它头上狠狠砸过去。那凶猛的家伙高高跃起，猛地拧过身来，蛮横地一口便把船桨咬掉半截，吞下肚去。

Part 9
海水的颜色开始有了变化

手里拿着断桨，我心中又绝望又恼怒，依然继续击打着水面。鲨鱼把我仅有的食物从我手中夺走了，我必须报复。这是我在海上的第七天，快到下午五点了。要不了多会儿，大群的鲨鱼就会游过来。两块鱼肉下肚，我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劲儿，而失去鱼肉又让我怒火中烧，并生出一种奇异的勇气要去和它们干上一场。筏子上还有两支船桨。我想扔掉那支被鲨鱼咬断的船桨，换根新的继续和那些凶猛的家伙搏斗。可我谨慎的天性战胜了我的恼怒：我意识到这样一来我很可能会损耗这余下的两支桨，而我随时都可能用到它们。

黄昏和前些天没什么两样，只是这一夜天色更黑，大海动荡不安。像是要下雨了。想到即将到来的雨水是可以喝的，我赶紧脱下了鞋子和衬衫，以备储水。这种天气在陆地上会被叫作“疯狗之夜”，那么在海上就该叫作“鲨鱼之夜”吧。

九点钟后刮起了一股寒风。我试图在筏子底部避避，但没有用。那股寒气一直侵到我的骨头里。我只好又把鞋子和衬衫穿上，并自我安慰道，雨会下得出人意料，而我并没有什么东西去接水。海浪比二月二十八日出事那天还要大。海面波涛汹涌，暗淡无光，筏子像只蛋壳，就这样随波逐流。我无法入睡。我让自己浸在水里，只露出脑袋，因为海风甚至比水更冰冷。我浑身都在发抖。然后我觉得自己恐怕扛不住这样的寒冷，便试图做做操，热热身子。无济于事。我非常

虚弱。我必须紧紧抓住筏沿，免得被大浪打进海里。我把头枕在被鲨鱼咬断的那支桨上。另外两支我放在筏子底部。

临近半夜，风越刮越急，天空越来越暗，变成了铅灰色，空气也湿漉漉的，可一滴雨也没下。半夜十二点过几分，一个大浪—就像那个扫荡了驱逐舰甲板的大浪一样大—打来，筏子好似一瓣香蕉皮，被抛到半空，先是倒竖了起来，一眨眼就摔了个底朝天。

和出事那天下午一样，直到落进水里拼命向上游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我拼命地游着，游出水面，可又被吓得半死：筏子不见了。只见一排排黑色的巨浪向我头顶压过来，这时我想起了路易斯·任希弗，像他那样强壮的一个人，水性好，又吃得饱饱的，筏子只在两米开外的地方，他都游不到跟前去。事实上，我是晕头了，只知道往前看。而就在我身后差不多一米远，筏子露出了海面，轻飘飘的，随着波浪晃动。我划了两下水，便抓住了筏子。这个动作顶多用了两秒钟吧，可那两秒钟的时间漫长得好像没有止境。我惊恐万状，纵身一跃，便气喘吁吁、浑身湿透地跳进了筏子。我的心在胸膛里怦怦乱跳，几乎透不过气来。

我的幸运之星

我对自己的命运没什么好抱怨的。倘若翻船发生在下午五点钟，我早就被鲨鱼撕成碎片了。然而，在夜里十二点，那些家伙们都不会来捣乱。海面波涛汹涌的时候更是如此。

当我重新爬上筏子时，手中紧握着被鲨鱼咬断的那支桨。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我所有的动作都是出自本能。过了一会儿我才记起来，落水后这支船桨打到了我的头，当我往下沉的时候我一把抓住了它。这是船上剩下的最后一支船桨了。另外两支都落进了海里。

这支被鲨鱼咬去半截的木棒不能再弄丢了，我用筏沿上的一截绳子头把它紧紧捆住。大海还在咆哮。这次是侥幸，要是筏子再翻一次，恐怕我就很难再爬上来了。想到这里，我解下腰带，把自己也紧紧绑在了绳网上。

波浪继续扑向筏子。筏子像是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上舞蹈，可有腰带绑着，我相信没什么危险。那支桨也很安全。我一面竭力不让筏子再翻倒，一面想着，刚才差一点儿把衬衫和鞋子也弄丢了。如果不是因为天冷，衬衫和鞋子会被放在筏子底部，筏子翻倒的时候，它们就会和那两支船桨一起落进海里了。

在大风大浪里，一只筏子翻个底朝天再平常不过了。这筏子是用软木做成的，外面包了一层防水布，布外面又刷了一层白漆。但它的底部并非是固定的，而是像一只篮子一样挂在软木做成的边框上。筏子在水里翻倒后，它的底部会立即恢复正常状态。唯一的危险是失去

筏子。因此我想，只要我和筏子绑在一起，它就算是翻上一千个跟头，我也不会失去它。

这说法固然不错。可有一件事情我没能料到：就在筏子第一次翻倒的一刻钟之后，我的筏子第二次表演了杂技。我先是感觉被掀到冰冷潮湿的半空，风呼呼地打在身上。我发现眼前就是深渊，也看出筏子会往哪边翻过去，便竭力靠向另一边，试图保持筏子的平衡，可我被皮带结结实实地绑在了筏子上，什么都做不了。我很快意识到了问题所在：筏子整个儿翻了过来，而我被扣在筏子底下，还牢牢地绑在绳网上。我快被淹死了，两只手无助地寻找着皮带扣，想解开皮带。

虽然心里很绝望，我还是努力理清思路，想方设法解开皮带扣。我知道自己没多少时间：在身体状况十分理想的情况下，我在水下可以待上八十多秒。自打我发现自己被筏子压在水里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屏住了呼吸，现在至少过去了五秒钟。我的一只手在腰间摸索，不到一秒钟就摸到了皮带。又用了一秒钟，我摸到了皮带扣。皮带扣紧紧夹在绳网上，我必须用另一只手把自己撑起来才能松开它。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个能紧紧抓住的地方。接着，我用左臂把自己撑起来，右手找到皮带扣，迅速调整了一下方向，皮带终于松开了。松开皮带扣后，我依然抓着筏沿，而身体又滚进筏子底部，那一瞬间，我终于从绳网上解脱了。我的肺像是要爆炸了一样。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双手抓住筏沿，憋着气，让身体吊在筏子上。我这时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自己的体重把筏子翻过来。但我还在筏子底下待着。

我开始呛水了。喉咙又干又渴，火辣辣地疼。可这时的我完全没有在意。这时最要紧的是不要松开筏子。最后我终于把头露出了水面，吸了几口气。我全身无力。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力气再翻过筏沿爬进去。然而此时的我心中还有一件害怕的事情，我泡在水里，而就

在几小时之前，我还看见这里到处都是鲨鱼。我确信这可能会是我这辈子要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便使出最后残留的能量，爬过筏沿，精疲力竭地栽进了筏子底部。

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仰面朝天地躺了有多长时间，喉咙在灼烧，十根手指头都皮开肉绽，一抽一抽地疼。我只知道自己同时有两件要操心的事情：让自己的肺缓一缓，以及这筏子可别再翻了。

清晨的太阳

我在海上的第八天，就在这样的清晨中来临了。整个早晨狂风大作。那时就算下雨了，我也没力气去接雨水。我想雨水至少能让我重振些活力。尽管空气潮湿得要命，预示着马上就要下一场大雨，终究是一滴雨都没落下来。拂晓时分，海面还是波涛汹涌。直到上午八点过后才稍稍平静下来。这时太阳出来了，天空一片湛蓝。

我已经耗尽了体力，趴在筏子边上喝了好几口海水。现在我当然知道这对机体是有好处的。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我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喉咙实在疼得无法忍受了。我整整七天没喝过一口水，渴的感觉变得十分异样；它一直痛到喉咙深处，痛彻胸骨，连锁骨下面都疼痛难忍。那也是憋气后的一种绝望。海水能稍稍缓解一点这疼痛。

暴风雨过后，大海往往是碧蓝碧蓝的，就像风景画：要是在岸边，会看得到海面上静静地漂着被暴风雨拔起的树干树根。海鸥们也都纷纷出动，在海面飞翔。这天早晨，风停了下来，海面亮闪闪的，筏子笔直轻快地向前滑行。海风温暖舒适，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得到了些许恢复。

一只硕大的黑色海鸥在筏子上空盘旋，它看起来年岁不小了。毫无疑问，我应该离陆地不远了。几天之前我捉到的那只海鸥很年轻。而年轻的海鸥能飞行很长的距离。有人在离岸几百海里的地方都遇见过它们。可一只又大又笨重的老海鸥，比如说第八天在我的筏子上空飞过的那一只，应该不会离开海岸一百海里以上。我打起精神，又有

了坚持下去的力量。就像头几天一样，我又开始在海平面上搜寻起来。海鸥成群结队在四周翱翔。

我觉得自己有了伴，很开心。我也不觉得饿了。海水也喝得更勤了。一大群海鸥在我头顶盘旋，我顿时觉得自己不再孤单。我想起了玛丽·埃德瑞斯。“她怎么样了？”我这样问自己，耳边响起了看电影时她为我翻译对白的声音。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不知为何，那是我唯一一次想起玛丽·埃德瑞斯，没准是因为天空中到处飞翔的海鸥吧），玛丽正在莫比尔的天主教堂里为我做安灵弥撒。那次弥撒，据后来玛丽往卡塔赫纳给我寄的信上说，正是在我失踪后的第八天举行的，为了让我的灵魂得到安息。现在我觉得，其实也是为了让我的肉体得到休息，因为那天上午，就在我想起玛丽·埃德瑞斯的时候，她正在莫比尔参加弥撒，而我在海上看着那些海鸥，心情很愉快，因为海鸥意味着离陆地不会太远了。

我差不多一整天都坐在筏沿上，瞭望着海平面。天空清澈透亮。我敢肯定，在五十海里开外的地方，我看见了陆地。筏子在前进，就连双人四桨都不可能达到这个速度。它在平静湛蓝的海面上笔直前行，就像是有发动机在推动似的。

一个人在筏子上待了七天，一定能察觉到海水颜色最细小微妙的变化。三月七日下午三点半，我发现筏子进入了一片水域，那里的海水不再是蓝色，而是墨绿色。有一刻，我甚至看见了两种海水的分界线：这边是我七天以来一直看见的蓝色海面；而那一边，海水是绿色的，明显更浓烈。天空中满是海鸥在飞翔，而且飞得很低很低。它们飞过我头顶时，我能感觉到它们翅膀扇起的劲风。这些征兆再明白不过了：海水颜色的变化，成群的海鸥，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今夜我不能入睡，要随时保持警觉，以便发现岸上的灯光。

Part 10
希望丧失……唯有死亡

在海上的第八个夜晚，我不需要再强迫自己入睡了。那只老海鸥从九点起就歇在筏沿上，一整夜都没离开过筏子。而我靠在唯一剩下的半截船桨上，就是被鲨鱼咬断的那支。夜里很平静，筏子仍在笔直地朝着某处航行。“会到达哪里呢？”我不时这样问自己。因为有那些征兆（海水的颜色和那只老海鸥），我确信自己第二天就会登上陆地，但这筏子会在风的推动下到达什么地方，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这筏子是否还保持着最初的方向。如果它一直是沿着飞机的航线走，很可能会到达哥伦比亚。可若手里没有指南针，你是没办法知道方向的。如果筏子是一直向南，毫无疑问会到达加勒比海在哥伦比亚的海岸。可它同样有可能是在向北航行。如果是那样，我就不可能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了。

临近半夜，当我困得躺下来时，那只老海鸥来到我身旁，在我头上啄了几下。一点儿也不疼。它啄得很轻，没有伤着我的头皮，就好像在抚摸我一样。我又记起驱逐舰上的枪炮长跟我说过，对水手而言，杀死海鸥是很不体面的行为，我心里涌上一股对那只被我无端杀死的小海鸥的愧疚之情。

我搜寻着海平面，一直到破晓时分。这天夜里倒不算冷。可我没有看见一丝灯光，也没有看见任何靠近海岸的迹象。筏子在清澈而宁

静的海水中滑行，而我四周的亮光，唯有闪闪的繁星。当我完全平静下来的时候，那海鸥仿佛也睡着了。它还站在筏沿上，头低垂着埋在翅膀里，许久一动不动。可只要我稍稍一动，它就会跳起来，轻啄我的头。

天快亮的时候，我换了个姿势，让脚靠近海鸥的位置。我感到它啄了啄我的鞋子。然后它就顺着筏沿走了过来。我一动不动。海鸥也站住了。接着它又挪到我的脑袋旁边，再次停住不动。可只要我的头稍稍一动，它就会在我的发间温柔地啄几下。最后那好像变成了一场游戏。我换了好几次姿势，每一次它都会跑到我的脑袋这边来。天亮以后，我也没什么必要再那样小心了，一伸手，便抓住了它的脖子。

我并不想把它弄死。先前那只海鸥的经历告诉我，那只会是无谓的牺牲。肚子饿归饿，但这只海鸥是我的朋友，它陪了我整整一夜，对我没有丝毫伤害，我完全不想拿它来充饥。我抓住它的时候，它张开了双翅，挣扎着想逃走。我把它的翅膀在脖子上交叉起来，让它不能再动弹。就在这时，它抬起了头，于是在晨曦中，我看见它那双透明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恐。就算在某个时刻我真准备把它扯成几块，但只要看见它那双大大的忧伤的眼睛，我也一定会打消那个念头的。

太阳早早就升起了，从早上七点开始就炙烤着大气。我仍然躺在筏子上，手里攥着那只老海鸥。海水和前一天一样，依然碧绿而深邃，可往任何一个方向都看不到靠近海岸的迹象。空气闷热到令人窒息。于是我放开了我的囚徒。老海鸥抖了抖脑袋，箭一般地飞上了天空。片刻之后，便和海鸥群混在了一起。

这天早晨－我在海上度过的第九个早晨－太阳比前几天更加炽热。我十分注意不让阳光直射我的胸肺，但这样一来背上却燎起了许

多大水泡。我不得不将用来倚靠身体的船桨挪到一边，把身体泡进水里，因为脊背一接触到木头就疼得受不了。我的肩膀和胳膊也都晒伤了。我甚至不敢用手指头去碰我的皮肤，因为一旦碰到什么，那地方就像是有鲜红的火炭在燎烤。我的眼睛也发了炎。我无法把目光集中到任何一个点上，因为那样一来空中便会满布一个个亮闪闪、炫人眼目的圆圈。在这一天之前，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如此糟糕。在苦咸的海水和炎炎烈日的双重作用下，我体无完肤。胳膊上的皮肤可以随便就撕下一长条，露出底下红红的、光滑的一层肉。紧接着，撕了皮的那一块就会疼得颤抖，从毛孔中渗出鲜血。

我也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胡子。我有十一天没刮胡子了。浓密的胡须一直长到了脖颈，可我连摸都不敢去摸，因为皮肤被太阳晒得通红，钻心地疼。我一想到自己那憔悴的面孔和满是水泡的躯体，便会记起自己在这些孤独绝望的日子里受过的罪，就再一次陷入绝望。没有任何靠近海岸的迹象。已经是正午时分了，我对能找到陆地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就算筏子走得再远，如果这个时候四下里还没有一点陆地的影子，天黑之前我是绝不可能漂到某一处海滩上的。

“我想死”

我用十二个小时建立起来的快乐只要一分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精力在衰减。我停止了所有努力。九天以来，我第一次趴了下去，把满是大水泡的脊背冲着太阳。我这样做的时候，对自己的身体已毫无怜悯之心。我很清楚地知道，若是这样下去，不用等到天黑，我就会窒息而死。

有那么一段时间，疼痛的感觉也消失了。感官失灵后，理性思维能力便也迟钝起来，最后，对时间和空间都没了概念。我就这样脸朝下趴在筏子里，胳膊搭在筏沿上，下巴搭在胳膊上，一开始，我还能感觉到阳光在无情地撕咬着自己。一连几个小时，我的视线里布满了一个又一个耀眼的光点。我终于虚弱不堪地闭上双眼。然而这时我的身体已经感觉不到太阳的炙烤。我不饿也不渴，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种看透生死的全然冷漠。我想，我就要死了。这样一想，心里反倒又有了一种奇特又含糊的希望。

等我再睁开双眼时，我又来到了莫比尔。天气十分闷热，我正和驱逐舰上的伙伴们去参加一次露天聚会，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犹太人，叫马赛·纳赛尔，他是莫比尔一家商场的店员，我们这群水兵常去他那儿买衣服。那几张名片就是他给我的。在我们的舰船大修的那八个月里，马赛·纳赛尔负责招呼我们这群哥伦比亚水兵，而因为感激，我们也只去他的店里买东西。他讲得一口好西班牙语，尽管他跟我们说过，他从来没在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待过。

这天，和每个星期六一样，露天咖啡座里只有犹太人和我们这群哥伦比亚水兵。用木板搭成的台子上，每周六都来的那个女人正在跳舞。她露着肚皮，蒙着面纱，和我们在电影里见过的阿拉伯舞娘一模一样。我们不时鼓鼓掌，一面喝着罐装的啤酒。我们中间最快活的就数马赛·纳赛尔了，这个莫比尔的犹太人店员，他总是把又好又便宜的衣服卖给我们。

就这样，我沉浸在莫比尔聚会的幻觉中，迷糊昏沉，也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只知道自己突然在筏子上跳了起来，发现天色已近黄昏。然后，就在离筏子五米远的地方，我看见一只巨大的黄色海龟，长了个带虎皮纹的大脑袋，两只眼睛定定的、不带任何表情，就像两个巨大的玻璃球，正盯着我看，那模样十分阴森可怕。开始我以为这又是幻觉，便心惊胆战地坐了下去。这个硕大的家伙，从头到尾足有四米长，在看见我动弹后，便沉到了水里，留下一串气泡。我不知道这是真事还是幻觉，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肯定那只海龟是真是假，但在好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亲眼看见那只黄色大海龟就在筏子前方游着，只露出那个可怕的、噩梦般的大脑袋。我只知道—真海龟也好假海龟也罢—它只要稍微碰一下我的筏子，筏子就会原地转上好几圈。

看见那么可怕的东西使我又有了恐惧。而那时，正是那种恐惧让我重新鼓起勇气。我一把抓起那半截船桨，坐在筏子上，准备拼死一搏，不管对手是这头怪物还是别的任何胆敢来撞翻筏子的家伙。快五点钟了。鲨鱼群一如既往地准时出现在了海面上。

我往筏子上我刻下日期的那边看了看，一数有八道刻痕。我想起来了，今天我还没刻呢。我用钥匙划了一下，坚信那应该是最后一道了。我心里既绝望又愤怒，因为显而易见，对我来说死去比活下来还要难。那天上午我已经在生与死之间做出决定，我选择了死。可到现

在我还活着，手里还握着半截断桨，准备为了活下去而奋力一战。我这是在为唯一一件我已经毫不在意的东西而奋战吧。

神秘的树根

头顶上是放射出炫亮光芒的烈日，心中是无比的绝望，再加上口渴难忍，就在这时，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就在筏子的最中央，在绳网上，有一段红色的树根，就像人们在博雅卡捣烂了做染料的那种，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那树根就缠在了那里。我在海上已经漂了九天了，在海面上连一根草都没见过。可那树根就在那里，我甚至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它就在网绳上缠着，这仿佛又是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附近一定有陆地，只是我还没看到。

那树根大约有三十厘米长。我已经饿得连去想一想饥饿是什么滋味的力气都没有了，但还是不顾一切地把树根放进嘴里嚼了嚼。它有一股血腥味。从树根里挤出来的是一种黏糊糊的油脂一样的东西，味道甘甜，咽到嗓子眼儿里凉凉的。我想这味道像是有毒。可我还是不停地吃着，把那根弯弯曲曲的棍子吞下肚去，连一丁点儿木屑都没剩下。

吃完之后，我并没有觉得好受多少。我突然想到，那会不会是一条橄榄树枝，因为那时我想起来圣经里的一个故事：诺亚把一只鸽子放飞出去，鸽子飞回方舟的时候带来了一根橄榄枝，这意味着洪水已经从陆地上退去了。我想，鸽子衔回来的那根橄榄枝应该就和我刚刚吃下去、一解九天以来的饥饿的树根差不多吧。

一个人也许可以在海上等上一年时间，但总会有那么一天，他觉得连一个小时都等不下去了。头一天我还在想，第二天天一亮我就会

到达陆地。二十四个小时过去了，我能看到的仍然唯有水天一色。我什么都不指望了。那是我在海上度过的第九个夜晚。“我已经当了九个晚上的死人了。”想到这里，我心中恐惧万分，这会儿，在我波哥大奥拉亚区的家中，一准聚满了我们家的亲朋好友。这应该是为我守灵的最后一个夜晚了。明天，为我设立的灵堂就要拆掉，慢慢地，对我的死亡，大家也就会接受了。

直到那天夜里，我始终没有失去那最后的遥远希望，希望有人会想起我、来救我。可当我想到，对我的家人来说，这已经是我死后的第九个夜晚，也是为我守灵的最后一晚了，我就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被遗忘在海上了。我想，现在我能做的最好选择就是真的死了吧。我在筏子底部躺了下来。我想大声说：“我再也不起来了。”可声音哽咽在了嗓子眼里。我想起了我上过的学校。我把卡尔曼圣母像举到嘴边，心中默默祈祷着，我猜想我的家人此刻正在做同一件事情。因为知道自己正在慢慢死去，我感觉好了许多。

Part 11
第十天，又一个幻觉：陆地

第九天的夜晚是我度过的最长一夜。我躺在筏子上，海浪轻轻拍打着筏子。可我的感官都失灵了。伴随着我头边每一记波浪的拍打声，我都感觉是那场灾难又重新上演了。有人说垂死的人会“重蹈他走过的每一步路”。那天夜晚，类似的事就发生在我身上。我又回到了驱逐舰上，回到了二月二十八日的中午时分，我和拉蒙·埃雷拉一起躺在舰尾，躺在一堆冰箱和电炉中间，看着路易斯·任希弗在附近站岗值勤。打在筏子边上的每一个海浪都使我觉得那些货物在翻滚，我在沉向海底，又竭力想浮出水面。

九天以来，我在茫茫大海之上所经历的孤独、痛苦和饥饿、干渴都一一重现，分分秒秒，清清楚楚，就像在电影屏幕上重放。首先是落水。接着是我的伙伴们在筏子周围高声呼救；再接下来是饥渴、鲨鱼和在莫比尔生活的回忆，全都一幕幕地闪过。我预先想了办法避免自己掉进水里。我看见自己又来到了驱逐舰的舰尾，用绳子把自己捆住，不让大浪把自己卷走。我捆得那么用力，把自己的手腕、脚脖子都勒疼了，右边的膝盖尤其疼得厉害。可不管我捆得多紧，浪终究还是打了过来，把我卷入海底。惊魂稍定，我便向上游去。我快要窒息了。

几天前，我也曾想过把自己捆在筏子上。那天夜里我真的该这样做了，可我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更别说找到绳网上面的绳子了。

我已经不会思考了。九天以来，我第一次无法判断自己的处境。以我当时的情况，那天夜里我没被大浪卷进汪洋大海里，完全是一个奇迹。我恐怕对什么都是视而不见。我的现实世界已经和幻觉混为一体。倘若那时真有个大浪把筏子打翻，兴许我会以为那只是又一个幻觉，觉得自己再一次从驱逐舰上落入海中—那天夜里我无数次有过这种感觉，而且只需要一秒钟，我就会成为九天来一直耐心等在筏子旁边的那群鲨鱼的口中之食。

然而，那天夜里，我的好运气又一次保佑了我。我的感官没了任何知觉，只是在一点点回味这九天的孤独生活，事后再想，我那天就像把自己绑在了筏子上一样安稳。

天亮的时候，风变得冰冷刺骨。我发烧了。浑身滚烫、战栗，那忽冷忽热的感觉深入骨髓。右膝盖又开始疼了。海水里的盐分可以使伤口保持干燥，可它一直没有愈合，和第一天没什么两样。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不去碰它。这天夜里我是趴着睡的，这样一来，膝盖就碰到了筏底，伤口在抽痛。现在想起来，那伤口可以说救了我一命。黑雾之中，我的痛感回来了。我对自己的身体也就有了知觉。我感到冰冷的风吹在我烧得通红的脸庞上。现在才知道，之前好几个小时里，我一直在说胡话，和伙伴们聊天，还在一处音乐很刺耳的地方和玛丽·埃德瑞斯吃冰激凌。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个小时，我觉得头疼欲裂。太阳穴那里一抽一抽的，浑身的骨头都痛。我能感觉得到，膝盖那里的肉露了出来，已经肿得麻痹了。就好像膝盖变大了，比我的身体还要大。

天明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还在筏子上。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这样待了有多久。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想起来，我曾经在筏沿上划下几道

痕迹。可最后一道是什么时候划的？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我觉得，自从那天下午我找到缠在网绳上的树根并把它吃下去之后，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那是一场梦吗？我嘴里还有一丝黏稠的甜甜的味道，可当我回想吃的是什么东西时，我却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它没能让我恢复元气。我把它吃得一点儿不剩，可我的胃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精疲力竭。

从那时起过去了多少天？我知道天快亮了，但我不知道自己已经在筏子里经过了多少个虚脱的夜晚。我静候死亡降临，而死亡好像比陆地还要遥远。天空转红，像晚霞一样。这也让我迷惑：我分不清这是又一次黎明还是又一次黄昏。

陆地！

膝盖上的伤口实在疼痛至极，我只有设法变换一下姿势。我想翻个身，但根本办不到。我太虚弱了，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我动了动那条受伤的腿，用两只手撑在筏子底部，把身体支了起来，再仰面朝天倒下去，头就倚在筏沿上。看天色明显是黎明。我看了看手表。是早上四点钟。每天这个时候我都会往海平面上瞭望。可我已经不再指望能找到陆地了。我继续仰望天空，眼见它从火红色变成淡蓝色。风依然冷飕飕的。我感觉自己在发烧，膝盖的痛仿若酷刑。我因为还没能死去，心情糟透了。我浑身绵软，仍然活着。想到这一点我觉得又茫然又失落。我先前以为自己肯定熬不过那一夜。然而我又进入了新的一天，还是老样子，依然在筏子上受煎熬，这新的一天，空洞的一天，依然是无可忍受的炎炎烈日，依然有下午五点便来到筏子四周的成群鲨鱼。

天空变蓝了，我又一次向海平面看去。四下里到处都是平静的碧水。可就在筏子的正前方，在晨曦之中，我看见了一道长长的浓密阴影。就在清澈的天空之下，那里现出了椰树的形状。

我心中升起一团怒火。一天之前我在莫比尔参加了聚会，后来又看见一只黄色的大乌龟，夜里我回了趟在波哥大的家，去了一趟拉萨耶·德威森西奥学校，还和我在驱逐舰上的伙伴们待了好一会儿。这会儿我倒看见陆地了。如果这样的景象出现在四五天以前，我可能会高兴得发疯。我可能会让这条筏子见它的鬼去，纵身跃入水中，飞快地游向岸边。

但如今我已对幻觉有了心理准备。椰树看上去太清晰了，一点儿都不像是真的。此外，它们忽远忽近。有时好像就在筏子旁边，可过了一会儿，又好像离我有两三公里远。所以，我心里实在高兴不起来。我还是想一死了之，我不想因为这些幻觉把自己弄得神经错乱。我把目光又转向了天空。此刻蔚蓝色的天空深邃莫测，万里无云。

四点四十五分，海平面上透出霞光。我先前一直对黑夜心存恐惧，可这会儿在我看来，白天的太阳才是我的敌人。一个巨大无比、毫不留情的敌人，它噬咬着我伤痕累累的皮肤，用饥渴折磨着我。我诅咒太阳。诅咒白天。也诅咒自己的命运。命运让我在海上绝望地漂流了九天九夜，真不如让我饿死算了，或是让一群鲨鱼把我咬得死无全尸。

我觉得浑身不舒服，便在筏子底部寻找那半截断桨，想枕在上面。我这个人睡觉时枕头一向不能太硬。可那时，我发狂地寻找那支被鲨鱼咬得仅剩半截的船桨，只是想把头枕在上面歇一歇。

船桨就在筏子底部，还在绳网上系着。我把它解了下来，垫在我疼痛难忍的后背下，这样一来，我的头就可以靠在筏沿上了。就在这时，在冉冉升起的旭日的映照下，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一道长长的绿色的海岸线。

快五点了。清晨晴空万里。毫无疑问，那真的是陆地。多日以来所有的空欢喜—看到飞机，船舶的灯光，海鸥，认出海水颜色的改变—都在见到陆地的瞬间席卷而来，尽数重现。

那时，就算我刚刚吃下两个煎鸡蛋、一块肉、一杯牛奶咖啡，外加面包—驱逐舰上标准的早餐，恐怕也不会像看到陆地后那样浑身充

满了力气，我确信自己是真的看见陆地了。我纵身跃起。我看得一清二楚，就在正前方，那里有海岸线的暗影，还能看出椰树的轮廓。我没有看见灯光。可就在我的右手边，大约十公里左右远，朝阳发出的第一缕光芒映照在一道悬崖上，反射出耀眼的白光。我欣喜若狂，一把抓住我仅剩的半截船桨奋力划水，让筏子直直地朝海岸驶去。

我估计从筏子到海岸还有差不多两公里的距离。我的双手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一用力，后背就更是疼痛难忍。可此刻陆地已经近在眼前，如果放弃，我这九天以来—加上这刚刚开始的一天应该算十天了—全部的努力就白费了。我浑身冒汗。清晨的冷风又吹干了汗珠，寒入骨髓，我继续划着。

可陆地到底在哪儿？

对筏子而言，那根本就算不上一支船桨。顶多算一根木棍，甚至不能用作测量水深的探杆。在最初几分钟里，凭借那股让我热情迸发的奇异力量，我还向前划行了一小段。可很快我便没了力气。我把桨抬了起来，朝着眼前变近的那一片茂盛植被察看了一番，才发现有一股与海岸平行的水流正在把筏子冲向那边悬崖的方向。

我真后悔把另外两支船桨弄丢了。我心里明白，只要有一支完完整整的桨，而不是我手上这支被鲨鱼咬得只剩下半截的木棍，我准能战胜这股海流。过了一会儿，我又想，要不然干脆耐住性子，等筏子被冲到悬崖那边。在初升阳光的照耀下，那悬崖就像座放出万道金光的大山。说来真是万幸，眼看陆地近在咫尺，我又如此渴望大地，简直无法忍受不去登陆的失望，这才躲过一劫。后来我才知道，那地方是卡里巴纳角的岩礁，倘若我真的被海流冲到那里的话，我早就在礁石上撞得粉身碎骨了。

我尝试估量了一下自己的力气。要想到达岸边我得游上两公里。状态好的情况下，游完这段距离我用不了一个小时。可这会儿，除了一小块鱼肉和一截树根，我已经十天没吃东西了，全身都是被太阳晒出来的水泡，膝盖也受了伤，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游多长时间。可那是我最后的一线生机。我根本没有时间仔细权衡。我也来不及去想会不会有鲨鱼。我把桨一扔，眼一闭，便跳进了水中。

一接触到冰冷的海水，我浑身一激灵。在水平面上我看不见海岸。一下水我就发现自己犯了两个错误：我既没有脱掉衬衫，也没有

系紧鞋子。在开始游泳前必须解决好这两件事。我尽量让自己不要沉下去，脱下衬衫，把它牢牢系在腰间。又把鞋带系紧。这时我才开始游泳。一开始我只是拼命地游。后来我才慢慢冷静下来，每划一下水，我都觉得力气快要用尽，而且现在连陆地也看不见了。

游了不到五米，我感觉到挂在脖子上的卡尔曼圣母像的链子断掉了。我停下来，趁它还没沉入海面下的绿色漩涡，一把抓住了它。没时间把它藏进口袋里了，我用牙齿紧紧咬住圣母像，继续向前游去。

我感到力气在不断衰减，可还是看不到海岸。这时，恐惧再次占据了我的心：那陆地该不会又是一场幻觉吧？冰凉的海水使我稍稍振作，知觉也慢慢恢复了，我拼命地朝着我幻觉中的海岸游去。我已经游了挺远的距离，再游回去找我的筏子已经全无可能。

Part 12
复活在异乡的土地上

拼命游了十五分钟之后，我终于又看见了陆地。它离我还有超过一公里的距离。可此时我心里已经毫无疑虑了，这不是幻觉，真的是海岸。阳光把椰树的树冠染成了金黄色。岸上没有灯光。从海里看过去，岸边没有村子，连房子都没有。可那确实是陆地。

二十分钟后我就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了，可我坚信自己一定能游上岸。我信心满满地游着，尽量不让自己因过度兴奋而失去控制。我半辈子都是在水上度过的，可我从未像三月九日早晨那样，懂得并且珍惜游泳的重要性。每划一次水我便感到自己的力量又少了一分，但依然坚持奋力向岸边游去。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我越清楚地看见椰树的婆娑树影。

太阳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能踩到海底了。我试了试，海水还很深。很明显，我还没到海滩。离岸这么近了，海水还是很深，也就是说我还得继续游。我也不知道自己游了有多长时间，只知道越靠近岸边，晒着我头顶的太阳就越热，不过现在阳光不再使我的皮肤难受，反倒让我的肌肉力量倍增。刚下水没游出几米的时候，我还曾担心冰冷的海水会不会引起抽筋。实际上，我的身体很快就发热了，然后水也不那么冷了，我疲惫地游着，像是身处云雾之中，然而我心里的勇气和信念压倒了饥渴带来的困苦。

早晨的温暖阳光下，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岸上浓密的草木，这时我第二次试探能不能踩到海底。大地就在那里，就在我的脚下。在海上漂流十天之后，再次踩到陆地，实在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

但很快，我就发现难关尚未克服。我没了一点力气。连站都站不住。回头浪在猛烈地把我推回大海。我用牙齿紧紧咬着卡尔曼圣母像。湿衣服和胶鞋重得要命。可即便是在这样极端的处境中，人还是有羞耻心的。我想，再过一会儿就会碰到人了。尽管身上的衣服使我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尽管我感到精疲力竭马上就要昏倒，我还是没有把衣服脱掉，而是继续和回头浪奋力搏斗。

海水齐腰深了。经过一番绝望的努力，终于，水只齐我大腿深了。于是我决定爬着走。我用双膝和双手着地，努力向前爬去。可事与愿违，浪头把我卷向后方。粗硬的沙粒摩擦着我膝盖上的伤口。我知道伤口那里在流血，可我并不感到疼痛。我的手指肚也都磨得见了肉，沙子钻进指甲里，钻心地疼，但我还是用手指抠住地面，拼命向前爬行。突然，一阵恐惧向我袭来：陆地呀，阳光照耀下金光闪闪的椰树呀，全都在我眼前摇晃起来。我觉得自己正在流沙之上，被大地吞噬。

不过，这应该是疲劳过度而产生的幻觉。想到自己很有可能身处流沙区，这个念头唤起了我无比的力量—由恐惧转化而来的力量，我忍住疼痛，不顾自己鲜血淋漓的双手，迎着海浪继续爬行。十分钟后，一切一切的痛苦，连同十天以来的饥饿和干渴，整个儿压在了我的身上。我半死不活地躺在了温暖坚实的沙地上，脑子一片空白，没有感谢谁，也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喜悦，虽然自己在毅力和希望的支撑下，怀着不懈的求生意志，登上了这片安静而陌生的海滩。

人的足迹

登上陆地后，你首先注意到的是一片寂静。在你有所感觉之前，就已经陷入了这巨大的沉默。片刻之后，你会听见浪花拍打海岸的声音，那声音遥远而又忧伤。然后，是微风吹过椰树叶的沙沙响声，这强化了你的感觉，你真真切切地在陆地上了。当然，接下来你就知道，自己得救了，尽管还不知道身处何方。

等我躺在沙滩上恢复感官知觉后，便开始打量这个地方。这是个荒僻之地。我本能地寻找着人的足迹。离我大约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处带尖刺的铁丝网。那里有一条弯弯的小路，上面有牲畜走过的蹄印。路旁还可以看见被砍开的椰子壳。这本只是证明此处有人烟的最微不足道的证据，但对那时的我来说不亚于一种神启。我兴奋得不知所以，把脸贴在沙子上，等候着。

等了差不多十分钟。我一点一点地恢复了体力。已经六点多钟，太阳完全升起来了。就在小路旁边，碎椰子壳那头，还有几个完整的椰子。我朝它们爬了过去，让自己靠在一棵树干上，然后把一只光溜溜的、一点儿缝隙都没有的椰子用膝盖紧紧夹住。就像五天前我摆弄那条鱼一样，我迫不及待地想在椰子上找到一个可以下手的地方。每转动一次椰子，我都能听见里面汁水的激荡声。那低沉的汩汩流动的响声更搅得我干渴难耐。我的胃很疼，膝盖那里的伤口在流血，皮开肉绽的十根手指一抽一抽的，隐隐作痛。我在海上漂流的十天里，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疯掉。可那天早晨，当我把椰子转来转去，想找一个软一点的地方钻个眼，听着清凉新鲜的汁水就在我两手之间汩汩作响而我却无法喝到时，我觉得自己要疯了。

每个椰子的顶上都有三个小孔，呈三角形排列。可要想找见它们就得先用砍刀把皮削掉。我手头只有几把钥匙。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图用钥匙钻透那层结实粗糙的外壳，可一切都是徒劳。终于，我认输了。我恼怒万分地把椰子扔出去的时候，依然能听见汁水的荡漾。

最后一线希望在那条小路上。我身边那些碎椰壳告诉我，曾经有人来过这里摘椰子。它们告诉我，有人每天都会爬到椰树上，然后把椰子皮削掉。此外，所有这些还向我昭示，有人居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因为不会有人仅仅为了几只椰子大老远地跑到这里来。

我靠在一棵树干上，正在想着这些，忽然听见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狗叫声。我警觉起来，全部感官高度集中。片刻之后，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了金属撞击的叮当声，沿着那条小路越来越近了。

那是一个黑人姑娘，非常非常瘦，很年轻，穿了身白衣裳。她手里拎了一只铝皮小锅，锅盖没盖严，每走一步就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我这是到了哪个国家呀？”我暗自思忖，眼见那黑人姑娘越走越近，看着像是牙买加人。我一下子想起了圣安德烈斯岛与普罗维登西亚岛。安的列斯群岛大大小小的岛屿都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那个姑娘是我第一个、不过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希望。“她能听懂西班牙语吗？”我带着这样的疑问，想从姑娘脸上看出点儿什么来。她并没有看见我，仍旧漫不经心地在小路上踢踢踏踏地走着，皮凉鞋上沾满了土。一定不能错失这个机会，我是如此迫切，心里突然生出一个古怪念头，如果我跟她说西班牙语，她会听不懂的；然后我就会被遗弃在那里，遗弃在小路旁边。

“Hello! Hello!”我急切地呼唤着。

姑娘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眼仁白白的，透出惊恐。

“Help me!”我又叫了一声，心想她一定是听懂了。

姑娘犹豫了片刻，四下里看了看，顺着小路飞跑而去，被吓得不轻。

人、驴和狗

我觉得自己会死于悲痛。有一瞬我仿佛看见自己已经死在了那里，被一群秃鹫啄食得七零八落的。可没过多一会儿，我又听见了狗叫声。声音越来越近，我的心脏怦怦乱跳。我用手掌撑起身体。我抬起头。我等待着。一分钟。两分钟。狗叫声越来越近。突然，四周都安静下来。接着只能听见浪花拍打海岸和风从椰林中穿过的声音。在经历了我这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分钟后，一条瘦骨嶙峋的狗出现了，后面紧跟着一头驴，驴背上还驮着两个筐。狗和驴后面出现了一个白人，他脸色苍白，头上戴了顶草帽，裤腿一直卷到膝盖上，背上斜背了支卡宾枪。

那人在小路拐弯的地方一露面，便惊讶地看着我。他停下了脚步。那狗将尾巴竖得笔直，过来嗅了嗅我。那人一动不动，一声不吭。过了一会儿，他取下卡宾枪，把枪托支在地上，继续打量着我。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是在加勒比海的某个地方，反正不会是在哥伦比亚。我不知道那人能不能听懂我的话，还是决定讲西班牙语。

“先生，帮帮我！”我说道。

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带着神秘莫测的神情继续打量着我，眼睛一眨不眨，枪还是支在地面上。“现在就差他给我一枪了。”我心灰意冷地想道。那狗在我脸上舔来舔去，而我连躲开它的力气都没有。

“帮帮我！”我又说了一遍，心中半是希望半是绝望，担忧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您怎么了？”他问我，语气很是和蔼。

听到他的声音，我意识到在此刻，比起干渴、饥饿和绝望，更折磨我的是讲述我全部经历的愿望。我差点儿被自己的话噎住了，一口气不带喘地对他说道：

“我是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海军卡尔达斯号驱逐舰上二月二十八日落水的水兵之一。”

在我想来，没有人会不知道这件事。我以为只要我报出家门，那人便会立即上前帮助我。可他面不改色，还是站在原地看着我，完全没有理会那条狗过来舔我受伤的膝盖。

“您是卖鸡的水手？”他这样问我，兴许是想到了那些沿着海岸线倒卖猪和各种家禽的货船。

“不。我是海军水兵。”

直到此刻那人才算动了动身子。他把卡宾枪重新挎到后背，又把草帽往后推了推，对我说：“我得把这些金属线送到港口去，然后再回来找您。”我觉得我又要失去一次机会了。“您肯定会回来吗？”我几乎是在哀求。

那人回答说是的，他绝对会回来的。他和气地朝我笑了笑，便跟在毛驴后面继续赶路了。那条狗还留在我身边，在我身上嗅个不停。直到那人走远了，我才想起来那个问题，几乎是吼叫着问他：

“这里是哪个国家？”

他非常冷静地说出了一个词作为回答，这答案是我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

“哥伦比亚。”

Part 13
六百人簇拥我到达圣胡安

他说到做到，果然回来了。我没等多久，不超过一刻钟，他就赶着驴回来了，驴背上两个筐都空了，来的还有那个拎着铝皮小锅的黑人姑娘，后来我得知那是他妻子。而那条狗一直都没有离开。它不再舔我的脸和伤口，也不再围着我嗅来嗅去。它在我身边卧了下来，一动不动，似睡非睡，直到看见那头毛驴出现。它跳起身来，尾巴摇个不停。

“您还能走路吗? ”那男人问我。

“我试试看吧。”我对他说。我试图站起身来，却迎面扑了下去。

“还不能。”说着那人扶住了我，没让我摔倒在地。

他和他的妻子一起把我扶上了驴背，又一边一个托着我的胳膊，催动了毛驴。狗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

沿路到处都是椰子。在海上我忍住了口渴。可到了这里，骑在驴背上，沿着狭长弯曲、两旁长满了椰树的小路前行，我觉得我一分钟都忍不住了。我请那男人给我点儿椰汁喝。

“我没带砍刀。”那男人说道。

可他没说实话。他腰里明明就挎着一把砍刀。那时哪怕我还有一点点力气，都会把他的砍刀抢过来，削开一只椰子，把里头的汁水一股脑儿喝下去。

后来我才明白那男人为什么不肯给我椰汁喝。他事先去过离发现我的地方大约两公里的一户人家，那家人告诉他，在医生没给我做检查之前，最好不要给我吃的。而最近的医生在圣胡安- 德乌拉巴，离这里有两天路程。

走了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到达了一所房子。那是路边一座简陋的小屋，用木板搭起来的，房顶上铺着锌皮。那里有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他们一起动手把我扶下了驴背，带进卧室，让我躺在一张粗布床上。一个女人去了趟厨房，端来一小锅用桂皮煮的茶，在床边坐下，用勺子喂我。我急不可耐地喝下第一口，等到第二口下肚，我就觉得自己重振了精神。于是我不想再喝了，只想倾诉自己的经历。

他们谁也没听说过那次事故。我尽量给他们解释，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想让他们知道我是怎样逃过一劫的。我先前一直以为，不管自己是到了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人们都会知道那次海难的。当我了解到自己想错了，不免有点沮丧，这时那女人还在一勺一勺地喂我喝桂皮茶，就像是在喂一个生了病的孩子一样。

我好几次坚持要给他们讲我身上发生的事。四个男人以及两个女人只是站在床前看着我，不为所动。仿佛是在举行某种仪式。如果不是因为已从鲨鱼嘴里、从十天以来海上无数次险情当中死里逃生而心生欢喜，我一定会想，这些男男女女恐怕不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吧。

故事终于有人信了

喂我喝桂皮茶的女人很和气，却不容我展开话题。每次我想讲讲自己的故事时，她总是对我说：

“现在您什么话都不要说。以后再慢慢讲给我们听。”

那时的我无论手边有什么东西都能吃下肚去。午饭的香气不断从厨房飘来。可不管我怎么央求都无济于事。

“等医生来看过您之后，我们会给您吃东西的。”他们这样告诉我。

可医生一直没来。每隔十分钟他们便喂我喝几小勺糖水。女人当中最小的那个还是个孩子，她用布条蘸温水替我擦拭了伤口。一天就这样慢慢地过去了。我心里也慢慢轻松了许多。我确定自己遇上了好人。如果她们不是一点一点喂我糖水，而是一下让我吃个饱，我的身体肯定会受不了的。

在路边遇见我的那个男人名叫达马索·依米特拉。三月九日，也就是我爬上海滩的那一天，上午十点钟，他去了邻近的穆拉托斯村一趟，回到我所在的路边小屋时带来了几名警察。他们也对发生过的惨剧一无所知。穆拉托斯村就没人听说过那件事。那个村子里没有报纸。只有一家小店铺里安了个发电机，带动一个收音机和一台电冰箱。但平时也没人听新闻。后来我才知道，当那天达马索·依米特拉告诉警长说在海滩上发现了虚弱不堪的我，我还自称是卡尔达斯号驱逐舰上的一员时，他们就启动了发电机，整整一天都在听卡塔赫纳的新

闻报道。可那时收音机里已经不再谈论那次事件了，直到天黑以后，才有只言片语提及那次事故。于是，上至警长，下至全体警员，再加上穆拉托斯村里的六十个人，都出动前来帮助我。夜里十二点刚过，他们涌入小屋，吵吵嚷嚷地把我从梦中惊醒。那可是我十二天以来睡的第一个安稳觉。

天还没大亮，小屋里就挤满了人。整个穆拉托斯村的人—男女老少都有—全都赶来看我。那是我第一次碰到那么一大群充满好奇的人，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倒是有了不少与类似的人群相处的经历。人们举着马灯，打着手电筒。当警长和他的手下把我从床上抬起来的时候，我只觉得后背上被太阳晒脱了皮的地方撕裂般地疼。真是乱作了一团。

那天天很热。在那样一群关切的面孔包围之下，我觉得自己都快喘不上气来了。来到路上，无数马灯和手电筒齐刷刷地照在我脸上。我什么都看不见，只听得耳边的窃窃私语，以及警长大声发号施令的声音。我既不知道时间也不知道去向。自打我那天从驱逐舰上落水之后，我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漫无头绪地移动。这一天清晨，我继续移动着，不知道目的地，甚至也不知道这群辛勤友好的人准备把我怎么样。

苦行僧的故事

从我被发现的地方到穆拉托斯村的路很长，也很不好走。人们把我安置在一张用两根杠子挂起的吊床上。每根杠子的两头各有个人抬着，在灯火的照耀下，行进在一条狭长而弯曲的小路上。我们明明是在露天地里行走，可被灯光一照，感觉就像是在一间密不通风的屋子里一样热得难受。

八个人分两组，每半小时一换。换岗时，他们会给我喝点儿水，吃几块苏打饼干。我倒是很想知道他们准备把我抬到哪里去，想拿我怎么样。可那群人之间什么都谈，就是不谈这个。人人都在开口说话，只除了我。领队的警长不允许任何人走到我身边来和我说话。远远地我能听见人们的叫喊声、号令声和议论声。我们到达穆拉托斯村的那条长街时，警察根本无法阻止涌上前来的人群。这时大概是早晨八点钟。

穆拉托斯是个小渔村，没有电报所。离它最近的镇子是圣胡安-德乌拉巴，那儿一周两次有小飞机从蒙特利亚飞来。我们到达村子的时候，我还以为已经到了某个大地方，满心以为就会有家人的消息了。实际上穆拉托斯不过是这趟行程的中点。

他们把我安顿在一户人家，全村的人都排着队过来看我。这使我想起了两年前在波哥大，有一次我花了五生太伏去参观一个苦行僧。当时要想去看，得排好几个小时的长队，等上足足一刻钟才勉强能前进半米。而等你最后进到苦行僧待的房子里，只见他被装在一个玻璃

柜里，你就什么都不想看了，只想快快从那里出去，活动活动腿脚，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那苦行僧和我的唯一区别就是，他被装在玻璃柜里。当时他九天九夜没吃一点儿东西，而我在海上漂了十天，外加在穆拉托斯村一间卧房的床上躺了一整天。我看见一张张面孔在我面前晃过，有白的，也有黑的，没完没了。天热得让人难受。那时的我已经恢复得不错了，甚至还有点幽默感，心想，完全可以安排一个人守在门口卖票，放人进来参观一个海难幸存者。

人们又是用那张把我送到穆拉托斯村的吊床，把我送到了圣胡安- 德乌拉巴。只是随我前往的人多出了好几倍。估计不少于六百人。队伍里还有女人、孩子和牲畜。有些人骑着驴，但大多数还是步行。这一路我们走了差不多一整天。整个路途中，六百人轮流簇拥着我，我觉得自己的体力在渐渐恢复。我猜此刻的穆拉托斯村大概空无一人了吧。那天一大早，发电机就开始工作，收音机的音乐声传遍了村子的每一个角落。热闹得像是赶集一样。而我作为这场盛会的中心和源起，继续躺在床上，全村的人又一次排成长队来看我。就是这同一群人，不忍心让我一个人上路，便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陪我去圣胡安-德乌拉巴，把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塞得严严实实。

路途中，我又渴又饿。那几小块苏打饼干、几小口水确实能缓解问题，但同时更刺激了我的辘辘饥肠。到达圣胡安时的场面使我想起了村社过节的盛况。这个小巧秀丽的镇子里的所有居民，像是被海风吹出来似的，全都跑出来看我。幸好事先采取了一些措施应对那些好奇的人们。人们聚集在街头想要围观我，警察成功地制止了他们。

我的旅行到此算告一段落。翁贝托·戈麦斯大夫是第一位给我做了详细体检的医生，他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在体检结束之前他一直忍着没告诉我，因为他想先确认我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了。他在我脸上轻轻拍了拍，带着和蔼的微笑，对我说：

“已经备好了一架小飞机把您送到卡塔赫纳去。您的家人正在那里等您呢。”

Part 14
大难不死的我成了英雄

我始终不敢相信，一个人变成英雄，仅仅是因为他在一只筏子上没吃没喝地待了十天。我只是没得选。假使那只筏子上配备了淡水、压缩饼干、指南针和捕鱼的工具，那当时我肯定会和现在一样活蹦乱跳的。可若真是那样事情就不同了：我不会被当成英雄。这么说来，我之所以成为英雄，完全是因为在十天十夜的时间里，我没让自己死于饥渴。

我没有什么英勇举动。我只是费尽全力想救自己一命。可我的得救打一开始就被披上了一层霞光，我就像一不小心得到一块糖果那样得到了英雄的头衔，我别无选择，只好把自己的得救和英雄主义什么的一股脑儿全盘照收。

人们总在问我，当英雄感觉怎么样。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我自己而言，我和从前没什么不同。我从里到外都没有什么变化。身上被阳光灼伤的地方已经不疼了。膝盖上的伤口也结了痂。我又成了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变化了的是别人。我的朋友们比以前更友好了。有时候我暗中思忖，我的对头们恐怕也比以前更恨我了，尽管我不觉得自己有过什么仇人。当人们在大街上认出我时，会像观看怪物那样上下打量我一

番。因此，我总是身着便装，直到人们渐渐忘记我曾经在一只筏子上不吃不喝漂流了十天。

成了大人物以后，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也不管在何种场合，人们总是喜欢让你谈谈你自己的事情。这一点是我在卡塔赫纳海军医院的时候意识到的，他们还给我派了警卫，禁止别人和我交谈。三天后，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恢复了，但我还是不能出院。我知道，一旦让我出院了，就必须把这故事讲给大家听了，因为警卫告诉我，全国各地的记者都涌进了这座城市，来报道我的事迹，要拍下我的照片。其中有一位，他的八字胡耷拉下来有二十厘米长，令人印象深刻，他给我拍了不下五十张照片，可是别人不许他提出任何与我的海上经历有关的问题。

还有一位胆子更大，他化装成医生，骗过了警卫，进了我的病房。他战绩不俗，但那短短几分钟也够他心惊肉跳的。

一则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

能进到我病房里的人只有我父亲、警卫，以及海军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有一天，来了一位我之前没见过的医生。他年纪很轻，穿了身白大褂，戴了副眼镜，脖子上还挂了听诊器。他来的时间不合常规，进来之后一言不发。

警卫队的士官迷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请他出示证件。这位年轻医生翻遍身上所有的口袋，愣了一会儿，然后说证件忘带了。于是，警卫告诉他，没有医院院长的特别准许，他不得与我交谈。就这样，他们一起去见了院长。二十分钟之后，他们回到了我的病房。

警卫先进了病房，通知我说："这个人得到了特别准许，来给您做十五分钟的检查。他是波哥大的一位心理医生，但我觉得他是个乔装打扮的记者。"

"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我问道。

"因为他惊慌失措的。而且心理医生也用不着听诊器。"

可在此之前，他已经同医院院长交谈了有一刻钟。他们谈到了医学，也谈到了心理学，用的都是些非常复杂的医学术语，很快便谈拢了，所以院方准许他和我聊上十五分钟。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警卫的提醒，反正那青年医生再次走进我的病房时，我也觉得他不大像个医生了。可我也不觉得他像记者，话又说回来，直到那时，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位记者。我倒觉得他像个化装成

医生模样的神父。我以为他是不知道怎么开始谈话，实际上他是在琢磨用什么办法支开警卫。

“劳驾您辛苦一趟，去帮我拿一张纸来。”他说。

他或许认为警卫会去办公室找纸。可警卫接到的命令是不能留我一个人。他没有去找纸，而是走到走廊上高声喊道：

“喂，快拿几张能写字的纸来。”

纸一会儿就送到了。五分多钟过去了，医生一个问题也没问我。在纸拿来之后，他才开始给我做检查。他递给我一张纸，让我画一艘军舰。我画了一艘军舰。他又让我在画上签名，我也签了。接下来他让我画一座乡下的房子，我尽量把房子画得像模像样的，还在旁边画上了一丛芭蕉。他让我签上名。这时我确信他是一位乔装的记者了。可他还坚持说自己是医生。

等我画完之后，他端详了一番那几张纸上的画，含含糊糊地嘟囔了几句，开始就我的遇险提问。警卫插话了，提醒说不允许提这一类问题。于是他检查了我的身体，就像一般医生通常做的那样。他的手冰凉冰凉的。假如警卫碰到这双手的话，一定会把他从病房里赶出去。可我一句话都没说，他那副紧张的神情，还有他可能是个记者这件事，都使我对他抱有强烈的同情。还没待满特许的十五分钟，他便带着那些画飞奔出了病房。

第二天，出大事了！那几幅画被登在了《时代报》的头版，上面还加了些箭头和说明。“我当时在这个地方。”有一条说明这样写道，还用一个箭头指向舰桥。这不是事实，因为我当时并不在舰桥上，而是在舰尾。不过那些画确实出自我手。

他们跟我说我应该出面辟谣，还说我可以起诉他。我觉得这太荒唐了。一个记者敢于乔装成医生闯入一家军队医院，我对他很是钦佩。要是他当时能让我明白他是记者的话，我一定会想办法让警卫到房间外面去的。因为事实上，从那天起，我已经得到许可，可以讲出我的故事了。

故事里的生意经

记者乔装成医生这件离奇的事让我清楚地知道，新闻界对我这海上十日漂流很感兴趣。大众也都很有兴趣。就连我的伙伴们也不止一次地让我讲给他们听。后来我到了波哥大，那时我的身体已经差不多完全恢复了，我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变了个样。我在机场受到了热烈欢迎。共和国总统给我授了勋。他还赞赏了我的英雄壮举。也是从那天起，我知道自己还将留在海军，而且当上了士官生。

此外还有一件我不曾预料到的事：各种各样的广告商都在联络我。我十分感谢我那块手表，它在我整个海上历险中走得十分精准。我没有想到这对手表厂家有所帮助。可他们给了我五百比索，外加一只崭新的手表。因为我嚼过某个牌子的口香糖，又在一个广告里把这事儿说了出来，他们给了我一千比索。我又在另一个广告里提了一下我那双鞋，厂家给了我两千比索，这真是运气来了。电台为了让我在广播里讲自己的故事，又给了我五千。我完全没有想到，不吃不喝在海上漂流十天还能挣大钱。可确实如此：到现在为止，我差不多赚了快一万比索。可即便如此，要让我再去受一遍罪，给我一百万我也不干。

我作为英雄的生活没什么值得一说的。我早上十点钟起床，去咖啡馆和朋友们聊聊天，或者去某家代理商那里转转，他们在以我的海上历险为蓝本制作广告。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去看场电影。而且总是有人陪着。不过和我去看电影的女人的名字，我就不方便透露了，这属于个人隐私。

每天我都会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件。都是不认识的人寄来的。有一封从佩雷拉寄来的信，署名是首字母缩写J.V.C.,他写了一首长诗，里面提到筏子和海鸥什么的。玛丽·埃德瑞斯，那位当我还在加勒比海上漂流时为我做过一场安灵弥撒的女人，现在也常给我来信。她还给我寄来了一张题了词的相片，就是读者们见过的那张。

我已经在电视上和广播节目里讲过了我的故事。我也对朋友们讲过这个故事。我还对一位年迈的寡妇讲过，她有一本厚厚的相册，邀请我上她家去讲。有些人对我说，这些故事都是我凭空编造出来的。而我是这样反问他们的：那么，我在海上漂流的十天十夜里，又做了什么呢?


加西亚 · 马尔克斯
一起连环
绑架案的新闻
NOTICIA DE UN SECUESTRO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林叶青 译

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

南海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译者：林叶青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9-01-01

ISBN：9787544294072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致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后记

致谢

一九九三年十月，玛露哈·帕琼和她的丈夫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向我提议，让我把她六个月的被绑架经历和她丈夫为了救她而付出的艰苦努力写成一本书。当第一稿已经颇为成熟时，我们才意识到，这起绑架案与哥伦比亚同期发生的另外九起绑架案之间有着难以割裂的关系。一开始，我们以为这十起绑架案是相互独立的，然而，这实际上是一起连环绑架案，被绑架的十个人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绑架由同一个集团实施，目的也是相同且唯一的。

这个迟来的发现迫使我们从头安排本书的结构和基调，好让所有主角都能拥有明确的身份及各自的叙事空间。对于迷宫般的叙述而言，这是一种有技巧的解决办法，否则，若仍按第一稿的处理方式，叙述将是聒噪而永无止境的。尽管如此，预计一年的写作时间还是延长到了将近三年。在此期间，玛露哈和阿尔贝托一直细心、及时地协作，他们的叙述始终是本书的中心和线索。

我采访到了尽可能多的主角，所有人都向我展现了同样的慷慨，不惜搅乱他们记忆的平静，为我重新撕开那些他们或许试图遗忘的伤口。他们的伤痛、他们的耐心和他们的愤怒给了我勇气，让我在人生的秋季坚持写完这部我生命中最艰难、最悲伤的作品。我知道，他们能在书页间寻找到的，只有现实中那些恐怖经历的阴郁镜像，这是唯一让我沮丧的事。尤其是两位遇害人质——玛丽娜·蒙托亚和迪安娜·图尔巴伊——的家属，特别是后者的母亲，妮迪娅·金特罗·德巴尔卡萨尔

女士。对我而言，采访他们是一次感同身受、痛彻心扉且永生难忘的体验。

我与两个人分享了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她们与我一起经历了写书匠的秘密劳作：一位是记者卢桑海拉·阿尔特阿加，她就像一名潜伏的捕猎者，顽强而机警地获得了无数难得的资料；另一位是玛格丽特·马尔克斯·卡瓦列罗，她是我的表妹，也是我的私人秘书，负责本书的誊写、排序和核对，她还掌握了处理复杂的基础材料的秘诀，好几次，我们都觉得要被这些材料淹没了。

我向所有的主角与合作者致以永恒的谢意，是他们让这场残忍的悲剧免遭遗忘。很不幸，这只是二十多年来在哥伦比亚上演的大屠杀中的一个片段。谨以此书献给以上所有人，并同他们一起将此书献给所有的哥伦比亚人——无辜的和有罪的，并希望书中的一切不再重演。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一九九六年五月于卡塔赫纳

一

上车前，她回头看了一眼，确保没人跟踪她。现在是波哥大晚上七点零五分。天色在一小时前黑了下来，国家公园里灯光昏暗，光秃秃的树木在昏暗悲伤的天空的映衬下显得鬼影幢幢，但乍看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尽管玛露哈身份显要，她还是坐在了司机的后面，因为她一直觉得这是最舒服的位置。贝阿特利丝从另一扇门上车，坐到了她的右边。她们比平常晚了近一个小时，在令人昏昏欲睡的下午参加了三场行政会议之后，两人看上去都很疲惫。尤其是玛露哈，前一晚她在家办了一场聚会，只睡了不到三小时。她伸展麻木的双腿，闭上眼，把头靠在椅背上，像往常一样发号施令：

“劳驾，回家。”

他们像平常一样回家，有时走这条路，有时走另一条，这取决于安全因素和路况。这辆雷诺21是全新的，十分舒适。司机小心地驾驶着。那晚的最佳选择是沿着希尔昆巴拉大街向北行驶。他们三次都遇到了绿灯，而当晚的交通也不像往常那么拥堵。在路况最糟糕的日子里，他们得花半小时才能从办公室抵达玛露哈位于第三横街84A-42号的家，接着司机再送贝阿特利丝回家，她家在大约七个街区外。

玛露哈出身于一个显赫的知识分子家庭，几代人都是记者。她本人也当过记者，并数次获奖。两个月前，她开始担任扶影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一家扶持电影发展的国有公司。贝阿特利丝是她丈夫的妹

妹，也是她的私人助理，以前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理疗师，但在歇业了一阵子后转了行。她在扶影公司的主要职责是处理与媒体有关的一切事务。她们俩都无所畏惧，但从去年八月起，玛露哈无意间养成了回头的习惯，当时，毒贩们开始绑架记者，行迹难料。

她确实有理由恐惧。虽然上车前她回头看了一眼，觉得国家公园空无一人，但其实有八个人正在跟踪她。其中一个坐在一辆深蓝色的奔驰190里，车子停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挂着假的波哥大车牌。另一个驾驶着一辆偷来的黄色出租车。有四个人穿着牛仔裤、运动鞋和皮衣在公园的阴影下散步。第七个人个头很高，衣冠楚楚。他穿着春款西服，带着公文包，看起来像是一名年轻的经理。而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正在半个街区外的街角咖啡馆监视着这第一幕的正式上演。细致紧张的排练从二十一天前就开始了。

出租车和奔驰跟着玛露哈的车，一直保持着最近的距离。为了确定玛露哈的日常线路，他们从上周一就开始这么做了。大约二十分钟后，所有人都在82号大街上向右拐，那里距离玛露哈夫妇和儿子住的红砖房不到两百米。玛露哈的车刚开上陡坡，黄色出租车就超了过去，把它堵在了左边的人行道上，司机不得不紧急刹车。几乎同时，奔驰停在后面，堵住了退路。

三个男人从出租车上下来，果断地向玛露哈的汽车走去。那个身材高挑、衣冠楚楚的男人带着一件奇怪的武器。玛露哈觉得那是一把霰弹枪，枪托被削短了，枪管又长又粗，像一架望远镜。实际上，那是一把口径九毫米、带消音器的迷你乌兹冲锋枪，它能发射单枚子弹，也能在两秒内连发三十枚子弹。另外两名歹徒也带着冲锋枪和手枪。从后面那辆奔驰上又走下来三个男人，但是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看不见他们。

他们的行动迅速而统一，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只记得短暂偷袭的那两分钟内的零星片段。五个人在围住那辆汽车的同时，也十分专业地盯紧了这三辆车。第六个人拿着冲锋枪在街上巡逻。玛露哈看出了其中的凶兆。

“开车，安海尔！”她向司机喊道，“从人行道开过去，怎样都行，赶紧开车。”

安海尔呆住了，无论如何，前有出租车、后有奔驰，他们没有脱身的余地。玛露哈害怕那些人会开枪，她像抱着救生圈一样抱着她的包，藏在司机座位后面，向贝阿特利丝喊道：

“跳下去。”

“不行，”贝阿特利丝低声说，“跳下去我们会被杀的。”

她颤抖着，但很坚定。她坚信这不过是一次抢劫。她艰难地取下右手的两枚戒指，扔出窗外，想着：“拿了东西就赶紧走吧。”但她没来得及摘下左手的两枚戒指。玛露哈在司机座椅后面缩成一团，甚至不记得自己戴着一枚祖母绿宝石钻戒，还有配套的耳环。

两个人打开玛露哈旁边的门，另两个打开了贝阿特利丝旁边的门。第五个人隔着玻璃朝司机的脑袋开了一枪，由于消音器的作用，枪声听起来几乎像是一声叹息。接着他打开车门，把司机拽了出来，又朝倒在地上的他开了三枪。命运无常：安海尔·玛利亚·罗阿三天前才成为她的司机，他穿着深色西装和熨帖的衬衫，戴着属于部长级领导司机的黑色领带，才刚开始他全新、体面的职业生涯。一周前，曾在扶影公司供职十年之久的前任司机自愿退休了。

玛露哈很久之后才得知司机的遭遇。她躲在藏身处，只能听见玻璃破碎的声音，还有几乎是从她头顶传来的强制命令：“我们为您而来，女士。出来吧！”一只铁掌抓住她的胳膊，把她从车里拖了出来。她尽力抵抗，摔倒了，腿上被划出一道伤痕。但是那两个人把她举了起来，抬到了停在后面的车上。没有人注意到玛露哈紧攥着她的包。

贝阿特利丝的指甲又长又坚硬，而且，她接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她向那个试图把她从车里拽出来的年轻人反抗。“别碰我！”她喊道。他被激怒了，贝阿特利丝意识到他和她一样紧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于是，她改变了语气。

“我自己下来，”她说，“请告诉我该怎么做。”

他指了指出租车。

“坐上那辆车，然后趴在地上，”他对她说，“快！”

车门是开着的，发动机已经启动，司机在座位上静止不动。贝阿特利丝尽量在汽车的后半部平躺。绑架者把他的外套盖在她身上，坐好后，把脚搁在了她的身上。另外两个人上了车：其中一个坐在司机旁边，另一个坐在后面。等到两扇车门同时关闭后，司机便沿着希尔昆巴拉大街颠簸着向北行驶。此时，贝阿特利丝才想起她把自己的包落在了她们的车上，但为时已晚。除了恐惧和不适之外，她无法忍受的还有盖在身上那件外套上的体臭味。

玛露哈被抬上的那辆奔驰一分钟前发动了，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她被安排坐在后排座椅的中间，两边各坐着一个男人。左边的人强迫她趴在他的膝盖上，这个姿势非常不适，她几乎无法呼吸。司机旁边坐着另一个男人，通过一台原始的对讲机和另一辆车通话。玛露

哈愈发感到疑惑，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被带上了哪辆车——她从未发觉它停在她的车后面——但她觉得这辆车很新很舒适，或许还有装甲防护，因为街道上的声音被减弱了，就像微弱的雨声。她觉得自己要窒息了，心脏几乎要从嘴里跳出来。司机旁边的人看起来像是领导，他发现了她的焦虑，试图让她平静下来。

“您冷静点，”他回头说，“我们把您带走是为了让您传递一份公告。几个小时以后您就能回家了。但如果您乱动，那就糟了，所以您冷静点。”

那个让她趴在膝盖上的人也试着让她镇定。玛露哈深深地吸了口气，接着张嘴呼气，呼吸得非常缓慢，渐渐缓了过来。驶过几个街区后，情况变了。汽车在一道陡坡上遇到了交通堵塞。拿着对讲机的人开始对另一辆车的司机大声下达无法完成的命令。在公路的某一段，有几辆救护车停滞不动。救护车的汽笛声和震耳欲聋的喇叭声能把一个神经紧绷的人逼疯，而至少在那个时刻，绑架者的神经都紧绷着。司机试着开路，但他太过紧张，撞在了一辆出租车上。只是撞上也就罢了，对方司机还不住地大喊着什么，这加剧了所有人的紧张情绪。拿着对讲机的人下令，无论如何都得前进。汽车从人行道和空地上逃窜而出。

摆脱拥堵之后，车子继续爬坡。玛露哈觉得他们是在朝拉卡莱拉驶去，那是一处山坡，在那个时段非常拥挤。她突然想起自己的外套口袋里有几颗小豆蔻种子，它们是天然的镇静剂，她便请求绑架者允许她咀嚼这些种子。右边的男人帮她在口袋里找种子，然后发现她紧抱着她的包。包被夺走了，但是他们把小豆蔻递给她。玛露哈试图看清绑匪的模样，但光线十分昏暗。她壮着胆子问他们：“你们是谁？”拿着对讲机的男人用慵懒的声音说道：

“我们是M-19的人。”

这是胡扯。因为M-19已经合法了，当时正在为加入制宪议会而举行竞选活动。

“说真的，”玛露哈说，“你们是毒贩还是游击队的人？”

“游击队的，”前面的那个人说，“但您冷静点，我们只想让您传个信儿。真的。”

他停了下来，命令其他人把玛露哈按在地上，因为他们即将经过一个警察的岗哨。“现在别动，也别说话，不然我们就杀了您。”他说。她感觉到身体侧面被一把左轮手枪顶着，她旁边的男人把话继续说完。

“我们拿枪对着您呢。”

那十分钟长得没有边际。玛露哈集中力气咀嚼小豆蔻种子，它们让她越来越精神。但是，糟糕的姿势让她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交谈（如果他们的确交谈过的话）。在玛露哈的印象中，他们没被盘问就通过了。她最初的猜想被证实了，他们正是朝着拉卡莱拉驶去，这让她感到一阵轻松。她没有试图起身，因为把头放在那个男人的膝盖上更加舒服。车子通过了一段泥巴路，大概五分钟之后停了下来。拿着对讲机的人说：

“到了。”

没有一丝光亮。他们在玛露哈的头上盖上一件外套，让她弯腰出来，因此她唯一看见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脚。她先穿过一个院子，接着可能是一间铺着瓷砖的厨房。当他们掀开外套时，她发现自己在一间

两米宽三米长的小房间里，地上放着一个床垫，光滑的天花板上挂着一个红色的灯泡。过了一会儿，进来两个蒙面的男人，头上戴着某种像是防寒帽的东西，但实际上那是运动裤的一条裤腿，上面还给眼睛和嘴巴挖了三个洞。从那个时刻开始，在被囚禁的全部时间里，她再也没有见过除被绑架者以外任何人的脸。

她意识到这两个看守并不是绑架她的人。他们穿着又旧又脏的衣服，比身高一米六七的玛露哈矮，身材和声音都很年轻。其中一个让玛露哈交出她戴的珠宝。“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他解释说，“它们在这里不会有事的。”玛露哈把祖母绿宝石钻戒交给他，但没有交出耳环。

贝阿特利丝坐在另一辆车上，完全无法判断路线。她一直躺在地上，不记得曾经爬过像拉卡莱拉那样陡的山坡，也不记得曾经通过岗哨，虽然出租车可能有某种直通的特权。一路上，车里的氛围由于交通拥堵而变得十分紧张。司机通过对讲机大喊着说没法从车子上飞过去，问该怎么办，而这让另一辆车里的人更加紧张，发出了好几条自相矛盾的指令。

贝阿特利丝觉得非常不舒服，她弯着腿，被外套的臭味熏得不知所措。她试着调整姿势。看守的人以为她在反抗，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冷静，亲爱的，你不会有事的，”他说，“你只需要捎个信儿。”后来，他终于明白是因为她的腿没有摆好，便帮她舒展了一下，也没之前那么粗鲁了。贝阿特利丝完全无法忍受他对她说“亲爱的”，这种放肆几乎比外套的臭味更冒犯她。但他越是试图让她安静下来，她越是确信他们会杀了她。她估计行程持续了不到四十分钟，因此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应该是八点差一刻。

到达之后的遭遇和玛露哈的一模一样。他们用那件发臭的外套盖住她的头，用手牵着她，确保她只能向下看。她和玛露哈看见的东西也一样：院子、铺着瓷砖的地面，最后是两级台阶。他们让她往左边移动，接着取下外套。玛露哈在那里，坐在一张凳子上，在唯一一盏灯泡的红光下显得脸色苍白。

“贝阿特利丝，”玛露哈说，“您在这里！”

她不知道贝阿特利丝那边发生了什么，以为他们已经把她放了，因为她和一切都毫无瓜葛。然而，当她看见贝阿特利丝出现在那里，她既感到一阵强烈的快乐，因为她不再孤单一人，同时又感到一阵强烈的悲伤，因为她也被绑架了。她们如同许久未见一般互相拥抱。

要两人在那间陋室里勉强过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她们要睡在一张铺在地上的床垫上，两个戴着面罩的看守一刻也不让她们离开自己的视线。新来的一个戴面罩的男人很优雅，身材魁梧，至少有一米八，他们管他叫“博士”，他发号施令时带着大头目的气势。他们摘掉了贝阿特利丝左手的戒指，但没有发现她还戴着一条有圣母像章的金链子。

“这是一次军事行动，你们不会有事的，”他说，然后重复道，“带你们过来只是想让你们给政府传递一份公告。”

“你们是谁？”玛露哈问他。

他耸了耸肩，答道：“现在这无关紧要。”他抬起机关枪让她看清楚，接着说：“但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这是一把带消音器的机关枪，没人知道你们在哪儿、和谁在一起。要是你们大声叫喊或者是做了什么，我们会让你们在一分钟内消失，没人能再听到你们的消息。”两人

屏住呼吸，等着最糟糕的结果。但是威胁完之后，头目向贝阿特利丝走去。

“现在我们要把你们分开，但是我们打算放了您，”他对她说，“我们带您来是个误会。”

贝阿特利丝立马做出了反应。

“啊，不。”她毫不犹豫地说，“我留下来陪玛露哈。”

这是一个勇敢而慷慨的决定，连绑匪都不带一丝讽刺地感叹说：“玛露哈女士，您有一个多么忠诚的朋友啊。”玛露哈既错愕又感激，她肯定地说，贝阿特利丝一贯如此，她非常感谢。“博士”问她们是否想吃点什么，两人都说不用了。她们要了水，因为她们的嘴唇都干了。他们给她俩拿了饮料。平时，玛露哈手边总会有一支点燃的香烟、一只烟盒和一个打火机，而这一路上她都没有抽烟。她请求他们把装着香烟的包还给她。那个男人递来一根他的烟。

两人都要求上厕所。贝阿特利丝先去，她的头上被包了一块肮脏的破布。“看地上。”有人命令她。他们拉着她的手，带她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来到一间简陋至极的厕所，条件非常糟糕，一扇忧伤的小窗朝着黑夜打开。门的内侧并没有插销，但门关得很严实。于是，贝阿特利丝爬上抽水马桶，向窗外望去。就着路灯的光，她唯一能看见的东西是一座红顶土坯房，房子前面有一块草坪，看起来就像草原里那些建在小道上的房子。

当她回到房间时，情况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刚刚得知您是谁，您对我们也有用处，”“博士”对她说，“您还是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吧。”广播刚刚播报了这起绑架案，他们因此得知了相关信息。

当时，国家广播电视台（RCN）处理公共秩序消息的记者埃杜阿尔多·卡里约正在采访某军方人士，该人士通过无线电话获悉了这起绑架案。于是，这则新闻被草率地播报出来，绑匪们就这样得知了贝阿特利丝的身份。

广播还播报了被撞的出租车司机记下的两个车牌号码，还有撞他的那辆车的基本信息。警方确认了逃逸路线。现在，这座房子对所有人来说都变得十分危险，他们得马上离开。更糟糕的是，被绑架的两个人将被锁进另一辆车的后备箱里。

两人的争辩毫无用处，因为绑匪看起来就像她们一样害怕，而且并没有掩饰这一点。玛露哈想要点医用酒精，想到她们可能会在后备箱里窒息身亡，她觉得无所适从。

“没有酒精。”“博士”严厉地说，“你们坐进后备箱里，没别的办法。快。”

她们被迫脱下鞋子拿在手上，被人领着穿过房子来到车库。在那里，他们取下她们的头套，没有来硬的，只是让她们爬进后备箱，摆成胎儿的姿势。他们撕去了密封胶，后备箱里空间充足，通风良好。关上后备箱前，“博士”恐吓她们:

“我们带了十公斤炸药，”他说，“一旦你们大叫、咳嗽、哭，或者弄些别的名堂，我们就下车，然后把车炸了。”

通过后备箱的缝隙，清凉纯净的空气透了进来，如同从空调里吹出一般，她俩松了口气，同时惊奇不已。窒息的感觉消失了，只留下了不确定感。玛露哈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这种态度会与彻底的心灰意冷相混淆，但实际上这是她忍受焦虑的一种神奇的方式。相反，贝

阿特利丝充满了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后备箱没调整妥当，留下了一道光缝，她便向那道光缝望去。透过后玻璃窗，她看见了车里的乘客：后排座椅上坐着两个男人，司机旁边坐着一个长头发的女人，她带着一个大约两岁的孩子。在右手边，贝阿特利丝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商业中心的巨幅广告，广告闪着黄光。毫无疑问，那是通向北部的公路，一路上都有路灯照明，接着是一段黑灯瞎火的土路。车子放缓了速度，十五分钟后停了下来。

大概又是一个岗哨。她们能听见模糊的说话声、其他车辆的声音和音乐声；但是周围一片漆黑，贝阿特利丝什么都看不清。玛露哈清醒了过来，集中注意力，希望这里会检查车辆的后备箱。车子大约在五分钟之后启动了，然后爬上了一个陡坡，但这一次她们无法确定路线。大约十分钟后，车子又停了下来，后备箱被打开。她们的头又一次被蒙了起来。在黑暗中，有人帮助她俩下了车。

两人一起走了一段路，路线和另一座房子里的类似。她们看着地面，由绑匪们引导着穿过一条走廊、一个有人在低声交谈的小客厅，最后来到了一间屋子。进屋前，“博士”让她们做好思想准备：

“现在，你们将会见到一个朋友。”他告诉她们。

房间里的灯光十分昏暗，她们过了一会儿才适应。那个空间不足两米宽三米长，唯一的窗户关闭着。两个蒙面人坐在地上的单人床垫上，专心地看着电视，就像留在之前那座房子里的那些人一样。一切都阴森森的，充满了压迫感。房门左边的角落里，有一个幽灵般的女人，她头发花白暗淡，目光呆滞，瘦得只剩皮包骨，坐在一张装着铁扶手的窄床上。她似乎没有意识到有人进来：没有张望，没有呼吸，什么都没有。连尸体都不会如此死气沉沉。玛露哈克制住了冲动。

“玛丽娜！”她低声说。

那是玛丽娜·蒙托亚，她被绑架快两个月了，大家都以为她已经死了。她的兄弟赫尔曼·蒙托亚先生曾经是共和国的总统府秘书长，在比尔希略·巴尔科政府中掌握大权。他的儿子阿尔瓦罗·迭戈是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经理，毒贩们曾经绑架他，企图在与政府的协商中施加压力。对此，最流行但也从未被证实的说法是，双方缔结了一项秘密约定，此后不久他便被释放，但后来的政府并未履行该约定。九个月之后，对他的姑姑玛丽娜实施的绑架只能被解释为一次卑鄙的报复行为，因为当时她已经没有了交易的价值。巴尔科任期结束，赫尔曼·蒙托亚变成了哥伦比亚驻加拿大大使。因此，所有人都认为他们绑架玛丽娜仅仅是为了杀害她。

绑架初期，国内外的舆论风起云涌。之后，玛丽娜的名字就渐渐从报纸上消失了。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尽管对她非常熟悉，此刻却都很难认出她。她们被带到了她的房间，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身陷死囚的牢房。玛丽娜没有改变神色。玛露哈握紧她的手，不寒而栗。玛丽娜的手既不冷也不热，没有传递出任何东西。

电视新闻节目的主题曲让她从惊愕中回过神来。那是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七日晚九点半。半小时前，国家新闻台的记者埃尔南·埃斯图庇南通过扶影公司的一个朋友得知了这起绑架案，并赶赴现场。他还没有带着完整的细节回到办公室，导演兼主持人哈维尔·阿雅拉就以如下标题报道了这则紧急新闻：“今晚七点半，著名政治家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的妻子、扶影公司董事长玛露哈·帕琼·比亚米萨尔与阿尔贝托的妹妹贝阿特利丝·比亚米萨尔·德·盖莱罗被绑架。”意图看上去很明显：玛露哈是路易斯·卡洛斯·加兰的遗孀格萝莉娅·帕琼的妹妹。路易斯曾是一名青年记者，于一九七九年发起了新自由主义运动，旨在扫除自

由党内的政治歪风。他曾是打击贩毒、支持国民引渡的最严厉、最强大的力量。

二

第一个获悉绑架案的家庭成员是贝阿特利丝的丈夫佩德罗·盖莱罗医生。他当时正在大约十个街区外的心理治疗和人类性学研究中心，进行一场关于物种进化的演讲，从单细胞生物的基本机能一直谈到人类的丰富情感。一名警官的来电打断了他，警官用十分专业的口吻问他是否认识贝阿特利丝·比亚米萨尔。“当然了，”盖莱罗医生回答说，“她是我的妻子。”警官沉默了一会儿，换了一种更为人性化的语气：“好吧，您别太着急。”盖莱罗不必动用他出色的精神科医生专业素质也能明白，这句开场白之后一定是某件极其严重的事情。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问。

“一名司机在第五公路与85号大街交汇的街角被杀了。”警官回答道，“是一辆雷诺21，浅银灰色的，车牌号是波哥大PS-2034。您认识这个号码吗？”

“完全不认识。”盖莱罗医生不耐烦地说，“请告诉我贝阿特利丝到底怎么了。”

“目前我们只能告诉您她失踪了。”警官说，“我们在座椅上发现了她的包，还有一本笔记本，上面写着如果有紧急情况就跟您联系。”

确定无疑了。盖莱罗医生建议过他的妻子，让她在笔记本上注明这一条。虽然他不认得车牌号，但是警官的描述同玛露哈的车子相

符。发生案件的街角离玛露哈家只有几步之遥，贝阿特利丝回家前会路过那里。盖莱罗医生匆匆做了解释，中止了演讲。他的朋友、泌尿科医生阿隆索·阿古那载着他穿过晚七点的拥堵交通，花了十五分钟来到案发现场。

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是玛露哈·帕琼的丈夫，也是贝阿特利丝的哥哥。他距离绑架现场只有两百米，通过门房打来的内部电话得知了消息。制宪议会的成员将于十二月选出，为了相关的竞选活动，他在《时代报》社忙了一下午。他四点钟回到家，由于竞选前夕的疲惫，穿着衣服就睡着了。快到七点的时候，他的儿子安德烈斯回到家，贝阿特利丝的儿子加夫列尔也跟着一起来了。从儿时起，他们就是最好的朋友。安德烈斯探进卧室找妈妈，把阿尔贝托吵醒了。黑暗中，阿尔贝托被吓了一跳。在半睡半醒间，他点亮电灯，发现快七点了，而玛露哈还没有回来。

玛露哈会晚归，这太奇怪了。无论交通如何糟糕，她和贝阿特利丝总是很早回家，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她也会打电话提前告知。而且，玛露哈之前跟他约好了，五点在家里见。阿尔贝托很担心，他让安德烈斯给扶影公司打电话，保安告诉他，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已经走了，而且只比平常晚走了一小会儿，应该很快就会到家了。电话铃响的时候，阿尔贝托去厨房喝水了，安德烈斯接起了电话。只听安德烈斯的语气，阿尔贝托就明白，那是一通让人惊慌的电话。事情是这样：一辆汽车在街角出了什么事，车好像是玛露哈的。门房说得很模糊。

阿尔贝托让安德烈斯留在家里，以防有人打电话来，然后自己匆匆忙忙地出门了，加夫列尔跟着他。他们紧张得没办法等电梯，而是飞快地走下楼梯，门房向他们大喊:

“好像死了一个人。”

街上非常热闹。邻居们从居民楼的窗户探出头来，希尔昆巴拉大街上车辆拥堵，喧喧嚷嚷。街角处，一支带着无线电的警察巡逻队不让好奇的人们靠近那辆被遗弃在那里的汽车。盖莱罗医生比他早到，这让比亚米萨尔很惊讶。

那确实是玛露哈的车。离绑架案发生至少已经半小时了，现场只留下了这些痕迹：驾驶座一侧被子弹击碎的玻璃、座椅上的血迹和玻璃碎片、柏油路上潮湿的阴影——奄奄一息的司机刚刚从那里被抬走。其余的东西都整洁有序。

警官效率极高，非常正式地告知比亚米萨尔由少数几位目击者提供的细节。这些细节不太完整，而且并不精确，有一些甚至相互矛盾。但毫无疑问，这是一起绑架案，唯一已知的伤者是司机。阿尔贝托想知道司机能否提供一些线索。但这是不可能的：司机处在昏迷之中，暂时也没有人知道他被带去了哪里。

另一边，盖莱罗医生仿佛因这样的打击而麻木了，他好像没有估计出这件事的严重程度。他一来就认出了贝阿特利丝的包、化妆盒、日程本、装着身份证的皮质卡套以及装有一万两千比索和信用卡的钱夹。他得出的结论是，被绑架的只有他的妻子。

“你看，玛露哈的包不在这儿，”他对他的内兄说，“或许她当时不在车上。”

两人都在试图平复呼吸，这或许是一种谨慎而专业的分散注意力的方式，但是阿尔贝托想得更多。当时他急于证实，车上及车辆四周没有除司机之外其他人的血迹，好以此确定两位女士都没有受伤。对

他而言，其余的一切显而易见。他为自己没能预见这起绑架案而内疚不已。现在他十分确定，这是一次针对他的行动，他知道是谁做的，也知道是为什么。

阿尔贝托前脚刚走，广播新闻就播报说，玛露哈的司机在开往考垂医院的专车上去世了。不久后，这则枪击新闻引起了蜗牛电台的法律编辑、记者吉耶尔摩·弗朗哥的注意，他来到现场，但只发现了那辆被遗弃的汽车，在司机的座椅上捡到了几块玻璃碎片和一张沾了血迹的烟纸，他把这些东西放进一只透明的盒子里，标上数字和日期。弗朗哥从事法律新闻报道工作多年，那只盒子将成为他职业生涯丰富遗产中的一部分。

警官陪比亚米萨尔回家时，对他进行了一次非正式查问，这可能对调查有帮助。但比亚米萨尔在回答他时，只想着自己即将面对的漫长而艰难的日子。首先，他告诉安德烈斯他的决定：由安德烈斯招呼来到家里的客人，而他去拨打紧急电话，并整理自己的思路。他把自己锁到卧室里，开始给总统府打电话。

他和塞萨尔·加维里亚总统政见相合，且私交甚笃，总统认为他是一个冲动又热情、但在面对极其危急的情况时又能保持冷静的人。因此当他说起他的妻子和妹妹被绑架时，所表现出的激动和冷淡让总统印象深刻。最后他毫不拐弯抹角地说：

“您得为她们俩的性命负责。”

当塞萨尔·加维里亚认为必须强硬的时候，他可以变成最强硬的人，他当时便是这么做的。

“您听我一句，阿尔贝托，”他干巴巴地说，“所有该做的事都会做成的。”

他随即以同样镇静的口吻告诉阿尔贝托，他会马上通知安全顾问拉法埃尔·帕尔多·卢埃达，让他负责这件事，并随时向自己汇报情况。事情的进展证明了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记者们纷纷到来。比亚米萨尔知道一些被绑架者的先例，他们会被允许听广播、看电视。因此他临时发布了一条消息，要求绑匪尊重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因为她们是两个值得尊重的女人，而且与战争毫无瓜葛。他还宣布，从此刻开始，他将用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解救她们。

米盖尔·玛萨·马尔克斯将军是最早到来的人之一，他是安全管理部部长，负责调查本次绑架案。玛萨将军从七年前的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政府时期就开始担任本职，在比尔希略·巴尔科总统任职期间续任，而且刚刚被塞萨尔·加维里亚总统任命。在一个几乎不可能做好的职位上，他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幸存者，哪怕是在打击贩毒行为的艰难战争时期也恪尽职守。他中等身材，犹如被钢铁铸成般强壮，有着好战民族的公牛般的脖子。将军能长时间保持沉默，同时也能在亲密的朋友圈子中畅所欲言：他是一个地道的瓜希拉[1]人。但是在工作中，他向来公事公办，对他来说，打击毒品贸易的战争是一件私事，是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殊死较量。这场较量也得到了对方充分的回应。埃斯科瓦尔在针对他的两场连续袭击中使用了两千六百公斤炸药：这是埃斯科瓦尔对一个敌人前所未有的最高认可。而玛萨·马尔克斯在两场袭击中都安然无恙，他把这归结于圣婴的庇佑。当然，埃斯科瓦尔把玛萨·马尔克斯没能杀死他的奇迹也归功于同一位圣婴。

加维里亚总统坚持执行一项不成文的政策：如果没有与被绑架者的家属达成协议，军队不能擅自采取任何解救措施。但是，政界纷传总统和玛萨将军关于这一程序有分歧。比亚米萨尔决定先发制人。

“我想告诉您，我反对实施强行营救。”他对玛萨将军说，“我必须确保你们不会这样做，你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得提前跟我商量。”

玛萨·马尔克斯表示赞同。一段信息量十足的漫长对话之后，他下令监听比亚米萨尔的电话，以防绑匪在夜间和他联系。

在当晚与拉法埃尔·帕尔多的第一次对话中，比亚米萨尔得知，总统任命帕尔多为政府与家属间的调解人，他是唯一获得授权可以对本案发表官方声明的人。他们两人都清楚，绑架玛露哈是贩毒分子的计谋，想通过她姐姐格萝莉娅·帕琼来对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不再凭空猜测。

在毒贩们还没有通过走后门介入国家政治高层的时候，哥伦比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世界毒品贸易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后来，毒贩们先是利用自己不断增长的腐化和贿赂能力，后来又通过自己的候选人进入了政治高层。一九八二年，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试图在路易斯·卡洛斯·加兰的运动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路易斯将他除名，并在麦德林的一场五千人游行中揭开了他的真面目。但在不久之后，借助政府自由主义的边缘势力，埃斯科瓦尔成了众议院的替补议员。他没有忘记耻辱，向政府，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发起了一场殊死之战。罗德里格·拉腊·波尼亚，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政府的司法部长，在波哥大街头被一名骑摩托车的杀手刺杀身亡。继任者恩里戈·帕莱霍被一名雇佣杀手跟踪至布达佩斯，中了一枪，但活了下来。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八日，路易斯·卡洛斯·加兰尽管受着十八名全副武装的

保镖保护，却仍在距总统府十公里的索阿查市公共广场被机关枪射杀。

那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毒贩害怕自己会被引渡到美国，他们会因为在那里犯下的罪行而受到审判，被处以极刑。一九八七年，被引渡的哥伦比亚毒贩卡洛斯·莱德尔就被美国法院判处了终身监禁外加一百三十年有期徒刑。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胡里奥·塞萨尔·图尔巴伊总统签署的一项协议。在其中，政府第一次通过了国民引渡的决议。拉腊·波尼亚被刺杀时，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总统首次执行决议，并迅速通过了一系列引渡决定。毒贩们十分害怕美国向全世界伸出的长臂，意识到没有比哥伦比亚更安全的地方了，最终成了自己国家内部的秘密逃亡者。最讽刺的是，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寻求祖国的庇护才能保住性命。因此，为了得到庇护，他们既用暴力胁迫，又动之以情理：既实施残酷的、无差别的恐怖主义，同时又表示愿意屈服于法律。他们还提出，只要不被引渡，他们会回国并在哥伦比亚投资。那是暗影里真实的反对力量，这股力量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可被引渡者"，还有埃斯科瓦尔的一句名言："宁要哥伦比亚一座坟，不要美国一间牢。"

贝坦库尔时期，战争一直持续。继任者比尔希略·巴尔科加剧了战况。一九八九年路易斯·卡洛斯·加兰被杀害后，曾任竞选经理的塞萨尔·加维里亚成为总统候选人，那时他所面临的局面便是这样糟糕。塞萨尔在竞选时捍卫引渡决议，认为这是巩固司法权不可或缺的工具。他还宣布了一项新策略。策略很简单：服从法律、承认部分或全部罪行的人能得到基本权益，免于引渡。然而，正如初版协议中的提议一样，这对于"可被引渡者"来说是不够的。埃斯科瓦尔通过他的律师提出，不被引渡应该是无条件的，招供和揭发不应该是强制性要求。他

还要求监狱绝对安全，并保证其家属及随从的安全。为了争取这样的结果，他们一边实施恐怖主义，一边积极协商——他们开始绑架记者，意在拧断政府的臂膀。在两个月里，他们绑架了八名记者。因此，针对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的绑架可以被看作那场致命进程之中一颗拧得更紧的螺丝。

从看见那辆千疮百孔的汽车开始，比亚米萨尔便认为，妻子和妹妹的性命取决于他为拯救她们所做的事。后来，在轮番侵扰他家的人群中间，他完全确信了这一点。所以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在一方的挑衅下，战争像一场无法避免的个人决斗般开始了。

实际上，比亚米萨尔已经是个幸存者。一九八五年，作为众议院议员，他促使《国家麻醉剂章程》获准通过。当时还没有打击贩毒行为的普通法律，只有战时颁布的分散法令。后来，路易斯·卡洛斯·加兰命令他阻止一项立法议案的通过，该议案由支持埃斯科瓦尔的议员提交给议会，意在废止引渡决议。这给比亚米萨尔带来了杀身之祸。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两名身穿运动服的杀手假装在他家对面健身，趁他上车时扫射了他两次。他奇迹般地逃脱了。一名袭击者被警方击毙，同谋被拘捕，过了几年后又被释放了。没有人宣称为那次袭击负责，但也没有人对此事由何人指使提出疑问。

在加兰本人的劝说之下，比亚米萨尔同意离开哥伦比亚一段时间。他被任命为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在那里待了一年之后，美国驻新加坡的安保机构逮捕了一名计划前往雅加达的哥伦比亚籍杀手。无法确定他是否受人指使、试图刺杀比亚米萨尔，但他在美国登记了死亡状态，还伪造了一张死亡证明。

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绑架的那个晚上，比亚米萨尔家里快被掀翻了。政客、政府人员以及两位受害者的家属纷纷来到他家。比亚米萨尔家族伟大的朋友、艺术商人阿塞内思·韦拉斯克斯住在楼上，她担负起了女主人的职责。只是没有音乐，不然这个夜晚就与任意一个星期五的夜晚别无二致了。这是难以避免的：在哥伦比亚，所有超过六人的聚会，不论何种类型，不管在什么时段，都注定会变成舞会。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家庭成员都得知了这个消息。玛露哈的女儿阿莱桑德娜处在第一段婚姻中，当哈维尔·阿雅拉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她刚刚在麦考（在遥远的瓜希拉半岛）的一家餐厅吃完晚饭。她是《焦点》栏目的导演，这是一档在每周三热播的电视节目。为了进行一系列采访，她于一天前来到了瓜希拉。当晚，她跑遍了宾馆，试图跟家里取得联系，但是电话一直占线。巧合的是，就在前一期节目里，她采访了一位精神病学家，专长是研究由于监狱戒备森严而引发疾病的临床案例。她一听说绑架的消息，就意识到同样的治疗或许也适用于绑架案的受害者。她回到波哥大，预备从下一期节目开始将这种治疗方法付诸实践。

格萝莉娅·帕琼（玛露哈的姐姐，时任哥伦比亚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凌晨两点被比亚米萨尔的一句话叫醒了："我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玛露哈的女儿胡安娜正在巴黎度假，不久后在格萝莉娅的隔壁房间得知了这个消息。二十七岁的音乐家、作曲家尼可拉斯，则在纽约被叫醒了。

凌晨两点，盖莱罗医生和他的儿子加夫列尔前去找迭戈·蒙塔那·古埃亚尔议员，迭戈是共产党的分支组织"爱国联盟"的主席，也是"高贵者"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成立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致力于调节政府与阿尔瓦罗·迭戈·蒙托亚案的绑匪之间的关系。父子俩发现迭戈不仅醒

着，而且十分抑郁。他在晚间新闻中听说了绑架案的消息，觉得这是道德沦丧的表现。盖莱罗想请他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协商，把自己作为被绑架者与贝阿特利丝交换，这是盖莱罗唯一想求他的事。蒙塔那·古埃亚尔给出的答复非常符合他的做事风格。

“别他妈犯傻了，佩德罗。”他回答说，“在这个国家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

天亮时，盖莱罗医生回到家中，但无心睡眠，他的心因为焦虑一直悬在空中。快到七点的时候，蜗牛电台新闻频道的编导亚米德·阿玛特亲自打电话采访他。盖莱罗医生的情绪处于低谷，受访时十分莽撞地向绑匪们提出了挑战。

比亚米萨尔一分钟都没睡。清晨六点半，他冲了澡，穿好衣服，赶赴与司法部长海梅·希拉尔多·安海尔的会面，了解到了对毒贩恐怖主义采取打击行动的最新进展。会面结束后，比亚米萨尔愈发确信，他的斗争将会是漫长而艰巨的，但是他很感激这用来更新信息的两个小时，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完全误解了毒品贸易。

他没吃早饭，也没吃午饭。到了下午，在几番令人沮丧的努力之后，他也去拜访了迭戈·蒙塔那·古埃亚尔，后者的坦率又一次让他惊讶不已。“你别忘了这事得慢慢来，”他告诉比亚米萨尔，“至少得等到明年六月制宪议会结束以后，因为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将会成为埃斯科瓦尔对抗引渡决议的盾牌。”很多友人反感蒙塔那·古埃亚尔的态度，因为尽管他是“高贵者”的一员，但在报纸上总是毫不掩饰他的悲观。

“无论如何，这破事我不干了，”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比亚米萨尔，“现在我们纯粹是蠢蛋。”

比亚米萨尔结束了没有希望的一天，回到家时，他觉得筋疲力尽、孤单异常。他猛地灌了两口干威士忌，更加萎靡不振。从此刻起，他的儿子安德烈斯将是他唯一的伙伴。安德烈斯终于让他在下午六点吃了一天的第一顿饭。这时，总统打来电话。

“现在行了，阿尔贝托，”他尽量和气地告诉他，“您过来，我们谈一谈。”

晚上七点，加维里亚总统在总统府私人住宅的书房里接见他。总统和他的妻子安娜·米莱娜·穆纽斯还有两个孩子（十一岁的西蒙和八岁的玛丽亚·帕丝）住在那里已经三个月了。这个庇护所很小，但是很舒适，紧邻开满鲜花的温室。家里有摆满了政府刊物和家人照片的木制书架、一套组合音响，还有他们钟爱的唱片：披头士、杰斯罗·塔尔乐队、胡安·路易斯·盖拉、贝多芬、巴赫。在完成令人精疲力竭的政府工作之后，总统总是在这里进行非正式会见，也总是在这里与在黄昏时到来的朋友饮一杯威士忌，放松心情。

加维里亚亲切地问候了比亚米萨尔，与他交谈时带着同情和理解的口吻，但坦率得有些冷酷。然而，比亚米萨尔已经从最初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冷静了许多，而且他掌握了足够多的信息，明白总统能为他做的事非常有限。两人都确定，针对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的绑架有政治动机，并且不需要成为占卜者就知道，始作俑者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但是，明白这一点并不是关键，加维里亚说，关键是让埃斯科瓦尔承认这一点，这是保证被绑架者安全的重要的第一步。

比亚米萨尔从一开始就清楚，总统不会僭越宪法和法律来帮助他，也不会中止寻找绑架者的军事行动。不过，如果没有家属的授权，他也并不会强行营救。

“这，”总统说，“是我们的原则。”

没别的可说了。比亚米萨尔走出总统府时，离绑架案发生已经有二十四个小时。面对自己的命运，他就像一个盲人。但他知道自己有政府的支持，可以着手进行有利于被绑架者的私人行动。他还有拉法埃尔·帕尔多为他效力。但是，最值得他信任的，还是迭戈·蒙塔那·古埃亚尔粗暴的现实主义。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绑架风波中，第一起案件发生于上一年的八月三十日，当时塞萨尔·加维里亚总统上任刚满三周。受害者是迪安娜·图尔巴伊。她是波哥大电视新闻栏目《氪》的导演和《今日×今日》杂志的总编，还是共和国前总统、自由党最高领导人胡里奥·塞萨尔·图尔巴伊的女儿。她组内的四位成员也和她一同被绑架了：新闻栏目编辑阿苏塞娜·里埃瓦诺、编辑胡安·维塔、摄影师理查德·贝塞拉和奥兰多·阿塞维多。此外，还有定居在哥伦比亚的德国记者埃罗·布斯。一共六人。

绑架者下的圈套是一场所谓的对民族解放军（ELN）总司令马努埃尔·佩雷斯神甫的采访。在了解情况的少数人中，没几个人赞成迪安娜接受邀请，国防部长奥斯卡·博特罗将军和拉法埃尔·帕尔多也不同意。总统让拉法埃尔调查了此行的风险，并把这些风险告知图尔巴伊一家。然而，了解迪安娜的人都知道，她不会放弃那次出行的。事实上，与其说是对马努埃尔·佩雷斯神甫的报刊采访激发了她的兴趣，倒不如说是进行一场和平对话的可能性吸引了她。几年前，她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骑着骡子踏上征途，孤注一掷地寻求同自卫武装组织在他们的领地上进行谈话，试图从政治和新闻立场理解他们的运动。那则新闻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最后也没有被公之于众。后来，尽管她与M-19素有矛盾，但她成了卡洛斯·皮萨罗司令的朋友。她曾前往驻

地拜访他，以寻求和平解决矛盾的方案。很显然，策划这场采访骗局的人不会不了解这些背景。因此，在当时，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不论会遇到什么困难，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迪安娜前去同佩雷斯神甫交谈，因为神甫手上握着另一把通往和平的钥匙。

一年前，由于最后时刻发生的种种不利因素，会面推迟了。一九九〇年八月三十日下午五点，迪安娜和她的小组成员终于坐上一辆破破烂烂的汽车，开启了征程。他们没有通知任何人。同行的还有两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女孩，冒充民族解放军指挥部人员。从波哥大开始的这场旅行模仿得几可乱真，就像真的是由游击队策划的一样。那几个随行人员应该是或曾经是某个武装组织的成员，或者接受过非常好的训练，因而在对话和行动中没有露出任何马脚。

第一天，他们来到位于波哥大以西一百四十六公里的翁达。另外几个人开着两辆更舒适的汽车在那里等候他们。在一家小旅馆吃完晚饭之后，他们继续沿着一条看不清的危险道路行驶，一路上大雨倾盆。天亮时，一起严重的滑坡事故阻塞了道路，在清理完毕之前，他们无法前行。上午十一点，他们终于来到了某个地方，巡逻队带着五匹马在那里等候他们。他们没有休息好，非常疲惫。迪安娜和阿苏塞娜跟着那位女孩骑马行进了四个小时，男同伴们则徒步前行。先翻过了一座树木繁茂的山峰，接着经过一处田园般的山谷：咖啡树间坐落着恬静的屋子，人们探出头来，注视他们经过。有几个人认出了迪安娜，从露台上跟她打招呼。胡安·维塔估算了一下，沿途有不下五百人见过他们。下午，他们在一个荒凉的庄园下了马，那里有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自称是民族解放军的人，但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他的任务的信息。所有人都觉得很困惑。在距离不到半公里的地方有一段公路，而后面的城市毫无疑问是麦德林，也就是说，那不是民族解放军

的领地。如果真是这样——埃罗·布斯曾这么想过——那可能是佩雷斯神甫玩的一个精湛把戏，在一个没人会想到的地方同他们会合。

大约两小时后，他们来到了科帕卡瓦那，那是一个被麦德林迅速增长的人口吞噬的城市。他们在一座小屋前下了马。小屋的墙壁是白色的，房顶长满了苔藓，屋子几乎是被镶嵌在一个杂草丛生的突兀斜坡里。屋子里有一间客厅，两侧各一间小房间。其中的一间房里有三张双人床，向导们就在那里歇息。另一间房里有一张双人床和一组上下铺，迪安娜一行人中的男性被安置在那里。她和阿苏塞娜则被安置在屋子深处最好的房间里，那里有女人住过的痕迹。当时是大白天，屋里却灯火通明，因为所有的窗户都被木头封住了。

等了三个小时之后，一个蒙面人以司令的名义欢迎他们。他告诉他们，佩雷斯神甫已经在等候他们，但出于安全考虑，应该让女士先走。这时，迪安娜第一次表现出不安。埃罗·布斯私下里向她提议，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她都不应该允许队伍被分开。但由于无法阻止这件事发生，迪安娜偷偷地把自己的身份证交给他。她没有时间向他解释原因，但是他这么理解：如果她失踪了，这可以作为一项证据。

天亮前，两位女士和胡安·维塔被带走了。埃罗·布斯、理查德·贝塞拉、奥兰多·阿塞维多和五名向导留在那间有双人床和上下铺的房间里。他们怀疑自己陷入了一个圈套，随着时间的推移，疑虑不断加深。晚上玩牌的时候，埃罗·布斯注意到其中一个向导戴着一块奢侈品手表。“所以民族解放军已经到了戴劳力士的级别了。”他嘲讽说。但是他的对手并不认为他在含沙射影。他们携带的武器并不是游击队使用的，而是用于城市武装行动的，这也让埃罗·布斯感到疑惑。奥兰多寡言少语，认为自己缺乏旅行经验，但他不需要过多线索就能预知真相：一件严重的事正在进行中，这让他无法忍受。

变故发生在九月十日半夜。“向导”们闯入房间，大喊着“警察来了”。然后，他们在暴雨中穿过丛林，跋涉两个小时后来到了迪安娜、阿苏塞娜和胡安·维塔早先到达的房子。房子很宽敞，收拾得很整齐，里面放着一台大屏电视机，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那天晚上，纯属偶然，他们所有人离获救如此之近，这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的事。在那几个小时里，他们交流想法、经历和未来规划。迪安娜向埃罗·布斯倾诉说，她为把他们带入这个无法逃脱的圈套而感到沮丧；她坦诚地告诉他，她试图通过对家人（丈夫、孩子、父母）的回忆得到平静，但是结果却总是适得其反。这些回忆一刻不停地折磨她。

第二天晚上，他们带着迪安娜、阿苏塞娜和胡安·维塔徒步走向第三座房子，那条路几乎没法走，而且当时雨下个不停。迪安娜意识到，他们说的没一句是真话。但也是在那个夜晚，一个陌生的看守解开了她的疑惑。

“你们并没有和民族解放军的人在一起，你们落入了‘可被引渡者’的魔爪。”他告诉他们，“但是请冷静，因为你们将会见证历史。”

十九天后，玛丽娜·蒙托亚被绑架了，而迪安娜·图尔巴伊小组的失踪原因依然成谜。玛丽娜被三个衣冠楚楚、持有九毫米手枪和带消音器的迷你乌兹冲锋枪的男人拖走了，当时她经营的位于波哥大北部的餐厅“阿姨家”刚刚打烊。她的姐妹露科莱希娅通常会帮她招呼客人，但幸运的是，露科莱希娅的脚踝扭伤了，打了石膏，那天没法去餐厅。玛丽娜原本已经把餐厅关了，但又重新开了门，因为在敲门的三个男人中，她认得两个。从上周开始，他们已经在店里吃过好几次午饭了，他们有着帕伊萨人[2]的幽默感，很招人喜欢，而且会给服务员百分之三十的小费，这些都给餐厅员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那

天晚上的他们却是另一副模样。玛丽娜一打开门，他们就用万能钥匙把锁卡住，把她从店里拖了出来。她一只手臂紧紧抱住电线杆，大叫起来。一个歹徒用膝盖在她的脊柱上顶了一下，这让她喘不过气来。她毫无知觉地被拖进一辆蓝色奔驰190的后备箱，在里面可以正常呼吸。

路易斯·吉耶尔摩·佩雷斯·蒙托亚是玛丽娜七个孩子中的一个，当年四十八岁，是柯达哥伦比亚分公司的高管，他与大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对他母亲的绑架是政府没有履行赫尔曼·蒙托亚与“可被引渡者”之间的协议造成的恶果。自然，他不信任与政府有关的一切。他试图直接同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联系，以解救母亲。

两天后，他漫无目的地去了麦德林，事先没有联系任何人，甚至不知道到了之后该做什么。他在机场打了一辆出租车，简单指示司机把他带到市区。当看见一具被遗弃在公路边的尸体时，他开始明白现实的面目。那是个十五岁左右的女孩，穿着鲜艳的派对装，妆容浓艳。她的额头被打了一枪，留下一道干涸的血迹。路易斯·吉耶尔摩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他用手指了指。

“那儿有个姑娘死了。”

“是的。”司机回答，但他看都没看，“是跟巴勃罗先生的朋友参加派对的其中一个姑娘。”

这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僵局。路易斯·吉耶尔摩向司机坦白了他此行的目的，司机告诉了他一些关键信息，让他能见到所谓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表亲的女儿。

“今天八点，你到市场后面的教堂去，”他告诉路易斯，“一个叫罗萨莉娅的姑娘会在那儿。”

果然，她坐在广场的一张长凳上等他。她几乎还是个孩子，但是言行却自信得像一个成熟、老练的女人。她告诉他，想办这件事，必须带上五十万比索的现金。她把他下周四必须入住的酒店名称告知于他，还告诉他必须等一通周五早七点或是晚七点打来的电话。

“给你打电话的人叫皮塔。”她明确说。

他白等了两天，第三天过了大半，他才意识到这是个骗局。他很感激皮塔没打电话向他要钱。他谨慎地保持了沉默，他的妻子直到四年后、他为了这本书第一次讲述往事时，才得知了这次出行和它的悲惨结局。

玛丽娜·蒙托亚被绑架四小时后，在波哥大西部拉斯·菲利亚斯区的一条辅路上，一辆吉普车和一辆雷诺18一前一后堵住了《时代报》总编辑弗朗西斯科·桑托斯的汽车。那辆吉普车看似普通，事实上却是一辆原装装甲车。包围它的四个歹徒不仅带着九毫米手枪和带消音器的迷你乌兹冲锋枪，其中一人还带着一把用来击碎玻璃的锤子。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帕丘[3]是个无可救药的好辩者，他先一步打开窗户跟歹徒说话。“如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情愿去死。”他后来说。一个绑匪用枪抵着他的额头，使他不敢妄动，然后按下他的头，让他从车里出来。另一个歹徒打开车的前门，开了三枪：一枪射偏了，打在玻璃上，两枪打穿了司机的头。司机名叫欧罗曼西奥·伊巴涅斯，三十八岁。帕丘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对司机开了枪。数天之后，他重新回忆这次袭击，才想起自己听见三颗子弹的嗡嗡声，声音被消音器减弱了。

这次行动速度飞快，并没有在周二喧闹的车流中引起关注。一名警官于遗留在现场的汽车的前座上发现了那具血淋淋的尸体。他拿起无线电话机，听见从那头传来的一个声音，好似迷失在星系间。

“有。”

“谁在说话？”警官问。

“《时代报》。”

新闻十分钟后播出了。事实上，这场绑架行动从四个月前就开始筹备了，但差点由于帕丘·桑托斯无法预测的行踪而失败。十五年前，由于同样的原因，M-19打消了绑架他父亲埃尔南多·桑托斯的念头。

这一次，他们甚至预料到了最不起眼的细节。绑匪们的汽车在博亚卡大街和80号大街的交汇处被堵住了，他们开到人行道上以摆脱拥堵，随后在一个居民区的犄角旮旯里迷了路。帕丘·桑托斯坐在两个绑匪之间，视线被一副涂满指甲油的眼镜挡住了，但他依然记着汽车行驶过程中的转弯和掉头，直到汽车艰难地驶进了一个车库。他试着根据路线和时间猜测他们所在的街区。

他戴着遮蔽视线的眼镜，一个绑匪拉着他的手臂带他走到一条走廊的尽头。他们走到二楼，左转，走了差不多五步，来到一个很冷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摘掉了他的眼镜。他身处一个阴森的房间，窗户被木条封了起来，天花板上孤零零地挂着一个灯泡。家具就只有一张双人床（床单看起来很旧）和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台便携式收音机和一台电视机。

帕丘意识到绑架他的歹徒如此匆忙不仅是出于安全原因，还是为了及时赶回来，收听圣达菲和卡尔达斯的足球赛。为了让他安静些，他们给了他一瓶白酒，让他单独跟他的收音机待在一起。他们去了一楼收听比赛。帕丘在十分钟内喝了半瓶酒，没感觉到酒劲，但有了收听球赛的心情。他从小就是圣达菲的忠实球迷，二比二的平局让他十分恼火，没法尽情喝酒。最后，他在九点半的电视新闻中看见了自己，电视里的他穿着晚礼服，被选美小姐簇拥着。那时他才得知司机的死讯。

看完新闻之后，一个戴着布口罩的看守走了进来，强迫他脱下衣服，换上灰色汗衫，这仿佛是“可被引渡者”监狱里的必需品。看守还试图拿走他放在大衣口袋里的哮喘吸入剂，但是帕丘说这会要他的命，看守相信了，又向他说明了囚徒生活中的规矩：他可以用走廊的厕所，可以无限制地听广播看电视，但音量得正常。最后，那人让他躺下，在他的脚踝上系了根绳子，把他绑在床上。

看守在地上铺了张和床平行的床垫，过了一会儿就开始断断续续地打鼾。夜深了，帕丘在黑暗中意识到，这仅仅是第一晚，在不确定的未来里一切都可能发生。他想起了玛丽亚·维多利亚（朋友们叫她玛丽亚维），他美丽、聪颖、和善的妻子。他们当时有两个孩子，二十个月大的本哈明和七个月大的加夫列尔。邻居的鸡叫了。帕丘对它混乱的生物钟感到惊讶。“一只晚上十点叫的鸡一定是疯了。”他想。他是一个情绪化、冲动、易流泪的男人：他父亲的翻版。安德烈斯·埃斯卡比是他妹妹胡安妮塔的丈夫，死在一架飞行中途被“可被引渡者”炸毁的飞机上。在家人们情绪激动时，他说了一句令所有人都震惊的话：“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活不过十二月。”然而，他并不觉得绑架案发生的那个夜晚会是他的最后一夜。他的神经第一次平缓下来，他肯定

自己能活下来。他通过呼吸的节奏判断，躺在旁边的看守是醒着的，于是他问：

“我落在了谁手里？”

“你更愿意落在谁手里？”看守问道，“游击队还是毒贩子？”

“我觉得我落在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手里。”帕丘回答。

“没错，”看守说完立即纠正他，“是在‘可被引渡者’手里。”

新闻播出了。《时代报》总机的操作员给帕丘最亲密的亲属打了电话，这些亲属又打给其他人，一直打到世界尽头。由于一系列奇怪的巧合，帕丘的妻子是最晚得知消息的亲属之一。绑架案发生几分钟后，她的朋友胡安·加夫列尔·乌里维打电话给她，当时他对发生的事还不太确定，便只是问她帕丘有没有回家。她告诉他没有，胡安·加夫列尔不敢告诉她这个尚未被证实的消息。几分钟后，恩里格·桑托斯·卡尔德隆打电话给她，他是她丈夫的堂亲，也是《时代报》的副总编。

“你知道帕丘的事了吗？”他问她。

玛丽亚·维多利亚以为他说的是另一件她已经知道的事，那事跟她丈夫也有点关系。

“当然了。”她回答。

恩里格着急地道了别，接着给其他亲戚打电话。几年后，谈起那次误解，玛丽亚·维多利亚说：“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我太自作聪明了。”她立刻重新打给了胡安·加夫列尔，他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她：司机被杀了，帕丘被抓走了。

加维里亚总统和他最亲近的顾问正在重新察看几则宣传制宪议会竞选的商业广告，他的新闻顾问毛里西奥·巴尔加斯向他耳语道：“小帕丘·桑托斯被绑架了。”放映没有中断。总统摘下眼镜看着巴尔加斯。他看视频时需要眼镜。

“随时向我汇报。”他说。

他戴上眼镜，继续观看放映的内容。他亲密的朋友、通讯部长阿尔贝托·卡萨斯·桑塔玛利亚在旁边听见了这个消息，低声把它传达给总统的顾问们。大厅里一阵骚动。但总统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这符合他的性格。他用遵守学校纪律般的口吻说：“得先把这个任务完成。”广告放完之后，他摘下眼镜，放进胸前的口袋里，命令毛里西奥·巴尔加斯道：

“请您给拉法埃尔·帕尔多打电话，告诉他马上组建一个安全委员会。”

同时，他像原先计划的那样，积极推动关于商业广告的意见交流。直到得出了最后的修改意见，他才表露出这起绑架案对他造成的影响。半小时后，他走进大厅，安全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刚刚开始讨论，毛里西奥·巴尔加斯就踮着脚走进来，在他耳边说：

“玛丽娜·蒙托亚被绑架了。”

事实上，这事发生在下午四点——在帕丘被绑架之前，但这个消息花了四个小时才传到总统这里。

帕丘的父亲埃尔南多·桑托斯·卡斯蒂大约三小时前睡下了，他正在十万公里外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家酒店里。隔壁房间住着他的一个女儿胡安妮塔，另外一间房住着另一个女儿阿德里安娜和她的丈夫。他们都通过电话得知了这个消息，并决定不把爸爸叫醒。但是他的侄子路易斯·费尔南多直接从波哥大打了电话给他。路易斯以他能想到的最谨慎的方式开场，惊醒了六十八岁高龄、做过五次心脏搭桥手术的叔叔。

“我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他说。

埃尔南多自然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

“发生什么事了？”

“帕丘被绑架了。”

绑架案不管多严重，都不像谋杀案一样无可挽回。埃尔南多松了口气：“愿上帝保佑！”说完马上改变了语气：

“大家冷静。我们商量下该怎么办。”

一个小时后，在托斯卡纳香气馥郁的秋日清晨，他们踏上了返回哥伦比亚的漫长旅途。

图尔巴伊一家在迪安娜出行一周后都没有她的消息，感到非常焦急。他们通过主要的游击队组织申请政府的非正式协助。在迪安娜原定的返回日期过去一周后，她的丈夫米盖尔·乌里贝和议员阿尔瓦罗·莱伊瓦秘密前往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位于东部山脉的总部“绿房子”，与所有武装组织取得了联系，试图了解迪安娜是否跟其中某个组织在一起。七个组织在一份联合公告中否认了这一点。

共和国总统常强调，在没有确定信息的情况下，舆论应该反对虚假公告的扩散，并提出，比起虚假公告，应该更相信政府的信息。但舆论总对“可被引渡者”的公告深信不疑，这个严峻的事实令人心寒。十月三十日——距迪安娜·图尔巴伊被绑架六十一天，弗朗西斯科·桑托斯被绑架四十二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那天，“可被引渡者”的公告用一句话打消了所有的疑虑：“我们公开承认，失踪的记者在我们手里。”八天后，玛露哈·帕琼和贝阿特利丝·比亚米萨尔被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次行动的背后有着更大的野心。

迪安娜和她的组员失踪的第二天，还没有任何人怀疑他们被绑架了。那天，著名的蜗牛电台编导亚米德·阿玛特在波哥大市中心的街上被一队歹徒拦截，他们已经跟踪他数日。阿玛特凭借运动员般的技巧逃脱了魔爪，这让他们大吃一惊。没人知道他之后如何躲过了一颗从背后射来的子弹。几小时后，前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的女儿玛丽亚·克腊拉带着她十二岁的女儿纳塔莉娅，也成功驾驶汽车逃离。在这起事件中，一队绑架者试图在波哥大的某居民区封锁她们的去路。他们接到了不杀受害者的绝对指示，这是唯一能解释以上两次行动失败的理由。

埃尔南多·桑托斯和前总统图尔巴伊是最早确定玛露哈·帕琼和贝阿特利丝·比亚米萨尔落在谁手里的人，因为绑架发生四十八小时后，埃斯科瓦尔本人给他的一名律师写道：“你可以告诉他们俩，帕琼女士在组织手里。”十一月十二日，一封署名为“可被引渡者”的信又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这封信是寄给麦德林《哥伦比亚人》日报主编胡安·戈麦斯·玛蒂内斯的，他曾多次以“高贵者”的名义同埃斯科瓦尔协商。“对玛露哈·帕琼记者的拘禁，”“可被引渡者”在信中写道，“是我们对近期政府安全机构在麦德林市恶意实施的酷刑与绑架的答复，我们在之前

的公告里已多次提到该机构。"他们重申了先前的决定：如果继续如此，他们不会释放任何一名人质。

面对这些超出能力范畴的事情，贝阿特利丝的丈夫佩德罗·盖莱罗医生从一开始就被一种绝对的无力感击垮了，他决定关闭他的心理诊所。"如果我比病人还糟糕的话，怎么能接待他们呢？"他说。他经受着焦虑的折磨，但不想把它传染给孩子们。他一刻都无法平静，傍晚时喝着威士忌聊以自慰，夜晚听着"回忆广播台"的波莱罗舞曲来放逐失眠的时光，歌曲里的情人们流着泪滴。"我亲爱的，"有人唱着，"如果听见我的声音，请回答我。"

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妻子和妹妹的绑架案是连环恶行的一部分。他便开始联合其他受害者的家属，但是他第一次拜访埃尔南多·桑托斯的经历令人气馁。在妻姐格萝莉娅·帕琼·德·加兰的陪同下，他找到了瘫倒在沙发上的埃尔南多，后者的意志十分消沉。"我现在做好准备，这样等弗朗西斯科被杀的时候，我能尽量好受点。"他这样开场。比亚米萨尔拟定了一个与绑匪协商的计划，但埃尔南多用他无可救药的灰心丧气把它碾得粉碎。

"别天真了，小子。"他说，"您一点儿都不知道那些人是什么样的。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前总统图尔巴伊也并不更乐观。他通过不同的渠道得知，他的女儿在"可被引渡者"手里。但是他决定，如果无法确切掌握他们的目的，就不会把女儿的情况公开。一周前，一群记者已经就此向他提问，他就像斗牛士欺骗牛一般大胆地回避他们的问题。

“我的心告诉我，”他回答他们，“迪安娜和她的伙伴们由于新闻工作耽搁了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被关押了。”

进行了三个月无效的操作后，他呈现出一种可以解释的失望状态。比亚米萨尔这样理解他的行为。但他没有被别人的悲观情绪传染，一种新的情绪迫使他采取普通的手段。

比亚米萨尔的一个朋友曾经被问起，在那段日子里，比亚米萨尔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用一句话下了定义：“一个了不起的酒友。”比亚米萨尔欣然接受了这个定义，仿佛这是一个惹人嫉妒、与众不同的优点。然而，他在妻子被绑架的当天就意识到，以他的处境，这还是一个危险的优点，他决定不在公共场合喝酒，直到他被绑架的亲属得到释放为止。作为一个资深社交饮酒人士，他明白酒精会降低警惕性，放松舌头，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现实的认知。对于一个需要谨言慎行的人来说，在公共场合喝酒是一种有风险的行为。因此，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并不是惩罚手段，而是一种安全措施。他不再参加聚会，和他放荡不羁的日子以及政治应酬道了别。在那些情绪高度紧张的夜晚，他的儿子安德烈斯喝着矿泉水听他倾诉衷肠，而他孤独地小酌一杯，聊以自慰。

在同拉法埃尔·帕尔多的会面中，他们研究了其他方法，但总与政府的政策相悖。无论如何，政府都会把引渡作为威胁，他们俩也都知道这是迫使“可被引渡者”投降的最强的压力。总统信心满满地利用引渡政策相威胁，而同时，“可被引渡者”因为这种威胁而拒绝投降。

比亚米萨尔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但他是在军营附近长大的。父亲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弗洛雷斯担任总统府护卫队的医生多年，与军官们的生命密切相关。爷爷霍阿金·比亚米萨尔将军曾经担任过战争部

长，叔叔豪尔赫·比亚米萨尔·弗洛雷斯曾经是军队总司令。阿尔贝托继承了爷爷和叔叔身上军人和桑坦德[4]人的双重性格，他热情又喜欢发号施令，严肃却喜欢应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说话直截了当，而在一生中从没有用“你”称呼过任何人。父亲的形象同样深深影响着他。父亲在哈维里亚那大学修完了医学课程，但由于被无法避免的政治风波牵连，一直没有毕业。比亚米萨尔总是带着一把史密斯维森38短枪，不是作为一个军人，而是单纯作为一个桑坦德人，他希望自己永远都用不上它。无论如何，不管他有没有携带武器，果断和耐心是他最优秀的品质。虽然乍看去，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但是生活已经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凭借这样的家族遗传，比亚米萨尔有足够的魄力用武力解决绑架案，但除非到了生死存亡的极端时刻，否则他拒绝采用这种方式。

因此，十一月底，摆在他面前的唯一解决方法是与埃斯科瓦尔对峙，以桑坦德人的方式强硬且势均力敌地与那位安蒂奥基亚人协商。一天晚上，四处奔波之后，疲惫的比亚米萨尔向拉法埃尔·帕尔多全盘托出他的计划。拉法埃尔·帕尔多理解这种焦虑，但也很快做出了回答。

“听我一句，阿尔贝托，”他简洁而直接地告诉他，“您想用什么手段、想做什么样的尝试都行，但是如果您想继续我们之间的合作，就必须明白您不能逾越政策允许的范畴。一步都不行，阿尔贝托。您得清楚这一点。”

没有任何一项优点能像果断和耐心一样，帮助比亚米萨尔避开那些条件中的内部矛盾。由于有这样的矛盾，他可以凭借想象力，以他的方式随意行动，但同时，他的双手一直都被束缚着。

[1] 哥伦比亚北部省份。

[2] 生活在哥伦比亚西北部省份安蒂奥基亚省的族群，文中提到的麦德林市即是该省的首府。

[3] 弗朗西斯科的昵称。

[4] 哥伦比亚的北部省份。

三

玛露哈睁开双眼，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西班牙箴言：“我们所能承受的，愿上帝别赐予我们。”距离绑架发生已经有十天了，不论是贝阿特利丝还是她，都已经习惯了一种在第一天晚上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生活。绑匪们经常向她们强调，这是一次军事行动，但是关押制度比监狱还要严格。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允许她们说话，而且只能窃窃私语。她们不能随意从床垫上起身，这张床垫就充当了她们的床铺。她们的一切需要都必须向两个看守请示：请示坐下，请示伸腿，请示和玛丽娜说话，请示抽烟。看守紧紧盯住她们不放，连睡觉的时候都不例外。玛露哈得用枕头堵住嘴，才能降低咳嗽的声音。

唯一的那张床是玛丽娜的，一盏床头灯不分日夜地亮着，铺在地上的床垫和床平行。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睡在床垫的两头，就像十二宫里的双鱼座，两人盖同一床被子。彻夜不眠的看守或坐在地上，或靠墙站着。空间非常狭小，他们只要伸一下腿，就会踩到人质的床垫。仅有的一扇窗户被关上了，她们生活在阴暗之中。睡觉前，唯一一扇门的缝隙也会被破布堵上，免得玛丽娜打开床头灯时，灯光照进屋里的其他房间。在玛露哈的请求下，看守摘掉了天花板上的蓝色灯泡，之前它让所有人都显得苍白得可怕。因此，除了电视机闪烁的灯光之外，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没有其他光源。这个密闭的屋子完全不通风，充斥着热气和臭味。早上六点到九点是最糟糕的时候，人质们醒了，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食物。她们等待门缝上的破布被取走，让她们可以透透气。咖啡和香烟供应得很及时，而且有求必应，

这是玛露哈和玛丽娜唯一的安慰。对于贝阿特利丝这位呼吸疗法专家来说，小屋里积累的烟雾是一种灾难。然而，由于另外两位是如此快乐，她便一直默默地忍受着。一次，玛丽娜抽着烟，喝着咖啡，感叹说："如果我们三个能在我家一块儿抽烟、喝咖啡，笑谈这些可怕的日子，那该是多么美好啊。"那天，贝阿特利丝不仅不觉得自己在勉强忍受，反而遗憾自己不会抽烟。

把她们三个安排在同一间监狱里是一项应急方案。那辆被撞的出租车暴露了绑匪的行踪，她们被带去的第一所房子没法使用了，这才有了最后时刻的变动和这样的窘境：只有一张窄床；一张简易床垫要供两人使用；在不到六平方米的空间里挤着三个人质和两个轮班的守卫。玛丽娜也被从另一幢房子（据她自己说，那是座农场）带走过，因为那里的守卫嗜酒如命、不守规矩，将整个组织都带入了危险的境地。无论如何，一家世界顶级的跨国公司，竟没有丝毫的善心来为它的追随者和受害者提供人道的环境，这让人匪夷所思。

她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她们通过声音判断出附近有一条重型卡车专用公路；似乎还有一家卖酒的路边小店，放着音乐开到下午；有时会听见召集群众参加政治或宗教活动的喇叭声，还能听见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她们还有好几次听见了下届制宪议会竞选活动的口号。更常听见的是小型飞机近距离起飞和降落时发出的轰鸣声，因此她们猜测自己是在瓜伊玛拉尔机场附近。这个提供短距离跑道的机场位于波哥大以北二十公里的地方。玛露哈从小就对草原的气候非常熟悉，她觉得房间的冷气并非来自开阔的田野，而是来自城市。此外，守卫们防范过于严格。除非他们身处城市中心，否则这很难解释。

最让人惊讶的是一架轰隆作响、偶尔经过的直升机。它离他们那么近，好像就在房子上方。玛丽娜·蒙托亚说，是负责绑架案的军官来

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不得不习惯那个声音。在那几个月里，那架直升机每个月至少降落一次，人质们确信这与她们有关。

要划分现实和玛丽娜充满感染力的幻想是不可能的。她说帕丘·桑托斯和迪安娜·图尔巴伊就在这幢房子的另一个房间里，因此直升机里的军官每次来访时，都同时处理这三起案件。有一次，她们听见院子里发出警报声。“管家”教训他的妻子，慌慌张张地命令她，让她把东西抬高点儿、放到这边、向上翻，仿佛是想把一具尸体塞进某个装不下的地方。玛丽娜阴森森地胡言乱语，认为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可能被肢解了，他们正在把尸块藏到厨房的瓷砖下面。“他们一旦开始杀人就停不下来，”她说，“接下来就是我们了。”那是一个恐怖的夜晚，后来她们偶然得知，那晚他们是在给旧洗衣机换地方，四个人抬它都很费劲。

夜里万籁俱静，只有一只没有时间观念的疯狂公鸡随时都会打鸣。她们听见远在天边的犬吠声，附近也有一只狗在叫，她们觉得那是守卫养的狗。一开始，玛露哈的状态很糟糕。她蜷缩在床垫上，闭着眼睛。在几天的时间里，她试图保持头脑清醒，如果不是不得已，就不睁开双眼。她无法连续睡八个小时，几乎每次都睡不到半小时，醒来时，又一次身处焦虑之中，那焦虑在现实中窥探着她。这是一种持久的恐惧：她真切地感觉到胃里有一条温暖的线，总是处在爆炸的边缘，让她恐惧不安。玛露哈像看电影一样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试图抓住美好的回忆，然而，不愉快的回忆总是占了上风。她曾三次从雅加达出发回到哥伦比亚，其中一次，她正在吃午饭，路易斯·卡洛斯·加兰邀请她领导团队帮助他竞选下届总统。在上一届选举中，她是他的形象顾问，和姐姐格萝莉娅在全国展开了竞选活动。他们欢庆过胜利，经受过失败，躲避过风险，因此，这个请求是符合常理的。玛露

哈觉得很合理，很满意，但是，吃完饭后，她察觉到加兰脸上有一种意义不明的神情、一种超自然的光芒，她以准确的洞察力快速判断，有人要杀他。征兆太明显了，于是她说服丈夫也一同回哥伦比亚。虽然玛萨·马尔克斯将军给他提了醒，但没有向他说明死亡的风险。启程前八天，他们在雅加达被一则新闻惊醒：加兰被杀害了。

那次经历使她有了抑郁倾向，绑架事件又加剧了症状。她找不到可以坚守的东西，无法摆脱自己正面临致命危险的想法。她不说话，也不吃饭。贝阿特利丝的冷淡和蒙面人的粗鲁让她很心烦，她也无法忍受玛丽娜对绑架者的顺从和对他们制定的规则的认同。她仿佛是另一个看守，如果玛露哈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咳嗽，或是动作超过了必要的幅度，她就会训斥她。玛露哈把杯子放在一个地方，玛丽娜吓坏了，急忙把杯子拿走："小心！"然后把杯子放在别处。玛露哈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对待她。"您别费心了，"玛露哈说，"您在这儿做不了主。"最糟糕的是，看守们也担惊受怕，因为贝阿特利丝整天都在记录囚禁生活的细节，等到自由的那天好讲给丈夫和孩子们听。她还列了一份很长的清单，记录了房间里所有让她厌恶的东西。后来，当发现找不到不让她厌恶的东西时，她只好放弃了。看守们从广播里听说了贝阿特利丝是理疗师，但是他们把理疗师和心理咨询师弄混了，害怕她在筹划用科学方法把他们逼疯，于是禁止她记录。

玛丽娜的"堕落"是可以理解的。对她而言，在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死亡前夜之后，在这个已经属于她，而且只属于她的世界里，另外两个人质的到来就像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入侵。她和看守们的关系本来已经非常密切，却被她们搅乱了。在不到两个星期内，她重新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无尽的孤独之中，此前她本已克服了这种情绪。

而对玛露哈来说，没有哪个夜晚像第一晚那样难以忍受。那是一个漫长的寒夜。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凌晨一点，波哥大的气温在十三度到十五度之间，市中心和机场附近下起了毛毛细雨。玛露哈被倦意打败了。她刚睡着就开始打鼾，但随时又会因为自己老烟枪的咳嗽醒过来。咳嗽很顽固，无法控制。清晨，潮湿的墙壁上渗出了冰冷的夜露，这使她的咳嗽更加严重了。她每次打鼾或者咳嗽时，看守就会用脚后跟在她头上踹一脚。出于一种难以遏抑的恐惧，玛丽娜站在了看守们一边。她威胁说要把玛露哈绑在床垫上，免得她一直动；又威胁要堵住她的嘴，免得她打呼噜。

玛丽娜让贝阿特利丝听凌晨的广播新闻。这是个错误。在第一次接受蜗牛电台的亚米德·阿玛特采访时，佩德罗·盖莱罗医生训斥、辱骂了绑架者，还向他们发出了挑战。他威胁他们，让他们表现得像个男人，承担起责任。贝阿特利丝非常恐惧，她坚信这些侮辱会落到她们身上。

两天后，一个头目如一阵狂风般踹门而入，他衣冠楚楚，身材魁梧，身高有一米九。他穿着无可挑剔的热带羊毛西装和意大利皮鞋，系着黄色真丝领带，这衣着和他粗鲁的举止形成强烈对照。他朝看守们骂了两三句脏话，粗暴地对待其中最害羞的一位——同伴们管这名守卫叫“大灯”。“我听说您很紧张，”他对“大灯”说，“我警告您，在这儿，紧张的人都得死。”接着，他不假思索地对玛露哈说：

“我听说，昨晚您很烦人，又出声儿又咳嗽的。”

玛露哈回答时十分冷静，这种冷静可能会被误解成鄙视。

“我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噜，但是我感觉不到，”她回答，“屋里太冷了，清晨的时候墙上还会滴水，所以我没法忍住不咳嗽。”

那个男人不是来听抱怨的。

“您觉得您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他吼道，“如果您晚上再打呼噜、再咳嗽的话，我们就一枪打爆您的头。”

然后，他又对贝阿特利丝说：

“或者打爆你们孩子和老公的头。我们都认全了，而且知道他们在哪儿。”

“随您便，”玛露哈说，“我不可能不打呼噜。您想杀我就请便吧。”

她很坦诚，而且随着被监禁的时间越来越长，她意识到这样做是对的。从第一天开始，她们就遭到了粗暴对待，这是绑匪们用来击垮人质的方法。相反，贝阿特利丝没有那么高傲。她丈夫在广播里的疯狂表现依然让她耿耿于怀。

“您为什么非得把我们的孩子牵扯进来，他们和这些有什么关系？”她快哭了，“您没有孩子吗？”

他回答说有，或许他有些动容，但贝阿特利丝已经输掉了这场战役：泪水让她无法继续说下去。玛露哈已经冷静下来，她告诉这个头目，如果真的需要达成某种协议，她们可以跟自己的丈夫谈谈。

她觉得这位蒙着面的头目听取了她的建议，因为星期天的时候，他的态度完全变了。他带来了当天的报纸，上面有阿尔贝托·比亚米萨

尔的声明，表示他想跟绑匪们商定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看来，绑匪们也相应地行动起来了。至少，头目非常满意，他让人质们列了一张必需品清单：肥皂、牙刷、香烟、面霜还有一些书。清单上的部分物品当天就到了，但有几本书四个月之后才收到。在监禁期间，她们收集了圣子和圣母玛丽亚的各种画像和纪念物，看守们离开或是休整完回来时，都会留下或是带来这些东西。十天后，她们已经养成了一种居家习惯。她们把鞋子放在床底下，但是房间里太潮湿了，必须时不时地把鞋子取出来，拿到院子里晾干。她们只能穿看守们第一天拿给她们的男袜，袜子是厚羊毛的，有不同的颜色。她们一次穿两双，免得走路出声。她们被绑架当天穿的衣服被没收了，绑匪给她们发了运动服，每人一件灰的和一件粉的，她们穿着运动服活动、睡觉。还发了两套内衣，冲澡的时候才能清洗。刚开始，她们穿着运动服睡觉。后来，她们有了一件睡衣，天冷的时候，她们把睡衣套在运动服外面睡。绑匪们还给了她们一个口袋，用来装她们为数不多的个人物品：备用的运动服、干净的袜子、换洗的内衣、卫生巾、药和化妆品。

她们三人和四个看守共用一个卫生间。上厕所的时候，她们只能把门掩上，不能上锁。而且，尽管还得同时洗衣服，冲澡的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绑匪们给她们多少烟，她们就能抽完多少。玛露哈一天抽一盒多，玛丽娜更多。房间里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家用便携式收音机，好让人质们听新闻，让看守们听音乐。她们收听上午的新闻时，音量很低，好像在干一件偷偷摸摸的事。相反，看守们听舞曲的时候会把音量调得很高，像是他们情绪的写照。

早九点，看守们打开电视收看教育节目，接着看电视剧和另外两三个节目，最后是午间新闻。电视机运行的最主要时段是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一点。那段时间，就像在孩子的房间里一样，即便没有人看，

电视机也一直开着。相反，看新闻时，人质们用极其细致的注意力仔细研究，试图发现家人们加密过的信息。当然，她们永远无法得知自己错过了多少加密信息，又把多少无关的话语错读成了充满希望的口信。

最初的两天内，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在不同的新闻节目里出现了八次。他确信，他的声音会通过某个节目传到受害者那里。此外，玛露哈的孩子几乎都是传媒界人士。有几个孩子在固定时段有电视节目，他们利用这些节目保持着一种他们认为的单边沟通。也许这种沟通是无效的，但他们还是坚持着。

在接下来的星期三，她们看到的第一个节目是阿莱桑德娜从瓜希拉回来之后制作的。精神科专家海梅·加维里亚是贝阿特利丝丈夫的同事，也是他们家的老朋友。他讲授了一系列如何在封闭空间内保持良好情绪的指南。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认识加维里亚医生，她们明白了节目的意图，并对他教授的内容做了笔记。

根据一场与加维里亚医生关于绑架受害者心理学的长谈，阿莱桑德娜准备了八期节目，这是第一期。她挑选了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喜欢的话题，并在其中融入了只有她们才能解读的个人信息。阿莱桑德娜决定每周邀请一个回答问题的嘉宾，这些问题意有所指，肯定能立刻引发人质们的联想。令人惊讶的是，很多毫无准备的观众也发现，这些看似单纯的问题里包含其他内容。

在同一座城市里，离玛露哈她们所在的位置不远，关押弗朗西斯科·桑托斯的房间里，情况一样令人憎恶，只是没有那么严重。一种解释是，除了政治用途之外，对她们的绑架还有复仇意图。此外，几乎可以确定，玛露哈的看守和帕丘的看守是两组人。他们分开行动，相

互之间完全不联系。尽管这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但其中还是有令人费解的不同之处。帕丘的看守们更加亲切，更有自主性，也更容易满足，而且对他的身份也没那么小心翼翼。帕丘睡觉时被一条金属链绑在床边的栏杆上，为了避免将他挫伤，金属链表面裹上了绝缘胶带，这就是他面临的最糟糕的情况。而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连一张能被绑起来的床都没有，这是她们面临的最糟糕的情况。

从第一天起，帕丘准时收到报纸。总体来说，报纸上关于这起绑架案的叙述非常随意，而且信息量很少，这让绑匪们笑弯了腰。当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绑架的时候，他的作息时间已经固定了。他整晚都很清醒，大约在上午十一点的时候入睡。晚上，他有时自己看电视，有时也和看守们一起看，或者跟他们谈论当天的新闻，尤其是关于足球比赛的新闻。他看完书已经很累了，但还有脑力玩纸牌、下棋。他的床很舒服，他从第一天开始就睡得很好，直到感染了疥疮，又痒又痛，而且还双眼灼热。他们洗干净棉被，在房间里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后，这些毛病就消失了。由于窗户被木板封死了，他们从不担心有人会从外面看见屋内的亮光。

十月份，他毫无预兆地出现了幻觉。绑匪们命令他给家人寄去自己还活着的证明。他费了好大劲才控制住自己的幻觉，要了一罐黑咖啡和两包烟，接着开始书写来自灵魂的口信，完成后连个逗号都没改。他把口信录在一卷迷你磁带里。跟普通的磁带相比，信使们更喜欢这种磁带，因为更容易藏起来。他尽可能地放慢语速，并试着改善发音，他说话的态度没有泄露他阴霾的情绪。最后，他录了两则《时代报》当天的头条新闻，用来标记传递消息的日期。他很满意，特别是对第一句话：“所有认识我的人都明白，完成这则口信对我来说有多难。”然而，等到阅读刊登出来的消息时，他已经冷静下来了。他觉得

这则口信像把绳子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因为在最后一句话中，他请求总统尽全力解救记者们。“但是，”他提醒道，“不能违反法律和宪法的规定。这不仅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也是为了让目前被绑架的新闻界重获自由。”几天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绑架的消息传来，他变得更加沮丧，因为他认为这是事情将变得冗长繁复的征兆。逃亡计划由此开始酝酿，并且还将变成无法抗拒的执念。

迪安娜和她组员的情况与其他人质不同。此刻，距离被绑架已经有三个月，他们被困在波哥大以北五百公里的地方。同时囚禁两个女人和四个男人带来了非常复杂的后勤和安全问题。在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的牢房里，看守们彻底缺乏宽容心。在帕丘·桑托斯的牢房里，跟他同属一代人的看守们和蔼可亲、不循规蹈矩。而在迪安娜小组的监狱里，一种临时感统治了一切，这让被绑架者和绑架者都处于警觉和不确定的状态之中，不稳定感毒害了一切，使得所有人都更加紧张了。

迪安娜小组还因其囚禁地点游移不定而与众不同。在长期的囚禁中，人质们在麦德林市内和附近地区被无故转移了至少二十次，被转移到不同风格、不同类别和不同条件的房子里。他们能进行这样的转移，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绑架者与波哥大的不同，他们在自己的环境中行动，能够完全控制环境，并和上级保持直接的联系。

这批人质只有两次被关在同一所房子里，而且每次只持续几个小时。刚开始，他们被分成两组：理查德、奥兰多和埃罗·布斯在一所房子里，迪安娜、阿苏塞娜和胡安·维塔在附近的另一所房子里。有几次转移非常匆忙，而且毫无预兆。由于警察的突袭，他们随时都得马上收拾东西，而且几乎总是徒步攀爬陡坡，还总是在没完没了的暴雨中把水坑踩得哗哗直响。迪安娜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女人，但是囚徒生

活中的冷酷与羞辱恶劣至极，大大超出了她身心忍耐的限度。有几次转移的方式让人难以置信：他们穿过麦德林的街道，搭乘普通的出租车，躲过街上的岗哨和巡警。最开始的几周，没有人知道他们被绑架了，这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最残酷的事实。他们看电视、听广播、阅读报纸，但在九月十四日之前都没有任何一条报道他们失踪的新闻。直到有一天，新闻栏目《氪》报道说迪安娜小组并没有对游击队进行采访，而是被“可被引渡者”绑架了，但没有提及消息来源。又过了好几周，“可被引渡者”才正式承认绑架行为。

看守迪安娜小组的负责人是一个聪明、不拘小节的帕伊萨人，别人叫他堂帕丘，不提姓也不提其他称呼。他大概三十岁，但外表有着长者的祥和。只要他一到，马上就能解决日常生活中既留的问题，还能给未来播撒希望。他给人质们带去礼物，书、糖果、音乐磁带，还告诉他们目前的战况和国家的现状。

然而，他只会偶尔出现，而且糟糕地分派了他的权力。看守们和信使们非常混乱，他们从不蒙面，用漫画里的绰号称呼彼此，在每一处关押地都给人质们带去至少能安慰他们的口信或是字条。从第一周开始，绑架者们给小组成员买了规定的汗衫、洗漱用品、化妆品和本地的报纸。迪安娜和阿苏塞娜与他们玩飞行棋，而且好几次帮助他们列物品清单。一位看守说的一句话让阿苏塞娜十分惊讶，她把这句话记在了笔记上：“你们不用担心钱，最不差的就是钱。”刚开始，看守们的生活十分混乱，听音乐的时候把音量调到最高，还不按时吃饭，经常穿着短裤在屋里走来走去。但是迪安娜承担起了领导的职责，让一切变得井井有条。她强烈要求他们穿上体面的衣服，调低搅乱她们睡眠的音乐的音量，并让一个试图睡在她床边那张床垫上的人离开房间。

阿苏塞娜二十八岁，文静而浪漫。在跟丈夫一起生活了四年之后，她就无法离开他了。她经受着幻想中的嫉妒的折磨，尽管知道他永远不会回信，但她还是给他写情书。从被绑架的第一个星期开始，她每天都记笔记，而且更新得非常及时，以便将来把它们写进书里。她在迪安娜的新闻栏目工作了好几年，和迪安娜的关系没有超出工作的范畴。但是，在不幸面前，她们惺惺相惜。她们一起读报，交谈到黎明，试着一直睡到午饭时间。迪安娜说话的时候总是咄咄逼人，但阿苏塞娜从她身上学到了关于生活的知识，这是在学校里学不到的。

在小组成员的记忆中，迪安娜是一个聪明、快乐、有活力的伙伴，还是一个对政治很敏感的分析员。沮丧的时候，她对他们表达了愧疚之情，因为是她使他们被卷入了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我不在乎我会怎么样，”她告诉他们，“但是如果你们出了什么事，我永远都不能平静地生活。”她和胡安·维塔有着长久的友谊，十分担心他糟糕的身体状况。他是用最充分的理由、最坚决的态度反对此次采访的人之一。他曾因为严重的心梗住院，一出院就陪着她踏上行程。迪安娜没有忘记这些。绑架案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她哭着走进他的房间，问他是否因为她之前没有理会他的建议而恨她。胡安·维塔非常坦率地回答：是的。当得知落入了“可被引渡者”手中的时候，他发自内心地恨她，但是最后，就像接受难以避免的命运一样，他接受了被绑架的事实。最初几天的恨意也变成了愧疚，因为他没能说服她。

在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埃罗·布斯、理查德·贝塞拉和奥兰多·阿塞维多暂时没有那么多感到惊恐的理由。他们在柜子里找到了数量惊人的男装，都没拆封，还带着欧洲大牌的标签。看守们告诉他们，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在多处安全屋里放着应急的衣物。“好好享受，小伙子们，想要什么就提。”他们开玩笑说，“因为交通问题，会有些延迟，

但是我们可以在十二个小时内满足一切要求。”起初，大量的食物和饮料是用骡子运来的，这像是疯子才会做的事。埃罗·布斯告诉他们，没有一个德国人离得开啤酒。于是在下一次出行归来后，他们给他带了三箱啤酒。“氛围很轻松。”埃罗·布斯用他完美的西班牙语讲述道。那几天，他说服了一个看守，让他给三个被绑架者拍张照片，当时三人正在削土豆皮准备午饭。后来，在另一所房子里，拍照被禁止了，但他成功地把一台自动照相机藏在了衣柜上面，并用这台相机制作了一套关于胡安·维塔和他自己的彩色幻灯片。

他们打牌、玩多米诺骨牌、下棋，但是人质们在看守们疯狂的赌注和魔术般的作弊伎俩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大家都是年轻人，最小的可能才十五岁。他在一场每杀死一个警察能拿到两百万比索的比赛中崭露头角，还获得了奖品，对此感到非常自豪。他们完全不在乎钱，理查德·贝塞拉一开始就卖给了他们几副太阳镜和一件摄影师用的外套，卖的价钱够他买五件新的。

在寒冷的夜晚，看守们会不时地抽大麻、把玩武器，有两次还走了火。其中一颗子弹穿过厕所的门，打伤了另一名看守的膝盖。他们通过广播听见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为了解救绑架受害者而发出的号召，其中一个看守大喊道：

“这个婊子养的为什么非得掺和这件事？”

因为这句脏话，他的同伴愤怒地跳了起来，人质们不得不从中调停，以免他们爆发枪战。除了这次之外，埃罗·布斯和理查德都不怎么在意这些事，因为看守们并非凶狠歹毒之人。至于奥兰多，他认为自己是组里多余的人，理所应当会出现在死刑名单的首位。

后来，人质们被拆分成三组，分别安置在三所不同的房子里：理查德和奥兰多在一所，埃罗·布斯和胡安·维塔在另一所，迪安娜和阿苏塞娜在第三所。前两位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带上出租车，在极其糟糕的路况下，穿梭在商业中心之间。同时，麦德林所有的安保人员都在寻找他们。他们被安排在一所还在初步施工阶段的房子里，共用一个房间。房间看起来更像是一间两米见方的牢房，有四名看守，厕所很脏，没有灯。他们只能睡在两张铺在地上的床垫上。隔壁房间一直锁着，那里住着另一个人质，据看守们说，绑架者向他索要上百万的赎金。那是一个魁梧的穆拉托人[1]，脖子上戴着一条实心的金链子。他的双手被捆着，处于绝对孤立的境地。

迪安娜和阿苏塞娜被带去的那座房子既宽敞又舒适，仿佛是某位大首领的私人宅邸，被绑架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们都被囚禁在那里。她们在家用餐桌上吃饭，随意交谈，听流行唱片。阿苏塞娜的笔记上写到，她们听了罗西奥·杜尔卡尔和胡安·玛努埃尔·塞拉特的唱片。就是在这所房子里，迪安娜收看了在她的波哥大公寓里拍摄的电视节目。通过这个节目，她回想起她把衣柜的钥匙藏在了某个地方，但不确定是放在了音乐磁带后面，还是卧室的电视机后面。她还想起来，这场不幸之旅开始前，她最后一次匆忙地离开时，忘记了锁上保险箱。“但愿没人嗅到钱的味道。”她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几天后，在一档普通的电视节目里，她得到了让她安心的答案。

居家生活仿佛没有因为房子里有被绑架者而有什么不同。陌生的女士们来到家里，像对待亲属一样对待她们，送给她们神迹圣徒的纪念章和画像，希望帮助她们获得自由。全家人带着孩子和狗来到家里，在房间里快乐地玩耍。糟糕的是，天气总是不太好。好不容易有几次出太阳的时候，她们也不能出去晒太阳，因为外面总是有男人在

工作，他们可能是化装成泥瓦匠的看守。迪安娜和阿苏塞娜躺在自己的床上，相互拍了照片，此时，她们的身体看起来还没有什么变化。但三个月之后，在迪安娜的另一张相片上，她显得非常憔悴苍老。

九月十九日，迪安娜得知了玛丽娜·蒙托亚和弗朗西斯科·桑托斯的绑架案。她不需外界的定论就明白，跟她刚开始以为的不同，对她的绑架并非一次独立事件，而是一次规模庞大的政治行动，目的是交换更好的条件。堂帕丘证明了这一点：有一份精选出的记者和重要人物名单，只要绑架者有利益需要，就会绑架他们。就是在那时，她决定写日记，不是为了记录她的生活，而是为了记录她的心情和对事物的评价，其中包括：囚禁生活细节，政治分析，人性观察，与家人、上帝、圣母和圣子的没有应答的对话。好几次，她完整地抄写了祷文（包括《主祷文》和《圣母经》），这是一种原始的方式，以书写的方式祈祷或许更加深刻。

很显然，迪安娜并不打算写一部可以出版的作品，而是在构思一本关于政治和人性的备忘录，写作的过程变成了她与自身痛苦的对话。她用又圆又大的字体写作，字迹清楚，但是很难解读，因为她把笔记本里横线间的空隙完全填满了。起初，她在清晨时分偷偷地写作，但是绑匪们发现之后，给她提供了充足的纸笔，好让她在他们睡觉的时候找点事做。

九月二十七日，在玛丽娜和帕丘被绑架一周之后，她写下了第一则笔记：“十九号（周三），本次行动的负责人到来。从那天开始，发生了很多让我窒息的事情。”她思考着为什么始作俑者没有宣布这起绑架案是他们的杰作，接着她自己回答道：一旦他们对始作俑者的目的起不到作用，那些人就可以无声无息地杀掉他们，而不会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感到非常恐惧。”她写道。比起她自

己的状况和从各方来的让她可以总结自身处境的消息，她更担心同伴们的状况。她一直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就像她所有的家人，特别是她的妈妈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信仰变得愈发强烈而深刻，甚至达到了神秘主义的境地。她为所有与她生命相关的人，甚至为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向上帝和圣母祈祷。“也许他最需要您的帮助。”在日记中她给上帝写道，“我知道，为了避免更多的痛苦，您努力让他看见善之所在。我代他请求您，让他理解我们的处境。”

毫无疑问，对于所有人而言，最困难的事就是学会与看守们相处。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的看守是四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十分粗鲁，而且频繁轮岗。每隔十二个小时就换两个人值班，他们坐在地上，拿着冲锋枪，时刻准备着。他们都穿着印有商业广告的短袖上衣、运动鞋和短裤，有时候自己用修枝剪把裤子剪短。六点开始值班的看守中，有一人会一直睡到九点，这段时间应该由另一个看守负责，但他在这个时段基本上也会睡着。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曾经想过，如果一队警察在这个时候发起突袭，看守们完全来不及清醒。

看守通常都是绝对的宿命论者，知道自己会英年早逝，而且接受这个事实，只在乎活在当下。他们做着可憎的工作，原谅自己的方式是帮助家人、买高档衣服、买摩托车，还有守护母亲的幸福。母亲是他们最爱的人，他们做好了为她赴死的准备。他们和受害者依靠着同一位圣子和同一位圣母生活，带着变态的虔诚，每天都向圣子和圣母祈祷，恳求他们的庇护和慈悲。因此，他们向圣子和圣母进献贡品，让他们帮助自己成功地犯罪。排在第二的信仰是氟硝西泮。这是一种镇静剂，能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成就电影里的英雄伟绩。“和啤酒混在一起，喝的人立马会进入飘飘欲仙的状态，”一个守卫说，“所以，如果有人这时候借给他武器，他就会抢一辆车去兜风。别人把车钥匙交

给他的时候，脸上的惊恐表情会让他感到享受。”他们憎恨其他的一切：政客、政府、国家、司法、警察、全社会。他们说，生活就是一坨狗屎。

一开始不可能分辨出他们，因为唯一能见到的是面具，所有人看起来都一样。也就是说：只有一个人。但时间向他们表明，面具能够遮挡面孔，但遮挡不了性格。就这样，她们一一辨认出了他们。每张面具后都有不同的身份、性格和无法磨灭的声音，还有一颗心。虽然她们并不愿意，但最后还是和他们一起分担囚禁生活的孤独，和他们打牌、玩多米诺骨牌、互相帮助解答旧报纸上的填字游戏和谜语。

玛丽娜服从看守们的规则，但也并非对他们一视同仁。她喜欢一些看守，讨厌另外一些；她像母亲一样在他们中间散布恶意的言论，最后酿成了内部矛盾，使得房间里的和谐氛围岌岌可危。但她强迫他们所有人念《玫瑰经》[2]，大家都照做了。

在第一个月的那些看守里，有一位患有突发痴呆症，还反复发作。他们叫他淘气包。他很喜欢玛丽娜，对她很亲热，还会对她发脾气。然而，从第一天起，他就是玛露哈最凶恶的敌人。他会突然间发疯，踹电视机，还用头撞墙。

那个最古怪、最阴郁、最沉默的看守非常瘦，几乎有两米高。他在面具外面又套了一件深蓝色汗衫，就像一个疯疯癫癫的修士。他被人叫作“和尚”，长时间弯着腰，处于一种恍恍惚惚的状态之中。他应该是最早来的几个看守之一，玛丽娜和他很熟，而且对他照顾有加，跟对待其他人不同。他休假回来之后会给她带礼物，其中有一个塑料的耶稣受难像，玛丽娜就用系在上面的普通绳子把它挂在脖子上。只有她见过他的脸，因为在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到来之前，所有的看守

都不蒙面，丝毫不掩饰他们的身份。玛丽娜把这看作她无法逃出那个监牢的征兆。她说那是一个衣着考究的少年，有着她见过的最美丽的眼眸。贝阿特利丝相信这一点，因为他的睫毛又长又卷，从面具的孔隙里伸了出来。他能做出最好和最坏的事。就是他发现了贝阿特利丝戴着圣母像章项链。

“这里不准戴项链，”他说，“您得把它给我。”

贝阿特利丝痛苦地反抗。

“您不能拿走它，”她说，“这是噩兆，如果拿走它，我身上会发生不好的事。”

他被她的痛苦感染了。他解释说，不准佩戴像章是因为里面可能会有远距离定位的电子装置。但是他找到了解决办法：

“这样吧，”他提议说，“您把项链留着，把像章给我。很抱歉，但这是他们给我的命令。”

另一方面，“大灯”偏执地认为有人要杀他，常因恐惧而不住地颤抖。他能听见虚幻的声音；也许是为了迷惑想要认出他的人，他声称自己脸上有一道巨大的伤疤。他用酒精擦拭他碰过的所有东西，以免留下指纹。玛丽娜取笑他，但是无法缓解他的癔症。他会在半夜突然惊醒。“喂！”他非常害怕，低声说，“警察来了！”一天晚上，他关掉了床头灯，害得玛露哈在厕所门上狠狠地撞了一下，几乎失去了知觉。最过分的是，“大灯”还责备她不会在黑暗里活动。

“别操蛋了，”她说，“这又不是侦探片。”

看守们也像是被绑架了。他们不能在房子的其他地方活动，休息时他们睡在另一个房间，房子被锁死了，以免他们逃走。所有的看守都是安蒂奥基亚人，对波哥大很不熟悉。一个看守说，他们每隔二十或三十天休一次假，离开或前往这栋房子时，他们会被蒙上眼睛或是被装进汽车后备箱，以免他们获悉自己的位置。另一个看守害怕一旦他没了用处就会被杀，好把他知道的秘密埋进坟墓。蒙着面、衣冠楚楚的头目们会不定时出现，前来接收情报、发布指令。他们的决定是无法预测的，不论是被绑架者还是看守，都任由他们摆布。

人质们的早餐在最不合理的时刻到来，她们吃的是牛奶咖啡配香肠玉米饼。中午吃浸在灰色汤汁里的菜豆或兵豆、油渣肉丁、一勺米饭，喝一瓶汽水。房间里没有椅子，她们只能坐在床垫上吃饭。出于安全考虑，刀叉被禁止使用，她们只能用勺子吃饭。晚饭很随意，就吃热过的豆子和中午的其他剩菜。

看守们说，房子的主人拿走的钱占了预算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叫他“管家”。他四十来岁，体格健壮，中等身材，说话时鼻音很重，充血的眼睛从面罩的小洞里露出来，看起来昏昏欲睡，可以由此推测，他长着一张羊神般的面孔。他的妻子是一个叫妲玛莉丝的小个子女人，声音很尖，衣衫不整，满口蛀牙，可以整天扯着嗓子唱萨尔萨、巴耶纳托[3]和班布科[4]。她的听力像炮兵一样烂，但她是如此激情四射，让人不禁想象她独自一人在房子里随着自己的音乐翩翩起舞的场景。

要等到人质们提出抗议的时候，“管家”夫妻才会清洗杯盘和床单。抽水马桶一天只能冲四次水。星期天的时候，房主一家会出门，厕所会一直锁着，免得冲水的声音引起邻居的注意。看守们便在洗脸

池或是淋浴排水口撒尿。只有当头目们的直升机快来的时候，妲玛莉丝才会试图掩盖自己的疏忽。她像消防员一样，用水管快速地冲洗楼道和墙壁。她每天都看电视剧，一直看到下午一点，然后把午餐要煮的东西一股脑儿扔进高压锅里，把肉、青菜、土豆、豆子全混在一起，然后点火，直到高压锅开始喷气。

她和丈夫频频争吵，证明恶言恶语拥有极大的力量和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有时能登上灵感的高峰。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九岁，另一个七岁，都在附近的学校上学，偶尔会邀请其他孩子来院儿里看电视或者玩耍。老师有时会在周六拜访他们。其他一些吵吵嚷嚷的朋友则随时会来，兴致一到就放音乐开派对。这时，“管家”夫妇就会锁上房门，强行关掉收音机，强迫玛露哈他们收看静音的电视节目，并且憋得再难受都不能上厕所。

十月底，迪安娜·图尔巴伊发现阿苏塞娜忧心忡忡、十分悲伤。她一整天都不说话，也没有心情和别人分享任何内容。这并不奇怪：阿苏塞娜聚精会神的能力十分出众，特别是在她阅读的时候，如果那本书是《圣经》的话，就更是如此了。但是，她当时的沉默还伴着担惊受怕的情绪和异常苍白的脸色。她坦白地告诉迪安娜，两周前，她就开始担心自己怀孕了。她算得很清楚，她被囚禁了五十多天，连续两次月经都没来。迪安娜因为这个好消息高兴地跳了起来——这是她典型的反应，但是，这加剧了阿苏塞娜的痛苦。

在最初的几次到访中，堂帕丘向他们承诺过，他们会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四被释放。他们觉得这是真的，因为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更好的待遇、更好的食物、更多的行动自由。然而，总会出现更改日期的借口。在那个星期四之后，他们又被告知将于十二月九日被释放，以此庆祝国民制宪议会的选举。接着是圣诞节、新年、三王节、

某人的生日。在延期的锁链里，这看起来更像是一小勺一小勺的安慰。

十一月，堂帕丘继续拜访他们，给他们带去了新书、当天的报纸、过期的杂志还有盒装巧克力，还向他们讲述其他被绑架者的情况。当迪安娜得知自己并不是被佩雷斯神甫囚禁时，她迫切地想要采访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并不是为了发表（如果确实能发表的话），而是为了跟他讨论投降的条件。十月底，堂帕丘告诉她，她的请求被批准了。但是十一月七日的新闻报道给她的幻想带来了致命的第一击：麦德林队和国家队的足球比赛被玛露哈·帕琼和贝阿特利丝·比亚米萨尔被绑架的新闻报道打断了。

胡安·维塔和埃罗·布斯在牢房里得知了这则新闻，他们觉得这是最坏的消息。他们也得出了结论：他们只不过是一部恐怖电影的群众演员。是“凑数的料”，胡安·维塔说；是“废物”，看守们说。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一名看守对埃罗·布斯喊道：

“闭嘴吧，您还真把自己当客人了。”

胡安·维塔陷入了沮丧之中。他吃不下，睡不好，迷失了方向。他选择了令人怜悯的解决方式：一次性死去，而不是每天死去无数次。他脸色苍白，一只胳膊失去了知觉，呼吸困难，总是做噩梦。当时，他只跟死去的亲人们对话，他看见他们活生生地来到自己床边。埃罗·布斯非常不安，于是掀起了一场德国式的骚动。“如果胡安死在这儿，那都是你们害的。”他告诉看守们。看守们听取了他的警告。

他们请来了孔拉多·普里斯科·洛佩拉医生，他是著名的普里斯科集团中的大卫·里卡尔多和阿尔曼多·阿尔贝托·普里斯科·洛佩拉的兄弟。

他们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贩毒初期就跟他合作。据说，他们在麦德林东北地区培养青少年杀手。传言中，他们领导着一群青少年杀手，干着最龌龊的勾当，其中就包括看守绑架的受害者。而与此产生对照的是，医疗界都认为孔拉多医生是业界翘楚，他唯一的污点在于，他是，或者曾经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家庭医生。他进来时没有蒙面，还用出色的德语向埃罗·布斯问好，这让德国人吃了一惊：

“你好埃罗，一切还好吗？”[5]

这次来访让胡安·维塔十分意外，并不是因为诊断结果——“精神高度紧张”，而是出于书籍爱好者的激情。医生给他开出的唯一药方是“读好书”糖浆。这个药方的效果和关于这位医生的政治新闻完全相反，囚犯们觉得那些新闻就像一剂毒药，可以杀死最健康的人。

十一月，迪安娜的不适加剧了：剧烈的头痛、痉挛性腹痛、重度抑郁，但是在她的日记里并没有医生来访的记录。她想，这或许是由于境况的停滞而产生的抑郁。接近年末，她的处境越来越不明朗。“在这里，时间流逝的方式与我们所习惯的不同，”她写道，“我对一切都提不起劲。”当时的一段记录反映了她的悲观情绪：“我回顾了我迄今为止的人生：有多少爱啊！多少次不成熟地做出重要的决定啊！浪费了多少时间在不值得的事情上啊！”在这场激烈的良心拷问中，她的职业占据了特殊的地位：“虽然我越来越确定从事新闻业意味着什么、应该是什么，但是我看不清我的空间。”她甚至也没放过自己的杂志，它“不仅在商业上贫乏至极，在出版内容方面也是如此”。她毅然判定：“它缺乏深度，分析也不足。”

当时，日子在所有人质等待堂帕丘的过程中流逝。总有人提前说他要来，但是很少能说准。他的来访是衡量时间的尺度。他们听见轻

型飞机和直升机从房顶飞过，认为那是日常的巡逻。然而，每次飞机经过，看守们都会行动起来，他们会准备好武器，摆出战斗的架势。在不断重申的警告中，人质们知道，如果发生武装攻击，看守们会首先把他们杀死。

尽管如此，十一月以希望结尾。困扰阿苏塞娜·里埃瓦诺的疑惑消散了：她的症状是假性怀孕，可能是由精神紧张引起的。但是她并不感到庆幸。正相反，在最初的惊吓之后，生孩子的想法已经变成了一种幻想，让她有信心能在获得自由之后很快重生。而迪安娜则在“高贵者”发表的可能达成协议的声明中看见了希望。

对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来说，十一月余下的时间是用来调整的。她们俩都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生存策略。贝阿特利丝很勇敢、很有个性，她安慰自己现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并将这种安慰当作避难所。前十天她很能忍，但她很快就意识到，情况极其复杂凶险，于是她开始旁观困境。玛露哈是个冷静的分析者，反对贝阿特利丝近乎不理智的乐观。她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让她无能为力的事实，囚禁会是漫长且艰难的。她躲进自己的内心深处，仿佛蜗牛躲进了它的壳。她储存能量，深度反思，甚至习惯了自己可能会死去这一难以回避的想法。“我们不会活着从这里出去。”她对自己说。这种心安理得的宿命论却起了相反的作用，连她自己都惊讶万分。从那时起，她觉得她是自己的主人，她关注一切，关注所有人，并成功说服了看守，让规定变得不那么严苛。从被囚禁的第三个礼拜开始，连电视节目都变得让人无法忍受，填字游戏做完了，她们在房间里找到的几本杂志里少数几篇值得阅读的文章也读完了。这些杂志可能是之前某起绑架案留下的。但是，在最糟糕的日子里，玛露哈每天仍给自己保留了两小时完全独处的时间，就像她在被绑架前一直做的那样。

尽管如此，十二月的头几条新闻显示，她们有理由充满期待。玛丽娜预测着自己可怕的命运，玛露哈开始设计充满乐观色彩的游戏，玛丽娜很快也加入进来：有个看守竖起了拇指，表示赞许，她们认为这说明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有一次，妲玛莉丝没有去买生活必需品，她们把这解读为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因为她们就快要被释放了。她们乐在其中，假装自己即将被释放，还选定了日期以及方式。她们生活在黑暗之中，因此想象着那一天会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她们还会在玛露哈公寓的露台上举办聚会。“你们想吃什么？”贝阿特利丝问道。玛丽娜厨艺精湛，口述了一份女王菜谱。她们开始是闹着玩，结束时已经信以为真。为了离开，她们梳洗换衣，给彼此化妆。绑匪曾预告，十二月九日是释放人质的日子，理由是庆祝制宪议会的选举。她们收拾停当，甚至为记者会做好了准备，想好了每一个答案。那一天在焦虑中流逝了，但并没有在苦恼中终结，因为玛露哈坚定地认为，她的丈夫早晚会把她们解救出来，她毫不怀疑这一点。

---

[1]黑白混血人种。

[2]即《圣母圣咏》，是天主教徒用于敬礼圣母玛利亚的祷文。

[3]巴耶纳托是一种用手风琴、小鼓和瓜恰拉卡三种乐器演奏的哥伦比亚音乐。

[4]班布科是哥伦比亚最有特色的歌舞，内容与爱情有关。

[5]原文是德语。

四

自从在比尔希略·巴尔科政府担任部长以来，有一个想法就一直困扰着塞萨尔·加维里亚：如何利用法律手段，代替战争来打击恐怖主义。针对记者们的绑架正是对这个想法的回应。这曾经是他竞选总统时的核心话题，他在就职演讲中又强调了这一点。他说，毒贩的恐怖主义是国家内部问题，或许可以通过一个国家的力量解决；但是贩毒是国际问题，必须用国际手段解决，这样的区分很重要。首要问题是毒贩恐怖主义，头两枚炸弹投下时，舆论要求将这些恐怖分子送进监狱；之后的炸弹则让舆论要求实行引渡；但是从第四枚炸弹开始，舆论就要求赦免他们了。同样，在这个意义上，引渡应该是给罪犯施压、让其交出人质的紧急手段。加维里亚打算毫不留情地将它付诸实践。

在就职的头几天，他为了组建政府和召集国民制宪议会忙碌不已，几乎没有时间和别人交流这件事。这届国民制宪议会将制定出百年来第一部彻底的国家改革方案。自从路易斯·卡洛斯·加兰被谋杀以来，拉法埃尔·帕尔多就对恐怖主义深感不安，但是他也在最初的重担下忙得不可开交。他的情况很特殊，他被总统府任命为安全与公共秩序理事，这是他最初的几项职务之一。总统府被总统的革新之力撼动着。塞萨尔·加维里亚是二十世纪最年轻的总统之一，他热爱诗歌，崇拜披头士，想要彻底变革，他本人给这一系列变革起了一个朴素的名字：大力扑倒。帕尔多带着公文包在那场暴风雨中四处奔走，并习惯了在任何可以工作的地方工作。他的女儿劳拉以为他失业了，因为他

没有固定的离家和回家时间。事实上，因形势所迫而产生的无规律性与拉法埃尔·帕尔多的性格恰恰相符，比起政府官员，他更像是一位抒情诗人。他三十八岁，有着突出而扎实的教育背景：曾就读于波哥大现代中学；获安第斯大学经济学学位，并在那里担任了九年教师和研究员；后来又获荷兰海牙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规划学硕士学位。此外，他还如痴如醉地阅读了所有他能找到的书籍，尤其热衷于两个相差甚远的领域：诗歌和安保。当时，他只有四条领带，是他在前四年的圣诞节收到的礼物，但他不喜欢戴，于是，他把领带放在口袋里，只在紧急时刻才拿出来使用。他还把裤子和外套随意组合，既不考虑花色也不考虑风格，他漫不经心地穿上不同颜色的袜子，而且只要可以，就只穿一件单衣，因为冷和热对他来说没多大影响。他最大的狂欢就是和女儿劳拉打扑克牌，一直打到凌晨两点。他们玩牌时非常安静，赌注是菜豆而不是钱。他美丽耐心的妻子克劳蒂娅常对他发火，因为他如同梦游一般在家里游荡，不知道杯子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关门、怎么把冰箱里的冰块取出来，而且他还有一样神奇的技能：可以无视一切令他无法忍受的事物。不只如此，最奇怪的地方是，他如同雕像一般不露声色，不留丝毫空间让他人窥探他的想法，还拥有一种无情的天赋：可以用不超过四个词就结束一段对话，或是用碑文般的单音节词解决一场激烈的争论。

他的同学和同事无法理解他在家中竟会毫无威严，他们认为他是一个聪明、有序、冷静得令人发指的工作者，觉得他迷糊的特质不过是用来糊弄人的。他会对简单的问题发怒，却对无可救药的事业有着极大的耐心。他性格坚毅，几乎无法被他沉着、狡黠的幽默感调和。比尔希略总统应该是认识到了他守口如瓶和玄秘爱好的可取之处，于是委任他同游击队协商，让他负责冲突地区的重建。帕尔多在这个职位上，和M-19达成了和平协议。而如今，加维里亚总统深不可测的沉

默同他不分伯仲，他们共同保护着许多国家机密。此外，在跻身全世界最不安全、最混乱国家之列的哥伦比亚，总统先生还把安全和公共秩序问题抛给了他。帕尔多的公文包就是他的办公室，在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他不得不借用其他办公室的卫生间和电话。但是总统会就各种问题频繁地咨询他的意见，并在困难重重的会议中如总统预期般专注地倾听他的想法。一天下午，他和总统单独留在办公室，总统疑惑地问他：

“告诉我，拉法埃尔，如果这些人中有人现在就自首，而我们却没有一条指控可以把他送进监狱。对此您不觉得担心吗？”

这是问题的关键：被警察追捕的恐怖分子若无法得到个人和家人的安全保障，是决计不会投降的。而如果将他们缉拿归案，政府又并没有将其绳之以法的依据。解决思路是，政府保证他们及其家人的安全，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寻求促使他们认罪的法律途径。拉法埃尔·帕尔多已经为上届政府思考过这个问题，当加维里亚向他提问的时候，他的公文包里还有一些上届遗留的笔记。这些笔记正是解决方案的雏形：自首的犯人若供认可被控告的罪行，将获得减刑；若将财物交给政府，还将获得额外的减刑。只有这些内容，但是总统隐约见到了方案的全貌，这与他不想采用战争或是和平手段，而是想采用法律手段的观点不谋而合。这样，既无需放弃引渡这一必不可少的威胁，也能使恐怖分子不再与政府作对。

加维里亚总统向司法部长海梅·希拉尔多·安海尔提出了这个方案，后者立马心领神会，长久以来，他也一直在构思将贩毒问题纳入法制框架的方案。此外，他们两人都支持国民引渡，认为引渡是迫使毒贩投降的必要手段。

希拉尔多·安海尔的心不在焉有种智者的感觉，他措辞精准，很早就会熟练地在电脑上打字。他用自己的想法和一些刑法中已经确立的条例完善了这个方案。周六周日，他在自己那台专供记者使用的手提电脑里撰写了第一份草案。周一，他第一时间向总统展示了带有手工涂改痕迹的草案。上面的油墨标题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起点：《服从法律》。

加维里亚总统十分谨慎。在确定方案肯定会被通过之前，他不会把它送到部长委员会。因此，他同希拉尔多·安海尔和拉法埃尔·帕尔多一起彻底检查了草案。拉法埃尔·帕尔多虽然不是律师，但他的只言片语往往能切中要害。后来，总统把更加成熟的版本提交给了安全委员会，希拉尔多·安海尔在会上得到了国防部长奥斯卡·博特罗和刑事诉讼法庭庭长卡洛斯·梅希亚·埃斯科瓦尔的支持。卡洛斯·梅希亚·埃斯科瓦尔是一名年轻有为的法律工作者，他将负责法令的实施。玛萨·马尔克斯将军并没有反对这个方案，但他认为，在同麦德林集团的斗争中，任何非战争途径都是无用的。“只要埃斯科瓦尔不死，”他经常这么说，“这个国家就没得救。”他坚信，除非允许埃斯科瓦尔在政府的保护下在监狱里继续贩毒，否则他绝不会投降。

他们把方案呈交给了部长委员会。方案中明确：为了避免发生惨剧，他们不会与恐怖分子协商，而且毒品消费国要为这场惨剧负首要责任。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在与毒品贸易的斗争中，赋予引渡最大的法律效力；而对自首的人来说，不被引渡将作为一系列激励和保障措施中的最大奖励。

争论的关键点之一是由法官们负责考虑的可宽恕罪行截止日期。也就是说，在法令规定的日期之后犯下的任何罪行都不会得到庇护。总统府秘书长法比奥·比耶加斯是截止日期最理智的反对者，他提出了

一项有力的依据：政府将无法对该日期之后的罪行问责。然而，大多数人都赞同总统的方案。必须要设定截止日期，否则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项政策可能会变成犯罪分子们随时烧杀抢掠的通行证，直到他们决定投降为止。

为了让政府免受非法协商的质疑，加维里亚和希拉尔多达成协议，在审判期间，不直接接见任何由“可被引渡者”派来的使者，也不会同他们或是任何人协商任何法律事宜。也就是说，不讨论任何原则问题，只讨论操作问题。全国刑事诉讼法庭庭长（他既不供职于行政机关，也不由行政机关任命）将正式负责与“可被引渡者”或者其合法代表的一切联系。所有的交流都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以便存档。

他们在讨论法案时非常高效，还带着一种在哥伦比亚难得一见的缄默。一九九〇年九月五日，法令通过了，即2047号战时法令：自首与认罪者可以免于引渡；如果认罪后还同司法部门合作，将获得多达三分之一的减刑；如协助揭发，将获得六分之一的减刑。总之，如果一个人因其某项或所有罪行而被要求引渡，只要积极配合，就可以获得多达一半的减刑。对正义最简单、纯粹的诠释是：引渡意味着极刑。签署该法令的部长委员会否决了三起案件中的引渡决议，也通过了三起，这仿佛是一份公示，声明新政府只会将放弃引渡作为法令能给出的主要优惠。

事实上，与其说这是一部松散的法令，不如说这是一项用来从整体上打击恐怖主义的总统政策。它不仅仅针对毒贩，还针对一般刑事案件中的罪犯。玛萨·马尔克斯将军没有在安全委员会上表达他对法令的真实想法，但是几年后（在竞选共和国总统时），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这部法令，说它是“这个时代的谎言”。“这部法令践踏了司法的威严，”他写道，“葬送了刑法的历史性尊严。”

这条法令前路漫长又复杂。“可被引渡者”（即众所周知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商号”）虽然为了得到更多好处，将大门微微敞开，但立马对法令进行了抨击。主要理由是该法令并没有明确他们不会被引渡。他们还要求能被当作政治犯处理，并享有M-19游击队员那样的待遇。M-19已经被赦免了，而且成立了一个被认可的政党。一名成员还当上了卫生部长，所有成员都参与了国民制宪议会的选举。“可被引渡者”的另一个顾虑是，他们需要一座保证他们不受敌人伤害的监狱，还要保障他们的家人与随从的生命安全。

传言说，政府制定这部法令，是由于受到了绑架案的压力，而向毒贩的让步。实际上，该方案在迪安娜被绑架之前就已经有了进展。而几乎与法令出台同时，“可被引渡者”绑架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和玛丽娜·蒙托亚的做法，又一次拧紧了螺母。后来，因为八个人质也无法让他们达到自己的诉求，他们又绑架了玛露哈·帕琼和贝阿特利丝·比亚米萨尔。他们一共绑架了九名记者，这是个惊人的数字，此外还有一名逃脱了埃斯科瓦尔私人迫害的政客的妹妹。在某种程度上，在该法令证明其效力之前，加维里亚总统就逐渐变成了自己发明成果的受害者。

迪安娜·图尔巴伊·金特罗像她的父亲一样，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感受和激情，还富有领导才能，这两点决定了她的人生轨迹。她在著名政客的圈子里长大。从儿时起，政治就注定塑造她的世界观。“迪安娜是一位政治家，”一位理解她、喜爱她的朋友评论说，“服务国家的执着意愿是她人生的第一要义。”但是，权力就像爱情一样是一把双刃剑：有用也有害。它在带来一种飘飘然状态的同时，也会引发它的反面：对难以抗拒、转瞬即逝的快乐的追寻。这只能用对理想化爱情的追求来类比——无比渴求又心怀恐惧，苦苦追寻却无法企及。迪安娜想要

了解关于权力的一切，想要置身其中，想要发现事物的缘由、样貌以及她生命的真谛，她有着无法被满足的贪念，因而经受着权力的折磨。一些与她密切交往过的人和爱过她的人，都在她的心神不定中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她很少有快乐的时候。

只有询问她本人，才能得知这把双刃剑中的哪一面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影响。二十八岁时，她就成为父亲的私人秘书和左膀右臂，应该是在那时，她便真切地感受到了何为权力，并被困在了权力交错的狂风中。她的众多朋友讲述说，她是他们认识的最聪颖的人之一，掌握着令人难以想象的信息量，有着令人惊叹的分析能力以及识别他人意图的过人天赋。她的敌人们直截了当地评价她是王位背后引起骚乱的祸根。然而，其他人认为，她为了维护父亲的命运不顾一切、众叛亲离，因而忽略了自己的命运，成了朝臣和谄媚者的棋子。

她出生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八日，是冷酷无情的双鱼座。出生时，她的父亲已经是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之一。不管身处何地，他都是天生的领袖：波哥大安第诺学院、纽约圣心大学、圣托马斯·阿奎那大学，在波哥大也一样，他在那里读完了法律专业但没有等到文凭。

她从事新闻业较晚（幸好新闻界不会论资排辈），对她来说，是新闻业让她遇见了最好的自己。她创办了《今日×今日》杂志和新闻栏目《氪》，这是她为和平而努力的最直接的道路。“我已经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情与别人争吵了，”她当时说，“现在我更期待与人和解。”确实如此，她甚至坐下来同M-19的指挥官卡洛斯·皮萨罗进行和平谈话。卡洛斯曾在战时往图尔巴伊总统所在的屋子发射了一枚炮弹。讲述这件事的朋友大笑着说：“迪安娜明白，要像一名棋手，而不能像一名对世界拳打脚踢的拳击手。”

因此，对她的绑架除了她作为人的分量，自然还担负着很难驾驭的政治分量。前总统图尔巴伊曾公开也曾私下表示过，他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可被引渡者”的消息，因为他认为，保证他们的企图不为人知就是最谨慎的做法。但实际上，在弗朗西斯科·桑托斯被绑架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消息。埃尔南多·桑托斯刚从意大利回来就告诉了他，并邀请他来家中做客，共同制定行动方案。桑托斯在他家巨大书房的阴影处找到了他，前总统已经确信迪安娜和弗朗西斯科将被处决，感到万分压抑。就像在那个时期所有见过图尔巴伊的人一样，桑托斯印象最深的，是他承受苦难时的尊严。

寄给他们俩的信有三页，以印刷体写就，没有署名，引言让人惊讶不已：“请诸位接受来自‘可被引渡者’的问候。”信件的真实性不容置疑，其简明、直接、毫不含糊的风格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所特有的。信件开头承认了对两名记者的绑架。根据信中所述，这两名记者“健康状况良好，关押条件尚可，对于绑架来说，两人的关押条件皆属正常”。剩下的部分回忆了“可被引渡者”受警察镇压的羞耻经历。最后，他们提出了释放人质的三项不容拒绝的条件：终止麦德林和波哥大针对他们的军事行动；撤走“精英部队”（警方打击贩毒贸易的特殊团队）；罢免“精英部队”的长官以及另外二十名警官，“可被引渡者”认为他们是折磨并谋杀麦德林东北地区四百多名年轻人的罪魁祸首。如果这些条件不能被满足，“可被引渡者”将发动毁灭性的战争，在大城市进行炸弹袭击，并发起针对法官、政客和记者的暗杀。结语很简单：“如果引发政变，那正好。我们已经没有什么能失去的了。”

不容事先商议的书面答复须于三天后交至麦德林洲际酒店，那里会有一间以埃尔南多·桑托斯的名义预订好的房间。负责联系的中间人将由“可被引渡者”指定。桑托斯同意了图尔巴伊的决定，答应只要他

们没有获得可靠的消息，就不向任何人透露这条信息以及接下来的任何信息。“我们不能自说自话地把没有署名的信息传达给总统，”图尔巴伊总结说，“也不能有辱尊严。”

图尔巴伊向桑托斯提议，两人先各自回复，然后将两封信的内容合成一封。他们的最终成果是一封正式的声明，宣布他们没有任何权力干涉政府事务，但愿意公布一切由“可被引渡者”用确凿证据揭露的践踏法律和人权的政府行为。至于警察的行动，他们提醒说，要阻止他们实属不易；如果没有指控二十名警官的证据，他们不可能被免职，记者也不可能写社论抨击他们并不了解的情况。

阿尔多·布恩那凡图拉是一名公证员，从许多年前在斯帕基拉国立学院开始，他就疯狂地热爱斗牛。他是埃尔南多·桑托斯可以绝对信任的老朋友。他负责送回信。他刚走进在洲际酒店预订的308房间，就有人打来电话。

“您是桑托斯先生吗？”

“不，”阿尔多回答，“但我代他过来。”

“您把东西带来了吗？”

那声音听起来如此直白，以至于阿尔多怀疑会不会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在跟他通话。他回答说是。两名着装和仪态像是行政人员的年轻人来到了房间。阿尔多把信交给了他们。他们向他伸出手，并礼貌地点了点头，然后离开。

一周前，图尔巴伊和桑托斯接待了安蒂奥基亚律师基多·帕拉·蒙托亚，他带着“可被引渡者”的最新来信。帕拉并非波哥大政坛的陌生面

孔，但好像总是在暗处。他四十八岁，曾两次作为自由党人的候补出现在众议院，还有一次作为全国人民联盟（简称Anapo, M-19的前身）的正式成员出现在众议院。他曾在卡洛斯·耶拉斯·莱斯特莱波政府担任共和国总统法律办公室的顾问。他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在麦德林从事法律行业。一九九〇年五月十日，他因有与恐怖分子合作的嫌疑而被捕，两周后，又因缺乏证据被释放。尽管历经坎坷，他依然被看作一名专业的法律从业者和出色的谈判人员。

然而，似乎很难想象出比他更不适合做“可被引渡者”密使的人。他一点也不低调，是一个对加官晋爵非常在意的人。他穿着时髦的亮灰色行政套装和鲜艳的衬衫，戴着青春靓丽的领带，还在上面打了一个意大利式的硕大结扣。他的举止过分讲究礼数，用词华丽，装腔作势，与其说他对人亲切，不如说他在殷勤奉承。要他同时伺候两位先生，相当于逼他自寻短见。面对自由党前总统和全国最重要报刊的总编，他开始滔滔不绝。“尊贵的图尔巴伊先生、尊敬的桑托斯先生，我随时恭候您二位的差遣。”他说，接着他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我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律师。”

埃尔南多很快发现了问题。

“所以您捎来的这封信是他的？”

“不是，”基多·帕拉眼睛都不眨一下，改口说，“是‘可被引渡者’的，但是你们的回复应该是给埃斯科瓦尔的，因为他会在协商中施加影响。”

这样的区别很重要，因为埃斯科瓦尔不会在司法部门面前暴露踪迹。在可能牵涉到他的信件中，他会使用印刷体来掩饰，并以“可被引渡者”或是任意名字（马努埃尔、加夫列尔、安东尼奥）署名，正如这些商讨绑架案的信件一样。相反，在那些自称是指控者的信函中，他会使用他本人的有些稚嫩的字体，他不仅会签名，还会印上拇指指纹。在绑架记者时期，对他本人是否参与绑架案的质疑或许是合理的：也许“可被引渡者”只不过是他的假名，但也可能恰恰相反，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姓名和身份或许只是“可被引渡者”的挡箭牌。

基多·帕拉似乎总是有将“可被引渡者”信中的提议更进一步的准备。但是，得用放大镜阅读这些提议，才能发现真实的意图。实际上，他为他的客户寻求的是与游击队相似的政治解决方法。此外，他还当面提议借助联合国的介入将麻醉剂问题国际化。同时，面对桑托斯和图尔巴伊的断然拒绝，他提出了多个备选方案。就这样，一段漫长而了无成效的谈判开始了。最终，事情将变得错综复杂、没有出路。

从第二封信开始，桑托斯和图尔巴伊与共和国总统私下进行了联系。晚上八点半，加维里亚在私人图书馆的小厅里接见了他们。他比往常更冷静，希望获悉与人质有关的最新信息。图尔巴伊和桑托斯把两次信件往来和基多·帕拉的介入告诉了他。

“糟糕的使者，”总统说，“他非常聪明，是个好律师，但极其危险。不过，他有埃斯科瓦尔的全力支持。”

他读信时的认真态度让所有人印象深刻：他仿佛隐了身，完全忽略了周围事物。读完之后，他的评论机智而全面，相关推测没有一个多余的词。他告诉他们，任何情报机构都无法得知人质们被藏在了哪

里。就这样，总统确定了人质处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掌控之中，这是一个新的消息。

那天晚上，加维里亚证明了自己在做最终决定之前质疑一切的本领之精湛。他想过这些信可能是伪造的，基多·帕拉可能正在进行另一场游戏，甚至，所有这一切可能是某个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毫不相干的人的恶作剧。来访者们离开时，不像进门时那样神采奕奕了。看来，总统认为这是国家的重大事件，他们的个人情感只能占据很小的空间。

在制宪议会针对引渡问题（或者说是赦免问题）表态的同时，埃斯科瓦尔会随着自身问题的演化而不断改变条件，以便拖延绑架时间来获得额外和意外的好处，这是达成协议的主要困难之一。在埃斯科瓦尔与被绑架者家属进行的狡猾的通信中，这些内容从来没有被表述清楚。但是，在他与基多·帕拉保持的秘密通信中，为了把协商的策略变动与长期展望告知于他，埃斯科瓦尔把这些内容表述得一清二楚。“你把我们的所有烦心事都传达给了桑托斯，这样非常好，免得这事变得更加复杂。”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得有白纸黑字和法律条文，我们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因为任何罪行被引渡到任何国家。”他还要求政府明确投降后的招供条件。另外的两个要点是特殊监狱的警卫力量以及家人和随从的安全。

过去，埃尔南多·桑托斯和前总统图尔巴伊的友谊一直建立在政治基础上。而从那时起，两人的友谊开始变得私人而密切。他们能在绝对的沉默中面对面坐上数个小时。他们每天都通电话，交流内心的想法、秘密的猜测、最新的资讯，甚至建立了一个用来传达保密信息的完整加密体系。

这大概并不容易。埃尔南多·桑托斯是一个视责任大过一切的人，只消一句话，他就能解救或是毁灭一个生命。他很情绪化，容易精神紧张。他的群体意识在他做决定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儿子被绑架期间，和他相处过的人都担心他无法熬过这种折磨。他不吃东西，也睡不了一个整觉，总是把电话放在手边，铃声一响就扑上去。在那几个月里，他很痛苦，很少有社交时间。他认为儿子必死无疑，为了能承受儿子死亡带来的打击，他采取了一个精神治疗方案，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或者自己的房间里，沉溺于回顾他令人惊叹的邮票收藏以及空难中烧焦的信件。他的妻子艾莲娜·卡尔德隆是七个孩子的母亲，七年前与世长辞，留他孤单一人。他的心脏和视力状况恶化了。他想哭就哭，从不压抑。他在报纸与个人悲剧之间划清界限，这是他在如此戏剧化的情境中堪称典范的优点。

坚强的儿媳玛丽亚·维多利亚是他在那段痛苦的时光里主要的支柱之一。她记得，在绑架案发生后的几天里，丈夫的亲友挤得满屋都是，他们躺在地毯上喝威士忌和咖啡，一直聊到深夜。他们总是聊相同的话题，在此期间，对绑架案的震惊和对被绑架者的同情随之逐渐淡去。埃尔南多从意大利回来以后直接去了玛丽亚·维多利亚的家里，带着情绪问候她，这种情绪最终将她撕碎。但是，当他不得不处理关于绑架案的机密时，他请求她把这些机密留给男人们，不要介入。玛丽亚·维多利亚个性很强，有着成熟的想法。她意识到，在一个男权家庭里，她永远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物。她哭了一整天，但是之后就恢复了活力，因为她决定争取自己在家里的身份和地位。埃尔南多不仅理解她的理由，而且因为自己的疏忽而自责，他发现她是能够抚慰他痛苦的最好依靠。从那时起，不论是直接接触，还是通过电话、书信和中间人，甚至通过心灵感应，他们之间都维持着一种无法击垮的信任。就连在错综复杂的家庭会议中，他们只要互相对望一眼，就能明

白对方的想法，明白应该说什么样的话。她想出了几个好点子，其中之一是在报纸上刊登不加密的社论，这样可以跟帕丘分享家庭生活中的趣事。

最少被提起的受害者家属是莉莉安娜·洛哈斯·阿利亚斯——摄影师奥兰多·阿塞维多的妻子，和玛尔塔·露贝·洛哈斯——理查德·贝塞拉的母亲。虽然她们不是亲密的朋友，也不是亲属（尽管有相同的姓氏），但绑架案将她们变得密不可分。“并不是因为痛苦，”莉莉安娜说，“而是因为互相陪伴。”

莉莉安娜在给她一岁半的儿子埃里克·耶斯德喂奶时，通过新闻栏目《氪》得知，迪安娜·图尔巴伊的整组人员都被绑架了。当时她二十四岁，三年前结了婚，住在婆家房子的二楼，房子位于波哥大南部的圣·安德烈斯区。“她是一个快乐的小姑娘，”一位朋友评价说，“她不该卷进如此糟糕的事件。”除了快乐之外，她还很有想法。从最初的震惊中平复过来之后，每到新闻节目的播放时间，她就把孩子放在电视机面前，让他看看自己的爸爸。直到绑架案结束，她一直都这么做。

新闻栏目的成员告诉她和玛尔塔·露贝，他们将会继续帮助她们。莉莉安娜的孩子生病的时候，是他们负担了医疗费。妮迪娅·金特罗也给她们打电话，试图让她们获得自己从未得到过的平静。她承诺，她在政府部门的一切行动都不仅仅是为了她的女儿，而是为了所有的组员，她还会把与被绑架者有关的一切消息都转达给她们。她确实履行了承诺。

玛尔塔·露贝和她的两个女儿一起依靠理查德生活，当时女儿分别十四岁和十一岁。理查德在和迪安娜的小组一起离开的时候告诉玛尔塔，他三天后回来。第一周过去之后，她开始感到不安。她讲述道，

她不认为那是一种恶兆，但是她一直给新闻栏目打电话，直到他们告诉她，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发生了。不久之后，他们被绑架的消息被公之于众。从那时起，她整天都开着收音机，等着儿子回来。只要她的内心感应到了什么，她就会给栏目组打电话。她的儿子是被绑架的受害者中最无依无靠的，她对此很不安。“但是除了哭泣和祈祷之外，当时我什么都做不了。”她说。妮迪娅·金特罗说服她，为了解救被绑架者，她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并邀请她参加市民和宗教活动，不断激发她的斗志。莉莉安娜和奥兰多想的一样，她陷入了一个窘境：作为最没有价值的被绑架者，他可能是最后一个被处决的，也可能是第一个被处决的，因为处决他同样能够引发社会动乱，而且对于绑匪来说，后果更轻。这种想法让她陷入无法遏抑的痛哭之中，一直哭到绑架案结束。“每天晚上哄孩子上床之后，我就坐在露台上，一边看着大门等他回来，一边哭。”她说，“我这样坐了一晚又一晚，直到重新见到他。”

十月中旬，图尔巴伊博士通过电话，把一条用私人符号加密的信息传达给了埃尔南多·桑托斯。“如果你对斗牛感兴趣的话，我有几份不错的报纸可以给你。如果你想要的话，我给你送过去。”埃尔南多明白那是一则关于被绑架者的重要消息。事实上，那是一卷从蒙特利亚寄到图尔巴伊博士家的磁带。其中的内容证实，迪安娜和她的同伴们还活着。虽然她的家人一再索求，却从几周前就失去了他们活着的证据。她的声音绝不会错：“亲爱的爸爸，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给你传达消息，但是在我们苦苦请求之后，他们允许我们这么做了。我就说一句话，是给你们未来行动的线索：我们一直都在收看、收听新闻。”

图尔巴伊博士决定把信息传达给总统，并试图获取新的线索。加维里亚接待他们时，正好在给当天的工作收尾。他和平常一样在私人

图书馆里接待他们，他很放松，但是罕见地话多。他关上门，倒上威士忌，随意地说了几条政治机密。由于“可被引渡者”顽固不化，招降的进程似乎停滞不前，总统打算在法令原文中增加几条说明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整晚都在忙这件事，并相信当天晚上就能完成。他承诺说，第二天会给他们好消息。

第二天，他们如约回到那里，但是遇见了一个和前一天完全不同的人，他疑心很重，而且非常悲伤。从第一句话起，他们的对话就注定没有结果。“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加维里亚告诉他们，“我想帮助你们，也已经尽我所能去做了，但这个时刻，我无能为力。”很显然，某种关键的东西改变了他的情绪。图尔巴伊立即察觉到了。会面的时间还没到十分钟，他郑重、冷静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总统，”他毫无怨恨地说，“您在做分内之事，我们作为一家之主也是如此，我理解您。您是国家元首，我恳请您不要做任何会给您带来麻烦的事情。”最后，他指着总统椅说：

“如果我坐在那个位置，我也会这样做的。”

加维里亚站了起来，脸色惨白。他把他们送到电梯口。一名助手和他们一起下楼，在私人宅邸的底楼为他们打开车门。在他们驶进十月第一个悲伤的雨夜前，没人说话。街上车水马龙，喧嚣声穿过装甲玻璃，传到他们耳边时已经模糊不清。

“在这方面，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在漫长的思索之后，图尔巴伊叹了口气。“昨晚和今天发生了某些事，但他不能告诉我们。”

这场戏剧化的面谈促使妮迪娅·金特罗女士来到了台前。她是前总统图尔巴伊·阿雅拉的前妻，他又是她的舅舅。他们育有四个孩子，其

中迪安娜是老大。绑架案发生的七年前，她与前总统的婚姻被教廷废除。之后，她与自由党国会议员古斯塔沃·巴尔卡萨尔·蒙松再婚。由于当过第一夫人，她清楚前总统身份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他们如何被现任总统对待方面。“唯一应该做的，”妮迪娅曾经说过，“是让加维里亚总统认清他的义务和责任。”因此，虽然她并不抱有太多幻想，但她本人在这方面做了尝试。

在绑架案得到官方承认之前，她组织的公共活动就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规模。她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占领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活动，由孩子们朗读请愿书，恳求绑匪释放人质。十月十九日是全国和解日，那天，她成功让各大城市在正午十二点举行弥撒，祈求哥伦比亚人民和睦共处。在波哥大，这项活动在玻利瓦尔广场举行。与此同时，数个街区的居民组成的队伍拿着白手绢举行和平游行，他们点燃火炬，这把火炬直到人质们平安回来才会熄灭。因为她的行动，电视新闻在节目的开头播送所有被绑架者的照片，计算他们被关押的日子，而且随着他们被释放，不断撤掉相应的相片。同样也是因为她的倡议，全国各地的足球赛在开场之前都会呼吁释放人质。一九九〇年全国年度选美冠军玛莉贝尔·古铁雷斯在她的获奖感言中，也以呼吁释放人质作为开场白。

妮迪娅出席其他被绑架者的家庭会议，听取律师的建议，通过哥伦比亚团结基金会进行秘密行动——至今，她领导这个组织二十年了，但她总觉得自己毫无建树。对于她这样个性坚定热情、敏感犀利的人来说，这样的结果难以接受。她将希望寄托在他人的行动上，直到发现他们身处一条死胡同之中。无论是图尔巴伊，还是埃尔南多·桑托斯，或是任何一名位高权重的人士，都无法给总统施压，让他与绑匪们协商。当图尔巴伊博士向她讲述上次拜访总统的失败经历时，她

完全确定了这一点。因此，她决定自己行动，为了直接寻求女儿的自由，她开辟了通向自由的第二条战线。

那几天，哥伦比亚团结基金会位于麦德林的办事处接到了一通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说他有关于迪安娜的一手消息。他说，在麦德林附近的一个农庄，他的一位老朋友在他的蔬菜篮子里放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迪安娜在那里。他还说，看守们看球时，会喝得大醉，满地打滚，如果这时开展救援行动，他们不可能做出任何反应。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安全，他还提供了农庄的草图。消息十分可信，妮迪娅甚至专程前往麦德林回复他。“我向线人请求，”她讲述说，“不要跟任何人谈起这条信息，并让他明白，如果有人试图营救，我女儿，甚至她的看守们都会遭遇危险。”

迪安娜在麦德林的消息让妮迪娅产生了前往拜访玛尔塔·妮耶维丝和安海莉塔·奥乔阿的想法，她们是豪尔赫·路易斯、法比奥和胡安·大卫·奥乔阿的姐妹。这三兄弟因为贩毒和非法致富被指控，还作为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私人朋友而闻名。多年之后，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妮迪娅说道：“我带着强烈的愿望前去，希望她们帮助我与埃斯科瓦尔取得联系。”奥乔阿姐妹告诉她，她们的家人饱受警方的欺凌。她们认真听她倾诉，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但是也告诉她，埃斯科瓦尔一事，她们无能为力。

玛尔塔·妮耶维丝明白绑架意味着什么。一九八一年，她本人被M-19绑架，绑架者向她的家人索要巨额赎金。作为回应，埃斯科瓦尔创建了一个暴力组织——“杀死绑架者”（MAS）。三个月之后，在一场对抗M-19的血腥战争之中，她获得了自由。她的姐妹安海莉塔也自认为是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她们俩耗尽心力制作了一份清单，列出了警察的暴力行为、私闯民宅的行径和无数违反人权的罪行。

妮迪娅没有失去继续斗争的动力。最后，她希望她们至少能把她的信带给埃斯科瓦尔。她已经通过基多·帕拉送出了一封信，但是没有回音。奥乔阿姐妹一开始拒绝送信，因为埃斯科瓦尔之后可能会因为这封信带来的某种伤害而怪罪她们。然而，在谈话结束时，她们被妮迪娅的激情感染了。妮迪娅回到波哥大，确定她给两扇门各开了一条缝：一扇通往她女儿的自由，另一扇通往奥乔阿三兄弟的和平投降。因此，她觉得应该亲自把自己的行动告诉总统。

总统马上接见了她。妮迪娅开门见山地谈起奥乔阿姐妹对警察行为的不满。总统让她把话说完，只是偶尔提出几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他的意图很明显，他不想让指控像妮迪娅所说的那样严重。至于她个人的诉求，妮迪娅有三个需要：救出被绑架者；总统控制好局面，避免发生营救惨剧；延长“可被引渡者”投降的期限。总统给她唯一的保证是：不论是对迪安娜还是对其他被绑架者，如果没有家人的授权，不会实施任何营救行动。

“这是我们的政策。”他告诉她。

尽管如此，妮迪娅还是怀疑总统是否已经采取了充分的保障措施，防止有人试图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实施营救。

一个月前，在一位共同的朋友家里，妮迪娅和奥乔阿姐妹又进行了一次谈话。她还拜访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妻子的姐妹，后者详细地向妮迪娅讲述了警方的欺凌事件，她和她的兄弟姐妹都深受其害。妮迪娅给她带去了一封写给埃斯科瓦尔的信，足有两页半长，几乎没有留白。她使用了花体字，在打了几次草稿之后，形成了用词准确而感情丰富的风格。她意图直抵埃斯科瓦尔的内心深处。开头写道，这封信不是写给那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战士，而是写给巴勃罗这个

人，“那个敏感的人，他爱自己的母亲，愿意为她献出自己的生命；写给那个拥有妻子，拥有幼小无辜而脆弱的孩子，并想保护他们的男人。”她发现，埃斯科瓦尔在利用绑架记者来引起舆论的关注，作为他事业的助力，但她认为，他得到的东西已经足够了。因此，她在信中总结道：“请您表现出人性本来的模样，并以世人了解的伟大与慈爱的姿态，把被绑架者还给我们。”

读信的时候，埃斯科瓦尔妻子的姐妹似乎真的被感动了。“我敢肯定，这封信会让他非常感动，”她停了一会儿，仿佛是在自言自语，“您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会感动他的，这将对您的女儿非常有利。”最后，她把信折了起来，放进信封里，亲自把信封封上。

“您放心走吧。”她告诉妮迪娅，真诚得丝毫不让人怀疑，“巴勃罗今天就会收到这封信。”

那天晚上，妮迪娅回到波哥大，怀着希望等待那封信的结果。她决定求总统做一件图尔巴伊博士不敢提的事：在协商释放人质的同时，暂时中止警方的行动。她这么提了，加维里亚毫不拐弯抹角地说，他不能下达这个命令。“我们会提供司法政策作为备选。”他接着说，“但是，中止警方行动对释放被绑架者没有好处，只会让我们不再追捕埃斯科瓦尔。”

妮迪娅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男人，他毫不在意她女儿的生命。当总统向她说明警力无法协商时，她不得不遏制自己愤怒的情绪。他说警方的行动不需要获得许可，他也不能要求他们停止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行动。那次拜访非常糟糕。

既然与共和国总统周旋后无功而返，图尔巴伊和桑托斯决定另辟蹊径，他们想不到除“高贵者”之外更好的选择。这个组织由前总统阿丰索·洛佩斯·米切尔森，前总统米萨尔·帕斯德拉那，议员迭戈·蒙塔那·古埃亚尔与红衣主教、波哥大大主教马里奥·莱沃约·布拉沃组成。十月，被绑架者的家属同他们在埃尔南多·桑托斯家里会面。他们先讲述了与加维里亚总统会面的情况。事实上，通过司法解释修改法令，从而给投降政策开辟新路径的可能性是那几次会面中唯一让洛佩斯·米切尔森感兴趣的内容。“得动点脑子。”他说。帕斯德拉那表示支持寻求新方法，以迫使毒贩投降。但是用什么武器呢？埃尔南多·桑托斯提醒蒙塔那·古埃亚尔，可以动员游击队的力量。

在一场漫长而顺畅的交流之后，洛佩斯·米切尔森得出了第一个结论。他说：“我们要跟‘可被引渡者’玩游戏。”于是，他提议写一封公开信，宣布“高贵者”已经掌握了被绑架者家属的话语权。大家一致同意让洛佩斯·米切尔森写这封信。

两天后，第一稿起草完毕，并在一场会议中被公布，基多·帕拉和埃斯科瓦尔的另一名律师出席了这次会议。那份文件第一次提出了贩毒可以被视为集体犯罪的观点，具有特殊性；还指出了一条通往协商的前所未有的道路。基多·帕拉跳了起来。

“一种特殊的犯罪，”他惊讶地大喊，“这真是太棒了！”

之后，他以自己的方式扩展了这一概念，他认为那是一种完美的特权，处于普通犯罪和政治犯罪之间的模糊边缘地带。这使得“可被引渡者”可能与游击队同样，取得政治地位。第一次阅读时，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埃斯科瓦尔的那名律师要求“高贵者”拿到一

封加维里亚的信，以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方式保证埃斯科瓦尔的生命安全。

“我很遗憾地告知诸位，”埃尔南多·桑托斯对这个要求非常恼火，他说，“我不会插手这件事。”

“我更加不会。”图尔巴伊说。

洛佩斯·米切尔森强烈拒绝。于是，律师要求他们安排一次与总统的会见，让总统亲口向埃斯科瓦尔保证。

“这事儿没法在这儿谈。”洛佩斯说。

在“高贵者”聚集起来起草声明之前，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就已经获悉他们最隐蔽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他在一封急信中给基多·帕拉做出了极端的指示。“我给你自主权，你想办法让‘高贵者’邀请你去交流想法。”他写道。接着他罗列了一系列“可被引渡者”做出的决定，以赶在其他不同的提议之前确定他们的立场。

“高贵者”的信二十四个小时内就完成了，其中包含了关于之前行动的重要的新内容：“我们的调解行动有了新的意义，我们的努力不仅是为了一次偶然的营救活动，也是为了让所有哥伦比亚人得到真正的安宁。”这是一个全新的说法，让人充满希望。加维里亚总统觉得这很不错，但是他认为应该与“高贵者”划清界限，避免人们将其与官方立场混淆。他还指示司法部长发布通告，申明投降政策是让恐怖分子自首的唯一政策。

埃斯科瓦尔对这封信则是一行字都不喜欢。十月十一日，他刚读完登报的信函，就愤怒地把回复发给了基多·帕拉，之后哥伦比亚所有

的沙龙里都回响着他的答复。"'高贵者'的信简直无耻，"他说，"他们让我们尽快释放人质，因为政府为了研究我们的事耽误了时间。难道他们觉得我们又会上当吗？"他说，"可被引渡者"的立场和第一封信里写的一样，"既然我们在第一封信中提出的要求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我们就没有更改立场的理由。这是一次谈判，不是一场判断谁更聪明谁更愚蠢的游戏。"

事实上，当时埃斯科瓦尔已经领先"高贵者"好几光年了。他想让政府给他分配一块独立、安全的土地——一块监狱营地，正如他所说的，就像M-19完成投降手续之后得到的那样。一周多以前，他交给基多·帕拉一封信，详细地说明了他想要的特殊监狱的情况。他说，最完美的地点是距离麦德林十二公里的一座农庄，这座农庄是他的财产，但登记在另一个人名下。恩比加多市政府可以租下该农庄，将其改造为监狱。"由于这需要很多开销，'可被引渡者'将根据费用支付补贴。"他接着说。最后，他用一大段令人惊愕的话作结："我之所以把这些都告诉你，是因为我希望你跟恩比加多市市长谈一谈，告诉他你是代表我去的，然后把我的想法解释给他听。同时，我希望你说服他给司法部长写一封公开信，告诉司法部长，他认为'可被引渡者'没有寻求2047号法令的庇护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恩比加多市能够建设一座特殊监狱，保障投降者的生命安全，以此为哥伦比亚人民的和平做出贡献。你去跟他们面谈，并明确提出让他们和加维里亚交涉，向他提议营地的事。"这封信的明显目的是强迫司法部长公开做出答复。"我知道，这会是一枚炸弹。"埃斯科瓦尔在信中写道，并以极其平和的语气结尾："有了这些，我们就能逐步把我们的人带到我们想去的地方。"

然而，部长拒绝了信中提出的要求，埃斯科瓦尔不得不在下一封信里放缓语气。在这封信中，他第一次提供了比他所要求的更多的东西。为了换取监狱营地，他承诺解决不同贩毒集团、团伙和帮派之间的冲突，保证让一百名弃暗投明的毒贩投降，最终开辟一条和平之路。“我们没有请求赦免，没有请求对话，也没有请求任何他们说给不了的东西。”他说。这单纯是一个关于投降的提议。“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在请求对话，请求政治地位。”他甚至蔑视了对他而言最有价值的东西：“我对引渡没有意见。我知道如果被活捉，他们会杀了我，就像他们对所有人做过的那样。”

他的策略是，家属如果想要与被绑架者保持通信往来，就得拿极大的好处来换。“你告诉桑托斯先生，”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如果他想要弗朗西斯科还活着的证据，首先得发布《美国观察》的报告，再发一篇对其主编胡安·蒙德斯的采访，还有一篇关于麦德林屠杀、酷刑和失踪案的报道。”但是当时埃尔南多·桑托斯已经学会了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他意识到，虽然他因循环往复的提案和反提案损耗极大，但对他的对手们也是如此。比如，基多·帕拉在十月底就经受着一种难以抵御的紧张状态的折磨。桑托斯回复埃斯科瓦尔，只要他没有得到儿子还活着的确凿证据，就不会发表一个字，也不会再次接待他的使者。阿丰索·洛佩斯·米切尔森以退出“高贵者”作为要挟，支持他的做法。

这种措施很有效。两周后，基多·帕拉在一家旅馆跟埃尔南多·桑托斯通话。“我和我的妻子坐车过来，十一点到您家，”基多·帕拉说，“我给您带了最美味的甜品。您不知道我享用了什么，您也想象不到您将会享用到怎样的东西。”埃尔南多立马觉得他们会把弗朗西斯科带过来。但是他们带来的只有他录在迷你磁带里的声音。为了听这卷

磁带，他们花费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因为没有合适的录音机，直到有人发现电话机的自动应答器也可以播放磁带。

帕丘·桑托斯可以出色地从事多种职业，除了语音教师。他想以他思考的速度说话，但他的各种零碎的想法总是接踵而至，说得没有想得快。那晚，让人惊讶的是，一切与平时完全相反。他说得很慢，声音平稳，结构完美。实际上，帕拉带来了两条口信——一条给他的家人，另一条给总统，都是他在一周前录制的。

绑架者们自作聪明地让帕丘念了几则报纸头条作为录制日期的依据，埃斯科瓦尔必定不会原谅这个错误。这给了《时代报》法律编辑路易斯·伽农利用重磅新闻亮相的机会。

“他在波哥大。”他说。

事实上，帕丘朗读的一则新闻头条只在当地报纸中出现，发行范围仅限于波哥大北部。这条信息珍贵如金，如果埃尔南多·桑托斯没有反对武装营救，这条信息会有决定性的作用。

对他来说，这是个重获新生的瞬间，主要是因为磁带中的内容让他确定，被绑架的儿子赞同他处理绑架案的方式。此外，家人们一直认为帕丘是兄弟姐妹中最脆弱的一个，因为他脾气暴躁，情绪很不稳定。没有人会想到，在七十天的囚禁之后，他仍神志清醒，有着很强的自控力。

埃尔南多把全体家庭成员都召集到家里，让他们听录音，一直听到黎明。只有基多沉浸在痛苦之中。他哭了。埃尔南多朝他走了过去，安慰他。在汗湿的上衣里，他嗅出了恐惧的味道。

“别忘了，警察不会杀我。”基多·帕拉眼泪汪汪地告诉他，“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会杀了我，因为我知道的太多了。”

玛丽亚·维多利亚无动于衷。她觉得帕拉在玩弄埃尔南多的感情，在利用他的弱点，一边给他点好处，一边从他身上榨取更多的东西。基多·帕拉应该在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刻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告诉埃尔南多：“那个女人是块铁板。”

事态进展到这一步时，十一月七日，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绑架了。“高贵者”失去了立足之处。十一月二十二日，迭戈·蒙塔那·古埃亚尔向他的同伴们提议解散组织，此前他曾公布过这一计划。他的同伴们庄重地依次将关于“可被引渡者”最终条件的结论提交给总统。

如果加维里亚总统指望投降法令能迅速使毒贩们大规模投降，那么他必然要失望了。因为情况并非如此。新闻界、政界和知名法律界人士的反应，甚至是“可被引渡者”的律师们的合法提议都表明，应该修改2047号法令。首先，这部法令让任意一名法官都能以自己的方式操纵引渡。该法令的另一个缺点是，贩毒的决定性证据都在国外，与美国合作的每个阶段都变得非常关键，但是获取证据的期限非常紧迫。解决方法（在法案中没有体现）是延长期限，并将沟通的责任转移到共和国总统府，由总统负责把证据带回国。

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也没有在法令中找到他所期待的决定性支持。他与桑托斯和图尔巴伊的交流以及他和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律师的最初几次会晤，让他对形势有了整体的看法。投降法令是正确的，但有缺陷，他只有很小的行动空间去解救他被绑架的亲人。这是他对投降法令的第一印象。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没有得到她们的任何消息，也没有获得丝毫她们活着的证据。他唯一与她们联系的

机会是一封通过基多·帕拉送出的信，在信里他展现出乐观的态度，并保证不会再做任何与解救她们无关的事情。“我知道，您的情况非常糟糕，但请您放心。”他对玛露哈写道。

事实上，比亚米萨尔正处在阴霾之中。他已经山穷水尽，整个漫长的十一月里，他唯一的盼头就是拉法埃尔·帕尔多的承诺，他说总统正在构思一部可以补充、解释2047号法令的文件。“已经准备好了。”帕尔多告诉他。拉法埃尔·帕尔多几乎每天下午都会路过他家，随时把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但是自己也不是很确定如何继续。比亚米萨尔与桑托斯和图尔巴伊进行过低效的对话，他的结论是，谈判已经陷入僵局。他不信任基多·帕拉。他了解一些基多在国会奔走钻营的往事，认为他是一个不正派的投机者。然而，不论好坏，那是唯一一封信，他决定彻底地赌一把。时间紧迫，他别无选择。

应他的请求，前总统图尔巴伊和埃尔南多·桑托斯约见了基多·帕拉，条件是埃斯科瓦尔的另一位律师圣地亚哥·乌里维博士也得出席。圣地亚哥·乌里维博士严肃认真，有着良好的声誉。基多·帕拉以他惯用的天花乱坠的词汇开启了对话，但比亚米萨尔从第一句话开始就用桑坦德式的斗牛技巧让他双脚着地。

“您别跟我瞎扯，”比亚米萨尔告诉他，“我们直奔主题吧。您到处尽要求些没用的，所以您把什么都弄僵了。现在只有一件事：很简单，这些家伙得投降认罪，坐十二年的牢。这是法律规定的。完了。作为交换，他们能获得减刑，保障生命安全。别的全是瞎扯淡。”

基多·帕拉毫不犹豫地顺势说话。

“您看，我的医生，”他说，“事情是这样的，政府说不会引渡他们，所有人都这么说。但是法令哪有明确指出这一点？”

比亚米萨尔表示赞同。如果政府表示不会实施引渡，那就要在法律的层面这么表示。说服政府修改法律中的模棱两可之处是任务所在。其他（对“特殊”罪行的狡猾解读，或是拒绝认罪，或是对不道德行为的揭发）只不过是基多·帕拉迷惑人的辞令。显然，对于“可被引渡者”来说，就像他们自己名字说明的那样，当时，唯一真实而紧迫的诉求就是不被引渡。因此比亚米萨尔认为，在法令中明确这一点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在此之前，他要求基多·帕拉坦诚、坚决地表态，而坦诚和坚决正是“可被引渡者”要求比亚米萨尔一方持有的态度。首先，他想知道帕拉被授予了多少权力进行谈判；其次，在法令修改完之后，需要多长时间才会释放人质。基多·帕拉很认真。

“二十四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出来了。”他说。

“一定是所有人。”比亚米萨尔说。

“所有人。”

五

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绑架一个月后，荒谬的关押制度已经出现了裂痕。她们起身时不再请求许可，可以自己倒咖啡、更换电视频道。在房间内说话还是得轻声细语，但是动作已经变得比较随意。玛露哈尽量当心，免得外面的人能听见她的咳嗽声，但她已经不需要蒙进枕头里咳嗽了。午饭和晚饭依然与原来一样，有同样的菜豆、同样的兵豆、同样干瘦的肉，还有一份普通的速食汤。

看守们经常互相讨论，除了窃窃私语之外，对她们也没有其他的防备。他们互相交流血腥的新闻，谈论他们在麦德林的夜晚因为猎杀警察赢了多少钱，讲述他们充满男子气概的英雄壮举和风流故事。玛露哈已经说服他们，如果发生武装营救，更实际的做法是保护她们，这样至少能够保证体面的待遇和宽容的审判。起初，他们看起来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是无可救药的宿命论者，但感化策略使得他们在睡觉的时候没有继续把武器对准囚徒们，而是用毛巾卷起来，藏到电视机后面。相互的依赖和相同的遭遇最终为囚犯和看守之间的关系增添了几丝人性的光辉。

玛露哈由于她的性格因素无法隐忍任何让她痛苦的东西。她向脾气暴躁的看守们发泄不满。她带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决心面对他们：“杀了我吧。”她偶尔向玛丽娜发泄，玛丽娜和看守们在一起时的心满意足让她愤怒，她的末日幻想让她失去理智。有时，玛丽娜会抬起头，无缘无故做出让人气馁的评论或是邪恶的预言。

“在这个院子后面有一间作坊，停着杀手们的汽车。”她有一次说，“所有的杀手都在那里，早晚都拿着猎枪，准备来杀我们。”

然而，最严重的一次争吵发生在一个下午，玛丽娜习惯性地发表对记者的侮辱性言论，因为一档关于被绑架者的电视节目没有提到她。

“所有记者都是婊子养的。”她说。

玛露哈走到她面前。

“这可不对，”她愤怒地驳斥玛丽娜，“请您放尊重点。”

玛丽娜没有反驳。后来，她冷静了一会儿，向玛露哈道歉。事实上，玛丽娜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她六十四岁，曾经是一个出众的美人，有一双又大又黑的漂亮眼睛和一头银发，尽管头发有些杂乱，但依然保持着光泽。她瘦得只剩皮包骨。贝阿特利丝和玛露哈到来的时候，她几乎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与看守之外的人交谈过了，她需要时间和精力来接受她们。恐惧对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她瘦了二十公斤，精神低落至尘埃里，成了一个幽灵。

她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嫁给了一名脊骨神经医学家，他在体育界也有着良好的声誉，身材魁梧，有着一副好心肠。他全心全意地爱她，他们生了四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她掌控着自家和其他几家亲戚的一切，因为她认为自己有义务承担一个人数众多的安蒂奥基亚家族的一切事务。她就像所有人的第二个母亲，因为她的权威，也因为她的操劳。除此之外，她还关心任何一个叩开她心门的外人。

她卖汽车，也卖保险，并非是出于需要，而是由于她桀骜不驯的独立意识。而且，她似乎有能力卖出一切她想卖出去的东西，只是因为她想挣钱自己花。然而，熟悉她的人会感到痛心，一个天生具有诸多美德的女人却置身于悲惨的命运之中。她的丈夫接受了将近二十年的精神治疗，生活无法自理，两个兄弟在一场可怕的交通事故中丧命，一个兄弟因为心梗而猝死，另一个兄弟在一场混乱的交通事故中被红绿灯的灯杆压死，还有一个喜欢四处旅行的兄弟永远地失踪了。

她被绑架的处境是无解的。她也同意那种已经被普遍认可的想法，他们绑架她只是为了得到一名有分量的人质，他们可以杀了她，又不至于因此让投降谈判落空。但是，她被囚禁了六十天的事实让她觉得，刽子手们发现，用她的生命换取某种好处几乎不太可能。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尽管处在最糟糕的日子里，她依然花上数个小时认真仔细地打理手指甲和脚指甲。她把指甲挫平、磨光，用自然色的指甲油把指甲刷得闪闪发亮，这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加年轻。她还很细心地修剪眉毛和腿毛。克服了最初的困难之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就开始帮助她。她们学会了如何与她相处。贝阿特利丝和她不停地聊天，谈论喜爱和憎恶的人，没完没了的低语声甚至把看守们给激怒了。而玛露哈试着安慰她。她们俩都觉得非常难过，因为她们是除了看守之外，唯一知道玛丽娜还活着的人，但她们不能告诉任何人。

蒙面首领的意外回归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宽慰之一，他在第一天就曾经拜访过她们。他回来的时候很开心，带来了她们十二月九号之前会被释放的消息，那是制宪议会选举的日子。这条新闻对玛露哈来说意义非常特殊，因为那一天是她的生日。和她的家人一起过生日的想法提前使她喜悦万分。然而，那是个转瞬即逝的美梦：一周后，那位

首领告诉她们，她们不会于十二月九日被释放，而且绑架时间还会变得更长：圣诞节和新年时都不可能被释放。这对她们俩都是沉重的打击。玛露哈饱受初期静脉炎的困扰，炎症引发了剧烈的腿痛。贝阿特利丝觉得呼吸困难，胃部溃疡还出血。一天晚上，她被疼痛折磨得失去了理智，她恳求“大灯”，让他破例准许她在那时候上厕所。他考虑很久之后同意了，同时警告她，自己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是没有用。贝阿特利丝继续发出伤犬一般的哭声，她觉得自己快死了。最后连“大灯”都可怜她，到“管家”那儿给她拿了一剂丁溴东莨菪碱。

尽管她们一直以来都在努力，但是仍没能获得任何关于她们所在位置的可信依据。看守们害怕邻居们听见他们的声音，她们由此以及从外面传来的声音猜测，那里是一个居民区。那只不分昼夜随时打鸣的发疯的公鸡可能印证了这一点，因为被关在高楼上的公鸡通常不再能感知时间。她们经常听见在很近的地方，有不同的声音叫唤着同一个名字：“拉法埃尔。”短途飞机飞得很低，直升机依然离得非常近，以至于她们觉得它就在房子上方。玛丽娜坚信着一个永远无法证实的猜测，她觉得那是巡视绑架案进程的高级军官。对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而言，这是她的另一个幻想。但是，每次直升机来到的时候，关押生活的军事化规定就会重新变得严格起来：像军营一样有序的房子，里面上了插销、外面上了锁的门，低声讲话，随时待命的武器以及没那么糟的食物。

十二月初，看守人员由一开始就和她们在一起的四个人换成了另外四人。他们之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怪人，看起来就像是从恐怖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他们管他叫“猩猩”，他也确实像猩猩：身材巨大，像角斗士一般强壮，肤色很深，毛发浓密卷曲。他的声音太过洪亮，无法低声说话，而且也没有人敢要求他那么做。很明显，所有人

见到他都觉得低他一等。其他看守都穿短裤，但他穿着健美裤。他戴着遮住脸孔的防寒帽，穿着完美显示身材的紧身衣，脖子上戴着一块圣子像章，手臂非常漂亮，手腕上戴着能带来好运的巴西手环。他的手很大，命运线在苍白的手掌上尤为明显，像是被火烙上去的。房间几乎装不下他。他每次挪动身体都会让周围一片狼藉。人质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对付之前的看守，对于她们来说，这是一次糟糕的换岗。特别是对贝阿特利丝来说，因为她一开始就让他看不顺眼。

在那些日子里，看守和人质们都感到百无聊赖。作为圣诞节欢庆氛围的前奏，房子的主人和教区神甫举行了九日祭。那位神甫是他们的朋友，他或许是无辜的，或许是同谋。他们做祷告，合唱圣诞歌，给孩子们分发糖果，用苹果酒碰杯。苹果酒是家里的正式饮品。最后，他们洒圣水给房子驱邪。他们需要大量的圣水，甚至动用了油桶来搬运。神甫走了以后，女主人走进屋里，在电视机、床垫和墙上洒圣水。三名人质非常惊讶，不知所措。“这是圣水，”女人一边洒水一边说，“它能让我们平安。”看守们划着十字，双膝跪地，用天使般的热忱接受圣水的洗礼。

这种对祷告和节庆的兴致是安蒂奥基亚人特有的，整个十二月都没有减退。玛露哈已经做了准备，以免看守们得知九号是她的生日：她已是一个五十三岁的灵魂。贝阿特利丝保证过，她会保守秘密，但是看守们通过一档玛露哈的孩子们在她生日前夕献给她的特别电视节目得知了这个消息。

看守们觉得他们以某种方式参与了那档节目，他们毫不掩饰激动之情。“玛露哈女士，”一位看守说，“比亚米萨尔医生年纪很大吧？身体好吗？他爱您吗？”他们期待玛露哈会向他们介绍她的某个女儿，想要跟她们约会。无论如何，在监牢里看那档节目就像是死去之后从另

一个世界观看无法参与其中的生活，活着的人对此却一无所知。第二天上午十一点，“管家”和他的妻子毫无预兆地走进房间，带着一瓶克里奥约香槟酒，给每个人拿了一个杯子，还端着一个仿佛涂满了牙膏的蛋糕。他们祝福玛露哈时，情感非常强烈。她们和看守们一起合唱“生日快乐”[1]。所有人都吃了蛋糕，喝了酒，而玛露哈陷入了复杂的情感斗争之中。

十一月二十六日，胡安·维塔醒来时得知，由于他糟糕的身体状况，他即将被释放。恐惧让他动弹不得。就在那几天，他觉得自己前所未有地健康。他觉得，那则通知是向舆论交出第一具尸体的幌子。因此，在看守通知他为自由做好准备之后的两个小时中，他遭受了恐惧的折磨。“我本来更愿意自己了结，”他说，“但如果这是我的命运，我只能接受它。”他们命令他刮胡子，穿上干净的衣服。他这么做时，确信他是在为自己的葬礼穿衣打扮。他们给他指示，告诉他获得自由之后的做法，特别是迷惑记者提问的方法，这样警方就无法推测出用以辅助营救行动的蛛丝马迹。正午后不久，他们坐上车，在麦德林错综复杂的街区兜了几个圈子，然后在一个街角突然把他放下了。

释放胡安·维塔之后，他们又把埃罗·布斯单独换到了一个不错的街区，对面是一所为富豪小姐们设立的有氧体操学校。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热爱聚会、挥金如土的穆拉托人。他的妻子大概三十五岁，怀有七个月的身孕，她从早餐开始就佩戴着极其惹眼的昂贵珠宝。他们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和他的祖母在另一所房子里生活，他堆满了各种机械玩具的卧室被埃罗·布斯占了。鉴于自己是被安置在家庭中，埃罗·布斯做好了被长期关押的准备。

房子的主人大概像玛琳·黛德丽[2]电影里的人们一样，和这个德国人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埃罗·布斯两米高，一米宽，是个五十岁的青少年。他的幽默感可以经受住债主考验，他的西班牙语像是在妻子卡门·圣地亚哥的加勒比风格中煎了一小会儿。作为德国报刊和广播电台在拉丁美洲的通信员，他曾经冒过巨大的风险，甚至在军事体制下的智利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担忧着自己黎明时就会被枪决。因此，他已经习惯了身处各种困境，甚至在被绑架时还可以享受当地的风俗。

在这所房子里，风险并没有减小，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使者带着装满钞票的口袋前来，然而他们总是过得很拮据。因为房子的主人们很快就把所有钱都花在聚会和零食上，有时候，他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每逢周末，他们都为兄弟、堂表亲和亲密的朋友们准备聚会和丰盛的食物。孩子们满房子乱跑。第一天，他们认出了这个经常在电视里看见的德国巨人，非常激动，像对待电视剧演员一样对待他。不少于三十个与绑架案无关的人向不戴面具的他索要照片和签名，和他吃饭，甚至和他跳舞。在那座疯子们的房子里，他一直住到囚禁生活结束。

高筑的债台最终逼疯了主人们。为了养活被绑架者，他们不得不典当电视机、贝塔录像机、唱片机以及随便什么东西。女人脖子、手臂和耳朵上的珠宝逐渐消失，直到一件不剩。一天清晨，男人把埃罗·布斯叫醒，向他借钱，他妻子将要分娩，已经开始阵痛，他却发现他没有一分钱可以付给医院。埃罗·布斯把他最后的五万比索借给了他。

十二月十一日，在胡安·维塔被释放十五天之后，埃罗·布斯也被释放了。为此，房子的主人给他买了一双穿不了的鞋子，他的鞋码是四十六号，他们找了很久，找到的最大鞋码只有四十四号。他们给他买

了一条裤子和一件上衣，买的尺码比他原来穿的小了两号，因为他瘦了十六公斤。他们把摄影设备和手提包还给了他，手提包的里衬中还藏着几本笔记。他们把分娩时花的五万比索和他之前借给他们的一万五千比索还给了他，这一万五千比索是用来还他们从市场里偷来的钱的。他们还给了他很多东西，但他唯一的要求是，请他们给他争取一次对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采访。他没有得到答复。

那几位在最后几天里陪伴他的毒贩把他从家里拖了出来，塞进一辆私家车里。为了防止被跟踪，他们在麦德林最上等的街区里兜了许多圈子，然后把背着行李的他留在了距离《哥伦比亚人》日报半个街区之外的地方。他还带着一封声明，在声明中，“可被引渡者”认可了他为捍卫哥伦比亚和拉美各国的人权所做的斗争，并重申，只要他们及家人的安全有司法保障，他们会寻求投降政策的庇护。埃罗·布斯把相机递给了第一个从他身边经过的行人，请他给自己拍摄一张获得自由的照片。自始至终，他都是一名记者。

迪安娜和阿苏塞娜通过广播得知了这个消息，看守说，她们会是接下来获得自由的。但是他们说了太多次，她们都已经不相信了。她们俩都给自己的家人写了一封信，万一只有一个人获释，就让离开的那个人把信带出去。从那以后，对她们俩来说什么都没有发生，她们没有再得到任何消息，直到两天之后，也就是十二月十三日清晨，迪安娜被房子里的窃窃私语和奇怪的动静吵醒。她们会被释放的预感让她从床上跳了起来。她通知了阿苏塞娜。没有人告诉她们任何消息，而她们已经开始收拾行李。

迪安娜和阿苏塞娜都在日记里记录了那个戏剧性的时刻。一名守卫突然通知阿苏塞娜，让她准备离开。只有她。当时，迪安娜正在冲

澡。在不久之后出版的书里，阿苏塞娜用简单得惊人的笔触重现了那个时刻。

“我回到房间，回家穿的衣服已经在椅子上放好。穿衣服的时候，迪安娜女士还在洗澡。她出来的时候看见了我，她便站住看着我，对我说：

“‘我们要走了吗，阿苏？’

“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急切地等待着答复。我什么都不能告诉她。我低下头，深呼吸，告诉她：

“‘不。我一个人走。’

“‘我很高兴，’迪安娜说，‘我知道会是这样的。’”

迪安娜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我感到心里一阵刺痛，但是我告诉她，我为她感到高兴，让她安心离开。”她把写给妮迪娅的信交给阿苏塞娜。她及时写了这封信，以防他们不放她走。在这封信里，她请求妮迪娅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过圣诞节。阿苏塞娜哭了，迪安娜拥抱她，让她平静下来，接着陪她上车，在那里，她们又一次相互拥抱。阿苏塞娜转身透过玻璃看迪安娜，迪安娜在挥手道别。

他们把阿苏塞娜送到麦德林机场，让她飞回波哥大。一个小时之后，她在车里听见电台记者问她的丈夫，当听到释放新闻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实话实说：

“我在给阿苏塞娜写诗。”

就这样，十二月十六日，他们实现了心愿，一起庆祝了结婚四周年纪念日。

理查德和奥兰多已经厌倦了在臭气熏天的牢房地板上睡觉，他们说服看守，给他们换了一个房间。他们被换到了那个被铐的穆拉托人先前住的房间，此前已经很久都没有听说关于他的消息了。他们惊恐地发现，床垫上有大量新鲜的血迹，很可能是缓慢的折磨或是突然的刺伤造成的。

他们通过电视和广播得知了释放行动。看守说，他们会是接下来被释放的。十二月十七日一大早，一位被叫作“长者”的首领（实际上就是负责迪安娜的“堂帕丘”）没有敲门就走进了奥兰多的房间。

“您把自己收拾得体面点儿，因为您要走了。”他告诉他。

他勉强能刮完胡子、穿好衣服，还没来得及通知在同一所房子里的理查德。他们给了他一封写给媒体的通告信，给他戴上了一副度数很高的眼镜。“长者”独自一人带着他在麦德林的数个街区里仪式性地兜了几个圈子，之后给了他五千比索的打车钱，把他留在一个他不认识的街心花园，因为他对这座城市毫不熟悉。那是一个凉爽干净的星期一，时间是上午九点。奥兰多无法相信这一切。甚至在当时，向载有乘客的出租车做着无用的手势时，他仍确信，对于绑架他的人来说，杀死他比冒险给他活路要容易得多。他一找到电话便马上打给妻子。

莉莉安娜正在给孩子洗澡，满手泡沫地跑去接电话。她听见了一个陌生而冷静的声音：

“瘦妞，是我。”

她以为有人想开她玩笑，马上就要挂断电话了。当她认出那个声音的时候，她大叫起来，“啊，我的上帝！”奥兰多非常匆忙，他只告诉她自己还在麦德林，当天下午会到达波哥大。在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莉莉安娜没有得到片刻的安宁，她为自己没有听出丈夫的声音而感到忧心忡忡。胡安·维塔被释放的时候曾经告诉过她，奥兰多被监禁生活改变了很多，得费些功夫才能认出他。但是，她从来没想过，他连声音都变了。当天下午，她在机场受到了更大的震撼，她穿过一群记者，却无法认出那个亲吻她的男人。那正是度过四个月囚禁生活的奥兰多，他很胖，脸色苍白，蓄着黝黑扎人的胡子。他们两人都已经决定，一重聚就要第二个孩子。“但是，人太多了，那天晚上我们没做成，”莉莉安娜笑弯了腰，“第二天因为惊吓也没做成。”但是，他们很好地弥补了失去的时间：九个月零一天之后，他们生下了一个男孩；再过一年，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释放人质的风波（对于其他人质和他们的家人来说是一阵乐观的微风拂过）让帕丘·桑托斯相信，没有任何合理的迹象表明事情在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他觉得，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只是清除了小牌，以便在制宪议会上施加压力，获得赦免和不被引渡的权利。他留下了三张“A”：前总统的女儿、国内最重要的报纸的总编辑之子和路易斯·卡洛斯·加兰的妻妹。虽然玛露哈不愿用粗浅的解读来让自己不失望，但是贝阿特利丝和玛丽娜感受到了重生的希望。玛露哈情绪低迷，圣诞节的临近让她更加萎靡不振，她讨厌强制性的节日，从来不做圣诞马槽和圣诞树，不发礼物和卡片。没有什么比平安夜凄惨的聚会更让她感到压抑，大家在这些聚会上因为悲伤而歌唱，或是因为快乐而哭泣。“管家”和他的妻子准备了一顿令人作呕的晚餐。贝阿特利丝和玛丽娜努力参加了，但是玛露哈吃了两片药效强劲的巴比妥[3]，醒来时并没有感到内疚。

接下来的星期三，阿莱桑德娜的周播节目献给了妮迪娅家的圣诞夜，图尔巴伊全家都聚集在前总统身边；还有贝阿特利丝、玛露哈和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的家人。孩子们出现在特写镜头中：迪安娜的两个孩子，玛露哈的外孙，也就是阿莱桑德娜的儿子。玛露哈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因为她上一次见到他时，他还在牙牙学语，现在他已经会说话了。最后，比亚米萨尔用他抑扬顿挫的嗓音详细地讲述了他们行动的经过以及进展。玛露哈用一句精准的话给那次节目作了概括："美好而可敬。"

比亚米萨尔的信息让玛丽娜·蒙托亚打起了精神。她很快变得宽厚仁慈，表现出她的好心肠来。凭借着不为人知的政治敏感度，她开始兴致盎然地收听、解读新闻。对法令的分析让她得出了一个结论——她们被释放的可能性前所未有地大。她的身体开始好转，她甚至开始藐视囚禁规则，用自然、美妙、银铃般的嗓音说话。

十二月三十一日是她重要的一晚。妲玛莉丝送早饭的时候带来了一个消息：他们将举办一次像模像样的聚会来庆祝新年，到时会有克里奥约香槟和猪肘。玛露哈想，那将是她人生中最悲伤的夜晚，她第一次在那一晚远离家人。她陷入了抑郁之中，贝阿特利丝也被击垮了。她们俩都没有心情参加聚会。玛丽娜正好相反，她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这个消息，毫不吝惜地列举让她们高兴起来的理由。她甚至还鼓舞看守们。

"我们得讲点理，"她对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说，"他们也远离家人，我们该做的是让他们尽可能高高兴兴地过年。"

在玛丽娜被绑架的那个晚上，看守们给了她三件睡衣，但是她只穿过一件，把另外两件放进她的私人口袋里保存了起来。之后，玛露

哈和贝阿特利丝被带来了，她们三个把运动服用作监狱制服穿，每十五天清洗一次。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玛丽娜变得更加兴奋之前，没有人记得这些衣服。“我有个想法，”她说，“我这儿有三件睡衣，我们把这三件睡衣穿上，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一切顺利。”接着她问玛露哈：

“亲爱的，你想要什么颜色的？”

玛露哈说，她无所谓。玛丽娜觉得绿色更适合她，又把粉色的给了贝阿特利丝，给自己留了一件白色的。然后，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化妆盒，提议给彼此化妆。“今晚让我们都漂漂亮亮的。”她说。玛露哈已经受够了在穿着上的装扮，便暴躁地拒绝了。

“我都到了穿睡衣的境地了，”玛露哈说，“到这步田地了，还在这儿化得像个疯女人？不，玛丽娜，这可不行。”

玛丽娜耸了耸肩。

“那我化了。”

由于没有镜子，玛丽娜把化妆品递给了贝阿特利丝，坐在床上，让贝阿特利丝给她化妆。贝阿特利丝在床头灯的灯光下，化得完整、雅致：掩盖了苍白皮肤的胭脂、热烈的嘴唇、眼影。那个曾因个人魅力和美貌而名声斐然的女人竟依然如此美丽，她们俩都惊叹万分。贝阿特利丝对自己的马尾辫和学生气质感到非常满意。

那天晚上，玛丽娜展现了她作为安蒂奥基亚人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看守们效仿她，每个人都用上帝赋予的嗓音说想说的话。“管家”例外，他在放纵的酒宴中依然低声细语。“大灯”借酒壮胆，送给贝

阿特利丝一瓶男士香水。“让你们在被放出去的那天，能在无数拥抱你们的手臂里散发香气。”他告诉她们。粗鲁的“管家”没有忽略这件事，他说那是一份来自压抑之爱的礼物。这使得贝阿特利丝的诸多恐惧中又多了一样。

除了被绑架者之外，“管家”、他的妻子和四个轮班看守也在。贝阿特利丝如鲠在喉。玛露哈非常想家，而且觉得很羞愧。但是，她也无法掩饰自己对玛丽娜的敬佩之情：玛丽娜穿着白衣服，满头银发，声音动听，因为妆容而显得光彩照人、青春洋溢，快乐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她还是成功地让别人信服了。

她和看守们开玩笑，让他们摘了面具喝酒。有时候，他们热得受不了，于是要求人质们背过身去，让他们摘下面具透透气。十二点整，消防车的鸣笛声和教堂的钟声一齐响起，所有人都挤在房间里，他们坐在床上、床垫上，在锻炉间般的热气里大汗淋漓。电视里响起了国歌。玛露哈站了起来，命令所有人起立和她一起唱国歌。最后，她举起苹果酒，为哥伦比亚的和平干杯。半个小时之后，酒喝完了，聚会也结束了，盘子里只剩一块猪腿骨和吃剩的土豆沙拉。

换岗让人质们松了一口气，因为换回了她们被绑架那晚的同一批看守，她们已经知道如何应对他们了。玛露哈尤其觉得放松，她的身体正在低落的情绪中每况愈下。起初，恐惧使她全身疼痛，因为她被迫保持着不自然的姿势。后来，由于看守们施加的不人道的压力，疼痛变得更加明显了。十二月初，由于不听话，她被罚一整天不能上厕所。等到能去的时候，她什么都排不出来。那是顽固性膀胱炎早期症状。从那开始，一直到囚禁结束，她都受着出血症的折磨。

玛丽娜跟丈夫学过运动按摩，她用她微弱的力量坚持帮玛露哈复原。她依然保留着新年的好心情，依然乐观，讲述着趣闻轶事：她在生活。她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支持被绑架者的电视运动中，这给了她希望和快乐。她再次感受到了曾经的自己，存在过的自己，身处此地的自己。她总是出现在电视运动的第一阶段，直到有一天，她没有缘由地不再出现了。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都不敢告诉她，她被从名单里划去可能是因为没有人相信她还活着。

对于贝阿特利丝来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她曾经把这一天定为获得自由的最后期限。失望击垮了她，连她的狱友们都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有一段时间，玛露哈没法正视她，因为她失去了控制，号啕大哭。她们甚至在一个不比卫生间大多少的房间里忽略彼此的存在。情况变得难以为继。

对于三名人质来说，在洗完澡之后的漫长时间里，互相用保湿霜进行缓慢的腿部按摩是最持久的消遣。为了防止她们失去理智，看守们提供了充足的保湿霜。一天，贝阿特利丝发现保湿霜快用完了。

“等保湿霜用完的时候，”她问玛露哈，“我们该怎么办？”

“那就再管他们要。”玛露哈刻薄地回答，接着用更加刻薄的语气强调：“要不然，我们就看着办。对吧?”

“您别这么跟我说话。”贝阿特利丝勃然大怒，冲她大声喊道：“我现在之所以在这儿都是您的错！”

这样的爆发是难以避免的。在那一刻，她说出了她在这么些紧张压抑的白天与恐惧的黑夜里隐忍的一切。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情绪的爆发并没有伴随着更加强烈的恨意。贝阿特利丝处于一切的边缘，她

克制地活着，独自咽下怨恨，不加细细品尝。一句简单的、漫不经心的话迟早会解放压抑在恐惧下的攻击性，当然，这是可能发生的最不严重的事了。然而，轮值的看守并不这么想。他担心会发生剧烈的争吵，于是威胁要把贝阿特利丝和玛露哈分开，关进不同的房间。

她们两人都很不安，因为对性侵的恐惧依然存在。她们相信，只要她俩在一块儿，看守们就不容易得手，因此把她们分开的想法总是最让她们恐惧的。另一方面，看守们总是两两出现，互相并不亲近，而且似乎在监视对方，这像是一种维持内在秩序的防备措施，以免人质出什么大岔子。

但是，看守们的压迫在房间里营造出了一种病态的氛围。十二月轮班的看守们带来了一台贝塔录像机，用来播放极其色情的暴力电影，时不时还会放些色情片。房间里充斥着令人无法忍受的躁动。此外，人质们上厕所的时候必须把门留一条缝，她们不止一次发现看守在偷窥。有一个看守一直用手顶着门，这样她们上卫生间的时候门就关不上了。当贝阿特利丝故意一下子把门关上的时候，他的手指几乎要废了。另一件让人不适的事情是值第二轮班的看守中有一对同性恋，他们用各种下流的方式调情，一直保持着兴奋的状态。“大灯”对贝阿特利丝一言一行的过分监视、赠送给她的香水和“管家”的无礼也是骚动的种种表现。他们互相讲述强奸陌生女人的经历，交流变态的色情行为和虐淫的快感。这让气氛变得更加怪异了。

由于玛露哈和玛丽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午夜前，“管家”为贝阿特利丝叫来了一位医生。那是一个年轻人，衣着得体，很有教养。他戴着一个黄色的丝质面具，和他的黄色衣服很相称。通常，蒙面医生很难让人觉得值得信任，但是，他一进门就表现得相当熟练。他能让人安心，给人带来安全感。他带着一只像行李箱一样大的高级皮箱，

里面装着听诊器、血压计、心电描记器、便携化验箱和其他急救用品。他给三名人质做了全面的检查，用便携化验箱给她们化验了血液和尿液。

做检查的时候，医生悄悄对玛露哈说："看着您处在这样的境地却无可奈何，我觉得自己是世上最羞愧的人。我想告诉您，我是被迫来这里的。我是路易斯·卡洛斯·加兰博士的朋友。我支持他，给他投过票。您不应该受这样的罪，但是请您试着克服它。冷静对您的身体有好处。"玛露哈对他的话非常欣赏，但为他道德的妥协程度感到惊讶不已。他跟贝阿特利丝说了一样的话。

她们俩的诊断结果是重度心理压力和早期营养不良，因此他建议要丰富、平衡膳食。他发现玛露哈有血液循环问题和需要警惕的水疱感染症状，便以七叶树、利尿剂和镇定片为基础给她开了药方。他给贝阿特利丝开了镇静剂，来减轻胃溃疡的痛苦。至于玛丽娜，他之前已经见过了，还给她提了建议，让她多注意自己的身体，但他发现她没有好好听取这些建议。他让她们三个每天至少散步一个小时。

从那时起，看守给她们每人一个装着二十片镇静剂的药盒，让她们早上、中午和睡前各服一片。极端的情况下，她们可以把镇静剂换成药效强劲的巴比妥，以便从恐怖的监牢暂时解脱。只要四分之一片，她们就能在数到四之前不省人事。

那天凌晨一点钟，她们开始在漆黑的院子里散步，看守们带着没上保险的机关枪战战兢兢地监视她们。走完第一圈的时候，她们有点晕，特别是玛露哈，她得靠着墙壁才不会摔倒。在看守们和妲玛莉丝偶尔的帮助下，她们最终习惯了这样散步。两个星期后，玛露哈就能

快速走完一千圈，也就是两公里。她们三个的情绪都有了好转，日常生活也变得更加和谐。

除了房间之外，院子是那座房子里她们唯一熟悉的地方。她们散步的时候，院子里一片漆黑。但在月朗星稀的夜晚，可以看见一台破破烂烂的大洗衣机、电缆上晾着的衣服，还有乱七八糟的破盒子和废旧物品。洗衣机的雨棚上方是紧闭的二楼窗户，布满灰尘的玻璃上盖着报纸做的窗帘。被绑架者们猜想，不值班的看守们就睡在那里。院子里有一扇门通往厨房，另一扇通往被绑架者们的房间。还有一扇旧木板制的大门，它和地面之间有点缝隙，那是连接世界的大门。她们之后将会发现，这扇门通向一个安宁的牧场，复活节羔羊和散养的母鸡在那里吃草。似乎很容易就能把门打开，但是门口有一条看起来忠心不二的德国牧羊犬把守着。不过，玛露哈和它关系不错，当她走上前去摸它的时候，它不会叫。

阿苏塞娜被释放之后，只留下迪安娜独自一人。她带着前所未有的兴趣看电视、听广播，偶尔看看报纸，但是了解这些新闻却无法与别人谈论是唯一比得知它们更糟糕的事情。她觉得看守们对她很不错，她承认他们为了取悦她所付出的努力。“我不想形容，也很难形容我每一分钟的感受：疼痛、焦虑以及我经历的恐怖的日子。”她在日记里写道。她担忧她的生命安全，尤其对武装救援有着不曾止歇的恐惧。要释放她的消息常变成一句蛊惑人心的话：“就差一点了。”她想，那是一种无限延期的策略，用来等待制宪议会成立，做出关于引渡和赦免的具体决定。这种想法让她非常恐惧。过去，堂帕丘和她在一起很长时间，和她探讨，让她充分了解信息，但他现在跟她越来越疏远。他们无缘无故地不再给她送去报纸。随着元旦的远去，新闻，甚至电视剧都感染上了这个瘫痪国家的节奏。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反复向她承诺她会见到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本人，以此分散她的注意力。她演练自己的态度、理据和语气，肯定自己可以跟他谈判。但是，永远的拖延把她带入了不可思议的悲观的极点。

在那样的恐惧里，她脑海中的保护人形象是她的母亲，或许她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热情的性格、百折不挠的信念和对幸福捉摸不定的幻想。她们有与人沟通的才能，在被绑架的暗无天日的几个月里，这种才能使她有了奇迹般的洞察力。妮迪娅在广播电视上说的每一个词、做的每一个动作和最出人意料的强调处向身处黑暗监牢的迪安娜传递着假想的信息。“我总觉得她仿佛是我的守护天使。”她写道。她坚信，在众多的挫败之后，最后的成功将归功于母亲的奉献和力量。由于这种信念的激励，她幻想自己会在圣诞夜被释放。

圣诞前夜，房子的主人们为她举办了一场聚会，对自由的幻想让她在聚会时坐立不安。他们准备了烤肉、萨尔萨唱片、烧酒、烟花和五颜六色的气球。迪安娜把这当作一种道别。她甚至已经把手提包准备好，放到床上了。为了在他们释放她的时候不浪费时间，她从十一月就开始收拾了。晚上很冷，晚风像狼群般在树木间呼号，但她把这当作美好时光的征兆。当他们给孩子们分发礼物的时候，她想起了自己的孩子，盼望着明天晚上和他们在一起，以此来安慰自己。梦想实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为看守们送给她一件加了里衬的皮衣。也许，为了让她更好地忍受不幸，他们特意挑选了这件衣服。她肯定，她的母亲会像往年一样等她吃晚饭，还会在门上挂一个槲寄生花环，还有为她准备的“欢迎”标语。的确是这样的。迪安娜依然非常肯定自己会被释放，她一直等到聚会最后的碎屑在地平线上消失。又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早晨来临了。

接下来的周三，她独自一人在电视前搜索着频道。突然，她在屏幕上认出了阿莱桑德娜·乌利维的小儿子，那是《焦点》栏目为圣诞节制作的节目。当她发现这期节目的出现是因为她在阿苏塞娜给她母亲带去的信上要求庆祝平安夜时，感到惊喜万分。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的家人在场，图尔巴伊全家都在：迪安娜的两个孩子、她的兄弟姐妹和她的父亲。她父亲站在中间，他身材高大、精神萎靡。“我们并没有在庆祝。”妮迪娅讲述道，“然而，我决定满足迪安娜的心愿。我花了一个小时组装圣诞树，在壁炉里组装圣诞马槽。”尽管所有人都好心地不想给被绑架者们留下悲伤的回忆，但与其说是在庆祝，这更像是一场追悼会。但是妮迪娅坚信迪安娜会在那天晚上被释放，她在门上安了圣诞装饰和金色的欢迎标语。“那天我不能和大家一起过节，我感到非常痛苦。”迪安娜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但是，这极大地鼓舞了我，我觉得自己离大家很近，我很高兴看见他们团聚在一起。”她非常喜欢玛丽亚·卡罗琳娜的成熟，也很担忧小米盖尔的孤僻，同时不安地想起他还没有受洗；父亲的悲伤让她难过，母亲让她十分感动——母亲在圣诞马槽里放了一件为她准备的礼物，在门上挂上了欢迎的标语。

迪安娜没有因为圣诞节的希望落空而消沉，相反，她对政府有了抗拒的态度。一开始，她对2047号法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十一月的幻想正是基于这条法令而产生的。基多·帕拉的行动、“高贵者”的努力、对制宪议会的期望以及调整投降政策的可能性都激励着她。但是，圣诞节的失望让她不再体谅政府。她愤怒地想，为什么政府不考虑任何对话的可能性，而荒谬地让绑架案的压力决定一切。她明确地表示，她一直了解在受讹诈的情况下开展行动的难度。“在这方面，我是图尔巴伊家族的人。”她写道，“但是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态已经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她不能理解政府面对在她看来是绑架者的嘲弄行为时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她不明白，政府既然已经制定出针

对他们的政策，并接受了一些合理的要求，为什么不以最大的力度威胁他们投降。“只要不强制他们投降，”她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慢慢来，而且他们知道自己掌握着最重要的施压武器。”她觉得体面的调停已经变成了一盘象棋，双方挪动着自己的棋子，等着看谁会把对方将死。“但是，我会是哪颗棋呢？”她想，又坦率地回答，“我禁不住想，我们是可以被抛弃的棋子。”对已经消亡的“高贵者”团队，她直击他们的要害：“他们从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事业开始，到为‘可被引渡者’服务告终。”

一月，一位值班的看守闯进了帕丘·桑托斯的房间。

“这事玩儿完了，”他说，“他们要杀人质了。”

他说，这是为了给死去的普里斯科集团成员复仇。公告已经拟好了，几个小时后就会发布。第一个被杀的会是玛丽娜·蒙托亚，往后按顺序每三天杀一个人：理查德·贝塞拉、贝阿特利丝、玛露哈和迪安娜。

“您是最后一个。”看守安慰他说，“但您放心，死的人超过两个，这届政府就撑不住了。”

帕丘非常害怕，他根据看守的数据算了一笔账：他还能活十八天。因此，他决定给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写信。他在笔记本上写了整整六页，没有打草稿。他用分开的小写字母书写，像印刷体一样，比往常更容易辨认。他握笔很稳，他明白这不仅是一封道别信，还是他的遗嘱。

“不管结局如何，我只希望这场戏尽快结束，让大家最终都能得到安宁。”他在开头写道。他最感激的人是玛丽亚·维多利亚，他写道，

和她在一起，他成了一个男人、一位公民和一名父亲。唯一让他遗憾的是，他过去更注重他的记者工作，而不是家庭生活。“在坟墓里我会感到内疚。”他写道。至于他几乎刚出世的孩子，他相信他们会被最可靠的人抚养长大，这让他感到安心。“等他们能理解曾经发生的一切的时候，再跟他们谈起我，这样他们能平静地消化我的死所带来的不必要的痛苦。”他感激父亲为他做了那么多事，只求他“在与我团聚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免得我的孩子们在将来的财产争夺中伤透脑筋”。于是，他谈起了他认为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聊但重要”的内容：他孩子们的富足生活和《时代报》家庭内部的团结。前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报给他的妻儿买的保险。“请让他们把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交给你，”他说，“我为日报做出的牺牲并不完全是徒劳，这样才勉强公平。”关于报纸的行业、商业或是政治前景，他唯一担忧的是内部的斗争和分歧，他意识到大家族之间有着不小的冲突。“在这次牺牲之后，《时代报》将会分崩离析或是落入他人之手，这令人难过。”这封信以对玛丽亚维的感谢结尾，感谢他们在一起生活时的美好回忆。

看守感动地接过这封信。

“放心，老爹。”他告诉他，“我保证让这封信寄到。”

事实上，帕丘·桑托斯没能剩下十八天的时间，他只剩了几个小时。他是名单上第一个，谋杀的命令在一天前就下达了。由于机缘巧合，玛尔塔·妮耶维丝·奥乔阿在最后时刻通过第三人得知了这个消息，她给埃斯科瓦尔寄了一封求情信。她坚信帕丘的死最终将燃烧整个国家。她一直不知道他有没有收到这封信，但是，针对帕丘·桑托斯的命令从来没有真正被发布出来，他们发布的是一条针对玛丽娜·蒙托亚的无法撤销的命令。

玛丽娜似乎从一月初就有了预感。出于她从来不加以解释的理由，她决定在“和尚”的陪伴下散步。“和尚”是她的老朋友，在新年第一轮换岗时回来了。电视节目结束以后，他们会散步一个小时，之后玛露哈与贝阿特利丝会和她们的看守一起出来。一天晚上，玛丽娜回来的时候非常害怕，她看见一个穿着黑衣服、戴着黑色面具的人，他在洗衣机那里，在黑暗处看着她。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认为那又是她经常出现的幻觉，没有理会她。当天她们就证实了这个推断，因为放洗衣机的阴暗处没有任何光线，不可能看见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男人。而且，如果这是真的，那应该是家里的某个熟人。否则，那条害怕自己影子的德国牧羊犬会受到惊吓。“和尚”说，那应该是一个只有她能看见的幽灵。

然而，两三晚之后，玛丽娜散完步回来时，就处于真正的恐慌状态了。那个男人又来了，他总是一身黑衣，用令人毛骨悚然的注意力长时间观察她，而且完全不在意她也在看他。和前几晚不同，那天是满月，院子被笼罩在一种奇幻的绿色中。玛丽娜向“和尚”讲述这件事，“和尚”反驳了她，认为她在说谎。但是出于错综复杂的理由，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都对此感到困惑。从那时起，玛丽娜就不再散步了。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疑虑给人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以至于玛露哈产生了真正的幻觉。一天晚上，她睁开眼睛，就着床头灯的灯光看见了“和尚”。他像往常一样蹲着，面具变成了一副骷髅。玛露哈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因为她把这幅景象同她母亲的忌日（即将到来的一月二十三日）联系了起来。

玛丽娜在床上度过了周末，似乎已经被遗忘的脊椎旧疾把她折磨得非常虚弱。初来时的混沌情绪又回来了。由于她无法自理，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开始照顾她。她们几乎抬着她去卫生间，喂她吃东西、

喝水，在她的背后放一只枕头让她在床上看电视。她们宠着她，真心地爱她，但觉得自己被她前所未有地蔑视。

“我病得这么厉害，你们都不帮我，”玛丽娜对她们说，“我帮了你们那么多。”

有时候，对于玛丽娜来说，只有折磨着她的无助感在不断滋长。她连续几个小时激情洋溢地低声祈祷。事实上，这样的祈祷和处理指甲是她在那场危机中仅有的安慰。几天后，她厌倦了一切，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她叹了口气:

“唉，随上帝所愿吧。”

二十二日下午，最开始来过的那个医生又一次来看望她们。他悄悄地和看守们谈话，并认真倾听了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关于玛丽娜身体状况的评论。最后，他坐在床边和玛丽娜交谈。他们说的应该是严重而秘密的事情，他们俩的窃窃私语声是如此微弱，没人能听清一个字。医生离开的时候比来的时候情绪更好，他承诺会很快再来。

玛丽娜沮丧地躺在床上，不时地哭泣。玛露哈试着鼓励她，玛丽娜用不停做祷告的方式感激她，而且总是充满情感地回应她，用僵硬的手握住她的手。玛丽娜跟贝阿特利丝的感情更加深厚，也同样亲昵地对待她。修剪指甲是唯一支持她活下去的习惯。

二十三日（周三）晚十点半，她们开始看《焦点》节目。她们期待听到迥异的词汇、熟悉的笑话、最意想不到的动作和歌词里可能藏匿加密信息的细微变化。但是，没有时间了。主题曲刚刚响起，房门就在这个奇怪的时刻被打开了。“和尚”走了进来，而那天晚上他并不用值班。

“我们是为奶奶来的，我们要把她带去另一个农场。”他说。

他仿佛在发出一个共度周末的邀请。玛丽娜躺在床上，仿佛被刻进了大理石里。她脸色惨白，连嘴唇也毫无血色，头发卷曲。“和尚”像孙子一般亲昵地向玛丽娜走去。

“收拾好您的东西，奶奶，”他对她说，“您有五分钟时间。”

他想帮她起身。玛丽娜张开嘴想说点什么，却又将话咽了回去。她没有依靠任何帮助就起了身，拿起装着她个人物品的袋子，向卫生间走去，走路时像梦游一般轻飘飘的，仿佛没有踩到地面。玛露哈毫不畏惧地质问“和尚”。

“你们会杀了她吗？”

“和尚”被激怒了。

“这些东西不能问。”他说，但他立马恢复了正常，“我已经说了，她会去一个更好的农场。我保证。”

玛露哈不惜一切代价尽力阻止他们把她带走。由于没有任何一位首领在场——这对于一个重要的决定来说是不正常的，她要求叫一个领导人来讨论这件事。但是另一个走进来的看守打断了争执，他还带走了收音机和电视机。他们没有解释一句就切断了电源，聚会的最后一寸光在房间里熄灭了。玛露哈请求他们，至少让她们把节目看完。贝阿特利丝表现得更加暴躁，但是并没有用。他们带走了收音机和电视机，并告诉玛丽娜他们五分钟后回来接她。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留在房间里，她们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应该相信谁，甚至不知道那个捉摸不透的决定在何种程度上成了自己命运的一部分。

玛丽娜在卫生间里待了远远不止五分钟。她穿着完好的粉色汗衫、棕色的男袜和被绑架那天穿的鞋子回到屋里。汗衫很干净，刚被熨过。由于潮湿，她的鞋子上长了苔藓。它们看起来很大，因为在忍受了四个月的折磨之后，她的脚缩了两码。玛丽娜依然面色苍白，全身被冷汗浸湿了，但是她还留有一丝幻想。

“天知道他们会不会把我放了。”她说。

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不约而同地决定，无论如何，最基督的做法是欺骗她。

“当然了。”贝阿特利丝回答她。

“就是这样。”玛露哈第一次灿烂地笑了，“真好啊！”

玛丽娜的反应让人感到惊讶。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她们有什么口信要捎给家人。她们临时想出了尽可能好的答案。玛丽娜自嘲了一会儿，又问贝阿特利丝借“大灯”在新年时送给她的那瓶男士香水。贝阿特利丝把香水递给她，玛丽娜非常优雅地把香水喷到耳后。她没有照镜子，用手指轻轻地整理她暗淡的美丽银发。最后，她似乎为自由和幸福做好了准备。

事实上，她快要晕厥了。她向玛露哈要了一根烟。他们朝她走去的时候，她正坐在床上抽烟。她抽得很慢，也因为忧虑抽得很大口。与此同时，她一寸寸地审视那个糟糕又悲惨的房间，她在那里没有找到丝毫的怜悯，在那里，他们最后连死在床上的尊严都不给她。

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贝阿特利丝认真地重复了一遍给她家人的口信：“如果您有机会见到我的丈夫和孩子们，告诉他们我很好，我很

爱他们。”但是，玛丽娜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别拜托我。”她回答的时候甚至没有看她，“我知道，永远不会有那样的机会了。”

玛露哈给她拿了一杯水和两片足够睡上三天的巴比妥。她得喂她喝水，因为玛丽娜的双手颤抖着，无法将杯子送到嘴边。当时，玛露哈看见了她闪烁的眼睛深处的东西，这足以让她发现玛丽娜连自己也没有欺骗得了。玛丽娜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他们会对她做什么，她会被送到哪里；她明白，同样是出于同情，她顺从了她人生中剩下的最后的朋友。

他们给她带来了一顶新的风帽，帽子是粉色的，用羊毛织成，和她的汗衫很相称。在他们给她戴上帽子之前，她向玛露哈道别，给了她一个拥抱和亲吻。玛露哈为她祈福，告诉她：“放心。”她也给了贝阿特利丝一个拥抱和亲吻，跟她告别，对她说：“愿上帝保佑您。”贝阿特利丝直到最后一刻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沉浸在幻想之中。

“您就要见到您的家人了，真好呀！”她对玛丽娜说。

玛丽娜任由看守们摆布自己，没有流一滴眼泪。他们给她反着戴上风帽，给眼睛留了两个孔，让她能看清东西，还在风帽后颈处给嘴巴留了孔。“和尚”拉着她的双手，把她从房子里带走了。玛丽娜任由他带着，脚步很稳。另一名看守从外面把大门锁上了。

面对那扇紧闭的大门，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纹丝不动，不知道如何继续生活。车库里响起发动机的声音，后来，这声音消失在了地平线上。她们在那个时候才明白，他们拿走电视机和收音机是为了不让她们得知当晚的结局。

[1]原文是英语。

[2]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1901－1992），生于德国柏林，德裔美国演员兼歌手，著名好莱坞影星。

[3]一种催眠药。

六

次日，也就是二十四日，星期四。清晨，有人在波哥大北部的荒地发现了玛丽娜·蒙托亚的尸体。她几乎是坐在早晨的毛毛雨淋湿的草地上，倚靠着刺网围栏，手臂十字交叉。描述尸体的78号刑事诉讼法官形容她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女人，有一头银发，发量很足，穿着粉色汗衫和棕色男袜，汗衫下面戴了一条配有塑料十字架的圣衣项链。司法人员到来之前，已经有人偷走了她的鞋子。

尸体头部被风帽盖住了，风帽反戴着，因为干涸的血迹而皱得像一块纸板，在后颈部有给嘴巴和眼睛留的小孔。头部中了六枚子弹，几乎被打碎了，子弹是从五十厘米开外的地方射出的，没有在布料和皮肤上留下印记。伤口分布在头颅和左侧脸颊，额头上还有由一颗致命的子弹造成的清晰伤口。然而，在被野草浸湿的尸体旁只找到了五枚九毫米的子弹壳。司法警察的技术部队已经提取了五套指纹。

马路对面圣·卡洛斯学院的一些学生和其他好奇的人在四周游荡。在围观尸检的人中，有一个在城北墓园卖花的女人。她起得很早，要去附近的一所学校给女儿注册。死者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人穿着高档内衣，双手护理得很好。尽管她的脸上千疮百孔，但依然能让人注意到她的与众不同。那天下午，鲜花批发商在给五公里外城北墓园的摊位供货时发现，这位卖花女头痛得厉害，并处于需要注意的抑郁状态之中。

“您都想不到，看着那位可怜女士倒在草地上是多么难过。”卖花女告诉她，“您得看看她的内衣，贵妇人的身材，白色的头发，细嫩的双手和精心修剪的指甲。”

那位批发鲜花的女士为她的衰弱感到惊慌，给了她一片治疗头疼的止痛药，建议她不要想这些伤心事，尤其是不要为别人的事情难过。一周之后，她们俩才意识到，她们经历的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插曲。那位批发商叫玛尔塔·德·佩雷斯，是路易斯·吉耶尔摩·佩雷斯的妻子，路易斯正是玛丽娜的儿子。

星期四下午五点半，法医研究所接收了尸体，将其留在了停尸房，等待第二天解剖，因为弹伤超过一处的死者不会在晚上进行尸检。还有两具上午在街上发现的男尸在等待确认身份和解剖。夜间，又送来了两具成年男性的尸体，也是在露天场所被发现的；还有一具五岁男孩的尸体。

帕特莉西娅·阿尔瓦雷斯医生从周五早上七点半开始解剖玛丽娜·蒙托亚的尸体。医生在她的胃里发现了可辨认的食物残渣，并推测死亡时间是周四清晨。她也对高级内衣和精心修剪、涂了指甲油的指甲印象深刻。她向她的上司佩德罗·莫拉莱斯医生寻求帮助，他当时在两台桌子外解剖另一具尸体。他帮她发现了其他证明尸体生前社会地位的不容置疑的特征。他们给她做了牙齿鉴定，给她拍摄了照片和X光片，又提取了三对指纹。最后，他们给她做了原子吸收测试，并没有发现精神类药品的残留。虽然玛露哈·帕琼在她死前的几个小时给了她两片巴比妥，但看来她没有吃。

初步的手续完成之后，尸体被送到了城南墓园。三周前，那里挖掘了一个大约能埋下两百具尸体的公共墓穴。她和另外四个陌生成年

人还有那个孩子埋在了一起。

显然，在那个残酷的一月，国家已经陷入了可想象的最糟糕的状况。自一九八四年罗德里格·拉腊·波尼亚部长被刺杀以来，我们已经历了各种令人深恶痛绝的事件。但是，这样的形势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最糟糕的情况也没有成为过去。所有暴力的因素都被激发、加剧了。

在众多引发国家动荡的危险中，毒贩恐怖主义被定义为最有害、最残忍的因素。四名总统候选人在一九九〇年的大选之前被谋杀。一名单独行动的杀手在一架民航客机上杀死了M-19的候选人卡洛斯·皮萨罗，尽管他已经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四次变更了航班，并使用了各种精明的技巧来为自己打掩护。预备候选人埃尔内斯托·桑佩尔在十一颗子弹的扫射中幸存了下来。五年后，他成为共和国总统时，身体里还留着四颗子弹，它们会在过机场的电磁门时嘀嘀作响。他们在玛萨·马尔克斯将军的途经处引爆了一辆装有三百五十公斤炸药的汽车，将军从他的低配装甲车里逃了出来，还拖着一名受伤的卫兵。“突然，我觉得自己好像被浪头打到了空中。”将军讲述说。他受到了很大打击，为了恢复平静，他寻求了精神治疗的帮助。七个月后，一辆携带两吨炸药的卡车用一次毁灭性的爆炸，炸毁了安全管理部（DAS）的巨型大楼，造成七十人死亡，七百二十人受伤，还有无法估量的财物损失。当时，将军的精神治疗还没有结束。恐怖分子按照往常将军走进办公室的时间精准地引爆炸弹，但是他在那场灾难中连一点擦伤都没有。同年，一枚炸弹在一架客机起飞五分钟后爆炸，造成一百零七人死亡，其中有安德烈斯·埃斯卡比——帕丘·桑托斯的妻弟，以及哥伦比亚男高音歌手赫拉尔多·阿莱亚诺。人们普遍认为，此次爆炸是针对候选人塞萨尔·加维里亚的。那是个糟糕的失误，因为加维里亚从没有乘坐那班飞机的打算，竞选团队中负责他人身安全的成员甚至禁止他乘坐

民航客机。有一次他想乘坐民航客机，但其他乘客试图下飞机，以避免跟他同行的危险。在他们的惊慌面前，他不得不放弃了。

事实上，国家陷入了地狱般的恶性循环之中。一方面，“可被引渡者”拒绝投降，也不肯减少暴力行动，因为警方没有给他们停战的机会。埃斯科瓦尔通过各种媒体揭露，警方随意闯入麦德林的贫民窟，随机抓走十个孩子，不经调查就把他们枪决在酒馆和牲口圈里。警察粗略地推测，大多数人都在为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效力，要么是他的支持者，要么出于理智或被强迫，随时都会变成他的支持者。不管是在对警察一个不留的屠杀中，还是在袭击和绑架中，恐怖分子都没有停歇。另一方面，两场历史最久、力量最强大的游击运动——民族解放军和革命武装力量的运动，正用各种恐怖行动抗议塞萨尔·加维里亚政府的第一份和平提案。

受那场盲目战争影响最大的群体是记者，还有谋杀和绑架行为的受害者，以及因为威胁和腐败而逃逸的人。在一九八三年九月至一九九一年一月期间，有二十六名来自全国不同媒体的记者被贩毒集团杀害。《观察者报》的主编吉耶尔摩·加诺是其中最文弱、最无辜的一个。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他在报社门口被两名暗中监视的持枪者杀害。当时他正在自己的车里。由于写作攻击毒品贸易的自杀性社论，他成了国内最受威胁的人之一，但他拒绝使用装甲汽车，也不携带卫队。然而，在他死后，他的敌人还试图继续毁灭他。一个纪念他的半身像在麦德林被炸毁。几个月后，一辆装有三百公斤炸药的汽车被引爆，摧毁了报社的办公楼。

一种比臭名昭著的海洛因更有害的毒品被引入了民族文化中：赚快钱。这种想法盛行一时：法律是幸福最大的阻碍，学会读写没有用

处，像罪犯一样活着比像好人一样活着更好、更安全。一言以蔽之，这是非典型战争时期特有的社会腐化状态。

在哥伦比亚近期的历史中，绑架并不是新鲜事。前些年的四位总统都没有逃过破坏国家稳定的绑架案的考验。当然，就目前所知，这四位总统中没有一位屈服于绑架者的要求。一九七六年二月，在阿丰索·洛佩斯·米切尔森政府时期，M-19绑架了哥伦比亚工人联盟主席何塞·拉盖尔·麦尔卡多。绑架他的人认为他背叛了工人阶级，最后，他被处死。由于政府拒不满足一系列的政治条件，他的后颈挨了两枪。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七日，在胡里奥·塞萨尔·图尔巴伊政府时期，同一武装组织的十六名精英成员攻占了多米尼加共和国位于波哥大的大使馆，当时大使馆正在庆祝国庆节。在六十一天里，几乎整个驻哥伦比亚的外交系统都成了人质，包括美国、以色列和梵蒂冈的大使。他们索要五千万美元的赎金，并要求释放三百一十一名被拘捕成员。图尔巴伊总统拒绝谈判。但是，四月二十八日，人质们被无条件释放，绑架者们在古巴政府的保护下离开了国家，这次保护行动是由哥伦比亚政府申请的。绑架者们私下承认，他们收到了五百万美元的赎金，这笔现金是由哥伦比亚的犹太移民向全世界的教友募集的。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六日，M-19的突击队在最繁忙的时间段占领了人流涌动的最高法院大楼。他们要求共和国最高法院审判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总统，因为他没有履行他的和平承诺。总统没有同意谈判。十个小时后，军队强行武装解救了最高法院大楼，造成了九十五位公民死亡，其中有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还有院长阿丰索·莱耶斯·埃昌迪亚，失踪人数难以统计。

比尔希略·巴尔科总统在他的任期快要结束之时，没能妥善处理秘书长之子阿尔瓦罗·迭戈·蒙托亚的绑架案。七个月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怒火向继任总统塞萨尔·加维里亚爆发了。他的政府在成立之初就面临着超过十名显赫人物被绑架的难题。

然而，在最初的五个月，加维里亚争取到了不太动荡的氛围，因此顶住了骚乱。为了召集一个被最高法院赋予足够权力的制宪议会，他达成了一项政治协议，让制宪议会可以不受限制地决定任意事务。当然，其中包括最热门的议题：国民引渡和赦免。但是，只要哥伦比亚没有一个有效的司法体系，就几乎不可能整合出一项和平政策，能将国家置于好人的一边，将各种罪犯归于坏人的一边。对于政府、毒贩和游击队来说，这才是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在那个时期，没有什么事是容易的，让某一方客观地通报某条新闻更是不易，教育孩子、教他们区别善恶也并不简单。

政府的公信力不再由突出的政治成就决定，而是由政府的安全机构、国际媒体的抨击和国际人权机构的底线来衡量。相反，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取得了游击队在鼎盛时期都没有获得的信任度。人们甚至更相信“可被引渡者”的谎言，而不是政府的真话。

十二月十四日，政府颁布了3030号法令，这部法令修订了2047号法令的内容并废除了之前所有的相关法令。它引进了诸多新内容，其中有一个司法刑罚累积的概念。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被判定有数项罪行的人来说，无论是在同一场审判还是在之后的审判中，他都不会因为不同的罪行而增加服刑的年份，而是只承担其中判得最重的刑罚。此外，法令还确定了一系列程序和从国外转回到哥伦比亚审理的案件的证据期限。但是，阻碍投降的两块巨大的礁石依然坚挺：不够明确的不被引渡条件和可被赦免罪行的固定期限。确切地说，投降和认罪

依然是不被引渡和减刑的必然要求，但前提是所有罪行是在一九九〇年九月五日之前犯下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通过一条愤怒的信息表达了他的不满。这一次，他并非是想避免被当众揭发，而是另有缘由：与美国交流证据的进程在加快，促进了引渡事宜的进展。

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是对这部法令最惊讶的人。由于与拉法埃尔·帕尔多日常的联系，他正等待一部更容易操作的法令出现。然而，他认为这部法令比第一部更难操作。这么认为的人不止他一个。不赞同的意见不计其数，甚至在第二部法令颁布当天，就有人在构思第三部法令了。

至于让3030号法令变得更难操作的原因，一个很容易想到的猜测是，面对调解公告的进攻和无故释放四名记者的行为，政府中最激进的派别已经使总统相信埃斯科瓦尔正面临困境。而实际上，凭借绑架案施加的巨大压力和制宪议会取缔引渡和宣布赦免的可能性，埃斯科瓦尔当时前所未有地强大。

相反，奥乔阿三兄弟立即选择了投降以寻求庇护。这可以解读为贩毒集团高层出现了裂痕。其实，他们的投降进程从第一部法令颁布后就已经开始了。九月，一名跟拉法埃尔·帕尔多相熟的安蒂奥基亚参议员请他接见一个他之前并不认识的人。那是玛尔塔·妮耶维丝·奥乔阿，她大胆地为她的三个兄弟办理投降手续已经有一个月了。投降将会这样进行：最小的法比奥于十二月十八日投降；一月十五日，豪尔赫·路易斯将投降；二月十六日，胡安·大卫投降。五年后，一群记者在监狱里采访豪尔赫·路易斯，他的解释斩钉截铁："我们投降是为了保命。"他承认，在这背后有着家族女性施加的难以抗拒的压力。但是，直到他们被安全地关进位于麦德林工业区的伊塔古伊装甲监狱时，他

们才真正得到了安宁。那是一次信任政府的家族行为，当时政府依然能在他们有生之年把他们引渡到美国。

妮迪娅·金特罗女士一直很关注这些事件，她没有忽视奥乔阿兄弟投降的重要性。法比奥投降三天后，她便和女儿玛丽亚·维多利亚，还有迪安娜的女儿玛丽亚·卡罗琳娜一起去监狱探望他。奥乔阿家族的五名成员：母亲、玛尔塔·妮耶维丝、另一个姐妹和两名年轻的男子到她的住处接她，他们遵循着帕伊萨人的部落礼仪。他们把她带到了伊塔古伊监狱，那是一座装甲建筑，位于山坡上一条小街的尽头，已经装饰上了圣诞节的彩纸花环。

在监狱的牢房里，除了小法比奥之外，父亲堂法比奥·奥乔阿也在那里等待他们。他是一位一百五十公斤重的族长，七十岁了，却有着孩子的容貌。他饲养着步伐高贵的哥伦比亚马，还是一个由英勇的男性和安分守己的女性组成的大家庭的精神领袖。他喜欢戴骑手的帽子，坐在主座上指挥客人。他的举止礼数周全，和他缓慢拖沓的说话风格以及他的群众智慧非常契合。他的儿子在他的身边，常被衬托得很有活力，说话很不得体。但那天，他父亲说话的时候，他几乎没有插嘴。

堂法比奥首先赞美了妮迪娅为了救迪安娜表现出的撼天动地的勇气。他用精湛的措辞技巧提出了帮助她对付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可能性：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非常愿意帮忙；但是，我认为我做不了什么。拜访结束时，小法比奥请求妮迪娅向总统解释在投降法令中增加投降期限的重要性。妮迪娅告诉他，她无法这么做，但他们能，他们可以写信给相关的权威机构。这是她避免自己被用作面见总统的信使的方法。小法比奥理解这一点，他用一句鼓舞人心的话向她告别：“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妮迪娅回到波哥大后，阿苏塞娜把迪安娜的信交给了她，信里请妮迪娅和她的孩子们一起过圣诞节。埃罗·布斯打电话催她去卡塔赫纳私下谈一次话。她发现，这个德国人在三个月的囚禁生活之后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这让她对女儿的身体稍稍放心了一些。埃罗·布斯从被绑架的第一周以来就没有见过迪安娜。但是，看守和服务人员之间有持续不断的信息交流，这些信息会被泄露给人质，因此他知道迪安娜很好，唯一严重的、一直迫在眉睫的危险是武装营救的可能性。“您无法想象一直面临着被杀害的风险是何种境况。”埃罗·布斯说，“不只因为警察会来，就像他们说的那样，还因为他们总是心惊胆战，连一点点小声音都会被误认为是一场行动。”他唯一的建议是不计一切代价阻止武装营救，并争取更改法令规定的投降期限。

回到波哥大当天，妮迪娅向司法部表达了她的不安。在儿子胡里奥·塞萨尔·图尔巴伊·金特罗议员的陪同下，她拜访了国防部长奥斯卡·博特罗将军。她以所有被绑架者的名义焦急地请求他利用好情报机构，而不要采取营救行动。身心消耗让她头晕目眩，悲剧的直觉变得越来越明晰。她的心很痛，一直在哭泣。她尽最大的努力控制自己，但是坏消息让她喘不过气。通过广播，她听到了“可被引渡者”的口信，他们威胁说，如果不修改第二部法令的条款，他们会把被绑架者的尸体装在麻袋里，抛到总统府前。妮迪娅极其绝望地给共和国总统打电话。但当时他人在安全委员会，因此拉法埃尔·帕尔多接了电话。

“我恳求您问一问总统和安全委员会的人，是不是得等到人质被杀了装到麻袋里扔到门口，他们才会修改法令。”

几个小时后，她依然很激动，当面请求总统更改法令的期限。总统已经听说了妮迪娅抱怨他面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消息，因此他努力表现得耐心，尽量表达清晰。他说，3030号法令刚刚颁布，至少

应该给它时间，看它表现如何。但是妮迪娅认为，总统的说法不过是为他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做该做的事而找借口。

“改变最后期限不仅是为了拯救人质的生命，”妮迪娅已经厌倦了讲理，反驳道，“也是让恐怖分子投降唯一欠缺的条件。请您改变期限吧，这样他们就会把迪安娜还给我们。”

加维里亚没有让步。他已经确信，固定期限是投降政策最大的绊脚石，但是他拒绝更改期限，这样“可被引渡者”就无法通过绑架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制宪议会将在不确定的期望中集合起来，他们不会允许因政府的软弱而赦免贩毒贸易。“民主不会因为四名总统候选人被谋杀或因为某件绑架案而岌岌可危。”后来，加维里亚这么说，“存在着诱惑、风险或者可能正在发酵的谣言的时候，才是民主真正岌岌可危之时。”也就是说：制宪议会的意识也被令人难以置信的风险绑架了。加维里亚已经决定了：如果这发生了，他会冷静坚决地决定让制宪议会解散。

从某一刻起，妮迪娅就想让图尔巴伊博士做些震撼全国的事来支持被绑架者：组织总统府前的群众游行、公民罢工、在联合国的正式抗议。但是，图尔巴伊博士让她冷静了下来。“他总是这样，因为他有责任感和自制力。”妮迪娅说，“但是，我们知道，在内心深处他痛苦得要死。”这种了解并没有让她松一口气，反而增加了她的焦虑。就是在那时，她决定给共和国总统写一封私信，这封信“会让他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方面采取行动”。

古斯塔沃·巴尔卡萨尔博士为妻子妮迪娅的精神衰弱感到担忧。一月二十四日，他说服她一起去塔比奥的房子（位于一小时车程外的波哥大草原）里住几天，减轻焦虑。自从女儿被绑架之后，她就没有回

过那里，她带上了圣母半身像和两支大蜡烛，每支可以用十五天。她还带了所有她可能需要的东西，以免与现实脱离联系。她在草原上度过了漫长寒冷的一夜，跪着请求圣母用刀枪不入的玻璃罩来保护迪安娜，让大家都尊重她，让她不觉得害怕，把打向她的子弹弹回。凌晨五点，在一个短暂而混乱的梦之后，她开始在餐桌上给共和国总统写一封发自肺腑的信。她胡乱地记录转瞬即逝的想法，一直到天明时分，她哭泣着，不停地哭着撕碎草稿，又在泪海里把稿子誊清。

与她自己预想的相反，她在写一封最慎重、最激进的信。“我不想写一份公文，”她起笔写道，“我想写给我国总统，凭借我理应得到的尊重，我请您做适当的反思，同时我痛苦但理智地向您恳求。”尽管总统反复保证绝不会通过武装行动解救迪安娜，但妮迪娅为一次富有远见的恳求留下了书面证据：“如果警察搜查民宅时碰上了被绑架者，可能会酿成可怕的悲剧。这一点国家明白，你们也明白。”妮迪娅坚信，第二部法令中的障碍中断了“可被引渡者”在圣诞节前发起的释放行动，她带着全新的、清醒的恐惧警告总统：如果政府不立即做出决定清理障碍，人质们将会面临该议题落入制宪议会之手的风险。“这将使我们这些家属和整个国家遭受的痛苦和忧虑延长无数个月份。”她写道。她用高雅的敬辞结尾：“出于我的信仰，出于我对您作为国家元首的敬意，我无法向您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我想向您恳求，在保护无辜的性命时，不要轻视时间所意味的危险。”写完草稿，用好看的字体誊抄后，内容共占二又四分之一页稿纸。妮迪娅在总统府的私人秘书处留下了口信，并说明了应该把信寄到哪里。

当天上午，随着普里斯科集团头目死亡的消息传开，动荡加剧了，该集团的头目是大卫·里卡尔多和阿尔曼多·阿尔贝托·普里斯科·洛佩拉两兄弟。他们因为当年刺杀了七位要人并策划了绑架案而被指

控，其中包括迪安娜·图尔巴伊和她小组的绑架案。兄弟中的一人以伪造的弗朗西斯科·穆纽斯·塞尔纳的身份死去。但是，当阿苏塞娜·里埃瓦诺在报纸上看到照片的时候，她认出了那是堂帕丘，是在囚禁期间负责迪安娜和她的人。在那个混乱的时刻，他和他兄弟的死对于埃斯科瓦尔来说是难以弥补的损失，埃斯科瓦尔很快就用行动说明了这一点。

“可被引渡者”在一封威胁性的公告中指出，大卫·里卡尔多不是在战斗中死去的，而是在他年幼的孩子和有孕在身的妻子面前被警察折磨致死。至于他的兄弟阿尔曼多，公告肯定，他也不是警方所说的在战斗中死去，而是在里奥内格罗的一个农庄被杀害的，而他在之前的一次袭击中已经瘫痪了。公告说，在当地的电视新闻栏目上可以清楚地看见轮椅。

这就是看守向帕丘·桑托斯谈起的公告。一月二十五日，他们宣布将每八天处死两名人质，第一个命令已经针对玛丽娜·蒙托亚发布了。这个消息令人震惊，因为人们以为玛丽娜·蒙托亚在去年九月份被绑架的时候就已经被杀害了。

“当我向总统传达他们将把人质的尸体装进麻袋的消息的时候，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妮迪娅在回忆起那糟糕的一天时说，“并非是我冲动或者脾气暴，我也不需要心理治疗。他们要杀死的人是我的女儿，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打动能够阻止这件事的人吧。”

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绝望极了。“那是我生命中最可怕的一天。”他当时说，他确信行刑在即。会是谁呢：迪安娜、帕丘、玛露哈、贝阿特利丝还是理查德？那是一场根本无法想象的死亡抽签。他愤怒地给加维里亚总统打电话。

“您得停手。”他告诉他。

“不，阿尔贝托，”加维里亚冷静得令人不寒而栗，“人民不是为了这个选我的。”

比亚米萨尔挂断电话，被自己的冲动打乱了思路。“现在我该怎么办？”他想。首先，他向前总统阿丰索·洛佩斯·米切尔森、前总统米萨埃尔·帕斯特拉纳和佩雷拉的主教达里奥·卡斯特利翁求助。他们都公开抨击了“可被引渡者”的做法，并要求保障人质的生命安全。洛佩斯·米切尔森通过国家广播电视台呼吁政府和埃斯科瓦尔停止战争，寻求政治解决方法。

当时，悲剧已经发生了。一月二十二日零点前的几分钟，迪安娜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快五个月了，只有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写道，“我不想失去安然无恙回家的信念和希望。”

她不再孤单一人。在阿苏塞娜和奥兰多被释放之后，她要求和理查德团聚。圣诞节过后，要求被满足了。对他们俩来说，这都是幸运的。他们聊天聊到筋疲力尽，收听广播一直到黎明，就这样养成了白天睡觉晚上活动的习惯。他们通过看守们的对话得知了普里斯科集团成员的死讯。一个看守哭了，另一个坚信这就是结局，问：“现在我们怎么处置货物？”毫无疑问，他指的是被绑架者。正在哭泣的看守不假思索。

“了结他们。”他说。

早饭过后，迪安娜和理查德无法入睡。几天前，他们已经被告知换房子的事。他们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在他们共处的短短一个月里，已经两次被转移到附近的庇护点，因为看守们预见到了警方真正的，

或是假想的进攻。二十五日上午快到十一点的时候，迪安娜和理查德在她的房间里小声讨论看守们的对话，这时他们听见了从麦德林飞来的直升机的声音。

最近几天，警方的情报机构接到了举报科帕卡瓦那市萨瓦内塔区（尤其是在阿尔托·德·拉·克鲁兹、比亚·德尔·罗萨里奥和拉·波拉）武装人员行动的数个匿名来电。也许迪安娜和理查德的看守们计划将他们转移到阿尔托·德·拉·克鲁兹，那是最安全的农场，位于地势陡峭、林木茂盛的山顶上，从那里可以俯视整个谷地，视线一直通往麦德林。由于电话检举和其他特别的征兆，警方几乎要搜查民宅了。他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出动了两名上尉、九名军官、七名士官和九十九名特工，一部分人在地面行动，另一部分人在四架带有航炮的直升机上行动。然而，看守们已经不再理会直升机了，因为它们时常经过，但什么事也没有。突然，一名看守探出门外，发出了可怕的叫喊声：

“警察来了！”

迪安娜和理查德故意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因为当时正是警察到来的有利时机：那四名看守是态度最不强硬的，而且他们看起来害怕得甚至无法自卫。迪安娜刷了牙，穿上了她前一天洗干净的白衬衣、运动鞋和被绑架那天穿的牛仔裤。由于体重下降，牛仔裤变得特别宽松。理查德换了衬衣，拿起了他们前几天还给他的摄影装备。直升机从房子上空飞过，向谷地驶去，然后贴着树木返回。它越来越大的轰鸣声似乎让看守们失去了理智。看守们大声催促着被绑架者，把他们推向门口，给了他们两顶白色的帽子，好让空中的警察错认为他们是当地的农民。他们扔给迪安娜一条黑色的披肩，理查德穿上了他的皮衣。看守们命令他们朝山的方向跑，自己也朝那个方向跑去。看守们

带着武器，好在直升机处于射击范围内的时候开枪。迪安娜和理查德开始沿着一条布满石块的小路往上爬。山坡非常陡峭，灼热的太阳从空中垂直照射下来。当直升机出现时，迪安娜走了几米后觉得筋疲力尽。第一阵扫射过后，理查德躺在地上。“您别动，”迪安娜冲他喊道，“装死。”她立马趴倒在了他的身边。

“我中弹了！”她大喊，“我的腿动不了了。”

的确动不了，但是她没有感觉到疼痛。她让理查德帮她检查后背，因为摔倒之前她在腰上感觉到了一阵电击。理查德掀起了她的衣服，在左侧的髂嵴处看到了一个清晰可见的小洞，但没有出血。

射击还在继续，而且越来越近，迪安娜绝望地坚持让理查德把她留在那儿，自己逃走。但是他一直在她身边等待救援，好让她脱离危险。与此同时，她把一直放在口袋里的圣母像握在手里祈祷。射击声突然停止了，两名精英部队的警员拿着武器出现在小路上。

理查德跪在迪安娜旁边举起双手，说：“别开枪！”其中的一名警察惊讶地看着他，问他：

“巴勃罗在哪里？”

“我不知道，”理查德说，“我是理查德·贝塞拉，是个记者。这是迪安娜·图尔巴伊，她受伤了。”

“请您证实一下。”警察说。

理查德向他出示了身份证。迪安娜被安置在一张垫着床单的临时吊床上。他们和草丛里走出的几个农民一起把她送进直升机，让她躺

好。疼痛变得难以忍受，但她依然很冷静、很清醒。她知道自己快死了。

半个小时后，前总统图尔巴伊接到了军方的来电，得到通知，精英部队在麦德林的一次行动中救出了他的女儿迪安娜和弗朗西斯科·桑托斯。他立刻给埃尔南多·桑托斯打电话，埃尔南多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他命令报社的话务员把这个消息告知给分散在各地的所有亲人。接着，他给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的公寓打电话，把得知的消息重新传达了一遍。“太好了！”比亚米萨尔喊道。他的快乐是真诚的，但是他马上意识到，一旦帕丘和迪安娜被解救，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将变成埃斯科瓦尔手里唯一能行刑的目标。

他拨打紧急电话的时候打开了收音机，这一事件的新闻还没有播出。他正要给拉法埃尔·帕尔多打电话时，电话铃再次响起。还是埃尔南多·桑托斯打来的，他在电话里气馁地说，图尔巴伊纠正了上一条消息：被解救的人不是弗朗西斯科·桑托斯，而是摄影师理查德·贝塞拉。迪安娜受了重伤。然而，这个错误并没有令埃尔南多·桑托斯感到特别烦恼，反倒是图尔巴伊因为让他空欢喜一场而感到十分沮丧。

当新闻栏目的人打电话给玛尔塔·露贝·洛哈斯，通知她儿子理查德已经被释放时，她并不在家，而是去了她兄弟的家里。她非常关注新闻，甚至随身携带便携式收音机。但就在那天，自绑架案发生以来，收音机第一次坏了。

当有人告诉她，她的儿子安全了以后，她坐上一辆出租车，去了新闻编辑部。在车上，胡安·戈萨音记者熟悉的声音让她回到了现实：来自麦德林的消息依然非常混乱。已经确定了迪安娜·图尔巴伊死亡的消息，但是关于理查德·贝塞拉的消息依然不明朗。玛尔塔·露贝开始低

声祷告:“我的上帝，让子弹从他身边飞过，而不要碰到他。”此时，为了给她报平安，理查德从麦德林给家里打电话，但没有找到她。戈萨音激动的叫喊声让玛尔塔·露贝回过神来。

“号外！号外！理查德·贝塞拉还活着！”

玛尔塔·露贝哭了起来，一直到深夜在《氪》新闻栏目编辑部接到她儿子的时候，她仍无法控制住自己。她至今记得:“他瘦得只剩皮包骨，脸色苍白，满脸胡须，但他还活着。”

几分钟前，拉法埃尔·帕尔多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到了一位记者朋友的电话，询问营救的实情。他这才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先后给玛萨·马尔克斯将军和警察局长戈麦斯·帕蒂亚将军打了电话，他们都对营救行动一无所知。过了一会儿，戈麦斯·帕蒂亚给他回了电话，告诉他那是精英部队在寻找埃斯科瓦尔行动中的意外发现。他说，行动之前他们完全不知道那个地方会有绑匪。

图尔巴伊博士接到来自麦德林的消息之后，一直试图与在塔比奥家中的妮迪娅取得联系，但是没有人接电话。他派卫队队长驱车前去传达迪安娜已经获救、正在麦德林的医院接受常规检查的消息。下午两点，妮迪娅收到了这个消息。她没有像她的家人一样高兴地尖叫，而是痛苦而惊愕地大喊道:

“他们杀了迪安娜！”

在返回波哥大的路上，她收听着电台的新闻，感到一切越来越不确定。“我一直在哭，”她后来说，“但当时的哭声已经不像之前一样声嘶力竭了，我只是流着眼泪。”去机场前，她先回家换了衣服。一架老掉牙的福克总统专机在机场等候他们一家人，在近三十年的义务劳动

后，它依然因神赐的恩慈而翱翔天际。当时的消息是迪安娜正处于密切的监护之下，但是妮迪娅除了自己的直觉之外不相信任何人。她径直向电话走去，要求和共和国总统通话。

“迪安娜被杀了，总统先生。”她说，“这是您的杰作，是您的错，是您的铁石心肠造成的结果。”

总统很高兴能用一条好消息反驳她。

“不，女士。”他愈发冷静地说，“似乎是进行了一次行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但是迪安娜还活着。”

“不，”妮迪娅否定道，“她死了。”

总统与麦德林方面有直接的联系，他毫不怀疑自己的判断。

“您怎么会知道？”

妮迪娅以她绝对的信念回答：

“因为我的慈母心是这么告诉我的。”

她的心是对的。一个小时后，驻麦德林的总统顾问玛丽亚·爱玛·梅希亚登上了图尔巴伊一家乘坐的飞机，给他们带去了坏消息。在数小时的医治之后，迪安娜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在飞往麦德林的直升机上，她就已经失去了意识，而且再也没有恢复。一颗子弹打断了她的腰椎。那是一颗高速飞行的中等直径爆炸性子弹，在她的体内炸成了碎片，造成了无法恢复的全身瘫痪。

妮迪娅在医院里见到迪安娜的时候，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迪安娜赤裸地躺在手术台上，身上盖着一张沾满血迹的床单，她面无表情，由于大量失血而肤色苍白。她的胸部有一道巨大的手术切口，因为医生们要从那里伸进拳头，按压心脏。

妮迪娅已经出离痛苦和绝望了，她刚从手术室里出来，就在医院里召集了一场激烈的新闻发布会。“这就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她开场说。她坚信，迪安娜是一场受波哥大指挥的行动的受害者（根据她到达麦德林之后得到的情报），她详细列举了她的家人以及她本人向共和国总统做出的恳求，他们希望警方不要采取行动。她说荒谬至极、罪行累累的“可被引渡者”是害死她女儿的罪人，但是政府和共和国总统本人也承担着一样的罪责，尤其是总统。“他冷漠无情，无动于衷，不理睬人们向他的恳求，这才导致被绑架者被强行救援，令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

这一决绝的声明在所有媒体上直播，引发了舆论的一致回应和政府部门的愤怒。总统召集了秘书长法比奥·比耶加斯、私人秘书米盖尔·席尔瓦、安全顾问拉法埃尔·帕尔多和新闻顾问毛里西奥·巴尔加斯，他们本来想制订一个强烈反对妮迪娅声明的计划。但是深刻的反思让他们得出了结论：母亲的痛苦无法辩驳。加维里亚也是这么理解的。他放弃了会议原有的意图，命令道：

“我们去参加葬礼吧。”

不仅是他，还有全体政府人员。

妮迪娅的仇恨没有饶过总统。她和某个他记不清名字的人一起，给他寄去了一封晚到的信（当时他已知道迪安娜已经去世），也许是

为了让他时刻记得她预见未来的能力。“显然，我不指望您会回信。”她说。

追思弥撒在主教座堂举行，当天，教堂里少见地人头攒动。弥撒结束时，总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摄影师的闪光灯下，在电视节目的摄像镜头下，独自一人穿过空旷的中殿，向妮迪娅伸出了手，他相信她会回应的。妮迪娅勉强地、极其冷漠地伸出手。事实上，她松了一口气，因为她害怕总统会拥抱她。相反，她欣然接受了总统夫人安娜·米莱娜的哀悼亲吻。

事情还没有结束。刚从哀悼的任务中解脱，妮迪娅又一次申请面见总统，让他在当天发表关于迪安娜死亡的讲话之前，知道他应该知道的重要消息。席尔瓦一字不差地传达了她的要求，总统露出了妮迪娅再也没见过的微笑。

“她来是为了掏空我。”他说，“但当然了，让她来吧。”

他像往常一样接见了她，而妮迪娅走进办公室，一身黑衣，态度与往常相去甚远：简单而痛苦。她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让总统明白她的来意。

“我是来帮忙的。”

让人吃惊的是，她开始向总统道歉，之前她误以为是总统指挥了导致迪安娜惨死的行动。现在，她明白总统对此也并不知情。她还想告诉他，他们骗了她，那次行动也不是为了寻找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而是为了救出人质。人质的关押地点在警方严刑拷打一名被捕的杀手之后水落石出。妮迪娅解释说，那名杀手之后被当作是战死人员。

她激动而清晰地讲述着，希望能激发总统的兴趣，但是她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同情的表露。“他就像一块冰。”后来，她回忆起那一天时如此评价道。她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无法避免地哭了起来。于是，她之前控制住的脾气又重新上来了，彻底地改变了话题和说话的方式。她指责总统的无动于衷和冷漠无情，批评他没有履行宪法规定的拯救被绑架者的义务。

“请您想想，”她最后说道，“如果是您的女儿处于这样的情境中，您会怎么做？”

她直视他的双眼，但是她太激动了，总统没法打断她。后来，他本人说：“她向我提问，但是不给我时间回答。”妮迪娅确实用另一个问题打断了他：“总统先生，您不认为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错了吗？”总统第一次表现出了犹豫。“我从来没有那么难受过。”几年后，他说。但是，他当时只是眨了眨眼，用他自然的嗓音说：

“有可能。”

妮迪娅站了起来，安静地跟他握手，在他给她开门之前离开了办公室。当时，米盖尔·席尔瓦走进了办公室，发现总统被杀手死去的消息震惊了。加维里亚立即给总检察长写了一封私信，让他调查此事，秉公处理。

大部分人都相信那次行动是为了抓捕埃斯科瓦尔或是某位重要的头目。但是，甚至在这个逻辑里，这都是一桩蠢事，是无法挽回的失败行动。根据警方即刻提供的说法，迪安娜死于一场地空配合的搜捕行动。他们并没有要找到绑架迪安娜·图尔巴伊和摄影师理查德·贝塞拉的团伙的打算。在逃跑过程中，一名绑匪朝迪安娜的后背打了一枪，

致使她的脊柱骨折。摄影师安全脱险。迪安娜乘坐警方的直升机被转移到麦德林总院，下午四点三十五分在医院死亡。

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提供的版本则完全不同，其中的要点和妮迪娅向总统讲述的版本不谋而合。他说，警方是在明确地知道被绑架者就在此处的前提下展开行动的。人质信息是在严刑拷打两名杀手之后获取的，他还提供了两名杀手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公告说，这两名杀手被警方捕获，并遭到严刑拷打，其中一名还在直升机上给那次行动的长官指路。还说，迪安娜已经逃脱了追捕，是在逃离战场时被警方杀死的。最后，他还指出，战斗中还有三名无辜的农民被杀，警方却告诉媒体他们是在战斗中死亡的杀手。这封公告应该让埃斯科瓦尔感到非常满意，他一直盼望揭发警方犯下的违反人权的行为。

理查德·贝塞拉是唯一的目击者，在悲剧发生的当晚，他在波哥大警察总局大厅被记者们团团围住。他依然穿着被绑架时穿的黑色皮衣，戴着绑架者递给他用来冒充农民的帽子。他的情绪状态并不适合给出任何表述清楚的证词。

当时情况一片混乱，他无法把它们汇总成新闻观点，这是留给最能体谅他的同事的印象。他声称，杀死迪安娜的那颗子弹是由一名绑匪故意射出的，但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尽管有各种猜测，但普遍认为迪安娜是意外死于双方交火中的。不过，最终的调查由总检察长负责。在妮迪娅·金特罗来过之后，加维里亚总统给总检察长寄了一封信。

闹剧还没有结束。面对公众不确定玛丽娜·蒙托亚死活的状况，“可被引渡者”于一月三十日发布了一封新的公告，他们在公告中承认，他们在二十三日发出了处决她的命令。但是：“由于保密和通信

原因，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得知她被处死了还是被释放了。如果她被处决了，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警方没有找到她的尸体。如果她被释放了，她的家属有发言权。”于是，在下令谋杀的七天之后，寻找尸体的行动才开始。

参与解剖的法医佩德罗·莫拉莱斯在报纸上读到了这封公告，他认为那位穿着高级内衣、有着考究指甲的女士就是玛丽娜·蒙托亚。确实如此。然而，身份刚被确认，某个自称司法部官员的人就给法医研究所打电话施压，不让他们把尸体在公共墓穴里的消息公之于众。

电台播放这则新闻的时候，玛丽娜的儿子路易斯·吉耶尔摩·佩雷斯·蒙托亚正要去吃午饭。法医研究所向他展示了被子弹打得面目全非的女人的照片，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认出她。由于新闻已经播出，警方得在城南墓园准备特殊的警用装置，为路易斯·吉耶尔摩·佩雷斯开路，让他在一群好奇群众的包围下到达墓穴。

根据法医规定，无名尸体被埋葬时，背上、手臂和腿上必须被印上序列号，这样就算尸体被肢解也依然能被认出来；尸体须被类似垃圾袋材质的黑色塑料布包裹起来，脚踝和手腕处须用牢固的绳子系紧。玛丽娜·蒙托亚的尸体（据她儿子证实说）全身赤裸，沾满了烂泥，被随意地扔在公共墓穴里，也没有法律规定的身份刺青。她旁边是与她同时下葬的孩子的尸体，包裹着粉色的汗衫。

到了解剖室，在玛丽娜被高压水管清洗完后，儿子检查了她的牙齿，迟疑了片刻。他似乎想起了玛丽娜没有左上臼齿，而这具尸体的牙齿是完整的。但是，当检查双手的时候，他把她的手放到自己的手上，就打消了疑虑：两人的手一模一样。他一定坚持怀疑着另一件事，也许会永远坚持着：路易斯·吉耶尔摩坚信，发现尸体的时候，其

身份已经被确认了；但为了避免舆论骚动或是扰乱政府事务，尸体没有经过任何手续就被送到了公共墓穴。

迪安娜的死（在发现玛丽娜的尸体之前）对国家状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加维里亚拒绝修改第二部法令时，比亚米萨尔的强硬态度和妮迪娅的恳求都没有使他让步。他的依据，一言以蔽之，是法令的合理与否不能根据绑架案的进展来评判，而应该根据公众的利益来评判，因为埃斯科瓦尔不是为了迫使政府投降，而是为了强行达到不被引渡和得到赦免的目的而绑架人质。种种考量导向了法案最终修订版的成形。在抵御了妮迪娅的恳求和众多他人的痛苦之后，更改日期是非常艰难的，但他决定面对困难。

比亚米萨尔通过拉法埃尔·帕尔多听说了这个消息。等待的时间对他来说是极其漫长的，他没有片刻的安宁。他密切关注着广播和电话，如果没有听到坏消息，他会大松一口气。他随时都会给帕尔多打电话。“事情怎么样了？”他问，“情况到什么地步了？”帕尔多会用一点理性精神让他冷静下来。每天晚上回家时他都是一样的状态。“得赶紧把这部法令弄出来，不然他们会把大家全杀了。”他一直这么说，帕尔多一直安慰他。终于，一月二十八日，帕尔多打电话告诉他，法令的最终版本在等着总统签字。由于所有的部长都得签字，可他们找不到通讯部部长阿尔贝托·卡萨斯·桑塔玛利亚，所以法令被耽误了。最后，拉法埃尔·帕尔多打通了他的电话，并用老朋友的温和态度胁迫他。

“部长先生，”帕尔多告诉他，“您要么半个小时内在法令上签字，要么您就不再是部长了。”

一月二十九日，303号法令颁布了，该法令清理了此前阻碍毒贩投降的所有障碍。正如政府事先预想的，他们永远无法让公众相信这是由于他们愧对迪安娜而采取的行动。跟往常一样，这引发了另外的分歧：一些人认为这是迫于哗然舆论的压力而向毒贩让步的行为；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总统授意行为，虽然已经晚了，但无论如何是为了迪安娜·图尔巴伊。不管怎样，加维里亚总统明知延迟可能会被解读为冷酷无情的表现，且迟到的决定会被认为是软弱的证明，但他还是坚定地签署了这部法令。

第二天早上七点，总统给比亚米萨尔回了一个电话。法令颁布前夜，比亚米萨尔曾打电话给总统，对他表示感激。加维里亚在绝对的沉默中听他讲了种种缘由，并与他分担了一月二十五日那天的痛苦。

“对于所有人来说，那都是可怕的一天。”总统说。

于是，比亚米萨尔松了一口气，他给基多·帕拉打电话。“您现在他妈的可别说这部法令不行。”他说。基多·帕拉已经深度研读过法令了。

“好了，”他说，“没有任何问题。您看，要是早这样咱们能少多少麻烦！”

比亚米萨尔想知道下一步怎么做。

“什么都不用做，”基多·帕拉说，“四十八小时之内就会有进展。”

“可被引渡者”立刻发布通告宣布，鉴于国内数位重要人物的要求，他们将终止之前进行的行刑活动。这里的“数位重要人物的要求”也许是指洛佩斯·米切尔森、帕斯特拉纳和卡斯特利翁向他们传达

的电台信息。但是，这本质上可以解读为他们对法令的认可。“我们将尊重我们手中仍握有的人质的性命。”公告说。作为特殊的让步，他们还宣布，当天，他们将马上释放一名人质。比亚米萨尔正和基多·帕拉在一起，他大吃一惊。

“怎么就一个？”比亚米萨尔大吼道，“您说过所有人都会出来。”

基多·帕拉面不改色。

“放心，阿尔贝托，”他说，“就是一礼拜的事。”

七

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还没有得知玛丽娜和迪安娜的死讯。她们既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除了绑匪提供的消息之外没有别的信息，不可能猜出真相。看守们自相矛盾的说法使得玛丽娜被带去某个农庄的说法站不住脚，因此任意一种猜测都会陷入同样的绝境：她要么自由了，要么死了。也就是说：过去她们是唯一知道她还活着的人，现在她们是唯一不知道她已经死去的人。

由于不确定他们对玛丽娜所做的事情，唯一的床变成了一个幽灵。她被带走半个小时之后，“和尚”就回来了。他像影子一样走进来，蜷缩在角落里。贝阿特利丝直截了当地问他：

“你们对玛丽娜做了什么？”

“和尚”告诉她，当他和她一起出去的时候，两个没有进屋的新首领已经在车库里等他了。他问他们要把她带去哪里，其中一人生气地说：“婊子养的，不许提问。”后来，他们命令他回到房子里，让另一个值班看守巴拉巴斯看管玛丽娜。

这个说法听来非常可信。如果“和尚”参与了犯罪，他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来回，而且他也不忍心杀死一个衰微的女人，他看起来像爱自己的奶奶一样爱她，而她也像宠爱孙子一样爱他。相反，巴拉巴斯是出名的嗜血狂人，他冷酷无情，而且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感到非常得意。疑惑在清晨时变得更加让人不安，当时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

仿佛是受伤动物的哭声吵醒，那是“和尚”的抽泣声。他不想吃早饭，好几次都感叹：“他们把奶奶带走是多么让人心痛啊！”然而，他从来没有让人觉得她已经死了。“管家”固执地拒绝把电视机和收音机还给她们，这也更让她们怀疑玛丽娜被杀了。

离家几天后，妲玛莉丝心事重重地回来了，这种情绪使困惑的气氛更加复杂。在清晨的某次散步中，玛露哈问她去了哪里，她回答的语气仿佛是在说真话：“我在照顾玛丽娜女士。”她没有给玛露哈思考的时间，又补充说：“她一直记得你们，经常询问你们的情况。”紧接着，她用更加随意的语气说，因为巴拉巴斯负责玛丽娜的安全，所以还没有回来。从那时起，妲玛莉丝每次因为某种理由上街都会带回消息，这些消息越是热情洋溢越显得不可信。所有的信息都有个仪式性的结尾格式：

“玛丽娜女士好极了。”

跟“和尚”或是任何一名看守相比，玛露哈没有理由更相信妲玛莉丝，但是，在一切事情看起来都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她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如果玛丽娜真的活着，他们没有理由不让人质们接收新闻和娱乐消息，仅有的可能是为了向她们隐瞒其他更糟糕的事实。

对于玛露哈不服管束的想象力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合情理的。此前，她一直向贝阿特利丝隐瞒自己的不安，害怕她无法承受真相。而贝阿特利丝远离了所有的污染。从一开始，她就拒绝任何关于玛丽娜已经死去的怀疑。她的梦境帮助了她，她梦见她的哥哥阿尔贝托，就像他真的来到她身边一样，向她及时汇报了他们的行动，说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她们离获救就差一点了。她梦见父亲安慰她说，她忘在手

提包里的信用卡很安全。这些景象是如此生动，以至于她无法将这些回忆同现实区分开来。

那几天，一个叫霍纳斯的十七岁男孩即将结束对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的监管。他从早上七点就开始用一台音质浑浊的录音机听音乐。他用震耳欲聋的音量重复播放他最喜欢的音乐，一直放到录音机没电。同时，他合着副歌大声喝道："生活啊，你这个婊子养的混账东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掺和进来。"在安静的时候，他会跟贝阿特利丝谈起自己的家人。但是每次走到深渊边缘，他只会发出高深莫测的叹息："如果你们知道我爸爸是谁就好了！"他从来没有说过他父亲是谁，而看守们的种种谜题让房间的氛围变得更加古怪了。

"管家"负责众人的饮食起居，他大概是向他的首领们汇报了笼罩房间的不安状态，因为那几天，来了两名前来调解矛盾的首领。他们又一次拒绝归还收音机和电视机，但是试图改善她们的日常生活条件。他们承诺可以带书来，但是数量很少，其中有一本科林·特亚多的小说。她们拿到了几本娱乐杂志，但是没有一本是时新的。他们在之前装蓝灯泡的位置换上了一个大灯泡，并下令在早晨七点和晚上七点各开一个小时，让她们可以阅读。但贝阿特利丝和玛露哈已经习惯了黑暗，无法忍受强光。此外，灯光让房间变得闷热，甚至让空气变得令人窒息。

玛露哈失去了希望，任凭怠惰支配她的行为。她从早到晚都在床垫上装睡，脸朝墙壁，尽量不说话，饭也几乎不吃。贝阿特利丝占着空床，在杂志的填字游戏和谜语里寻找慰藉。事实是残酷而令人痛苦的：在这个房间里，四个人比五个人占的空间更小，少了逼仄感，也有了更多呼吸的空气。但这就是事实。

一月底，霍纳斯值班结束，向人质们告别时，透露了一条可靠的消息。“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但不准说出去这是谁说的。”他警告说。接着，他说出了那个侵蚀他内心的消息：

“迪安娜·图尔巴伊女士被杀了。”

这个打击把她们惊醒了。对玛露哈来说，那是囚禁生活中最糟糕的时刻。贝阿特利丝尽量不去想她认为无法避免的事：“如果他们杀死了迪安娜，下一个就是我。”总之，旧的一年过去了，她们没有被释放。从一月一日开始，她就告诉自己：“要么放了我，要么我就去死。”

一天，当玛露哈和一名看守玩多米诺骨牌的时候，“猩猩”用食指按压自己胸部不同的位置，说：“我觉得这儿特别难受，会是什么呢？”玛露哈停下了牌局，极其不屑地看着他说：“要么是胀气，要么是梗塞。”机关枪从他手里掉到了地上，他害怕地站了起来，五指张开放在胸前，大声地惨叫：

“我的心脏疼！他妈的！”

他突然头朝下倒在了早餐的餐具上。贝阿特利丝知道他讨厌她，但她有种救助他的职业冲动。此时，“管家”和他的妻子走了进来，被叫喊声和摔倒的动静吓坏了。另一个看守身材很小，虚弱无力，他想做点什么，但是机关枪让他行动不便，于是他把枪递给了贝阿特利丝。

“替我照看好玛露哈女士。”他对她说。

他、“管家”和妲玛莉丝三人合力都没有办法把摔倒的人扛起来。他们用尽力气抓住他，把他拖到客厅。贝阿特利丝拿着机关枪，而玛露哈错愕地看着另一个看守把枪扔在了地上。她们两个都因为同样的诱惑而颤抖着。玛露哈知道如何用左轮手枪射击，有一次别人还教过她怎么使用机关枪，但是一阵天赐的清醒阻止了她捡起那支枪的冲动。贝阿特利丝对军事操练很熟悉，她接受过五年每周两次的训练，当过少尉和中尉，并在军队医院中得到了荣誉上尉的军衔，她还曾学过炮击课程。然而，她也意识到她们全无胜算。她们俩用“猩猩”再也不会回来的想法互相安慰。确实，他没有再回来。

帕丘·桑托斯从电视里看到了迪安娜的葬礼和挖掘玛丽娜·蒙托亚尸体的场景，他意识到他唯一的选择是逃跑。当时，他已经大致猜想到他在哪里。利用看守们的对话内容和疏忽大意，以及作为记者的本领，他推断自己身处波哥大西部某个人口众多的大型街区，他所在的房子位于某个街角。他的房间是二楼的主卧，窗户外侧被木条封死了。他意识到那是一栋出租房，或许没有合法的合同，因为女房东每月初都会来收租金，她是唯一进出房子的局外人。在给她开门前，他们会把帕丘锁在床边，胁迫他不要发出任何声音，还会关掉收音机和电视机。

他已经推断出房间内被封死的窗户朝向花园前庭，房间在狭窄的走廊尽头，卫生间也在那里。他可以不受监视地穿过走廊随意使用卫生间，但他得提前要求他们给他解锁。卫生间唯一的通风设施是一扇可以看见天空的窗户。窗户非常高，很难够到，但是窗户的宽度足以让他从那里出去。当时，他不知道这扇窗户通向哪里。隔壁房间用红色金属分成了几个隔间，睡着不值班的看守。他们共有四个人，每隔

六个小时就换两个人值班。虽然他们一直把武器带在身边，但平常看不见它们。只有一名看守在双人床边打地铺。

他推断附近有一家工厂，因为每天能听到数次工厂的汽笛声。通过每天的合唱声和课间的嘈杂声，他知道附近有一所学校。有一次，他点了一份比萨，五分钟内就送来了，还是热乎乎的。就这样，他发现比萨是在同一个街区里制作售卖的。可以确信，他们在街对面的一家大商店里买报纸，因为那里还卖《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晚上，面包店里刚刚烘焙好的面包会用香味将他唤醒。他向看守们提出狡猾的问题，得知了方圆一百米内有一家药店、一家汽修店、两家酒馆、一家小旅馆、一家修鞋铺和两个公交站。通过搜集到的各种零碎信息，他试图拼凑起逃亡路线。

一名看守告诉他，如果警察来了，根据命令，他们会提前进屋，直接给他三枪：一枪打在头上，一枪打在心脏，还有一枪打在肝上。从得知这件事开始，他准备了一个一升装的汽水瓶子，把它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好像挥舞锤子一样挥舞它。那是唯一可用的武器。

国际象棋（一名看守凭借出众的天赋学会了下棋）给予他一种衡量时间的新方法。一名十月份值班的看守是电视剧方面的专家，他一开始的恶习是：从不考虑电视剧的质量而只是追剧。其中的秘诀就是不要过多地在意今天的剧情，而是学会想象第二天的剧情可能带来的惊喜。他们一起看阿莱桑德娜的节目，分享广播和电视新闻。

另一名看守在他被绑架的那天拿走了他口袋里的两万比索，但是作为补偿，他承诺带来他要求的一切东西。特别是书：几本米兰·昆德拉的书、《罪与罚》、桑坦德·德·皮拉尔·莫莱诺·德·安海尔将军的自传。他也许是他那一代哥伦比亚人中唯一听说过何塞·玛利亚·巴尔加斯

·比拉的人了。何塞·玛利亚是二十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最有名的哥伦比亚作家，帕丘极其热爱他的书，甚至到了一读就热泪盈眶的程度。他几乎读完了他所有的书，这些书是一名看守从他祖父的藏书中偷来的。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还和另一位看守的母亲保持着有趣的通信，直到他的安全负责人明令禁止，这场通信才告一段落。每日的报纸补充了当日阅读量，他们会在下午给他带去平整的报纸。负责给他送报纸的看守强烈地仇视记者，尤其针对某个知名的电视主持人，当他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看守就会用机关枪指着他。

“我负责免费搞定这一个。”他说。

帕丘从来没有见过首领们。他知道他们偶尔会来，但从来没有上楼到卧室来过。他们在“鞋匠”咖啡馆举行监督会议和工作会议。他反而和看守们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状态下的关系。他们有着掌控生死的权力，但他们一向承认他具有协商某些生活条件的权利。几乎每天，他都会赢得一些条件，或是输掉另一些条件。最后，他甚至赢得了睡觉时不被铐起来的条件，也通过玩莱米斯纸牌游戏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这是个很简单的游戏，要凑三张数字一样的牌和十张顺子，而作弊非常容易。一名从未露面的首领每隔十五天会借给他们十万比索，他们会分掉这笔钱来玩牌，帕丘一直都输。六个月后他们才向他坦白，所有人都作弊了。他赢的那几次，是因为他们不想浇灭他的热情。这都是魔术师的手上把戏。

在新年到来之前，他的生活就是这样。自第一天起，他就预见到了囚禁生活将是漫长的，而他和看守们的关系让他觉得自己尚可以承受绑架的不幸，但是迪安娜和玛丽娜的死击溃了他的乐观态度。过去激励他的那些看守情绪低落地从街上回来。在等待制宪议会宣布引渡和赦免相关内容的时候，一切似乎都停滞了。因此，他相信逃亡是有

可能实现的。但有一个条件：只有当他认为其他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的时候，他才会尝试逃亡。

对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来说，在十二月的幻想破灭之后，前景已经被堵死了。但是，一月底，又传出了即将释放两名人质的传言。这样，前景又被打开了一条缝。当时，她们不知道还剩下几名人质，也不知道有没有新的人质。玛露哈认定被释放的会是贝阿特利丝。二月二日晚上，她们在后院里散步的时候，妲玛莉丝告诉她们自己有同样的猜想。她深信不疑，甚至去市场上买了口红、胭脂、眼影和离开那天要用的其他化妆品。贝阿特利丝脱去了腿毛，免得在最后时刻没有时间。

然而，第二天拜访她们的两名首领没有给出谁会被释放的任何确切信息，事实上连是否会有人被释放都无法确定。很容易注意到他们的级别。他们跟以往的首领完全不同，而且比那些人更善于沟通。他们证实，"可被引渡者"的一封公告宣布将释放两名人质，但有可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阻碍。这让囚犯们想起了会在十二月九日释放她们的承诺，那个诺言也没有兑现。

新来的首领们着手营造乐观的氛围。他们随时会无缘无故吵吵嚷嚷地进屋来。"进行得还算顺利。"他们说。他们带着孩童般的热情讲述当日的新闻，但是拒绝把电视机和收音机还给她们，被绑架者不能直接获悉这些新闻。一天晚上，一名首领出于恶意或是因为愚蠢，在同她们道别时说了一句话，背后的双重含义可把她们吓得要死："放心，女士们，事情很快就结束了。"

之后便是紧张的四天。在这四天里，他们慢慢地给出了零散的新闻碎片。第三天他们说，将只会释放一名人质，可能是贝阿特利丝，

因为他们要留下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和玛露哈，好派更大的用场。对她们来说，最痛苦的事情是无法将这些新闻同外界的新闻做对比。特别是无法同阿尔贝托对证，他也许比那些首领更了解不确定因素背后的真实原因。

终于，二月七日，他们比往常来得更早，并揭晓了谜底：贝阿特利丝可以走了。玛露哈得再等一周。“还差一些小细节。”其中一个蒙面人说。贝阿特利丝对着筋疲力尽的首领们、“管家”和他的妻子，还有看守们唠叨了一阵。玛露哈没有理会，对丈夫无声的怨恨让她伤心，因为她奇怪地认为，她的丈夫更愿意救出妹妹而不是她。整个下午，她都是怨恨的囚徒。这幽怨好几天都没有褪去。

那天晚上，她教贝阿特利丝应该如何将绑架的细节告诉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以及为了大家的安全应该如何掌控这些细节。任何一个错误，无论看起来是多么无辜，都可能会要了人命。因此，贝阿特利丝应该向她哥哥简明、真实地讲述情况，不能轻描淡写也不能过分夸张，别让他毫无触动，也不必令他更加担心：只要说出残酷的真相。不该告诉他任何能判断出她们所在地点的信息。贝阿特利丝有些不满。

“您不相信我哥哥吗？”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信任他，”玛露哈说，“但是这个承诺是我俩之间的，没有其他人。您要向我保证没有人会知道这些信息。”

她的恐惧是有道理的。她了解丈夫冲动的个性，为了他们俩和所有人着想，她想避免他试图凭借警力实施营救。她想让阿尔贝托咨询一下她在服用的心血管药物是否有副作用，这是给他的另一条口信。

在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她们设计了一套在广播和电视中播送加密信息的实用系统。将来，如果书信往来被批准，也可以使用这个系统。然而，在灵魂深处，她在口述遗嘱：她的孩子们、她的古董和一些普通但值得特殊关注的物品该怎么处理。她情绪太过激动，以至于一名听见她说话的看守急忙告诉她：

“放心。您不会有什么事的。”

第二天，她们焦急地等待着，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她们在下午继续交谈。终于，晚上七点，房门突然被打开了，两名熟悉的首领和一名新首领走了进来，他们走到贝阿特利丝面前：

“我们是为您来的，准备一下。”

玛丽娜被带走的那个夜晚骇人地重演了，这把贝阿特利丝吓坏了：同一扇门被打开，同样一句可被解读为获得自由或走向死亡的话语，关于命运的同样谜题。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对玛丽娜和她说：“我们为您而来。”而不是她渴望听到的：“我们会放了您。”她试图狡猾地引出答案，她问：

“你们会把我和玛丽娜一起放了吗？”

两个首领生气了。

“别提问题！”其中一个首领用粗暴的声音回答，“我怎么知道这种事！”

另一个首领更会说话，他最后说：

“这和另一件事没有关系。这是政治问题。”

贝阿特利丝渴望的词——释放——没有被说出来，但氛围是鼓舞人心的。首领们并不着急。妲玛莉丝穿着学生短裙，给他们带去了饯别用的葡萄酒和一磅蛋糕。他们谈论了囚犯们并不知道的当天新闻：实业家洛伦佐·金·玛苏埃拉和埃杜阿尔多·普亚纳在波哥大分别被绑架了，这似乎是“可被引渡者”的行为。但是，他们也告诉她们，在逃亡了许久之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热切地想要投降。据说，他甚至住在下水道里。他们承诺当晚把电视机和收音机带来，让玛露哈看见贝阿特利丝与家人团聚的场景。

玛露哈的分析似乎是有道理的。之前，她一直怀疑玛丽娜被处决了，那天晚上她才完全确定，因为这两次的仪式感完全不同。没有首领为了玛丽娜而提前几天来预热情绪。他们也没有去找她，而是派了两个恃强凌弱的无名小卒，没有任何批示，只用了五分钟就完成了任务。如果他们要杀死贝阿特利丝的话，他们用蛋糕和葡萄酒给她举办的饯行仪式就成了死亡仪式。玛丽娜被带走后，他们拿走了电视机和收音机，以免她们获悉行刑的消息；但现在，他们提出归还电视机和收音机，用好消息来缓解坏消息的伤害。因此，玛露哈直接得出了玛丽娜已经被处决、贝阿特利丝将获得自由的结论。

首领们给贝阿特利丝十分钟的时间梳洗打扮，他们去喝杯咖啡。她无法遏制自己正在重演玛丽娜最后一夜的想法。她要了一面镜子用来化妆。妲玛莉丝给了她一面金色叶子镶边的大镜子。在三个月没照镜子之后，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着急地看了看镜中的自己。那是囚禁生涯中最惊悚的时刻之一。玛露哈的印象是：如果她在街上与自己相遇，都没法认出自己。“我要吓死了，”她后来讲述道，“我看见自己很瘦、很陌生，仿佛为了饰演一个戏剧角色而化了装。”贝阿特利丝看见自己极其苍白，她瘦了十公斤，头发又长又干枯，她惊恐地大叫起

来：“这不是我！”在虚虚实实的消息中，她已经屡次感受到了他们会趁某天她状态极其糟糕的时候释放她的羞辱，但她从来没想过现实会糟到这种地步。后来更糟了，因为一名首领点亮了正中的灯泡，房间的氛围变得更加充满恶意了。

一名看守拿着镜子让贝阿特利丝梳头。她想化妆，但是玛露哈制止了她。“您怎么想的！”她恼火地说，“就您这惨白的脸色，还想抹上这些？会很吓人的。”贝阿特利丝听取了她的意见。她还喷了“大灯”送给她的男士香水。最后，她干咽下了一片镇定片。

袋子里放着她被绑架那天晚上穿的衣服，还有其他的东西。但是她更喜欢那件不太穿的粉色汗衫。她犹豫地穿上了床底放着的发了霉的平底鞋，这双鞋跟她的汗衫并不相配。妲玛莉丝给了她一双健身用的运动鞋。鞋码正好合适，但是模样太寒酸，贝阿特利丝以鞋子挤脚为由拒绝了。她穿上了自己的平底鞋，用皮筋扎了马尾辫。最后，由于没什么装饰，她看起来就像个女学生。

他们没有像对玛丽娜那样给她戴上风帽，而是试图用医用胶带蒙上她的眼睛，免得她认出路线或是人脸。她意识到撕下胶带的时候会一起扯下眉毛和睫毛，因此她不同意。“等一下”，她对他们说，“我帮你们。”于是，她在两边的眼睑上放了一团棉花，并用胶带固定住。

告别很快就结束了，没有人流泪。本来贝阿特利丝快哭了，但是玛露哈用刻意的冷漠制止了她，让她振作起来。“请您告诉阿尔贝托，让他冷静，我非常爱他，也爱我们的孩子。”她说。她吻了贝阿特利丝一下，跟她道别。两人都非常痛苦。贝阿特利丝痛苦，是因为她怕在关键时刻，杀死她比放了她更容易。玛露哈痛苦，是因为她遭受着双重的恐惧，她害怕贝阿特利丝被杀，也害怕单独和四名看守待在一

起。她唯一没有想到的可能性，是一旦贝阿特利丝被释放，她自己就会被处决。

大门关上了，玛露哈纹丝不动，她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直到听见车库里响起马达声，汽车的踪迹消失在夜色里。她强烈地感到自己被抛弃了。这时她才想起，他们没有履行把电视机和收音机还给她、让她获悉当晚结局的诺言。

“管家”和贝阿特利丝一起走了，但是他的妻子承诺说，她会打一通电话，让他们在九点半的新闻节目开始之前把电视机和收音机送过来。他们没有来。玛露哈哀求看守，让她看“管家”家里的电视，但是他们和“管家”都不敢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违反规定。妲玛莉丝在不到两个小时后走进房间，兴高采烈地告诉她，贝阿特利丝已经安全到家了，并在做出说明时表现得非常谨慎，没有说出任何会伤害任意一方的话语。当然，全家人和阿尔贝托一起，围绕在她的身边。家里都挤不下这么多人。

玛露哈依然很恼火，她觉得这不是真的。她坚持让他们借一个收音机给她。她失去了控制，不计后果地同看守们对峙。后果并不严重，因为他们都见证了首领们承诺给予玛露哈这一待遇，也更愿意使用另外的方法让她安静下来，努力借一台收音机。后来，“管家”探头进来，告诉玛露哈，他们把贝阿特利丝安然无恙地留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现在全国都已经看到或听到了她和家人团聚。但是，玛露哈想要的是一台收音机，这样她可以用自己的耳朵听见贝阿特利丝的声音。“管家”承诺给她带收音机，但他没有兑现诺言。晚上十二点，玛露哈被疲倦和愤怒击垮了，她服下了两颗药效强劲的巴比妥，一直睡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

看守们的说法是真的。贝阿特利丝穿过后院被带到了车库。他们把她安置在一辆汽车的车厢底板上，毫无疑问那是辆吉普车，因为她得在他们的帮助下才能够上侧踏板。起初，他们在坎坷不平的路段上颠簸了一阵。他们刚驶上柏油路，一个与贝阿特利丝同行的男人就开始毫无道理地威胁她。通过这个男人的声音，她意识到他非常紧张，他强硬的态度也无法掩饰这种紧张。他不是之前在房子里的任何一位首领。

“会有一群记者等着您。”那个男人说，“您当心点。任何一个多余的字都能要了您嫂子的命。记住，我们从没有跟您交谈过，您从来没见过我们，而且这趟行程开了两个多小时。”

贝阿特利丝安静地听完了这些威胁，那个男人似乎毫无必要地重复说了许多其他威胁的话，只是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在一场三人对话中，她发现车上除了“管家”之外没有一个熟人，而他几乎不说话。她打了一个寒噤：最不幸的预想依然可能成真。

“我想请你们帮我一个忙。”她什么也看不见，但她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嗓音，“玛露哈有心血管问题，我们想给她寄一种药。你们能给她送到吗？”

“可以，”那个男人说，“您放心。”

“非常感谢。”贝阿特利丝说，“我会听从你们的指示。我不会伤害你们的。”

在川流不息的汽车和重型卡车发出的声音、音乐片段和尖叫声的背景音下，他们的行程出现了一阵长时间的停顿。男人们窃窃私语，其中一个对贝阿特利丝说：

“这里有很多岗哨，”他说，“如果我们被拦下了，我们会说您是我的妻子。因为您现在脸色苍白，我们可以说我们带您去诊所看病。”

贝阿特利丝已经冷静一些了，她忍不住开玩笑：

“眼睛上裹着胶带？”

“您眼睛做了手术。”男人说，“您坐到我身边来，我把胳膊搭在您身上。”

绑匪们的不安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时，在波哥大的不同街区，有七辆公共汽车被城市游击小分队放置的燃烧弹点燃，正在燃烧。同时，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炸毁了位于卡克萨市郊区的电力塔，还试图攻下市区。因此，波哥大开展了几次维护公共治安的行动，但几乎没人察觉。这种情况下，七点的城市交通与任何一个周四的状况一样，密集而吵闹，伴着缓慢变换的交通信号灯、为了避让而突如其来的躲闪，还有骂娘的话，就连在绑匪们的沉默中也能感受到紧张的氛围。

“我们找个地方把她放下吧。”其中一个人说，“您快点下，慢数到三十，然后摘下眼罩往前走，别回头看，坐上第一辆经过的出租车。”

她感觉他们往她手里塞了一张钞票。“给您打车用，”男人说，“五千比索。”贝阿特利丝把钱塞进了裤子口袋里，无意间又找到了一片镇定片，她把药吞了下去。车子开了半个小时后停了下来。同一个声音说出了最后的判决：

“如果您告诉媒体您曾经和玛丽娜·蒙托亚女士在一起，我们就杀了玛露哈女士。”

他们到了。男人们疯狂地把贝阿特利丝弄下车，但没有取下她的眼罩。他们非常紧张，步速参差不齐，命令和咒骂声一片混乱。贝阿特利丝感受到了踏实的地面。

“好了，”她说，“这样就行了。”

她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他们回到车里，就立即发动了汽车。当时她才听见，他们后面还有一辆汽车同时发动。她没有完成数数的命令，张开双臂走了两步，意识到自己大概是站在大街上。她一把摘下了眼罩，马上认出这是诺曼底街区，有段时间她经常去一个卖珠宝的朋友家，途中会路过这里。她看着那些灯火通明的窗户，试图找出让她信任的一扇，她觉得自己穿得非常寒酸，因此不想打车，而是想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来接她。当一辆保养得极好的黄色出租车停在她面前的时候，她还没有做出决定。年轻、体面的司机问她:

“坐出租车吗？”

贝阿特利丝坐上了这辆车。她上车后才意识到，一辆出现得如此合时宜的出租车不可能是偶然。她肯定这是绑匪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然而，这种肯定让她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安全感。司机向她询问地址，她低声地把地址告诉他。她不明白为什么司机询问了三遍才听见。因此，她用自然的嗓音把地址又重复了一遍。

那晚寒冷而晴朗，天上挂着几颗星星。司机和贝阿特利丝只进行了必要的交流，但是他一直通过后视镜观察她。离家越来越近，贝阿特利丝觉得红绿灯出现得更频繁，变换的频率更慢了。在离家两个街区远时，她让司机放慢速度，以躲开接到绑架者通知而前来的记者。

然而记者们并不在。她认出了她的房子，她很惊讶自己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激动万分。

计价器显示的是七百比索。由于司机没有零钱找开五千比索，贝阿特利丝走进家里找人帮忙，老门房惊叫了一声，疯狂地拥抱她。在监禁期间无休无止的白天和胆战心惊的黑夜里，贝阿特利丝把这个时刻想象成惊天动地的场景，肉体和灵魂的所有力量都将涌向她。然而完全相反，她有一种几乎感受不到的迟缓，缓慢而深沉，她的心脏因为镇静剂而变得非常安静。于是，她让门房去付车钱，自己按响了公寓的门铃。

她的小儿子加夫列尔给她开了门。他的叫喊声在整个房子里回荡："妈妈！"她十五岁的女儿卡塔琳娜尖叫着上前环住她的脖子，但是立刻害怕地松开了手。

"但是妈妈，你为什么这样说话？"

这个幸福的细节让恐惧消散了。贝阿特利丝还需要在拜访她的人群里待上好几天才能改掉小声说话的习惯。

他们从早上就开始等她。三通匿名来电（毫无疑问是绑架者们打来的）宣布她将被释放。无数记者打电话来询问他们是否知道释放时间。正午过后，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确认了这件事，基多·帕拉在电话中向他宣布了这个消息。媒体躁动不安。贝阿特利丝到家三分钟前，一名女记者打来电话，肯定而冷静地说："放心，今天他们会把她放了。"当门铃响的时候，加夫列尔刚刚挂断电话。

盖莱罗医生在比亚米萨尔家的公寓等她，他以为玛露哈也会被释放，她们俩都会去那里。他喝了三杯威士忌，一直等到了七点播出的

新闻节目。见她们没有回来，他以为这又是一条假消息，和那些日子里诸多其他的假消息一样。于是他回到自己家，穿上睡衣，又喝了一杯威士忌，然后钻进被窝，把收音机调到“回忆广播台”，想要随着波莱罗舞曲入睡。自从苦难的日子开始，他就不再阅读了。在半梦半醒间，他听见了加夫列尔的叫声。

他带着可被奉为典范的自制力走出卧室。贝阿特利丝和他这对结婚二十五年的夫妻不紧不慢地拥抱对方，仿佛她刚从一次短途旅行回来，他们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他们俩都曾经无数次地想象过这个时刻，而真正经历这一刻就像是上演一场排练过上千次的戏剧，感动了所有人，唯独没有感动演出的主角。

贝阿特利丝刚走进家里就想到了玛露哈，她孤独一人，在那个悲惨的房间里音信全无。她给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打电话。铃声响了一下，他本人就用准备就绪的嗓音接起电话。贝阿特利丝认出了他的声音。

“你好，”她说，“我是贝阿特利丝。”

她意识到她哥哥在她自报姓名之前就已经认出了她。她听见深沉、刺耳的叹气声，仿佛是猫的叫声。紧接着，她听见他用平静的声音问道：

“您在哪儿？”

“在家里。”贝阿特利丝回答。

“太好了！”比亚米萨尔说，“我十分钟后到。在这期间，别跟任何人交谈。”

他准时到了。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贝阿特利丝的电话让他吃了一惊。他很高兴能够见到妹妹归来，并直接得到关于被囚禁的妻子的第一手消息。此外，当务之急是在记者和警察到来之前，让贝阿特利丝做好准备。他行动了起来。为他开车是他的儿子安德烈斯难以违抗的天职，儿子及时把父亲送到了。

众人的情绪已经平静了下来。贝阿特利丝和她的丈夫、孩子、母亲、两个姐妹待在客厅里，他们如饥似渴地听着她的讲述。阿尔贝托觉得，她由于长期囚禁而脸色泛白，看起来比过去年轻了，而且由于运动衫、马尾辫和平底鞋而有了学生的气质。她想哭，但是被他制止了，他急切地想知道玛露哈的消息。“您放心，她很好。”贝阿特利丝告诉他，“那边的情况很艰难，但是可以忍受，而且玛露哈很勇敢。”她想立即解决折磨了她十五天的担忧。

“你知道玛丽娜的电话吗？”她问。

比亚米萨尔想，或许真相是最不残忍的。

“她被杀害了。”他回答。

贝阿特利丝把坏消息带来的痛苦和后知后觉的恐惧混淆在了一起。如果她在两个小时前得知真相，或许她将无法撑过释放之旅。她哭了个痛快。与此同时，比亚米萨尔采取了防范措施，不让别人进来。他们讨论着绑架的公开版本，避免让其他被绑架者处于危险之中。

囚禁生活的细节让她对监牢所处的位置有了大致的概念。为了保护玛露哈，贝阿特利丝得告诉媒体，他们从某个气候温和的地点出发，全程花了三个小时。虽然真相并非如此：真实的距离，途经的山

坡，周末从扬声器里传来的震耳欲聋、持续到凌晨的音乐，飞机的噪声，气候和所有一切都说明了那是城里的某个街区。另一方面，只要询问该区的四五位神甫就能发现是哪一位负责给房子驱邪。

一些更加愚蠢的破绽给最低风险的武装营救提供了线索。如果营救，时间应该是早晨六点换岗之后，因为上岗的看守们晚上没睡好觉，疲惫地倒在地上，毫不担心自己的武器。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是房子的布局，特别是后院的大门，她们在那里见过一名携带武器的看守和那条事实上比它的叫声显示的更容易被收买的狗。很难预见周围是否还有防护带，但是内部的混乱秩序让人觉得防护带不可能存在，无论如何，一旦房子被定位，就很容易查清这一点。在迪安娜·图尔巴伊的悲剧之后，人们对武装营救前所未有地缺乏信心，但是比亚米萨尔将武装营救纳入了考虑范围，以免陷入没有其他选择的境地。无论如何，这也许是他唯一没有同拉法埃尔·帕尔多分享的秘密。

这些信息让贝阿特利丝感到良心不安。她已经承诺玛露哈，她不会给出方便袭击那座房子的线索。但是，在确定比亚米萨尔与玛露哈还有她自己一样明白武力解决方式的弊端之后，她郑重地决定把这些信息告诉她哥哥。而且，释放贝阿特利丝的行为证明，在种种挫折之后，协商之路是行得通的。就这样，在睡了一晚好觉之后，她第二天已经非常清醒和冷静。她在哥哥家里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会上，人们勉强能从鲜花丛中穿过。她向记者和舆论机构讲述了囚禁生活中恐怖的真实情况，没有提及任何会促使别人自发采取行动、让玛露哈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的信息。

之后的周三，在确定玛露哈已经了解新法令的前提下，阿莱桑德娜决定临时播出一期娱乐节目。最近的几周，随着谈判的进展，比亚米萨尔对他的公寓做了显著的改变，好让即将重获自由的妻子称心如

意。他按照她的想法在一个位置摆了书架，更换了一些家具和几幅画。他把玛露哈从雅加达带回来的唐代马俑放在了一个显眼的地方，这是玛露哈生命中最重要的纪念品。最后时刻，他们想起，玛露哈抱怨卫生间里没有一块像样的地毯，于是赶紧去买了一块。他们在模样大变、灯火通明的家里录制了一期特别电视节目，玛露哈可以在回家之前就熟悉新的装饰。虽然他们无从得知玛露哈是否看了这期节目，但节目的效果很好。

贝阿特利丝很快就恢复了。她把重获自由时穿的衣服放进了囚徒口袋里，里面锁着那个房间压抑的味道，这种味道依然会在午夜时分将她忽然惊醒。在丈夫的帮助下，她抚平了情绪的波澜。唯一曾经从过去来到她身边的幽灵是“管家”的声音，他打了两次电话给她。第一次传来的是绝望的叫喊声：

“药！药！”

贝阿特利丝认出了那个声音，血液在静脉里凝固了，但是她调整呼吸，用同样的语气回问。

“什么药！什么药！”

“那位女士的药！”“管家”喊道。

于是他说，他想要玛露哈吃的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名。

“七叶树。”贝阿特利丝说。回答完之后，她立即问道：“她怎么样了？”

“我很好[1]，”“管家”回答，“非常感谢！”

“不是问您，”贝阿特利丝纠正说，“是问她。”

“啊。您放心，”“管家”说，“那位女士很好。”

贝阿特利丝一下子挂断了电话，哭了起来，她被惨无人道的回忆恶心坏了：极其糟糕的食物、卫生间的粪坑、千篇一律的日子、发臭的房间里玛露哈的恐惧与孤独。不管怎样，电视新闻的体育版块插播了一段神秘的广告：“请服用漆树叶。”他们改变了词的写法，以免某个糊涂的实验室莫名其妙地抗议节目中产品的植入。

“管家”几周后的第二次来电非常不同。贝阿特利丝花费了一些时间才认出那个经过伪装之后变得很奇怪的声音。这种说话的风格更像是父辈的风格。

“您记住我们谈过的，”他说，“您没有跟玛丽娜女士在一起。没有。”

“放心。”贝阿特利丝说，接着挂断了电话。

基多·帕拉对他辛勤劳动的初步成就非常满意，他通知比亚米萨尔，玛露哈大概会在三天之后被释放。比亚米萨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通过广播和电视向玛露哈传达了这个消息。另一方面，贝阿特利丝关于监狱条件的叙述让阿莱桑德娜肯定，她的消息可以传到那里。因此，她对贝阿特利丝进行了半个小时的采访，贝阿特利丝讲述了玛露哈想知道的一切：她是如何被释放的，孩子们、家里和朋友们怎么样了，可以对自由保有怎样的期待。

从那时起，她将利用各种细节制作节目，用他们穿的衣服，买的东西和接待的客人作为题材。有人一直说：“马努埃尔已经烧好猪大腿

了。”这些只是为了让玛露哈知道，她在家里留下的秩序依然保持着原样。所有这些，虽然看起来无关紧要，但对玛露哈有着激励的作用：生活在继续。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并没有要释放她的迹象。基多·帕拉满口空洞的解释和幼稚的借口：埃斯科瓦尔拒接电话；他消失了。比亚米萨尔质问他。帕拉只是顾左右而言他。他说，由于警方在麦德林贫民窟的屠杀行为不断增加，情况变得复杂了。他援引了一句话：只要政府不停止那些野蛮的行为，释放任何一名人质都会是非常困难的。比亚米萨尔没有让他把话说完。

“这不是条约里的内容，”他说，“一切都建立在法令清晰的基础上，现在也很清晰了。这有关名誉，别跟我耍花招。”

“您不知道当这些家伙的律师有多倒霉，”帕拉说，“我的问题不是我收不收钱，而是事情必须得顺利进行，否则我就没命了。您希望我怎么做？”

“我们别废话了，”比亚米萨尔说，“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要警察不停止屠杀，不停止处罚罪犯，玛露哈女士就没有被释放的可能。事情就是这样。”

比亚米萨尔被愤怒遮蔽了双眼，他说了许多辱骂埃斯科瓦尔的话，并总结说：

“您快滚吧，因为杀死您的人会是我。”

基多·帕拉消失了。不只是因为比亚米萨尔的激烈反应，还和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有关，埃斯科瓦尔似乎无法原谅他滥用谈判者的职权。

埃尔南多·桑托斯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基多·帕拉害怕地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埃斯科瓦尔写了一封可怕的信，基多·帕拉甚至连读这封信的勇气都没有。

“这个人疯了，”他告诉他，“谁都不能让他平静下来，除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之外，我没有别的办法。”

埃尔南多·桑托斯意识到，这个决定中断了他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之间唯一的联系，他试着说服基多·帕拉留下来，但没有成功。基多·帕拉求他帮最后一个忙，让他帮忙办一张去委内瑞拉的签证，并让基多·帕拉的儿子完成在波哥大现代中学的学业。一个永远无法证实的传言让人们相信，他在委内瑞拉的一所修道院避难，他的一个姐妹在那里当修女。埃尔南多·桑托斯再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直到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六日，在麦德林一辆无照汽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他和他当时读高中的儿子的尸体。

比亚米萨尔需要时间从可怕的挫败感中恢复过来。他后悔轻信埃斯科瓦尔的话，悔意压得他无法喘息。他觉得失去了一切。谈判过程中，他随时同图尔巴伊博士和埃尔南多·桑托斯分享进展，他们也失去了与埃斯科瓦尔沟通的渠道。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最后，他没有讲述自己的困难，而是告诉他们可能激励他们的消息。他陪前总统待了几个小时，图尔巴伊已经凭借着令人痛心的克制精神承受了女儿的死亡。他没有表露出任何的情绪，拒绝任何一种表态，他变得隐形了。埃尔南多·桑托斯陷入了深深的挫败感中，因为他把解救儿子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帕拉的调解之上。

对玛丽娜的谋杀，尤其是承认和宣布谋杀的残忍方式，不可避免地使人反思往后应当如何行动。“高贵者”式调解的一切可能性都已经

穷尽了。然而，似乎没有其他有效的调停者，好心好意与间接手段又缺乏实际意义。

比亚米萨尔看清了自己的处境，他去向拉法埃尔·帕尔多发泄。“您想象一下我的感受，”他倾诉说，“这么多年来，埃斯科瓦尔一直折磨着我，也折磨着我的家人。起初，他威胁我。后来，他袭击我，我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他继续威胁我。他杀了加兰，绑架了我的妻子和妹妹，现在还想让我捍卫他的权利。”然而，这样的发泄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了：解救被绑架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深入虎穴。直截了当地说：他唯一能做的——而且无论如何都得做的——是飞到麦德林去，掘地三尺地找到巴勃罗·埃斯科瓦尔，面对面地和他商议这件事。

---

[1] 在西班牙语中，“您”与“他/她/它”的变位形式是一样的。

八

问题是，如何在一个暴力肆虐的城市里找出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一九九一年一月和二月，这里发生了一千二百起谋杀案——每天二十起，每隔四天还会发生一场屠杀。几乎所有的武装组织都一致决定发动哥伦比亚历史上最残忍的游击恐怖袭击，而麦德林正是城市行动的中心。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有四百五十七名警察被杀害。安全管理部曾说，贫民窟里有两千来人为埃斯科瓦尔效力，其中很多是青少年，靠猎杀警察为生。他们每杀一名警官能获得五百万比索，每杀一名警员能获得一百五十万比索，每打伤一人能获得八十万比索。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六日，一辆装着一百五十公斤炸药的汽车在麦德林斗牛广场对面爆炸，炸死了三名士官和八名警察，与战争毫无关联的九名市民死亡，一百四十三名民众受伤。

与贩毒贸易团伙正面交锋的精英部队被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指控为一切罪恶的化身。一九八九年，比尔希略·巴尔科总统组建了精英部队。当时，他陷入了军队和警察等大型部队无法明确各自职责的困境，深感绝望，便将组建精英部队的任务委托给国家警察，让军队尽可能地远离贩毒贸易和准军事集团的毒害。最初的精英部队不超过三百人，拥有直升机特种小分队，并接受英国政府特种空勤团（SAS）的训练。

地主组建的反游击队准军事化队伍于巅峰时期，在国家中部的马格达莱纳河中游开始了行动。之后，这支部队分离出了一支专门进行

城市作战的队伍，并作为自由行动军团驻扎在麦德林。它直接听命于波哥大国家警察总局，不受任何中间机构影响。由于其属性特殊，这支部队行使职权时并不是非常谨慎。罪犯们一头雾水，地方政府也很不情愿地接纳了一股跳脱其管辖的自治武装力量。“可被引渡者”暴怒，指控他们实施了各种践踏人权的行为。

麦德林的人们明白，“可被引渡者”揭露警方犯下谋杀与欺凌罪行不是没有依据的，因为他们目睹这些事情在大街上发生，尽管大部分案件都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国内外的人权组织对此表示抗议，但政府没有做出让人信服的答复。几个月后，政府决定，如果没有国家检察院的人员在场，不许私闯民宅，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军事行动的官僚手续烦琐起来。

司法部门并不能做多少事。法官们微薄的工资仅够他们糊口，而不够他们负担孩子的教育费用。他们深陷于没有出路的两难抉择当中：要么被杀，要么被毒贩收买。令人敬佩和痛心的是，许多法官在这种情况下情愿选择死亡。

也许在这种形势下，最具有哥伦比亚特点的是，麦德林人有一种惊人的能力：他们能习惯一切（不论情况是好是坏），并从中迅速恢复过来。这种恢复能力可能是他们无所畏惧的性格最苦涩的表现方式。大部分人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生活的麦德林曾是全国最美丽、最有活力、最热情好客的城市，但是在那几年里，这座城市变成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城市之一。当时，城市恐怖主义已经变成了哥伦比亚百年暴力文化的奇特组成部分。历史悠久的游击队——城市恐怖主义的实践者——曾经亲自有板有眼地将这种行为谴责为非法的革命斗争方式。人们已经学会了带着对已经发生之事的恐惧生活，但还没有学会带着对可能发生之事的不确定感生活：炸弹将学校里的孩子炸得

粉碎，将空中的飞机炸毁，市场里的豆子也会突然炸开。杀死无辜平民、随处爆炸的炸弹和匿名的威胁电话一起，成了日常生活中最让人不安的因素。然而，从统计数据看，麦德林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受到影响。

几年前，贩毒分子嚣张至极，处于虚幻的光环之中。他们完全不受法律的制裁，甚至还享有某种民间威望，因为他们在童年时居住过的贫困街区推行慈善事业。如果有人想送他们进监狱，完全可以让街角的警察去抓他们，但更多哥伦比亚人会带着类似满足感的好奇心和兴趣对毒贩们听之任之。政治家、实业家、商人、记者，甚至是地痞流氓都出席了麦德林附近的那不勒斯庄园举办的永留史册的聚会。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在那儿开了一家动物园，里面有从非洲带回来的活生生的长颈鹿和犀牛。在动物园的大门口，展示着第一架运载出口可卡因的轻型飞机，仿佛一座国家纪念碑。

凭借巨额财富和保密工作，埃斯科瓦尔成了幕后的主人，他变成了一个在阴影里掌控一切的传说。他的公告具有模板一般的审慎风格，内容足够以假乱真。在他的鼎盛时期，麦德林的贫民窟里建起了供有他画像的祭台，祭台上摆着蜡烛。人们甚至相信，他会创造神迹。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哥伦比亚人拥有像他一样控制舆论的天赋和腐化社会的力量。他个性中最让人不安、最具破坏性的特点，是他完全没有分辨好坏的恻隐之心。

这就是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二月中旬打算寻找的无迹可寻的、不可思议的男人，他想让他把妻子玛露哈还给他。他开始寻求途径与关押在戒备森严的伊塔古伊监狱中的奥乔阿三兄弟取得联系。拉法埃尔·帕尔多根据总统的指示给他亮了绿灯，但是提醒他不能越界：他的行动不是以政府名义进行的谈判，而是一次考察任务。他告诉他，不能

以政府方面的酬劳作为交换来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在投降政策的范畴内，政府对“可被引渡者”自首是感兴趣的。从这个新概念出发，他想改变行动的视角，不再像往常那样专注于解救人质，而是专注于促使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投降。投降之后，释放人质就顺理成章了。

就这样，可以说玛露哈第二次被绑架了，而比亚米萨尔的另一场战争开始了。也许，埃斯科瓦尔原本打算把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一起释放，但是迪安娜·图尔巴伊的悲剧可能打乱了他的计划。迪安娜的死对他来说应该糟糕至极，除了得替他并未下令执行的杀人行为背负罪责之外，他还失去了一颗价值难以估量的棋子，他所面临的情况因此更加复杂了。此外，当时警方的行动对他步步紧逼，使他跌入了谷底。

在死去的玛丽娜同迪安娜、帕丘、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中，如果当时他决定要杀死一个人，那个人大概本会是贝阿特利丝。但贝阿特利丝获得了自由，迪安娜死了，他还剩两个人：帕丘和玛露哈。也许由于帕丘的交换价值，他原本更愿意保留他。但是现在玛露哈获得了意料之外、无法估量的价值，她能让比亚米萨尔与他保持沟通，促使政府颁布一部表述更加清楚的法令。同样，对于埃斯科瓦尔来说，从那时起，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比亚米萨尔的调解，而唯一的保证方法是滞留玛露哈。他们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比亚米萨尔从拜访妮迪娅·金特罗女士入手，以了解她调解经历中的细节。他发现她是个慷慨又果断的人，而且心平气和地服着丧。她向他转述了自己与奥乔阿姐妹、老族长以及狱中的法比奥的对话。她让人觉得她已经接受了女儿的惨死，她既不是因为痛苦也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争取和平才记住这场死亡。凭借这种精神，她交给比亚米萨尔一封写给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信，在信中表达了她的期望，希

望迪安娜的死能让其他的哥伦比亚人不再经历她经历过的痛苦。在信的开头，她承认政府不能阻止警方为了找出犯罪分子而搜查民宅，但的确能阻止警方用武力营救人质。因为受害者的家属明白，政府明白，所有人都明白，如果在搜查民宅的行动中发现了被绑架者，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就像她女儿身上发生的那样。“因此，我来到您面前，”信上说，“带着充满痛苦、谅解和善意的心，恳请您放了玛露哈和弗朗西斯科。”最后，她用一个令人惊讶的请求结尾：“请您告诉我您不想让迪安娜死去的理由。”几个月后，埃斯科瓦尔在监狱里公开表示了他的惊讶之情，因为妮迪娅的来信既没有指责也没有仇恨。“我非常痛苦，”埃斯科瓦尔写道，“我没有勇气给她回信。”

比亚米萨尔带着妮迪娅的信和政府口头授予的权力前往伊塔古伊监狱拜访奥乔阿三兄弟。两名安全管理部的卫兵与他同行，麦德林的警察还增派了六名人员。他发现奥乔阿兄弟刚被安置进一间戒备森严的监狱，里面有三重一模一样的防护门，每一道门打开都很费功夫。墙皮脱落的砖墙让人觉得这是一座没有修好的教堂。空空荡荡的走廊、狭窄的楼梯、黄色管道制成的栏杆和显眼的警报器延伸到三楼，那里又延伸出了一座小楼，奥乔阿三兄弟在小楼里制作精美的皮具和马鞍等各种马具以消磨服刑的时光。全家人都在那儿：子女、姑舅亲眷和姐妹们。最活跃的玛尔塔·妮耶维丝和豪尔赫·路易斯的妻子玛丽亚·莉娅都表现出了帕伊萨人热情好客的典型品质。

比亚米萨尔来的时候恰好是午饭时间，食物摆在后院深处的一间敞开式棚屋里，棚屋的墙上贴着电影明星的海报，屋里还有一组专业的健身设备和一张十二人餐桌。出于安全考虑，食物是在附近的拉·洛玛农庄准备的。拉·洛玛农庄是全家人正式的住所，而那天享用的是美

味丰盛的克里奥约食物。他们吃饭的时候不谈论食物之外的话题，这在安蒂奥基亚是必不可少的礼节。

饭后，伴随着家庭会议的各种繁文缛节，谈话开始了。午饭时的和谐气氛让人很难想象这次对话的情况。比亚米萨尔用他缓慢、精确、善于解释的方式开始了对话，这使其他人很难提问，因为一切似乎都已经被提前回答了。他细致地讲述了他与基多·帕拉的谈判情况和突然的决裂，最后说，他坚信只有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直接联系才能救出玛露哈。

“让我们来中止这种野蛮的状态，”他说，“让我们好好谈谈，不要再犯错了。首先，你们得知道，我们不可能会采用武装营救的方式。我更愿意进行对话，了解事情的状况以及你们想要的是什么。”

豪尔赫·路易斯是三兄弟中的老大，掌握着话语权。他讲述了他的家族在战乱中的困境，他们投降的理由与困难，还有对于制宪议会不取消引渡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担忧。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战争。”他说，“您无法想象我们的遭遇、我的家人和朋友们的遭遇，以及在我们身上发生过的一切。”

他说的句句属实：他的姐妹玛尔塔·妮耶维丝曾经被绑架；一九八六年，他姐妹的丈夫阿隆索·卡尔德纳斯被绑架后遭杀害；一九八三年，父亲的兄弟豪尔赫·伊万·奥乔阿被绑架；表兄弟马里奥·奥乔阿和吉耶尔摩·莱昂·奥乔阿被绑架后遭杀害。

比亚米萨尔也试图向他们说明，他与他们一样都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且从今往后发生的一切都将由所有人平等地偿还。“我的经历不

比你们的轻松。”他说，“一九八六年，‘可被引渡者’试图谋杀我，我被逼得逃到世界的另一头，但他们还不放过我。现在他们绑架了我的妻子和妹妹。”然而，他没有抱怨，而是将自己摆在与对话者同等的高度上。

“这太过分了。”他总结说，“现在是时候开始互相理解了。”

只有他们俩在说话。家族的其他成员在悲伤的死寂里倾听着，女人们专注地围在来客身边，没有参与对话。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豪尔赫·路易斯说，“妮迪娅女士也曾经来过这里。我们理解您的处境，但是我们不想惹祸上身，我们跟她说了同样的话。”

“只要战争继续下去，你们所有人都会处在危险当中，即使四面都被装甲墙包围。”比亚米萨尔坚持说，“相反，如果现在这一切结束了，你们的父母和全家人都不会受到伤害。但前提是埃斯科瓦尔自首，玛露哈和弗朗西斯科安然无恙地回家。不过你们要知道，如果他们被杀害了，你们也会一起付出代价，你们的家人会付出代价，所有人都会付出代价。”

在监狱里三个小时的漫长会面中，每个人都拼尽全力地克制自己。比亚米萨尔欣赏奥乔阿家族帕伊萨式的现实主义。来访者分析话题时的直接与坦率也给奥乔阿一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库库塔[1]生活过——那里是比亚米萨尔的家乡，他们在那儿认识许多人，并和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最后，另外两名奥乔阿家的人加入了对话，玛尔塔·妮耶维丝用她克里奥约人的风趣使气氛缓和下来。男人们似乎

非常坚定地拒绝参与这场他们自以为已经全身而退的战争，但是他们逐渐开始考虑这件事。

“那好吧。”豪尔赫·路易斯最后说，“我们会给巴勃罗带信儿，告诉他您来过这里。但是我建议您跟我的爸爸谈一谈。他在拉·洛玛农庄，他会很高兴跟您交谈的。”

于是，比亚米萨尔和他们一家人去了农庄，他只带了两名从波哥大来的卫兵，因为奥乔阿一家认为他们的安保措施太显眼了。他们来到大门口，沿着一条郁郁葱葱、精心打理的小路，朝着房子步行了大概一公里。几个看起来没有携带武器的男人挡住了卫兵们的去路，并让他们原路返回。气氛变得有些躁动，但是这些看守用良好的风度和合情合理的理由让外来的卫兵们冷静了下来。

“你们往这边走，在这儿吃点东西。”他们对卫兵说，“比亚米萨尔医生得跟堂法比奥谈一谈。”

树林尽头是一个小广场，后面是一栋整齐的大房子。从露台上可以俯视延绵至天边的草原，老族长在上面等候客人的到来。家族的其他成员，包括女人们，都和他在一起，几乎所有的女眷都在为战争中死去的亲人服丧。虽然已经到了午睡的时间，但他们还是准备了各种食物和饮品。

从问好开始，比亚米萨尔就意识到堂法比奥已经完全了解监狱中的对话结果了。这样就省去了开场白。比亚米萨尔只是重复强调说，如果战争加剧，就更加可能伤害他人数众多、繁荣昌盛的家族，尽管他们没有因为凶杀也没有因为恐怖主义而被指控。因此，虽然他的三个儿子已经脱险，但未来是无法预测的。没有人比他们更希望获得和

平。但只要埃斯科瓦尔不像他的儿子们一样投降，和平就不可能实现。

堂法比奥平静而专注地听着他说话，当听到他认为正确的内容时，他会轻轻点头表示赞同。接着，他用类似于墓志铭的简略有力的话语，在五分钟内说明了他的想法。现在做的任何一件事，他说，到头来都缺少最重要的一环：当面同埃斯科瓦尔交谈。“因此，最好从这一步开始。”他说。他认为比亚米萨尔是合适的人选，因为埃斯科瓦尔只相信一诺千金的人。

“您是这样的人，”堂法比奥总结说，“问题是如何向他证明。”

这次拜访上午十点在监狱开始，下午六点在拉·洛玛结束，最大的成就是打破了比亚米萨尔和奥乔阿一家之间的坚冰，双方有着共同的目的，且已经与政府达成共识——让埃斯科瓦尔自首。确定了这一点，比亚米萨尔便有勇气把他的感受传达给总统。但是，他一回到波哥大就听说了一则坏消息：总统本人也在经受着绑架案带来的痛苦。

事情是这样的：福尔图纳托·加维里亚·博特罗是总统的堂弟，也是他从小到大最要好的朋友。他在佩雷拉的农庄里被四名持枪蒙面人劫持了。总统没有取消在圣安德烈斯岛举行的地区行政长官会议。周五下午离开波哥大的时候，他还没有确定绑架他堂弟的人是不是“可被引渡者”。周六上午，他起床去潜水，浮出水面时，他被告知，福尔图纳托已经被劫持者杀害了，劫持者不是贩毒分子。他被偷偷地埋在旷野里，连棺材都没有。尸检时发现他的肺里有泥土，说明他是被绑匪活埋的。

总统的第一反应是取消地区会议，马上返回波哥大，但是医生们制止了他。他在六十英尺深的水下待了一个小时，他们不建议他在二十四个小时内坐飞机。加维里亚听从了建议，全国人民都看见他在电视上一脸阴沉地主持会议。但是，下午四点，他无视医嘱，回到了波哥大主持葬礼。他后来回想起那天，认为那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之一，他心酸地说：

“我是唯一不能抱怨总统的哥伦比亚人。”

在监狱里与比亚米萨尔共进午餐后，豪尔赫·路易斯·奥乔阿就给埃斯科瓦尔寄了一封信，试图游说他投降。他把比亚米萨尔描述成一个严肃的桑坦德人，比亚米萨尔说的话可以相信，他言出必行。埃斯科瓦尔立即回复说：“告诉那个婊子养的，别跟我说话。”比亚米萨尔通过玛尔塔·妮耶维丝和玛丽亚·莉娅打来的电话得知了这个消息。她们让他回麦德林继续想办法。这一次，他没有带卫兵就去了。他从机场打车到洲际酒店。大概十五分钟后，一名奥乔阿家的司机来酒店接他。司机是一个大概二十岁的帕伊萨人，很和善，喜欢开玩笑，他从后视镜里观察了他好一会儿，终于问他：

“您很害怕吗？”

比亚米萨尔通过后视镜对他笑了笑。

“放心，医生。”年轻人接着说。他还略带讽刺地补充：“跟我们在一起您不会有事的。您怎么会这么想！”

这句玩笑话让比亚米萨尔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一直保留着安全感和信任感。他永远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跟踪，甚至到了谈判后期也是如此，但是他一直觉得自己处于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影响之下。

看来，埃斯科瓦尔不觉得自己对比亚米萨尔有所亏欠，虽然比亚米萨尔在为他打开反引渡法令的大门中功不可没。毫无疑问，赌棍的算盘打得精明，他认为这个恩惠已经用释放贝阿特利丝的方式报答了，但其他历史债务依然原封未动。然而，奥乔阿一家认为，比亚米萨尔应该坚持下去。

因此，他无视那些恶语相向，准备继续前行，奥乔阿一家支持着他。他又去了两三次监狱，他们一起制定了行动策略。豪尔赫·路易斯又给埃斯科瓦尔写了一封信，在信里告诉他，他投降后的保障都已经确定，他的生命会得到尊重，他也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被引渡。但是埃斯科瓦尔没有回信。因此，他们决定让比亚米萨尔本人给埃斯科瓦尔写信，向他说明自己的处境和提议。

三月四日，这封信在关押奥乔阿一家的牢房里写成了。豪尔赫·路易斯是这封信的顾问，他告诉比亚米萨尔哪些话对他有利，哪些话可能不合时宜。比亚米萨尔在开头承认，尊重人权是取得和平的基础。“然而，有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揭露他人侵犯人权的行为是自己侵犯人权的最好借口。”这增加了双方行动的难度，也抹杀了他本人在为解救妻子而斗争的这几个月里取得的成果。比亚米萨尔家族长期受暴力之苦：对他的袭击、对他的连襟路易斯·卡洛斯·加兰的谋杀，对他妻子和妹妹的绑架，但他们自己并没有任何责任。“我和我的妻姐格萝莉娅·帕琼·加兰，”他补充说，“既不能理解也无法接受那么多不合情理且无法解释的暴行。”相反，释放玛露哈和其他记者是哥伦比亚真正走向和平的必然要求。

两周后，埃斯科瓦尔的回信以一记晴天霹雳开头：“尊敬的医生，非常遗憾，我无法满足您的要求。”接着，他援引了一则新闻。在被绑架者家属的默许下，一些来自政府部门的制宪议会成员即将提议，如

果不释放被绑架者，他们就不会着手处理引渡的议题。埃斯科瓦尔认为这不合理，被绑架者不能被当作向制宪议会成员施压的砝码，因为他们在选举之前就已经被绑架了。无论如何，关于这个话题，他放肆地发出了令人畏惧的警告："比亚米萨尔医生，请您记住，引渡政策已经牺牲了许多受害者的性命，再添两条命并不会改变这个进程，也不会改变一直以来进行的斗争。"

这是间接的警告，因为法令颁布之后，埃斯科瓦尔没有再提及引渡，也没有将引渡作为战争的理由。这部法令没有给投降者留下余地，而是侧重于处罚为埃斯科瓦尔作战的特殊武装力量犯下的违反人权的罪行。这是他的精妙策略：凭借部分胜利获得优势，并用其他不计其数且越来越多的理由继续战争，这样就不需要投降。

信上说，比亚米萨尔所进行的战争与他为了保护家人而进行的战争是相同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表示理解。但是他坚持认为，精英部队杀死了麦德林贫民窟的四百多名青少年，却没有人惩罚他们，这些行动证实了绑架记者并给政府施压使其制裁警方相关责任人的合理性，而且他对没有一名政府官员试图就绑架案跟他建立直接的联系表示惊讶。他总结说，无论如何，来电、恳求他释放人质都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危在旦夕的是"可被引渡者"的家人及其合伙人的生命。最后，他说："如果政府不介入，也不听从我们的提议，毫无疑问，我们将处死玛露哈和弗朗西斯科。"

这封信证明埃斯科瓦尔希望与政府官员取得联系。他没有放弃投降，但是投降的代价会比想象中更加高昂，而且他已经打算以投降为借口进一步索要好处。比亚米萨尔理解他，并在一周内拜访了共和国总统，把最新的情况告诉他。总统只是认真地做了笔记。

那几天，比亚米萨尔还拜访了总检察长，试图在新的形势下找到不同的行动方法。那是一次硕果累累的拜访。总检察长说，他将在周末发布迪安娜·图尔巴伊的死亡报告。在这份报告里，他将责任归于警方无序、莽撞的行动，并列出了三名精英部队警官的罪状。他还透露，他调查了十一名被埃斯科瓦尔点名指控的警察，也列出了他们的罪状。

总检察长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四月三日，共和国总统收到了国家检察院关于迪安娜·图尔巴伊死亡原因的评估报告。报告说，该行动从一月二十三日开始酝酿，当时麦德林警方的情报机构接到了几通匿名来电，内容都涉及在科帕卡瓦那市的高地出现的武装人员。根据来电内容，他们的行动集中在萨瓦内塔区，尤其是在比亚·德尔·罗萨里奥、拉·波拉和阿尔托·德·拉·克鲁兹的农庄。其中有一通来电透露，被绑架的记者们就在那里，连“大头目”，即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也可能在那里。第二天的行动分析文件总结了这次行动的基本信息，其中提到了埃斯科瓦尔的信息，但没有提到被绑架的记者也可能在那里。国家警察局局长米盖尔·戈麦斯·帕蒂亚声称，他于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收到消息，计划在第二天进行核实、搜寻和清查行动，“而且有可能抓捕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和众多毒贩”。但是，当时似乎也没有提到发现两名人质——迪安娜·图尔巴伊和理查德·贝塞拉的可能性。

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点，行动开始了。哈伊罗·萨尔塞多·加西亚上尉与七名军官、五名士官和四十名警察离开麦德林卡洛斯·奥尔金学校。一个小时后，埃杜阿尔多·马尔蒂内斯·索拉尼亚与两名军官、两名士官和六十一名警察也离开了那里。报告指出，相应的文书中没有埃尔梅尔·埃塞基埃尔·托雷斯·维拉上尉的出行记录，他是拉·波拉农庄的小组负责人，迪安娜和理查德实际上就在那里。但是后来在国家检察

院做陈述的时候，上尉本人承认，他于上午十一点同六名军官、五名士官和四十名警察一起离开。为了这场行动，他们派出了四架带航炮的直升机。

在比亚·德尔·罗萨里奥和阿尔托·德·拉·克鲁兹庄园进行的搜捕行动顺利完成了。大约下午一点，他们在拉·波拉农庄开展了行动。伊万·迪亚斯·阿尔瓦雷斯少尉说，他从直升机上下来之后，从高地向下走，此时他听见了山坡上的爆炸声。他向那个方向跑去，看见了大约十个人带着步枪和冲锋枪落荒而逃。“我们在那里待了几分钟，想看看进攻是在哪里发起的。”少尉说，“当时，我们听见有人在地势很低的地方求救。”于是他着急地向下跑，然后碰到了一个男人，男人向他喊：“请您帮助我。”少尉也向他喊道：“站住！您是谁？”那人回答说他是理查德，是个记者，需要帮助，因为迪安娜·图尔巴伊也在那儿，她受伤了。少尉说，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他脱口而出：“巴勃罗在哪里？”理查德回答：“我不知道，但是请您帮帮我。”于是，这名军人向他警惕地走去。之后，小组的其他人也到了那里。少尉总结道：“对我们来说，在那里找到记者们是意外所得，因为这不是我们的目标。”

他对这次碰面的叙述几乎与理查德·贝塞拉向检察院叙述的内容完全吻合。后来，理查德·贝塞拉还扩充了他的声明，声称看见了向他和迪安娜射击的男人。那个人站立着，双手伸向左前方，距离他们大约十五米远。“枪击声刚刚响起的时候，”理查德说，“我还没有趴在地上。”

至于导致迪安娜死亡的那枚子弹，化验结果证明，它从左侧髂骨进入，紧接着向右上方移动。创口很小，说明那是一颗高速运行的子弹，秒速在两千到三千英尺之间，也就是音速的三倍左右。子弹无法找回，因为它碎成了三部分，重量减轻了，形状也发生了改变，最后

变成了不规则的碎块，在她体内继续移动，造成了致命的脊柱碎裂。几乎可以确定，那是一颗直径五点五六毫米的子弹，可能是由奥地利AUG突击步枪或是技术条件与之类似的武器射出的，因为在事发地点找到了一把该型号的步枪。这种步枪并不是警方的常规武器。在尸检报告的空白处有一条注解："迪安娜的预期寿命本来还有大约十五年。"

现场一名戴手铐的平民的出现是该行动最让人好奇的疑点。他也在把受伤的迪安娜送到麦德林的直升机上。两名警方特工都认为他是一个农民，年龄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他脸色黝黑，头发很短，身材有些粗壮，身高差不多一米七，那天戴着一顶布帽。他们说，他是在行动中被逮捕的。当双方开始交火的时候，他们试图让他表明自己的身份，因此不得不逮捕他，在上直升机之前一直带着他。其中一名警员补充说，自己把他交到了少尉手里，少尉当着他们的面质问他。后来，少尉在找到他的地点附近把他放走了。"那位先生与这事无关，"他们说，"因为枪击声是从下面传来的，而当时这位先生和我们一起在上面。"这些说法都否认了这位平民曾经上过直升机，但是机组成员的证词完全相反。另一些声明则更加具体：路易斯·卡洛斯·里奥斯·拉米莱斯中士是直升机上的技术炮兵，他确定那个男人就在直升机上，并在当天被送回了行动地区。

一月二十六日，何塞·翁贝尔托·巴斯克斯·穆纽斯的尸体出现在麦德林附近的希拉多塔市，谜团还在发酵。他被三颗九毫米子弹击中身亡，一颗击中胸腔，两颗击中头部。情报机构的报告将他描述为有严重犯罪记录的麦德林集团成员。调查人员用数字五来标记他的照片，把它同其他已经确认身份的犯罪分子的照片混在一起，然后将这些照片展示给曾和迪安娜·图尔巴伊关押在一起的囚徒。埃罗·布斯说："我

不认识其中任何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五号有点像我在被绑架几天后见到的一名杀手。”阿苏塞娜·里埃瓦诺也说，五号照片上的人像在迪安娜和她被绑架后待的第一栋房子里值夜班的看守，但是那个看守没有胡子。理查德·贝塞拉也认出了五号照片上的人，说他戴着手铐出现在直升机上，但又解释说：“我觉得脸型很像，但是我不确定。”奥兰多·阿塞维多也认出了他。

最后，巴斯克斯·穆纽斯的妻子认出了这具尸体。她在声明中说，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八点，她的丈夫出门想打一辆出租车，两个身穿警服、骑着摩托车的男人和两名平民装扮的男人在街上抓住了他，把他塞进了一辆车里。他大声叫着她的名字：“安娜·露西娅。”但是，他已经被带走了。然而，这份声明不能算数，因为没有其他目击者。

“总之，”报告指出，“考虑到证人提供的证词，可以确定在拉·波拉农场的行动之前，国家警察局负责此次行动的成员已经通过受他们控制的巴斯克斯·穆纽斯先生得知几位记者的囚禁地。而且可以肯定，行动结束以后，他们杀死了他。”在事发地点发生的另外两起难以解释的死亡事件也已经被查明了。

特别调查处总结说，没有证据证明戈麦斯·帕蒂亚和国家警察局的其他高层领导知道这件事。打伤迪安娜的武器不是由麦德林国家警察局特种部队的成员使用的。在现场找到了三个平民的尸体，拉·波拉行动小组的成员应该为他们的死亡负责。特别调查处将对军事刑事诉讼93号法官迭戈·拉法埃尔·德尔·科莱伊·涅托博士和他秘书的反常行为正式展开彻底、循序渐进的纪律调查，就像对波哥大安全管理部专家进行的调查一样。

这份报告公布之后，比亚米萨尔在给埃斯科瓦尔写第二封信时觉得更踏实了。他跟往常一样通过奥乔阿一家把信寄给埃斯科瓦尔。他还给玛露哈写了一封信。他恳求埃斯科瓦尔让她收到这封信。利用这个机会，他向埃斯科瓦尔解释了国家的三种权力：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让他明白，对于总统来说，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掌控像军队这样数目众多、结构复杂的机构是多么不易。然而，在揭露公安机关侵犯人权的行为方面，他赞同埃斯科瓦尔的做法。埃斯科瓦尔坚持要求，在投降时，政府要保障他本人、家人和下属的安全。对此，比亚米萨尔也表示赞同。“我赞同您的观点，”他向埃斯科瓦尔写道，“我和您进行的斗争本质是相同的：拯救我们自己和我们家人的生命，同时争取和平。”基于这两个目的，他提议采取联合的策略。

几天后，埃斯科瓦尔给他回信，他的自尊心因为信中的普法课程而受到了伤害。“我知道国家被分为总统、国会、警察和军队。”他写道，“但是，我也知道总统是统治者。”余下的四页信纸再三抨击了警方的行为，而且只是增加了资料，并没有提供证据。他否认“可被引渡者”处决了迪安娜·图尔巴伊，他们也没有这么做的打算，因为如果是那样，他们不需要把她从囚禁的房子里带出来。他还否认他们让她穿上了黑色的衣服，令直升机上的人把她误认为农妇。“她不是作为人质死去的。”他写道。最后，他既没有过渡，也没有客套，用了一句非同寻常的话结尾：“您别因为您曾经向媒体发表要引渡我的宣言而担心。我知道一切都会好的，我不会心怀怨恨，因为您的斗争和我的斗争有着相同的目的，都是为了保卫家人。”比亚米萨尔把这句话和埃斯科瓦尔之前说的话联系在了一起，他之前说过他感到很羞愧，因为人质是玛露哈，但和他抗争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她的丈夫。比亚米萨尔用另一种说法质问他：“为什么斗争的是我们俩，在你们手里的却是我的妻

子？”因此，比亚米萨尔提议，把他和玛露哈交换，让他亲自和他谈判。埃斯科瓦尔没有接受。

当时，比亚米萨尔已经去了二十多次奥乔阿家族所在的监狱。他享受着拉·洛玛农庄的女人们给他们送去的当地美食，她们小心翼翼地提防着各种袭击。这是一个相互了解、互相信任的过程，他们最重要的帮助是解读埃斯科瓦尔每句话和每个动作中的深层意图。比亚米萨尔几乎总是搭乘最后一班飞机回波哥大。他的儿子安德烈斯经常得带着矿泉水在机场等他，让比亚米萨尔独自缓慢地喝水，从紧张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他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没有出席任何社交活动，也没有和朋友见面：一次也没有。压力大的时候，他会走到露台上，朝着玛露哈所在的方向长久凝望。一连几个小时，他向她传送着精神信息，直到困意来袭。早晨六点，他又一次站起来，准备好重新开始。当他们收到回信，或是其他与之密切相关的事物的时候，玛尔塔·妮耶维丝或是玛丽亚·莉娅会给他打电话，只要一句话就够了：

“医生，明天十点。”

没有电话的时候，他会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哥伦比亚呼唤他们回来》上。那是一档电视宣传节目，内容以贝阿特利丝提供的关于监狱条件的资料为基础。这是国家媒体联合会（Asomedios）会长诺拉·萨宁的主意，由玛丽亚·德尔·罗萨里奥·奥尔蒂斯（玛露哈的好朋友、埃尔南多·桑托斯的外甥女）、她的撰稿人丈夫，以及格萝莉娅·德·加兰和家庭中的其他成员（莫妮卡、阿莱桑德娜、胡安娜和她们的兄弟姐妹）一起着手推行。

每天都有来自电影、戏剧、电视、足球、科学和政治领域的明星站台，传递同样的信息，要求释放被绑架者，尊重人权。从第一次播

出开始，这档节目就掀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阿莱桑德娜带着摄像机，在全国范围内追逐着明星。在节目播出的三个月里，有大约五十位名人参与其中，但是埃斯科瓦尔并没有被打动。大键琴演奏家拉法埃尔·普亚纳说，他可以跪下请求埃斯科瓦尔释放被绑架者，埃斯科瓦尔回复说：“三千万哥伦比亚人都可以跪着来找我，但我不会释放人质。”然而，在写给比亚米萨尔的一封信里，他称赞了这一节目，因为他们不仅为了人质的自由而战斗，还为了尊重人权而斗争。

玛露哈的女儿和她们邀请的嘉宾在电视屏幕上出现时的轻松自如让帕丘·桑托斯的妻子玛丽亚·维多利亚非常不安，因为她面对镜头时总是无法克服害羞心理。意外出现的麦克风、聚光灯不知廉耻的光束、摄像机严厉的眼神和总是等着同样答案的同样问题让她因为惊慌而恶心，勉强才能抑制这种情绪。在她生日那天，他们制作了一条电视简讯。在这条简讯里，埃尔南多·桑托斯专业而流利地说了一段话，然后挽着她的手臂说：“献给您。”她几乎总是能逃开，但有时候她不得不面对。她不仅认为这种尝试让人想死，还认为在屏幕里看见自己的模样、听见自己的声音是荒谬和愚蠢的。

而她对社交活动的态度却完全相反。她学习了小企业管理和新闻学的课程。她决心变得自由自在并热衷于聚会。她接受过去曾会厌恶的邀请，出席各种会议和音乐会，穿上了活泼的衣服，而且熬夜到很晚。就这样，她摆脱了可怜的寡妇形象。埃尔南多和她最好的朋友们理解她，支持她，帮助她做自己。但是，很快她就受到了社交界的惩罚。她知道很多人当面赞扬她，背后却说她坏话。她收到了没有卡片的玫瑰花，没有署名的盒装巧克力，匿名的表白信。她幻想这些信是她丈夫寄来的，他也许开辟了一条从孤独通向她的密道。但是，寄信

人很快就通过电话表明了身份：那是个疯子。有一个女人也打来电话直截了当地向她表白：“我爱上您了。”

在那自由而富有创造力的几个月里，玛丽亚维偶然遇见了一个能预测未来的朋友，她曾经预见了迪安娜·图尔巴伊的悲惨命运。只要想到她可能会做出不祥的预测，玛丽亚维就觉得害怕，但是这位朋友让她冷静了下来。二月初，她们又一次遇见时，这位朋友凑到她耳边说：“帕丘还活着。”事先没有人向这位预言师提问，她说出预言后也不期待任何答复。她说这话的时候是如此肯定，玛丽亚维非常相信她的话，仿佛她亲眼见到了帕丘。

二月，埃斯科瓦尔似乎不相信这些法令，尽管他声称自己相信。不信任对他来说是根本的信条。他总说，也多亏了这个信条，他现在还活着。他不会把重要的东西授权给别人。他是他自己的军队长官，他自己的安全长官、情报长官、反情报长官、令人意想不到的战略家和独一无二的间谍。在极端情况下，他会每天更换八名私人保镖。他掌握各种通信技术、有线干扰技术和信号追踪技术。他雇人整天用他的电话进行疯子般的对话，让窃听内容变成繁杂的胡言乱语，这样真实的信息就无法被辨认出来。警方开通了两个电话号码，让人们提供关于埃斯科瓦尔下落的信息。同时，埃斯科瓦尔与小学签约，让孩子们二十四个小时内都不停地打告发电话，这样告发人就打不进去。为了不让他的行动留下把柄，他有无穷无尽的狡猾手段。他不向任何人咨询建议。他把法律方面的策略告诉他的律师，他们只负责赋予这些策略法律依据。

他拒绝面见比亚米萨尔是因为害怕他在皮肤底下安置了能追踪他的电子设备。那实际上是一种带有电池的微型无线发射器，它的信号能被一种特殊的接收器（无线电测向器）远距离捕获，然后通过电脑

确定信号的大致位置。埃斯科瓦尔非常相信这种高级的技术，如果有人在皮肤底下植入发射器，他也不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无线电测向器也可以确定广播、移动电话或有线电话的坐标。因此，埃斯科瓦尔尽可能地避免使用这些设备。如果有必要，他会在行驶的车辆上使用它们。他使用手写的信函。如果他与某人见面，他不会约在他所在的地点，而会去对方的所在地。结束会面之后，他会朝着难以预测的方向离开。或者，他会走向科技的另一个极端：坐上一辆带着伪造车牌和伪造标记的小型公共汽车，汽车会沿着常规路线行驶，但不会在车站停靠，因为车上坐满了车主的保镖。对了，埃斯科瓦尔的一项娱乐就是偶尔充当一下公共汽车的司机。

二月，制宪议会支持不引渡和赦免毒贩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了。埃斯科瓦尔明白这一点。与针对政府的力量相比，他在这个方向上集中了更多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加维里亚应该比他想象的更加强硬。与投降法令相关的一切内容都在刑事诉讼法庭进行了重新讨论，司法部长为了处理各种司法紧急案件一直保持着警惕。比亚米萨尔不只以自己的名义行动，也以自己的名义承担着风险。但是与拉法埃尔·帕尔多的密切合作让他和政府维持着直接联系，这种联系并不会让他处于危险之中。相反，这让他不需协商就能取得进展。当时，埃斯科瓦尔应该已经明白，加维里亚永远不会指派官员与他协商——这是他的幸福美梦，无论是作为一个懊悔的生意人，还是作为武装集团的暗中操控者，他都会抓住制宪议会可能会赦免他的希望。这并不是一个疯狂的估测。在制宪议会设立之前，各个政党已经一致确立了封闭式议题的议程，政府援引法律依据不将引渡问题纳入议程，因为政府需要把它作为投降政策的施压工具。但是，最高法院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决定：制宪议会可以没有限制地处理任何议题，于是引渡议题又死灰复燃了。赦免没有被提及，但也是有可能的：一切都不受限制。

加维里亚总统并不是那种因为其他议题就放弃某个议题的人。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他在他的助手中推行了一种私人通信系统：在任意纸条上书写能概括一切的短句。有时，他只写上收件人的名字，然后把纸条交给身边的人，收件人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做。然而，对于他的助手来说，这种方法非常恐怖，因为它不区分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加维里亚对此没有意识，他在休息和工作时都同样严于律己。他在鸡尾酒会上或是刚结束潜水捕鱼时，都和往常一样传递小纸条。“和他一起打网球就像是在参加部长会议。”一名顾问说。他能在办公桌上深度小睡五到十分钟。当他的助手昏昏欲睡的时候，他醒了过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尽管看起来非常随意，但是这种方法跟正式的备忘录相比，能够更加及时、有效地开展行动。

当总统试图阻止最高法院打击引渡时，这个通信系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总统据理力争，他说这是法律问题，不是宪法问题。政府部长翁贝尔托·德·拉·卡耶一开始就说服了大多数人，但是与民众利益攸关的事务最终胜过了与政府利益攸关的事务。人们认为引渡是导致社会混乱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导致野蛮的恐怖主义的因素之一。因此，众多曲折之后，引渡最终被纳入了权利委员会的提纲。

尽管如此，奥乔阿一家一直担心被心魔围困的埃斯科瓦尔会决定在一场毁灭性的斗争中背水一战、玉石俱焚。这是具有先见之明的担忧。三月初，比亚米萨尔从他们那里收到了一条紧急信息：“您赶紧过来，大事不好了。”他们收到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信，信上威胁说，如果不制裁摧毁麦德林贫民窟的警察，他就会引爆卡塔赫纳·德·印第亚斯历史城区的五十吨炸药：每一百公斤炸药代表一个因为失去战斗力而死去的男孩。

在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以前，“可被引渡者”认为卡塔赫纳是不能触碰的圣地。但是那天，爆炸晃动了大地，炸碎了希尔顿酒店的玻璃，还炸死了两名在另一个楼层开会的医生。从那时起，这处人类遗产显然也无法在战争中幸免。新的威胁不容许片刻的犹豫。

离最后期限还有几天，加维里亚总统通过比亚米萨尔得知了这个消息。“现在，我们不是在为玛露哈而战，而是为了拯救卡塔赫纳而战。”比亚米萨尔对他说，以此作为催促政府有所行动的托词。总统回答说，他很感激他的情报，政府会采取行动阻止灾难发生，但是绝对不会向讹诈行为让步。因此，比亚米萨尔再次前往麦德林。在奥乔阿一家的帮助下，他劝阻了埃斯科瓦尔。这并不容易。在到达期限的前几天，埃斯科瓦尔在一张仓促写成的字条上保证，记者们暂时安全了，他还延迟了在各大城市引爆炸弹的时间。但是，同样不容商议的一点是：如果四月之后麦德林警方还继续行动，古老高贵的卡塔赫纳·德·印第亚斯城就会片瓦不存。

---

[1] 哥伦比亚东北部城市。

九

玛露哈独自一人留在房间里，她意识到自己正在一群可能杀死了玛丽娜和贝阿特利丝的人手里。他们拒绝把收音机和电视机还给她，以免她得知真相。她羞怯的请求变为了愤怒的要求，她冲着看守们大喊大叫，想让邻居们听见她的叫声。她不再散步，还威胁说再也不吃饭了。“管家”和看守们因这种意料之外的状况而感到惊慌，手足无措。他们在无用的秘密会议中窃窃私语。他们出门打电话，回来的时候比原来更加愁眉不展。他们试图用虚幻的承诺让玛露哈冷静下来，或是用威胁的话语恐吓她，但是他们无法让她放弃绝食的念头。

她前所未有地觉得她能很好地掌控自己。很显然，看守们得到了不能虐待她的指示，她打赌他们需要不计代价地让她活下去。她的预测是正确的：贝阿特利丝被释放三天后的清晨，房门毫无预兆地打开，“管家”带着收音机和电视机走了进来。“您马上会知道一件事。”他告诉玛露哈，接着平淡地说出了这个消息：

“玛丽娜·蒙托亚女士已经死了。”

与她本人预料的完全相反，玛露哈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表现得仿佛她一直知道这件事。对她来说，如果玛丽娜还活着，那才令人吃惊。然而，当真相抵达心底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爱她。如果能够改变这个事实，她可以付出一切。

“凶手！”她对“管家”说，“你们都是凶手！”

在那一刻，“博士”出现在了门口，他想安慰玛露哈。他告诉她，贝阿特利丝在家里过得很幸福。但是，只要她没有亲眼在电视上看见，没有亲耳在广播里听到，她什么都不会相信。相反，她觉得这个刚刚到来的男人只是受命来安慰她的。

“您很久没来了，”她说，“我能理解您：您应该为自己对玛丽娜做的事感到羞耻吧。”

他好一阵才从惊讶中平复过来。

“怎么回事？”玛露哈挑衅他，“她就该死吗？”

他解释说，这是为了给两个人复仇。“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说。他又重复了一遍以前说过的话：“这是政治。”玛露哈带着少见的痴迷听他说话，是那种给明知自己将要死去的人传达死亡消息的痴迷。

“至少告诉我是怎么进行的。”她说，“玛丽娜察觉到了吗？”

“我向您发誓，她没有察觉。”他回答。

“但是怎么会没有察觉！”玛露哈坚持说，“她怎么会察觉不到！”

“他们告诉她，她会被带到另一个农场。”他尽力让她相信他的话，“他们让她下车。她一直向前走，然后他们从她脑后开了枪。她什么都没有察觉。”

玛丽娜反戴着风帽，朝假想的农场摸索着走去。这幅画面将在许多失眠的夜晚纠缠玛露哈。与死亡本身相比，她更害怕最后时刻的清

醒。唯一能带给她安慰的是她像珍珠一样珍藏的那盒安眠药。在他们把她拖去屠宰场之前，她可以吞下一把。

在正午新闻中，她终于看见了贝阿特利丝，她在一间摆满了鲜花的公寓里和家人在一起。尽管有了一些变化，但她立刻认出了那间公寓：那是她的公寓。然而，对新装饰的厌恶破坏了见到贝阿特利丝的喜悦之情。她觉得新书架很不错，而且就在她想要的地方。但是，墙壁的颜色和地毯让人无法忍受，而且唐代马俑被放在了最碍事的地方。她无视自己的处境，开始责骂丈夫和孩子们，仿佛屏幕里的他们能听见她的声音。“太粗俗了！”她喊道，“这跟我说的完全是两码事！”获得自由的愿望一瞬间变成了历数他们糟糕做法的渴望。

在这场对感觉与情感的折磨中，白天变得难以忍受，黑夜变得无比漫长。她睡在玛丽娜的床上，盖着她的毯子，闻着她的气息，受到了极大的触动。渐渐入睡的时候，她在黑暗里听见了玛丽娜像蜜蜂嗡鸣一样的低语，仿佛玛丽娜就睡在同一张床上，在她的身边。一天晚上，真正的奇迹出现了，那不是幻觉。玛丽娜用鲜活、温热、柔软的手抓住了她的手臂，用自然的嗓音在她耳边轻声说道：“玛露哈。”

她认为这不是幻觉，因为在雅加达的时候，她也有过奇幻的经历。她在一个古董集市上购买了一尊真人尺寸的英俊少年雕像，他的一只脚踩在一名战败的孩子头上。他有一个类似于天主教圣人的光环，但光环是铜质的，风格和材质让人觉得这是低劣的附加品。当她把雕像放在家中的最佳位置时，她才意识到他是死神。

一天晚上，玛露哈梦见自己试图把雕像的光环摘下来，因为她觉得它太难看了，但是没有成功。光环是用青铜焊在雕像上的。醒来时，她为这段糟糕的回忆感到不快。她急忙去看客厅里的雕像，发现

死神没有了光环，光环被丢在了地上，就像她梦境的结尾那样。玛露哈（一位理性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安慰自己，是她本人在一场被遗忘的梦游中摘下了死神的光环。

在监禁生活之初，对玛丽娜顺从态度的恼怒支撑着她。后来，对玛丽娜悲苦命运的同情和鼓励她活下去的希望支撑着她。当贝阿特利丝失去控制的时候，她假装自己拥有她并不具备的力量；当逆境把她们压垮的时候，要尽力让自己保持平静的责任感和必要性支撑着她。在这个三米长两米半宽、阴郁且臭气熏天的空间里，她们睡在地上，吃着厨房的剩菜，无法确定下一分钟会不会死去。有人得承担起领导的职责，不能被打倒，而这个人就是她。但是，当房间里没有其他人的时候，她没有理由伪装下去：她孤独地面对着自己。

她肯定，贝阿特利丝已经把通过广播和电视与她沟通的方法告诉了她的家人，这使她保持着警惕。比亚米萨尔确实带着他振奋人心的嗓音出现了几次，她的孩子们也用想象力和幽默感安慰她。在最近两周，没有任何征兆，联系突然中断了。于是，一种被遗忘的感觉充斥着她。她被打倒了，她不再散步，面朝墙壁躺着，远离一切。吃饭、喝水只是为了勉强维持生命。她又一次感受到了十二月时折磨她的疼痛、痉挛和大腿上的刺痛，有必要再去请医生了。但是这一次，她甚至没有发出呻吟。

看守们因为私人冲突和内部分歧而魂不守舍，他们不再管她。食物在餐盘里冷掉，“管家”和妻子似乎对此毫不知情。日子变得越来越漫长，越来越枯燥。有时候，她甚至会想念最初几天里更糟糕的时刻。她失去了对生活的兴趣。她哭了。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她惊恐地发现，她的右臂自动抬了起来。

二月份的看守是上帝的恩赐。巴拉巴斯那伙人没有来，换成了四名新来的少年，他们认真、守纪律而且态度保守。他们彬彬有礼，十分健谈，这让玛露哈松了口气。他们一来就邀请她一起玩任天堂游戏，一起看娱乐节目。游戏让他们更加亲近。她从一开始就发现，他们很有共同语言，这使彼此的交流更加方便。毫无疑问，他们收到指令，要用不同的方式对待她，瓦解她的抵抗，振奋她的精神。他们开始劝说她继续遵从医嘱，在院子里散步；让她想想她的丈夫和孩子，不要辜负他们的希望，因为他们想尽快看到健康的她。

这种氛围有利于互相倾诉衷肠。她意识到他们也是犯人，而且可能也需要她。玛露哈跟他们讲她和三个已经度过青春期的儿子的经历。她告诉他们在养育和教育儿子期间的一些重要事件，还讲了他们的习惯和爱好。看守们觉得自己被信任了，也跟她谈起了他们的生活。

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其中一个上过至少一个学期的大学。与之前的看守不同，他们说他们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但无论如何，他们被烙上了麦德林贫民窟文化的印记。年纪最大的看守二十四岁，他们叫他“蚂蚁”。“蚂蚁”个子很高，衣着考究，沉默寡言。父母在车祸中死去之后，他就中断了自己的大学学业。他没有找到其他出路，于是成了一名杀手。还有一个看守，他们叫他“鲨鱼”。他开心地说，他用一把玩具手枪威胁老师，通过了一半的中学课程。被叫作“陀螺”的看守是这组人中最开朗的，也是所有到过那里的看守中最开朗的一位，而且确实长得像陀螺。他很胖，有双很短很脆弱的腿。他疯狂地热爱跳舞。有一回，他吃完早饭后就在录音机里放了一盘萨尔萨音乐磁带，然后不停地跟着音乐疯狂地跳舞，一直跳到值班结束。最正经的一名

看守来自教师家庭，他热爱阅读文学书籍和报纸，对国家的现状非常了解。他只用一个理由解释自己这样生活的原因：“因为这很酷。”

就像玛露哈一开始猜测的那样，他们对人性化的对待方式不是无动于衷的。这不仅给了她活下去的动力，还让她机警地从中获利，看守们或许没有预见到这一点。

“你们别担心，我不会对你们做蠢事。”她告诉他们，“你们放心，我不会做任何被禁止的事，因为我知道囚禁生活很快就会顺利地结束。所以，你们这样束缚我是没有道理的。”

新来的看守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自主权——连他们的首领都没有拥有过。他们极大地放松了关押制度，这是玛露哈意料之外的。他们让她在房间里活动，用尽量自然的声音说话，还允许她不必在固定时间上厕所。由于在雅加达的经历，新的相处方式让她有了照顾自己的劲头。她很好地利用了一位老师在阿莱桑德娜的节目里为她设立的健身课程，这档节目似乎有着专门的主题：狭窄空间中的体育运动。她热情满满，以至于一名看守起了疑心：“难道这个节目中有什么传达给您的信息？”她费了很大功夫才使他相信并非如此。

在那几天，《哥伦比亚呼唤他们回来》的意外出现也让她非常激动。她觉得这个节目不仅构思巧妙、制作精良，还非常适合用来提振最后两名人质的精神。她觉得自己和家人的沟通更加顺畅，也更能体会他们的感受了。她觉得自己也会像他们那么做，这就像是一场战役、一剂药、一次舆论冲击。她和看守们打赌第二天谁会出现在屏幕上，她甚至能猜对。有一回，她打赌维姬·埃尔南德斯会出现，她是一位伟大的演员，也是她的好朋友。她赢了。无论如何，能看见维姬，听见她的口信，就是她在关押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

院子里的散步也开始有了效果。那只德国牧羊犬很高兴再次见到玛露哈，它试图钻过门下的缝隙，和她一起玩耍，但是她用爱抚让它冷静下来，因为她担心看守们起疑心。玛丽娜曾经告诉她，大门外是一个安宁的牧场，那里有很多羊羔和母鸡。玛露哈在清亮的月光下迅速向外看了一眼，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她还发现有一个拿着猎枪的男人在围栏外巡逻。在牧羊犬的通力合作下逃跑的幻想破灭了。

二月二十日，生活似乎已经恢复了节奏，他们通过广播得知，在麦德林的一个牧场上发现了孔拉多·普里斯科·洛佩拉医生的尸体，他是普里斯科集团首领的堂兄弟，在两天前失踪了。四天后，他的表兄弟埃德加·德·赫苏斯·博特罗·普里斯科被杀害。他们两人都没有犯罪记录。普里斯科·洛佩拉医生曾经给胡安·维塔看过病，没有隐瞒姓名也没有蒙面。玛露哈想，这会不会是几天前给她做检查的医生。

与一月份普里斯科兄弟的死亡一样，他们两人的死给看守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管家”和他的家人都十分紧张。贩毒集团会用一名人质给他们两人偿命（正如玛丽娜·蒙托亚的遭遇）的想法像一个不祥的影子在房间里游荡。第二天，“管家”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毫无理由地走进房间。

“我不想让您担心，”他告诉玛露哈，“但有一件很严重的事：一只蝴蝶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停在后院的大门上。”

玛露哈不相信无法看见的东西，她不理解他想说明什么。“管家”用他设想好的惊悚方式向她解释。

“另外几个普里斯科家族成员被杀害的时候发生了一样的事情，”他说，“一只黑蝴蝶在厕所的门上停了三天。”

玛露哈想起了玛丽娜的黑暗预感，但是她假装没有听懂。

“这能说明什么？”她问。

“我不知道。”“管家”说，“但这应该是个非常糟糕的预兆，因为玛丽娜女士就是在那时被杀害的。”

“现在那只蝴蝶是黑色的还是浅咖啡色的？”玛露哈问他。

“浅咖啡色的。”“管家”回答。

“那就是吉兆，”玛露哈说，“黑蝴蝶才是凶兆。”

“管家”没能吓到她。玛露哈了解她的丈夫，了解他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她不认为他会迷糊到因为一只蝴蝶而失眠。她知道，他和贝阿特利丝都不会泄露任何有利于武装营救的信息。然而，她已经习惯把内心的起伏解读成外部世界的投影。她没有否认，一个月内同一个家族五名成员的死亡会给最后两名人质带来可怕的后果。

相反，制宪议会对引渡有疑问的传言应该让“可被引渡者”松了一口气。二月二十八日，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加维里亚总统宣布，他坚决不计任何代价维护引渡。但是声明没有引起很大反响：不引渡已经变成了国民情绪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既不需要贿赂也不需要恐吓就能顺利推行。

在循环往复的日常里，玛露哈继续认真关注着这些事件。在她和看守们玩多米诺骨牌的时候，“陀螺”突然结束了游戏，最后一次收起了骨牌。

“明天我们就走了。”他说。

玛露哈不相信他说的话，但是那个教师的孩子证实了这个消息。

“是真的，”他说，“明天巴拉巴斯组的人会过来。”

这是玛露哈必然难忘的黑色三月的开始。离开的看守似乎接受过减轻刑罚的训练，而到来的看守毫无疑问是为了让她的监狱生活变得无法忍受。他们就像地震般破门而入。“和尚”又高又瘦，他比上次更阴郁、更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剩下的还是那些人，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巴拉巴斯用电影里杀手般的气质领导着他们，他下达了严格的命令，让他们寻找某件不存在的东西，或者用假装找到这件东西来吓唬人质。他们粗鲁地把房间翻了个遍。他们弄坏了床，掏空了床垫，又胡乱地把填充物塞回去，让她很难在不平整的床上继续睡下去。

日常生活又变得和原来一样。如果她没有马上执行命令的话，他们会随时端起武器准备射击。巴拉巴斯跟玛露哈说话时，总是用机关枪指着她的脑袋。她和往常一样威胁他说，她会向他的首领举报他。

“我不会因为您擦枪走火就死的，”她对他说，“您别动，否则我就举报。”

这一次，这个方法没有奏效。然而，很显然，这种混乱既不是恐吓性的也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而是由于士气彻底低落而产生的系统性混乱。连“管家”和妲玛莉丝之间同往常一般的频繁争吵都变得非常可怕。“管家”会不定时从街上回来，几乎总是因为醉酒而非常粗鲁，不得不面对他妻子粗俗的指责，有时干脆就不回来。两人大喊大叫，女儿被惊醒后哭了起来，整座房子不得安宁。看守们夸张地模仿他们、

嘲笑他们，吵闹声变得更大了。一片混乱中，完全没有外人出现，哪怕是出于好奇，这令人费解。

“管家”和他的妻子分别找玛露哈倾诉。妲玛莉丝这么做是因为情理之中的妒火，这让她片刻不得安宁。“管家”试图找出安慰妻子的方法，但他不愿放弃他的恶习。玛露哈出色的调解能力也只能维持到“管家”的下一次鬼混之前。

在一次争吵中，妲玛莉丝把她丈夫的脸抓伤了，伤疤过了很久才消退。他打了她一下，把她甩出了窗户。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因为最后的时刻，她挂在了院子的阳台上。这是最后的结局。妲玛莉丝收拾好行李，带着女儿们去了麦德林。

房子落在了“管家”一个人的手里。有时候，他直到傍晚才会带着酸奶和几袋炸薯条出现，偶尔才会带一只鸡。看守们厌倦了等待，便把厨房洗劫一空。回房间的时候，他们会给玛露哈带一点剩下的饼干和生香肠。无聊让他们变得更加敏感和危险。他们辱骂父母，辱骂警察，辱骂全社会。他们细数自己无用的罪行，故意说着渎神的话，以此证明上帝并不存在。在讲述自己性生活中的伟大事迹时，他们达到了疯狂的极致。一名看守说，他为了报复一位情人的嘲笑和侮辱，对她做了极其不堪的事。在仇恨和失控中，他们用大麻和古柯膏麻痹自己。房间的烟雾让人无法呼吸。他们把收音机开得震天响，摔门进出，蹦蹦跳跳，唱歌跳舞，在院子里翻跟头。其中一名看守仿佛一个疏于管理的马戏团中的职业杂耍艺人。玛露哈威胁他们说，喧闹声会引起警察的注意。

“让他们来吧，让他们杀了我们吧！”他们一齐喊道。

玛露哈觉得自己已经到达极限了，她尤其无法忍受神志不清的巴拉巴斯。他热衷于用机关枪枪管顶着她的太阳穴把她弄醒。她开始掉头发。清晨，充满了松散纱线的枕头从她睁眼开始就压迫着她。

她知道每一个看守都是不同的，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弱点，他们没有安全感，而且相互都不信任。玛露哈利用她自身的恐惧激化了这些特点。“你们怎么能这么活着？”她会突然问他们，“你们相信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友谊吗？”在他们有所反应之前，她进一步逼问：“承诺对你们来说有意义吗？”他们没有回答，但是内心的答案大概让他们心神不宁，因为他们没有反抗，反而在玛露哈面前卑躬屈膝。只有巴拉巴斯与她对峙。“狗屎独裁者！”有一次，他朝她喊，“你们觉得自己能永远统治下去吗？现在不行了，去你妈的，这事结束了！”玛露哈非常害怕，但是她带着同样的愤怒面对他。

“你们杀了你们的朋友，你们的朋友会杀了你们，所有人都互相残杀。”她冲他大叫，“谁会理解你们？你们谁来告诉我，你们到底是什么畜生？”

巴拉巴斯或许因为无法杀死她而感到绝望，他朝墙上打了一拳，伤到了手腕上的骨头。他发出野人般的叫声，开始愤怒地哭泣。玛露哈没让自己因为同情而心软。“管家”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并徒劳地努力改善晚饭的伙食。

玛露哈想，在这样的混乱中，他们怎么还能继续相信低声的对话、房间里的囚禁、由于安全因素而限制广播和电视的使用是有意义的。这样的癫狂让她觉得无聊，她开始反抗无用的监狱规定，她用自然的声音说话，随心所欲地上厕所。然而，她越来越害怕暴力，尤其是当“管家”让她和两名值班看守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一天上午，剧

情到达了高潮。当她在花洒下抹肥皂的时候，一名蒙面看守闯进了厕所。玛露哈及时用毛巾盖住了自己的身体，她恐惧地大声尖叫，尖叫声可能传遍了整座房子。由于害怕邻里的反应，他愣住了。他非常紧张，但是没有人出现，连一声叹息也没有。看守踮起脚向后退，仿佛他刚刚是走错了门。

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时刻，“管家”带着另一个女人出现了，她很快就掌握了家里的大权。但是他们俩并没有控制住家中的混乱，反而加剧了这种乱象。那个女人在他烂醉如泥的时候跟他一样醉，而过去他要是喝醉了，事情总是以殴打和摔瓶子告终。吃饭时间变得无律可循。他们每周日都出门喝酒，玛露哈和看守们直到第二天才有东西吃。一天清晨，玛露哈单独在院子里散步，四名看守去洗劫厨房，而把机关枪留在了房间里。一个想法让她不寒而栗。她一边和牧羊犬交谈，抚摸它，和它轻声说话，一边仔细地斟酌那个想法。牧羊犬高兴地舔着她的手，心照不宣地发出哼哼声。巴拉巴斯的叫声把她从幻想中拉了回来。

这就是幻想的结局：他们把牧羊犬换成了一只面貌凶残的狗。他们禁止她散步，持续不断地监视她。当时，她最害怕的事是被塑料内芯的锁链绑在床上。巴拉巴斯把锁链卷起来，又展开，仿佛这是一串铁质念珠。玛露哈洞悉了他的意图。

“如果我想离开这里，我早就已经离开了。”她说，“好几次我都单独一人。我没有逃跑，那是因为我不想逃跑。”

大概是有人告了状，一天上午，“管家”带着可疑的谦卑态度走了进来，并说了一堆借口。他说自己非常羞愧，小伙子们往后会好好表现；他受命去找了他的妻子，她已经回来了。确实如此：妲玛莉丝回

来了，她和过去一样，带着两个女儿，穿着色彩鲜艳的苏格兰迷你裙，煮着让人厌烦的兵豆。第二天，两名戴面具的首领带着同样的态度到来，他们粗暴地揪出四名看守，并且强制整顿了秩序。“你们再也不会回来了。”其中一名首领坚决得令人不寒而栗。他说到做到。

当天下午，他们派来了高中毕业生小组，二月的安宁就这样神奇地回来了：静止的时间，各种杂志，枪炮与玫瑰的音乐还有梅尔·吉布森的电影。电影里的雇佣枪手有着放荡不羁的内心。少年看守们和她的儿子们一样喜爱这些音乐和电影，这让玛露哈非常感动。

三月底，两个陌生人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他们戴着看守们借给他们的风帽，以免露脸说话。其中一个陌生人没等和她打招呼就开始拿裁缝用的米尺测量地面。与此同时，另一个陌生人试图博取玛露哈的好感。

“很高兴认识您，女士，”他说，“我们来给房间铺地毯。”

“给房间铺地毯！”玛露哈怒不可遏地大叫，“你们滚出去！我只想离开这里！马上离开！”

无论如何，最让人惊愕的不是地毯，而是地毯的含义：她的释放日期被无限延后了。后来，一名看守告诉她，她的解读是错误的，因为这也许意味着她很快就要离开了，他们是为了其他更需要慎重对待的人质翻修房间。但是，当时玛露哈确信，这可以理解为她生命中在这里度过的又一个年头。

帕丘·桑托斯也不得不想办法给他的看守们找点事做。当他们厌倦了打牌，厌倦了连续十次看同一部电影，厌倦了讲述他们充满男子气概的英雄事迹，便开始像笼中的狮子一样在房间里绕圈。能通过风帽

上的小洞看见他们通红的眼睛。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休几天假，也就是说：在连续一周的狂欢中疯狂地喝酒吸毒，回来之后变得更糟糕。吸毒是被禁止的，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不仅仅在工作时禁止。但是，瘾君子总能找到摆脱上级监视的方法。日常的毒品是大麻，但是在困难时刻，他们会自制大量让一切不幸都心生畏惧的古柯膏。其中一名看守在过完狂欢之夜后，闯进房间，号叫一声吵醒了帕丘。魔鬼般的面具几乎贴在了他的脸上，他看见了充血的眼睛和一些落在耳旁的卷曲毛发。他闻到了地狱的硫黄味道。那是一名想和他一起结束狂欢的看守。“您不知道我有多混蛋。”早上六点，他在喝双份烧酒时说。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仅仅出于意识无法控制的冲动，他自说自话地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最后他因为醉酒而神志不清。当时，帕丘之所以没有逃跑，是因为他在最后时刻缺乏了勇气。

在他的监狱生活中，玛利亚·维多利亚首创的私人简讯是最能鼓舞他的文字，《时代报》毫不遮掩、毫无保留地在它的版面上发布这些简讯。其中一篇简讯附上了孩子们的近照。他立即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内容尽是恐怖的真相。对于没有遭遇过这些事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十分荒谬：“我坐在这个房间里，被绑在一张床上，眼里充满了泪水。”从那时起，他给妻子和孩子们写了一系列发自肺腑的信，但他永远无法把这些信寄出去。

玛丽娜和迪安娜死去之后，帕丘失去了所有的希望。这时，逃跑的可能性来到了他面前。毫无疑问，他在城市的西边，他所在的街区是最靠近波雅卡大街的几个街区之一。他很熟悉这一片，因为在高峰期的时候，他从报社回家时总会走这条路来避开拥堵，他被绑架的那天晚上，他的车就是往这个方向行驶的。这里的大部分建筑应该都是成片的居民区，房子也是千篇一律的：车库的大门，小型花园，能看

街景的二楼房间，而且所有的窗户都装有漆成白色的防护铁栏。他甚至在一周内确定了比萨店的距离，还确定了附近的工厂是巴伐利亚啤酒厂。那只发疯的公鸡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细节。起初，它随时会叫；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于不同地点叫：有时它离得很远，会在下午三点叫；有时它就在他的窗边，会在凌晨两点叫。如果他们告诉他，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在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也能听见它的叫声，那么这个细节会更加令人不解。

他可以从走廊尽头、房间右边的一扇窗户跳下，窗户外面是一个封闭的小院子。接着他可以爬上覆盖着藤蔓的围墙，围墙旁边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他不知道围墙后面有什么，但既然这是一座街角的房子，那里应该是一条街道。而且，他几乎可以确定，那条街上有粮食店、药店和汽车维修店。然而，这可能是一个不利因素，因为那些可能是绑架者的伪装。事实上，帕丘曾经听到从那边传来讨论足球的声音，说话的两个人毫无疑问是他的看守。无论如何，翻过围墙逃走很容易，但是之后的一切就无法预料了。因此，另一个最好的选择是厕所，那是他唯一可以不带锁链去的地方，这是个不可或缺的优势。

他确定，逃跑必须在白天进行，因为他躺下之后从来不上厕所（即使他醒着看电视或是在床上写信），不同寻常的举动可能会暴露他。而且，店铺很早就会关门，邻居们在七点的新闻节目结束后就休息了，到了十点周围就不会有人出没。就连在波哥大震耳欲聋的周五夜晚，这里都只能听到啤酒厂缓慢的呼吸声或是涌入波雅卡大街的救护车短暂的鸣笛声。此外，晚上很难及时在荒凉的大街上找到藏身之处，人们会用插销和门闩锁上商店和住宅的大门，预防夜间的风险。

然而，三月六日，机会出现了——前所未有地转瞬即逝，而且是在晚上。一名看守带了一瓶烧酒，邀请他喝一杯。与此同时，他们在

收看一档关于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的电视节目。帕丘喝得很少，他只是想应付看守的要求。这位看守从那天下午开始值班，来之前就喝了酒。在那瓶烧酒喝完之前，他还没把帕丘绑起来就直接倒下了。帕丘非常困，没能看见从天而降的机遇。只要他想在夜间上厕所，他的值班看守就得陪着他去，但是他不愿意打扰看守幸福的醉态。他天真地走到漆黑的走廊，光着脚，穿着内裤，屏住呼吸走过其他看守睡觉的房间，其中一名看守鼾声如雷。直到那一刻，帕丘才意识到，机会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溜走了，而且最艰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他感觉到胃里一阵恶心，他的舌头被冻住了，心脏裂开了一道缝。“我不是因为逃跑而害怕，而是因为不敢逃跑而害怕。”他后来说。他在黑暗中走进卫生间，并带着不回头的决心把门调整好。另一个看守在半梦半醒之间推开门，用手电筒照亮了他的脸。他们俩都呆住了。

“你在做什么？”看守问。

帕丘坚定地回答他：

“拉屎。”

他想不出别的理由。看守不知如何回答，他点了点头。

“好吧，”他最后说，“拉得愉快。”

他眼睛都不眨一下，继续站在门口用手电筒的光束照着帕丘，直到帕丘煞有介事地拉完屎。

在那一周的时间里，他被失败的沮丧打垮了，他决定用一种彻底的、无法挽回的方式潜逃。“取出剃须刀的刀片，切断静脉，天亮时我就死了。”他告诉自己。第二天，阿丰索·亚诺斯·埃斯科瓦尔神甫在他

《时代报》的每周专栏上发表了一篇写给帕丘·桑托斯的文章，以上帝的名义命令他不要有自杀的想法。那篇文章在埃尔南多·桑托斯的办公桌上停留了三周，他一直犹豫要不要发表它——但他不知道为什么犹豫。一天前，他在最后时刻决定发表这篇文章，他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每次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帕丘都会重新经历一遍那天的惊愕。

四月初，一位拜访玛露哈的二级首领向她承诺，会替她求情，让她丈夫能给她寄一封信。她很需要这封信，这对她来说是精神和肉体的良药。他的话让人难以置信："没问题。"大约晚上七点的时候，那个男人离开了。十二点半左右，她在院子里散完步，"管家"急匆匆地敲门，因为门从里面被反锁了。"管家"交给她一封信。这不是比亚米萨尔通过基多·帕拉寄出的信，而是他通过豪尔赫·路易斯·奥乔阿寄出的，格萝莉娅·帕琼·德·加兰在这封信上写了安慰她的附言。在这张纸的背面，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亲笔写了一段话："我知道这对您和您的家人来说难以忍受，但是我和我的家人也非常痛苦。不过您别担心，我向您保证，无论发生什么，您都不会有事的。"最后，他透露了一个秘密，玛露哈觉得难以置信："您不要在意我的新闻公告，那只是用来向政府施压的。"

相反，她丈夫在信中写的话让她感到丧气，因为他很悲观。他告诉她一切顺利，但是让她保持耐心，因为等待时间可能会变得更加漫长。比亚米萨尔确信，这封信在交给玛露哈之前会被别人阅读，因此他在结尾写了一句话。这种情况下，这句话不是写给玛露哈的，而是写给埃斯科瓦尔的："请你为哥伦比亚的和平做出牺牲。"她被激怒了。她曾经数次感知到比亚米萨尔从露台上给她传出的精神信号，她

全心全意地回答他：“让我离开这里吧，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照过镜子了，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因为那封信，她又有了一个亲笔写信回复他的理由，告诉他，耐心什么耐心，她已经耐心十足地忍受了那么多恐怖的黑夜，对死亡的恐惧会让她突然惊醒。她不知道那是一封旧信，写在与基多·帕拉协商失败和与奥乔阿一家的最初几次见面之间，当时比亚米萨尔看不见一丝希望的曙光，所以写不出一封乐观的信。但是现在，她的自由之路似乎已经确定了。

幸运的是，这种误解让玛露哈意识到，她也许不是因为这封信而感到如此愤怒，而是因为更早之前对丈夫无意识的怨恨：如果阿尔贝托能够掌控事件发展的进程，为什么他会让他们先放了贝阿特利丝？在十九年的共同生活中，她从来没有时间、理由和勇气来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她给自己的答案让她意识到了真相：她能忍受这场绑架至今，是因为她完全肯定她的丈夫会倾注他生命的每一秒钟来解救她；即使没有希望，他也一刻都不会停歇，因为他确信她都明白。那是就连他和她都没有意识到的——爱的盟约。

十九年前，他们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相识，当时他们都是青年撰稿人。“我立马就喜欢上了阿尔贝托。”玛露哈说。为什么？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他无依无靠的气质。”这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第一眼看去，比亚米萨尔似乎是典型的脱离时代的大学生，头发及肩，胡子拉碴。他只有一件衬衫，下雨的时候才会洗。“我那时偶尔才洗一次澡。”现在谈起这事的时候，他哈哈大笑。第二眼看去，比亚米萨尔似乎是一个热爱聚会、游手好闲、脾气暴躁的人。但是玛露哈一下子见到了第三眼的他，一个会为了美丽女子失去理智的男人。如果这名

女子聪明、感性，他会为她痴迷；如果她既培养出了铁腕又有一颗洋蓟般柔软的心，他会彻底为她疯狂。

被问到喜欢玛露哈什么方面的时候，比亚米萨尔眨了眨眼。也许是因为除了显而易见的优雅之外，玛露哈似乎并没有能让人爱上她的更好资质。那时她三十岁。十九岁时，她通过天主教会结婚，婚后和丈夫有了五个孩子：三个女孩，两个男孩——每隔十五个月就有一个孩子出生。“我一下子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他，”玛露哈说，“让他明白，他正在踏入雷区。”他听完后，又眨了眨眼。他没有邀请她吃午饭，而是让一个共同的朋友邀请了他们俩。第二天，他和那个朋友一起邀请她；第三天，他单独邀请她；第四天，他们见了面，但没有吃午饭。就这样，他们继续用最好的借口每天见面。如果有人问比亚米萨尔，当时他是已经爱上她了，还是只想和她睡觉，他会用纯正的桑坦德人的方式回答：“别瞎说，我从没那么认真过。”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认真到了什么程度。

玛露哈的婚姻平淡，波澜不惊，非常完美。但是，她或许需要灵感与冒险，让她觉得自己是鲜活的。她以忙于工作事务为借口，匀出时间陪伴比亚米萨尔。她撒谎说有更多的工作，工作时间甚至包括每周六正午十二点到晚上十点。周日和假期，她临时编造出参加青年聚会、艺术讲座、午夜电影俱乐部等各种借口，只是为了和比亚米萨尔在一起。他没有问题：他单身，可以随时待命，用自己的方式生活，随心所欲。他有过很多个周六女友，但相当于一个也没有。他只差最后一篇论文就能成为一名像他父亲那样的外科医生。但是，时间更适合用来尽情生活，而不是用来治愈病人。爱情从波莱罗舞曲中滋生，直到留存了四个世纪的芬芳信笺、呜咽的小夜曲、手绢上的姓名首字

母、鲜花中的情意、下午三点空荡荡的电影院都成为过去；全世界都鼓起勇气，抗议对披头士的疯狂喜爱引发的死亡。

相识一年之后，他们和玛露哈的孩子们一起住进了一间一百平方米的公寓。“那是一场灾难。”玛露哈说。她说得对：所有人都互相争吵，孩子和成年人都生活在破碎的碗碟、嫉妒和怀疑之中。“有时候，我恨他恨得要死。”玛露哈说。“我也恨她恨得要死。”比亚米萨尔说。“但是，只恨了五分钟。”玛露哈笑着说。一九七一年十月，他们在委内瑞拉乌雷尼亚市结婚，玛露哈的生命中又增加了一宗罪，因为她并没有离婚，也很少有人相信非宗教婚姻的合法性。四年后，他们两人唯一的儿子安德烈斯出生。惊险还在继续，但是他们觉得痛苦减轻了：生活已经教会他们，爱情的快乐不是用来让他们高枕无忧，而是用来让他们一块儿倒霉的。

玛露哈是阿尔瓦罗·帕琼·德·拉·托雷的女儿。阿尔瓦罗是四十年代著名的记者，他和两名出色的同事在一场载入新闻界史册的车祸中死去。玛露哈父母双亡，和姐姐格萝莉娅自小就学会了保护自己。二十岁的时候，玛露哈成了一名画家。后来，她成了一名年轻的报纸撰稿人。她还当过广播电视的导演、编剧和大型公司的公关和宣传主管，但其间她一直都是一名记者。她那吉普赛人的沉静眼神后，极好地隐藏着指挥才能。在这种才能的帮助下，她的艺术天赋和冲动个性从一开始就表现得淋漓尽致。比亚米萨尔则忘掉了医学，他剪了头发，把唯一的衬衫扔进了垃圾堆。他戴上了领带，成了一名销售专家，他可以卖掉别人给他的一切东西。但是，他的性情没有改变。玛露哈认为，是他，而不是生命中的各种打击，让她从繁文缛节和压抑的社交圈中解脱。

他们分头工作，孩子们在学校里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下午六点，玛露哈下班回家照顾他们。她从自身严格、传统的教育中吸取教训，她不想成为出席家长会的母亲，也不辅导他们写作业。女儿们抱怨说：“我们想要一个和别人一样的妈妈。”但是，玛露哈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他们前进，让他们具备了做一切想做之事的独立精神和各种素养。奇怪的是，所有的孩子都想变成她想让他们成为的样子。现在，莫妮卡是从罗马美术学院毕业的画家和平面设计师。阿莱桑德娜成了一名记者，还是电视节目制作人和导演。胡安娜是电视电影编剧和导演。尼可拉斯是一名电影电视作曲家。帕特里西奥是一名心理学家。安德烈斯是一名经济学学生。由于父亲的坏榜样，他喜爱政治。二十一岁时，他被民众选为波哥大北部查皮内罗市的市政府成员。

路易斯·卡洛斯·加兰和格萝莉娅·帕琼还是恋人的时候就一起共事，这对阿尔贝托和玛露哈都没有预见到的政治生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凭借他宣扬的新自由主义，加兰在三十七岁时进入了共和国总统选举的最后环节。彼时已是他妻子的格萝莉娅是一名记者，玛露哈也在推广和宣传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她们领导团队规划并实践了六场选举活动的形象策略。比亚米萨尔在销售方面的经验给加兰提供了很少有政客了解的波哥大的物流信息。在疯狂的一个月里，三人小组举办了新自由主义在首都的第一场选举活动，打败了经验丰富的竞选经理。在一九八二年的选举中，比亚米萨尔被写入了竞选名单的第六位。本来至多会选出五名议会代表，但那次最终选出了九位。不幸的是，那场胜利是阿尔贝托和玛露哈新生活的序幕，八年后还引发了那绑架案中可怕的爱情考验。

收到信大概十天之后，被叫作“博士”的大首领（他被视为绑架案的总经理）毫无预兆地拜访了玛露哈。她在被绑架当晚被带去的第一

座房子里见过他。后来，在玛丽娜被杀害之前，他大约来过这里三次。他曾经和玛丽娜进行过长时间的低声交谈，这只能解释为他们之间长久的信任。他和玛露哈的关系一直很糟糕。对于她的任何提问，不管多么简单，他总是粗鲁而高傲地回答："您在这里没有发言权。"还有三名人质的时候，她想向他抗议房间的糟糕条件，她将她的顽固性咳嗽和迁移性疼痛归咎于这种条件。

"我曾经在比这糟糕一千倍的地方度过比这糟糕得多的夜晚。"他恼怒地回答她，"你们以为自己是谁？"

他的到访预示着将有重大事件发生，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总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这一次，由于埃斯科瓦尔的信，玛露哈有了面对他的勇气。

沟通马上开始，而且出乎意料地顺畅。她一开始就毫无恨意地问他，埃斯科瓦尔想要什么，谈判进行得怎么样了，他很快投降的可能性有多大。他毫无保留地向她解释，如果没有给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他的家人和手下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一切将会非常困难。玛露哈向他问起基多·帕拉，他的行动曾经让她充满了希望，她很好奇他怎么突然消失了。

"他表现得不太好，"他平淡地告诉她，"他出局了。"

这句话可以用三种方式解读：他或许丧失了权力，或许已经出国了——就像新闻公布的那样，或许已经被杀害了。他带着答案逃跑了，但事实上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一方面是出于难以抑制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是为了赢得他的信任，玛露哈还问他是谁写了那封由"可被引渡者"指定寄给美国大使的

信，信上谈论了引渡和毒品贸易的问题。这封信论据有力，书写规范，引起了她的注意。“博士”并不是很肯定，但他确定埃斯科瓦尔都是亲自写信，他会反复斟酌，不断打草稿，直到他能准确无误、没有前后矛盾地说明他想表达的内容。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谈话结尾，“博士”又谈到了投降话题。玛露哈发现他对这个最初的话题更感兴趣，而且他不仅在意埃斯科瓦尔的命运，还在意自己的命运。她对法令引发的论战和法令的演变有着成熟的见解，了解投降政策的细枝末节以及制宪议会关于引渡与赦免的倾向。

“如果埃斯科瓦尔不考虑在监狱里待上至少十四年，”她说，“我认为政府不会接受他的投降。”

他非常欣赏这个观点，以至于冒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想法：“您为什么不给老板写信？”接着，面对玛露哈的茫然，他很坚持。

“真的，给他写信吧，”他对玛露哈说，“会很有用的。”

他们说干就干。他把纸笔递给玛露哈，不慌不忙地等待着，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玛露哈坐在床上，用一块木板垫着信纸。在开始写第一个字到完成最后一个字的过程中，她抽了半包香烟。她简单地向埃斯科瓦尔表达了感谢之情，因为他的话让她有了安全感。她说她没有要报复他的想法，也不想报复负责绑架事宜的人，她因所有人都用体面的方式对待她而心存感激。她希望埃斯科瓦尔能够寻求政府法令的庇护，这样他和他的孩子们就能在自己的国家拥有一个不错的未来。最后，她像比亚米萨尔一样在信里向他提议，让他为了哥伦比亚的和平做出牺牲。

“博士”原本期待她写一些关于投降条件的更加具体的内容，但是玛露哈说服他，如果不在一些不适宜或是容易被误解的细节上犯错，她所写的内容能起到一样的效果。她说得有道理。埃斯科瓦尔把这封信交给了媒体。当时，由于对投降的关注，他把这封信放在了触手可及的地方。

趁着那一次邮递，她给比亚米萨尔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和她在狂怒状态下设想的完全不同。这让他在沉默数个礼拜之后重新出现在了电视上。那天晚上，在巴比妥的作用下，她梦见埃斯科瓦尔走下直升机，利用她当挡箭牌躲过了枪林弹雨，这仿佛是西部牛仔电影的未来版本。

拜访结束时，“博士”向房子里的人下达了指令，让他们善待玛露哈。“管家”和妲玛莉丝对新命令非常满意，他们甚至偶尔会表现得过分开心。在告别之前，“博士”决定更换看守。玛露哈请求他不要这么做。三月的骚乱过后，四月值班的年轻人让她松了口气，而且他们依然和她保持着和平的关系。玛露哈已经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和她谈论他们听到的“管家”和妻子的对话，还告诉她毒贩们的内部矛盾，这曾经是重大机密。他们甚至向她承诺（玛露哈也相信他们）——如果有人试图对她不利，他们会是首先出手制止的人。他们从厨房偷出零食给她，证明对她的情谊。他们还送给她一罐橄榄油来遮盖兵豆的恶心味道。

折磨着他们的宗教忧虑是唯一的难事，因为她没有宗教信仰，而且对信仰一无所知，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她多次冒险打破房间的和谐。“来看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问他们，“如果杀人是罪过的话，为什么你们要杀人？”她挑衅他们：“你们在下午六点念了那么多玫瑰经，点了那么多的蜡烛，和圣子一起做了那么多事。但如果我想

逃跑的话，你们不会想着圣子，你们会一枪打死我。”辩论变得异常激烈，其中一名看守害怕地大叫起来：

“您是无神论者！”

她大叫着回答说是。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引发这样的惊愕。她意识到，她无益的过激行为可能会让她付出惨痛的代价。她编造出了一套关于世界和生命的宇宙论，让他们和平讨论。因此，把他们换成其他陌生的看守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博士”解释说：

“这是为了解决机关枪的问题。”

当新的值班看守到来的时候，玛露哈明白了他想说的话。那是几个没有武器的扫地工，他们整天打扫、拖地，甚至比过去的垃圾和脏乱状态更让人厌烦。但是，玛露哈逐渐不再咳嗽了，新秩序让她可以冷静、专注地看电视，这对她的健康与平衡状态很有帮助。

不信神的玛露哈完全不关注《上帝一分钟》，这个奇怪的节目时长六十秒，八十二岁的欧德[1]主义神甫拉法埃尔·加西亚·埃莱罗斯在节目中并不进行宗教反思，而是进行社会反思，他的反思常常是非常晦涩的。相反，帕丘·桑托斯是一个狂热的实践型天主教徒，他对与专业政治家不太相关的信息更加感兴趣。一九五五年一月，这档节目在国家电视台第七频道开播。从此，神甫成为国内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在此之前，他自一九五〇年起就是卡塔赫纳一家电台的知名主播；一九五二年一月，成了卡利一家电台的主播；一九五四年九月，成为麦德林一家电台的主播；同年十二月，他当上了波哥大一家电台的主播。他几乎在电视传媒体系启动的同时就开始在电视台工作。他凭借直截了当、偶尔粗暴的风格而出类拔萃。他说话时，用一双雄鹰般的眼睛

专注地看着观众。从一九六一年开始，他每年都会组织“百万晚宴”，许多著名人士（或是想成为著名人士的人）都会参加这个活动，他们花一百万比索买选美冠军端上的一碗法式清汤和一块面包。活动目的是给同名社会福利机构筹集资金。引发骚动的一次邀请发生在一九六八年，他们给碧姬·芭铎寄了一封私人邀请函。这名女演员立即接受了邀请，这掀起了哥伦比亚“上流社会”的轩然大波，并威胁到了晚宴的举办。神甫坚持他的决定。后来在巴黎布洛涅工作室及时发生了一场火灾，再加上飞机上没有座位的神奇理由，那次全国性的荒唐事件最终没有发生。

帕丘·桑托斯的看守们是《上帝一分钟》节目的忠实观众，但是他们更关注其中的宗教内容，而不是社会内容。就像大多数安蒂奥基亚贫民家庭的成员一样，他们盲目地相信那位神甫是一名圣徒。他说话的语气总是愤怒的，而内容有时是难以理解的。四月十八日的节目（虽然没有提及姓名，但毫无疑问是献给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是难以破译的。

“我听说，他想投降。我听说，他想跟我谈一谈。”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直视镜头。“啊，大海！啊，下午五点，太阳西沉时的科韦尼亚斯海！我该怎么做？我听说，他已经厌倦了他的生活，厌倦了纷争。但我不能把我的秘密告诉任何人。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这个秘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请告诉我，大海啊！我能这么做吗？我该这么做吗？你熟悉哥伦比亚的所有历史，你见过印第安人在海边祈祷，你听说过历史的传言：我应该这样做吗？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会被拒绝吗？我会在哥伦比亚被拒绝吗？如果我这样做了，当我和他们同行的时候，会遇到枪林弹雨吗？在这场冒险中，我会和他们一起倒下吗？”

玛露哈也听见了，但是她不像许多哥伦比亚人一样觉得奇怪，因为她一直认为，这位神甫喜欢信口开河，然后迷失在宇宙星辰之间。她把这个节目看作七点钟的新闻栏目前无法避开的开胃菜。那天晚上，这档节目引起了她的注意，因为一切跟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有关的事物都与她有关。她感到困惑和好奇，同时还觉得非常不安，因为她无法确定那段晦涩难懂的预言背后所蕴含的深意。相反，帕丘确定，神甫会把他从炼狱中解救出来，他高兴地拥抱了他的看守。

---

[1] 若望·欧德（Jean Eudes，1601—1680），法国神甫、传教士，创立了耶稣圣母会和仁爱圣母会。

十

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的口信在绝境中凿开了一道缝隙。比亚米萨尔觉得这是个奇迹，因为那几天他正在重新梳理调解人的人选。他们要凭借他们的形象和履历去获得埃斯科瓦尔的信任。拉法埃尔·帕尔多也听说了这个节目，他担心自己办公室的消息可能已经走漏。无论如何，比亚米萨尔和他都认为，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是说服埃斯科瓦尔投降最合适的调解人。

三月底，往来的信函中确实没有新鲜的话题。更糟糕的是，埃斯科瓦尔显然把比亚米萨尔当作向政府传送口信的工具，并且没有给出任何东西作为交换。他的上一封信里只有没完没了的抱怨。他说，谈判还没有破裂，但是他已经给了下属抵御警察部队进攻的自由；警察部队已经被列入了大型袭击的目标名单；如果不迅速解决问题，他会增加对警察和平民的无差别袭击。他抱怨检察长只罢免了两名警官，但“可被引渡者”指控的警官足有二十名。

当比亚米萨尔陷入窘境的时候，他会和豪尔赫·路易斯·奥乔阿商量。但是，如果有更棘手的事情，豪尔赫会让他去父亲的农庄寻求建议。老人给比亚米萨尔倒了半杯用于祭典的威士忌酒。“您干了它吧，”他说，“我不知道您怎么受得了这么惨烈的悲剧。”四月初的情况就是这样。比亚米萨尔来到拉·洛玛，向堂法比奥详细地讲述了他和埃斯科瓦尔的分歧。堂法比奥分担了他的失落。

“我们别再写信争吵了。”他做出了决定，“继续这么吵还能再吵一百年。最好的办法是您亲自和埃斯科瓦尔面谈，商定你们想要的条件。”

堂法比奥本人向埃斯科瓦尔提出了这个建议。他告知埃斯科瓦尔，比亚米萨尔打算冒着种种风险藏进汽车后备箱里。但是埃斯科瓦尔没有同意。“我或许会和比亚米萨尔谈，但不是现在。”他回复说。也许他依然害怕电子跟踪器，它可能被藏在任何地方，甚至被藏在臼齿的金牙冠下面。

同时，他继续坚持要求制裁警察，继续指控玛萨·马尔克斯联合准军事化分子和卡利集团杀死他的手下。这项指控与杀害路易斯·卡洛斯·加兰的指控是埃斯科瓦尔执着而愤怒地攻击玛萨·马尔克斯将军的手段。玛萨·马尔克斯将军总是公开或是私下里回复说，目前他不会发动战争攻击卡利集团，因为当务之急是对付贩毒分子的恐怖主义，而不是毒品贸易。埃斯科瓦尔则在给比亚米萨尔的一封信中自说自话地写道：“请您告诉格萝莉娅女士，是玛萨杀死了她的丈夫，这毫无疑问。”面对这项不断重申的指控，玛萨的回答总是相同的：“埃斯科瓦尔本人最清楚，这不是真的。”

比亚米萨尔对那场血腥、徒劳的战争非常失望，这场战争击溃了情报机构的每一项倡议。比亚米萨尔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想争取让政府进行停战谈判。这是不可能的。拉法埃尔·帕尔多从一开始就让他明白，只要人质家属的提议与政府不让步的决定发生冲突，反对投降政策的人就会控诉政府正在把国家交到毒贩手中。

比亚米萨尔在妻姐格萝莉娅·德·加兰的陪伴下，还拜访了国家警察局局长戈麦斯·帕蒂亚将军。格萝莉娅请求将军停战一个月，以便与埃

斯科瓦尔取得私下联系。

“我们非常遗憾，女士，”将军说，“我们不能中断攻击这项罪行的行动。您正在冒险，我们唯一能做的是祝您好运。”

这是他们争取到的一切。警方为了不泄露难以解释的信息而守口如瓶，曾经因为走漏消息，埃斯科瓦尔从最严密包围中逃脱了。但是，格萝莉娅女士没有空手而归，因为一名警官在道别时告诉她，玛露哈在哥伦比亚与厄瓜多尔交界的纳利尼奥省的某个地方。而她通过贝阿特利丝得知，玛露哈在波哥大。因此，警方的错误判断打消了她对营救行动的恐惧。

那几天，媒体关于埃斯科瓦尔投降条件的推测造成了一场国际风波。警方的否认、各级政府的解释、甚至总统本人的解释都无法让民众相信，政府和毒贩之间不存在投降协商和私下了结的情况。

但玛萨·马尔克斯将军相信这是真的。他一直坚信，而且把这一点告诉了所有愿意听的人——罢免他将是埃斯科瓦尔投降的重要条件之一。长久以来，加维里亚总统似乎对玛萨·马尔克斯向媒体发表随心所欲的声明感到非常不满。而且根据从来没有被证实的谣言，一些重要信息的泄露是他干的好事。但是，当时，在他任职数年之后，凭借他强硬打击犯罪活动积累的巨大威望以及对圣子溢于言表的崇拜，加维里亚总统无法立即决定罢免他。玛萨应该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力，但他同样应该知道，总统也会行使他的权力，而玛萨唯一的请求（他们共同的朋友透露）是提前足够长的时间通知他，以保证他家人的安全。

唯一被授权和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律师保持联系的官员是刑事诉讼法庭庭长卡洛斯·埃杜阿尔多·梅希亚，他需要全程留下书面记录。根据法律规定，他负责商定投降的行动细节和狱中的安保与生活条件。

希拉尔多·安海尔部长本人检查了所有可行的选择。自从法比奥·奥乔阿于去年十一月投降之后，他很关注戒备森严的伊塔古伊监狱，但是埃斯科瓦尔的律师拒绝了，因为那里很容易成为汽车炸弹袭击的目标。他认为将波夫拉多修道院改建为装甲监狱的想法很可行，那里距离卡利集团安置了两百公斤炸药的居民楼很近，埃斯科瓦尔曾逃过那场爆炸袭击，但修道院的修女们不愿意出售它。他曾经提议过强化麦德林监狱，但是被麦德林市政委员会集体否决了。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担心投降计划会由于找不到监狱而终止，因此他提出了有分量的理由，支持埃斯科瓦尔在去年十月提出的建议：埃尔·克拉莱特戒毒中心。该中心距离恩维加多的主公园十二公里，位于一座名叫拉·卡特德拉尔·德尔·巴耶的农庄中，这座农庄处于埃斯科瓦尔名下。政府明白，如果无法解决他自身的安全问题，埃斯科瓦尔是不会投降的。于是，政府研究了租用埃尔·克拉莱特戒毒中心并将中心改造为监狱的可能性。他的律师要求看守是安蒂奥基亚人，并要求监狱的外部安保绝不能由警方负责，因为他们担心由于谋杀麦德林的警察而遭到报复。

恩维加多市市长负责整个工程，他对政府报告做了记录，开始安排监狱的配备工作。根据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他应该将配备方案呈交给司法部。基础建筑风格简洁，楼层用水泥浇筑，屋顶铺设瓦片，金属房门漆成绿色。管理区域位于原来农场老房子的位置，由三间小厅、厨房、铺满石子的后院和牢房组成。牢房区有一间四百平方米的集体卧室，一间用作藏书室和学习室的大厅和六间有独立卫生间的单人房。戒毒中心有一个大约六百平方米的公共空间，里面有四个淋浴

喷头，一间更衣室和六个卫生间。二月，改造工程启动，七十名在编工人轮流倒班，每人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复杂的地形、糟糕的路况和严冬的寒冷迫使他们放弃自卸车和卡车，不得不用骡子运送大部分家具和电器。第一批包括两台五十升的热水器、行军床和二十四张漆成黄色的管椅。二十个盆栽——南美杉、月桂和槟榔完善了室内装饰。作为一间古老的监狱，那里没有安装电话网络。监狱一开始的通信将依赖于无线电系统。工程的最终造价是一亿两千万比索，由恩维加多市政府支付。根据最初的估测，工程将在八个月内完成。但是当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登场时，工程被强制加快了进程。

投降计划中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瓦解埃斯科瓦尔的私人军队。埃斯科瓦尔似乎并不认为监狱是一种法律镇压的手段，反而认为它是攻击敌人，甚至攻击司法本身的避难所。但是，他没有得到一致同意，因此不能让他的军队和他一起投降。他希望保留军队的理由是监狱无法保证他家人的安全，并会让他的同伴们落入精英部队手中。“我不会单独行动。”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那封信的内容不完全是事实。因为他也可能想让完整的工作团队留在他身边，好在监狱里继续经营他的生意。政府更倾向于把他们和埃斯科瓦尔关在一起。因为那是将近一百个不处于长期备战状态的武装团体，他们是一线的预备力量，几个小时内就能快速集合并武装起来。这意味着得让埃斯科瓦尔解除手下十五或二十名无畏长官的武器，并把他们一起带进监狱。

在比亚米萨尔与加维里亚总统为数不多的几次私人会面中，加维里亚总统总是给他私下解救被绑架者的行动提供便利。比亚米萨尔不认为政府的谈判与他在政府的授权下进行的谈判有什么不同之处。政府谈判的内容在投降政策中就能看出端倪了。图尔巴伊前总统和埃尔

南多·桑托斯（他们虽然从没有表明这一点，也没有否认政府制度方面的困难）毫无疑问等待着总统最低限度的变通。面对妮迪娅的坚持、恳求和抗议，总统同样拒绝了更改法令规定的期限。总统的拒绝依然是抗议的家人们心中的一根刺。迪安娜去世三天后，总统更改了期限。这个事实是迪安娜的家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总统在私下里说过，很不幸，在那种情况下，更改日期也无法阻止迪安娜的死亡。

埃斯科瓦尔永远不会满足于一种渠道，他也不会停止用各种合法或是非法的方式千方百计与上帝和魔鬼谈判。并不是因为他对一些人更加信任，而是因为他不相信任何人。尽管他已经明确表示自己对比亚米萨尔有所期待，但他依然记得曾经破灭的政治赦免的美梦。一九八九年，大毒枭们和追随者们获得了M-19成员的证件，以期作为游击队员得到赦免。卡洛斯·皮萨罗司令用不可能达到的要求阻止了他们。两年后的现在，埃斯科瓦尔通过制宪议会寻求第二次机会，从金钱贿赂到恐吓，想方设法向数名制宪议会成员施压。

但是，埃斯科瓦尔的敌人们也在他的计划中横插一脚。他们发布了一则所谓来自毒贩的视频，引发了一桩轰动却无益的丑闻。这个视频应该是用旅馆房间里的摄像机拍摄的。视频中，一名制宪议会成员收取了埃斯科瓦尔的律师的现金。该制宪议会成员已经被选入M-19成员名单。然而实际上，他属于为（在战争中攻击麦德林集团的）卡利集团效力的准军事集团成员，他的信誉无法说服任何人。几个月后，一名私人武装部队首领向警方坦白道，他的手下制作那个粗糙的视频是为了证明埃斯科瓦尔正在贿赂制宪议会成员，并以此推翻赦免或不引渡的决议。

在埃斯科瓦尔想开辟的诸多战线中，他试图绕过比亚米萨尔协商帕丘·桑托斯的释放事宜。当时，比亚米萨尔的奔波即将结束。四月

底，埃斯科瓦尔通过一位神甫朋友给埃尔南多·桑托斯传达了一条消息，让他和自己的律师在乌沙盖恩教堂会面。消息说，埃斯科瓦尔要和他商议释放帕丘的重要事宜。埃尔南多不仅认识这位神甫，还把他视为在世的圣人。因此，他于指定日期晚上八点，独自准时赴约。律师的样貌在教堂的阴影里勉强能被看清，律师告诉他，自己与贩毒集团没有关系，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是他职业生涯的教父，他不能拒绝他的请求。他的任务只是交给埃尔南多两份文件：国际特赦组织谴责麦德林警方的报告和一篇关于精英部队暴行的文章，似乎是一篇社论。

“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您儿子的性命。”律师说，“如果明天这些文章能发表，后天弗朗西斯科就会被释放。”

埃尔南多带着政治眼光阅读那篇尚未发表的社论。其中的内容是埃斯科瓦尔数次揭露过的事实，但是带有无法证实的惊悚细节。文章写得很认真，而且带有微妙的恶意。律师说，作者是埃斯科瓦尔本人。无论如何，这像是他的风格。

国际特赦组织的文件已经在其他报刊上发表过了，对埃尔南多·桑托斯来说，重复发表该文件没有困难。然而，如果没有证据，发表那篇社论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希望您能把证据给我。这样的话，即使你们不释放帕丘，我们也会马上发表。”埃尔南多说。没有别的可说了。律师意识到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他想利用这次机会询问埃尔南多，基多·帕拉在调停中向他收取了多少费用。

“他一分钱都没要。”埃尔南多回答说，“我们从来不谈钱。”

“请您告诉我真相。”律师说，“因为埃斯科瓦尔控制着账务，他控制着一切，他需要这个信息。”

埃尔南多再次否认。会面以正式的告别结束。

也许在那几天里，哥伦比亚占星家毛里西奥·布埃尔塔是唯一确信事情即将结束的人，他通过星辰专注地观察国家命运，甚至得出了关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出生星图的惊人结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上午十一时五十分，埃斯科瓦尔出生于麦德林。因此，他是射手座，上升星座是双鱼座。他的出生星图中有着最糟糕的行星会合情况：火星和土星在处女座会合。他的性格倾向是：残忍的权威主义、专制主义、难以满足的野心、叛逆、躁动、不服从、无序、无纪律、攻击权威，以及难以挽回的结局：突然的死亡。

从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开始，对他来说，土星在接下来的三年中都会保持五度的斜角。他的命运只剩下三种归宿：医院、坟墓或者监狱。第四个选择——修道院——对他来说似乎并不可行。无论如何，当时的形势更有利于就谈判条约达成协议，而不是将最终的可能性封死。也就是说：他最好的选择是政府提议的有条件投降。

“埃斯科瓦尔大概非常不安，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出生星图。”一名记者说。因为他一得知毛里西奥·布埃尔塔散布的消息，就想详尽地了解他分析中的细节。然而，埃斯科瓦尔的两名使者并没有到达目的地，其中一名永远地消失了。因此，布埃尔塔在麦德林举办了一个众人皆知的研修班，以便让埃斯科瓦尔与他取得联系。但是，一系列奇

怪的不利因素阻止了他们的会面。布埃尔塔将这些因素解读为星辰的保护，任何事物都无法干预难以改写的命运。

帕丘·桑托斯的妻子也得到了一名预言家的超自然启示。这名预言家曾经凭借令人惊叹的洞察力预见了迪安娜的死亡。她同样肯定地告诉帕丘的妻子，帕丘还活着。四月，预言家又一次在公共场合遇见帕丘的妻子，趁机凑到她耳边说：

“恭喜你。我已经看见神迹降临了。”

当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把密信传达给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时候，这些是仅有的鼓舞人心的征兆。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是如何做出那个富有预见性的决定，以及这个决定与科韦尼亚斯海有什么关系，这些依然令国民好奇。然而更加让人费解的是，他是如何想出这种做法的。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二日，周五，他拜访了马努埃尔·埃尔金·巴塔洛约医生——疟疾疫苗的发明者，请求他担任《上帝一分钟》制作组中的医疗岗位，进行艾滋病的早期检测。除了一名来自他教会的年轻神甫之外，一位具有诸多美德的安蒂奥基亚人也陪伴着他。这人是他伟大的朋友，在世俗问题上帮他出谋划策。由于他本人的决定，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施主不仅捐款建造了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的私人祈祷室，而且为了神甫的公益事业自愿缴纳什一税[1]。在将他们载往巴塔洛约医生免疫学研究所的汽车上，他感受到了一种急切的想法。

“听我说，神甫，”他说，“您为什么不干预这件事，让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投降呢？”

他直截了当地说了，而且没有任何动机。“那是上面的信息。”他后来讲述时，带着奴仆的敬意和老朋友的信任，他总是这样暗指上

帝。神甫在收到信息时，心脏仿佛被箭矢射中了，他变得非常苍白。巴塔洛约医生之前并不认识他，他眼中散发出的能量和他的谈判理解力给医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神甫的朋友看到了截然不同的一面。“神甫仿佛在漂浮着。”他说，“在拜访过程中，他只想着我跟他说过的话。离开的时候，我看见他非常着急，甚至把我吓了一跳。”因此，周末他带神甫去了科韦尼亚斯的度假屋。那里是加勒比的浴场疗养胜地，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游客；那里也是每日输送二十五万桶原油的输油管道的终点。

神甫没有得到片刻的平静。他几乎不睡觉，会在用餐的中途起身，不分昼夜地随时在沙滩上长时间徒步。“哦，科韦尼亚斯海，”他对着澎湃的浪花大喊，“我能这么做吗？我应该这么做吗？了解一切的你啊，我们会在尝试中死去吗？”在痛苦的徒步之后，他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走进屋里，仿佛真的得到了大海的回答。然后，他和房东讨论方案的细枝末节。

周二回到波哥大时，他已经有了大致的想法，这让他恢复了平静。周三，日常生活又重新开始了：六点起床，淋浴，穿上带有教士领的黑色服装，外面加一件不可或缺的白色斗篷。他在宝琳娜·加尔颂的帮助下了解错过的事件。在他的半生中，宝琳娜·加尔颂是他必不可少的秘书。那天晚上，他制定了另一个话题的方案，这个话题与之前让他着迷的内容完全无关。周四上午，巴塔洛约医生像他承诺的那样，对他的请求给出了肯定的答复。神甫没有吃午饭。六点五十分，他到达国家广播电视协会的工作室，在那里播出他的节目。面对摄像机，他即兴说出了给埃斯科瓦尔的信息。那是改变他所剩不多的生命的六十秒。回家时，迎接他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留言和蜂拥而至

的记者。从那天晚上开始，记者们不会让他离开他们的视线，直到他完成自己的使命，牵着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手，把他送进监狱为止。

最后的程序开始了。但预测是不准确的，因为舆论分成了两派，一群人认为善良的神甫是一位圣人，而不信神的人坚信他是半个疯子。事实是，他的生命证明了许多东西，但没能证明生命本身是什么。一月，他过了八十二周岁生日；八月，他的神甫生涯将迎来第五十二个年头。而且，他显然是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哥伦比亚人中，唯一完全不想成为共和国总统的。花白的头发与教士服外面的白色羊毛斗篷勾勒出了国内最受尊敬的形象之一。十九岁时，他出了一本书，内容是他创作的诗篇。青年时代，他以“年华流逝[2]”为笔名，创作了许多其他诗歌。凭借一部短篇小说集，他获得了一个已经被遗忘的奖项。因为他的公益事业，他获得了四十六块勋章。不论是在顺利还是在艰难的时刻，他总是脚踏实地，过着无神职信徒的社交生活，他自己讲，也听别人讲各种口味的笑话。在关键时刻，他一直隐藏在教士斗篷下的内心会浮现出来：一个地地道道的桑坦德人。

他在圣若望·欧德教区的教会过着清贫的修士生活，他住的房间漏雨，但他拒绝修缮。他睡在一张没有床垫的木板床上，没有枕头，床罩是几位慷慨的修女用带有彩色小房子图案的碎布给他缝制的。他没有接受他们提供的羽毛枕，因为他觉得这违背了上帝的规定。只要他们不给他新鞋，他就不换鞋子；只要他们不给他新的衣物，他就不更换他的衣服和白色斗篷。他吃得很少，但他在餐桌上有着不错的品位。他懂得如何品鉴美食和上等葡萄酒。但是，他不让别人邀请他去高级餐厅，因为他担心他们认为他会付账。这些人中有一位出身显赫的女士，她戴着一只杏仁大小的钻戒。

“用这样一枚戒指，”他在她面前说，“我可以给穷人建造一百二十座房子。”

那位女士因为这句话而感到茫然失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是，第二天，她把戒指寄给了他，并附带一张礼貌的字条。戒指当然不够建造一百二十座房子，但无论如何，神甫确实建成了一百二十座房子。

宝琳娜·加尔颂·德·贝尔穆德斯出生于桑坦德省南部的奇帕塔市。一九六一年，她十五岁，带着一封专业打字员推荐信和母亲来到了波哥大。她的确是一名专业打字员。但她不懂如何在电话中交谈，字也写得太差，她写的购物清单是旁人无法解读的。但是，她学会了做好这两件事，并让神甫聘用了她。二十五岁时，她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儿子阿丰索和一个女儿玛丽亚·孔斯坦萨，现在，他们成了系统工程师。宝琳娜在兼顾家庭的同时，继续给神甫工作。他逐渐向她释放权力并让她承担更多义务，让她变得不可或缺，以至于他们常一起在国内外奔走，但是总有另一位神甫陪伴着他们。“这是为了防止谣言。”宝琳娜解释说。她陪着他四处奔波，尽管只是为了给他戴摘隐形眼镜，因为他自己永远无法做到。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神甫的右耳失去了听力。他变得易怒，并对自己记忆的缺口感到更加愤怒。他渐渐地放弃诵读经典祷文，而是带着智者的灵感，大声地即兴朗诵自己的祷文。他精神错乱的名声不断传播。与此同时，民众越来越相信他拥有超自然的能力，能与水体交谈，并掌控它们流淌的路径和方式。他对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理解态度让人想起他就一九五七年八月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亚将军回国接受国会审判这一事件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向法律屈服，那么即使他是有罪的，他也值得尊敬。”几乎在他生命的尽头，在一次组织困

难的“百万宴会”上，一个朋友问他，之后他会做什么。他给出了一个十九岁少年的回答：“我想躺在草地上看星星。”

在电视消息播出的第二天，没有通知也没有事先办理手续，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出现在了伊塔古伊监狱。他询问奥乔阿兄弟，如何才能在埃斯科瓦尔的投降过程中起到作用。在奥乔阿兄弟的印象中，他是一位圣人，只有一个需要注意的不足：通过每日的传道，他与听众保持了四十年的沟通，因此他构思出的所有计策都会被透露给舆论。但是，对他们来说，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堂法比奥认为他是一位天赐的调解人。首先，因为埃斯科瓦尔对神甫没有顾忌，而他正是出于这种顾忌才没有接见比亚米萨尔。其次，因为他的神化形象能够说服埃斯科瓦尔的手下，让所有人都投降。

两天后，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在记者会上透露，他已经与关押人质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他乐观地表示，他们很快会被释放。比亚米萨尔毫不迟疑地去《上帝一分钟》找他。当神甫第二次前往伊塔古伊监狱拜访时，比亚米萨尔与他同行。即日，代价巨大的保密程序开始运转，而且必将以毒贩投降告终。这一程序以神甫在奥乔阿兄弟的牢房里口述信件开始，玛丽亚·莉娅用打字机将口述内容打印出来。神甫站在她面前，用和一分钟布道时同样的仪态、同样使徒般的语气及同样的桑坦德口音即兴口述。他邀请埃斯科瓦尔一起探寻哥伦比亚的和平之路。他说他希望政府任命自己为担保人，“让你的权利，以及你的家人和朋友的权利得到尊重”。但是，他提醒埃斯科瓦尔，不要要求政府无法给予的东西。在以“我亲切的问候”结尾以前，他说明了这封信的真实意图：“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在某个安全的地方见面，请你告诉我。”

三天后，埃斯科瓦尔亲笔回信了。他同意投降，为和平做出牺牲。他明确表示，他不奢求赦免，也不要求对摧毁贫民窟的警察进行刑事处罚，而只要求纪律处罚。但是，他不放弃以激烈的报复作为回应的决心。他准备认罪，虽然他确定没有一位哥伦比亚或是外国的法官有足够的证据判决他。而且他相信，他的对手也会服从于同样的体制。然而，与神甫的热切希望相反，他没有提到与他会面的提议。

神甫向比亚米萨尔承诺，他会控制住将信息公之于众的冲动。起初，他部分地履行了诺言，但是他近乎天真的冒险精神胜过了他的意志力。人们抱着极大的期望，而媒体的动员能力是如此强大，从那时起，他每迈出一步，就有来自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大批记者和行动小组追着他，甚至追到了家门口。

在拉法埃尔·帕尔多的严格保密下，比亚米萨尔绝对秘密地行动了五个月。比亚米萨尔认为，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的口才让整个行动处于永久的危险之中。因此，他通过申请得到了神甫最亲近之人的帮助——排在第一位的宝琳娜，她可以提前为一些行动做好准备，无需事先通知神甫。

五月十三日，他收到了埃斯科瓦尔的信息，要求他带着神甫前往拉·洛玛农庄，并让他在那里停留必要的时间。他提醒说，可能是三天，也可能是三个月，因为他得亲自仔细检查行动的每一个步骤，甚至有可能在最后时刻由于安全问题取消会见。很幸运，神甫总是为让他难以入眠的事情做好充足的准备。五月十四日早上五点，比亚米萨尔敲响了他家的大门，发现他像白天一样在书房里工作。

“走吧，神甫，”他说，“我们去麦德林。”

奥乔阿一家在拉·洛玛做好了准备，让神甫能在必要的时间里得到消遣。堂法比奥不在家，但是家里的女人们张罗起了一切。让神甫分心并不容易，因为他明白，一次如此突然而迅速的出行只可能是为了某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早餐非常可口，用餐时间很长，神甫吃得很香。上午十点左右，玛尔塔·妮耶维丝尽量不那么戏剧化地向神甫透露，埃斯科瓦尔很快就会和他见面。他吃了一惊，很开心，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直到比亚米萨尔让他回到现实。

“最好现在让您知道，神甫，”他提醒说，“也许您得单独和司机一起离开，我们不知道您会去哪里，也不知道去多久。”

神甫脸色苍白。他勉强能用手指拿住念珠，来回踱步，高声诵读他自编的祷文。每次经过窗户的时候，他都会看一眼马路。他一面害怕为他而来的汽车出现，一面因为汽车没到而焦虑。他想打电话，但是他自己意识到了危险。“幸好跟上帝交谈不需要打电话。”他说。吃午饭的时候，他不想坐在桌子旁边。午饭比早饭持续的时间更久，也更可口。在为他准备的房间里有一张床，床头是用金银饰带制作的，仿佛那是一张主教的床。女人们试图说服他休息一会儿，他表面上接受了，但没有睡着。他不安地阅读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这本书很流行，它试图通过数学计算证明上帝并不存在。下午四点左右，他出现在客厅里，比亚米萨尔在那里打盹。

“阿尔贝托，”他对他说，“我们最好回波哥大。”

劝阻他很难，但是女人们用自己的魅力和精明说服了他。傍晚时，他的情绪又一次剧烈波动，但是他已经不再逃避了。他明白夜间

出行的危险。躺下时，他向别人求助，想要摘下隐形眼镜。因为帮他摘戴隐形眼镜的人是宝琳娜，他不知道如何自己完成。比亚米萨尔没有睡觉，因为他觉得埃斯科瓦尔可能认为晚间的黑暗对约见来说更加安全。

神甫一分钟都没有睡着。早上八点的一餐比晚饭更加诱人，但神甫甚至没有坐到餐桌旁。他依然在为隐形眼镜丧气，没有人可以帮助他，最后，农庄的管理员费了很大的力气帮他戴上。与第一天不同，他看起来并不紧张，也没有焦虑地走来走去。他坐下来，盯着马路，汽车将会从那里驶来。他保持着这样的姿势，直到他失去耐心，突然站了起来。

“我走了，”他说，“这事是个笑话。”

他们说服他吃完午饭再走，这个承诺让他恢复了精神。他吃得很香，交谈很愉快，他像自己最健康的时候那样有趣。最后，他宣布说，他要去午睡了。

“但是，我提醒你们，”他伸出食指威胁说，“午睡醒来我就走。”

玛尔塔·妮耶维丝打了几个电话，希望从侧面获得一些信息，好让她在神甫醒来时留住他，但一无所获。快到三点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客厅里打盹，发动机的声音把他们吵醒了。汽车到了。比亚米萨尔突然站了起来，他习惯性地敲了一下神甫卧室的门，然后把门推开。

“神甫，”他说，“他们来接您了。”

神甫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他尽力起床。比亚米萨尔非常感动，因为他觉得神甫就像一只没毛的小鸟，皮肤挂在骨骼上，因为害怕而

瑟瑟发抖。但是，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划了个十字，鼓起勇气，变得坚定而高大。“跪下，孩子，”他命令比亚米萨尔，“我们一起祈祷。”起身时，他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

“我们去看看巴勃罗究竟怎么了。”他说。

虽然比亚米萨尔想陪他去，但是他没有去争取，因为这事已经约定好了。但是，他可以和司机交谈。

“您得对神甫负责。”他对司机说，“他是非常重要的人。留神你们对他做的事情。请您明白你们身上的责任。”

司机看着比亚米萨尔，仿佛他是个白痴:

“您认为，如果我和圣人坐在一起，我们会出事吗? ”

司机拿出一顶棒球帽，让神甫把帽子戴上，以免人们通过白发认出他。神甫戴上了棒球帽。比亚米萨尔想到，麦德林处于战争之中。他担心神甫被拦下，耽误会面。或许，神甫还会被困在杀手和警察的交火中。

他们让神甫和司机一起坐在前面。当所有人看着汽车远去时，神甫摘下帽子，扔出窗外。“别担心，孩子，”他向比亚米萨尔喊道，“我掌控着水体。”雷声在田野上回荡，天空在滂沱大雨中坍圮。

关于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对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拜访，唯一已知的是神甫本人回到拉·洛玛时讲述的版本。他说，埃斯科瓦尔接待他的房子又大又豪华，里面有一个奥运标准的游泳池和许多体育设施。出于安全原因，他们不得不在路上换了三次车。但由于大雨一直下个不停，好几处警察岗哨都没有拦下他们。根据神甫的讲述，剩下的岗哨

是为“可被引渡者”的安全服务的。他们行驶了三个多小时，虽然他最有可能被带去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位于麦德林市内的一处住所，不过为了让神甫觉得他们去了离拉·洛玛农庄很远的地方，司机极有可能绕了远路。

他讲述说，大概有二十名携带武器的人员在花园里迎接他。他斥责他们糟糕的生活方式和抵制投降的做法。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本人穿着一套白色棉质家居服在露台上等他，胡子又黑又长。见到埃斯科瓦尔时，神甫从到达拉·洛玛起就坦白的恐惧感和后来旅途中的不确定感都消散了。

“巴勃罗，”他说，“我是为了解决这件事来的。”

埃斯科瓦尔对他致以同样的礼貌和极大的尊敬。他们面对面坐在客厅的两张印花椅上，准备开始一场老朋友式的长对话。神甫喝了一杯威士忌，冷静了下来。同时，埃斯科瓦尔一直都小口喝着果汁。但是，由于神甫不耐烦的性子和埃斯科瓦尔像他信中一样的简洁尖刻的说话风格，拜访从预计的时长缩短到了三刻钟。

比亚米萨尔担心神甫会忘记，特地嘱咐神甫记下对话的内容。神甫确实这么做了，而且他似乎做得更多。他以糟糕的记忆力为借口，要求埃斯科瓦尔亲笔写下他的核心提议。提议写成之后，神甫又以无法完成为由让他更改或剔除。就这样，虽然埃斯科瓦尔控诉警方的各种暴行，但提议中他把执意要求的警察革职问题最小化，并集中谈到了囚禁地点的安全问题。

神甫说，他问埃斯科瓦尔，他是不是袭击四名总统候选人的罪犯。他回答得并不直接，只说人们把不是他犯下的罪行归咎于他。他

向神甫坦白，他无法阻止四月三十日在波哥大的大街上发生的对罗·穆特拉教授的袭击案，因为这个命令很早之前就已经发出了，无法更改。至于释放玛露哈和帕丘的事宜，他没有说任何可能牵连到自己的话。但是他说，“可被引渡者”让他们生活在正常的条件中，而且他们很健康。一旦确定投降条约，他们马上会被释放。他特别提到了帕丘，并严肃地说：“他对自己的绑架生活很满意。”最后，他认可了加维里亚总统的正直，并对达成协议表示期待。纸上的内容有时由神甫来写，但大部分是由埃斯科瓦尔亲笔修改和进一步阐述的。这张纸成了第一份正式的投降提议书。

当神甫的一只隐形眼镜掉落时，他起身准备告辞。他试着把镜片戴上，埃斯科瓦尔也来帮助他，他们还向雇员们求助，但是都没有用。神甫很绝望。“什么都做不了，”他说，“只有宝琳娜能做这件事。”令人惊讶的是埃斯科瓦尔知道她是谁，还知道当时她在哪里。

“别担心，神甫，”他说，“如果您愿意，我们把她带来。”

但是神甫迫不及待地想回去，他情愿不戴眼镜离开。在道别之前，埃斯科瓦尔让神甫为他脖子上戴着的一块金牌祈福。在随从们的包围下，神甫在花园里给金牌祈福。

“神甫，”他们对他说，“您走之前，先给我们祈福吧。”

他们跪了下来。堂法比奥·奥乔阿说过，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的调解会对埃斯科瓦尔手下的投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埃斯科瓦尔大概也是这么想的。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和手下一起下跪，以做出表率。神甫祝福了所有人，并劝说他们回归合法的生活，为国家的和平做出贡献。

神甫在那里待了不到六个小时。晚上八点半左右，在闪耀的群星下，他出现在了拉·洛玛农庄。他像十五岁的学生那样从车上跳下来。

“放心，孩子，”他对比亚米萨尔说，“没有问题，我刚刚让所有人都下跪了。”

很难让他恢复常态。他陷入了令人惊慌的兴奋状态。缓和剂和奥乔阿家的女人煎制的镇静剂都没有起作用。天还在下雨，但他想马上飞回波哥大公布这个消息，他想和共和国总统交谈，当场敲定协议宣布实现和平。他们成功让他睡了几个小时，但是从凌晨起，他就在黑灯瞎火的房子里走来走去，他自言自语，大声诵读他脑海中闪现的祷文，直到黎明时，睡意才击垮了他。

五月十六日上午十一点，他们到达波哥大，广播里正在播送新闻。比亚米萨尔在机场找到了儿子安德烈斯，激动地拥抱他。“放心，儿子，”比亚米萨尔告诉他，“你妈妈三天后就回来了。”当比亚米萨尔打电话给拉法埃尔·帕尔多时，帕尔多很难相信他的话。

“我真的很高兴，阿尔贝托。”他说，“但是，您别抱有太多幻想。”

自绑架案发生以来，比亚米萨尔第一次出席了朋友们的聚会。就像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其他承诺一样，这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模糊的承诺。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当时，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出现在了哥伦比亚所有的新闻栏目上——电视、广播和报刊上，他要求人们宽容地对待埃斯科瓦尔。“如果我们不辜负他，他会变成伟大的和平缔造者。”他说。他还引用了卢梭的观点，但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在

内心深处，所有人都是好人；只是某些情形会把他们变成坏人。”在缠绕成一团的麦克风之间，他毫无保留地说：

“埃斯科瓦尔是一个好人。”

十七日，周五，《时代报》公布神甫持有一封私人信件，这封信将于下周一呈交给加维里亚总统。事实上，这封信就是他和埃斯科瓦尔在会谈时一起做的笔记。周日，“可被引渡者”发布了一份通告。在新闻的激流中，这份通告极有可能被公众忽略：“我们已经下令释放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和玛露哈·帕琼。”他们没有说时间。然而，电台认为这个消息是真实的，激动的记者开始在人质的家里布岗。

结局是：比亚米萨尔收到了埃斯科瓦尔的信息，他告诉比亚米萨尔，他不会在当天释放玛露哈·帕琼和弗朗西斯科·桑托斯，他们将于第二天（五月二十日，周一）晚上七点被释放。但是，周二上午九点，比亚米萨尔得为埃斯科瓦尔的投降事宜再次出现在麦德林。

---

[1] 旧时欧洲基督教会向居民征收的宗教税款。

[2] 原文是拉丁语。

十一

五月十九日，周日。晚上七点，玛露哈听见了“可被引渡者”的公告。公告没有说明释放的日期和时间。而根据“可被引渡者”的办事方式，释放时间可能是五分钟以后，也可能是两个月之内。“管家”和他的妻子走进房间准备庆祝。

“已经结束了，”他们喊道，“得庆祝一下。”

玛露哈费了好一番工夫，才说服他们等待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直属信使的正式口头命令。这则新闻没有让她吃惊，因为在最近几个星期里，她感受到了明显的征兆。当他们带着令人灰心的承诺前来给房间铺设地毯时，她以为事情会进行得很糟糕。最近播出的节目《哥伦比亚呼唤他们回来》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和知名演员。带着重新燃起的乐观，玛露哈继续认真地观看电视剧，她甚至相信自己在不可实现的爱情催下的甘油眼泪中发现了加密的信息。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的消息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显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即将发生。

玛露哈预测，会有一次不合时宜的释放，她得穿着被绑架者的悲惨汗衫出现在镜头前，因此她想穿上她来的时候穿的衣服。广播中没有传来新的消息，“管家”在睡前等待着正式的命令，但他的希望破灭了。这让玛露哈开始警惕自己的荒谬表现，即便这种表现只有她自己

看得到。她服用了大剂量的巴比妥，睡到第二天（周一）才醒来，她惊恐地发现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比亚米萨尔没有因为任何疑虑而感到不安，因为埃斯科瓦尔的通告是确凿无疑的。比亚米萨尔把通告传达给记者们，但是他们没有理会他。大约九点，一家电台大张旗鼓地宣布，比亚米萨尔的妻子玛露哈·帕琼女士刚刚在硝石区被释放。记者们一拥而上，赶往那里，但是比亚米萨尔无动于衷。

“为了避免她出事，他们绝不会在一个如此偏远的地点释放她。”他说，“明天，他们会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稳妥地释放她。”

一名记者用麦克风挡住了他的去路。

“让人吃惊的是，”他对比亚米萨尔说，“您对那些人如此信任。”

“那是战争中的诺言。”比亚米萨尔说。

最信任他的记者们留在了公寓的走廊上（有一些待在了厨房的吧台处），直到比亚米萨尔请他们离开，好关上家门。其他记者在房子对面的中小型车上扎营，并在那里过夜。

周一，比亚米萨尔像往常一样醒来收看早上六点的新闻节目，在床上待到了十一点。他想尽量少接电话，但是记者和朋友们的来电让他无法停歇。当天的新闻主题依然是等候被绑架者们。

周四，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拜访了玛丽亚维，并带去了她的丈夫将于周日被释放的秘密消息。桑托斯一家不可能知道他如何在“可被引渡者”发布公告的七十二个小时前得到了这个消息，但是他们相信这是真的。为了庆祝，他们给神甫与玛丽亚维和孩子们一起拍了照片，并

把这张照片发表在了周六的《时代报》上，他们希望帕丘把照片解读成一条私人信息。确实如此：帕丘在狱中一打开这份报纸就得到了清晰的启示，他知道神甫的行动已经结束了。他一整天都惴惴不安地等待奇迹的发生。在与看守们的对话中，他偷偷设置了无害的陷阱，观察他们是否会露出马脚，但他一无所获。从几周前开始，广播和电视就在不断地谈论这个话题。但是在那个周六，他们略过了这个话题。

周日与平常一样开始了。帕丘觉得看守们早上奇怪又紧张。但是，他们逐渐回归了周日的日常生活：特别的比萨午餐、电影和扎堆的电视节目、纸牌游戏、足球赛。突然，新闻栏目《氪》出人意料地以“可被引渡者”宣布释放最后两名人质的新闻开场了。帕丘跳了起来，发出了一声胜利的叫喊。他拥抱了他的值班看守。“当时，我觉得我要心肌梗死了。”他后来讲述说。但是，那名看守接受他的拥抱时带着禁欲主义的怀疑态度。

“我们等着消息确认吧。”他说。

他粗略地浏览了遍电台和电视的其他新闻节目，这份通告在所有节目里都出现了。其中一档节目是在《时代报》的编辑室录制的。被绑架八个月之后，帕丘再次感受到了自由生活的坚实地面：周日值班室的荒凉氛围、玻璃房里的老面孔、他专属的工作地点。在又一次播报人质即将被释放的消息之后，新闻节目的特约记者挥了挥麦克风，就像挥动一个蛋筒冰激凌那样，把它递到一名体育撰稿人的嘴边，问他：

“您觉得这条新闻怎么样？”

作为一名主编，他无法克制自己的反应。

“这是什么蠢问题！”他说，“还是你希望他说让我再多待一个月？”

电台像往常一样没有那么尖刻，也更加感性。一些电台工作人员聚集在埃尔南多·桑托斯家里，在那里播报他们遇到的一切事情。这加剧了帕丘的紧张情绪，因为他认为自己一定会于当晚被释放。“就这样，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二十六个小时开始了，”他说，“每秒钟都像是一个小时。”

记者无处不在。摄像机在帕丘家和他父亲家之间往返。从周日晚上开始，两家都挤满了亲戚、朋友、单纯的好奇者和来自各地的记者。玛丽亚维和埃尔南多·桑托斯已经记不清自己跟随着新闻难以预测的走向在两家之间往返了多少趟。帕丘甚至无法准确区分电视上出现的是谁家的房子。更糟糕的是，在每座房子里他们都会重复问他们二人相同的问题，时间变得难以忍受。家里是如此混乱，埃尔南多·桑托斯甚至无法在自己家里从拥堵的人群中辟出一条道路。他不得不偷偷从车库溜出去。

不值班的看守们上前祝贺他。他们高兴得让帕丘都忘记了他们是他的监狱看守。人们聚集起来，现场变成了一场同代老朋友的欢庆会。当时他意识到，由于他重获自由，他想让看守们重新做人的计划失败了。他们是从安蒂奥基亚省的其他地区迁入麦德林的小伙子，在贫民窟中迷失了自己，毫不在乎地杀人，也不在乎被杀。他们通常来自破裂的家庭，其中父亲的形象是消极的，而母亲的形象则很重要。他们已经习惯了从事收入极高的工作，对金钱没有概念。

当帕丘终于睡着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恐怖的梦，梦见自己自由而快乐，但是他突然睁开眼睛，又看见了那个相同的天花板。接下来，

他忍受着那只疯狂的公鸡的折磨——它前所未有地疯狂，也离他前所未有地近，而且他无法确定它究竟在哪里。

周一早上六点，广播确认了消息，但是没有提及有关释放时间的任何线索。在无数次重复播报通告原文之后，广播宣布，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在会见加维里亚总统之后，将于当天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唉，我的上帝啊。”帕丘想，“但愿这个为我们做了许多事的人，不要在最后时刻把事情搞砸了。”下午一点，他们通知他，他将被释放，但是下午五点过后，他才得到更多的信息。一名蒙面首领毫无感情地通知他，埃斯科瓦尔凭借对宣传的感知力判断，玛露哈会准时出现在七点的新闻栏目里，而他会出现在九点半的新闻栏目里。

玛露哈度过的上午更加有趣。大约九点的时候，一位二级首领走进房间向她确定了她将在下午被释放，还向她讲述了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行动的一些细节。他或许是想为之前不公正地对待玛露哈表示歉意。在他近期的一次来访中，玛露哈问他，她的命运是否掌握在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的手中。那个男人用带着些许嘲笑的语气回答她。

“别担心，您安全得很。”

玛露哈意识到他误解了她的问题，连忙向他解释，她一直都对神甫有着极大的敬意。起初，她的确没有留意他偶尔混乱而晦涩的电视布道。但是，从他发出给埃斯科瓦尔的第一条信息开始，她就明白了，他与她的生命息息相关。于是，她每晚认真收看他的节目。她关注他行动的线索、前往麦德林的拜访以及他与埃斯科瓦尔对话的进展。她确信，他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然而，首领的讽刺让她担心，也许神甫并不像在他与记者们的公开对话里表现的那样，得到了“可被引

渡者”的信任。但他的奔走让自己很快会被释放。这样的确认让她愈发快乐。

在一段关于国内释放协定的简短对话之后，她问起被绑架的那天晚上，他们在第一所房子里拿走的那枚戒指。

“您放心，”他说，“您所有的东西都很安全。”

“我很担心，”她说，“因为戒指不是在这所房子里被拿走的，而是在第一所房子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那个收走戒指的人。不是您拿的吧？”

“不是我，”男人说，“但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您别担心，因为您的衣服在这里。我已经看见了。”

“管家”的妻子自愿提出去给玛露哈购买所有她需要的东西。玛露哈托她买睫毛膏、口红和眉笔，还让她买双长袜，来替换被绑架的那天晚上弄破的那双。后来，“管家”走了进来，他因为没有得到关于释放的新消息而忧心忡忡。他还担心他们会在最后时刻改变计划，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相反，玛露哈非常镇定。她洗了澡，穿上了绑架案发生当晚穿的衣服。出门时，她还会穿上那件奶油色的外套。

广播电台一整天都饶有兴致地推测被绑架者们等待的情景，播放对家属们的采访和没有被证实的谣言。那些谣言在下一分钟就会被其他更加声势浩大的谣言淹没，但是一切都没有被证实。玛露哈带着提前出现的喜悦之情听见了她的孩子们和朋友们的声音，这种喜悦被不确定性威胁着。她再次看见了经过重新装潢的家，她的丈夫与无聊地等待着她的记者们愉快地交谈。第一次见到这些装潢的细节时，她觉得反感。但当她有时间更加仔细地观察这些细节，她的心情好了起

来。看守们在疯狂的清扫中停下了，他们收听和观看新闻节目，并试着鼓励她。但是，随着下午时光的流逝，他们越来越难让她振作起来。

在总统生涯的第四十一个星期一，加维里亚总统在早上五点钟自然醒来。他起床时不会开灯，以免吵醒安娜·米莱娜，她有时睡得比他更晚。他刮完胡子、洗完澡、穿上衣服之后，坐在一张放在卧室外阴冷走廊的便携椅子上收听新闻，不会吵醒任何人。他用一只口袋收音机收听广播新闻，把收音机放在耳边，音量调得很低。他迅速阅读报纸，从头条新闻一直读到广告，撕下重要的内容，方便之后和他的秘书、顾问以及部长们酌情处理。有一次，报上有一条关于某件原本该做但没有做成的事情的新闻，他把剪报寄给了相关部长并在剪报空白处快速写了一句话："贵部究竟要拖多久才能解决这个麻烦？"这件事立马得到了处理。

当天唯一的新闻是即将发生的人质释放事件，以及同属于这则新闻范畴的接见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一事，总统将听取他的汇报，了解他会见埃斯科瓦尔的细节。总统重新安排了当天的日程，以便随时都有时间接见神甫。他取消了一些可以延期的会面，安排了其他会面。第一项日程是与总统顾问的会议，他用一句学校用语开场：

"好，我们来完成这份作业。"

有几位顾问刚从加拉加斯回来，他们在上周五同固执的玛萨·马尔克斯将军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新闻顾问毛里西奥·巴尔加斯表达了他的担忧，他担心政府内外都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到底有什么打算。玛萨肯定他不会投降，因为他只相信制宪议会的赦免决定。巴尔加斯用一个问题反驳他：对于一个被自己的敌人和卡利集

团判了死刑的人来说，赦免有什么用处吗？“赦免也许能够帮助他，但并不是彻底的解决方法。”他总结说。埃斯科瓦尔迫切需要的是一座在政府的保护之下能保证他和他手下安全的监狱。

顾问们之所以提出这个话题，是因为他们害怕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会在最后时刻带着无法接受的要求出席十二点的会见。他们担心，如果这个要求不被满足，埃斯科瓦尔既不会投降，也不会释放人质。对于政府来说，这将会是一个难以挽回的失败。外事顾问加夫列尔·席尔瓦提出了两条防范性措施：第一，总统不要单独出席会面；第二，会议一结束，就得拟出尽量完整的公告，以免引发更多的解读。拉法埃尔·帕尔多一天前飞去了纽约，他在电话中表示赞同。

当天十二点，总统特别接见了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一边是神甫本人、两名来自同一个教会的神甫、比亚米萨尔和他的儿子安德烈斯，另一边是总统、他的私人秘书米盖尔·席尔瓦以及毛里西奥·巴尔加斯。总统府的新闻人员拍摄了照片和录像。如果事情进行顺利，他们会把照片和录像交给媒体。如果进行得不顺利，也不致把失败的证据留给媒体。

神甫意识到了那个时刻的重要性，他把会见埃斯科瓦尔的细节告知了总统。他确定，埃斯科瓦尔会投降并释放人质。他用他们两人共同书写的笔记证实自己的判断。由于埃斯科瓦尔本人提出的安全原因，他要求必须使用恩维加多监狱，而不是伊塔古伊监狱。这是唯一的条件。

总统读完笔记，把它还给了神甫。埃斯科瓦尔没有承诺释放人质，而是承诺让“可被引渡者”出面办理此事。这吸引了总统的注意。

比亚米萨尔向他解释说，这是埃斯科瓦尔的一项防范措施：他绝不会承认是他控制着被绑架者，以免这变成不利于他的证据。

神甫问总统，如果埃斯科瓦尔要求他在投降时进行陪同，他应该怎么做。总统同意他前去。面对神甫提出的行动安全问题，总统回答说，没有人比埃斯科瓦尔更能保障自己行动的安全。最后，总统向神甫指出（陪神甫一同前来的人都同意这一点）——将公开申明的内容减少到最低限度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让不合时宜的话破坏一切。神甫表示赞同。最后，他提出了不辞辛劳的许诺："我想借此为各位服务。如果诸位需要更多的帮助，比如同另一位神甫先生寻求和平，我随时听候诸位的差遣。"所有人都明白，他指的是西班牙神甫、民族解放军司令马努埃尔·佩雷斯。会议在二十分钟后结束，并没有拟定官方的公告。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对媒体做出了简洁的声明。

玛露哈收看了神甫的记者会，但是没有发现任何新的消息。电视新闻再次展示了被绑架者家中的记者们，这或许是前一天的画面。玛露哈也完全重复了前一天的安排，并留出了观看下午电视剧的时间。妲玛莉丝因为官方的通知重新振作了起来，她给予玛露哈决定午餐食谱的恩惠，就像死刑犯临刑时得到的待遇一样。玛露哈不带嘲讽意味地说，她想吃除了兵豆之外的任何食物。最后，他们浪费了很多时间，妲玛莉丝不能出去购物，于是告别午餐只有兵豆和兵豆。

帕丘则穿上了被绑架那天穿的衣服，由于长期不活动和糟糕的食物，他的体重增加了，衣服变紧了。他坐下来收听新闻，开始抽烟，用烟头点燃另一根香烟。他听到了关于释放他的各种版本的消息，听到了各种更正的说法和他同事们纯粹、简单的谎言，他们因为紧张的

等待而慌乱。他听到他们说发现他隐瞒身份在一家餐馆里吃饭。结果那是他的兄弟。

他重新阅读自己为了不忘记本职工作而写的关于自身实际情况的社论、评论和报道，他想在离开之后发表这些文章，作为监狱生活的见证，一共有一百多篇。他把一篇写于十二月的文章读给看守们听。当时，传统的政权阶级开始毫无顾忌地质疑制宪议会的合法性。帕丘则带着独立意识强烈地抨击制宪议会，他的独立意识无疑是狱中反思的产物。“大家都知道在哥伦比亚候选人是如何获得选票的，大家也知道一些议员是如何被选举出来的。”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说，购买选票的行为在全国范围内滋长，尤其在沿海地区；家用电器抽奖换取选票的做法十分流行；许多人通过其他恶劣的政治手段当选，比如把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和议会补贴当作佣金。他说，因此，被选中的总是同一群人，他们带有同样的目的，他们“面对失去特权的可能，正在大声地哀号”。他用一句几乎是反对自己的话结尾：“虽然人们已经为媒体（包括《时代报》）的公正性斗争了那么久，并且正在开创新局面，但是它早已土崩瓦解了。”

然而，他的笔记中最让人惊讶的内容是对政权阶级与M-19之间的对立关系的描述。当时，M-19获得了制宪议会百分之十的席位。“对M-19的政治攻击，”他写道，“和对他们在媒体上的限制（为了避免使用歧视这个词）说明我们离宽容多么遥远，我们多么需要把最重要的东西——思维——现代化。”他说，政权阶级允许曾经的游击队员参与选举只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民主。但是，当他们的席位超过总数百分之十的时候，他们开始无所顾忌地辱骂、反对他们。他用他爷爷恩里克·桑托斯·蒙特霍（绰号“卡利班”）的风格结尾，恩里克是哥伦比亚新闻史上读者最多的专栏作家：“哥伦比亚特有的传统阶层杀死了老虎，却

害怕那张虎皮。”恩里克从小学开始就作为浪漫主义右派的早慧典范而十分突出。在他身上，出现什么都不会让人觉得惊讶。

他撕掉了所有笔记，但出于他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原因，他决定保留其中的三份。他还保留了给他的家人和共和国总统的消息草稿，以及他的遗嘱草稿。他原本想带走那根把他绑在床上的链条，幻想着雕刻家贝尔纳多·萨尔塞多会把它制成一件雕塑。但是，他们没有允许，因为担心他得到揭发他们的证据。

相反，玛露哈不想保留关于那段悲惨过去的任何回忆，她打算把这段往事从她的生命中抹去。但是，下午六点左右，房门从外面打开时，她才意识到这六个月的苦涩时光将在何种程度上制约她的生活。从玛丽娜去世和贝阿特利丝离开时起，门被打开的时刻就变成了释放或是行刑的时刻：两者都有可能。她的心都悬了起来，等待着那个不祥的仪式：“我们马上出发，请您做好准备。”走进房间的是“博士”，一名副手陪伴在他身边。副手前一天就已经到了。他们俩似乎都很着急。

“行了，行了，”“博士”催促玛露哈，“快点！”

她无数次想象过这个时刻，她觉得自己被一种为自己争取时间的奇怪需要控制住了。她问起了她的戒指。

“我把戒指给您丈夫的妹妹了。”副手说。

“不对，”玛露哈冷静地回答，“您跟我说，您后来见过它。”

当时，她更在意的不是戒指，而是让他在他的上级面前出丑。但是，在时间的压力下，上级假装没有听懂。“管家”和他的妻子把装着

私人物品的口袋拿给玛露哈，里面还有在囚禁期间不同的看守送给她的礼物：圣诞卡片、汗衫、毛巾、杂志和一本书。在最后的日子里照看她的温顺的看守们只给了她圣人纪念章和圣人画像。他们恳求她为他们祈福，让她记住他们，还让她为他们做点什么，帮助他们脱离糟糕的生活。

“你们想要什么都可以。”玛露哈告诉他们，“如果你们需要我，请你们来找我，我会帮助你们的。”

“博士”不想置身事外：“我能给您什么作为纪念呢？”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摸着口袋。他拿出了一颗九毫米的子弹，把它递给了玛露哈。

“拿着，”他对玛露哈说，他没有开玩笑，他是认真的，“这是没有打到您体内的子弹。”

很难把玛露哈从“管家”和妲玛莉丝的怀抱中解救出来。妲玛莉丝把面具抬到鼻子上，亲吻着玛露哈，请她不要忘记自己。玛露哈感受到了她的真情。总之，在她生命中最长、最煎熬的日子结束之时，那是她度过的最快乐的一分钟。

他们给她戴上的应该是他们手头最脏、最臭的一顶风帽。风帽是反过来戴的，在后颈处给眼睛开了小洞。她不由得想起，他们在杀死玛丽娜时，也是这样给她戴上风帽的。她拖着两条腿，在黑暗中被带进一辆汽车，那辆车和他们用来绑架她的车子一样舒适。他们让她用同样的姿势在同一个位置上坐下，采取了同样的防范措施：让她的头靠在一个男人的膝盖上，以免别人从外面看见她。他们警告她，他们

会经过好几个警察岗哨。如果他们在某个岗哨上被拦下了，玛露哈得摘下风帽，好好表现。

下午一点，比亚米萨尔已经和他的儿子安德烈斯吃完了午饭。两点半，他躺下午睡，一直睡到了五点半。六点，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他刚刚淋浴完，开始穿衣迎接妻子。他拿起了床头柜上的话筒，只说了一句："喂？"一个身份不明的声音打断了他："她会在七点过几分的时候到家。他们快要出发了。"匿名者挂断了电话。那是一个意料之外的通知，比亚米萨尔对此很感激。他给门房打电话，确定他的汽车停在花园里，司机已经准备好了。

他穿上了一套深色的衣服，戴上了一条有浅色菱形花纹的领带，准备迎接妻子。他前所未有地苗条，因为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他瘦了四公斤。晚上七点，他来到客厅，准备在玛露哈到家的同时接受记者采访。她的四个孩子和他们共同的孩子安德烈斯也在那里。只差尼可拉斯，这位家族的音乐家将在几个小时内从纽约赶来。比亚米萨尔坐到离电话机最近的沙发上。

当时，距离玛露哈获得自由还有五分钟。与被绑架的那天晚上不同，通向自由的旅程迅速而畅通。起初，他们行驶在一条碎石小路上，拐了很多不适宜豪华轿车拐的弯。玛露哈通过对话判断出，除了她身边的男人之外，车上还有一个人，坐在司机旁边。她认为"博士"不在他们中间。一刻钟后，他们强迫她躺在地上。大约五分钟之后，他们停了下来，但是她不明白为什么。然后，他们驶进了一条喧闹的大道，七点的交通非常拥堵。接着，他们非常顺利地进入了另一条大道。当总时长过去不到三刻钟的时候，车子突然刹车。司机旁边的男人向玛露哈发出了一道决绝的命令：

“好了，下车，快点。”

她旁边的男人试图把她撵出车外。玛露哈进行了反抗。

“我什么都看不见。”她叫道。

她想摘下风帽，但是一只手粗鲁地制止了她。“您等五分钟之后再摘下它。”他向她喊道。他们把她推下了车。玛露哈一阵眩晕，她感到害怕。她以为自己被扔下了深渊，坚实的地面让她平复了呼吸。她等待着汽车远去，觉得自己位于一条车辆稀少的大街上。她小心翼翼地摘下风帽，看见了树木间的房子。长久以来，她第一次看见了灯火通明的窗户。于是她意识到，自己真的自由了。当时是七点二十九分，从她被绑架的那天晚上开始，已经过去了一百九十三天。

一辆汽车沿着大街向她靠近，它掉了个头，停在了对面的人行道上，恰巧在玛露哈对面。就像贝阿特利丝当时一样，她想，这样的巧合是不可能发生的。那辆汽车应该是绑架者们派来的，以保证她被成功解救。玛露哈靠近驾驶员的窗口。

“拜托，”她对司机说，“我是玛露哈·帕琼。他们刚刚把我放了。”

她只想让车里的人帮她叫一辆出租车。但是男人大叫了一声。几分钟前，他听着广播里即将释放人质的新闻，心想：“如果我碰见弗朗西斯科·桑托斯在找车会怎么样？”玛露哈焦急地想见到她的家人，但她任由他把她带到对面的房子里打电话。

房子的女主人和孩子们认出了她，所有人都大叫着拥抱她。玛露哈觉得自己失去了知觉，她觉得周围发生的一切是绑架者们的又一个骗局。那个接她的男人叫马努埃尔·卡罗，他是房主奥古斯都·波雷罗的

女婿。房主的妻子曾是新自由主义的积极分子，她在路易斯·卡洛斯·加兰的选举活动中与玛露哈共事过。但是，玛露哈现在从局外人的角度观察生活，仿佛那段生活只在一块电影屏幕里。她要了一杯烧酒（她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一饮而尽。她给家里打电话，但是她记不清号码，打错了两次。最后一个女声立刻接起了电话："是谁？"玛露哈认出了她的声音，平静地说：

"阿莱桑德娜，女儿。"

阿莱桑德娜叫了起来：

"妈妈！你在哪里？"

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但是阿莱桑德娜抢在了他前面，因为她恰巧路过电话旁边。玛露哈开始向她口述地址，但是她手上没有纸笔。比亚米萨尔抢过话筒，用一种令人惊愕的自然语气向玛露哈问好：

"怎么样了，宝贝？你还好吗？"

玛露哈用同样的语气回答。

"很好，亲爱的，没有问题。"

他已经为那个时刻准备好了纸笔。他记下了玛露哈口述的地址。但他觉得某个地方不是特别清楚，他让她把电话递给那个家里的人。波雷罗的妻子给他提供了之前缺少的准确信息。

"非常感谢，"比亚米萨尔说，"离得很近。我马上过去。"

他忘记了挂断电话，他在这紧张而漫长的几个月里保持着的钢铁般的自制力突然瓦解了。他两级两级地迈下台阶，跑过前厅，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紧随其后。在大门口，从相反方向跑来的其他记者几乎快把他推倒了。

“玛露哈被放出来了，”他向所有人喊道，“我们走。”

他坐进车里，粗暴地关上了车门，把昏昏欲睡的司机吓了一跳。“我们去接夫人回来。”比亚米萨尔说。他把地址告诉司机：107斜街27-73号。“那是一座白色的房子，位于与高速公路平行的西边的公路旁。”他确认道，但他说地址的时候着急而混乱，司机启动时弄错了方向。比亚米萨尔失控地纠正方向，这与他的个性并不相符。

“您做事当心些。”他喊道，“我们得在五分钟内赶到。如果迷路了，我就阉了您！”

司机跟他一起经历了绑架案的各种恐怖的情节，便没有生气。比亚米萨尔恢复了镇定，给司机指了几条最短、最便捷的路，因为当他们在电话里跟他解释地址的时候，他已经设想好了路线，以确定自己不会迷路。那是交通最糟糕的时候，但不是最糟糕的一天。

安德烈斯跟在父亲后面出发了，他的表亲加夫列尔和他在一起。后面是记者的车队，他们用伪造的警报和救护车在车流中开出一条路来。尽管安德烈斯是一名驾驶专家，但他被困在了拥堵的交通中，滞留在了那里。而比亚米萨尔在十五分钟后到达了。他不需要花时间辨认那座房子，因为几名记者正在公寓门外和主人争论，想要让他允许他们进去。比亚米萨尔在混乱中开了路。他没有时间和别人打招呼，房子的女主人认出了他，向他指了指台阶。

“往这边走。”她对他说。

他们把玛露哈带到了主卧，让她收拾打扮，等候她丈夫的到来。她一进屋就迎面遇见了一个古怪又陌生的人：镜中的自己。她看起来非常臃肿，眼睑由于肾炎而肿胀。由于六个月的阴暗生活，她的肤色发青，非常憔悴。

比亚米萨尔两步并作一步地迅速上楼，推开了他遇见的第一扇门。那是孩子们的房间，里面有洋娃娃和自行车。接着他推开了对面的门，看见玛露哈坐在床上。她穿着被绑架那天穿的格子外套，刚刚还化了妆。“他进来的时候就像一阵雷。”玛露哈讲述说。她跳起来搂住他的脖子，他们激烈、长久而沉默地拥抱彼此。记者们的喧闹声使他们从心醉神迷中回过神来。记者们击破了主人的防线，一拥而入。玛露哈吓了一跳。比亚米萨尔开心地笑了。

“是你的同事们。”他告诉她。

玛露哈灰心丧气。“我有六个月没照过镜子了。”她说。她朝着她镜中的影像笑了笑，那不是她。她直起身子，用发绳扎了一个马尾辫。她尽力打起精神，试图让镜子里的女人与她六个月前的形象更加接近。但无能为力。

“我现在太难看了，”她说，她给丈夫看她臃肿变形的手指，“之前我没有意识到，因为我的戒指被拿走了。”

“你很完美。”比亚米萨尔告诉她。

他搂着她的肩膀，把她带到客厅。

记者们用摄像机、闪光灯和麦克风迎接他们。玛露哈被灯光照射得睁不开眼睛。“冷静，小伙子们，”她对他们说，“我们在我的公寓里聊能更自在些。”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

晚上七点播出的新闻节目什么都没有提及，但是通过对广播的监控，加维里亚总统在几分钟后得知玛露哈·帕琼已经被释放。他与毛里西奥·巴尔加斯一同向她家驶去，他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关于弗朗西斯科·桑托斯被释放的官方公告，这件事应该也会很快发生。面对记者们的录音设备，毛里西奥·巴尔加斯已经大声宣读过通告的内容。但条件是，只要正式的新闻没有发布，他们就不能传播这则消息。

当时，玛露哈正在回家的路上。快到家的时候，传出了帕丘·桑托斯已经被释放的谣言。记者们发布了官方公告，各家广播电台纷纷转播。

总统和毛里西奥·巴尔加斯在车上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们为提前录好公告而感到高兴。但是，五分钟后，消息被辟谣了。

“毛里西奥！”加维里亚感叹说，“真糟糕啊！”

然而，当时他们唯一能做的是相信新闻播报的内容是真实的。同时，由于他们不可能待在比亚米萨尔人流拥挤的公寓里，他们来到了楼上阿塞内思·韦拉斯克斯的公寓里。在听到三次假消息之后，他们等候着帕丘真正被释放的时刻。

帕丘·桑托斯已经听说了玛露哈被释放的新闻、自己提前被释放的假消息以及政府的失误。这时，上午跟他交谈过的男人走进房间，挽着他的手臂，没有蒙住他的眼睛就把他带到了底楼。在那里，他注意到房子已经空了，一名看守大笑着告诉他，为了不支付最后一个月的

房租，家具已经被一辆搬家卡车运走了。所有人都互相拥抱告别。看守们向帕丘表示感谢，因为他们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帕丘真诚地回答：

“我也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在车库里，他们递给他一本书，让他假装看书遮住脸。他们警告了他。如果遇到警察，他必须跳车，让他们逃跑。最重要的是，他不能说自己曾经被囚禁在波哥大，他得说自己在沿着一条崎岖不平的公路行驶了三小时的地方。这样做的理由很充分：他们知道帕丘相当敏锐，他对房子的位置有着大致的概念；并且他不能揭发房子的地址，因为在绑架的漫长时间里，看守们毫无防备地和邻居们生活在一起。

“如果您说了，”释放事宜的负责人最后说，“我们会杀死所有的邻居，让他们以后再也认不出我们。”

汽车在波雅卡大街和80号大街交会处的警察岗哨前熄火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没有发动，到第五次时终于启动了。所有人都出了一身冷汗。在距离那里两个街区的地方，他们拿走了被绑架者的书，把他留在了一个街角，给了他三张两千比索的纸币打车。他坐上了经过的第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和善的年轻人，不想向他收费。司机在等候于他家门口的人群中间开了条路，他按着喇叭，高兴地大叫。对于黄色新闻[1]记者来说，这是一次幻想的破灭：他们以为会见到一个在结束了两百四十四天监狱生涯后变得憔悴而挫败的男人，但是他们遇见了一个由内而外焕发青春的帕丘·桑托斯。他胖了一些，比过去更加咋咋呼呼，他有着前所未有的生活热情。“他们把他原模原样地送回来了。”他的堂亲恩里格·桑托斯·卡尔德隆说。另一位堂亲被家族的欢乐情绪感染了，他说：“他就该再待上大半年。”

玛露哈已经到家了。她是和阿尔贝托一起到的，身后跟着一组车队。车队超到他们前面，利用交通堵塞的机会进行现场直播。通过广播关注这件事的司机们在经过时认出了他们，不断地按喇叭向他们问好，甚至一路都响起了掌声。

安德烈斯·比亚米萨尔不知道父亲去了哪里，他想回家。但他驾驶时过于粗鲁，汽车的发动机已经坏了，拉杆也断了。他把车子留给了附近岗哨中的值班警察，然后拦下了经过的第一辆汽车：一辆深灰色的宝马，驾驶员是一名和蔼的经理，开车时正听着收音机。安德烈斯告诉他自己是谁，为什么着急，并请他尽量把自己带到目的地。

“上车吧。”他说，“但是，我得提醒您，如果您说的是谎话，您不会有好下场。”

在第七公路与80号大街的交汇处，一位坐在旧雷诺车上的女性朋友追上了他。安德烈斯上了她的车，但是汽车在希尔昆巴拉的斜坡上抛锚了。安德烈斯用尽全力追上了国家广播电视集团的最后一辆白色吉普车。

家门前的斜坡被拥上街头的车辆和行人堵住了。于是，玛露哈和比亚米萨尔决定下车，走完剩下的一百米。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下车的地点就是玛露哈被绑架的地方。玛露哈在激动的人群中首先认出的是玛丽亚·德尔·罗萨里奥·奥尔蒂斯的面孔，她是《哥伦比亚呼唤他们回来》的开创者和导演。从这个节目成立开始，那天晚上第一次由于缺乏话题而停播。接着她看见了安德烈斯，他全力跳下车，试图在一名身材高大、衣着考究的警官下令封锁街道时回到家中。安德烈斯灵光一现，他直视警官的眼睛，用坚定的声音说：

“我是安德烈斯。”

警官并不认识他，但是让他通过了。他向玛露哈跑去，她认出了他，两人在掌声中拥抱。巡逻警察帮助他们开路，玛露哈、阿尔贝托和安德烈斯带着不堪重负的心脏爬坡，情感将他们击溃了。第一次，他们本打算抑制住的泪水喷涌而出。当然，视野所及之处，另一群善良的邻居在几座最高建筑物的窗户上展开了旗帜；他们用到处摇曳着白色手绢的春天和热烈的掌声庆祝这段快乐的回家之旅。

---

[1] 黄色新闻，或黄色新闻学，是新闻报道和媒体编辑的一种取向。这里的“黄色”并不等于色情。在理论上，黄色新闻以煽情主义新闻为基础；在操作层面上，注重对犯罪、丑闻、流言蜚语、灾异、性等问题的报道，采取种种手段迅速吸引读者注意，同时策动社会运动。

后记

第二天早上九点，比亚米萨尔如约来到了麦德林，他前一天晚上只睡了不到一个小时。那是一场重生的欢庆。凌晨四点，他和玛露哈终于单独待在了公寓里。他们对那天发生的事感到异常兴奋，留在客厅里交流过去的回忆，一直到天亮。在拉·洛玛农庄，人们用像往常一样的宴会招待他，还增加了香槟洗礼庆祝自由。然而，那只是短暂的休息，因为当时更着急的人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他藏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失去了人质这一盾牌。他的新使者是一个非常高挑的男人，话很多，有一头金发和金色的长胡子。人们管他叫“猴子”，他全权负责投降的谈判事宜。

根据塞萨尔·加维里亚总统的安排，与埃斯科瓦尔律师进行的一切法律辩论程序都通过卡洛斯·埃杜阿尔多·梅希亚博士进行，司法部须对整个过程知情。至于投降，政府方面，梅希亚会根据拉法埃尔·帕尔多的指令行动；另一方面，豪尔赫·路易斯·奥乔阿、“猴子”和埃斯科瓦尔本人会在暗中行动。比亚米萨尔依然积极地充当政府一方的调解人，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是埃斯科瓦尔的道德担保人，在紧急状况下，他会出面干预。

埃斯科瓦尔焦急地让比亚米萨尔在玛露哈被释放的第二天出现在麦德林，这让人觉得投降指日可待。但人们很快发现并非如此，因为对他来说，还差一些掩人耳目的流程。所有人，尤其是比亚米萨尔最担心的是在投降前埃斯科瓦尔会出事。当然，比亚米萨尔明白，一旦

埃斯科瓦尔或是他一方的幸存者们怀疑他食言，便会让他用性命偿还。坚冰是埃斯科瓦尔本人打破的，他打电话到拉·洛玛，直截了当地向比亚米萨尔问好：

“比亚医生，您满意了吗？”

比亚米萨尔从没有见过他，在此之前也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他绝对冷静的声音给比亚米萨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声音中没有丝毫神秘光环的痕迹。“我很感激您来。”没有等他回答，埃斯科瓦尔接着说。他的天性完全基于他来自贫民窟的粗野的说话方式。“您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您不会让我失望。”接着，他直入正题：

“我们开始商量我怎么投降吧。”

事实上，埃斯科瓦尔已经知道该如何投降，但是他或许想和他当时完全信任的人一起做一次完整的讨论。他的律师和刑事诉讼法庭庭长一直在和司法部协调，时而采取直接的方式，时而通过地方刑事诉讼法庭庭长办理。他们已经逐一讨论了投降的所有细节。从每个人对总统法令做出的不同解读延伸出的法律问题已经阐明，只剩下三个问题：监狱环境问题、监狱人员问题以及警察和军队的作用问题。

位于恩维加多戒毒中心的监狱即将完工。比亚米萨尔和“猴子”在埃斯科瓦尔的要求下，于玛露哈被释放的第二天参观了监狱。由于墙角的瓦砾和那年强降雨的侵袭，监狱的气氛看上去有些压抑。安全技术设施问题已经解决了。监狱外有一道二点八米高的双重围墙，围墙上配有十五条五千伏的电缆和七个岗哨。此外，在入口处还有两个岗哨。这两个设施既能阻止埃斯科瓦尔逃走，也能防止他被杀害。

在比亚米萨尔看来，唯一的缺陷是为埃斯科瓦尔准备的房间里的卫生间，该卫生间是用意大利瓷砖铺设的。他建议换成（确实也被更换了）更加朴素的装饰。他报告的结论甚至更加朴素："我觉得这是一座非常监狱的监狱。"的确，奢华的关押环境可能会在全国和整个西半球引发一场风波，并牵连到政府的威望。后来，这种奢华还是通过在政府内部进行的一系列难以想象的贿赂和恐吓行动实现了。

埃斯科瓦尔向比亚米萨尔索要一个没有被监听的波哥大电话号码，以便商议投降的细节。于是，他把他楼上女邻居阿塞内思·韦拉斯克斯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他觉得这是最安全的电话，随时都有疯癫的作家和艺术家给这个号码打电话，他们能让别有用心的人暴跳如雷。方法简单而无害：某个匿名人物给比亚米萨尔家打电话，告诉他："十五分钟后，先生。"比亚米萨尔不慌不忙地上楼来到阿塞内思的公寓，在十五分钟后亲自给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打电话。一次，比亚米萨尔在电梯中耽搁了，阿塞内思接起了电话。一位粗鲁的帕伊萨人问起比亚米萨尔先生。

"他不住在这里。"阿塞内思回答。

"您别担心，"帕伊萨人笑着说，"他上来了。"

说话的正是埃斯科瓦尔本人，但是阿塞内思只会在她阅读本书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一点。因为，出于基本的诚实，比亚米萨尔想在那天把真相告诉她。而她完全无法接受，还捂住了耳朵。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她告诉他，"您想在我家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别告诉我。"

当时，比亚米萨尔每周至少去一次麦德林。他在洲际酒店给玛丽亚·莉娅打电话，她会派一辆汽车，把他接到拉·洛玛。最初的一次，玛露哈和他同行，以感谢奥乔阿一家的帮助。午饭时，他们谈论起了释放之夜没有归还的祖母绿小钻石戒指。比亚米萨尔也曾经和奥乔阿一家说起这件事。他们给埃斯科瓦尔发了一条信息，但是他没有回复。“猴子”当时也在，他建议比亚米萨尔再送她一枚新的。但是比亚米萨尔跟他解释说，玛露哈并不是因为戒指的价格而怀念它，而是因为它的情感价值。“猴子”承诺把问题反馈给埃斯科瓦尔。

埃斯科瓦尔打给阿塞内思家的第一通电话是关于《上帝一分钟》的。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在节目中谴责他是冥顽不灵的色情分子，并敦促他回归上帝的道路。没有人理解这样的骤变。埃斯科瓦尔认为，如果神甫反对他，应该是有重要的原因。埃斯科瓦尔要求得到即时、公开的解释作为投降的条件。对他来说，最糟糕的是，他的军队出于对神甫话语的信任，已经决定投降了。比亚米萨尔把神甫带去了拉·洛玛，神甫在那里通过电话向埃斯科瓦尔做了解释。他解释说，在节目制作的过程中，他们的剪辑出了错误，播出了他没有说过的话。埃斯科瓦尔录下了对话，放给他的军队听，避免了危机。

但是，事情依然没有结束。政府坚持在监狱外安置由军队和国民警察卫队组成的混合巡逻队；坚持砍伐附近的森林，改造为射击场；还坚持保留在中央政府、恩维加多市政府和检察院构成的三方联合委员会内部任命警卫的特权，因为这是一座市级兼国家级监狱。埃斯科瓦尔拒绝警卫靠近，这样他的敌人们就无法在监狱中杀死他。他拒绝混合巡逻队，因为他的律师们说，根据监狱权利法令，监狱内不能有政府武装力量。他反对砍伐附近的森林。首先，因为森林让直升机无法在那里降落；其次，他认为砍伐后留下的空地会成为政府用来瞄准

囚犯的场地。他甚至相信，从军事层面上说，射击场只不过是一块视野开阔的空地。这自然是戒毒中心的优点，对于政府和犯人来说都是如此——从屋里的任何一个点都能完整地看见山谷和山峰，提前侦察到危险。最后，除了电缆围墙之外，刑事诉讼法庭庭长在最后时刻还想在监狱周围建一面装甲墙。埃斯科瓦尔被激怒了。

五月三十日，周四，《观察者报》发布了一则新闻——来自可靠的官方来源，内容是埃斯科瓦尔在他的律师和政府发言人举行的会议中提出的投降条件。根据新闻报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条件是流放玛萨·马尔克斯将军，以及革职国家警察局局长米盖尔·戈麦斯·帕蒂亚和司法警察调查与情报中心（Dijín）的指挥官奥克塔维奥·巴尔加斯·席尔瓦。

为了弄清消息的来源，加维里亚总统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玛萨·马尔克斯将军，因为政府的亲信认为消息是他传出的。会见持续了半个小时。如果有人同时认识他们两人，也很难想象哪一位更加镇定。将军拥有男中音，声音温柔而缓慢。他详细地讲述了他对这件事的调查细节。总统沉默地听着。二十分钟后，他们互相道别。第二天，将军寄给总统一封六页的正式信函，详细地复述了他之前说过的内容，作为历史的证据。

信上说，根据调查，新闻的来源是玛尔塔·妮耶维丝·奥乔阿。几天前，她将这则独家消息告诉了《时代报》的法律撰稿人——她的专门委托人，她无法理解为什么消息首先被《观察者报》刊登了。将军还说，他强烈支持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投降，并重申他坚持自己的原则、责任和义务。他最后说：“出于您了解的原因，总统先生，很多个人和团体坚持寻求让我的职业生涯不得安宁的方式，或许还想把我置于危险的境地，方便他们实现反对我的目标。”

玛尔塔·妮耶维丝·奥乔阿否认了自己是消息的来源，便再也没有谈论此事。然而，三个月后（当时，埃斯科瓦尔已经在监狱里了），总统府秘书长法比奥·比耶加斯受总统的委托，让马尔克斯将军去他的办公室，并邀请他前往蓝厅。法比奥从一头走到另一头，仿佛是在周日散步。同时，他告诉将军总统将辞退他的决定。玛萨·马尔克斯相信，这就是政府之前否认的与埃斯科瓦尔达成的协议。他也是这样说的："我被谈判了。"

无论如何，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埃斯科瓦尔就已经让马尔克斯将军明白，他们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他忘记了一切，认真投降：他停止了袭击，解散了集团，交出了炸药。他寄给将军一份藏匿地点清单，将军的人在那些地点找到了七百公斤的炸药。之后，他将在监狱里继续向麦德林军队透露总计藏有两吨炸药的藏匿点。但是，玛萨·马尔克斯从来没有相信过他。

政府对投降的拖延感到不耐烦，于是任命了一名博亚卡[1]人路易斯·豪尔赫·帕塔基瓦·席尔瓦作为监狱负责人，而没有任命一名安蒂奥基亚人。政府还任命了二十名来自不同省份的国民警察，没有一位是安蒂奥基亚人。"无论如何，"比亚米萨尔说，"如果他们想要的是贿赂，那么无论是安蒂奥基亚人还是其他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埃斯科瓦尔本人也因为众多周折而感到筋疲力尽，他几乎没有谈论这件事。最后，他们达成一致，入口将由军队而非警察把守；他们会采取特殊手段，消除埃斯科瓦尔认为有人会在监狱的伙食中下毒的忧虑。

另一方面，国家监狱管理局采取了与奥乔阿·巴斯克斯兄弟在伊塔古伊监狱安全戒备等级最高的楼阁中相同的探视制度。起床时间最晚是早上七点，门禁时间是晚上八点。每周日上午八点到下午两点，埃

斯科瓦尔和他的同伴们可以接受女士们的拜访；每周六可以接受男士们的拜访；每个月的第一和第三个周日可以接受未成年人的拜访。

六月九日凌晨，麦德林军事警察部队的正式成员替换了在周围巡逻的骑兵，开始进行令人印象深刻的安全部署，驱逐了附近山区的不相关人员，完全控制了地面和上空。埃斯科瓦尔没有其他借口了。比亚米萨尔满怀诚意地告诉埃斯科瓦尔自己非常感激他释放了玛露哈，但是如果他还不投降，比亚米萨尔不打算冒更大的风险。他派人严肃地告诉埃斯科瓦尔："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回信了。"埃斯科瓦尔在两天内做出了决定，他要求总检察长也在投降时陪同他。

最后时刻出现的异常情况可能又会导致投降延期：埃斯科瓦尔没有官方的身份证件，无法证明投降的人是他，而不是别人。他的一位律师向政府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要求给埃斯科瓦尔办理一张居民身份证。他没有考虑到，被各种公共武装力量追捕的埃斯科瓦尔需要亲自前往户籍登记处的相应办公室。应急办法是用指纹和过去在公证处使用过的身份证号码来验证身份，同时说明旧的身份证已经丢失，无法出示。六月十八日晚上十二点，"猴子"叫醒了比亚米萨尔，让他上楼接一通紧急电话。已经很晚了，但是阿塞内思的公寓仿佛是欢乐的地狱，播放着埃希迪奥·瓜德拉多的手风琴曲和他的巴耶纳托音乐。比亚米萨尔不得不用手肘在热情高涨、人人高声交谈的疯狂丛林中给自己开路。阿塞内思用她典型的方式挡住了他的去路。

"我知道是谁给您打电话了，"她对他说，"请您当心点，如果有什么疏忽，他们会阉了您。"

当电话铃声响起时，她把他留在了卧室里。在震颤房子的喧闹声中，比亚米萨尔勉强听见了关键内容：

“已经准备好了，您明天一早来麦德林吧。”

早上七点，拉法埃尔·帕尔多调度了一架民用客机特别管理中心的飞机，供接受埃斯科瓦尔投降的政府代表们使用。比亚米萨尔担心信息走漏，因此他早上五点出现在了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的家中。他发现神甫正在祈祷室，教士服外穿了一件无接缝的斗篷。当时，他刚刚主持完弥撒。

“好了，神甫，走吧。”他说，“我们去麦德林，因为埃斯科瓦尔要投降了。”

飞机上除了他们之外，还坐着神甫的侄子费尔南多·加西亚·埃莱罗斯，他是神甫的临时助手；来自国家新闻委员会的海梅·巴斯克斯；共和国总检察长卡洛斯·古斯塔沃·阿列塔先生；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检察官海梅·科尔多瓦·特里维尼奥先生。玛丽亚·莉娅和玛尔塔·妮耶维丝·奥乔阿在麦德林市中心的奥拉亚·埃莱拉机场等候他们。

政府代表们被带去了市政府。比亚米萨尔和神甫前往玛丽亚·莉娅的公寓吃早餐。同时，最后的投降手续正在办理之中。比亚米萨尔在公寓里得知，埃斯科瓦尔已经在路上了。他有时乘车，有时步行绕远路，以避开频繁的警察岗哨。他是应对这种情况的专家。

神甫再一次非常紧张。他的隐形眼镜掉了一片，还被他踩碎了。他大发脾气，玛尔塔·妮耶维丝不得不带他去圣·伊格纳西奥眼镜店。他们用一副普通眼镜解决了他的问题。城市里充斥着严格的岗哨，他们被所有的岗哨拦下，但不是为了搜查他们，而是为了感激神甫为麦德林的幸福所做的一切。因为在那座一切皆有可能的城市里，世界上最隐蔽的新闻也能够人尽皆知。

下午两点半，“猴子”到达玛丽亚·莉娅的公寓。他穿着清凉的外套和软皮鞋，仿佛要去郊游。

“好了，”他对比亚米萨尔说，“我们去市政府吧。您走这边，我走另一边。”

他坐上自己的车，独自离开了。比亚米萨尔、加西亚·埃莱罗斯和玛尔塔·妮耶维丝坐玛丽亚·莉娅的车离开。两位男士在市政府对面下车，女士们在车里等待。“猴子”已经不是那个冷漠高效的技术员了，他试图隐藏自我。他戴着深色的眼镜和高尔夫球帽，总是站在比亚米萨尔后侧不显眼的位置。有人看见他和神甫一起进门，便给拉法埃尔·帕尔多打电话说，埃斯科瓦尔（一个满头金发、个子很高、举止优雅的人）刚刚在市政府投降了。

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猴子”通过无线电话得知，一架飞机正朝着麦德林上空飞来。那是一架军事急救机，上面载着几名在与乌拉巴游击队会战中受伤的士兵。政府很担心投降时间过晚，因为直升机不能在傍晚飞行。如果把投降推迟到第二天，后果将是致命的。因此，比亚米萨尔给拉法埃尔·帕尔多打电话，让他命令运载伤员的飞机改变航向，并重申让天空保持空旷这一不容商议的指示。在等候结局的同时，他在私人日记上写道：“今天，连一只鸟儿都没有飞过麦德林。”

第一架直升机（限载六人的贝尔206）于三点过后不久，在市政府的屋顶起飞。上面载有总检察长、海梅·巴斯克斯、费尔南多·加西亚·埃莱罗斯和电台记者路易斯·阿利里奥·卡耶。路易斯的巨大声望是让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保持冷静的又一个保障。安全军官将给飞行员指明监狱的方向。

第二架直升机（限载十二人的贝尔412）在十分钟后起飞，当时“猴子”通过无线电话接收到了命令。比亚米萨尔、“猴子”和神甫一起登上了飞机。刚刚起飞，他们就通过广播得知，政府的立场在制宪议会上被击溃了。制宪议会刚刚以五十一票赞成、十三票反对和五票弃权通过了国民不引渡的决议，之后该决议将得到批准。虽然没有迹象表明这是埃斯科瓦尔安排的行动，但是如果料想不到他是提前得到了消息，并等到最后时刻才投降的话，就几乎是幼稚的表现了。

飞行员负责按照“猴子”的指示把巴勃罗·埃斯科瓦尔送到监狱。飞机飞行的时间很短，飞行高度非常低，仿佛是在给汽车下达指令：沿着第八航线继续行驶，现在向右拐，再往右，再往右，一直到那座公园，就是这样。在一片树丛后面，在色彩鲜艳的热带鲜花中，突然出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宅邸。里面配有一个完美的足球场，在埃尔·波夫拉多川流不息的交通中仿佛是一张巨大的台球桌。

“在那里降落，”“猴子”指示说，“不要关发动机。”

当他们与房子处在同一高度时，比亚米萨尔才发现，足球场周围至少有三十名全副武装的人员。直升机停在了平整的草地上，从队伍中分离出了大约十五名护卫。他们围着一个引人注目的男人，紧张地向直升机走去。他长发至肩，胡子很黑、浓密而毛糙，而且长到了胸部；他的皮肤被荒野中的阳光晒得黝黑，他又矮又胖，穿着运动鞋和浅蓝色的棉外套。他走动时，步伐轻快，冷静得令人害怕。比亚米萨尔一眼就认出了他，因为他和他生命中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在用快速有力的拥抱向离他最近的护卫告别之后，埃斯科瓦尔指示其中的两个人从直升机的另一边登机。他们是穆格雷和奥托，是他最亲近的两个人。然后，他全然不顾螺旋桨还在转动，不慌不忙地坐

上飞机。坐下前，他首先跟比亚米萨尔打了招呼，向他伸出了温暖的、精心保养的手，声音毫无波动地问：

“您好吗？比亚米萨尔医生。”

“您好吗，巴勃罗？”他回答。

接着，埃斯科瓦尔回头给了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一个亲切的微笑，并感谢他所做的一切。他和两名护卫坐在一起，似乎才刚刚意识到“猴子”也在那里。或许，他本来只想让他给比亚米萨尔传达指示，但没想让他登上直升机。

“您确实，”埃斯科瓦尔对他说，“掺和这件事到最后。”

没有人知道这是表扬还是责骂，但他的语气是和善的。“猴子”就像所有人一样疑惑，他摇了摇头，笑了。

“哎呀，老板！”

于是，就像在一次神启中那样，比亚米萨尔觉得埃斯科瓦尔是一个比想象中更加危险的人，因为他的冷静和自制力有着某种超自然的因素。“猴子”试图关上他那边的门，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关，副驾驶员不得不替他关上。在当时的激动情绪之下，没有人想起要发出命令。飞行员因为缺乏指令而感到紧张，他问：

“我们起飞吗？”

于是，埃斯科瓦尔显露出了唯一一点被压抑的焦虑迹象。

“当然了！”他急忙地命令道，“快点！快点！”

当直升机离开草坪的时候，他问比亚米萨尔："一切都很顺利，对吧，医生？"比亚米萨尔没有回头看他，诚实地回答："一切都很完美。"没有更多对话，因为飞行已经结束了。直升机掠过树枝，停在了监狱的足球场上（上面有许多石块和损坏的球门）的第一架直升机旁边。那架直升机在一刻钟前到达了。从市政府出发的整个行程持续了不到十五分钟。

然而，接下来的两段旅程强度更大。舱门一打开，埃斯科瓦尔就试图第一个下飞机。他发现自己被狱警包围了：足有五十名身穿蓝色制服的男人。他们很紧张，还有些茫然，还用长管枪械对着他。埃斯科瓦尔吃了一惊，突然失去了控制，发出了充满权威和震慑力的叫喊：

"放下武器，混蛋！"

当狱警首领发出同样的指令时，埃斯科瓦尔的命令已经被执行了。埃斯科瓦尔和他的同伴们步行两百米到了房子里，监狱高层、政府代表和为了与埃斯科瓦尔一起投降而乘车到达的第一批随从在那里等候他们。埃斯科瓦尔的妻子和母亲也在那里，他的母亲面色苍白，几乎要哭了。他经过她身边时，亲昵地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对她说："放心，妈妈。"监狱负责人伸出手迎接他。

"埃斯科瓦尔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路易斯·豪尔赫·帕塔基瓦。"

埃斯科瓦尔伸出手，卷起了左腿裤脚，脚踝上绑着一根绳子，他取出了束在绳子里的手枪。那是一件宝物：西格＆绍尔9，珍珠母制成

的枪柄上镶嵌着黄金花押字。埃斯科瓦尔没有取下弹匣，而是一颗一颗地取出子弹，把子弹扔在地上。

那是一个仿佛演练过的具有戏剧性的动作。这个动作显示了他对监狱负责人的信任，而对这一职位的人事任命曾经让埃斯科瓦尔夜不能寐。第二天，报纸上刊登的新闻说，埃斯科瓦尔交出手枪的时候，对帕塔基瓦说："为了哥伦比亚的和平。"没有目击者记得这句话，而比亚米萨尔更加不记得，那件精美的武器让他目眩神迷。

埃斯科瓦尔向所有人问好。检察官代表握住他的手，对他说："埃斯科瓦尔先生，我在这里见证您的权利得到尊重。"埃斯科瓦尔带着特殊的敬意向他表示感谢。最后，埃斯科瓦尔挽住了比亚米萨尔的手臂。

"走吧，比亚米萨尔先生，"他对他说，"我有很多话要和您说。"

他把他带到室外游廊的尽头，他们靠在栏杆上、背对着所有人交谈了大约十分钟。首先，埃斯科瓦尔正式表示了感谢。接着，他带着令人惊愕的冷静，为自己给比亚米萨尔和他的家人造成的痛苦表示抱歉，但是他请求对方理解，那是一场对双方来说都万分艰难的战争。比亚米萨尔没有浪费这个解决他生命中三大未解之谜的机会：为什么路易斯·卡洛斯·加兰会被杀害，为什么埃斯科瓦尔试图杀死他，以及为什么会绑架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

埃斯科瓦尔拒绝承担第一桩罪行的任何罪责。"事实是所有人都想杀死加兰先生。"他说。他承认他出席了决定实施袭击的讨论会，但是他否认曾介入袭击，他跟这些事情没有任何关联。"许多人参与了这次

行动，”他说，“我甚至并不赞同，因为我知道杀害他会有什么后果，但是这就是决定，我无法反对。我恳求您这样跟格萝莉娅女士解释。”

至于第二个疑问，显然是有一群议员朋友让他相信，比亚米萨尔是一名无法控制的、固执的同事。在引渡决议通过之前，必须不计任何代价处理他。“此外，”他说，“在我们身处的这场战争中，人们甚至会因为谣言就被杀害。但现在我认识您了，比亚米萨尔先生，幸好当时您没有出事。”

关于玛露哈的绑架案，他给出了非常简略的解释。“当时，为了得到某些东西，我已经绑架了一些人，但是我的目的没有达到。没有人对话，没有人在意。因此，我找到了玛露哈女士，看看能不能得到些什么。”他没有解释更多的理由，而是衍生出了一长串关于他在谈判的过程中如何逐步了解比亚米萨尔的言论，他最终相信比亚米萨尔是一个认真、勇敢的男人。他的千金诺言值得让自己永远感激。“我知道，我和您不可能成为朋友。”他告诉比亚米萨尔。但是比亚米萨尔可以放心，从此往后，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在他和他的家人身上。

“没有人知道我会在这里待多久，”他说，“但是我依然有很多朋友，因此如果您的家人觉得不安全，如果有人想碰你们，派人告诉我就行了。您兑现了对我的承诺，我也会兑现我对您的承诺。非常感谢。这是我的诺言。”

在告别之前，埃斯科瓦尔请求比亚米萨尔帮他最后一个忙，他想让比亚米萨尔安慰他的母亲和妻子，她们都处在崩溃的边缘。比亚米萨尔做这件事时并不抱有很多幻想，因为她们俩都坚信这个仪式是政府为了在狱中杀死埃斯科瓦尔而布下的邪恶陷阱。最后，他走进负责

人的办公室，凭着记忆拨打了总统府的电话2843300，联系拉法埃尔·帕尔多。

帕尔多在新闻顾问毛里西奥·巴尔加斯的办公室。毛里西奥接起电话，然后沉默地把话筒递给他。帕尔多认出了那个严肃、冷静的声音。但这一次，这个声音中带着闪亮的光环。

“帕尔多先生，”比亚米萨尔说，“埃斯科瓦尔已经在监狱里了。”

帕尔多毫无疑心地接受了这条消息，这也许是他生命中第一次这样做。

“太好了！”他说。

他又飞快地评论了什么，毛里西奥·巴尔加斯甚至无法做出解读。帕尔多挂了电话，没有敲门就走进了总统的办公室。巴尔加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极具天赋的记者。由于帕尔多的匆忙和果断，他猜测这应该是件大事。他没有耐心再等五分钟，于是没有事先通报就走进了总统的办公室，他发现总统因为帕尔多刚才告诉他的事而哈哈大笑。因此，他明白了。毛里西奥高兴地想，即将有一大群记者冲进他的办公室。他看了看表，时间是下午四点半。两个月后，拉法埃尔·帕尔多将成为第一位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文职人员。此前的五十年，该职位一直由军人担任。

十二月，巴勃罗·埃米里奥·埃斯科瓦尔·加维里亚年满四十一周岁。根据进入监狱时严格体检的结果，他的身体状态属于“身心状况正常的年轻人”。唯一异常的是鼻子，鼻子上有鼻黏膜充血的症状以及一道类似于整形手术的疤痕。但是，他解释说，这是他少年时在一场足球赛中受的伤。

全国刑事诉讼法庭庭长、地方刑事诉讼法庭庭长以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检察官在自愿投降书上签字。埃斯科瓦尔用大拇指指纹和已丢失身份证的号码（恩维加多8345766）来增加签名的权威性。秘书卡洛斯·阿尔贝托·波拉夫在文件的末尾写下一段证明：“签署完文件之后，巴勃罗·埃米里奥·埃斯科瓦尔先生要求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卡尔德纳斯先生在文件上签字。比亚米萨尔先生签了名。”虽然没有人告诉他以什么名义，但是比亚米萨尔还是签了字。

完成这些手续之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告别了所有人，走进了监狱。在那里，他将和以往一样忙于处理自己的事务和生意。此外，政府的力量将帮助他获得家庭的安宁，并保证他的安全。然而，从第二天起，比亚米萨尔口中那座非常监狱的监狱就开始变成一座极尽奢华的五星级农庄，配有娱乐设施以及方便玩乐和犯罪的装置，这些都由上等的材料制成。他们将一辆供货汽车的后备箱改装成双层，把这些材料装进第二层，慢慢地运送。两百九十九天后，政府得知了这件丑事，决定不加通知就更换埃斯科瓦尔的监狱。埃斯科瓦尔用一盘食物贿赂了一名中士和另两名吓坏了的士兵，他在政府人员和负责搬迁的军队的眼皮底下，和他的护卫们一起步行穿过毗邻的森林，逃离了监狱。这事就像政府居然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获悉那件丑事一样令人难以置信。

这宣判了他的死刑。根据他后来的声明，政府的行动是如此奇怪、不合时宜，以至于他认为政府实际上不是去转移他，而是想杀死他或是把他交给美国处置。当他意识到自己夸张的错误时，他发动了两场并行的战役，以逼迫政府支持他返回监狱：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炸弹恐怖袭击以及没有任何条件的投降提议。政府没有接受他

的提议，国家也没有屈服于恐怖的汽车炸弹，警察对他的进攻达到了极端猛烈的程度。

世界已经为埃斯科瓦尔改变过了。原本想重新帮助他并拯救他性命的人失去了这样做的意愿和理由。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加西亚·埃莱罗斯神甫死于肾衰竭。宝琳娜既没工作也无积蓄，在一个安静的秋天，带着她美好的回忆，和她的孩子们一起藏了起来。现在，《上帝一分钟》节目组的人都没有她的消息。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被任命为驻荷兰大使，他收到了很多条埃斯科瓦尔的口信，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埃斯科瓦尔大约三十亿美元的惊人财产大部分在战争中消耗掉了，或者是在集团的溃散中消失了。他的家人们无法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安然入睡。埃斯科瓦尔变成了哥伦比亚历史上最大的追捕目标，他无法在同一个地方停留上六个小时，在疯狂的逃遁中，他杀死了许多无辜的人。他自己的护卫或被杀害，或自首，或投靠敌人的阵营。他的私人警卫，甚至他自己动物般的求生本能，都失去了往日的神武。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他年满四十四岁的第二天），他没有禁受住给儿子胡安·巴勃罗打电话的诱惑。胡安由于被德国拒绝入境，刚刚和他的母亲及妹妹回到波哥大。胡安·巴勃罗比父亲更加警惕。通话两分钟后，他提醒父亲不要再继续通话，因为警方会确定电话的来源位置。埃斯科瓦尔（他对家庭的热爱是众所周知的）没有理会他的劝告。当时，追踪人员已经确定了他在麦德林的洛斯·奥利沃斯区的精确位置。下午三点十五分，由二十三名谨慎的便衣警察组成的特别小组封锁了这个区域，他们控制了那座房子，试图强行打开二楼的门。埃斯科瓦尔察觉到了。“我先走了，”他在电话中对儿子说，“发生了奇怪的事。”这是他最后的话。

比亚米萨尔在这座城市最欢快、最危险的舞场里度过了投降那天的夜晚，他和埃斯科瓦尔的保镖们喝着烈性烧酒。“猴子”酩酊大醉，他告诉所有在场的人，老板只跟比亚米萨尔道过歉。凌晨两点，他站了起来，挥手道别。

“永别了，比亚米萨尔先生。”他说，“现在我得消失了，我们很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很高兴认识您。”

清晨，他们把醉得像一团海绵的比亚米萨尔留在了拉·洛玛农庄。下午，在回程的飞机上，没有人谈论除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投降之外的话题。那天，比亚米萨尔是全国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但是，机场的人群中没有人认出他来。各家报纸都写明他出现在了监狱里，但是没有刊登他的照片。他在整个投降过程中真实的、具有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似乎注定要淹没在秘密荣光的阴影之中。

那天下午回到家，他发现生活已经回到了正轨。安德烈斯在房间里学习。为了变回原来的自己，玛露哈默默地和她的幽灵们展开艰难的斗争。唐代马俑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放在玛露哈精美的印度尼西亚纪念品以及半个世界的古董之间。它前腿腾空，并按玛露哈的意思，被摆在了一张神圣的桌子上。它曾被放在一个角落里，玛露哈在被绑架的漫长黑夜里也曾梦见自己在那里看见它。她坐上了被绑架时坐的那辆汽车，回到了扶影公司的办公室（玻璃上的子弹坑已经消失了），心怀感恩的新司机坐到了死者的座位上。两年后，玛露哈被任命为教育部长。

现在，比亚米萨尔没有工作，也不想找工作，他对政治有着苦涩的回忆。他情愿以自己的方式休息一段时间，修补家庭的小损伤；和老朋友们一起慢慢消磨空闲时间；亲自采购，让自己和朋友们享受民

间厨艺的美味。这种情绪有利于在下午阅读，让胡子疯长。在某个周日的午餐时间，有人敲了敲门。当时，记忆的雾霭已慢慢让过去变得模糊。他们以为安德烈斯又忘了带钥匙，因为那天不是工作日，比亚米萨尔打开了门。一位身穿运动外套的年轻人交给他一个礼盒，上面系着一条金色的带子。接着他走下楼梯消失了，没有跟比亚米萨尔说一句话，也没有给他时间提问。比亚米萨尔想，这可能是一枚炸弹。他因为对绑架的厌恶颤抖起来。玛露哈在厨房里等他。但是，在离厨房很远的地方，他解开了带子，用指尖拆开了包装。那是一个人造革盒子，在盒子的绸缎内衬中，放着绑架案发生当晚他们从玛露哈那里拿走的戒指。虽然少了一颗钻石，但还是同一枚戒指。

玛露哈无法相信。她戴上了戒指，她意识到自己正在迅速恢复健康，因为戒指顺利地戴到了手指上。

“太棒了！”她充满幻想地感叹道，“这一切能写成一本书。”

---

[1] 哥伦比亚中部省份。



加西亚・马尔克斯
米格尔在智利的地下行动
La aventura de Miguel Littín, clandestino en Chile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魏然 译

米格尔在智利的地下行动

南海出版公司

版权信息

书名：米格尔在智利的地下行动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译者：魏然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9-06

ISBN：9787544277006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语

第一章 秘密重返智利

　　乔装打扮

　　“要是笑了，你就死定了”

　　给皮诺切特装上一条长长的驴尾巴

第二章 最初的失落：城市繁荣

　　我难道是为此而来？

　　在我怀旧的中心

　　恐怖的死寂让人铭记

第三章 留下的人也是流亡者

　　三个被割喉者扳倒了一个将军

　　“你是乌拉圭人，值得庆贺”

　　留下的人也是流亡者

第四章 圣地亚哥的五个基准点

　　圣地亚哥的五个基准点

　　街角偶遇：我的岳母！

　　这座桥见证了一切

第五章 大教堂前的自焚者

　　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广场上永恒绽放的鲜花

　　在康塞普西翁，刮胡子绝非易事！

　　地狱里的爱情天堂

　　海鸥栖息的餐吧

第六章 两位永垂不朽的逝者：阿连德和聂鲁达

　　两位虽死犹生的逝者

黑岛大地每时每刻都在震颤
“格拉齐雅飞升上天”
第七章 警方虎视眈眈：包围圈开始收紧
精准测距：十首博莱罗舞曲
包围圈开始收紧
“先生，喜欢人家的翘臀吗？”
第八章 注意：有位将军准备说出一切
会跳伞的老祖母
接近“通用电气”的漫漫长途
谁了解警方？
第九章 母亲也没认出我来
“利廷回来了，拍完电影了，又离开了”
“为祖国的未来拍张照片吧”
“你一定是我儿子的朋友”
第十章 警方助力，皆大欢喜
餐厅里的疯子
“要么撤离，要么潜伏”
两个寻找作者的非法旅客

导语

一九八五年初，被列入五千个严禁归国者名单的智利电影导演米格尔·利廷，经过乔装打扮秘密潜入智利。他在那里待了六个星期，并拍摄了长达三万二千二百多米的胶片，记录了其祖国遭受十二年军事独裁统治的现状。利廷改变了容貌，调整了穿衣风格和说话方式，持有假证件，在智利地下民主组织的帮助和掩护下，深入祖国的领土展开调查，甚至潜入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内部。同期有三支欧洲摄制组各自持合法证件入境智利，供利廷调遣，此外他还指挥着六支国内抵抗组织的青年摄影队。这次地下行动的成果是一部长达四小时的电视片和一部两小时的电影，影片将于近期在世界各地展映。

大约六个月前，当米格尔·利廷在马德里向我叙说他做了什么以及如何做到的时候，我意识到在他的电影背后还藏着另一部未被记录的佳作，而它有湮没无闻的风险。就这样，他接受了我几乎持续一星期的令人精疲力竭的访谈，磁带录音长达十八个小时。他叙说了自己完整的历险故事，以及所有专业性和政治性的见解。我将其压缩成十个章节，加以转述。

为了保护那些继续生活在智利境内的主角们，某些名字已做了改动，不少场景有所变化。我更倾向于保留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就如同利廷给我讲述时那样，我想以此保留他有时是很私密的个人腔调，既不轻率而戏剧性地添油加醋，也没狂妄地奢求记录历史。

文稿最终仍旧是我的风格，当然，一个作家不可与别人互换声音，何况是在他还不得不把超过六百页的初稿压缩至不到两百页的情形下。但很多时候我都试图保留原本叙事中所用的智利方言习语，在各方面尊重叙事人的想法，尽管这些想法并不总是和我的一致。

从调查方法和题材性质来看，这可算作一篇报告文学。但它不止于此：这是一个以感性重构的冒险故事。这场冒险的最初目的是规避军事独裁统治下的种种风险，拍摄一部出色的影片，但它的最终结果无疑更加真挚动人。利廷本人曾说过："这不是我此生最英勇的行动，却是最值得做的事。"

确实如此，我想他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第一章　秘密重返智利

智利拉德科航空公司115次航班从巴拉圭首都亚松森起飞，延误了一个多小时，马上就要在智利圣地亚哥机场降落了。左侧，将近七千米的高空中，阿空加瓜山在熠熠的月光下宛若一座钢岬。飞机以吓人的优雅姿态往左偏斜，继而在一阵喑哑的金属噪音中摆正了角度，又袋鼠似的连蹦三次，终于着陆。我，米格尔·利廷，埃尔南和克里斯蒂娜之子，智利电影导演，五千名严禁归国者之一，在流亡海外十二年后，终于再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尽管此时此刻，我仍继续在自己的身体里流亡：我的身份是假的，护照是假的，甚至连妻子也是假的。我的面庞和外貌借由化妆和衣着而改变，甚至几天以后，我的生身母亲也没能在白天将我认出。

世上只有几个人知晓这个秘密，其中之一正与我坐在同一架飞机上。她就是埃莱娜，一名智利抵抗运动激进分子，年轻而富有魅力，受自己的组织委派，负责与国内地下秘密网络保持联系、安排私下接触和会面、选择恰当碰头地点、评估形势，并保障我们一行的安全。假如我被警方揭穿或失踪，或者超过二十四小时未能实现事先约定的联络，那么，她就得将我秘密潜回智利的情况公之于世，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虽然我俩的身份证件并无关联，但此前还是从马德里一道出发，足迹遍布半个地球的七座机场，俨然一对和睦的夫妻。不过，在这最后一段一个半小时的旅途中，我们决定分开就座，仿佛互不相识一般各自下飞机。她必须在我之后过海关，如此一来，万一我遇上

任何麻烦，她好通知地下组织的人。倘若万事顺利，我们就重新扮作一对普通夫妇，从机场出口离开。

我们的目标在纸面上显得简单明了，但实践起来风险巨大：秘密拍摄一部讲述十二年军事独裁统治后智利现状的纪录片。这个想法盘踞于我脑海，是我思量已久的梦想，因为祖国的形象已在乡愁的迷雾中渐渐模糊。而对一个电影人来说，还有什么方法能比重返祖国拍摄一部电影，更准确地恢复失落的记忆呢？当智利政府开始公布几批获准回国的流亡者名单时，这个梦想变得更加紧迫了，而我的名字却没出现在任何一份名单上。后来情形愈发叫人绝望：又公布了一份严禁入境的五千人名单，我反倒赫然在列。这一拍摄计划最终得以实现，纯属偶然。我本已放弃两年多，不敢再奢望了。

那是一九八四年秋天，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圣塞巴斯蒂安。为筹拍一部故事片，我与妻子艾丽和三个孩子已经在这里住了六个月。计划中的影片，就像影史秘闻里许多夭折的影片一样，在开拍前一周就被制片人否决。一时间我不知何去何从。电影节期间，有一次跟朋友们在当地一家著名餐厅共进晚餐时，我又旧梦重提。席间，朋友们饶有兴味地听着，不时穿插议论，他们觉得这个拍摄计划不仅政治意味明显，还能把独裁者皮诺切特不可一世的模样嘲弄一番。但除了将这一夙愿权当流亡者的幻想，没人另作他想。然而午夜时分，当我们沿着老城沉睡的街道散步回家时，此前在餐桌旁几乎未曾发言的意大利制片人卢西亚诺·巴尔杜奇牵住我的胳膊，貌似不经意地把我拽离人群。

“能帮你的人，”他对我说，“正在巴黎等你。”

的确如此。我需要的那人在智利国内抵抗运动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他原先的计划跟我的想法仅有形式上的细微差别。在巴黎穹顶餐厅的社交场上，我与他深谈了四个小时，卢西亚诺·巴尔杜奇也在旁边积极出谋划策。这足以让心底酝酿已久的梦想变为现实，有些地方甚至精确到了细节，而原先，它不过是流亡者在难眠之夜辗转反侧时不切实际的空想。

第一步是向智利派去三支摄制组，为拍摄做基本的准备：一组意大利的，一组法国的，最后一组可来自任一欧洲国家，但须持荷兰证件。所有团队都应合法，持有许可证，并照例获得各国使馆的保护。意大利摄制组最好由一名女记者领队，名目是拍摄一部意大利移民在智利的纪录片，着重于建筑大师华金·托埃斯卡的杰作——智利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就出自他的设计。法国摄制组应当对外宣称要拍摄一部有关智利地理的生态纪录片。第三支小组则以考察最近发生的几场地震为掩护。任何一组都不该知道还存在另外两支摄制组；任何小组成员也不允许知道实际目标是什么，以及谁是幕后主使，除了每组的负责人。负责人应是自己领域内足够知名的专业人士，有政治修养，能意识到眼前任务的风险。这是最简单的部分了，为了提前布置，我首先对每个小组的所在国来了一趟短途旅行。三支摄制组办妥了审批手续，也签署了合同，早已在智利境内准备就绪，只待我抵达智利的那一晚下达指示。

乔装打扮

实际上，对我来说最艰难的任务是如何变成另外一个人。改变个性是一种日常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你总要违拗自己不想改变、执意回归自我的心愿。因此最大的困难不是预先设想中的训练和模仿，而是改变了体态和行为举止后，如何克服下意识的抵抗。我不得不勉强自己，放弃惯常的秉性，伪装成另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好叫那些迫使我流亡异乡的警察不会生疑，甚至要让亲友见面时也难以辨认。在一位智利国内赫赫有名的秘密行动专家的指导下，两名心理学家连同一位电影化妆师，在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与我想保持自我的本能意愿做了不懈的斗争，最终创造了奇迹。

先从胡须入手。这可不是简单的剃光胡子的问题，而是要我摆脱因胡子而塑造的个性。自从青年时代拍摄第一部影片起，我就开始留胡子，虽然后来剃掉过几回，但从没有在拍电影时不蓄须的。胡子似乎成了我导演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况且我的叔伯们都留胡子，这无疑增进了我对胡须的感情。几年前，我在墨西哥曾经剃光过胡子，但始终没能让朋友和家人接受我的新面孔，连我自己也觉得难以接受。大家都有一种跟个冒名顶替的外人在一起的感觉，不过我还是坚持不蓄须，自以为这样更显年轻。还是小女儿卡塔丽娜打消了我的错觉。

“剃掉胡子，你是看起来更年轻，”她对我说，“但也更丑了。”

因此为了入境智利而再次剃掉胡须，就不光是准备剃须泡沫和剃刀的问题，而是一个深度隐藏个性的过程。我的化妆师们先是一点点

地把胡须剪短，观察每一步变化，估量每一次修剪会给我的外貌和性格带来什么样的效果，直至最后把胡须剃净。过了好几天我才鼓起勇气照镜子。

第二步是头发。我头发是乌黑的，这一点继承自希腊裔的母亲和巴勒斯坦裔的父亲。我也遗传了父亲过早谢顶的毛病。起先，化妆师想把头发染成浅棕色，之后又试了几种梳法的发型，最后决定不违背自然走势。至于谢顶，他们没有像开始打算的那样掩盖这个问题，反而决定更突出这一点，不仅把头发平顺地往后梳，还用镊子拔干净多年来已经严重脱发的部分。

说起来没人信，但就是那几处几乎难以察觉的调整改变了整个脸型。虽然当时减掉了几公斤，可我还是面如满月，但把眉梢修短以后，脸型就显得长了。奇特的是，这让我样貌中与生俱来的东方人特征更明显了，倒是更契合我的家族背景。最后一步是配上有度数的眼镜。最初几天，眼镜让我头疼得厉害，但它不仅改变了我的眼形，还改变了目光的表达方式。

调整体态造型是最容易的，但需要我付出更多精神上的努力。面部改造本质上是化妆师的事，但身体改造则需要特殊的心理训练，需要更集中注意力，因为我不得不从根本上接受阶级身份的转换。平时我总穿牛仔裤和猎装夹克，现在我得习惯穿整套由英国毛料缝制的欧洲名牌西装，还有量身定制的衬衫、麂皮皮鞋和意大利印花领带。还得改变我那疾风骤雨般的智利农民口音，学习乌拉圭富商的说话节奏——乌拉圭国籍最适合我的新身份。还得学会压抑带个人特征的笑声，学会慢慢踱步，学会在对话中使用手势以显得更有说服力。简而言之，我得放弃从前一贯不墨守成规的穷导演做派，把自己变成在这

世上最不屑为之的角色：一个自鸣得意的资本家。在智利，我们管这类人叫：行尸走肉。

“要是笑了，你就死定了”

在乔装变成另一个人的同时，我还得住在巴黎十六区的一栋公寓里，学习与埃莱娜一起生活。有生以来我头一次违拗自己，顺从别人设定的一套规矩。此外，为了从当时八十七公斤的体重减下去十公斤，我还得像乞丐似的节食。这栋房子不是我的家，而且与我家毫无相似之处，但在规定的记忆里，它必须是我的家。住在这里是为了培植一套记忆，以免将来说漏嘴。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奇特的一段经历，因为我很快发现，埃莱娜在私人生活中既友善又严肃，但我绝不可能跟她共处一室。专家们之所以挑选她，是因为她的职业经验与政治素养，她能把我限定在一条轨道上，不给我留随意发挥的空间。作为一名主张自由的艺术创作者，我可不欣赏这一套。后来，当一切进展顺利，我才意识到自己对埃莱娜的态度不够公平。或许我下意识地将她和另一个自我的世界混同了。我拒绝屈就那个世界，即便明知眼前的处境可谓命悬一线。如今回想起那段奇特的经历，我自问，当一切过去后，这场婚姻可否算得上是典范：待在同一片屋檐下时，我们几乎总是无法忍受对方。

埃莱娜没有身份问题。她是智利人，尽管近十五年都没在智利长期居住过。但她也从未流亡，没被全世界任何国家的警察追踪，因此她的掩护是毫无破绽的。埃莱娜曾在不同国家执行过许多重要的政治任务，而在自己国家拍摄一部地下电影的主意激起了她的兴趣。难题在于我的身份。出于技术上的考虑，乌拉圭国籍再合适不过，因此我被迫习得一套跟自己全然不同的性格特征，再编造一套发生在我不熟悉的国家的个人经历。不过，在预定日期之前，我已练就了一旦有人

叫我的假名就立刻转头的本事，也能回答有关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城最刁钻的问题，例如该乘哪一路公交车回家，甚至二十五年前我“曾就读”的第十一中学的同学们各自家庭情况如何，我还能说出坐落于意大利街上的这所中学相隔两个街区的地方有一家药店，隔一个街区的地方有一家新建的超市。唯一需要刻意避免的是笑，因为我笑起来实在太特别了，即便化了妆也会暴露自己。因此，乔装易容这项任务的负责人尽可能富于戏剧性地告诫我：“要是笑了，你就死定了。”不过，一个操持大宗生意的国际大亨长着一张无法挤出笑容的铁面，倒也不足为奇。

那段日子出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变故。智利政府宣布实施一项新的戒严令，这对执行计划的时机有所影响。独裁政府因为芝加哥学派经济冒险的显著失败而威信受损，所以启用戒严的办法来对付联合起来的反抗力量。独裁政权建立以来，智利境内各方抵抗力量第一次形成了统一阵线。一九八三年五月，爆发了第一波街头抗议事件，其后反复持续了一整年，许多斗争经验丰富的青年，特别是妇女都参与进来，但抗议也遭到了血腥镇压。资产阶级当中最为进步的力量第一次加入到抵抗阵营中来，与合法的、不合法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发动了持续一天的全国总罢工。全社会显示出的力量和决心激怒了独裁政府，政府提前启动了戒严令。气急败坏的皮诺切特像表演舞台剧似的发出一阵叫嚣，他的话在世界各地激起回响：

“再这样闹下去，我们要再搞一场‘九一一’[1]行动！”

这种局面看起来的确对我们的拍摄工作有利：这部影片就是要抓住国内的现实动向，甚至是外人看不到的因素。但同时，警察管制肯定更加森严，镇压也会更加残酷，受宵禁影响，留给拍摄的时间将大

为缩短。不过，国内抵抗组织分析了形势的方方面面，结果如我所愿，鼓励继续推进方案。于是，我们顺利在预定好的日子扬帆起航。

给皮诺切特装上一条长长的驴尾巴

第一场严峻的考验发生在从马德里机场出发的那天。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过妻子艾丽和孩子们了。三个孩子分别叫玻奇、小米格尔和卡塔丽娜。这段日子我甚至都不能直接获得他们的音讯，安保负责人的意思是不辞而别，省得跟他们告别时生出枝节。此外，在最初构想时，既然要保证所有人平安无事，那么我的家人最好干脆不知情。但不久我们就意识到这么做没意义。和预想的相反，说到后勤工作，谁也比不上艾丽能干。她在马德里和巴黎、巴黎和罗马之间往返，甚至后来还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接收和处理我从智利国内一点点送出的素材，甚至在必要时帮我筹措拍摄所需的补充资金。事实如此。

另一方面，我女儿卡塔丽娜在筹备的最初阶段就发现，我卧室里堆放着一套套跟我的穿衣风格甚至个性截然不符的新衣服。她如此紧张不安，好奇心那么重，我别无选择，只能把孩子们叫到一起，将我的计划说给他们听。孩子们听了很兴奋，有一种入伙成为同谋的高兴劲儿。以往为了家庭娱乐，我们偶尔会拍摄一些短片，此时他们仿佛又加入到了这类拍摄当中。然而在机场时，他们发现我变成了一个教士打扮的乌拉圭人，跟我本人差异极大。他们，包括我自己，才意识到，眼下是一部发生在现实中的电影，既重要又危险，大家脑海中都闪过同样的念头。但孩子们的反应却是一致的。

“最要紧的，”他们对我说，“是给皮诺切特装上一条长长的驴尾巴。”他们说的是那个众所周知的儿童游戏：蒙上眼睛的孩子要准确地把尾巴贴到纸驴的屁股上。

“一定做到，”我估量着将要拍摄的电影胶片的长度，回答说，“驴尾巴差不多会有七千米长。”

一周之后，我和埃莱娜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着陆。出于技术考虑，在没有预先固定行程的情况下，这趟旅行涵盖七座欧洲城市，这是为了让我凭借一本无懈可击的护照来适应新身份。那其实是一本真实的乌拉圭护照，合法持证人的姓名和所有信息都是真实的。护照主人把它当作一份政治贡献交给我们，他知道护照将被篡改，用来帮助他人入境智利。我们唯一要做的是把原先的照片换成我本人乔装打扮之后的证件照。我的行头都是依照这个假名字准备的：我的衬衫上绣着名字首字母交织而成的图案，我的公文包、名片和信纸上也印有姓名缩写。经过好几个小时的练习，我已学会了毫不迟疑地写下他的签名。由于时间仓促，唯一不能解决的是来不及办一张信用卡。这是个危险的纰漏，因为以我所扮演角色的身份，没道理拿着美元现金来购买旅途当中的几张机票。

尽管实际生活里的种种不合保准叫我们两天内就闹离婚，但我和埃莱娜仍学会了勉强迁就彼此，表现得像一对能克服任何糟糕的家庭冲突的夫妻。我俩都熟知对方虚构的身份、虚构的过去和虚构的资产阶级趣味，我想，就算遭受深度审讯，我俩也不会犯什么严重的错误。我们编造出来的故事完美无缺。我们的身份是一家总部设在巴黎的广告公司的负责人，眼下率领一支摄制组到智利为一款新品香水拍摄广告，这款香水计划于次年秋天投放欧洲市场。之所以选择智利，是因为这里一年到头任何时节都能同时找到截然不同的四季景色与风貌，从炎热的海滩到终年不化的雪峰一应俱全，这样的国家全球少有。抵达智利时，埃莱娜身穿高档欧洲时装，风度迷人，神态自若，跟他们在巴黎介绍给我的那位姑娘简直判若两人：那时，她披着蓬松

的头发，穿着苏格兰裙，脚上是女学生常穿的软皮鞋。我原以为披着企业家的新外套应该还算舒适，但瞥见马德里机场一扇玻璃窗里映出的形象，端详穿着两件套深色西装、竖着衬衫硬领、系着领带的自己，那副实业大亨的派头实在叫人反胃。“真可怕！”我心想，“要是我没能成为自己，不就沦落成这副模样了？”那一刻，旧身份遗留给我的唯一物件是一本几乎翻烂的书，阿莱霍·卡彭铁尔[2]的伟大小说《消失了的足迹》。十五年来，这本书始终放在我的行李箱里，在每一场旅程中陪伴着我，帮我抵御飞行期间无法克制的恐惧。然而这一回，我还得忍受全世界不同机场的出入境检查，学会克服那本陌生护照带来的紧张感。

第一站是日内瓦，一切顺利，但我知道，余生我肯定永远忘不了这般场景：移民局官员相当仔细地检查护照，几乎一页一页地翻看，最后抬眼端详我，跟照片作比对。我屏住呼吸，凝视那些官员的眼睛，尽管那本护照上唯一属于我的凭证就是那张照片。这倒是一剂猛药。自此之后，直到飞机在智利圣地亚哥机场开启舱门，我再也没遭遇过那种反胃、心悸的感觉。舱门外一片死寂，十二年后，我再次感受到从安第斯山麓吹来的寒冷的空气。机场大楼外墙上挂着一行蓝色巨幅标语：“智利在秩序与和平中前进。”我瞥了一眼手表：距离宵禁开始，还剩不到一个小时。

---

[1]指智利“9·11”。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空军轰炸了智利总统府，阿连德总统惨遭杀害。皮诺切特上台，开始了对智利的军事独裁统治。

[2]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1904—1980），古巴小说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新闻记者和音乐理论家，被誉为“拉

美文学小说的先行者”。

第二章　最初的失落：城市繁荣

移民局官员翻开我护照的那一刻，我有一种清晰的预感：只要他抬头与我四目相对，就会发现护照有伪造的痕迹。入境处有三个窗口，每个窗口里都坐着一名没穿制服的男子，我选择的是最年轻的那位，因为据我观察，他的动作最麻利。埃莱娜排到别的队里去了，仿佛我们互不相识，这样，假如其中一人遇到麻烦，另外一人可以出机场向外界求救。其实没这个必要，因为移民局官员们显然比旅客还着急：他们也不想赶上宵禁，所以几乎不怎么查验证件。给我办手续的那位移民官甚至都没翻看签证，因为他知道邻国乌拉圭的公民入境根本不需要签证。他翻到第一张空白页，在上面盖上入境章，但退还护照时，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顿时让我五脏六腑都冻住了。

“多谢。”我语调坚定地说。

他报以灿烂的笑容，回应说：

“欢迎入境。”

行李很快就送出来了，跟世界上的其他机场相比，速度可谓惊人，因为海关办事员也想赶在宵禁之前回家。我拿起自己的行李，随后也取走了埃莱娜的箱子（这是事前商量妥的，我一人先拿行李出机场可以节省时间），拖着两件行李往海关检查台走。检查人员更不愿赶上宵禁，比旅客还着急，不但不翻检行李，反而催促旅客动作快些。我正准备把自己的箱子放上去，那个办事员问我：

“一个人旅行？”

我回答说是。他朝那两件行李快速扫了一眼，随即不耐烦地命令道：“行了，走吧。”但有一位我此前没留意的女主管——穿着双排扣制服，一头金发，模样雄赳赳的——从里面吆喝道：“检查一下那个人！”直到那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我没办法解释为什么行李中有女装。而且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在众多行色匆匆的旅客中间，女主管偏偏挑出我来检查，除了行李，应该没什么特别的或更严重的纰漏了。那个男办事员翻检我箱子里的衣物时，女主管拿去了我的护照，细细查看。我想起身上还揣着一块飞机降落前发的硬糖，于是摸出来含进嘴里，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提问，而我担心我模仿的乌拉圭口音掩饰不住真正的智利身份。那个男的先问我：

“先生，你要在这儿待几天？”

“挺长一阵子吧。”我支吾了一句。

嘴里含着糖块，连我自己都听不清嘟哝了些什么，不过那位办事员也没留意，只要求我打开另一只箱子。但另一只箱子有锁。我不知该怎么办，心焦地四下张望，搜寻埃莱娜，发现她无动于衷地挤在另一排入境者的队伍里，似乎对近在咫尺的这一幕漠不关心。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多么需要她的协助啊，不仅在这一刻需要，在整个冒险历程中都是如此。我正准备坦白说出那位女士才是这只行李箱真正的主人，完全没有思考这个轻率的决定会造成什么后果，而就在此时，女主管却把护照递还给我，指示继续检查后面的行李。我回头再看埃莱娜，却不见她的踪影。

这个奇特的情况，至今我们仍无法解释：当时埃莱娜如何离开我视线并无影无踪。后来她对我说，她排队时就瞧见我拎走了她的行李箱，起初也觉得我的做法不谨慎，等到见我顺利出了海关，她也就放心了。在出口有一名推行李车的服务生接过了我的箱子，我跟着他往外走，穿过空空荡荡的大厅，遭遇了回国之后的第一次冲击。

预想中的军事化迹象我一点儿也没看见，也没发现丝毫贫困的痕迹。当然，我们抵达的并不是那座庞大而阴沉的洛斯塞里略斯旧机场。十二年前，十月的一个阴雨之夜，我行色仓皇、惴惴不安地从那座机场出发，开始了流亡生涯。而此刻我们到达的是现代化的普达韦尔机场，政变之前，我仅匆匆来过这里一次。但无论如何，最初的感受并不是我的主观印象。我没在任何地方见到预想的武装设施，特别是那个时期还在实行戒严令。机场干净整洁，灯火通明，色彩鲜艳的广告招牌和进口商品琳琅满目的大型商店随处可见。甚至，目之所及，一个给迷路游客指路的热心警察都没有。站台上等候乘客的出租车也不再是破烂的旧车，而是换上了清一色的日本新款轿车，车型一致，秩序井然。

但眼下不是琢磨这些的时候，埃莱娜还没露面，我已把两件行李放到了出租车上，腕表上的指针飞速移向宵禁时刻，快得让人晕眩。还有另一件事叫我犹疑不决。根据约定的规矩，倘若两人中的一个不能脱身，另一个应该继续前行，并拨打事先记好的用于紧急情况的电话号码。但此刻我很难决定是否单独行动，况且我们也没商量好入住哪家旅馆。入境单上，我填写的是征服者酒店，往来首都的客商常去这家旅馆，这个安排也最符合我们的假身份。此外，我知道意大利摄制组也住在那里，但这一点埃莱娜恐怕并不知情。

心里焦急，室外寒冷，我不禁发起抖来，正打算不再等了，却望见埃莱娜朝我跑来，还有个身穿便装的男人在她身后紧追，手里扬着一件深色雨衣。我一下子愣住了，头脑中盘算着最坏的情况。可最终那男的赶上她，却只是把雨衣递给了她，说是她刚才落在海关检查台上的。埃莱娜耽误了时间其实另有原因：她旅行却没有托运行李，被刚才那位凶神恶煞的女主管盯上了，于是检查人员对她手提箱里的所有物品，从身份证件到洗漱用品，一一细致排查。不过他们当然想不到，她手提箱里的日本袖珍收音机其实也是一件武器，只要调到特定的频率，我们就能跟智利境内的抵抗组织联络。然而那一刻，我比她还焦急，因为我估计她在机场已耽搁了半个多小时；但在出租车上，她向我证明说其实不过晚到了六分钟。出租车司机听到我们的交谈，叫我大可放心，因为距离宵禁开始并不像我以为的只剩二十分钟，其实还差八十分钟呢。我的手表没有调，还是里约热内卢时间。实际上，那一刻是当晚十点四十分，夜色凝重而阴冷。

我难道是为此而来?

随着我们驶入城区，原先设想中重返故乡时噙满泪水的喜悦渐渐被一种不安的心情所取代。事实上，通往洛斯塞里略斯旧机场的路是一条老路，会穿过工业带和贫民区，军事独裁期间，这片区域多次遭到了血腥镇压。而现在连接新国际机场的路是一条灯火通明的高速公路，条件和世界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个令人失望的开端，我原先不仅坚信独裁统治丑恶，还指望在街头、在日常生活中、在人们举手投足间观察到暴政的失败，并用摄影机记录下来，传播到全世界。但现在我们每前进一米，起先的沉痛便一点点化成了明显的失望。埃莱娜后来承认，尽管那一段时间她曾多次回国，但对此也同样感到了不安。

不仅如此。圣地亚哥跟我流亡海外时所听到的情况正相反，它仿佛已是一座璀璨的都市，聚光灯下的纪念碑令人肃然起敬，街面上整洁有序。警察还不及巴黎或纽约街头常见。一眼望去似乎没有尽头的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大街宛如一条光的河流，在我们眼前徐徐铺开。大街起始处是历史悠久的中央车站，由巴黎铁塔的建筑师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甚至连对面人行道旁那些憔悴的站街女也不像过去那般可怜、悲戚了。突然，在我这一侧的窗边，总统府拉莫内达宫仿佛不受欢迎的幽灵般赫然显现。我上一次见到它时，这座建筑已是覆满灰烬的空壳，而如今，总统府整饬一新，重新启用，似乎成了一座法式花园深处的梦幻官邸。

城市的地标建筑渐次排列，从车窗前一一掠过。富豪们聚集一堂操纵传统政治戏码的联盟俱乐部，智利大学昏暗的玻璃窗，圣方济各

教堂，国家图书馆的雄伟殿堂，巴黎百货商场。在我身旁，埃莱娜正忙着处理现实的生活问题，她费尽唇舌劝说司机把我们送到征服者酒店，因为司机执意要把我俩送到另外一家旅馆。显然，那家旅馆付钱让他拉客。埃莱娜处理得很有分寸，既不说冒犯司机的话，也不做让他起疑的举动，因为圣地亚哥的出租车司机有不少是警方的眼线。我晕晕乎乎，还是不插话为妙。

驶向市中心的路上，我不再去欣赏辉煌的街景，独裁政府意图用这种繁华来洗刷四万多人遇害、两千多人失踪、百万人去国流亡的血污。相反，我专注地看人，注意到行人大都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匆匆疾走，大概是因为宵禁时间快到了。但让我有感于心的情景不止于此。灵魂就写在行人被寒风肆意吹过的面孔上。没人讲话，没人看着确切的方向，没人打手势侃侃而谈，也没人满面笑容。没有一个人不是躲藏在深色外套里，以防任何细微的动作泄露了内心，仿佛每个人都孤零零地行走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街上尽是空白的面孔，什么也不流露，连恐惧也没有。于是我的心理状态开始变了，忍不住想离开出租车，混迹于人群当中。埃莱娜给了我各种理智的警告，但因为怕被司机听见，又不能表现得太突兀。我被不可抑制的情绪控制了，让司机停车，下来，猛地关上车门。

我顾不得宵禁将至，径直往前走了不过两百米，但头一百米的见闻便足以让我恢复对自己城市的记忆。我走过国家街，走过孤儿街，穿过整片已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步行街区——就像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佛罗里达大街、罗马的孔多蒂大道、巴黎的博布尔广场和墨西哥城的玫瑰区一样。这片街区是独裁统治制造出来的另一样杰作，尽管布置了供行人休憩闲谈的长椅、闪耀欢乐光彩的霓虹、精心打理的花坛，但现实清楚说明了一切。只有三三两两的人在角落里交谈，而且把声音

压得很低，以免隔墙有耳，被独裁政府分散各处的暗探听见。有几个摊贩沿街兜售你能想得到的各色便宜货，还有许多孩子向行人讨钱。然而，最引我注意的是那些福音派传教士，他们向愿意听其胡诌的寥寥几位行人推销能带来永恒好运的秘方。突然，在一个街道转角，我跟一名巡警撞了个正着，那是我回国后碰见的第一个警察。他十分镇定地从人行道的一头踱到另一头，而在孤儿街转角的岗亭里还有几个警察。我的胃里泛起一阵空落落的感觉，膝关节也有些不听使唤。每次碰见警察，我都会产生这种反应，一想到这个就让我恼火。不过，我很快发现，警察自己也很紧张，他们眼神疑虑地注视着来往行人。他们比我更加恐惧，这个发现让我倍感宽慰。警察的疑虑是有道理的。我的智利之旅才开始没几天，地下抵抗组织就炸毁了那座岗亭。

在我怀旧的中心

那里全是我过往生活的核心记忆。那边是令我难忘的电视台和视听局的旧楼，我正是从那儿开始了我的电影生涯。再过去是戏剧学院，十七岁那年，我从外省赶来，参加了一场决定我人生的入学考试。那里也是我们组织人民团结[1]政治集会的地方，我在那里度过了最艰苦而意义非凡的岁月。再往前走，经过城市电影院，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观看了那批至今仍激励我拍摄电影的大师之作，其中最难以忘怀的是《广岛之恋》。突然，有人哼唱着巴勃罗·米拉内斯[2]的名曲从身边走过，就是那首《我将再次踏上圣地亚哥淌血的街》。这个巧合太意味深长了，我觉得如鲠在喉，几乎克制不住。一阵侵入骨髓的颤抖让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隐蔽潜伏的处境；那一瞬，我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城市，变回了我自己。当时我真想用尽全力喊出自己的名字，告诉别人我是谁，为了争取回家的权利，我愿意跟任何人作对。可我不得不克制这种不理智的冲动。

宵禁前的最后一刻，我泪流满面地返回酒店，看门人不情愿地为我打开刚锁上的大门。埃莱娜已在前台替我俩做了登记，现在人正待在房间里，架起便携收音机的天线。她看起来挺平静，可一见我走进来，还是像一个典型的妻子那样勃然大怒。她想象不出我干吗要冒无谓的风险，宵禁前独自在街上游逛。而我当时无心听她训斥，所以也表现得像一个典型的丈夫，砰地摔门而出，去找住在同一家酒店的意大利摄制组。

下了两层楼，我敲响了三〇六房间的门。两个月前在罗马，我与意大利组领队约定了冗长的口令，为了不说错，我还暗自排练了好几遍。一个半梦半醒的声音——那是格拉齐雅热情的音调，无须暗号，我一听便知——从门里问道：

“谁呀？”

“加百列。”

“还有呢？”格拉齐雅追问。

“大天使。”我答道。

“是圣乔治和圣米迦勒？”

确认回答后，她的声音非但没平静下来，反而颤抖得更厉害了。这真奇怪，因为在意大利我俩有过长谈，她应当能分辨出我的声音。然而，即便在我肯定地回答了大天使就是圣乔治和圣米迦勒之后，格拉齐雅还是要把暗语说下去。

“萨尔科。”她说。

这是我在圣塞巴斯蒂安没能拍完的影片《四季旅人》中一个人物的姓，而我应该回答其名。

“尼可拉斯。”

格拉齐雅是一位完成过艰巨任务、经验丰富的女记者，显然刚才的答复没能让她信服。

“胶片有几英尺？”她接着问。

于是我明白了，她是要把冗长的暗语对到底，可那还差很长一段呢，而我担心这可疑的游戏会被隔壁房间听到。

“别瞎扯了，快开门吧。”我说。

但她不对完最后一句口令，决不开门。此后几天里，格拉齐雅无时无刻不显露出这股严谨的劲头。“该死的，”我心里暗骂，不仅想到了埃莱娜，也连带想到艾丽，“女人都一个样。”我继续回答这辈子遇到的最可恨的一长串问题，恰似老练的丈夫般屈就。暗语对到最后一句时，那位在意大利结识的年轻迷人的格拉齐雅一下子打开房门，但一见到我，仿佛撞见幽灵似的，吓得又赶紧关上了门。后来她告诉我：“你看起来像我见过的一个人，但我不确定是谁了。”这可以理解。在意大利，她只见过不修边幅的米格尔·利廷，那时他还留着胡子、不戴眼镜、着装随意，而敲响她房门的男人是个秃头，戴近视镜，胡子剃得干干净净，一身银行经理般的行头。

“放心开门吧，”我对她说，“我是米格尔。”

即便后来经过细致检验准许我进了门，她还是有所保留地打量我。寒暄之前，她故意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以防我们的谈话被隔壁房间听到，或被暗藏的窃听器录下来。不过，她泰然自若。一星期前，她率领团队的其他三个人提前到达。多亏意大利使馆的好心安排，他们已获得了工作批准和许可，当然，使馆官员们并不清楚我们的真实意图。

不仅如此，摄制组已开始工作，在政府高官出席意大利使馆安排在市剧院的《蝴蝶夫人》歌剧演出时进行了拍摄。皮诺切特将军也受邀了，只是最终没有出席。但意大利摄制组在演出现场露面对我们的

工作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如此一来，他们等于在圣地亚哥获得了官方许可，接下来的几天，在大街上拍摄就不会遭到任何质疑了。另一方面，拍摄拉莫内达宫内景的申请手续还在办理中，不过申请人已经获得了担保，说不会遇到什么阻碍。

这些好消息让我深受鼓舞，想即刻开始工作。要不是因为宵禁，我肯定请格拉齐雅把摄制组其他人全部叫醒，好留下我重返智利第一晚的见证。我们制定了第二天一早拍摄的详细计划，不过，我俩达成一致，不必让其他组员预先知晓计划，而且应该叫他们坚信格拉齐雅才是领队。与此同时，格拉齐雅自己也不知道还有另外两组人马在拍摄同一部影片。我们取得了不少进展，同时品尝着格拉巴酒——一种意大利烈性白兰地，格拉齐雅一直把这种酒带在身边，几乎像一个护身符。这时电话突然响了，我俩同时跳起来。格拉齐雅飞速过去抓起听筒，听了一会儿，旋即挂断。原来是酒店前台打来的，让我们把音乐音量调低，因为隔壁房间已经打电话抱怨了。

恐怖的死寂让人铭记

在同一天里，情绪感受太过丰富了。我回到房间时，埃莱娜已经在她的温柔梦乡里徜徉，而我那一侧床头柜上的夜灯还亮着。我悄无声息地脱掉衣服，准备如上帝安排的那样安睡，可怎么也睡不着。刚一躺到床上，我便留意到宵禁期间那种恐怖的死寂。我想象不出世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有与这里一般无二的寂静。那寂静就压在我胸口，压迫感越来越强，无休无止。熄灯之后整座空寂的城市没有一丝声响。听不到管道里的水流，听不到埃莱娜的呼吸，甚至听不到我自己身体里的声音。

我焦躁地起身下床，从窗口探出头去，想呼吸几口街上的新鲜空气，看一看这萧条而真实的城市。自从在漂浮不定的少年时代第一次踏足圣地亚哥起，我从来没见过这座城市像眼前这样孤寂而悲凉。窗户在五层，正对着一条死巷，巷子两侧是黢黑、高耸的墙壁。高墙之间，透过一片灰色阴霾，只能窥见一小块天空。我并不觉得站立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觉得面前是真实的生活，只觉得自己仿佛一个被困在马塞尔·卡尔内[3]阴冷电影里的囚徒。

十二年前，早晨七点，一名率领巡逻队的中士端着机关枪，往我头顶上扫射了一梭子子弹，喝令我排进一群俘虏的队列。这群俘虏正被驱赶进我任职的智利电影公司的大楼。当时整座城市正在爆炸声、机枪子弹呼啸声和低空飞行的战斗机的轰鸣声中瑟瑟发抖。逮捕我的那位中士自己也晕头转向，竟问我出了什么状况，他说："我们保持中立。"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也不清楚这个"我们"包括谁。某一刻，仅有我们两人的时候，他问我：

“《纳胡尔托罗的豺狼》是你拍的，对吗？”

我回答说是。忽然间他似乎忘记了一切，忘记了尖啸的子弹、爆破的炸药和袭击总统府的燃烧弹，恳请我解释电影里怎么装死，怎么让伤口冒出血来。我向他一一解释，他听得非常痴迷，但随即就回转到现实中来。

“别回头瞧，”他朝我们嚷道，“不然我崩了你们的脑袋。”

要不是几分钟前我们还看见倒在街上的第一批死难者，要不是看到一个血流如注的受伤者趴在人行道上无人救助，要不是看到几伙市民装扮的打手用棍棒将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支持者殴打至死，我们真还以为眼前这一切是无中生有的游戏。我们还眼见一群囚犯背倚着墙，一队士兵佯装要枪决他们。然而，看押我们的士兵一边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边坚持说：“我们保持中立。”阵阵轰响，遍地狼藉，一切都叫人发狂。

智利电影公司大楼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三脚架架起的机关枪对准了大楼正门。头戴黑色贝雷帽、胸前佩有社会党徽章的看门人朝我们迎面走来。

“啊”，他指着我喊道，“这位先生，利廷先生，该对这儿发生的一切事负责。”

中士用力推搡了他一把，看门人跌倒在地。

“滚蛋，”中士训斥他，“轮不到你讲话。”

看门人惊恐地连滚带爬，还仰头问我：

“喝咖啡吗，利廷先生？不来一小杯咖啡？”

中士让我拨几个电话打听一下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试着打了，但谁也没联系上。每时每刻都有军官进来下达命令，不一会儿又有别的军官下达完全相反的命令：告诉我们可以抽烟，又不准抽烟；叫我们坐下，又命令我们统统站好。半小时后，进来一位非常年轻的士兵，他用冲锋枪指了指我。

“报告中士，”他说，“外面有个金发妞儿来找这位先生。”

准是艾丽来了，肯定没错。中士出去跟她说话。与此同时，士兵们告诉我们，凌晨他们就被拉出来了，到现在还没吃上一口早饭，后来又接到命令，不让他们收取任何东西，所以他们现在又冷又饿。我们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递上香烟。

这时，中士跟着一位中尉进来了，中尉开始核实俘虏的身份，以便将我们羁押到国家体育场去。清点到我时，还没容我开口，中士抢先出了声。

“不对啊，中尉，”他对长官说，“这位先生跟这儿没关系，他跑来抱怨邻居用棍子把他的车砸坏了。”

中尉困惑地瞥了我一眼。

“这人怎么这么蠢，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跑来抱怨这种小事？”他呵斥道，“赶紧给我滚！”

我拔腿就跑，心想他们会在背后开枪，因为处决逃犯是最常见的借口。但并没有枪响。艾丽是来给我收尸的，她听一个朋友误传，我在智利电影公司门外被枪决了。街上有好几栋房子都升起了旗帜，军

方用这种事先约好的办法辨别他们的拥护者。另一方面，我们一家已经被一个女邻居揭发了，她说我们跟政府的人过往甚密；她还知道我曾积极参加过阿连德总统的竞选活动，军事政变爆发前夕，我家里还在组织秘密集会。于是我们决定不回家，带着三个孩子和最必需的日用品，在死神的步步紧逼下辗转寄宿各处，就这么坚持了一个月。直到围堵越发令人窒息，我们才不得不踏上了去国流亡之路。

---

[1]人民团结（Unidad Popular），智利历史上的一个左翼政党联盟，成立于1969年，前身为人民行动阵线，该联盟推举的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于1970年当选智利总统。1973年，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推翻了人民团结政府。1981年该联盟解散。

[2]巴勃罗·米拉内斯（Pablo Milanés，1943—），古巴歌手、作曲家，古巴新情歌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3]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1906—1996），法国电影导演，诗意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作品有《雾码头》《北方旅馆》《天堂的孩子》等。

第三章　留下的人也是流亡者

早晨八点，我请埃莱娜帮我打电话找个人，对方的号码只有我一人知道。还是用假名“弗朗奇”来称呼他吧。他本人接了电话，埃莱娜没做更多解释，只是说“替加夫列尔传个话”，请他到征服者酒店五〇一房间来。他提前半小时赶到。埃莱娜已准备出门，而我仍躺在床上。听到他敲门时，我故意用被单蒙住了脑袋。其实，弗朗奇并不知道自己会见到谁，我们只是约定好，任何用加夫列尔的名义打电话的人，都是我派遣的。最近几天，领导摄制组的三个“加夫列尔”都给他打过电话了，包括格拉齐雅，所以他没料到这个新的加夫列尔就是我本人。

早在人民团结时期之前，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在我拍摄最初几部电影时我们就合作过，后来还一道出席过几届电影节，最近一次见面是一年前在墨西哥。可当我露出脸的时候，他竟没认出我，直到我放声大笑——笑声是我明白无误的特征。这让我对自己的新造型更有信心了。

弗朗奇是去年年底被我招募进来的。他的工作是分别接待摄制组，下达初步指示，在不干扰埃莱娜指挥的前提下，处理一系列基本安排。他的档案清清白白：他是智利人，政变之后曾自愿流亡到加拉加斯，没有任何指控他的案底。从那时起，他已经在智利境内完成了几桩地下秘密任务，能凭借无可挑剔的伪装在智利境内自由行动。他跟电影圈熟络，再加上性格随和、富于想象力、做事大胆，应当能在

这趟冒险之旅中成为我们的理想搭档。我的判断没错。根据与我事先商量好的计划，他比我提前一周取道秘鲁经陆路入境智利，以便分头接待和协调三支摄制组，目前三支小组已着手工作。按照几个月前小组负责人分别和我在巴黎制定的详细方案，法国组在智利北方工作，从阿里卡拍摄到瓦尔帕莱索。荷兰组在南方完成相似任务。意大利组驻守圣地亚哥，直接听我调遣，并时刻准备拍摄任何预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三支小组都接到指示，在没有危险也不会引起怀疑的前提下，向受访者征询对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看法，因为我们相信，谈论这位殉难的总统，是判断每个智利人对国家现状和未来可能性所持立场的最好参照。

弗朗奇知晓每支摄制组的精确行程，连他们要下榻的酒店也悉数掌握，随时能跟他们取得联络。这样一来，我本人就能通过电话向他们传达指令了。为了更加保险，弗朗奇还将充当我的司机，每隔三四天，我们就从不同的租车公司租一辆新车。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俩很少分开。

三个被割喉者扳倒了一个将军

上午九点，我们开始工作。武器广场与酒店仅相隔几个街区，在现实中比在我记忆里更加生动，南方秋天昏黄柔和的阳光透过高大树木的枝叶，洒在广场上。四季常设的花丛每周更换一新，在我看来，花朵比以往更加鲜嫩而有光彩。一个小时前，意大利组已开始拍摄早间的日常景象了：退休职员坐在木制长椅上读报纸，老人们给鸽群喂食，小贩们兜售便宜货，摄影师端着带黑布罩的老式相机，还有那些画三分钟速写的街头画家，或许是当局眼线的擦鞋匠，手牵彩色气球围在冰淇淋车旁的孩童，以及正走出大教堂的人们。广场一角，与往常一样，还聚集了一群失业的艺人，等待着受雇于随时出现的庆典活动。他们当中有知名的音乐家、逗孩子的魔术师和小丑，也有服饰、妆容都相当夸张的异装者，性别难辨。不同于前一晚，在这个美好的早晨，广场上驻守着几支警察巡逻队，神情严峻、荷枪实弹；警备车停在旁边，车顶装有大功率喇叭，正在用最大音量播放着流行音乐。

不久我就发现，街上难得瞧见治安警力只是初来乍到者的错觉。地铁主要车站里无论何时都埋伏着防暴警察，街道两侧总是停靠着备有高压水枪的卡车，随时准备以残酷的方式掐断各类不合时宜的抗议活动的苗头，而抗议活动几乎天天都有。监控力度最强的地点就在武器广场，这里是圣地亚哥的神经中枢，也是团结圣公会的大本营。团结圣公会是席尔瓦·恩里克斯总主教发起的对抗独裁统治的坚强堡垒，不仅天主教徒支持它，所有为智利民主回归而奋斗的人士也都支持它。团结圣公会形成了难以瓦解的道德力量。它的总部坐落在一栋殖民时期风格的建筑里，中央庭院宽敞且阳光充足，全天都门庭若市。

在这里，所有受迫害者都能找到栖身之所，得到人道主义关怀。在这里，有所需求的人，特别是政治犯及其家属，总能找到提供援助的便捷渠道，在其帮助下安全抵达目的地。公会还接收那些揭发当局严刑拷问的控诉，为失踪者和其他任何不公正行为而组织抗议示威。

就在我秘密入境几个月前，军事独裁政府对团结圣公会展开血腥挑衅，结果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反遭打击，摇摇欲坠。一九八五年二月底，抵抗运动的三名成员被一群耀武扬威的人劫走，面对如此阵势，谁是幕后主使早已昭然若揭。社会学家何塞·曼努埃尔·帕拉达是团结圣公会的骨干，就在其子女就读的学校门前，他被绑架者当着孩子们的面抓走。恰在这时，警方截断了周围三个街区的交通，军用直升机在空中监控了整个区域。仅相隔几小时，另外两人在城市的不同地点被绑架。一位是曼努埃尔·格雷罗，智利教师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另一位是圣地亚哥·纳蒂诺，享有很高职业声望的插图画家，在此之前，人们并不知道他曾积极投身抵抗活动。正当全国人民惊愕不已时，一九八五年三月二日，三具尸体出现在圣地亚哥国际机场附近一条僻静的小路上，尸体的喉咙全部被割开，浑身布满野蛮折磨留下的伤痕。军警武装部队指挥官、国家军事委员会委员塞萨尔·门多萨·杜兰将军向媒体宣布，这起三重杀人案是智利共产党内讧造成的，均受到莫斯科方面的唆使。然而，拆穿谎言的声浪在全国蔓延，人们指责这位门多萨·杜兰将军才是屠杀的主谋，为此，他不得不辞去了政府职务。从那时起，通往武器广场的四条道路之一“桥梁街”，路标上的街名不知被什么人涂去，换上了沿用至今的新名——何塞·曼努埃尔·帕拉达街。

“你是乌拉圭人，值得庆贺”

那天早晨，当我和弗朗奇装作散步者，若无其事地走在武器广场上时，这场野蛮戏剧的凝重氛围还在暗中浮动。我看到摄制组就像前一晚我和格拉齐雅商定的那样，已在拍摄地点就位，而格拉齐雅也瞥见我们正走过来。但那一刻，她没给摄影师任何指示。接下来，弗朗奇从我身旁走开，我按照此前与三位小组负责人约好的方式，接手领导拍摄工作。首先，我在鹅卵石铺就的人行路上巡视了一遍，在不同的地方停步，指示格拉齐雅每个片段应该拍多长，而后再走一遍，以示机位。眼下我们两人都不应搜寻能证明街面上埋伏着镇压力量的细节。那天早晨只需捕捉一些日常氛围，特别要凸显人们的行为举止，因为就像我在前一晚观察到的，比起以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少了。行人步履匆匆，对周遭发生的事漠不关心；即便与人交谈，也悄声细语，避免用手势强调自己的语气。而在我印象中，以前的智利人很爱打手势，现今流亡海外的智利人也是这个做派。我自己在人群间穿行，口袋里揣着一台高灵敏度的袖珍录音机，用它来记录街头对话，这不仅有助于组织第一天拍摄的镜头，对全片剪辑也有参考价值。

指定几处拍摄位置后，我在一位在广场长椅上晒太阳的女士身边坐下来做笔记。在长椅的绿漆木条上，一代代情侣用折刀刻上了各式各样的名字和爱心。我总是忘记带记事本，于是就把笔记写在“吉卜赛女郎”牌香烟纸盒的背面。“吉卜赛女郎”是法国名烟，我在巴黎买了不少备用。后来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始终这样做笔记，虽然并非特意

存留香烟盒，但这批笔记就像一册海航日志，帮我在眼下这本书里复现旅途当中的种种细节。

那天早晨，在武器广场上做笔记时，我注意到坐在旁边的女士正侧目观察着我。她已经上了年纪，着装属于那种中产阶级下层的过时款式，外套有毛领，帽子也相当破旧。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坐在那里，孤单一人，沉默不语，并没定睛注视任何地方，甚至几只鸽子在头顶盘旋又飞落下来啄她的鞋边，她的神色也没有丝毫变化。若不是稍后她告诉我，她是在教堂望弥撒受了凉，想晒几分钟太阳再坐地铁回家，这些情况我肯定无从知晓。我假装读报，发现她正从头到脚打量我，毫无疑问，这个钟点到广场上走动的人群里，我的着装有点扎眼。我朝她笑了笑，她问我是哪儿的人。答话前我抬手轻轻按下了衬衫口袋里袖珍录音机的录音键。

“乌拉圭人。”我答道。

“啊！”她感叹道，“你们运气真好，值得庆贺。”

她指的是乌拉圭最近回归了民主选举制，说这话时，她语气中有一种缅怀过去的温柔。我假装心不在焉，想让她说得更明白些，希望她透露一点有关个人处境的隐衷，但没有成功。不过，她倒是毫无保留地向我讲起了智利缺乏个人自由，还面临严峻的失业问题。说话间，她还指给我看长椅那边的失业者、小丑、音乐家和异装者，这会儿，那群人越聚越多了。

“瞧那伙人，”她对我说，“整天待在这儿等救助，因为没工作。我们的国家在挨饿。”

我任由她自说自话。而后，我估摸着第一遍踩点已过去半小时，便起身告辞，开始第二遍走位。此时，格拉齐雅下达了拍摄命令，还指示摄影师，不要靠近给我特写，别让警察注意到我。但问题恰好相反：是我自己无法将目光从警察身上移开，因为他们对我来说有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虽然智利一直都有沿街叫卖的商贩，我却不记得数量有现在这么多。在商业中心很难有一个地方遇不到小贩们默默排开的长队。商贩人数多，货物品类杂，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征兆。路边摊贩里有失业的医生、落魄的工程师，能看见某位气质好似侯爵夫人的女士正廉价抛售她原先钟爱的衣服，还能瞧见一伙孤儿在人群中兜售偷来的东西，或者贫困的主妇推销自家烘烤的面包。但所有这些不幸的买卖人即便一无所有，也不肯失去自己的尊严。有人站在货摊后面却仍然穿着从前在堂皇的办公室里所穿的正装。一位出租车司机，原先是富裕的纺织品商人，他开车载我几个小时，逛遍了半个城区，最后却坚决不肯收费。

当摄影师拍摄广场环境时，我独自在人群间穿梭，捕捉将来可以充当影像解说的谈话片段，同时留心不要牵扯进以后有可能在银幕上被认出来的人。格拉齐雅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我，我也在观察她。跟从我的指示，她首先仰拍最高的建筑物，而后镜头一点点降下来，将摄影机移向近旁，最后拍那些警察的脸。我们想捕捉他们脸上紧张的表情。临近正午，广场上越发热闹，他们的紧张感也越发明显。但警察们很快注意到了摄影机移动的轨迹，察觉自己正在被人观察，于是立即要求格拉齐雅出示在街上拍摄的许可证。我望见格拉齐雅给他看了许可证，警察似乎很快就表示了满意，我便如释重负地继续走位。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告诉格拉齐雅不准拍他们的人，但格拉齐雅反驳

说，许可证上可没注明有什么禁忌，她还搬出了摄制组成员的意大利国籍，表示不接受原先未曾告知的命令。警察没再多说什么。这个情况让我很感兴趣，因为事实证明，欧洲摄制组在智利确实具有我们先前所预想的优势。

留下的人也是流亡者

警察成了让我着迷的心结。几次经过警察身边，我总想找个机会跟他们攀谈几句。突然，凭借一股无法抗拒的冲动，我走到一支巡逻队跟前，打听起那栋殖民时期风格的市政府大楼的情况。这座建筑在三月的地震里遭到了破坏，眼下正在修缮。回答我问题的那个警察根本没正眼瞧我，他的目光仍在扫视广场，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身旁同事的态度也一模一样，不过，当他听出我是故意抛出一些傻乎乎的问题时，斜睨的目光里越发流露出厌烦。而后，他眉头紧锁盯着我，喝令道：

“走开！”

就在此时，之前困扰我的咒语已经解开，警察带给我的惴惴不安转化成了一股得意劲儿。我非但没服从命令，反而给他们上了一堂礼仪课，教训他们面对和平守法、充满好奇心的外国游客，应该表现出怎样的得体举止。然而，还没等我发觉自己伪装的乌拉圭口音不足以对付这样复杂的申辩，那个警察已经受不了我的长篇大论，勒令我出示身份证件。

整趟旅行里恐怕再没有哪个场景让我如此担惊受怕。脑海中快速闪过所有念头：争取时间，死撑下去，甚至拔腿就逃，哪怕明知他们会很快追上我。我还想到了埃莱娜，此时不知她跑到哪儿去了；我只能瞥见远处摄影机映出的微光，摄影师会拍下一切，这确凿的证据足以向海外扩散我被捕的消息。还有弗朗奇，他肯定在不远处，凭我对他的了解，他绝不会容许我离开他的视线。当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出示护照，让警察查验身份，此前在几个机场，这本护照都经受住了考验。但我担心警察会搜身，因为那一刻，我猛然想到自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放护照的钱夹里，还装着我真正的智利身份证和一张写着真名的信用卡，我一时疏忽，忘记取出来了。意识到别无其他风险更小的办法，我便掏出了护照。应该怎么处理，警察似乎也不是很有把握，他快速扫了一眼照片，而后将护照递还给我，态度比刚才柔和了些。

“关于那栋建筑，您想要了解什么情况？”他问道。

我长舒了一口气。

“什么都不想，”我说，“是我自己没事找事。”

这件事治愈了警察给我带来的不安情绪。此后的全部旅途中，我开始能像其他守法的智利人一样，甚至像那些为数不少的从事秘密抵抗活动的智利人一样，以自然的心态看待警察。有两三次，我偶尔向警察求助，他们也态度良好地提供了帮助。甚至还有一回，警察开着巡逻车为我们开路，多亏如此，我才得以在警方发现我在圣地亚哥行踪的几分钟前赶上一架国际航班。埃莱娜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人为了纾解紧张情绪就跑去挑衅警察。我和她的合作关系本来就存在危险的罅隙，现在更是濒临破裂。

所幸，在她或其他人提醒我之前，我已经对自己的不谨慎感到后悔了。警察一把护照还给我，我就按事先商量好的那样给格拉齐雅做了个手势，请她暂停拍摄。弗朗奇早从广场另一头目睹了这一切，他跟我一样心焦如焚，此刻赶紧过来跟我碰头。但我让他午饭后再到酒店接我。我想一个人独处。

我坐在一张长椅上翻看当天的报纸，但目光扫过一行行文字却什么也没读进去。独自一人在这个晴朗的秋季早晨，我内心异常激动，无论如何也没法集中精神。突然远方传来了宣告十二点钟的礼炮声，鸽群惊飞，大教堂的钟琴奏响了比奥莱塔·帕拉[1]最动人的曲子：《感谢生活》。这情景实在让我难以自持。我想起比奥莱塔，想起她曾在巴黎忍饥挨饿、露宿街头，想起她不可撼动的自尊，又想到体制始终排斥她，蔑视她的歌声，嘲笑她的反抗。一位了不起的总统不得不迎接子弹光荣死去，智利不得不承受历史上最血腥的殉难；比奥莱塔·帕拉本人也是如此，只有当她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祖国才发现她的歌声里蕴藏着最深沉的美和人性真理。此时，那些警察也在投入地聆听她的歌声，但茫然不知歌手是谁，不知她在想些什么，不知她为何要长歌当哭。他们更不知道，倘若在这个晴朗的秋日早晨，歌手本人见到了这一幕奇特的情景，又该对他们表现出怎样的鄙弃啊。

我急于一点一点找回往日的记忆，便独自前往城市高地的一家餐馆，我和艾丽刚订婚时经常到这家餐馆吃午饭。那地方仍旧是从前模样，杨树荫下摆放着露天餐桌，遍地繁花，但给人的印象是，这里被时间遗忘了。一个客人也没有。我高声抱怨，侍者才来点菜，差不多耽搁了一个小时，才给我端上一大盘烤肉。我快要吃完时，一对夫妇走进来，我和艾丽还是此处常客时总能见到他们。男的叫埃内斯托，别人常叫他“内托”，女的叫埃尔维拉。他们在几个街区外经营着一家生意不景气的小店，专卖圣像卡片、圣徒塑像、念珠、圣骨匣以及丧葬用品。但两人性格跟自家生意相去甚远，他们性情风趣，思路敏捷。赶上星期六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会在这里品尝葡萄酒、玩纸牌，逗留到很晚。看到他们像过去那样手挽着手走进来时，我惊讶于尽管世界早已天翻地覆，可他俩还坐在过去的老位置上，更让我讶异的是，他们实在苍老太多了。在我印象中，他们不是一对循规蹈矩的夫

妻，更像是一对成熟、热情而机灵的情侣，但此刻我觉得他们成了发福、沉闷的老年人。两人仿佛成了一面镜子，让我忽然从中瞥见了自己的暮年。假如他们认出了我，无疑会同样错愕地端详我，不过此刻，我有这套乌拉圭富商的行头罩在身上。他们在旁边的桌子上用餐，大声交谈，但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他们间或朝我这边望一眼，却并不好奇，丝毫没有疑心我们曾在同一张桌子上谈笑欢聚。只有在这一刻，我才意识到流亡岁月是多么漫长而痛苦，不只是对那些离开的人——直到此刻我才想到这一层——留下的人们同样饱受流亡之苦。

---

[1]比奥莱塔·帕拉（Violeta Parra，1917—1967），智利作曲家、新歌运动代表人物，被誉为“拉丁美洲民歌之母”。

第四章　圣地亚哥的五个基准点

我们又在圣地亚哥拍摄了五天，这段时间足以证明我们的工作模式切实可行。与此同时，我与北方的法国摄制组和南方的荷兰摄制组保持联系。埃莱娜的联络工作也颇见成效，我们打算采访一些地下运动领袖和具有合法身份的政界人士，采访安排也越来越有眉目了。

至于我自己，我仍旧忍受着隐匿身份的痛苦。这对我而言，是一种艰难的牺牲，因为许多亲朋好友我都想探望，首先就是我的父母，此外我还想重温青年时代的许多片段。但现在，至少在电影拍完之前，他们得跟我绝对保持隔离。我压抑着自己的情感，承受着在祖国土地上流亡的奇特状态——最痛苦的流亡莫过于此。

我很少独自上街，但仍然觉得孤单。不管走到哪儿，即便自己注意不到，抵抗组织的眼线也会时刻照看着我。只有当我跟绝对信任的人见面，同时我也不希望会见者在别的朋友面前暴露身份的时候，我才会提前请求安保人员撤离。在埃莱娜成功地协助我，使工作走上正轨后，我在保护自己方面也接受了不少训练，因此没出现任何纰漏。电影如预想的那样持续拍摄，没有哪位合作者由于我的疏忽或错误而遭遇任何麻烦。然而，离开智利后，一位秘密行动的负责人用开玩笑的口气对我说：

“有史以来，还没有哪次地下行动，如此频繁又危险地打破了那么多条安保原则。”

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们已然提前完成在圣地亚哥的拍摄计划。我们制定了一个非常灵活的方案，允许随时随地做出任何调整，而事实证明，在一座无法预测的城市里拍摄，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圣地亚哥每时每刻都能出人意料，而意外冒出的念头也给我们带来新的灵感。

截至当时，我们已经换了三家酒店。征服者酒店舒适便捷，但它正位于镇压势力的中心，我们有理由确信这家酒店是监控最严密的地点之一。可其他的五星级酒店也没什么两样，因为总有许多外国人出出进进，而外国人在独裁政府安全部门的眼里，原则上全都属于可疑对象。不过，那些二流酒店对出入人员的检查往往更严，我们担心住在那些地方更易引人注目。因此，最安全的办法莫过于两三天搬一次家，也不管酒店是几星级的，而且决不折回原先住过的酒店，因为我有点迷信，认为回到曾经冒过风险的地方难免会出事。这种执念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那一天，空军轰炸了总统府拉莫内达宫，全城陷入骚乱。我赶到智利电影公司的办公室，跟长期合作的同事们商量怎样对抗政变。我本已从容地从电影公司脱身，开着车把一些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朋友送到森林公园，但这时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重新跑回了电影公司。所幸出现奇迹，我死里逃生，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那样。

除了更换酒店以外，我们采取了另一项预防措施：第三次搬家之后，我和埃莱娜开始分房入住，各自使用新身份。有时候我自称是经理，而她是秘书；有时候我俩装作不认识。逐步分开也正好符合我俩此时的相处状态，尽管我们两人在人际关系上越发尴尬，工作上还算顺畅。

应该说，在我们入住过的众多酒店中，只有两家引起了我们的警觉。第一家是喜来登酒店。入住当天，我刚要就寝时，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当时埃莱娜去参加一个秘密会议，时间比她预计的要长，宵禁前赶不回来就得在集会地点借宿，这种情况已发生过多次。半梦半醒间我接起电话，但根本不记得自己身在何处，更糟的是，我不记得那一刻自己的身份。一个智利口音的女人叫了我的假名。我刚想回答不认识这位先生，但一下子警醒过来，意识到此时此刻会有人用这个名字找我。

那是酒店接线员的电话，她说有找我的长途电话打进来。一秒钟里，我快速思量，除了埃莱娜和弗朗奇没人知道我住在哪儿，他们两个也不会用这种方式在凌晨时分给我打电话，还伪装成长途，除非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于是我决定接这个电话。电话另一端，一个女人用英语跟我说了一通亲昵的话，一会儿叫我亲爱的，一会儿又喊甜心、宝贝。终于等到我插空回话，我赶紧告诉她我不讲英语。那女人一听，娇嗔地骂了一句“靠”，就挂了电话。

试图跟酒店接线员搞清楚情况也是白费功夫，唯一的发现是，还有两位入住酒店的男士，他们的姓名跟我护照上的假名有点像。那一晚我一分钟也睡不着了，挨到第二天早晨七点埃莱娜进门，我们即刻搬到了另一家酒店。

第二次惊险发生在老旧的卡雷拉酒店，从这家酒店正面窗户望出去，能看到拉莫内达宫的全貌。这地方的惊险在于它叫人后怕。就在我们离开酒店几天后，有一对年轻男女假扮度蜜月的新婚夫妻，入住我们隔壁房间。他们在照相机三脚架上安放了一台装有延迟操作系统的火箭筒，发射方向对准了皮诺切特的办公室。他们的行动理念和设备都是一流的，皮诺切特在他们设定好的时刻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但发射的后坐力震散了三脚架，失去准星的火箭筒在酒店房间里爆炸了。

圣地亚哥的五个基准点

进入智利的第二周，星期五，我和弗朗奇决定在次日乘车到智利内陆，第一站是康塞普西翁。直到那时，我们还没能给圣地亚哥合法公开的政治家和从事秘密斗争的领袖们做访谈，也没能拍摄到拉莫内达宫的内景。前者需要事先做周密的准备，埃莱娜正以可敬的勤奋精神在安排。拉莫内达宫内景拍摄的申请已经通过批准，但正式书面许可要等下周才能到手。于是，我和弗朗奇想利用这段时间到内地拍摄。为此我们打电话通知法国组，一旦完成在北方的拍摄工作就返回圣地亚哥，同时荷兰组将继续在南方拍摄，一直拍到蒙特港，然后在当地待命。我本人则像此前一样，继续跟意大利组一同工作。

按照计划，星期五这一天将拍摄我本人在街上执导电影的片段，好让独裁政府的情报部门不能否认在智利主导拍摄的正是我本人。我们选择拍摄圣地亚哥最具特色的五个地标：拉莫内达宫外景、森林公园、马波丘桥、圣克里斯托瓦尔山和圣方济各教堂。为了拍摄时不耽误一分钟，格拉齐雅几天前就已踩点，研究机位，因为我们约定每个地点只拍摄两小时，或者说，全部地点要在十个小时内拍完。每场拍摄我都比摄制组晚到十五分钟，无须跟任何成员说话，到场后立即融入当地人流，用事先约定的手势提示格拉齐雅。

拉莫内达宫占据了整个街区，主要建筑立面在南北两侧。南侧朝向林荫街旁的布尔内斯广场，外交部就在拉莫内达宫这一侧办公。北侧朝向宪法广场，是共和国总统府的所在地。九月十一日轰炸发生后，拉莫内达宫受损，总统府那一侧成了一片瓦砾废墟，无人问津。此后，军政府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的旧楼里临时办公。那是栋

二十层的建筑，军政府急于展现自身的合法性，便搬出自由派名人堂迭戈·波尔塔雷斯的名字来命名这栋大楼。军政府在那里驻扎了差不多十年，直到拉莫内达宫漫长的修缮工程竣工。修缮期间，总统府增添了一些名副其实的地下工事：防弹地下室、秘密通道、逃生门、通向大街下方政府停车场的紧急通道。然而，在圣地亚哥，人们纷纷相传，皮诺切特这一重重形式主义的努力都因无法系上奥希金斯总统的绶带而大打折扣。国父奥希金斯是智利合法权力的象征，而他的绶带在轰炸总统府当天的大火中失踪了。某次，军政府的一个官员企图颠覆这个传闻，声称第一批占领总统府的军官们早已从烈焰中挽救了绶带，但没人相信这个幼稚可笑的谎言。

意大利组于上午九点前就位，在国父贝尔纳多·奥希金斯纪念碑前完成了拉莫内达宫临林荫街那一侧的拍摄。国父纪念碑前设置了一盏煤气长明灯，名为“自由之火”。摄制组随后转去拍摄另一侧。在那一侧能看到总统府的精英卫队，他们比一般的卫队官兵更加英俊高傲。此刻，卫队正进行每日例行两次的换岗仪式，引来世界各地好奇的游客围观。虽不像伦敦白金汉宫前那么人头攒动，但现场的阵势同样不小。总统府这一侧的警戒也更加森严。于是，当卫队瞥见意大利摄制组正准备拍摄时，便急匆匆冲过来要求出示拍摄许可，其实在林荫街那一侧，摄制组已出示过一次了。真是毫无例外：只要举起摄影机镜头，不管在城市的哪个角落，一定会出现军警要求出示拍摄许可。

我正巧在这一刻赶到。我们的摄影师乌戈是个友善而果敢的小伙子，在接连不断的摄影冒险中，他能像个日本游客一般善于找乐子。此时，他一只手掏出拍摄许可给卫兵看，另一只手趁其不备，继续拍摄那名士兵。弗朗奇把我载到四个街区之外的地方，约好十五分钟后，在总统府再往前四个街区的地方接我。这是个寒冷而多雾的清

晨，典型的智利初秋天气。虽然裹着冬装外套，我还是冻得直打哆嗦。为了让身体暖起来，我随着疾步前行的人流，匆匆走过四个街区。我故意向前多走了两个街区，等待摄制组完成身份检查手续，而后折返回来，让摄制组顺利拍下我走过拉莫内达宫前的镜头。十五分钟后，摄制组收拾器材，前往下一个目标，而我步行到里克尔梅街，在地铁英雄站前搭上弗朗奇的车，我们就缓缓出发了。

拍摄森林公园所用的时间比我们预计的要短，因为再次看到它时我才意识到，我对这座公园的兴趣大多是主观的。其实这里风景很美，景致颇有圣地亚哥的特色，特别是在这个宁静的星期五，在黄叶拂动的微风里，公园显得尤其迷人。但是面对这景象，我心里最炽烈的仍是怀旧的情绪。美术学院就坐落在那里，离别故乡到首都求学不久，我曾在学院门前的台阶上表演了自己平生第一场戏剧。

后来，当我已成为崭露头角的新人电影导演，差不多每天傍晚都要穿过这座公园回家。黄昏时分树叶间的余晖，永远与我最初几部影片的记忆交织在一起。没有更多可谈的了。摄制组只拍摄了一小段我在林间漫步的镜头，在我身旁，伴着雨水的低语，树叶纷然落下。随后我径直走向商业中心，弗朗奇正在那里等我。

天气澄澈而清冷，自我归来以后，远方的山峦第一次清晰浮现在眼前。圣地亚哥坐落在山间谷地，从城里望向雪山，总隔着一道污染形成的薄薄雾霾。上午十一点，国家街已像寻常一样熙熙攘攘，许多人走进电影院观看头场放映。雷克斯影院前挂着海报，那是米洛斯·福尔曼[1]的《莫扎特传》。我实在想看这部电影，有不惜一切代价的冲动。我费了好大心力才忍住，没有进去。

街角偶遇：我的岳母!

在前几天的拍摄中，我曾看到不少熟人从我身旁经过：记者，政客，文化人士。在我印象里，没人特意看我，这样一来我对自己的外形又信心倍增。但在那个星期五，迟早要发生的还是发生了。一位气质不凡的女士朝我迎面走来，她身着奶油色斜纹两件式衣裙，没穿外套，仿佛是在夏天一样。相距不到三米远时，我才认出她来——那是我的岳母莱奥。差不多六个月前，我们在西班牙刚见过面，她对我太熟悉了，不太可能近在咫尺而认不出我来。我当即想转身往回走，但又想到他们提醒过我，要克服这种本能的冲动，因为很多秘密潜入者不会从正面被识破，却往往从背影露出马脚。我信任我的岳母，即便认出我来，她也不会惊慌失措，可她当时不是一个人，还挽着自己妹妹的胳膊。那是米娜姨妈，而米娜姨妈也认识我。两人正低声交谈，几乎是窃窃私语。我倒不担心遇上其他情况，我怕的是两人同时大吃一惊：她俩完全有可能激动地在大街上喊上一声“米格尔，我的孩子，你回国了，谢天谢地！”或诸如此类的话。而且，得知我秘密入境，也会将她们置于险境。

我别无选择，只得继续往前走，尽量集中精神注视着她，万一她认出我来，我好能立即稳住她。但她走过时，只是抬眼看了我一下，触碰到我那直勾勾的吓人的目光，却没有停止与米娜姨妈交谈，短暂一瞥间，并没有认出我。擦身而过时，我们离得那么近，我能闻到她的香水味，瞧见她美丽温柔的眼睛，还清楚地听见她说：“……孩子长大了麻烦就更多。”但是，她继续往前走了。

不久前，我从马德里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们曾在街上偶遇，她诧异于自己竟毫无察觉。但对我而言，那是一场扰乱心神的突发事件。受到这件事的震动，我想找个地方平复一下，于是钻进了一家小电影院，里面正在放映意大利电影《幸福岛》，一部彻头彻尾的情色片。我在里面待了十几分钟，望着银幕上的英俊男子和异常美丽开朗的女人手挽着手，在天堂某个角落一个骄阳灿烂的日子双双跳进大海。我甚至都没想集中精神看电影。不过，黑暗能帮我冷静下来。到此时我才意识到，前几天的日子是多么按部就班、波澜不惊。十一点一刻，弗朗奇从国家街和林荫街的转角把我接上车，载我到下一个拍摄点：马波丘桥。

马波丘河流淌在铺满鹅卵石的河床上，穿城而过。河上有几座很别致的桥，精巧的钢铁结构让桥梁能经受地震而不倒。在旱季，正如当时的情况一样，河床收缩成一道湿泥沟，中间的水流仿佛被围堵在破烂的棚屋之间。到了雨季，山洪汇入河流，泛滥出堤岸，棚屋漂浮在水面，仿佛泥泞之海上的一艘艘小船。军事政变发生后的几个月内，军警巡逻队数次夜袭城郊社区，即圣地亚哥城外有名的棚户区。马波丘河漂荡着被虐杀者的遗体，一时恶名远扬。但这几年来，河上的惨剧变成了一群群饿殍与野狗、秃鹫争食，抢夺从大众市场扔进河里的残羹冷炙。军事委员会在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们的“天启神授”下炮制了所谓“智利奇迹”，而上述这一幕正是奇迹的阴暗面。

直到阿连德执政时期，智利虽算不上富裕，但即便保守的资产阶级也把简朴视为民族美德。军政府为了制造迅速繁荣的表象，凡是阿连德时期收归国有的产业全都被私有化，将整个国家贩卖给了私人资本和跨国公司。结果，令人眼花缭乱而无用的奢侈品充斥市场，装饰性的公共工程随处可见，制造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幻象。

短短五年里，进口商品比此前两百年的总和还多，这些商品都是国家银行用去国有化得来的财力做抵押，大肆借贷美元而购买的。美国和国际信贷机构协力合谋。但到了该还债的时候，现实显露了本相：持续了六七年的繁荣幻象一夕瓦解。智利的外债，在阿连德执政的最后一年是四十亿美元，而现在几乎达到了二百三十亿美元。只要到马波丘河岸边的大众市场走一走，就能感觉到消耗掉的一百九十亿美元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代价。军政府制造的奇迹让少数富人越发富有，却让其余智利人越发穷困。

这座桥见证了一切

然而，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典当中，马波丘河上的雷柯莱塔桥宛如一位中立的情人：既为市场服务，也供殡葬使用。白天，送丧的队伍不得不在人群中冲开一条路；晚上，实施宵禁制度以前，这座桥又是通往探戈俱乐部的必经之路。那是城郊贫民的怀旧之所，其间最出色的舞者是那些掘墓工人。最吸引我注意的是，那个周五，有那么多的年轻恋人挽着腰在河畔平台上散步，在墓园为死者供上的靓丽花坛前拥吻，缓缓相爱，永不止息的时间从桥下无情地流逝，他们并不为此担忧。如此盛大的热恋景象，我只在很多年前的巴黎街头见过；我印象中的圣地亚哥与之相反，似乎一直是一座情感含蓄的城市。但我此刻正在目睹一幅鼓舞人心的画面，这景象在巴黎已经一点点地淡去，我想，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再难寻觅了。我想起前些日子有人在马德里告诉我的一句话："爱在瘟疫蔓延时。"

人民团结时期之前，总穿深色正装、手握雨伞的智利男人，追逐欧洲时尚和新潮事物的女人，小推车里穿着兔子装的婴儿，这一切早已被披头士乐队带来的革新之风吹走了。随后是一股男女莫辨的潮流：所谓"无性别"风格。女士们把头发几乎齐根剪短，跟男人们一样穿上窄裆喇叭裤，而男士们则开始留长发。但所有这一切又被独裁政府虚伪的狂热风潮扫荡而去。政变最初几天曾多次发生军警用刺刀割头发的事件。为了不被刺刀剃发，整整一代人被迫剪掉了长发。

直到那个星期五，在马波丘桥上，我才发觉年轻人已经变了。我之后的一代人主宰了城市。我去国流亡时，他们不过是十岁左右的孩子，还不能理解这场灾难的烈度，而现在他们已大约有二十二岁了。

后来，我们又发现了新证据，证明习惯在公众目光下恋爱的这一代年轻人，已经懂得在他人不断的嘘声中坚持自我而不受影响。在独裁政府日渐衰朽的压抑氛围里，他们开始向他人传达自己的喜好品位和生活方式，还有对爱、对艺术以及对政治的新颖观点。任何镇压都无法阻止他们。随处可以听见音量开到最大的古巴歌手西尔维奥·罗德里格斯和巴勃罗·米拉内斯的歌，就连坐在装甲车上的警察也在听这些歌曲，哪怕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听的是什么。萨尔瓦多·阿连德时代的小学生现在已成长为抵抗运动的指挥官。这个发现很有启迪，但又令人不安。我第一次自问，我这趟怀旧之旅的收获到底还有没有价值。

疑惑给了我新的刺激。为了完成当天的拍摄任务，我快速登上圣克里斯托瓦尔山，而后又探访了圣方济各教堂。暮色给教堂的砖石镀上了一层金。这之后，我请弗朗奇到酒店取出我的旅行包，并吩咐他三个小时后再到雷克斯影院门口接我，而我去那儿观看了《莫扎特传》。此外，我还让他转告埃莱娜，我们将要消失三天。再没留下别的信息。这种做法违背了约定好的规矩，埃莱娜本该时时刻刻了解我的行踪，但我没法这样约束自己。我和弗朗奇将乘坐当晚十一点的火车出发，前往康塞普西翁待上一段足够长的时间，没有知会其他任何人。

---

[1]米洛斯·福尔曼（Miloš Forman，1932—2018），捷克电影导演，代表作《飞越疯人院》《莫扎特传》《月亮上的男人》。

第五章　大教堂前的自焚者

尽管我的说法有理有据，听起来不容置疑，但这到底是个异想天开的念头。在我看来，到智利内地旅行，乘火车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能避开机场和公路上许许多多的关卡。此外在列车上还能享受夜晚的时光，因为在城里，宵禁一到，晚上只能无所事事。然而弗朗奇不以为然，他知道火车是受监控最严的交通工具。对此我反驳说，正因如此，坐火车才最安全，因为警方永远想不到，一个秘密潜入者会跑到被严密监控的列车上。弗朗奇的看法再次跟我针锋相对，他认为警察早就料到潜伏者可能会搭乘火车，因为谁都懂得最危险的地方也最安全；他还提出，一个在欧洲经营着大笔买卖且处事老到的广告业富商，乘坐舒适的高级列车出差还说得过去，但绝不会乘坐智利内地那种简陋的破火车。不过，我最终还是把他说服了，理由是无论是去赴约或拍摄，乘坐飞机去康塞普西翁都不是最安全的选择，因为这段时日常有大雾，飞机不易降落。说实话，无论如何我都更倾向于坐火车，因为对乘飞机，我总怀有一种无法克制的恐惧。

于是当天夜里十一点，我俩在中央车站上了车。中央车站的钢架结构与埃菲尔铁塔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得难以言表。我们在列车卧铺车厢一间舒适干净的隔间里安顿下来。我饿得要命，当天早餐以后我几乎什么都没吃，除了在电影院买了两个巧克力棒聊以充饥——啃巧克力棒时，银幕上的青年莫扎特正在奥地利皇帝面前像杂技演员似的表演跳跃。检票员告知我俩，只能在餐车就餐，但按照规定，餐车和卧铺车厢之间是分隔开的，走不通。他自己倒是出了一个主意：可以

在开车前跑到餐车上，能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等一个小时，当列车停靠在兰卡瓜站时，再从餐车返回卧铺车厢。听完这番指导，我们赶紧照办，因为宵禁铃已经响了。检票员在一旁高声催促：“赶紧跑，先生们，赶紧呀，咱们在干违法的事呢。”不过，当列车到达兰卡瓜站，站台上的警卫昏昏欲睡、寒冷难耐，对这类被默许的、无法避免的破坏军管法的行为，根本漠不关心。

那是一座清冷而空寂的站台，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周笼罩着鬼气森森的雾霭。那场景跟电影里偷渡者逃离纳粹德国时途经的车站一模一样。乘务员正催促我们尽快返回自己的车厢，猛然间，一个身穿寻常白色工作服的餐厅服务生，手捧一盘煎蛋配米饭，倏地冲到我们前头。他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往前跑了五十多米，手里的餐盘竟然稳稳当当，神奇地保持了平衡。他跑到最后一节车厢的某个车窗前，隔着窗口把米饭递了进去，那位乘客显然花钱订了餐。还没等我们走到卧铺车，服务生已钻回餐车去了。

驶往康塞普西翁的五百多公里，都是在绝对死寂中度过的，仿佛戒严令不仅限制了这趟梦游列车上的所有乘客，还压抑着自然界的一切生灵。有几回我探头窗外，但隔着浓雾，目之所及只有空旷的车站，空旷的田野，这片杳无人烟的国土上的空寂长夜。唯一能证明大地上还有人类存在的，便是沿着铁道无穷无尽布满尖刺的铁网，而铁网后面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没有鲜花，没有动物，空无一物。我想起了聂鲁达的诗：“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有面包、稻米、苹果；在智利，只有铁网、铁网、铁网。”早晨七点钟，铁网仍不见尽头，列车已抵达康塞普西翁。

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前，我俩觉得不妨找个地方刮刮胡子。于我自己其实不成问题，我倒乐意利用这个借口让胡子再长出来。不利

之处是，街上的警察瞧见我俩的邋遢模样会怀疑我们是逃犯，因为所有智利人都知道，康塞普西翁这座城市是所有重大社会斗争的舞台。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就酝酿于此；在这里，萨尔瓦多·阿连德获得了总统大选中决定性的支持；也是在这座城，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1]在一九四六年掀起了血腥镇压，不久又设立了皮萨瓜集中营，一个叫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青年军官在那里学到了他后来擅长的那套恐怖和死亡的手艺。

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广场上永恒绽放的鲜花

乘坐出租车前往市中心的路上，透过凛冽的浓雾，我们看见了大教堂中庭前孤零零的十字架，十字架前摆放着一束不知什么人送来的鲜花。两年前，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在十字架前自焚。此前，国家情报中心以非法私藏武器罪逮捕了他二十二岁的儿子和二十岁的女儿。他各处求告，要求停止对两个孩子的严刑折磨，直到自焚前都毫无结果。

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发出的不是哀求，而是警告。因为正值总主教出访，他就跟主教府的官员交谈，跟当地最有影响力的报刊记者交谈，跟政党党魁交谈，跟工商界领袖交谈，跟任何愿意倾听的人交谈，甚至连政府官僚也不放过。跟所有人交谈时他都是一句话："如果你们不设法阻止他们拷打我的两个孩子，我就往自己身上浇满汽油，在大教堂前自焚。"有些人不信他的话，另一些人不知该怎么办。到了指定的那一天，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站在教堂中庭前，往自己身上浇了一桶汽油，警告聚集在街上的熙攘人群，谁要是跨过了地上的黄线，他便立刻点火。恳求、命令、威胁，全都不管用。一名警员为了阻止他自戕，跨过了黄线，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顷刻变成了火人。

他仍活了七小时，神志清醒，没有痛苦。这起事件给公众带来的震撼太强烈了，警方不得不同意让他的女儿在他死前去医院探望。但医生们不愿叫女孩看见她父亲的惨状，只允许父女俩隔着对讲机交谈。"我怎么知道你就是坎德拉利娅？"听到女孩的声音后，塞巴斯蒂

安·阿塞维多问。于是女孩说出了她还是小姑娘时父亲给她起的乳名。之后，两兄妹终于从秘密刑讯室里被放出来了，因为他们的父亲以命抗争，两兄妹才得以被移交到正规法庭听候判决。自此以后，康塞普西翁的市民们给这座发生自焚事件的广场起了个秘密的名字：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广场。

在康塞普西翁，刮胡子绝非易事！

早晨七点闯入历史重镇，想伪装成两个资本家，却满脸胡茬——这种冒险不值得一试。此外，谁都晓得，这个时代的广告商出差总要随身携带记录想法的袖珍录音机，手提箱里也必定装有电动剃须刀，以便赴约谈生意前，在机场、火车站或轿车上刮刮胡子，拾掇一番。不过，在康塞普西翁，某个寻常星期六的早晨七点，找人帮忙剃须修面，应该算不上是很大的风险吧。我最开始尝试的是武器广场旁仅有的一家在这个钟点开门营业的理发店。店门前挂着“男女皆宜”的招牌。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姑娘正在清扫大厅，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旁边的男孩跟她年龄相仿，正在打理化妆台上的瓶瓶罐罐。

“我想修面。”我说。

“不行，”那男孩说，“我们这里做不了这个。”

“那么，哪家店可以？”

“往前走，”他说，“前面有好几家理发店。”

我往前走了一个街区，弗朗奇刚巧在那个街区办理租车，我瞥见两个警察正围着他检查证件。他们瞧见我走过来，也要求我出示证件。检查不仅没出纰漏，结局还很圆满。弗朗奇继续办理租车手续时，一个警察陪着我往前走了两个街区，找到另一家开门营业的理发店，他这才跟我握手道别。

这家店门上也有“男女皆宜”的牌子，跟第一家理发店一样，里面也有一男一女，男人在三十五岁上下，姑娘稍微年轻些。男人问我要不要理发，我回答说：“我想修面。”两人听闻后惊讶地望着我。

“不行啊，先生，我们这儿没这项服务。”

“我们这儿是‘男女皆宜’的理发店。”女孩说。

“好吧，”我对他们说，“就算‘男女皆宜’，给顾客修个面也没问题吧。”

“先生，不行的，”男的说，“我们做不了。”

两人背转过去，不再搭理我。穿过叫人心情压抑的浓雾，我沿着空荡荡的街道继续往前走。让人惊讶的不仅是康塞普西翁有那么多家“男女皆宜”的理发店，还有它们完全一致的经营方针：没有一家愿意给我修面。我在迷雾中游荡，有个小男孩从街边走过，问我，“先生，您在找什么吗？”

“对，”我告诉他，“我在找理发店，但不是‘男女皆宜’的，而是原来那种只给男士服务的店。”

于是，男孩把我领到一家传统的理发店，门前竖着红白两色旋转立柱，屋里摆着旧时常用的那种大转椅。两位上了年纪的剃头师傅系着脏兮兮的围裙，正给仅有的一位男顾客理发。其中一个剪头发，另一个用刷子把落在脸上、肩头的碎发拂去。一进门，一股老式搽剂的气味扑面而来，混着含有薄荷醇的酒精味，还有各类药品味。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在之前那几家店里都没闻到这股气味。这是我童年的气味。

“我想修修面。”我说。

两位师傅和那位顾客，全都抬眼惊异地瞧着我。那个拿刷子的老师傅无疑提出了此时三人头脑里正琢磨的问题：

“您是哪国人？”

“智利，”我不假思索地说，但赶紧纠正，“不过我是乌拉圭人。”

后面的纠正比前面说错的话更糟糕，不过，他们都没注意到，而是提醒我，在智利很多年前就不用“修面”这个词了，而是说“刮胡子”。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吧，那些在“男女皆宜”的新派理发店工作的年轻人，听不懂我们老一辈智利人才用的过时话。在这家理发店则正相反，他们很高兴有人像从前他们生意好的时候那样讲话。手里没活的那位师傅引我坐到理发椅上，按照我熟悉的老规矩把理发围布系到我脖子上，打开一把生了锈的剃刀。那位师傅少说也有七十岁了，似乎过惯了苦日子，高个子，肌肉松弛，白发苍苍，他自己应该也有三天没刮过胡子了。

“用热水还是用凉水刮？”他问我。

他双手颤颤巍巍，几乎拿不稳剃刀。

“当然用热水。”我回答。

“这位先生，那咱们可就难办了，”他说，“因为我们店里没热水，只有透心凉的冷水。”

于是我又返回第一家“男女皆宜”的理发店，跟他们说要“刮胡子”而不是“修面”，一听这话，他们立马就给我服务了，但条件是必须

要理发。我同意后，小伙子和小姑娘原先那种无所谓的神情一扫而空，立即开始操持那套冗长的职业程序。女孩把毛巾围在我脖子上，用凉水给我洗头——因为这家店同样没有热水。然后那姑娘问我，是否需要三号、四号或是五号配方的面膜，要不要选用一种治疗秃顶的药水。依照程序，我任由她做完了一切步骤，可等到给我擦干脸的时候，那姑娘突然愣住了，自言自语道："真奇怪！"我慌忙睁开双眼，问她："怎么了？"她的表情比我更茫然无措。

"您拔过眉毛！"她说。

她的发现让我不悦，于是我决定讲一个此时能想到的最突兀的笑话。我幽幽地白了她一眼，而后问道：

"你对同性恋有偏见吗？"

她的脸唰地红到了脖子根，一个劲儿地摇头。然后男理发师过来接手，尽管我给了很多细致、精确的指点，他还是把我的头发剪得过短了，还用另一种方式梳了头，结果把我变回了米格尔·利廷。这是难免的，巴黎的化妆师故意违背我头发的自然走向来梳理，康塞普西翁的理发师当然不会这样做，而是把发式还原了。我并不担心，因为只消用另一个我的方式梳头就是了，这很容易，我也的确这么做了。不过，我费了很大气力才压制住回归自我的念头——在这座雾气重重的边远城市，断乎没人会认出我。头发剪完了，那位姑娘把我领到店内里间，小心翼翼地，似乎在做什么违法的事一样，在镜前插座接上电动剃须刀的电源线，而后把剃须刀递到我手上，让我自己刮胡子。幸好，这样不需要热水。

地狱里的爱情天堂

弗朗奇已经办好了租车手续。我俩从冷饮柜里各拿了一罐冰咖啡，权当早餐，因为这里还是没热水。然后我们驱车驶过比奥比奥河上的一座大桥，前往洛塔- 施瓦格煤矿矿区。比奥比奥河是全智利水量最丰沛的河流，隔着雾气几乎望不见桥下的河床，只听见流水淙淙，发出让人困倦的金属音。十九世纪，智利作家巴尔多梅罗·利略详实地记述了煤矿的景象和矿工的生活，他笔下的纪实文字今天看来仍跟现实没有太大出入。进入矿区，不论是空中充满油烟的雾霾，还是那种几乎处于前工业革命时代的劳动条件，都让人想起一百年前的威尔士。

进入矿区前，要经过三道岗哨，接受警察检查。正如我们所料，突破第一道关卡最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当警察质询我们到洛塔- 施瓦格做什么时，我们费了好一番唇舌才解释明白。不过，我能对答如流，自己都有点惊讶。我解释道，我们此行是来自然公园观光——它算得上整个美洲最漂亮的公园之一——古老高大的南美杉闻名遐迩，雕塑群新奇罕见，还有象征命运的孔雀和黑颈天鹅在其间闲庭信步。我们要借用这片风景名胜拍一部广告片，向全世界传扬南美杉的美名，推出一款同名香水，向这片田园牧歌般的土地献礼。

没有哪位智利警察能抵挡这冗长的解释，特别是言辞间还如此夸张地盛赞了他祖国的美妙风光。警察当即表示欢迎，可能还把我们到访的消息通知了第二个检查岗哨，因为经过那里时没有查验证件，却搜查了手提箱和汽车。唯一引起他们兴趣的是那台超8毫米摄影机——虽然不是什么专业型号——因为在矿区拍摄是需要书面许可证的。我

俩对检查者声明，只想开车到山顶上瞧一瞧有雕像和天鹅的公园；最后，我试图用流露贵族派头的冷漠态度结束这番辩白。

“我们对穷人不感兴趣。”我告诉他们。

一位警察心不在焉地检查他碰到的每一件物品，没抬眼回答我说：

“我们这里都是穷人。”

警察搜查完毕，表示满意。半小时后，我们爬上陡峭而狭窄的山间小道，没受到任何繁冗手续的骚扰就驶过了第三个岗哨，终于抵达了公园。公园是一处奇特的所在，著名的酿酒商堂马蒂亚斯·科西尼奥为他心爱的女人修造了这个地方。为讨佳人欢心，他把全智利各地的珍稀树种汇聚于此，此外还弄来了各色神奇动物，请人雕塑了代表欢乐、忧伤、思念与爱情等心理状态的难以考证的女神像。公园深处有一座童话般的宫殿，从宫殿平台上可以眺望太平洋，直到世界的另一边。

整个早晨我们都拿着超8毫米摄影机拍摄之后摄制组计划取景的地方，此时他们正在办理许可证。就在我们刚开始拍摄时，一名警卫走过来说，这里严禁拍摄，连最普通的照片也不行。我们把计划拍摄一部广告片向全世界做宣传的故事重讲了一遍，可警卫仍旧要我们遵守规定。不过，他倒是提议陪我们到底下的矿区，直接向他的上级提出申请。

“我们现在不拍了，”我对他说，“你要是愿意，可以跟我们一块儿走，这样你更放心。”

他同意了，我们又跟他重新游览了一遍公园。他年纪不大，面容愁苦。弗朗奇一直跟他交谈，我则是不得不开口时才搭一句腔，免得暴露了蹩脚的乌拉圭口音。有一会儿，警卫想吸烟，我们就把身上的香烟全塞给了他。于是他就留下我俩单独拍摄，直到我们认为该拍的全都拍完了，才停歇。不只拍摄了上层公园，还拍摄了下面的矿区外景。我们明确了感兴趣的机位、角度、镜头、距离和大公园的整体外景，还有下面矿区里矿工和渔民杂居共处的艰苦环境。天堂和地狱并列在眼前，几乎叫人难以置信，但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海鸥栖息的餐吧

我们下山时已是午后，正赶上汽船出海。这些汽船每天都要载着携带破旧家什、炊具和家禽的一家老小，跨过危险可怖、翻滚黑色巨浪的大海，到附近的圣玛利亚岛上去。煤矿坑道深入海底，在那里，数以千计的矿工在悲惨的条件下整日劳作。外面，坑道入口，数百个男人和领着孩子的妇女像鼹鼠似的刨地，想用指甲抠出一点煤渣。山上，公园里树木蓊郁，氧气充足，空气纯净而新鲜。山下，人们只能在雾气中呼吸着煤烟，不仅肺部生疼，支气管还会有煤烟沉积。从山上眺望，海洋美得超乎想象；可从山下看，洋流浑浊，轰然作响。

这里曾是萨尔瓦多·阿连德政治力量与情感力量的一座重要堡垒。一九五八年爆发的著名的“矿区进军”事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矿工们组成紧凑而沉默的游行队伍，黑压压一片，高举旗帜和横幅，通过比奥比奥大桥，占领康塞普西翁，以斗争的决心向当时的旧政府发出挑战。智利导演塞尔西奥·布拉沃的影片《人民的旗帜》记录了这一场景，这部片子是智利最激动人心的纪录片之一。阿连德当时就在现场，我想，正是在那一刻，他终于赢得了全体人民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长久支持。后来，在他担任总统后，最初的一次巡访就是在洛塔广场与矿工们对话。

我当时也在总统随行人员之列。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像阿连德那样一个年过六十仍自称保持着青春活力的人，那天却发自肺腑地说：“我已度过了青年时代，现在差不多是个老人了。”那些形容憔悴、备受摧残、沉默寡言的矿工们，多年来被兑现不了的承诺深深伤害，那天却毫无保留地与总统交谈，成为他胜利的坚实堡垒。正如那

天他在洛塔- 施瓦格做出的承诺一样，他入主政府后最早的政策之一，便是将矿业国有化。而皮诺切特则是让矿业重新私有化——私有化是他针对一切部门的政策，包括墓地、铁路、港口，甚至是垃圾回收。

完成矿区拍摄计划后，下午四点，我们途经塔尔卡瓦诺返回康塞普西翁，一路上没碰到军方或民政部门的任何阻挠。下班回家的矿工们推着独轮车，车上载着从矿上废料中拣出的煤渣。想在浓雾中驾车穿过独轮车队与矿工人流并不容易。鬼魅一般的瘦小男人，矮小却强壮的妇女，肩扛沉重的煤渣袋子，这些梦魇中走出的形象在黑暗中骤然显影，车灯几乎无法将他们的轮廓照亮。

塔尔卡瓦诺是培养士官生的海军学校所在地，是智利主要的军港，这里的造船业也相当发达。政变发生后的几天里，这座城市被选为押解政治犯前往地狱般的道森岛的集结地，因而变得恶名昭彰。城市街头聚集着衣衫破烂的矿工，也能看见身穿雪白制服的年轻士官生。这里的空气被鱼粉厂的腥臭味、造船厂的沥青味和海水的腐臭味所侵染，叫人难以呼吸。

情况跟我们预想的完全相反，针对旅客的军事管制并不存在。大部分房屋都黑洞洞的，只有几扇窗户里透出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的煤油灯光。自从早餐喝了冰咖啡以后，我们还没吃过任何东西，因此当始料未及地遇到一间灯火通明的餐吧时，几乎把它当作童话里的幻景。尤其在发现室内满是从海边平台飞进来的海鸥时，幻景的感受便更强烈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海鸥，更没见过这么多海鸥从暗处飞来，在无动于衷的顾客头上乱撞，仿佛失明般，晕头晕脑地在各处发出剧烈的碰撞声。我们在晚餐时分才吃上早饭，品尝着诞生于史前时代的智利海鲜，盘中海产还带着冰冷深海的余味。就餐后我们驾车返

回康塞普西翁。开往圣地亚哥的列车已经开始启动的时候我们才赶上车，因为租车公司关门了，到处找人还车差不多耽误了四个小时。

---

[1] 加夫列尔·冈萨雷斯·魏地拉（Gabriel González Videla，1898—1980），智利第24任总统，1946年至1952年执政。

第六章　两位永垂不朽的逝者：阿连德和聂鲁达

智利都市外围，那些规模庞大的贫民窟叫作“棚户区”，某种意义上，这些地区也是“被解放的领土”——正如阿拉伯城市里的“卡什巴赫”。棚户区居民饱经贫穷历练，发展出一套惊人的、迷宫般的文化。警察和军队若非考虑再三，绝不敢贸然进入这片穷人的蜂巢：在这些街区，一头大象都能消失得无影无踪，入侵者必定会碰上最独特也最灵活机动的抵抗，老套的镇压手段将无处施展。民主制选举期间，这一历史条件让棚户区成为最关键的活动据点，因此，它们历来叫政府头疼不已。对我们而言，棚户区同样关键，因为我们要用纪实电影手法捕捉群众对独裁政权抱有怎样的态度，对萨尔瓦多·阿连德又怀有怎样鲜活的记忆。

首先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对眼下与独裁者缠斗的国内年轻一代来说，流亡领袖的鼎鼎大名没什么意义。他们当然是英雄传说里的主人公，但对当下现实没太大影响。虽然听上去有些矛盾，但这一点恰恰是独裁政府最严重的败笔。本届政府上台之初，皮诺切特将军宣称他的意志是持续掌握政权，直至把民主体制的最后痕迹从未来几代人的记忆里抹除干净。然而，他万万没料到，自己的政权反成了这种灭绝企图的牺牲品。不久前，一群智利年轻人仅凭石块在街头与警察对峙，这个群体搞地下武装斗争，参与秘密政治活动，想建立一个他们自己尚不清楚的新政体。年轻人的激进势头让皮诺切特震怒，他气急

败坏地叫嚷，说年轻人之所以激烈反对他，是因为他们对智利的民主一点儿概念也没有。

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名字支撑着历史。在棚户区，对记忆中的阿连德的崇敬已经到了神化的程度。首先，我们最感兴趣的方面，是了解人们的生活状态、对独裁的厌恶态度，以及他们富于想象力的斗争方式。有关这一切，受访者都由衷而坦率地回答，但答案总是离不开对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怀念。各式各样的证词可归结为一句话："我一直投票给他，从来不投其他人。"正因如此，阿连德一生中多次成为总统候选人。最终当选前，他曾开玩笑说，将来自己的墓志铭不妨用这句话："这里安眠着萨尔瓦多·阿连德——智利未来的总统。"虽然连续四次被提名总统候选人后才最终当选，但阿连德此前也曾担任众议员和参议员，并多次连选连任。不仅如此，在漫长的议员生涯中，他曾担任过智利这个狭长国度北起秘鲁边疆、南至巴塔哥尼亚的众多省份的候选人。因此，他不仅了解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土地上的居民、居民的多种文化以及他们的苦难和梦想，也让全国人民都熟识了血肉鲜活的他。跟那些只在报纸和电视上露面或仅在广播里夸夸其谈的政客不同，阿连德的政治生活在平民百姓家展开，他挨家挨户巡访，与人们直接而亲切地交流，这种做法和他的实际职业"家庭医生"是一致的。他能洞悉人心，在政坛又有种近乎动物本能的直觉，这唤起了人们对他不易厘清的复杂情感。阿连德担任总统后，某次游行中，一位男子高举一块不寻常的标语牌站到总统座席前方，牌上写道："本届政府烂得像屎，但它是我的政府。"阿连德站起身为他鼓掌，走下来与他握手。

在我们长途跋涉全国的行程中，没发现有哪个地方未曾留下他的痕迹。总能听到关于阿连德的掌故：有人说阿连德跟他握过手，有人

说阿连德是他儿子的教父，有人说阿连德从他家庭院摘下树叶，熬成汤药替他治好了严重的咳嗽，或是为他谋了一份工作，又或是替他赢了一盘棋。阿连德碰过的东西全都变成了人们悉心保留的圣迹。在我们未曾留意的地点，人们会指着一把比其他器物保管得更精心的椅子，说道：“他曾在上面坐过。”或者拿出几件小手工艺品给我们瞧：“这是他送我们的礼物。”一位十九岁的姑娘，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当时也怀有身孕，她告诉我们：“我总是教育我儿子谁才是总统，尽管我自己不怎么了解他，他逝世时我才九岁。”我们问她，还有哪些印象？她回答说：“那时我和我父亲在一起，我看见他站在阳台上演讲，挥动着一条白手绢。”在一间悬挂着卡门圣母画像的房子里，我们问女主人，当年是否曾是阿连德的支持者，女士回答说：“不能说曾是，现在仍然是。”言毕她取下圣母像，后面藏着一张阿连德肖像。

他执政期间，民间市场上曾出售他的小型胸像，现在，这些胸像被供奉在棚户区各家各户的小祭坛上，祭坛边摆着花瓶和许愿灯。人们心中对他的追思持续高涨，这些人当中有曾四次给他投票的老者，也有人投过三次，还有在他最终当选那次助他一票的人，甚至连孩子们也经由别人讲述的历史而得知了他的故事。接受我们采访的好几位妇女异口同声地说：“阿连德是唯一谈到妇女权利问题的总统。”不过，人们很少直言他的姓名，只是说“总统”怎样怎样，仿佛他还在任上，仿佛他是唯一的总统，仿佛人们在等待他归来。留在棚户区居民的记忆里的，远不止他的形象，还有他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住房和食物没那么重要，我们想要他们交还的是尊严。”棚户区居民如是说，随后具体补充道：

“我们最想要的是两样被他们夺走的东西：发言权和投票权。”

两位虽死犹生的逝者

在瓦尔帕莱索，能感受到对阿连德更炽烈的崇敬。在这座熙熙攘攘的港口城市，他出生、成长，为日后的政治生涯做准备。在城中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鞋匠家里，他读到了第一批理论著作，也染上了对国际象棋终生的痴迷。他的祖父拉蒙·阿连德是智利第一所世俗学校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智利第一所共济会堂的奠基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后来在那里晋升为最高等级的大师。他一生值得追忆的政治活动最早发生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十二天”时期，传奇人物玛尔马杜克·格罗夫[1]策划了这场运动，此人的弟弟娶了阿连德的姐姐。

奇怪的是，独裁政府竟准许将阿连德下葬在瓦尔帕莱索，毫无疑问，这正是他本人所期待的长眠之地。没有讣告，没有葬礼，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夜里，空军一架旧式直升机将遗体运送到这座城市，一路上南方凛冽的寒风从裂缝灌进机舱。陪伴遗体旁边的只有他的妻子奥尔滕西娅·布思和他的妹妹劳拉。军事委员会情报局的一位前成员跟随首批突击队员冲进了拉莫内达宫，他向美国记者托马斯·豪瑟透露，自己见过总统的尸体：“头颅炸开，脑浆溅在地面和墙上。”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总统遗孀要求看一看躺在棺椁里的丈夫的遗容时，军官们拒绝掀开遮挡，只让她见了一具布单覆盖的人形。阿连德被安葬在圣伊内斯墓地的玛尔马杜克·格罗夫家族陵园里，墓前除了他遗孀摆放的花束再无他物，花束缎带上写道：“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长眠于斯。”独裁政府原以为用这个方法能冲淡民众的追悼，但这是徒劳的。他的墓地现已成为终年无休的朝圣地，墓石上永远摆放着

无名者敬献的鲜花。为了限制祭奠活动，政府谎称遗体已迁往他处，但墓前仍是鲜花常新。

另一位继续受新一代崇敬的人物是巴勃罗·聂鲁达，到海滨黑岛故居纪念他的人络绎不绝。虽名为“黑岛”，但这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居所既不在岛上，也非黑色。这里原本是从瓦尔帕莱索出发、沿圣安东尼奥公路向南四十公里处的一座渔村，村中有参天松柏间黄土铺就的小径，有时常掀起巨浪的绿色海面。巴勃罗·聂鲁达在黑岛有一所房子，那里现今成了全世界恋人的圣地。当意大利组还在瓦尔帕莱索拍摄最后几组镜头时，我和弗朗奇先一步赶到，提前制定拍摄方案。值勤警察给我们指点方位，告诉我们哪儿是木桥，哪儿是旅馆，哪些是聂鲁达诗句里描写过的地点，可最后他却告知我们，故居不准参观。

“可以在外面瞧瞧。”他说。

在旅馆等待摄制组到来的这段时间，我们领悟到诗人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黑岛的灵魂。当他还在世时，这里住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他们手中唯一的导游书就是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他们别无所求，只期望有机会偶遇诗人，或请他亲笔签名，留下黑岛旅行的回忆，就心满意足了。那段日子里，旅馆是个欢闹而嘈杂的地方，聂鲁达时不时现身，身穿色彩花哨的披风，头顶安第斯便帽，身躯庞大，行动迟缓，仿佛教皇一般。他到旅馆来要么是打电话——他怕受打扰，把自家电话拆掉了——要么是来找旅馆老板娘堂娜埃莱娜商量当晚在他家给来宾们准备什么样的晚宴。据说旅馆餐厅水准颇高，因为聂鲁达自己也是世界级的美食专家，能像专业大厨那样亲手烹饪佳肴。他对宴饮礼数非常挑剔，摆桌的细枝末节都不容马虎，会多次更换桌布、杯盘、餐具，直到与当晚菜肴搭配妥帖。他死后十二年，这一切都被萧索之风涤荡得干干净净。堂娜埃莱娜忍受不了怀旧的折

磨，迁居圣地亚哥，小旅馆几近破败。然而，伟大诗作终归留下了一点痕迹：最近一场地震之后，黑岛每隔十到十五分钟就能感觉到大地的震颤，夜以继日，从不间断。

黑岛大地每时每刻都在震颤

我们走到松林浓荫掩映下的聂鲁达故居前。故居被大约一米高的木栅栏围住，这原本是诗人修建以保护私人生活的，如今，木板上已长出花朵。一块告示牌提醒游人，房子已被警方密封，严禁入内，严禁拍照。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巡逻警察走到跟前，他说得更明确："这里禁止一切行为。"由于我们抵达前早就知道是这样，便令意大利摄影师提着笨重又显眼的设备，存心让检查岗哨没收，而实际暗中夹带一台更便携的摄影机。此外，摄制组分乘三辆汽车，为的是在拍摄过程中就能把胶片送往圣地亚哥，假使我们被扣住，损失的也不过是正在拍摄的素材。倘若发生意外，他们就装作不认识我，我和弗朗奇只是两名不相干的无辜游客。

门从里面锁住了，窗户也用白色窗帘遮挡住。入口的旗杆上没有挂旗，因为原先升起旗帜表明诗人在家。不过，在这片凄惨景象中，花园里的盛况倒是引人注目，不知是谁把花圃打理得这样好。聂鲁达的妻子玛蒂尔德在我们成行前不久去世了。军事政变后，她就带走了家具、书籍以及诗人在漂流的一生中收集的所有神圣和富于个人趣味的收藏。诗人在世界不同地方有几套居所，风格都不算简洁，更确切地说，装饰繁复而夸张，令人炫目。大自然的激情被诗人捕捉，不仅融入他的诗作佳篇，还寄托于其收藏的奇特海螺、船首像、梦魇般的蝴蝶、异国情调的杯盏。在诗人的某一栋房子里，你会突然在书房中央撞见一匹已制成标本但仍栩栩如生的马。在他了不起的创造执念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写诗，而成就不那么显著、辉煌的，则是他随意改造房屋结构的任性之举。有套房子的改造很有创意，从客厅到餐

厅必先到庭院里转一圈。诗人还备有雨伞，好叫客人不必因为到餐厅吃饭而淋雨着凉。这些荒唐事，没有人比他自己更自得其乐了。他的几个委内瑞拉朋友劝他，怪癖招致厄运，这些收藏品不吉利，可能让主人倒霉。听闻此言，他笑得差点背过气，反驳道，诗歌能破解一切厄运，而他用整整一屋子的骇人收藏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他的主要居所在圣地亚哥的拉普拉塔侯爵街上。军事政变几天后，他白血病旧疾复发，加之悲郁过度，在圣地亚哥的寓所逝世。寓所被负责镇压的军警分队劫掠，士兵们用他的藏书在花园里点起火堆。聂鲁达在巴黎为人民团结政府担任驻法大使期间，用诺贝尔奖奖金在诺曼底购置了一栋附属于古城堡的老马厩，将其改造成居所。那房子坐落在开满红莲花的水塘边。室内屋顶高挑，仿佛教堂的拱顶，诗人穿着长袍坐在床边接待访客，如主教般威严。阳光透过几扇玻璃彩窗照进来，在诗人周身洒上缤纷的色彩，熠熠生辉。他享受这栋房子的时光不到一年。

不过，在聂鲁达的读者看来，黑岛的房子跟他的诗作更相配。即便诗人去世后，房子处在无人看管的弃置状态，仍有新一代的爱慕者前来参观，而诗人在世时，这些年轻人都还不满八岁。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在门户紧锁、阻人擅入的栅栏上画上一颗颗心，将名字首字母嵌进去，再刻上爱的誓言。多数誓言是同一主题的变体：*胡安和罗莎阅读巴勃罗的诗而相爱；感谢你，巴勃罗，教会我们什么是爱；我们愿像你一样爱恋*。还有一些话，警察未能阻止也没有及时擦去：*将军们，爱情永不死去；阿连德和聂鲁达虽死犹生；一分钟的黑暗不会让我们失明*。有些铭文镌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整个围栏给人的印象是，因为空间不够，几代人的文字层层叠叠写到一起去了。如果谁有耐心，能把恋人们全凭记忆写在围栏木板上的零散诗句整理出来，就

能还原聂鲁达的诗歌全集。然而，给我们此行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每隔十到十五分钟，这些文字就会随着从地心传至地表的震荡一起颤动，仿佛获得了生命。围栏想要跳脱地面，木板接合处吱嘎作响，杯子和金属器皿叮当碰撞，好像置身于一艘挺进中的游船。观者有一种印象，似乎整个世界都随着播种在住所花园里的深深爱意而震颤不已。

事实上，我们采取的所有防范措施都没必要。没人没收相机，也没人妨碍拍摄，因为警察都去吃午饭了。我们不只拍摄了事先设计的镜头，收获还比预想的要丰富。这要感谢摄影师乌戈，海上地震令他迷醉，他迎着一波波海浪，跨进齐腰深的海水里。浪涛发出远古的怒吼，不断拍击在礁石上。乌戈是在拿生命冒险，即使没有地震，桀骜不驯的大海也可能会把他甩到礁岩上。但没人能够阻止他。乌戈着魔似的盯住取景器，不受控地不停拍摄。熟悉电影这个行当的人都知道，想指挥或控制亢奋中的摄影师，那是不可能的事。

“格拉齐雅飞升上天”

正如我们之前所计划的，每卷胶片拍摄完后都被紧急送往圣地亚哥，好让当晚出发的格拉齐雅带到意大利。她的启程日期不是随意选择的。整整一星期以来，我们都在研究怎样将迄今为止拍摄的素材送出智利，虽然预先设想了几条秘密渠道，但哪套方案最保险却迟迟没能敲定。正在权衡之际，突然传来新任智利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弗雷斯诺阁下即将从罗马前来赴任的消息，他将接任年满七十五岁、即将荣休的席尔瓦·恩里克斯主教。席尔瓦主教是团结圣公会的灵魂人物，大众对他充满感戴之情，教士阶层也因他的激励而充满斗争觉悟，这使得独裁者不得不放弃幻梦。

确乎如此。在最贫困的棚户区，有些神父甘愿做木匠、瓦工、手工艺人，与普通居民一起胼手胝足地劳作，甚至还有些神职人员由于参加街头抗议而被警方杀害。政府迎接新主教的兴致原本似乎没那么高——新主教的政治态度还是个谜——相较而言，席尔瓦·恩里克斯主教卸任却让独裁者欣喜雀跃，政府于是批准戒严管制暂停数日，并呼吁所有官方媒体发布盛情欢迎弗雷斯诺主教驾临的新闻。与此同时，以防万一，皮诺切特将军将与家人及一批未透露姓名的年轻部长到智利北方巡视两周。显然他本人或任何一位部长都不宜出席效果难料的迎接仪式。由于相互矛盾的官方决策使人们感到困惑，在城里，实际能容纳六千人的武器广场上，仅有两千人到现场观看迎接典礼，而原先预估人数不会低于六千。

不管怎么说，可以预见，当天下午政府举棋不定，正好创造了将首批胶片送出国去的绝佳时机。我们抵达瓦尔帕莱索的同天晚上，收

到了加密的信息："格拉齐雅飞升上天。"情况是这样的：格拉齐雅到达机场时，发觉检查比往常更严格，但所幸机场也比平时更乱、更拥挤，警方反而协助她托运行李，帮她及时登上了新主教赴任所搭乘的那架班机。

---

[1] 玛尔马杜克·格罗夫（Marmaduque Grove，1878—1954），智利空军将领、政治家，1932年他策划成立的"智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仅持续了十二天。

第七章　警方虎视眈眈：包围圈开始收紧

整个周末，埃莱娜都焦急不安，因为我在康塞普西翁和瓦尔帕莱索持续拍摄期间，跟她中断了联系。万一我失踪了，她的职责是向各处告急，但她也明白，我是个无可救药的即兴表演家，所以把预先约定的告急时间往后拖延了一点。星期六一整晚她都在等。星期天，发现人还没回来，她开始联络可能知道线索的人，但毫无结果。就在她把发出警报的最后期限设定在星期一中午十二点之时，看见我走进了酒店，满腮胡茬，一脸倦容。她曾执行过许多重要而危险的任务，但她发誓说，从来没有哪一次像跟我合作时这样，替这么个不可控制的假丈夫操碎了心。这回她又有理由抱怨了，而且抱怨得天经地义。她付出了不懈努力，经过屡败屡试的多次碰头和细致审慎的规划，才最终敲定当天上午十一点，跟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的领导人秘密会晤。

这无疑是我们预先设想的所有行动里最艰难、最危险，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会晤。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几乎集结了皮诺切特政变时刚刚小学毕业的那一代人里所有的热血青年。他们主张联合所有反对派来打倒独裁，恢复民主制，好让智利人民获得决定自己命运的完整的自主权。组织名称源自一八一〇年智利独立运动当中一位富于象征意义的历史人物。这个人物似乎具有轻松摆脱国内外一切监控的超人能力，在当时的智利爱国者被镇压，保皇党重新掌权之

后，他始终在驻扎于阿根廷门多萨的独立军和智利境内秘密抵抗组织之间穿梭往来。那个历史时期的诸多因素与当代智利的情况何其相似。

采访爱国阵线领导人，是每个优秀记者梦寐以求的特权，我也不能例外。摄制组成员依照安排各就各位之后，我在最后一刻赶到约会地点。我只身一人，走到神佑街上一个公交车站前，手里拿着表明身份的信物：一份当天的《信使报》和一册《新动向》杂志。什么也不用做，我只需等待有人上前搭话：“您要去海滩吗？”我应该回答：“不，我去动物园。”这在我看来是个荒唐的接头暗语，因为深秋时节没人要去海滩，但爱国阵线的两位秘密联络员事后告诉我，正因为荒唐，才不会被别人误用或碰巧识破。这话有理。十分钟后，我开始担心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自己太过显眼了，而就在此时，我看见一个中等身材的瘦削的小伙子朝我走来，他左腿有点跛，头戴贝雷帽，我心想，一眼就能认出他是个地下党。小伙子毫不遮掩地靠过来，趁他还没说出暗语，我抢先一步开口了。

“你就不能找一套别的行头？”我揶揄道，“凭你现在的穿着，连我都一眼认出来了。”

他先是惊讶，而后忧伤地瞄了我一眼。

“那么明显？”

“一公里外就暴露了。”我说。

这小伙子风趣幽默，身上完全没有密谋者的自以为是，所以刚一接触，就缓解了紧张氛围。就在他靠近我的同时，一辆贴着面包店招牌的小货车停在我面前。我上车，坐在副驾驶位置。小货车在市中心

兜了好几圈，然后在不同的等候地点将意大利摄制组的几个成员依次接上车。随即又在五个不同地点分别将我们放下，接着用不同车辆分别将各人再度接走。最终，大伙在另一辆货车上重新碰头，而摄影机、灯光和音响设备早已装在货车上了。我并未感到自己正经历一场现实生活中的严峻冒险，更觉得像在出演一部间谍片。在兜圈子的环节，那位头戴贝雷帽、长着密谋者面容的联络员不知何时消失了，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接替他工作的是一位爱开玩笑的司机，但他工作起来却又一丝不苟。我坐在他旁边，摄制组其他成员坐在后面的载重车厢里。

“我带各位兜兜风，”他对我们说，“闻一闻智利海水味。”

他把收音机音量调到最高，开始在城里绕圈子，后来我已经不知道身在城市何处了。然而，这对他来说还不够，他喝令我们闭上眼睛，说了句我已不大记得的智利方言：“好的，孩儿们，现在该‘困觉’了。”见我们没有反应，他便直截了当地命令道：

“好啦，现在把眼睛都给我闭得死死的，我让你们睁眼再睁开，谁要是不听话，咱们今天的事就拉倒！”

他跟我们解释，平时执行特别行动，他们会带来特制的盲人眼镜，这种眼镜的外观跟普通太阳镜没区别，但戴上之后会发现不透光。不过这一趟他忘了把眼镜带来。坐在后面的意大利人听不懂他的智利黑话，我只好给他们当翻译。

“你们都睡觉吧。”我对他们说。

于是他们更犯糊涂了。

“睡觉？”

“按我说的办，”我对他们说，“躺下，闭眼，我通知你们睁眼时再睁开。”

精准测距：十首博莱罗舞曲

他们挤在一起，躺倒在货车地板上，而我继续努力辨识着货车驶过的街区，但司机毫不含糊地对我说：

“您也照办，伙计，也给我‘困觉’吧。”

于是我把后脑勺倚在座椅靠背上，闭上眼，任自己在收音机里不断流淌出的博莱罗舞曲中漂流。劳尔·楚·莫莱诺，鲁乔·加蒂卡，乌戈·罗马尼和莱奥·马里尼，那些永恒不朽的博莱罗曲啊。岁月流逝，一代人走了一代人来，但智利人对博莱罗曲的倾心，任何国家的人都比不上！每隔一段时间，货车就会停下来，接着传来一阵含糊不清的低语，然后就听到司机喊：“嘿，再会了！”我想，他肯定是在跟路线关键点的战友们讲话，汇报沿途情况。有一刻，我试图睁开眼睛，以为司机不会瞧见，谁想他早已挪动了后视镜，以便在驾驶和跟联络人交谈之余，还能用目光扫视我们。

“注意哦，”他对我们说，“只要谁一睁眼，咱们就掉头回家，兜风结束！”

我赶紧紧闭双目，开始随着收音机哼唱：“痴心献伊人，伊人知我心……”躺在货车车厢里的意大利人也跟着我唱。司机情绪高涨了。

“孩儿们，这就对啦，继续唱吧，唱得不赖。”他又说，“有我在，你们放一百个心。”

流亡之前，圣地亚哥有些地方，我闭着眼睛也能认出来：从陈年脏血的臭味，能分辨出屠宰场；从机油味和铁道建材味，能分辨出圣米格尔区；我在墨西哥旅居多年，一闻到造纸厂那不容混淆的味道，就知道离古埃纳瓦卡区的出口不远了；凭石油精炼厂的烟味，就知道到了阿兹卡波查尔科区。但那天中午在圣地亚哥，虽然在唱歌之余，我受到好奇心驱使而不断搜寻，却没闻到任何熟悉的气味。十首博莱罗舞曲播放完毕，货车停了下来。

“别睁眼，”司机急忙吩咐道，“现在我们小心地挨个儿下车，大家手牵着手，别摔坏了屁股。”

于是我们照办，开始沿一条起伏的沙土路上上下下，这条路可能相当陡，而且背阴。最后我们来到一片暗处，不那么冷了，而且能闻见新鲜海产的味道。一时间，我甚至以为到了瓦尔帕莱索的海边，但我们路上没走那么久。当司机命令我们睁开双眼时，我们发现我们五个人正挤在一个狭窄的房间里，四壁清洁，家具廉价却保养良好。在我眼前的是一个衣装考究的年轻人，他脸上相当随意地粘着一道假胡子。我忍不住笑出声。

“你得化妆得仔细点，”我对他说，“这个假胡子谁也骗不了。”

他听完哈哈大笑，随手扯去了胡子。

“刚才太匆忙了。”他解释道。

窘境彻底打破，大家有说有笑地进了另一个房间。房间里，一个年纪轻轻的男子头裹绷带，卧在床上，似乎在闭目养神。此时我才发现，我们到了一座设施齐全的地下医院，而床上的伤员正是费尔南多·拉雷纳斯·塞格尔，智利政府头号通缉犯。

他二十一岁，是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的中坚力量。两周之前，某天夜里凌晨一点，他没带武器，独自一人驾车返回圣地亚哥自己家时，被四名端着机关枪的便衣包围了。没人向他下命令，也没人发问，其中一人隔着车窗玻璃举枪射击，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臂，划伤了颅骨。四十八小时后，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的四位骨干在枪战中把他从雪山圣母医院营救出来，送到了抵抗组织的四家秘密医院之一。此前，他在警方监控下处于昏迷状态。我们采访当天，他已在康复阶段，面对我们的提问也能侃侃而谈。

这次会晤之后没几天，爱国阵线最高指挥部接待了我们，见面程序还保持同样的间谍片似的谨慎风格，但有一个显著差别：这次不是在地下医院，而在一栋舒适、温暖的中产阶级私宅，家中收藏有一整套音乐大师的唱片，设有一间典雅的文学阅览室，其中大多数藏书都经翻阅，这一点不少藏书丰富的私人图书馆都做不到。起初的设想是，让组织领导人戴上兜帽接受采访，但最后决定用布光效果和取景角度来解决，确保他们的身份不暴露。正如影片中所见，这样的采访影像更有说服力，也更有人情味，不像传统的采访秘密领袖的效果那么阴森可怖。

结束了一系列与公众人物和秘密人士的会谈采访后，我和埃莱娜达成协议，她先返回欧洲进行常规工作，她曾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她肩负的政治任务干系重大，除了非她莫属的情况，没必要让她长时间置身险境；况且到目前为止所获得的经验，足以让我在没有她协助的情况下完成影片的收尾工作，这部分任务估计没那么危险。直至今天，我再没见过埃莱娜。当望着她走向地铁站，再次身着苏格兰裙和女学生的软皮鞋时，我才意识到，经历了长时间的伪装恋情和共同的担惊受怕之后，我对她的思念远比想象的更加强烈。

考虑到外国摄影团队可能会被不可抗拒的势力驱逐出境或禁止继续拍摄，国内抵抗组织的一个部门从自己队伍里选拔了一批青年电影人，来协助我拍摄。选得再合适不过了。这支团队像其他组一样优秀，办事高效，成果显著，而且他们了解工作性质，因此热情更高。他们的政治组织向我们保证，这支团队不仅值得信赖，而且身经百战。后来，当外国摄制组需要更多人手在棚户区拍摄时，这支智利摄制组还负责组建新的摄影队，新团队又派生出更新的团队。到了最后一周，我们有六支智利摄制组在不同地点同步工作。这批年轻人还让我更充分地体会到，新一代有决心把智利从军事独裁的灾难中解放出来，而且不急不躁，卓有成效。虽然年纪轻轻，但他们每个人不光对未来满心憧憬，还早已有了不为人知的成绩和未曾宣扬的胜利，这一切，他们都以极大的谦逊藏在心中。

包围圈开始收紧

我们采访爱国阵线领导人的那几天，法国摄制组出色完成了预定计划，从北方回到圣地亚哥。北方影像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历史上，那里是智利各党派形成的关键区域。从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巴伦在二十世纪之初创建第一个工人党到萨尔瓦多·阿连德，我们可以看出，北方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有很强的延续性。该区域是世界上铜矿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早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之际，英国人就在那里推进工业化，由此促进了智利工人阶级的诞生。无疑，在拉丁美洲举足轻重的智利社会运动也诞生在北方。阿连德上台后，他最有效、也最冒险的政策就是铜矿国有化。而皮诺切特上台伊始，最早的政令之一，就是重新将铜矿出卖给旧主。

法国摄制组负责人让·克劳德的工作报告详细而丰富。我得想象这部分影像出现在银幕上的样子，以免破坏影片的整体性，因为只有等完成所有工作返回马德里后才能看样片，到那时再做调整恐怕为时已晚。我和让·克劳德会面，但没有约在一个固定地点，而是在那个非凡的秋日早晨游荡在城市各处，边走边谈。这固然有安全上的考虑，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比在智利故乡散步更惬意的了。我俩在市中心散步，登上乘客稀少的公交车，在人流如梭的地段喝咖啡，就着啤酒吃海鲜，天黑了才发现离酒店已经很远了，于是钻进了地铁站。

我不熟悉圣地亚哥地铁，虽然这项工程此前由弗雷政府着手修建，阿连德政府继续推进，但直到军事独裁期间才竣工。地铁的清洁和高效令我惊叹，而同胞们早已适应地下出行，显得悠然从容，同样叫我意外。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探索过这个空间，因为一时没找到令

人信服的理由来申请拍摄。不过，想到地铁是法国人协助修建的，让·克劳德领导的法国摄制组就有理由工作了。走到佩德罗·巴尔迪维亚车站时，我俩正在商量这件事。刚迈上出站口的台阶，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有人正在监视我们。的确如此。一个便衣警察正对我们虎视眈眈，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在半路碰上了。

那时，我已经学会在人群中辨认便衣警察。虽然他们自以为穿着便服，但那样的外表谁也不会认错：他们都穿着过时的、长至膝盖的深蓝色外套，留着入伍新兵式的寸头。但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们看人的方式，因为普通智利人从来不注视路上的行人，走路或开车都目不斜视。因此，假如某个体格魁梧的男人明知自己被发觉了还盯着你瞧，就能立刻推断出他是个便衣警察。此时他双手插在厚呢子大衣的口袋里，嘴上叼着烟，因为烟熏而眯起左眼，差不多是电影里侦探形象的拙劣模仿。不知为何，我猜想他会不会就是“胖子罗莫”。罗莫是独裁政府雇佣的一名杀手，曾伪装成激进的左派，不少地下运动的积极分子都是被他告发而惨遭毒手的。

我承认盯着他看是个严重失误，但那不可避免，因为当时不由自主，是一股下意识的冲动。而后，同样出自本能冲动，我先往左看，再往右瞧，发现了另外两个便衣警察。“随便跟我聊点什么，”我低声对让·克劳德说，“只说话，别打手势，也别往四处看，什么都别做。”他领悟了我的意思，我们两人继续若无其事地往上走，直到走出地铁站。夜幕已经降临，空气比前两天更暖和、更清新，有很多人沿着阿拉梅达大街疾步回家。于是我跟让·克劳德告别：

“你快撤离吧，”我对他说，“稍后我跟你联系。”

他往右跑开了，我则朝反方向混入人流。一辆出租车从我面前驶过，就像是我母亲专门派来的。我立刻叫住它，钻进车里，回头望见三个便衣从地铁口出来，四顾茫然，不知该追踪让·克劳德还是追踪我。出租车驶远，三人消失在人流中。经过四个街区之后，我跳下车，往相反方向打了一辆车，接着又换乘一辆，再换乘一辆，直到看起来他们不可能再跟踪我为止。唯有一件事，我当时没想通，现在也没搞懂，那就是便衣为什么追踪我们。碰到第一家电影院时，我让出租车停下，也没看清正在放映什么就钻了进去。纯粹是职业病，我一如既往地坚信，没有比电影院更安全、更适合思考的环境了。

“先生，喜欢人家的翘臀吗？”

原来影院节目是先放电影，后进行现场表演。我还没坐稳，放映就结束了。灯光亮度打到一半，节目主持人走上台来，把后面的演出吹得天花乱坠。我惊魂未定，不住地回头看影厅门口是否有人尾随我进来。结果邻座也纷纷回头，这种不可抑制的好奇心几乎是人类行为法则，就像大街上有人望天空，周围人群肯定也会停住脚步，举头研究别人究竟在看什么。不过在这座影院里，毫无疑问还有一条额外的理由。这地方整个都不太对头。装潢，灯光，情色电影，特别是台下清一色的男观众，真不知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各个都长着逃犯的面孔。所有人都像隐姓埋名的可疑分子，而我比其他人显得更可疑。对任何警察来说，不管有没有证据，眼前都堪称一场嫌疑犯大会。

演出安排让现场违禁表演的氛围越发强烈了。主持人逐一介绍舞台上的脱衣舞娘，不过那些描述用到菜单的一道道菜肴上可能更合适。女郎们上场时比她们降生人间那会儿还要赤裸，浑身涂脂抹粉，想炮制些许自己不具备的气质。她们纷纷登台亮相后，舞台上只留下一个身材浑圆的黑皮肤姑娘，她搔首弄姿，摆出口型，假装在演唱萝西奥·胡拉多[1]的歌，其实不过是播放出来的震耳的唱片录音。我正盘算着何时开溜，那黑姑娘手拿拖线话筒走下了舞台，一边开下流玩笑，一边向观众提问。我拿捏着逃跑的好时机，却突然发现自己被罩在追光灯下，紧接着传来了假冒萝西奥的粗鄙嗓音：

“嘿，那位先生，您的秃头真是太优雅了。”

指的当然不是我，而是另一位，但不幸的是，那位先生同时也是我，我不得不替自己伪装的角色回答。女郎拖着话筒线走到我跟前，说话时离我很近，我都能闻见她呼吸里的大蒜味。

“您觉得我的臀部怎么样？”

“很美，”我对着麦克风说，“你还指望我说什么呢？”

然后她转身背对着我，在我眼前摇晃屁股，几乎碰到我的脸。

“先生，喜欢人家的翘臀吗？”

“喜欢，”我说，“怎么能不喜欢。”

我每一次回答之后，扩音器里紧跟着都会传出录制好的哄堂大笑，就像美国电视上的弱智娱乐节目。这种音效还真必不可少，因为影厅里没人笑，众人看起来都希望自己变成透明人。脱衣舞女郎离我更近了，蠕动着贴向我的脸，原来她是想让我看清她屁股一侧的痣，那颗黑色的痣上长着毛，像只蜘蛛。

“喜欢人家的痣吗，先生？”

她每问一个问题，都会把话筒贴在我嘴上，好让我的回答高声传出去。

“当然，”我说，“你浑身上下都美极了。”

“那先生，假如我提议咱俩在床上过一夜，您会怎么对我呢？来吧，把你的心思统统讲出来。”

“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回答，“不过肯定很销魂吧。”

折磨人的问答没完没了。而且我在慌乱中忘记了要伪装乌拉圭口音，临了还想弥补这个失误。于是她模仿我含糊的口音，问我从哪儿来。我解释之后，她惊呼道:

“乌拉圭人床上功夫可厉害了，您怎么样? ”

我别无退路，只好沉下脸来。

“对不起，”我说道，“请别再向我提问了。”

她发觉跟我已经无话可谈，便转身寻找下一个对话者去了。某个时候趁着退场不会惹人注意，我迅速逃离了影厅，往酒店走的一路上心里越发惶惑不安，怀疑当天下午发生的一切都绝非偶然。

---

[1]萝西奥·胡拉多（ Roc í o Jurado ，1946—2006），西班牙女歌手、演员。

第八章　注意：有位将军准备说出一切

除了埃莱娜提供的联络网，我还约旧友筹划了一支从旁协助的工作队，这支工作队又帮我招募了几支由智利人构成的摄制组，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在棚户区畅行无阻了。从康塞普西翁刚回来的那几天，我第一个联系的人是埃洛伊莎，她是一位优雅漂亮的女士，嫁给了某著名实业家。她还把自己的婆婆介绍给我，这位孀居的七十多岁老太太机智果敢，虽然平时孤独度日，看电视剧消磨时光，但她心中的金色梦想却是在现实生活里作为主角，来一场真刀真枪的胆大冒险。

我和埃洛伊莎在大学期间就一同参加过政治活动，萨尔瓦多·阿连德最后一轮总统大选期间，我俩曾在竞选宣传部门共事，那时友谊就已经很牢固了。刚入境智利那几天，我碰巧听说她现已成为一家公关公司的明星人物，便忍不住想打个匿名电话，证实一下那是不是她。接电话的嗓音沉静而果断，确实像她，可谈吐间某些措辞又让人心生疑惑。于是当天下午，我只身来到孤儿街上一家咖啡馆蹲守，那里能望见她办公室的门口，不久她本人便出来了。虽然我俩都经历时光洗练，但十二年的光阴竟没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甚至比从前更加端庄、更加美丽了。那天我还进一步确认了她身后没跟着那种穿制服的司机，作为有影响力的资本家的妻子，雇私家司机是很寻常的事，可她却是亲自驾驶一辆银光炫目的宝马635轿车。于是，我给她寄了一封短笺，信上只有一句话："安东尼奥在这里，他想见你。"安东尼奥

是我大学期间参加政治运动时用的化名，这名字她熟悉，我相信她没忘。

我判断得没错。次日中午一点整，银光闪耀的豪车从阿波琴多街的街角转过来，而后减速停在雷诺车经销处前。我跳上车，带上车门。埃洛伊莎错愕了一下，直到我嘿嘿地笑出声，她才认出我来。

“你疯了！”她说。

“这还用问？”我回答她说。

我们商量去我初到圣地亚哥的时候独自光顾过的那家餐厅吃午饭，但今天餐厅门前却封上了木板，上面的说明更像是一句墓志铭：“本店永久歇业。”于是我们去了周边一家我比较熟悉的法式餐厅。名字记不清了，但餐厅环境相当舒适，服务也好，正对着全城最知名、最雅致的一家汽车旅馆。埃洛伊莎发现旅馆前的轿车有不少属于她公司的老顾客，她打趣说，我们两人吃午餐的工夫，那些名流们正忙着寻欢作乐呢。她开玩笑时那种成熟的气度，一直让我很欣赏。

我直入正题。我毫无保留地告诉她这次秘密潜入的初衷，然后恳请她帮忙物色几个联络人，像她这样受到阶级特权保护的女性，做这项工作的风险相对小一些。当时，还没有合适的政界人物出手帮忙，我们在棚户区拍摄处处受掣肘。我建议埃洛伊莎帮我联络几位人民团结时期我们共同的朋友，对我来说，他们隐蔽在蛰伏的迷雾之后，寻找起来着实不易。

她不仅怀着极大的热情答应了我的请求，而且接连三个晚上陪我参加秘密集会。乘坐她驾驶的那辆尊贵轿车前往某些城区，风险应该会小一些。

“没人相信宝马635的车主是独裁政府的敌人。”她戏谑道。

多亏了这辆车，有一天晚上我才没被逮捕。那天我和埃洛伊莎在某个秘密集会上碰上了一次停电，因为那些日子，抵抗组织曾多次破坏供电系统。有关停电的情报，集会负责人预先就告知我们了：第一次断电持续大约四十分钟，第二次一个小时，最后一次圣地亚哥全城将断电两到三天。这场秘密会议很早就开始谋划，因为考虑到断电期间镇压部队将极度紧张，近乎歇斯底里，会不加区别地在街头大肆围捕，手段也将异常残酷。再加上还有宵禁。但最后关头，断电还是给我们造成了一些不便，当天会议的主要事项还没谈完，第一次停电就开始了。

会议的政治领导人叮嘱我和埃洛伊莎，稍后灯一亮就立即离开，其他人再分头撤离。我们依计划行动，供电系统刚一恢复，立刻驾车从山脚下一条没铺柏油的大路离开。意外的是，转过一个弯道，却迎头撞见国家情报中心的车：几辆小卡车分列道路两侧，夹出一条甬道。便衣特工手持微型冲锋枪。埃洛伊莎试图停车，我劝她别停。

“不停不行吧。”她说。

“继续开，”我宽慰她，“别紧张，继续跟我聊天，继续说笑，他们不命令停车你就别停。合法证件我都备齐了。”

说话间，我摸了一下口袋，五脏六腑顿时凉透了：装证件的钱夹我没带在身上。一个便衣往路中间一站，举手示意停车。埃洛伊莎只得停下。那人走过来，用手电筒的光照亮了我们两人的脸，又向车内扫了一圈，一句话也没说就放行了。埃洛伊莎说对了：没人相信这辆豪车的主人有政治威胁。

会跳伞的老祖母

正是那几日，埃洛伊莎把自己的婆婆介绍给我认识。从第一次见面起，我们就一致决定把这位老太太叫作克莱门西娅·伊绍拉，至于当时是怎么冒出这个念头的，现在也说不清了。事先没打招呼，我俩在某天下午五点跑到高档社区七二七号的奢华私宅里拜访了她老人家。一进门就瞧见老太太像平常一样安详地饮茶，品嚼英国饼干，不过客厅里还回荡着重型武器扫射时子弹的呼啸声，电视荧屏上正播放血腥场景。老太太身着私人定制的名牌礼服，戴着帽子和手套。她习惯在下午五点喝茶，即便孤身一人，也要打扮得像参加生日宴会一般整齐。不过，这套近乎英国小说的生活排场跟她本人的性格并不完全相符。虽然她婚后育有子女，但这并不妨碍她在加拿大学习驾驶滑翔机，在跳伞方面也取得了优异成绩。

得知我们是请她帮忙完成一项事关重大而危险的地下行动，老太太立即应道："好啊！这里的生活太无趣了，不外乎是怎么穿衣打扮才更优雅，忙了半天却不知道为了什么。"不过，等我向她透露，具体目标是在难以进入的城区寻找五位旧友，她似乎大失所望。

"我还以为，至少是让我放炸弹呢！"她说。

我不想通过抵抗组织的常规渠道寻找这五个人。他们都是早在人民团结时期之前就跟我合作过的。五人当中无人流亡。其中一人就是在军事政变当天通知艾丽，说军方要在智利电影公司大楼前枪毙我的那一位。另一人在政变后第一年被关押在集中营里，出来后继续在圣地亚哥生活，表面上过着寻常日子，实际上不知疲倦地从事地下政治

工作。另一人在墨西哥待了一阵子，在那里联络智利流亡者，而后凭合法身份证件回国参加抵抗运动。还有一人在戏剧学院时就跟我合作过，后来和我一道创作过影视作品，现今他成了一名活跃的工人领袖。最后一人在意大利待了两年，回国后当了运输卡车司机，这背景一定能让他圆满完成联络工作。这五个人全都改换了住址、职业和身份，如何找到他们可以说全无头绪。在智利，有成千上万的人像这样生活，换了跟一九七三年之前截然不同的身份，同时暗地里为抵抗运动工作。克莱门西娅·伊绍拉面临的挑战是找到关键线头，再顺势理出整个线团。

此外，她所做的试探性接触至关重要：向老友们透露我在智利的行踪并谋求帮助前，得判断一下他们的态度。我不知道老太太具体是怎么办到的。离开智利前，我没能找到充裕的时间跟她见面长谈，很多细节没向她多问，因为当时我还没想过要在本书中叙述她的冒险经历。她只是告诉我，她从没在电视上看过任何一部电影像她所经历的那样惊心动魄。

不过我知道她在棚户区奔波了好几天，东问问，西找找，所凭借的仅仅是我告诉她的那点儿几乎已从记忆中抹除的模糊线索。我建议她改变一下着装风格，以便混迹在穷人们中间能显得自然些，但她没听我的。行走在圣地亚哥屠宰场旁喧闹逼仄的小路上时，她仍旧穿着喝茶、吃英式小饼干的礼服。一位优雅的老妇人，流露出可疑的好奇心，反复打听某个似是而非的地址，谁要是突然碰上这么一位，肯定觉得十分诧异。但是，克莱门西娅·伊绍拉身上那种不可抗拒的亲切感和温暖的人情味，迅速赢得了别人的信任。事实是，仅仅一周后，她就找到了五位失联者当中的三位，甚至还邀请他们到七二七号私宅聚餐，一场社交晚宴恐怕也不会比那次聚会更精致、更隆重了。就这

样，第一支智利工作队问世了，紧接着拍摄各大棚户区的联络人也相继敲定。负责下一阶段联络工作的是一位可敬的小个子姑娘，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参与者：虽然她性格谦逊，丝毫不引人注目，但超乎寻常地勤奋，从事秘密组织工作也很有心得。在其运作下，拍摄棚户区期间没碰到任何麻烦事。大家用一个绰号称呼她，其实我们也只知道这唯一的称呼，既符合她的形象，也是对其勇气的赞颂：无敌小蚂蚁。

接近“通用电气”的漫漫长途

在克莱门西娅·伊绍拉忙碌的同时，通过埃洛伊莎牵线，我利用拍摄间隙开始接触一些高层人士。一天晚上，我和埃洛伊莎在一家豪华餐厅等一位秘密联络员，那人最终没有现身。等人的时候，走进来两位胸前佩戴着徽章的将军，埃洛伊莎远远地朝他们招手，手势亲昵，这让我心底充满某种不祥的预感。其中一人走到我们的桌前，站着跟埃洛伊莎聊了几分钟社交界的琐屑小事，始终没瞟过我一眼。我不能确定那人的军衔，因为我一直没学会辨别将军们的星级和酒店的星级有何不同。等他坐回自己的餐桌，埃洛伊莎与我低声耳语，第一次向我谈到她在军界高层有些人脉，因为业务关系，她跟高级将领时有往来。

在她看来，皮诺切特政权不倒的原因之一是，他促使同辈将领们退休让位，同时把一批从前与他的资历相差甚远的青年军官提拔到高位。这批青年军官算不上他的盟友，几乎不了解他，但绝大多数遵从他的命令，无条件效忠。但与此同时，这也是皮诺切特政权的软肋：很多青年将领认为，他们不该为阿连德总统的死以及后来那些年的血腥镇压和篡权罪行负责，他们觉得自己的双手是干净的，因此他们相信，迟早要跟公民达成共识，非暴力地回归民主制。见我一脸惊讶，埃洛伊莎进一步说：至少她认识的一位将军准备把军界内部的深刻分裂公之于众。

“他正想着把一切说出来，不吐不快。”她说。

这个消息令我震动。说不定能将这样一段惊人的证词加入我的影片，这个念头完全颠覆了对未来几天的预想。不利之处是，埃洛伊莎不能冒险牵线，况且她也没时间筹划，因为两天后，她就要随丈夫赴欧洲开始为期三个月的旅行了。

不过，几天之后，克莱门西娅·伊绍拉紧急把我召唤到她家，交给我一份埃洛伊莎留下的联络暗号，有了暗号就能联系到“通用电气”[1]——我俩此前已给这位持异见的将军起了个秘密代号。那是一副单人电子象棋棋盘，尺寸很小，从第二天起，我就要带着它在下午五点到圣方济各教堂等候。

我已经不记得上次进教堂是什么时候了。但这回引起我注意的是，许多男男女女在教堂里读小说或看报纸，玩纸牌，做针线活，孩子们在玩猫捉老鼠一类的儿童游戏。那一刻我才领悟埃洛伊莎为什么留给我一副电子象棋棋盘，一开始我还觉得，走进一所教堂而不想引人注目，电子象棋大概是最不恰当的道具了。正如我抵达圣地亚哥的第一晚就在街边注意到的，人们喜欢待在傍晚的暗影之中，显得沉默而阴郁。其实，在人民团结时期之前，智利人就是这副神情。阿连德在大选中占据优势那一刻，人们看到他胜利在望，于是巨变发生了，阿连德的胜利将智利骤然变成了另一个国家：人们在大街上载歌载舞，在街边墙上作画，在露天演戏、放电影，所有的人都融入群众游行的队伍中，每个人都不吝表达生活的欢乐。

连续两天，我一直跟另一个乌拉圭国籍的自己下棋，后来终于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女性的低语。我坐着，而她跪在我身后的靠背椅上，这样一来，她几乎是同我耳语。

“什么也别看，什么也别说，”她用忏悔似的低沉音调对我说，“记住我要告诉你的电话号码和接头暗号，我走后过至少十五分钟你再离开教堂。”

她起身走向主祭坛，我这才发现，她是一位年轻漂亮的修女。我只需要默记暗号，因为电话号码我已经用卒子标记在电子棋盘上了。我本以为这条渠道能让我最终接近“通用电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接下来的几天，我严格按照指示拨打电话，但焦虑感与日俱增，因为电话那边总是重复同一句回答：“明天再联系。”

谁了解警方？

在我最意想不到的时候，让·克劳德带来了一条让我深感意外的坏消息。巴黎一份报纸根据法新社驻圣地亚哥分社传来的消息，刊登了一则新闻：有三名在圣地亚哥工作的意大利摄制组成员，出于不明动机在拉莱瓜贫民区拍摄，由于事先未申办许可证，现已被当地警方逮捕。

弗朗奇认为，我们已经触碰底线了。我则试图冷静地对待这则消息。让·克劳德并不知道除他们组之外还有跟我一道工作的摄制组，正如其他组不知道法国组的存在。他的慌张出自类比：既然有人处在跟他相似境地而被捕，那他也面临同样的风险。我努力让他放宽心。

“别担心，”我对他说，“跟咱们没关系。”

他刚一离开，我就动身去找意大利组，发现他们平安无事，正各司其职。格拉齐雅已从欧洲赶回来，归队工作。不过，乌戈证实说，法新社的消息在意大利也见报了，尽管意大利新闻社稍后已经辟谣。糟糕的是，这个假新闻却提到了三位成员的真名，且消息不胫而走。这毫不稀奇。独裁高压之下的圣地亚哥谣言满天飞，往往一天之内，新谣言便要经历酝酿而生，耸人听闻地添油加醋，最后消弭于无形的过程，但它们大多并不是空穴来风。关于意大利组的消息也不例外。前一天晚上，小组参加意大利使馆的一个接待晚会，那时关于他们的谣言已有不少；小组成员一进门，上前迎接的正是通信部部长，他用所有来宾都能听到的嗓门大声说道：“看见了吗？现在到场的就是被逮捕的三个囚犯。”

得知这条电讯以前，格拉齐雅就有个印象：有人跟踪他们。然后，使馆联欢会后他们回到酒店，察觉到似乎有人动过他们的行李箱，翻查过证件，但什么也没丢。或许是紧张引起的错觉，但也可能是有人故意搜查以示警告。无论如何，我们有理由相信，情况确实不妙。

当天晚上，我通宵没睡，写了一封致最高法院院长的长信。信里解释了秘密归国的情由，我想，手里应该备好这样一封信，以防突然被捕。这么做不是突发奇想，而是随着包围圈不断缩小，应急工作变得更加急迫而深思熟虑。不过，在最初的构思中，所谓信只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句子，犹如一个海难幸存者在投向大海的漂流瓶中留下的信息。但行文当中我才意识到，需要给自己的行动注入一种政治和人道上的合法理由，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得不传达千千万万像我一样抱恨流亡的智利人的情感。我多次提笔起头，又多次揉烂曾在上面反复修改的信纸；整宿我都把自己锁在昏暗的酒店房间里，某种意义上，这间斗室也是我在故土流亡期间的一处藏身之所。当长信最终完稿时，教堂早已敲响晨间弥撒的钟声，打破了宵禁的沉寂。在那个难以忘怀的秋日，第一缕阳光艰难地穿透晨雾，照进屋来。

---

[1] 原文为“General Electric”，即通用电气公司。其中“General”一语双关，暗指将军。

第九章　母亲也没认出我来

其实，完全有理由担心，警方已经掌握了我潜入智利的情报，获悉了我们正在做的工作的性质。我们在圣地亚哥差不多待了一个月，摄制组在公共场所现身的频繁程度已经超出了约定的安排；我们跟各色人等接触，很多人已经知道是我在执导这部影片。我当时已能自如地使用新身份了，以至于时常意识不到在用乌拉圭口音讲话，在实际行动中也不再严格依照潜伏者的准则办事。

起初，会议都是在车上举行的，汽车漫无目的地全城漫游，每开四五个街区就更换一辆。这法子太繁琐，有时候我们自己制造的险情，比试图避免的危险更糟糕。比如某天晚上，我在神佑街和洛斯莱昂内斯街的街角下了车，按计划，五分钟后应该有一辆蓝色雷诺12重新接上我，车子挡风玻璃上贴着动物保护协会的标志。一辆车准时开来，正是雷诺12，正是闪亮的蓝色，因此我也没留意是否有标志就坐上了轿车后座。车上坐着一位珠光宝气的女士，虽近中年，仍光彩不减，身上香水撩人，她那件玫瑰色貂皮大衣的价格是这辆车的两到三倍。这位女士是圣地亚哥上流社会的典型，这一点绝无偏差，只是像她这样的人物并不常见。见我坐进车来，她惊得张口结舌，为了让她安心，我赶紧说出暗语。

“现在这个时间，到哪儿能买把雨伞？”

穿制服的司机扭头朝着我吼道:

“滚下去，不然我报警了。”

我这才注意到挡风玻璃上没贴标志，心里暗想眼前的情景实在荒诞尴尬。“实在抱歉，”我说，“我可能上错车了。”但此刻那位女士已恢复了镇静，她一边拉住我的胳膊，一边用女高音般的甜美嗓音安抚司机。

“这会儿，巴黎百货商场还开着吗？”她问司机。

司机认为可能开着，她便执意载我去买伞。这位女士不光漂亮，而且优雅、热情，让人不由得想把暴力镇压、政治抗争和艺术创作抛诸脑后，这一晚随她沉溺在亲密的氛围里。她把我放在巴黎百货商场门前，还道歉说不能亲自陪我去挑一把中意的雨伞，因为她要去接丈夫，然后去听一位世界著名钢琴家的演奏会——钢琴家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现在已经迟到半小时了。

这种险情时有发生。每次秘密会面，我们用越来越简短的暗号来明确彼此身份。从第一次问候起，我和地下联络员就交了朋友，我们不立刻说工作的事，而是会耽搁半晌讨论政治时局，就电影新片和文学新作互通想法；我也会主动聊起想见哪几位共同的朋友，虽然有人力劝我克制这种冲动。或许是为了免除警方怀疑，一个联络人赴约时还带了自己的小儿子，那孩子情绪激昂地问我：“《超人》电影是你拍的吗？”就这样，我开始意识到完全可以在智利隐居，就像数以百计的秘密归国者那样，隐姓埋名过普通人的日子，而不用忍受刚回国时的紧张感。那一刻这种感想太强烈了，要不是尚未兑现拍摄这部电影的承诺——不仅是对国家、对朋友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我可能会就此改换职业和社会环境，以本来面目在圣地亚哥生活下去。

但是，由于怀疑警方正在身后步步追踪，出于最起码的谨慎，我们不得已要采取另一种工作方式。此时，能否进入拉莫内达宫拍摄还悬而未决，申请许可的手续不知为何一再被拖延；能否拍摄蒙特港和中央谷地尚不能敲定，设想当中采访“通用电气”的计划也无法落实。另一方面，我想亲自拍摄中央谷地，因为我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少年时光。我母亲仍生活在那里，住在贫困的帕尔米亚村。但有人已经断然告诫我，考虑到最重要的安全因素，此行绝不要探望母亲。

眼下，当务之急是重新安排外国摄制组的工作，以便让组员们冒最小的风险结束各自任务，尽快返回自己的国家。只有意大利组需要留在圣地亚哥，跟我们一起拍摄拉莫内达宫。法国组一旦拍摄完预计在几天后举行的“饥饿进军”游行，就返回巴黎。

荷兰摄制组在蒙特港等我，一起拍摄靠近南极圈的风貌，此后经由巴里洛切的边境通道，离开智利前往阿根廷。三支摄制组都离开时，全片百分之八十的内容也就基本完成了，胶片将被妥善地保管，送至马德里洗印。艾丽非常高效地完成了她的工作，我回到西班牙时，胶片已经准备停当，只待剪辑了。

“利廷回来了，拍完电影了，又离开了”

鉴于那段日子情况晦暗不明，最恰当的做法似乎就是我和弗朗奇假装离境，之后更审慎地重新潜入智利。蒙特港之行给我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因为无论从阿根廷还是从智利前往那里都同样近便。于是就这么办了。我请荷兰摄制组在蒙特港等我，同时与智利团队的一支分队约好，三天后在全国正中央的科尔查瓜谷地会面，而此刻，我和弗朗奇一道乘坐飞机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出行前几小时，在没有预先暴露身份的情况下，我打电话给《分析》杂志社，与女记者帕特里西娅·科列尔做了一次深度访谈，讲述了秘密潜入圣地亚哥的情况。离境两天后，采访见报，封面上有我的照片，文章标题带有一种罗马式的戏谑：“利廷回来了，拍完电影了，又离开了。”[1]

为了让一切显得更加真实，克莱门西娅·伊绍拉开着自己的车把我和弗朗奇送到普达韦尔机场，与我们洒泪吻别，表演很是出彩。虽然我们尽量高调离境，但抵抗组织仍暗中保护，假如我们出关时被捕，抵抗组织的安全部门会向外界发出告急信号。这么做首先是为了知晓，机场是否有针对我们的监控。其次，一旦事后警方追查，将发现我们留下的出境记录，会相信目标已经离境。

入境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我使用了自己的合法护照，因为没必要在一个友好国家做违法的事。然而在移民局窗口前掏出护照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真护照上的照片是易装前拍摄的，看起来实在不像现在的我。我修过眉毛，秃顶面积也更宽了，还戴上

了高度眼镜，很难辨认出是同一个人。别人也曾提醒过我，伪装成另一个身份和事后恢复本来身份一样困难，但在最应该琢磨这句忠告的时候，我却把它忘光了。所幸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移民官没认真端详我的脸，我才得以从这场理应扮演自己却不能自证的默剧中脱险。

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弗朗奇要依照我的指示跟艾丽电话沟通余下工作的众多细节，还要提取她从马德里汇来的一笔钱款，以支付最后的花销。我俩在那里分别，计划几天后在圣地亚哥再见。我在阿根廷境内搭飞机前往门多萨，为的是预先考察智利那一侧的安第斯山麓。经由一条没有严控关卡的通道，可以轻易从门多萨重返智利。我独自一人，背着一台16毫米轻型摄影机，徒步前往智利那一侧的山麓，拍完了一切所需的镜头。回程时搭乘了智利的警务巡逻车，司机很同情我这位不知该如何返回阿根廷的乌拉圭记者。

我从门多萨南下，前往边境城市巴里洛切。一艘衰朽的破船塞满了从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来的游客，以及返程的智利人，从巴里洛切驶向智利边境。这条航路上是一派白得刺眼的极地风貌，冰川绝壁雄阔，海面怒涛涌起。到蒙特港的最后一段航程要乘坐渡轮，极地寒风从碎裂的玻璃窗吹进来，声似狼嚎。舱内没什么地方能抵御骇人的寒冷，也不提供吃喝，连一杯热咖啡、一口酒也喝不上，什么都没有。不过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倘若智利机场警方已经查验了我的出境记录，就很难想象次日我将再度入境，并且是从远在圣地亚哥一千公里以外的边境小城。

快抵达边防检查站时，渡轮上一个职员收取了不下三百本护照，只匆匆扫视一遍，没盖入境章。不过，智利人的护照要对照着严禁入境的流亡者名单一一核对，那份长长的名单就贴在边检人员眼前的墙上。持他国护照的旅客则走在畅行无阻的边境通道上，我也身在其

列，一切进展顺利，直到走到两个边检人员跟前。这两个人喝令开箱检查，因为他们穿着厚厚的极地外套，我起先没认出他们是警察。我观察到这是一道彻底的检查，可并不担心，因为我确信自己箱子里没带任何与假身份不相符的东西。然而，箱子刚一掀开，一堆“吉卜赛女郎”牌香烟空盒就冒了出来，散落一地，许多纸盒上写满了拍摄笔记。

来智利时我带足了“吉卜赛女郎”牌香烟，够我抽上两个月的。但我不敢随手丢弃那些硬纸烟盒，烟盒个儿大，在智利很显眼，容易成为警方追踪的线索。工作时抽完一盒烟，我就把空盒塞进口袋，久而久之分藏得到处都是，主要原因是上面有拍摄笔记。有段时期，衣柜里的所有外套兜里都揣着空烟盒，床垫底下、旅行包里，空烟盒遍布，看起来简直像某种戏法，而我脑子里总在琢磨能安全摆脱这些烟盒的办法。我就此落入了一种荒诞的焦虑状态，仿佛囚犯挖掘逃生通道，却不知把土藏在哪儿。

每次我整理行李准备换酒店时，都会自问，该怎么处理空烟盒。最后，我想不出比塞进行李箱更简便的方法了，万一在烧毁烟盒时被人撞见，可比收藏烟盒更加百口莫辩。我曾想过在阿根廷摆脱它们，但事情进展节奏太快，我甚至都没来得及打开行李箱。等到在南方边境不得不开箱，我匆匆从地上捡起一个个空盒时，惊恐地瞥见警察死死盯着我，脸上满是惊讶和怀疑。

“全是空的。”我说。

他们当然不信。年轻点儿的警察忙着检查其他旅客，那位岁数大一些的一个接一个地查看烟盒，翻来覆去地端详，想弄懂某些笔记是什么意思。我突然灵光一现。

“有时候我会写几句短诗。”我说。

他继续一声不吭地检查，最后望着我的脸，似乎想从我脸上揣测出什么线索，来解读空烟盒上高深莫测的奥秘。

“如果你想要，都送你。”我对他说。

“我要它们做什么？”他说。

于是，他帮我把烟盒收拢回箱子里，旋即检查后面的旅客去了。我当时犯糊涂，没想到应该当着警察的面把烟盒扔进垃圾桶，而是继续把它们留在身边度过余下的旅程。返回马德里后，我并没让艾丽将它们处理掉。我觉得自己跟这些空烟盒的联系太密切了，决定余生都把它们当作患难记忆的证物存留下来，放在怀旧的厨房中细细回味。

“为祖国的未来拍张照片吧”

荷兰组在蒙特港等我。选择蒙特港拍摄，不仅是因为难以言表的美景，还因为这一区域在智利近代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这座城市是长期斗争的舞台。在爱德华多·弗雷政府时期，这里发生过一起异常残酷的镇压，造成执政联盟中的进步派脱离了政府。民主左派由此意识到，能否取得广泛的联合，不仅关乎自己阵营的命运，也牵系着整个国家的前途。自此，一场不可逆转的疾风骤雨般的巨变发生了，其高潮就是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总统的时刻。

蒙特港拍摄完毕后，整个南方的拍摄计划也圆满结束了。荷兰组携带充足的素材取道巴里洛切，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将这批胶片带给身在马德里的艾丽；而我选择在一个怡人的夜晚，搭乘夜车只身前往塔尔卡。当晚没什么值得记录的，除了我把烤鸡原封不动地退回了餐车，因为鸡肉外皮太硬了，一刀也切不下去。在塔尔卡，我租了一辆车，驶向科尔查瓜谷地中央的圣费尔南多城。

在小城的武器广场上，任何一个地点、一棵树、围墙上的一块砖石，都能让我回想起童年。当然，除了这些，更令我怀旧的是小学的旧楼，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读写。我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拍了些照片，或许可以在影片中穿插使用。广场上逐渐充满了上学的孩子们的欢闹声。有些孩子在相机前摆姿势，有些伸出手掌遮住镜头，一个小姑娘摆了几个舞蹈动作，姿势很专业，我情不自禁地请她在更合适的背景前再跳一遍。突然几个孩子坐到我身旁，对我说：

“为祖国的未来拍张照片吧。”

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我，因为它呼应了不久前我在“吉卜赛女郎”牌空烟盒上写下的一句话：“我敢断言，每个智利人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许。”尤其是孩子们这一代，他们无从了解祖国与现今不同的另一个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自身的命运满怀信念。

我跟智利摄制组约定，上午十一点半在游击队员桥边见面。我准时到达右岸，看到摄影机已在对岸架好。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四处弥漫着树丛间百里香的芬芳，在故乡，我从未像此刻这样气定神闲，流亡的痛楚也淡去了。此时，我已解掉另一个自己的领带，脱去英式西装，重新换上夹克和牛仔裤，还原成本来的我。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后的两天，我很庆幸我没刮胡子，重新长回的胡子是我恢复本来身份的明证。

我意识到摄影师正从取景器里看我，于是走下车，慢慢走过桥面，让他们有时间拍摄，而后，在这些男孩子的热情和早慧的激励下，我逐一向所有人打招呼。他们年轻得让人难以置信——十五岁，十七岁，十九岁。小组负责人、导演里卡尔多年龄最大，二十一岁，其他人管他叫“老家伙”。几天以来，没有什么比获得他们的支持更让我感到振奋的了。

就在那里，大家倚着桥上的栏杆，拟定了拍摄计划，须臾便投入工作。应该承认，我当天的计划有些偏离了最初目标，更准确地说，是顺从了童年的回忆。我选择从记忆当中那座桥的形象开始拍摄。十二岁那年，正是在这座桥上，我被一群吵闹不休的表姐们推下水去，强行学习游泳。

不过，随着一天工作日程的展开，旅行的最初缘由重新凸显出来。圣费尔南多谷地是一片广阔的农业区，在人民团结政府时期，定

居于此却一直沦为农奴的农夫们第一次享受到公民权。从前，这一区域是封建寡头的堡垒，寡头集团驱使形同臣仆的选民，操纵选举投票。在爱德华多·弗雷的基督教民主党执政时期，这里爆发了首次农民大罢工，萨尔瓦多·阿连德亲身参加了这次罢工。阿连德担任总统后，剥夺了寡头地主过分的特权，当地活跃而富于团结精神的农会也将农民们组织起来。如今，作为历史倒车的标志，中央谷地成了皮诺切特消夏别墅的所在地。

离开故乡前，不拍摄几段堂尼古拉斯·帕拉西奥斯[2]雕像的影像，那可不行。帕拉西奥斯写了一本不寻常的书，《智利种族》。作者在书中提出，远在巴斯克人、意大利人、阿拉伯人、法国人和德国人迁居智利的移民大潮前，地道的智利人是古希腊人的直系后裔，因此命中注定要被指派为领导拉丁美洲的霸权力量，展示真理与救赎世界之路。我出生的地方离那里不远，每天上下学总要习惯性地朝雕像瞟上几眼，但没人给我解释那是谁的雕像。皮诺切特是堂尼古拉斯·帕拉西奥斯最忠实的崇拜者，现已将这位学者从历史的遗迹中解救出来，在圣地亚哥市中心为他竖起了另一尊纪念碑。

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完成了一天的拍摄，时间刚够在宵禁前赶回一百四十公里外的圣地亚哥。除了里卡尔多，摄制组全员就地解散，各自返程。里卡尔多把车开到海边，陪我兜了一大圈，逐个敲定次日取景地点。我俩陶醉在工作里，连闯四道警察岗哨都丝毫没觉得恐惧。不过，通过第一道岗哨后，我决定还是谨慎些，于是脱掉导演米格尔·利廷的便装，换上乌拉圭商人的行头。稍没留神，已临近午夜。等发觉时，宵禁已经开始半小时，我们顿时感到一阵惶恐。于是，我指挥里卡尔多驶离主干道，开车钻进一条土路——这条路我记忆犹新，仿佛昨天才刚走过。而后我指引他左转，过桥，再右转驶入一条漆黑的

小巷。黑暗中，只能听到禽畜惊醒后嘈杂的叫声。我让里卡尔多熄灭车灯，顺着一条没铺柏油的土路往前开，沿途碰上好几个急转弯和陡坡。这座迷宫尽头，是一座沉睡的小村庄，躁动的犬吠吵醒了邻居院子里的所有禽畜。车子穿过全村，驶到村庄另一头，停在我母亲的家门前。

　　里卡尔多当时不相信，至今也不相信这不是早有预谋的方案。我发誓，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其实，当我意识到我们在违反宵禁，脑海中唯一的念头就是藏进一条僻静的小路挨到天亮，因为赶回圣地亚哥要通过四道检查站。驶离公路后，我才辨识出了童年时代常走的土路，桥那头的犬吠声，炉膛熄灭后的灰烬余味，而这一切，叫我无法遏制给母亲带来惊喜的鲁莽冲动。

“你一定是我儿子的朋友”

拥有四百户居民的帕尔米亚村，仍同我孩提时代一样，从未改变。我的祖父出生在巴勒斯坦的拜特萨侯尔，而我外公是个希腊人，名叫克里斯托斯·库库米德斯，两人都是在二十世纪初最早的那一批移民潮中来到此地，定居在火车站附近。如今，铁路已直接把圣地亚哥和海岸连通起来，而当时，帕尔米亚村唯一的重要性在于它曾是铁道线的终点。旅客们需要在此地转车，来往海滨的货物都要在此地装卸，因此形成了一种过境贸易，让这个地区繁荣一时。后来，铁道线延伸至海滨，这座车站就变成了给机车加水的必经之地，列车按规定只停靠十分钟，可实际停车时间动辄延长到一整天。列车从我那位阿拉伯祖母玛蒂尔德的房子前驶过，总要鸣笛，宣告火车进站。不过，那时的村庄在规模上跟现在没什么差别：仅有一条长街，街旁零零散散伫立着几栋屋舍；还有一条侧路，沿路的房子比长街上还要少些。从村庄再往下，有座叫拉卡雷拉的小镇，这地方全国闻名，因为家家户户都能酿出上好的葡萄酒，让往来路人免费品尝，请他们评比谁家的酒最好。因此，拉卡雷拉有一段时间成了全国醉鬼的天堂。

帕尔米亚村最早的一批画报是玛蒂尔德带来的，对于画报，她总是怀有一种无法满足的热爱。她还时常把房子对面的果园借给马戏团、巡回戏班和木偶艺人使用。每当我们这样的偏远孤村能放映几场电影，也总是选在这个园子里。五岁那年，正是在那里，我坐在祖母膝头观看了生平第一部电影，就此萌发了自己的终生志向。当时放映的是《十字军的复仇》[3]，其实，这部电影留给我的回忆倒不如说是

恐惧，很多年之后我才搞清楚，挂在树中间的被单上怎么会出现飞奔的马匹和硕大的头颅。

我和里卡尔多当晚拜访的地方属于我的希腊外公，现在，我母亲克里斯蒂娜·库库米德斯住在这里，我的少年时代也在这栋房子里度过。房子修建时间极早，仍保持着智利农村的传统风格，有长长的走廊、阴暗的过道、迷宫般的房间、宽敞的厨房，再往里走是牲口棚和马厩。这片地方叫橘园，真的常年能闻到酸橘的气味，旁边还有一片满是九重葛和其他鲜艳花卉的园圃。

想到能跟母亲在老宅重逢，我心情激动，车还没停稳就一脚迈出了车门。我沿着空荡荡的走廊往里走，穿过阴影中的庭院，出来迎接我的只有一条呆狗，它在我腿间打转。我继续往前走，还是没发现一点人迹。每走一步，都能激活一段回忆，要么是下午的一个钟头，要么是某种已经遗忘的味道。长长走廊的尽头，我探头朝一间灯光昏暗的客厅里张望，我母亲就坐在房间里头。

这是很奇特的一幕。客厅很宽敞，屋顶高挑，四壁萧索，没什么家具，只有一把孤零零的扶手椅，而我母亲正坐在里面。她背对着门，旁边放着一只火盆，侧面还有一把同样的座椅，里面坐着她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巴勃罗。两人都沉默不语，面带天真的表情愉快地注视着同一个地方，仿佛在看电视，但其实，对面不过是光秃秃的墙壁。我朝他俩走去，并没刻意轻手轻脚，可见到他们没反应，我便说：

“好吧，这里竟然没人招呼我，真见鬼。”

我母亲这才站起身。

“你一定是我儿子的朋友吧，”她说，“让我抱抱你。”

自从十二年前我离开智利，巴勃罗舅舅再没见过我。此时，他坐在椅子里，纹丝不动。我母亲去年九月在马德里跟我见过面，但起身拥抱时仍没认出我。于是我抓住她的双臂轻轻摇了摇，想让她从困惑中醒悟过来。

“好好看看我呀，克里斯蒂娜，”我望着她的眼睛，对她说，“是我呀。”

她再次定睛打量我，但还是没认出我来。

“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你是谁。”

“可你怎么会认不出我呢，”我说着，忍不住笑出声来，“我是你儿子米格尔。”

她再一次打量我，脸色变得惨白。

“天啊，”她说，“我快要晕倒了。”

我赶紧扶住她，免得她跌倒。巴勃罗舅舅也站起身，同样情绪激动。

“做梦也想不到还能再见你一面，”他说，“现在叫我立即去死也甘心了。”

我赶紧拥抱他。虽然他年纪仅比我大五岁，但已经满头白发，此时正裹着一条旧毯子，枯瘦得像只小鸟。他曾有过一次婚姻，自从离

婚后就一直住在我母亲家里。他始终非常孤独，年少时看起来就很老成了。

“别瞎说了，舅舅，”我对他说，“别说什么现在就要死的傻话了。去拿瓶酒来，庆祝我回家吧。”我母亲像从前一样，突兀地打断我俩的谈话，仿佛收到了某种超自然的启示。

“我准备好了马斯图。”

要不是到厨房亲眼看见了烹调完毕的马斯图大餐，我都不肯相信她的话。这并非虚言。希腊人家只有在盛大节日期间才会做马斯图，因为料理工作费时费力。这道菜要放入炖羊肉，配上鹰嘴豆，还得加粗燕麦粉，有点类似阿拉伯人的古斯米。这是那一年我母亲头一回做马斯图，事前无缘无故，纯属灵光乍现。

里卡尔多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餐，之后就去休息了，无疑是想给我们留点私人空间。不久，舅舅也休息去了，只剩下我和母亲一直聊到天亮。我们母子两人向来无话不谈，几乎像一对朋友，大概因为我俩年龄差距没那么悬殊吧。她十六岁就嫁给了我父亲，一年后生下了我，所以我还清楚记得她二十岁左右的模样，非常漂亮、温柔。她经常跟我玩耍，就好像我不是她儿子，而是她的一个布娃娃。

我此行归来，让她容光焕发，但我着装的新风格让她有些气馁，因为她一直喜欢看我穿工人装。“你看起来像个神父。”她对我说。我没跟她解释乔装的原因和入境智利的目的，她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合法的。我宁愿不让她知道冒险行动的内情，免得她心中不安，当然，更重要的是，不想让她受到牵连。

天亮之前，她拉着我的手穿过庭院，也不告诉我原因，只是仿佛狄更斯小说里的场景一般秉烛照亮，稍后给我带来了此趟旅行中最大的惊喜。院子深处，是一间书房，格局与我流亡前圣地亚哥家中的书房一模一样，摆设也分毫不差。

军方最后一次查抄圣地亚哥旧居后，我和艾丽不得不带着孩子们逃往墨西哥。我母亲雇了一位熟识的建筑师，把圣地亚哥书房里的木板一片一片拆卸下来，再运到帕尔米亚村的家族老宅里，依照原样重建。从室内看来，仿佛我从未离开过。不但遗落的物品待在原处，混乱无序的样子也一仍其旧。我毕生的各类文稿都收藏在此：年轻时写的剧本、电影脚本大纲、场景设计图，等等。甚至连室内空气也是旧时颜色、旧时气味，以至于让我觉得回到了自己最后一次端详书房的那一天、那一刻。我心底打了一个寒战，因为那一刻我不敢确定，母亲分毫不差地还原了这一切，究竟是为了有朝一日我归来时不必想念旧居，还是为了万一我客死异乡能借此悼念。

---

[1] 源于恺撒大帝著名的胜利宣言“Veni，vidi，vici”，意思是“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胜利了”。

[2] 尼古拉斯·帕拉西奥斯（Nicolás Palacios，1854—1931），智利外科医生、作家，其著作《智利种族》一书首版于1904年。

[3] 《十字军的复仇》（*Genoveva de Brabante*），1964年意大利与西班牙合拍的电影。

第十章　警方助力，皆大欢喜

返回圣地亚哥，我们再次以身犯险。身边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种种迹象显而易见。“饥饿进军”大游行遭到了血腥镇压，警察殴打了摄制组的几位成员，砸毁了一台摄影机。因为工作关系常与我们打交道的人都认为，我们假装出境的计谋不会实现，甚至连克莱门西娅·伊绍拉也坚信，我们就像是无辜的圣徒踏进了狮穴。至于寻找那位持异见将军的努力，被那句永恒的回答“明天再联系”阻遏住了。当意大利组得到通知，获准于次日上午十一点到拉莫内达宫拍摄时，我们即处在如此紧张不安的精神状态之中。

让人不由得怀疑这是个致命的圈套。我自己愿意冒一切风险，没什么大不了，但贸然指派意大利摄制组进入总统府拍摄，却不清楚是否会让他们置身陷阱，这个责任过于重大。然而，摄制组成员明知有风险，还是决定负起责任，冒险前往。法国组已经没理由再待在圣地亚哥了。因此，我们紧急召开会议，敦促他们乘坐最早的航班离开智利，带上准备运往马德里的拍摄完毕的素材。在我指导意大利组拍摄皮诺切特总统府的当天下午，法国组起飞离境。

前往拉莫内达宫之前，我先把写给最高法院的信交给了弗朗奇。最近几天，我都把这封信放在手提箱里随身携带，迟疑着是否该寄出去。我请弗朗奇立即亲自邮寄，他照办了。我还把埃莱娜留下的紧急联络电话留给了他。十一点差一刻，弗朗奇开车把我放在神佑街的街角，我在那里跟意大利摄制组全员汇合，一起前往拉莫内达宫。最悖

谬的是，这一次我脱掉了乌拉圭广告商的装束，穿上了牛仔裤和兔皮衬里的夹克。这是最后时刻所做的决定，因为格拉齐雅是记者，乌戈是摄影师，奎多是录音师，这些成员的背景早已经过彻底审查。但其助手，名字虽然也要列在拍摄许可申请书上，却不需要验明身份。这正解决了我的难题： 我作为照明组助手，手提线缆和聚光灯，混进了总统府。

负责接待的三位青年官员态度亲和，他们轮流引导我们在府内各处游览。我们从容地拍摄了整整两天，力求技术上没有瑕疵。我们特意询问与建筑修复有关的方方面面，因为格拉齐雅针对托埃斯卡和智利的意大利风格建筑做足了功课，所以没人怀疑这就是影片唯一的主题。不过，军方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极有把握地向我们介绍府邸每个局部的意义和历史，以及跟建筑原样相比，做了怎样的修复；但他们也预备了喋喋不休的遁词和云山雾绕的话，缄口不谈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的事件。说实话，修复工作还算忠实于原始图纸。他们封堵了几道门，另开了几道门，推倒了几堵墙，又改变了一些隔挡的位置，还封闭了莫兰德街八十号的大门——历届总统的私人访客原先都经由此门出入。改建的地方这样多，即便是了解旧官邸的人，如今在新总统府里也难免迷路。

当要求他们向我们展示《独立宣言》原件时，接待我们的官员似乎犯了难。这份文献原先一直保存在部长会议大厅里，我们知道原物已在轰炸中被焚毁。接待官员始终不肯承认这一点，而是要我们再填写一份特别拍摄申请，且一再告知申请要迟些才能获批，就这样一直拖延到拍摄结束。他们也没法说清堂迭戈·波塔雷斯用过的写字台被挪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往历届总统留下了不少遗物，可原本用来陈列文物的小型历史博物馆也在政变大火中付之一炬。或许，自奥希金斯总

统以来，历届总统的半身像都难逃同样的噩运，尽管更流行的说法是，军政府为规避有朝一日被迫摆上萨尔瓦多·阿连德雕像的尴尬局面，索性把以往安置在走廊里的历届总统半身像统统撤走了。总之，深入游览总统府之后的印象是，为抹除殉难总统的所有痕迹，这里的一切都被彻底改造了。

在拉莫内达宫拍摄的第二日，大约上午十一点，我们突然感觉到空气中一阵不可见的骚动暗自酝酿，随后听见一阵急促的军靴声和金属器具的碰撞声。接待我们的官员神色骤变，生硬地命令摄制组关掉聚光灯，停止拍摄。两名便衣警卫毫不掩饰地立在我们面前，万一我们执意拍摄，他们就会出手制止。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直至看见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本人走来。他面色铁青，体态臃肿，在一位军官和两位文员助手的陪同下，径直往办公室走去。这个照面来得突然，没给我们留下任何反应时间。皮诺切特走过去时没朝我们这边望一眼，但距离如此之近，能真切地听见他当时在说些什么：

“女人的话不能信，就算她们说的是实话。”

乌戈一下子愣住了，手指紧扣在摄影机的拍摄键上，仿佛眼睁睁错过了自己的目标。“如果当时有谁想刺杀他，”他稍后对我们说，“那再容易不过了。”虽然那天还剩三个多小时的工作时间，可我们当中谁都没有心思再拍下去了。

餐厅里的疯子

拉莫内达宫的拍摄任务一终了，意大利摄制组便携带剩下的所有素材，顺利出境。这样一来，我们总共拍摄了三万二千二百米长的胶片。

在马德里，经过为期六个月的后期剪辑，这些胶片最终浓缩为四个小时的电视片和两个小时的电影。

虽然原计划已大功告成，我和弗朗奇还是在圣地亚哥多待了四天，惦念着能与“通用电气”取得联系。按照对方在电话里的指示，两天之内，我每隔六小时来到指定的咖啡馆。我坐在那里，耐心静候，重读了一遍《消失了的足迹》——那本我乘飞机时的护身符。让我久候的联络人终于来了，是个二十岁左右天使般的姑娘，穿着公馆女子中学那种矫揉造作的校服，在倒数第二个赴约时间赶来，传达了下一步指示：当天下午六点，在波塔雷斯街上有名的亨利之家餐厅见面，赴约时，我要手拿一份《信使报》和一本连环画杂志。

我迟到了几分钟，因为出租车遇到了街头游行队伍，无法前行。紧随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在康塞普西翁的自焚事件，一场新的反独裁和平抗议运动兴起。警察用高压水枪驱散示威人群，两百多名抗议者浑身湿透，但仍抵在墙壁上，无畏无惧，高唱爱的颂歌。虽然这场崇高的示威抗争让我深受感染，但我仍不得不遵照女学生的指示，赶到餐吧，坐在高脚凳上阅读《信使报》社论版。按约定，有人将靠近问我：“您喜欢读社论版？”我应该回答说是。对方再问，为什么喜欢

读？我再回话：“因为有经济信息，对我的职业有帮助。”不久我就应当起身离开餐厅，门外会看到一辆等候我的汽车。

我把社论版从头到尾读了三遍，这时有人从我身后走过，并用胳膊肘在我腰上轻轻撞了一下。我在心里说：“就是他了。”我看了看那人，是位大概三十岁的男子，肩背宽阔，正慢吞吞地往卫生间走。我想这可能是暗示，想让我跟他到卫生间那边接头，但我坐着没动，因为他还没说暗号。我一直留意着卫生间，直到那人出来，经过我背后，又像上次那样轻轻碰了我一下。于是我转过身，望着他的脸。那人长着酒糟鼻，嘴唇发紫，眉头有好几道伤疤。

“喂，”他说，“你过得怎么样？”

“好，挺好。”我对他说。

他在旁边的吧椅上坐下来，用熟络的口气跟我攀谈起来。

“你还记得我吗？”

“当然，朋友，”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怎么能忘。”

就这样，我们的对话持续了几分钟，我动作明显地露出报纸，提醒他说暗号。但他没留意，仍旧坐在我身边，望着我。

“那么，”他开口道，“请我喝杯咖啡怎么样？”

“好啊，朋友，很乐意。”

我向服务生点了两杯咖啡，但他只在吧台上放了一杯。

“我点了两杯，”我说，“另一杯给这位先生。”

“哦，好，”服务生回答，“请稍等，很快就送来。”

“可你为什么不现在送来？”

“是的，”他说，“马上给他送来。”

但咖啡仍旧没来。更怪的是，我旁边的男子似乎并不在意。遇上这种咄咄怪事，我不免紧张起来。那人把手搭在我肩上，对我说：

“我觉得你没认出我来，对吧？”

此时我决定摆脱他了。

“你看，”我告诉他，“说实话，我确实没认出来。”

他取出钱包，从里面掏出一角揉搓得很烂、已经发黄的剪报，在我眼前晃了晃。

“这就是我。”他对我说。

这时我才想起他是谁。这人是早先的一位拳击冠军，全城闻名，不过与其说是凭借过去的殊荣，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后来的精神失常。我决心在沦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以前离开，于是向服务生要求结账。

“那我的咖啡怎么办？”他说。

“您到别处喝吧，”我对他说，“我可以把钱留下。”

“谁要你的钱！”他说，“你认为他们把我打倒了，我落魄了，就连尊严都不要了？少跟我扯淡！”

他就这么大嚷大叫，于是周遭所有的目光都汇集到我们身上。我一把擒住拳击手粗壮的手腕，紧紧攥住。幸好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双樵夫般的大手。

“请你冷静一下，明白了吗？”说话时我盯着他的双眼，“一个字也别说了！”

我很走运，因为对方虽易激动，但镇静下来同样迅速。我赶紧结账出门，走入寒夜，乘坐碰到的第一辆出租车返回酒店。在前台，我收到了弗朗奇留下的紧急字条：我把你的行李送到了七二七号。无须解释。七二七是我和弗朗奇约好的暗号，指的是克莱门西娅·伊绍拉的家。弗朗奇仓促离开酒店，匆匆把我的行李箱带走，这一情况显然说明，抓捕我的包围圈已经要收网了。我赶忙离开酒店，换乘了几次出租车，每次都随机改换目的地。终于，见到克莱门西娅·伊绍拉时，她一如往常，从容安详，正坐在电视机前观赏一部希区柯克的电影。

“要么撤离，要么潜伏”

弗朗奇留给克莱门西娅·伊绍拉的口信说得很明白。当天下午，有两名便衣来酒店打听我们，还抄录了我们的入住登记卡。酒店门童把这事说给弗朗奇听，而弗朗奇佯装根本没当回事，说这是宵禁状态下的例行公事。随后，弗朗奇不慌不忙地办理了退房手续，又请门童帮忙叫一辆到国际机场的出租车，出发时跟门童握手告别，塞了一笔数目不菲的小费。但门童并不吃这套。“我可以帮您二位安排另一家酒店，叫他们永远找不着。”门童如是说。当然，弗朗奇觉得谨慎为妙，装作听不懂他的意思。

克莱门西娅·伊绍拉已经帮我拾掇出一间卧室，还特地遣散了女仆和司机，免得隔墙有耳，镜中有眼。等我的时候，她已经备好了一桌丰盛的晚餐。桌上摆了烛台，佐以上等葡萄酒，室内甚至回响着勃拉姆斯的奏鸣曲——勃拉姆斯是她最爱的作曲家。她有意将饭后的桌边闲话拖到很晚，直至深夜，仿佛在涉渡暮年生活令人懊丧的泥沼。她不甘心只把生命消耗在培养子女成为无聊的资本家，跟蠢笨的保姆玩卡纳斯塔纸牌，或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看催泪电视剧，一边织羊毛袜，最后了此残生。直到七十二岁高龄，她才发现自己真正的天赋是参与武装斗争，策划地下运动，沉醉于冒险事业。

“与其等肾脏溃烂，老死病榻，”她说，“我更愿意跟士兵巷战，饮弹牺牲。”

弗朗奇在次日早晨抵达，他租的车跟前几天不是一家公司的。他带来一条紧急口信，信息是从三条不同渠道传递给我的：“要么撤离，

要么潜伏。”所谓潜伏，等于要我躲藏起来，不能继续做任何事，这个选项不可想象。弗朗奇同意我的看法，况且他已经搞到了当天下午去蒙得维的亚的航班仅剩的两张机票。

这是最后的行动。前一晚，弗朗奇已经跟第一支智利摄制组结清了所有账目，并委派他们跟其他组结账。他还把最后三卷摄制好的胶片转交给抵抗组织的一位使者，托他们尽快运送出国。他们操作得很顺利，五天后我们抵达马德里时，艾丽早已收到胶卷。把胶卷送到家里的，是一位年轻而迷人的修女，艾丽说她简直像是圣女小德兰。不过，她不愿意留在家里吃午餐，因为她必须在当天上午完成其他三个秘密任务，且当晚就要返回智利。不久前，凭借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我才发现，她就是那位在圣地亚哥的圣方济各教堂跟我接头的修女。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采访“通用电气”，我就绝不离开智利。上次在餐厅，接头线索断了，于是那天清晨，趁着在克莱门西娅·伊绍拉家吃早餐的间歇，我又拨打了一次指定电话，电话里仍旧是那个女声，让我两小时后再打来，届时给我最终答复：行还是不行。于是我下定决心，就算在飞机起飞前一分钟找到了接头方法，我也要不计安危地留在圣地亚哥。如果还是没希望，我就只能飞往蒙得维的亚了。我已把能否采访看成一件事关荣誉的大事。假如不能用这次采访来胜利终结潜伏智利六周以来的种种幸运和不幸，会让我在精神上倍感痛苦。

但第二次通话还是同一个结果：两小时后再打电话。换言之，飞机起飞之前，还是存在两种可能性。克莱门西娅·伊绍拉坚持要送给我们一把拦路打劫用的那种左轮手枪，那是她丈夫生前一直藏在枕头底下用来吓唬小偷的。我们好说歹说才劝服她，配枪出行并不谨慎。与我们告别时，她简直以泪洗面。对我们的深情厚谊固然是一方面，但

与冒险激情挥别的痛苦，才是更主要的原因。严格地说，我把另一个自己遗弃在那里了。我仅取出个人必需品，装进一只手提箱，而将带滑轮的行李箱留在了克莱门西娅·伊绍拉家。行李箱里塞着英式套装、印有假身份姓氏首字母的亚麻衬衫、意大利手织领带，以及另一个自己——我此生最讨厌的男人——出席奢华社交场合的种种道具。我只保留了一件他的东西，就是我身上穿的衣服，但三天后，我便有意把它丢在里约热内卢的一家酒店里了。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全都花在了给孩子们和流亡在外的朋友们挑选智利的礼物上。我在靠近武器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又打了第三次电话，再次获得相同的答案：两小时后再打来。但这次接电话的不是那位女士，换成了一名男子。他对上了正确的暗语，并告知我，假如下次打电话还是不能搭上线，那么两周内都没机会了。我和弗朗奇只好动身前往机场，想从那里打通最后一次电话。

交通路线被几处施工地阻断了，路线标识相当混乱，岔路很多且杂乱无章。我和弗朗奇非常熟悉通往洛斯塞里略斯旧机场的路，但普达韦尔新机场怎么走，我们就不大清楚了。不知怎么搞的，我们竟然迷失在鳞次栉比的工业区里，绕了很多圈子，尝试了各个出口，一直沿错路走，却没注意到方向反了，直到一辆军警巡逻车拦住了去路。

我下了车，决定迎上前去。而弗朗奇不肯浪费他巧舌如簧的本领，一番辞令将警察说倒，不给他们一丝喘息的机会来起疑心。他迅速即兴编造了一套天花乱坠的说辞，告诉警察，我们是来跟通信部签协议的，准备在智利建一个通过卫星传输的全国交通监控网；他还制造了点戏剧性的风险：假如半小时内赶不上飞往蒙得维的亚的飞机，全部计划都得泡汤。最后，因为弄得一团乱，所有人都说不清直通机场高速的正确路线，两名警察索性跨上巡逻车，在前面给我们领路。

两个寻找作者的非法旅客[1]

于是乎，警车拉响警笛、闪着红灯在前面开道，我们驾车以每小时一百多公里的速度一路疾驰，赶到了机场。弗朗奇冲到赫兹租车公司的专柜办理退车手续，我则跑到电话亭，当日第四次拨出了同样的号码。电话占线，我连拨了两次，第三次才接通，但我错失了宝贵的时机，接电话的女人听不懂暗语，愤怒地挂了电话。我急忙再拨，前一次那位男子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话音轻柔和缓，但似乎毫无希望。正像他此前所说的，两个星期之内都没有机会了。我挂上电话，气急败坏，此时距离起飞只剩半小时了。

我跟弗朗奇约定，他去赫兹租车公司结账时，我先办移民局出境手续，万一我在出境时被捕，他则可脱身去最高法院告急。但最后一刻，我改了主意，决定在出境检查窗口对面几乎空无一人的房间里等他。他耽搁得太久了，超出了正常情况，我拎着手提箱，身旁还放着两个旅行箱以及大大小小的礼品袋，随着时间推移，愈发惹人侧目。机场广播里传来一个女声，最后一遍通知前往蒙得维的亚的旅客登机，听那声音，似乎比我还焦急。情急之下，我把弗朗奇的箱子塞到一个行李搬运工手里，又给他一张大额钞票，嘱咐道：

“把这只箱子拉到赫兹租车的柜台，告诉那位正在结账的先生，要是他不马上赶来，我就登机了。”

“您自己去找吧，”他对我说，“那样更简单。”

我只好向一位负责在入口处检查旅客的航空公司女职员求助。

“请帮个忙，”我对她说，“再等我两分钟，我要去找一位朋友，他正在付租车钱。”

“还剩十五分钟。”她说。

我一口气冲到租车柜台，也顾不上举止风度了。焦虑让我丧失了另一个自己的迟缓稳重，再次变回了那个一贯冲动的电影导演。此前数小时的谋划、精确入微的设计、仔仔细细的彩排，两分钟之内就原形毕露。我找到弗朗奇了，他正异常镇静地跟一个职员就汇率问题讨价还价。

“真是胡闹！”我对他吼道，“别管多少，赶紧付钱，我在飞机上等你。我们只剩五分钟了。”

我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快步走到出境检查窗口。移民局官员翻看了护照，抬头盯着我的眼睛。我也同样回看他。然后，他对比护照照片，再次端详我，两人目光交汇。

“去蒙得维的亚？”他问我。

“对，回家，享受老妈的厨艺。”我说。

他望了一眼墙上的电子钟，说：“蒙得维的亚的航班已经起飞了。”我坚持说不会，于是他跟智利国家航空公司的女职员求证，后者证实舱门的确没关，她正在等我们登机。此时只差两分钟了。

移民局官员在护照上盖章，微笑着递还给我。

“旅途顺利。”

我刚走出出境检查口，就听到机场广播正用最大音量呼唤我的假名。我想这下全完了，从前以为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倒霉事，此时却无法挽回地落在了自己头上。脑海闪过这些念头时，心里却有一丝如释重负的奇异感觉。然而，用广播叫我的人其实是弗朗奇，因为他的登机牌被我夹在证件里带过来了。我只好再跑到出口，请求刚才那位在我护照上盖章的官员允许我把登机牌递过去，而后拖着弗朗奇通过了检查口。

我俩是最后登机的乘客。我们行色匆匆，没想到竟一步步重演了十二年前我登机逃往墨西哥的旧事。我俩在仅有的两个空座上坐定。此刻，这段旅程中最为矛盾的感受在我心中涌起。我一面悲伤至极，愤怒不已，再次经历着难以承受的流亡之痛，但一面也深感宽慰，因为参与这场冒险之旅的所有人都安然无恙。谁知机舱广播里传出了一条意想不到的通知，迅速把我拉回了现实：

“请所有旅客拿出机票，现在进行检查。”

两名便衣站在机舱前面，可能是航空公司安全员，也可能是政府特工。我坐飞机的经验不少，知道最后一刻验证登机牌号、核对登机情况不是什么稀罕事。但这还是头一回碰上要乘客出示机票的情况，我心里不由得冒出不祥的联想。我焦虑不安，只能与身旁分发糖果的空姐搭话，在她一对迷人的绿色眼眸中寻找避难所。

“小姐，这实在太反常了。”我对她说。

“唉，先生，我该怎么跟您解释呢，”她说，“这些事我们也做不了主。”

弗朗奇一贯是身处窘境也忘不了开玩笑，他问空姐是否会在蒙得维的亚过夜。她用同样的口吻回答说，那得问问她丈夫了，他碰巧是这架航班的副驾驶。而我呢，在另一身份背后躲躲闪闪的羞辱感，一分钟也忍受不下去了，内心有股冲动，想起身朝迎面走来的检查员大喊："全都给我滚！本人就是电影导演米格尔·利廷，克里斯蒂娜和埃尔南的儿子，你们谁也无权阻止我在自己的祖国用自己的姓名、自己的面孔正常生活！"但遭遇现实之际，我还是不知不觉地躲藏到另一个自己的护身铠甲之下，尽量不动声色地递出机票。检查员瞧都没瞧就还给了我，甚至没扭头瞥我一眼。

五分钟后，飞机越过被夕阳染成玫瑰色的安第斯山脉，我意识到，刚刚度过的六个星期，虽然并非如我初到智利时所预想的那样，是我一生中最英勇的时光，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我一辈子最值得的六个星期。我看了看手表：下午五点十分。这个时候，皮诺切特正带着他的随从们，走出办公室，慢悠悠地穿过空寂的长廊，踩着铺设了地毯的华贵阶梯下到一楼，却没料到身后拖着我们给他装上的三万二千二百米长的驴尾巴。我还怀着深刻的感激之情忆起埃莱娜。这时，那位生着碧色眼眸的空姐给我们端上两杯迎宾的鸡尾酒，主动透露给我们说：

"他们以为飞机上混入了一个非法旅客。"

我和弗朗奇双双举杯，向她致意。

"其实是两个，"我说，"干杯！"

---

[1] 这一小标题戏仿了意大利小说家、剧作家皮兰德娄的戏剧作品《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